

# 日本的军国主义

(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册

[日]井上清著

商务印书馆

# 日本的軍国主义

(天皇制军队和軍部)

第一册

[日] 井上清 著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本书根据 1954 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井上清著“日本の  
军国主义 I——天皇制军队と军部”译出。

## 内部读物

### 日本的军国主义

(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册

〔日〕井上清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59 年 2 月初版	开本 787×1092 1/27
1972 年 6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158 千字
印张 7 21/27 插页 1	印数 5,501—55,500
统一书号, 3017·19	定价, 0.62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井上清是日本进步的史学家，现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日本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部落问题的研究》等书。

本书是根据井上清所著《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译出的。内容分两篇：《幕府末期的兵制改革和民兵》和《天皇制军队的建立》，比较深刻地探讨了江户幕府末期至明治前半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形成，揭露了江户幕府封建统治的残酷性、腐朽性、脆弱性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分析了明治政府天皇制军队是在残酷地压迫和榨取日本人民的基础上，以对外侵略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中译本初版于1959年，这次重印，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1972年5月

## 前 言

目前我国正在加速进行重整军备，军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复活了。这种军备和军国主义，因为隶属于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所以和过去的军备和军国主义截然不同。从而在新旧的军队和军国主义之间也就产生了种种的区别。

然而，认为目前的重整军备和恢复军国主义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而看不见它是为日本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服务，看不见它也是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大日本帝国”的野心而利用的手段，那就要大错特错了。

目前的军备和军国主义同过去的军备和军国主义不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既然都是建筑在天皇制、半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共同的基础之上，当然就会产生出共同的性格来。因此，为了反对目前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为了争取民主主义与和平而斗争，对过去的军队和军国主义加以历史的研究，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根据以上的看法，从我所研究的过去的日本天皇制军队和军国主义的论文中，选出五篇，分作两册，以“日本的军国主义”为题而出版。其目次如下：

### 第一册 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篇 幕府末期的兵制改革和民兵的萌芽

第二篇 天皇制军队的建立

###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一篇 征韩论和帝国主义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成立——

第三篇 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預兆——

以上五篇中，第二册的最后一篇論文曾在杂志“历史学研究”的一五一号、一五三号上發表过(1951年5月、9月)。第二册的第二篇是在1950年秋为历史学研究所編“近代日本の形成”写的初稿。

第一册的两篇論文都是以十八年前即1935年我当学生时在羽仁五郎先生恳切指导下所写的論文为基础而写成的。但是在当时是无法發表的。战后，日本軍隊已經瓦解，因而認為再来發表它的創建史已經沒有意义了。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現在对軍隊問題又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虑了，因此把原稿大加增补，予以發表。

除以上两篇以外，其他論文都是在这里初次發表的。

原定在第一册內还要包括一篇五十頁左右的論文“軍閥和政治”，并已在先前出版的第二册序文里提到，但因最初两篇論文增补甚多，仅仅这两篇就已大大超过了預定篇幅。这样一来，这篇“軍閥和政治”与其象現在写成的这样概論，就不如改为詳述事实的論文，把它另行編入“日本の軍国主义”第三册中，而不在这里發表。請讀者見諒。

第二册的第一篇是在1940年写的。在这年春天，每日新聞社为了配合紀念所謂“皇紀二千六百年”大事宣傳天皇主义的运动，把德富苏峰所著“昭和国民讀本”的一部分版稅作为奖金，以“征韓論の真相及其影响”为题悬赏征文，本篇即其应征論文，不过根本沒有入选。

我之所以在这样軍国主义的法西斯的悬赏之下应征，是想要單人独馬杀入敌陣的核心。同时也以为既然有尾佐竹猛博士、辻善之助博士等人担任审查員，如果是一篇徹底实証的、具有充分史料根据的論文，即便是批判軍国主义的，也可能通过。但是后来听說，这篇論文在苏峰的門人們进行予选时一下子就被淘汰了，正式的审查員根本沒有寓目。于是不禁苦笑：自己未免过于天真了。写这篇論文时，得到了友人宗京奖三君很多帮助。

这篇論文在苏峰奖的审查中虽然落选了，但是現在为了請反

对軍国主义的人民予以审查，特地再發表出来。这篇論文的一部分，过去曾以“两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題在“历史学研究”上發表过。

本書如果对讀者多少有些参考价值，那便万分荣幸了。

井 上 清 1953年11月25日

# 目 次

前 言	i
第一篇 幕府末期的兵制改革和民兵	1
第一章 幕府末期兵制改革的必然性	1
第一节 封建军备的腐朽和国内的动荡不安	1
第二节 列强资本主义的威胁和兵制	13
第三节 改革的开端	26
— 外患和内憂 —	
附：农兵論	35
第二章 幕府的兵制改革及其矛盾	40
第一节 三兵的創建	49
— 文久年間的改革 —	
第二节 征討長州的失敗和庆应年間的改革	60
第三节 幕府兵制改革的种种矛盾	71
第三章 民兵性的各种組織	79
第一节 担任海防的农兵	80
第二节 为領主和地主服务的农兵	84
第三节 改革派的平民性軍事組織	90
— 長州奇兵队及其他 —	
第四节 革命民兵的萌芽	101
第二篇 天皇制军队的建立	113
第一章 征兵法的制定	113
第一节 天皇政权的成立和对民兵的压制	113
第二节 各藩兵制的整理和統一	122
附：关于海軍	134
第三节 廢藩置县和征兵法的制定	139
第二章 征兵制的实现	160
第一节 壮兵的解散和士族的整理	160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	169



第三章 天皇制軍隊的建立.....	183
第一节 統帥权的獨立.....	183
第二节 財政及經濟基础.....	187
第三节 奴隶式的軍紀——充兵制度.....	190
結語 走向战争.....	196

# 第一篇 幕府末期的兵制改革和民兵

## 第一章 幕府末期兵制改革的必然性

### 第一节 封建軍备的腐朽和国内的动蕩不安

江戸时代<sup>①</sup>中叶以后，整个武士阶级風气頹靡并陷于无法挽救的貧困状态。关于这些，已有很多著述。

例如，辻善之助教授在“田沼时代”一書中生动地叙述了旗本<sup>②</sup>喝醉酒后溺死在壕沟里，同妓女情死，淪为地痞流氓或同平民斗毆反遭平民毆打等情况。甚至在尊王攘夷的口号甚囂塵上，举世杀气騰騰的1860年，德川幕府还就武士的“格杀勿論”發出这样指示：即便武士格杀平民不成，反遭平民杀死，只要不違背武士道的精神，武士的身分仍然准許世襲，所以不要貪生怕死<sup>③</sup>（三浦周行“国史上的社会問題”）。

武士的日常生活既然如此，无怪乎天保末年有人上書<sup>④</sup>說：“目前，担任武职者同袍之間互相猜忌，以致新入伍者自然无法进行練習。”因此，也就难免受到这样挖苦：“嗚呼世祿之士果熟習槍劍火攻水战之术乎，抑或精通茶經瓶史乎”<sup>⑤</sup>。

除了这些以外，这类責难武士墮落和懦弱的例子，多至不胜枚舉。

其次，上自幕府各藩下至全体武士普遍貧穷，也是人所共知的

① 自1600年德川家康在江戸創建幕府至1867年德川庆喜归还政权于天皇。——譯注

② 俸祿在一万石以下有資格晋謁將軍的幕府直屬武士。——譯注

③ 武士与平民斗毆时，如果武士未經拔刀即被平民杀死，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現，因而他的武士身分就被撤銷，不准世襲。——譯注

④ 代官北条雄之助上書，見胜海舟編“陸軍历史”卷十三。

⑤ 赤井东海“海防論”見日本海防史料丛書第二卷。

事情。由于貧困武士典當“灵魂”——武器的事例，早在享保九年的“远藤守信存寄書”（“伊达家文書”六）中就有所記載：“諸侯的家臣迫于穷困，近年来不仅典當武器和馬具（中略），即使这样，仍然难以維持生活，因此，倘若交給重任，必有多数人受到飢餓，以致發生騷动。”此外，“升平夜話”、“世事見聞录”等書中也有类似記述，这里就不再引了。

而且，不仅是典當或出賣象征着“武士灵魂”的这些东西。当幕府和諸侯強制实行征地減祿时，有人甚至說，一部分家臣“恨主如恨敌”<sup>①</sup>，甚至有人估計：“忠心耿耿为主效力的家臣几希矣”<sup>②</sup>。这些话都是人們常常引用的。

这些不仅說明个别武士日益頹靡和日益腐化，同时也說明封建制的整个組織本身已趋于崩潰，因为世襲家臣已經减少。关于这一点，熊澤蕃山早在“大学或問”一書中就說过：“武士弃农以来（中略），年輕武士或下級武士只服役一年，故无忠君思想，此軍备上之損失也”。荻生徂徠在“政談”里甚至說：“近来頂替服役之風盛行，將軍、諸侯已无世襲家臣矣”。这一类議論，此外还有很多，这表示士兵正在从从屬关系过渡为雇佣关系，这是純粹的封建制度，当然亦即其兵制趋于崩潰的一种征象。

并且，在另一方面，农民和市民对封建統治的反抗也日益高漲。鎮压了烏原之乱<sup>③</sup>和实行閉关政策以后，幕府各藩的封建統治得到巩固。但后来不到一个世紀的享保年間就又出現了新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头一个高潮。当时荻生徂徠在“政談”中叙述“农村秩序”發生动搖的情况时写道，武士領主向农民征收租稅时，“尽量要多征，而农民則尽量想少繳，双方为了多征和少繳爭执不已，因而当时保甲長和农民之間的关系簡直如同仇敌。”

然而，当时的御用文人認為这种情形的产生完全是由于兵农

①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

② 只野真葛“独考論”，見国書刊行会本“新燕石十种”第二卷。

③ 又名天草之乱，是1637—1638年天草及烏原的天主教徒的暴动，其首領益田四郎时貞，率教徒三万七千余人，占据城池，幕府派板倉重信率兵鎮压，不成。后又派松平信綱糾合九州各藩兵力，好不容易才鎮压下去。——译注

分离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也确是这样),因而首先主张通过恢复兵农合一来突破这个难关。这就是所谓“武士土著论”(武士下乡落户)。

关于“武士土著论”这个问题,基本上不需要说明。早在熊泽蕃山的“大学或问”里就有过“恢复旧日的农兵”的主张,在荻生徂徕的“政谈”和太宰春台的“经济录”中也都特别热烈而详尽地主张了这一点。嗣后,随着武家统治的困难日益严重,作为唯一的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士下乡落户的议论也越来越盛了。例如,古贺精里的“寛政纪元十事解”、林子平的“上书”和“海国兵谈”、武元立平的“劝农策”、杉田玄白的“野叟独语”、广瀬谈窗的“迂言”、藤森弘庵的“新政谈”等等都是属于这类议论。特别是作为防御外患的对策,许多人都主张“土著论”,其中包括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大原左金吾的“北地危言”、会泽正志斋的“新论”以及水户的学者们等等。

这种主张并不仅仅是空口的议论。在寛政年间已由津轻藩付诸实行(注一),但结果是失败了。水户藩也在义公<sup>①</sup>统治时期,也曾下令家臣的长子以外的诸子下乡落户,虽然这样,还是失败了(注二)。如果说武士集中城市是历史的必然,那末,除非武士的本质彻底改变,全体武士重新下乡,也就是说,既不是紧急时期的临时性驻扎,又不是退休后的还乡,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天保8年(1837年),藤田东湖在其答复藩主谘询时提出的“土著之议”中详细陈述了“土著”之所以不可能,最后作为折中方案(注三),提出的是使武士迁移到离城二日里范围以内落户的办法,然而这已经不是最初所说的“土著”了。而且就连这个办法也没能实现(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参看注一、二、三)。

既然被认为是挽救武士阶级的唯一根本对策的这一措施注定要归于失败,那末,武家的统治走上绝路,其生活作风日益腐化,从而上述那种颓靡和穷困,以及军备的日益削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① 德川光圀的谡号。一 译注

但是，不論武士階級怎樣頹靡和窮困，只要天下還保持太平，用不着使用武力，也許就不需要實行“兵制改革”了。然而，事實却恰恰相反，當他們頹靡和窮困到甚至開始喪失忠義思想的時候，也正是武士階級受到人民憎恨的時候，同時這也就是他們不能不用武，亦即不能不改革兵制的時候。

統治階級認為“農民就是納糧”<sup>①</sup>，農民一向被剝削得“死不了活不成”。他們的負擔與年俱增，最後還被迫預繳地租。關於這一點，只要回憶一下松平定信的那篇著名的“國本論”就夠了，而在“野政談”等書里也可以看到強迫預征的例子。這樣，由於剝削的加重，農民的力量日益削弱，結果水利灌溉等農業上的基本設施也徹底荒廢，以致經不起甚至短暫的旱天和霖雨。這樣，在江戶時代中葉以後，連年發生劇烈的“天災地變”，封建體制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反過來又造成了對農民和市民的進一步剝削。這樣一來，人民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到處發生農民起義、暴動、改革運動等等，這些就是這個時代的特徵。

元文4年(1739年)在但馬的生野發生了銀礦礦工和農民的大暴動。為了鎮壓這次暴動，在姬路到生野之間的两个地點，安設了鐵筒火弩，在新町安設了10門大炮，并由附近的旗本領地和五處諸侯出動了軍隊，據說“使者往來馳驅，不分晝夜，騷動波及遠方，為島原之亂以來罕見之事”。同年，奧州岩城的平藩統治下7萬石領地的全體農民起義，迫臨城下，據說“城中敲打所有戰鼓<sup>②</sup>，鳴放所有火槍火炮”，武士“都抱定必死的決心”<sup>③</sup>。另外安永2年(1773年)，飛騨的高山發生暴動時，幕府甚至用火槍屠殺起義的百姓<sup>④</sup>。

在這歷次暴動中，農民居然在戰術方面勝過了以作戰為“職業”的武士。例如，天保7年(1836年)南部地方發生暴動時，據

① 在日語里，“農”與“納”同音。——譯注

② “但馬國生野礦工及農民騷動事件”見“元文世說雜錄”卷十九。

③ 見“元文世說雜錄”。

④ 見辻善之助著“田沼時代”，羽仁五郎著“幕府末期的社會經濟狀態，階級關係及階級鬥爭”。

說“農民們全部攜帶鎌刀、柴刀、食糧等等，用手巾或包袱皮包裹面部，頭戴草笠，按照口令進退，簡直不象是農民的動作”（南部史要）。又如寶曆四年（1754年）久留米大暴動時，農民詐稱要打鹿和野豬借出全城的洋槍，進行戰鬥（久留米騷動記見“列侯深秘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寬延年間姬路的農民起義。幾千農民在一個暗夜里把武士引誘到陌生的地方，同時，把幾十只火把綁在大梯子上面抬著前進，偽裝人多，等到武士靠近，一齊息滅火把，由左右加以包抄。其中腿快的人把武士敗走時丟下的槍刀收集起來，連夜送到姬路的神社門前陳列，來向敵人示威（“兵庫縣農民暴動史話”，羽仁五郎前引書）。民眾起義的聲勢這樣浩大，而武士却如同上述那樣腐敗墮落，竟至有的武士雖然想出來鎮壓，而不會騎馬，這種情形使得某些人不能不慨嘆“武士的風格衰敗”（注四）。民眾起義和武家統治體制的走向崩潰逐年加劇，至文政8年（1825年）末，竟然達到這種程度，以致曾經主持“寬政年間的改革”的幕府前任老中<sup>①</sup>松平定信不能不說出：“擾亂日本的將是蠻夷和農民暴動”（三上參次著“江戶幕府的海外知識”，史學雜誌35編8期）。

這已經不是荻生徂徠所慨嘆的“農村秩序”發生動搖的程度了。必須設法重建鎮壓民眾暴動的軍事力量。以獨特的哲學觀點著稱的三浦梅園早在天明6年（1786年）就曾說：“對於軍備，似乎各州不重視。前幾年有烏原之亂，近年各處時常發生農民暴動，間有全村暴動者。每次都是突然發生，迅雷不及掩耳。可能釀成內亂，不可忽略，必須慎重對待。此類事件，假如事先得知，尚可預防，然而變亂總是爆發於突然之間。”（下略）因此，建議必須經常重視軍備（“梅園全集”上）。松平定信等人也曾研究過對付農民暴動的軍事策略，他曾這樣說明當時城的構造和誘致農民和市民的戰術：“外城的‘帶曲輪’所以稱為‘和黨曲輪’是由於賤民、農民、市民暴動時，以後門誘入，然後在這個曲輪中加以捉捕的原故”（“花桔錄”）。

① 總理政務，統轄各大名的官職，員額四名或五名，每月輪流執政。——譯注

和上述形势相关联的、值得注意的是佐渡島的軍备。根据大約在 19 世紀初期編写的“佐渡志”(見“吹簾余录”),佐渡有奉行<sup>①</sup> 2 名(駐江戶),隊長 2 名(駐佐渡),其下有广間役(与力級)以下官吏及其嫡子 300 人以上。然而加紧巩固对外防御的天保年間(1830 年代)担任江戶灣防务的浦賀奉行所,也只有与力<sup>②</sup> 18 名、同心<sup>③</sup> 74 名,加上駐守富津竹岡的人員,总共不过 40 名(陸軍历史一三)。而在佐渡对岸的新泻,有广間役以下 170 名(吏征別录)。由此可见佐渡的兵力是如何雄厚了。

关于佐渡的軍备的質量,有更加值得注意的地方。該島从元和 4 年(1618 年),拥有武器,运进和儲藏了信州松本产的火藥和出羽最上地方产的鉛,以后每年有所补充。这批軍火在寬政 11 年(1799 年)因發生火灾而遭到焚毀,次年又从江戶重新补充,以后几年之間每年都有所增加。在操場方面,从早就有馬匹調教場,享保年間(1716—1753 年)又在相川北澤开辟了鳥槍場,自文化 2 年(1805 年)起,扩充到全島每一角落。相反地,享保年間开辟的射箭場,經過十年左右就被取消,同时开始了火槍的騎射和走步的教練,每年由官府举行考試。这种火槍队教練的具体进行情况虽然不得而知,單从取消弓箭練習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知道佐渡的軍备在当时是比其他地方进了一步。

該島在軍备上的这种进步,如果同它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看,当然可以說是具有防御外患的意义,但是該島开始扩充軍备是在享保年間,当时还没有發生外患的問題。那末,促使这种軍备的改革和加强的原因只能認為是在国内。这可能是因為該島距离本土很远,一旦群众發生騷动,倉卒之間,无法求得別处的援救,所以很早就着手充实了島內的軍备。从庆長到享保年間,發生过四次全島居民的越級控告事件,在寬政和文化以前的明和 4 年(1762 年),發生过全体島民 7 万人的大暴动,即以后的天保 8 年(1837 年),

① 奉上級命令,担任某項工作的官員或某一部門的首長。——譯注

② 隶属于“奉行”,指揮“同心”,分掌事务的官吏。——譯注

③ 在“与力”下掌管庶务、警察事务的下級官吏。——譯注

也發生过全島范围的大騷动。此外，还發生过 58 个村庄联名和 207 个村庄联名的两次越級控告騷动事件。佐渡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騷动最多的地方之一（新潟县內务部新編“越后佐渡农民騷动”）。該島很早就实行了洋槍陣法，恐怕也是因为用少数的刀槍对付不了几万群众，同时，該島的官吏都不是高級的武士，而是低級的当地小吏，所以一般武士所鄙視的洋槍队在这里就容易編成。也就是說，这个孤島已經成了一个小小的模型，它体现着后来幕府改革兵制的方向、动机，并提供了使这种改革成为可能的具体条件。

到了民众已經对于封建統治忍无可忍，不得不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在武士階級内部，也可能有的不平不滿的分子企圖利用这种局势，同时，也可能出現同情群众的人。水戶的会澤正志斋等人就在松平定信已經承認农民起义的威力的时候，还認為农民起义不足畏惧，并自以为是地說：“小民非无怨尤騷扰，其所以尚未用兵，是因为胆虛，首倡者不知兵故也”（文政 8 年著“新論”），他的这种說法，只是暴露他自己如何“不知兵”而已。到了天保年間，全国性的騷动便相繼爆發了。

天保 4 年（1833 年），由于灾荒飢饉，全国約有 40 处發生暴动，天保 7 年（1836 年），甲斐地方的农民举行暴动，两万群众逼近了江戶的第一道防綫——甲济城（与东海道上的箱根同是保衛幕府的重鎮），由邻近的几个藩出动大軍，好不容易才鎮压下去（“郡內騷动記”）。在这个事件還沒結束的 9 月間，德川氏的故乡三河国又發生了大規模的群众武装暴动，这次也是由各藩联合出兵鎮压的。这次暴动結束後，光是被判刑的就有二万一千多人（“爱知县史”）。同年 12 月，陆奥的盛岡地方也發生了同样的民众暴动。在这一年里，全国有二十多处發生了暴动。

到了次年即天保 8 年（1837 年）2 月，終於發生了由“知兵”的人領導的群众暴动。这一事件，發生的地点不是別处，恰恰就是“全国的經濟中心”大阪，領導暴动的人也不是別人，而是一个曾經当过町奉行所組与力（相当于市的区警察署長）的大盐平八郎。



大盐号召民众起义的檄文中說：“告……以及上天的赤子——各村的佃农”，可見他号召的对象也包括貧农在內。他的檄文一开始就說：“四海困穷，天祿难保”，接着指責幕府的失政、富豪的橫暴、官吏和富豪互相勾結、人民的困苦等等，并且說“决不是一时的暴动蜂起，必須作到逐漸減輕租稅和各种徭役，百廢俱兴，实行神武帝的政治，对人民寬仁大度”。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武士階級的腐化、穷困和农民的騷动，而是武士和群众打成一片来向武士开火了。并且这一事件还明显地表现出从單純的“暴动蜂起”进一步要求政治改革，虽然这种要求还不够明确。这一点表明大盐事件在性質上有着重要意义。

这次暴动虽然只經過两次冲突就結束了，但是它却严重地震惊了幕府和各藩，这是众所周知的。已經到了次年正月，水戶藩主德川齐昭还不相信大盐已死，甚至幕府的大目付<sup>①</sup>也似乎对此有所怀疑(注五)。大目付曾向德川齐昭报告說，当时国内“不用說再發生灾荒，只要有风风吹草动，馬上就有可能發生变乱的”。<sup>②</sup>人民“甚至愚夫愚妇也都尊敬平八郎<sup>③</sup>”，还說有这样一個民謠：“大炮插着旌旗，上写拯救黎民”<sup>④</sup>。次年5月，有一个姓生万田的自称是“大盐平八郎的門徒”在越后的柏崎举行暴动。此外，由于大盐之乱的影响，長州藩也發生了群众暴动。

大盐之乱徹底暴露了幕府軍备的腐朽无用。于是，幕府也就赶紧張罗充实軍备。藤田东湖在“回天詩史”里写道：“乙酉，叛賊大盐平八郎結党倡乱于大阪，騷扰近畿，关左为之騷然。戎衣兵革之費，驟然增加数倍”。

德川齐昭看到自己領地內，也發生了群众騷动以后，如同上述那样，他不相信大盐已死，所以在手書里說：“大盐如果再来，当与

① 監察官，在老中下監督政務，同时監察各大名。——譯注

② “水戶藩史料”別記下，第十五卷齐昭手書(參看注五)。

③ 藤田东湖“見聞偶筆”，东湖全集。

④ 見“卷間贅說”，“近世風俗見聞集”第四。

上次不同，必有妙策，因此务希先与侍衛長商議，要进一步加强武备，并暗暗通知武庫方面进行戒备”。同年5月又上書說：“前年申年<sup>①</sup>，在大阪發生了大盐平八郎之乱，参州和甲州农民也有騷动，想是連年灾歉所致，社会总是不安，因此务希加强武备，尽管这样作有些过分”，并决定选拔槍炮隊長以下以至于普通武士的嫡子，成立了近衛队(注六)。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文件里，关于对外防禦問題只字未提。

近衛队隊員要受以下訓練：(1) 每月定期練習使用 22.5 克子彈的洋槍六次；(2) “槍刀是作战上最重要的武器”，必須特別努力練習，(3) 不論怎样不爱學習的人 至少也要經常閱讀“用假名写的武士道的書”。第一条可能是鑒于大盐之乱自始至終使用槍炮作战而規定的。第二条表现出武士对于槍刀仍旧恋恋不舍。一般武士从来認為槍炮是兵卒使用的，他們自己不屑于練習使用槍炮，而这里却把練習使用槍炮規定为訓練从高級藩士中选拔出来的藩主近衛队的第一条，这就表明德川齐昭等人也已經初步預感到未来的战争所将具有的新的性格，和使用旧式刀槍已經不可能鎮压人民大众。另外，第三条还暴露当时武士階級中比較健全的分于文化水平够多未低。

德川齐昭还居于德川氏三藩之首，他利用这种重要地位，于天保10年(1839年)6月向幕府当局上了“戊戌封事”臚陈内憂外患，殷切建議革新政治和充实军备。这“封事”是在天保9年戊戌(1838年)起草的，里面写道：“居于治世而不忘乱，这话人人都講，但是现在上下忘乱，以致發生种种内憂”，“遇到凶年則坐視人民餓死，武备廢弛，士民惰弱，以致近年以来有参州甲州农民結党暴动，大阪奸賊企圖掀起大乱，而今年又發生了佐渡的暴动。究其原因，总不外乎在下者怨恨在上者和不惧怕在上者。自烏原之乱以来，大約二百年未动干戈，近来則頻繁用兵，事态严重，倘官吏等閑視之，后患将不堪設想，因此建議，必須从速施行仁政以解除民怨，并充

<sup>①</sup> 这个文件是天保9年戊戌写的，所以說“前年”是申年，这是对的。但是大盐之乱是在前一年即酉年，这里說申年，是包括三河的大暴动和大盐之乱而言。

实軍备使人民有所畏惧”云云,他在这里严厉地責难了幕府的官員。这个建議書接着又談到外患問題,这里从略。

幕府根据德川齐昭的建議書,着手实行所謂“天保改革”。在各藩里,如長州藩和佐賀藩,也鑒于大盐之乱和本藩內發生的大暴动<sup>①</sup>而着手进行改革,这些大暴动有的是因受到大盐之乱的影响而發生的,有的是与大盐之乱直接无关的。这种改革的真正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其次是为了充实和改革軍备,以及通过这些来維持和加强封建統治。

如上所述,完全由于国内的历史形势的發展加劇了武家統治的整个体系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迟早必須实行某种兵制改革,而实际上已經开始作了一部分。

不过,正当这个时候,欧美列强侵略远东的鋒芒已經逼近日本,成了当时的重大問題。防御欧美侵略的問題被提到首要地位,因此国内問題暂时被大大冲淡了。

(注一)青森县史第二卷。

天明4年12月28日津輕藩布告:“近有荒田,聞藩中武上有欲报領而归农者,認為可行(中略)。虽严重違背祖宗遺法,但仍拟按俸額分与田地,仰即自由申請”。

这还是恩賜式的准許归农。但到了寬政元年(1789年)10月朔日,藩主便發出布告說:

“卯年以来,上下艰苦(天明4年大飢饉),百物昂貴,祿薄而家口众多者,日用不足,生活困窘,男女如不适当地从事紡織农耕,人口漸增,一向从事生产者恐將多数廢罢。故应按古来習慣居乡开垦荒地,从事耕織,其愿下乡生产者拟發給津貼以便迁徙”;这样竟然奖励起来了。

另据,寬政4年(1792年)8月21日的布告:

“自卯年發生灾荒以来,荒田甚多,天明4年12月,曾通告藩中武上可自由申請报領落戶,从事开垦。又寬政2年……(中略)”,“据聞所發津貼不足,既无房屋又无去

---

① 長州的改革是从天保8年5月开始的,該藩鑒于藩內受到大盐之乱的影响而發生了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認為必須改革藩政,于是起用村田清風担任这个工作(“修正防長回天史”一)。

鑒于大盐之乱时本藩在大阪的貨庄的衛兵也出动参加鎮压,佐賀藩也感到如果不主动地改革藩政,前途就不堪設想,恰巧在次年,比邻的唐津藩內發生了大暴动影响波及到佐賀藩內,所以不得不着手改革藩政(“鍋島直正公傳”一、二。秀島成忠著“佐賀藩枪炮沿革史”)。

处者，无法申請落戶等情，此次已規定增發津貼，凡愿下乡落戶者可即申請”（以下从略）。

这样已發展到半强制，并对沒有領地的武士，規定由藩撥給。企圖通过这样办法，使武士变成在乡村落戶的自耕地主，从事垦荒，以便挽救藩和每个武士的貧困。

并在寬政5年（1793年）10月朔日的布告中说“奉藩主諭，关于武士婚姻，虽早有規定，但下乡落戶者如欲同农民結婚，一經申請应予照准”。

既然使武士下乡落戶，那么，就不得不允許武士同农民結婚。不过，虽然千方百计地奖励，但这时（寬政5年10月朔日）已經不能不这样说：

“近来有人散布种种謠言，妄称关于下乡落戶一事藩主尚未作最后决定，致使群情騷然。”至同月2日，竟然發生以下这种情况，必須加以制止：

“据聞申請下乡武士中，为物色空房，竟有进入民宅擅自釘上自己門牌和木樁者，殊屬非是，嗣后不应再有此类不法举动”。这是必然的，虽然把住在城市的武士遣放到乡村，但是他們也决不肯亲自开垦荒田，無論是住宅或是其他东西，他們总是想要夺取农民的。然而这时的农民，已經不是鎌倉时代的“賤者”，他們已有了强大的抵抗力。

到了寬政6年（1794年）閏11月，已經完全暴露了武士下乡的有害无益了。

“查鼓励武士下乡落戶”，原为“使其繼承勤儉朴素之風，安家立业，以便奉公效勞”，“据聞，下乡后，反而沾染奢侈習气”。

还有：

“查在决定使武士下乡落戶以前，因考慮可能發生不法情事，曾以严令訓飭在案，近聞下乡务农者迟迟不繳公粮，当由村吏催索时，反而提出异議，进行非法抗拒”。这說明一旦下乡，他們便任意侵吞該村公粮，影响了藩的收入，和藩当初企圖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就背道而馳了。

“再者，在下乡开垦武士中，竟有人向村方提出无理要求，或勒令农民預繳地租，将应繳各种实物地租折成稻米，农民申訴无力繳納，反将租粮强行增加一倍，使农民深感困难。此外，尚勒令农民提供馬匹等，如为公家服役，自无不可，但据聞，尚有耕种私有田地而拉伕者，殊屬非法之尤”。

这就是說下乡武士純粹想作当地的領主、或农奴主，这是藩体制走向崩潰的征象。

此外，藩的政务已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史料从略）。本来封建制度已經發展到“藩”这样一个地方成为一个經濟和政治的單位，而現在却要破坏这个單位，所以藩这个机构也就陷于瘫痪了。最后，在寬政10年（1799年）5月2日發出布告說：

“因鑒于下乡武士中間有开垦荒地成家立业者，故有飭令下乡务农之举，近聞每多不能成家立业，反而益增困难，今后仍令居住弘前（藩的首府）”。

由于这样，終于取消了武士的下乡务农，并对以前主張武士下乡务农的家老等

人，分別予以免職，或反省的處分。

（注二）水戶藩史料，上篇 乾。

安政2年10月6日，烈公（德川齊昭）對幕府海防司所擬下鄉務農方案的一段批評語如下：

“本藩曾由源義（指義公，即德川光圀）創立馬廻<sup>①</sup>一職，選拔武士之次子，三子充當，使其全部移居城市近郊務農，但結果不能符合原初目的，不久，又令其迂回城市”。

藤田东湖全集

在天保8年8月關於下鄉務農的意見書中寫道：

“即使在義公時期，“馬廻”下鄉務農之議，猶未能行通，不久又復廢罷”。

（注三）藤田东湖全集。

上述引用的“關於下鄉務農的意見書”

“按目前情況，只令志願者五人或十人下鄉務農，數年之後，將不異於以往之鄉士<sup>②</sup>恐難成為國之干城。

一旦實行下鄉務農，“則大部武士將輪流交代，長期勤勞者亦必視警衛室（班上）為臨時住所”，“本來，下鄉務農應貫徹輪流交代的方針”。

但如果讓所有武士都這樣下鄉務農，就要產生如下情況：

（1）藩城內的武士住房將全部騰空。

（2）執掌政務者以及各級官吏遠居鄉間，則難以上班，又必須遷來藩城，如斯，則俸祿在五六百石以上者姑置不論，五六百石以下者，“其鄉間住宅又將空出”。

（3）另外，還要輪班前往江戶值勤，這樣，則“在江戶亦屬旅居，在藩城亦屬旅居，終年旅行，不僅於工作不利，而雙重輪班既須到江戶值勤，又須到藩城值勤，恐非武士所能長期堅持者也”。

（4）“此外，武士與農民雜居鄉間，亦將發生種種問題，而官吏下鄉又諸多不便，總之，下鄉務農一舉恐難實行……”。

具有遠見的藤田东湖經過具體考慮後，已經從理論上預見到如果實行下鄉務農，勢必如前注津輕藩那樣，村民和下鄉武士之間發生對立。儘管如此，东湖還是多方試圖實現這一措施，因而，提出建立“綜合了封建制和郡縣制”的下鄉務農方案。他還說：

（5）使武士下鄉務農，流弊甚多，可能導致領主之政令不行，甚至釀成叛亂，總之，難免尾大不掉之患”。

為了避免發生這些弊端，並保證武士不致變成“溫室武士”（常住城市的文弱武士），他主張“應使武士分別移居于城郊2日里範圍以內的鄉間。每日進城上班”。為了解決“子弟學習文武”及其他問題，他主張設立“城內”和“下鄉各組”學校。

① 護衛大將的騎馬武士。——譯注

② 居鄉的武士，平時從事農耕，戰時結隊臨陣。——譯注

此外，关于武士下乡务农論的全般內容，以及德川齐昭反对武士下乡务农，認為武士下乡以后，势必逐渐向富裕农民低头等情況，請參閱本章末尾的“农兵論”。

(注四)野史雜語。

“据云前者羽州山形境内农民暴动时，米澤武士佩帶武具欲上馬而馬惊不得上，極感困窘，平心論之，危殆之事莫过于斯矣”。

“而在本藩內，农民动辄蜂起，近則藩主府內消防員等頻繁結伙斗毆滋事，足見武家風教已衰，可畏也已”。

(注五)水戶藩史料，別記，下。

天保9年正月，烈公致老中手書：“去冬据大目付（土屋紀伊太守）密报，甲州、大阪等处發生暴乱后，变故相寻至今犹未平息，聞大目付等亦甚为震惊，不用說再發生灾荒只要有個風吹草动，……”（以下部分已引用在本文中）

“据聞大盐业已燒死，一时可告无事，然近来又出現貌似大盐者，聞已下令通緝，因此又謠傳，大盐实际并未燒死，此与大目付密报相符。如再發生变乱，大盐再次出現，当与上次不同。”（以下引用在本文中）

既然“与大目付密报相符”，可見大目付也怀疑是否大盐已死了。

(注六)水戶藩史料，別記，上。

“天保9年5月5日，选拔槍炮隊長以下普通武士以上的嫡子編成近衛队”。

“自巳年以來，申年及本戌年連續發生大灾荒，藩主用度支絀，所有編制近衛队一案开支过大，即使逐步实行減俸，仍难以达到平衡。然而發給近衛队之甲冑、洋槍等物，业經制造齐备，再者，前年申年大阪地方（以下引用在本文中，从略）应即充实武备，当經議决选拔槍炮隊長以下及御目見（之長子擅長文武或品行端正者）百人，如蒙每年發給学費銀幣二枚，当能倍加鼓励。以上各节容調查研究后报請鈞裁。在未有关批示以前，希即着令物色人选”（編制法等从略）。

据說，这一方案原来想于天保7年施行，只因發生灾荒，未能实现，后来，因为上述理由，“虽然有些过分”，还是成立了这种近衛队。

## 第二节 列强資本主义的威胁和兵制

在这里不需要叙述列强侵略东亚的外交史，只是看一看防备这种侵略的軍事改革是怎样提到議程上来的。

元文4年（1739年），俄国軍艦开到安房<sup>②</sup>海岸，安永7年（1778

① 有資格晉見藩主的武士。——译注

② 今屬千葉县。——譯注

年)，俄国人在虾夷<sup>①</sup>地方致書松前藩吏并贈送方物，要求通商，但是这些事件几乎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

到了天明年間，即天明六年(1786年)出版了林子平著的那部著名的“海国兵談”第一卷。在这部書里，第一次出現了日本的全民性防衛和以此为目的的新的軍事思想的苗头。“海国兵談”和从前的任何軍事理論都有本質上的不同。从前的軍事理論只是研究封建領主相互間的战争和封建領主对人民的战争，而林子平所提出的却是把領主和人民合而为一的、一个民族的或者一个国民对别的民族的防衛战争的問題。一般說来，在当时，軍事学是一門秘密傳授的學問。而林子平却把他的研究結果出版公开出来，并希望“不分貴賤，不分文武”，凡是“国人”都来研究這個問題（“三国通覽圖說”）。这是因为他的軍事学不是为了維持封建統治的軍事学，而是为全民服务的軍事学，是与全民的生死攸关的，应该由全民来运用的軍事学。

林子平已經对于近代的統一的民族国家有了比較正确的認識。这一点从他的“兵談”第一卷中以下的話可以看出来，他說“尤其諸国(欧洲各国)皆有妙法，政治修明，人民相亲，故不自相攻伐。世代因結一心，專事侵掠他洲，并攫为己有，一國之內，决不进行內战，此日本、中国望塵莫及者也”。这位接近于国民的立場的林子平不同于松平定信和德川齐昭等最高封建統治者恐慌焦虑于“內憂外患”，他說：“天地之間，人世之間，也有变革，此乃不易之理，切勿以为万万世永远一如今日”。他已經預見到并确信历史的变革和走向进步（“海国兵談”卷一）。

他从这种預見和确信出發，不是为了研究諸侯相互間的、以及封建主鎮压人民的軍备，而是为了研究日本民族的对外防衛，不但學習了荷兰文書籍的翻譯本而且还到長崎实地研究了荷兰船和荷兰炮，并对世界局势和日本的軍事地理条件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① “北海道”的旧称 —— 譯注

他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而得出的結論就是：“海国必须有海国的防衛”。

他說：“窃維当时長崎已有强大火炮装备，而安房、相模<sup>①</sup>两地的海港，却无此装备，此事令人百思莫解。細思之，自江戸之日本桥至中国、荷兰乃一貫相連之水路，而竟不于此設防，惟設防于長崎者何哉。依愚之見，应于安房、相模两地各置諸侯，而于海峡兩側，严密設防。如对日本全部海岸进行設防，应以此海口为先，此海国武备中之最要著也”。

这段著名的話，只有理解了林子平的根本立場，才能了解其真正意义。

林子平虽然沒有从正面反对当时对建造大船的禁令，但是却把荷兰船的情形詳細地加以介紹，然后說沒有这样船只就不可能进行水战，并極力主張海国軍备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設这样的海軍。林子平在战术上也持有新的想法，他对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战术加以比較，認為日本的战术以血战为主，中国的战术以理法为主，而欧洲的战术以火器船艦为主，因而主張将此三者綜合起来，灵活地加以运用。他又說：“勿热衷于取敌人首級，应以追赶敌艦为主”，“即便陆战，以未經操練者当之，犹多陷于混战，何况水战，尤不可不經操練也”。这样，他否定了單人独馬的血战，強調了集体战斗<sup>②</sup>（“海国兵談”序）。

林子平由于出版“海国兵談”及“三国通覽圖說”，触怒了幕府当局。寬政4年（1792年）5月，老中松平定信把他逮捕下獄。当时，北海道的防衛問題剛剛引起人們注意，同年9月，拉克斯曼<sup>③</sup>来到根室，要求通商，于是，全国为之嘩然。松平定信認為應該赶

① 今屬神奈川县。——譯注

② “海国兵談”一書，从内容看来，序文和第一卷“水战”，似乎是正文，第二卷“陆战”起一直到第十六卷，似乎是附录。著者煞費苦心独創出来的部分是第一卷。第二卷以下，虽然也不无独到之处，例如主張减少武士的俸祿，使其成为自耕农而不是單純的“武士下乡”，但总的說来，还是以获生徂徠的“鈴录”为主，并参考其他兵書而編写的一种旧式兵書。林子平在第二卷以下沒能徹底摆脱过去的老一套，这表明他的局限性

③ A. K. Лаксман 沙俄軍官。——譯注



紧充实“海防”。同年7月，在江戶郊外德丸原第一次开办炮术練習場，接着又視察江戶灣沿岸，着手充实水軍和建立了望所等防禦設施。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松平定信虽然把林子平下了獄，但实际上却向林子平的見識屈服了。

那末，松平定信为什么对林子平判了刑呢？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林子平把海防問題作为民族的問題提出来，而沒把它看成保衛幕府的問題来考虑。对于松平定信等人來說，所謂“海防”首先是幕府和封建統治的防衛，它不但不是民族的防衛，而且也不應該是民族的防衛。寬政5年(1793年)，在昌平坂學問所<sup>①</sup>五条規則的第二条中規定“勿議國政”，這就是說，學生應該注意學習，不准干与政治。松平定信自己也說过：“君子应有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語”(“婆心錄”)。这里所說的“國”，就是幕府的統治机构。凡是“憂”这个“國”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在地协助当局就行了。然而林子平却認為“國”就是全体日本人民，在这点上林子平和松平定信有着根本的不同。表面上同是热心于“海防”，然而，一个認為它是民族的防衛，另一个則認為它是封建統治的防衛。两者不但內容完全不同，甚至还是相对立的。所以，松平定信就不能不处罚林子平。只要象松平定信那样，把防衛看作封建統治的防衛，也就是反人民的和反动的防衛，那末，在采用新的进步技术上，也要存在極其狹隘的局限性。松平定信研究国外情况，写了“海岸防备大意”、“海防独語”、“婆心錄”及其他許多有关海防的著述；另外，还使兰学家前野良澤翻譯“荷兰筑城書”，使石井庄助編譯“远西軍器考”，前者是在寬政2年，后者是在寬政11年完成的，这是关于西洋兵器的最早的譯著(參閱“新撰洋學年表”)。不过，松平定信虽然一方面要求担負着“屏藩之任”的諸侯們“必須留心鑽研外国用兵之道”，但同时又說：“果能通曉外国人情，即可粗通其用兵之道，若不諳其人情，則其术亦难施用，欲知其人情，亦无须通覽外国書籍之譯本，只要留心考察其服装、徽章、器械、财务等各种情况，亦可推断其人

<sup>①</sup> 幕府設立的儒學最高学府，又称昌平黉江戶學問所。——譯注

情矣”(“花月亭遺書”)。

列强資本主义的压迫,既是民族的危机,也是封建制度的危机。松平定信等人把它只看成是封建制度的危机,而林子平的观点固然还不是十分明确的和系統的,但是却表现出,要把这个危机看作是民族的危机这样一种倾向。如果不是或多或少具有林子平的倾向,而是站在松平定信等人的立场,那末,无论怎样大吵大嚷夷狄的侵略,也不可能建立起新的軍备。文化初年,在北方同沙俄的冲突日趋激烈,文化5年(1808年),長崎又發生英国軍艦費頓号的暴乱事件<sup>①</sup>,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文化7年(1810年),前任老中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同会津藩一起奉幕府命令,第一次在江戶灣沿岸构筑炮台,加强防御。然而,据天保8年的調查,那里的备炮,可以發射1貫<sup>②</sup>重以上炮彈的大炮,只有21門,并且其中还有4門發射5貫重炮彈的大炮、1門發射2貫重炮彈的大炮和1門發射一貫重炮彈的大炮完全不能使用(胜海舟著“陸軍历史”十三)。由于發生了費頓号事件,負責鎮守長崎的佐賀藩藩主曾受到幕府的处分。尽管有过这样慘痛的經驗,但是一直到这时候,該藩在軍备上仍然沒有采取任何新的措施。佐賀藩成为进行新軍备的先驅,是在天保以后,这只是由于前节所述的针对天保年間的民众暴动实行了改革的結果(“佐賀藩枪炮沿革史”)。

改革軍备的思想,只出現在不居于封建統治上層的处士之間。繼林子平之后,大原左金吾著的“北地危言”(寬政9年),也和“海国兵談”具有同样倾向,認為“旧式盔甲、兵器、城池攻守器械”,“于防御外寇,多不济事”,他不但否定了旧式的軍备,并否定了旧式的血战。

到了上述費頓号事件的次年(1809年),幕府的儒士古賀精里在“極論时事封事”里提出一項“習水战以补武备”,第一次要求改

<sup>①</sup> Phaeton 艦在 Pellew 上校指揮下于8月15日开到長崎,恣意騷擾,奉行松平康英因兵力太少,束手无策,費頓号得到燃料,食粮后,于19日离去。結果,松平康英引咎自尽,藩主真鍋氏也受到处分。——譯注

<sup>②</sup> 1貫約合8.75公斤。——譯注

革制度，撤銷禁止建造大船的禁令和興建海軍。島原之亂以後，幕府曾嚴禁諸侯建造大船，而海國日本的防衛，如果沒有大船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禁止建造大船，就連林子平也沒能公開表示反對，而到了這時，竟在向幕府提出的建議書中出現了反對的主張。

從此以後，主張撤銷不准建造大船的禁令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幕府絲毫未加理睬。不久，在文政7年（1824年）5月，英國船員為了取水，曾在常陸<sup>①</sup>的大津海濱上岸，被水戶藩逮捕；過了三個月以後，又發生英國船因為闖牛，而在薩摩<sup>②</sup>以南的寶島鬧事，這些事件引起了人們的特別注意。次年（1825年），幕府又發布了這樣一道命令：一旦發現外國船隻，即使是送還日本漂流民的，也要“毫不遲疑”地予以擊退，這完全表現出封建統治者對於外國的那種本能的恐怖心理。幕府在發布這樣命令以前，並沒有考慮過是否可能擊退的問題。同時，雖然發布了這樣命令，但是也並沒有着手進行足以貫徹這項命令的軍備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的學者和先覺之士，不顧各種困難和幕府的壓迫，對於新的軍事技術和海外局勢，進行了研究。佐藤信淵、高野長英、鈴木春山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佐藤信淵早在費頓號事件時，就已寫成“西洋列國史略”、“防海策”，以後又撰寫了“洋槍劣理論”、“三槍用法論”等書。他在“西洋列國史略”的序文中，提到他受阿波藩<sup>③</sup>的委託，“鑄造了許多大炮”。槍炮是新軍備的主要兵器，這一點在佐藤信淵看來，幾乎是自明之理。他在“海防策”中提出打破閉關主義而採取積極的侵略東亞各國的主張，他在以後的“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著）中，根據空想，進一步發展和堅持了這個主張。這種主張所以產生是由於深切感受到列強的壓迫，而未能正確地建立起正確應付這種壓迫的國民的立場，不過，從反對故步自封的閉關政策的意義上來

① 今屬茨城县。——譯注

② 今屬鹿兒島县。——譯注

③ 今屬德島县。——譯注

說，在当时，还是具有積極的意义。

佐藤信淵在这以后的一个短时期曾經專心鑽研农政和农学，几乎中断了对軍事和海防的研究，但到了晚年，又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了(后述)。

对軍事科学进行了系統研究的是鈴木春山。他和高野長英合作，在天保10年(1839年)以前，根据几种荷兰兵書，編譯了“兵学小識”这部四十五卷的巨著。該書共分“学門”十四卷、“战斗术門”三十卷及“总引”一卷。“学門”分养兵、練兵、制械、筑城、地形測量(軍事地形学)、修路等六科。“战斗术門”分战斗、攻守、用兵三科，論述步兵、騎兵和炮兵这三个兵种——称为“三兵”的各个教練和三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綜合了近代軍事学的全部体系。这部巨著当时未能出版，但是相当于該書的縮写本、即鈴木春山著“三兵括法”，在弘化3年(1846年)出版了。高野長英后来遭受幕府的迫害，不得不到处躲藏，在这期間，还翻译了一本著名的“三兵战术”。(注七)

高野長英等人在天保年間，还和渡边華山及当时的其他进步学者共同組織了一个团体名叫“尚齿会”，从事研究外国情况，和外國的“治乱兴亡、練兵炮术、天文数学、本草物产”等問題，企圖用这些知識来改善当时悲慘的国民生活，并对政治和国防有所补益。当天保10年(1839年)，伊豆<sup>①</sup>韭山的代管<sup>②</sup>江川太郎左衛門英龙奉幕府的命令，和目付烏居耀藏互相竞争，对伊豆、相摸、安房、上总的海岸防务进行实地勘察，并臚陈了防衛对策。在这一工作中，由于尚齿会的積極帮助，江川得以运用新的測量技术和軍事知識，因而取得了远远超过保守的烏居耀藏的良好成績(高野長运著“高野長英傳”，胜海舟著“陸軍历史”十三)。

此外，長崎市諮議高島秋帆(四郎太夫茂敦)也对于西洋的炮术、練兵、战术的实际練習进行了研究。他家世代代在幕府的貿易机关“長崎会所”充当“調查員”这一低級官吏，从他父亲那一代

① 今屬靜崗县。——譯注

② 直屬幕府的地方官。——譯注

起，就以“荻野式”炮术聞名于長崎奉行所<sup>①</sup>內。高野秋帆从童年就对炮术感兴趣，自天保2年（1831年）起，向荷兰退役軍官、担任荷兰商館館長的德·希列尼學習炮术、軍事学，并以自費購買带刺刀的火石槍、臼炮、榴彈炮、加农炮，进行实际練習。高島秋帆的門下，除了“奉行所”的人員以外，还有肥前<sup>②</sup>、薩摩、長州<sup>③</sup>、清末各藩的藩士等共280人，在天保12年（1841年）以前进行了學習（細川潤次郎著“贈正四位高島四郎太夫秋帆先生年譜”、“陸軍历史”一、“鍋島直正公傳”三、“薩摩海軍史”上）。

幕府并不喜欢民間人士的这种追求革新的研究。德川齐昭的“戊戌封事”虽然強調“外患”的危險，并要求撤銷对建造大船的禁令，以防御外患，但仍然主張禁止一般人研究“兰学”。<sup>④</sup>他这样說：“槍炮已成为我国首要武器，只要利用得当，可能有利于国家，进行研究制造亦无不可。既然同是人类，只要与西洋人同样專心鑽研，吾国人决不致逊于禽兽一般的夷狄。况近年西洋因过于鑽研，而失去实用价值，无甚可取之处，故对研究‘兰学’，应予禁止”。

这个建議提出不久，幕府便借口有密謀出国嫌疑，把高野長英和渡边華山加以非法逮捕。以后經過查明并非事实。但是，在搜家时沒收的高野長英写的“戊戌梦物語”、渡边華山写的“慎机論”中發現有批評幕府“發現外国船只，应即予以击退”这一命令的文章，認為这是蠱惑人心，詆毀幕政，竟将二人治罪。

这时，英国已对邻邦中国發动鴉片战争，开始了武装侵略（1840年6月开战，1842年8月停战）。从邻国这种遭遇，高島秋帆很快地就吸取了宝贵的教訓。他在开战的仅仅三个月以后，就料到中国的全面敗北。于是，上書長崎奉行，指出小小英国所以能战胜中华大国，完全是由于炮术进步的緣故，同时，批評日本当时

① 奉行所相当于今之市政府。——譯注

② 今屬佐賀、長崎两县。——譯注

③ 今屬山口县。——譯注

④ 字义是“荷兰學問”，指日本从18世紀初叶到19世紀初叶通过荷兰文書籍學習、研究的西方学术。——譯注

的各派炮术，全是远远落在时代后面的“迟鈍之术”、“无稽之法門”，只是“沒落武士、流浪人等糊口之資”，因而建議赶紧“普遍改革全国火炮，充实防务”。

鴉片战争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天保 12 年（1841 年）正月，老中水野忠邦在寄給其心腹川路聖謨的信中說：“虽屬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鑒，关于浦賀防务之建議迄未能作出决定，殊为无状<sup>①</sup>”，表示十分憂慮，并深深感到“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不可晏然自佚<sup>②</sup>”。后来，陪利来到日本<sup>③</sup>时，首先想起的并不是費頓号事件和宝島事件，而是邻国的这次灾难。由于这种緣故，在日本最初的通商条約上，也用明文規定了禁止鴉片貿易（注八）。

因为当时是这样情况，所以高島秋帆的建議，也就被長崎奉行轉到幕府当局，由幕府进行了审查。当时，曾在上年将高野長英等人下獄的主謀人烏居耀藏認為，西洋炮术与日本各派炮术不同，不以命中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用烈性炸藥轟击多数人，“盖以西洋不知礼法”，專斗勇力，不同于日本、中华着重以智謀取胜，所以沒有采用的必要。况且一經采用，即将种下“沾染夷狄風气之根源”，“以憑借火炮之利，指揮少数地方小吏从事战斗为唯一之防禦，是乃卑賤者狹隘之見”，因而主張駁回这一建議。对此，曾有人（或許是江川太郎左衛門）严厉批評說：所謂“少数地方小吏”云云，无形中暴露出那种“不論事之是非得失，只問人之貴賤”，以及“身居高位信口雌黃”的封建階級的可耻的根性。經過种种討論，最后决定姑且叫高島秋帆前来江戶，实地演習一下他的炮术練兵。虽然是这样一个决定，而对于幕府來說，已經是了不起的“英断”了。

天保 12 年（1841 年），高島秋帆率領門徒 97 人来到江戶，在

① 川路寬堂著“川路聖謨之生涯”。

② 佐藤信淵著“海防余論”。

③ M. C. Perry. 美国海軍提督，1853 年 6 月，率东印度艦队来日本，进入橫須賀港（浦賀）向幕府遞交總統手書，要求通商，第二年又来，在橫濱簽定了亲善条約，著有“日本远征記”三卷。——譯注

郊外德丸原練兵場，表演了步兵中隊教練、騎兵教練以及各種大炮的實彈演習，老中以下各級官員以至西洋學家，都到場觀看。在演習中發揮了極大威力，結果使當局者大為震驚。儘管如此，幕府洋槍司還是挑剔說什麼“步伐雖極整齊，只是兒戲”，“動作固然敏捷，却並無用處”等等來惡意地加以排斥，而舉不出任何具體缺陷，最後，甚至說什麼：“臼炮為外國造，不合我國需要”，這就暴露了他們的真情（“陸軍歷史”一）。

然而，在幾乎全部明眼人觀看之下進行的這次實地演習，還是戰勝了上述卑鄙的反動論調。同年7月，幕府提升秋帆為“與力”級，並命他只對“熱心鑽研的旗本一人”傳授炮術練兵法。幕府惟恐這種新的兵器和戰術被幕府以外之人所掌握，然而這種盡人皆知的事情，幕府怎能長期獨占下去。到了次年天保13年（1842年）6月，幕府終於不得不准許“各藩武士自由學習”。9月，幕府下令說：“鑒於蠻夷各國戰鬥組織與日本、中華之制不同”，各藩都要備置大炮。這樣，好象最後確定了以槍炮為中心的軍備方針（其實，僅僅是方針而已），各藩中，有長州、佐賀、薩摩等藩帶頭執行了這個方針（注九）。

這時，陷害高島秋帆的陰謀已經布置好了。說他走過私啦，陰謀叛亂，才研究炮術啦等等，根據這些捏造的鬼話，終於在同年10月把他逮捕下獄了。這事的直接原因，固然由於鳥居耀藏等人的嫉妒。但是，真正原因，決不是由於個人的陰謀，而是因為幕府深恐高島秋帆等的近代兵學廣泛傳播起來，會對它的封建統治不利（注十）。

天保14年（1843年）8月和9月，德川齊昭再三要求幕府撤銷對建造大船的禁令。當時，老中認為一旦撤銷禁令，“西部地方及其他各地諸侯等將通過種種研究，可以隨意建造各種船隻，其後患不堪設想”，竟以此為理由拒絕了德川齊昭的建議（“水戶藩史料”別記、上）。不但如此，甚至还懷疑德川齊昭再三增強武備，是由於對幕府懷有異志，弘化元年（1844年），竟給予他以撤職反省的處分。

在幕府看来，所謂对外防备，归根結底就是为了保持幕府的專制，而不是保衛日本，这一点从上述这些事件中也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先后逮捕了林子平，处分了高野長英等人，这次又把高島秋帆下獄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幕府的这种态度如果沒有任何改变，尽管邻国的失敗使它受到了震撼，而且是很厉害的震撼，它也不会認真地实行軍备改革，哪怕是仅仅在槍炮上的改革。在这以后，幕府虽然在四谷的角筈，赤坂的今井谷，荏原郡的大森等处，也設立了炮术教練場（1843年至1852年），并制定一些奖励炮术的办法，但是这些炮术教練場全都掌握在田付氏、井上氏等保守的、反动的洋槍司手里，对于江川太郎左衛門和下曾根金三郎（曾入高島秋帆門下學習，并靠自学精通新軍事学）等人的新知識，根本不想采用（“陸軍历史”、“續德川实紀”）。

本質上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的人們中間，也有一些人并不盲目地坚持幕府的專制。这些人自从鴉片战争和參觀了德丸原的演習以来，已經完全相信，新的海防軍备要靠組織新式槍炮部队。葦山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和旗本下曾根金三郎等人，竟不顧幕府對他們的怀疑，进行了制造槍炮和新教練法的研究。在江川的門下出現了信州松代的佐久間象山、佐賀的木島藤太夫、仙台的大槻盘溪，以及旗本、各藩藩上等四千多人。江川还和片井京助共同創造了步槍用的雷管，嘉永3年（1850年），在葦山試制出一座小型反射爐，开始研究代替从前的青銅炮的鉄制炮。下曾根金三郎号桂园，对于炮术練兵，比江川更为先进，他对門人好象也很亲切。佐久間象山曾因江川保密不傳授兵書而离开了他的門下，但对桂园先生則衷心敬佩（“象山全集”卷三，宮本仲著“佐久間象山”）。渡边崙山等人的保护者——出原藩的公子三宅友信，在嘉永4—6年（1851—1853年），以上田亮章的名义編著出版了一部博得好評的近代軍事学的書“鈴林必携”，這本書是由下曾根金三郎校閱和刻印的。

除了高島秋帆等人的著作以外，还陸續出現了幕府天文台編的“海上炮术全書”，上述鈴木春山的“三兵括法”，高野長英的“三



兵战术”等西洋軍事学書籍的譯本和編纂本。其中單是“新撰洋学年表”所列举的，从天保末年至陪利来到日本之間，就有十数种，这些書籍大部分都曾公开刊行。

随着这种对于西洋軍事技术的研究的进行，对于海外情形、日本武士軟弱无能的现实情况、以及人民大众力量已經增長的認識的提高，人們逐漸認識到，必須从根本上改革兵制和軍备，而不能單單局限于槍炮队和三軍战术等狹隘的軍事技术的改革，同时，不仅仅从軍事的角度，而且进一步作为社会制度改革的一环提出了这种主張。这就是所謂“农兵論”、“国民皆兵論”、“世祿武士廢除論”等等。

关于农兵論和国民皆兵論，将在本章末尾所附論文中，詳加闡述，这里只叙述它的結論。天保末年以后，在多少具有人民立場的海防論，几乎一致主張应以最新式的槍炮把农民、漁民武装起来作为民兵用来补充武士軍隊。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認識到，由于近代战是槍炮战，需要大量的兵員，以及根据为求得部队行动的一致兵員的身分、待遇必須一律等近代軍隊的技术上的要求，可以而且必須由农民和一般市民征募兵員，来充作民兵或者是常备軍。另外，通过學習欧洲的兵書，人們也知道了民兵制和常备兵制的区别。

这些主張，究其本質都是为了捍衛武上的封建統治免遭破坏，企圖征用农民的劳力轉用到軍事上面，而根本不是要組織近代的革命的軍隊，也就是保衛人民的軍隊。然而对于封建主來說，把人民武装起来，特别是建立民兵制度，是他們内心最为恐惧的事情。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轉化为人民自己的反封建斗争的武力。即使征集农民为常备軍使其离开本村，也还有这样的危險。此外，还有許多地方同封建制度有矛盾，所以这些意見在当时是絕對不可能被接受的。不过，在这里已經明确了改革的方向。

若不从根本改革当前的封建制度，不但受苦挨餓的人民无从得救，同时民族对外的防衛武力也无从建立。对于这个問題作了最深刻的和最系統的思考的是佐藤信淵。他在 18 世紀 40 年代

中期，就勾画出一个空想的社会改革。据他的构想，廢除封建諸侯的割据，統一全国为單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沒有武士这种特权身分，全国人民一律平等，人人都要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軍备要采取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全民性的民兵制。当然，不論幕府或是諸侯都决不会这样作的。但是，不管怎样，在民間改革思想家之中已經出現这样想法，这件事本身就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新的社会和以它为基础的新軍备的因素，不久就要萌芽了<sup>①</sup>。

(注七)三兵坂本。

照原吉原样影印在“高野長英全集”第三卷中，据高野長运(長英之孙)所著“高野長英傳”的考証，是在弘化3年(1846年)着手翻譯的。又据吳秀三博士所著“洋学之發展与明治維新”(史学会“明治維新史研究”)里說：由于“譯文超群出众，被处罪因而自杀”。譯文这样高明，可能是經過了尚齿会的同人們的共同研究。

(注八)关于陪利来到日本的問題应采取什么对策，曾有各种意見：

德川齐昭、山本元七郎、鈴木德之助、沟淵伯耆太守、毛利大膳大夫、山内土佐太守等人，都認為日本有可能陷入与中国在鴉片战争中所遭到的同样的命运(幕府末期外国关系文書之一)。

安政4年(1857年)日本第一个事实上的通商条約日荷亲善条約的附录第十四条，以及后来所訂各通商条約中，都有禁止鴉片貿易的規定。

还有佐久间象山在天保13年的上書(全集第一卷)、堀田攝津太守的家臣大家同庵在嘉永2年的上書(“日本海防史料丛書”第五卷)等，也都強調了应当吸取鴉片战争的教訓。再有，在中山久四郎博士在“关于东西洋历史上的鴉片”(史学杂志第二十二編第二期)、“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編第二期)及“近代中国給与維新前后的日本的各种影响”(史学会編“明治維新史研究”)等论文中，主要介紹了当时日本所看到的有关鴉片战争的中国文獻。

(注九)文化12年，长州藩参考信州浪士<sup>②</sup>坂本天山的洋枪陣說創造了叫做神器陣的洋枪陣，这当然是一种日本式的陣法(修正防長回天史第一册)。該藩于天保12年，曾計劃派長崎駐在員等入高島門下學習，并購置西洋大炮。天保14年4月，在羽賀台大行操練，新式教練比較順利地进行了。但是，不久高島秋帆便被捕，因而沒能完成洋枪陣的根本改革(同上)。

長州在天保11年，創办南苑医学会，設翻譯專員，講授荷兰書籍。当时，林子

① 在旧稿的第二章第二节的一开始，曾簡單地敘述了农兵論的沿革。現在把它的結論部分移到这里来。关于史料和詳細情形，請參看本章所附的“农兵論”。

② 无主无祿的武士。——譯注

平的“海国兵談”被指定为藩校明倫館的必修課程。

佐賀藩在天保11年9月，由以前在長崎受过高島秋帆傳授的岩田御越、鍋島十左衛門等人，进行西洋炮术教練，“嗣后，藩士亦奉命进行練習，因規定称为威远式”。天保13年5月，任命高島式炮术練習員(同上)。这年着手创办“荷兰大炮制造厂”，次年14年2月建成(“佐賀藩槍炮沿革史”、“佐賀藩海軍史”)。

薩摩藩由于天保8年曾有美国船摩利逊号来到藩内山川地方的海面深受刺激，因此在次年，派遣島井平八、島井平七兄弟到長崎入高島門下學習。10年5月，二人返回薩摩，12年再度游学，兄平八于再度游学中死去。13年3月，在城外中村海滨，演習新炮术，藩主齐兴亲自檢閱。齐兴“深感其技术之巧妙，着令藩内普遍學習，并命名为‘御流儀炮术’，命島井平七担任教官”。后来，高島秋帆被捕，島井平七也感到身边危險，遂改名为成田正右衛門(薩摩海軍史中卷)。

(注十)高野長英在“鳥之啼声”一書里說：“即使我不写‘夢物語’，崙山不編輯小記、机論等書，亦难免于被誣陷”。

天保10年，頒布了有名的“兰学取締令”，其中說：“荷兰書籍譯本，除历書、天文及有关穷理之書業經当局准許者外，一概不得擅自授受”(“开国起源”)。高島事件可以說是这个原則的一种具体应用。高島秋帆遭到逮捕也許是由于謠言，不过，在当政的幕府老中下台以后，甚至逮捕高島秋帆的島居甲斐太守下了台之后，仍未釋放。嘉永6年5月，即陪利来到日本的前一个月，虽經江川太郎左衛門那样著名人物的担保，还是没有釋放(陸軍历史卷二)。幕府这样頑固地監禁不放，决非仅仅由于島居等人的个人憎恶。而且在这一期間，还采取了等于“禁止兰学”的压制“兰学”政策(嘉永3年9月，德川禁令考三帙)。尽管幕府迫于輿論，最后不得不允許高島秋帆自由傳授炮术，但是幕府并没有放弃它在天保12年“只許傳授給热心鑽研的旗本一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現就是禁止人們私相授受“荷兰書”。如果更往上溯，这种精神和逮捕林子平(因为他把自己的著作献給了日本国民)，以及大兴“蛮社之獄”<sup>①</sup>的精神是同出一轍的。

### 第三节 改革的开端

#### ——外患和內憂——

应当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这已經十分明确了。而进行改革时所必需的技术和知識，也已經在民間人士和沒有权柄、从而不受

<sup>①</sup> 江戸幕府于1830—1848年为了鎮压兰学家渡辺崙山、高野長英、鈴木春山等人而罗織的冤獄。——譯注

封建束縛可以自由思考的武士中間，逐漸傳播開來。可是這樣的知識和思想，不但不為幕府所採納，這些人反而不斷遭受迫害。這樣，在嘉永6年（1853年）6月，陪利的艦隊開到日本並強迫要求建交。

這時浦賀的防禦情況是怎樣呢？讓我們先聽一聽陪利的話吧，他說：“小艇（測量艇）駛近海岸時，就清楚地望見了各處炮台的情況，但並不象怎樣可怕，單單從它的構造，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它既沒有多大威力，也沒有什麼技術。”（土屋喬雄、玉城肇合譯“陪利提督遠征日本記”上卷）。不但從外國人眼裡看來，也不限於浦賀是這樣，就從日本人眼裡看來，對於“鍋島侯新建的”“長崎的神崎新炮台”也認為“人稱該炮台係按西法修築，即西洋人亦將為之驚異，竟未料到其如此粗陋（中略），以此炮台自夸，可謂遼東豕”（箕作阮甫著“征西紀行”幕府末期外國關係文書附錄之一）。

至於守炮台的人，據陪利說：“當測量艇靠近時，日本兵士擺出威武的架子，武裝看來也很齊整，但並不象要堅決進行抵抗。因為小艇剛要靠攏陸地時，他們就都退入牆壁壘後邊去了”（前引遠征記）。據當時的上書也說：“武士總是畏懼戰爭”（幕府末期外國關係文書之二、“常陸國麻植領主上書”）。

這時，頑固的幕府、各藩異常震驚，情況遠遠超過聽到伶邦中國發生鴉片戰爭的時候。而且，陪利艦隊露骨地威脅說：幕府若不在浦賀接受美國總統的國書，就立即開進江戶，再不接受時，“將在浦賀採取最後手段”，“立即開戰，以決勝負”（前任浦賀奉行組與力香山榮左衛門的報告，“幕府末期對外關係文書”一）。這樣一來，幕府就不得不認真地設法加強軍備了。8月，突然釋放了高島秋帆，令他作為江川太郎左衛門的部下，教授槍炮。9月15日，終於撤消了對建造大船的禁令。10月，向荷蘭大量訂購蒸汽軍艦和帶刺刀的步槍。11月，設置大船建造專員，命令水戶藩建造大船，命令薩摩藩上在江川的指導下試制輪船。水戶藩在12月（5日），設立石川島造船廠，從翌年安政元年（1854年）正月起，開始造船（“水戶藩史料”上編，乾）。

嘉永6年(1853年)7月,又命佐賀藩鑄造大炮。該藩先前就建設了反射爐,对于当时來說,已經拥有相当进步的軍火工业(注十一)。幕府自己也于8月,在湯島修建槍炮制造厂,由江川太郎左衛門等人指导制造槍炮,同时还采納了江川所提出的关于修建反射爐的建議。翌年安政元年(1854年)3月,同意借給水戶藩反射爐修建費一万两,并准以該厂所鑄大炮偿还。同年12月竟奏請<sup>①</sup>政府頒布好久未用的太政官令,用寺院的鐘改鑄大炮。

幕府一方面这样加紧輸入和制造槍炮及船艦,另一方面在嘉永6年(1853年)8月,任命勘定奉行<sup>②</sup>,大小目付等为“内海炮台修筑專員”,翌年安政元年(1854年)5月,計劃設立“校武場”(即后来的“講武所”)。同年7月24日<sup>③</sup>,終于起用水戶前中納言<sup>④</sup>德川齐昭为總裁,任命勘定奉行、大小目付等为軍制改革專員,并發布了实行軍制改革布告說:“政府軍制向有成規,惟当今情况不同,旧來經制多有不合,經研究斟酌,認為应即进行改革”。这时任命的改革專員有肥前太守筒井政宪、石見太守井戶弘道、校尉川路左衛門聖謨及其他幕府官吏中第一流人物,对于他們,一般人都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这个期望落空了。安政2年(1855年)5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春岳)向首席老中阿部伊勢太守詢問軍制改革进行情况时,阿部答称:“先已內定将先鋒队之弓矢改为洋槍,但因担心內乱者多于畏惧外患者,事后有人竟謂水戶老公与伊勢太守之主張純屬多事”云云(“昨夢紀事”一)。

軍制改革專員設置后,已經十个月,而情形尙且如此:認為德川齐昭与阿部老中的主張是“多事”的俗吏,姑且不論,再来看看德川齐昭領導下的軍制改革專員們的想法是怎样呢?在三个月以前,

① 水戶藩史料,上編,乾。

② 掌管幕府財政,監督代官、郡代,并司理农民訴訟的官职。——譯注

③ 这个日期是任命筒井、井戶的日子,在这以前的7月5日,已由老中把同一內容的“命令”送給了水戶的德川齐昭(“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七“昨夢紀事”,日本史籍协会出版第一册)。

④ 太政官的次官,在大納言下掌管机要政務的官职。——譯注

德川齐昭在給松平庆永的信中說：“关于軍制，由老夫提議，經老中交各方面討論，并經种种修改，犹恐不尽恰当，仍拟尽量征求各主管部門意見，然后由老夫加以折中，并附陈拙見。但去年以來，迄未收到任何建議，如此怠慢，再提議亦无用处，故而袖手”（“昨夢紀事”第一，“水戶藩史料”上、乾）。

軍制改革总拔首先陈述意見，还要“謙虛”一番說：“犹恐不尽恰当”。本来是，“由老中但主要由水戶老公提出方案，然后提交大家討論”，但結果是“双方互相推辞不肯申述意見”。（安政元年 11 月 23 日宇和島侯書簡，“昨夢紀事”）既然这样，怎能說軍制專員怠慢了呢？前引德川齐昭的書信里还繼續說：“窃思因为用餐所以准备飯菜食具，如不作战，則軍制亦无从建立”。对于外患感到焦虑而主張焦土抗战的德川齐昭，果真是“不作战”即无从改革軍制嗎？如前所述，封建軍备的腐敗无能，乃是出于封建制度本身的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封建制度，那么，軍制就无从单独地“建立”起来。

安政元年（1854年）7 月，目付堀織部等海防專員建議書中說：“封建之弊，是尾大不掉，郡县之憂为陵夷上崩”，現在武备既然如同郡县社会那样脆弱，那就必須大力加强，“既然如此，不可不及早講求对策，以防范尾大不掉之弊。如果諸侯兵威不振，无须防范，則猖狂橫暴之外夷，又难以制伏（中略）。今后当充实武备，命令一下，即可击退敌人，但其間养寇貪赏之弊，或将萌芽，前車之鑒不鮮”。这就是說：若是为了对外保衛日本而充实軍备，又怕这种軍备說不定会不听幕府的指揮以至反抗幕府，若果軍隊沒有这种反抗的可能，又不能防御外侮，这可以說最坦率地暴露了阿部老中“担心內乱甚于外患”一語所表达的封建專制者的苦悶。（“幕府末期外国关系文書”七、附录）

为了防御欧美列强，保衛日本，必須动員农民和商人，对于所謂“农兵”的必要性，所有的海防論者都知道（參閱后面所附“农兵論”）。提出前引建議書的堀織部，在上書后不久，便調任箱館奉行。根据友好条約外国船只可以停泊箱館，当他到任后考虑箱館的防

衛对策时，就深切感到組織“农兵”、“商兵”的必要。他在安政2年（1854年）正月、12月及翌年2月前后三次呈請老中批准只限在箱館組織农兵（“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九，杂志“江戸”十五期）。另外一个外国船只停泊地下田的奉行，也在安政2年（1854年）5月，向老中呈請說：“若不使农民、商人全習武事，将招致外人之輕侮”，要求准許人民随意練習武艺，一旦有事可以“破格录用”，同时还請求准許人民备置發射十两以下子彈的洋炮（“幕府末期外国关系文書”十一）。但是这两件事均未得到批准。

安政2年（1855年）9月，海防專員日付等，向軍制改革總裁德川齐昭建議，为了加强海防，应使旗本移居到沿海地区，并征募附近农民、漁民当兵。可是，德川齐昭認為使旗本移居沿海地区一事只能空談而不能实行，并談到水戶藩已往的失敗經驗（參閱第一节注三）。他还說武士一旦归农与百姓杂居，則“或玩弄权柄，或勾引农民妻女，或向富农張手乞討，势必發生种种麻煩……。如果上农杂居，彼此同席宴飲，則不但土風将为之不振，且居移气养移体，下放士族，将徹底墮落为农民，士道必将廢弛，深可慮也”。

本来主張武士下乡，是認為武士移居乡村，身心就会健康起来，同时还可以压制百姓，控制乡村。但这时，德川齐昭却深恐一旦士农杂居，武士将向农民低头，可見武士势力已衰，而人民力量已經壮大了。这时如果和人民对立，不但屯田务农办不到，組織农兵也不可能。

德川齐昭对于海防專員的农兵案曾这样說：“今之制度，軍备由武士承当，农民不服兵役，賦稅既重，还須繳納人口稅，若再使之从軍，豈非負担更重”，他認為再加重农民負担是困难的。“但亦不能一味按照道理办事，且日前农民中强壮勇敢者，多願充当农兵，故組織农兵，仍屬可行”。为此，不仅应“免除劳役”，而且必須准許佩刀；“近来槍战流行，即武士亦感佩带双刀不便，农兵幸而不佩刀，似便于进行洋槍操練，然我国临陣者，无不佩刀，如由此出現无刀步卒，殊不雅觀，此点望仔細考虑”。这就是說，明知不合“道理”，还要强迫推行。为此，不得不讓农兵也佩带显然无用的

刀，借以培养农兵封建武士的精神。（前引“水戶藩史料”上編、乾）

不仅如此，为了按德川齐昭所說那样，“不能一味按照道理办事”而硬干下去的話，須要了解农民的情况。关于这一点，軍制改革專員筒井政宪比較深入地做了分析。安政4年（1857年）7月，他上書說：当时农民屢次登門請願（來到領主門前請求減輕負擔），此乃“忍无可忍，始出此不法之舉。帶領此等百姓臨陣，殊不可靠，不无倒戈投敵之虞”（“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十七）。

对于幕府和站在幕府立場的人說來，既然有这样根本的矛盾，所以，就无法进行徹底的兵制改革，最多不过使旧有的武士軍隊練習使用槍炮，以及向荷兰人學習駕駛蒸汽軍艦的方法而已。关于練習使用槍炮一事，幕府曾在安政2年（1855年）7月，命令大番、書院番和小姓番这三番（由俸祿高的旗本組成的幕府的主力部队）先鋒（由徒步武士、步卒等組成的弓矢、洋槍部队），學習洋槍战法，使全体徒步武士入江川塾，并增設練兵場（注十二）。另外，还設立类似士官学校的“講武所”，除劍术外，并教授旧式武术和西洋兵法。对于这些措施，就連屬于德川三家的尾張藩主都嘲笑說“講武所及其他些微点綴”<sup>①</sup>。既屬点綴，所以修建工程迟迟不进展，以致江戶市民傳出这样譏諷語：“建立講武所的消息就同借錢的信一样拉得很長，总也不实现”，“似乎快要落成而总也不落成的是，淺草的了望楼和講武所”<sup>②</sup>。这个講武所，直到安政3年（1856年）才告落成。

高級的武士們就連这种洋槍战法，都不容易学会。这一則由于他們反动的保守思想作祟，他們激烈表示反对，說什么“模仿夷狄战法，将喪失大和魂”<sup>③</sup>，“日本武士，不論階級高低，均屬世祿仕

① 安政2年2月晦日，尾張藩主寄給松平春岳的信，“昨夢紀事”一。

② “辰年春季社会改革”，“甲寅年百事記”，“东京市史稿”外篇“講武所”。

③ 安政3年5月，水戶藩命令包括家老之子在內一律練習槍战时，会澤正志齋上書表示反对时所說的話。他本来是承認“火器船艦乃夷狄之所長”而主張学会这种專長的人，因为他持有这种膚淺的“采長補短”主义，所以对这类“采取夷狄之長”竟然也不得不加以反对了。（“水戶藩史料”上、乾）。



宦之君子，若改成匹夫下賤之形樣，甚至衣冠皆仿效西洋，極不雅觀(中略)，改易日本傳統習慣，降尊屈貴，效仿西洋士卒，此決非旗本武士所樂從者<sup>①</sup>”。一則由于武士的貧困，“旗本貧困，今日生活極感困難，自不能認真練武，只是勉強应付首長命令，敷衍塞責而已”。(筒井政憲上書)。對於他們的怠惰情形，講武所的目付痛加申斥說<sup>②</sup>：“某些學員，只為職位名義而出席，或志在列入三番，無心致力學習”。

海軍比陸軍前進了許多。因為海軍不但阻礙採取新辦法的保守勢力比較薄弱，恰恰相反，已經充分地領略了外國軍艦的威力。幕府的“船手”之類的水軍，只能在沿岸駕駛小船，遠不配稱為海軍。當它面對外國蒸汽軍艦的時候，哪里還容許顧慮什麼“模仿夷狄戰法，將喪失大和魂”。不過，倒不是完全沒有這種顧慮。安政元年(1854年)7月，長崎奉行曾與來到長崎的荷蘭軍艦孫賓號艦長就“創辦海軍”問題交換過意見，這時艦長強調創辦海軍學校及荷蘭語學校，為當務之急。對此，長崎奉行說：這固然是對的，但現在要把順序顛倒過來，希望趕快學會“直接操縱實物的方法”。其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怕聽了荷蘭艦長的話會“沾染夷狄之風”(安政元年7月20日，長崎奉行向老中<sup>③</sup>的請示，“幕府末期對外關係文書”七)。

雖然有這種顧慮，但在翌年安政2年7月，荷蘭將孫賓號贈給幕府以後，(取名觀光丸)幕府便以此作為練習艦，決定在長崎灣，委托荷蘭海軍軍官團對勝麟太郎(海舟)等幕府及各藩優秀青年傳授駕駛蒸汽軍艦、航海和炮術等，安政4年(1857年)4月，部

① 講武所劍術教師松平上總介建議。“陸軍歷史”十九。

② 筒井上書載在“幕府末期對外關係文書”十七，講武所目付報告載在“陸軍歷史”十八。

③ 關於從荷蘭入學習海軍一事，在勝海舟著“海軍歷史”中，收集許多史料，在“幕府末期對外關係文書”中也有關於此事的對外交涉文件。還有水口信利廣泛運用荷蘭方面的史料寫成的名著“幕府末期的我國海軍與荷蘭”。此外，迄今未經介紹過的史料還有第二次荷蘭教官團長“凡·喀天代克”(W. I. C. Huysen van Kattendyke)所著“回憶錄”。我並未看過這部原書，但在以前的文部省維新史料編纂會即現在的東大史料編纂所里藏有這部書的法文譯本(“Le Japon en 1857”, Paris, 1860)。在種種意義上，這是一本饒有興趣的文獻。

分練習員換班，同年9月，荷兰軍官团也換了班，这一訓練一直繼續到安政6年(1859年)2月。这时所以中斷了这一訓練，一則因为已經学会初步的駕駛术，因而安于小成(关于这点，以后再述)，另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大老<sup>①</sup>井伊扫部头是个反动保守派的巨魁，他把已故老中阿部伊势太守等所举办的改良主义事业，全都加以縮减或取消，停止訓練海軍練習，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訓練海軍，因为那时正在兴安政大獄<sup>②</sup>的时期，西南各藩藩士間反对幕府的气氛已經高涨起来，所以幕府不願讓那些藩士學習近代海軍学識。这里也反映出日本防衛与幕府防衛之間的矛盾。此事以后再述。

如上所述，陪利艦队的威胁和后来逐年增長起来的外来危机，的确給与幕府等封建統治者們以深刻的震动，但仅仅这些，还未能促使幕府及各藩改革軍备組織。就連組織槍炮队一事，尽管深感有其必要，也并没有充分进行。只是命令原来的警衛武士和步卒队練習洋槍，學習駕駛軍艦。当然，比起天保年間，这可以說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全国危机的加深，却远远超过了这种进步。担心“內憂”的封建統治者，始終沒有把建立全民性防衛的軍备来应付“外患”一事放在心上。所以不論外国威胁怎样加剧，只是由于这一点，是不可能促使它对軍制进行原則性和制度上的改革的。

只要不是为了人民的防衛而只是为了封建統治的防衛，那么，不論幕府和德川齐昭以及所謂志士們怎样大罵外国是夷狄，怎样憎恨外国，也是不能集結起足以对抗外国的力量，从而也就不得不屈服于所謂夷狄的欧美列强。本來是一个激烈的攘夷排外主义者的井伊直弼，也竟不得不擅自簽訂通商条約。这件事反过来又使所謂“內憂”加剧，使日本社会原有的內在矛盾大大加深，以致造成了旧的封建統治机构的瓦解和政治的危机。尊王攘夷与佐幕开

① 將軍手下的最高官职，居老中之上，只一人，类似現代的总理大臣。——譯注

② 安政5年，大老井伊直弼，未經奏准，便在同美、荷、俄、英、法各国所訂安政临时条約上簽了字，并處罰了反对德川家茂繼任將軍的公卿、諸侯，把梅田云濱、吉田松阴、賴三、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許多人下獄处刑。

国的对立以及倒幕<sup>②</sup>运动进一步发展。

本文不能叙述这些政治历史，安政大獄是一个轉折点，使急进派对幕府的改良感到絕望，并进而轉向打倒幕府方面。万延元年（1860年）3月3日，兴这一大獄的元凶井伊大老在櫻田門外，被水戶藩及薩摩藩的浪士等暗杀了。当时薩摩的浪士有村雄助等，对该藩大久保正助（利通）表示坚定的决心說：“不斬敌首，决不罢休”<sup>③</sup>。实际上这并不單是派別之爭，不是从严格的意义，單从改变现存統治体系的意义上說，这就是阶级性的武力斗争的序幕。

德川齐昭在四年前曾說过，若不想打仗，就建立不起来新兵制。这时，不是对“夷狄”的战争，而是幕府对国内的反幕、倒幕势力的战争迫于眉睫了。幕府深恐加强防御外国的軍备，就将陷入“尾大不掉”，所以未敢进行軍制改革。正因为幕府站在这样反人民的立場，才使地主、商人以及主要由下級武士出身的知識分子，利用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形成由自己来掌握领导权的反对幕府打倒幕府的力量，并迅速成长起来。到了这时，无论对于幕府或是打倒幕府派，都必须进行兵制改革了。但这并不是为了日本全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者的軍备，而是因为日本国内分成两大势力（注十三），为了互相对抗，互爭霸权需要武力。

（注十一）（參閱注九）。嘉永3年6月，新設鉄制鑄炮局，根据荷兰人修鳩宁著“克修究特基持列”（这个人名、書名俱不詳）开始建設了四座反射爐，第一座于嘉永3年11月完成，四座全部完成是在5年5月（“佐賀藩槍炮沿革史”）。

这些反射爐在当时可能是相当优秀的，因为就連曾經賜过長崎港神崎新炮台的箕作阮甫都称贊說：“新厂尚未装备起来，而旧厂十分完备，所有鑄削机床，大略与西洋式无异”（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附录之一）。当时同行的川路聖謨也惊嘆地說：“唉呀，規模真够龐大了！”（同上）。

（注十二）“陸軍历史”卷五。

近来外国船只不断駛来（中略），而防御夷狄，專須槍战，故已命与力同心及徒步武士等操練西洋槍战，所需槍支已陸續加紧筹备，一俟备齐，即行發給。应即本此專心致力操練。弓矢組亦应兼修槍战。除通令三番首長、百人組長、荷矛隊長、消防隊長、前鋒隊長、徒步隊長及八王子千人隊長等遵照外，并已轉飭洋槍隊知悉，仰各

① 輔保幕府、对外开放門戶的主張。——譯注

② 打倒幕府。——譯注

③ 安政6年8月23日，有村雄助等人寄給大久保利通等人的信。大日本史籍協會版“大久保利通文書”一。

該主管一体知照。

同年9月，“命徒步武士全体入江川門下”，見“村垣淡路太守公務日記”（“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附录之三）。

此外，并指令增設練兵場（安政元年12月），命書院番和小姓番操練騎兵隊（安政2年8月），老中在駒場野檢閱操練，又命旗本等陪臣亦操練槍戰（安政3年4月）等等，但正如本文后段所述，这些措施，并未發生多大效果。

如果仅仅是槍戰操練，它在軍制史上并非重要問題，它的意义只在于为即将实行的軍制改革，也就是为改变旧制組織創造了准备条件。

（注十三） 反幕派、倒幕派并不是要用革命方式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的人民的革命党，他們是遭受封建門閥、門第制度的压迫不能發揮能力因而憤憤不平的下級武士知識分子，以及一方面受着諸侯、領主的剝削和統治，而另一方面却又剝削农民工人的地主或商人的代表。

劳动农民和都市的劳动群众，通过非常猛烈的起义和暴动震撼了整个封建体制，使它漸趋于瓦解。然而，他們还没有成長到为了夺取政权而站起来进行有組織的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农民和商人們对和平友好的外国和外国人，固然抱有国际友爱，但对于威胁民众本身的生活、侵犯日本独立的外敌却有着坚决保衛民族独立，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但是，这还没有提高到自觉的民族意識，只是对于威胁生活的外敌的一种冲动性的斗争，因此也就没能形成有組織的全国性的民族斗争。

他們一方面反对現存的封建体制——將軍、諸侯的門閥制度，另一方面自己也屬於进行封建剝削、享有封建特权的階級。这些半封建的地主、商人、武士知識分子，一方面利用民众的这种革命力量，对于民众表示讓步，而另一方面却創造了民众所办不到的全国性的組織和联系，形成了倒幕派。他們使推翻封建制度的运动停留在打倒幕府各藩門閥制度的程度；使民族統一与独立停留在以天皇为首的国家的統一上，并企圖在这样国家里由自己長期掌握独裁权。倒幕派的这种本質，只有通过對維新史的政治，經濟及其他各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到充分的証明。关于这一点，在这里不能詳細論証，請參閱本人另一著作日本現代史第一卷“明治維新”。

倒幕派的这种部分的进步性、国民性和它本質上的封建性，已在他們所进行的兵制改革和农兵組織的性格上，明显地表現出来。

## 附：农兵論

关于“农兵”一詞，現在的学者們大部籠統地解釋为“农民的兵”或“住在农村的兵”，这只是形式地从文字上做的解釋，絲毫也沒有說明它的历史內容。农兵一詞，早已出現于德川时代的初期，到幕府末期則頻繁出現，其意义可以大分为四种。

第一、指住在农村的武士即乡士或类似乡士者而言。

第二、封建領主在适当时期，如每月数日或每年中一个短期間，对农民、商人在其居住地区分別施行軍事訓練，使他們經常携带武器，或只在必要时携带武器，作为武士常备軍的补充部队，以备必要时召集动员。幕府末期的“农兵”，大致指此。

第三、領主征集农民編为常备軍，使他們离开居住地脱离农耕，住在兵营里。这种平民常备軍并不是替代原有的武士常备軍。武士常备軍(即使武器、战法等有所改革)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它在制度、观念上仍然是封建兵制的骨干。平民常备軍只是下級的补充部队。所以，平民常备軍的軍官、軍士等职，都要从武士中选任，平民兵士是不能充任軍官的。可是，平民常备軍既然可以組成而且还是勁旅，那么，已經暴露了无能的武士軍隊，就不但被認為无用，甚至是有害的。这就产生了廢除世祿武士軍隊的想法。

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封建統治者为了对内对外保衛他們的統治而向人民征集的民伋。而第四种的“农兵”則是农民为了对抗封建領主及外敌而自动武装起来的革命的民兵。第二种农兵在幕府末年的維新动乱时期，随时都有可能轉化为这种革命的民兵。若再細加分析，以上四种农兵还可以分为若干种，并且还有不完全屬於其中任何一种的农兵。

幕府末期就有人把第二种以下的“农兵”的“农”字，專指农民，来和商、工市民的兵相区分，而把包含商人在內的所有平民的兵，称为“民兵”或“人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农是农工商等平民的代表称呼，“农兵”里面，也包括工人和商人。本文中除引用文以外，所有“农兵”，都是泛指平民兵而言。現代的所謂“民兵”(militia)，是和常备軍相对的概念，所以本文中的民兵，都是按照現代的意义。希望不要把它和来自德川时代文献的引文中專指平民兵的“民兵”混同起来。如果混淆，就弄不清本文的最基本的問題“保衛誰的和防御誰的軍备”的問題。

第一种意义的农兵論就是武士下乡务农論。这在第一节本文和注一、二、三 中已經叙述过了，这里从略。但同是下乡务农論，林

子平在“海国兵談”卷十四“武士之本分及按采邑摊派人数”中所論述的想法，是近乎第三种的廢除武士論的。他認為对当时的武士給予厚祿，只能使他們穷奢極欲，在軍事上毫无裨益，所以他主張削減三十石以上的俸祿，把所有武士的待遇，一律定为三十石，令其归农，就可以得到在数量和質量上几倍于当时的軍隊。然而，他也知道这个办法必定遭受武士的反对，实际上行不通，究竟怎样办才好，他也沒有主意。他还認為厚祿武士上戰場时，都要偕带扈从人員，要把各家武士的扈从合为一队是困难的。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三十石以上的武士是无用的，最好一律化为低薪而无扈从的上兵。这就是完全不同于当时軍隊組織而具有近代傾向的統一軍隊的思想的萌芽。总之，他这种“归农論”的傾向，是和企圖加强武士封建制度的、复古的一般的这类論調傾向恰恰相反。

德川时代初期就有过建立第二种农兵的想法，著名的兵学家長沼澹斋(1634—1692年)在“兵要求”卷十三，練兵七中說：“國中不禁畋猎，則民習于弓銃，将其屬邑姓名預先造册，納之于官，有事即可征服兵役”。山鹿素行著的“山鹿随笔”(1657—1685年)四之三內載：“如地方太守善于运用，則农民商人皆可成为兵民。如山中准許狩猎，河川准許捕鱼，擇地建社，使練習騎射，借祭日，树立悬的使練洋槍。或于每月朔、望、二十八三祭日以及八幡明神庙会，吊起金鼓，使作角力，此皆所謂农兵之法也”。在他的“山鹿語类”中，也有同样的記載。

山鹿素行的这种想法，是根据中国古代或者日本奈良朝(710—784年)征公民入軍团的兵制知識产生出来的。只因当时幕府，各藩体制还很强盛，所以山鹿素行也并没有感觉到組織农兵来补充武士兵制的必要。不但如此，他的主导思想，甚至还是認為兵农合一乃下民作乱的根源，是不相宜的。

从山鹿素行那时經過一代之后，封建統治的困难，正如第一节所述那样已經加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下乡务农論曾盛行一时。到了19世紀初叶，封建制度的內憂外患一齐到来，于是，为了补充封建常备軍，才大事提倡对人民施行軍事訓練。卓越的古典学家

蒲生君平在“不恤緯”(文化6年、1809年)中提出的主張，可能是最早的一个。他說：領主向人民課征重稅，人民窮困，抱怨領主，已經产生作亂之苗頭。因为这种原故，若能“更改禁令，使庶人學習騎射槍劍”，則官方可以不出費用而能養兵，切望付諸实行。这和他另一本書(今書)里所主張的裁撤武士中的无用分子，使其开垦荒地，以輕減农民賦役之說是互为表里的。惟有这样以輕減人民負担、裁撤封建武士为前提，才能够提出由于人民抱怨領主，有作亂之兆，所以应当教習武艺的主張。若是沒有这个前提，則“有作亂之兆”，只能成为进一步严禁人民进行軍事操練的任何开端的理由而已。事实也正是这样，幕府于文化2年(1805年)發布法令說：近来农民商人，隨便佩刀，向浪上學習劍術，应即严加禁止。天保10年(1839年)又重申了这一禁令。

蒲生君平所提出的以裁減武士、輕減人民負担为前提来使农民商人充当武士常备軍的补充民兵的主張，也出現在赤井东海著的“海防論”中。赤井东海痛斥武士无能(已在第一节中引用)，列举象加藤清正、福島正則那样的豪杰原来都是出自民間等等及其他一些历史先例，以及当时的槍炮專家在射猎鳥兽上还不如猎戶的事实，因而論証了农民、漁夫、猎戶也滿能編成勁旅，并主張應該把这些人編为“义軍”，“四季农閑，使入乡学，除學習孝悌忠信外，甲之冑之，使漸習于刀槍弓馬”。

在广瀬淡窗著的“迂言”(天保11年、1840年著)里，也有同样的主張。他說：“寡不敌众”，若想多練战士，“莫如使用农兵”，“古时只用农夫为士卒，今則不可限于农夫，盖因农民苦于重稅，且須伺农閑而用之，殊多不便”，“故应博征广取”，但是惟独“商人”，无論如何众多，亦不可用作兵士，因为他們是惟利是圖之輩。

这种主張，多至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利用民兵来补充軟弱无能的封建武士的想法，已逐漸普及开来。

这时又發生了海防問題。四面临海的日本的防衛問題，首先要求建立海軍。陆地的防衛，若只靠武士的話，就是人数也远远不够，所以无論如何，必須用某种方式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进步的

兰学家們，首先提出了这样主張。我还没有看到兰学家本身的論述此事的旧文献，不过，在幕府的日付平山行藏著的“海防問答”（文化 13 年、1816 年）中，有大罵兰学生的富强論的詞句。由此可以反过来推測兰学家們的想法。平山說：“兰学生等不了解富强之真义，以为积蓄金錢便是富国，增多军队便是强兵，真是囫圇吞枣”。他还接着說：农事專由农民担任，提供軍粮，这是富国，若采用这种富国政策，則“势必廢除农兵”，而由武士壟断軍事，就是“强兵”。总之，据他看来，当时的封建制度，才是真正的富国强兵。然而，即使他也認為不可能經常靠武士来防守辽闊的海岸，所以他也提出一个“把濱海民戶、漁戶組織起来”使之担任海防的方案。不过，他主張对于这种“民兵”，不但是进步的槍械，就連当时普通使用的弓箭也不發給，仅仅發給旧式的弩和三十支箭作为“相应的武器”。在已經發生了費頓号事件的当时，平山行藏內心里也决不会以为这样就足以防守海岸，他表面上虽然謾罵“兰学生等”的农兵（民兵）論，实际上却剽窃了他們的主張的要点。

文政 7 年（1824 年）幕府勘定奉行远山景晋著的“筹海因循录”中也有和平山相同的动員濱海平民的主張（“日本海防史料丛书”三）。他在方案后面說：“总之，自古边境之民，以及巨商，富农，多怀奸詐，万万不可忽視也”。与人民对立、不能信賴人民的幕府官員們所策划的民兵，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而已。

最先建議幕府建立正式海防民兵的是江川太郎左衛門。他在天保 10 年（1839 年）奉幕府的命令，測量伊豆、相摸的沿海地帶，并檢查防禦設備，5 月，向幕府提出了报告書，論述应在何处怎样地修筑沿海炮台，关于防守人員提出了三个方策。第一，駐屯諸侯的军队；第二，以三千石以上的武士为奉行，令八王子的千人同心等移駐；第三、作为“最簡便的方案”，提出“可以組織农兵，此虽不能即時得用，果能坚持訓練，則可大有用处。对于农兵固无需支給規定津貼，但如不支給練習武术所需各項，則决难貫徹，故应發給大小槍支和長矛等，并設立武术練習場，准备彈藥及其他操練所需器具。对勤奋者，略予褒獎，特別优秀者，給予相当于一名或二名武



士之口粮。但外国船只到来时，情形特殊，限当时上陣者，应特别授予称号。果能如是，全员当能發奋練習，可成为相当得用之部队”。（抄本“江川英龙建議書拔萃”，胜海舟著“海軍历史”十三）

江川在二年前向幕府提出的有关伊豆防衛的意見書中关于防衛人員，只提令八王子千人同心移駐伊豆，而到这时竟提出了这样先进的見解，其故何在呢？因为他这次考察伊豆、相模时，如前所述，受到尚齿会兰学家們的帮助。由于这种关系，使他不但在測量技术上而且在兵制上也有了新的思想。高野長英的“三兵战术”是比这晚几年出的譯本，他在“例言”譯注中介绍常备兵制和民兵制說：“西洋兵士制度有二，一是經常养兵，使習战斗，以备不虞之用，犹如我国之制。一是选拔民众以为兵士，无事时使从事稼穡，不养于营中，一旦有事，立即召集，使其服役，所謂农兵之类也”。高野長英等人早在天保 10 年左右撰写“兵学小識”这一巨著时，就有了这样見解，据推测，这种見解很可能也影响了江川。

江川在这以后的嘉永 2 年（1849 年）5 月，特地提出“有关农兵的建議書”，述說自己与治下农民数代以来关系亲密，决无任何顧虑，恳求特别对他的辖区放宽对农民學習武艺的禁令，并准許組織农兵。接着在嘉永 4 年（1851 年）和嘉永 6 年（1853 年）正月提出的关于伊豆、下田的防衛的建議中，都極力主張組織农兵。他这次提倡的已經不是“最簡便的方案”了。幕府已經按照他第一个意見書的第一方案，命令小田原、沼津、挂川三藩主以及駿河、远州的諸侯，担任伊豆、相模的防务。尽管这样，江川还不放心，認為“对严重敌人，如不采取严重措施，难保无虞”恳請以特别的英断，組織农兵。当时，他还回想起同自己的居住地結合在一起的人民力量是如何强大的事实說：“天草騷乱时，暴动規模虽小，而極其頑强，因得地利之故耳”云云（嘉永 6 年正月）。

江川所主張的农兵論后来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嘉永 2 年（1849 年）5 月，幕府向三奉行<sup>①</sup>和大小日付等諮詢海防对策，責

① 指社寺奉行、勘定奉行、町奉行。——譯注

令大胆地陈述意見，不要顧慮涉及不敬，首次表明要广开言路。对此，民間学者和各藩人士們也深为感动，关于海防問題，展开辯論，热切主張組織农兵。仙台藩大槻盘溪的“猷芹微衷”和紀州有田郡須原村的富农菊池海庄等人对它的批評，以及幕府代官羽倉簡堂的“海防私策”和大槻对它的批評，在这些言論里，都是一致贊同組織“土兵”或“农兵”（大槻盘溪著“盘溪先制”、日本海防史料丛書）。

不久，在 1853 年受到陪利艦队的胁迫以后，作为輔助性的民兵制的农兵論，越發盛行起来，不但是民間学者，就連幕府的箱館奉行、下田奉行、海防官員等，也都大談起农兵来了。山鹿素行的后裔平戶藩士山鹿素水在嘉永 2 年（1849 年）以前的著作“海防芻言”中，虽然也論述了以槍炮为主要兵器的西洋式部队战斗的优越性，但对从人民中間征集兵員的西洋选兵法还抱着疑問。可是，在陪利来到日本以后的著作“海备全策”里，他却認為在海防上輔助民兵是必要的了。山形藩的儒士盐谷宕阴的上幕府書（“幕府末期对外关系文書”一）及江戶儒士安井息軒的“靖海私議”（“日本海防史料丛書”六）等，也都簡略地論述應該減輕农民和商人的負擔，放寬禁止私有洋槍的禁令，組織平民軍隊，可見民兵論已經不仅仅是兰学派中进步分子的主張了。

不仅如此，还有人主張不但要動員、訓練沿海的农民和漁民組成海防民兵，而且还應該扩大範圍，把都市居民也都編成特殊軍事組織而加以訓練。嘉永 6 年无名氏（大概是江戶人）的“海备私言”（“日本海防史料丛書”五）中說：“窃維商家壯健男子，每一街巷，当有若干人，可按街巷組成几百人或几十人队伍，指派大小头目若干人，使各守崗位，規定某部分伙食由某街某組担負。如系商人而夙習武艺者，亦可令其担任某种防衛工作，規定其职务，使一面經商，一面練習炮术，或使其練習長鈎、木棒等术以鍛練筋骨。各处建立操場，由大、中、小头目恳切教練，使各組員坚定报国之志，一声令下，即可向各自崗位集合”。

这个著者还露出想要否定身分制度的口吻，他說：“日本比起外国，原屬小国，人数甚少，而且外国因使用农兵，国民无不参与軍

事，所有薪水、汲水、搬运工人(原文如此)，均兼服兵役，故无游闲之徒，人员相对增多。日本则有士农工商之别，军事为武士所独占，其中又有所谓阵中辅助人员，各种工匠只能搬运行李与作战队伍无关，如是则人员减少一半，结果，既无准备，而人员又少”。著者还说：在西洋，有一千人，一千人都有枪，而在日本，则除步卒等指定人员外，概不持枪，这是不应该的，因而主张全体人员都应该有枪。

关于民兵的理论，已经相当明确了。据推测是在安政初年(1855—6年左右)写成的、长山樗园的“海防私议”及“补遗”(“日本海防史料丛书”八)，在叙述农兵编制法的部分中，讲解了西洋兵制。“西洋亦有多兵，分为民兵与商兵二种，同地同乡之人皆有组织，选其平素信赖之人为军官，肩荷猎枪，防守海岸”。他还叙述这种乡兵在防御战中立功的事迹，主张日本也应该采用这种民兵、商兵制度。关于民兵的军官由民兵自己推选的介绍，的确是阐明了真正民兵制的最大要点。

海防农兵论的主张所以被提出来，是由于单靠武士来防守漫长的海岸的话，一则兵员不足，二则经费有困难，因而必须使用农兵。但是要实现这个主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在有关技术上的问题，承认农民和渔民确有当兵的体力和魄力，并要把以往由每个战士使用刀枪短兵相接的战法改变成为使用枪炮部队的战法。(这么一来，兵士的战斗技术训练是容易了，可是用兵作战的方法却困难了。)这个技术条件当时显然是存在着的，这一点从以上引用的农兵论者的话，也可以了然。然而，只靠这一个条件，还是建立不起来农兵的，同时，还必须有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条件，那就是为了对外巩固国防，国内的武士和农民等平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已经缓和或者可能缓和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许多农兵论者都以减轻赋税和免除徭役等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为建立农兵的条件，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了解到缓和阶级对立的必要。江川太郎左卫门在他的有关组织农兵的建建议中，特别强调指出他家和农民之间几个世代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表明，惟有他家能够不顾虑阶级对立的课题。

嘉永4年(1851年)若狭<sup>①</sup>的小濱藩規定了外国船只到来时对农民商人的部署,当时的布告是这样說起的,近来外国船只“动輒窺伺日本情况”,有的地方竟登陆“蹂躪田地”,这种外来的危机,是民族的危机,也是对于农民上地的危机。接着,便訴諸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說:“全日本自神代以来即屬独立国家,既未受过外国統治,亦未被外国夺去过寸土(中略)。国恩浩蕩,自不待言。时至今日万一遭受外国扰乱,实日本全国之大辱,上无以对开国之祖宗,下无以对后世之子孙。故上自天皇,下至黎民百姓,皆应同心协力,保衛祖国(指日本全国,并不限于小濱藩)决不蒙受从来未有之耻辱,因此,必須不分疆界畛域,一律舍命防守,此实首要任务也”。

这显然是在說外来危机不是个别封建領主的危机,而是全民族的危机。因而对此,号召領主和人民团結一致,打破封建的“藩”的圈子,起来保衛日本全国。比这晚些时候,自嘉永2年以来就提倡农兵論的菊池海庄(前述),在安政5年的著作“七实芻言”(日本經濟大典四七)中,也同样向农民呼吁說:“今日凡我国人,不分貴賤上下,不論士农工商”,均应立志防御外敌保衛祖国。

然而,事实上,人民的負担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越發加重起来,所以,如前所述,广瀨淡窗等人說:农民苦于重稅,征他当兵是困难的,就連德川齐昭也都認為組織农兵,事屬勉强。而領主与人民之間的階級对立,不但沒有緩和,反而逐年加深了。

幕府和各藩并沒真正認為对外問題是民族危机,而只是当做他們本身的封建統治的危机。越前侯松平庆永曾說:“夷狄終將以我为屬国而責令进貢”,可見他們担心的是他們这些封建領主将不能再向日本人民征收賦稅<sup>②</sup>。

不但是幕府和諸侯如此,就連主張不分“貴賤上下”、“士农工商”都應該一致奋起保衛祖国的菊池海庄也在“七实芻言”中說:“士以治民为天职,民以养士为天职”,他認為武士統治和剝削人民

① 今屬福井县。——譯注

② 參看羽仁五郎“明治維新”(岩波講座“日本历史”)。我写的“明治維新”(“日本現代史”第一卷)里更加詳細地列举了有关这一点的史料和实例。

是天經地義，而要保守這個體制。他後來在文久2年（1862年）寫的“農兵論言”（大山敷太郎“農兵論”）中說：國之有士農工商四等，猶如人身有筋、骨、血、肉四物，士乃國之骨，骨若患病，全身何以保全。他強調農工商人民必須保護和奉養武士階級，由此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舉國一致，不分士農工商全部動員起來，究竟是要保衛民族呢？還是要保衛封建制度呢？

儘管口頭上說的是民族危機，農民、商人的生命財產的危機，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和剝削，並且日益加重壓制和剝削。既然這樣，縱然叫嚷停止階級鬥爭和舉國一致，人民也不會停止鬥爭的。

所以，山鹿素水雖然認為對外“固結民心”是組織農兵的前提，但是不能不認為要使連年苦於苛政的農民和統治者親密團結，是極其困難的。為了“固結民心”，他主張，應該在海岸地帶修築炮台，向農民顯示威力。他說：“農夫漁夫無知，示以有形威權，則必大為畏服，如其畏我之念重，則將懼外之心輕，而鼓起勇氣”（“海備全策”），這就等於山鹿素水供認了，海岸炮台首先應該是為了威鎮本國人民的東西。

從這些說法看來，可知破壞舉國一致對外的並不是“不逞無賴”的人民，而經常是統治者。所以，統治者們若不多少改變一下態度，那麼，就要和德川齊昭所看到的那樣，農兵（民兵）隊伍隨時都會轉化為農民自己的革命的民兵。嘉永元年（1848年）5月，幕府海防目付等7人聯名反對農兵，他們武斷地說：農兵是創舉故無实效。還說：“雖具名目、形式，因系愚頑痴鈍之氓，故不但無濟於事，反將由此荒廢農事，成為無賴流氓之輩，以致削弱國力（“異船打攘復古御評議”）。後來到文久3年（1863年），在幕府內部，關於採用農兵的主張又復盛行起來，在討論的過程中，反對派的最有力的論據，還是認為農兵可能成為人民造反的武力（參看大山敷太郎著“農兵論”）。

農兵在經濟上也和封建制度的基礎互相矛盾。前面引用文中也說到“反將荒廢農事”，其實不論荒廢與否，當時農民的負擔已經

是那麼沉重，若再拉去當兵，那麼，農業生產就必然要減退，這也是當時的論者所考慮到的。

另外，在當時那種身分與職務分不開的社會里，這種“農兵”究竟是農即平民，還是“兵”即武士，就要分辨不清，就要使身分制發生混亂。這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也是擾亂社會的根本秩序的嚴重的危險。所以，詳細論述農兵的人都紛紛談論到以下這些問題，比如，農兵在平日是農，服役期間是士；升為小頭目的，即准于士；都要佩刀（即使這樣會妨礙作戰）；以及農兵在平日應歸勘定奉行或郡奉行管轄，還是應歸步卒指擲管轄等等（“七實芻言”、“農兵私議”、吉田敏成著“海警妄言”、以及上述各種農兵論）。

為了擺脫有關農兵的這些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各種困難，大部分論者都一致認為唯一辦法是，不要從一般農民中間征集農兵，而由“出身良好者”的村吏和與村吏同一階層的富農中間征集。當時農村中的這些上層農民同普通農民特別是貧農、佃戶、長工之間的階級對立，和包括富農在內的全體農民同領主之間的對立，此二者都已經達到尖銳的程度。幕府和各藩看到這點，就打算把富農和地主武裝起來，授予他們以准于武士身分的“榮譽”，把他們拉攏過來。但是這樣一來，農兵論的最初出發點即為了海防動員全體人民組織民兵的意義，也就完全喪失了。這和山鹿素水認為海防炮台首先應該成為威鎮人民的工具一樣，統治階級把農兵當作用來應付國內階級對立的新的形勢的一種新的武器。所有這些情形，將在第二章中列舉農兵的實例來詳細加以闡述。

第三種農兵論，也就是把農民等平民編成常備軍的想法。這種想法最初是根據日本和中國的古代都實行舉國皆兵制這一事實來的，其目的在於加強武士常備軍。生田萬在“岩苔”（文政 11 年、1828 年著，雜誌“傳記”三卷六期）里的主張，可以算作這種想法的最早的一個例子。他說：若是把諸侯、武士們“擺排場”的“茶僮”、侍女和其他冗員全部裁撤下去，只留精干的武士使之下鄉務農的話，農民的負擔即可減輕，農民暴動也就容易鎮壓，至於兵力的不足部分，可由“農民中 15 歲至 50 歲者每十人征一人。如斯，則且

使其充当前鋒，亦不致感到痛苦，此法近乎本朝軍團古制，而农民各自帶刀，引以为業，官方不費津貼，便可增加人員，全国將真正成为軍國”。

这个主張还不是一定要征平民为常备軍。征平民为常备軍的主張，和第二种农兵論一样，是受到鴉片战争的震动以后才产生的。佐藤信淵在“海防余論”(弘化4年、1847年)中說：最近的各种海防策中，有的主張“現在世襲武士不能作战，必須織組农兵”，这是認為农兵可以代替世襲武士。对此，信淵認為“若果实行，則內乱必作”，他所說的內乱，是指丧失了存在理由的武士所發动的內乱。信淵深知从实际情况看来，廢除武士常备軍而代之以平民，是办不到的，不过，他内心却以为这种办法是最理想的。

在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存华挫狄論”(嘉永4年、1851年)卷三、卷四中，反复論述武士軍隊和近代武器以及战法之間的矛盾，并強調指出：往昔西洋各国的兵士，也象今天日本这样使用世祿之士，后来火器發达，战术为之一变，部队的統一調用，成了最重要的問題，于是“因为世祿之兵士，勇怯不齐，老弱混杂，难应需用，遂改用选征农民以充士兵之法”。随后又說：現在的日本，如果“驟然廢除世祿制度必起內乱”。这本书和“海防余論”一样，是受到津藩主的委托而写的，所以也就沒有敢說應該廢除諸侯、武士的世襲俸祿制度。

佐藤信淵在“复古法概言”、“复古法”、“權貨法”、“垂統秘录”(自弘化2年、1845年至嘉永2年、1849年的著作)各書中，縱談了他的理想社会并描繪了与幕府各藩体制根本不同的新的国家社会及其兵制的理想。这个理想国家是这样：除了以天皇为名义上唯一最高的君主而外，沒有一个諸侯、一个武士，和廢除了封建割据的、統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所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資料都归国有，所有生产事业都归国营。人民之間根本沒有区分士、农、工、商、賤民等的身分制度，全国人民均按其所長分別从事草、树、矿、匠、賈、佣、舟、漁八种行业，按照行业，分为“八民”，他們在社会上、政治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政治和經濟由“教化”、“神事”、

“太政”等三台和“农事”、“物产”、“百工”、“金融”、“陆军”、“水军”等六府及其官吏负责管理经营，官吏由大学毕业充任。所有男女少年，均以公费入小学受义务教育，其中优秀者以公费入大学。

军备由陆军府和水军府掌管。陆军府负责管理园丁、马贩子、脚力、猎户、消防队员、轿夫、屠户等“凡所有在陆地靠劳动为生的十五种佣民”，以这些人组成军队，牧养牛马，设演武场，讲授武事，训练士卒，以多多培养良将猛士。陆军府的奉行长吏、<sup>①</sup>参政等也和一般文官一样由大学生选任，特别要选拔擅长军事武者，由下级官阶通过各种考验，逐步提升。军队分为“亲卫”、“内卫”和“外卫”，在平时，士兵和军官都是普通人民，各就专业。水军府管理“在江海上谋生之渔民与船户”，施以有关远洋航海、水战、大炮、火器等训练。无论水军或是陆军，平时都各自从事自己的专业。当向海外出征时——信渊抱有征服全东亚的极端狂妄的侵略幻想，这是对欧美列强压迫的民族抵抗精神受到封建意识的压抑而形成的——则以水陆军二府的上兵为骨干，再由全国人民征集壮丁入伍。

佐藤信渊的这种理想国家的本质，无非是君主专制的官僚国家，他所主张的兵制，无非是强迫劳动性质的国民皆兵制。不过，这种构想否定一切身分上的差别和封建诸侯的割据，要完成人民国家的统一，否定世禄武士的军队，主张在军备上采取由勤劳大众本身组成的、不脱离劳动生产的民兵式的常备军，所以在当时的确还是大胆而彻底的变革的想法。不过，他也并不以为这种变革会马上实现的。他的兵制论，如在“海防余论”和“存华挫狄论”中所论述的那样，虽然在理论上否定了武士常备军，但是暂时还无法把它废除，只能先精选武士改编为近代的枪炮部队。

此后随着有关西洋兵学的知识的增进，以及领主逐渐深切地感到加强武力的必要，倒不是主张废除武士军，而是主张在武士以外征集平民编成常备军的人越来越多，长州吉田松阴的“西洋步兵论”（安政5年、1858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决定战斗胜

<sup>①</sup> 管理“贱民”的官员。——译注



利的是“我国固有的短兵战”，即原有的武士軍，但为使武士充分运用“固有之專長”和对抗西洋“精練节制”的步兵部队而立于“不败”之地，日本也須要拥有同样的步兵。其編制是“由近衛武士中选拔30人，使其精心訓練步兵，并作为师长教練全部步卒包括农兵。至于农兵人数，若由百人中取一人，則两国（周防、長州二国）中可得二千五百人。平日每人發給一名武士之口粮，在受訓和駐防期間，可增發軍米一升”。

我還沒看到提出这样明确主張的著作，但我想这可能是極普遍的想法。因为白文久3年（1863年）以来，幕府征集民伋編成的步兵部队，就是根据这种主張加以仔細研究补充后付諸实行的。还有在此以前的文久2年（1862年）刊行的大島貞熏所著“臥榻兵話”里有一段“試論日、汉兵法之得失”，文中說：在西洋，“所有境内居民，均自20岁起一律充当兵士，受三年軍事訓練，此法最妙”。著者虽然沒主張日本应当仿效这种办法，但是实行平民常备兵制的想法，可能是这样普遍开来的。

文久3年（1863年），幕府征集民伋，編成步兵队，作为軍的主力，取得的成績远远超过了武士軍隊。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軍事学家都感到世祿武士的軍隊无用，甚至有害，应当廢除而改为平民常备軍<sup>①</sup>。关于这点，以后再講。

主張組織第四种农兵即革命的民兵的理論，並沒有公然提出来。这是和明治維新的整个性質分不开的。打倒幕府和王政复古并不是革命，明治維新并不是人民革命，这在軍事問題上也表现为沒有能够創造出来关于人民革命的武装暴动即革命民兵的理論。

<sup>①</sup> 从反面来証实廢除武士論的想法广泛傳播开来的史料，有水戶会澤正志齋的門生加藤櫻老的“藩兵私議”。这部書是在庆应2年（1866年）秋季写成，庆应4年（明治元年，1868年）5月增补，同年10月經過官方批准而出版的。他坚决反对廢除武士世祿俸祿，他說：这是“将多年恩义，一朝由我廢弃”，破坏道德之根本，使社会陷于混乱。但是就連他也不能不承認武士的无能而說：“以恩义养世祿之臣，遵循旧制，事虽順便，然流于文弱軟熟，不堪激烈战斗之用”。于是，他在兵制上提出了下乡务农論，并为加强武士队伍，主張“募集采邑之农民，接替駐防，作为常备軍”，并另“組織一队乡勇士兵，在郡厅进行訓練”。象著者这样保守反动的老人，竟然也認为軍备不得不兼組織人民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主張廢除武士世祿的論調越来越盛。

这是和当时在政治理論上終于未能产生人民革命权的思想相对应的。从社会的基础上說，这意味着当时未产生出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完全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者——无产阶级的萌芽——，意味着足以产生这个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未成熟。

然而在农民起义、暴动、社会改革运动等群众斗争中，已經出現革命的民兵的萌芽，并且也發生过群众保衛民族独立的游击战式的斗争的事实。發生在嘉永年間以前的这种斗争的一、二实例，已經在第一章第一节叙述过了，在第三章里还要列举嘉永以后的实例。輔助性的民兵論和平民常备兵論并不是單純由于外国的威胁，或者取得了一些外国軍制的知識，才提出来的。而正是因为群众的武装革命斗争有了發展，从而产生了震撼封建統治的事实，于是才有人企圖巧妙地把这种群众力量控制起来加以利用，而提出了农兵論，認為不能控制而害怕它的人，就对农兵表示反对。这就是說，在所有贊成或反对农兵論的背后，都存在着革命民兵已經萌芽的事实。

## 第二章 幕府的兵制改革及其矛盾

### 第一节 三兵的創建

#### ——文久年間的改革——

櫻田門之变<sup>①</sup>以后，幕府为了对付日益高漲的国内反对幕府势力，不得已才赶紧認真着手改革兵制加强軍备。改革的方向，当然不外乎仿效西洋近代兵制，同时由講武所和蛮書調查所的学者們进行收集为实现这一改革所需要的軍事学知識。

文久元年(1861年)3月，即櫻田門之变的第二年，幕府通令旗本等修文習武，勵行節約，当此时势紧迫之际，应“特別警惕”，决

<sup>①</sup> 1860年3月3日，水戶藩流氓武士等十八人，痛恨安政大獄的鎮压政策，在櫻田門外刺死大老井伊直弼的事件。——譯注

心破除已往“因循之弊<sup>①</sup>”。4月，把以前因“特別照顧”而任用的年老旗奉行、槍奉行、警衛長、先鋒等武職加以淘汰，換上了少壯有為的武士<sup>②</sup>。5月，又由講武所奉行、軍艦奉行、大小目付之中，選任了“軍制調查專員”<sup>③</sup>。

這時，反對幕府和攘夷的浪士的活動已展開，文久2年(1862年)初，天皇發布和宮<sup>④</sup>下嫁的敕令，又發生了坂下門之變<sup>⑤</sup>，4月，反幕派的藩士等想要擺脫藩主的控制，發動了“寺田屋事變<sup>⑥</sup>”。5月23日，宣布了關於改革政治、充實軍備的“將軍諭旨”，開始頒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幕府政治的命令。

在這期間，兵制改革專員的具體改革方案業已擬定，6月，將“近衛常備軍創建程序”提交老中。起首說道：

“竊維軍制改革，乃極為艱巨之大事，不僅軍律、戰法，甚至古來之制度及有關各種法令，如不大加修改，決難完成(中略)。后擬大綱，先議細目，雖屬本末倒置，難期達到目的，實感惶惑，但因本案所涉甚廣，倘拖延日時，或將不免迂闊之譏，故採取捷徑，奉諭從速擬就成立近衛軍備方案如左”。

軍制專員从一开始就認識到在封建制度下建立近代軍隊的矛盾。正因為這種矛盾，所以根本就沒考慮“全國的國防”即防衛民族危機的軍備。草案中說：“按歐羅巴各國兵制，國王近衛軍，為數至少，然我國本系封建制度，尤其目前諸侯似皆競養重兵，故難一味拘泥外國制度，政府應酌量眾寡兩者之間，建立相當數目之近衛軍”。可見這個方案完全是為了應付國內局勢而組織幕府的近衛軍(“陸軍歷史”二十)。

① “昭德院殿御實紀”，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德川實紀”第四編。

② “陸軍歷史”卷二十，“海舟全集”第七卷，(以下“陸軍歷史”是根據海舟全集本)。

③ “海軍歷史”卷十三，“海舟全集”第八卷，(以下“海軍歷史”是根據海舟全集本)。

④ 仁孝天皇第八皇女，嫁給德川家茂。——譯注

⑤ 水戶藩的尊王派浪士，痛恨老中安藤正信的文武合體政策，於文久2年1月15日，在阪下門外襲擊安藤正信的事件。

⑥ 文久2年4月，主張討伐幕府的急進派田中謙助，有馬新七等七人，在伏見寺田屋集合，商討擁立島津久光，殺死九條尚忠和酒井忠義。島津久光的臣下奈其原喜八郎、道島五郎兵衛等試圖抑制而演成殺傷的事件。

在“陸軍歷史”里，除這“近衛常備軍創建程序”以外，另有不附帶年號日期的“陸軍將上定員”、“將上人員調查”兩個文件，列在慶應2年（1866年）的幕府兵制改革文獻的後面。由於這種原故，以前關於幕府末期兵制改革史的著述，都把這兩個文件誤解為幕府實際編成的陸軍將兵人員的文獻，但經詳細分析，才知道它是和“近衛常備軍創建程序”同時擬定的另一個方案（注一）或是補充方案。在這些計劃書中，兵種的名稱等多少有些不同，但其要點是：

陸軍奉行（俸額五千石）一人之下，設步、騎、炮三兵如下。

（1）步兵。這又分為兩種。

（甲）步兵組（或重步兵）。和現在的步兵一樣，是三兵種的主力。責令旗本從領地內農民中按照5百石米1名，1千石米3名，3千石米10名的比例提供“兵賦”人員，共征兵員6,400名。以400名為一隊編成十六個大隊。

兵士年齡自十七歲至四十五歲，服役期間為五年。但根據本人志願，准許繼續服役至四十五歲。（身分待遇等後述。）

（乙）散兵組。此又分為（I）先頭散兵或稱先鋒輕步兵；（II）近衛狙擊隊或單稱輕步兵（注二）二種。

（I）擔任保護炮隊、火藥輸送車，糧秣車等，以小普請御目見以下50袋米以下者1,020人編成四組<sup>①</sup>（四大隊）餉額是當地米30袋3人份口糧。

（II）任務沒有明文規定，可能是和它的別稱近衛狙擊隊這個名稱所表示那樣。包括天守番<sup>②</sup>，富士見寶藏番120人（或140人）為1大隊，以徒步武士20組之內17組504人（或640人）為兩個大隊，將軍衛隊220人為1大隊，共編成4個大隊。（844人或1,000人。）

以上各種步兵由步兵奉行（職務津貼3千石）3人擔任指揮，其中，2人統轄（甲）項步兵及（乙）的（I）先鋒散兵，以1人統轄（乙）的（II）。（甲）的1組之長，稱為步兵准頭（1千石），2

① 俸祿二百石以上三千石以下的旗本御家人。——譯注

② 守城兵。——譯注

組(1 联队)之長,称为步兵头(2 千石)。关于(乙)的(J),有同样称为“步兵准头”和“步兵头”,以及称为“散兵准头”、“散兵头”两个方案,最后通过的方案可能是称为“散兵准头”等。(乙)的(II),分别称为天守番,富士見宝藏番头、徒步隊長,將軍衛隊長。名称和过去一样,但是把头的員額减少,地位和步兵准头相等。

(二)騎兵。这也分为以下二种。

(甲)騎兵組。亦称重騎兵。担任护衛全軍冲破敌人步兵陣势。从小普請御目見俸祿 150 袋米以下至 50 袋米者,以及各組与力中选拔 600 人編成 4 个小队,每組 96 騎,共 6 組(6 个騎兵連)。据另一方案,是 4 个小队、6 組,总名額为 808 騎。

(乙)騎兵槍組。亦称輕騎兵。担任护衛重騎兵的側面及炮兵迅速襲击敌人。以小普請御目見俸祿 1 百袋米以下者 192 人編成,每組 96 騎共二組。

以上的輕重騎兵年齡均限 17 岁以至 50 岁。50 岁以上的与力等,应即退伍而令其長子或养子入伍。待遇,服役期間 150 袋米。編入騎兵队者,要离开以往当与力等所屬的組,共同生活在一起。

騎兵的总指揮官是騎兵奉行,和步兵奉行职級相等。其下有騎兵头 2 人,騎兵准头 4 人,和步兵头,步兵准头同級。其下是上述輕重騎兵 8 組之長,称为騎兵指揮头,俸祿为 4 百袋米,职务津貼为 1 百袋米。

(三)炮兵。这也分为輕重二种。

(甲)輕野炮队。由各組同心中选拔炮手 384 人、炮 48 門編成六“座”(每“座”炮手 64 人,炮 8 門)。

(乙)重野炮队。同样选拔炮手 416 人、大炮 52 門編成 6 “座”半。

輕重炮兵队的任务并未明确区分。重炮队似乎是担任守衛江戶城的各門,但并不是不参加野战。两者在备炮上有区别,輕炮队有發射 6 斤炮彈的野炮和 12 厘米榴彈炮,重炮队則有發射 12 斤炮彈的野炮和 15 厘米炮彈的榴彈炮。

大炮組不設奉行, 1 “座”(炮 8 門,炮手 64 人)的指揮官称为

“大炮組頭”，俸祿 1 千石，和步兵騎兵的准頭同級。

以上三兵種共計，步兵 8,264 人，23 個大隊，（散兵的(II)按兵員數作為 3 大隊），騎兵 768 騎，8 個大隊，炮兵擁有炮 94 門、炮手 800 人，12 “座”半隊，這是總隊。

此外，各兵種均設有游軍，例如炮兵各組同心有 2,845 名，其中除編入野炮隊的 800 名以外，下余 2 千余名作為游軍和海岸炮台的炮手。騎兵隊也有 300 騎的游軍。但是，這些所謂游軍，只是對沒有被吸收到本隊里來而編余的與力、同心、小普請等的稱呼。方案的起草人固然表示要把這些下級武士全部分別編入近代的各兵種，但這只是書面的計劃並沒有實現的可能。

三兵完全是由農民及與力、同心等以往的步卒編成，此外還將奧向<sup>①</sup>、寄合<sup>②</sup>各番士（但將軍衛隊編入散兵）各按其所長，編為刀槍 2 隊，各隊以俸祿 5 百石以上者為騎兵，不滿 5 百石者為步兵，作為將軍的“馬前守衛”。但無論步兵或騎兵其刀隊均荷馬槍。至於大番組<sup>③</sup>，因預定派往在京都、大阪地方務農，（想係借眷遷居的意思）所以沒有編入以上步騎刀槍隊內。

以上是三兵編制方案的大綱，關於三兵種的各聯隊、大隊、中隊、小隊的組織，兵員數及裝備等，另外還有詳細的方案，這裡從略。因為本文的目的是要從社會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研究常備兵制的，後面還要在必要的限度以內，多少提到軍隊的內部組織問題。

從政治史的角度上值得重視的是，上述軍制改革方案的提出還是在起用德川慶善為將軍的監護人，起用前越前藩主松平春岳為幕府的“政務總裁”實行著名的幕府制度改革以前，而在這一改革後所進行的幕府兵制改革，不過是上述方案的實施而已。以前在水戶的德川齊昭和阿部正弘的領導下都沒能擬出具體的改革方案，而在这時，不等德川慶喜、松平春岳等人上台，就已經擬出

① 后勤武士。譯注

② 三千石以上的退役武士。——譯注

③ 輪流警衛江戶、大阪、京都二條的武士。——譯注

了这样極其具体的方案,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什么东西使这次改革成为必然而且可能的了。

不久到了8月,廢除弓术檢閱,閏8月,又廢除持弓、先手弓<sup>①</sup>和消防队,把他們編为洋槍組,9月,又廢除講武所的弓术課程。

11月28日,將軍分別召見各部門負責人員,命令尽力完成軍制改革,从此,便按照上述方案着手組織三兵常备軍。12月1日,首先任命陸軍奉行、步兵奉行、步兵头,同月6日,通令自1万石至1百袋的旗本、御家人提供兵員(詳細情形后述),7日,宣布將將軍衛队編为“近衛狙击队”,并命令在讲武所練習洋槍,25日,任命陸軍總裁,28日,任命步兵头、騎兵头、大炮組头及各該准头。

这时还任命了“御持小筒組准头”<sup>②</sup>。这一名称并没有列在上述改革方案中,但据史料<sup>③</sup>所載,有从小普請組中选1百人編入“御持小筒組”看来,这可能是方案中所列的“先鋒輕步兵”或“先鋒散兵”的散兵。以后,这个組的数目也改成4組,在庆应2年(1866年)改为散兵。

文久3年(1863年)2月,番士的步騎=刀槍队編成(“嘉永明治年間录”十二)。繼而三兵的下級軍官也依次任命了。3月,任命騎兵奉行和御持小筒組头。在这中間,“兵賦”的征集工作也在逐步进行。所謂“兵賦”是什么呢?

从封建制度的原則來說,旗本、御家人(各藩的藩上亦同)虽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拥有領地(即知行所),以那里居民为农奴,(商人准于农奴,隶属于領主)而进行統治和剝削的領主。他們的領地是由將軍所賜給的,或是由將軍所保障的。为了报答將軍的“恩情”,他們有义务对將軍尽“忠”,为將軍服文武差役,將軍作战时,必須率領“軍役人員”上陣。这种“軍役人員”的名額,是根据幕府的法

① 守衛江戶城門,担任防火防盜的与力、同心的組織。——譯注

② 管理將軍槍械,战时率領同心、与力护卫大营的官員。——譯注

③ “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五,“我自刊我丛书”本。

令，按領地租額規定的。旗本和御家人平素就拥有相当于軍役人員的部下(世襲的亲兵)，經常进行訓練，这样作才算得上模範的真正武士。然而，到了幕府末期，这样武士实际上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無論是誰都認為“軍役人員”就是从領地內征集的农奴或农民，这样被征集去服軍役的农民，始終是他們的領主的仆役，他們由領主(主人)發給武器和給养，跟随着主人，而絕不会被征集到別的地方，接受主人以外的旁人的訓練。这就是古时的兵役制度。

幕府这次改革軍制，並沒有廢除軍役制度，而是把向旗本、御家人摊派的軍役人員，減少到从前的一半，并通令他們提供按租額規定的“軍制兵賦”的人数。也就是由領地內的农民中尽量选拔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壯健男子，“由主人切实曉諭”，这是“为报答多少年来的恩澤”，把他們編入幕府的“步兵組”，編为洋槍队，使其住在“兵营”。

軍役人員是和各該主人在一起的，而“兵賦”則是同主人分开的。軍役人員分为武士若干名，持槍者若干名，勤务兵若干名，任务各有不同，而“兵賦”則一律为洋槍队。許多旗本所提供的“兵賦”，却集中在兵营，在那里接受和他們領主毫无关系的教官的軍事訓練，并由幕府發給装备，編成步兵組。既然住在兵营，衣食也不是由各該領主担負，而是由幕府直接供給。他們的身分不是平民，而是被列在最低一級的卒——“小揚”之下，可以說是准卒，并被准許佩帶一口短刀。

然而，这种“兵賦”同各該領主的农奴关系並沒有完全斷絕，兵賦的餉，規定为每年十两以內，由各該領主“适当地”支給。

那么，旗本們提供“兵賦”的比率是多少呢？原則上有領地者，每5百石出1人，零数每百石繳納黄金2两，每千石出3人，零数每百石交納黄金2两2錢，每3千石出10人，零数每百石繳納黄金3两，3千石以上者，按每3千石出10人，零数按每3百石出1人計算，再有零数，則每百石繳納黄金3两。这是原則，但因旗本貧困，暫定5百石以下者全免，5百石以上3千石以下者減半。

沒有領地而領祿米者，全部繳納現金，5百袋以下者，每1百



袋繳黃金 2 兩，1 千袋以下者，每 1 百袋繳納黃金 2 兩 2 錢，1 千袋以上者，每 1 百袋繳納黃金 3 兩。這項也是暫定 5 百袋以下者，全免，3 千袋以下者減半。

新的“兵賦”在形式上是舊軍役人員的一部分，它的隸屬關係也沒有完全斷絕，但實際上它和舊軍役人員的性質完全不同了。這種制度是幕府通過隸屬下的小領主（旗本、御家人）作為民伕征集農奴編成幕府直轄的步兵部隊，只是在通過旗本、御家人這一點上，還保留着舊軍役的影子而已，而且允許較大比率地折合現金繳納這一點，表明着通過領主征集農奴在實際上已逐漸變為不可能了。這是幕府企圖由舊的封建領主一躍而成為專制君主制的一個重大步驟。

兵賦負擔的攤派比率，比起改革以前的軍役雖然減到 4 分之 1 以下，但是 2 百多年以來，從未提供過軍役人員，尚且生活日益困難的旗本，現在驟然被勒令交出“兵賦”，當然不是很容易就辦到的。幕府為保證兵賦的提供，通令勵行節約，甚至限制僕從人數、冠婚喪祭的辦法、妻子的服裝等細節，以及允許旗本緩期償還所欠貸款，但同時卻又嚴令如數提供“兵賦”。文久 3 年（1863 年）1 月，好容易算是在西丸下設立了步兵駐屯所，同年 7 月，又增設駐屯所 4 處，派駐了“兵賦”。

這樣，前一年 6 月的“近衛常備軍創建”方案大致實現了。在這個月，軍制總管上書說：“今三兵編制法均已制定，如再通令交齊兵賦，加以各組與力、同心依次補入騎炮三兵，則三兵威力當逐漸提高，若再按以前調查分別指派將軍衛隊長、徒步武士隊長，則可以無顧慮矣”。（“陸軍歷史”卷十九）

那麼，實際上三兵究竟編成了多少呢？本來幕府對於自己就不想正確了解，它所採取的各項措施也不過是隨時隨地消極應付而已，所以對於兵力也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這裡只有大約是元治元年（1864 年）末的（注三）陸軍的年度預算要求書“三兵局經費 15 萬兩”，“軍官經費 7 萬 5 千兩”，試根據這個要求書來估計一下三兵的兵員額數。

要求書中所列当时軍官員額如下。

## (甲)

軍衛 兵種	總司令 (頭)	副司令 (准頭)	督察官	總指揮	指 揮	副指揮	助理指揮	副助理 指 揮
步 兵 (餉)	4人 (2千石)	8人 (1千石)	4人 (7百石)	64人 (4百石)	48人 (3百石)	56人 (250石)	64人 (80袋 15兩)	192人 (70袋 10兩)
騎 兵	2人 (2千石)	4人 (1千石)	2人 (7百石)	8人 (4百石)	18人 (3百石)	18人 (250石)	26人 (80袋 15兩)	56人 (70袋 10兩)
御 持 小 筒	2人 (2千石)	4人 (1千石)	2人 (7百石)	御持小筒 組組長 16人 (4百石)	16人 (3百石)	16人 (250石)	16人 (80袋 15兩)	64人 (70袋 10兩)
大 炮	8人 (1千石)			16人 (4百石)	32人 (3百石)	32人 (250石)	64人 (80袋 15兩)	64人 (70袋 10兩)

改革方案所列陸軍軍官定額如下。

## (乙)

軍衛 兵種	總司令 (頭)	副司令 (准頭)	監軍	正指揮	指 揮	副指揮員	助理指揮	副助理 指 揮
步兵組 (餉)	8人 (2千石)	16人 (1千石)	8人 (7百石)	80人 (4百袋)	96人 (3百袋)	80人 (250袋)	80人 (1百袋 15兩)	302人 (70袋 10兩)
騎兵組	2人 (2千石)	4人 (1千石)	2人 (7百石)	8人 (4百袋)	18人 (3百袋)	18人 (250袋)	26人 (1百袋 30兩)	56人 (70袋 30兩)
散兵組	2人 (2千石)	4人 (1千石)		16人 (4百袋)	16人 (3百袋)	16人 (250袋)	16袋 (80袋 13兩)	64人 (70袋 7兩)
大炮組	12人 (1千石)			25人 (4百袋)	25人 (3百袋)	25人 (250袋)	无定額 (80袋 10兩)	100人 (70袋 7兩)

試對比甲乙兩表，可知甲表的督察官和乙表的監軍是相同的；而散兵和“御持小筒組”也是相同的(前述)。由此可知，騎兵和“散兵”是按照預定編成了。因為兩者都是由小普請編的。不過關於散兵(御持小筒組)，在另一史料(“嘉永明治年間錄”卷十五)里記

載：“文久2年(1862年)12月，从小普請选拔1百人。元治元年(1864年)6月，野州發生騷动时，又由各司补充，編成6小队約240余人。又于庆应2年(1866年)7月云云”，可見到1866年7月，大約不致只有6个小队。至于步兵和炮兵，若只以“头”的員額来比較，可能各自編成了原定員額的2分之1和3分之2，但各級軍官的比率为何不同，不得而知，所以不能断定。尤其是关于炮兵，沒有任何資料可查，因而无从作进一步的估計。

关于步兵的員額，在这預算要求書提出的次年即庆应元年(1865年)1月的步兵食費增加額要求書內載有：“1年提供步兵3760名”，又称庆应3年兵賦提供法改正(后述)前的2年9月以前，提供的“兵賦”是“約3500人”，同一时期的“步兵1个联队(2个組)經費調查書”中所列兵士为840人(“陸軍历史”卷二八、二三、二八、)。根据这些資料估計，庆应元年，当时步兵員額應該是8組(4个联队)，大約3千5、6百人。另据“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二)的記載，文久3年7月設置步兵駐屯所4处，“每所5千名共2万名”，这可能是一般人傳說的夸大数字。

这里被征集来的兵賦步兵，并不限于从旗本領地內提供的“兵賦”，其中也包括从幕府直轄領地的农村摊派征集来的“兵賦”。关于这点，虽然沒有完整的資料可查，但由信州御影代官所管下佐久郡各村总代表的請願書中的下列一节可以知道，在庆应元年(1865年)，对幕府直轄領地各村按地租額每1千石出1人的比率征集了兵賦。

“信州佐久郡各村吏总代表一同报告：关于直轄領地兵賦一案，曾于丑年(庆应元年)中奉諭按租額每1千石出1人，仰即选拔提出等因，奉此，当即由管下各村按租額提供兵賦26人，送至江戶駐屯所，但……”(下略)。(田村荣太郎著“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論”)

还有庆应元年11月的幕府“步兵駐屯所規則”中也規定有：“凡兵賦入駐屯所者，限年令自18岁至45岁，不分来自直轄領地或旗本領地，一律定为5年”(“陸軍历史”卷二八)。

根据这些资料,可知不仅由旗本領地提供了“兵賦”,从幕府直轄地也征集了“兵賦”。

如上所述,总算征集了兵賦,迈出了組織近代三兵的第一步。但是,从这里立即可以看出,不但上級武士,就是中級武士也并未被編入近代化軍隊里来。三兵主力的步兵組,是征集农民編成的,其他部队,則是由小普請或与力、同心等最下級的武士組成的。正如講武所劍术教官松平上总介的建議書(參看第一章第三节)中所說,中級以上的武士是不肯“仿效西洋下級兵卒”的。可見一般武士階級已經在变为对于封建領主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長物。

元治元年(1864年),水戶的天狗党<sup>①</sup>暴动时,三兵中的步兵組作为幕府討伐軍的主力,树立了功績。尽管这样,次年庆应元年(1865年),幕府勘定奉行小栗上野介还批評說:“徒有其名,騎兵头仅自荷兰人学会馬术,还談不到运用騎兵队伍作战,实际上还不配称为三兵”(匏庵遺稿)。当时原想委托駐在橫濱的英国軍隊教練三兵(“陸軍历史”二十四),但因英国那时已逐漸鄙弃幕府,所以沒能办到。而法国公使列盎·罗修則正在进行策划援助幕府消灭反幕府派,企圖使幕府成为日本全国的統一君主,把它置于法国勢力之下。幕府方面以小栗上野介等为中心,想要接受法国援助,因而幕府和法国的关系,很快地就紧密起来。这时,为了准备招聘法国軍官团,正式教練三兵,在庆应元年1月,建立了法語学校。

(注一)“陸軍历史”卷二十。

以“近衛常备軍建立方案”为A,“陸軍軍官定額”为B,“將士人員調查”为C。

ABC之間的差別是这样,A是說明如何征集各兵种的兵員,B是說明对征来的兵員如何进行編队,C是說明指揮官的名称、地位、任务等。具体举例如下:

在A中

#### 一、重步兵

旗本領地按5百石1人,1千石3人,3千石10人的比率提供兵賦。此項人員是6,381人,但由幕府領取祿米之旗本及因家祿过低領取補貼者可不出兵賦,折繳

① 水戶藩內尊王攘夷的过激派,首領是田丸稻左衛門和藤田小四郎等人。  
——釋注

現金，領地 500 石以下的零數，亦折繳現金。

(其他从略) (129 頁)

但在 B 中

一、步兵組 16 組

以兵賦人員組成，每組 893 人，內小頭 5 人組共 16 組內，有常備 12 組，外郭番兵游軍 2 組。

一、步兵頭 每 2 組 1 名，西洋上校隊長，俸額 2 千石。

上列人員指揮步兵 2 組，即 1 個聯隊。(157 頁)

在 C 中

一、兵賦人員約有 6,400 人，可組成 16 個大隊，(1 小隊 40 人，1 大隊 4 百人)，暫先指派左列各職，其餘各職，可按另冊陸續指派。

一、步兵准頭，16 名俸額 1 千石。

上列人員，為大隊長，即一組之指揮。

(其他从略)。

此外關於輕步兵(散兵)、騎兵、炮兵等也都相同。據估計，A 是征集法，B 是征集兵士的編制原則，C 是當時暫行的編制。

(注二)先鋒輕步兵又稱為“大炮隊火藥輸送車守護散兵”。

一般所稱的輕步兵，據高野長英譯“三兵戰術”所載：“各國往往在大隊中編輕步兵為一單位，因有許多便利，故置於本隊之前。

其制乃以一隊單獨進行短兵戰為任務，其法多系散兵戰，故不似戰鬥橫隊之步兵，絕少對大部隊敵人進行挑戰”(高野長英全集第三卷)。

(注三)“陸軍歷史”二十九。

這個文件沒有記載年代，根據文中有“前戊年 4 月”，可以推定為元治元年。而這項請求的預算，據說是在慶應元年被批准的(同上，勝海舟之評語)。由此看來，不像是在元治元年初提出的。

又據慶應元年正月的財政支出調查報告書中所載：“關於陸軍需款一案，曾於上年(去子年)調查統計後轉送勘定奉行及審計官審查，經逐項審查後退回并附注意見，囑令再行調查統計，然後報請。此次接審查組長通知，該項預算已被批准……”。(“陸軍歷史”同上)

## 第二節 征討長州的失敗和慶應年間的改革

文久 2 年末以來，雖然幕府在傾注全力進行建立三兵，但是以長州藩為根據地的各藩浪士的反幕運動也在不斷發展，逐漸和

全国各地取得联系，到了文久3年（1863年），竟强迫幕府实行攘夷，使幕府终于不得不发出布告，规定在同年5月10日实行攘夷。届期，长州藩未经事前警告便向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进行了炮击。这年7月，英国舰队以解决前年萨摩藩士在横滨郊外生麦杀死英国人的事件为口实，侵入鹿儿岛湾，同萨摩藩进行了两天的战斗，这是一个大事件。

在国内政治方面，尊王攘夷派为了实现攘夷，进行打倒幕府、拥戴天皇、建立统一政权的活动。但是孝明天皇本人却在内心里极力反对倒幕，尊王攘夷派的计划，竟被孝明天皇透露给幕府方面。8月18日，幕府发动武装政变，长州藩上等尊王攘夷派被逐出京都，和他们通谋的三条实美等公卿7人也从京都逃到长州。

尽管这样，长州藩上并不灰心，次年7月，率领大军，进入京都，发动了禁门之变<sup>①</sup>，结果又遭到惨败。此后政局表面上形成了“公武合体”<sup>②</sup>，幕府似乎完全夺回了对时局的主动权，长州被天皇宣布为叛逆，成为幕府讨伐的对象。

正在这年8月，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借口报复前年在下关海峡船只遭受炮击，向日本展开进攻。长州藩当然抵抗不了，立即惨败，答应以后保障今后外国船只可以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赔款（由幕府付给）及其他条件而媾了和。经过前一年的萨英战争和这次下关战争以后，萨、长两藩改革派的领导集团已经不想再用武力进行攘夷，反而同英国亲密起来。而英国方面也鄙弃了幕府，企图援助反幕派，使之统一日本，然后将这个统一政权置于自己势力之下。

在禁门之变和下关战争之后，长州藩内的保守派上层武士，暂时夺回了藩政的实权，对于幕府，一战没打便完全接受了幕府提出的条件而投了降，并把禁门之变的负责人3名家老和4名参谋分

① 长州军与京都守护松平容保指挥下的各藩军在宫门附近进行的战役。——译注

② “公”是“公家”即朝廷，“武”是“武家”即幕府，双方共同合作的局面，这是老中安藤正信一派的主张。——译注

別处刑。于是，高杉晋作等所领导的急进改革派，在那年12月再度举兵，掀起持续两月的内乱，取得了胜利，重新掌握了藩政的实权。对于幕府，表面上表示“恭顺”，暗中却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次年庆应元年（1865年）3月，起用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为军制总管，他是周防鞆钱司村的开业医的儿子，起初学习荷兰医学，后来转到兵学方面。在他的领导下，坚决进行了军备改革。把火绳枪、甲冑等全部卖掉，而代之以最新式的来福枪（注四），把中间阶层的武士和步卒编成了来福枪队。

7月，废除以往作为藩兵制度的基干的八组制度。所谓八组是把马廻以上的藩士编成8组，由藩内最高家族八家统率的部队。当时宣布八组“因系使用刀枪进行短兵战的部队，对当前枪炮战斗，有损无益”，予以解散。组员中有才能者被任为步枪队、炮队的指挥，下余组员事实上均被解除了军务。

到了6月，更进一步从新规定1050石以下的藩士提供军役人员的比率，废除以往军队中的持枪等各种勤务兵，而一律改为步枪兵，集合数十家军役步枪兵为一队，断其主从关系，原来的主人变成了“单人独马”，也就是和幕府分派旗本等提供兵赋相似。到了10月，又把藩主一家及八家以下1千石以上高级武士的家兵（包括军役人员）从其主人手中抽出来编成步枪大队。（修正防长回天史第九）

以上是对藩正规军的改编情况，此外，长州藩在文久3年（1863年）6月为了攘夷战争而编成了奇兵队，以及把下级藩士和平民编制成了所谓“诸队”的急进派的兵力，这些至少有2千名，作为这些部队预备队，在藩内各地还训练了农兵。“诸队”具有明确的反幕府的政治思想，斗志极其旺盛，详情将在下一章叙述。

幕府也完全了解长州藩拿出全藩的力量建立了这样近代化的军备。庆应2年（1866年），幕府在法国公使罗修的指导下，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企图把它彻底击溃。幕府集结了谱代大名的兵力，主力沿着山阳道（艺州口）前进，另外还从西南的小仓口和山阴的石州口分3路向长州藩进攻，但结果是幕府军到处遭到

惨敗。幕府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它完全喪失了民心，其次是由于前一年第一次討伐長州時擔任幕府方面主要角色的薩摩藩，對於這次討伐堅決反對，以及外樣大名<sup>①</sup>有的積極反對，有的不支援。

從軍事上看來，也正如上所述那樣，長州全藩包括平民不但具有近代化裝備，受過近代的訓練，而且都是為着保衛鄉土而士氣昂揚。反之，幕府方面的隊伍一般上氣不振，因這次戰爭完全是不願輿論的反對而勉強發動起來的，因而師出無名，何況各藩內部因為農民起義的浪潮高漲，實際上也遠遠談不到支援幕府征討長州，而他們的裝備，也完全是關原戰爭<sup>②</sup>時代的水平。

其中只有幕府的三兵，不遜於長州，它的裝備、編制和戰術全是近代化的。幕府的藝州口副總督在給總督的報告（6月19日）中也說：“官兵中之三兵、講武所及特種部隊（注五）等隊，均極勇敢，遠非諸侯可比”（新聞會叢）。還有人說：“敵方對官軍三兵隊亦特別畏懼，我方亦非常倚重”（七年史）。所以，藝州口總督（紀州藩主）向幕府請求“以精兵三萬，全部編成三兵隊，從速派來”，他自己也想要把參加作戰的藩兵馬上編成洋槍隊（七年史）。（從此以後，紀州藩的兵制改革，大大進展了。）

8月3日，德川慶喜決定代替將軍親自臨陣，要把駐在大阪的兵員中“1萬石以下者，悉數編為洋槍隊”，身分在平民以上者，也將給予低於其身分的職務，打破一部分身分制度，將這些人編為“游擊隊”（“御在阪日次記”，繼德川實紀第五編，“新聞會叢”）。（然而以後不久，因將軍德川家茂死去，停止了遠征長州，同時組織“游擊隊”的計劃也作罷）到了這時，對上級武士仍然是毫無辦法。

在這以前的5月，長州討伐戰還沒開火時，小栗上野介等曾計劃向法國借來軍艦和貸款，“乘勢討伐一二強藩，並乘勝制服其他大藩，打破封建割據之制”。這件事載在勝海舟的“鷄肋”和“解難

① 不屬於德川氏同宗或直系、也就是旁系的大名。——譯注

② 1600年9月15日，德川家康同石田三成為爭奪天下，在關原（今屬岐阜縣不破郡）進行的最後決戰，結果，德川家康獲勝，建立了德川幕府。——譯注



录”等書中，是众所周知的<sup>①</sup>。德川庆喜在决定临陣的8月2日，也曾致書法国公使罗修，恳請“赶紧筹措”大小槍炮、运输船只。同月27日罢兵后，又致書罗修說：“皇帝体察国内上下衷情，已下令暂时停战，拟乘此机，首先急速改革大綱恢复政体，施行足下平素諄諄相告之固本培根大計，（中略）并决定革新部内軍制”，乞求援助船艦、武器，并說：“望体察时势之变迁，人心之动向，深切了解我等心意”（木村芥舟編“三十年史”）。

当德川庆喜等在大阪进行这种策划时，江戶方面也“得悉战地形势”，提出了第二次軍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所有旗本的軍役，統通以洋槍兵編成“‘混合’洋槍队”（注意：这和長州的作法完全相同），并将三番武上<sup>②</sup>、徒步武士、先鋒队、弓矛手以及勤务兵、与力、同心等全部編为洋槍队（“陸軍历史”卷二十）。

根据这个方案，在8月，發表新的軍役人員分配額，姑且先把3千石以上的軍役洋槍兵，編成“混合步槍队”。在这前后，廢除了“小普請組”指揮下的各取，改归陸軍奉行助理指揮，廢除“防火防盜緝察”，編入步槍組（即“御持小筒組”，这是以前改訂方案拟的名称），廢除“中奥小姓和中奥御番”<sup>③</sup>，前者編入“勤仕并寄合”<sup>④</sup>，后者編入“小普請”，所有与力、同心都編入“洋槍队”，并将將軍游猎区巡視、徒步武上、鼓手、勤务員、山間別墅勤务員以及先鋒、留守、消防組四組、江戶城西郭后門警衛等全部撤銷，把这些人分別編为“洋槍队”或洋槍組。这个洋槍队沒有定額，大概就是文久2年改革方案中所称的“游軍”。

9月，“小筒組”改名为“散兵”、“大炮組”改名为“炮兵組”。10月，廢除駐在内殿及講武所的劍术教师，命令他們練習槍战，改称为游击队，八王子的千人同心也改为千人洋槍队。11月5日，規定把旗本一律編为洋槍队，分平民以上和以下，按照身分制定軍服，

<sup>①</sup> 小栗上野介和德川庆喜等为了乞求法国援助，曾企圖許給北海道的权利，并讓法国独占生絲貿易。所有这些詳情，請參閱井上著“日本近代史”第一卷。

<sup>②</sup> 在殿中，营中值勤的兵士。所謂大番、書苑番、小姓番的三番。——譯注

<sup>③</sup> 在内殿紅葉間值勤的兵士。——譯注

<sup>④</sup> 俸祿3千石以上的后备役。——譯注

并把各組与力、同心、飼馬員等一律編入“散兵”，把“小納戶”、“小姓”<sup>①</sup>等編入“勤仕并寄合”，“講武所”也改为“陸軍所”，奠定了近代士官学校的初步基础。

12月，断然廢除“兩番”<sup>②</sup>、“新番”<sup>③</sup>、“大番”（五組）等幕府旧軍制的基干（类似長州八組的高级武士部队），而把健壯者按照身分編成“殿中洋槍队”、“殿中游击队”。这是保衛將軍身边的近衛部队。此外，还把一部分編入“游击队”和其他部队。廢除徒步武士組、將軍护衛組（十五組），編入各种洋槍队，所有头目或組头都編入“勤仕并寄合”。此外，所有剃髮匠、礼品掌管員等各項閑职，也一律撤消，編成步槍队<sup>④</sup>。

这样，对幕府的旧有軍制全面加以改革，所有战士都分別編各种洋槍队，这和長州的解散八組及其他改組完全相同。若在討伐長州以前实行了这些改革，譜代各藩也这样作了的話，長州軍能否取得那样胜利，那就很成問題。这固然是事后的話，作为封建制度的核心的幕府，比起由改革派的下級武士們先掌握了領導权的長州終于迈迟了一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所有旗本、御家人等虽然都分別編成各种洋槍队，但是他們已經不再是幕府軍备的主力了。主力是三兵即由农民編成的步兵組和最下級武士編制的騎兵、炮兵，特别是步兵。所以，如前所述，在庆应2年（1866年）8月，命令旗本等除兵賦以外，还要提供軍役洋槍兵，命令6百石以上者出人，6百石以下至3百石者折繳現金（由幕府領取祿米者，一律繳納現金），并規定提供兵員和祿米額的比率。而且，这时旗本中几乎沒有拥有世襲家臣可以提供軍役人員的，因而他們不得不从新招收步兵。幕府为了便于这种招募，指定4名江戶商人包办代募。这样一来，旧时的封建軍制也就完全瓦解了。（“嘉永明治年間录”十五，“陸軍历史”二十三）

① 侍候將軍理髮、吃飯等的勤杂員。——譯注。

② 書院番和小姓番。——譯注

③ 將軍出行时担任警衛者。——譯注

④ 关于上述改革的史料，載在“續德川實紀”第五編，“陸軍历史”卷二十、二十一，“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五，“德川禁令考”第五帙等書中，这里不一一注明。

这种軍役洋槍兵，并不象“兵賦”那样集体地住在兵营里，而是住在各自主人家里的封建从者，沒有軍事訓練时，他們要作主人吩咐的任何工作。但很快地就發現了这种封建性的主从关系，对于練成近代的步兵队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仅仅 1 个月以后的 9 月，軍制总管便上書幕府建議將这次軍役洋槍兵及从前的兵賦，一律改为繳納現金，用这笔款由幕府直接招募士兵，編成“常备軍”。

其理由有三：第一、軍役洋槍兵中(关于兵賦另行說明)有武士，有步卒，也有农民、商人、还有流氓无賴，这样“分子龐杂”的兵，“一旦身临死生之境結果当如何哉”；第二、由于主人身分不同，步槍兵的餉額也高低不等，致使部队不能統一，“至少各士兵之階級及餉額之多寡，如不一律，則众心絕难齐一”；第三、3 千石以下者提供的洋槍兵，一家至多不过 20 名，少者仅仅 3、4 名，因此，要編成一个大隊，需要糾合 60—70 家的洋槍兵，这样，只能是“烏合之众”，断难成为勁旅。

軍制总管还主張：如果軍役能折合現金繳納，同时兵賦亦應該折合現金繳納，使其完全一律。

这个意見的确合理，因为在封建主从关系的束縛下，不可能建立起近代的軍隊。然而幕府当局并未采納这个建議，可能由于認為打破“主从”这一基本封建秩序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承認主从关系，又要發生新的困难，那就是兵賦到主人家里，“勒索金錢”，要求增加薪餉。在文久 3 年(1863 年)4 月征集兵賦后不久就發生了这种情形，幕府曾經严令禁止(“嘉永明治年間录”十二)，但只憑一紙禁令是无效的。庆应 3 年(1867 年)1 月，幕府终于宣称：因为兵賦“由地头 村方領取过分薪餉額之弊端时常發生”，所以將各領主各自招收兵賦送交幕府办法取消，改由幕府直接招募，因此，兵賦一律改为折合現金繳納，每人定为現金 25 两，以往由幕府領取祿米而繳納現金者，較前加倍。同时，規定兵士薪餉每年为 15 两，对于小头另發职务津貼 10 两，对服役 10 年以上的“精勤者”在“退役”时，按照服役年限發給津貼。

这样，兵赋和旗本的关系完全断绝而成了幕府的“半”佣兵。为什么称为“半”佣兵呢？因为幕府征募兵赋，是从直轄領地征集农民，所以并不是純粹的佣兵，在本質上还带有征派农奴劳役的性質。但又不同于以往完全不給报酬的劳役，1年15两的薪餉，比起当时御家人在江戶市中雇佣僕人的工資：男僕每年1两2分，最多3两；女僕每年1—2两<sup>①</sup>，都是相当高的。要是比起明治年間征兵法規定的步兵日薪5分、一年18圓2角，就更高了。这种兵赋不仅征自农民，并且从江戶的无产市民中还雇佣了不少。据胜海舟說，幕府步兵“多为市僧游蕩之徒，只是貪圖薪餉，为一时糊口而已”（“陸軍历史”二十三）。由此可見，这种兵赋是具有佣兵性質的。由于穿上軍服的农奴的斗争，終于迫使幕府不得不完全由自己来招募半佣兵的兵赋了。

当年6月，炮兵也采用幕府直轄領地出的兵赋了。据当时炮兵头建議說：“从前的炮兵（由同心組成的）身体不甚强壮，經不起劳苦。去年曾經申請采用直轄領地兵赋編成炮兵，将从前炮兵改为散兵。茲教練（由法国軍官团进行的教練，后述）即将开始，故請从速实行这一改革”。这就是說連同心等下級武士也經不起正式炮兵的訓練。这项意見被采納后，馬上付諸实行，除农民兵赋外，并由江戶市中募集志願者組織了炮兵（“陸軍历史”二十三）。

長州藩的情形也是一样。庆应元年（1865年）6月，飭令俸祿高的藩士征集炮兵时，諭示炮队特經“商議，应由領地农民”征集（“修正防長回天史”九）。

当国内这样大力建立新軍时，幕府和法国陸軍当局在巴黎簽訂了招聘軍官的合同，次年庆应3年（1867年）春，以夏諾万大尉为首的軍官、軍士团到达日本，立即在橫濱太田兵营开始訓練三

<sup>①</sup> 杂志“江戶”第180期所載旧幕府与力佐久間長敬的“嘉永日記”，杂抄六內記有：与力的男僕工資一年1两2錢，女僕1两。据說与力（警察）的男僕倚仗主人的势力，另有額外收入，所以工資少。

庆应2年时每年15两的工資，若按同年江戶市内米价（每两1斗2升）折合大米是1石8斗，再将这些大米按1953年6月东京市内黑市价格折合現款，約为3万6千圓，即每月3千元，而現在保安队兵士的月薪是5千圓，可見还不到从前农奴雇佣兵月薪的2倍。

兵,6月,把訓練所迁到江戶。

夏諾万等的法国教官团,不象过去在長崎港对幕府各藩学生进行近代海軍初步技术教練的荷兰海軍教官团那样單純的兵学技术教官,他們是为了执行法国的政策,即在日本培植法国势力,使幕府成为法国保护下的統一君主政府而派遣来的。正象罗修公使指导幕府进行改革政治机构和制定政策那样,夏諾万担任指导幕府改革軍制体系和制定对反幕派的軍事战略。

夏諾万到任不久的4月,(阳曆?)便对幕府軍队的缺点,各兵种的軍官、兵士、武器和軍队内部事务等,提出尖銳批評。他說:“日本軍官中真正受过教育者竟无一人,只能認識外国武器而已,其中过于年迈者亦不少”。“兵士中一旦临陣,經不起劳累者甚多”。“所造大炮,其膛綫作法多屬錯誤”。“日本軍官頗能按照規章并借威权进行指揮,但不知勤务細节,在对各兵种的教練上作法并不一致,是大錯也”。“应采用合理制度作为各項勤务之基础,在法令、命令、守則等方面疏漏遺憾之处甚多”。此外,还提到編制及軍官教育等項,結論是:“立即看出,日本人以前所进行的改革,既无目的又无远見”。(“陸軍历史”二十六)

根据以上理由,夏諾万向幕府提出建立他所謂的既有“目的”又有“远見”的完整的近代軍制体系的詳細的建議。在“論述建立第一种法制組織”中,詳述設置陸軍省和兵士征募法(国民义务兵役制)等等,并論述“組織軍事法庭”,还說“軍队中果能拥有經過訓練之軍官,具备精密之編制表册,則平时可大大縮減兵員,因战时可以迅速增加实际員額故也”,“应經常注意造就軍官及兵士”。这就是說,采用不断輪換的現役和預备役制度来建立近代常备軍制。

幕府尽量采納了他的意見。幕府实行直接征募兵賦可能也是根据夏諾万的建議。6月,将三兵訓練所迁到江戶,同时,在陸軍所(从前的講武所)內設立士官学校,选拔14—19岁的有才能的幕府臣僚子弟入学。由此可見,幕府始終是想要把自己加强成为專制君主。不仅这样,在11月“奉还大政”即伪装交出政权以后,还

曾命令所有幕府臣僚，即御目見以上及以下，不論本人、子弟或是旁系親屬，自 15—35 岁的身体強壯者，除文官外，“不問本人志願與否均令一律學習三兵軍官課程”，同時，還大力擴充德丸原和駒場野的練兵場，為此，強行征用了農民土地，也不補償（注六）。

幕府同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打倒幕府派的決戰日益迫近，為了進行準備，幕府下定最後決心，在夏諾萬的指導下，拚命擴充軍備，並加緊進行近代化，這時已不能再拘泥於舊旗本和其軍役人員之間的主從關係了。甚至認為撥給旗本領地一事，也必須加以改變了。即在這以前的 4 月，飭令有領地的旗本申報最近 10 年間的租額，這樣作無非是為了在 9 月 26 日（“大政奉還”的前夕），應付時勢的需要，大力擴充軍備，而以“各人手下之兵，紀律難期一致”為理由，而使旗本在向后 10 年間作為軍役經費將各人領地所收租額的半數折合現金繳納，因為“採用各個旗本手下之上兵難以貫徹統一紀律”。

同時，由幕府領取祿米者的軍役，當然也改成繳納現金。以往交出兵員者，按每人 50 兩繳納現金，以往每人招收的洋槍兵，經選拔後由幕府直接編成步兵組。這樣，就消滅了兵賦和軍役洋槍兵的區別，二者都同樣成了半傭兵。這樣做是為了根據夏諾萬的建議來建立常備軍。

由旗本所提供的兵賦和軍役既然改繳現金，那麼，幕府將從那里和怎樣來取得兵員呢？一部分可能是在江戶或其他地方僱傭失業的無產者。以往從直轄領地的農村中按每千石出 1 人的比率征集農民兵賦時，也曾允許不用出人而按租稅額繳納現金<sup>①</sup>。這說明進一步趨向傭兵制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兵士都要靠僱傭兵來湊齊的，根據另一史料，曾計劃從這年年末到次年年初，在關東地方直轄領地試行征兵。

① 上述慶應 3 年 11 月信州佐久郡各村吏代表提交幕府代官所的請願書中說：“此次承蒙特別照顧，准予免征將所有本管區及中野、中之條三管區各村應出正兵賦，將上述各處之兵賦，全部折合現金等因，全體村民不勝感荷，查本管區內各村按租稅額應出 4 人合 4 分 4 厘 3 毫……”。（下略）

例如，在上州的綠野、多胡两郡，“去冬(庆应3年末)岩鼻軍区木村公命令提供农民步兵队，負担过重，各村不服。本年1月，風聞大阪事件(即庆应4年1月，烏羽优見之战<sup>①</sup>)，气势益盛，对前項命令交出农民步兵队一案，愈發表示不服”，2月，搗毀了“上項槍队催征員”的房屋。(“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七、上)

幕府甚至企圖廢除旗本、御家人制度，命令上繳領地所收租稅的一半，以此建立大軍，这对幕府說来，确是为了死里求生的一大英断。但是时候已經太晚了。旗本对租額的減半忿忿不平，农民也反对兵賦，同时，全国各地痛恨和反抗幕府的情緒日益高漲，倒幕派以此为背景，不能滿足于10月初的“大政奉还”，12月9日，發动要求王政復古的武装政变，并乘幕府还未准备停当就掀起了內乱，終于把幕府徹底推翻了。

(注四)庆应元年4月，长州“卖掉火繩槍以及甲冑，購进来福槍”(“修正防長回天史”九)。

5月26日，命村田藏六編制購買武器支出概算表。根据此表，用撫育局撥充購買普魯士大炮的2万两購買了来福槍1千3百支，并另用撫育局撥出的来福槍5百支的价款和财务厅撥出1万5千两，訂購帶刺刀的步槍(“修正防長回天史”七)。

新从英国回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經薩、土两藩士的斡旋，从英国商人格拉貝尔手里購进大量武器。据庆应元年7月26日的2人預定購入表所載：“一、米森开別尔短槍4千3百支，每支估价18两，合計价款7万4千4百两。二、开別尔槍3千支，聞各处有不少富农及其他組織愿購此槍，此次一并买进，以每支5两估計，合1万5千两，兩項共計9万2千4百两。以上只是粗略估計，当有一、二千两浮余”。

10月4日，重役山田宇右衛門寄給桂小五郎的信中說：“据小郡报称：裝載帶刺刀步槍及其他槍械之船，現已开到，2千余农兵目睹实物，不胜雀跃”。

(注五) 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五。

“庆应2年5月9日，廢除神奈川奉行管内定番<sup>②</sup>及下番<sup>③</sup>。定番的头目和督

---

① 明治元年1月3日，幕府军队和会津藩、桑名藩的藩兵，拥戴德川庆喜，借口討伐薩摩藩，企圖由大阪进驻京都，在伏見[今京都东南部]烏羽[今屬三重县]两方面同薩摩藩、长州藩及其他藩兵进行了战斗，結果，幕府軍慘敗，从而为明治維新打下了基础。——譯注

② 守城官。——譯注

③ 定番的部下。——譯注

察員調往他職。第一隊538人改為別手組。下番人員准許佩刀，編入上級步兵者約千名以上，勤務與步兵相同”。

所謂“別手組”就是擔任保護橫濱外國人的特种部隊。

“橫濱開港五十年史”上卷內載：“文久3年3月，在神奈川奉行之下設統轄所和定番的同時，撤銷各藩的警衛”，“元治元年9月，規定的名額是：定番7百人，其部下之下番為1千3百人”（和奉行役所付下番，名同而實異）。自慶應元年10月，派往江戶城西丸，每日輪流擔任警衛。“英國式步兵一大隊，附有樂隊，全部着紅呢軍服”，曾為“當時一大美觀”。根據定番役炮術教官林百郎的提議，選出定番役20人，并山下番中選出40人向英國人學習業務。

這種定番和下番改編為別手組，別手組雖然是保護外國人的部隊，但正如本文中所述那樣，也可能參加了長州戰役。

（注六）慶應3年8月，因為在法國教官團指導下建設駒場野練兵場，征用土地，下北澤村、代田村、代代木村一帶的群眾掀起暴動，20日搗毀給測量土地人員作响導的人的家，隨後又向代官松村忠四郎派往鎮壓的警察隊進行抵抗，最後代官所竟派出了騎兵隊，也沒有能夠使農民停止反對征用土地的鬥爭，直到9月1日，還和鎮壓軍隊相對峙（肥后藩時狀探索書“改訂肥后藩國事史料”九，抄本黑川秀波筆記）。

慶應3年11月，幕府為了擴展德丸原練兵場，征用土地，先行埋樁圍占，農民“全體約定，儲蓄竹槍器械，倘官員再來，即行刺殺”。正在這時，法國教官于13日在別手組的保護下前來打鳥，於是農民蜂起，把外國人包圍起來要殺死，由於別手組的保護，外國人方得逃脫，別手組4名被農民俘獲。別手組頭目要求交出俘虜，農民始終不交，留作停止征用土地的人質。

“上述土地全系上等土地，乃貧農賴以生活者，故誓死鬥爭者約3千人，至今（16日）猶有3千人集聚於該處”（抄本“長防珍說風聞記”）。

從慶應3年末到4年初，上州、隸野郡、多胡郡的農民反對幕府征集步兵，掀起暴動（“嘉永明治年間錄”卷十五）。

慶應3年10月，信州御影軍區管下的佐久郡75個村的代表，請求豁免兵賦洋槍兵；并主張將兵賦折合現金，亦不應高於他村有失公允，要求按照負擔最輕的地方核定（田村榮太郎著“近代日本農民運動史論”）。

### 第三節 幕府兵制改革的種種矛盾

正當幕府最高當局終於認識到只有犧牲250年世襲的家臣，封建性的“官位身分”，才能使兵制的近代化工作向前進展，也只有如此，幕府的權力才能保持，才能加強。當幕府認識到這一點並將



付诸实行的时候，它就垮台了。

作为封建制度的核心的幕府，由于封建制度的积重难返，使它本身的改革，在每一阶段都不能不落后一步。当安政年間，幕府認真采用新式炮术練兵时，已經为时太晚了。于是，它就大大飞跃一步着手建立三兵，但这时局势已發展到非全面廢除封建武士兵制就不可能建成足以保衛幕府的兵力的情况。因此幕府又想再来一次跃进，但这时一切都晚了。“落后一步”——这就是企圖在封建制度下建立近代兵制的矛盾的集中表现。使幕府不能不落后一步的这种矛盾，在改革的所有阶段和所有部門中，都暴露出来了。

首先，幕府作为日本最高当局，負有对外保衛日本全国的责任。但是，它既沒能尽到这个责任，也沒想尽这个责任。它害怕內乱，甚于害怕外患，同时，它也不能不害怕內乱。这是所有封建統治者，不，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反人民的統治者們共同的本性。幕府的軍备并不是保衛民族的，它首先是为了保衛他們本身的統治和剝削人民的軍备。他們深恐充实民族性的、全国性的防衛性軍备会威胁幕府，所以不肯采取这种軍备。幕府远在寬政年間，曾懲罰了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全国性防衛的林子平，天保末年，又以莫須有的罪名监禁了高島秋帆，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它的最后一天沒有改变。

幕府反对采取全国性防衛这一点，在海軍建設方針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安政年間各藩和幕府的矛盾還沒發展到非打倒幕府不可那么深刻的时候，幕府还讓它的学生在長崎和后来成为打倒幕府的核心力量的長州和薩摩等西南各藩的学生，一起跟荷兰人学习海軍技术。然而，到了安政条約簽訂以后，幕府就結束了在長崎的学习，另在江戶設置專收幕府臣僚的軍艦操練所，不許各藩藩士参加。文久2年（1862年），幕府向荷兰訂購軍艦，并派遣海軍留学生，但不准各藩藩士前往留学。

这年7月20日，在江戶城召开改革海軍制度的會議。当时，老中提出諮詢：“我国如欲备置軍艦3百数十艘，以幕府武士担当，由政府（幕府）掌握海軍大权，在东西南北海面布置海軍，需要几年

始能实现？”对此，軍艦操練所長胜麟太郎（海舟）答称：“非經 5 百年难以实现”（“海舟日記”全集九卷）。若單靠幕府的力量，的确只能象胜海舟所回答的那樣。

至閏 8 月，軍制总管提出分全国海岸为 6 区，15 組，拥有船艦共 445 艘，水师約 6 万 8 千名的大海軍建設方案（“海軍历史”卷十三），可是怎样实现这个方案呢？9 月，軍制总管在“建立海軍方案”的建議書中說：現在是“封建制度”，“令各諸侯分掌海軍，事屬当然”，但“失策莫过于此”。其理由，（1）沒有海岸領地的諸侯和有海岸領地的諸侯之間負担不均，如何处理？如令前者提供“海軍兵賦”，那么“因于自己无益”他們就要感到不滿。（2）（3）如果实行分掌，則各藩互相爭衡，不能团結一致，而規則、号令亦各自不同，不能統一。（4）各藩将要各守自己的海岸，而忽略防守要冲。（5）这是最后一条，最值得注意，这就是：“此次諸侯皆奉命居国在邑（中略），割据之势已隱然萌生”，如不及早防备，必将發生內乱。“此时如由幕府一手掌握海軍大权，縱有任何强梁跋扈之大藩，亦不难予以鎮压”，如諸侯分掌，“是所謂齧盜以粮，其禍將不可測，万万不可”。所以，它的結論是，“切实曉諭諸侯，使其同心协力，按其分际，提供兵賦”，“大权由国家（幕府）一手掌握”，以建設上述大海軍。然而，“諸侯之同心协力”是不可能的，論者自己不是已經承認隱然割据云云了嗎？

这样，怎能建立起对外保衛日本全国的海軍呢？

至文久 3 年（1863 年）4 月，反幕攘夷派的势力高漲起来，他們支持京都的宮廷，迫使幕府公布实行攘夷的期限，这时，軍艦奉行助理胜海舟說服了攘夷派的公卿姉小路公知，請他策动宮廷，由宮廷迫使幕府为了保衛攝津海在該地設立大海軍操練所，訓練各藩藩士，并建設軍艦制造厂和鋼鐵厂。幕府不得已在神戶設立操練所（注七），以胜海舟为所長，并以長崎鋼鐵厂作为該所的附屬机构。

对于这个操練所，有脫离土佐藩的乡士坂本龙馬等“許多国内有志之士，極表贊成”。为了使它不久成为幕府和各藩联合的“一大共有海軍局”，在次年元治元年（1864 年）5 月，允許各藩藩士

自由出入。但是，这时尊王攘夷派已经由于上年8月幕府方面的武装政变暂告衰退，它对幕府的压力也削弱了，于是，幕府“惟恐神户海軍局人員增多，日后难以控制，千方百計阻撓此举”，至11月竟然把它封閉了（“海軍历史”卷十七）。

由于这种情况，虽然在庆应2年（1866年）7月將軍艦操練所改为海軍所，但是直到10月还是“为皇国首要武备之海軍尙屬寥寥”（“海軍历史”卷十四）。这时，各藩中只有佐賀和薩摩两藩拥有少数海軍，这当然談不到对外防衛。

总之，若想在封建制度下来建設可以担任国防的近代海軍，那是絕不可能的。

不但海軍如此，幕府的陸軍也是如同上述那样，在文久2年改革方案的开头就說：“关于全国防衛一案，姑置不論”。

幕府此后所进行的軍备的改革和扩充，不但不是为了保衛日本，反而是为使日本淪为法国的屬国，給予法国以种种权益，以便換取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援助，来打倒国内的反对派。这就是說：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并为保全这个基础而采用具有反封建性質的近代軍备这一矛盾，从一开始就割断了軍备同民族防衛的关系，并进而使軍备轉化成为反民族的軍备。

其次，由于封建制度同近代軍备的矛盾，不但使考虑全国性的防衛問題成为不可能，而且还給作为維護幕府和各藩的軍备，带来了种种制約。

#### 一、怎样取得近代武器装备？

关于幕府和各藩的武器生产詳情，略而不談，这里只談談武器生产同封建制度的矛盾。

首先是沒有鑄造槍炮的材料。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陪利来到日本时所采取的頒布太政官符，通令用寺鐘改鑄大炮这一挖肉补疮的办法上。日本本来就缺乏鉄这一天然資源，这一点即使不談，也还缺少制造武器的技术專家。以著名的武田斐三郎（成章，炮兵大佐）为主任的幕府的关口兵工厂（文久3年、1863年，建立）（注八），直到庆应2年（1866年）5月，才造出膛綫炮50門，而据夏

諾万說，这些炮“體綫多半錯誤”（前述）。在关口兵工厂建成以前，曾在湯島兵工厂由旧式槍炮匠們进行制造，而那些成品，連幕府的官吏都認為“是否适于实地应用，毫无把握<sup>①</sup>”。这种情形，不消說是由于幕府多年一贯压迫近代科学和創造一切“新事物”的結果。最后还缺少工匠。嘉永6年幕府官員曾慨嘆“目前各家鑄造大炮，因缺乏工匠，殊感困难”，至于近代工人，那更是哪里也沒有。

幕府对于工匠，一律采取“定雇”，“不但早晚加班加点，还要作夜班”，因而，工資高涨（“陸軍历史”卷七）。后来“因拖欠工資，熟練工匠終于投奔諸侯”（“陸軍历史”卷二十九）。因为沒有办法竟然从消防隊員中选拔工匠。不消說，“消防隊員所擅長者是其动作敏捷，对于上述精巧技术絕少鑽研，是以可取者寥寥无几”，这也是必然的結果（“陸軍历史”卷八）。

工匠較多的是越前福井藩的武器工业。那里在安政4年（1857年）11月建成兵工厂，开始生产，延攬藩內槍炮專家和熟練工人“作为官家工匠，除給与祿米外，并發給相当工資，故不到一年，即發展到1千2百人”。当时步槍一支的价格是25两，而这里的成本不过是5两甚至2两2錢，因而还接受了别的藩許多訂貨（三岡丈夫著“由利公正傳”，福井县史第二册）。福井是著名的絲綢产地，自安政年間，就是“生产、貿易之發展相当可观”（同上書）的地方，所以也就能够延攬槍炮專家。不过，这里制造的步槍是旧式的，所以不久便衰落了。

再次，技术和劳动力問題姑置不論，生产規模稍一扩大，便和封建制度的財政發生矛盾。例如最热心搞軍备的長州藩曾在安政末年，計劃建設反射爐，終以“一諸侯兴建如此巨大工厂，得不偿失”而作罢論（“修正防長回天史”第二册）。还有幕府末期在搞武器生产方面最先进的佐賀藩，虽然向外国訂購了煉制鋼鐵的机器，但是缺少足够的財力，竟不得不將全部机器“原封不动地獻給幕府”（秀島成忠著“佐賀藩海軍史”，胜海舟“海軍历史”卷六）。幕府末期在

<sup>①</sup> 小栗丰后太守（以后的上野介）取消湯島制作所的建議。元治元年5月。“陸軍历史”卷六。

武器工業上取得最大成就是薩摩藩，“它的煉鐵爐、棉花火藥、電氣水雷等為我國之首創”，這是因為藩內擁有礦山，和倚靠琉球貿易（其實是對華貿易）以及壟斷南方各島的砂糖等著名的殘酷剝削來維持的雄厚的財政（注九），由於這種原故，也就沒有長遠的前途。

幕府因為領有全日本的四分之一的土地，所以建成了遠遠超過薩摩和佐賀等藩的兵器工業。然而，如前所述，它以低於別處的工資奴役工匠，結果工匠紛紛離去，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它的財政困難。長崎鋼鐵廠是在安政4年10月開工興建，經過3年半之久，至文久元年（1861年）4月才告落成，但是後來幾乎沒有發揮效用。其原因除了財政困難以外，可能還有管理不善、工人不足以及上述種種情形。

假如民間有相當數量資本的積累，而且可以自由生產和買賣武器的話，這些困難或許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這種條件一個也不存在，只是幕府和各藩總想要自己秘密地建成自給性的武器工業，這在經濟上是絕對辦不到的。實際上許多藩都幾乎沒有搞武器的生產，長州等藩專靠從國外輸入，而幕府則除了靠一般輸入以外，還仰仗了法國的援助。它由法國借款，聘請法國以海軍工程師威爾尼為首、包括模範工匠在內的法國技術專家團，依靠他們的力量，在橫須賀建設了煉鐵、修船和造船三個工廠並附設有武庫的大海軍工廠。這是仿照法國土倫軍港的海軍工廠設計的，規模為該工廠的3分之2，慶應元年（1865年）9月開始建設，次年7月建成一部分，立即着手建造三十馬力的小氣艇，但是，它沒有充分展開生產，幕府便垮台了（“橫須賀海軍船廠史”一）。當明治元年發生內亂時，法國海軍曾一度占領橫須賀（尾佐竹猛著“幕末外交秘史考”）。換句話說，這也是法國控制幕府的一條鎖鏈。

總之，封建領主為了保存封建的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而建設近代機械工業，這無論在技術上，勞力上或財政上，都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所以，他們也只能作到上述那種程度，這是很自然的。

二、就算武器和裝備主要仰賴從國外輸入，那麼，軍隊的軍官和士兵又怎樣產生呢？

关于武士不能充当近代战的兵士，前面已經說了很多。但是，他們是否能夠成為勝任的軍官呢？前面已經說過，夏諾萬曾經批評說：“日本軍官中真正受過教育者竟無一人，全是僅能認識外國火器而已”。封建身分制度妨礙了造就勝任的近代軍官。這不但在幕府臣僚之間如此，就是在革新派的長州等藩，也是如此。高杉晉作曾用一語道破：“肉食之士不中用”，他們是“無用之高位士”（後述）。佐賀藩士佐野榮壽左衛門（常民）在他的藩政改革意見書內甚至說：“學者往往謂僧侶等坐食，然我則以為武士乃方今天下坐食之魁耳”（佐賀海軍史）。

既然身分高的武士顯然是些無能之輩，那麼，要想培養優秀軍官，則所有“各級官佐”，只好採用“俸祿低的武士或其次子、三子、憑個人本領擔任職務者”。所以當文久改革時，幕府軍制總管說：“如不打破專講身分之高低，及次子、三子之限制，根據才干任用軍官，則難以達到目的”。但上司的指令卻是：“盡量不任用次子、三子”（“陸軍歷史”卷二十一、二十九）。

安政3年（1856年）7月，規定派往長崎受海軍訓練的學生，可不論身分及是否次子、三子，根據才能選拔。但同時又說：“但身分高者，所需旅裝及其他費用較多，故應盡量由低級御家人中選拔”（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十四）。讓下級武士受近代訓練，讓高級武士擔任軍官，這樣自然無法培養優秀軍官。所以，慶應2年（1866年）10月，海軍奉行等主張：“惟有海軍，如不打破門第世祿之舊習，則革新難以實現”。然而這個意見也是沒被採納（“海軍歷史”卷十四）。

最後，最重要的是兵士問題。關於這點，已在第一章農兵論里列舉了許多史料，農民的負擔，本來就經過重，若再征常備軍，勢必加劇他們的反抗，這是一開始就預料到的。實際上也是如此，征作兵賦的農民，曾到領主家里要求增加薪餉，或對被征為兵賦本身表示反抗。同時，如果還保存領主同農奴式農民的關係，則近代軍隊最重要的統一問題，就無從維持，也就不能不成為“烏合之眾”。其結果，勢必要採取半傭兵制，而這麼一來，又只能召來

一群貪圖薪餉的“市僧游手之徒”。这些情形前面已經講过。

这样罗致来的兵士，一到重要关头便开小差，或者是騷扰市民。当幕府的最严重的危机“大政奉还”之后，駐在江戶的步兵，曾在11月14日和16日，3、5百名成群結队，携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在市內大肆搗乱，并搗毁了吉原等处（“丁卯杂拾录”“淀稻叶家文書”）。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江戶市民对幕府的反感和輕視。

不仅如此，幕府还将这些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派往京都大阪，进行了烏羽伏見之战，結果，由于高級指揮官、軍官和軍士的无能，兵士毫无斗志，人数虽然三倍于敌，却立即敗北。这些殘兵敗将在胜海舟的率領下回到江戶以后，“气愤食住不便，薪餉不足，成群脫逃者近千人，到处騷扰搗乱，无法控制”（“海舟日志”2月1日），甚至使得胜海舟也束手无策。这样，已經不仅仅是軍紀紊乱的問題，而几乎等于叛变了。当幕府陷于危机，端賴兵力的时刻，构成幕府軍的主力的步兵和炮兵方面的矛盾达到頂点，竟而自己爆發了。由那些小普請組等下級武士改編的散兵（即御持小筒組），总共5千名中有2千名是老弱殘兵，不堪使用，其余3千名也因为不滿薪餉微少，士气不振，至使幕府高官悔恨地說：“投以30万金，而不能滿足緩急之需要，实屬遺憾之至”（淀稻叶家文書）。至此作为封建制度的中樞的幕府和其近代軍制之間的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出来了。

（注七）胜海舟日志 文久3年4月24日“本日派在神戶村务农武上到操練局造艦所办事”（派令書从略）。

5月9日，今日天皇降旨，由周防關下（老中板倉胜靜）傳达：

一、浪花城乃攝津海之咽喉，尙无主将，难以把守，应选派大藩，担任指揮南海警衛（中略）。

一、鋼鐵厂目前只有長崎1处，堅艦巨炮乃攘夷必需之器械，应于适宜之地，新建巨大鋼鐵厂，并飭各藩充分备置艦炮。

胜海舟說：“对于海軍及制造器械，曾为邦家尽力多年，前曾向姊小路公陳述，公英明有高見，想系奏聞天皇，故有今日之旨降下”云云。

（注八） 截前建設关口兵工厂年月的史料，还未見过。只有文久2年2月，“奉示上諭”着手兴建（見“陸軍历史”卷六）。翌年文久3年2月，將軍晋京时，飭令关口

水道町准备鑄制大炮用水車，其他各項照常工作（“陸軍歷史”卷六），可見這時還未竣工，次年元治元年5月，已經開始生產，計劃取消湯島和龜山的江川式反射爐，將生產集中在一處。據工學會編“明治工業史”火兵篇的記載，只說開始生產，今從之。

（注九）“大西鄉全集”第一卷，關於收購大島及以外二島砂糖呈上藩廳的申請書，元治元年3月初。

“道之島砂糖統購辦法甚屬苛酷，可獲利五倍，近來重斂更甚，人民困苦不堪，倘外國人乘隙着手收買，特施小惠，誘惑愚民，則統購辦法立即破壞，此乃意中事也”。

### 第三章 民兵性的各種組織

即便構成封建制度的頂點的幕府，要想創建新的軍事力量，也只有依靠兵賦或佣兵，就是說除了征募農民市民當兵以外，別無辦法。在這樣歷史條件下，把平民編成正規常備軍，并以它為主，那只有擁有廣大直轄領地和旗本領地的幕府能夠作到，一般的藩是辦不到的。

據我所知，把平民也編入到正規常備軍里的有長州藩和藝州藩。如前所述（第二章第二節）長州藩在慶應元年（1865年）6月以後，作為藩土的軍役，下令提供洋槍兵然後把他們編成洋槍隊<sup>①</sup>。藝州藩在慶應2年（1866年）9月，即幕府第2次討伐長州的戰役失敗之後不久（藝州曾是討伐長州軍的主力基地），大概是从那次戰役中取得教訓，令藩土上繳俸祿4分之1作為經費，由鄉村征集洋槍兵，編為正規常備軍（藝藩志要卷二十五）。然而這兩個藩的平民兵員，都沒達到象幕府用兵賦和佣兵編成步兵和炮

① 由軍役組成的長州洋槍隊中，令俸祿在1050石以下的藩土所提供的兵士有一個大隊（人員不詳），由同宗和1千石以上的藩土的家臣所組成的隊伍，共有15個大隊。1個大隊的兵員數，有的4小隊有的8小隊不等，同時，1小隊的人數也不詳（“修正防長回天史”第九冊）。小隊中屬於原來步卒階層的人，當不在少數，長州藩的土力，在正規常備軍方面，有步卒等的來福槍隊，而非正規軍（如後所述）的奇兵隊等各種隊伍，是最重要的兵力。

藝州藩由鄉村征集的洋槍兵，確數不詳。但是它的主力，是由過去的步卒組成的洋槍隊和類似後述長州的奇兵隊組織的各種隊伍。



兵那样，足以构成主力的数目。

在各藩(只是指计划创建新的军事力量的少数藩，而不是所有各藩)，并未把农民和市民编为正规常备军，而是编成了特种部队，它是以长州的奇兵队为典型的非正规军和在藩控制下的辅助性的民兵即所谓农兵。所谓奇兵队等等，显然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但是它和我所说的辅助性民兵即农民的关系很深，所以把它也作为“民兵性的组织”，在这一章中和农兵一起阐述。

在民兵性的军事组织中，还有一些不是由于藩的权力而是由各地乡士和上层农民等自动组织起来的，这些也要在本章里讲述。

### 第一节 担任海防的农兵

为了海防，亦即为了对外保卫民族，最理想的是用某种方式把全体人民按军事目的组织、动员起来。天保年以来，就有很多人从这个观点出发，主张创建“农兵”，然而在居住地和生产场所对人民施以军事训练使之拥有武力一事，从封建统治者看来，不论在经济上或是政治上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所以实际上农兵始终没能很好地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情形，已在第一章及所附农兵论中，详加阐述了。

不过，担任海防的农兵组织，并非完全没有建立过，试举二、三实例：

水户藩 天保13年(1842年)，规定在海岸各地设置防衛据点，一有缓急，即动员附近“各村壮丁”，每处5百人至1千人，但是这些壮丁并未受到军事训练，亦未发给象样的武器，只发给一些救火钩和棍棒等，总之，还只是一些点缀而已(“水户藩史料”别记、下)。

陪利来到日本以后，在安政元年2月，前藩主德川齐昭亲自发出“为巩固海防组织壮丁为农兵”的训令，同3年(1856年)9月，特对旧乡士、上层农民、统治阶级出身的农民、体力强的人等以

及捐款达一定数额以上者 1 千 5 百人左右，允许冠姓佩刀，称为“农兵”，次年 1 月，并特准许子孙可以继承这一身分。这就是事实上使上层农民市民具有乡上身分。将这些人编为几个小队，使之附属于藩的海岸警备军，并在领地内各处学馆附设演武场，使他们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和武艺。所学习的究竟是些什么武艺，尚未看到有关史料，所谓演武场，大概就是剑术练习场，不象进行过洋枪训练。这种“农兵”中，出入于潮来、小川、那珂湊等处学馆的人们，在元治元年（1864 年）水户天狗党作乱时构成了主力（“水户藩史料”上卷十六、附录）。

小滨藩 前面已经叙过，在嘉永 4 年（1851 年）规定了一旦外国船只来袭时市民农民等担当的防衛部，“一听到信号令，全体应立即集合到事前指定地点，身穿短外衣（中略），各人须带器械——矛枪、斧头、镰刀、救火钩之类，持有洋枪者，亦应携带”。大致和水户藩天保 13 年的海岸壮丁动员计划略同，并未施以特别军事训练。“大体是令每个人担当各自村庄警备任务”（蘆田伊人著“小滨藩之海防计划及其设备”，“历史地理”六十三卷五期）。

土佐藩 安政元年（1854 年）9 月，发布“民兵章程”，规定把“本地浪人及其子弟、徒党以及农民、渔民、猎人等”自 17—50 岁的壮健者，在“海滨便利之地”“编入军籍”。业余时间进行训练（训练日数不详），继续受过几年训练以后，“凡技术进步，一有缓急可以临阵作战者，由郡方呈报督察”。但“民兵系利用农闲服役，故不论技术如何提高，凡荒废本业者，不予褒奖”。

这是根据平尾道雄著“高知藩的民兵制度”（“土佐史谈”三十五期）的记载。平尾氏认为这种民兵的名额，除幡多郡以外的土佐各郡，在文久 3 年（1863 年）共约 1 千名，我想加上幡多郡大概有 1 千 5 百名。但据饭岛茂（陆军军医中将）的“日本选兵史”所载，“这种民兵分属于各郡奉行所管的五乡兵局，各局定额为 2 千名，故总名额为 1 万名，以 5 名为 1 伍，伍有伍长，5 伍为 1 小队，置队长 1 人，以 4 小队即 1 百名为 1 大队，以乡士为大队长，以 20 大队为 1 军，由郡奉行统率。武器规定用西洋枪，凡贫困者由官方发给，

但多以自費由藩購領”。果真照这样实行了的話，的确很了不起，但是作者并未举出所根据的史料，我想这可能只是計劃罢了。因为果真有这样組織的話，多年从事于編纂山内家史料的平尾氏就不会不知道的。

長州藩 嘉永 2 年(1849年)，在見島构筑炮台时，規定將該島上的农民、漁民編入警备队。至安政 5 年(1858年)8月，为了应付“两州(防長 2 州)广大海岸之緩急”，藩厅曾决定征集农民，但并未实行。

以上所举各例，虽然都称作“农兵”或“民兵”，实际上頂多不过是太平洋战争期間的警衛团一类的东西，或者只是象在水戶那样，通过搜罗捐款出卖名义的办法造成許多乡士而已，并不是第一章所附农兵論中的农兵論者主張的那种正規农兵。真正为了海防而組織农兵，是在文久 3 年(1863年)攘夷派势力最盛、幕府宣布 5 月 10 日为攘夷日期、長州藩炮击外国船只、英国艦队炮击鹿兒島等大事件相繼發生的时期。例如：

松江藩 文久 3 年(1863年)建立农兵，选拔 17—50 岁者充当。起初，和前述小濱藩的壯丁动員方式一样，后来到庆应 2 年(1866年)7月，为了防守隱岐島，选拔富家子弟，称为“新农兵”，由藩發給粮餉，施以洋槍訓練，时常在代官所前面举行全島农兵檢閱(“贈从二位松平定安公傳”，“隱岐島志”)。

艺州藩 海防农兵組織得最好的是領内有瀬戶內海的艺州藩。

文久 3 年(1863年)3月 22 日，艺州藩發布通令：“近来英国軍艦出沒領海，而攘夷日期(5月 10 日)业已迫近，海岸防御極為紧急，并聞有浪士結党扰乱本地居民，故先令領内安艺郡所屬倉桥島、下蒲刈島及瀬戶島、佐伯郡所屬二十日市及能美島、丰田郡所屬忠海及御手洗、御調郡所屬因島及向島等处，招募壯丁組織农兵队，使之練習西洋炮术及劍术，并置指揮、組長、伍長加以統轄，以备不虞。自即日起更派藩士担任教官，教导农兵，使益加奮發苦練”。

据佐伯郡代官發出的通令，农兵的編制是这样：管内設农兵駐屯所 5 处（地名从略），名額每处 2 百名，共 1 千名。农兵每 5 人置伍長 1 名，共 6 名称为“小組”，每 4 个小組共 24 名置“組長”1 名，共 25 名，称为“一組”，合 4 組为“一备”，置“指揮”1 人。

农兵的待遇与村中上層农民相同，准許佩带 1 把刀；伍長与村的組長相同，准許穿短褂佩带 1 把刀；組長与村長相同，准許穿短褂和佩刀，“指揮”与乡長相同，准許冠姓带刀，穿短褂和裙子。領主来郡时，所有农兵均准“謁見”。

此后自同年 6 月，在丰田郡大崎島等地构筑炮台 7 处，每 1 炮台置武士 2 名，新組 5 名（以上是武士身分），大炮組置步卒 25 名、农兵 120 名。农兵置农兵隊長（乡長級）1 名、副隊長（村長級）1 名，农兵組長 5 名。另外有洋枪术的教官 1 名、新兵征募員 1 名担任指导，由藩的講武所派員担任教練，每百日輪換一次。

这样可以說是正規的海防农兵。艺州藩所以能够做得这样徹底，是因为一旦实行攘夷，則瀨戶内海諸島正当外国船艦航行要路，势必要加以防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农兵都受到相当于上層农民的待遇。由此可以想象，农兵并不是从一般的农民中間征集的，最初似乎是从上層农民中征集的。这种农兵并不仅担任对外防衛，它还同时担任防范浪士結党作乱，这一点也不可忽視。（“艺藩志要”卷五）

渡部村农兵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由領主組織和指揮的，在这里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出羽的男鹿半島，由島上开垦者渡部斧松所組織的农兵。渡部斧松是檜山城主多賀屋氏的步卒渡部惣左衛門之弟惣十郎的兒子，寬政 5 年（1793 年）誕生，十八岁时學習鉄匠，2 年多以后回到家乡檜山，从事鍛造鎌刀。以后进过矿山，又在江戶武士家中当过佣工，27 岁时又回到故乡，不顧父兄和亲屬的反对，領得藩厅許可，着手开垦男鹿半島和鳥井長野的荒地，經過 6 年工夫創建了渡部村（文政 8 年——1825 年）。4 年以后，受到藩厅奖賞，被賜与旗本近进。但后来遭到藩厅的压迫，又遭逢飢饉荒年等等，在千辛万苦之中，使渡部村發展起来。安政 3 年

(1856年)制定村約，禁止抵押貸款和典當，限制佃耕，并限制村中戶數為105戶，其中農戶為90戶，木工等40戶，海岸防守3戶，嚴禁私人經商(商業只有村營的日用品市場)。此外，還有互助、共耕等制度。

他在安政3年3月6日的備忘錄中寫道：“一、諸侯各國即應統一為一個天下；二、對外防衛應由農民擔任；三、士族擔任平定內亂”。由上面的最後一條可以看出，他並不否定武士階級，仍然承認他們是統治者，但是他已具有超越封建制的藩的、作為統一整體的日本的意識，所以他驕傲地認識到農民的對外保衛民族的責任。他本着這種認識，向藩庁申請用自費購買洋槍，選拔農民60名，組成農兵，按照西洋方式加以訓練，以備緩急之需。從村中公糧里提出3百石充作這項經費。渡部斧松親自率領農兵防守半島的一角；同時，遵照藩命，在半島上4個地方及土崎港修築了炮台。

明治元年(1868年)東北戰役時，渡部村農兵(斧松本人已于安政3年6月死去)站到官軍的一邊(西岡虎之助著“老農渡部斧松翁傳”)。

渡部村的農兵，雖然產生在一個具有特殊條件即領主權薄弱的開墾村中，但是它的确是一件珍貴的事實，可以說明幕府末期人民中間民族意識的成長。

長州的奇兵隊在動員一般人民參加對外防衛方面是最有組織的，這點另行敘述。

## 第二節 為領主和地主服務的農兵

農兵所以廣泛地組織起來，並不是為了海防。當時，國內勞動農民和上層農民及領主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加深，扶保幕府派與反對幕府派、上層武士與下級武士之間的鬥爭逐漸要發展成為武裝鬥爭，這樣對立的兩個階級或者兩個陣營為了補充各自的武力，才開始把農民和市民組成為軍事力量。舉例如下。

## 幕府

1. 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英龙这位一代名士曾拼命請求准許征集海防农兵,但幕府坚不批准。到了文久3年(1863年)幕府遭到打倒幕府派的反对必須傾注全力来保衛自己的时候,在这年10月,終于接受了繼承英龙遺志的英敏的热切請求,暫時准許在他的管区内組織农兵。幕府所以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已不在于海防。在江川的“关于建立农兵建議”里說:“外寇固無論矣,一旦有变,盜賊惡徒将乘机蜂起,釀成若何事变,頓难逆料,为防患于未然……”,这里所說的惡徒蜂起,不外是无产群众的起义。为了对此进行防衛,加强瀕于崩潰的封建統治,才組織了农兵洋槍队。

江川从管区内1万8千6百余戶中,征集农兵450名,發給高島式槍,利用农閑,在各該村神社、寺院院内,每年訓練20天(“日本选兵史”引用江川家文書)。根据另一史料(东京府民政史稿)所載:征募的农兵,先在韭山和江戶的宅第院内施行訓練,受过此次訓練者再回到本村去教練村中青年。据“昭德院殿御实紀”所載:庆应元年(1865年)將軍家茂在赴京都途中,于5月23日在駿河的原宿休息时,檢閱“江川太郎左衛門管区的农兵,三島宿1小队,原宿1小队,吉原宿1小队”的教練,次日在兴津檢閱江川管内农兵6大队的教練。这是幕府官方記錄,可以憑信。由此可以想見,江川在管内各地訓練了相当数額的农兵。又据当地相傳,庆应2年(1866年)秋,从武藏至上州、甲州一带發生大規模起义及暴动时,江川組織的农兵,在八王子附近,击败了暴动。但所有这些农兵,是否都持有洋槍,还是疑問。

2. 最初只限在江川氏管区内征集农兵,后来經有关官員慎重考虑,終于在文久3年(1863年)11月15日,命令各代官所和郡代役所<sup>①</sup>也組織农兵,目的是警衛代官所和郡代役所及“維持各村治安”。征集的方法是,选拔村吏或普通农民而“出身可靠者”及其子弟,在不妨碍农耕时,准許在代官所的習武場練武。再从其中挑选

① 掌管租額在10万石以上的幕府直轄領地的官署。——譯生

不响影农事者1百名，使之附属于代官所，每20人为1班轮流警衛代官所。并严禁农民窩藏浪士私自学习武艺。这样，先把代官所的警衛体制建立起来，然后在代官所里逐步备置步槍和子彈，使农民在农闲时进行練武(大山敷太郎著“农兵論”)。

这些是否实行了，不得而知，恐怕沒有实行多少，因为庆应2年(1866年)10月，幕府还曾命令关东郡代調查具报各地代官所征集农兵的方法(“德川禁令考”第一帙)。

3. 在幕府領地內大力組織农兵，是在农民起义、群众暴动达到江戶时代的最高潮，幕府的統治基础發生动搖，以及使幕府討伐長州归于失敗，打倒幕府派乘机積極展开攻势的时候以后。同年12月，幕府为了“各村的非常戒备”，通令从速組織农兵。当然，这只是訓練村吏和出身可靠者的子弟<sup>①</sup>。

4. 幕府西部領地的兵賦，不送往江戶，而留作守衛郡代和代官所的“农兵”。据西部郡代洼田治郎右衛門的报告書所載，自庆应2年7月(幕府和長州作战时期)至次年庆应3年末，計劃在他的管区内，把应提供江戶的兵賦1128名农兵，編为19个步兵小队，炮兵十組。这似乎不是民兵而类似幕府三兵的小型常备軍組織，但書中有“按征集兵賦之比率，征集上著之农兵”字样，所以似乎还是民兵，究竟如何，不太清楚，同时，实际上到底編成了多少，也不清楚(以前引用“日本选兵史”，洼田文書，“嘉永明治年間录”卷十六)。

5. 函館的奉行也从文久3年(1863年)11月起由附近各村征集壯丁70名，每年發給津貼5两，以7人为1組，輪流住在五稜廓的代官所15天，施以軍事訓練，或令其修筑要塞(“新撰北海道史”第二卷)。

6. 还有被称为一桥家的“农兵”，这并不是这里所談的民兵，而是为了充作幕府三兵中的步兵或炮兵，由一桥家領地內征集的。它是在村吏率領下送交到江戶兵营。所以，称它为一桥家农兵是錯

<sup>①</sup> “庆应2年12月，为征集农兵进行非常防衛，松村忠四郎申請官方准許攜帶槍支的請愿書抄本”。作者所藏。

誤的。現有慶應 2 年(1866 年) 10 月 20 日,野州和武州的一橋家領地的村吏向一橋家征兵負責人澁澤薦大夫(栄一)提出的由各村向江戶送交兵賦所需旅費請求書的草稿(作者所藏)。

許多藩都組織了農兵。只是缺乏史料,據推想,在幕府末期曾大肆活躍的各藩或多或少都擁有一些農兵,只有薩摩藩却是例外。該藩有很多所謂“外城士”的居鄉下級武士,平均 5 戶平民中即有 1 戶士族(普通的藩,只有它的半數)。所以,無須征集普通農民當兵,實際上也无法征集。

下面簡單地例舉我所知道的農兵的實例。

小倉藩 文久 3 年(1863 年) 3 月,征集藩內富農組織農兵,不發薪餉,武器全部自備,分農兵和准農兵兩級,輪流擔任警備領內各處關卡。僅企救郡就有農兵 240 名,在“小倉藩政時狀記”(福岡縣史資料第五輯)內載有關於農兵的訓練、勤務及負擔的實況,這裡從略。收集在“官武通紀”十三的元治元年(1864 年)小倉探索書內載:“再三組織農兵,青年農民或荷洋槍、或携竹槍、往來路上,據說每二三村互相聯合,設置鐘樓,一有緩急,鳴鐘為號,由各村出動云。但據當地人傳說,近來雖無若何動靜亦撞鐘,致使四五里內外大為震驚”。可見旨在保護舊秩序的農兵,反而要威脅舊秩序了。

慶應 2 年(1866 年),當幕府和長州作戰時,幕府軍的基地小倉(老中小笠原長行的領地)被長州奇兵隊攻破,藩的正規軍潰敗,奇兵隊占領各處,恣意掠奪,只有以農兵為中心的村民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抗。

長州 在後面奇兵隊等項內一併敘述。

藝州 如前所述,該藩曾為海防建立了大量的農兵。自文久 3 年(1863 年) 10 月,曾令代官携眷移居到海岸以外的 9 處要沖,擔任訓練農兵。幕府同長州作戰時,使 2 百名農兵自備洋槍,參加藩的正規軍,警備邊境間道。該藩還建立了類似奇兵隊的組織,以後再述。

除此以外,據史料所載,津和野、紀州、津、大垣、信州上田、越前、川越、仙台等各藩,也都建立過農兵組織,因過於煩瑣,故從略。



(“于抒呂我中”，“南紀德川史”十三，“旧津藩近世事迹”、“小原鉄心傳”、“嘉永明治年間录”十三，“福井县史”第二册、“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論”、“伊达家文書”九、“石母田頼至日記”)

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农兵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武力，而是为封建領主維持秩序、鎮压人民的武力。即以担任海防为直接的主要的目的而建立的农兵，也兼負保护領地內封建秩序的任务。所以当庆应4年(1868年)島上居民暴动时，隱岐島的农兵站到了代官那一方面。农兵的这种性質也是由于他們一般出身于村吏和地主階層，而不是出身于普通农民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所以，这种农兵，不但是由領主組織的，也有的是由村吏和地主們为了应付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而組織的。

庆应2年9月，当从兵庫、大阪掀起的市民大暴动波及到江戶，以及从武藏北部到上州、信州、甲州一带爆發了农民大起义、市民暴动之后，武藏的荏原、橘树两郡53个村的村吏們，向幕府代官所申請組織农兵，当即被批准了。申請書上說：

“近来米价及各种物价相繼上漲，我等邻近驛村戶数人口，本已多于村中粮食产量，只靠农耕难以維持生活，海岸各村，日夜出海捕撈魚介，借以扶养老人妻子，勉强度日。而捕魚地区全系无地之貧苦漁民，不論如何勤奋，亦难糊口，其中如川崎村原为产粮極少之驛站，所有米粮及日用薪柴，均須購買，而往返官員投宿頻繁，至感窘迫，倘物价繼續上漲，实无法維持”。

这就是說，貧农、漁民、交通劳动者等无产勤劳大众，苦于物价暴漲，生活已經将无法維持下去。因此，这些“貧民必然陷于穷困，将發动若何事变，殊难逆料，近来总覺人心不稳，果卑賤愚民，乘虛結党，不顧死生，挺而走險，其情实堪怜悯。今夏秩父地方貧民群起搗毀房屋，釀成大乱，祇因防守无力，当經馳报有关当局，而在听候指示之間，暴徒竟恣意猖狂……”。

这就是說，一旦民众蜂起，不能等待幕府軍隊前来鎮压，必須預先有所防备。因此，申請以村吏及出身可靠者20人組成农兵1小队，外加照料人員5人，这样农兵小队共組織两小队，計50人。

每小队更配置里正 5 人，作为管理員，担任指揮監督。所有洋槍和彈藥均由代官所發給，請代官所教官每月巡迴各村一次或二次进行訓練。无论兵上如何熟練，除了近处發生严重情况必須出动以外，希望始終駐在本村，担任保护本村。

幕府批准了这个申請，并派八王子千人队的教官村松讓三郎前往訓練。全体兵士 42 名中，村吏或村吏之子共 33 人，农民的兒子 7 人，批發商的兒子 1 人，村中医生 1 人。同时，对于兵士 20 名，就按置了照料員 5 人，管理員 5 人，可見統治階級是多末严密防范农兵轉化为人民自己的武力了。这个例子，不論在它的建立的理由和动机上，或是在組織上，都明显地暴露出“农兵”的本質（“橫濱市史稿”政治篇五）。

另外，在这份申請書中，还提到川崎的邻村綱島村等地已申請建立这种农兵組織。如前所述，在这年 12 月，幕府曾通令直轄領地各村，赶紧組織农兵，“以备万一”。階級斗争不仅表現在幕府同打倒幕府派之間的政治斗争上，而且在直接进行生产和剝削的各个村中，也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所以地主和資本家批發商們，才这样在封建領主的支援下，積極地組織农兵来对付群众的革命武装。

目前，自由党分子和已故的石原莞尔將軍的伙伴們，正在提倡組織保衛故乡的“民兵”，他們所說的“民兵”，正是上述明治維新变革时期的那种农兵的現代版。

如上所述，無論是領主組織的也好，还是各村地主自动組織的也好，幕府末期的一般“农兵”，本質上都是为了鎮压革命群众的武力。但是，不可忽視，这样地主农兵的身上也有与幕府、諸侯相对立的因素。

例如，武州荏原郡的地主农兵，事先就規定下拒絕为了村中地主自衛以外的目的使用农兵。足立郡村吏代表的申請書中，也同样声請說：完全为的是各村自衛，决不讓农兵充当幕府軍役的預备兵。槍械和彈藥請由幕府發給，幕府官員因指导監督农兵教練来村时，“应事先由联村(村的联合体)进行申請”。这就是說，不希望

官員随便来村。这虽屬无关紧要的事，但也表现出各村力图摆脱幕府統治要求自立的态度，在代官看来，該是狂妄已極僭越之至了。

在組織了相当数量的农兵，并頻繁地进行教練或动員的小倉藩那里，甚至在企救郡的乡長支援农兵的小森承之助，在成立了农兵組織的一年多以后即元治元年（1864年）7月还訴苦說，动員农兵妨碍农耕，人皆苦于槍械、彈藥等經費的負担，因此非富有者无力充当农兵，农兵勤务不論怎样增多，也无法增添員額，因而越發艰苦。所以，他不得不請願說，要是在非常时（例如为了防衛下关海峡开赴大里等）动員农兵，則“即使令其留駐数日，每人皆能抱定决心，不至抱怨”，但平日責令农兵担任檢查村店旅客、取締形迹可疑分子等事，希望停止。

編輯这部小森日記及其他史料的“小倉藩政时状記”的人（是藩政时代的村長，并曾充任郡吏）在該書最后写道：“想起呻吟在压制严重的兵政之下的当时，实不禁气愤填胸。因将我們祖先經過数百年的艰苦奋斗而达到的今日和藩政的当时实况，加以詳記”。

总之，也当村吏的地主階級剝削貧农、佃农及农业劳动者，同他們相对立，在这点上他們是同領主站在共同的立場。但他們也苦于領主的压制和剝削，因而他們也有不能不和領主对立的一面，这一面，在地主农兵上面也有所反映。在地主階層的这种两面性里，基本的一面固然是同貧农对立而和領主結合的那一面，但这一面也并不是永远占优势的，在某种情况下，他們同群众結合而和領主对立的一面，也可能占据优势。到了那时，农兵已不止是上述的那种“农兵”，它将成为更加进步的組織，并且組織也将扩大起来，同时，組織方式也就有所改变了。这一点将在下节里闡述。

### 第三节 改革派的平民性軍事組織

——長州奇兵队及其他——

幕府末期地主階層的两面性，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为革新的、

改良的思想和立場，以及这种思想立場的不徹底和搖擺不定；而在同一地方，也表现为这种情况，有些人站在农民起义的前列，而另一些人却成为农民攻击的对象。有些人率領群众反抗領主，而另外一些人則作了領主的走狗。这在軍事上也有这种情况：在某一村庄地主階級当了維護領主勢力的走卒——“农兵”，而另一村庄的地主却恰恰相反，他們反抗領主勢力，把农民群众組織成为独特的軍事組織。在隱岐島就發生了这种典型的情况(后述)。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他們也不可能始終和群众站在一起坚持革命到底。他們只是在一定限度內和群众結成同盟，而利用群众。这种和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結成同盟的地主階層大都是知識分子、商人、农村小商店主、有时是兼营手工业工厂的資本家。我想把这个階層簡称为中間階層改革派。因为他們处在封建領主階級和农民、无产市民階級之間(本質上是封建性的)，他們为了反对腐朽的封建統治而进行改革，曾利用了民众的斗争，但是当民众要进行革命时，他們又坚决加以鎮压。

中間階層改革派和武士階級改革派結合起来，在軍事上組織并利用了群众力量的一个典型，就是長州的奇兵队及其他所謂的“諸队”。另外，在明治元年(1868年)內乱时，也曾有过單純由中間階層組成队伍参加天皇政府軍的例子。

奇兵队 長州藩远自天保改革以来，以革新派的地主、商人为背景的改革派就逐步滲入到藩政中来。文久元年(1861年)，該藩讓各郡、乡的“急公好义”之士，在本地出力兴办乡校，养活农兵，并接受富农的捐獻，拿出一部分来充作建立农兵的經費。就这样地，改革派武士和中間階層在軍事組織上的結合向前發展了。(“修正防長回天史”第四册)

文久2年(1862年)秋季以后，由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領導的急进改革派，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操縱藩政，联系各藩的志士，形成了整个政局的推进力量。到了文久3年(1863年)，终于使幕府不得不發出布告限期实行攘夷。到了攘夷的日期即5月10日那天，長州藩根本沒有經過任何警告便对通过下关海

峽的美国商船进行了炮击,随后又炮击法国軍艦和荷兰軍艦,發泄了怨气。但是,到了6月1日,由于美国軍艦作好战斗准备进行了报复,結果吃了败仗,丧失軍艦2艘。6月5日,又有法国軍艦2艘前来报复,使長州藩遭到更加严重的惨敗,下关炮台几乎全被破坏。

未經警告便炮击外国船艦,这种作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民族的防衛,对于这种作法長州一般群众并不支持,反而不满意被征集去担任下关和藩厅所在地山口之間的物資运输,从事土木工程,故意怠工,使战斗部队遭受不利影响,也毫不介意。但自6月1日战敗以来,情形为之一变。事情的起因虽然出于武士的封建攘夷主义,但是,事情發展的结果,遭到外国强大軍艦的炮击以后,这就不仅是藩政权的危机,同时也是防、長二州人民的危机了。根据現代革命家的战略來說,也許認為当时群众应该起来推翻排外主义的統治者,同外国締結公正的和約。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是办不到的。民众还是热心地参加了修理炮台以及其他防衛工作(“修正防長回天史”)。

藩政府由于6月5日的失敗陷于茫然自失,不得不承認“的确是器械不如,兵不精練,以后防衛之策,不知所出”(“奇兵队日記”一)。于是,他們又起用了以前因故被赶下台去的高杉晋作,請他来指揮防衛工作。

高杉認為:“目前国家形势,肉食武士不能任事”,“必須下决心矯正豪門积弊”,“不分武士或平民,一律提高薪俸,募集身体强健者”,以此組成軍隊;“賞罰严明”,以建立强大的新式軍隊,舍此別无他計(“东行先生遺文”)。他并不想改革以前的藩的軍制,根本沒把它放在眼里,而想从新建立完全新式的軍隊。他这种独出心裁的方針,完全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他所以有了这种独创的想法,不仅因为他在文久元年(1861年)視察过中国的上海,目睹太平天国的人民軍和英、法軍英勇作战,以及通过鑽研理論認識到人民的力量;也不是仅仅由于农兵从2年前就逐漸發展壮大起来,可能还由于他亲眼看到6月1日战敗以后,上級武士們和他們

的妻子一样惊慌失措，致使 5 日的失败更加惨重，而战场附近人民的士气却极为振奋。

高杉在被起用的次日，即着手组织军队，向藩的世子提出 5 条编制纲要，得到批准。其中第 1 条是，“我想奇兵队是以志愿者编成，不分藩士、陪臣、步卒、应同处一队，尊重才能，当可成为劲旅”<sup>①</sup>。同时，大量招收了农民、市民的志愿者参加。虽然这样说，实际上整个奇兵队员全是由农民、市民的志愿者和步卒组成，除了高杉本人以外，几乎没有武士家庭出身的人。

6 月 26 日，把应征而来的各郡洋枪猎户 2 百余名编为洋枪队，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狙击队附属于奇兵队。7 月 7 日组成力士队，并采纳吉田稔麿的建议，以他为“屠宰业者征募承办人”，选拔山口垣之内的居民及各部落<sup>②</sup>的优秀人才，废除“秽多”<sup>③</sup>这一卑称，准许佩刀，限每村 1 百户中出 5 人，经过郡长的批准，编成了“屠勇队”，以后又改称“维新团”。同月 17 日，还征募僧侣充军，在清光寺内设立练兵场，进行训练。

7 月 27 日，藩厅公布，发生外患时，准许一般平民佩带长刀，无论僧侣、农、商均准自由学习各种武术。不但如此还从这时（月日未详）起，准许民间自由制造兵器。这就是说，准许全体人民可以自由武装，这是封建社会里空前绝后的事，即便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也是办不到的。只有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政权才能组织全民武装。长州藩固然不是革命党的据点，但是这里改革派掌握着领导权，为了民族的防卫，能够相信改革派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所以才采取了上述措施。

此后，到处对市民和农民展开了训练。藩厅对此从未加以干涉或限制。各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的富农巨商，捐献了经

① “奇兵队日记”第一，“修正防长回天史”第四册。在“东行先生遗文”中，也有同样的文件，但“尊重才能”以下是“暂时积蓄力量，当可形成劲旅”。这样，意思就很不相同了。这两种文献究竟那个是正本，无从判断，不过，本文中引用的词句，倒是确切地表现出奇兵队的性格。

② 所谓“秽多”人的居住区。——译注

③ 所谓“贱民”，多从事屠宰业。——译注

費，同時也支援了奇兵隊。商人兼地主的秋元新藏、富農吉富藤兵衛、下關的商人白石正一郎等，都是以特別積極的活動家著稱。

這樣，在防長二州全民武裝的基礎上，產生了奇兵隊，並陸續不斷地組成了同樣的隊伍。10月，小郡的農兵司令櫻井愼平同江崎村的富農（村長）等經過協商並取得藩的許可，以農兵及志願者組成了集義隊，所需經費，原擬使“民間有德者”即民間富豪提供，但藩府不準，結果由藩支給。同月，來島又兵衛和久坂玄瑞組織了游擊隊；後來又有鷹德、荻野、正導、博習、神威、金剛、鄉勇、市勇、力七、狙擊、鍾秀、地光、維新諸隊參加了這個隊伍，因而改稱游擊軍。此外，從9月到10月之間，還組成八幡隊、義勇隊。奇兵隊以下所有這些諸隊，都是經藩批准的常備軍，它是以農民和商人的志願者為主，並由步卒和下級武士的志願者掌握領導權。

諸隊的編制是以隊員30名左右為一伍，以幾個伍為1小隊，以幾個小隊為1隊。各隊名額並不一致，1伍之中，有的超過30名，有的不足30名；而1小隊中，有2—3個伍的，也有5—6個伍的。作為應付變革時期的需要而由志願者組成的機動性部隊，這是很自然的。部隊的最高司令是“總管”，總攬隊中一切事宜，執行賞罰，嚴格維持紀律。副司令稱為軍監，在隊伍分成兩部分時，擔任一部分的指揮。此外，在所謂司令部或本部內，設有“諸差引方”（參謀）、書記、教習、會計、器械員、斥候等職。1隊之中，伍有伍長，小隊有隊長及“押伍”（副小隊長、在小隊分成兩半時，一半由隊長指揮，一半由押伍指揮）。伍長是兵長，押伍是軍士，隊長以上是軍官，但本部各職的地位等級、組織均不詳。

關於隊員薪餉，文久3年10月，為了充實國力，奇兵隊曾申請減低隊員月薪（原來是多少不詳）為銀三錢，將其附屬狙擊隊員日薪二錢改為一半。由此可以看出，平民出身的兵士和具有武士身分者以及受武士待遇者之間待遇上有差別，但是這個差額只有2級，並不太大。在這一年年末制定了諸隊規則，其中規定“諸隊所需米、銀，分上中下三等”，但各等實額不詳。

這樣，組織和薪餉上等級不多，差額也少，從這裡可以看出

諸隊是擺脫了封建身分制、相当自由和平等的志願者的队伍。据村田峰次郎著的“防長近世史談”中所載，軍官是由武士任命的，但更正确地說，應該說，当上軍官就被認為具有了武士身分。第三任的奇兵队总管赤瀬武人是大島郡的一个孤島——桂島上的农民，当軍監的山县有朋也不是武士，他是出身于比步卒还低賤的藩厅會計的僕人家庭。隊長和总管等职，形式上是由藩厅任命，但实际上似乎由队中推选。据桂太郎(明治元年内乱时任第四大队第二队司令)的自傳(“公爵桂太郎傳”乾)所載，后来藩正規軍的洋槍大队(由步卒和平民的軍役洋槍兵編成的)受了这个影响，队员們反对由藩派下来的隊長，頑強地要求自选隊長。試将这种諸队和武州荏原郡的地主农兵及幕府农兵每 20 名兵士置村吏監督人員 10 名的情况，以及幕府步兵組的軍官因受身分制度的限制得不到人才，而步兵每 25 名置軍官 1 人，16 名置軍士 1 人等情况比較一下，便可清楚地看出諸队的进步性。

長州藩在改革派掌握領導权的情况下，自从文久 3 年 6 月，就預料外国艦队将大举来襲，計劃集結全体人民力量进行民族防衛，在几个月之内，便建立了以上那样进步的“諸队”，而作为諸队基础的农兵(民兵)也自由發展起来。然而，这对于藩内保守派來說，确是不可容忍的。待至 6 月对外緊張局势緩和了以后，他們便挽回頹势，以其中代表人物成立了叫做“撰鋒队”的一种政治、軍事性的組織，处处和奇兵队对抗。文久 3 年 8 月 16 日，双方終於在下关發生小規模流血冲突。由于这次事件，奇兵队被調到小郡地区的秋穗，而高杉晋作也被排出藩政权以外。两天以后京都發生了政变，尊王攘夷派的势力衰落以后，藩厅便越發压迫起諸队来了。

同年 12 月 12 日，藩主召集諸隊長亲自指示：“应严格执行队中紀律，务使国力不致削弱，国政益兴”。这就是說：自由的諸队有使国力(藩的势力)削弱的危險，目前必須树立秩序；于是，限制各队名額，总人数 1500 名，不准武士本人及其嫡子入队，农民、商人、“繼續农耕經商者，各归本业，如声請入队，当予准許，其他如遺弃家中子弟者，农户、商家瀕于破产者，严格予以逐回”，“农商兵，須



由鎮長或代官領取證明，只限持有證明者入隊”；這就不再准許拋棄家業的貧農隨便入隊了。另外，即使“武士及步卒以下”如“曾受處分”，也是不准入隊。凡屬隊員，必須報請藩廳許可，並在隊內“應由隊長嚴加管束，必須遵守服裝等各項規則，以保持武士與平民之區別”。這就是說，不准隊內有絲毫民主氣氛（“修正防長回天史”第四、九冊，“奇兵隊日記”第四）。

在對諸隊開始反動統制的同時，並禁止人民的自由武裝。次年元治元年（1864年）2月，通令各郡農兵司令：“凡事應同代官商議，以免妨礙地方治安”。3月，通令關於農兵，當由藩廳选派適當人員分赴各地進行組織，嗣後一概不准他人“擅自越過郡界，隨意組織農兵”，並禁止“以往即結有師弟之盟，亦不准擅自帶領當地居民他往”（“忠正公一代編年史”）。

反動勢力一天天地猖狂起來。長州急進派忍無可忍，在同年7月，發動了“禁門之變”。結果，遭到慘敗，於是，反動派進一步猖狂起來。藩廳於9月5日，認為小郡的村醫佐分利顯茂自己出錢組織的民兵達數百人，“妨礙民事”，命令解散（“忠正公一代編年史”）。並在12月21日，命令奇兵隊以下諸隊解散，但諸隊完全未遵守這項命令。本來為了對外防衛而組織起來的諸隊，這時已完全認識到攘夷是多麼愚蠢，這樣他們便成了為國內階級鬥爭服務的武裝力量，也就是富農豪商和武士的急進改革派對抗反動的藩廳、對抗幕府、並以打倒幕府為目的的武裝力量。他們在這點上確信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所以對於藩廳的壓迫，表示決不屈服。抗拒解散命令以後，諸隊自己重新制定了紀律（不是藩主的訓諭），企圖鞏固內部團結，加強同人民的聯繫。他們制定的紀律是：

一、以禮讓為本，以不違背民心為宗旨。禮讓者不亂尊卑之序，各守本分，凡事不可任意妄為，應忠實誠懇而不驕傲自滿。

一、切莫妨礙農事，不准擅入農戶。狹路遇到牛馬，應避於道旁，以利通行。凡屬耕地，雖無稼禾亦不准踐踏。

一、山林之竹木櫨楮等固不待言，即道旁之草木亦不准砍伐，

至于勒索民家之水果、鷄犬等物，尤在严禁之列。

一、言語应謙虛和藹，不准稍涉威吓口气，务使人民乐于接近。

一、应劝誘乡勇队员自动前往击劍場，劝农家小兒入学学习。

一、应以不畏强敌百万，而畏弱民一人作为武道之本。

这项紀律明显地反映出諸队的封建性的一面和力求联系群众的改革派的一面。

諸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在这年 12 月，对反动派的藩厅發动了叛乱，这次内乱繼續了两月之久。由上級武士組成的調停派向藩厅提出的意見書中也說，因諸队“說服农商兵，人心归服，故憑兵威难以制服，反将激其气势”，“各郡百姓，并非因金錢而归服諸队，以目前情势观之，人民似認為正义屬于諸队，故民心悅服”。斗争的結果深得民心的諸队取得胜利。庆应元年（1865 年）2 月初停战，藩厅当权者調換上受到諸队支持的人員，对于幕府决定采取“武备恭順”方針，如前所述，实行正規常备軍軍制及其他各項改革，奠定了長州战胜幕府的基础。

然而，諸队因为具有“不乱尊卑之序”的封建性質，所以在胜利后并沒企圖掌握藩的政权。另外，在庆应元年 3 月，又容許了成立以上級武士的“撰鋒队”为基础發展起来的“干城队”。这支部队是由于深恐諸队的强大，“如无一支基干部队，則恐难以进行镇压”，專为抑压諸队，以及为了和諸队相对抗而組織的。同时，还将游击軍也置于它的指揮統率之下。

諸队的急进的、民兵的性格，在内乱胜利后反倒减弱了。农民参加諸队的虽然日益增加，而藩厅却在 5 月間严格限制农民入队。同时，在藩內各地設立訓練所，建立制度，由农商平民中征調 16—35 岁者 1,600 名，每月訓練 3 天共訓練 6 个月，所需装备也因富豪捐獻一律改为“格威尔”槍。但这并不是文久 3 年后半期那样的自由民兵，而是受藩厅严格控制的。另外，还严禁对平民擅自施行軍事訓練<sup>①</sup>。

<sup>①</sup> 从内乱到对幕府战争的政治过程，請參閱我著的“日本現代史 I，明治維新”。

当时，諸队的薪餉也日漸困难，被認為“数千人員，費用浩大，不能量入为出，反使藩內日益貧弱”。这年年末，高杉在寄給諸队总管的信里談：“关于諸队經費，除削減无用的高級武士俸祿外，恐无他策”。总之，如不徹底打破世襲制度，諸队已不可能在数量上得到进一步發展了（“奇兵队日記”四，“东行先生遺文”）。

当对幕府作战时，奇兵队在山县有朋指揮下，以下关为据点，同小倉口的幕府軍进行作战，攻陷小倉城，并深入領地内部。但因在該領地內征發糧食，極尽苛酷，受到小倉藩农民和一般农民的激烈反抗，于是，奇兵队等長州藩兵竟然燒毀了进行反抗的各村。可見奇兵队的民主的、平民的一面，对于外藩就不存在了。

尽管这样，奇兵队仍不失为促进長州藩討伐幕府的最大原动力。自从王政复古的武装政变成功以后，長州志士的領導者桂小五郎（木戶孝允）等便認為諸队不好摆布，他說：“国家之患，在于尾大”，“不願長此看諸队顏色行事”。

艺州藩諸队 長州邻藩的艺州藩，也受到奇兵队的影響，組織了类似奇兵队的諸队。最初，在幕府長州战争期間的庆应2年（1866年）7月，安艺郡下村的富农木本壮平組織农兵3百余名，名为“应变队”。同月，由广島市志願者組成“报国队”，征集城区新开組的壮丁建立了“一心队”。最初，报国队和一心队都接受藩厅指揮，而应变队因純系民間队伍，于同年12月14日被解散了。到了次年庆应3年（1867年）3月5日，应变队又重新組織起来，这时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自由的队伍，而是被置于郡長严格統轄之下。明治元年东北战争时，这个重編的应变队从日光口轉战北陆，那时的編制是，軍官23名，卒族12名，隊員237名，僕从25名，杂役26名（“艺藩志要”卷二四、二七、三八）。从軍官的僕从很多这一点看来，可以推想它并不象奇兵队那样民主。这个部队的最初組織者木本壮平本来是到長州藩充当藩士宮城彦助的僕人，在当僕人期間学会了新的兵法和农兵队的組織（“男爵船越衛傳”）。

应变队就是这样由民主的农兵队一跃而成了藩的常备軍的一部分，沒能發揮奇兵队那样的政治作用。但是，以它为开端，在庆

应3年8、9月間，陸續出現了神机队和發机队等等。这两队是由藩士船越衛（明治初年充任兵部大丞，参与制定征兵制度）“看穿世祿士卒不足信賴，乃从新募集壯丁”而組織的。神机队几乎是农兵队伍，發机队則是士族志願者的队伍，但这里只有少数武士充任軍官，士兵也是步卒和农民的志願者。此外，还陸續成立了类似發机队的队伍，其經過情况不詳。后来在明治2年（1869年）7月，当“版籍奉还”<sup>①</sup>后改革藩制时，解散發机队以及同仇、同心、献力、尽勇、推城、神速、輔世、众合、晴云、司箭等11个队，計队员2千余名，选拔其中精兵9百名編为一队，称为协和軍。到了8月，对该藩军队进行改革时，廢除“馬廻”、“中小姓組”（上級武士）改編为一等队；把“外藩步卒”改編为二等队；洋槍队及新整組（步卒等的队伍）編为三等队；把协和軍、应变队、神机队、新队等統通編为四等队（“艺藩志要”）。

艺州藩不象長州藩那样上下之間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上述諸队虽然在形式上是模仿長州諸队的，但并没有長州諸队那样的政治革新的要求，它和民众也没有政治联系。不过，因为这些队伍逐渐成为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一事，在打倒幕府的紧要关头，对于迫使該藩观望派要員参加薩長方面，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上佐藩 此藩在正規軍以外，也由急进派的藩士把乡士和平民的有力分子組成了諸队。据谷干城的“隈山語謀录”所載：庆应4年（明治元年、1868年）1月，自高知出發的倒幕軍，是“由許多志願者，即乡士、徒步武士以及村長、本地浪人等混合組成的，共8小队（16个連）”。这支兵力是根据前1年即庆应3年（1867年）5月，乾退助（板垣退助）在大阪和薩藩的西乡隆盛等約定，不管土佐藩厅意見如何，有志之上必将参加举兵討伐幕府，回到本藩以后以乡上为中心組織起来的。上佐藩的急进派，因遭受藩厅迫害，逃往藩外或被处死者很多，沒能象長州那样掌握藩的实权，所以也沒能建立起長州那样的諸队。到了庆应3年，逃往藩外的

① 明治維新后实行廢藩置县，各諸侯各將領地交給明治政府。——譯注

中岡愼太郎策动板垣退助，将待机在藩内各地的急进派乡士們，象上述那样从政治、軍事上組織起来，终于迫使藩参加了討幕軍。（尾崎卓尔著“中岡愼太郎先生”，栗原亮一著“板垣退助傳”一卷）

除了上述的長州、艺州、上佐之外，我想当然还有拥有象長州諸队那样組織的藩，但是，現在还没有掌握有关資料。

在討幕战将要爆發的前夕，各处都先后成立了和藩厅毫无关系的、由乡士富豪等組成的討幕軍事組織。

山国队 是丹波山国乡的乡士在庆应4年(明治元年)1月，响应山阴道鎮撫使“凡靠攏官軍各村，限本年一年賦稅減半，如犹疑不定不肯靠攏，則必立遭誅罰”的号召而組織起来的。队员83名，最初官軍認為无用，后經队员热心要求參軍，一部分随东征軍、轉战各地，明治元年11月25日，凱旋京都(“山国队志”)。

越后的諸队在北越的乡士、富农等队伍中，有居之队、北辰队、金革队等。居之队中富农最多，金革队中一般农民分子較多(田中惣五郎著“北越草莽維新史”)。这三队参加了官軍。此外，还有叫做正气队的五泉的民兵(同上)。

明治元年战争结束后，居之、北辰、金革三队并未解散，作为属于越后水原县的軍隊連同队名保留下来。明治3年(1870年)2月，改为兵部省直屬部队，被調晋京，欢欣鼓舞地到京后，即被取消队名編入第三游击队，队长以下的干部也改由中央任命。队员对此声称“本队队长以下各負責干部，原系由队员自由推选”，今由上級任命，頗感不安，希望恢复旧制，但是沒被批准(“固穷录”、維新史料編纂会藏的抄本)。

除了这些队伍以外，在戊辰战争<sup>①</sup>时参加官軍的还有远州的神社住持等的报国队<sup>②</sup>和下野足利的田崎草云率領的誠心队等<sup>③</sup>，这些队伍，是以“民間”諸队聞名的。当元治元年(1864年)水戶藩發生内乱时，构成天狗党主力軍的也是乡士和上述的农兵<sup>④</sup>。至

① 明治元年(1868年)政府軍同幕府軍及东北各藩的战争。——譯注

② “远州报国队事历大要”(維新史料編纂会所藏抄本)。

③ 藤井甚太郎著“維新前后之农兵”、杂志“历史地理”特集、“日本兵制史”。

④ 在下节內叙述。

于虽未組成独立部队而由志同道合者相率投入官軍的“民間”之士，全国各地所在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官軍才取得了胜利。

#### 第四节 革命民兵的萌芽

革新的中間階層的軍事組織，不論是掌握了藩政权的奇兵队，或是“民間”諸队，一直到对藩的門閥进行斗争和打倒幕府时为止，都是革新的，和人民一致的。但是，他們只是到此为止，再也不能由此前进一步，这里反映出由他們的階級本質所决定的局限性。虽然如此，在某种情况下，他們还是能够起到革命的作用。長州奇兵队本是为担任防長二州的对外防衛而組織起来的，当他們和防長二州的全体人民的自由武装結合在一起的时期，自文久3年6月起以后的几个月中間，可以說是完成了民族防衛軍这样一种革命的任务。但是，他們并未鼓动对岸的小倉藩和比邻的艺州藩的人民——不是封建領主——，并試圖把他們从政治上，軍事上組織起来，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由它們的階級本質所决定的局限性。当时在日本，还没有形成能够建立和領導那种超出藩界的人民組織的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或者初期的无產階級。所以，即使在当时，奇兵队也只能同防長二州全体人民的自由武装相結合而未能更进一步，這可以說是它的客觀的、历史的局限性，不应同以后脫离了人民甚至和人民对立起来的奇兵队相提并論。

奇兵队等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間里完成了革命任务的根本力量，并不在于他們的領導干部，而在于他們所結合的人民之中。然而，人民不能自己來組成独立的軍事組織，而只能參加中間階層的革新組織，或者在暴动蜂起时暫時武装起来。在这样人民的武装里产生了革命民兵的萌芽。

当幕府末年明治維新的变革动乱时期，人民違抗幕府各藩禁令而自行組織的武装，是相当广泛的。据元治元年(1864年)8月幕府造兵主任小栗上野介等上書說：向来不准人民私自持有洋槍，洋槍匠的洋槍每年也要受到新旧洋槍檢查，但“近来這項章程已成具

文，农民商人均有洋枪，铁匠随意制造买卖，发生弊端，形成极端自由放任。本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树立管理的根本方针。方今内乱爆发，参加暴动之浪人、山贼、窃盗持有军用洋枪，法令实难执行”。由此可知，当时民间生产和持有兵器的范围已日益扩大。凡属购买洋枪的人当然不是贫农而是富人，而担任管理的官员却深恐他们的洋枪逐渐转到“参加暴动之浪人、山贼、窃盗”，也就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起义的群众手中。

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情形，所以才如前所述，一方面在幕府或藩的控制监督下，由地主富农子弟组成“农兵”，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再三重申明从前的禁令，禁止人民练武。庆应3年（1867年）3月，幕府发出布告说：“查近来各村窝藏浪人，农民学习武艺，或农民相聚习武，不但妨碍农事，并成为忘却身分、逞凶闹事之基，应即严加禁止”。这个禁令，最初是文化2年（1805年）颁布的，后来到天保10年（1839年）重申一次，这回是第三次重行颁布。前后三次词句完全一样，但是其所针对的情况，庆应3年要比以前严重得多了。

以下列举一般的农民起义以外的革命民兵的萌芽的实例。

#### 一、文久元年（1861年）对马的情况。

同年3月3日，沙俄军舰波萨德尼克号（Посадник）来到对马的浅海，测量海岸，至3月4日，借口修理军舰，停泊在芋崎浦，不顾对马藩当局的制止，开始建设长期居住的设施。沙俄和英国都是老早就企图在对马岛建立海军基地，用以控制日本海和中国海，这回是沙俄先下了手。对马藩当局对于这次侵略的态度是这样，由于自己的领地芋崎一带“实际上已俨然成为沙俄领地”，内心总是设法请波萨多尼克号开走，但又没有毅然抵抗的决心，曾想如果能在别处领到适当土地，或者能得到现金或粮米，就抛弃对马而逃走。至于幕府的态度比起对马藩来就更冷淡了。在这期间，波萨多尼克号越发蛮横起来，他们掠夺了修筑营房用的木材和食粮，另外他们忽然死了8头牛，也诬赖是岛上居民毒死的，因而要求拿牛抵偿。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要求给他们寻找妓女。我还没有看到

关于他們强奸島上妇女的史料,据想象,这样事件可能有的。

藩主和武士只顧保守他們的封建租稅收入,根本不管对馬命运如何,但是,对馬的人民可就不同了。他們为了保衛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毅然站了起来。4月12日,一队侵略者在大船越破坏防御工事登了陆,为了制止他們,有二、三青年跳上敌人的舢板,一个名叫安五郎的青年农民,和敌人奋勇搏斗,终于被敌人杀死。这个消息象闪电似地震动了全島居民,情况很快地就發展到幕府官員报告書中所說那样:“由于大船越村开枪一事,青年人憤怒达于極点,不待指示,即行出动,大船越村及其附近各村老人少女皆退到府下,全州居民意气激昂”

人民的奋斗激动了青年和俸祿低微的武士特别是乡士,他們屡次开会,拒絕上級命令,主張抗战。7月8日“有外国人7名,由陆地州藻村道通过,达到城下砥石州,于是該地青壮年随即携带武器,加以制止”,终于迫使外国人退去。不久,有3百余人从九州对馬藩領地田代跋涉海陆百里来到对馬,同当地人民和乡士会合一起,一时造成了将要“發动一大事件”的形势。如果藩厅接受了俄艦的要求,或租給土地,或准許自由往来的話,“民气激昂,难以抑止,势必捣毀藩厅”,这时,藩厅当局大有和俄艦同遭人民攻击之势。

在人民的这种压力之下,对馬藩总算坚持到8月下旬一直拒絕了强要租用土地的俄艦要求。在这期間,由于害怕俄国建成基地的英国出来干涉,俄艦才在同月25日开走,以后再沒有来<sup>①</sup>。这次民族斗争經過了6个多月,根据4月12日和7月8日的事件推測,对馬人民一定是成立了某种形式的民兵組織,但实际情况如何,我还没有發現有关的史料。

## 二、元治元年(1864年)水戶藩的情况。

<sup>①</sup> 关于这次事件的史料,已經出版的有收集在胜海舟編的“开国卅原”中的“俄人登陆对州事件”。这是派往現地的幕府官員調查报告書的匯編。維新史料編纂会所藏抄本“关于俄艦开到对州的記錄”,是对馬藩厅的逐日記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关于这二事件的全部經過及其意义,在我的“日本現代史 I 明治維新”中有詳細闡述。



元治元年3月，水戶藩上藤田小四郎等及其同志5百余名，以筑波山为据点，要求幕府实行攘夷，因而釀成筑波騒动或称天狗党騒动。6月，幕府和水戶藩厅派遣军队进行讨伐，到10月末，常野地方乱成一团。当时，各地农民为了保卫本村，有的反对天狗党，有的反对讨伐军，有的反对双方，到处发生了武装起义。

天狗党的主力，是出入于水戶藩所設小川、潮来、那珂湊三所学館的乡上和乡士化了的“农兵”（见前，参阅本章第一节）。但其中也有许多普通农民。据幕府平定关东军事报告（波山始末）内载，在10月23日天狗党在那珂湊总退却时，投降的农民有2百名，此外，未及逃脱而被俘的农民有680余名。另外，天狗党在常野失败后，有8百余名不肯投降打算晋京投奔德川庆喜，在幕府军追击之下，通过中山道，从美濃向越前进发，爬过山，经过50余日的恶战苦斗，作为天狗党人坚持战斗到最后，其中的一半是农民<sup>①</sup>。另外，在敦賀被处死的干部级經查明身分的261名中，有153名是叫做“玉造村农民重平”，或“羽生村农民佐平”一类名字而没有姓氏的农民<sup>②</sup>。由此可知，当时热烈支持天狗党的农民，还是大有人在的。

在常野的战斗中，有一个农民支持天狗党的典型事例。7月9日，天狗党军在下妻偷袭幕府讨伐军的本营，获得大胜，迫使幕府军溃退到下总的結城时，“下妻一带农民皆勾結浪上”（波山始末）。

① 据“波山記事”卷十一“投降浪士姓名录”所载，在越前投降的共計749名，其中没有姓氏的仅仅60名，但据同書“波山記事”卷十一的“为解交野州浪士一案致土屋丰前太守文件抄件”（没有日期，或許是庆应元年閏5月初的）所载，野州投降者中，有427人以輕罪送去服劳役，内有多士33人，出家人52人，农民342人。在越前投降的天狗党人总数根据不同史料，也有从749人至823人之差，内中“美濃、尾張等地农民78人”亦包含在内。根据管理俘虏的加賀藩上石黑坚三郎的庆应元年2月19日的日記，这78人被流放了。因为史料記載有出入，所以由关东行军到越前的总兵員和其中包括的农民，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

② 本文的記述，是根据敦賀联队区那須弓雄少佐的“从军事上看水戶天狗党的暴动”（杂志“偕行社記事”所载“水戶幕末風云录”轉載）。但“水戶幕末風云录”的著者自己却写道，在敦賀被处死刑者内，完全无姓者38人。

但是，根据这件事和曾有相当多数农民跟天狗党同生共死的事实，就認為他們受到人民的絕對支持，那就錯了；毋宁說，他們更多地受到人民的反抗。参加天狗党的农民，可能是和它的領導者們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人。

天狗党人中，也有不少的人借口筹集攘夷經費，不但襲击下总、常陆、下野各地的領主、代官，并搶夺了一般民众的金錢粮谷，杀伤人民，而自己則沉溺于酒色。由于这些情形，使人民进一步反抗了天狗党。7月中旬集結在下总、小金的一批天狗党人，命令当地农民都要佩刀前来，农民不听，便再次督促，并威胁說，如不服从，即严惩不貸。这样作法只能使他們越發脱离群众，不久，民众的反抗便發展成为武装斗争。6月下旬，当浪士来到下野真岡代官所筹款时，遇到1千名左右手持洋槍的农民守衛着代官所。7月下旬，浪士千种太郎率領2百名左右的天狗党人，在常陆府中附近受到农民襲击而被歼灭，千种太郎后来在牛久藩領眞家村为武装农兵所杀死。到了8月，茨城郡的鯉淵村等35个村的村民，組織了3千余名民兵，配合水戶藩軍对天狗党进行了激烈战斗。同一时期，河内郡各村的农民和以柿岡为中心的筑波山麓54个村的农民，也都同天狗党进行战斗，将其击溃。天狗党的干部福地广延的日記中不止一次地記載着，到处民兵蜂起，苦于“竹槍結队之奸民”抵抗“义徒”（引自“水戶幕末風云录”）。

当时，各村庄，有的5村，有的10村联合在一起，一有浪士前来，立即鳴起警鐘，操起竹槍和洋槍将其赶走。这时“鉄匠鋪因农民訂制矛槍，忙得不可开交”（“波山記事”卷六）。这种民众的自衛，逐漸發展成为維護自己利益的階級斗争。7月末，被調去警衛太田鎮的附近各村1千余农民，闖进鎮內十几戶批發商店，加以搗毀。因为以前当天狗党的强盜来筹款时，这十几戶商店为了自己免受損失，曾指引他們勒索他村，故而引起农民的激憤。正在討伐天狗党的藩厅，对于这种民众斗争，竟然不得不急忙派人前去鎮压。还有7月末日，茨城郡額出各村的农民搗毀了村長及富农的家，从8月1日又連續三天搗毀大官村等數村的村長

家<sup>①</sup>。这些农民完全形成一个部队<sup>②</sup>，配合藩軍同天狗党进行战斗，而重要的是，他們所以靠攏藩方，只是为了摆脱天狗党的暴行，来维护他們自己的安全和秩序而进行了战斗。他們并非是藩厅的走狗，他們也反抗藩厅官吏，他們在藩的镇压下还搞起上述那样捣毁事件。

民众的武装自卫斗争一发展到这种自己的阶级斗争，藩厅就不得不积极加以镇压。9月下旬（日期不详）藩厅发出布告如下：

“查附近各村集聚群众，不分官员或百姓家宅，一律加以捣毁，且有日见猖狂之势。被捣毁者或有罪行，如确有罪行，应由村公所加以惩处，个则不待指示，便擅自捣毁，藐视官府，殊属非是。（中略）而被捣毁者之中，亦有无多大罪行者，斯则尤属非法之至。果有罪行，经调查后，当即严惩不贷，不拘官员百姓，仰即控告前来为要”（“波山记事”卷十二）。

照这一布告看来，蜂起的农民似乎是不拘村吏或百姓，曾一律加以捣毁，但实际遭受捣毁的只是村吏或属于同一阶层的地主、商人。进行捣毁的人，既是百姓和贫农，断无袭击同一阶层的百姓之理。各地农民袭击天狗党，上述例子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我想这并不只是由于气愤天狗党掠夺财物，一定还有更深的内在理由。我认为这是农民平素对于天狗党主力的乡士、神官（地主）们的阶级仇恨，借着他们掠夺财物、胁迫入党的机会爆发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长州尊王攘夷派的地主、商人、武士等能够团结普通农民，对藩厅上层进行了斗争，而水户的情形却和长州相反。虽然同是尊王攘夷派，水户的尊王攘夷派是有比幕府和水户藩门阀势力更加顽强的封建性，他们是从右倾立场来反幕府反

① 8月4日，水户奥右笔致江戸同僚书。“水户藩史料”下编，卷十六。

② 高瀬真卿著“昨日之梦”（故老实历水户史谈附录），著者是藩厅高级武士之子，少时遭逢天狗党事件，曾目睹用竹枪武装起来的农民的“结队游行”。并说：“近来所有各郡村，均出农兵二三百名支援领主居城，其中出自鯉渊村者称鯉渊势，出自額田村者称額田势，相傳此种队伍最强”。

門閥的；而長州則是改良主義，他們是從左傾立場來反幕府反門閥。雖然對外同是攘夷，水戶是一味奉行封建的排外主義；而長州則反映了民族獨立的要求。因為有這樣差異，才造成水戶長州兩藩尊王攘夷派對民眾關係的不同。更進一步追究起來，我想也就是兩藩的階級分化過程有所不同，不過，這裡不能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 三、慶應3年、4年隱岐島的情況。

隱岐島是幕府領地，由松江藩代管。如前所述，慶應2年（1866年），藩庁在這裡選拔了地主、上層農民30名，組織了“農兵”，其中20名駐在島后（隱岐是由東北的1個大島和西南的3個島及其他小島組成，東北的大島稱為島后）的矢尾、目貫、宇屋三處海岸，下余10名，駐在島后各村。

但是，村中有些知識分子及富農要自由地修文習武。在京都的隱岐出身的國學家中沼丁三的弟子中西毅男（島后山田村出身）、隱岐一之宮神社的神官總部正弘、加茂村的村長頭井上香彥等糾合同志73人，計劃成立文武修業所，慶應3年6月，向郡代<sup>①</sup>申請批准，結果遭到批駁。中西毅男等憤恨松江藩借口保衛國土，組織農兵作為自己的爪牙，并向島上增派藩士，却限制人民自由修文習武，便直接向郡奉行提出申請書。在進行第三次申請的8月18日，當局傳喚請願者村長等人責罵說：“研究文武，乃武士身分以上者之事，爾等農民根本無份。爾等只宜處理肥料、計算繳納租稅足矣。如今竟提出此種申請，莫非欲作此地主宰耶”。實則申請者和藩當局雙方都充分了解到這個“修文習武”的階級的意義。

談判決裂後，中西毅男即去京都和討幕派取得聯繫，留在島上者結成“同志會”，按照各村地理情況分別組織了幾個大小聯合村，每月舉行集會數次，練習擊劍，研究國學，和松江藩對抗起來。所謂“國學”並不是本居派的文獻學，可能是學習“王政復古”之類的政治思想。

後來，局勢急轉直下，10月，“大政奉還”，12月宣布王政復

① 幕府直屬地官員。——譯注

古，翌年庆应4年(明治元年、1868年)1月，以島羽伏見之战为开端爆發了討幕的內乱。松江藩因系德川氏同宗，天皇政府对于它的向背，特別保持警惕。

2月6日，天皇政府的山阴道鎮撫使沒有通过松江藩，直接命令隱岐島村吏說，隱岐島已成天皇“領地”，应即提出有关地亩租稅、人員、牛馬数及海陆物产的統計表。因为松江藩的官員拆开了这项命令，于是同志派大为激憤，3月9日，召集同志秘密會議，决定以13日为期，襲击西乡町的郡代公所，将郡代驅逐出島。恰巧因島后各村定于同月15日召开村長大会，因此“同志会”改变原定計劃，想利用村長大会的決議，全島居民一致起来驅逐郡代。在大会上，驅逐郡代派(称为正义党)和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爭論，目貫村、矢尾村、宇屋村(以上是藩厅农兵的据点)，今津村、平村的村長，認為不应反抗上級，表示反对(称为出云党)，因而全島未能取得一致。18日，同志会在上西村的横地官三郎家里开会，决定联合正义党的村長，馬上掀起武装起义。当天的夜半，以襲击并逮捕巡邏村內的郡代公所官吏为开始，3千多名农民举行了起义。村長表示反对起义的矢尾村、目貫村也有150名至210名农、漁民参加了起义。

19日早晨，武装起义群众在横地官三郎等人指揮下，包圍郡代公所，提出了譴責失政書，書中指出，松江藩在島上的行政，历来只顧滿足私欲，因此民众不服，島上不安，以及14条失政；并宣称从今以后，隱岐已成朝廷的領地，不再受尔等統治，尔等应即低头認罪，退出本島，不然，将与尔等决一死战。郡代答应了島民的要求，留下全部公文和公有财产，逃回了松江。起义宣告胜利。

島后的同志会想把島前各村也拉攏过来，曾向那些村長进行了工作，但是，島前的代官巧妙地籠絡了民心，同时还把他本人和屬員的妻子送到松江，动員了农兵部队(庆应2年的新农兵抑或以前的农兵，未詳)表示要和群众斗争到底，由于这种原故，沒能吸引島前各村参加起义。

⑩ 島后驅逐了郡代以后，便派中西毅男等前往山阴道鎮撫使处联系，并在島上建立了自治制。把以前的郡代公所改为“會議所”，以各村的“年高有德者”为議員，推举忌部正弘为“总指揮”。會議所不仅是立法机关，而是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合一的最高机关。在會議所指揮監督下，設有执行机关——总会所，由各村村長輪流执行任务。

在軍事方面，設有戍兵、义勇、揮刀三局，各局置壯丁四五十人，輪流駐守，巡邏村鎮，担任警备。三局設有击劍組長，武具管理員，軍粮管理員等職員。士兵是否領取薪餉，不得而知，我想大概沒有領取薪餉，因為他們是保衛自己自治团体的民兵。

这个自治团体的独裁階級即神社神官、村長等，若不依靠一般群众，固然任何事也办不成，但是，他們并不是群众的代表。所以，他們在掌握了政权之后，主要考虑的問題并不是坚决执行和巩固同群众之間的联系的改革的或者革命的政策——廢除或減輕封建性的負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而是想要依附天皇政府的权威和权力来巩固他們在島上的統治地位。可是，天皇政府比头脑簡單的乡村勤王地主更为狡猾，它在隱岐島上居民的行动中看到破坏秩序、进行群众革命的萌芽，而松江藩又表示忠于新政府，于是新政府就擯弃了民众。4月25日，太政官指示松江藩隱岐一如从前，仍交松江藩管理，并命令对島上居民自治团体进行鎮压，天皇政府說：“聞近来島上人心不稳，应即更加严厉取締，如当地居民对官署有不法举动，仰即查明，可不拘旧幕府时期之前例，根据刑法适当惩处”。

松江藩認為正中下怀，立即派参政乙部勘解由率領洋槍队两个小队及特別选拔的捕吏20名計70名兵力前往隱岐。这支鎮压队伍于4月29日到达島前，进行了大約1个月的鎮撫工作以后，在閏4月27日到达島后的西乡，次日又由松江派来增援部队2百余名，乙部倚仗这些兵力，要求島民交出郡代公所，島民不听，于是双方对峙起来。

5月10日，乙部借口进行演習，將軍队摆开了战斗队形，同

同志會認為這種演習可能刺激人心，要求立即停止，這樣，發生戰鬥的危機逐漸迫近了。

正當這時，在這以前晉京的井上香彥、橫地官三郎回到島上，認為和藩兵進行武力鬥爭對自己不利，主張“暫移他處，切勿抵抗”。但是，“少壯者抗稱，事急而退，我輩所耻，彼既挑畔，即宜應戰。因而固執不聽”。於是，總部總指揮急命隊長收繳民兵軍械。正在這種緊要關頭，同志會的領導者們發生了叛變性的動搖。民兵反對叛變，陷於混亂。時刻已近黃昏，藩兵突然開槍，原田村的吉田牛之助首先倒下，這樣，只有開始戰鬥了。不過，由於指揮部的動搖，民兵方面不能進行有效的戰鬥，經過一場混亂，民兵失敗了，計陣亡 10 人，負傷 8 人，被俘 19 人，而郡代公所也被占領了。

藩兵立即轉人追擊，陸續逮捕同志會分子，燒毀了表示反抗的村落，掠奪了人民許多財物。取得了勝利的這支反革命軍隊，和所有的其他反革命軍隊一樣，在這裡極盡了猖狂殘暴的能事。同志會的首腦們從島上逃跑了。

後來中央的政局發生變化，在閏 4 月江戶城開城投降後，反天皇勢力反倒加強，北越、奧羽地方一連串的反天皇各藩，掀起了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於是，松江藩的向背又成了問題，而隱岐島處在天皇政府軍出兵北越的海路要衝，它的戰略價值增大了。5 月 16 日，薩、長、因三藩的軍艦和陸軍開到隱岐，對松江藩兵施加壓力，迫使它只在島後留捕吏一小隊，島前留一小隊，下余兵力，全部撤走。松江藩於 18 日，匆匆忙忙發放大米 5 百袋，分給島上貧民，並從新出了布告說：

“此次王政一新，一向代管兩島，改奉朝廷之命，方今庶政初創，不拘過去慣例，人民如有困難，當以公論裁奪，仰即打破顧忌，申訴前來，兩島居民，咸令周知，切切此布”。由此可知，去年年末以來同志會的鬥爭是以一般民眾反抗藩政為基礎的。藩方又稱：“當茲王政一新之際，凡我人民應不分貴賤，一律為皇國鑽研文武，以期作出勤王之實效，自不待言。以往已不乏有志之士，殊屬可嘉，今後當逐步規定辦法，以期再接再厲。惟農業乃國之根本，

仍应勤事耕作，切莫懈怠”，这样，准许了同志会关于修文習武的要求。

然而，同志会和島上居民并没有被这些言詞迷惑住，他們的斗争进一步發展成为“廢佛弃釋”。在这以前的3月，新政府頒布了神佛分离令，于是，由神社的神官领导的同志会便活跃起来，对勾結藩厅拥有广大領地的佛寺进行攻击，砸毀了十字路口的地藏菩薩象和青面金剛象，并威胁要搗毀寺院。寺院一向担任着一部分封建政权的警察任务，他們檢查宗門信徒的思想(即思想警察)，出村旅行的人，必須携带寺院發給的保証身分，宗門的“旅行証”。但是，島上居民却无视这种制度，用实力爭取了旅行自由。各寺院于5月要求藩厅进行鎮压，他們說：“倘神社神官、百姓等破坏天下之宗門”，实在遺憾，他們“无异国敌天主教徒”。島上居民則攻击僧侶如何腐敗，表示不能甘心讓这种人来“教导人民，檢查宗門信徒思想”。

新政府鑒于北越、奥羽地方内乱扩大，感到有必要收攬隱岐島上的民心，遂于5月28日派遣監察使(因州藩土肥謙藏)前来隱岐，表示同意同志会的主張，事实上否認了松江藩的統治，于6月13日离去。自此以后，島上居民又把运用會議所和总会所进行的自治重新恢复起来，并在烏取藩支援下，对民兵大力进行洋槍教練。从这时起，島前各村也和島后合作了，兵士分为“国壮士”和“村壮士”2种，前者是担当隱岐全島防务的會議所直轄军队，后者是各村的警备兵。这年11月，本州内乱結束时，隱岐划归烏取藩統轄，廢除了會議所等名称，忌部和井上等會議所的10名干部，改为烏取藩的雇員，但事实上他們的半自治团体仍然繼續存在。同时，对佛寺的攻击更加激烈起来，所有島上寺院的佛象和佛具全被燒毀。更重要的是迫使僧侶还俗，对还俗者以較低的地价由寺院領地中撥給土地五段步<sup>①</sup>，不听从者，驅逐出島。撥給僧侶以后下余的土地究竟怎样处理了，沒有史料可查。不管怎样，島民自治团体总算沒收了寺院土地，只这一点，也值得大書特書。可以認為，这里

① 一段約合 991.7 平方公尺。——譯注



潛在着可能發展為土地革命的因素，而實行土地革命的實力組織，就是國壯士和村壯士的民兵。（以上關於隱岐島的情形，是根據“隱岐島志”，“島根縣史”，“贈從三位松平定安公傳”，而在我的“明治維新”里也大致敘述了。）

關於隱岐島的民兵後來同新政府的关系，以後再講。

隱岐的同志會及其武裝（壯士）組織的階級本質和長州奇兵隊相同，不過，同志會最初和封建領主權力沒有任何联系，以後雖然有形無形地受到新政府的支持，但它作為民間組織的性格還是很強烈，在這點上，可以說比奇兵隊更加接近民兵組織。

四、明治元年内亂時東北和北海道的情况。

在明治元年内亂中，使天皇政府取得勝利的最大力量是（象在隱岐那樣），民眾對新政府的支持在各地發展成為武裝起義。無論是在關東地方以及北越、奧羽地方，武裝群眾對舊領主的叛變和倒戈，在使官軍取得勝利上起了巨大作用。關於這點，我在“明治維新”（“日本現代史”第一卷）中，已詳加敘述。尤其是北海道函館的游軍隊，是民兵中最为進步的，關於它，除了上列“明治維新”中所述的以外，並沒有什麼可以追加的，所以在此從略。

總之，當幕府末年明治變革期中，在一切都要取決於人民採取堅決行動的時候，雖然未能看到發展成為完全革命的民兵組織，但到處都出現了人民的武裝鬥爭，這是後來自由民權鬥爭的多次起義在歷史上的前驅。更重要的是，從數量上說，它是更加廣泛的群眾的武裝鬥爭，是日本革命民兵的直接的和在歷史上的萌芽。

明治政府的征兵常備兵制，是在徹底鏟除了這種民兵的萌芽之後才建立起來的。

## 第二篇 天皇制军队的建立

### 第一章 征兵法的制定

#### 第一节 天皇政权的成立和对民兵的压制

幕府是整个封建体制的中枢和顶峰，它为了保存这种地位，竟不考虑全国性的防衛，而企圖建立一支镇压国内反对派的新的军队。但即使为了建立这样旨在維持幕府專制的军队，早在1862年幕府的軍制总管就叫嚷过：“除非将古来面貌徹底革新，对所有各項法制大加改革，絕难实现<sup>①</sup>”。的确，如果不对整个封建制度加以改革，而只求兵制軍备的近代化，那是不可能的。幕府在它的末年，曾接受法国的援助和指导，甚至不惜将日本国上一部分出卖給法国，来一个“大变革”，企圖成为專制君主，并为此实行兵制的大改革。但那时，打倒幕府的势力业已联合起来，幕府终于被推翻了。

正如站在打倒幕府派的最前列的長州改革派那样，打倒幕府派是同富农巨商阶層結成同盟，通过他們把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集中起来而利用到反对幕府上面。因为这样，他們才能在兵制上建立了象長州軍那样比幕府的更为进步的現代化军队，和在一定限度內利用民兵力量，借此打倒了幕府，并在后来的內乱中取得了胜利。

打倒幕府的主力，表面上是以薩、長两藩同盟为核心的反对幕

---

① 胜海舟著“陸軍历史”所載“近衛常备軍建立程序”。長崎海軍傳習所荷兰人主任教官凡·卡廷代克寄給本国政府的報告中也写道：“日本具备条件，迟早将成为强大海軍国。不过，这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并且在那以前，必須消除一些毫无价值的成見和制度”。（水田信利著“幕府末期的我国海軍与荷兰”）

諸如此类表示已認識到封建制度同近代兵制間有矛盾的言論，还能举出許許多多。

府的各藩的联合。但打倒幕府后所形成的政权，并不是各藩的联合体（王政复古政变之后，曾出现过形成封建联邦的趋势，但以鳥羽伏見之乱开始的內乱，终于摧毁了封建联邦的构想），而是超越藩界的官僚政权，即天皇制<sup>①</sup>。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所谓打倒幕府的各藩的联合，实际上并不是各藩本身的联合，而是掌握藩的权力或在藩內拥有相当势力的改革派的联合，这些改革派同不受藩控制的富农巨商结成同盟，并以高唱打倒幕府和藩的保守反动派，得到了反对幕府和藩的封建制度的全国人民的支持，以这些势力为基础，才形成了领导各藩改革派进行联合的首領們的超越藩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新的中央政权。

那时，天皇——古代日本制度上的惟一最高統治者、在中古时代一直站在封建諸侯和幕府之上的精神的、半宗教性的权威——被拥戴为这个超越藩的統一国家在制度上的元首。那些打倒幕府派的首領們，昨天还是諸侯的家臣，而現在居然成了天皇的“臣”，天皇的文官武将。由于这样，换言之，由于把天皇的权力和权威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的源泉，他們就可以把对于旧主子即諸侯和藩的統治加以神聖化了。假如打倒幕府派是人民的、反封建的革命党，那么，在那次胜利后，就不会出現天皇的封建性权威，他們一定会直接依靠人民反封建的革命实力即暴力，把包括天皇家族在內的整个封建統治階級一扫而光。只因打倒幕府派的武士和支持他們的富农巨商，全都不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階級，所以他們只能在封建性的大义名分即对于天皇的忠誠上找到高于幕府、諸侯的权力。

但是，国家权力不能單靠观念上的权威来維持，无论这种权威是怎样一种被傳統神聖化了的。它必須拥有足以制伏反对者和維持并加强自己的暴力。这种暴力，就是警察、監獄、特别是軍隊。天皇政权如果没有这种暴力組織，一天也存在不了。那么，不以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暴力即革命的群众武装为憑借的天皇政权，究竟

<sup>①</sup> 关于这段历史过程，請参閱我的“明治維新”（日本現代史 I，东京大学出版社刊行）。

在哪里找到了它的暴力呢？王政复古后，新政权的领导者——原先的改革派藩主在各自藩内所拥有的、归他们掌握的军队，暂时成了天皇政权的支柱。但是，这并不是直属于新政权自己固有的军队，它是藩的军队，不能长久依靠下去<sup>①</sup>。新政权必须保有自己固有的军队。

新政府将从哪里取得它固有的军队——军官和士兵呢？在幕府末期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不能以武士阶级为基础来建立新军。那么，能否允许全国人民自由武装呢？当1868年内乱时，固然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民兵组织，但新政府并非革命政府，万万也谈不到组织民兵的问题。恰恰相反，禁止组织民兵，倒是它的首要任务。所以，它一方面铲除人民武装的萌芽，另一方面削减各藩兵力，统一藩兵的制度，抽出其中一部分使之直属于中央，这就是新政府最初的方针。

1868年(明治元年)1月3日(旧历)，任命议定嘉彰亲王为军事总裁，17日，设置7科，其中一科为海陆军科。2月3日，改7科为8局，海陆军科改为军防事务局，嘉彰亲王担任该局长官，称作“督”。此后，于2月6日通令所有参加东征的各藩说：“废除洋枪队、炮队以外各队。队长、司令、輜重员不实用之冗员一律撤消<sup>②</sup>。使各藩废除封建性的装备和军官凭封建身分带领的从者等在战场上无用而有害的人员。这就是新政府关于兵制政策的首次具体表示。同月(何日不详，可能是设置军防事务局那天，或者其后不几天)，又由总裁局令军防局调查“兵制”。同月20日，任命公卿壬生基修等为“亲兵总管”，用十津川、山科、八幡的乡士，多田的家臣及长州的致人队等<sup>③</sup>，编成“亲兵”。这就是新政府最初的固有兵力。当时

① 例如打倒幕府的元勋西乡隆盛，对新政府的开明政策心怀不满，并由于个人的一些情形，在江户幕府投降后，立即返回萨摩，并未协助中央政府，也就是说，他所掌握的萨摩军队是不协助新政府的。在内乱时期，萨摩军队曾拥护天皇，树立功勋，其后也曾经有一小部分队伍留在中央，但这一部分队伍已经不是供政府驱使的军队，而是西乡隆盛为了“约束官吏的跋扈”，监视中央政府而有意留驻的(前引拙著“明治维新”)。

② “法令全书”、同日条。以下法令未标明年月日的，根据都是法令全书。

③ “法规分类大全”兵制门一，以下，此书名简称为“法规大全、兵制”。

既不便依賴藩兵、更不能依靠全体人民武装的新政府，却从所謂“民間”的富农階層建立了它最初的“亲兵”。兵員只有4百名，人員多少姑且不論，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了新政府所要依靠的是哪一個社会階級。

此時，東征軍進展迅速，4月，箱根以西之地已全歸新政府勢力之下。於是，政府在閏4月20日，首次制定“陸軍編制法”，通令各藩按各諸侯俸祿每1萬石出兵員10名(但暫時定為3名)作為“京畿常備兵”；另按每1萬石50名的比率，駐在藩內；并按每1萬石3百兩的比率，繳納“軍備資金”。次日21日，再度實行官制大改革，將軍防事務局改為軍務官，掌管2局(陸軍、海軍)、4司(築造、兵船、兵器、馬政)(但此時四司中只有兵器1司)；任命嘉彰親王為知事，熊本藩主的同宗長岡護美為副知事，長州藩出身的參與大村益次郎為判事。如前篇所述，大村益次郎通曉近代戰術，他曾擔任改革長州的兵制，使1866年長州對幕府的戰爭取得勝利，他是後來政府軍事方面的實際領導人。到了24日，根據前述編制法，制定“各藩征兵細則”，其中規定征兵：(A)只限十七、八歲到三十五歲者；(B)槍械被褥等暫時由本人自備，但軍服、月薪、口糧等由政府發給；(C)各處駐軍應時刻保持戰鬥準備等。這次征兵究竟征集了多少兵員，不得而知，據法規大全兵制門的零散記載，部隊都帶上了番号，擔任警備京都各關卡和宮廷。再者，這次征兵，對於提供的兵員，不問其身分是士族還是平民，這表明了新政府的開明政策。各藩中也有的鑽這個空子，“歪曲意旨，湊足名額敷衍了事”，隨便僱用一些腳夫來充數塞責(法令全書元年11月)。到了5月16日，命令解散旧時幕府的散兵隊。7月，政府下令說，雖有意文武并舉，但是，決定首先開辦軍校。8月3日，京都軍校開學，只收堂上<sup>①</sup>、地下<sup>②</sup>各級官吏的子弟和在京的下大夫等入學，不收一般藩士和平民，企圖主要由宮廷貴族中培養軍官。這

① 有資格上殿的四品以上的宮廷官吏。——譯注

② 沒有資格上殿的宮廷官吏。——譯注

表明在高捧天皇权威的同时，不得不承認宮廷貴族的發言權。其實，正如宮廷貴族不能成為近代的政治家一樣，他們也不能成為近代的軍官。次年1月，這所軍校改為“兵學所”，同時取消入學學生的身分限制，一般士族可以入學了。

新政府計劃建立自己的軍隊的意圖和方向就是這樣。在東北地方的內亂還未平定以前，在積極方面並沒能作出什麼。但對禁止人民武裝、壓制民兵的萌芽方面，却不遺余力。首先在1868年3月規定：“向來逃兵游勇每多冒充皇家、公卿扈從，嗣後凡稱皇胄、公卿扈從而集合者，着即一律嚴禁，果欲效忠朝廷，應報請太政官<sup>①</sup>軍防局，當酌予詮叙求用。雖然一方面把山科、多田的鄉士編為“親兵”，使山國隊、遠州報國隊也加入東征軍，卻又禁止一般人民自稱皇家、公卿扈從充當兵士。由此可見，政府的方針是，哪怕是一點點民兵的萌芽，也毫不留情。這個方針，後來進一步貫徹下去了。6月8日，規定：“近有歹徒私自糾合兵士，流浪之徒竟相聚集，在京畿附近進行操練，所需餉資，募自民間”，今後“定加取締，嚴懲不貸”。由此可見，方來民間富豪出資糾合逃亡離村的農民，編成武裝部隊這種情況，即在京都等處（內亂的戰場，更不待言），也很盛行。屬於所謂“皇家、公卿之扈從”中的一個例子是平松家的丹陽隊，其成員中也有京都市的商人或丹後久美浜的農民子弟（參閱注三）。

1868年時，就連保持了250年之久的舊幕府威信和權力也完全掃地，一切傳統的權勢，均已衰微，整個社會普遍充滿了變革的氣氛。無論農民或是商人，到處都在用種種方法同舊的勢力進行鬥爭。政府所謂的“逃出原籍的流浪者”，也就是為了求得生活和自由而離開農村的隸農<sup>②</sup>到處皆是，這也是這階級鬥爭的一個表現。政府對此嚴加取締，曾企圖強行逐回原籍（法令全書，元、三、四）。1868年10日，委任軍務官來處理流浪者。（可見，當一個國家權力還處

① 明治2年7月設置的最高官署，明治18年廢除，相當於現在的內閣。——譯注

② 一般說來，作為封建生產方式中的基本勞動力，與農奴相同，但從狹義說來，它擺脫了農奴的束縛，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它是繳納實物地租或貨幣地租的農民。江戶時代的農民，就是隸農。——譯注

在形成的过程中，警察和军队还不能明确划分，天皇制的最初期的军队，也是这样。）次年1869年4月，还下令调查流浪者，一经查明，即行遣回原籍，而对于“亲兵和府、藩、县兵”，也要进行调查和处理。由此可见，所谓“流浪者”大约已潜入军队中。天皇政府虽然也曾部分地利用了人民的这种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在骨子里却最为害怕，所以才禁止人民的自由武装。

当内乱告一段落以后，政府便开始禁止人民参加以前得到公认并且被编入政府军中的“民间”诸队。这正和幕府末期长州藩的作法同出一辙，也就是说当危机到来时，允许平民入伍或进行武装；而一旦危机解除，便马上限制或禁止平民入伍。例如1868年11月17日，驻在越后新发田的政府军大本营总督的“指示”中便说：“本地草莽之徒，今后如无军务官及府藩县指示，不得征为兵士，并严禁其参加任何队伍”（法规大全一）。如前所述，越后的民间诸队中有金革队、居之队等；内乱以后，拨归水原县管辖，后来奉命调京，被编入第三游军队，而禁止了它以往自主的同志式的结合。改编后，出了空缺，也不准用越后的同志来补充，一任其自然消灭（固旁录）。隐岐岛的民兵，内乱后也被剥夺了自主性而改为县兵。

不但民间武装、民兵的萌芽受到摧残，即政府直轄府县为了维持管内治安而拥有的警察性的武装力量，也只是存在了一个极短时期，不久便被取消了。例如，神户裁判所<sup>①</sup>在1868年3月征集市民（注一），组织了市军；5月，箱馆府也征集市民编成府军，其他府县似乎也有同样事例。但是，到了同年8月23日，便下令禁止各府县新建府县军。关于禁止的理由在禁令中说：“因规章纷纷不一，有碍建立全国统一之兵制”。

虽然如此，神奈川县由于情况迫不得已还是组织了队伍，并于同年11月，上了一封呈文说：“已按英国式编制编成府军5百名，特请核准备案”（注二）。但是，政府始终坚持禁止的方针，于次年1869年4月8日，重申禁令说：“因与既定规章有所抵触，且一旦征为兵

① 此处所谓裁判所，并不是现在的司法机关即法院，而是行政机关。它类似幕府时代的奉行所。

士，日<sub>レ</sub>后<sub>レ</sub>复<sub>レ</sub>員<sub>レ</sub>亦<sub>レ</sub>有<sub>レ</sub>困<sub>レ</sub>難<sub>レ</sub>，流<sub>レ</sub>弊<sub>レ</sub>非<sub>レ</sub>淺<sub>レ</sub>”，并在同年7月頒布的“府县办事規則”第十項中，特別規定禁止府县編制軍隊。在此前后，上述的箱館府軍、神戶市軍、屬於公卿平松家的称为“丹阳队”的平民軍隊(注三)以及水原县的县軍等，全被解散了。(只有神奈川县是惟一例外。)其他府县拥有的府軍县軍，大概也同样地被解散了。例如隱岐的县兵(原来的民兵)等也被解散了。8月13日，民部省<sup>①</sup>对府县的“指令”中說，“凡自幕府时期以来拥有軍隊之府县，应迅速查明兵士員額及軍官姓名等”具报，这可能是要实行解散的前提(法令大全一)。

不仅法令上規定，除了中央政府以外，不准地方机关或民間建立軍隊，而在1868年12月軍务官副知事長岡护美的建議書中，也一面主張建立足以“称雄世界”的陆海軍，一面主張禁止“各处随便募兵<sup>②</sup>”；1869年3月，長崎府判事井上馨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議書中<sup>③</sup>，也有一条“应禁止新建軍隊”。而实际上，当县厅苦于管区内治安难以維持，再三請求批准建立县軍时，政府也只是指令由附近的藩精选少数“捕亡”来維持治安(注四)，不准称为軍隊。

虽然叫做府县軍，但是，就拿神奈川县來說，也只有5百人左右，所以实际兵力还不及現在的警察，至于其他府县更是可想而知。即便这样微不足道，政府还是加以禁止，其原因就不仅是如禁令中所說那样，因恐規章紛紛不一会妨碍将来的統一，同时还因为如禁令中所提到的一旦編为兵士，日后不易遣散等語所暗示的那样，以及勒令参加軍隊的“流浪者”回籍等語所表示的那样，政府是惟恐这种情形将为人民武装开辟道路。那么，府县既沒有自己的兵力，怎样来鎮压人民呢？它如同以前幕府时代的代官所、奉行所一样，必要时就向邻近各藩請求支援。

天皇政府就这样徹底禁絕了任何微小的民兵的萌芽和可能

① 明治2年7月8日所設的中央政府的1个部，掌管土木、邮电、矿山、通商、所設等事宜，明治4年7月21日撤銷。——譯注

② “改訂肥后藩国事史料”九。

③ “世外井上公傳”一。



性。

(注一) (1) 神戸市史，本篇各节 明治元年3月3日。

“兵庫裁判所总监东久世通禧招集兵庫津里正北風庄右衛門、南条新九郎、北風丈助三人指示說：兵庫接近皇城，应迅速組織市軍以巩固海防。該里正等体会了意圖，由出身可靠者中選得市兵 50 名，槍械彈藥由本人自备，北風庄右衛門担任司令，請薩摩藩士小倉宗九郎、竹狭重次郎教練英國操法。

同年4月，兵庫市軍撥归大阪裁判所管轄，同时奉命增为 150 名，北風庄右衛門司令担任教官，南条新九郎、北風丈助担任小隊長。

同月，大阪裁判所总督醍醐忠順視察兵庫时，在和田岬檢閱市軍的作战演習。6月，替代津山藩兵担任警衛神戶外侨居留地警衛。

明治2年4月，各府县所編軍隊被撤消时，此市軍亦被解散。

(2) “蘆館沿革志”。

“明治元年4月，清水谷公幸任府知事，井上、石見等任判事。5月1日，井上判事等征集当地居民，組織新軍”。

另据“法規分类大全”一所載：明治2年1月25日，“箱館府軍任务已畢，奉命解散”。这里所說的“箱館府軍”是否就是上述的“新軍”不得而知，但以前所稱的新軍，并未提到解散，所以二者可能是一个东西。

(注二) “橫濱开港五十年史”上。

明治元年11月組織县軍一大队，在神奈川县厅內設內政总管，統轄軍務。县官称軍監，置本营于太田代官公所、为保衛港内外关卡及取締走私商人，日夜巡邏。当时县軍兵員总数为 511 名。

明治8年7月，县軍專門担任关卡及卡外巡邏事宜。

4年1月，奉太政官令，本港防衛，由六浦藩兵調来半大队担任；8月，廢除县軍，同时并解散藩警衛軍。嗣后，置一、二、三等取締員，担任警衛。

“神奈川史料”政治部分。

案奉行政官布告內开：此次关于兵制已制定章程，禁止各府县組織軍隊，以前所編軍隊，应由各該府县設法处置，仰即查明兵士員額具报等因。查本县与他县不同，有外侨寄居，需特別警衛，正如以前呈报在案，陸續进行征募，并承貴处派来軍監以下各职，茲将当时名額查明，特具名册一分。此呈

軍務官判事

己4月(明治2年) 神奈川县判事)

神奈川县軍名額表

一、511 名

內計：

40 名 英國式 9 小队。包括各职在內

43名 大炮隊 包括各職在內  
45名 樂隊 包括教官以及各職  
13名 軍監及所屬各職

另有：

軍監 渡邊平之助  
教官 實際是大隊長 渡邊藤太  
教官 西村保太郎

以上系去年8月27日由軍務官派來

明治2年4月(1869)

(注三) “法規分類大全”兵制門一，軍務官對久美濱、笠松兩縣的指示(2年5月)。

附件所列各員，根據本人請求，准其退伍，為照顧生活，各賞金2百兩，分別遣返原籍(下略)，缺少附件，但有2年1月10日軍務官給會計官的通知書，內開：“關於遣送流浪者歸籍一案，前已通知在案，茲有平松家丹陽隊隊員71名申請回籍”(下略)。同月24日軍務官通知京都府，前往城州四條通猪熊西者和泉榮助之子(其他從略)，“上列人等數年以來，有志勤王，曾寄居平松家，稱為丹陽隊。此次附件所載流浪者全體申請回籍”(下略)。對久美濱縣(京都府)、笠松縣等的通知也是一樣。內有“農民嘉六之子”，“雜貨商弥七之子”等名。

(注四) 例如下列史料。

民部省呈文 明治4年5月(1871)

“關於宮谷縣(千葉縣木更津地區)所請一案，遵囑再次調查，得悉該地三面臨海，出沒極為便利，該縣深恐流浪之徒，潛入其中，釀成大患，擬請准予組織軍隊等因。查此項請求，固屬不無理由，惟既有布告在先，且地處東京以南，舟行便利，出兵增援，亦極便捷，所請組織軍隊，應勿庸議。但查目前實際情況尚不穩定，擬據該縣所請，暫由附近藩內選派‘捕亡’15名，責令認真取締，似不致發生意外暴動。已抄附尊處指令稿示復如另件。此呈

大政官

民部省

辛未5月14日

附尊處指令稿

指令：組織軍隊一事，著勿庸議。管內既有不逞之徒潛入作亂情形，暫由鄰近藩內選派‘捕亡’15名，前往認真搜捕，一俟取締告一段落，應速免職，並將情形具報。

‘捕亡’薪俸，應按幕外四等官俸發給，其他待遇，亦准此辦理。”

## 第二节 各藩兵制的整理和統一

### I

这时，东北和越后地方的内乱，总算以天皇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东征的各藩军队就要凯旋，因此结合着整理和缩减各藩军队与创建中央政府军队这个基本问题来处理夸耀功勋的各军，也就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了。对此，兵库县知事，原任长州诸队的一个队长伊藤博文首先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会津城攻陷后不久的明治元年(1868年)10月17日，他向政府提出“关于处理北地凯旋军队之对策”，其要旨如下：

现在对于北伐军队，必须论功行赏。对此显然有人要提出封疆裂土的意見，这种办法不妥。“自今以后，如欲施行文明之政教，而与五洲各国并驾齐驱，即不能以世祿之制建立国政，此人所共知者也。”也有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天皇一声令下，諸侯之兵，必立即应从。然而，“朝廷兵权，有名无实，是故朝廷之力尚微，力微則不能御下”。如果朝廷沒有实力，不管怎样高唱王土王臣，对于拥有实力者說来，“朝廷只有唯唯諾諾而已”。所以，“应趁此机将东北凯旋之兵改編为朝廷之常备军，对总督、監軍、參謀以下各职，皆賜予适当爵位，使其統带士兵，对于士兵，亦皆授与軍銜，使各得其所，并尽量參照欧洲各国兵制，以从新改革我国兵制，由朝廷亲自統帅，(中略)对内可以鎮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万国”——(“法規大全”兵制一，“春亩公文录”)。

这位創建天皇国家的官僚领导人确已深知旧封建兵制的脆弱性，只靠天皇权威这种空言是无济于事的。他根据这种認識，提出了把北伐军队收归朝廷掌握的方案。但是，为使这一提案不致落为空論而能具有某些现实性，需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实际掌握着东征各藩军队的統率权者，一方面固然是屬於各藩的藩士，但另一方面却又超越出藩的范围以外。正如伊藤博文本入一方面是长州藩士，而另一方面又是超越了藩的中央政府的官僚(而且后一种

的性質日益增強)，所有各藩軍隊的指揮者“總督、監軍、參謀以下各職”，既是藩兵的指揮者，又是中央政府的臨時武官。因為這樣，所以才想對於他們“賜與適當爵位”，改為正規武官，以便將其指揮下的軍隊變成中央政府的軍隊。

總之，各諸侯已經喪失統率自己軍隊的力量，而革命的人民軍隊還不能出現，即便稍有萌芽，便被鏟除，這是歷史的現實。伊藤的提案，只有以這種歷史情況為前提才能成立。實際建立朝廷常備軍的過程，並沒有象伊藤建議中說的那樣順利。不過，朝廷常備軍所以能夠建立起來的基本歷史條件以及當局的構想，却同伊藤的建議一致。這一點，從以下的敘述便可了然。

身居政府軍務中樞（軍務官副知事）的大村益次郎，早就抱有同伊藤博文一樣的想法，他說：“兵乃刑之大者”，“治國之要器”，兵權若歸幾個人掌握的話，中央政府就要陷於危地，使“兵權歸一，實當務之急”，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馬上取消各藩兵力，所以莫若先建立朝廷的“親兵”。而“方今奧羽地方即將平定，所有參戰軍隊尚未解散，恰是時機”。一旦逸失此機，各藩兵“各歸故土，勢將釀成尾大不掉之患”。因此，應立即精選各路士兵，“編成不分藩籍之親兵，作為常備軍<sup>①</sup>”。

然而，當時的政府，既沒有維持這種“親兵”常備軍的財力，又沒有責令各藩上繳這項經費的實力。大村益次郎也曾同參與木戶孝允計議，“分全國收入為五分，以其三分充作海陸軍費，另靠募集公債籌措海軍經費，如能制定適當法令，當大有成就<sup>②</sup>”。議定岩倉具視也說：“每年應以1百萬石1百萬金”充作軍費<sup>③</sup>，不過，這顯然是辦不到的。從前每1萬石出“征兵”3人，都未能辦到，如前所述，各藩中有的“只湊足人數，敷衍塞責”“可惡已極”，如紀州藩提供的兵士，患病的竟占三成（注五）。大約由於這種原故，於1869

① 村田峰次郎著“大村益次郎先生傳”。這個建議書上沒有日期，根據文意推測，顯然是寫在奧羽地方平定以前。

② 木戶孝允日記（大日本史籍協會版本），明治元年11月6日。

③ “岩倉公實紀”中卷。

年2月，認為“东北既已平定，在兵制确定以前，尚須討論研究”，通令所征兵士“归休”，而另由肥后等22个大藩从新征兵来代替<sup>①</sup>。这意味着企圖在东征军队归藩以前，利用它来組織中央兵力的計劃已告失敗。

奥羽地方各藩虽然已經平定，而亟館尚有以前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和陸軍將領大島圭介等建立“虾夷島共和国”进行割据，因此，各藩拥有实力者开始对中央政府抱有反感。1869年1月，参与横井小楠被反动士族暗杀，这些暗杀分子正是代表打倒幕府派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起来参加打倒幕府的下級武士階層的作为武上的一面。他們因为憤恨幕府不能攘夷而支持了打倒幕府派，但現在新政府却比幕府更加和“夷狄”友好，接受“夷狄之風”，对此，他們感到激憤。这在客觀上也就是反映出，在資本主义和各种近代关系日日發展、封建武士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沒落下去的情况下，注定要遭受最大牺牲的封建武士階級的下層的不滿情緒。作为这种士族階級代表人物的西乡隆盛，不論他主观上怎样想，确是对新政府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敌对堡壘。

大村益次郎等担心一旦遣返东征军队，势将釀成大患，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改編东征军队为亲兵的計劃失敗之后，木戶、大村等所想出的整理藩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它来进行对外擴張，侵略朝鮮。1868年12月14日，木戶向岩倉建議說：“願遣使朝鮮，責其无礼，如不服时，則兴問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如斯則天下陋習可立即一变，将目标移向海外，則百艺技术等将稳步發展，举凡两眼向內，揭人之短，攻人之非，而不反躬自省之弊，可一扫而清之矣<sup>②</sup>”。次年1月初，木戶又寄給大村益次郎一封長信，建議为了削弱各藩实力，增强朝廷力量，应即征服朝鮮。木戶的这种意見逐漸打动了整个政府<sup>③</sup>，但是，这决非当1868年内乱时

① “法令全書”明治2年2月10日。山县有明監修“陸軍省沿革史”（明治28年陸軍省刊行，“明治文化全集”第二三卷）。

② 木戶孝允日記。明治元年12月14日，同2年1月1日。木戶孝允文書第三。

③ 关于“征韓論”的全貌，請參閱本書“日本軍国主义”下冊第一篇。

連軍費都籌不出来的新政府和各藩所能办得到的。然而，天皇制剛成立不久便开始策划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一点，对于认识天皇政权和它所要建立的军队的性质，是不应该忽略的。

## 2

这样，新政府越是痛感到有必要“统一兵权”，实现这种统一就越发困难。因为兵权的统一，要以政权的统一和削弱各藩的权力为前提，而政权的统一，又需要中央拥有足以强制各藩执行中央命令的实力即兵力。这个矛盾将从哪一方面和如何来克服呢？天皇政权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由于夺取了以前幕府及反对派各藩的大部领土，因而打下了坚实的领土基础。全国的一切经济中心，都归天皇政府掌握了。此外，新政府还利用“民间”的富农、巨商即地主和商人阶层和拉拢三井等大商业资产阶级，尽力扫除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全国的障碍。这样，一方面为中央政府实行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使得各藩的地方割据越发困难起来。（这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不必管它。）同时，中央政府为了把各藩及“民间”的知识分子、优秀人才——他们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进展得到利益的阶级的知识分子——拉拢到自己的周围，或使他们协助自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就是当时所谓根据“公议舆论”的政治的实质<sup>①</sup>。这样一来，就使诸侯和它周围的原来的封建上层分子同掌握藩的实权的势力分裂开了。其结果，前者陷于孤立，后者被中央政府吸收去了。

新政府就是这样逐渐加强了它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1869年6月，迫使盘踞在函馆的榎本军投降以后，接着就顺利地实现了“版籍奉还”即废除诸侯对土地、人民的领有权。这是由萨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长州出身的木户孝充、土佐出身的板垣退助以及肥前出身的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即构成打倒幕府的主力的4藩出

<sup>①</sup> 关于这项具体事实，请参阅拙著“明治维新”（日本现代史第一卷）。

身的官僚巨头，以各該藩的开明分子为背景向藩主施加压力的結果而實現的。

6月17日，即“版籍奉还”的一周以后，政府指令藩知事实行几項“諸务变革”。根据这次改革，把旧藩的实际收入的十分之一定为“知事家祿”，作为諸侯的个人收入，把知事的家計和藩的財政完全分开。諸侯和公卿一律改称为华族，家臣中普通武士以上的階層一律改称为士族（步卒以下的階層則称为“卒”）。这不仅是改变了身分和族称，而是意味着廢除了以往的君臣关系。7月，中央政府实行大規模机构改革，仿照古代律令的官制，設置神祇官和太政官二官，在太政官內設置宮內、大藏（財政）、民部、兵部、刑部、外务六省和彈正台（監察部）及大学校。同时，关于地方制度，也把以往的政府直轄地府县和藩的行政組織大綱加以統一。藩內的家老及其他世襲制度已不复存在，不拘出身如何，專从人才中选拔出来大参事、小参事这样官僚来輔佐知事执行藩政。

由于“版籍奉还”和繼此实行的各种改革也就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解体，才使兵制改革和中央集权前进了一步。版籍奉还后不久，政府首脑便就兵制进行了討論，据說这次大論战进行了好几天，但究竟誰和誰抱有怎样的意見，以及發生了怎样的意見的对立紛歧等等，一概不詳。

在大久保利通日記的6月21日条內写道：“本日关于兵制一事，召来大村（軍务官副知事益次郎）逐項进行审議，并就征集長州、土佐、薩摩三藩精兵事展开辯論”。23日条內写道：“大（村）、井（吉井友实前軍务官判事）出席，进行种种討論，已决定征集三藩軍隊；兵制之制定甚为困难”。次日24日条內写道：“关于軍事制度一事，發生極大爭論”；大久保本身也“毅然有所建議”。25日条內还写道：“本日关于兵制又有所討論，軍务官拟議不用藩兵，另募农兵，以充亲兵，此种作法，令人殊不放心，当即提議召集知名之士，进行討論，听取其意見，这一提議被通过”。

在木戶孝允日記中6月23日条內写道：“本日討論兵制及朝鮮問題，反对余平素所持意見者甚多，余曾極力辯論，虽病弱亦不得

不振奋也”。24日条内只記有：“本日復討論兵制，虽与我見不同，但事关皇国前途，大有非成功不可者。退朝归途，往訪大村，研究目前局势，討論将来計劃”。前此6月13日，木戶在寄給大村信中写道：“逐一討論法国式陆軍利弊，各方均踊跃發言，并列举将来之得失，喋喋不休，弟实无力逐一应付，且其議論亦多从全局出發，亟願面聆高見”。木戶日記7月10日条内还記有：訪問大村“論及将来軍务上之要着及匡救时弊之策，彼亦表示同感”。

根据这些史料推测，这个兵制會議，至少討論了3个問題。第一、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央政府的軍隊要由当时的藩兵来編成呢，还是不依靠藩，另行征集“农民”即平民来編成的問題。第二、政府和各藩的軍隊的装备、編制、訓練等等要按照法国式或者其他方式来統一呢，还是保持原样不动的問題。第三、暫且調来長州、薩摩、土佐三藩軍隊作为中央兵力使其直屬中央的問題。这一問題可能結合第一問題进行了深入的討論，可能还討論了这三藩是否适当，只此三藩是否足够，是否还要加上其他藩兵等問題。此外，还可能討論了一些人事問題、

我想，以上三个問題互相都有所关联，意見的根本对立在于是否利用藩的势力来巩固中央这一点。而这种意見的对立，也是和对各藩动向估計的不同，以及对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和暴动(注六)所采取的对策的不同分不开的。木戶孝允和大村益次郎基本上抱有同样意見，关于兵制的基本方針是，不依靠藩兵而靠“农兵”——“国民征兵”来建立中央武力。这一点，是根据以上引証的大久保日記中所說的軍务官主張农兵，木戶的日記和書信、文件中也載有他和大村意見基本相同等推想出来的。这也可能是他們从打倒幕府的斗争的体驗中得到的結論。

他們——至少大村是从这种立場出發，不贊成用三藩兵力来保衛中央。因为在此以前的4月上旬<sup>①</sup>，政府曾决定指令薩、長、

<sup>①</sup> 見于大久保4月14日和4月26日寄給岩倉的信，以及大久保4月28日寄給薩藩土田尻务的信中，“大久保利通文書”第三。



土、肥四藩各派兵一大队来“保衛东京”，但是，“軍务官認為已无此必要”，竟不向各藩發布命令，参与大久保利通对此表示憤慨，要求岩倉具視議定(类似副首相)执行政府的决定，但是終未实行<sup>①</sup>。这个“軍务官”，只能是大村軍务官。木戶是否和他意見一致，固无确鑿証据，但从他一貫的立場来推測，可能是意見一致。木戶在6月13日寄給大村的信中写道：“其实真能担負屏藩之任者并无一人。每一出兵，則要求軍餉，如不發給則滿腹牢騷”。而在7月10日寄給大村的信中，慨嘆自己主張的征韓論不得实现，深恐这样下去，“朝廷大权逐漸下移”，“今日天下之事，徒因上下权力問題而敗坏，必須由在上者掌握权力，形成均衡之势，对阻撓者，应立即一刀两断”。所謂“阻撓均衡之势”者，系指盘据藩內的心怀不平的武士。他特別不信任西乡和他所控制的薩藩。根据这些情形可以推想，他是不贊成調来薩、長、土三藩的兵作为中央的武力的。

最后关于軍隊制度問題，大村打算按照法国式来訓練中央政府軍隊，并依此統一各藩的軍隊制度——主要是因为从技术条件看来，以往幕府的陸軍是法国式，而諳習法国式的比較別国式的为多。

首先反对木戶、大村等人主張的一定是大久保，岩倉具視也可能支持了大久保。在大久保以建立“庙堂根基”和确立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当务之急这一点上，和木戶等是完全一致的。大久保和木戶意見分歧之点在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久保主張在当时應該同藩的势力进行妥协，并加以利用；而木戶則主張把反对派的士族調去侵略朝鮮，利用政府直轄領地的民众力量来充做政府的武力。在版籍奉还后立即开始的关于兵制的爭論經過一年多以后的1870年8月，木戶在寄給岩倉和三條太政大臣的意見書(8月16日、8月20日)中写道：“朝廷以八百万石而实行自立，暫使各藩保持現狀，对于府县大力进行改革，使全国人民摆脱封建束縛，各自取得自由权利，則朝廷政权自能达到完全自立。尔时，

---

<sup>①</sup> 見前注。

各藩亦不能墨守旧習，勢將附和于朝廷”。这就是說，木戶認為当前威胁政府的主要敌人是反对派的士族，因此企圖扶植人民的力量，并利用它来巩固專制主义的政权。在上述 1869 年关于兵制展开爭論的当时，木戶似乎还没有明确地認識到这一点，但是，他企圖依靠“农兵”及反对利用藩兵的主張，归根結蒂还是根据这种想法而来的。大久保和他相反，在他 1869 年春寄給岩倉的信中写道：反动上族等“謬論紛紛，不足挂怀，固不能为其所动摇，但近察民情，实不胜痛心之至”（“大久保文書”第三）。因此，他認為軍务官打算把这种人民編为軍隊，是“極不可靠”的，莫若利用士族的力量，倒是可靠。

总之，木戶也罢、大久保也罢，都是打算利用封建势力和近代势力的斗争来建立天皇制自己的軍隊，这种軍隊，才是地道的專制主义的軍隊。虽然两人走的是一个方向，但对当时情况的判断各自不同，因而發生了所謂漸进和急进的对立。經過数日激烈爭論之后，大久保派的主張暂时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說，暫不实行征集农兵，先由薩、長、土三藩的軍隊中抽調一部分充作中央的警备队（并由肥前藩兵也抽調一大队）。此时，藩和中央的軍隊并没有統一起来，只是，如下所述，以达到这种統一为目标，制定了培养軍官的計劃。

在 7 月实行官制改革，將軍务官改为兵部省的同时，大村由軍务官副知事轉任兵部大輔，仍然居于新政府軍政軍令系統中的机要职位。这时他提出“兵部省前景规划”，其要点是：（一）以将来統一日本全国軍隊为目标，首先設置陆海軍士官学校，培养軍官，暂时按照法国式。（二）各藩兵力，按每万石出 1 百名的比例，以其中 50 名担任藩內的警备，下余 50 名“駐防其他地方”，虽然是藩軍，其大队长以上的軍官，由中央政府授与适当軍銜。（三）警衛三都和边防，按每 1 万石出 50 名的比例（即上述每万石 1 百名的半数），并根据一定办法，由各藩輪流担任。（四）为保証此項方案得以切实执行，編制兵部省的岁出預算。

这个建議，除了有关处理藩兵的部分以外的各項，似乎都被采納了。8 月，在京都河东建立法国式的操練傳習所，共有長州、各

前两藩武士1百名入所受訓。接着在9月，又在大阪設置兵部省的兵学寮，把京都的兵学所移到这里，到年末，在大阪兵学寮內成立青年舍。此外，还决定扩充兵部省的机构，在宇治建立火藥制造厂，在大阪建立兵工厂。

当时为什么要把陆軍的各种設施都集中在大阪呢？据“陆軍省沿革史”所載，“盖大阪一地为海陆四通八达之要冲，位于皇国中央，易于应付各方之变故也”。这里所說的“各方之变”，并非指外国对日本的进攻，而是指国内各方之变，亦即反对政府的叛乱。当时計劃建立的軍队并非国防軍，从其称作“亲兵”即可想見，乃是对付国内反对派来保衛天皇和天皇政府的軍队。从陆軍的历史看来，認為同外国作战的是軍队，而鎮压国内叛乱或者人民的小規模反抗的不是軍队而是警察的那种說法，是毫无价值的。再者，同是为了防备反政府的斗争，为什么天皇政府各机关全設在东京，而单独把陆軍中心設在大阪呢？据曾在大村手下担任兵部大丞的曾我祐准的回忆，这是因为大村認為，东北各藩已无反抗能力，将来可能反抗政府的主力，要在近畿以西(特别是薩摩)，这恐怕是事实。(曾我祐准自傳)

正如大村对薩摩等反动士族存有戒心一样，反动士族也憎恶大村。以前他們杀害了横井小楠，現在他們又想謀害大村，大村早已覺察到。7月，他由东京出發，前往京都、大阪視察軍事設施，木戶等人担心大村身边的安全，囑咐京都府权大參事(長州人)保护大村，并提醒大村本人說：“薩摩出身的刑法官中，内心反对軍务官者不少<sup>①</sup>”。果然不出所料，9月4日，大村在京都旅舍遭到長州、秋田的反动士族和旧越后居之队队员的襲击，身負重伤，到11月5日終于死去。

### 3

大村被刺后，兵部省陷入异常混乱，兵部大丞船越衛(旧广島

<sup>①</sup> 7月27日，木戶寄給京都府权大參事横村正直的信，8月5日，木戶寄給大村的信(“木戶孝尤文書”第三、大村益次郎先生傳記刊行会編“大村益次郎”)。

藩士)和山田显义(旧長州藩士)在木戶孝允等長州出身的參議支持下,拼命来实现大村的遺志(注七)。然而,同是兵部大丞的黑田清隆(旧薩摩藩士)等薩摩派,对此抱有强烈的派閥意識,不滿意兵部省把主要力量放在陸軍方面,而主張应先兴建海軍。兵部省以外的保守反对派也大肆攻击。基本上由薩摩反动士族控制的彈正台——类似后来內务省的警保局同檢事局合而为一的机关——故意拖延逮捕和处理暗杀大村的犯人,甚至主張赦免犯人,同时还肆意攻击兵部省措施无力,淨想依靠藩的势力。这时前原一誠(旧長州藩士),就任兵部大輔(12月),但是关于兵制和軍事問題,他的能力远远不如他的前任大村。他也認為建設海軍比建設陸軍重要,在这点上,他和薩摩派是一致的,但他对薩摩派也抱有派別对立意識,而在長州派內,因为是个保守分子,所以同木戶、井上等人也不一致<sup>①</sup>,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兵部省內的紛歧。而以船越、山田为中心的大村的門徒們,却在木戶等人支持下,積極努力来实现大村所遺留的計劃。

这时,藩制的腐敗已使旧藩制难以維持下去了。例如,封建色彩極为濃厚的貢士对策所的后身“會議所”1869年5月的議案中便有这样一項:“一向居于武士之列而不胜武上之任者,应按其身分賜与轉業津貼,准許其从事农工商”,对此,竟有包括最大的紀伊、加賀等四十多藩表示贊同(“公議所日志”,“明治文化全集”宪政篇)。可見藩本身已承認“不胜武士之任者”甚多,如不散,已难以維持藩制。实际上,在这以前的2月,紀州藩(和歌山)因疲弊已極,覺得“別无他法”,已由藩主本身不得不以“領地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作为“生活費”<sup>②</sup>,并以此为口实,把藩內武士俸祿減为十分

① 參看渡边几治郎著“人物近代日本軍事史”。

② 根据版籍奉还后中央政府的指令,藩知事的家祿定为領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上述紀州藩比起這項規定似乎削減得太多了,不过,这对于藩主并不算很大的打击,因为藩主的个人收入,向来只是領地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下余部分要充作藩內武士的俸祿和藩政的各项开支。所以,以藩主的“生活費”減为二十分之一为理由,而把一般藩內武士的俸祿也減为二十分之一这样做,乍一看来,似乎公平,但实际上是害苦了藩內武士。另外,俸祿在24石以下的并未削減。

之一(“南紀德川史”第四册)。

据井上馨說，1870年3月的山口藩如果象当时那样养1万5千名军队的話，就連30天的連續战斗都坚持不了，即使“养其三分之一”，亦“須停發所有世祿，否則无法支应”。于是，井上甚至提出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暫定常备軍为3千名，先令軍官进行学习，无用者改为庶人，沒收佩刀”云云（“世外井上公傳”一）。这时已經不是什么整理藩上的問題了，上野的古井藩和泉的狭山藩，因无法維持藩制，竟于1869年12月申請廢藩。次年1870年7月，南部的盛岡藩，10月，越后的長岡藩也先后申請廢藩。这两个藩本是大藩，但因戊辰內乱时被打敗，藩祿遭到削減，終于沒能恢复过来。次年，又有多度津、丸龟、龙岡、大沟、津和野等藩也申請廢藩。这样藩主（知事）在政府的保証下可以得到旧藩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祿，因而既得到比以前反倒稳定的私有财产的收入，又解除了对藩政的一切責任和义务，并且还可以保持貴族的身分，享受优待，所以他們受不到任何損失，只是成为士族的旧时家臣吃了苦头（不过，政府也保証他們可以取得以前俸祿的几成）。由此可見，由于大势所趋，“藩”的腐朽制度已經逐漸无法維持下去了（太政官日記）。整理藩制、縮減藩兵、統一和整理兵制所以成为可能和必然之势，与其說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大，勿宁說是由于各藩的脆弱。构成打倒幕府的主力并拥有大量军队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安艺(广島)等藩以及其余各藩，从1869年年末到1870年，也都不得不开始削減兵力，解散或改編部队。政府利用这种形势，在1870年(明治3年)2月，認為“兵制必須全国統一，固不待言”，开始整理和統一各藩的兵制，并公布了各藩的“常备队条例”。条例規定：(一)兵士年齡限18—37岁；(二)步兵以60名为1小队，炮兵以炮6門为1队；(三)軍隊內部的規章制度可以按照以往的習慣；(四)兵員名額为每1万石出1个小队；(五)达不到此項比例时，“除非士族、卒族，亦不准新征兵士”，借此来預防兵力增加(法令全書)。从前凡具有武士身分的人，原則上都是士兵，这样一来，由于年齡的限制，身分和职能便开始分裂。到了4月，政府制定大

阪兵学寮陸軍學舍規則”，分为青年、幼年两个学舍，通令各藩“不分士族和庶人”，按照藩的收入派送学生（法令全書）。这和京都兵学校不准平民入学就有所不同了。同月，外务卿委托法国公使翰旋聘請軍官（“法規大全”兵制門第一），閏10月，应聘軍官同兵部省签定为期三年的任用合同<sup>①</sup>。这和以前幕府招聘法国将校团不同，并无政治意义，是純粹技术性的。

同年8月，長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前奇兵队总督，从1869年3月出国）同薩摩出身的西乡从道赴欧美各国考察了兵制和軍事以后一道归国。山县有朋就任兵部少輔，西乡从道就任大丞。兵部大輔前原本就不滿意政府的方針，并同薩派也不和，曾再三提出辞呈，終于9月得到批准；从此，兵部省的实权便落到山县有朋手中。他和薩派的西乡很相投，并以实现举国皆兵的征兵制为将来軍制的基本方針，在这一点上，同大村系也取得一致，于是，兵部省內的混乱得到解决，兵制改革工作这才开始进展。

在山县等就任后不久的9月10日，政府下令改革藩政，規定以当时的租稅額作为藩的收入額，将其中1成做为知事的家祿，1成充作陆海軍經費（其中一半作为海軍經費上繳政府），下余則充作一般行政費和士族、卒族的俸祿（法令全書）。配合这次藩制改革，在兵制方面，于9月29日規定各藩常备兵員按現有收入每1万石米为60名（1小队）。这比2月間的藩收入每1万石1小队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另外，以現有租稅30万石和各藩上繳的海軍經費作为兵部省的定額經費。这30万石的預算，只是把从前未經明确規定的

① 合同載在大日本史籍协会出版的“川胜家文書”中，是由法国教官普塞同兵部省代表船越兵部权大丞之間訂的任用合同。合同規定：普塞从1870年12月（明治3年閏10月）在日本政府服务3年（第一条），月薪定为墨西哥銀元250圓（第二条）；顺利完成服务时，支給退職金1千2百圓（附則），赴任准备費4百元，期滿后由日本政府支給归国旅費7百元（第五条、第八条）；普塞在勤务中，服从日本兵学寮首長的指示（第三条）；兵部省在期滿前廢除本合同时，只要普塞沒有重大过失，将支給相当于服务期間的月薪、退職金和旅費，如果普塞有过失，則不支給（第九条）；此外，在合同上还規定普塞同日本政府間發生爭執时，“由双方选定之法官裁判”（第十条），其他有关待遇細节从略。当时，一墨西哥銀元合日本幣1圓，所以，普塞的月薪相当于各當的大輔或少輔。

实际数额明确规定下来的数字，每石按 8 两折合，接近于由明治 2 年 10 月至次年 9 月的经常岁入 1 百万日圆的四分之一。当时中央政府的军队微不足道，而兵士薪餉又很低微，由此便可想见政府该是如何大力地在搞军事设施了。

更在 10 月 2 日，政府命令各藩统一军队制度，“海軍仿照英国，陆军仿照法国（注八）”，“这是一直想做而始终未能做到的。实际上，各藩的军队制度也并没有因为这一纸命令就统一起来，这只是表示政府已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对各藩兵制的整理和统一，同时也是后来统一改编各藩军队为脱离藩的中央政府军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性的前提条件。接着在閏 10 月 20 日，修改了大阪兵学寮学生名额的分配。11 月，在制定下节叙述的国民征兵法的同时，还制定了各藩的“常备兵编成法”，以大队为分界线，凡少校（大队长），大尉（中队长），少尉（小队长）各级军官，暂时由各藩委派，但少校的任命必须经政府批准，大尉以下则在任命后报请政府备案。同时，各藩军队的服装也都统一了。这时，对于枪械等项还没有能够统一，不过，兵制的整理和统一工作确已进入具体实行的阶段了。

### 附：关于海軍

中央政府为了拥有自己的陆军，削减和整理各藩的兵力，曾遇到一些困难问题，但是，在海軍上面，则几乎没有发生这类问题。在幕府时代，也基本上是幕府的艦队占绝对优势，各藩如薩摩、肥前等藩，只不过有两三只炮艦、帆船巡洋艦，各藩在财政方面几乎没有力量扩充艦队。因此，只要新政府把幕府的軍艦接收过来，就足以压倒各藩的海軍。这一接收是在江戶幕府开城投降后进行的。当时，榎本武揚等人反对交出軍艦，曾率领幕府最好的軍艦 4 艘和运输艦 4 只逃到北海道，但在 1869 年 5 月，榎本的艦队也投降了。各藩自己保有一、二艘乃至数艘炮艦，只能给藩添些累赘，并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軍艦对于统治領内人民并无用处，也谈不到用它防御外国侵犯領海。由于这种原故，薩摩、長州、肥前等藩都把保

有的一部分軍艦“獻給”了新政府(1870年)。

有了軍艦并不等于有了海軍,可是,新政府在接收幕府和各藩軍艦的同时,所有軍官和水兵几乎全都随着軍艦一起接收过来了。只是这些,还不能够編成将来所需要的海軍軍官和水兵。1869年7月,在兵部省成立的同时,就把东京筑地的原广島藩邸改为海軍操練所,令薩摩、長州、肥前、筑前(福岡)等26个藩选派“海軍志願者”(按大藩5名,中藩4名,小藩3名的比例)。实际开始訓練是从同年11月末,訓練是按照英国方式,教官是由旧幕府的各艦長担任。次年1870年3月,扩建了从幕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横須賀造船厂,并在那里附設技术学校,教授造船技术。同年9月,首次聘用英国海軍軍官,开始接受炮术訓練。

从日本对外防衛的角度看来,由于地理条件,在軍备上应该首先建設海軍,这是“三尺童子皆知”的(史料后述)。但对天皇政府說来,对外保衛国土,更不必提全国国民参加防衛,都不是当前的迫切問題,而首先如何建立起“亲兵”即常备陆軍以保护政府不被反对派推倒,却是最关心的問題。不过,前原一誠任兵部大輔以后,想把重点放在海軍的建設上,当时兵部省的預算規定陆軍經費为12万石,海軍經費为10万石,前原却将陆海軍經費各改为15万两,并于1870年5月,向太政官提出建立强大海軍的建議。

前原建議的內容是,軍艦大小2百艘(其中蒸汽厚鉄甲艦50艘),外加蒸汽、运输帆船20只,常备人員2万5千名(其中軍官以上2千名、軍士3千名、水手1万5千名、水兵5千名、火夫2千3百名、各种技工等2千3百名),計劃用20年的時間来建成这个强大的海軍。分二十年为三期,每期七年。所需經費,第一期头两年撥款3百万两,第二个两年撥款5百万两,下余3年撥款7百万两。如折合石数,每年平均約为150万石,相当于全国(包括藩在內)岁入1千2百万石的八分之一;据前原說,这种經費的比率比起英国以岁入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用于海軍,还不算多(帝国海軍史料)。

据大久保利通日記,大臣、參議等曾为这个建議开过多次会



議，但會議內容不詳。建議書中，曾就英國海軍經費在歲入中所占比例和日本海軍建設費在日本全國政府和藩的歲入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作了比較，但是，這種比較犯了極其可笑的錯誤，因為他沒考慮到英國並沒有象日本那樣每年耗去大部分生產價值、除壓迫人民以外不起任何作用的士族。單憑這種荒謬的夸大妄想，是不可能建立起海軍的。同時，前原所以幻想要建設大海軍，並不是從保衛祖國或全民防衛這種進步思想出發的，他的動機是封建的攘夷排外主義，從這種立場出發來為建設海軍出力，這在政治上就意味着妨礙中央政府建立陸軍，充實武力，來控制各藩，進而撤銷各藩，實行統一。從這一點上說，他也是支持反動士族的。

因為這樣，這個建議雖然用兵部省的名義提出的，但是，船越大丞在6月14日寄給山田大丞的信中，對馬上擴充海軍表示反對。他說：“從我全國地形論之，目前確應以建設海軍為當務之急，此雖三尺童子亦知之。但國內陸軍如不統一，萬一國內發生不軌之徒，將無以防范。如欲以不足之經費完成建設海陸兩軍之大業，是猶緣木求魚耳。是故莫若先專力於陸軍，逐一解決，果能建成陸軍，尚可防備國內，此系已故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之一貫主張，想吾兄亦有同感。惟世人不察，每稱今日不興海軍，則皇國即無以自保，此說實難接受”（由前引“人物近代日本軍事史”中引用）。

由於這種原故，迅速建設海軍一事，無論是從政治上、經濟上或者技術上一時都還談不到，建軍的主要力量還是投到陸軍方面。那年（1870年）閏10月，在兵部省內設置陸軍司和海軍司，邁出了後來陸海兩軍分別設部的第一步。這說明當時有關海軍的事務已有所增加，需要分別處理了。

（注五）南紀德川史 第十三冊。

明治元年8月20日，送交按藩收入比率所征兵員，征兵額145名。

其中29名因病遣回原籍，本日只能交上116名，而此中又有10名突然患病云云。

閏4月20日已發出命令，直到8月20日還發生這種情形，可見各藩對於提供兵員並不能算熱心。

（注六）在戊辰內亂中，天皇政府軍所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農民和商人到處蜂起，反對藩主。因為這種起義大都發生在擁護幕府的各藩，自然對天皇政

府軍有利，天皇政府軍也向人民进行煽动宣傳，有的老百姓竟信以为真而支持了天皇政府軍(本書第一篇)。

內亂平息后，民众并未从新政府得到任何东西，于是又重新掀起大规模的暴动。会津攻陷后不久，在旧会津藩領地内曾掀起激烈的“要求变革的斗争”，但这已不再对天皇政府有利，而具有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倾向。至于早就成为新政府直轄領地的地方(旧幕府的直轄領地)以及从一开始就支持新政府的各藩内發生的暴动，性質上显然是受了天皇政府欺騙的民众起而反抗新政府的斗争。尤其是政府为了筹措战費，濫發不兌換紙幣太政官票，鑄造2錢金幣和1錢銀幣的僞幣和劣幣，强制通用，使城市居民以及卷入到貨幣經濟的广大农民和农村居民都受到莫大損失(只有大商业高利貸資本勾結政府攫取了巨利)。人民既遭受战乱的痛苦，又受到这种掠夺，终于从1869年初掀起了大规模的暴动。仅据土屋乔雄著的“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所記載的，在明治2年中就有暴动、騷乱或要求变革的斗争41起。

其中著名的大事件有：1月初，越后信濃川流域一帶的大暴动(引起这次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民最初相信新政府在內乱时期宣布的减半或全部豁免土地稅，但結果是受到欺騙，因而激憤)；3月，飞騨高山的暴动(反对新政府知事梅村速水的暴政)；8月信州上田及信州飯田反对米价暴漲和劣幣流通的暴动；10月，越中新川郡的暴动；同月，伊勢三郡的暴动等。这些暴动是以貧农和农村的新生无产者为主力的，目的在于燒毀地亩册，把土地分給农民，以及实现由村民中选举村吏等等，已形成土地革命的萌芽。

在京都市內，虽然沒有發生暴动、騷乱，但是也有人为了反对强制通用太政官票竟然跑到大久保利通所住的旅館去貼标語等等，整个社会充滿了緊張的气氛。在同年春(月日不詳)，大久保利通寄給岩倉具視的意見書中写道：“試听近来申訴，不但无感謝王政復古之字样，甚至有申訴新政苛于幕府者，似此譟言喧器，虽以为不足介意而不为其所动摇，但观察近日民情，实令人痛心不已。尤其日前将有水患，民心之离叛，实难逆料”。在4月24日，还警告政府全体人員說：“自古大乱之后，安于无事，不察下民之苦，不以万民所非为非，欲遂其非而触怒天地，終至亡国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同样意思，还多次出現在同一时期木戶的信件中。

针对这种局势，大久保認為必須首先統一政府內部的意見，因而，产生了他对各藩的妥协方針。但是，木戶却与他相反，認為对待各藩应当强硬，而要紧的是应当对民众表示一定的讓步。

(注七) 木戶孝允文書 第三

明治2年10月17日，木戶寄給大村的信：

“兵部省当然暗中勉强支持船越，商討如何維持之策，彼亦甚感困窘，每日前来苦訴衷腸。总之，只彼一人尙在勉强支持，倘彼一旦去职，則万事俱休。但聞竟有恶人嫉妒船越，暗施种种奸計，进行阴谋活动，并由政府向兵部省提出击劍論等，实屬

荒謬絕倫，即此，可以想見一般”。

10月15日木戶寄給橫村正直的信：

“东京依然情勢不妙，政权大有隱然移归浪士之勢，所謂彈正台者，即彼等窩聚之处(中略)。長此以往，兵部省終將瓦解。必須設法使大村早日康復，并大力加以支援。前曾同大村等秘密計議，至少兵部省應養精蓄銳，以为他日之柱石。由于此次事件發生，大事活动、企圖摧毀原定方案者甚多。現正暗助船越勉強維持局面。海江田(信义彈正大忠，前薩摩藩士)乃大奸慝，亟應警惕，大村事件，亦有人認為系由彼唆使(中略)，据聞前曾屢次陰謀陷害大村，土人(土佐人)亦曾暗中示意防范”。

明治2年12月3日船越衛寄給山田显义的信(渡边义治郎著“人物近代日本軍事史”中引用)：

“兵部省中事務，自大村先生逝世以來，陷于停頓，一事未舉，朝廷深為焦慮，如不先得其人，則一切无从完成，朝廷切望兄台出山，特此奉懇(山田似乎畏懼黑田，而不敢出仕)(中略)。前日前原公(一誠)到省，窺問情况如何，見告虽不得上上，尚可取得中中，此言略慰愚怀”。

(注八) 各藩軍隊制度不一，如肥后為荷蘭式，土佐為荷蘭式，而紀伊則為普魯士式。紀伊曾擬聘用英國人，但未獲政府批准(2年2月7日)。于是，變更名目，申請為購自普魯士之槍枝製造子彈，擬聘用普魯士人，終于獲准，聘來普魯士人卡賓(2年11月)，担任教練至3年6月(“南紀德川史”第十三册)。長州的軍隊制度是法國式。當然，各藩都有一些沿革，譬如土佐起初是北条式，后来由薩摩軍隊學習英國式，有时或兼采荷蘭式，最后又改用法國式(“隈山論謀录”谷干城遺稿上)。我要順便說明：軍隊制度效仿哪个國并非重要問題，所有歐美各國的軍隊制度不論哪國只是小队、大队的編制法和服装、号令等略有差別，这在战术上或許成為問題，而对于我們研究的兵制史來說，是无关緊要的。

(注九) “法規分類大全”兵制門第一。

关于軍官及上級軍官一案，茲規定如下：

大隊長改稱為少校。

大隊長之選任法，以后當用明令規定，以前之大隊長，應暫由藩厅拔選，報請政府任命。

再者，中隊長“改稱為大尉”，“其選任法，以后當用明令規定，暫時仍按以前辦法，由藩選任報請政府備案”。軍上則經“少校選任報請藩厅備案”。“軍服之制法、鈕釦及帽章一併規定如附件所开，仰即遵照”。

### 第三节 廢藩置县和征兵法的制定

#### 1

“版籍奉还”以后，所有藩制的調整及藩軍的整編縮減，对于藩主或世襲武士說来，在被剝夺以往的权力这一点上，固然是个打击，但是在經濟上並沒有感到多大痛苦，而且身分也得到保障。可是，对下級士卒說来，情况完全不同，他們的名义和收入遭到剝夺或者削減，打击最为严重。只有薩摩藩情况不同，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实行了維護下級士卒利益的改革，收繳世襲武士的領地，作为藩的公有，分全藩为若干乡，各乡打破以往門第的限制，設置士族的“乡長”，把乡內士族都編为常备軍隊，由乡長指揮，行政、司法也都归軍隊掌管，甚至乡的統治机关也称为“軍务机关”，由于这种原故，这里并未發生下級士族反抗上級的事件。但是他們全体对于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权統一政策，却隱然或公然形成了一个敌国，构成了其他藩和其他地方被陷于穷困的士族群众反政府斗争的精神据点(參看“大西乡全集”第三卷)。

薩摩以外的各藩的士族群众，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反对政府对藩制和兵制的調整，而有所动摇不稳，这种动摇不稳已經反映在暗杀横井小楠和紧接着發生的刺杀大村益次郎的事件上面，不过，这种不稳情緒，最先爆發为最大規模的暴动，是在長州藩。

長州在 1869 年 12 月，解散奇兵队，游击队及其他过去的諸队，改編为第一至第四常备大队，隊長以下干部，以往是由各队自由推选，这次由藩厅从上面硬派下来，同时并将 40 岁以上和身体軟弱的兵員全部裁汰。他們是 1863 年以来長州藩革新派武力的主体，戊辰內乱时最有功績。这番仅發給每人退役津貼銀 30 两便无情地弃置不理，他們感到失业的不安而發生了动摇。尤其是戊辰內乱后的行賞厚上薄下，各隊長还有克扣兵餉的貪污行为，因此不滿情緒也就高漲起来(注十)。这时，攘夷主义者大乐源太郎等人便尽量利用这种不滿情緒，把它引向反对中央政府及追随中央政府

的藩厅完全采用洋式的兵制改革的斗争上面。

12月，諸队向藩厅提出三项要求，即反对解散多年的同志，反对偏重洋式的军队制度，反对由上级硬派军官，主张要由他们自己推荐。藩厅方面说什么为了不使队内同仁都陷于穷困，或者不久即将论功行赏等等进行抚慰，但諸队并不满意，次年1870年1月约有兵士2千名逃出山口集結在宮市，1月26日，由宮市进攻山口城，包围藩厅，断绝粮道，企图夺取藩厅政权。同时，藩内各地农民和市民因苦于物价昂贵也同情此举而掀起了暴动。不但如此，逃出的士兵还潜入邻近的石见国大封地方，并在那里也鼓动农民暴动起来。“叛军”以农民、市民占多数的游击队为主力，而諸队中最受优遇的奇兵队和振武队同高级武士组成的干城队构成藩军的主力。由此可见，这次“叛乱”虽然是由主张攘夷的反动士族所领导，但并不是纯粹反动的暴动，而是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藩厅借支藩的兵力，在当时恰巧回到藩里的木户孝允和闻警赶来的井上馨的指挥下，于2月11日大举进击山口，镇压了叛军（“修正长防回天史”第十二册）。

正在这次叛乱的高潮的1870年2月10日，西乡隆盛突然带着六、七名随从乘船来到中关，马上转赴下关。究竟为何而来，没有史料可查，而木户却深恐西乡为“叛军”和藩厅双方进行调停，曾劝西乡勿出此举。不管西乡意图如何，他的前来，一定会使大乐等人受到鼓励。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迹象说明西乡掌握下的萨摩藩正在策划某种反政府活动。

这年7月，西乡的得意弟子横山安武上书痛陈时弊十条，谏诤政府，并在太政官正院（内阁）前自杀。条陈的一开始便说：“以前幕府积弊，已无形传染新政”，“辅弼大臣上则谗诱朝廷，下则罔视人民疾苦，此其一也”。并叙述官吏骄奢淫佚，勾结商人营私舞弊；此外，还特别反对征韩计划（“明治政史”）。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对萨摩的疑惑。同年9月，萨摩又调回上年以来提供中央的两大队征兵，东京已无一名萨摩兵士，由此便发生了这样謠傳，“萨摩要大举兴兵改变朝廷”（“大久保利通日記”3年10月10

日)。

不仅薩摩藩，全九州的士族都充滿着反政府情緒，久留米、柳河、肥后、熊本藩等从 1869 年夏間就被看做是反政府陰謀的根据地<sup>①</sup>，中央政府甚至在考虑对它如何处分的問題。

这时(月日不詳)土佐藩也調回派駐中央的軍隊，領導土佐藩政的板垣退助、后藤象次郎等則与西乡相反，实行了比政府还急进的改革(以后詳述)，并預料掌握政权的薩、長两藩閥勢将分裂和进行斗争，企圖乘机提高本藩地位，糾合四国各藩代表，在琴平設置會議所，表示要割据一方。

东北地方的士族也是不稳，米澤的云井龙雄等因圖謀叛乱，于 1870 年 7 月被捕。8 月，土佐的岡崎恭助、熊本的江村秋八，秋田藩的大参事初岡敬次郎等甚至計劃用秋田藩軍艦襲击东京。

不独士族心怀不平，从上年以来，农民、工人、商人等无产劳动人民的反抗也大大發展起来。在 1870 年 1 年中，农民起义和其他暴动超过 30 起，其中，11 月末在信州松代藩境內爆發的共計有数万人民参加的农民起义，竟繼續了数日，鎮長、村長也都参加，形成了地方性的內乱。参加这次农民起义的还有鎮長和村長，縱火燒毀了富豪及藩厅大参事的住宅，佃农不但要求减租，并且还要索回已繳租粮(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

这种具有不平情緒的士族的反抗和人民的蜂起在本質上虽然完全相反，但在反政府这一点上两者却互相結合起来了。这种暴动，先前已有長州諸队的叛乱，同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之間，九州島日田地方又發生了同样的大規模起义。这次起义，最初是日田县人民蜂起，搗毀官吏公館和富豪住宅，随后又有長州逃兵公然或暗中参加，因而造成了大規模起义。12 月末，中央政府派陸軍少将四条隆謨为巡察使前来鎮压，暂时略告平息，巡察使乃于 1 月回京；到了 2 月暴动又起，于是又派四条少将前来，并命令肥后、薩摩、長州三藩向日田出兵，土佐藩向伊豫方面出兵，接着又令四国、

① 參閱明治 2 年 3 月 27 日木戶孝允寄給广澤真臣的信，明治 2 年 4 月 19 日寄給岩倉具視的信以及大久保利通日記明治 4 年 4 月 22 日的記載。

九州的 42 个藩受巡察使指揮，并作好随时出兵的准备。經過这样空前动员，到了 3 月才告平定。（“改訂肥后藩国事史料”卷十，“世外井上公傳”一，“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

## 2.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大久保等于 4 月間感到焦虑，深恐長此以往，失去全国人心，“演变至若何局面，难以逆料”，因而必須巩固政府的基础。为此，大久保曾不断設法力求統一政府意見。而井上馨等在長州暴动平定后，認為今后应“着手办理民政，首先减低錢粮”——減輕賦稅——同时还要“不束縛人民之自由”，“公布岁入岁出使全国人民一体周知”，以及提倡养蚕、改革教育、廢除汉字、提倡机械理化科学等等，总之，要对人民讓步，廢除封建特权，进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木戶在 8 月向三条太政大臣提出的建議中（前已引用），也主張目前朝廷应以大力改革府县政治为首要任务，“解除全国一般人民向来所受之束縛，使各享自由之权”，只要朝廷能以收攬民心，那么，各藩也就不能不归附。他还認為，松代、日田的人民暴动，固然是件痛苦的事，但也是政府树立坚定方針的良机，“反而是个前进的机会，人心也会逐漸稳定下来”（明治 3 年 12 月 14 日）。

总之，已經深切感到，无论士族如何反抗，亦必須树立整理士族、逐漸廢除世祿的基本政策。于是，廢藩置县問題也就提到政府的議程上来了。为此，必須中央政府拥有自己的軍隊，而为了对人民一面怀柔一面压制，也必需拥有中央軍隊（日田暴动时，薩摩藩并未服从政府使其出兵的命令）。井上馨<sup>①</sup>当日田暴动时主張首先要对民众讓步以期收攬民心，而对松代藩的暴动則說：“由本地（东京）兵部派兵 3 百余名（中略），群众暴动今后必将不断發生，如不炫耀武威，断然处之，終将陷于被制之势”。

<sup>①</sup> 明治 4 年 1 月 10 日，寄給木戶的信，“世外井上公傳”一。

那末，怎样来建立政府军队呢？可能采取的办法有二，其一、是对全国人民征兵；其二、将可靠的藩兵从藩的控制下抽出来，改成政府亲兵。这两种办法早就讨论过，并已暂时征集了萨、长、土、肥四藩的少数兵士。但是，政府对这些兵并没有能完全控制得了，而对全体人民实行征兵，还没有信心，然而办法只有这两种，由于情势所迫，只好两种办法同时并行，即一面试行全国征兵，一面又利用萨、长、土三藩的士兵编成了亲兵。

新由国外归来的山县兵部少辅一到任，便同继承大村遗志的船越、山田等人一同热心研究实行全国征兵。这可能由于他具有在长州编练平民军成功的经验和实地考察了欧美兵制的缘故。他在就职一个月后，便出差到大阪兵部省办事处，会见了山田等人，他在寄给本户和参议广泽真臣（长州出身）的信中写道：“事无巨细，从募兵一事谈到将来扩充海陆军之目的，意见完全一致，一如在东京同吾兄所谈，应决定赶紧着手建立亲兵”。

于是，在11月就颁布了第一个国民征兵规则。

“计划将来彻底改革兵制，实行全国征兵，目前决定暂按下列规定，实行征募。自来年（1871年、明治4年）1月起，各道、府、藩、县应按顺序，不分士族、卒或平民，以1万石出5人之比率，选出身体强壮堪服兵役者，送交大阪兵部省办事处”。规定有8项：（一）兵士年龄限20—30岁，身高5尺以上，身体强壮，经医官检查合格者；（二）凡身为一家之长或独生子、父母年老或父母残废者不取；（三）服役4年，在服役期中“不得以私事请假归乡”；（四）、（五）、（六）从略，（七）除首次前来兵营旅费外，地方官不得支给任何费用。

根据这个规则，五畿内、山阴道、南海道的各府藩县应在次年1月25日至2月朔日之间，东海道、北陆道的各府、藩、县在同年4月25日至5月朔日之间，东山道、山阴道在12月25日至次年1872年1月1日之间，分别向“大阪征兵处送交法定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规则并不是政府直接向人民颁布的规则，而是发给府、藩、县的指令。这是勒令下级领主将其隶农提供给上级领主



(政府)來服徭役，是和德川幕府責令旗本代官繳納兵賦沒有兩樣。

這次按照地方收入每 1 万石征集 5 名——全國不足 1 万 5 千名——的少數兵員，實際上幾乎沒有“交來”，而是胡里胡塗地就結束了(註一)。

其所以失敗的直接原因不外乎，府、藩、縣既沒有堅決執行的誠意，也沒有足夠的行政準備，而中央政府也沒有足以督促執行的強制力量和周密的、統一的行政機構。

正如後面所說的那樣(廢藩置縣以後的征兵法，最初實行時也曾極感困難)，更確切地說，類似幕府征集兵賦那樣的征兵方針，已不能引起府、藩、縣當局任何新的感覺，更沒有絲毫魔力可以吸引人民起來響應，這就是征兵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

政府雖然失敗了，但如前章所述，征集平民為常備軍一事，已成為幕府末期以來兵制上的一個必然的歷史方向。1869 年 9 月由各藩代表組成的“集議院”進行的軍制討論中，贊成士族軍隊論的固然占多數，但其中主張“應將兵農劃一，實現全國皆兵”者也有 16 人，主張為補充士族常備軍而建立農兵者有 5 人(“集議院日誌”)。

和歌山藩從 1869 年末起大規模地實行了國民征兵制。

同年 10 月，和歌山藩在全國內首先開始以藩內“農工商子弟”組織了叫做“輪流兵”的常備軍 4 個大隊。據次年 1870 年 2 月頒布的征兵條例“兵賦略則”規定：

(I) 凡 20 歲的平民男子除(一)一家之主、(二)體格檢查不合格者、(三)獨子、獨孫、(四)替代父兄主持家務者、(五)兄弟均在軍籍者以外，均須服兵役；但對現役 3 年每年交納 60 兩，對第一預備役 1 年交納 20 兩，對第二預備役 1 年納 20 兩者，予以免除。

(II) 服役期間為 11 年。(一)自 20—22 歲 3 年間，稱為“輪流戍兵”，住在營內(現役 3 年)；(二)現役期滿後 4 年間，稱為“預備兵”，每年入營 1 次，演習數日；(三)預備役期滿後 4 年間，稱為“補缺兵”，居住家中。過了以上 11 年終了後，完全免除兵役。(後來在 1871 年 2 月，將現役改為“輪流常備兵”；將“預備兵”改為“第

一預備兵”，服役三年，只限最初一年应征演習；將“補缺兵”改為“第二預備役”，服役三年。）

與服役有關的重要規定是，在兵役年限以內的男子，不得到其他府、藩、縣去當養子，也不得到其他府、藩、縣去作傭工，可在本藩內作傭工，但在 20—22 歲期間，即在本藩內亦不准作傭工。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兵役具有農奴徭役的性質。

(III) 待遇，輪流戍兵分為“上等戍兵”和“下等戍兵”兩級，下等戍兵給以“少初位”，上等戍兵給以“大初位”軍銜。如果服役成績優秀，可以升任軍士和軍官。薪餉，上等戍兵每年米 17 袋，下等戍兵 16 袋，其中扣除 13 袋作為“衣服、冠履、飲食等項費用”及“營中雜費”，下余 3 袋或 4 袋“儲存”起來，等到退伍時領走。（這個薪餉與聯隊長年俸米 170 袋相比，差別並沒有後來天皇制軍隊那麼大。）

此外還詳細規定征集手續，並立即付諸實行了。當 1870 年 2 月，中央政府頒布常備隊規則，規定禁止由士族、卒以外征集兵員時，和歌山藩提出申請說：“本藩所有政務，均按士農工商一律平等處理”，“本年度兵賦已大致辦齊”，礙難更改，請將本藩作為例外來處理，結果得到批准。所征兵士全部編為步兵。和歌山藩的常備軍，就是以這種步兵為主，配備着由士族組成的炮兵、騎兵、工兵和輜重兵，並在編制、裝備、內務、練兵、補給等各方面均受普魯士人卡賓教官指導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正式的現代軍隊。此外，還從普魯士聘用了裝填火藥、制作皮件等武器技師和築造專家。到廢藩置縣時，輪流兵已達 1 萬 3 千餘名（注十二）。

以一個藩的力量，擁有這麼多的軍隊，究竟能維持多久呢？僅僅裝備一項的財政負擔就不得了，而且還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人民的反抗，即使沒有 1871 年 7 月的廢藩置縣，也不能長久維持下去。中央政府每萬石出 5 名的征兵嘗試完全失敗，而一個藩卻竟然作到這種地步，看來似乎是個奇蹟，其實，這是由於藩的權力從藩中央一直貫徹到基層各村，以及統治機構完備的結果，也正是一個藩才能作到的。同時也因為只是一個藩的力量，所以一時雖然

作到，而究竟不能持久。总之，只有象在一个藩内那样，握有完全的統一权力，并且能够憑借可以貫徹到日本全国的統一权力来統一运用全国的财力人力，才能長远地实行征兵制度。紀州藩的征兵制度基本上和后来天皇政府的征兵制相同，但是要把它推行到全国范围，还必须經過廢藩置县和其后的政治、社会、經濟上的各种改革。

实施征兵制度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就是民主主义。征兵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以一国的民主主义發展程度为轉移的。关于这点将在下章詳述。和歌山的輪流兵制度，不但在“兵賦”方面实行了“士农工商四民一律平等”，同时，并作到“以至于文武官吏之銓叙以及市在伍組之編籍，士族，杂与其他三民并无若何差別<sup>①</sup>”。如上所述，和歌山藩把知事家祿削減为藩祿的二十分之一，把士族俸祿削減为十分之一，如果不以这种旨在廢除世祿的改革为前提，它就沒有实施征兵制度的财力，也无法緩和人民的不滿。（这并不是說和歌山藩实行了真正的民主主义，而只是說部分的膚淺的民主主义傾向的改革和征兵制——即使基本上是与农奴徭役沒有两样的征兵制——是不可分的。）

在标榜四民平等的理想和企圖廢除武士軍制的几个有名的藩里，还有土佐藩。領導土佐藩的是板垣退助，他曾率領藩兵参加平定戊辰之乱，当攻陷会津，看到一般人民非但不援救藩主的危难，反而支援政府軍，因而深切感到如不实现四民平等团结全国人民，就不能够維持国家；关于这一点，他曾再三說过，也曾写过。正如前篇所述，土佐藩在幕府末期曾征集平民作为輔助民兵，在1869年12月改革兵制，把原来部队整理縮編为常备軍(步兵)4个大队，并規定另外征募“乡兵”(住在家乡一面从事本业，一面受軍事訓練，即輔助民兵)4个大队(每大队480名)。这些步兵是主力，此

<sup>①</sup> 明治3年3月12日，和歌山藩向兵部省提出的請愿書。“南紀德川史”第十三册。渡辺几治郎著“陆奥宗光傳”中，也記載着和歌山藩藩制改革的梗概。另外，这个改革是由幕府末期提倡农兵論的藩士津田出和参加坂本龙馬海援队學習了民主改革思想的陆奥宗光二人倡議和指导的。

外，編成炮兵1个大队，工兵和騎兵各1队（征募条件等詳見注十三）。

接着在1870年11月，土佐藩宣布四民平等，廢除士族独占文武官职的制度，允許他們自由从事农工商等各行业，規定“官員、兵士”均由士族、卒、平民中选拔，并計劃通过征兵制来建立常备軍。但是这些還沒实现便实行廢藩了（注十三）。当时土佐是仅次于薩摩、長州的一个有力而又著名的藩，这个四民平等宣言，对于他藩也發生了巨大影响，米澤、福井、彦根各藩曾企圖仿照土佐实行改革，但不久便廢除藩制，以致未能实现（明治政史）。

### 3.

兵部省本想按照1万石出5名的征兵比率，建立保障中央集权的常备軍，但整个政府并未認真执行这一方針，而又另按新的計劃，竭尽全力要把薩、長、土三藩兵力的軍隊从藩的控制下抽出来，而改編为中央的亲兵。

如上所述，1870年的年初發生了長州諸队的騷动，到年末又發生了日田县的人民和不平士族的大規模起义。在这期間还陸續發生了松代的群众暴动和反动士族的大大小的反政府阴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感到不安，并造成了政府內部的对立。大久保等同民部省和大藏省即掌握財政、經濟实权的大隈重信等——他們背后有資產階級撐腰——新生势力不能相容；而木戶也对大久保和大隈两方始終感到不滿。如前所述，为使政府摆脱这种危机，木戶和井上企圖以政府直轄領地八百万石为地盘，在这里实行民主改革，对人民表示讓步，誘导人民傾向政府，借以加强政府，削弱反动势力，这也就是确立專制主义的基本路綫。但是參議大久保和大納言岩倉却想拉攏昨天还是同道和領導人、而今天已变成反政府的士族巨头的西乡参加政府，換言之，就是想对士族势力表示讓步，以期巩固政府和加强中央集权。木戶等对于自己的主張並沒有坚定的信念，結果拉攏西乡成了政府的基本方針。为了怀柔两藩的不滿派（尤其是島津久光和西乡派），天皇曾于1870年（明治3年）12月对長州藩祖和已故薩摩藩主島津齐彬賜与神

号，打算以此作为礼物来劝說西乡参加內閣。为了这个目的，特派岩倉任勅使，率領大久保、木戶以及山县兵部少輔隨員前往薩摩。

西乡接受了岩倉等的劝告，同意到中央来。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反对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半資產阶级的方向，想要把中央改造成为他所改革成的薩摩藩政那样的士族独裁的政权<sup>①</sup>。当山县請他出来担任要建立保衛天皇的武力时，他便主張征求長州、土佐两藩的同意，由薩、長、土三藩提供“天皇亲兵”。这就是說，西乡是要公然率領自己的子弟兵进入政府，他想得真妙。

对此，山县略感惊讶，他本想在他苦心經營的兵学寮学生畢業后，各藩軍隊制度的整理統一工作告一段落，正式征兵入伍以后，再由各藩逐步抽調少数兵員編成亲兵。不过，他听到西乡說出这話，也不便反对，只好同意了。虽然如此，山县还是这样叮問一番：“既由三藩提供兵員，作为天皇亲兵，則其兵員已非某藩藩臣，一旦有事之秋，即使薩州出身之兵，亦須具有槍口对准薩摩太守之决心，(中略)否則，将徒有天皇亲兵之名，而无其实矣”。以前由各藩征集的兵員，脫不掉藩軍的性質，中央不能完全控制。(这正指的是薩藩的兵員，他們本来是奉調駐京，但結果竟然借口換班而撤了回去。)山县說这些話就是为了預防發生这种不利情况。当时，西乡答称“当然應該如此<sup>②</sup>”。在西乡看来，在某种情况下，并不反对“槍口对准”藩主和藩的上層，因为在他改革藩政时，已經在政治上向藩主等开过槍。

西乡就这样積極地行动起来，到長州去会見木戶，又由長州会

① 关于西乡的立場、政策的論証，請參閱本書“日本軍国主义”第二册的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及第三节。

② 关于山县会見西乡的經過情形，系根据山县晚年的著述“征兵制度及自治制度建立的沿革”，据山县的記述，用三藩的兵編成亲兵的方案，是西乡提出的，山县从未作过那样想法。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好能有更确实的史料加以証实，但是还找不到。不过，并没有史料說这个方案不是由西乡提出的（譬如說，在岩倉动身前政府已經确定了这个方針的說法），而且西乡曾为提供亲兵一事，說服木戶，并到土佐去說服板垣，从他这样積極的表現看来，以及从当时圍繞着这个问题的总的情况看来，山县关于这一方案是由西乡提議的这一記述，是可以置信的。

同大久保、木戶等乘船前往土佐會見板垣，約定薩、長、土三藩緊密合作。

1871年(明治4年)2月21日，發出了关于薩、長、土三藩“提供親兵”的划時代的命令。薩藩提供步兵4個大隊、炮兵4個隊，長州藩提供步兵3個大隊，土佐藩提供步兵2個大隊，騎兵2個小隊，炮兵2個隊，計總兵力為8千名，組成了天皇(政府)的親兵。這筆經費共計125萬兩，是在兵部預算以外支出的。政府的財力已經能以支出這樣巨款，這是值得注意的。23日，在東山、西海兩道設置“鎮台”<sup>①</sup>，西海道的本營設在小倉，分營設在博多和日向，東山道的本營設在石卷，分營設在福島和盛岡，所有本營、分營的兵力是由附近各藩征集的。同時，在西海道鎮台管區內“選定便于增援、運輸之地”數處，駐扎軍隊，例如，令丰津藩派兵一中隊駐“日田縣”(“法規分類大全”兵制門三)。中央政府所以能把藩軍調充鎮台兵，也正是由于擁有8千親兵。這種兵力配置，顯然不是為了防御外侮，而是為了鎮壓國內反對派。用藩兵編成鎮台兵，主要是為了鎮壓一般人民的反抗，對於士族的反政府派，是由親兵來威懾的。

6月25日實行內閣改組，以往的參議包括大久保、大隈在內全體辭職，只有薩摩的西鄉和長州的木戶擔任參議，大久保任大藏卿，大隈降為大輔(大隈派的其他人員也都失勢了)，板垣还是在野身分支援政府。西鄉認為這次內閣改組总算實現了“在家乡同伙伴們約定”的事項，他在寄給家乡伙伴的信中說：“此次俗吏們(指大隈、井上等民部、大藏兩省同資產階級关系密切的人)感到非常失望，狼狽不堪”。这个消息立即傳到各地，反动上族們認為偉大的西鄉即將開始行動了。

这样，木戶、大久保、西鄉等便商討廢藩置縣問題，多少持有異議的大久保最后也認為“与其姑息現狀，任其瓦解，莫若断然行之，破釜沉舟而后瓦解。盖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大久保日記7月12日)。在7月14日，断然實行了廢藩置縣的大改革。这一改革

① 即后来的那司令部。——譯注

所以能够成功，当然还是有賴于亲兵的力量。

廢藩置县以后不久(7月，日期不詳)，改革兵部省官制，分設陸軍司和海軍司，另設陸軍參謀局，作为外局，首次建立了明确的軍令机关，兵部卿不但掌管軍政，还掌管“討伐派兵”的軍令大权。

8月，解散各藩的常备兵，增設鎮台，設置东京、大阪、东北、鎮西4管区，东京本营駐常备步兵10个大队，并在新泻、上田、名古屋設置分营。大阪本营駐常备步兵5个大队，在小浜、高松設分营。鎮西本营(小倉)駐常备兵2个大队，在广島、鹿兒島設分营。东北鎮台本营設在仙台，駐常备兵1个大队，在青森設分营。所有本营、分营的兵員，“以原屬各藩的常备兵充之”，而以前的大藩和中藩的常备兵，則各派1个小队分駐各該县內。全国城池和兵器統归兵部省管轄。9月間，規定兵部省岁出陸軍經常費为8百万两，海軍經常費为50万两，陸軍临时費为25万两，共計875万两，約等于第五期(明治4年10月——5年11月)經常临时岁出总額的14.1%强。在这一时期，因廢藩置县所需各項經費頗巨，不能由这比率算出軍事費的比重，但与同时期的經常岁入总額2.442万两相比，則仅兵部省的經常費一項就占三分之一以上。

从这时起，有关軍备的工作迅速进展，10月9日，撤銷兵部省大阪办事处，确定政权中樞的东京为軍政軍令的中心。11月，建立軍事医院。12月10日，兵学寮也迁到东京。12月29日，首次制定基本軍紀“讀法”7章，規定軍人要忠誠、敬礼，特別強調服从，严禁結伙、脫逃、賭博、强买、吵架，違犯者处以“重刑”。1872年(明治5年)1月29日，頒布“槍炮管理条例”，“上自华族，下至平民”一律不准持有軍用槍炮彈藥等，并禁止私自制造；猎槍等类槍枝只准各地指定特許商人(每府5人，每县3人，鎮台本分营管区各1人，通商口岸5人)販賣，并由兵部省进行監督，以期除軍隊以外，誰也不持有近代武器。

这时，海軍也逐漸奠定了基础。1871年2月，規定由海岸少壯漁夫志願者中募集海軍水兵，采用一种佣兵制度，建立了訓練水兵的基础。兵部省机构改革以后，海軍司分設秘史、軍务、造艦、水

路、會計等 5 局。1872 年 2 月，撤銷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當時，有軍艦 14 艘，運輸船 3 艘，共計 17 艘，總排水量 13,832 噸。

1872 年 3 月 9 日，把三藩提供的親兵改為近衛軍，共編成步兵 3 個聯隊，騎兵 1 個大隊，大炮 4 門，設都督擔任總指揮，首任都督是由山縣兵部大輔兼任的，到了 8 月，西鄉任元帥，兼近衛都督。8 月 15 日，制定“巡檢參謀將校職務”，其中規定：“調查各地城堡之方向地勢，研究攻守之便利與否”，調查“城鎮人口之多寡及其貧富”，“總之，應考慮將來萬一發生暴動時，無論友軍占據城池，或城池被敵攻占，預先就其攻守方略，作出初步估計”（“法規大全”兵制門二）。4 月，聘任法國陸軍中校馬克利等 15 人組成的軍官團為教官。6 月，頒布兵學寮概則，寮中學校分為幼年學校、教導團（軍士訓練班）和士官學校。此外，關於陸軍各機關的沿革，載在本篇末的附表。

#### 4

這樣以親兵即近衛軍為骨干而整編的軍隊，是以什麼為目的的武裝力量呢？如以上各處所述，它首先是為了保衛天皇和官僚的政權，防止國內人民和士族反抗政府（尤其是針對一般人民）的武力。這在建立親兵的經過和鎮台兵的構成上，已明顯表現出來。在廢藩不久的 1871 年 10 月 5 日，政府指令兵部省說：近因廢藩，“聞各地奸民等時有結伙暴動情事，應飭令所屬嚴加取締，就地懲辦。現已通令各地方官，倘力有不逮，應即申請本地鎮台採取機宜措施在案，應預先布置停當，一旦地方官申請前來，應即進行鎮撫，勿得有誤”（“法規大全”“法令全書”）。再看巡檢參謀將校的職務，也可以看出這種軍隊的任務就是鎮壓人民起義。

另外，還規定“管區內州縣有強盜悍賊，地方官無能緝捕而需要兵力時”，鎮台可以根據地方官的請求立即派兵<sup>①</sup>，這說明警

<sup>①</sup> “大阪、鎮西、東北鎮台條例”，這是一本印刷的小冊子，但是，並沒有記載發行者，發行年月日和序文等。在條例的第一條內有“五管之鎮台”字樣。按鎮台最初是 2 管，其次為 4 管，最後從 1873 年起為 6 管，從無“5 管的鎮台”，這種錯誤，殊不可解，但是，這條例的全文，並不是偽造的。



察和軍隊還沒分开。

軍部当局和整个政府并未以此为滿足，1871年12月24日，山县兵部大輔、西乡从道和川村純义两少輔，向太政官建議說：“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对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对外，然内外非可自始加以区分，果御外之目的既定，措施得宜，則内事即不足慮。試观目前軍备，所謂亲兵乃保护天皇及守衛宮禁之兵，其他四管鎮台之兵，不过20余大队，是乃鎮压国内之具，而非御外者也。至于海軍只战艦数艘，尚不完备，此何足以御外乎”。

目前急需拥有御“外”的軍隊，为此，首先应建立常备軍，同时还要拥有大量預备軍，“凡男子年滿20岁，身体强健，家无系累可服兵役者，一律編入队伍，期年还家”（建立征兵制）；其次应“确定沿海防御，即建造战艦，修筑海岸炮台”；再次应“培植海陆两軍之根基”，即培养軍官，生产和儲备兵器，使兵器“毫不仰給于外国，甚至能向国外輸出”。

为此，需要巨額的經費，有人認為“不能举全国之财力供兵部一省之用”而表示反对，但政府当局却認為，“应察天下大势之緩急而定措施”，方今沙俄不断南下，故大量扩充常备軍、預备軍及战艦等軍备，“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屬必要之大計，亦只有断然行之<sup>①</sup>”。

当时認定沙俄是日本的威胁，这与其說是一种錯誤，勿宁說是故意歪曲事实。因为日本政府本不想和沙俄对抗，就速庫頁島国境問題，都想放弃爭执表示讓步（參看“日本軍国主义”第二册第一編）。山县等故意这样歪曲事实，大肆扩充軍备，并不是为了保衛国土和人民，而是为了要建立用以侵略朝鮮和台灣的軍备。前面已經簡單叙述过，木戶孝允等人提倡征韓論以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手段（詳細情况見本書第二册第一篇），明治政府自成立以来就一貫地想要侵略朝鮮。

山县等只是強調沙俄南下的威胁，而对于英法及其他欧美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約压迫日本，当时英法两国还在横浜驻扎着軍隊

<sup>①</sup> “法規大全”一，“公爵山县有朋傳”中册載有全文，“陸軍省沿革史”中也載有本文的“大略”，但与原意多不相符。

的情况应如何进行抵抗，却只字不提，这也就等于供認了整个政府的真意，并不在于建立保衛祖國的軍备。政府借口为使日本同西洋各国处于平等地位，也曾極力強調“富国”（是富天皇政权的國庫，不是富裕人民）“强兵”，实則这是政府想把人民爭取完全独立的要求，轉移到侵略性的扩軍上去（此点也詳見于本書第二册）。

为了实现这样大規模的軍备，山县等主張立即实行征兵制度，因为要是采用象近衛軍和四管鎮台那样，用上族編成的旧式軍隊的話，首先从人数上說就不可能。当时士族共有 42 万余戶（“明治政史”第五編），不足全国人民十分之一，如果由他們中間选拔适齡者和身体强健者編成常备軍和預备軍的話，数目当然有限。其次，長期給予士族俸祿使其保持特权地位的同时，还要維持近代軍备，这在財政上亦不可能。另外，采用夸耀封建身分特权的士族，就不能維持作为軍隊的生命的紀律。这一点在幕府末期已經完全暴露出来了（參閱本書第一篇）。兵部大丞曾我祐准回忆当时情况說：“士族兵驕傲难制，元年一役已充分証明矣”（自傳）。統領士佐出身的近衛兵的谷干城說：“自改三藩兵为近衛軍并实行統一紀律以来，不滿丛生，兵士中既有俸祿二三百石之上級士族，又有領取 2 人口粮五石左右之步卒，其統御之难，不堪言状”（隈山論謀录）。薩摩出身的近衛兵，“起初軍官和士兵之間，等級相差不大，薪餉亦不悬殊”——大概不是軍阶，而是指原来的身分等級——可是一改为近衛軍，就有了新的軍阶，当上队長的薪餉既多又能在营外随便享受，而軍士和士兵就要过营內生活，薪餉也很有限，于是“兵士由于不滿而开小差的很多，人数虽不詳，总数 3 千余名中以 2 成計算，就有 6 百余名”。为了补充缺額，当时采用了藩制时代身分最低賤的外城武士，而城区出身的兵士又“称之为乡下佬而加以鄙視”，因而又产生不滿，結果弄得大西乡也沒有办法<sup>①</sup>。

从全局看来，靠人民群众来建立軍隊，是幕府末期以来历史趋势的主流，大村益次郎和山县有朋都曾致力于此，只是由于在廢藩

<sup>①</sup> 明治 5 年 3 月 1 日，西乡寄給黑田清綱的信及其解說，“大西乡全集”二。

置县以前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因而实行全国征兵在技术上感到困难，同时政府害怕这样做会造成反抗政府的人民武装，所以未能实行征兵。但廢藩置县以后，征兵在技术上便成为可能的了。另外，在把征来的士兵完全训练成为天皇的忠实军队以前，还有近衛軍即“保护天皇，守衛宮禁”的政府亲兵，所以即便征来的常备軍万一叛乱，也足以应付得了。看到这种情况，山县等便下定决心要实行迫切需要的通过征兵来建立的常备軍制度。

对此，政府内部也曾有过相当强硬的反对意见，“在许多反对意见中，有人说，惟独守衛宮禁的兵士，必须从士族中征集，决不能采用一般征来的兵；还有人說，如果讓一般人民持有槍械，势将促成农民暴动<sup>①</sup>”。以前大久保利通等也曾这样主张过，这种从维护士族利益出發的反对論調，势头十分猛烈。曾我祐准在自傳中說：“要知道这是沿襲了1千余年的日本軍隊制度的一大改革，并非易事。对此采取否定态度的并不是农商的人民，而是士族，他們是从‘除了他們以外就沒有能够作战的人’这样一种自高自大不学无术的观点出發的”。

薩摩的桐野利秋等人反对征兵最甚，他对谷干城嘲罵地說：“山县要收罗一些庄稼汉来做泥娃娃，究竟有什么用处”。至于西乡隆盛的态度，据谷干城推测說：“西乡乃寡言之人，虽不明言，似仍持壮兵(士族志願兵)主义”(隈山論謀录)。大隈重信的“昔日譚”也这样說。“大西乡全集”的編者說：西乡認為“征集不諳軍事之农工商子弟，能否成为优秀兵士，殊屬可疑”。我想如果西乡象桐野那样公然表示反对的話，征兵法可能就制定不成了。尽管他内心并不贊成，却找不出有力的反对論据，只好保持緘默，听其自然，而对于如何运用士族軍隊，他却另有考虑(注十四)。

这些士族方面的反对，如果是出自“自高自大和不学无术”，那倒好办，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出自对于被解除所謂“士族的本

<sup>①</sup> 引自石黑忠憲著“征兵法頒布当时的回忆”，松下芳男著“制定征兵法的前后”。

职”，丧失特权地位（繼之而来的还要完全剝夺俸祿）的深刻的不滿，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据三宅雪岭的“同时代史”，板垣退助曾極力反对征兵制，但是他和西乡、桐野不同，他向来就主張“解除士族的文武本职”，他是站在比政府还要急进的立場来反对的。“大隈伯昔日譚”中說板垣曾主張“瑞士式的民兵制度”，这話虽不中不远矣。如前所述，他在改革土佐藩兵制时，也曾采用了“乡兵”制。

人民方面怎样呢？人民也曾站在人民的立場極力反对征兵，但在法令頒布以前，絲毫不知底細。只有土佐早在 1871 年就發生过反对征兵的暴动，在征兵法頒布后，也發生过激烈反对征兵的暴动。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談。

山县等終于制服了各种反对，并对采用“壮兵制”还是采用“賦兵制”（义务兵役制）的問題，也作过一番研究后，在 1872 年（明治 5 年）11 月 28 日，發布了“全国募兵詔書”，太政官把它的精神“曉諭”全国。（注十五）。

布告一开头就說古代日本是全国皆兵。繼而痛斥武士說，“原非如后世腰佩双刀，自称武士，厚顏坐食，甚至杀人亦不治罪者”。到了中世，兵农分离，弊端滋生。接着說，“大政維新，各藩奉还封土，及至辛未，遂恢复远古之郡县制，坐食之世襲武士，減其俸祿，准其免佩刀劍，自是四民始得自由之权，此乃平均上下，齐一人权之道，亦即兵农合一之基也”。“世上每一事物，莫不課稅，以充国用，然則人人固应竭尽心力，报效国家，西人称之为‘血稅’。（中略）且国家若有灾禍，人人必皆分受其殃，須知人人竭尽心力，防止国家之灾禍，亦即从根本上防御自己之灾禍。苟有国家，即有軍备，既有軍备，則人人即应服役。是故民兵之法，乃自然之理，非偶然臆造之法也”。这就是說，頒布征兵法就是根据这种国民必須担任保衛国家的“自然之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布告里，根本就看不到要求为天皇尽忠而服兵役的字样，而是罗列一些四民自由权利，人权平等，国家的灾禍即自己的灾禍等資产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所

用的那一套詞句。这个布告或許是出自当时的陸軍大丞、曾研究歐洲軍事制度、对于制定征兵法在理論方面出力最多的西周等人的手笔。其实具有这种性質的征兵制度，是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創建的。那种国民义务兵制是国民革命推翻了專制制度以后为了保衛胜利果实的兵制。而 1872 年日本的征兵制度，恰是为了保障專制制度对于封建領主和革命人民的胜利而建立的兵制。尽管这样，如果不用革命言詞加以粉飾，征兵还是实施不了。假如这个征兵制度，真象布告里所說的那樣，是以民主精神、民主政治、民主主义社会体制为基础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但事实恰恰相反，所以通过这种征兵而建立起来的軍隊，对于国民福利絲毫不起作用，只能变成天皇制的、軍国主义的、欺压人民和侵略邻国的軍隊。

1873 年 1 月 9 日（阴曆明治 5 年 12 月 11 日），决定撤銷四管鎮台，把全国分为 6 个軍管区，設置鎮台 6 处，兵营 14 处，共有步、騎、炮、工、輜重五兵种，官兵平时为 31,680 名，战时为 46,350 名。次日頒布征兵法。同年 1 月 4 日，山县陸軍卿在报告六管鎮台募兵順序的奏章中夸耀地說：“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內足以鎮压草寇，外可与列强爭衡”。同年 3 月，在东京鎮台管区内，首次根据征兵法征集兵員，編成步、騎、炮、工、輜重各兵种，逐步推及全国（陸軍省編“陸軍沿革要覽”）。8 月，陸軍省就發出通告說：“除鎮台外，不应再有軍隊名义”，当各地人民暴动时，不准地方官擅自募集士族“加以軍隊名义”派往鎮压。但士族以其他名义出动时，則与“本省无关”。当时士族事实上仍是预备兵員，不过，正式称为軍隊的，只有完全按照天皇——太政大臣——兵部卿——鎮台这一系統进行統帥和編成的队伍，除此而外，不复存在了。至此，天皇制的常备軍制度已完全建立起来了。

（注十）“观樹將軍回忆录”

“俺是隊長，會計上的事情一窍不通，这回讓俺来办理善后，竟然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兵士的薪餉津貼全都被克扣了一半，这是其一。其次是藩厅由朝廷領到 10 万石恩賞費，但是，只發給陣亡者一点点奠仪，对于其他兵士，絲毫沒發給恩賞，用这种殘酷的办法驅使兵士死于非命，这真是所謂賊夫人之子”等等。在第 53 页还有类似的記載。

明治2年12月諸队的請愿書中还有：“數年以来，各隊長每每克扣薪餉，兵士因而日趨貧困。此次改革軍制，患病者及身体屈壯健而年逾四十者均須一律退伍。而一經退伍，即日陷入飢餓者亦不乏其人，情况确实严重。（中略）伏請設法不仅使一般兵士即病人与老兵今后均能維持生計”（“奇兵队日記”第四）。

明治3年1月，熊本藩益田勇探索報告書（改訂肥后藩國事史料卷十）中載有：

“一、去年十月末，山口藩政府議定（中略），擬暫先解散諸队，尽选精銳，另行編制，对以前兵士，每人發給30兩，令其解甲归田。諸队認為处理不当，群情鼎沸。賴知事亲自出馬，进行說諭，始得平息。本年又通令40岁以上之兵士归田，以致演成今日之暴动。

一、鑒于上列諸人，历年从事攘夷（中略），維新后仍执掌藩政，身列朝臣，竟一变而主張开埠之說，真是豈有此理，因此某队主張应再接再厉，以国家之兵，完成举国攘夷之初衷（中略）。

一、此皆出自利用藩制改革虐待下級，只为在职官員謀利之私心。

一、军队号称精兵二千名，但聞長防二州人心均傾向军队。

一、大村兵部大輔（中略）骸骨已葬，但聞激憤之士兵，竟發其墓而毀其骨”。

（注十一）“法規分类大全”兵制門一。

明治4年3月29日，太政官对各府县的通令“关于提供应征兵員一事，业于去年11月指令在案，茲又規定如下，仰即如期送交大阪兵部省办事处，切勿延誤为要。

計 开

东海道 北陆道 府藩县

以上限自辛未年7月20日至月末

西海道 藩县

以上限自辛未年11月20日至月末

东山道 山阳道 藩县

以上限自壬申年（明治5年）3月24日至月末

这大概是由于預定从明治4年1月25日至月末在石見内、山阴、南海道各府县进行的征兵。結果未能实行，因而对下一次进行征兵的各道通知延期的指令。但在同年5月28日，又通令东海道各府藩县說：关于送交所征兵員期限，“因故改期，在另行通知以前，可暫緩送交”。山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征兵“卒未能取得預期成就而作罢”（“征兵制度及自治制度确立的沿革”）。参看松下芳男著“征兵法制定的前后”。

（注十二）渡边几治郎著“陆奥宗光傳”。

“4年11月解散时，据呈报兵部省文件所載大致如下：

戍兵都督

監軍 2名

都督附屬

120名

都督侍令使以下	59 名
普魯士式 步兵 6 个联队队长以下总人数	13,230 名
普魯士式 县厅常备兵 1 个联队	973 名
法国式 騎兵 1 个联队	157 名
法国式 炮兵 2 个联队	594 名
普魯士式 工兵 1 个联队	503 名
普魯士式 輜重队	880 名
兵学寮官員寮長以下总人数	246 名
医院	44 名
普魯士式 狙击队	373 名
实行輪流兵制的第一年度即明治 3 年 3 月,藩向朝廷呈报的員額:	
戍兵 12 个大队队长以下总人数	5,076 名
另有政事厅常备 3 个大队队长以下总人数	1,137 名
騎兵 1 个小队队长以下总人数	165 名
炮兵 1 个联队队长以下总人数	279 名
工兵队 队长以下总人数	572 名
輜重队 队长以下总人数	89 名
共計	7,318 名

以上第一項中所列的“戍兵”和“普魯士式步兵 6 个联队”等是輪流兵。虽然沒有明确記載的史料,但由于政事厅(县厅)常备兵及騎、炮、工、輜重各兵种分明都是士族兵,因此可以这样肯定(南紀德川史第十三册 246 頁、206 頁等)。

仅仅一年之間,兵員就增加了一倍以上,可見征兵做得多未严厉。

(注十三) 隈山詰謀录(“谷干城遺稿”上)。

备忘录(明治 2 年 12 月)

一、募兵 大队 480 名 每一小队 60 名,共 8 小队

选拔法

一、年龄 17—30 岁

一、身高 5 尺以上,力量扛 14 貫(一貫=3.57 公斤)。

一、由距城 2 日里以內者选拔。

虽居于距城 2 日里以外,由于本人志愿而迁到二日里以內者,亦得选拔之。

一、入伍者每年支給稻米 3 石 1 斗。

俱出外操練者,超过两日时,發給飯食。

一、入伍者可佩帶一口刀。

一、入伍者平日領米有限,故不得荒廢农工商等本业。

一、入伍者达到年龄时,应即归农,工、商。

据此看来,是把平民編为民兵,而予以准予士族的待遇,这和化士族为平民的四

民平等的思想不同。但此后一年半即明治3年1月3日，以藩知事名义向中央政府請得批准的藩政改革綱要，已發展如下（“上佐藩政录”）：

- 一、以人民一律平等为原则，廢除士族文武常职，使其成为人民之一部分。
- 一、設置官員、軍隊，应根据官职官祿由士族、卒及平民中选拔之。
- 一、改变士族俸祿制，發給祿券，作为家产。
- 一、解除士族常职，另編常备軍隊，因此，削減以前世祿几分之一，以充兵餉。
- 一、只分士族、卒、平民各族称，农工商者乃人民之生业，与族称无关。

（注十四）也有西乡隆盛贊成征兵制的一說。后来山县門下的官僚平田东助写道：“由于西乡道破：士族决組不成好軍隊，一定要照山县的提案，实行征兵制”，于是反对意見才消声斂迹。平田写了“道破”，但又紧跟着自相矛盾地写道：因为部下桐野等的薩摩派反对征兵，“西乡竟未發表自己的主張，暗囑弟弟西乡从道帮助山县公实施征兵制”。其实，西乡从道所以帮助山县，并不是由于西乡隆盛的授意，而是由于他同山县一同出国考察，一同归国，又一同进入兵部省，并抱有基本相同的思想。平田这样說，只是为了掩飾西乡的反动性。德富苏峰引用平田之說，并对它表示贊同，无非表明他一貫的曲学阿世罢了（德富編“公爵山县有朋傳”中卷）。三宅雪岭說：西乡既未贊成，也未反对，他“不愿参加討論制度，但愿率領三軍，馳驅戰場，不計方法如何，只求扩充軍隊”。这也是一种臆說。因为一方面認為西乡如果公开反对，征兵法就不会制定出来，而实际上西乡显然是不贊成的，为了調和这种矛盾而編造了这种臆說。

在征兵法頒布以后，一有机会，西乡就想把它改回来。明治6年春夏之交，鳥尾小弥太少将曾向西乡建議：廢除征兵，用士族代替，以士族專政的方式在全国施行“武政”。据說西乡对此曾表示贊同（“明治政史”第六編）。鳥尾的提案，原是西乡在薩摩已經实行过的方式，所以这話可能不假。

对于西乡內心的想法，單純作为他个人心境問題来推測，所以犯錯誤。这个問題，應該从他的階級立場来加以判断，这样，就可立即明了他是反对征兵的。那么，他为什么沒有公开反对呢？这可能因为他看穿了反对也无用，与其反对征兵，莫如利用“征韓”来把征兵制和官僚制一起搞垮。

（注十五）在征兵法頒布以前，山县曾以“論士一賦兵”为題，草拟意見書，論述了壯兵和賦兵的利弊。对此，曾我祐准、大島貞薰、宮本信順等人提了意見，經過討論的結果，于明治5年末，写成了征兵法。在征兵法的緒言中写道：

“所謂賦兵，即使全国壯丁均服兵役，充实陸軍兵員，并以其中沿海居民習于舟楫波濤者，充实海軍兵員。而壯兵乃自愿服兵役者，服役數年，武艺熟嫻，練成一批精兵，頗有益处，但日后終難免發生流弊。故拟廢除壯兵法，建立全国賦兵制度”（法規分类大全一）。

实行壯兵制，不能培养“无数的預备兵”，且兵餉巨多，經費浩繁。同时，根据当



时情况看来，志愿服役者全是难以駕御的士族，我想以上这些情况构成了放弃壮兵制的理由。

## 第二章 征兵制的实现

### 第一节 壮兵的解散和士族的整理

实行征兵制是为了通过版籍奉还、廢藩置县等一系列措施来瓦解純粹封建国家体制，从而調整(不是廢除)士族的俸祿制度和特权地位的一种决定性的措施。在太政官布告中那样痛斥武士，其实也无非是为了征集人民来服兵役的一种伪装的攻击。尽管这样，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时政府已經把重点由吸引士族移到吸引人民上面来了。征兵制和它的前提——廢藩置县，是依靠和利用了被吸引到中央来充作亲兵的士族中的有力部分的力量而实现的，但是到这时，却又要利用常备軍的力量来对付这些士族了。

由薩、長、土三藩出身的士族組成的近衛軍，是抱有不滿情緒的士族的核心，他們不但反对征兵制，同时对政府一切施策也都表示反对，并且势力非常强大，就連陆海軍的刑律，对他們也不适用(隈山詒謀录)。他們企圖向国内显示自己的威力，追求功名，起初主張“征討台灣”，繼而又主張侵略朝鮮。西乡隆盛个人如何想法，固然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这些士族和近衛軍的首領，竟不得不接受他們的要求，頑强主張必須征韓。

另一方面，陆軍少將鳥尾小弥太(長州出身)等还梦想要由士族实行軍事独裁的“武政”。他們說：“今則口称文明开化，認美为母，認法为父，盲目崇拜西洋，日趋文弱，大有亡国之兆”，为了挽救这种趋势，“应三分全国稅收，以其中二分充作陆海軍經費，使业經解除常职之士族恢复原职，并使全国士族分別归属六管鎮台統轄。凡自成丁至45岁之男子，全部編入常备及預备两軍。对喜爱武术之平民，考校其技术才干，擢为士族。全国一般平民，則依屯田

之法在各地設置軍團。可以服役之男子，則在冬春之季，悉數征集，施以訓練，以為護國軍。全國男子，應以所謂武士道進行訓練。政府左右大臣之一，必須由大將擔任，親承天皇之命，掌海陸之大權，以統一武政（以下從略）”。

據說鳥尾在 1873 年春夏之交，曾把這一建議提交西鄉，西鄉表示“完全同意你的主張”，不過，還要等待正在游歷歐美的岩倉大使等回國後再說（“明治政史”第六編）。細節如何，姑且不論，這種主張，確是當時一般士族的幻想。

士族的這種想法，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就是西鄉主張的“征韓論”，這和岩倉、大久保、木戶等官僚派的主張全面地對立起來，結果征韓派失敗，發生了十月政變。這時，官僚派所以能夠強硬地對抗士族派，是因為他們已經由於征兵法的實行開始有了自己的軍隊，同時，只要能夠爭取近衛軍的一部分或相當部分中立，即足能對抗征韓派的部隊——主要是薩摩出身的部隊。此外，所有火藥、子彈，均在陸軍省的掌握中，近衛軍手中雖也保有一部分，但為數有限。這時，新的軍隊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

征韓論失敗後，篠原國干、桐野利秋等薩摩派軍官 140 余名一齊辭職，返回薩摩。土佐派軍官的大部分約 40 余名也同樣辭職了（10 月 25 日）。這時近衛軍幾乎就要垮台，但因兵學寮已培養出新的軍官，山縣陸軍卿使用這些新軍官來重建近衛軍，經過兩周左右大致完成。這樣一來，近衛軍的指揮權便由西鄉等士族軍閥手中完全轉移到官僚政權的新軍部手中來了。對於新軍備說來，士族軍官的反抗，反倒促成了其基礎的迅速奠定。

回到薩摩的西鄉、桐野等，在 12 月初，燒毀熊本鎮台的鹿兒島分營，並解散分營的部隊（鹿兒島士族軍），然後控制鹿兒島“縣”政，扣留稅收，不向中央上繳分文，無視中央法令，標榜完全獨立，執行上述鳥尾少將所主張的“武政”那種軍事獨裁，建立士官學校，明目張膽地組織起地方軍閥政權，儼然構成了全國抱有不滿情緒的士族的最後堡壘。

從 12 月 21 日傍晚到第二天，熊本鎮台內步兵第十一大隊的

征韓派士族掀起暴動，第九大隊也發生動搖，但由於一部分官兵的拚命努力，逮捕了首謀者 60 余名，才得以鎮壓下去(注一)。關於其他鎮台，倒沒有顯著動搖的史料，不過，士族出身的鎮台兵士，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遵守軍紀，已完全成為政府的累贅，隨著征兵的進行和兵力的充實，逐步加以整理，至 1875 年(明治 8 年) 2 月，政府以征兵事業基本完成為理由，下令逐步解除全部壯兵的兵役。

同年 12 月，陸軍卿就上族佩刀一事上奏說：“不但在政治上或多或少發生障礙，而軍隊之外有人攜帶武器一事，關係陸軍權限，良非淺鮮”，今已設有近衛軍和鎮台，足以“鎮壓七道”，士族已經沒有必須帶刀的理由，建議立即下令廢除帶刀。次年 3 月，發布廢除帶刀令，從此，士族特權身分的最後標識“武士之魂”也被剝奪了。

上述排除士族志願兵的方針，並不意味士族立即被排除到一切軍事以及統治身分的地位以外，它還暫時作為天皇制的預備軍，起着壓制人民的作用。例如：自 1872 年 11 月 25 日到次年 1 月 12 日之間，在大分縣日田發生農民起義時，所有杵臼、日出、杵筑及其他各藩的士族部隊，均應縣知事的要求，出動參加鎮壓。1873 年敦賀農民起義時，在大阪及其他鎮台軍隊到達以前，福井、鯖江兩藩的士族，也曾應縣知事的召集，出動參加鎮壓。同年 5 月末，當北條縣(岡山縣)的人民為反對征兵而掀起了大規模起義時，舊津山藩的士族 3 百多名，協助鎮台軍隊，參加鎮壓。同年在福岡、大分、島根、鳥取、贊岐等地，因反對征兵等而發生了群眾暴動時，除鎮台軍隊外，當地士族也曾應召參加鎮壓。士族雖然反對征兵，卻踊躍參加鎮壓人民反對征兵的起義，這裡反映出他們的階級本質。這種事例，此外還有很多。

熊本鎮台谷干城等對於這樣頻繁召集士族部隊，表示憤慨，曾向政府追究責任，並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說：既已實行征兵制，設置鎮台，而實際上還仍然把士族當作軍隊，這種做法，應立即停止(“谷干城遺稿”下)。由於這種原故，政府便象在前一章末尾所說的那樣，一方面通令禁止以軍隊“名義”召集士族，但同時又玩弄詭辯，說使用上族“捕捉”暴徒，與陸軍省無關，繼續對使用士族鎮壓

人民起义的做法，采取了放任的态度。1873年12月在三重、1874年1月在宮崎、同年2月在篩磨县(兵庫县)發生起义时，都有士族数十名乃至数百名出动参加镇压。甚至在解散鎮台壯兵的方針业已确定和頒布了廢刀令以后的1876年11月27日，茨城县眞壁郡农民起义时，还在宇都宮兵营的軍隊沒有出动以前，就有旧下館及笠間两藩武士数百名被組成镇压队开到了出事地点。这次起义结束后，茨城县那珂郡馬上接着又發生了起义，这时也有水戶藩武士数百名出来镇压，其中有的是响应县的号召，有的是自动参加的，平定后他們还受到奖賞。

当时，西部各地到处發生士族的反政府暴动，因而政府特别注意全国士族的动向，严重加以防范。1876年12月19日，由三重县某村掀起的农民起义，不但席卷了全县，并發展到爱知、岐阜、滋賀、堺等五县，發展到数万人参加的大規模起义。这时，首先被动员的是旧津藩的士族，后来因为力量还不足，才出动了鎮台軍隊，这样，力量还是不够，于是，又召集了有关地方的旧藩士族1千2百余名，这才勉强把起义镇压下去(以上根据“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

士族不但镇压人民起义，当佐賀的江藤新平和島义勇等暴动时，还出动了4千3百名士族；西南战争<sup>①</sup>时，竟然动员了士族8千名以上。这几次都是因为鎮台軍隊动员后兵力不足才动员的，主力还是鎮台兵，这和人民起义时首先动员士族，然后調动鎮台軍隊的情形不同。1874年侵略台灣时，也曾征募鹿兒島县士族参加“远征軍”，不过，这次“远征”，本来就是为了把鹿兒島士族的反政府情緒轉向对外战争而發动的，所以征募当地士族参加，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之，政府对于人民起义，則利用士族来镇压，对于反动士族的叛乱，則以征来的士兵作为主力，采取这样分別利用的办法逐渐

① 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抱有不满情緒的薩摩武士对政府掀起的内战。西乡主張征韓論失敗后，辞官返回鹿兒島，兴設私塾，教育乡党子弟。1827(明治10)年2月，私塾学生拥戴西乡举兵，进攻熊本，政府任命征討总督进行討伐，結果西乡遭到失敗，因而自杀。——譯注

巩固了官僚独裁的地位。这时，象廢藩以前的長州逃兵暴动和日田暴动那样，士族的反抗和人民的反抗結合在一起的情形已絕迹了。这說明政府实行的廢藩以及其后的各項改革等政治措施的成功。

由于这样巧妙地利用士族和平民来逐漸充实自己的武力，政府終于获得力量可以調整上族的經濟特权即世祿制度。政府对于秩祿的进攻，是以版籍奉还后实行的减祿开始的。1873年12月，征韓派下野，近衛軍改編后不久，政府規定对家祿实行課稅，并对不滿1百石者，劝其“奉还”，对已“奉还”者，授与現金或公債作为生計資金。在頒布壯兵解散令的7个月以后，把从来用稻米支付的华族、士族的家祿、賞典祿（对于在壬政复古和戊辰內战时立功者的奖賞）及社寺祿等一切秩祿，全部改用現金支付（这项現金額是按以前三年間每石米价的平均价格折合的，嗣后来价上漲，其現金支付額亦不变更，所以實質上是削減了祿額）。

后来不到一年，即1873年8月，廢除用現金支付秩祿，改用公債代替。分秩祿为永世給与、終身給与及年限給与三种，按照不同种类秩祿的金額、等級，分別發給偿还期限、利率各不相同的各种公債。廢藩后，各种秩祿的年支付額（据1873年3月的調查）共計22,658千日圓（千圓以下四舍五入），改用現金支付后的年支付額为17,676千日圓（比用米支付时减少498万日圓），后来又改为發給公債券，結果到1880年共發行公債175,797千日圓，每年利息11,610千日圓（比用現金支付时的年額约减少600万日圓）（“秩祿处分始末記”“明治政史”第九篇）。

1873—1890年左右的国家經常岁入只有6千万至7千万日圓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征自农民的土地稅。如果拿它和上述秩祿和为支付秩祿所發公債利息支出額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这种公債是多末繁重的財政負担；这是一种剝削民脂民膏来供养坐食享受的反动寄生虫的殘酷办法。

虽然如此，对大多数的士族群众說来，丧失了俸祿，馬上就丧失了生活。他們不懂老老实实在地靠劳动生产維持生活，少数华族

和高祿的士族，固然可以利用公債或利息購買土地，成為寄生地主，或向公司、銀行投資，兼作資本家，而一般士族要靠仅有的公債來作經營資金，正所謂“士族的生意經”，那點零星資金很快地就被高利貸和商人盤剝去了。所以，士族群眾必然要走向沒落。

正當這時，政府又頒布了廢刀令，這就使得士族忍受不住了。他們內心里想：廢藩置縣不也幸亏我們嗎？現在的政府所以能夠強大起來，不是由於士族努力的結果嗎？現在卻來踐踏我們這些丰功偉績的人，真是豈有此理！如果政府一開始就毅然決然依靠人民群眾的話，士族的俸祿，早就可以無償地沒收；而政府既利用士族來鎮壓人民，同時還要打倒士族，這樣就不好辦，結果，給他們保留了舉行叛亂的力量。首先是1874年佐賀的士族舉兵叛亂，結局是一敗塗地。當時還在觀望的西部地方和九州的反動士族，到了1876年，便先後掀起熊本的神風連之亂<sup>①</sup>，萩的前原一誠之亂<sup>②</sup>，秋月的士族之亂<sup>③</sup>，到了1877年，終於發生了西南戰爭。

10年前曾經是“革命”的最高領導人物（指西鄉隆盛），只是由於開頭第一步沒有趕上歷史發展的速度，一轉身之間變成了反革命的最後和最大的頭目，對於自己曾經煞費苦心開創出來的天皇制政權，竟然進行了武裝反抗，以至於殺身喪命。由此可見，即便在明治維新那種程度的變革中，歷史發展的規律，也是極其有力地反映出來。

曾被士族鄙視為莊稼漢的從人民中間征來的軍隊，在鎮壓這些士族的叛亂中，進行了最英勇的戰鬥。在西南戰爭中，熊本鎮台的士兵奮勇作戰，這是人所共知的。而這時鎮台軍隊已經不是士族壯兵，而是由人民中征集來的士兵。

在西南戰爭中，曾動員了各鎮台和教導團的兵力4萬1千3

① 神風連是信奉神道的政治團體，反對明治政府，明治9年10月掀起暴動，襲擊鎮台、縣廳，不久被鎮壓下去，首領為太田黑伴雄、加屋鑿堅。

② 前原一誠系吉田松陰的門徒，明治9年響應神風連，在萩舉兵，擬由山陰道進攻東京，旋敗於政府軍，被處死刑。

③ 擁護征韓論的秋月藩士松崎重之助、今井八百郎等組成的新政不平黨，於明治9年10月，響應神風連掀起內亂，後被小倉鎮台分營兵擊潰。

百名，后备兵 6 千 4 百名和壮兵 7 千 5 百名也就是当时现役和后备的全部兵力，其中还包括远从北海道调来的屯田兵 5 百名<sup>①</sup>（兵員名額系根据“岩倉公实紀”）。虽然调动了这些兵力，但是仍然敌不过 4 万余名西乡军，于是，政府中便出现了募集土族志愿军（壮兵）的强烈主张，但是山县陆军卿表示坚决反对。他唯恐在这时募集壮兵，将来战胜以后不论在兵制上或是政治上都会造成巨大困难。但是毕竟兵力不足急需解决，结果还是以充作首都警察厅的警察为名，从东北和其他各地募集了土族，编成军队开往战场。第一批募集来的 3 千 6 百名编成别动第三旅团，后来募集的 4 千 2 百名编成了“新编旅团”。

但是，土族并不愿意进攻自己的同类<sup>②</sup>。为了怀柔土族，山县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起用各县土族的首领为官员，“一则消除其悒郁，一则使不良之徒丧失其首领”（“西征战记稿”卷三二）。尽管这样，本来为当警察而应募的土族，当一旦被编成军队调往前线时，他们就认为这样和募集条件不符，竟有半数以上不肯在关于遵守陆军纪律的宣誓书上签名而拒绝出征，结果是强行调往战场去了。因为他们仍怀不满进行反抗，所以就从队内选出 2 百名组成宪兵，来进行镇压。这件事载在当时曾率领新编旅团的米泽的千坂高雅的手记中（注二）。既有这样明显的事实，可见所谓新编旅团是战场上精锐无比的部队，使得勇猛的西乡军，也竟然唱起“若不是近卫军的大炮再加上警察，一定会攻入百花缭乱的江户城”，“若不是红帽子（近卫军）和银线条（警察）一定会攻入百花缭乱的江户城”。这种害怕警察部队的说法，一定是政府和首都警察厅方面捏造出来的。当时西乡军方面倒唱着这样嘲笑警察部队的歌：“大久保、川路（大

① 屯田兵是根据 1874 年的屯田兵条例，在次年送往北海道的武装移民部队。这是想利用奥羽地方的没落土族来开发北海道，为了使他们成为北海道的军备及治安机构之一，把奥羽地方的土族迁移到北海道琴似村等处，发给他们以少许开拓资金，并配备了枪炮，对男子施行军事训练，所有各户均实行军事编制并接受军事统辖。

② 熊本镇台司令官谷干城在 1874 年 7 月建议书，关于镇台的土族兵曾这样写道：“当时之兵，可用以镇压暴动，可用以远征海外，但很难用以对付不逞土族之暴乱”。

警視，別動第三旅團長)帶領一帮魚鱉蝦蟹，讓鯨魚追得胡跑亂竄”。

政府在西南戰爭中所以取得勝利，并非由于士族的隊伍，而是賴有通過征兵建立起來的現代軍隊。他們“士氣凜然，臨陣決不畏懼<sup>①</sup>”，“有力地發揮訓練之實效<sup>②</sup>”。這并不完全是親手建立起征兵制度的人們的自夸。人民對於西鄉等封建士族勢力勇敢進行了鬥爭，也是很自然的。結果是征來的軍隊戰勝了士族的軍隊。

這樣，逐步地把壯兵解散，軍隊變成單一的征兵常備軍；被解散的人員，盡量改成警察。

在廢藩以前，與其說是警察和軍隊幾乎不分，勿寧說是軍隊擔任着維持日常治安的警察性的任務。就以東京的警察來說，直到廢藩置縣以後的一個短時期，還稱作“府兵”。後來從1871年10月起，全國警察一律改稱為“邏卒”，或稱作“捕亡”，有時還按照西洋說法稱為“包利斯”來和軍隊分開。東京的邏卒中，有許多薩摩出身的下級士族，這是由於西鄉為了救濟他們失業，格外照顧的原故。其中薩摩出身的川路利良，曾被派出國研究歐洲警察制度，於1873年9月歸國，當上大警視<sup>③</sup>，他曾建議創立新的警察制度。建議說：

“夫警察者，乃國家平素所施之治療，猶如人平素之養生，所以保護良民，培養國內氣力者也。故自古以來凡欲振興帝業，擴張版圖者，必先注意于此，拿破崙一世是也。今之普魯士所以平定四方，威震世界，即賴有警察善于治理內外，經常探悉外國情形，故能終於戰勝強國法蘭西。由是可見，欲使國家強盛，與外國相抗衡，必先明了此理”。

根據這種精神，創立了新的警察制度，1874年1月，在設立內務省的同時，建立了全國統一的警察，並設立了東京警視廳。從這時起，邏卒改稱警察。川路竟公然宣稱：“束縛就是保護”，在君主國必須提高君權，為此，他迫切希望“日本被稱為警察國家”。作

① 明治10年1月4日山縣有朋的奏章(陸軍省沿革史)。

② 山縣有朋著“征兵制度及自治制度確立的沿革”。

③ 首都警察廳長。——譯注



为一个当局者，沒有象他这样直截了当地暴露出天皇制警察的本質的了。

随着征兵制度日趋完善，军队逐渐发展成为统治阶级防备不测的强大暴力，它一向担负的经常压制人民的任务，便逐渐移交給壮大起来的警察，（不过，也有象西南战争时那样，警察变成实质上的军队，）而壮兵遂被吸收到警察里去了。使士族充当警察，也是川路利良的主張（注三）。

（注一） 我尚未得到有关熊本鎮台兵士暴动和鹿兒島分营兵士解散的詳細史料，但在鎮台司令官“谷干城遺稿”卷六內載有，司令官谷干城关于事件的簡單報告書和他关于处理鎮台兵士的基本原則的意見書。再是，关于該鎮台兵士如何难以統轄一点，谷干城叙述如下：

“先是，熊本鎮台（中略）虽征集九州各藩之兵，并略已納入一定規矩，但因多系来自各藩，不服約束，統轄殊感困难（中略）。桐野少将曾暂时轉任熊本鎮台司令長官，但每多放任自流，不遵守陸軍省法規，凡事均按照桐野氏个人意圖处理，故省令几乎未被执行，（中略）余不敏繼桐野之后，实乏整頓之方略，（中略）对于統轄各藩集結之兵，甚感棘手。如进行整頓，必須完全改变編制（中略）。余固知整頓难以和平进行，故拟調来已經充分訓練之大阪鎮台士兵，作为榜样，对熊本之二大队进行严选，改編为一大队，万一發生嘩变，即以大阪兵鎮压之”（“隈山論謀录”）。

关于上述調大阪鎮台士兵 1 个大队来熊本一事，有谷干城申請陸軍省的文件保存在遺稿中，文件中說：熊本鎮台的 2 个大队兵員不滿定額，想把两队合为 1 个大队。为了補充缺額，請將大阪鎮台兵調来本鎮台云云，並沒有暗示用大阪兵来对抗熊本兵的字样，不过，真相可能是上述那样。他的請求被批准，由大阪調来第 19 大队。当暴动时，第 19 大队也曾略微有所动摇，但究竟还是最可靠，成了鎮压的主力。事件平息后，第 11 大队和第 19 大队之間發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緒，因此，谷干城請求把第 11 大队調往大阪。

由此可見，鎮台兵的紀律該是多未恶劣。明治 8 年东京鎮台报告中說：壮兵醉倒街头，征兵有潛逃者。仙台鎮台当时已无壮兵，但报告說：征兵“比已經解散的壮兵，可謂比較遵守軍紀”（“陸軍軍政年報”創刊号）。

（注二） 干坂高雅手記“履歷大要”（干坂是米澤藩家老的兒子，当时是中校）：“留守东京的岩倉右大臣深为憂慮，經同旧藩主及地方有力者計議，決定以警部、警察名义招募东北各县士族，应募晋京者达 7 千余名。但因处置失当，在应募者中，竟有結伙要挾归籍者（中略）。当首都警察厅令应募者入营从軍时，应募者認為原是假借警部、警察名义騙来补充兵員不足，遂釀成此次之騷乱”。

“編組新編旅团以前，責令宣督隨同东伏見宮殿下，服从陸軍紀律，开往前綫，

但应募者中認為違反募集条件而不服从者，将近半数”。

“高雅率领 2 千余名随后出发，乘船停泊神户，先发各队已抵该港。因将兵士拘留船中，只许队长上岸，于是，群情激昂，擅自登陆，任性妄为，不听上级命令。高雅来到后，奉命处理此项案件，搜出犯规士兵，拘禁于寺中，并由队中选拔士兵 2 百名，组成宪兵，命二等小警部曾我祐正充任队长，进行弹压”。

“当解散新编旅团时，各自矜夸战功，请求官职。结局，为酬劳绩，另行发给津贴作为存款，经由地方官厅分别邮寄原籍；并晓谕一俟首都警察厅及地方官厅出缺，当即录用（中略）。高雅曾在各地亲自进行说服，但积愤难平，束手无策”。（引自松下芳雄著“征兵法制定的前后”）

（注三）从警察的前身“包利斯”都是士族这一点也可以明了：警察多半是由士族充当。所以，当 1873 年因征韩派下野，近卫军发生动摇时，“包利斯”也“群情鼎沸”了（木户孝允寄给山县有朋的信，“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

后来，板垣退助也在奏章（明治 20 年 8 月 12 日）中写道：“尤以我国警吏，大多出自封建武士残余云云”（明治文化全集 第三卷 “名家意见书”）。

以“封建武士残余”充当警察，就是警察当局的方针。

据铃木蘆堂著“大警视川路利良君传”所载，在明治 6 年 9 月的川路建议书写道：“用军人充当宪卒，乃欧洲之通例，故其警士皆系出身行伍之健者……”。欧洲各国并无武士与平民之分，故不得不用士兵。而我朝尚有武士，倘弃置不用，可谓失策莫大焉”。再者，本文中所引用川路的建议书等，均出自此书。

##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

### 1

如上所述，征兵常备军制虽然和封建士族的政治、军事、社会的特权有矛盾，但是它决不是象太政官布告所说的那样建立在“上下平等”、“人权均齐”、“人民自由之权”的基础上，同时也不是为了奠定这个基础的一种武力。恰恰相反，它首先是天皇制专制国家为了镇压要求自由权利、确立平等人权，广泛说来，也就是镇压为实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起斗争的人民，即所谓“对内，则镇压草贼”的专制主义的军队。

征兵也叫作“赋兵”，这恰恰表明征兵就是征集农奴来服役，它和过去幕府的“兵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1870 年按每 1 万

石出 5 名的征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跃进成为 1873 年的征兵，但其本质并未改变。1873 年的征兵法和和歌山藩的征兵一样，规定在服第一后备役期间，原则上不准到镇台管区以外旅行，必须旅行时，须请得镇台批准。在服第二后备役期间，到镇台管区以外旅行时，出去回来均须报请镇台备案<sup>①</sup>。另外，在服后备役期间，不得自由充任官吏。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召集动员的一种技术上的措施，而是意味着征兵常备军制就是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为前提的。

再者，这个征兵法规定：(A) (一) 在中央各部及府县任职者、吏役亦准此；(二) 陆海两军学生；(三) 国立公立专门学校学生、国外留学生及学习医术、兽医者，亦即属于官吏、公吏和将来可能成为官吏、公吏的官僚统治阶层的人，免除兵役，这就表示，兵役只是被统治者所担负的义务。(B) 缴纳代人费 270 元者，可以免除常备役和后备役，这就等于免除大地主、富豪和资本家的兵役。(C) (一) 一家的户主；(二) 嗣子及承继祖父的孙子；(三) 独子、独孙；(四) 替代父兄治理家务者；(五) 养子；(六) 应征服兵役者的兄弟也都免役<sup>②</sup>。这显然是为了维持家族制度，它表现出这个征兵法的封建性。

如上所述，不但在征兵法条文中已表现出征发徭役的封建性格，而且这个常备军制所赖以存立的社会经济关系，根本就是封建性的。从当时的经济组织和阶级人口构成来看，被征去服兵役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而这种农民还担负着和幕府时代武士俸禄不相上下的封建华族士族的秩禄（虽然后来改发“金禄”公债，但其本利还是要靠农民的纳税来偿还）。此外，还得担负着维持官僚制度和军队的费用以及国家各项开支。所以，农民并没有能够摆脱死不了也活不成的封建剥削。同时，旨在修改土地税的土地制度的改

<sup>①</sup> 征兵编制及其总则之二第四条、第四章第九条、第十条，后来这个法律取消了。但是，户主有责任经常知道在服役期中的家属的所在。民法上关于户主得指定家属的住址的规定，与此有关。即便人民不向镇台申报，警察也不断地进行“调查户口”。

<sup>②</sup> 为了表示服兵役是一种光荣的特权，还规定曾被判处徒刑的人，也免除兵役。

革,并不是为了保障耕者有其田。恰恰相反,它比幕府时代还进一步限制了农民对山林、原野的利用,因为把山林原野分为国有、公有、民有,结果是夺去了农民的土地。

不仅如此,年富力强的男子,还要被抽調去服三年兵役,并且随时都有被調出去打仗的可能,这种情况,只是从农民生計上說,也是无法忍受的。(也正因为当局看到了这点,所以才不得不規定免除戶主和服兵役者的弟兄的兵役。)服这种兵役,在精神上并不能使人感到絲毫的光荣和鼓舞。太政官曾把詰屈聱牙的布告写成易懂的“关于征兵的解說<sup>1</sup>”,分配給各村鎮,解說上写道:“士也不是从前的士,农民也不再是以前的賤民,他們全都是同样的日本人,在报效国家这方面,当然也沒有任何差別”,政府企圖用这种說法来使人民感到光荣,但现实生活的体验,早已戳穿了这种謊言,人民并没有受騙。

人民采取一切手段頑强地、坚持不渝地进行了反对征兵法的斗争。这一斗争远非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兵賦时所能比拟,它是广泛的、大规模的、極其深刻的和多种多样的斗争。

早在1871年12月,高知县就由“兵务司”發出布告,命令18—22岁的男子进行登記,当街長到各戶进行調查开始編号时——这可能是征兵的准备工作——,在土佐郡、吾川郡的山区(这里在藩政时代常發生暴动)的人民中間,傳播开来这样謊言,說:这是为了用青年的身体煉制油脂卖给外国人,群众認为这还得了,于是就掀起了反对征兵的首次暴动(注四)。

1873年,征兵法一开始实施,到处就掀起了規模巨大的反对征兵的暴动。現在仅就暴动發生的月日、地点、参加人数、主要要求及鎮压的概况記述如下(根据“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同时还參照了其他史料的,另行注明)。

(一)1873年3月12日,度会县(三重县牟婁郡神内村)的人民(人数不詳)涌至县厅临时办事处示威,經区长劝說,始告平息。

① 在松下芳男著“征兵法制定史”中,載有全文,据說原文附有眉注,汉字旁注有日文字母,并有朱笔的句讀圈点等符号。

(二)同年4月19日,福岡县怡土郡人民發生动搖,經“豪門世家”說服,始告平息。

(三)5月22日,大分县久美郡山下村等数村居民,手持竹槍,向前來視察的县知事吁請取消征兵,并向村長等作同样要求。在这次事件中,只是被处刑者就有419名,最后由于县知事进行劝說,始告平息。

(四)5月26日,北条县(岡山县、美作国)有数万人举行持續了5天的大暴动,除反对征兵外,还要求減輕土地稅修改后規定的負担和学校經費的負担,反对廢除賤民制,反对杀牛,声称“打稔多少”,襲击了被歧視的“部落民”(关于反对解放受歧視的部落民的意义,請參閱注四)。最后是被旧津山藩武士4百名和大阪鎮台兵3个小队鎮压下去了(明治政史)。

(五)从6月18日至7月5日,福岡县嘉麻、穗波2郡及县內各地的30万人揭竿而起,除反对征兵外,还要求豁免土地稅3年、廢除学校、土地執照等,搗毀了博多的富豪宅第,并燒毀了县厅。各村的酒店和地主、高利貸等也遭到襲击。領導者是村中的医生,不分农民、工人或是商人,所有无产者都紧密团結在一起。在这次事件中,有勢力的富商小野組曾向县厅捐獻了鎮压資金(小野組的博多支店也被燒毀)。由于邻县土族30个小队的支援和鎮台兵使用了大炮好容易才鎮压下去。起义領導人中,处斬者3人,处絞刑者2人,处徒刑者86人,处杖刑者11,330人,处笞刑者52,519人,共課罰款11万6千6百日圓。当时,群众中还編造了一个笑話。相傳受了杖、笞刑臀部腫起以后,如果貼上豆腐,便能消腫,所以,全都搶購豆腐,造成豆腐价格暴漲(小野武夫著“維新农民蜂起譚”、藤井、森谷共著“綜合日本史大系”明治时代)。

(六)6月19日,鳥取县会見郡有2万数千人举行暴动,在反对征兵的同时,要求減低米价,免征学校經費及土地執照費,廢除繳公粮使用京都斗,这次暴动持續了5天(明治政史)。

④ 稔多是在社会上遭受歧視的一部分居民,又稱部落民。——譯注

(七)6月19日,鳥根县神門、楯縫、能义3郡的人民因受邻县鳥取县内暴动的影响,發生动摇,抓住警察罵“吸血鬼”,要求取消征兵名單上所盖的圖章,还企圖組織拒絕当兵的組織。县厅为进行鎮压,曾召集了数百名松江士族。

(八)6月25日,在广鳥县御調郡因之島上,有农民3百名暴动,当天被30名邏卒鎮压下去。至8月5日,該郡及丰田、奴可、三上、惠苏各郡的許多村庄相繼蜂起,只因各自分別行动,未能联合起来,因此毫不費力地被鎮压下去了。

(九)6月27日,名东县(香川县丰田、三野、鶉足、阿野、多度、那珂各郡)有两万多人,因反对征兵、要求降低物价和反对学校而蜂起,襲击村長,綁架警察。在7月6日被百余名士族和鎮台兵鎮压下去了。

(十)从6月28日至8月18日,長崎县松浦郡各村(分散在各島上)陸續分別举行暴动,这次暴动假如联合起来,可能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暴动。群众襲击了村公所,要求保証不立戶口簿、不征兵,結果被数十名警察鎮压下去了。

(十一)从6月下旬到7月間,爱媛县宇和、周布、桑村等三郡人民,受到(九)名东县蜂起的影响,举行暴动,但未及使用暴力,名东县的暴动即被鎮压下去,因此就被“官兵”威懾住了。

(十二)7月4日,熊本县天草郡崎津村的人民4百名暴动,7月15日左右,經县知事劝說始告平息。

(十三)7月23日,京都府何鹿郡人民2千余名,反对征兵和社倉,要求減輕学校經費、証券印花稅、酒稅,被鎮台兵1个中队及士族数十名鎮压下去了。

(十四)1874年(明治7年)9月10日,秋田县平鹿郡阿气村等6个村7百余人,醞釀暴动,經官吏到場,当天即告平息。

(十五)同年12月7日,高知县幡多郡川登村民530名反对征兵,結队闖进县支厅,經劝說始告平息。

以上这些事件是为了反对征兵,或者訴諸实力举行暴动,或者是将要举行群众暴动,除了1874年秋田县的一起以外,均發生在

近畿以西，尤以中部地方、四国島、九州島为最多，規模也大。这是和这些地方那一年歉收，米价及各种物价暴漲，人民生活困苦有关系。这些声势浩大的暴动的主力，并不是出卖稻米的上層农民，而是需要买米的人，或者是虽然不买稻米，但由于米价上漲，小麦杂粮和一般物价也随着上漲以致陷于生活困难的貧农、佃农和手工业者。

这些暴动的特征是，除反对征兵以外，还有很多反对学校、反对修改土地稅、反对負担經費等等。因为从那年起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并开始發放土地執照和修正了土地稅，所以群众在反对征兵的同时，也提出反对这些措施。当时，在学校里和在社会上曾大張旗鼓地进行宣傳“兵役、义务教育和納稅是国民的三大义务”，其所以同时开始实施这三件事，和人民所以对这三件事同时提出反对，就是因为这三件事中間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联系。

修改土地稅，首先是为了筹措常备軍費的經費及維持天皇制政权机关的經費，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它还意味着企圖巩固农村半封建性的地主制度使之成为天皇制的支柱。这些地主階級分子当上了村長和区長，担任有关征兵，修正土地稅，办学校，立戶籍等基層事务。新的村長制度彻底消除了以往乡約、里正等村中三長制所具有的些微的民主色彩，而构成了彻头彻尾的專制主义官僚統治的基層机构（这种村鎮制度也是从1871年实施的），有了这种地主制——乡村中的天皇制——的压力，才能够迫使人民服兵役。

由于修改了土地稅，使广大的森林变成了国有或村鎮所有，而村鎮所有和国有地的利用，都是服从于天皇制官僚統治的基層組織——村中統治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私有森林的絕大部分又都掌握在地主階級手里，因此，一般农民（佃农更不消說）即使是自耕农也要从屬于地主。同时，自耕农还要被剝削着变相的封建負担即高額土地稅，因此很难进行独立的自耕，結果就不得不从屬于村中既有物又有錢的地主，就不能从土地的束縛中得到徹底解放。在資本主义尙未發达时期，自不待言，即当資本主义發达起来以

后，被保持下来的、从属于地主的庞大农村人口也是成为提供天皇制兵士的源泉。

因为后来有很多政治家和军人主张，为了保持足够的优良兵士，必须保持自耕农，于是，就有人简单地认为只有自耕农才是天皇制军队的社会基础，而把它比作构成拿破崙一世的军队的基础——由于大革命而产生的法国的割地农民；这种比拟完全是毫无意义的类推。天皇制的社会支柱是地主，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由于体格壮健和易于灌输忠君思想，而被看做是最可靠的士兵，这倒是事实。不过，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断定自耕农是军队的基础的话，那就未免太片面了。近代征兵制度的社会基础，本来应该是通过土地革命摆脱了封建性的负担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农民（象割地农民那样的农民），但是，日本并未经过土地革命（从政治上说，也就是没有建成民族国家），便实行了征兵制，这就使得天皇制军队存在着很大矛盾。因为这样，所以人民才对征兵制表示强烈的反对。为了压制这种反对，才建立了后述的那种独特的军纪、军队秩序和“真空地带”的秩序。

义务教育的目的，不消说，是要训练人民成为天皇制的“忠良臣民”。在1872年颁布的头一个“教育令”中只说：教育是立身起家的本钱，并没提到忠孝等字样，这和征兵法布告中不提忠义报国等字样而只罗列了一些自由、人权、平等字样，是同出一辙的。这是起草者开明思想的表现，并不是政府的本意。当时，政府设置了文部省，曾大事宣传皇道教义。我们必须把这事同建立学校联系起来看。国民教育本来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作为国民一律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政府为保证人民实际上得以行使这种权利，有义务建立教育设施。所以，如果要用“义务教育”这个字眼，就应该意味着政府有义务办理的教育；但是，在日本竟成了国民的义务——不是国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是负有这种义务，并且在教育令上规定：父兄不送子弟入学，应视为“过失”；同时在每一学区都设有“学区督察员”，不送子弟入学者，要受到“督察”。此外，还规定所有学校的创办、维持及教师薪俸等一切



經費和學習用品費用，全歸村民負擔，在某些地方，甚至公立小學還要繳納學費。山縣兵部大輔在給天皇的奏章中曾說：學校的“教化”和軍隊的威壓，構成了維持天皇制的一雙車輪<sup>①</sup>。既然這樣，人民反對這種“義務教育”的負擔，也是理所當然的。1872年頒布的教育令，到了1880年又進行了一次修改，規定小學要實行尊皇愛國思想教育。本來，義務教育的目的就在這裡。

由於以上所述，大致可以了解，為什麼政府要同時實行征兵法，修改土地稅及實行義務教育，為什麼人民要同時反對這些負擔的原故。同時，也可以了解到某些論者認為反對征兵法是由於誤解了太政官布告中所載“血稅”的字樣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早在血稅這個字樣還沒有出現以前，土佐就已經發生過由於相信關於提煉人油的謠言而引起的暴動。當時人民確曾戰戰兢兢地互相談論着政府為了賣給或贈給西洋人，要烤焙人民煉取油脂，要榨取血漿，要把處女賣給西洋人作妾，要榨取他的血摻入葡萄酒里等等（注五）。而這些謠傳構成了暴動的起因之一，也是事實。但是，那種“誤解”並不是反對征兵的原因，只是反對征兵的一個表現。當時，大久保利通等人剛從歐洲歸國便認為“到處都因為征兵或征稅掀起暴動，一定會有它的原因”<sup>②</sup>。

## 2

1873年里幾乎沒有發生反抗征兵的暴力鬥爭，不過，這只是由於人民改變了反抗的形式罷了。這時，人民轉而採取了規避兵役的手段。有錢的人或者繳納代人費，或者進學校，或者充當官吏公吏（地方上的地主、富戶的子弟，很容易就可以到縣廳里去當吏役），來公然逃避兵役。一般人民則想盡各種手段，逃避當兵。譬

---

<sup>①</sup> 1872年1月4日，山縣兵部大輔上奏說：“廣教化以服人心，振武威以綏天下，此二者并行而不悖者也（中略）。關於國內陸軍設施，如能擴充近衛軍，以保聖躬，以衛宮闕；整編鎮台兵以綏撫國內，鎮壓人心，更與教化并行，使天下皆知朝威之所向及皇威之所振（下略）”。

<sup>②</sup> 宮島誠一著“國究編纂起源”明治18年，收在明治文化全集憲政黨中。

如：有的出去当养子（甚至有人給六岁幼女当“入贅女婿”的事例），有的分家，有的假装代替父兄管理家务，有的看到去北海道或琉球当移民也可以免服兵役，于是就逃到那些地方，有的托熟人只把戶籍迁到那里等等。因为当时戶籍还没彻底建立起来，对于采取这些办法非常方便。至于沒有当养子的去处，或者沒有财产可以分家的人，就干脆毀伤自己身体，或是逃之夭夭，躲藏起来<sup>①</sup>。

1875年（明治8年），全国壮丁大約30万名中，属于免役者竟达25万3千余名（达84.75%），其中嗣子約14万9千7百余名（“陸軍軍政年報”第一期），凡是男子全部变成了長子。1879年（明治12年），对征兵法进行了部分修改，但是关于免役的規定几乎沒有改动（只把有关养子的免役改为50岁以上者的养子，以及区分了免役的种类），所以养子仍然很多。1882年（明治15年）的全国壮丁28万余名中，平时战时全免役者就有15万4千名；其中包括戶主7万6千人，50岁以上者的养子2万8千人，嗣子約4万人。另外，还包括只限平时免役者6万4千人。“如不即速对此規定处理办法，軍隊即将發生缺額”（“陸軍省第七年報”明治15年）。

1881年，陸軍卿大山岩建議說：“因戶籍不完备而發生之弊端，每多出現于人口众多之地，据云長崎县之長崎全区中竟无一人应征者”。“由此可見，向来担心东京、大阪两鎮台管轄区内应征員額缺短，不无缘故”。这样，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征兵制了。大山为了防止这些弊端，建議制定严密的戶籍法規，凡戶籍簿上有关生死、出入等变动，不讓村長經办，另行委任郡公所办理，改变戶籍时，必須报請县厅，經過警察“偵察事实”确定屬实以后，才給予改变。可見作为政权基層的村長已經屈服于人民的压力，得不到上級的信任了（法規大全兵制門一）。大山这个建議被採納了，自1883年1

<sup>①</sup> 关于利用免役規定規避兵役的实例，請參閱前引松下芳男的著作。明治7年的“陸軍省日記”几乎每期都滿載各府县請示如何处理征兵檢查前的养子和分家問題的呈文。

山县陸軍卿在1877年1月4日的奏章中也認為：“或因厭惡服役，自行毀伤肢体，或借逃亡及其他各种欺瞞手段規避征集者，亦屬不少”（陸軍省沿革史）。

月起，府县内設置兵事科，在兵事科的督導和監視下，取得了“近年罕見的”成績，但这一年度的征兵，也不过征集了壯丁的 10.38%（陸軍省第八年報）。

因反抗征兵而逃亡失蹤者，无故不受檢查者如下<sup>①</sup>：

征兵不到者人数表(1880—89年)

年 次	因故不到者	逃亡失蹤者	无故不受檢查者	以上合計	不到者对壯丁总数的%
1880年 (明治十三年)	529人	9,268人	1人	9,798人	3.58%
1881	627	13,033		13,710	4.47%
1882	160	17,366	43	17,569	6.26%
1883	303	21,001		21,304	6.90%
1884	1	22,834	9	22,844	6.57%
1885	128	18,754	5,787	24,619	6.36%
1886	20	21,293	5,945	27,258	6.47%
1887					
1888		27,884	5,002	32,886	7.69%
1889	14	35,667	259	35,940	9.97%

上列表內“无故不受檢查者”为什么从 1885 年起会突然陡增到 5 千余名以上，原因不明，但是，同年“逃亡失蹤者”比上年减少 4 千 1 百多名，可能是把从前作为“逃亡失蹤者”处理的一部分，改为“无故不受檢查者”了。同样地，1889 年逃亡失蹤者驟增，而“无故不受檢查者”却由 5 千多名减为 259 名，这可能也是把无故不受檢查者当作逃亡者处理了。总之，無論是“逃亡失蹤者”或是“无故不受檢查者”，都是在該年度应受征兵檢查而逃避了的。这个数字逐年增加两千名乃至 4 千名，大概是由于旧的逃亡者多未就捕，而每年新發生的逃亡失蹤者多于被捕的逃亡者的緣故。1889 年以后的数字是多少，不得而知，因为沒得到有关統計，希望讀者賜教。

当时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話：“征兵和懲役（徒刑）只是一字之

<sup>①</sup> 小山弘健根据“陸軍省第三次統計年報”所作的表，載在該氏所著“近代日本陸軍史”。

差，而一个是腰間帶刀，一个是腰系鎖鏈”。因为被判处过徒刑的人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話头。松下芳男的著作中，还詳細記載着，当时，曾有人發售“免服兵役須知”的小册子，到处出现了“保証逃避征兵指南”。

即便被征去当兵，人民也沒有停止反抗。“憂慮家屬生活困难”而逃脫者層出不窮。川路大警視曾經在 1876 年建議建立国内旅行証制度，在他这份建議書中，还特別強調借此可以帮助逮捕逃兵（大警視川路利良君傳）。根据陸軍省第七年報所載，1881 年度的陸軍犯罪总数（既決部分）为 2,834 人，比上年增加 87 名，其中近半数是逃亡犯，共 1,403 名；次年度的逃亡犯为 1,066 名（第八年報）。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征兵的初期軍隊时常和警察發生冲突，这倒不是士兵对征兵的直接反抗，而是由于对被征入伍的不滿情緒而产生的，它是对权力无法發泄积憤的一种反抗方式。例如：1874 年 1 月 18 日，在东京本乡区三丁目警察發現士兵喝醉酒在路旁小便，就对他加以申斥并想帶走，士兵不服进行抗拒。这时，跑来了近衛軍二十余名声援兵士，于是，警察也求得增援来同兵士对抗，接着又跑来了士兵五、六十名，最后兵士竟增加到 150 余名同許多警察搏斗起来。此外，比如說 2 百名士兵襲击了警察派出所；由于警察帶走喝醉酒鬧事的兵士，数百名士兵为了报仇，竟把二、三十名警察打得体无完膚等等事例，曾不断出現在 1871 年的報紙上。因为史料关系，一般人所知道的这种事件多半是發生在东京的，就是在地方也是一样，例如熊本鎮台的兵士，遇事便同警察冲突。这类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于 1884 年（明治 17 年）1 月，在大阪松島花街發生的 6 百多名警察同 1 千 4 百名士兵的冲突。在这次事件中双方拔刀相斗，結果兵士死了 2 人，負重伤者 18 人，警察中也有十数人受伤。当时剛剛建立起来的宪兵也有 1 百来名跑到現場想进行排解，但是，束手无策<sup>①</sup>（大浦兼武

<sup>①</sup> 盐田保美著“从历史上看宪兵制度的創立”，杂志“軍事史研究”第二卷第一号（昭和 12 年）。

傳)。

暴动、逃避、逃亡、斗争，这真是一系列惊人的反抗。天皇政府为维持它所赖以存立的家庭范围内的天皇制即父系家长制所规定的免役条款，同全民征兵这种近代制度之间是有矛盾的；人民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矛盾，使征兵制度陷入瘫痪状态。不管户籍如何严密，警察如何完备，也没能制止了这种反抗。在日本这样国土狭窄，而警察网又远远比人民的交通网和生产网不但完成得早，而且严密得多的国家里，每年竟有数千人逃避了兵役，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只要看看这样反抗征兵的人民（农民），和欣然参加拿破崙军队的法国割地农民是多末不同，就可以了解主张自耕农是天皇制军队的基础或者支柱的学说是怎样一会事了。

人民的这种激烈反抗，使一部分军方的首脑也觉察到征兵制和天皇制的矛盾。山田显义少将到欧美各国考察了一年半兵制，在到处燃起反对征兵的火焰的 1873 年归国后，提出了改革军制的意见书。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意见书的一开头便着重指出：军队是浪费国家的财富、妨碍少壮人的事业和学业、束缚他们的才能、教人学坏和传播梅毒的凶器。他还说：军队是“抵抗的工具”，而“抵抗是人的本性”，所以建立军队这种坏东西，也是万不得已的。这种想法不可能出自革命军和人民军队的干部、兵士，只有受到人民怨恨和反抗的天皇制军队，才会有这种想法。山田显义在介绍了欧洲军制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所谓强兵，并不仅是要在军事方面优越，“要紧的是一般人民的知識要超过敌人”。接着，他批评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制的现状，主张首先应该巩固“基础”，政府对人民要“忠实讲信义”，政府同人民应该有共同遵循的“不变之法，不易之律”即宪法，使日本成为近代的法治国家。首先应该培养军官、军士，建立军事工业，尤其应该普及一般人的教育，对小學生也要施行军事训练，一般国民则每星期日施以训练。如果这样奠定了“基础”以后，再实行征兵制的话，入营期间只需两三个月，炮兵亦只需 5 个月就够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伏乞断然将征兵期推迟”，以便在以后的 8 年乃至 10 年中，打下这个基础。

总之，山田显义认为只有以资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为基础，才能作到全国皆兵，并且那时只有民兵制的军队就够了。同时，为争取他所說的基础即民主革命而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认为“征兵法与政体不合，故兵制无从建立”，把它作为政府的失政而进行了攻击，同时主张为了实行征兵制，必须建立议会政治即民族国家（明治10年立志社建议，“自由党史”）。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在他的“民权辩证”（1880年）中也曾指出，所谓民选议院为时尚早之說，是与征兵法相矛盾的。他还揭露征兵法同天皇制的矛盾說：在农村中过孤立生活的农民被征去当兵以后，“和許多士兵住在一起，散步时多数人相伴而出，徘徊街头”，从而，認識了广大的社会；同时在军队中“閱讀書籍，学习写作，接触‘扶桑新志’、‘近事評論’（自由民权派的杂志）等激进杂志，将不复有挖掘甘藷之心矣”。但是，退伍以后，还要去度貧苦生活，“如斯而不主張民权，高唱自由主义、不充当竹槍席旗<sup>①</sup>之先鋒者几希矣”。

这种矛盾，促进了上述的人民反抗，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兵士之間也产生了革命情緒，他們不但越营逃亡，而且还發生了政治性的动摇，終于釀成竹桥兵营近衛部队的叛乱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經過及天皇政府怎样“解决”了这些矛盾，将在以后闡述。

（注四）乍一看来，这次起义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反动的。試看名野川乡及大崎村全体村民的要求：

（一）恢复旧藩主；（二）反对引进“外国人”来；（三）反对廢除賤民制，以上三項要求是和（四）反对村公所把18岁至20岁的男子不經通知村民，便送去当兵，以及反对登記門牌号碼、住戶姓名的要求一并提出的。

其中（二）的要求是和（四）有关联的，因为深信要把日本人交給外国人去煉油才提出来的。关于（三），正如文中所說的“把农民都变成秽多，有何益处”那样，他們认为廢除賤民制度，与其說是解放賤民，毋宁說是使以往的农民也都淪为賤民，因而才提出来的。这是由于人民通过維新并未从封建剝削和压制中得到任何解放，因而把争取解放的方向弄反了。（一）的要求恢复旧藩主是出于仍托为横倉山神社的啓示而編造出来的煽动詞句中的思想：为了阻止把日本人送给外国人去煉油，“卖给外国

① 农民举行起义时，削竹为槍，揭席为旗。——譯注

人去当奴僕或作妾，屆時按戶籍順序辦理；奸吏从中索取賄賂”等等，非有旧藩主不可。所謂“神的啓示”中還有“廢除鄉約，設置村長，此輩莫非奸吏之類，媚外之徒”。

暴動之所以把反對征兵、爭取解放的要求同反動的要求放在一起，可能是由於受到暴動的領導者巫師（他編造“神的啓示”）以及同旧鄉約相勾結的上層農民的反動思想的蠱惑。當時，該地土地稅已由徵實改用現錢繳納；旧藩鈔票已被廢除而改用了太政官鈔票；僧侶已被強迫還俗，並已廢除宗門帳<sup>①</sup>，實行了新的戶籍法（編排門牌號等），準備征兵；一言以蔽之，專制主義的官僚統治已經滲透到山村，人民深切感到這種束縛甚於藩政時代的專制統治，對於這種束縛的反抗，乃是這次暴動中人民所提出的要求的實質。要求恢復旧藩土，也正如由於廢除旧藩鈔票改用太政官鈔票因而感到困難的人民要求恢復旧藩紙幣一樣。而這些要求的中心，還是反對征兵（小野武夫著“上佐的煉油暴動”、“維新農民蜂起譚”所載。“明治初年農民騷擾錄”、“明治政史”）。

（注五）關於“誤解”“血稅”的各種情況的基本史料，在松下芳男著“征兵法制定史”第二章中有詳細的記載。其所以產生了這種“誤解”，是因為政府“榨取民脂民膏”。“明治文化全集”文明開化篇中的“開化的入口”一書（1873年出版）中，塑造了名叫迅川愚太夫的1個人物，由他口中說出“學校經費和這次征兵的督促真是苦死人”，還有1個名叫“安樂院鈍念”的和尚道出：“近來又是征兵，又是血稅，又課買契稅，又課官員的薪金稅；這還不算，還要榨取全國青年的血液當作稅”。對此，有“西海文吉”和“文明”等人物來進行說服。可見對於血稅的“誤解”，不過是反對天皇制的學校、土地稅、商業稅和剝削的一種最原始的表現而已。

當時人民對於政府所實行的改革的看法，最鮮明地表現在“開化問答”（1874年刊）中名叫“旧平”的一個農民所說的這樣一段話中：

“據說天皇親政，是為了讓全國老百姓安居樂業。可是，維新以來，對於一切事物都死求百賴地徵稅，所以老百姓們开玩笑時也說近來皇上大概是患了痰喘病，因為他的喉嚨老是在吱吱地响。（因為天皇老是在說“稅、稅”，在日語中“稅稅”的讀音是和“吱吱”相同。）

“這般年景，還讓農民市民扛上洋槍，好像被狐狸迷住了似地排成隊齊步走。這套王法也未免太不講理了！”

“這次改用現款納稅（指修改土地稅）對老百姓說來，真是糟糕極了，老百姓中很少有人經常持有繳納土地稅的足夠的現錢，每到繳土地稅，商人們便乘機來大把撈錢，老百姓是躲不開的”。

“無論政府怎樣說土地執照是為了鞏固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但歸根結底它是為了搜刮民財的坏事，所以欲蓋彌彰，結果，災禍已經落到人民頭上，造成了全體社會

<sup>①</sup> 為了禁止基督教而設立的戶口冊，記載各人所信佛教的宗門及出生年月日等，由戶主及所屬佛寺蓋章提交本管官署。——譯注

的巨大痛苦”。

“照你説来，所謂人民的权利，归根結底就是自由自在，政府的一切政务，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可是，冷靜地看一下，現在的社會情况，根本不象你説的那樣。首先請你看看警察的作風，（接着，講起警察如何压迫人民，他对于‘官老爷們’如何低首下心，而对于穷人又是如何作威作福的情形，）这是我旧平經常亲眼看到的情形，每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深恨警察作風恶劣，若是不犯法的話，我倒想給他們几个耳光”。这种想打警察几个耳光的气憤心情，就是釀成暴动的根源。

### 第三章 天皇制軍队的建立

#### 第一节 統帥权的独立

天皇政权不等政治、經濟、社会及文化达到真正近代化，就想通过本来属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征兵制来建立最新式的即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新成果来装备和补給的常备軍，虽然他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遭到人民的激烈反对，不，正因为遭受反抗，他們却越發傾注全力来扩充軍备。

1874年，当征兵的軍队还在逐漸形成的时候，政府就在美国公使等的煽动和指导下，为了把土族和一般人民的反抗情緒轉向对外，也是为了攫取領土和富源，竟悍然侵略台灣。这件事意味着这时日本軍队已經不止是“鎮压国内”的工具，而且开始以侵略海外为目标了。

政府在这次“远征”中，給予了三菱公司以莫大的保护，使它掌握了東亞的海运事业。不过，这样做只是为了建立向海外进行侵略所需要的运输船队，而不是为了貿易<sup>①</sup>。

次年1875年，海軍当局利用初具艦队規模的海軍，侵入朝鮮江华島，迫使朝鮮接受了不平等条約。同年，又向英国訂購3艘軍艦。这批軍艦在3年后建成，共花掉310万5千日圓。这笔款相当

<sup>①</sup> 明治文化全集杂史篇中“三菱公司内幕秘聞录”里有詳細記載。



于当时文部省或农商务省的岁出 1 百万至 150 万日圓的两倍和三倍。1876 年(明治 9 年),决定在“东海”、“西海”設置海軍鎮守府,但实际上只是在横濱設置了东海鎮守府(1887 年迁至横須賀)。

陆軍兵力也如下表所开列的那樣,是在逐年增加。(从 1875 年开始解散壮兵至 1883 年为准备發动甲午战争而頒布軍备扩充法——从次年才实行——根据陆軍省第八年报。)

区别	年度	1875年	1876年	1877年	1878年	1879年	1880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将官		10	21	16	20	25	25	26	31	32
校官	队副	38	38	52	58	66	80	86	90	95
	队外	109	111	124	130	138	164	154	158	168
尉官	队副	857	1,118	1,285	1,234	1,251	1,525	1,588	1,584	1,574
	队外	397	467	582	808	725	804	645	623	619
軍士	队副	4,094	4,585	4,909	3,791	4,056	4,823	5,144	4,996	4,843
	队外	873	443	672	898	711	766	742	842	890
兵士	队副	22,336	23,230	29,250	30,886	32,126	30,702	31,550	34,295	35,469
	队外	260	391	934	566	439	464	347	377	365
学生		1,950	1,996	1,727	2,201	1,905	1,281	1,266	960	877
留学生		17	11	6	1	0	34	35	16	13
軍屬		2,162	1,956	1,699	1,586	1,636	1,625	1,772	1,802	1,989
合計		32,645	39,332	40,859	32,017	43,116	42,315	43,832	45,815	47,040

另外,预备役和后备役的增加情况是这样。1875 年: 4,618 名; 1876 年: 6,415 名; 1877 年: 5,530 名; 1878 年: 9,530 名。此后急剧增加,至 1883 年增至 81,168 名。

陆軍的各种机构,也逐年扩充起来。1874 年 1 月,陆軍卿曾揚言說:“划定全国防御綫,內足以防禍乱于未發,外足以制覬覦于未然”。从这年开始建立联队編制。同年 11 月,頒布“工兵方面条

例”；次年，1875年2月，頒布“炮兵方面条例”。这里所說的“方面”，是指管轄領域，工兵方面是指筑城机关，炮兵方面是指掌管槍炮火藥生产計劃及进行生产的机关。这些机关分为东京和大阪“两个方面”。同年5月，所屬各学校均已独立，兵学寮因而被撤銷了。同月，在琉球藩設置熊本鎮台的分遣队。这样，对于从解散壮兵、頒布廢刀令直到西南战争为止的一系列土族叛乱，新的军队都取得了胜利。

西南战争以后，在兵制史上和全部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付诸实行了，这就是作为独立机关，直屬于天皇之下，分別設立了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从此，統帥和軍令便脫离一般政治而独立了。

軍令机关的創建，最初是在1871年7月实行了兵部省官制改革，同时設立參謀局，作为兵部省的外局。后来，兵部省分为陸軍省和海軍省时，撤銷參謀局，參謀局的业务划归陸軍省第一司和第六司掌管。当1874年2月侵略台灣时，撤銷第六司，又重新設置了參謀局。这时，正式規定了陸軍卿“要由将官担任”的武官制。海軍卿則不然，当时的海軍卿是文官胜安房。至1878年，又撤銷參謀局，設置參謀本部。

以往的參謀局和它的前身都是陸軍省的一个局，隶属于陸軍卿，因而归太政官統轄；而新設的參謀本部則直屬于天皇，它是不受太政大臣或其他任何人控制的独立的軍令机关。

不但如此，另外还規定參謀本部長可以把已經决定的軍令事項“下达陸軍卿責令执行”。因此，作为政府机关之一的陸軍省，在另一方面却隶属于參謀本部了。这样一来，就給參謀本部通过陸軍省来控制政府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因为陸軍卿只限由武官担任，如果參謀本部通过陸軍省提出要求坚持貫徹执行时，政府就不得不屈服于參謀本部。这在实际上也就是造成了軍部机关高于政府的局面。

統帥和軍令的独立和优越，由于設置監軍本部，便更加巩固起来。監軍本部長掌管陸軍的教育和檢閱，并作为統率各鎮台司令

官(旅团长)的师团长，执行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军令。监军本部也直属于天皇。以往关于军令的决定(形式上是由天皇决定，但这里所說的是实际关系)和执行，都是属于陆军卿(最后是太政大臣)的权限，而现在陆军卿却成了只掌管平时的陆军人事、军需和战时的供应以及与此有关范围以内的军令的机关了。

这样一来，决定国家拥有兵力的数量和装备的，事实上已经不是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了。当然，军备需要有预算、而决定预算的权限，在于政府而不属于参谋本部，所以在法制上参谋本部是不能决定兵力数量的，不过，它可以通过陆军省来做。参谋本部还可以通过天皇对政府施加压力。怎样来调动建立起来的军队，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专断，因此，如果参谋本部决定要发动战争，而师团长们又执行这个决定的话，政府和人民便毫无办法。实际上，1931年以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就是这样搞的。不但如此，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也都是在政府宣战以前，军部早就开了火。这种使军部得以独断专行的机构，早在1878年时就造成了。这是认为兵制必须独断专行的天皇制军队的必然的路线。

统帅部之所以在1878年时独立出来，是由于当时军队已经不以镇压内乱为主要目标，而开始以对外战争，具体说来，即以对朝鲜或者中国作战为现实的目标了。这一点从当时陆军的准机关报“内外兵事新闻”关于设置参谋本部的理由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文中说：“今观亚洲局势，西有中国，东北有俄国、朝鲜，一旦风云紧急，则我东方海国，岂能与此无关乎(前引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论集”)。当时日本曾强迫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这是为了使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转而隶属于日本的一种野心的表现(参阅本书第二册第一篇)。试看参谋本部的内部分科，也和以往的参谋局不同，它是把主力放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准备上面的。

早在1880年，统帅部的独立就公然发挥了它的威力。11月30日，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把参谋本部编纂的详述中国军备的“邻邦军备略”6册提交给天皇；同时，还作为紧急任务提出修筑炮台

和扩充軍备說：“方今歐洲計較兵之多寡，甚于計較国之貧富，是以各国兵制均按其人口……(中略)何暇計較内外国債之多寡，顧慮岁出岁入之不相抵乎”。他認為强兵乃是富国之本，而决不是相反，“而今若以富国为本，强兵为末，則民心日趋于追求私利，不知公利之所在……将以虛飾为習尚矣。苟如斯……一旦發生战事，則叛君卖国之賊，将群起而不可御焉。故所謂强兵，自非幸灾好战之謂，适所以維持風尚，不使流于浮薄頹廢，进而充实倉廩，以免陷于空虛之策略也”。然而，最近“身为臣僚者”，狃于安逸，已不如昔，“是以关于兵备海防等事，臣虽再三論之，而傾听者甚少。安于小康，敷衍顛預，茫然不察时势之所趋，一旦有事，則将噬臍无及矣”。所以主張必須扩充軍备，修筑海岸炮台。

一讀便可看出，这里並沒有真正屬於軍令的事項，他在論述政治，主張应将国策的根本放在强兵上面。山县攻击政府由于財政困难不能充分答应他所提出的漫无止境的扩軍要求，并企圖通过天皇来威胁政府說：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半年以后，即 1881 年 5 月，陸軍卿大山岩和山县參謀本部長联名向天皇申訴既定的有关修筑东京灣炮台的經費不足，終于爭取到用天皇的命令，特別撥付了这笔經費。这样，只要一行使參謀本部長的上奏权，就可以不經政府同意而取得軍备經費(“陸軍省沿革史”，“公爵山县有朋傳”)。

关于各軍事机构的建立和調整扩充，請看本篇末尾的附表从天皇制的确立到 1886 年改革时的陸軍机构沿革表。

## 第二节 財政及經濟基础

强兵高于一切，这是天皇制建立以来的最高国策。財政的絕大部分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的軍事費。廢藩以前的軍事費，只是中央政府和各藩的直接軍事費的总額，——因为各藩的部分不詳，无法估計——可能超过岁入的一半以上。而在廢藩以后，除了陸海軍省經費、軍艦購置費、营房建筑費以外，每年的鎮压暴动費、吞并琉球費、侵略台灣战争費、从佐賀之乱以至于西南战争的一系列土族叛

乱的鎮压費等，当然也都是軍事費(在一般的財政史、軍事史的書籍中，这些費用并未列入軍事費內，可能是把鎮压內亂費列入行政費內)，如果把这些費用和陸海軍省經費加在一起，恐怕要占歲出的一半以上。当时華族和士族，每当鎮压暴動、叛亂時，都曾隨時應征，事實上他們還是預備軍人，所以，他們拿的俸祿和“金祿”公債利息也是具有軍事費的性質。這樣算來，在天皇制的最初10年中，軍事費恐怕要占全部經費的80%以上。譬如說，1877年西南戰爭那年，一般預算的歲出總額為4,842萬余日圓，其中陸海軍省經費為920萬圓，只是這一項就占歲出總預算的19%，此外還有西南戰役費4,156萬余日圓，這個數額幾乎等於通常一年的歲出總額。

從西南戰爭結束有關內亂的經費沒有了以後，到頒布憲法之間各年年度中，陸海軍省的定額經費及炮台費、軍艦購置費等被公開列入預算內的軍事費數額在各該年度歲出總額中所占的比率如下。

#### 1878年—1889年陸海軍省經費及直接軍備費

年次	金額	對歲出總額的比率
1878年	10,087千圓	16.5%
1879	11,896	19.7%
1880	12,022	19.0%
1881	11,874	16.6%
1882	12,890	17.4%
1883	16,902	20.1%
1884	17,684	23.0%
1885	15,623	25.5%
1886	20,737	24.5%
1887	22,452	28.2%
1888	22,787	28.0%
1889	23,583	29.6%

從以上的預算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天皇政權的確是把它的所有力量投到軍事上面。人民不但被迫負擔了這樣龐大的直接軍費、官僚統治的各種費用、以及具有軍事意義的特權商人扶植費

(三菱保护費就是它的典型),而且还要被迫負担每年付給华族、士族“金祿”公債的利息 1 千多万日圓,这样怎么能受得了呢?

为了进行这种掠夺,为了保护天皇制的社会支柱——地主阶级,竟然放弃了土地革命,代之以修改土地稅,結果,使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得到了巩固。民間的財富被政府搜刮去以后,把它投于保护特权商人(政府称为“富国”或“振兴实业”)和政府經營的軍火工业方面。旧幕府时代各藩的軍火工厂集中到政府手里并加以扩充,当时一般机械工业还没有影子,而炮兵工厂、横須賀造船厂等却發展成为第一流的大工厂。作为軍事輸送預备船队的海运事业,作为鎮压国内人民的軍事警察輸送路綫的鉄路,以主要供官厅、警察、軍隊之間的联系用的电报电话等設施,都是在牺牲經濟上的需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关于海运方面,前边已經提到,至于鉄路干綫,最初計劃后修东海道綫,先修中山道綫(結果,因为工程艰巨,改为先修东海道綫了)。电话方面,在 1889 年时,东京大阪間的長途电话綫,只供官厅同軍隊之間使用,而不准一般人民使用,到了 1890 年底,才架設了东京和横濱两市內以及两市之間的电话来供人民使用。电报也是一样,主要力量是花在修建供应官厅、警察、軍隊使用的設施方面。电报在軍事上的价值受到重視,人們甚至認為政府能在西南戰爭中获得胜利,主要是由于独占了电报,那以后便大力扩充了电报設施。早在 1883 年就与朝鮮政府簽訂了海底电綫敷設条約,这当然不会是为了商业通信,其主要目的是为供駐朝公使館和軍隊(从前一年起就有少数日本軍隊駐在汉城)等同本国政府和軍部联系之用(參閱“开国五十年史”)。

这样,在农业方面还保留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掠夺农民的基础上,国营和特权商人的資本主义經濟,带有濃厚的軍事意义获得了早熟,其結果,断送了真正的“富国”——使人民富裕起来——,大大妨碍了民間資本主义的全面發展,从而使得近代生产事业的基础成为極其薄弱而不稳固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政府怎样搜刮征斂,只能使被搜刮的源

泉日趋貧乏，所以財政也就不能不日益困難。因為只能靠這種貧乏的來源來維持那樣龐大的軍事費和官僚費，所以政府就不能不經常苦於財政支絀。儘管這樣，削減軍事經費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1877年12月，西南戰爭後財政發生危機，政府計劃削減各部預算二成，可是，陸軍卿表示反對，他主張：有關軍隊、警察、司法等經費，是“政府執行任務”所必需的，因而不能削減；不過，“立法議會經費”在專制國家里雖然對於緩和民心尚有其必要，但仍有削減余地；農業振興費也“並不是非有不可的”；同時，“政府也沒有擔負教育的義務”；一句話，他主張應該削減這些具有民主意義的經費、生產事業費和教育費。

雖然如此，因為當時財政已經瀕於破產，結果陸軍經費還是被削減了。可是，到了次年，如前所述，陸軍經費反倒增加起來，建立參謀本部，以後又利用“統帥的獨立”要挾政府說：“何暇計較內外國債之多寡，顧慮歲出歲入之不相抵乎”，拚命要求擴軍，並且一意孤行地堅持下去。這在一方面造成了對人民的進一步橫征暴斂，而在另一方面卻又利用這些軍事支出來扶植特權商人，使國民經濟越發走向畸形的、不健全的發展的道路，而且不斷地擴大這種惡性循環。在一個時期里曾因早熟而發展起來的國營軍火工業，由於一般工業水平低，馬上又停滯下來，而且在技術方面還不得不依靠外國<sup>①</sup>。關於這些問題的具體的、詳細的闡述，只好讓給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等書了。

### 第三節 奴隸式的軍紀——憲兵制度

人民反抗、財政困難、經濟基礎薄弱，所有這一切都反映着企

<sup>①</sup> 一般人總是說不管是由於日本生產槍炮技術的早熟也好或者是怎麼的也好，反正1880年的“村田式”步槍是日本產品的一個優秀的實例。但是村田式步槍並不是超過國際水平的產品，它只是把外國步槍改造成為適合於日本人使用的步槍罷了。在日俄戰爭中，日軍曾被俄軍的機關槍打得落花流水，從這個事實也就可以看出造兵技術是如何低劣了。為抵補武器的落后，就採用“敢死隊”戰術；反過來說，也是正因為好搞什麼敢死隊呀、特攻隊呀等，所以武器總是落后於國際水平。

圖在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極端專制政权的最近代化的、最强大的軍国主义軍队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質上是和从前幕府想在封建基础上建立近代化軍队而發生的种种矛盾性質相同。随着政权的統一，生产事业的發展以及軍队的扩充增强，这种矛盾越發扩大起来而表现为新的形式。

不过，一部分矛盾多少經過調整而减弱了。例如，旧幕府軍队中培养軍官同封建身分制度的矛盾等，在廢除身分制度而單純化了的天皇制軍队中，是相当减弱了。但这不是說天皇制軍队中就完全没有身分上的特权或差別了。作为“大元帅”的天皇姑且不論；1886年3月修改的參謀本部条例中，規定本部長要“以(天皇的)勅令由皇族一人担任”，这一点，在3年以后进行修改时，也沒有变动。自从1873年12月实行征兵制时起，就規定皇族“今后将被派参加海陆軍”，以身分上的特权充当軍官；对于华族，則于1881年4月勅令“少壮者务須立志参加陆海軍”，也是以身分上的特权(从另一方面說，也是义务)充当軍官。(华族須要基本上学完所規定的軍官教育課程，方能被任命，任命时适当照顧他們的身分。)由于軍队的上層存在着身分上的特权，使得最下層因身分关系而遭受的压迫十分严重。德川时代被称作賤民的人們，維新后虽然在法制上变成了平民，但在社会上和軍队中(尤其是在軍队中)都受到身分上的差別待遇，只能充当制鞋兵等，升不到上等兵以上，也不能进士官学校<sup>①</sup>。

要想徹底解决这些矛盾，除了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等民主主义革命以外，别无他途；然而天皇制却恰恰是为了鎮压革命才拥有这种軍队。前引山田显义的建議書中指出通过改革天皇制来緩和这些矛盾的办法，可是天皇制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

<sup>①</sup> 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史料，直到后来成立了全国水平社展开反对軍队内差別待遇的斗争以后才出現。在那以前，恐怕差別待遇还要厉害。

(水平社是遭受歧視的所謂特殊部落民，为爭取平等待遇，开展“水平运动”的組織。这个运动最初是在大正11年[1922年]由京都开始的，以后很快地就遍及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到迫害，战后改为部落全国解放委员会。)



他所說的“基础”。天皇政权对于这些矛盾，并未想通过改革政治、經濟来加以解决，而是企圖利用日趋完备的軍事、警察机构和奴隶式的教育制度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使民气消沉下去；在軍隊中，則采取奴隶式的軍紀和等級制度来压制士兵，抹杀士兵的人格，并利用宪兵的監視来窒息士兵的反抗。而对于扩軍同財政、經濟的矛盾，則認為强兵乃立国之本，企圖靠侵略邻国来加以解决。

西南战争以后，自由民权运动从以往的“上流人士的民权論”，發展成为全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它的影响当然也不能不波及到軍隊中来。

1878年(明治11年)8月，近衛炮兵第一大队士兵260余名，因为前一年西南战争的論功行賞只厚于上層，对于軍士和士兵不但沒有奖賞，反而減低了薪俸，所以感到憤慨，在三添卯之助、小島万吉等领导下，掀起了叛乱。在这以前，他們曾再三給上級軍官写信，申訴不滿，但是未被理睬，终于在8月23日夜里，杀死大队長和值勤軍官，放火燒毀营房，开出竹桥兵营，为了振作士气，首先开炮轟击了座落在兵营前面的大隈財政大臣官邸，从那里又开到赤阪临时皇宮門前。他們打算联合近衛軍內的同志，燒毀皇宮，等待各參議来上朝时，一下子把他們都杀掉或逮捕起来。但是，“叛軍”馬上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一事件的結果，有53名被槍决；軍官中，有岡本少校和內山定吉少尉因与事件有关系——有关系到什么程度，不明了——受到了处分。

当时，軍官、士兵反对減薪的，不仅是竹桥炮兵队；据新聞报道，大阪鎮台炮兵第四大队、宇都宮分营(联队)和熊本鎮台，也都發生了軍官提出辞呈，士兵“有些不穩”的情形(“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

軍部首脑因炮兵叛乱而陷于惊慌失措，費尽心机要树立“軍紀”。在暴动以后，用山县陸軍卿的名义，頒發了“軍人訓誡”；內称軍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实”，“勇敢”，“服从”，然后又列举了以下各項：

(一)軍人对于“聖上”，“即使有关御容等細节，亦不得發一

言”。必須把天皇当作超人的存在来崇拜，这是一切日本軍紀的根本。只有这样，天皇的命令才能具有神格的权威貫徹到最下層。

(二)对于武官須根据表现在服装上的“軍銜等級”实行敬礼，“軍官不应与軍士、上兵混同，固不待言”、“凡事均应向上級及年資高者表示謙讓”。軍阶制度正是假借天皇权威，以把权力权威貫徹到新兵中去的武器。

(三)对于天皇的官吏，也要表现出这种精神。

(四)“批評朝政，私議宪法，評論官厅等之布告規章等行为，均系違背軍人之本分，一人如此，众人效之，終致产生輕慢上級之風，其流弊不可胜言。……喋喋逞辯，动則憤慨時事，高唱民权等”，这是最不应当的。

(五)同营的兵士战友須要亲睦，而“新入伍者，凡事应听从年資高者，不得違抗”。这样就保证了老兵对新兵的权威。

(六)对上級的无理橫暴，也必須絕對服从。申訴不平时，“因結伙为軍人所最禁忌，故不准三人以上同时出面申訴，即使事情关联到三人以上，申訴时亦不得有其中二人以上出面”，其余人等，除当局进行查詢，一概不准發言。

此外，还有几項。

然而，自由民权思想終归还是渗入了軍隊。近衛軍的步兵下士小原弥惣八<sup>①</sup>因政府压制言論自由，拒絕召开国会，义憤填胸，曾企圖在皇宮前切腹自杀来向天皇控訴。素以高傲頑固聞名的岩倉具視，对于甚至渗入到軍隊中的自由民权斗争的高潮，也无法掩飾他的恐怖情緒。1882年12月，他在关于停止召开府县議会的意見書中写道：“即便法国大革命前夕，恐亦与目前局势相差不远”，……“今日政府所賴以保持威权者，盖因手中掌握陆海軍，使人民手无寸鉄故耳。倘一任今日之形势，不予收攬人心，权柄愈益下移，道德倫理如江河而日下，即兵卒軍士，亦难保其不离心而倒戈。

<sup>①</sup> 据說：小原弥惣八后来于1884年(明治17年)2月，在他的家乡岩手县組織了“平民党”，以“遵奉欽定宪法，保护皇室尊荣，使平民亲睦，培养国力，以爭取上下均得自由”为綱領，糾合了数百名同志(朝野新聞、“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

气运一旦至此，則虽欲不蹈一夫夜呼关中失守之复轍，豈可得哉”（岩倉公实紀）

次年2月，东京日日新聞（政府的御用报纸），作为仙台通訊报道：“1月4日，仙台鎮台的軍士和士兵約会在該地杜鵑岡梅林中举行新年宴会时，其中1人發表政論演說被举發，似有联合自由党的嫌疑，其中7名被捕，交軍法會議审讯中，他的演說題目，据說非常过激”。

后来，自由民权运动由于敌人的分化、干部的叛变以及政府的镇压而逐渐削弱下去的时候，各地掀起了最后的实力斗争。其中之一是爱知县田原地方的自由党员村松爱藏和信州飯田的櫻井平吉等人的武装起义。他們在名古屋鎮台內發展了同志，在起义的大队旗上写着“爱国义党”，“自由革命”，“天誅”，“自由万岁”等字样；在分队旗上写着“要求減輕賦稅”，和“要求修改征兵法”等字样（“自由党史”，出岡岭云著“明治叛臣傳”）。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在1881年3月，建立了宪兵制度，規定宪兵“担任巡察和檢查，視察軍人違法乱紀，……用以維持国内安宁”。最初的宪兵是由警察中选拔优秀分子，作为陆軍省勤务，并由其中任命宪兵上士以下的軍士来編成宪兵；宪兵的軍官当然是由軍队中的軍官任命的。自从建立宪兵以后，所有士兵在营外的犯罪，不准一般警察过問，結果使軍队的独立性进一步提高，宪兵就可以借保守軍事机密等各种各样的借口，逐漸發展成为維持“国内安宁”的政治警察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們不但受到警察的監視，还經常受到宪兵的監視。

为了防止兵士越营，兵营高筑圍牆，1885年前后的近衛軍司令官三浦梧楼曾經說过：这簡直象“監獄”。士兵被禁閉在那里，終日受着軍紀的束縛，外出时还要受到宪兵的監視。在軍队中故意使用不同于一般社会的語言，可能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大概是为使士兵失掉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观树將軍回顧录”）。

“軍紀”越来越严厉了。宪兵制度建立后第二年即1882年（明治15年）1月頒布了“軍人勅語”，这个“軍人勅語”是把“軍人訓

誠”变本加厉而成的，其目的在于借天皇自称“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即利用天皇的直接的神格权威来树立奴隶式的军纪。

由于宪兵制度的创建和军人敕语的颁发，奠定了一切军事机构的基础，确立了军纪的根本原理，也就是确立了天皇制的军队，从此以后，便不断地进一步整备、扩充和加强了。

## 結語 走向战争!

参謀本部之所以独立，是由于日本已經决心要同中国和朝鮮开战。次年1879年4月，日本进一步吞并了琉球，廢除琉球藩，設置了冲繩县。对此，琉球王屈服了，但是琉球的人民并未屈服，他們不断地进行了反抗。同年7月，宮古島全体居民通过決議反对归屬日本，并且还襲击了警察派出所(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琉球居民企圖憑借多年以来它所朝貢的清朝政府的势力来脱离日本取得独立。在这以前，中国就主張对琉球的宗主权而与日本相对抗，中日两国关于琉球的这一爭议，从这时起經過1880年和1881年越来越尖銳化，在清朝政府中，左宗棠等人主張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种局势給日本軍国主义者造成了扩充軍备的有利借口。

比这更加严重的是，日本强迫要求朝鮮开放元山、仁川为商埠(1879年)，准許日本開設邮局(1881年11月)。但是，朝鮮却拒絕开放仁川为商埠，禁止稻米出口，要求提高关税等来进行抵制，对此，日本方面繼續采取高压政策，想迫使朝鮮屈服，日本商人憑借治外法权和公使、領事的势力，像掠夺一般地从朝鮮农民手里运走了稻米和豆类。因此，朝鮮人民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起来。当时，朝鮮国王打算聘任(实际是被迫聘用)日本軍官到朝鮮軍隊里来使其担任教育貴族子弟和訓練新式軍隊，然后解散旧式軍隊，这就爆起了士兵們的不滿情緒，民众和士兵的这种不滿都集中到当时的封建專制、对日屈从的罪魁、掌握着独裁权的王妃閔氏一派势力的头上；結果在1882年7月23日，汉城士兵掀起叛乱，民众也参加进来，襲击了閔氏一派势力和訓練院，杀死日本軍官，还襲击了日本公使館，花房公使同館員們險些被杀，倉皇地从仁川乘船逃跑了<sup>①</sup>(这次事件称为“壬午兵变”)。

① 林光徵著“朝鮮历史讀本”。

日本統治者利用这次事变来进一步扩大侵略朝鮮的野心，胁迫朝鮮，他們以保护公使館为借口，使用胁迫的手段夺取了在汉城駐軍的权利。多年以来以朝鮮的“上国”自居的清朝政府，当然不能对此袖手旁观，这样圍繞着对朝鮮的統治权問題，中日两国的对立一年比一年尖銳化起来了。

在發生壬午兵变的半年以前即 1882 年 1 月 6 日，參謀本部長同陸軍卿計議說：“試觀目前宇内局势，东方論尚未絕迹，琉球藩問題亦未徹底解决，固非可以高枕无憂之时，因此，即使財政上受到若干影响，每年亦須征足征兵法所規定之員額”。这就是說，以前由于人民反抗和財政困难，难以征足征兵法規定的員額，而現在無論如何也要强行征足。这固然是屬於軍政的事情，但是參謀本部竟向軍政当局發出这样指示。正当这时，爆發了上述朝鮮事变，于是，軍部便借机加紧扩充軍备，准备战争。8 月 5 日，据說是“为防备非常事变”而制定了戒严令；同月 12 日，又制定了“征發令”，并宣称“这是动员上必要的措施”（陸軍省沿革史）。同月，制定了“战时宪兵服务概則”；8 月 15 日，山县有朋以參事院議長身分提出“关于財政的建議”，奏請天皇扩充陸海軍。

海軍卿川村純义早在 1881 年 12 月，認為海軍保有船只过少，向太政大臣提出要求說：“应对民間船舶公司与以特別保护，一則奖励海运之發展，一則使其成为海軍之助手”。这个要求被採納了，在 1882 年 7 月，創辦了官民合办的共同运输公司，同时規定了战时征用該公司船只的办法<sup>①</sup>。这一年發生了朝鮮壬午兵变以后，川村海軍卿向左大臣岩倉具視提出建議說：应立即实行增稅，扩充海軍。9 月，岩倉具視在內閣會議席上主張說：“目前朝鮮發生事变，深感現有軍艦已不敷用，倘与朝鮮交涉宣告决裂，或同中国發

① 共同运输公司的創辦經過是：三菱公司一向受到佐賀出身的大隈大藏卿的支援，后来又通过大久保利通，同薩摩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長州派的井上馨和品川弥次郎等人，为了对抗薩摩派和打破三菱的壟斷，支援三井公司，創辦了这个共同运输公司。事实固然如此，但更重要的是，如本文中所述，它是根据海軍的要求，为了增强海軍的后备力量而創辦的，長州派和三井只是利用了这一点罢了。

生战事”，則將无法应付，所以必須立即扩充海軍，为此除征收“非常稅”，别无办法，这样做虽然近于“招惹民怨”，但实屬万不得已（岩倉家文書）。

11月24日，明治天皇召集全国地方長官，就扩充軍备宣布“聖旨”說：“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証貫徹执行”。太政大臣对此解釋說：扩軍势必增稅，而“征稅会影响民心”，故应加倍努力，压制人民的反抗（渡边几治郎著“基础資料皇軍建設史”）。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联合貧农群众，为反抗政府的暴力鎮压，已經到了非举行实力暴动不可的阶段，所以，天皇、太政大臣都分別召开了地方官會議。次年1月，山县參事院議長又特地召集了地方長官，严令鎮压人民。

从此便开始扩充陆海軍，来准备發动后来的甲午战争。試看上列陆海軍省經費增加的情形，便可一目了然。（參閱前章第二节的陆海軍預算。）

1884年（明治17年）12月，朝鮮汉城爆發了朝鮮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即所謂“甲申之变”。日本公使帮助朝鮮貴族中的亲日派，唆使他們發动武装政变，但因做得不妙眼看就要失敗，这时，日軍轉过来赶走自己唆使發动政变的亲日派，占領了王宮。这使得朝鮮人民和中国軍隊大为激憤，开始向占領王宮的日軍进行攻击，朝鮮国王逃到中国軍隊那一边。这时，日軍想要退出王宮，遭到朝鮮士兵和群众的襲击。日本政府接到告急电，立即向朝鮮派出大軍，中国也进行增兵，眼看着中日两国就要开战。只因中国方面根本不想打仗，而日本也感到軍备不足，認為时期尚早，所以战争危机才被推迟了。

此后，日本便开始按照“非常时”情况大力扩充軍备，在1886年至1889年之間，对于兵制和軍备进行了全面改革。这次改革是以新由德国回来担任陆軍次官的桂太郎少将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少将为中心，在从德国聘来的麦克尔少校指导之下进行的。当时，桂太郎和川上操六曾联名向陆軍大臣提出意見書，其中把建軍目的的分作两种，“其一是只防御敌国入寇，并严守局外中立，欧洲二等

国之建军目的是也。其二是大扬武威，当国家缓急之秋，诉诸武力以决雌雄……即所谓养他动之兵者，欧洲强国即其一等国之建军目的是也”。他们认为日本军备也应和欧洲列强一样，以正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他动的”）军队为目标（“公爵桂太郎传”）。他们就是抱着这种野心来进行兵制改革的。

改革的重点：第一，把从前采取的法国式的有关军队的编制、训练、内务的规章制度改为德国式；同时，普鲁士军队中著名的对士兵的体罚，也成为维持军纪的最重要手段，抹杀个性的军纪便日甚一日地严厉起来。

第二，废除镇台，设置师团，在每1师团下设步兵两个旅团，每1旅团由两个步兵联队组成，骑兵联队则直属师团，师团长直属天皇。师团是战略单位，相当于外国的一个军（1888年5月）。“不能不认为后来可以进行大陆作战的基础是在这时奠立的”（“公爵桂太郎传”）。

第三，由于建立师团兵制，废除了以前既是教育总监部又是师团司令部的监军本部，设置只担任教育和检阅的监军部（1888年5月），同时，还改组参谋本部，设置所谓“参军”，在参军之下并列着设置了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1889年3月）。

第四，修改了征兵法，修改的要点是（一）废除一切免役规定，官吏、公吏也要服役，取消了代人费。所有这些规定，在这以前，也有的已经废除，有的曾经修改过，而这次则完全取消了。只对生活困难者，准许缓期征集。这是因为为了维持父系家长式家庭制度而设的免役规定，变成了人民抗拒征兵的武器，所以这次才不得不把它全部废除。对生活困难者准许缓期征集，乃是社会政策性的措施；（二）对于公立中等学校以上的在校学生，准许缓期征集最长到26岁。这是因为这些学生是未来的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军队干部，准许对他们施行缓期征集，可以避免打断对他们的培养；（三）同时，对于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制定了一年志愿兵制，具有一年志愿兵资格者，经过一年即可升任预备少尉；这是同1886



年教育改革后在中等学校里加添“兵式体操”为正課相配合的。在这里也明显地暴露出，日本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首先是为了供应预备军官的场所，同时也是培养官僚的訓練班；(四)对于师范学校毕业生，准许只服6个月的短期现役，不过，只要体格不特别差，或者不是殘廢，所有师范学校毕业生都要被征去当兵。这是为了使所有小学教員，都受軍事訓練，把教师培养成为軍国主义者。

这样一来，以往旨在维护官吏、地主、资本家等身分上的阶级特权和父系家长制度的旧征兵制度，改为全国民基本均等的义务兵役制度和培养統治阶级統治階層干部的緩期征集制度了。

至此，日本军队就算具备了它的一切基本特征。它的基本特征是：以半封建的地主制作为它的固有基础，靠特权资本加以巩固，强征半农奴的人民充当上兵，用天皇的名义，用最野蛮的、蹂躪人格的軍紀和宪兵来束縛兵士。这种军队被置于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当然人民更不能过問的——假借天皇名义的統帥部的統帥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或是教育都要为軍国主义服务。它是天皇的军队，对内則镇压人民爭取民主主义的斗争<sup>①</sup>，保护天皇、軍部本身、官僚地主、资本家的統治和剝削；对外則經常伺机进行侵略。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但毫未改变这个基本特征，反而把它肯定下来。

虽然如此，它的各种内在矛盾，并未得到消除，相反，却越来越加深了。其結果，使得这种军队越来越变成沒有人性的和侵略性的军队，而軍部也越来越把持国政。最后，它终于挑起了以全世界为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到彻底失敗。

<sup>①</sup> 军队不是为了国防而首先是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革命，这在1887年10月板垣退助代表旧自由党員向天皇提出的攻击政府的奏章中，已經指出。奏章說：“将与欧美列强相抗衡，以維国佑民，保全社稷乎？則应建立一旦有事全国皆兵之制度，平素培养其勇敢之气，激励其敌愾之心。其本无他，設常备軍則无需人多，可以节省国用。应設法教育全国人民勇敢强悍，富有敌愾心，經常練兵習武，一朝有事，一日之内即可举天下之精銳悉以为兵；計不出此而仅以区区六万常备軍，又何能与欧美列强相抗衡而安社稷乎？故应設非常兵制，削減常备兵額，以其盈余，充作海軍經費。今日之当局独不知此乎？然而其所以計不出此者，盖因只欲对内施威吓之政，固集权之基，逞專恣之欲，而極不欲培养一般民气故也”（“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名家意見書”）。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日本的军国主义 (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册

作者 =

页数 = 20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 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日〕井上清 著

尚永清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根据 1953 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井上清著《日本の軍国主義 II——軍国主義と帝国主義》译出。

根据 1975 年现代评论社出版井上清著新版《日本の軍国主義 II——軍国主義と帝国主義》校订。

## 内部发行

RÌBĒN JŪNGUÓ ZHŪYÌ

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日〕井上清 著

尚永清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007

---

1955 年 1 月第 2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5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65 千

印数 13,100 册

印张 7 1/2

定价：1.25 元

# 目 次

<b>第一篇 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b> .....	1
序 章 明治维新的对外任务 .....	1
第一章 屈服和侵略 .....	16
——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一节 对强者的屈服 .....	16
第二节 “主权外交” .....	22
第三节 侵略中国之梦 .....	30
第二章 野心的焦点——朝鲜 .....	39
第一节 明治前的日朝关系 .....	39
第二节 征韩外交的开始 .....	48
第三节 朝鲜“悔日”的真相 .....	62
第三章 关于征韩的争论 .....	73
——士族军国主义和官僚军国主义——	
第一节 征韩论的意义 .....	73
第二节 西乡、板垣派的立场 .....	81
第三节 大久保、木户派的立场 .....	96
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确立 .....	101
第一节 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 .....	101
第二节 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 .....	107
第三节 征韩派——士族军国主义的去向 .....	112
第四节 新军国主义 .....	116
<b>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b> .....	125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章	甲午战争的本质	125
第一节	谁是主角	125
第二节	客观条件	130
第三节	开战的时机和战果	137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农业的变化	143
第一节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43
第二节	农业的变化	147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55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早产和对大陆的野心	155
第二节	世界和日本	165
	——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	
<b>第三篇</b>	<b>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b>	<b>180</b>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序章	米骚动和入侵西伯利亚	180
第一章	武装干涉的主角	183
第一节	外务省和参谋本部	183
第二节	西伯利亚缓冲国的幻想	190
第二章	“双重外交”	196
第一节	种种的反对	196
第二节	出兵	204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失败	214
第一节	军事和政治的矛盾	214
第二节	革命的力量	222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233
第一节	庙街事件和占领库页岛	233
第二节	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240

# 第一篇 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

## 序章 明治维新的对外任务

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日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把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另一方面要废除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及其另一表现形式——领土侵略主义，并广泛同世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明治政府屡次提出“国权外交”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只有在完成上述历史任务的前提下才可以说是正确的。

然而，怎样才能达到所谓独立自主呢？明治政府的中心人物之一佐佐木高行在1871年（明治四年）4月28日的日记内写道：“凡是稍具远见的人都说：国内人民如果不能平等，就不能扬国威于海外。”（见《明治圣上和臣高行》）。就连专制官僚的头子木户孝允也说过：“人人自立，其国自然独立。”（明治十年十一月三日致三浦梧郎书）。这就是说，为了完成维新的对外任务，基本条件是必须确立国民的独立自由。明治政府是否果然做到了这一点呢？在阐述这点以前，且先看一下维新前的日本同欧美的关系和东亚的大势。

旧幕府的武士贵族，在国内对一般人民发挥无限的特大权力。正因为如此，对西洋各国却完全软弱无能。不仅幕府及其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甚至整个日本民族势将变成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独立自主的国权已经不复存在。

卑鄙懦弱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幕府各藩的封建制度而牺牲国民的进取精神和日本国家的进步，闭关自守，甚至禁止制造大船，对内用士农工商秽多非人<sup>①</sup>的身分制度、村落制、五人组制<sup>②</sup>、行会制等等来束缚人民；对农民则肆无忌惮地实行所谓“榨芝麻油”式的剥削，同时“禁止一切新的创举”，压制所有的独立思考。他们竟然这样害怕历史的进步，以一个多点的武士来对付十个老百姓的比例在国内施行镇压，用来夸耀天下太平。殊不知他们所说的太平，只是把社会的停滞误认为政治的安定罢了。

然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在各诸侯国乡村颁布告示：“农民不得食大米，应以甘薯叶、豆叶为常食，大米要上缴，饮茶过多的女人其貌虽绝美、也应同她离婚。”但同年，即1649年（安庆二年），英国已经确立了议会政治制度。

十八世纪末，英国发明蒸汽机和纺织机，完成了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此外，还有美国的独立自由宣言和法国的大革命，以及这些国家的产业革命等等，到处都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国家，代替了封建专制。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性的贸易经济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代替了闭关自守的小规模的孤立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侵略亚洲，正是因为他们国内有了这种发展，而发展最快的英国终于先后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等国，到十八世纪末成了欧亚两洲的胜利者。当时整个印度已经处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下了。

进入十九世纪后，英国急于建成新的殖民地统治体系而彻底摧毁了旧印度，随即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廷接受南京条

---

① 秽多、非人都是江户时代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所谓“贱民”。——译者

② 五人组是江户时代的一种压迫人民的连坐制度。——译者



约，割让香港，开辟广州和上海等五个商埠，建立治外法权，缔结关税协定（1840—1842年）。从此以后，中国沦为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

被称为“欧洲野蛮国家”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在亚洲北部以强大的武力弥补它落后的经济侵略，猛烈向东扩张。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它已把实力扩张到白令海峡，沿满洲东岸南下，在千岛、库页岛开始与日本势力发生冲突。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也完成了产业革命。1847年（弘化四年）穆拉维耶夫出任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从此以后，远东经营开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858年（安政五年）迫使清国签订璦琿条约，割取了黑龙江左岸的土地，两年后，又从清国夺取了乌苏里地区，开辟了符拉迪沃斯特克（俄语是控制东方之意，即海参崴）。

幕府各藩对这样的世界形势、尤其是东亚的形势，没有任何明确的远见和坚定的对策。相反地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那些热心研究世界文化和世界形势的学者林子平、高桥作左卫门、高野长英、渡边崋山等先驱一一处刑，说西洋人是夷狄禽兽，且悔且惧。一看到西洋船只，即便是救护海上日本漂流难民送他们回国的船只也下令坚决击退。但同时还命令，对没有肇事企图的船只要供给用水和燃料，设法使其平安离去，可见方针摇摆不定。

鸦片战争期间，长崎的市政官吏高岛秋帆认为清廷的失败就是日本的危机，不忍坐视，决心建议幕府采用现代武器及炮术，在江户郊外演习新式军事操练，江川太郎左卫门等有见识的人深为感叹。可是，幕府的枪炮专家硬说西式兵术不合实用，加以卑鄙的谩骂，不久高岛秋帆被扣上走私者和擅自练兵等罪名而入狱。水户烈公<sup>①</sup>主张采取夷狄之长，在藩内延聘兰学家<sup>②</sup>兴建铸造枪炮

① 即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译者

②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学习荷兰语，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洋学术（包括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称为兰学。——译者

用的反射炉。表面看来,他好象是位先驱,但他又决不许民间自由研究兰学,主张必须严加禁止。水户藩的领导人会泽正志斋在文政末年曾发表一篇“新论”,主张采取夷狄的长处,但当水户藩决定兵士一律使用枪炮时,却立即上书激烈反对,说模仿蛮人兵法会丧失大和魂(参照《水户藩史料》别记及该书上册)。

既然被称为先驱的部分执政者都是这种情况,难怪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舰队来寇时,幕府当局固不必说,即便受谘询的诸侯以下人等,也拿不出坚定的对策,因而陷入佩里的“诳骗”政策的圈套,不得不和清廷一样签订安政开港的辱国条约。

不久,到1861年(文久元年),日本领土也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列强早就注目,特别是沙俄,它根本不重视对日本的贸易,而是虎视眈眈地企图伺机占领北海道和对马。

1861年3月,沙皇军舰“波萨德尼克”号借口修舰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任意砍伐山林,建筑房舍,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然后强迫该岛领主对马太守宗氏让它永久租借这一地方。幕府急忙派外交长官小栗(丰后太守)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小栗到对州(即对马岛)后,竟轻易地向俄人表示屈服,甚至答应舰长提出的会见藩侯(即对马太守宗氏)的要求,发给他会见的证件。小栗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对州人,摆摆官架子就匆忙返回了。后来,舰长拿着小栗的证件要求会见藩主。对州的全体人民对小栗这种卑鄙行为非常痛恨,但已无可奈何。

对州藩说来,这是宗氏一族存亡之秋,4月13日,号召武士和平民必要时对俄人进行殊死抵抗。然而这究竟有几分诚意,颇有疑问,因为对州藩于5月向小栗提出的《商讨书》里说:“芋崎一带事实上已经成为彼等领土,长此下去,势必扩张地盘,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此危急之际,“公虽欲使彼等今后不来,岂非难事”。可

见，一开头就是一种失败主义，于是请求说：“事已至此，希望我公或拨浅海之地作为补偿，或者年年给与大致与该地出产额相同的粮谷，或一次补偿，钱、粮均可。”

这样做，对宗氏一族或对州的藩士来说，也许是一条生路，然而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来说会如何呢？只有对马岛的人民，才对不法的侵略者拼命斗争到底（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论文。拙著《明治维新》、《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也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论述）。

幕府并没有就这件事呼吁全国人民给予协助，而是把它隐瞒起来，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便强烈要求波萨德尼克号撤走。在这期间，对马岛民，直到国际对立发生为止，一直英勇奋斗，阻止该岛变成租界地和基地化。半年以后，俄舰终于撤走了。这一事件在4、5月间国内已经盛传，但攘夷党的志士却热衷于谋杀外国人，竟没有一个人赶赴对州援助，或组织援军。他们只是闯进江户的对州藩邸辱骂他们软弱无能。有的人则凭占卜相信俄舰撤走来聊以自慰（文久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久坂玄瑞的信，真木保臣的《南迁日记》）。

1830年初，朝鲜也有西洋船前来要求通商。中国和日本开埠通商后，这个国家看来也迟早难免发生某种事变。但朝鲜当局毅然采取了排外主义。尤其是高宗（后为李大王）即位后（1864年，日本的元治元年），执政大院君顽固地执行强烈的排外主义，首先想消灭国内的天主教徒。十八世纪后半期，朝鲜从中国开始传人天主教，虽然经过数次的大镇压，但天主教并没有屈服，反而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这时，法国人张敬一<sup>①</sup>、达布路易等数名传教士潜入朝鲜传教，信徒已达三万人。

---

<sup>①</sup> 张敬一（Siméon François, Berneux, 1814—1866）法国传教士，在朝鲜传教受迫害而殉教。——译者

大院君在高宗即位第三年(1865年)1月,首先逮捕张敬一等三名洋人,枭首示众,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批屠杀教徒。殉教者达一万人<sup>①</sup>。朝鲜的对外危机便因此而起。

好容易逃到天津的两名法国传教士,向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罗兹及驻中国公使伯洛内报告了朝鲜事件。公使立刻向清廷交涉,结果清廷声明对朝鲜内政外交概不负责。于是,伯洛内大放厥词说:“朝鲜国王对我国不幸公民下毒手的日子,也就是他统治朝鲜的末日,”并扬言“朝鲜民众盼望我们前来解放他们。我们将开始维护秩序、正义和繁荣。”<sup>②</sup>他不等待本国的命令就派罗兹率领六艘军舰开往江华,向朝鲜政府交涉,要求惩办杀害传教士的人犯并开港通商。

法国舰队于同年9月驶抵江华,数百名陆战队士兵从江华南门登陆,占据京畿要冲达一月之久。但是,他们因遭到朝鲜猎民组成的勇敢的狙击队的奇袭而折兵,又因江华海上有结冰之虞,乃于10月5日撤走。大院君为胜利冲昏头脑,便越发“坚定了攘夷保国的信心”。当时朝鲜对洋船也决定坚决予以击退。两个月前,当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大同江搁浅时,即被烧毁,船员也全都遭到惨杀。同时,严禁使用和携带洋货,并屡次进行搜查(《李大王朝史》)。

为了抵抗欧洲各国对远东的压迫,日本、清廷及朝鲜都在实行“攘夷”。但是,这种只从视夷狄为禽兽的封建排外观点出发的斗争和杀害洋人的办法,反而被贪婪的英、美人所利用,他们借此从

---

<sup>①</sup>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U. S. A.)1871年,China Despatch. 这是1871年美国舰队驶来朝鲜时,登舰访问的朝鲜信徒所说的数字。美国公使罗从种种角度证明,这番话是可以充分凭信的。根据朝鲜史料,被残杀者达二十万人。参照《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

<sup>②</sup> W E.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pp. 378. footnote. 关于这件事的前后叙述,参照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史》第六编之四,《李大王史》。

日本人民手中掠夺赔款，压低关税，并在我国国内驻扎军队等等，只能给日本人民造成了进一步受压迫受屈辱的因素。

于是，所谓志士们认为不能退守，必须进攻，便纷纷主张向海外扩张势力，侵略朝鲜和中国。

例如，吉田松阴说：“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sup>①</sup>，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夺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然后‘爱民养士’。”（普及版《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幽囚录》）。又如，日本同美、俄两国缔结友好条约后，1855年（安政二年）4月，吉田松阴从获<sup>②</sup>的野山狱将《狱是帖》寄给其兄，作为“同志的一致意见”。他在上面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同上《全集》第八卷所收）

他梦想把封建主义因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交易所遭到的损失，借助于掠夺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封立诸侯，即借助于把封建制度推广到海外去的办法来取得补偿。但是，如果说只要对“容易攫取的”朝鲜和满洲可以完全不讲信义，那末这样取得的土地也当然要在“贸易中”被欧美资本主义夺走。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海外扩张、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主张，乃是攘夷主义的一个侧面，是从封建主义中引伸出来的一种海外扩张论，这种东西又怎能用来同扬弃了封建制度的欧美各国相对抗呢。

与吉田松阴齐名的幕府末期的知名人士桥本佐内在他的“日俄同盟论”中也说：“加上现在力量不足，根本无法同西洋各国的兵

① 即北海道。——译者

② 长州的首邑。——译者

力抗衡，进行长期战争，不如暂且结为同盟”。他认为选俄罗斯结盟最好，因为“我国孤立，不能对抗西洋同盟各国，如果有俄国作后盾，即便战败，也不至于彻底灭亡”。这样就完全令人无法相信他的主张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气概和信心，并在战略上利用英、俄对立的策略（安政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村田氏寿的信，〈桥本景岳全集〉新版上卷）。

胜海舟在1862年（文久二年）11月同横井小楠谈话时说：“开埠通商还是闭关自守的争论全然无用。人心如能一致，西洋又何足惧。今若争雄宇内，如无威权，恐怕开埠通商和闭关自守都办不到。”他又说，杀伤夷人并非攘夷，“当务之急首先在于兴国大业”。可见这两个人不愧为有远见的人。不过，这里所说的“威权”，并不是幕府专制的威权，而应该指的是国民的威权。因此，规避讨伐幕府的“兴国”之策，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兴国”之策，他和吉田松阴一样，也是海外侵略主义者，他们的具体主张就是征韩论。

《海舟日记》1863年（文久三年）4月2日记载胜海舟对长州的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和对州藩的大岛友之允说：“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据说桂小五郎等对此表示同感。单看这一段话，可以说“攘夷必须首先兴国”，向前迈进了一步，无可非议。

但数日后，又有这样的记载：“向司农监察解说征韩之深义。今日城中有此议论，俗吏大哗，皆不同意。”又说：“大岛友之允来。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息时机之将失”。仅仅遇到俗吏反对，便大失所望，还谈什么兴国的远大理想呢？况且，如果是和平的、文化的日韩同盟，我想俗吏们也不会反对。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所以俗吏也好，不是俗吏也好，都不会轻易赞同。胜海舟的意见，总的说来，不外是先向朝鲜提议建交和结盟，如不听从，

就征服它。胜海舟本人虽然没有这么说过，但倾听他的议论的大岛友之允却是说过的(维新史料编纂会：《大岛家文书拔粹》抄本，原平三《征韩论和明治六年十月政变》，载《历史学研究》第35期)。

这种议论，是在1863年8月政变以前，尊王攘夷派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想把幕府的危机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去的反动议论。这与当时的老中<sup>①</sup>板仓侯的儒臣山田方谷屡次向其君主献策“转内讧为外征，把士气(即讨伐幕府的士气)转向对外”的征韩论是相同的。所以，尽管俗吏反对，但老中板仓却还要实行。这在第一章另有叙述(参照《方谷先生年谱》、《德川庆喜公传》四)。

至于对州藩的征韩论，其实不过是假借征韩名义，请求幕府拨给“军粮”而已。这一点，参看《方谷先生年谱》即可了然。此外，对州藩吏安达土肥之亮向藩厅汇报朝鲜情况的序言部分，也坦率地透露了这一点。报告书说，由于对州藩疲弊，1863年(文久三年)请求幕府拨粮补助，但因其他藩侯也有类此请求，“按幕府内意，除非征韩，否则难于照准，不得已乃以此为理由”云云。

幕府末期的一切攘夷论，并非丝毫都没有进步思想。佩里来犯以后，幕府提出的开港论，实质上不过是掩饰对外屈辱的辩解。为了反对这种辩解而提出的攘夷论中，也部分反映了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因此，长州藩的久坂玄瑞看破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是对幕府的一种妥协论时，便加以反驳，提倡攘夷，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必要性(文久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久坂玄瑞致入江于远的信)。例如，推崇高杉晋作的土佐藩浪士中冈慎左郎，认为“攘夷”两字意味着类似美国独立战争那种民族独立战争(尾崎卓尔著《中冈慎太郎先生》)。

总之，依靠封建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加强来真正地抵抗欧美，是

<sup>①</sup> 幕府的最高执政官。——译者

根本办不到的。必须首先打倒内部幕府各藩武士的独裁专制，建立和欧美同样或更高的国民秩序和权威。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抵抗外敌，这是对州事件所证明的。1863年夏，在长州炮击外国船舰时，高杉晋作就曾道破：“吃肉的武士皆不堪重任”，他认为唯一可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把被称为“秽多”而受到鄙视的人民也都组织成为军队，一旦发生对外战争的危险时，准许全体人民自由武装，自由制造武器。长州借助于这种平民的力量，不仅闯过了对外的危机，并且于1865年击溃了从四面八方进攻的幕府诸藩的封建武士军队。

中国也是一样。清廷对欧美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群众对内则打击清廷的压制和地主的剥削，不久逼近长江沿岸，使欧美的殖民地统治者为之胆寒。英、法之所以未能对我日本恣意加以暴力压迫，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太平天国的牵制。久坂玄瑞在他1862年著的《解腕痴言》中说：“英法所以没有逞虐，对皇国动武，盖因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威势甚强，如太平天国向英、法屈服，英、法必将进犯我国。”英法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但因在中国尝到了苦头，认为对日本用武并非上策，对日政策必须慎重<sup>①</sup>。

在朝鲜，迫使侵入江华的法国舰队撤走的，并不是两班贵族，而是平民的猎人。朝鲜国民的大多数农民，被称为“驮重载的牲畜”、“政治上的零”（前引 Griffis 著书）。但是他们不仅抵抗外敌，并且在国内奋起反对封建统治。自哲宗末年到高宗初年，朝鲜民众为抵制压迫，曾经屡次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尤其是哲宗十二年（1860年，日本万延元年）朝鲜八个道到处爆发人民起义，光是

---

<sup>①</sup> R.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Narrative of the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关于英国的对日纲领，参照拙著《明治维新》。



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二十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地方官都企图叛乱（《朝鲜史》第六篇之三、四）。在这类民众中间，天主教和东学活跃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两种宗教虽然教义相反，但都是群众希望打倒封建制度、实现天国的表现。天主教徒早就主张聘请洋人、开放门户和信教自由等国内改革，早在纯祖元年（1801年，享和元年）就发生过黄嗣永等为此掀起的斗争。

在日本维新当时，这类朝鲜民众中间有人想到维新的日本来求援。1868年（明治元年）闰四月，朝鲜天主教徒朴根基和徐景端听说日本已摆脱封建闭关自守的旧习，“洋人与倭国通商”，为求援于我国，同洋人联系，来到釜山附近，想伺机潜入当地我国对马藩的商馆（倭馆），但不幸被捕（《李大王朝史》五年闰四月）。这种教徒的动向最后也决不至于在政治上屈服于欧美或其他外国，这一点可以从天主教徒洪秀全等非但没有成为欧美的走狗，相反地却成了最尖锐、最彻底地反对欧美的唯一的中国势力这一事实中推断出来。

那末，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如能对内依靠勇敢爱国的国民大众的力量，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制度，确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对外也必能在欧美诸国面前保持独立自主的国权。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平等的日本，如果向勇敢爱国的朝鲜和中国的人民大众伸出友好互助的手，那末，实际上这一定会比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修好提议对日本更为有利。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国内人民没有自主平等，对外没有独立的国权，只是企图向欧美屈服和侵略朝鲜、中国。

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废除了藩侯制度，把全国统一成为不可分割的国家，从而迈出了走向靠独立自由的人民来确保独立自主的国权的伟大的第一步。然而它的第二步，却裹足不前了。

维新政府最高和一贯的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于1868年（明治

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建议迁都的奏折中说:“一改数百年来的因循腐朽,撇开文武之别,使国内同心一致,深感一天之主皇恩浩荡,苍生如此效忠可赖,上下一体,万人感涕,此为今日急务中之最急者也”,并慷慨陈词地说,除此以外,就“不能扬皇威于海外而抗衡万国”(《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三)。虽然幕府已经推翻,但江户城还没有陷落,支持幕府的势力还很强。此时,大久保决不认为人民愚蠢而不足恃。东征的官军向人民呼吁,声称拯救万民,使之摆脱涂炭之苦,并决定将旧幕府领地的当年赋税减半<sup>①</sup>。东山道镇抚总督出兵时布告该道各村说:“德川的领地自不待言,各知行<sup>②</sup>、兵营、寺社等的领地,年来亦皆苦于苛政,此外凡有意见者,均可前来本军申诉,经审查后必予公正处理”。后来,一有机会,各道军也都发布了同样布告<sup>③</sup>。

人民响应倒幕军的号召,越后和东北两地方都不听旧幕府的宣传,各地蜂起抵抗旧藩主军队,4至6月间,越后地方的农民屡次起义,进行游击战。当时有些地方实行完全自治的村政,罢免藩主任命的村吏,改由村民选举,也有人认为“不这样,就不能纠正专制政治,促其革新”(新潟县内务部编述《越后左渡农民骚动》,羽仁五郎《明治维新史研究》,《幕府末期的政治动向》)。

6月,越后地方的新发田侯为参加奥羽越的反新政府同盟来到新津驿站时,该地的大庄头慎吾等人蜂起阻拦,形成“新发田领爆发大骚动,农民数千成群,道路梗塞,通信杜绝,秩序混乱,令人不胜痛心”,致使米泽藩惊慌失措,其势大挫(参照史籍协会《米泽藩戊辰文书》,《内外新闻》)。

<sup>①</sup> 见《复古记》明治元年正月十二日条,其实施的例子见《复古外记》,《东山道战记》第一,正月二十二日条。

<sup>②</sup> 封给武士的土地。——译者

<sup>③</sup> 参照《复古外记》,《东山道战记》正月二十二日,同二月九日,《复古记》六月七日,同十六日,八月三日,同七日,同十三日、同二十四日各条。

东北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8月，仙台藩和会津藩等逐渐受到压迫。仙台藩在伊达和信夫两郡悬赏招募农民，但无人应募。而当8月3日仙台藩企图出兵收复福岛时，中途却出现农兵一千余名，加以阻拦。第二天“福岛农民大概受了敌人（官军）的煽动，起来暴动，蜂拥来到瀨上”。一般的情况是“仙台方面经常陷于被动，因敌人善于抚慰农民，便常顺从仁心，指点近道，密告仙藩情况，致使其计应时而取胜”（《仙台戊辰史》、《石母田赖至日记》）。

这类事例在其他各地也很多<sup>①</sup>。身为东山道军和会津征讨主力军的参谋板垣退助，最关心民心向背。据说，他深知会津的失败，是“由于上下隔绝，不能同甘共苦”，痛感如要维持国家于万世，就必须四民平等和自由民权。这决不可能是无稽之谈<sup>②</sup>。

幕府的势力就这样在全国人民一致的力量下被推倒了。但是，维新的第二步却在这时停止不前了。

1868年8月，中央政府改变当初赋税减半的诺言，宣布“税法暂从旧例”，对越后府判事前原一诚等擅自在管区内发布减税令一事，认为是“中国式的粉饰太平”，给予惩罚（《前原一诚传》，《大隈伯昔日谭》）。

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从1868年5月起发行太政官札<sup>③</sup>。这时对于三井、鸿池等大商业资本给予巨额利益的保证，而对一般人民则硬说是“仁恤”，强制和金币一样流通这种完全不能兑现的纸币，凡是贬值授受者，一律逮捕下狱。1869年4月，京都府逮捕这类商人以压服人民时，府知事向大久保利通夸耀说：“市民极其浅见，官府稍施压力，马上就有转变”。然而“人心惶惶，贫穷百姓尤感困

---

① 在《米泽藩戊辰文书》中有庄内地方的事例。在《都鄙新闻》、《明治文化全集》中也有越后的庄头喜三七等勇敢行动的事例。参照拙著《明治维新》。

② 关于这一点，在川田瑞穗《片冈健吉先生传》中有详细叙述。参照《自由党史》和《明治宪政经济史论》所收板垣的论文等。

③ 即纸币。——译者

难”，甚至有人在大久保利通的邸宅张贴请愿书，各处都发生大暴动，就连大久保本人都承认这“还不如旧幕府的恶政”。政府既然施行这种恶政，那么“天下人心不信政府，怨声载道，反而留恋武士旧政”，也是不可避免的了<sup>①</sup>。

天皇政府事事失信于人民。五条誓文中明文规定“万机决于公论”，然而早在1868年末，大久保就说：“不教之民，决不能使之惯于各国充分开化之政”，他甚至在政府的部衙内说：“固然，广开言路是明政之本，然而也大有以卑凌高之弊”。大久保仿佛忘记，他自己就是以卑下的藩士身分凌驾于高高的幕府的（《大久保利通文书》二、三）。大久保等人在没有确保自己的权力以前，刚刚说过苍生庶民可以依靠，而现在却说什么不教之民了。木户孝允也在1873年（明治六年）教导后辈伊藤博文时说：“建国的大法，非专制不可”（《木户孝允日记》，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推翻数百年来的封建制度，建立新日本，其困难不容讳言，当局的苦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江户城开城前的方针贯彻到底，信赖人民，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坚定不移地把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话，建国的事业一定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彻底。然而，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指望于大久保等人，事实竟如上所述。他们推翻幕府后，并没有趁势立即实行废藩置县，而是一直拖到1871年（明治四年）7月才实行。而当那时，政府也没有把人民的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反而压制这种力量，把萨、长、土三藩的士族武力当作后盾。因此，废藩置县以后，士族的封建世禄也没有废除。

然而，士族的世禄是不能留下不废的，因为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烈了。例如1869年（明治二年）末至1870年初这段时期，长州

<sup>①</sup> 参照《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三，明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久保致岩仓的信，二年春致岩仓的建议及其他在此前后的信。

发生了旧奇兵队<sup>①</sup>的骚乱和农民的大暴动，当时前往镇抚的井上馨认为必须“着手民政，减轻粮税率(地税剥削率)”，“不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同时“如果不一律废除世禄”，恐怕连五千名士兵都养不起。1871年5月，三田藩摄津知事在奏折中说：“盖对抗万国之道，其要只在于使人民自主，各得其所”，“而所谓的世禄却大大妨碍人民的独立之道”(《世外井上侯传》一，《太政官日志》)。因此，如果不把占政府支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禄废掉，国家财政也将支持不了，政府从1872年2月后，才好容易认真订出废除计划。

当时为筹措家禄偿还基金而前往欧美募集外债的吉田清成说：“所谓禄者并非家产，政府予以没收，亦未尝不可”(《明治政史》)。这话说得很对，禄是封建身分的特权，封建制废除后，由人民的国家予以无偿没收乃属当然。然而，不相信人民的天皇政府，因害怕一百六十万士族，不敢这样做，竟以发行公债来代替家禄，分别在1873年12月发行秩禄公债，1876年8月发行金禄公债，这才算得到解决。其总额约达两亿日圆之巨。偿还基金虽然依靠募集外债，但是本利的偿还，结果还是要靠由劳动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所征的租税，而农民还象旧幕府时代一样供养了士族，并且还要担负现代国家的各种费用，这可以说是双重的负担了。所以，在改革地税时，也不得不以“不减旧时的岁收”为目标，农民的负担丝毫也没有减轻。这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得到确认，但不久很多农民就不得不出卖他们的田地了(《秩禄处分参考书》，《秩禄处分颠末略》，《明治财政史》)。

这样，作为国家独立基础的人民的独立自由，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不论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没有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木户、大久保、岩仓等人苦心经营的“专制主义”政府内部的暗斗，

---

<sup>①</sup> 奇兵队系高杉晋作向长州藩厅建议创建的非正规军队，其成员主要是下级武士、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译者

也变得不可避免了，早就发生了大久保所承认的那种“百官各自擅专，其乱如麻”的状态了（1869年春，关于政府的形式信，〈大久保利通文书〉三）。尽管大久保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形势后来仍然继续存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而木户在1873年秋说：“即便是非常专制臆断的国家，倘若年年始终如此，也决不能称其为国家，难免日益遭受外人的嘲笑，因此，虽经百年之久，亦决难望发扬国威”（明治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伊藤博文的信）。

因此，我国对欧美各国，一时很难获得独立和平等，而另一方面，征韩的主张却甚嚣尘上了。

## 第一章 屈服和侵略

### ——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 第一节 对强者的屈服

明治时代的日本对欧美外交，是极其屈辱的。如果说这种屈辱外交只是因为外交当局的软弱，或是因为缺乏外交惯例的知识和经验，那实在是肤浅之谈。这些仅仅是极其次要的因素。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兵力不足，这也完全不对。“现在皇国实患兵多而不患兵少”（佐田白茅〈征韩论〉），所缺少的只是没有把全民的力量，包括国民的兵力在内，集结起来。

日本与欧美之间难以解决的问题，理应由维新政府主动解决，外国没有理由提出什么抗议。譬如，明治初年的对欧美外交上的两大困难事件，即二分金币伪造问题和基督教徒的处理问题，就是如此。

1868年至1869年（明治元年到二年），萨摩、筑前、土佐、安艺各藩以及会津、仙台各藩，大肆伪造金币，政府也从1868年5月起

大肆改铸低质量的一分银币和二分金币。因此，不仅人民遭到莫大的危害，外国商人也大受损失（泽田章《明治财政的基本研究》，《世外侯事历》）。那时对日贸易最多的是英国。英国早就要求日本实行非革命性的自上而下的稳步改革，建立新秩序。1863年萨英战争、1864年炮击下关事件媾和以后，英国同萨、长、土等讨伐幕府的各藩进行密切合作。1867年（庆应三年）萨、长、土的人士同英国公使馆员往来频繁，甚至通知外国的有关王政复古的程序草案都是由萨藩的寺岛陶藏在大久保的授意下同英国公使馆秘书萨道义进行了协议的（参照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二，《大西乡全集》二，《维新史料纲要》五等）。

因此，英国公使巴夏礼在外交团中很自然地成为对日本最有发言权的人了。1869年正月，这个巴夏礼及法国公使乌特雷等以共同照会向日本抗议说：传说一分银币和二分金币的成色降低，有伪币流通，这是违背1866年（庆应二年）条约的，作为一国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观点来说，也是失策，希望从速采取适当措施”<sup>①</sup>。

政府对此暂不作答，仓猝派大隈重信（会计官副知事兼任外交官）前往大阪调查实情，此后对公使团的催促答复，则以目前正在调查等等为借口拖延时日。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因遭到太政官札和伪币、劣币的损害，各地发生骚动。于是大久保、木户等政府首脑为之震惊。大久保向其原籍的萨藩提出长篇建议书，促请“始作俑者”的该藩自动停止伪造。伪币种类达十八种，“某种属于某藩，皆有详细区别”。政府由于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不能对各藩给以任何约束（《大久保文书》三）。

外国公使的抗议皆有事实，“政府无言可对”，担任交涉的外交官知事伊达宗城由于无法忍受巴夏礼的怒斥而辞职了（《大久保利

<sup>①</sup> 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卷第一册。以下本章及第二章有关外交交涉事项，除有特别注释者外，皆根据上述外交文书。该文书每年编为一卷。

通文书》三，〈岩仓具视关系文书〉四）。

公使团鉴于日本政府态度游移而大为震怒，7月6日，提出一份全文为三条的备忘录。同月12日，太政大臣<sup>①</sup>三条实美、大纳言<sup>②</sup>岩仓具视、外务卿<sup>③</sup>泽宣嘉以及大隈、寺岛等政府要人，一起被巴夏礼叫去和外交团见面。政府托词伪币完全系旧幕府所造，政府并未铸造劣币云云，企图搪塞，但公使团洞悉事实，严加追究。同月17日再次会见，政府终于答应凡由政府许可通用的非正式货币、二分金币和一分银币，概由政府兑换标准货币。本来政府完全无需替诸藩随意铸造的伪币负责，但因政府许可劣币流通，结果只好负起这种不应担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这以前，1869年6月，政府为设立造币厂，与英国东洋银行签订一项合同，规定雇用该行推荐的外籍造币技师，“日本政府除非通知东洋银行及雇用的外国人外，不得擅自从造币厂运出货币或铸造货币”。除此以外，其他各项细节，也都甘心接受英国资本的领导（〈大藏省沿革志〉）。

这样一来，各国（尤其是英国）固然十二分满意，但国内情况就不好了，政府于10月下令规定银胎的劣质金币，以一百两兑换金札三十两，在通告地方官的公文中说：“现在规定以百两兑换三十两，贫民的困难实属可悯”，因而要妥加说服教育，以免穷人暴动（〈法规分类大全〉，政体、货币三，前引泽田氏著书）。

政府深知这种兑换率很不合理。当时，大阪天满的商人批评说，政府规定兑换的银胎二分的金币百两，如果加以化验，其价值等于纸币一百二十两，“要是政府不知道这点面下的命令，可以说是官愚人民也愚，要是官吏心中有数面发此命令，可以说是欺骗愚民，贪图非法之利”云云（〈改订肥后藩国事史料〉十）。

① 相当于首相。——译者

② 类似副首相的官。——译者

③ 外交大臣。——译者



因此，信州地方的上田和饭田，美浓地方的土岐，丰后地方的冈，摄津地方的高槻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上田的民变除伪币问题外，还提出民选村吏的要求，数万民众涌集城下，这诚然是万不得已（《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改订肥后藩国事史料》十，《维新史料纲要》十）。

政府在对外对内关系上既然这样截然不同，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一致对外的抵抗力量。所以这一年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比幕府签订的安政条约更为变本加厉，更为屈辱。这种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马上就牵涉到对英美法的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明治初年外交上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天主教问题。肥前地方的浦上或五岛等地方的村民，在幕府近三百年的彻底镇压下并未屈服，坚决信仰基督，表现了日本人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到了幕府末期，对外交通开放，传教士入境，在长崎、横滨等地修起教堂以后，教徒越发得到鼓励，“切支丹<sup>①</sup>的复活”有了迅速的进展。1867年，仅仅浦上一地就有了四千名教徒。幕府未及处理这些信徒，就已王政复古，问题留待维新政府来解决了。

政府在1868年3月14日发出“打破旧日陋习”云云的五条诺言，同一天又发布了五条禁令。其中第三条规定，“切支丹邪教照旧严禁”。接着参与<sup>②</sup>木户孝允便前往长崎，企图逮捕教徒，给予处分。

英、法公使4月命令驻长崎领事向木户孝允提出抗议：“现在日本既然宣布前进，就不该后退采取旧时的措施”。闰4月，他们以天主教并非邪教为理由，要求政府撤消上述布告。因此，政府才把天主教同邪教分开，更改布告字句。此后各国公使因屡次要求政府放宽对教徒的措施，指摘政府有拷问教徒的事实。政府允以

① 即天主教。——译者

② 官名。——译者

宽大处理。可是，政府为迎合攘夷的士族，于1869年的10月至12月间逮捕教徒三千余人，分别送往加贺、萨摩、土佐等十八个藩加以管制。各国公使大为吃惊，抗议日本政府违背宽大处理教徒的诺言。而政府的答复则是：“这些教徒照理应该一律斩首，但为顾及外国友谊，才这样从轻发落”（12月2日，渡边弹正大忠在长崎同巴夏礼的谈话）。巴夏礼等人甚为愤慨，威胁日本政府说：“新政府成立后，本来希望一改德川旧政，现在这种作法完全是恢复野蛮行为。我们基本上已经答应日本政府的请求，准备撤退横滨的英国驻军，但鉴于这次事件，为防备今后发生不测，撤兵一事，暂不考虑。我们并无侵犯日本独立之意，为了友谊，特予忠告”（12月16日，英国亚当<sup>①</sup>书记同寺岛外务大辅的谈话）。

12月18日，三条、岩仓、泽、寺岛和参议副岛种臣等人，同英、法、美、德公使团会见，说明处分教徒是根据国法，不得已而为之。公使们坚决要求思想信仰自由，不肯让步，并且声言人民和政府形成一体的欧洲各国政府，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恐将难以同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结果，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声明教徒如系单纯信仰异教，决不加以苛刻处分。第二年1870年正月，各国公使对此提出要求，在不让外国传教士出入居留地以外地区的条件下，允许教徒回村。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要求。

后来，金泽藩也发生过残酷处分教徒、引起英国领事前往调查实际情况的事件。土佐藩为使教徒改宗，竟把婴儿同母亲隔离开来，使婴儿在邻室啼哭以至饿死，或为使教徒堕落，把一对年青男女关在一间屋内，使尽封建主义的卑鄙手段。另一方面，命令儒家和神官<sup>②</sup>对教徒讲述忠孝仁义或皇国神道的神圣。但是，说教者本身的这种行为可以说就是对儒教或神道的一种侮辱（川田瑞穗：

① 日本名为三浦按针。——译者

② 日本神道的司祭。——译者

《片冈健吉先生传》)。

对基督教的这种禁止和压迫，不止是对一个宗教的压迫，而是意味着更广泛地对思想信仰乃至良心自由的普遍禁止和压迫。外国公使也正是抱着这种看法。这种措施完全是封建残余，不论外国抗议与否，维新政府应当认识到这是“旧日陋习”中最大的陋习，首先应予废除。

这种对良心自由的压迫，造成屈辱条约长期存在的直接的重大口实。不仅英国把这当作拒绝撤退横滨驻军的托辞，当1872年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等在美国华盛顿商议修改条约时，美国方面也一再主张在新条约内载明，“许可美国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发行报纸，信仰自由，并请把这种自由施给贵国<sup>①</sup>人民”。岩仓等人虽然百般辩解，但结果只好承认“思想之权，乃属大自然的天赐”，并说我国政府对此充分保护，不必载入条约。但美国方面马上要求“提出确凿证据”，我方为之语塞。接着，同年10月在英国举行谈判时，英国方面也提到“专制和自由政治在英国实验的结果，我们终于知道了自由的很大好处”，因而为修改条约，要求日本承认自由，特别是承认信仰和良心的自由。1873年1月在法国，同年2月在比利时，都有过同样内容的谈判。在国内，1872年4月，法国驻日代理公使也劝告副岛外务卿说，如果不承认信仰自由，法国政府将难以同意修改条约的谈判。另一方面，教徒也表示坚决不屈的态度，因而虽然进行种种说教，但由于说教者本身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侮辱，所以毫无成效。井上馨、木户孝允等人这才有所醒悟，1873年2月，政府终于撤回严禁基督教的布告，3月，把分发各藩管制的教徒，遣回故乡。然而“这并不等于默许异教，而是说布告内容已属人所周知之事，故而撤回”。当局尽管承认信仰、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和“思想之权”乃是“大自然的天赐”，但没有彻底允许人民

<sup>①</sup> 即日本。——译者

享有这些自由。因此，中央始终没能组织起国民的力量，用来作为修改条约的后盾。后来寺岛、井上、大隈等人进行的修改条约谈判，对国民严守秘密，打算略加修改，即便是极其屈辱的条约也就满意了，但因这个秘密谈判泄露出去，才不得不停止进行。

## 第二节 “主权外交”

当时日本政府最感困难、也是各国十分注目的问题之一，就是“虾夷”——北海道、库页岛的开发和日俄边界划分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征韩论直接有关。日本在千岛和库页岛同俄国公发生冲突，开始于1806年（文化三年）。后来，由于松前藩扣留俄国海军少校格洛宁，双方谈判释放时才发生划分日俄边界的问题。当时俄国对库页岛没有任何权利，而松前藩却已在“北虾夷”即库页岛久春古丹等处设立渔场并进行殖民。日本自不必说，就是俄国也承认这点。当时俄国使节列扎诺夫出使日本时所乘的克鲁森施滕号的航海日记中也明确载有此事<sup>①</sup>。

因此，倘如德川幕府允许科学自由和通商航海自由，那末，第二、第三个近藤重藏、最上德内、间宫林藏这类人也将继续出现，后来也就不会留下惹起纠纷的余地了。

后来，俄国南下之势日益加速，1853年普提雅廷前来要求签订友好条约时，俄国在库页岛的势力已经超过了日本。日本在维新前后只是模糊地认识到库页岛是“北门的锁钥”，而这时俄国则看到“库页岛富于俄国最缺乏的煤炭”，把它当作原料资源地并且明确

---

<sup>①</sup> 《异国丛书》，羽仁五郎译《克鲁森施滕日本纪行》上。《通航一览》俄国部分所载的文化十年幕府拟向俄国提出的国界划定书内，只就千岛提出问题，没有一字涉及库页岛。可见，当时俄国对库页岛没有任何权利，已属自明。（Kruzenshtern, T. F. <1770~1846>，俄国海军提督，探险家，1803~1806 探测东亚沿岸，1814 年发表旅行记，1815 年探测白令海峡。——译者）

认识到它作为北太平洋称霸据点的重要性。所以，俄国的态度很强硬，当普提雅廷同幕府签订友好条约时，意欲占领整个库页岛。日本全权代表对此加以拒绝，提议以北纬五十度为彼此分界。这一提议的根据并未经过具体调查彼此殖民的实际情况和沿革，而是由于译员偶然看到俄国船上的地图在五十度处分别涂有不同颜色而想到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凭证和说服力，于是库页岛问题仍然和从前一样，日俄杂居，边界未分。（1869年2月关于库页岛边界谈判的旧幕臣小出大和太守的呈报，〈大日本外交文书〉三所载）。

后来，幕府和俄国曾经两次商议库页岛分界问题，在1867年的条约上规定库页岛照旧由两国人民杂居，直到明治年间。1868年6月，箱馆法院的法官冈本监辅前往久春古丹，由旧幕府官吏手里接管岛务，宣布王政复古。明治政府极为重视北海道和库页岛，1869年5月，箱馆的榎本武扬等尚未平定，岩仓具视就决定财政、外交和开发虾夷地方是政府的三大急务。然而开发的具体方针却是“给土著少许烟酒即可使用”，“内地移民则以纸币充其费用即可，不必拘泥收支不相抵之论”（〈日本外交文书〉二）。同年5月，政府当局举行会议，天皇谕询开发虾夷地方的问题。会议的报告说：“虾夷之地乃皇国之北门，接近山丹满洲，虽分界粗定，而北部则中外杂居，以前官吏使役土著极其苛刻，而外国人颇施爱恤，以至土著往往眷恋我邦之人，尊信于彼。一旦有人以拯救民苦为名加以煽动，其祸必将转瞬延及松前箱馆。当务之急，应防祸于未然”云云。1870年正月，俄国兵对我官吏施加暴行时，也曾有过“库页土著内通俄国”的事情（〈日本外交文书〉三）。既然抱着给以少许烟酒就能驱使土著的想法，那末事情演成这种地步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来，我方也曾施惠于土著，然而“并无一定方针，既没有使她们与祖国人民同化的企图，也没有授以先进的工艺技术，使其足以自立”，因只限于封建的仁惠，费用不继，仁惠便逐年减少下去（桦

太厅《桦太施政沿革史》)。

同时,俄人也常因欺凌土著而遭到反抗(同前书)。不过,俄国对库页岛的经营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而令人吃惊的是,直到庆应三年十一月,即大政奉还之后,德川幕府才许可武士和平民自由迁移,在这以前,人民连去库页岛的自由都没有(《续德川实纪》、《维新史料纲要》五)。这还谈什么北门的锁钥呢?维新政府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大嚷北方危急,但从未做过有组织的科学调查;1873年(明治六年)3月才初次用华氏寒暑表测量库页岛的气温,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桦太施政沿革史》)。

这样怎能对抗俄国呢?就本质而言,正如克鲁森施滕早在1805年所说的那样,“要占有库页岛,不得到库页岛真正主人虾夷人的同意不行”。可见日本理应对俄国可以主张对库页岛的历史优先权。为了确保这种优先权,应该在国内保证人民的独立自由,对虾夷人要超出一时的恩惠或俄国式的殖民统治,“不剥夺虾夷人的自由,采取措施,使虾夷人不要求撤换他们的统治者”,使国民与土著的虾夷人一致协力,这“不论从人道上说,还是从政策上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前引克鲁森施滕书。本多利明著《经世秘策》中也有同样的主张)。

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宁愿依靠英国和美国,它们同俄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对立地位。从1869年初开始,巴夏礼与外务当局间就库页岛问题接触频繁,到7月前后,俄国开始向库页岛派遣大军。巴夏礼比日本政府提前获悉,对这件事很重视,8月1日和9日两次同外交当局恳谈,商讨对策。日本外交最高首脑岩仓、泽等人完全不了解库页岛情况,反被洋人巴夏礼嘲笑说:“贵国的事情,你们当然知道”,一面打开地图说明。情况使巴夏礼大为失望,感到问题不仅限于库页岛,甚至连北海道都有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建议日本应该放弃库页岛,把防御力量集中于北海道。当时(公历

1869年8月13日)巴夏礼在寄给他妻子的信里表明了他的见解：“虾夷的北方，即库页岛上发生了重大问题，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日俄间有发生争端之虞。(中略)俄国向库页岛南端派去一千二百名军队，目的恐怕是要占领虾夷(北海道)。如果日本不慎丢失虾夷，这对日本将是一大损失，而对俄国则是一大利益。我劝告日本政府向虾夷派兵，不要在库页岛问题上同俄国抗衡。库页岛已不可救药，但虾夷还有挽救希望”云云<sup>①</sup>。巴夏礼的建议，作为日本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可看出他对这件事的痛切关心。因为北海道如被俄国蚕食掉，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就要受到威胁了。

日本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明确措施，仅仅在9月赶紧派外务大丞丸山作乐等前往库页岛。丸山是个激烈的排外主义者，他被派往库页岛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尽管他是个对外强硬论者，然而这种旧时代的人物根本不能抗衡资本主义的俄国而作好经营库页岛的工作。当丸山出发时，外务省及三条大臣对丸山和开拓使指示说，俄国来势非常凶暴，如与之抗争，势必火上加油，“这时，必须应用柔能克刚之理”，加以忍耐。这事实上就等于放弃库页岛。大久保利通、广泽真臣等人本来就十分关心库页岛问题，但大久保也认为还不到采取“断然措施”的时机，主张只好“暂且应付一时”，表现出退缩不前的态度(8月12日，11月13日致岩仓的信)。

政府于1870年2月设置桦太开拓使。5月，任命黑田清隆为开拓使次官兼摄库页政务，7月，前往库页岛与俄国军官进行协商。当时黑田对所有一切争端，都草率表示让步，9月，回京提出建议说：“库页岛的经营应该断然放弃，委诸俄国，免得浪费国力于无用之地，此为上策。退一步说，划定边界是中策。仍旧杂居，伺

---

<sup>①</sup> Dikins, F.V. & Lane-pook, S.: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 2.

机断然放弃，乃是下策”。这种屈服是令人吃惊的。冈本和丸山这类排外主义者处在这种长官下本来应该愤然辞职才是（森谷秀亮氏著《明治时代》）。

另一方面，政府在巴夏礼对此事撒手不管以后，求助于美国公使德朗，同他商议“如何处理库页岛”。1870年10月，俄国驻清国公使布策来日游览，会见了参议副岛种臣和寺岛外务大辅，就库页岛问题交换意见。副岛向他说：“鉴于人心不安，倘贵国能将库页全岛交给我方，我国人民将永久安定，还将永久尊敬俄国”。这番话与其说是维护我国主权，毋宁说是乞求对方施舍（参照《日本外交文书》三，七六号文书）。令人有必要记住副岛这个名字。但是，当时因为布策反对，便不再恳求美国公使调停，而且后者对于这一问题也拒绝斡旋，并劝我国放弃库页。翌年1871年，副岛打算前往波谢特湾同俄国进行交涉，但事前没有弄清对方公使是否前来，就来到箱馆。待得知对方不来便返回了。1872年4月，布策来日就任驻日代理公使，同副岛开始谈判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几次接触之后，他不同意在岛上分界。于是，我方首先提议将全岛卖给俄国，但他说没有收买资金。后来法国公使向副岛透露俄国有意出卖库页岛，于是我方提议收买全岛。1873年，对方明确表示拒绝出卖，说：“库页岛是俄国不可缺少的土地，不能交给日本，亦不能出售”。结果，我方再次决意出售，“如果决定将全岛交给俄国，俄国政府将对日本政府或人民给予相当利益，于是谈判进行到两国间可以为此签订条约的阶段，并讨论了上述利益和签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已经进入协商细节了。由于副岛不久前往中国，他同俄国的谈判也就随之中断，接着征韩论决裂，副岛便下野了（《日本外交文书》六，172号文书，明治七年二月外务省官员田边笔记，这不能说没有史料价值吧）。

向来的说法是，《开国五十年史》内载副岛的《外交史》和其他



各书均未提出任何确凿史料，副岛曾提议以二百万日圆收买库页岛，事已垂成，他即下野，后来黑田放弃库页岛的意见占了上风云云。但据正确史料，事实显然恰恰相反<sup>①</sup>。

据认为，西乡隆盛作为当时的政府最高首脑，也支持过副岛的出售库页岛方案。据木户的信说（1873年11月20日致伊藤博文）：“昨天黑田的话里有这样一段：仿佛西乡曾说过，库页岛与千岛群岛交换确将成为事实，据说这话可能出自副岛。果真如此，便与花言巧语云云相符合了”。这是主张对俄妥协的黑田说的话，也许可以看作黑田故意拿西乡作挡箭牌，但对上述谈判经过，作为政府最高首脑，西乡也是有责任的，并不能认为是黑田的随便胡说。

在这期间，俄军事实上已经占领我方根据地久春古丹地方，不顾我方的严重抗议，肆无忌惮地进行修筑码头工事。1873年3月，俄军公然白昼纵火烧毁我方官员宿舍，民众挺身抢救时，俄国兵竟投石拦阻，暴行逐日加剧（《桦太施政沿革史》，《日本外交文书》六）。日本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也丝毫不得要领。同时，西乡、副岛、板垣等政府最高领袖也都无意经营库页岛，而急于向朝鲜扩张。这一点容在下文详述。

副岛的主权外交十分著名，尤其玛利亚鲁士号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1872年6月5日，秘鲁国轮船玛利亚鲁士号从澳门载中国工人驶入横滨。7日，有一名工人因不堪虐待从船中逃出，经英国军舰营救，交给神奈川县。县当局传讯玛利亚鲁士号船长，据称并未虐待工人并保证将来也不虐待，于是便把工人交还船长，了结这件公案。然而，英国代理公使沃森详细调查了玛利亚鲁士号上中国

<sup>①</sup> 与此有关的参考史料有1873年（明治六年）5月2日驻俄美国公使欧尔向美国国务卿提出的报告。该报告说，俄国首都外交团间传闻俄国对4月1日到达此地的岩仓全权大使等提议以千岛交换库页岛云云。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U. S. A.)1873, Russia; No 339.

工人的惨状后，汇报给副岛外务卿，要求审讯船长。他建议说：“对买卖奴隶，应该竭尽国力坚决予以阻止，并应向世界表明这种决心”。同时，还鼓励他说，日本有权审判这一事件，决不会引起外国干涉，甚至说审判时可以用我(沃森)的控诉作为证据。同时，美国代理公使也有同样的提议，并言明秘鲁在日本的事务虽由美国官吏代行，但关于这一事件决不支持秘鲁。这时，副岛才不顾司法卿江藤和神奈川县令陆奥等人主张不要介入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问题的反对，决心再度过问这一事件，让美国顾问斯密士和希尔两人与神奈川县的副县令大江卓，共同担任玛利亚鲁士号船长的审判。正当进行审判时，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和法国及德国驻横滨领事等提出抗议，说日本无权审判此案。但因英国绝对支持，终于在8月25日，使中国工人“取得自由权，返回祖国”(《玛利亚鲁士船裁判略记》，《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大江天野传》、《日本外交文书》五)。

于是，副岛外务卿就以主持“正义人道”而扬名了。同时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场面，即秘鲁船长以日本艺妓和娼妓为例，指出日本国内也存在着买卖奴隶的事实。

这一事件的幕后还有另一个国际关系。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以后，当地对劳动力的需要有了激增，中国工人成了供给这项劳动力的巨大源泉。他们先从香港或澳门被运到秘鲁或古巴，在那里当作奴隶进行买卖。1855年(安政二年)香港英国当局对此严加取缔，所以后来澳门便成了买卖工人的最大中心。香港英文报纸连日揭露这种工人的惨状，大肆攻击澳门葡萄牙当局。结果1866年(庆应二年)，在北京由清朝政府和英法美德各国代表想就“移民”境遇改善措施签订协定。在行将达成协议时，因为法国提出异议而告失败，只有英国一国极力主张废除奴隶贸易。美国在这以前就如同它后来排斥移民那样，

极力排斥中国工人的移民(Michie, A.: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1890, Vol. II Chap. XX. )。

一考虑到这个背景，玛利亚鲁士号事件之所以在日本一度结束，后经英美提议再度审判的全貌就十分明显了。

情况尽管如此，这当然也是副岛的功绩和有关我国的名誉。此外，副岛外务卿就任后，纠正了外国公使随便召唤我国大臣的丑态，这也是值得赞扬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实现了废藩置县和国内统一等，维新事业有了前进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由于这种前进并不彻底，不仅暴露了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奴隶的丑事，而且副岛的外交实际上也还不能抗拒英美俄的利益以维护我国主权。不仅库页岛的转让问题，甚至1873年以副岛为全权代表同上述南美三等国秘鲁签订友好条约时，还不得不给与这个国家和英美俄同样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而且副岛身旁还经常有美国公使德朗、美国顾问佩先·斯密士、李仙得等人为之策划，这也是周知的事实（这点后面还要谈到）。

当时美国正值奴隶制度废除后，国内市场有了迅速发展，“美国夺得大陆西部地方，国内遍设铁路，保证了发达的工业品的销路。因为有了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发展，野心最大的人也可以不出国境而满足侵略欲望了”。因此，美国国会对政府当局在1867年（庆应三年）从俄国手里收买阿拉斯加一事加以责难，禁止以后收买领土，并且否决了1871年（明治四年）格兰忒总统时签订的合并圣多明各岛的条约，废除同夏威夷间的关税协定，在这种情形下，对遥远的亚洲海上冒险就更加反对了<sup>①</sup>。1871年美国舰队为了要求朝鲜赔偿烧毁的美国船只舍门将军号签订条约而开赴朝鲜江华掀起战端时，虽然驻清国公使罗极力主张强硬方针，但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由于受到国会的掣肘而不允许这种主张（奥平武彦《朝鲜

<sup>①</sup> 塔特罗维奇著，广岛定吉等译《在中国争霸的战争和太平洋》上。

开国交涉始末》)。同时，美国向远东市场的扩张大大落后于英、法、俄等国，因而不希望日本和中国变为英、法、俄等国的半殖民地，唯其如此，它才得以伪装成“友好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由于民主党资本家煽动，排斥中国工人移民的风气很盛，还如后面所述，它害怕日本与中国结成同盟，便越发设法接近日本。日本当局也正因不满英国公使巴夏礼的高压态度，而把讨伐幕府以来的对英依赖关系改为依赖美国了。

小笠原群岛的归属问题，轻易决定归属日本，这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国的一般对外政策，是容易理解的。日本政府的大藏省<sup>①</sup>方面直到1873年还没有完全认为该岛是我国领土，该年5月停泊于横滨的一只美国船申请开往二见港时，横滨海关和大藏省认为那里属于外国港口而予以照准（如果是我国领土，则因二见港是不开放港口，不能批准）。但外务省则认为我国领土，却禁止开往该港。另一方面，1853年，佩里曾经把当时我国称为“无人岛”的该岛宣布为合众国领土，后来有数名美国人移居该岛，如果美国主张对该岛的领有权，这种主张也并非毫无根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美国远东政策，它表明“当初科莫多尔、佩里驶往日本时，舰队中的一艘军舰以合众国名义占据了该岛，但此事未经国会许可，而且后来本政府亦无意继续支持该海军军官（下略）”云云。美国表示对小笠原群岛没有任何野心，因而该岛很容易地确定为日本领土了（《日本外交文书》六）。

### 第三节 侵略中国之梦

以上是日本外交对欧美及俄国屈服的一面。但它还有另一面，作为前一方面的补偿。那就是从明治初年，也可以说从幕府

<sup>①</sup> 即财政部。——译者

末期起，策划对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方面的侵略。所谓经略大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关于对朝鲜的政策将在下章内详细分析。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具有经略朝鲜准备工作意义的对华政策。

德川时代，经幕府许可的少数中国商船只限于航行长崎一港。但日本人到中国去，当然不许可。开港后，1861年，幕府派官吏到上海去刺探情况，并会见上海道台，协商日本船只开往中国进行贸易的办法等等。同行的有长州的高杉晋作，萨摩的伍代才助，佐贺的中牟仓之助等人。后因国内多事，没有任何进展。到1867年末，长崎奉行<sup>①</sup>河津祐邦委托英国官员致书上海道台，请发给日本人为了经商或留学前往中国的人境、居住护照。上海道台的回文是在幕府垮台后1868年（明治元年，清朝同治七年）3月寄给河津的，这封信由新政府的九州镇抚总督收到。从此以后，我国长崎官宪和上海道台间有了书信往返。同年10月，上海道台的信中说，为学习前来中国者，不需要印信，商船只要不违犯清朝法律就可得到优厚待遇，也不需要签订条约。这就等于拒绝确立交际方式，只准前往上海，而且说：“日本人如违犯清政府法律者按当地法律惩罚，如同旅日中国人遵从日本法律一样，各该本国官吏不得干预”，这就是说不承认彼此的治外法权。长崎府对此立即表示同意（《日本外交文书》二）。

上述长崎府的交涉并非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日本政府平定东北<sup>②</sup>地方的问题以后，才正式着手对华政策。1869年5月，外国官<sup>③</sup>才训令长崎府呈报日清往复信件及处理华侨的规章。

同年7月，寺岛外国官副知事<sup>④</sup>呈请通过英国公使通知清政

① 行政长官。——译者

② 指日本东北地方及北海道。——译者

③ 即外交部长。——译者

④ 即外交部次长。——译者

府表示我方有意派遣使节来华议订条约。11月，外务省（前称外国官）举行部务会议，决定首先派遣“职位较低的使节”，前往北京观察情况，“如日商贸易大有意外进展的可能，再仿效西洋各国谈判条约，也不算晚”。

从这个部务会议（或寺岛的呈文）中可以看出，如单从经济观点出发，当时我国工业还很不发达，所以没有必要急于签订日清通商条约。但上述寺岛的呈文以及1870年5月的“外交急务三条”中也曾提到，最初随欧美人来到日本的中国人，独立经营商业后，遇事则受外国领事保护，我国对它不能行使权利，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和更重大的根本目的——即所谓“宇内形势一变，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若无使节往还，实非经略之远图”的政治目的，这才急于同中国签订条约（《日本外交文书》三）。

“经略之远图”的第一个步骤，指定是朝鲜。当时朝鲜责难日本政府致朝鲜政府的国书中有“敕”、“皇”等字样。它认为这种字样只有上国大清帝国才能使用而不接受日本的国书。而日本国内则以朝鲜不接受国书为理由之一，征韩论在政府和民间士族间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同中国的交往虽不比同朝鲜的交往更急，但从怀柔朝鲜的观点来说，也应该首先着手进行”（明治三年四月，外务省的朝鲜政策，《日本外交文书》三）。

于是，取消往北京派遣“职位较低的使节”的方案。1869年12月3日，敕命当时最激烈的征韩论者木户孝允从三位为钦差全权大使，前往清国和朝鲜。但木户因国内多事，此行未果。明年1870年6月，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允等人前往清国进行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的预备谈判。柳原的权限只限于专门进行签订条约的预备谈判，并不包括调查朝鲜同清国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签订条约的目的与朝鲜完全无关。

8月，柳原等抵达上海，然后转道天津，将他的使命通知清政

府。清政府最初说“古语云‘大信不约’，中日两国自古友好，无需仿照西洋，签订条约”，意欲限于上海一港照旧通商。柳原不屈，会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第一流大官，力陈签约的必要。

据李鸿章的上奏折载，柳原向李鸿章等陈说：“西人常逼该国（日本）通商，心虽不满，但力难抗拒，亟欲与中国通好，同心协力。又华人在该国通商者，西国领事每欲代管，故须互定条约，自为桎束”。李为这种说法所动而在奏折中说：“日本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则为我用，拒绝之则为我仇”。李还屡次建议政府应该同意缔结条约谈判说，我若拒之太甚，彼若他日委托泰西各国提出要求，终难拒绝，反招耻辱。于是朝廷终于10月11日照准（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

柳原的中日合作对抗欧美的说法，本来是临时的托词，柳原本人和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图。不仅如此，明治政府的实际最大首脑大久保利通，在柳原去华以前，1870年3月，当天津发生杀害传教士事件，英法开始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时，曾向岩仓具视说过这样的话：

1. 关于中国发生混乱一事，鉴于“各国交往本以亲睦为主”，希速派外务卿或大辅前往横滨，慰问公使团，以表示我“对外国遵守信义”。

2. “英、法如果出动军舰、陆军，必有确实报导。那时尽管英、法早有应变的全部准备，我方可向它们致意，愿在食粮、薪、水方面以及只要日本能做到的其他事情都尽力帮忙，请它们不客气地提出来”（《大久保利通文书》三）。

但欧美对中日同盟也倍加警惕。第二年5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柳原等人为随员，前往中国签订中日条约时，横滨外文报纸报称，中日间有意签订攻守同盟（1871年6月5日〔明治四年四月十八日〕法文报《日本之声》）。因此，英、法、美各

国公使立刻质问我外务省是否属实，并威胁说：“倘与清朝修约，犄角连衡，恐非日本之福”。政府当然没有同盟之意，便于五月十日（6月27日）发表辟谣声明（《日本外交文书》四）。

6月7日伊达全权代表等抵达天津，立即开始谈判。我方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同欧美的条约为蓝本，把日本摆在欧美各国的同等地位，是个不平等条约的草案。清廷大为吃惊和震怒，认为日本草案“全部照抄西人约书，只是一面之词，与我政府（清廷）所望大为背谬”（《日本外交文书》）。接着，提出中国的方案。其中第二条说：“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乍一看来，分明是一种同盟方案。我方代表当然未予接受。日方宣称：“西方各国已在怀疑中日同盟，故必须按照西洋成例订立条约，以使彼等不致生疑”云云，一再援引西洋进行辩论。对此，中国对此答道：“若虑西人之忌，则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即无此虑，更可周全西人，岂非上策”。伊达全权代表无言可驳，结果把第二条看作中美条约或日美条约中所有这类条款一样，单纯解释为平时的细微纷争要以友国之谊加以调停之意而接受下来，7月29日，签订了修好条约和其他文件。

日本提出的最惠国待遇的要求未被接受，关于审判权是：本国人民之间的诉讼由驻在各该口岸的理事官根据本国法律审判；中日两国人民间的诉讼则由双方官吏协议审判。关于关税率也由双方互相协定。一切权利固然都是双方平等的。但是，既然两个国家在法权方面也好，在税权方面也好，当时已被欧美剥夺无遗，再没有任何国权可以被欧美援用最惠国条款剥夺的了，为什么两国没有按照彼此都是独立自主国家来签订一个真正平等的条约呢？实际情况是，我国政府希望我方取得完全自主审判权，而为了取得这种审判权就必须同样也赋与中国以自主审判权，于是我方认为



“其结果虽然彼此平等，但使我国国民处于彼方严酷法律之下是不适宜的”，便在预料中国领事不会来驻日本的情况下，企图事实上唯有我方可以确保治外法权，才订立了这样的条约（《日本外交文书》六）。关于税权也是如此。

同盟根本谈不到，企图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经略之远图”的政府，当然对这个条约大为反对。首先反对第二条自不待言，此外，对条约的前文没有明白写上“天皇陛下”的尊号（为了说服朝鲜接受日本国书的“皇”、“敕”等字样，进而说明朝鲜是日本的下国，这种尊号也是必须写上的），（参照外务权少丞宫本小一郎的《朝鲜意见书》，《日本外交文书》二）、第十一条两国商民往来不许携带刀剑的规定、第十四条两国兵船不准驶入未经指定口岸以及内地河湖支港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都认为必须删除或修改。

以上是岩仓和大久保出使欧美以前的情况，“对华强硬”的方针，并不是由西乡留守内阁和副岛任外相时开始的，而是日本政府起首的一贯方针。

当时欧美各国把我国视为非文明国家，并以此为借口强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种不合理的办法，我国人民当然是人人切齿的。假如当时我方当局不希望在同受欧美压迫的中日两国之间，把一方视为非文明国而订立不平等条约，并且排除上述大久保意见书内的那种追随欧美的侵略主义，而订立一个两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平等条约，其第二条不拘中国意图如何，由我方积极加以扩大解释，相互协力，打击欧美最害怕的要害，那末，对增进中日两国的地位和幸福可能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条约签订后，驻日各国公使认为第二条与政府的前言不符，提出抗议性的质问（《日本外交文书》，四）。驻中国的美国公使罗也认为第二条是“真正的灾害”，曾千方百计力求删除（Demen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前引堪特罗维奇《在中国争霸的战争和太平洋》）。

我国政府解释第二条决非同盟之意，使彼等放心，并于 1872 年 5 月，派柳原为驻中国公使，令其交涉在互换批准前删除第二条并修改其他条款。另一方面，这时政府在美国公使德朗的支持下早就开始了向中国领土台湾出兵的计划。

在这以前，1871 年 11 月，琉球的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牡丹社住民杀害，十二名仅以身免，请求中国官宪保护。这件事于 1872 年 4 月由柳原驻中国公使报告到外务省，7 月，琉球当局也报告到鹿儿岛县。

琉球数百年来既附属于萨摩的岛津氏，同时又对明、清纳贡，受明、清的封册，即所谓处于中日两属状态，同时又和法、美等国作为独立国家订立了条约。废藩置县的时候，日本把它置于鹿儿岛县管辖之下。1872 年 1 月，该县官吏前往琉球通知本国的变革，促其改革岛政，并豁免它对岛津氏所负的债务，试图逐步定为日本领土。正当这时发生了上述事件，鹿儿岛县大参事大山纲良立即上书请求政府借与军舰，深入“蛮地”<sup>①</sup>进行讨伐，以雪民冤而扬皇威于海外。

陆军少校野津镇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均为鹿儿岛士族)等也相继晋京向西乡、板垣等当时的政府首脑(大久保当时正在国外)建议“征伐台湾”，并得到他们赞许(《西南记传》一)。于是，基本上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出身的士族成立的近卫兵及其他海陆军人之间，竟“有沙中偶语，不待朝命，而图谋擅自征讨生番者”(《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西乡、副岛等人唯恐他们轻举妄动，为了预防欧美的干涉和领有台湾的中国的抗议，说服他们暂时待机，“然后再用诸君之力，取得此地以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同上)。

因此，政府首先要求各国公使团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另

<sup>①</sup> 指台湾。——译者

一方面,9月,敕立琉球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为华族。美国公使首先承认琉球为日本领土,并要求日本政府继承琉美条约,我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接着各国也办理了同样手续。

副岛就这样在得到美国公使德朗的援助下,进行了出兵台湾的准备。此时,恰好美国驻澳门领事李仙得在归国途中路过横滨。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867年(庆应三年),他曾率领美国军舰讨伐台湾,后来又曾随同中国兵渡台,直接会见牡丹社酋长,使酋长宣誓,以后非但美国人,即使其他西洋人来台,也一概不施暴行(吉野作造《日本外交的恩人李仙得将军》、《明治文化研究》三之七、八)。

1872年9月23日,副岛外务卿与德朗会见,讨论台湾问题,并经介绍认识了李仙得这个人物。当时副岛十分露骨地说:“台湾也是我国的渴望之地”,德朗也明目张胆地鼓励副岛说:“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有所扩张,则为我所好”(《日本外交文书》七)。翌日,副岛与李仙得会见,问他出兵台湾前后同中国交涉的始末,中国统治台湾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军备等,并将李仙得所携的台湾地图、海图、照片等全部借来。副岛因为有了李仙得而十分喜悦,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后来副岛还和德朗保持密切联系,有一次两人曾彻夜协商对台湾的策略。德朗在副岛的委托下,曾致函驻华美国公使罗,请他替日本向清政府进行斡旋(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日本部,1872年11月6日,德朗报告书)。美国政府并没有认可德朗提议的援助日本的军事行动(同上,1872年12月30日国务卿菲什对德朗的训令)。但是李仙得却于同年11月(阴历)辞却本国官职来日本外务省担任二等官(大辅)待遇的顾问。

同时,政府内部征韩之议已经成熟(后述)。因此,为了准备工作,有必要明确中国同朝鲜的宗主关系的实际情况。

1873年(明治六年)2月,副岛外务卿为了批准中日条约的换文前往中国。但其真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兵台湾和朝鲜的外交准备,这也是副岛对驻华美国公使罗所谈到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中国部分)。

因此,删除条约第二条等已非重要问题,1873年4月3日,伊达全权代表签署的条约原封不动地互换完毕。

另一方面,副岛为了来华的真实目的,6月18日,访问驻华美国公使罗,就台湾蛮地对策及朝鲜政策交换意见,索取了美国同朝鲜发生争执时(1870年,明治三年)美国同中国交涉的文件抄本,并弄到了中国答复美国的中国对朝鲜内政外交不加干预的声明书。副岛也访问了英国公使威妥玛,讨论了日本对朝鲜、台湾的政策,并透露可能向台湾出兵(前引《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日本外交文书》六”,前引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中国部分)。

同时,柳原公使于6月21日前往中国总理衙门质问中国对朝鲜的关系。清政府如同前年答复美国公使或法国公使一样,告以朝鲜的内政外交皆听任朝鲜自主。柳原又要求说明为什么台湾原住民杀死了“日本琉球藩民”。清政府答称,台湾人杀死“中国属国之民”是有其事,但并未闻有杀死日本人事,于是便争论起琉球的归属问题。但是,柳原没有深入这个问题,对中国方面说的“台湾全岛固然是中国领土,不过生番是化外之民,为中国的政策所不及”这句话感到满意。他说:“既是化外孤立的番夷,只好归我单独处理”而辞去(《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日本外交文书》六)。

这样,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已成既定方针。副岛对于他赴华主要目的的这件事没有亲自进行谈判而让柳原来办,对中国的声明以及柳原的发言都没有要求写成书面,这一点一般人说是个“过失”。然而这决非无意识的“过失”,而是副岛有意识的策略。副岛和柳原岂不知道口头声明不能成为充分证据,而作顾问随行的李

仙得更不会不知道这点，他们是明知而故意这样做的。从柳原的问答态度上就可看出，他巧妙地引诱中国方面无意中说出“化外之民”这句话，说完后，他对中国方面的其他发言便置之不理了。他深知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由彼此的全权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会引起纠纷的。

副岛于7月末趾高气扬地回国了。在他出国期间，西乡隆盛已在筹划出兵台湾的准备。他要求他的从弟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一定要使别府晋助率领鹿儿岛兵一大队去参军”（明治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书信，〈大西乡全集〉二）。

后来不久，征韩论或作为它第一阶段的派驻朝大使的议论成了西乡内阁的第一目标，因而出兵台湾问题便搁置起来。不过，明治政府的侵略和对外战争的枪口是指向台湾，还是指向朝鲜，这时都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明治政府一面屈服于欧美，一面还一贯执行进攻弱邻的方针。

## 第二章 野心的焦点——朝鲜

### 第一节 明治前的日朝关系

日本同朝鲜的交往，和日本历史同样悠久。上古时代，日本列岛的政治势力虽然也曾到达南朝鲜的一隅，但朝鲜人民及其文化在我国文化的黎明时期经常起着指导作用。纵令古代日本的统治者把朝鲜半岛当作侵略的对象，但日本人民却认为朝鲜人民是传授农业、陶器、纺织等进步生产方法和文字、学问的恩人。

从平安朝时代<sup>①</sup>的末期起，以中国宋朝商人为中心，发展了东亚的海上交通，日本人民凭自己的力量主动地开始向海外发展。

<sup>①</sup> 794—1192年。——译者

鎌仓时代<sup>①</sup>、室町时代<sup>②</sup>、十四—十五世纪,出现了所谓的倭寇的全盛时代。日本人在中国和朝鲜的沿岸,或是作为和平的商人,或是作为海盗,自由自在地活跃起来。但是室町幕府不愿意国民自由活动,而朝鲜和中国也苦于倭寇滋扰,于是室町幕府便与高丽朝为交涉禁止倭寇而开始了接触。

1368年(日本正平二十三年,高丽恭愍王十七年)室町幕府和对马国守护<sup>③</sup>宗经茂各派使者前往高丽,协商取缔倭寇事宜。这时宗氏从高丽王处取得大米一千石。日本人的进入朝鲜从这时起有了迅速发展。李成桂自立为王,朝鲜国开国之初(1392—1393年),日本人被授以官职的称谓“受职倭人”和定居朝鲜的日本人也多了起来,仅庆尚道一地,就达两千人。

但后来对倭寇的禁止,发展到限制日朝交通,因而私人贸易,即两国人民间的自由贸易往来,受到了压制。朝鲜王制定了图书(即勘合印)、通信符等制度,凡是没有领得图书和通信符的人不得入境。取得这种图书的幕府、宗氏和大内氏等九州西部的有势力者和大商人等,由于这种制度可以防止出现新的竞争者,垄断对朝鲜的贸易,反而甘心拥护这个制度。当时朝鲜王利用对马岛的地理位置,对宗氏给以种种特权,并把宗氏看做是李朝官员,为替李朝服务的日朝通交的中心机关。根据1435年(日本永享七年,朝鲜世宗十九年)和三年后的1438年以及又五年后的1443年(日本嘉吉三年,朝鲜世宗二十五年)的对马同朝鲜的条约规定:

(1) 凡从日本乘船前来朝鲜者,除将军、管领等使者外,均须持有宗氏的渡航证件(称为文引),没有这个证件者,一律视为海贼。

(2) (甲)朝鲜特许宗氏岁遣船五十只;(乙)每年给与米豆

① 1193—1392年。——译者

② 1394—1572年。——译者

③ 即对马岛的藩主。——译者

共二百石；(丙)紧急时作为“特送”，可以不限船数，给与入境权利。

根据(1)的规定，宗氏可以征收发行文引的手续费，甚至可以对贸易品课税，取得巨大利益，并可随意限制贸易而进行垄断。同时正象岁赐米豆所具体表现的那样，宗氏俨然成了朝鲜的半属国，完全依靠朝鲜的恩惠。彼此的贸易场所限定于荠浦、釜山浦、盐浦三港，在这里修建了“倭馆”。

但是，由于私人贸易的废止，日本商人与朝鲜当局间发生争执，1510年(日本永正七年，朝鲜武宗五年)，上述三港的日本商人发动兵变，结果失败。后来贸易进一步受到限制。根据1512年的条约，贸易场所被限定为荠浦一港，后来迁至釜山浦。这就是截至1876年(明治九年)缔结日鲜条约以前彼此唯一的交涉场所草梁倭馆的由来。宗氏的岁遣船也被减为三十只，岁赐米豆减为半数。

这样一来，日朝的交通和贸易，变得和一般人民无关的事情，因而宗氏本身也失去抵抗朝鲜的后盾，后来也就不得不听从朝鲜统治者的任意行事和限制贸易了。丰臣秀吉大举侵略朝鲜以后，彼此的往来暂时中断了。1607年(日本长庆十二年)德川幕府同朝鲜和好，恢复了往来。后来，又曾发生过细微的日朝纷争，1635年(日本宽永十二年)幕府及宗氏同朝鲜当局之间的图书公文有了一定的体例。这个体例问题与日本的征韩论有重大关系，下面加以说明。

宗氏致朝鲜的书信署名为“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加盖朝鲜颁发的铜印(图书)。日本将军更换时，朝鲜方面派遣“信使”前来江户。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关于幕府的庆吊、藩主的吉凶、朝鲜的庆吊、信使的送往迎来等等事宜，由对州藩派规定的“参判使”(也有临时规外参判使)办理。参判使不得进入朝

鲜京城，只能留在东莱和釜山之间，由朝鲜中央政府派“接慰官”招待。朝鲜的“信使”可以谒见德川将军，而日本的使节不但不能谒见朝鲜国王或政府长官，甚至连相当于德川幕府的外国奉行的官员也都不能谒见，这根本不能说是平等的交往。1809年（元化六年）改为“易地聘礼”的办法，即幕府派使者到对马，在这里接待朝鲜使者。但这是出于对州藩和朝鲜方面的财政原因，并非为了彼此交往保持平等。

关于贸易方面，1609年（庆长十四年）宗氏同朝鲜当局签订“送使约定”。其内容不外是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壬辰之役，1592年）以前的状态更加缩小范围，允许由日本赴朝鲜的人限于国王（将军）和对马岛藩主的使臣和对马岛人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为朝鲜立过功劳的“受职倭人”，岁遣船包括遣使船在内限为二十只以内。图书、宗氏的文引等制度照旧，宗氏由朝鲜领受的岁赐米豆也一如从前，只是数量减为米豆合计一百石。

后来不久，1613年（长庆十八年）规定贸易定额，建立了所谓公贸易制。后来在手续上有过种种变更，对倭馆章程也重新有所规定。在所谓公贸易之外，也多少进行一些以输入棉布为主的私贸易，但由于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贸易逐渐衰落，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即1775年（安永四年），贸易完全停顿了。

对州藩的财政完全依赖于朝鲜的贸易，贸易的衰落对该藩来说是致命打击。所以，私贸易停顿后，对州藩屡次请求幕府给予借款以维持财政。后来由于加增禄米两万石，幕府还拨给铜锭用来进行公贸易，藩的财政才勉强维持下来<sup>①</sup>。

倭馆章程经过数次修改，截止明治维新前夕，其重要条目如下：

---

<sup>①</sup> 以上根据中村荣孝《室町时代的日鲜关系》同《江户时代的日鲜关系》、《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



(1) 朝鲜人每月六次,按规定日期,在双方官吏监督下进入倭馆交易,此外绝对禁止出入。即便在规定日期,也只限于白昼,晚间检查馆内,内外两道门都予关闭,派人看守。

(2) 馆内对州人绝对不得越犯标定界限(即所谓闯出倭馆之禁)。

(3) 入馆的两国人不得交谈本国国情。

(4) 妇女一概不得入馆。馆内日本人如出馆行奸,处以死刑或流刑,带女人入馆者斩首,女人处流刑。

(5) 馆内所需之鱼菜日用品,每晨馆前开市供应(即所谓朝市),薪炭免费奉送,不令缺乏(这叫作供菜或供餐)。

(6) 宗氏的使节入馆时,一定期间内的伙食由朝鲜当局免费供给(《通航一览》卷一百二十五以下)。

倭馆的章程以及彼此交往和文书的形式,必须严加遵守,文书若有一点一画违反,即便由日本送来朝鲜海上难民,也不予接收。对州藩为了书写发给朝鲜的公文,特令五山的学僧轮流住在藩内。如果违反倭馆章程,朝鲜方面马上“撤市撤供”,即撤消朝市和供菜,使馆内日本人陷于饥饿。这种实例在《通航一览》中屡见不鲜。

正如在供菜和对宗氏的岁赐米豆上表示出来的那样,这种交往完全是朝鲜施给宗氏或幕府的一种恩惠。1611年(庆长十六年),宗氏请求增加岁遣船时,朝鲜予以批驳,甚至说:“贵岛之于我国,因自先世忠顺不懈,故我朝对之恩宠备至。因此,贵岛本应对我朝恪守信义,为我防卫,反而发生壬辰意外之变(秀吉侵略朝鲜)。(中略)然而日本痛悔前非,特遣专使乞好。贵岛亦悔其罪表示诚意,因以不念旧恶,是为大德,姑许其交往”(《通航一览》第一百二十二卷)。宗氏和幕府对此非但没有提一点抗议,宗氏还承认这种“几乎等于对外国执行藩臣之礼”,并且甘愿接受一切屈辱,甚

至到 1870 年(明治三年)明治政府有征韩之意时,宗氏的重臣大岛友之丞还说:“当然就对州而言,朝鲜之祸即眼前对州之祸”(《日本外交文书》3 卷 95 号)。(大岛的征韩论的真意已如前述)。

以上是维新前数百年来本质上毫无变动的我国同朝鲜交往的常例。这种关系和德川幕府给荷兰人的待遇的情况相反,完全只是宗氏和幕府接受朝鲜恩惠的关系,而不是日本国对朝鲜国的交往。除了对州人以外,其他日本人绝对不能在朝鲜停留,甚至我国海上难民被朝鲜营救的时候,也不能进入倭馆,只在馆前海滨上交给对州官吏,然后马上送回对州。

这种交往恰恰是这样,即朝鲜也好,我国也好,国民内部不允许有自主平等的交往,在朝鲜是两班和平民,在日本是武士和平民,而每一等级内部还有若干阶层,身分等级森然,所有的人都仰仗上一级的人的恩惠而得到生存。因此,这种交往是根据施给恩惠的一方的意志和情绪,随时可以改变或废止的关系。

出岛<sup>①</sup>的荷兰商人虽然为了贸易而甘心忍受屈辱,但他们原来是从事世界贸易的自主独立的商人,他们迅速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宗氏所享受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特权。出岛的荷兰甲比丹<sup>②</sup>取得了日本的有志之士的尊敬,后来向幕府解说世界形势,指导了日本的建国,而草梁的宗氏官吏和他们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数百年来始终甘心忍受屈辱,几乎辨别不出他们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了。明治初年对朝鲜的交涉所以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草梁的宗氏官吏和商人等唯恐建立平等自由的日鲜新关系,竟至经常勾通朝鲜当局阻挠谈判。

当朝鲜、日本和中国互相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世界已经起了变化,结果这三个国家全都遭到欧美的压迫。同时,日本和朝鲜之

---

① 出岛是长崎市的一个海岸地区,江户时代荷兰商馆的所在地。——译者

② 荷兰甲比丹是荷兰商馆的馆长。——译者

间也出现了新局面。

1860年(日本万延元年,朝鲜哲宗十一年)对州藩乘大庆参判使(通知日本更换将军和使节,朝鲜称作“关白承袭告知差倭”)赴朝鲜之便,另修一书托该使通知朝鲜说:俄、法、英、美四国已经“与敝国通商”,告知日本开港之事,并提醒朝鲜要防范基督邪教,严戒边防(《朝鲜史》第六篇之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等)。

这时正是对州藩有机会象荷兰甲比丹对我国的开港那样,对朝鲜开港起到指导性作用,但是这当然指望不上,恰恰相反,它却提出禁止邪教和严戒边防的意见,从而助长了朝鲜的排外心理。朝鲜接到这样的通知,认为这是邻国对边境危险的一种友好忠告,殊不知这个邻国日本在开港以后,为了扭转幕府封建统制所面临的日益增大的危机,却叫嚣着上述的征韩论。

1863年(文久三年)胜海舟等人,如前所述,提出日韩“修交”论,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即便发动征韩战争也在所不辞。同时加上大岛等人发起的救济对州藩运动和板仓侯的儒臣山田方谷的建议,于是老中板仓乃主张“转内讷为外征”,以扭转反对幕府的情绪,因而采纳了这个日韩“修交”论。同年5月,幕府批准对州藩请求拨给的粮米,晓谕该藩说:“据闻外夷来朝,修建屋宇,我与该国素有信义,应派员前往援助,击破外夷根本之策,因时制宜,以兵威制服之”(《修订防长回天史》四)。这里所说的“制服”的对象,是指入侵朝鲜的洋人吗?日本国内正在苦于洋人的压迫,幕府尚且无力抵抗,若说派员前往海外去制服洋人,岂不是痴人说梦话。6月,幕府派胜海舟前往对州探查朝鲜国内情况,同年8月的政变消灭了反幕派,外征的必要不复存在,如果发动外征,反会造成内部危机,因而也就自然作罢了。

不久,1866年(庆应二年),十四代将军家茂去世,一桥庆喜当了将军。前此一年,朝鲜由于迫害天主教徒发生了前述的对法国

舰队的交战和烧毁美国船舍门将军号事件。关于这两件事，对州藩和驻日法国公使均通知了幕府，朝鲜在法国军舰退去后的 1865 年 10 月 15 日也通过草梁寄出公函，1866 年 3 月收到。

该函开头就说：“敝邦与贵国讲信修交垂三百年，凡事关边警，无不陈述因由，开示方略，如庚申之贵国书契（即指 1860 年开港通知），即所以申旧约而敦邻睦”，并详述事件经过，说这次胜利并非已经杜绝将来之患，又说：“敝邦近海，夷船往来无数，不知贵国有何防备？是否击退洋夷或不知其‘内情’，敝邦不胜忧虑，故特通知事件始末”云云。

这显然是对前次日本向它通知开港的回答，是对边防的善意的忠告，而幕府却把它领会为朝鲜示弱和求援的呼声了。庆喜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朝鲜与美法两国之间进行调停，以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庆喜的这个企图的推动力是法国公使罗修（此人企图协助幕府，统一国内而使日本从属法国），他在 1866 年 2 月 3 日劝告幕府“应该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向世界各国宣扬贵国的国威和信义”（尾佐竹猛《从国际法来看幕末外交》，田保桥浩《李大王丙寅洋扰和日本的调停》，《青丘学丛》第十号）。

幕府于 2 月内定派外国总奉行<sup>①</sup>平山敬忠前往朝鲜，4 月将此事通知对州藩，并向美国公使告以调停朝美关系之意，取得了谅解。对州藩致书朝鲜当局说，幕府出于邻国的友谊将派遣调停使节前往谒见国王，开陈时势。可是，朝鲜东莱府使认为日本文书不合先例，拒绝接收，延至 7 月才勉为收下。

在这以前，1865 年 12 月，香港的一家报纸刊登一篇署名“日本名儒八户顺叔先生”的谈话，其大意是：近来日本日新月异，大力学习西洋的军备学术，现在拥有火轮兵船八十余艘。又有江户政府督理船务将军中滨万次郎在上海制造火轮，已经驶回本国，国内

<sup>①</sup> 即外交部长。——译者

诸侯会于江户议政，大扬国威，现在有意讨伐朝鲜。朝鲜自古属于日本，近代每五年国王照例必至江户拜谒大君将军，而现在玩忽此例，故将征伐。据田保桥浩的考证，八户是幕府代官之子，他所以散布这种流言，决非出于自己的妄想，连幕府臣下和部分藩士之间都普遍存在着这种希望和幻想。

这篇文章马上被报告给清政府。清廷的判断是：“日本近来败于英、法，因而大为发奋。果如报纸所载，英、法各国只是希望通商传教，而日本则是意欲侵占领土。倘若日本据有朝鲜，与中国接邻，其患更为切肤，远非传教通商之比，日朝之战较朝法之战更为可怕”，并将此意于 1866 年 2 月秘密通知朝鲜。

朝鲜马上对幕府发出严重质问：“流言虽不可骤信，但不胜遗憾”（5 月）。幕府对此正式加以否认，并命令对州通知朝鲜说，日本为了朝鲜的幸福，派遣使节的日期已经迫近。这件事就此结束，但是，朝鲜对日本的疑虑并没有因此而冰释，尤其因为幕府在正式否认这件事的同时又通知它派遣特使，反而增加了朝鲜的疑虑和戒心。朝鲜以时值歉收、洋祸和疫病流行不能接待宾客为理由，拒绝了幕府派遣特使（9 月上旬）。

幕府虽然接到了拒绝来函，仍旧决定于 11 月派出特使。庆喜将军亲自修书命平山携带前往。当时的方针是：“彼国国情，顽固之习，并无轻易说服之迹象，倘若如此，只好等待日后悔悟，暂先告辞回国”。

同时预料可能遭到朝鲜拒绝，因而准备一份文件，以便那时交给朝鲜。文件里说：“此番渡海来至对州，尚未接到今春回音”，这就是说明明接到朝鲜拒绝派使的回答，却故意说没有接到，“既然杳无消息，不知国情如何”，“特远涉海洋派遣使节以尽邻国之谊，竟置之不答，可谓过于冥顽不灵”，“将来必有悔悟之时，彼时斟酌情形，或将以我君王天地之宏量，重敦旧交，以伸信义”云云，可谓

狂妄已极。当然完全不是什么为了克服东洋的危机而提议日鲜合作了。这时所以只说居间调停而没有征韩字样，只是因为幕府已经濒于崩溃，根本没有考虑向海外动兵的力量和财力，可是平山等人始终主张使用武力。

10月，庆喜实行“大政奉还”<sup>①</sup>以后，外交事务仍暂委任给幕府，遣韩使节的问题也继续由幕府办理。11月，平山等人准备渡韩，但因幕府和讨幕派武装冲突迫在眉睫，这个计划便告吹了。幕府根本没有赴韩真意，从前述的文件看来是很显然的，只是因为美国公使问到遣韩使节的事情如何(11月)，为了掩饰门面，才虚张声势一番而已。由于幕府这么信口开河，以致给新政府也留下了后患。朝鲜方面因为早在8月就已正式拒绝遣使，后来又接到了使节出发日期的通知，便越发加深了对日本的猜疑，12月，向对州藩再次坦率地拒绝了遣使来访，文件里说：“方今我国深海防务，愈益严固，固不致遣悔于邻国。东武(幕府)亦何须远劳神思，遣使涉海，窃惟大惑不解”云云。

## 第二节 征韩外交的开始

维新政府在对朝鲜关系上承袭了以宗氏为媒介的室町时代以来数百年的卑鄙惯例，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征韩论或服韩论以及朝鲜对我国的深刻的怀疑和戒心。

朝鲜问题，如上所述，对对州藩说来，是个死活问题。维新后，也是首先由对州提出了这个问题。1868年(明治元年)3月23日，新政府准许该藩的请求，通知藩主宗义达，“照旧”掌管日朝两国的交往，说这是宗氏一家的职务，并说：“当此王政一新之时，对海外事务应特别用心，一洗旧弊，为国家效力”，同时将这次王政复古，

<sup>①</sup> 即还政于天皇。——译者

以及今后对朝关系概归“朝廷”处理等情通知朝鲜。殊不知所谓宗氏一家职务，却是一切旧弊的根源。

新政府在外交上忙于应付欧美，无暇顾及朝鲜，只有对州藩干焦急。闰四月，该藩上书，陈述该藩过去同朝鲜的关系，坦率指出该藩仰食于朝鲜，甘心忍受几乎等于做朝鲜外藩的屈辱，建议更改旧弊，更改朝廷对朝鲜的公文格式，树立恩威并施的规范，对方如果无礼，可以断然予以惩戒。

政府对此暂未答复，而这时对州的大岛友之允等人热烈向各有关方面要求政府树立对朝政策。政府也没有忽视朝鲜问题，5月，当大岛到外国官访问小松带刀<sup>①</sup>请示对上述建议给予指示时，小松回答说，外国官并未忽视朝鲜问题，准备在俄国侵略朝鲜前“采取步骤”，但在国内安定以前没有余力。这时大岛恳求新政府设法考虑偿还宗氏对朝鲜的负债和几年前旧幕府允许拨给的三万石救济米。对州藩要求早日树立朝鲜政策的真实目的就在于这一点。6月，大岛的奔走奏效，政府通知他“不久可给予明确答复”。

1869年9月，会津城陷落，国内在天皇政府下得到了统一。10月，政府命令对州藩把大政一新事通知朝鲜。

11月，对州藩为了通过草梁馆司向朝鲜的东莱府使送递派遣大差使的通知书（“先问书契”），事前将抄件送交任译训导（朝鲜中央派在草梁的日朝交通事务官，也受东莱府使的指挥）。凡是两国间的例外书契必须事前送去抄件，得到他的同意后，方可正式提出，这是当时的规定。其文如下（缺字、改行等从略）：

“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义达，奉书朝鲜国礼曹参判公阁下：

本朝，顷时势一变，政权一归皇室，在贵国邻谊固厚，岂不欣然哉。近差别纸，具陈颠末，不赘于兹。不佞响奉敕朝京都，朝廷褒

<sup>①</sup> 带刀是一种身分。——译者

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邻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要之，两国交际益厚，诚信永远罔渝，睿虑所在感佩曷极。今般差别使书翰，押新印以表朝廷诚意，贵国亦宜领可。旧来受图书事，其原由全出厚谊所存，则有不可容易改者。虽然，即是系朝廷特命，宜有以私害公之理耶。不佞情实至此，贵朝幸垂体谅，所深望也。

明治元年戊辰十一月 日”(原文)。

嗣于 12 月，对州藩重臣樋口铁四郎为大差使，偕同副使菰田多记携带如下的王政复古通知书渡海前往朝鲜。

“我邦皇祖连绵，一系相承，总揽大政，二千有余岁矣。中世以降，兵马之权，举委任将家，外国交际并管之。至将军家康开府于江户，亦历十余世，升平之久，不能无流弊，事与时乖戾。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而贵国之于我交谊已久矣，宜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乃差使价，以寻旧悃，惟希照亮。

明治元年戊辰十二月 日”(原文)

训导安俊卿、别差李旻文阅过这些书契的抄件后，对体例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吃一惊，并且十分怀疑。他们指责的各点可以概括以下四条。

(1) 开头的发信人署名完全改了，按理应该是“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

(2) 上款写作礼曹参判公，为什么把“三百年来大人”的称呼改了？

(3) 文中屡见“皇”“勅”等字样。按“皇”是“天下之主，率土共尊之称”，朝鲜从未尊日本为皇，受日本的卑视。“勅”是“天子的诏书”，有资格使用这个字样的，只有朝鲜的“上国”大清帝国皇帝一人。

(4) 不用朝鲜颁发的图书而盖上了新印，并说明其理由



为“宜有以私害公之理耶”，把当初朝鲜出于恩宠而颁发的图书说成是“私”，最为使人莫解，真令人“张口结舌”，是重大的侮辱。

因此训导们说，两国的约定是“三百年来金石不刊之文”，“百神共证不渝之盟”，一字一言也不能违背体例，何况这种充满不敬字句的书契，绝对不能奉呈朝廷云云，严厉拒绝接受，并拒绝给樋口等人以使节待遇。

樋口们虽百般说明，但对方坚持不允，反复辩解一直继续到1869年(明治二年)11月。同月，安训导竟然通知说，不合体例的文书，即便在此逗留10年，也不会接受，不要抱万一的奢望，赶快回妥当地点去吧。但在樋口看来，这是有关对州藩存亡的问题，仍欲继续交涉。

于是，朝鲜方面在翌年1870年(明治三年)3月，寄来东莱府使的亲笔信说：“贵国(对州)明知敝邦不能接受而轻率出此一举，其意殊难谅解。倘贵国欲修千百年如一日的旧交，使用妥当文字并非困难。计不出此，实属可叹”，暗中怀疑日本故意难为朝鲜而包藏祸心。

朝鲜当局责难“皇”“敕”字样，是因为日本使用这种字样“必有臣隶我国(朝鲜)的阴谋，所以一开头就加小心，不能许可”(安训导对倭馆司的私谈)，又因为“称皇于本朝(日本)，首先对清朝有所忌讳，再者有履霜之虞，恐他日终于取臣礼也”(明治二年六月大岛友之允的建议)。由于过去的八户顺叔的事件和幕府强行修“好”等已使朝鲜对日本抱有戒心，此次又看到这样的字样，其戒心就越发增强了。更因为尽管指责文书不合体例，而日本却坚持不改，也就越发加深了疑心。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文字上的细节。朝鲜当局所希望的，是同三百年来受恩于它的宗氏和幕府的交往，而不是拒绝使用它所颁

发的图书的平等自由的交往。当时朝鲜的经济很落后，连我国江戸时代都赶不上，国民处于两班贵族的独裁之下，受着农奴的待遇，甚至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工商业很不发达。两班贵族依靠剥削农奴，过着堕落的生活，正如 1865 年（日本庆应二年，朝鲜高宗三年）国王上清廷书中所说：“朝鲜系海边一弱小附庸国家，人民贫穷，几乎没有交易品。既不出产贵金属和宝石，粮谷和布匹也出产不多，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如果允许这些物品流出海外，国内必将立即疲弊，这个小国无疑将陷入极端危机之中”<sup>①</sup>，它的极端排斥资本主义的交往，同我国的德川幕府完全一样。尤其当时的执政大院君在击退法国舰队后说：“近来大有武官出头之势，与前不同，每每动武”（明治三年六月十三日训导和对州藩使的谈话，《日本外交文书》三），表现出趾高气扬地热衷于排外主义。

另一方面，日本革新了数百年来和朝鲜所处的同一状况，并与朝鲜竭力排斥的欧美签订条约，吸取了它们的文明，开始与它们走向同一方向。因此，朝鲜便以杀法国人、烧毁舍门将军号船、禁止洋货的同一理由，开始排斥日本。1873 年（明治六年），在东莱府使发给倭馆官员的命令书——它成了日本政府讨论征韩的直接起因——中说：“彼（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不可算作日本之人，不许其来往我国，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标，也不许入我境”。这可以说最坦率地表明了朝鲜的立场。朝鲜是施与恩惠才允许对马人来航朝的，“马州人与我和卖，本是一定不易之法，则他岛人之交易，又我国之决不许者也”，这是朝鲜对日的国策。

促使朝鲜决心排斥日本的，还有另一件事。如前所述，1868 年闰 4 月，要求解放的朝鲜民众之一，朴根基听说维新日本与西洋各国往来，认为日本是自由国家，便想依靠日本取得信仰自由，来到

---

<sup>①</sup>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U. S. A.), China, No. 35, inclosure V, Mr. Low to Mr. Fish (June 20, 1871).

釜山附近而被逮捕。这一事件，可能大大加剧了朝鲜政府对新日本的排斥。

另外一些事情，也加深了日本和洋夷通谋的嫌疑。1870年（明治三年）5月，发生了德国驻日公使乘军舰停泊在釜山的倭馆前被朝鲜赶走的事件。我国外务少丞马渡俊迈和对州的朝鲜通译等也一同搭乘这艘军舰（《李大王朝史》，庚午五月四日，《日本外交文书》三）。因此，朝鲜认为日本明知朝鲜排斥洋人而“勾引洋船擅自驶来停泊，情节极为痛恨，难保其必无后日之虑”（《李大王朝史》，《日本外交文书》三，也载有朝鲜小通事的同样谈话）。

在草梁，双方谈判一开始就陷于停顿时，甚至在这以前，日本政府就以桂小五郎（后来改名为木户孝允）为核心策谋征韩计划。木户的日记中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4日条说：“明晨，岩仓公出发，垂问前途之事，因以数事进言，其中最大事件有二。一、迅速确定天下之方向，遣使朝鲜，质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鸣罪声讨，并希大张神州之威。果如此，天下陋习将倏忽一变，远定目的于海外，百艺机器随之进展，而各窥内部，非人之短，责人之非，各不自省之恶弊将为之一洗。国土必当大增，自不待言”。

当时尚未发生朝鲜政府的“无礼”，还没有可鸣之罪。但木户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当初幕府苦于无法处理尊王攘夷派时，智者胜海舟曾提出“攘夷必先兴国”的口号，主张征韩，并以此说服木户，木户亦颇表示共鸣。现在夸耀东北战功的各藩军队中都充满对新政府的不满分子，政府本身也因失信于农商平民大众而动摇不安。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木户抱有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当然的。

木户曾与统筹新政府军务的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计议征韩的具体方策。在其日记明治二年一月一日条内写道：“今晨与大村益次郎商讨征韩的夙志。然而，所谓征者并非滥征，欲推宇内之条理也”。这个“宇内之条理”指什么呢？木户还在他寄给大村的

信里明白地这样写道：“天下各藩诸侯皆有勃勃功名之念，诸藩除论赏外别无异议，况且比起藩幕之时，骄气自然更见增长，依仗藩力任意要挟朝廷，所谓名义名分多半是空喊，丝毫看不出有明察宇内大势、维护皇国于万世的态度，唯利是图之风日甚，寻人之非，妒人之能（中略），首先是太政官迄今尚未确立重要之财政目的……日本与太政官皆有因财政而一同垮台之虞……大致说来，若不以减上益下为原则，将永难确立，这就很难使天下之风习为之一变，因而情况愈加迫切。军务方面大致已有定局，前时箱馆之役既已平定，海陆两军于朝廷已稍具端倪，希望专以朝廷之力（即不用诸藩之力），主要以兵力开辟韩地釜山。当然，此举不可能有物产金银之利，甚至或有所损失，但皇国之大方向因此确立，亿万人之眼目将为之一变，海陆军各种技术将有实际进展。如欲兴皇国于他日，维持万世，除此以外，别无他策。或谓虾夷之地尚不能开拓而经略其他，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十之说，（中略）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从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两、三年，天地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世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木户于二月朔日，也曾把同样意图讲给了三条、岩仓（《木户孝允文书》三）。

后来木户在 1873 年反对征韩论时说，他过去提倡征韩论完全是“为了平衡朝廷同诸侯的兵力”的“策略”，“一时假托朝鲜之事，重新编征亲兵，欲一试武力。盖其意专在压倒内奸”（《木户孝允文书》五、八）。这种说法虽然与前面所引的文章略有不同，但其根本是相同的。

当然，征韩论也有另外的理由。那就是在沙俄和欧美侵人朝鲜以前，日本企图抢先占领。外务省方面完全根据这方面的理由

提出征韩论。前面所引 1868 年 5 月小松带刀的话就是这样。1870 年 7 月柳原外务大丞说：“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然而“俄法英美欲占彼地，昭然若揭”，因此“实非皇国因循之日”。这番话清楚地表达了外务省的见解（容后述。《日本外交文书》二，六、七项）。

正当此时，中央接到朝鲜拒收国书的报告，于是征韩论有了名目，便越发嚣张起来。同时，明明知道朝鲜责难“皇”“敕”等字样只是文字上的误会，反而认为这是“我方可乘之机”，很多人主张对朝鲜应该“比照幕府时的交往贬低二、三等”，“作为属国”来对待（官本外务权大丞《朝鲜论》，《日本外交文书》二）。

1869 年 5 月，大岛友之允从朝鲜回来，屡次访问木户，报告朝鲜国情紊乱，建议征韩。木户也再三主张政府采纳征韩论。他认为必须征韩的理由是，封建势力当时还很强大，无法打倒，各藩割据，政府既无兵力，亦无财力。然而这个理由本身也正好说明，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兵征韩。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始终抱着征韩或其他外征的念头。不过，政府内的主张者有所不同而已。

当时，萨摩的西乡隆盛好象也并不赞成征韩。西乡的得意弟子横山安武在 1870 年 7 月列举时弊十条，以自杀规谏政府时，曾强烈反对征韩说：“主张征韩论者毕竟是由于慨叹皇国衰微所致，然而出兵应有名义，岂可不慎。朝鲜之事今姑置之，必须明察我邦形势，张维新之德化，德化既张，朝鲜岂能对我非礼。今反侮彼为小国，妄兴无名之师，万一有所蹉跌，天下亿兆将云何”。西乡为他作碑文，以赏其志。朝廷也赐给横山祭奠费，这是因为考虑到横山背后有西乡等一派反对新政府的缘故。

然而，不久，西乡变成征韩的主要角色，而木户却认为时期过早而激烈反对了。原因当在下章内详述。总之，我国对朝政策远

在所谓朝鲜的无礼等问题出现以前就有了用武力强行侵略的企图。所谓日朝交涉不过是武装侵略的准备工作而已。

政府采纳了木户的建议，决定向清朝和朝鲜派遣使节，于1869年12月3日，敕命木户为使节（10月前后已经内定，见木户的信）。他的使命是同清朝签订条约，试图以此制造日本和清朝同等，而朝鲜是低于日本的国家的论据。但是，当时木户脚下的山口藩围绕旧骑兵队的解散问题，牵扯上农民的不满，发生了大骚乱，加上日本全国局势极为不稳，因而木户终于不能成行，此事就作罢了。（后来由柳原外务少辅和伊达全权使节代替木户缔结了最初的日清友好通商条约，已如前述。）

日本政府为了准备今后的对朝政策，1869年12月，命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偕同大和的人森山茂前往朝鲜，授与十三条调查工作。其中(1)(2)(3)条是关于已往的彼此交往形式，(4)朝鲜对清朝的独立程度，(5)派遣“皇使”时有无开入军舰的港口，(6)朝鲜响往俄国的传说是否属实，(7)朝鲜的军备，(8)朝鲜内政是否紊乱，(9)有无贸易物资，物价及货币的好坏，(10)岁遣船存废的利弊，(11)对州对朝鲜交往的经费，(12)能否到草梁以外的内地旅行，(13)竹岛和松岛成为朝鲜附属的原因。以上1、2、3、10、11各条表明想要更改过去的交往关系。但是，除了第九条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其他各条都与政治企图、军事企图有关。甚至连调查有无良港，也不是从通商观点而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佐田白茅是久留米藩出身的攘夷论者，维新后该藩成了保守派根据地。他从来就是热烈的征韩论者，因而得到木户的赏识。现在，他被选为使节，而使节中没有一个具备现代头脑的学者，也是很自然的。这与调查库页岛情况时选派丸山作乐——（他在1871年企图举兵征韩，阴谋颠覆政府而遭到失败）——的情况完全一样。

佐田和森山偕同旧幕臣曾经从事外国贸易的外务省小

录① 斋藤荣和佐田的同乡医师广津弘信，于1870年1月，到达对州的严原，调查过去的交往关系，2月9日，从该地出发，22日抵达草染，调查后，于3月间回到对州。

佐田从对州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征韩论的建议。大意是朝鲜不接受国书是侮辱皇国，应当兴师问罪。朝鲜肯定不会谢罪，那时便马上派遣大军从江华，庆尚，江原，咸镜四方进攻，不出五旬就可擒住朝鲜国王。清政府如果出兵，便一并讨伐，从而吕宋、台湾可垂手而得。尤其是朝鲜，是列国覬覦之地，非取不可。所需经费，以停止开垦库页岛的费用充当。只要攻下朝鲜，便可富强，因为该国是个金窖，米麦产量甚多。方今皇国实患兵多而不患其少，诸方之兵不满足于东北战争，好战思乱，若转内乱为外征，真是一举两得云云。佐田等人的见解不过如此，可见他们的报告书十分荒谬了。

森山和斋藤也分别在4月提出对朝方策，森山的论点是：宗氏对朝鲜几乎等于执臣礼，因而必需增加该藩封地以振作士气，如壬辰之役那样，使之服兵役。同时，日本向朝鲜派遣大使，如果朝鲜对之无礼，立刻兴师一举席卷全朝。必须学习壬辰年太阁秀吉②把国内郁结的士气转移到朝鲜的治国良策。“方今邦内士气，凜乎以炽，确乎以逸，岂无内患之念哉”，征讨的经费可以“通知同盟各国，拍卖库页全岛”，以开发库页岛之费用于朝鲜。他和后来的西乡隆盛等人的朝鲜使节派遣论的说法，非常相似。

斋藤的意见是，对州藩要改变它对朝鲜执臣礼的错误，然后以宗氏为副使，向朝鲜派遣大使“以和为主，以兵权示国威，践序秩”，对方如果仍不顺从，可凭“万国公法”的权利进行讨伐。所需费用“以非常节约筹措”。最稳健的斋藤并没有说要放弃库页岛，也没

① 官名。——译者

② 即丰臣秀吉。——译者

有说朝鲜是金窖，更没有说转移内乱等等，而是主张根据“万国公法”，这一点值得注意。不过，授与侵略权利的“万国公法”当然是不存在的。

外务省接到这三个人的报告书和建议后，拟定了对朝政策三条，向太政官请示。其内容是：“有人主张借口朝鲜不接受国书的无礼，掀起战端。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彼此的交往原系通过甘心忍受屈辱谬例的对州藩进行，因此不能立即以此成为战争的借口。应该(1)利用对方拒绝国书的机会，暂时断绝交往，等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灭，我国国力一经充实，便断然‘着手’。(2)派遣木户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领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备对方挨斥我国通知国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自由往来的条约’，如果朝鲜仍不听从，就断然征讨。(3)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云云。

既然不改变彼此的交往原则，公文格式也就不能不依照旧原则。因此，要想责难朝鲜借口违反条约而拒绝与日本交往为非礼，就必须首先改变交往的原则和条约。既然一方面照旧进行岁遣船的贸易，还有单凭宗氏文引的交通，那末另一方面也就无法以釜山官吏为对手而责备朝鲜为“无礼”。外务省能够注意到这点，毕竟还称得上是“维新”的政府。然而这个意见书的主要之点，既是签订“开港开市自由往来的条约”，那末为达到这个目的，不得已时，究竟是动用佩里向日本示威的那种程度的武力，还是以征韩为主，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毋宁说，这个意见书是为了征韩或把朝鲜当作低一等的国家来对待而研究其手段和对策的。

政府采纳前述第三条意见，开始同中国交涉订约事宜。外务省认为西洋各国既然垂涎朝鲜，在中国天津事件波及朝鲜以前，有向中国派遣皇使的必要，作为准备工作，请求先向中国派遣外务官



吏。前面说过，柳原外务权大丞也单独谈到天津事件，认为英、美、法、俄有意侵略朝鲜，建议在这些国家着手经略朝鲜以前，日本“应该迅速先发制人，派遣皇使，待庙议决定之后，必须议定出兵一次，倘能宽猛恩威并施，就能不至引起大战而使其服从”。

根据这项建议，政府于9月首次派遣外务少丞吉冈弘毅、森山和广津这三个外务官赴朝。

天津事件发生时，大久保曾竭力向英、美、法、俄献媚，前面已经叙述。

半年后，即1871年3月，美国为了要求朝鲜对烧毁舍门将军号事件认罪并签订通商条约而向江华派遣舰队时，驻日美国公使曾向我外交当局建议说：“美朝之间也许发生战争，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就可了解朝鲜的军备和国内的情况，这些‘对贵国政府说来，都是必须知晓的事情’，因而建议日本官吏搭乘美国军舰”，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时外务省还同美国公使详细谈论了美国派遣舰队的目的和我国同朝鲜交涉停顿的情形，经过太政官的批准，训令当时驻在朝鲜的吉冈等人说：“在皇朝与朝鲜缔结友好条约以前，一旦有事，皇朝的立场是有援美之义而无援朝之理”，又说：美国是公开的友邦，它对朝鲜的责难是有道理的，它的目的与我国的目的相同”。日本政府自鸣得意地充当美国侵略朝鲜的爪牙。

吉田等人于1870年10月携带外务卿致朝鲜礼曹参判书和外务大丞致东莱、釜山两使书，从东京出发了。两书以日本文为正文，附以汉译，避开皇、敕等字样，通知王政复古，并希值此万国自由交往之时，敦笃日韩多年的邻谊。

这种做法同1868年派大修参判使本质上一样。只是把对象改变一下，目的地仍旧是釜山。其实派吉冈等人的目的，并不是根据7月外务省的方针和柳原大丞的建议为派遣大使进行准备工作，而是根据8月间对州草梁代官浦瀨最助来到外务省报告说，

如果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涉，朝鲜也许会接受国书才这样作的。外务省虽然认识到必须首先改变彼此交往的原则，但并不彻底，也没能洞察朝鲜拒绝国书的根本理由，却根据浦瀨的不可靠的报告，轻率地派遣了吉冈等人。以前派佐田等人赴朝时，一心想要征韩，并没有让他调查朝鲜的国情和拒绝接受国书的理由，同时佐田等人也没有洞察这些的见识，一味豪言壮语，因而落得这种结果。

森山等人于10月末借浦瀨从严原出发，因海路航行困难，闰10月中在朝鲜沿岸驶来驶去，11月3日才抵达草梁。朝鲜的训导们最初称病，后来坚持旧例，除宗氏的使者外概不接见。这从训导的立场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这以前，浦瀨从东京回草梁与训导交谈时，曾说如长此不能解决，宗氏只好撒手不管，“果然如此，则国使将渡海莅京谈判，届时不可无护卫军”。他反映了中央的征韩论，无意中泄露了兵力等等的话。因此，朝鲜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东莱、釜山两使竟作好出兵准备，哪里还谈得上接待使节。翌年，1871年3月末，吉冈才得以同训导会面，这还是出于训导个人的好意，甚至拒绝把会见的实情报告给东莱府使。这时，我国国内外务大丞丸山作乐等反动士族，因阴谋举兵讨韩和颠覆政府而被逮捕。

吉冈等人抵韩后，痛感必须取消宗氏一家职务，曾屡次向外务省建议，1871年2月命令广津弘信回国，向外务省报告情况并要求罢免宗氏（广津于4月23日回到草梁。5月又来严原，担任外务省与吉冈等人之间的联络）。在这以前，即1870年10月，宗氏主动地对日韩修好谈判的失败，引咎申请辞职。这是因为宗氏在贸易上对朝鲜负有债务，近年来又无利可图，认为莫如辞去受人责难的“世袭专职”，还可以请求政府替他偿债，并希望政府能为他另想出个收人之道。

宗氏所谓的“公贸易”，其实对人民毫无关系，政府本来没有替

他偿债的义务。但是，政府认为这和继承幕府和各藩的藩债一样，也必须替他清偿。因此，政府若是无力替宗氏偿债，也就无法罢免宗氏的“世袭专职”，因而吉冈等人的建议也就无用。

1871年7月实行废藩置县，因而宗氏的“世袭专职”在对内方面就自然消灭了。政府于7月29日任命前严原藩知事宗重正为外务大丞，并派他赴朝通知我国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的事情。但此事也迟迟未能实现，于是森山等得不耐烦便于10月回国，促请政府确立方针。其实，即便宗氏的赴韩实现，也不过姑且解决国内部分矛盾，解决朝鲜的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宗重正个人的安置。所以，广津于9月8日、9日、23日和10月3日前后数次从严原请求政府指示说：“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之事，在公开通知朝鲜以前，若被对方察觉了将怎么办，岁遣船自然会废除，但没有宗氏文引的船，朝鲜不许入港，即便敷衍一时，日后对方自然会发觉，那时我方将无言可对，又该怎么办”。

广津遇到的困难，决非派宗大丞到釜山来和当地小官谈判所能解决的。何况连宗的赴韩也迟迟不能实现，所以广津说：“弘信在此困难重重，近来精神疲劳，几至昏晕，完全迷失方向，不知如何奉闻，唯茫然耳”。他的苦闷是理所当然的。

出使的人，也没有明确的方针。中央既无方针，出使者当然也不会有方针。森山于10月回京，请求政府把罢免宗氏世袭专职以及宗氏被任命为外务大丞的事情通知给朝鲜，并由宗氏致书东莱府使，要求他今后接待日本的外务省官吏。

这时政府已经决定派岩仓大使一行前往欧美。在他们出发以前，对于朝鲜问题，也急待定出一个明确方针。木户孝允的日记的1871年(明治四年)11月7日条内写道：“上朝，关于着手戊辰以来的对韩方策(即预料引起征韩的大使派遣论)终将实现。近来有人谈及美国云云(指美朝间的交涉)，山形狂介(即山县有朋)等与此，

论有关。因此今日应讨论前途大势，征求朝臣意见，决定是否同朝鲜交往。至于对美关系，鉴于世界局势，必须谋求建立益愈亲密的交往”。同9日条内写道：“4时访西乡(隆盛)，不在，即至岩卿(岩仓具视)处，与条公(三条太政大臣)、西乡、大隈、板垣等人会晤。讨论着手朝鲜问题的程序。5时散会”。至于究竟安排了什么样的“着手”朝鲜问题的“程序”不得而知，但据推测，当时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大使派”与留守西乡、板垣等意见不和；当时正是大使派和留守派之间立有一个信约，即在大使旅外期间，留守政府只作废藩置县的善后工作，决不着手其他新的措施(后述)，所以对朝鲜的“戊辰以来的方策”，也可能只按照木户的草案决定一个大纲，至于如何实行，需要等待大使回国以后再决定。

### 第三节 朝鲜“侮日”的真相

政府似乎决定在岩仓大使等旅外期间，对朝鲜也不采取新的措施，因而对先前决定派大使赴朝一节，也迟迟不实行，只是采纳森山的建议，按照他的希望，分别由政府写好通告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的公函，以及宗外务大丞要求东莱府使接见外务省官吏的书信，于12月命令森山和旧对州藩士族相良正树(外务省十等官)、浦濑最助(十一等官)及广津弘信携往朝鲜。

这样的信函朝鲜不会接受，政府本来早就知道。因为在这以前，1871年2月，对州藩知事宗重正致书东莱府使，通知我国政体改变，要求务请接见吉冈等人时，朝鲜方面一直拖到7月末也不受理。9月，东莱府使和釜山金使及任译训导、别差等朝鲜对日事务官吏全体成员答复说：违背“三百年来坚如金石条约，故意挑起争端，岂非存心凌侮邻国”。这与其说是答复，勿宁说是抗议。因此，森山赴任时曾就以下四条取得政府批准：(1)如朝鲜不受理我

国国书，便撤退旅居朝鲜的对州士族和人民，(2)和好也罢，决裂也罢，两国贸易是私事中的私事，允许商民自办，(3)改变图书，结果也就自然要废除岁遗船，因此使节应自带食粮(这是因为估计我方改变旧例时，对方当然会取消朝市供菜)，(4)海上难民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说，想执行前年外务省提出的三策中的第一策，森山的使命是调整旧关系而不是修好。

森山等人第一次搭乘轮船渡海。过去是从对州的严原特意改乘日本帆船赴朝的，那是因为朝鲜认为轮船是洋夷风习而表示厌恶。这次却断然改变旧例，这里也可以看出废藩置县以后的日本政府的气焰。森山等人因为搭乘轮船，没有象上次那样遇风漂流一月之久，1872年1月14日从对州出发，不到一天工夫就安抵草梁。“火轮船”的入港使对方大为震惊，不出所料，朝鲜果然撤消了朝市。但火轮船开走后，又恢复了朝市供菜。

森山等人到任后即与吉冈协议，把1868年以来即驻在朝鲜的对州的樋口大差使等人遣送归国，并确定以后的方针，把日本已与中国签订条约一事通知朝鲜，专以刺探“朝鲜的真意在于和好还是决裂”为目的，至于来往船只仍沿用旧时的勘合印信。

3月20日，相良会见别差，递交前述契约草案和相良的口述私函。别差虽然姑且接受了，但说是否正式受理，须待东莱府使的指示。29日，别差又来草梁馆说，文书的受理须请示中央的指令，尚需等待30天。吉冈等人识破这是对方的拖延之计，预料如对方再提出需要请示清廷，就不知要拖延多久了。于是决定撤退，并就撤退后如何处理草梁馆的办法等，请示外务省，5月4日得到批准。

朝鲜方面的答复逾期仍未到来，到5月25日，安训导才来草梁馆说：“契约之事，不经国中彻底讨论，碍难决定”。吉冈问其期限，则说：“需时几年几月，不能预料”，果然施出拖延政策。这时吉

冈要求直接会见东莱府使，以便约定答复的大致期限，并要求训导带领前往，得到了他的允诺。于是第二天(26日)，相良正树、草梁馆司深见六郎和浦濑最助三人，走出草梁前往东莱府。这却造成重大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便遭到了朝鲜的责难，说日本违反倭馆的规则而“擅出倭馆”。当时，训导仿佛没有与日本官员同行。因为在吉冈等人向中央提出的报告书和他们回京后的复命书以及反驳东莱府使指责“擅出倭馆”的文件里面，都没有提到和朝鲜官吏同行<sup>①</sup>。

最初训导既已允许日本官员入府，看来东莱府使也许有意接见。令人吃惊的是，旧对州代官海津茂太郎等人阻碍了这次会见。当相良等人来府以后，朝鲜的小通事崔在守夜间访问海津，问东莱府使可否接见日本使节（此事虽很离奇，但除海津等人的口供以外，别无史料可查，只好根据它）。海津答复说，最好不接见。后来两者往来频繁，有妨害使节行动的迹象。因此，东莱府使骤然改变态度，拒绝接见相良等人，照例指责违背“三百年来坚如金石约定”，并说本应恭候我政府（朝鲜）的回答，然竟敢犯禁擅自出馆，犯越禁界，骚扰上府，是何道理云云，大肆责难。吉冈等人立即提出反驳书，但对方根本未予受理。

6月，吉冈、森山、广津等人全体从草梁撤退，广津留在严原，吉冈等人回京向外务省复命。草梁只留下馆司深见六郎一人。“擅出倭馆”是朝鲜严禁的事情。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连府使也要受到监督不周的处分，供菜当然要停止的。海津等人明知这种情况却

---

<sup>①</sup> 即使朝鲜方面已经允许日本官员入府，而事后又觑着脸狡辩说没有允许，决不能连眼前同行人也一并否定吧。如果有朝鲜训导同行，这正好是反驳说日本方面违反规则不合理的有利事实，如果训导本来同行，而又责备日方擅出倭馆，那末日方应该请可加以反驳，吉冈的反驳书不会不记载此事，而竟没有记载。吉冈的反驳书曾提到在入府途中屡遭村民的扣留。如训导同行，决不会发生这种麻烦。可见，训导并未同行，而是日本方面犯了“擅出倭馆”的罪过。

故意让使节犯了错误。

这里有个原因。对朝贸易并非现代的自由贸易，而是对州侯及一些寄生的特权商人所垄断的贸易，是出于朝鲜的恩惠才得到准许的贸易。所以，代表宗氏的官吏和特权商人深恐他们的垄断权被废除了，早在1869年末佐田白茅等人赴韩时，就有对州的藩士想要狙击佐田。而且旅朝的对州人经常向对方商人和官吏说，政府的“寻求友谊”之说不过出于三、五个人的功名心，目前日本国家多事，不可能“大肆经略”朝鲜，一切只好依照旧例（5年7月13日广津弘信向外务省提出的报告书）。他们就这样一味“阿谀对方，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朝鲜的训导和通事们，也从对州贸易上获得贿赂和其他巨利，更不愿意废止原来的贸易。（所以彼此往返的船只文引，在废藩置县以后本应作废，但训导们决不过问，故作不知）。这样，旧对州官吏和商人同朝鲜官员的利害是一致的，结果就导致了海津等人的做法。

留在严原的广津于同年7月，向外务省强烈主张如不撤退宗氏的官员和商人，断言“不能断绝内奸之根”，留在草梁的深见也向广津报告倭馆情况说，近来所受对方欺侮益甚，“情形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内部有人勾结对方，制造事件”，“代官所<sup>①</sup>的奸细，令人殊堪悬念”（《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朝鲜事情》）。

此时，1872年末，国内才把草梁馆改由外务省管辖，海上难民移交长崎县管理，开始调查宗氏所谓“公贸易”的负债清理事宜。这些事情本来政府在开始对朝交涉时就应该首先办理，至迟也应该在废藩置县后，派森山回草梁时加以处理。可是，直到这时才迟迟初步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月10日，副岛外务卿概括以往的交涉经过，为了解决悬案，请求太政官派“高一级的官员”，得到批准。于是，决定派遣外务大丞花房义质、上述森山茂、广津弘信及

<sup>①</sup> 即宗氏代表官员的办事处。——译者

海军省七等官远山秀行。任务是清理宗氏负债及草梁馆员，而不是修好，勘合印信依照旧章。

这时西乡隆盛等人的留守内阁已经认定，必须征韩或远征台湾，政府任命西乡的心腹部下池上四郎和土佐藩的武市能吉为外务省官员，8月8日派往中国牛庄及满洲方面视察，同时又想派陆军中校北村重赖、大尉别晋助进入朝鲜。（我还没有看到北村等确实进入朝鲜的确凿史料）。

花房率领“春日”、“有功”两艘军舰，装载铜及清偿宗氏债务的其他物资出发，9月15日抵达草梁。同月23日前大致完成整理草梁馆员及其他任务。“有功号”军舰当天就返回严原，花房搭乘的春日号军舰测量近海，明确“浅海浦的海湾既深又广，可停泊数十艘巨舰”后返航。森山留在严原，花房一人于11月6日回京复命。为了这样一点点任务，竟派两艘军舰，又测量了釜山近海，其意图是很明显的。朝鲜方面在火轮船停泊期间，取消朝市和供菜，并拒绝举行清偿宗氏负债的交涉，军舰开走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于是废除了过去日韩关系中对日本不利之点，草梁馆司决定“一如俄国人在库页岛或前此来泊对州时一样，不顾一切抗议，一扫馆内上下旧弊，补修屋宇，移建房屋，扩展空地。除飞船（彼此往来的通信船）外，其他大中小船（贸易船）不带执照（即宗氏文引）而自由往返”。朝鲜如果对此提出抗议，决定告以径向本国外务省交涉，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日本把它遭受欧美列强的压迫，反过来加到朝鲜身上来了。

1873年2月，广津弘信再度受命前去朝鲜任职，在严原与森山办理交待后，4月1日来到草梁。其间曾发生过海上难民移交问题的小纠纷。

另一方面，外务卿副岛种臣同俄国公使进行割让库页岛的谈判。接着前往中国，表面上是为了中日条约批准书的换文，实际上



是刺探中国对台湾和朝鲜的关心程度，以便准备向台湾出兵或征服朝鲜。这时征台也好，征韩也好，只等待庙议决定了。这个机会由于朝鲜当局加强管理“走私商人”即加强管理走私贸易而终于到来。

对朝贸易的情况是，花房赴朝后，废除了岁遣船，对没有执照的所谓走私贸易认为“其实就是公开的通商贸易”而予以鼓励。（这种理论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以前的“公贸易”，其实就是一种封建领主的私贸易。）这样一来，无执照或是用“辛未（明治4年）10月”所发执照“双方交易毫无障碍”地进行起来。到了1873年，这种贸易越发兴盛了（同年5月森山的报告书）。当时长崎县想对这种贸易课税，但因外务省反对，太政官决定进出口一律暂时免税，于是“官民全都大搞起走私贸易”了。

1873年4月前后，所谓“执照”这种封建的束缚，事实上已不存在。东京、大阪的商人早就开始进入朝鲜。广津到任后，立即报告外务省说：“鉴于目前没有日朝交易的物资，东京及大阪的商人来朝也没有买卖可做。他们回国后可能因此作些无聊的宣传”。因此，请求“禁止他们来朝”。

但是，在这个报告还没有到这外务省，4月末，东京三井组的三名办事员，冒称严原的三木屋商店的办事员来到釜山。这时朝鲜方面突然开始加强管理走私商人。既然还没有签定新条约，是否允许“走私商人”，完全在于朝鲜的训导和通事随便掌握，日本对这种取缔无权提出抗议。日方只能说废藩置县后，日本已经没有对州人和东京人之分了，这样来对付他们，的确是个有趣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对朝鲜方面显然是讲不通的，如果对方提出执照问题，也将无法答对。

进入5月后，朝鲜更加加紧取缔走私贸易。同月2日，东莱府使在海岸上布置了一万名荷枪士兵，水兵往来于倭馆前面的海

上。因此贸易几乎断绝了。不过，朝市供菜虽然不充足但还没断绝。朝鲜方面所以突然加紧取缔，正如广津屡次报告给外务省那样，是因为三井办事员进入朝鲜的缘故。训导们听说三井是日本的大商巨贾，“得悉三井的人运到大宗货物，因而想出一条计策，即停止走私贸易，使日本商馆的商人陷入困境，然后让上面提到过的崔在守（小通事）一手包办，收买这些物资”。此外，受大资本压迫的对州的普通商人和朝鲜官员互相勾结，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再有，还可能因为走私贸易闹得也太公开了，训导们深恐被东莱府使察知，才着手取缔。

同时，朝鲜方面发觉日本怀有征韩野心，军事上开始显示有所准备。根据广津于4月24日向外务省提出的报告说：“据严原商人报告，韩商常说，日本早晚必派兵舰前来，故朝鲜方面亦专为此事进行准备。综合各种情况，朝鲜发觉我方将派兵舰来，多少有练兵迹象，但其唯一用意只是向馆内显示彼等亦有充分准备而已”。

征韩论在日本已酝酿很久，通过流言和浦瀨的失言，早已传入朝鲜当局，而朝鲜警惕日本是从幕府末期开始的，他们看到日本火轮船开到朝鲜和东京大商人进入朝鲜，便越发提高了警惕。在这以前，朝鲜已经知道中日订约事，并且也知道“洋夷利诱倭人”，倭人对清廷“已非臣服之国”（《李大王朝史》壬申三月四日条）。至于朝鲜察觉日本征韩野心这点，无疑同希望依照旧例交往的严原商人有关。

因此，4月15日还有朝鲜军队在倭馆附近演习，5月13日，举行多多浦金使、釜山金使和东莱府使联合的海陆军大演习。当天午后，各府使搭乘载重量三、四百石的主船三只及约百只小船——与我国（日本）船相比，是极其粗制滥造的船——在倭馆前的海面集合，府使搭乘的船上左右两舷站着约三十名妓女，奏乐舞蹈，时而放几声步枪，自鸣得意。然后在倭馆附近登陆，“文武士卒

共三、四百人，夫役三千、妇女约二、三百人”，另有许多妓女，大摆酒宴，五点钟时，士兵分列东西，“东边的旗帜往西，西边的往东，来回交叉跑五六回，这时发射步枪两响，然后渐渐沉寂下来”。“这大概就是这一天的所谓演习了”。入夜，岸上和海上燃起篝火，以张声势。据广津批评说，“连我国文政、天保年间武装窳劣时期的犬猎都比不上，三分之一是妇女、娼妓，以练兵为名，其实是极尽奢侈之能事，而下级士兵、夫役连肚子都吃不饱，装卸船货，践踏田地，怨声载道。显然是亡国之兆，实属可怜之至”。纵令东莱府使如何腐败，眼见日本开来轮船，还载妓游船，以为这是夸示武力，这点很值得怀疑。可能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军事示威。

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5月末，东莱府使命令草梁馆守将和小通事严加取缔走私商人，并将其命令书张贴在门前，写道：“近来彼我相持，一言以蔽之，我则仍依三百年约定，而彼欲变不易之法，是何居心？事若违例，行之本国，亦所难强，何况行于邻国，岂能任意行之乎。彼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此则不可谓日本之人，不能许其来往我境，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式，也不许入我港。马州人与我交易，本是一定不易之法，他岛人之交易，我国决不许可。潜货冒犯，乃两国所共禁。近见彼人所为，可谓无法之国，而且不以此为羞。我国则法令自在，行之于我境内。留馆商人，欲行条约中事，皆当听施，如欲行法外之事，则永无可成之日。虽欲偷卖一物，此路终不开。我守经奉法，彼亦想无他说，须以此意，洞谕彼中头领，使不至妄错生事。

癸酉五月 日”

广津把这个命令书的抄件附在他5月31日的报告书里，寄给了外务省。广津在报告中说：“文中有无理之言，青年官员十分愤慨，当即加以说谕，今后如公然进入馆内作无礼举动，反可为日后谈判造成开端，故我方却昂然不予理睬，大家非常镇静。唯盼早日

决定庙议，同人隐忍之情，诸希谅解”云云。

广津的报告几时到达外务省的不详，但各书都载外务卿代理上野景范据此报告太政官，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对策是6月12日，这显然失于过早。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各书所载森山于5月前往朝鲜时得到上述命令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西乡隆盛于7月21日写给西乡从道的信里谈到准备出兵台湾的事，但是关于朝鲜却只字未提。西乡在同月29日写给板垣的信里方才提到朝鲜：“朝鲜一事，副岛氏已经回来，是否有所决定？倘仍无决定……”。如果7月21日以前已有征韩之议，那末他写给从道的信里一定会有涉及这事的字句。

我想问题的发生当在7月末，首先在西乡和板垣之间有所计议，7月26日，副岛从中国回来，他在内阁会议上报告清政府言明不干预朝鲜内政外交以后，征韩论才正式提到内阁会议的议程上。

当时的留守政府漠视同岩仓大使等人所作的诺言，接连不断地做一些新的大事。对外，北有库页岛问题，南有出兵台湾计划，此番又得到上述东莱府使的命令书，终于讨论起如何实现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的征韩论。关于库页岛问题，西乡等人曾经认为“俄国派军加强防备，屡有暴行，故应在讨伐朝鲜以前发兵保护”，但并没有这样做，而采取了把库页让给沙俄的方针。同时还停止了已经完全准备好的台湾出兵，把注意力开始完全集中在朝鲜上。不过，西乡在9月2日写给黑田清隆的信里说：“倘在吾兄管辖区内（指库页岛）生起事端，当然无暇顾及朝鲜，我打算把兵力转用在库页岛上”，仿佛西乡比朝鲜更重视库页岛问题。然而《大西乡全集》的编者对此解释说，“由于预料到一定会有人说政府对强国俄罗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责备弱国朝鲜，岂有此理，西乡隆盛看到这点才故意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正确的推测。所以西乡在9月11日写给黑田的第二封信里对库页岛问题说道：“如果连朝鲜那里都垮

了的话，那就一切全垮了”。还有，黑田这时虽然主张对库页岛采取强硬态度，其实这只是反对征韩派的一种姿态，如前所述，首先主张放弃库页岛的不是别人，正是黑田。

征韩是明治政府很久以来的悬案。正如西乡隆盛寄给三条太政大臣的信中所说的：“朝鲜一事，在国政革新之初就已着手，迄今已五、六年矣。然而，最初并非寻求亲睦，想必方略已定”。这就是说，明治政府根本不是对朝鲜寻求和平的友好，而是抱着军事和政治野心。恰巧在 1873 年，明治六年七月，朝鲜方面使用了可以曲解为“骄夸侮慢”的词句，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便抓住了“过去隐忍等待的”这一天（西乡致三条书，1873 年 8 月 3 日）。

所有记述征韩论的书籍，都异口同声地说，朝鲜再三排日侮日，尤其竟至撤晨市停供菜来折磨倭馆的日本人，西乡等人为了保护侨民和正当权益、维持国家体面才决意征韩。然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企图使侵略合理化。撤市停供，只在火轮船入港期间，短期间确实有过，但并没有长期继续下去。不仅如此，1872 年森山回京时，在提交外务省的报告书中曾说，朝鲜方面向馆内送薪炭，尽管日本方面拒绝，但仍按旧例，不断供给，以致无计可施（《日本外交文书》，六）。朝鲜这样做，是因为它根本不愿意同日本作战，也不愿意接受新的自由平等的交往，想要由此表示信守“三百年金石定约”的是朝鲜，而破坏的是日本。因此，日本虽然拒绝，朝鲜方面还是继续供应。日本方面既然希望开辟新的现代式的交往，不是当作恩惠而是有权利的交往，那末朝鲜拒绝过去的恩惠待遇——朝市供菜，也是当然的。所以在晨市供菜的问题上，日朝双方都没有什么不合理处。

其次，各书把朝鲜政府处死同日本人通奸的妇女一事，算作排日行为之一，但史料没有举出。即使真有这种事，从倭馆规章来说，在朝鲜方面也是极其当然之事，应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排日

侮日的举动，因为在江户时代，这种通奸罪多得很。

还有，所谓朝鲜方面阻塞商路、对日本海上难民见死不救等等，这不是歪曲就是捏造。翻看《日本外交文书》，便会立刻明白真相。

东莱府使的命令书里说：“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云云，固然可以说是“侮日”，但如果比起朝鲜人称西洋人为“犬羊之夷狄”，对日本还是多少有些好意的。朝鲜统治者的自尊自大和保守顽固的愚蠢，固然可怜可笑，但别国人也无权为此而愤慨。维新前的日本固不待言，即当时政府内部也还有以左大臣岛津久光为首的保守派愤慨地说日本“醉心于西洋，易风变俗”，“受制于人”。直到1876年，还有熊本“神风连”<sup>①</sup>因愤慨日本受制于夷狄而掀起了叛乱。朝鲜的封建统治者也和岛津及神风连一样，问题非常简单明白。朝鲜是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尤其当时执政的大院君一伙人，是激烈的排外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同西洋人一样穿西服、坐洋轮船、按朝鲜说法是“违背了三百年金石约定”、甚至抱着征服野心的日本人进行不同以前方式的交往。他们所希望的，是李氏朝鲜开国以来恩赐给日本的那种旧式交往。到了1873年，恰巧是日本统治者——西乡、板垣等人感到有必要在台湾、库页岛或朝鲜试试他们的锋芒的一年。

接到上述命令书后，参议板垣退助立刻主张把它当作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就连西乡也认为，根据同釜山一个小吏的交涉就马上出兵，“纵令从公法上说也有讨伐的理由，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天下人并不知晓”，不如表面上暂派使节，“责备朝鲜其菲薄邻交，并要求纠正以往的非礼，敦笃未来的国交”。这样，它“必然采取轻蔑举动，还一定要杀害使节”，那时再派征讨大军不迟。可见派遣使节无非是制造征韩借口的手段。总之，一心要挑起战争

<sup>①</sup> 神风连又称敬神党，是明治九年在熊本组成的政治团体。——译者

侵略领土的是西乡等人。西乡在8月17日写给板垣的信里也说，如果派他担任这个使节，他一定会挑起战争。挑拨对方打仗，是西乡最得意的战略。当初在1867年末，江户的萨藩邸内窝藏大批浪人，向庄内藩等幕府方面挑衅，终于掀起讨伐幕府的战争，破坏了山内容堂等公武合体派的计策，就是西乡策划的。

征韩论是明治元年以来天皇政府最重要的国策。这个国策刚要实行时，它的首倡者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从国外回来，认为派西乡前往朝鲜，——其实是日韩开战，为期尚早，一致反对，主张首先着手内治。可是第二年，以大久保为中心，却侵略起台湾了。

为什么明治六年时发生了这种对立呢？为什么征韩论到了这一年才成了把政府分为两派的大问题呢？西乡等人的征韩论和木户等人最初是提倡的征韩论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我们要撇开对朝鲜的关系，来看看日本国内的问题。

### 第三章 关于征韩的争论

——士族军国主义和官僚军国主义——

#### 第一节 征韩论的意义

政府的征韩论，当时对人民完全保密。到1873年（明治六年）10月，围绕着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这一争执演成一大政变——天皇制官僚独裁的确立，享有一代盛名的西乡参议等征韩派连袂退出政府，近卫军也陷于一派混乱。于是社会也为之大哗。但是，直到这时为止，人民还是不知道征韩论是怎么回事。日本与朝鲜的交涉经过

也全然没有发表过，只是到了最近“《日本外交文书》”出版了，才大致明确了它的内容。

所谓朝鲜的“排日行为”也不是由我国政府向人民公布的，而是1872年（明治五年）2月旅居横滨的外侨煽动征韩热潮时，百姓才初次听到（史料后述）。1873年2月，由于实行征兵令，民间有流传说寅年出生的男子将被征去征伐朝鲜，政府办的《东京日日新闻》报导说：“寅年出生的男子因而大为惊慌，父母十分担忧，即使与此无关的人，无知的老百姓，一般说来，无不垂头丧气”。同时，该报又说：“所谓与朝鲜不和，完全是无稽之谈”。记者不知道征韩论的实情也好，知道故意不谈也好，总之对人民一切保密。

这时已经到了西乡和板垣等人计划出兵朝鲜（第一步是派遣使节）的8月时，甚至即将向海外用兵时，连新成立的陆海军当局都几乎没有参加过征韩的任何会议。虽然西乡是元帅，是近卫都督，身为最高武官，但他的近卫军是1871年从萨、长、土三藩征集来的土族兵，是旧式的军队。1873年征兵令实施后，建立了新军，指挥权归陆军卿山县有朋掌握，而西乡关于征韩从未同山县商议过。山县于8月从东京出发，在巡视镇台的中途抵达大阪时，接到陆军省官员津田出的来信，这时才知道征韩的内阁会议，但是他还认为“不致发生意外”。到10月19日，即内阁会议通过征韩后，山县才在箱馆接到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的公函，对事态的意外严重感到吃惊（《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

内阁会议隐约传到民间，仿佛在10月前后，同月10日的《新闻杂志》上有土族饭岛投的一篇征韩论的文章，《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的编者给它加的标题是“征韩论初露头角”。当时，这的确可以说是初露头角。前一个月，《东京日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香港汉字新闻的译稿，说日本有征韩之意，但对当时的内阁会议，一字未提。



征韩论就是这样，在新的陆海军当局都几乎没有参加讨论之下，仅仅在参议之间，其中包括赞成、反对两派参议极少数心腹在内进行了争论。因此，关于 1873 年的征韩派的主张，很少确实的记录，这也是当然的。虽然也有一些谈话记录、见闻录，如烟台专太郎的《征韩论真相》、黑龙会编的《西南记传》以及有关征韩论的其他名著等等，但这些书都是随便编造，提出自圆其说的主张，这些谈话和见闻录根本缺乏史料价值。因而根据这些谈话和见闻录所写的有关对韩交涉经过，都是有意无意地不符合事实。关于这样秘密进行争论，连一篇记录都没留下这一事实本身，正是解答征韩论真相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1873 年之前的征韩论有两个目的。一、以抢先沙俄侵略朝鲜为借口，日本出兵占领，进而把它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二、把当时的内乱危机转移为外征。

根据前文所述的事实，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外务省方面的征韩论从第一点着眼，初期的木户孝允、佐田白茅等人则从第二点着眼，从本章以前的叙述已很清楚。

那末 1873 年(明治六年)的西乡等人的朝鲜政策，在这一点上究竟做了哪些计划呢？此点通常引证的是西乡因征韩论失败下野后于 1874 年(明治七年)正月对庄内士族酒井玄蕃的一段谈话。我们虽然不相信西乡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象败将言勇似地到处谈论他当年的主张，但不妨姑且看一看他的谈话。

向朝鲜派遣使节，等待朝鲜对使节施加暴行，然后宣布征韩理由，这是已经内定的步骤，但这时黑田清隆提出了库页岛问题，因此，西乡认为“国情既然如此，毕竟不会平安无事，定会同俄国发生战争。一旦决定开战，就不得不策划军略，目前宜保护北海道，在那里与俄国对峙，这样就更需要征伐朝鲜，把势力从霍谢德扩张到尼古拉耶夫一带，由我方深入彼地一步，以保卫此地”。

当时恰巧在土耳其发生英俄冲突，有英俄即将开战的传说。

“听说欧洲方面有人计划把北海道作为各国杂居之地，关于此事最近可能有照会。总之，英国的海军是举世无敌的，所以不妨把北海道暂时租给英法，欧洲方面也认为俄国覬覦北海道对世界局势影响甚大，因而上述意旨必能得到支持”。

“情形既如上述，如果日本能这样起来奋斗，土耳其也必将起来奋斗，这样英国必将在波兰发动它预定的军事行动。如果同英国好好计议举事，我想俄国是不足惧的。我积极主张这点，于是岩仓也难以说出害怕战争，只说那样做步骤的先后就不合了云云”。

在对俄政策上有人主张在北海道的札幌设置镇台。如果那样，西乡就出任札幌本营长官，篠原国干任库页岛分营长官。与俄国开战，纵令政府投降，“我自己也决不投降云云”。

平时在经济问题上仿佛是英雄豪杰的人，一谈到战争流血的事，便畏缩不前。“本来朝鲜之事，除只两、三人外，从未谈论过，但后来军队中人逐渐听到，遂造成今日的情况”（《大西乡全集》二所收“酒井玄蕃笔记”）。

这个所谓西乡谈话的前半段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援引，并且说，西乡实际上是以沙俄为敌，是为防俄而征韩的。但是，如果这段谈话果真可信，那末我们必须提出，西乡是为了对抗俄国而“同英国好好计议”，是为了取得英法的援助而不惜把北海道暂时租给英法的。因为这段话的对俄政策是和对英政策分不开的。这样看来，西乡的所谓保护国权，该是极其实国的主张。他为了对抗俄国在南库页岛扩张势力而主张把北海道租给英法，使日本充当英国对俄的看家犬，这真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

根据《佐佐木高行日记》，板垣想用分年偿还外债的办法来筹备军费。可见板垣的主张也是为了防止莫须有的沙俄的领土侵略而使日本难免变成英法的经济上的奴隶的。

但据《征韩论的真相》、《大隈伯昔日谭》等载，副岛外务卿同驻日俄国公使布策过从甚密，关于征韩也曾取得他的谅解。当时，副岛同布策接近这点，从 1872 年热烈欢迎俄国皇太子，或从他曾谈判想把库页岛转让给俄国可以推测出来。假如说征韩的决意，是取得了俄国的谅解，那末所谓为了防备俄国而征韩云云，简直是可笑的澜言了。所谓防备俄国，究竟是在何处和怎样防备呢？既然已经交涉要把库页岛让给俄国，可见征韩派根本没有什么对俄防卫计划。

所谓征韩论取得布策谅解一事，并不能加以否定。在大久保利通反对即立征韩的意见书第七条里写道：“虽然说由于俄国或中国一、二朝臣的话或默许，便不会干预朝鲜之事”，这就是足以说明此间情况的资料。纵观当时东亚或世界的形势，沙俄把主力放在中央亚细亚和土耳其方面，对满洲和朝鲜虽然也有野心，但并不象外务省大肆宣传的那样。因此，对库页岛方面的压迫干脆让步，而远在外国采取对峙的战略，简直是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说西乡等人的征韩论是防卫俄国侵略的战略，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捏造。这种说法可能是在签订日英同盟（1902 年）、日俄战争前后捏造出来的。

代表 1873 年征韩论的对外政策方面的人物，是副岛种臣。关于征韩论，他没有向人民作过任何交代，但当他于 1873 年前往中国时，对英美公使曾在某种程度上谈到日本的朝鲜政策，取得了谅解。不仅如此，副岛的征韩论大部分根据顾问美国人李仙得的方略，这是一般的定论。据说李仙得的论调是：“日本应该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围绕中国成一半圆形，可以抵制俄国压迫东洋之势”（渡边儿治郎《日清日露战争史话》前引《征韩论的真相》）。我不知道他提出这种主张的年代，但是李仙得在 1874—1875 年（明治七一八年）曾提出两项建议：“日本或者开

发北海道全岛，然后攻取朝鲜，或者让朝鲜强盛起来，使其国力能够自卫”（堀真琴《论美国人李仙得建议书》，《国家学会杂志》五一之五）。

渡边氏所引的李仙得的建议和上述这个文件大不相同。副岛采取了李仙得的两条路线中的第一条。副岛通过李仙得对于一切对外政策与美国公使德朗取得联系，尤其是关于出兵台湾，外务省完全处于李的指挥之下，已如前述。1874年大久保政府出兵台湾也是根据李的策略，这在外国人方面已成众所周知的事，而对人民却没有任何交代，反而被外国人批评：“日本政府策划征讨台湾的大事，而对人民不作任何布告，政府不知政府为何物”（明治七年四月廿五日木户孝允致伊藤博文书）。由此可见，在对朝鲜政策上，说我国外务省与英、美，特别和美国之间有充分联系，进而取得美国谅解的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当时英、美方面煽动日本征韩也是明显的事实。1872年（明治五年）3月间，横滨的《先驱报》报导朝鲜对日本人的“无理残暴的对待”，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3月2日《东京日日新闻》）。同年7月，英国人布拉克的《日新真事志》刊载了一封伪造的朝鲜国致我国政府的国书，里面写道：“我朝鲜虽是小国，但敢致函贵国说西洋夷狄乃野兽也。（中略）吾人深望贵国联合同盟诸夷向我国派遣海陆大军。为使贵国及其友邦的攻击方便起见，吾人将以釜山为战场，清扫以待。（中略）日本一定要来侵略朝鲜，不然朝鲜只有侵略日本了<sup>①</sup>”。

木户孝允当时说：“外国恶徒始终为了私利而一再唆使外征，其目的不外乎贪图推销武器”。综合上述各项事实，木户的这些话，不可能不是为了反对征韩而编造的（明治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致青木周弼书）。这种煽动不仅是英美商人企图推销武器，英美两国政

<sup>①</sup> Black: Young Japan Vol. II, pp. 380.

府也唆使日本侵略朝鲜，并且加以援助。

虽然是 1873 年征韩论争后的史料，英国公使巴夏礼于 1874 年 9 月旅行函馆时写给他的友人说：“这里是能够监视对岸俄国行动的唯一地点。我盼望朝鲜不会有朝一日落到俄国的手里。函馆的开埠拯救了蝦夷，如果朝鲜人不愚蠢透顶，他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开埠通商就是救国”（1874 年 9 月 15 日致罗伯逊书）。为了不使朝鲜落到俄国手里，英国希望日本向朝鲜扩张。

1874 年，当大久保为了处理台湾事件前往中国时，清廷的英人顾问和英国驻华公使馆员们作为公使的意见向大久保说：“中国政府实在可怜，此番务必和好了事，今后可经略朝鲜，这样，英国将首先援助，这对日本说来是上策”，又说：“日本经略朝鲜有利，如果日本有此举，欧洲没有异论，我英国将给予帮助”云云（《大久保利通日记》，明治七年十月十二日，十三日）。

1875 年日本侵略朝鲜江华炮台时，《邮便报知新闻》登载一篇消息，大意说：“驻日英国公使鼓励了日本对朝鲜的好战欲望”。日英两国当局曾立即予以正式否认，但英国鼓励日本侵略朝鲜却是事实。当然，英国也并不希望日本完全征服朝鲜，英美所希望的是李仙得的第二点建议，即朝鲜的开埠通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希望日本采取积极手段；而副岛等人却把这看做是对征韩的援助了。《大隈伯昔日谭》怀疑副岛的征韩论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外国公使团的操纵。是否能肯定这样说，不得而知，但大隈所说的“李仙得的划策、德朗的阴谋”同征韩论有关，这是不能否认的。

把征韩论作为一个对外政策来看，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即梦想征服大陆的第一步。这种政策，并不是在我国国内使我国国力即民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充实起来，作为东亚的先进国家，启发朝鲜、中国等落后国家，协力对抗沙皇俄国和英法美对领土和经济的侵略，而是恰恰相反，如前文所述，我国国内不去抵抗英、美、

法、俄的压迫，想要侵略朝鲜和大陆上的满洲取得补偿，并且把人民对外平等的要求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这个计划，企图在英美的谅解和鼓励之下大力执行，这是明治以来天皇政府各派的一贯的对朝政策，西乡的谈话也是这样提的（即便不是西乡的真话，至少捏造这个谈话的人是这样想的），同时从副岛、大久保同英美公使的关系也可以看得出来。

岩仓、大久保和木户也并非在原则上反对征韩。侵略朝鲜是在岩仓等人出国前的一贯策划。他们在1873年反对西乡、板垣的征韩论后不久，在1875年就发动了江华岛事件。他们认为西乡的朝鲜政策从国内和国际情形看来为期尚早，计划草率，他们主张不要一举占领朝鲜，而是逐渐在朝鲜培植势力。这一点，将在下章叙述。

两派的主要争论之点不在于征韩论的对外方面，而是在于它的对内方面。1873年征韩论突然大肆叫嚣起来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国内关系，并不是由于朝鲜的“排日”激化起来。正因为征韩论主要是国内问题，所以它在国外并不十分保密，而在国内却是个严守的秘密。木户孝允的1869—1890年间的征韩论，目的专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武力，削弱各藩的势力，这点前面已经叙述。1872年7月，他在美国的旅次，看到了报纸登载朝鲜驱逐日本使节，撕毁国书的造谣报导而神驰祖国时，在日记里写道，应该向朝鲜派遣使节，首先要慰抚有礼，“倘若对方无礼，则必须有所准备”，“试观今日我日本的形势，一旦对外发生事端，将大大促进国内的进步”。这就是首先向朝鲜派遣使节，然后挑拨朝鲜，造成侵略借口的策略，而这种策略同一年后的西乡的主张完全一致。

但是，怎样促进“国内的进步”，加强什么样的中央政府，在这一点上，西乡、板垣等人和木户、大久保等人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虽然他们都是为此而主张征韩的。

## 第二节 西乡、板垣派的立场

### (1) 西乡隆盛

木户孝允企图把国内的对立扭转为外征，借此机会培养中央政府的兵力，以推行自己的国内政策。西乡等人也和木户一样，在1872—1873年间，企图把士族在国内思乱的心情移到对外方面，给士族开辟一条生路，同时在国内断然实行他们自己的政策。

在1868年内乱时，西乡刚刚接收江户城，还在东征大总督府参谋总长的任上，便返回故乡，不到中央来。他这种举动的理由，虽然有种种推测，西乡本人也曾表露过因为他同萨藩藩主岛津久光的关系而不能留在中央的心情，但是总的说来，是因为他对内乱刚一结束就开始的官僚政治心怀不满。回到故乡后，他在1869年12月写给友人桂四郎的信里说：“暂时派到中央去的军队，完全是为了替我纠正官吏的骄奢”。从萨摩藩派到中央作为政府亲兵的军队，原来是西乡监视中央官僚的军队。

翌年，1870年7月，西乡的得意门生横山安武举出十条时弊，以自杀规谏政府时，首先提到：“旧幕府之恶弊，暗移于新政，昨非者今是”，又说：“自辅相大臣起，侈靡骄奢，上则暗诱朝廷，下则不察饥饿，此其一也。大小官员，外张虚饰，内事名利，此其二也。”以下八条完全是批判官僚政治的腐败和非难征韩论之不当的。这样的想法是西乡及萨摩士族一般的心境。

那末西乡等人想怎样纠正这种腐败呢？除了实行民主主义，使全体国民抑制政府的专制以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可是，西乡根本没有想到这点，他是想用士族的“武政”来代替官僚。他的萨藩藩制改革就是他的理想制度的一副缩图。他利用“版籍奉还”后中央政府颁发的“藩治职制”来打破士族内部的门阀，不顾藩

主岛津久光及其亲近门阀的反对，剥夺了领主对门阀士族私领地的统治权，把藩主个人的财产同藩的财产区别开来，不管以前的藩主的直辖地，还是新没收的私领地，每个乡都一律安置重新选拔的专任庄头，以各乡乡士的人数为比例，组成了大小“常备军队”，命庄头统辖，司法和行政一概归军队掌管，把乡村办公处改称为军务处，完全是士族独裁的军国化。

他想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全国。1873年，陆军少将鸟尾小弥太根据自己的见解想在全国实行这类办法而向西乡征询意见，据说西乡也表示了同意（《明治政史》引用鸟尾著《国势因果论》）。

西乡反对官僚政治，是从封建士族立场出发的。1869年5月，他在信里说：“在生死存亡之时，象私有物一样将一些人召集来，平乱以后，则弃之不顾，这不仅有关道义……”云云，这充分表现了动员士族掀起戊辰内乱的肇事人和身任东征军总参谋的西乡本人的立场和心事。

仰慕西乡并对新政府心怀不满的士族都拥戴西乡为领袖了。1870到1871年，长州的大乐源太郎等人掀起反政府的暴动，后来逃到日田，想以久留米和柳川的藩士为依靠力量，在九州一带掀起大骚动，政府派遣巡察使四条隆謨少将前往镇抚，同时命令九州、西国各藩出兵时，萨藩却出兵很晚，反有支援暴动的趋势。因此木户等人对西乡深为怀疑。这时西乡身在中央政府为官，但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改组”政府。西乡与大乐等人是否真有联系姑且不论，但是因为愤懑之徒都把希望寄托在西乡身上，所以木户等人才对西乡产生了疑惑。由于这一件事以及横山的死谏，当西乡在鹿儿岛时，就谣传他将率兵晋京，清洗政府（《明治圣上和臣高行》）。西乡也多少抱有这种念头，这从上面他写给桂四郎的信中也可以推察出来。反动士族的阴谋，不拘大小，都利用西乡的名义。1871年12月，西乡自己写道：“每有坏事，都牵连到我的名



字，真令人不痛快”(致桂四郎的信)。

但是明治“维新”在不断前进，政府不得不放弃士族第一的立场，尽管各藩藩主和士族心怀不满，为了“皇国人民的平等”不得不缩小封建贵族的特权，振兴工商业，使生产得到自由，因此必须提出“文明开化”这个口号。不言而喻，为了做到文明开化，官僚和豪商的奢侈和腐败的政治，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这些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同时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大官也无需对三井、小野、岛田以及五代才助、岩崎弥太郎、山城屋和助这些新旧资本家，利用税款给以莫大的保护，因而也就不会发生 1871 年西乡骂井上馨是“三井的店伙”这类事(后述)。但是，明治政府就是搞这类事情的专制官僚政府。正因为这样，才激起反动士族的不满，而且它又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这种不满。

于是，便企图同士族谋求妥协，把西乡拉入中央政府，利用他的力量来压制士族，实行废藩置县。1870 年末，以岩仓具视为勅使，由木户、大久保等人随行，政府首脑全班人马来到山口和鹿儿岛，敦促两藩的藩主晋京，天皇还参拜了毛利<sup>①</sup>和岛津<sup>②</sup>两家的神社<sup>③</sup>。那时岩仓、大久保、山县有朋等人热心恳请西乡出马，西乡也终于答应了(他是想实行自己的政策，后述)。然后又拉出土佐的板垣退助，1871 年 2 月一同晋京，同时由萨、长、土三藩向中央政府派出“亲兵”。

这样就取得了政府的一时安定，乘机实行了废藩置县。直到这时为止，西乡和士族都没有异议，而且表示赞成。西乡在萨摩的政策也是把藩侯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表示反对的是以岛津久光为首的旧诸侯。在废藩置县后，久光甚至希望当鹿儿岛县知事(明治

---

① 即长州藩藩主。——译者

② 即萨摩藩藩主。——译者

③ 即祖庙。——译者

五年二月十五日西乡致大久保书，参照松平庆永《久光公密事稿》，《大久保文书》四）。

对西乡等人来说，最成为问题的倒是废藩置县以后，也就是迟早要搞的士族处理问题。甚至大久保也说：“鹿儿岛县之事，士族众多，无与伦比（为其他各藩的两倍，按全人口计算，每五人有一士族），这种情形，当然要遵照九月前后朝廷颁布的意旨来处理，此事真使人为难”（明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岩仓书）。可见西乡对此怎么能不关心呢。西乡在废藩后马上对如何保护旧萨藩士族的生活，拟定了周密的计划。从这时起到下野为止，西乡写给桂四郎等萨藩人士的书信，几乎全是关于士族生活保障的。

当时西乡对如何使藩的债权不被中央接收而留在士族手里也曾作过安排（明治四年九月二日致桂四郎书）。此外，旧萨藩领内诸岛出产的砂糖，很久以来归该藩专卖，废藩后，仍然没有停止鹿儿岛县——实质上就是萨藩的专卖。桂四郎等人想废除专卖，改由士族商行垄断砂糖的买卖，他主张“作为士族的贸易，组织一个商行，由商行一手贩卖，以其利益救济士族。”对此，西乡曾指示说，向各地贩卖砂糖，“无疑，其利益必为大藏省所占”，而人们还认为是官家专卖，必须注意，不要使利益被大藏省得去（1871年12月11日）。这与当时官僚们正在极力设法充实中央财政和保护商业资本相比，充分表现出专为地方士族生活着想的西乡的形象了。

1871年，西乡参加内阁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替岩仓、大久保等天皇制官僚充当挡箭牌。他是为了改组政府，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在萨摩实行的那一套。他离开故乡时，曾对士族们作了某种诺言。1871年6月25日，根据西乡提议实行内阁改组之后——改组原案设参议一名，执掌全权，西乡推举木户充任参议，但木户不肯担任，乃由西乡、木户两人同任参议——西乡写信向萨摩的桂四郎报告经过，他在信中说：“此时如不妥协，就得按在故乡与

队中人的约定决裂，因此实在不能脱身”。同时西乡认为这次改组是：“此次俗吏们大失所望，如落汤之鸡”，并且说：“因为没有充分进行选择，不胜遗憾”。这封信的抄件广泛流传在士族之间，西乡对此感到非常为难。据推测，对西乡改革政府抱有莫大期望的士族，在这封信上可能感到他们的期望没有落空。

“西乡对现在的政治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进步派说以西乡为首的谨严派愚蠢，谨严派也说进步派的坏话”（《佐佐木高行日记》），西乡和木户分别把大隈和板垣拉来作参议，使之站在自己方面，在这种对立之下，一直到1871年末岩仓大使等人出使欧美，木户、大久保、伊藤等全体首脑官僚则出国视察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留守政府变成了西乡、板垣、大隈的三头政治。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及其留守部队长大隈参议和井上大藏大辅等人深恐西乡派在首脑部出国期间进行任何“改革”，使节团和留守内阁间交换了亘古未闻的十一条信约。

第六条 国内事务在大使回国前尽量不作新的更改，不得已时，必须照会派出的大使。

第七条 各部长官出缺不补，由参议分别担任，不变更其规模和目的。

第九条 不论简任、荐任、委任，一律不增加官吏。

第十条 不增聘外国人。

这就是说，留守政府不得独自作任何事情，人事方面，也完全不得过问。在忙于革新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信约，可见政府内部的对立已达顶点。

11月，大使等出发，西乡在饯别宴会上向井上馨举杯说：“三井的店伙，来干一杯”（《佐佐木高行日记》）。井上致书大久保恳求说：“自感力微，难以代理，幸赖上野（景范）、濑泽（荣一）之助，必当尽力为之。如乘遇难之船，难保无虞，为此苦心焦虑。出发前，务

情与西乡先生洽谈，俾使今后彼此好生疏通”。（10月18日，〈大久保利通文书〉四，并参照〈大隈重信关系文书〉第一，大隈致木户书，明治四年十月九日。）

这样的留守内阁是不会搞好的。西乡丝毫也不信任大隈和井上，他在1872年5月写给桂四郎的信里也说：“大隈等人的奸诈是难以形容的，井上现不在京（当时出差大阪），回京后必定站在反对立场，”云云，同时大隈也怀疑西乡暗中勾结旧藩的士族（明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西乡的信）。

在这样暗斗的背景下，根据大隈、大久保的方针实行了各种疾风暴雨般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即把各种封建身分划分为华族、士族、平民，加以整顿；规定人民的职业和迁移的自由；地税的改订；准备实行田地自由买卖；1872年着手处理士族的禄制；同一时期还要制定征兵令等等，从这些基本的大问题一直到剪发、肉食的细微问题。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过程。纵令大西乡有声望，以士族为中心的改革也是无法推行的。例如，西乡尽力使士族成立商行实行垄断的三岛砂糖，也在1873年3月，不得不允许各地商人自由往返产地进行买卖了。

1872年2月，开始对士族的正面攻击，即开始计划取消家禄，吉田清成为此出国募集外债。同时废除付给士族、卒族的儿子及次子、三子、退休者等的俸禄，还废除了各藩的救济津贴（〈秩禄处分参考书〉）。士族渐渐动摇起来。1872年5月至7月，为了稳定士族的动摇，请出天皇来巡视反动士族的根据地——西国九州。西乡报告大久保说：因此“西国人心大为归附”，尤其鹿儿岛的“情形良好”。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稳定。拜谒天皇，并不能医治士族的饥饿，也不能抑制他们的不平。当天皇来到鹿儿岛时，岛津久光上奏说，皇国终于变成共和政治，大有成为洋夷属国之势，表示对政府的强烈忿慨。西乡属下的近卫兵也变成了“炸弹”，随时可能爆

炸，西乡代替山县有朋亲自就任近卫都督，才勉强防止了“爆炸”。

在这种情势下，1872年11月公布了征兵令。布告文直接痛骂士族是“号称武士、佩带双刀、厚颜坐食、甚至杀人官亦不问罪的人”，大声疾呼四民平等和自由人权。当然，这里说的四民平等自由，不过是蛊惑宣传而已，但可看出人民对自由平等的要求和斗争已经高涨，不这样说，人民就不答应了。在这种形势下，士族特权的美梦是继续不下去了。由于征兵令的实施，所谓士族的“常职”被剥夺了，作为享受家禄和其他封建特权的最后唯一口实已经不复存在，士族的愤慨达到了极点。西乡的心腹桐野利秋痛骂熊本的镇台谷干城说，山县有朋招集一些庄稼汉能搞出什么名堂？当时的兵部大丞曾我祐准晚年回忆时说：“反对征兵制的，不是农商平民而是士族。他们反对征兵令，是由于他们狂妄自大和不学无术而提出除士族外没有能够打仗的种族的愚蠢论点。”人民虽然也反对征兵，但在某一时期，士族的反对很猛烈。那种狂妄的愚蠢论点是出于留恋封建等级制而产生的（谷干城《隈山貽谋录》、《曾我祐准翁自叙传》）。

士族的台柱子——西乡隆盛的最大苦恼就在于此。他作为政府的负责人，不得不参与征兵令的制定工作，由于山县等人的说服，他也感到有必要制定征兵令。实际上也是如此，让士族来当兵是不能组成统一的军队的<sup>①</sup>。

但是西乡知道，征兵令公布后，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戊辰战争时的部下和对废藩置县有功的近卫军不久就会被淘汰。事到如今，他对他所爱的和景慕他的士族将怎样处理呢？怎样替他们开

<sup>①</sup> 近卫军就是一个好例子。近卫军里“领过三百石俸禄的上士和领过两个人粮饷的小兵”都混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身分对立观念非常强烈。同是萨藩出身的，城市出身的就轻视城外出身的，说他们是乡下佬，因而城外出身的忍受不了而陆续逃出兵营。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利用士族是组织不成近代军队的。组织士族兵，财政担负不了，其他方面就更不必谈了（前引《隈山貽谋录》、《大西乡全集》二，西乡致黑田清隆的信）。

辟一条生路呢？眼看他们就要变成“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他不能坐视他们爆炸，使有功的人变成罪人，必须设法找出一条发泄不满情绪的出路。

环视周围，大隈、井上以及他们背后的大久保等政府主流的官僚政治，都是铜臭冲天。号称“文明开化”，人心却日日颓废下去。“此地局势，西风日盛，但只在皮毛，未入其髓，口唱文明，实是懒惰，令人不胜慨叹，世风日下，今后究竟如何，实难预卜。”（明治六年九月，西乡致寺田平之助书，〈大西乡全集〉二）。

该是断然实行武政的时候了！现在西乡发现外征是替土族求生路和实行土族军事独裁的唯一出路。恰好发生台湾番族的暴行。萨摩的土族、近卫士官已经在沙上私语，不等朝命，就要前去讨伐了。西乡劝阻他们要等待副岛从中国回来作好外交准备。接着便发生朝鲜的“梅日事件”。台湾事小，不如侵略朝鲜。那样便可取得日本受欧美压迫的补偿。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或三雕四雕了。这就是“把希冀内乱之心转而向外，兴国的远图！”

1873年，西乡之所以拼命主张征韩，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因此，征韩是刻不容缓的了，无论如何必须在明治六年里实行。不是时机尚早，恰恰相反，如果迟迟不行，必然发生内乱。关于这一点，他曾屡次在写给三条太政官的信里加以申述（三条也害怕发生内乱，在8月17日和10月15日两次阁议上向西乡屈服，赞成征韩）。同时也正因为这样，西乡就认为无需再同山县有朋、胜海舟等新陆海军首脑部去商议征韩的事情了。其弟西乡从道内心也反对他的主张。胜海舟海军卿曾声言军备不足，如果政府命他作战，他就辞职（10月11日三条致岩仓书）。西乡对这些丝毫不加考虑。因为在西乡看来，并不完全需要那些新军队，他想利用的是“友邦”和一般土族。

西乡主张征韩的根本目的既如上述，当然他必须在岩仓等人

回国以前着手实现。因为岩仓等人一回国，西乡的土族路线必定遭到破坏，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出国期间，西乡和板垣在政府内大肆扩张势力。岩仓等人出国后一年，1872年末，发生了山城屋事件。长州土族出身的山城屋和助与同乡的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勾结，挪用陆军省的一笔巨款，在巴黎大肆挥霍，有人怀疑他的钱的来源，于是事件暴露了。山城屋仓促回国，在陆军省内部剖腹自杀，企图平息此事。但司法卿江藤新平追究山县，山县竟不得不在1873年4月暂时辞职。大隈、井上等人曾极力挽留。西乡虽然也略微表示挽留，但其实是恐怕因山县的辞职而引起军备紊乱。

山县辞职的次日，追究山县的江藤新平、后藤象次郎、大木乔任被任命为参议，接着实行官制改革，称为“制度润饰”，参议的权限加强并扩大了。岩仓出使时的一张信约，变成了烂纸。

大隈对此一味敷衍，但井上和濑泽却非常不平。正当这时，江藤新平（司法卿）要求增加法院开设费预算，而井上等大藏省当局除山县等要求的陆海军费外一概不批准。于是，江藤和井上发生激烈冲突。结果，井上等人于5月7日辞职。江藤还追究井上在处理尾去泽铜矿时的贪污案件（但不久江藤在征韩论上失败被赶出政府，尾去泽案件便无人过问了）。

江藤还对木户的部下、京都府参事榎村正直等人，追究他们唯恐因设置司法省直辖的法院而侵夺地方官的司法权而进行反抗的事件。虽然不能肯定江藤的背后有西乡撑腰，但是江藤就任参议却是由于西乡等人的破例提升。江藤同井上的斗争，其实就是西乡派对大久保、木户、大隈的斗争。

既然这样，当然可以预料，大久保、木户等人回国后，对留守政府一定要全而反对的。因此，西乡打算在岩仓还未回国，敌人尚未聚齐以前，极力迫使三条确定政府方针（后述）。

1873年的征韩论的彻头彻尾的中心人物是西乡。板垣、副岛、后藤、江藤等人，不过是从各自的角度支援了西乡的意见，或则是组成一个反对大久保——木户派集团来进行共同斗争。

## (2) 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及其他

板垣在内政上跟西乡几乎完全相反。板垣在1870年5月至11月这段期间与后藤象次郎等人实行的土佐藩政的改革，是“以人民平等之理为主”，解除士族的文武常职，废除禄制，代之以禄券，官员、士兵一律从一般人民中录取，华、士、卒、平民的称呼只是用以区别族类，而不代表任何身分特权和差别，大体上实现了人权平等。同时，土佐藩还建议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全国。关于土佐的特产——纸张的销售，也改为“解除官家的垄断，使商民自由买卖”，这点典型地表现出板垣和西乡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各地兴办学校，对女子教育也表示关心，男女学校都以洋学为必修课程，聘用英国人，开设西式医院等等，板垣领导的改革比政府前进一步，与西乡走的方向正相反。

土佐的纸张、樟脑、木材、木鱼等农林产物和水产物的商品生产，在当时已相当发达，具备先进的基础。为了输出这些商品，同长崎的外商发生接触，岩崎弥太郎等也借此渐渐壮大起来。酒商的后代坂本龙马等人尽管还保存封建残余，却已经模糊地有了议会政治思想。这种思潮也构成了板垣的改革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因为板垣在1868年内乱时期身为东山道军和会津征讨军的参谋，始终身临战场，处处关怀人心的向背，深切感到自主自由的人民才是最大的依靠力量(前述)。

1870年传说西乡谋反时，板垣曾计划讨伐西乡，掀起一场战争来促进国内的进步，同时还想把岩仓、大久保等反动保守势力逐出政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出于近代的民主主义意识，而是夹杂



着封建的对立意识。

单就土佐藩实行的录取平民入伍这点来说，和歌山藩早在1869年12月就作为“轮班兵”制度而大规模地实行了，它的前提也是“士农工商同权，平等对待”，但是和歌山的改革，整个说来，不如板垣的政策那样有系统（《南纪德川史》，第十一册，渡边几治郎《陆奥宗光》）。

板垣在1871年限西乡同时参加政府，并且支持西乡。但他并不是为了实现西乡的计划，而是为了导致由各藩大参事等组成的议会政治（《佐佐木高行日记》）。他所谓的大参事并不限于士族，但大参事议会当然还不能是现代议会。要使他的这种主张发展成为现代的民选议会论，还需要板垣本人退出官僚政府，和片冈健吉等人从英国留学回来。据说制定征兵令时，板垣还曾主张应该效仿瑞士的民兵制度（《大隈伯昔日谭》）。

因此，即便在征韩论争辩方酣时，岩仓在写给大久保的信中还提到：“板垣的主张，在朝鲜事件方面虽与西乡一致，但在预料将来的政体上，却是和你（大久保）一致的”（10月9日）。《国宪编纂起源》的著者说，板垣赞成征韩论，因而把“议会论贬到次要地位”了，又说：“一反平素的主张，变成压制主义，令人觉得奇怪”，但板垣并不是变了节。尽管板垣对未来政体的主张与大久保相同，但这只是说板垣的主张比西乡等人的半封建武政更接近大久保的主张，至于他的本心，正如大隈所推测那样，是想要利用外征来开辟废除官僚专制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同最右翼的西乡结成联盟。

这是由于板垣还没有摆脱封建军国主义，才造成这种不可救药的混乱。为了反对官僚制度，有时也可以同土族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但自己的议会政治的原则如果因此而糟蹋了，这种妥协就不是妥协了。关于这一点，板垣也没有明确认识到。他还置身于官僚专制政府之内，同人民——立宪论的真正基础——没有组织上

的联系，脱离了他们，因此，他不能克服士族军国主义而造成了这种混乱。

他在征韩论上也是摇摆不定的。争论时，他同岩仓也经常来往。根据桐野利秋的谈话，板垣中途态度软化，西乡曾责难他，这恐怕是事实。再者，板垣在征韩论引起政变而导致内阁分裂以后，仍然为安抚土佐出身的近卫军的动摇而努力，这点同西乡派率领近卫军回本藩是恰恰相反的（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木户孝允日记〉，田中光显〈土佐人〉报告）。

后藤象次郎虽没有板垣那样彻底，总之是他的同路人。

副岛种臣的情况，前而已经叙述。

江藤新平这个人，有人称赞他是个打破藩阀的急先锋，赞成征韩论。相反的，也有人非难他，说他是趁火打劫之徒。究竟真相如何呢？

江藤于1834年（天保五年）生于佐贺藩的一个下级武士“短枪手级”的家庭里。也和普通下级武士的情况一样，他家生活也十分贫寒，母亲一面开办私塾，一面搓捻纸绳补助生计。少年时代的江藤新平，出外是藩的卒伍，回家以切烟丝为副业，以求糊口。有时竟至绝粮断炊，但他却昂然壮语说：“食不得饱，智慧乃生”（〈江藤南白〉，以下引文完全根据此书）。

的确，他是个下级武士，受封建的恩惠不厚，因而受的束缚也不大。常常食不得饱的青年江藤新平，见识却是高人一等。1856年（安政三年，一说文久二年，当在开港以前），他的一篇“图海策”，是一部反对排外主义攘夷论的杰作。他没有把幕府诸侯放在眼里，彻底批判攘夷论说，如果提倡攘夷论，满足于原有的物资，不去搞海外通商航海，国内必将更加衰弱，人民不能养育子女，堕胎溺婴必将愈益盛行。迫使父母造成溺婴的惨事，是当政者的罪过。即使进行攘夷的战争，无能的幕府诸侯决无战胜外国人之理。纵使

战胜,也使百姓苦于劳役,田野荒芜,结果全国濒于饥饿。当此世界交通发达之时,唯一良策,只有振兴海外通商和航海,训练海军。他在题为“招北”的另外一章中还谈论说,开发虾夷地方以防俄国南下,乃是当务之急。

江藤在1868年(明治元年)初,任镇将府(天皇政权的江户军政机关)的判事,执掌江户的市政时,也曾主张强行减低地租和房租,废除买办商、代理商等封建垄断,或者主张赶紧把消费城市江户变为使用“蒸汽机”的生产城市。他还说,即便平定了奥羽诸藩之后,如果关八州<sup>①</sup>的人民不支持政府,必有内乱之兆。他的这些卓越见识,正是来自他跟人民一起经常食不得饱而产生的智慧。

但是,当江藤飞黄腾达,当上中央官僚、吃饱肚子以后,便同整个维新政府一起渐渐脱离了人民。1869年,江藤和副岛在佐贺藩实行改革时,纲领第一条就提出“打破门阀位阶的谬论”,但他认为“武士礼敬大夫<sup>②</sup>甚厚,诸人<sup>③</sup>礼敬武士则甚轻,故欲减低大夫的尊严,增加武士的威权,使大夫对待武士与武士对待诸人相同”。由此可见,所谓打破门阀,不过是想使江藤这类下级武士与上级武士平等,而对一般平民则要求比从前更加屈从于士族,为士族要求权威!这是惊人的倒退。

1869年12月,江藤任太政官中弁<sup>④</sup>,致力于整备官僚政府的机构。这时他是岩仓的参谋之一,也得到大久保、木户等人的赏识。1870年10月,大久保向岩仓提出的官制改革方案,就是江藤起草的。1871年2月,他兼任制度调查专员,与津田真道、神田孝平、副岛种臣等研究西洋和中国法制的专家为伍,秉承岩仓、大久保、木户等首脑部的意旨,致力于官制的制定(参照《明治圣上和臣

① 即箱根以东的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译者

② 即官僚。——译者

③ 即平民。——译者

④ 官名,监察使之类的官职。——译者

高行》、《木户孝允旧记》明治四年七月十九日)。

后来又升任文部大辅、左院副议长等职,并任岩仓、大久保等人的直系法制局长官,一直到1871年末岩仓等人出使欧美为止。

进入左院后,江藤就勾结议长后藤象次郎,投入留守政府的首脑部的阵营,即从昨天的大使派阵营转入反对派阵营,任司法卿,又升到士族的最高职位——参议(除非旧公卿或大名不能当大臣)。他历任中弁、制度调查专员、副议长和司法卿,一贯在官僚政府内担任法制的制定工作。人们根据他在1870年以“不妨误译,只要速译”为口号,抄袭法兰西民法,或根据1872年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时他写的艺妓娼妓解放令等的词句,认为他是个急进论者。然而这是非常错误的。

看看反面事实,就可以知道,他是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激烈反对者。他并不反对信仰,而是反对信仰自由。他在1871年3月提给岩仓的对外政策意见书里说,将来的世界强国可能是美、俄、德三国。他的根据是:英国的军事权属于议会,所以英国将来必弱。与此相反,美、俄、德三国军权“在上”,所以必强。1871年,他就任掌管法制的高官以后,还不知道美国是共和国中的共和国,美国的议会势力最强,实在令人吃惊。不拘怎样,江藤既然认为议会政治必将亡国,那就恐怕没有人敢说他是“急进主义”了吧。

江藤在1873年10月下野。第二年他在板垣、后藤等前参议拟定的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上签了名,但这并不是他本来的思想。他不听板垣等人的劝制,回到佐贺,依靠反动士族掀起叛乱,以致终于失败。他在叛变的檄文中开头就说:“国权如能行使,民权才能完整”。这里所谓的国权,指的是政府的权力,这和他做官时热衷于整备官制、扩大和加强司法部的一系列行动完全一致,而同确保自由自主的民权后国权才能完整的民选议院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国宪编纂起源》里说江藤反对制定宪法,恐怕不能说是

记错了。

司法卿江藤据说热衷于设立法院、加强和扩大司法部和“法律的严密”，他追究过山城屋事件的山县有朋及井上馨、榎村正直等长州派要人，为打破藩阀和争取严明公正的司法权独立而努力奋斗。哪怕是依仗藩阀的大官，只要他们一有不法行为就毫不留情地进行追究，他的这种勇气是值得佩服的。他虽然有志要打破藩阀专制，实现司法权的独立，但是藩阀专制其实就是官僚专制的一种表现，如果不打破官僚专制而谈打破藩阀，那只不过是江藤、佐贺来代替长州藩阀而已。要真想打破藩阀，除非依靠人民大众，否则是不可能的。不论怎样扩大司法部，给以多么大的权限，司法权的独立也是办不到的。司法权的独立要以人民摆脱封建的官僚专制，即立法权的独立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司法的独立。江藤本人的悲惨下场，就是一个例证。他在佐贺掀起叛乱，受到梟首之刑，而这种刑罚在他制定的法律中已经废除。当然，因为他当初彻底追究大久保的直系部下井上馨，这里肯定有大久保对他怀有报私仇的感情。然而，江藤的立法和司法事业如果依靠人民的力量、和人民一起实行了的话，那末就是大久保也不可能在全国人民监视之下敢于做出这种不法的暴虐举动。

江藤不是把立法权交给国民议会，而是专门加强官僚内部分工的司法部，也就是一心企图扩张他自己的地盘。1872—1873年，当人民要求土地革命、废除征兵制而被迫在各地纷纷掀起暴动的时候，据说江藤司法卿还因法院忙于逮捕、审讯人民而自鸣得意（《佐佐木高行日记》）。后世史家如果说他企图代替长州藩阀，凭自己精通的司法事业与西乡、板垣等人勾结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恐怕也不容否认。

江藤也有一个侵略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前述1871年3月的意见书。如前所述，他认为今后美俄德三国必将强大，所以他说：“一

且俄国向我提出难题,皇国将何以应付?”因此,现在就应该与这三国结好,以美防俄、以俄防美。他少壮时期主张赶紧开发北方的理想和气概,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和桥本庄内的日俄同盟论完全相似。又说:“皇国方今之忧在于封建论和邪教门”——身为中央的官僚,封建论当然要反对——应该加以禁止镇压,暂且同清廷表面和好,一面准备武力,一面以传教为名派僧侣到中国去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一俟内外准备停当,等到清政府的“无礼”,“便与俄国通谋合力,或让俄国中立,由我方单独一举征服中国”。要是和俄国同盟,便由两国瓜分中国,如由我方独自征服就不一定分给俄国,这是江藤的空想。他所以赞成征韩论,可能就是因为他想借此开辟一条侵略中国的道路。

### 第三节 大久保、木户派的立场

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正是根据木户在1872年前提出征韩论的同一理由,西乡越是迫不及待,就越发反对1873年西乡的征韩论。

木户的主张,表面上有矛盾,但决不是不能解决的。他回国前的征韩论是,虽然不提西乡,但企图把西乡也包括在内的诸藩士的势力转移海外,借以统一和加强官僚中央政权,进而在它的独裁下统一内政。木户等前一年想清除士族代表西乡,现在相反的,西乡却为清除木户等人,实行士族武政,并在士族掌握主动权之下进行外征,木户等人焉能不加反对。外征的领导权操在士族手里和操在中央官僚手里有重大的区别。如果在士族领导下取得胜利,士族的气势将不可当,官僚派势必要总退却,因此他们能不反对吗?

木户、大久保、大隈等人彼此之间也不断发生对立和争执。废藩置县前,大久保为了削弱盘踞在大藏省内挥舞独裁权力的大隈

及其手下“旧幕人”濫泽等的力量，曾不断地进行斗争。木户和大久保之间的不睦也是人所周知的。木户说：“壬戌、癸亥（1862—1863年）以来受萨人的愚弄”，他继续对藩阀抱着反感。二人在出国期间也是不睦的，甚至回国时不愿同乘一条轮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结成一个势力，反对士族的武政，也反对国民的议会政治，一味试图在他们的官僚独裁之下，用他们优厚的保护政策来扶植财阀，引进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经过为时一年半的欧美考察，木户、大久保等人越发坚定了他们的绝对官僚主义的信心。他们在海外时不断反对祖国的“轻率进步”，认为即便象法国那样进行剧烈改革的国家，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进行改革的。他们深深赞许法国的“政府权威”的强大。佐佐木高行等人出国前也没有反对开化论者的信心，但出国一看，认为西洋也决非开化论者所说的那样自由民权的国家，因而坚定了保守主义的信心。

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才能来学习。用官僚的眼光观察欧美，只能看到政府的强大，而不去想政府为什么强大。当时法兰西正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大久保说：“大总统梯也尔这个人坚决实行压制，可谓豪杰”，表示“非常佩服”，对普鲁士的俾斯麦，当然也“心向往之”（致西德次郎、大山岩、西乡隆盛等的信）。大久保尽管在英国听说自由优于专制，却说：“英、美、法等国的开化，高我数层（日本无论如何模仿也），望尘莫及”，表示放弃向这些国家学习，并说：“我认为德、俄两国必有很多东西可为我们的准绳”，“应特别注意这两个国家”，在军事、警察、官僚都很强大的这两个国家中应该特别注意沙俄，他再三委托西德次郎研究俄国的政体（明治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同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信）。

木户孝允也大致一样（参看出国时的日记文件等）。

他们在哪个国家都是最先视察“法院、监狱、学校”，同时也视

察“贸易公司、工厂”，说“无论到什么地方，没有一件地里出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生产品都是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向外国出口，工厂的兴盛，远远超出过去的传闻，到处黑烟冲天……这就足以了解英国所以富强的原因”。“纵观欧美各处的情况，小规模生产大都利润很少，因此丝织业如不集合力量，不能有大发展”（大久保利通致大山岩的信，木户孝允致榎村正直的信）。大工业远远超过以往的传闻，使他们大吃一惊，因而他们痛感急需引进这种工业，并加以扶植。

他们回国后，看到留守政府把他们的代理人井上驱逐出去，还擅自增加自己一派的参议，并要伺机确立军事独裁，他们当然再也不能容忍了。有人说，大久保、木户等人的不满是因为所有的改革都在他们出国期间进行完毕，他们感到回国后无事可做。这种见解未免过于肤浅。征兵令和地税改革等重要事项，是他们出使以前就已决定的计划。当然，木户和大久保可能稍微心怀不满，认为功劳被大隈夺去了，然而毕竟不是被西乡等人夺去的（明治六年九月十三日，木户致三条的信，〈国宪编纂起源〉）。木户等人认为征兵令布告中高唱国民自由平等和娼妓解放令等是“轻率的进步”，曾表示激烈反对。

最大的不满在于西乡和与西乡勾结的板垣、江藤等人的权势增大。大久保、木户等人所谓内治派的立场，自然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他们对征韩论是赞成的，但是反对西乡或士族掌握领导权的征韩，所以他们反对在1873年（明治六年）立刻实行。

大久保反对征韩意见书七条，最简洁地表现了大久保派的这种主张。在第三条里说，如果发动外征，则海陆军（即新海陆军）、文教、司法、开拓等事业（大久保等人着手兴办的官僚事业）必将中途而废，因而反对。在第四条和第六条里说，方今的贸易连年入超，对英国的外债为数甚巨，如果发动外征，为了输入武器等等，外



债势必更加增多。另一方面，“国内壮丁受苦于外，服役于内，为父母者忧虑烦恼，无意勤俭经营事业，”产业衰落，不能偿还外债，因而会造成英国干涉内政的开端。因此，现在必须振兴工业，提倡出口。

然而，大久保等人所以反对 1873 年征韩论，急于整顿官僚制度，发展现代产业，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人民反抗天皇制的危机。

在征兵令的布告里，虽然冠冕堂皇地高唱确立国民的自由平等的人权作为征兵令的必要前提，但是丝毫没有兑现。结果征兵制和征集农奴劳动力的赋役，完全没有差别，只是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同时地税改革也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人民痛苦万分。此外，义务教育制也是从学校的建立起，直到教师的工资等等，完全归人民负担，这也变成一种新的剥削方式。反对这些制度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和破坏骚动在 1872—1873 年间遍及全国，达到日本历史上采取起义方式的人民斗争的最高峰。废藩置县后，单就一万人以上参加的起义来说，有：伊予大州的四万人起义（1871 年 8 月），大分县起义光处刑者就有二万八千人（1872 年 12 月），到了 1873 年，越发激烈起来，3 月在越前大野有一万人以上起义，5 月在美作有数万人蜂起。尤其 6 月，在筑前的嘉麻、穗波两郡爆发了三十万人的大暴动，政府调派邻近各县的和镇台的大军才勉强镇压下去，除首魁六名被判处死刑以外，其余受刑事处分者达六万余人。同一时期，鸟取和赞岐也发生数万人的起义。至于规模较小的，光 1873 年一年至少有三十六起。在这以前，上溯到废藩置县，还有三十八起，地区遍及全国（土屋乔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

这些暴动事件有的被说成是人民对旧藩主的眷恋，有的被说成是人民对征兵令中的血税字样的误解，这些完全是肤浅之见。

象大久保这样具有卓见的人，尽管对留守政府深怀不满，一回国就认为“全国各处因征兵或因征税而暴动蜂起，这里一定有原因”，他首先希望政府加以镇压（《国宪编纂起源》）。所谓对旧藩主的眷恋，不过是“表面上以惜别为名”的借口，这点在政府的法令中已经指出（《法令全书》、明治四年七月十二日对府县的指令）。就连大久保也不认为这不过是无知小民的骚扰，只要一派军队就可以简单平定的。

当1869年人民起义大大发展时，曾发生横井小楠的暗杀事件和诸藩土的“纷纷谣言”。那时大久保认为“不足挂念”而泰然自若。但是，现在却不禁动摇起来说：“听到最近的民情而肝肠寸断”了。木户也同样“十分忧虑”（《大久保利通文书》三，明治二年春提给岩仓的建议书，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木户的书信）。

1873年情况仍旧没变，反而更加严重了。尤其谣传寅年生人的男子将被征集入伍，前去征讨朝鲜，因而与此有关的人自不待言，就是一般人也大为恐慌，连活也干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久保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外征。大久保在他反对马上征韩的意见书里开宗明义地说：“边隅顽民容易发生骚扰，不得已而鲜血溅地者不知已有几次，此乃最堪忧虑之事，因此不可骤然发动征韩之役，此其一也”。第二条以下的结论也是这样。如果发动外征，必将课赋重税，借外债或滥发纸币，其负担结果将落在人民身上，“使人民大为不满，终将酿成骚乱，还恐将发生说不尽的祸患”，“民间的怨愤日后必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必须延缓征韩，振兴国内工业，整备武器军舰（还谈到了国际关系）。

木户的意见也大致相同。他说：“方今万民困苦，新令频传，人民愈益迷惑。去年以来，暴动数次，政府习以为常”，“此时若言方略，莫急于内政之治，若言义务，莫先于保护库页岛人民。然而雷同世论，益使人民困窘，益损国力，决非余所服也”（9月3日日记）。

又说：“真正今后抚民养力以求匹敌文明国家之心甚薄，将来之目的置诸不理，一味想欺侮弱者，今日子弹、火药、船舰、器械皆需从国外购买，所谓出军云云，只能引起内乱而已”，“日本人心动辄避强凌弱，维新之初，虽曾有一策略（指朝廷兵力同诸侯兵力的均衡），但现已非其时”（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月二十三日致榑崎、青木的信）。

总之，内治派认为在目前这种国情之下，如果发动外征，国内人民说不定会起来革命，所以必须首先赶紧“抚民养力”。

岩仓是大久保、木户的代言人。

## 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确立

### 第一节 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

1873年前的国内局势和征韩论的真相既如上述，西乡派同大久保派根本是不能两立的，一场大政变完全在意料之中。

大久保在1873年5月26日回国，木户在7月23日也回国了。大久保4月间在柏林接到回国命令时，早就预料到留守政府难以对付。他在信里写道：“纵令我一个人回国也没有任何目的，除了默默等待大家回国之外，无事可作。我倒很想去温泉一游”（4月1日致寺岛宗则的信）。

实际回国一看，情况竟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说：“此间光景，实已变得无计可施。鄙人虽回国，犹如蚊背负山，不知所措”，又说：“纵有有为之志，此际与蜘蛛相纠缠，毫无益处，更兼我自有愚见”。所以，当三条要他就任参议时，他推托说有“苦衷”，拒不接受，采取“泰然旁观”的态度。他说：“等待角色到齐，到秋风白云时，将有一个大有可观的场面”。他想在岩仓大使一行回国后，不仅反对征韩

论,而且同西乡派决一胜负。

木户对留守政府也深为不满,回国后一直不到政府去。他正面反对留守政府首脑部的征韩论和征台论,8月向三条大臣提出长篇意见书。三条受了西乡派的牵制,而大隈和大木乔任这两个参议内心虽反对西乡,但却采取观望态度,同大久保感情上对立,不能合作,木户一个人孤掌难鸣,只是在日记和书信中发泄郁愤,至多也不过在团结长州派方面下点功夫,作些准备决战的工作。

在这期间,西乡派的工作节节进展。8月3日,西乡上书三条说:前此以等待副岛回国为词,好歹稳住了积极主张征台的军官,但现在副岛已经回国,抚慰无词。朝鲜一案,最初即非要求和睦,想您定有方略,今天对方傲慢至极,如果再象从前那样因循下去,必受天下人的嘲弄,因此,坚决希望派我为朝鲜使节,云云。他促请三条决定征台或征韩,同时,他认为征台居次,首先主张征韩,征韩的第一步,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派遣大使上。

8月14日,西乡请求板垣在派遣他为使节的问题上给予协助,要求板垣不要不忍得使他在征韩战争前就死去而有所姑息,请他从中斡旋,他表示坚定决心说:死只有早晚之差。西乡、板垣之间往来频繁。板垣很受感动,为西乡奔走。

8月16日夜间,西乡虽然因肥胖症行动困难,但仍抱病访问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三条说,派遣使节一事请等待岩仓大使回国后再行决定。西乡不肯,说不能安心等到那时,现在并非立即发动战争,乃是责难对方不敦友谊,对方必定杀害使节,那时天下人方知朝鲜之罪必须讨伐,事情必须导致这种地步。他说:“把希冀内乱之心转而对外,不仅是兴国的远略,也足以确证旧政府坐失良机、苟且偷安而终失天下”。他坚决要求派他为使节,以防范一般士族和近卫军的叛乱气势,并扭转时局。三条终于屈服,答应在第二天的参议会上决定。西乡再次叮嘱说,如果决定遣韩使节,不可

迟迟等到岩仓大使回国，必须在那以前确定遣使手续，以便使他安心。他预料岩仓等人回来，必将反对。

次日清晨，西乡赶紧向板垣详细叙述他与三条会见的情形，再次要求板垣协助。这一天有三条大臣、西乡、板垣、后藤、江藤、大木等人参加的参议会，终于通过了派遣西乡大使赴韩的议案。三条马上前往箱根行宫请得天皇批准。根据大久保、木户等人的传记载，此时天皇并未马上批准，命令等待岩仓大使回国后经过仔细商讨再上奏。但是，西乡在17日写给板垣的信里说：“承蒙先生（板垣）尽力，现在我心情方感欣快。疾病也顿见痊愈（中略），脚步也觉轻快。估计不致旁生枝节，这实在是生平的快事”。这分明说派遣西乡出使赴韩，已经得到天皇批准，因为任何“旁生枝节”也敌不过天皇。

于是，西乡预定9月20日为启程赴韩的日期，命人取来手枪，选定随员等等，愉快地准备行程。预定做随员的别府晋助患了感冒，西乡还开玩笑说：“是否临到出发前却贪生怕死了”。到此为止，对西乡来说，虽然很悲壮，却是“生平最愉快”的日子。木户参议的长篇反对意见书被驳斥了，开拓次官黑田清隆提出库页岛事件，企图阻止征韩，也被适当地应付过去了。

然而，在西乡写信揶揄别府的第二天，即9月13日，岩仓大使率领伊藤博文全体人员回国了。“秋风白云的时节”，即立春后第二百一十天左右来到了。从这时候起，西乡所谓的“旁生枝节”出现了，而且是很大的枝节。岩仓刚一回国便同三条商议，伊藤、黑田等人遵照岩仓的意旨各方奔走，首先调和木户和大久保的关系，使大久保就任参议，企图推翻留守政府的决议。木户也抛弃私情对此表示赞成。

大久保虽然认为时机将到，但仍不肯轻易出马，9月26日和30日屡次拒绝岩仓要他当参议的请求。三条和岩仓等人百般苦心

焦虑，“力求大久保奉命”就职。大久保就这样逐渐巩固自己的立足点。10月8日，他要求岩仓在第二天10时前用书面（而不是口头）表示一切都按他的方针决定，交到他手里。他得到这个确证以后才答应就任参议。10日，他写信给三条和岩仓，接受就任的请求，并表示决心说：“蒙详细告知确定的目的，完全知悉了。以后（中略）当不揣鄙陋，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内治派的阵营布置停当了。

这时，西乡因岩仓回国后始终没有举行阁议，曾再三催促三条大臣开会。但是，三条和岩仓认为大久保就任前举行阁议不利，闪烁其词，设法拖延。预定启程赴韩的日期徒然过去了，西乡渐渐焦虑起来。9月21日，他召集萨派武官开会，企图迅速确定军部的主张，由军部来催促内阁。然而就连西乡的从弟陆军大辅西乡从道都“十分怀疑”，企图策划“违约之策”。大久保的心腹黑田也出席了那次策划会议，他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次日，西乡要求黑田协助促请确定政府方针，可见他完全看错了黑田这个人。

到了10月，阁议仍然没有召开。岩仓派的策士往来频繁，拼命拉拢大久保上台。10月12日的阁议预定期再次延期，西乡终于忍无可忍了。11日，他写信给三条责难他一再拖延阁议，并说：“万一变更遣使之议，乃是轻视救命，万万不可，倘事到如今有所变更，自己只好一死以谢国友”。他不惜一死迫使政府迅速确定方针。这里所说的“国友”，指的是同乡的士族大众，言外之意，是说我可要动员士族啦，三条又为这句话动摇了。因为谁知道他要搞出什么名堂来。三条写信给岩仓说：“西乡已有决心，军队之动摇，亦系此一举，驾御殊难，他日变乱，不胜悬虑”。

西乡等人为什么任凭岩仓等人摆布而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连一个起码的要求渡韩的示威都没有搞呢？这就是武士站在权力面前优柔寡断的劣根性。

12日发表文告，任命大久保为参议。第二天，为了势力均衡，也任命征韩派的副岛种臣为参议。这样一来，两派的阵营齐备了，决战的阁议定于14日召开。岩仓在13日夜里还邀请板垣和副岛，企图请他们两个人说服西乡，但被西乡看破了。板垣的动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这样，就在两派对立的情况下举行了内阁会议。西乡派方面有板垣、江藤、后藤、副岛，反对派方面有右大臣岩仓、大久保、大隈、大木各参议。木户称病没有出席。三条太政大臣不知何去何从。

阁议的确切内容不得而知。有种种的说法，但全都缺乏史料价值。总之，前章所述的两派的主张，一定在一切论战所应有的夸张和激烈情绪之下掀起了尖锐的争论。库页岛问题首先提出来，岩仓等人主张这个问题要迅速解决，并在这期间整顿内政，充实军备和财政，确定方策和朝廷计划，然后才能图谋朝鲜，并且肯定会攻击了西乡计划中的极其草率之处（10月23日岩仓的上奏文）。

这一天没有决议，次日15日再次开会。西乡没有出席。这也是西乡的某种软弱面。板垣、副岛两人坚决主张按西乡的预定计划行事，大久保激烈反对。大久保的反对要点已如前述。他除了论到政府会因外征濒于危机，还谈到下述各点：他说日朝之争只会使俄国收渔翁之利，虽然副岛说他同俄国公使布策已有谅解，然而指望这种谅解是非常错误的。国内尚且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哪里有暇外征。纵令占领朝鲜全部领土，如果它的人民四处蜂起，数年内将疲于治理，其费用整个朝鲜也不足补偿。至于向朝鲜派遣使节，等对方杀害后对它进行讨伐，这种作法本身等于承认现在没有重大理由，必须放弃一切内政而讨伐朝鲜。不顾国情擅自发动事变是万万不可的。他的舌锋非常尖锐。这种堂堂的议论，恐怕任何人也无法从正面加以反驳。

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这时，三条和岩仓协商后，终于作出决定说：“问题重大，实与西乡进退有关，不得已按西乡计划行事”。这是因为西乡背后的军队和士族起了作用。于是，大久保表面上决心辞职，17日前往三条官邸，提出辞呈。木户，大隈，大木等人也都一起提出辞呈。不过，他们并非真正就此罢休，而是暗中策划反击。

17日是上奏内阁会议结果，请求批准的日子。可是，岩仓写信给三条说：“反复思虑，果如尊意，则天下大事去矣”，便称病没有出席内阁会议。到会的只剩下征韩派了。西乡声色俱厉地要求三条迅速上奏。三条说，必须等待岩仓诸人进官，要求给予一天的考虑，西乡等人允许了。这一天是多么重大的一天！那天，三条整日烦闷懊恼，18日拂晓，突然发病，不能进宫上奏，三条也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黑田清隆等人认为这是大好机会，便奔走于岩仓、大久保、木户之间，要求他们奋起，企图推翻前议。

大久保发挥了他所特有的谋略，19日，他说：“事到如今，虽再无挽救之法，但唯有一个秘策”。他把这个秘策传授给了黑田。黑田马上跑到宫内少辅吉井友实那里照计行事。第二天，即20日，天皇亲临三条家中探病。然后又幸临岩仓邸宅，命他代理太政大臣。这是多么高明的秘策呀！岩仓、大久保等人互相勉励，更进一步施展了这个“秘策”。岩仓对宫内卿德大寺实则也有所委托。然而，在这一瞬间决定永远的重大日子里，西乡派却无所事事，22日，西乡、板垣、副岛、江藤来到岩仓邸宅，要求岩仓迅速上奏阁议决定的事项。岩仓说，我和三条不同，我有我个人的见解，坚决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江藤说，代任者只能忠实地实行原任者的主张，但法律论在这时候是行不通的。就西乡派来说，如果他们坚信征韩是为国家着想的唯一的、最高的、不可缺少的措施，那么为什么不



在8日的阁议决定后马上向人民公布,促使人民的决心,要求人民协助呢?即使动用军队一事不说,而只是派遣使节,这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呢?他们如果这样做了,岩仓、大久保的“秘策”可以粉碎,江藤的法律论也不至于当作无谓的理论根本不予理睬。由于西乡派的阶级本性,他们这样做不来。大久保等人当然也不能诉诸于人民,但他们的“秘策”却有指使天皇一手,而西乡派连这一点也不能。

23日,岩仓上奏反对阁议决定事项的个人意见,得到了批准。西乡马上提出辞呈,次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也都请求辞职了。

## 第二节 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

大久保达到了目的。他最初尽量让西乡言所欲言,使事态发展到进退维谷的地步,实际上是使征韩派和征韩论同归于尽,在政府内失去立足之地。政变后,他在寄给税所写的信里写道:“事已至此,较量结果,不是完全失败,就是完全胜利,不是使他们放弃主张,就是我们放弃主张,二者必居其一。这种局面早在预料之中,所以千思万虑,肝胆欲碎,不敢轻率进退,然而迫不得已的机会终于到来。正如刚刚当上舞台监督,一幕未终,舞台就已经塌了”。所以,大久保在政变后再建政府时,表现出惊人的活跃。

大久保在10月24日已经同岩仓、大隈、伊藤等着手铨衡阁员人选,主张参议兼卿(即行政各部长官),得到了赞成。这件事是大久保从1870年10月官制改革方案以来的宿愿。政府首脑的实权因此得到增强。这样就不是把参议当作对实际行政生疏的政论家,而是使他成为官僚制度下有效率的名副其实的长官。这个提案第二天马上就实现了。西乡、板垣等人的辞职迫不及待地被天

皇照准了。不过，西乡的陆军大将职衔不准辞掉，并且命令他们大家在京候旨，而大久保等人的辞呈退了回来。大隈就任参议兼大藏卿，大木乔任就任参议兼司法卿，伊藤博文、寺岛宗则、胜安房三人新任参议，分别兼任工部卿、外务卿、海军卿。

大久保立即着手设立他准备已久的内务省，10月27日，吉田清成已经向大久保提出内务省的官制草案。数日后，11月10日，内务省成立，参议大久保自己兼任内务卿。

另一方面，10月23日，随着西乡提出辞呈，萨摩出身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篠原国干等多数军官也都一起提出辞呈，西乡和桐野没有等待照准就突然离开东京。从这时起，三条、岩仓等人最担心的萨派武官和近卫兵的动摇日益激烈，虽有萨摩出身的野津镇雄少将等人极力慰抚，根本无济于事。

10月25日，天皇打算召见篠原国干以下十三名近卫军官进宫，亲自晓谕效忠，但是他们没有进宫。29日，天皇再次召见篠原等一百四十余名将士。可是篠原等多数军官称病不进宫。这时不得已在第二天照准了军官们的辞职。板垣曾极力慰抚土佐出身的军官，但除山地大治等少数人以外，将近四十人辞了职。这样一来，近卫军几乎快要垮了。无怪乎木户孝允说：“大凡军官插嘴过问政治，乃是其国之耻，其人之耻。如此则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军官不成其为军官，令人不胜慨叹”。又说：“在这种情形下，即便如何企求文明，也办不到。当时的情况完全是一种野蛮状态，令人慨叹不已”（致田中光显及森寺常德的信）。

不过，木户、大久保等人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因为他们正在根据征兵制建立新军。山县有朋负责用新军来重建近卫军，11月中旬，已经完成预定的编制，可谓神速了。

中央政府和军队的重建，完全告成。然而主张内治为当务之急的大久保政府，其第一个施政方针，并不是确立人民的自主自由

和民主主义的方向，以求休养民力和奠定国家独立自主的根基。1874年1月公布的内务省官制中规定“管理国家安宁、保护人民的事务”，以警保局和劝业局为骨干，总管现在的内务、农林、商工、邮电等各部的事务。

在创设警察制度方面，作为大久保的亲信大肆活跃的大警视川路利良说：“束缚就是保护”。为了束缚保护的目地，大久保早在1873年10月19日为推翻征韩论而奔走时就发布新闻条例，压制批评政治，1875年又加以修改，重新发布谗谤禁令，开始了比封建时代还严厉的言论压制，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文字狱。

另一方面，劝业局和伊藤的工部、大隈的大藏省以及黑田清隆的北海道开拓使等机关，大力发展所谓殖产兴业，在建立官营工厂和开发农业等方面投入巨资。不久后，这些工厂几乎等于毫无代价地卖给勾结政客的商人了。其中最使世人吃惊的，是1881年北海道国有财产的处理事件。要把一个国家投资一千四百万日圆巨款的企业，仅仅以三十万日圆出让给萨摩出身的勾结政客的商人五代才助，而且三十年分期偿还，不取利息。这件事由于人民强烈反对，终于没有实现，但一般都是这样情形。

1874年以后，保护三菱公司给以数百万日圆巨额公款，说是为了“谋求发展我国海运事业”。不错，由于这种保护，从日本近海和上海航线上排除了外国轮船，但是，三菱在海运方面的垄断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我国航海业的健全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垄断而不合理地提高运费，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我国工业的发展？这是万人皆知的事。所谓殖产兴业，结果不外乎培植了官商财阀。关于井上馨经营的先收公司（后来的三井物产），就连井上的前辈木户孝允都说：“日本人瘦，而先收公司独肥，弟所不喜者也”（明治七年九月十五日致杉孙七郎等的信）。

另一方面，与这种殖产兴业政策相关联，在华族和士族家禄的

偿还问题上,还更进一步打击了士族派。

家禄的偿还问题,从1872年2月以来,大藏省就在进行准备。这时募集外债已经成功,取得了偿还基金,同时士族派的参议完全退出政府,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于是大久保政府赶紧在1873年11月着手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想对家禄实行课税。

然而,政府内部被称为最进步派的木户孝允对此激烈反对。他说:“今日各部中丢失二百余万元的巨款,人民尚且不知(想系指山城屋事件或三谷三九郎事件等而言),而对贫民的各税课之甚严,弟等于情不忍也”(11月30日,致伊藤博文的信)——这段话不是他反对地租的严酷,而是他反对对士族家禄课税的书信中的一节。

木户自命为人民的保护者,从1873年9月起直到他下野前后,他的日记和书信里不断出现“政府事事虐待人民”,“人民不堪司法的压制”等等的话。然而,他所说的人民,主要指的是士族,他把农民、经营工商业的一般国民叫作“无知的小民”和“顽民”。在这些地方,他与西乡之间没有本质差别。西乡读了福泽谕吉的著作后也说,他“顿开茅塞”了。下野后,在萨摩的赏典学校里也聘用外国教师。然而,当时所谓文明、进步,是要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彻底清除封建的压制和剥削,确立国民的自由民权,把土地交给劳动农民,使人民自由兴办企业。假如不这样,而仅仅引进欧洲的官制和机构,那就不过是装饰文明的外形而已,或者可以说是用文明手段实行封建专制,因而是比封建时代更残酷、更巧妙的专制。

尽管木户激烈反对,但如果不偿还坐食国家岁收三分之一以上的寄生者的封建特权的家禄,官僚政府的财政也就难以确立,而且进一步去剥削人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于是1873年12月正式公布课家禄税,同时,允许家禄不满百石者“奉还”家禄,对奉还者发给现款或公债作为产业资金。由此开始,1876年(明治九年)8

月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令，华族和士族的家禄，终于全部强制改为公债，而这种公债通过自由买卖转化成了现代资本。在这期间，中下级士族的公债大抵被商人赚去了。政府在1876年8月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果断态度，是因为这时根据征兵令建立的新常备兵制已经确立，从上一年的2月起，已经能使“壮兵”即士族的志愿兵复员，在军备上也有了自信。

政府就这样脱离人民的各个阶层，遭到人民的反对，因而后来政府内部的对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木户孝允把西乡、板垣等人逐出政府以后，不久便与大久保反目，1874年4月下野。政府可能因为失去西乡，感到对反动士族的威权遭到削弱，便邀来最大的保守顽固派岛津久光做内阁顾问，后来又任命他做左大臣，但却发生久光弹劾大久保的事件。1874年末，板垣的民选议院运动有了迅速发展，政府更加动摇，终于在1875年(明治八年)初，大久保、木户、板垣等人在大阪会面，举行所谓大阪会议，结果成立了三者联合政府，暂时得到妥协。但是，不久又继续闹起纠纷，板垣又与岛津久光同时辞职。在这些过程中，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所谓萨长藩阀的“有司专制”——天皇制的官僚专制，却日渐加强起来。1878年(明治十一年)大久保在纪尾井坂被暗杀后，伊藤博文成了他的接班人。当时始终袒护大久保的天皇侍补佐佐木高行曾说：“在岛田一郎等人暗杀大久保的斩奸状中说，今日的日本政治，上不出于圣旨，下不听从人民公论，仅由数名显要官吏臆断擅专，这完全是事实”(《明治圣上和臣高行》)。

征韩论的分裂，西乡、板垣的败退，正是为这种官僚独裁的确立铺平了道路。至此，官僚才在他们自己建设的新军队和新警察保护之下，把自己搞成绝对主义的官僚了。

### 第三节 征韩派——士族军国主义的去向

官僚政府战胜了士族的征韩论，确立了绝对主义的官僚独裁。另一方面，征韩派也进一步分化，各自回到他们本来的立场上。

板垣退助等人开始搞起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背景和社会基础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人民反对“有司专制”和争取土地革命。征韩论争达到最高潮的1873年，也正是人民起义达到顶峰的一年。民众的这个反封建斗争，使得改良主义的反政府派——板垣等人走上了自由民权运动。

关于这个运动，不得不留待将来再谈。不过，我要在这里指出，这个运动中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有征韩论的一股暗流。不过，这并不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民众的要求，而是领导这个运动的板垣等人作为民主主义者不够彻底的反映。

真正的征韩论者西乡等人，连形式上都没有参加这个自由民权运动，这也是他们立场的必然结果。西乡以下的桐野、篠原等西乡派文武官僚六百余人陆续回到萨摩，创办私立学校作为他们朋党的统一机关，开设附属的炮队学校，还在首邑和各乡镇设置一百三十多所分校，召集幼年或少年，加以训练并教给武技。当时称为幼年学校、专门学校或赏典学校的，是依靠西乡等各士族的赏典禄<sup>①</sup>来创设的学校。这些学校俨然形成一个大兵团、私立的士官学校，或议事所。

他们就这样以萨摩、大隅和日向的一部分地区（即旧萨摩藩领地）为根据地，私自拥有武器和军队，禄制也依旧不改，完全不听中央政府的命令。尽管他们主观上声称这是为了准备在国家危急时行动起来，但明治十年西南战争时，我国并没有外来的危机，国内

<sup>①</sup> 明治维新时，授与有功的公卿、诸侯、士族的家禄以外的俸禄。——译者

也没有濒临破裂，所以西乡等人没有正正堂堂地提出一个为天下国家而起兵的正当理由。他们只是含糊地说有事要质问政府，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的举兵才使国家陷于危机。萨摩的西乡和他的一伙恰恰和中国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军阀政权是一样的。

演变成西南战争的愤懑不平的土族的一系列叛乱，与其说是征韩论的影响，毋宁说是征韩论的必然结果，这是任何人都会游移的。1873年10月，征韩速行论虽然一度在政府最高会议上失败了，但征韩征台的议论反而在土族中传播开了。

1873年11月间，据木户观察是“一般人对征韩论谈论得很热烈，已经蔓延到此地，事态十分严重（中略），各报也论述不平，虽然性质有天壤之别，但对征韩及其他不平者是莫大的鼓舞，恐怕非陷入一场大乱不可了”（木户致井上馨的信）。

1874年1月14日，征韩论者高知县士族武市熊吉等九人认为：“征韩之事，庙议已决，独岩仓右大臣等有异议，因而变更庙议”。因此，非除掉岩仓不能达到国家的目的。他们在赤坂的岔路口袭击岩仓使岩仓受了伤。

在同一时期，佐贺县士族也有所策划，中岛鼎藏、朝仓尚武等人在佐贺纠合同党，征集武器、金、谷，在旧藩校弘道馆设立“征韩先锋请愿事务所”，企图迫使政府实行征韩。他们一度请求萨摩的西乡领导，西乡不允——想来，他可能认为时机不到——于是便想邀请乡党的前辈江藤新平。原来，江藤的行动是前后矛盾的。他虽然是个有才干有手腕的人，但可以说，因急于追求地位，结果丧失了理性。下野后，暂时住在东京，同板垣等人的爱国公党运动也曾有过联系，但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愿。因此，他一听到中岛等人的期望时，也就不听板垣再三劝阻，还是在正月回乡，当了征韩党的首领，并且联合岛义勇等人的忧国党——反对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封建主义最右翼。他还企图联系萨摩的西乡、长州的前原一诚

以及附近各县的士族，没等联系上，就在2月1日掀起了暴动，18日驱逐县令，占据了县署。近乡士族接着也来参加，达四、五千人，2月18日占据了佐贺城。

江藤叛乱的消息传到政府后，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似乎反而认为消灭士族派的良机已到。他说：“要当机立断，采取转祸为福的措施”（致木户孝允的信）。他强烈要求授给自己兵马和司法的全权，前去镇压。他在福冈设立大本营，以大阪的镇台兵为主力开始讨伐。3月1日，就大致平定了叛乱。江藤于2月23日离开阵地，逃往鹿儿岛，投靠西乡，西乡没有收容他，又逃到土佐，希望投靠林有造等人，但也没有达到目的。3月29日在土佐东面的甲浦束手就擒了。

另一方面，政府于2月23日推东伏见宫义彰亲王为征讨总督，以山县有朋为参军，领兵西下。亲王子3月14日来到佐贺。于是大久保认为军事及对叛乱者的处罚等问题，全都属于亲王的权限以内，并把自己的全权移交给了亲王。大久保假借亲王名义，担任审判江藤等人工作，硬把江藤和岛义勇判处当时我国法律已经废除的封建时代的极刑——梟首。

江藤的叛乱和大久保的审判，究竟哪一方面更反动，这是很难立刻断定的问题。当时立法和司法都由政府随意操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然而，外国人指摘我国审判制度太野蛮，以此为口实，不肯撤销治外法权，使我无法辩驳，不能恢复主权。

总之，佐贺之乱很快就平定了，并没有象“当此九州人心动摆之时，此举究竟影响如何，殊难逆料”所说的那样值得担心（大久保利通致三条实美的信），1874年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当然，这一年的平静也是因为另有侵略台湾之举，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外的缘故。

1874年总算平静地过去了，1875年也因为朝鲜江华岛事件，



日朝关系紧张起来。士族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去了。1876年(明治九年)日本成功地把不平等的修交条约强加给朝鲜,没有发生战争。另一方面,同年3月,政府下令废除士族带刀,8月又终于废除了家禄,士族阶级因此骤然受到冲击,相继爆发了10月的熊本敬神党之乱、秋月之乱、获(长州的城邑)的前原一诚之乱。敬神党暴动的直接动机是对废刀令的不服,秋月党是因日朝条约没有把朝鲜划归我国属国的直接不满。前原等人还以江华岛事变为良机高唱征韩论。三浦说:“偏激之徒见机实行血盟,或刺血签名以誓师;虽假征韩为名,但其血盟或刺血签名的意旨何在,殊属可疑”。这是以征韩为名,全面反对地税改革、库页岛和千岛的交换、士族处分等而掀起的暴动(三浦芳介致木户孝允的信,《松菊木户公传》)。

在这种总的形势下,1877年2月,发生了最后的、但也是最大的士族叛乱——西南战争。由于这一战争,原来的征韩党全都受到了处分。

当然,并没有因此放弃了征韩论或大陆侵略论。它们在同内治政策密不可分的关联下,一直存在了很久。1877年(明治十年)创立的玄洋社,以及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1月由玄洋社创立的黑龙会,在种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西乡等人的征韩论的直接承继人。在他们孕育下,还陆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团体和党派。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的纲领也多少有些变化。例如,黑龙会的纲领甚至还标榜出立宪主义来。既然不满官僚政治,到了1900年,也只好标榜立宪主义了。但是,黑龙会的本来目的,是西乡式的武政级现代化。尤其从它的名称可以看出,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侵略矛头推进到黑龙江畔。

西乡的征韩论就这样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大久保政府所推行的、比西乡更会盘算的新军国主义的一支别动队。

#### 第四节 新军国主义

西乡等人及其承继者们攻击官僚政府外交上软弱，在对欧美关系上的确应当受到这种责难。正因为这样，它才对朝鲜和中国大陆方面强行侵略而决没有放手。

因为在征韩论发生争论时，大久保主张迅速解决库页岛问题，他在1873年10月28日便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前任各参议”，因而他要求“库页联合审判及边界谈判之事，不得违背前议”。经过几次内阁会议之后，决定派遣一贯主张放弃库页岛的黑田清隆所推举的榎本武扬为使节前往俄国，同年3月，在谈判要领的第二款和第三款时，指令榎本以千岛交换库页岛（《日本外交文书》七）。榎本于1875年5月在俄国首都签署了交换条约。

同时，政府也讨论了朝鲜和台湾问题。1874年1月，岩仓被征韩派士族袭击以后，愈加感到有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便以大久保、大隈为中心，进行了有关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调查，并邀请美国人李仙得商议征台的方策。

2月初，大久保等人提出一份“台湾蛮地处分要略”，大意是：“台湾蛮地”可以看做是清国政权达不到的无主土地，“对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进行报复，乃是政府的义务”，“讨蕃的公理，也可以由此得出根据”。如果清政府认为琉球是中国的属地，对这种议论可勿深入，如果提出蛮地<sup>①</sup>是清廷领土的议论，“可以一面拖延时日，一面以完成当前紧急任务而不失和的策略”与之交涉。可见，虽说台湾是无主之地，但也无占领的决心。

这种不彻底的战争目的，恰恰说明主张内治是当务之急的大久保突然计划外征的根本动机。这完全是由于萨摩出身的大久保

<sup>①</sup> 指台湾。——译者

为了慰抚西乡派及一般的征韩党，转移自由民权的舆论而定下的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定论，我也没有异议。当然，这不仅不能转变国内局面，同时虽然当前还不能把占领台湾作为目标，但当前可以确保琉球，等到有朝一日，“清廷萎靡”，“清廷显然没有余力袭击我国，我则有恃无恐”，梦想趁着这种情况，迈出“在亚洲大变动中奠定霸业方略”的第一步（柳原前光书信，《大久保文书》五）。

木户痛斥一面主张内治为急务而又突然计划外征的作法。他严斥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的极不负责的说法：“征讨费有五十万元就足够了，如果超过，愿意引咎切腹”，他说：“这样重大事件，竟以死为誓，言者野蛮，听者亦野蛮，非堂堂政府所为。孝允不能以西乡之死谢苍生”，又驳斥说：“大凡战争，首先应考虑本国人民之利害得失”，结果辞掉了参议职务（致榎村正直的信，9月17日）。

2月6日，决定派遣台湾远征军，后因佐贺之乱而延期。4月，西乡从道中将任征台事务都督，以美国人李仙得和卡赛尔为顾问，租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轮船，率兵三千六百名在长崎待发。

然而，这时一向热心援助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台湾的美国公使德朗归国了，后任的平安刚刚到任，不了解情况，便于4月18日宣布保守中立，拒绝李仙得等人担任顾问和租借轮船。英国也接着同样宣布中立。

大久保等人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连运兵的船只都没有充分准备，因而此时火速命令西乡都督中止征台，但西乡不听政府命令，已经擅自率领大部队出发了。于是，大久保不得已火速派公使柳原前光前往中国，说明此举对中国毫无敌意，求其谅解。当时木户派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登载一首讽刺歌：“夕阳下，远眺琼浦（长崎湾），不听君命，帆船已出。听，人民在哭，人民问，都城名将有无？”

远征军从6月1日起开始进攻牡丹社，转瞬间迫使投降。但这并不足以自豪。从前，李仙得曾以一小队兵就迫令这个牡丹社降伏了，而这时则派去三千大军，未免小题大作。

另一方面，柳原同中国进行的交涉毫无进展，甚至发生中日间开战的危机。为了收拾残局，大久保亲自出马了。1873年以后，大久保的活动是值得惊叹的。据我看来，他可以算是日本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的封建的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大久保于9月10日抵达天津，经过数次谈判，几乎濒于决裂，后来经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才勉强打开僵局。清廷承认日本的征讨“台湾”是“义举”，不是赔偿战费，但付五十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遇难的琉球人遗族以及接收日本在当地的设施的代价，日本则立即撤兵，10月结束了谈判。虽然日本的出兵被认为是“义举”，但说“蛮地”是“无主之地”的日本主张被否认了，确认它是中国领土，同时也可以说清政府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征讨费花了约七百七十一万元，其中包括因征讨而购买轮船的代价四百一十万元。而这些轮船后来全部借给三菱公司，非但不收租金，而且还搭上了修理费。政府由于这次征伐，痛感要达到侵略海外的目的，必须拥有大批轮船。因此，把经济上的目的放在第二位，只是计划迅速创办大轮船公司。这就等于创办预备海军。

大久保于11月回到东京。西乡隆盛派的报纸攻击征台失败，自不待言。就连岩仓具视本人也对这次战争，内心感到羞愧，他假托局外人责难说：“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异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损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征台后一年，即1875年，终于开始正式侵入朝鲜。我们先看

看当时的国际环境。

巴夏礼的传记、英国人布拉克的《年轻的日本》、前英国公使馆员芒泽在1879年(明治十二年)著的《萨摩的叛乱》、美国人格里菲斯的《皇国》等等,凡是我能看到的当时旅日外国人的日本评论,都简单地认为征韩论是为了转移士族的不满情绪,唯有芒泽除了这个论点外还说日本想抢先俄国占领朝鲜。大概这就是外国的一般看法。因此,看不出征韩论对他们的东洋政策及对日政策发生任何影响,倒是他们的政策影响了征韩论。

从日本政府方面来说,是打算利用欧美各国的矛盾,而欧美各国也各有打算,明知日本有征韩之意,而暗中援助,企图借此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上述的副岛与德朗或布策的关系,大久保逗留中国期间,驻清英国公使再三劝他侵占朝鲜等事实,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如果目的只在于朝鲜的开口通商,即便日本率先使用强制手段,这也是英、美、俄等所希望的,不至于发生象始终参划征台的李仙得所说的“征台时,平安在长崎恫吓大隈,威妥玛在北京威胁大久保”那种事情(《国家学会杂志》第五十一卷五号,堀真琴《关于美国人李仙得的建议书》)。

征韩论对它的对方国家——朝鲜和中国起了什么影响呢?日本的征韩论自从幕府末期以来就流传到了中国和朝鲜。清朝的恭亲王和朝鲜的大院君都对日本深怀警惕。1873年前对韩交涉之所以没有进展,其理由之一,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日本有征韩野心。1873年的征韩论是否直接对中国和朝鲜发生特别影响,没有确切史料可以肯定。但是,由于副岛前往中国时曾经提到朝鲜问题,又兼横滨的外国人经过上海、香港把西乡的征韩论传到了中国,因而清政府和朝鲜对日本愈益提高警惕,这是很可能的。

尽管如此,对清朝和朝鲜,以及对欧美发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对台湾的侵略。外国人认为由于台湾事件,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

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裕的帝国”，外国人看到这个广告，因而更加促进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在阿礼国的传记里就是这样叙述的，他是侵略中国的祖师、英国的驻日和驻华的公使。（The English man in China, Vol. I. p. 256）。

由于台湾事件，当时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强逼中国说：“中国如果不忠实履行各项条约，外国人将不能对中国抱更大的同情”，这就造成清廷深深依靠英国的机会（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fficul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Regard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Blue Book, 1874, 11.6. 威妥玛致英国外相的报告）。

征台对很久以来警戒我征韩的朝鲜说来，是一个直接的示威。在这以前，朝鲜在大院君的连年暴政下，国内骚然，韩廷居然有人公开弹劾政府的弊政。国王高宗乘机与王妃闵氏一族计议，在1873年11月罢免大院君，开始亲政，多少缓和了排外主义，罢免去东莱府使郑显德，对草梁倭馆也多少有所尊重。朝鲜的这种变化，由草梁馆的奥义制报告了我国政府。我政府于1874年5月派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前去探查情况。

在这期间，因主张征韩而发生的佐贺之乱传到朝鲜。6月，中国把日本出兵台湾之事通知朝鲜说：“日本尚留五千军队于长崎，欲在台湾撤兵后立即征讨朝鲜。朝鲜与法美两国，前隙未解，法美必以武力援助日本。朝鲜敌不过三国，如中国能使朝鲜与法美两国订约通商，则日本便势孤不敢动兵，朝鲜也得以保全”。

朝鲜“半信半疑，满朝动摇”。当即复启清廷，吁请“晓谕”日、法、美三国，勿妄动干戈。大臣李裕元、朴珪寿等人上奏国王，言交往阻隔之弊，皆因大院君妄信训导安俊卿等之言，并论及不可因书契违背体例而阻隔邦交。因此，国王惩罚了前庆尚道观察使和郑显德、安俊卿等人。一方面，朝鲜政府秘密致书森山，通知有接待

日本外务省官员之意(《李大王朝史》)。

森山即刻报告到外务省,政府于8月20日欲派旧对州藩主宗重正为外务省官员前往朝鲜,没有实现。9月3日,森山初次与新任训导玄普运会见,责备朝鲜前年以来不接受日本国书,玄普运对这个责难略表承服,于是有了开始交往的征兆,森山于10月回京述职。

1875年2月,政府派森山为理事官,广津弘信为副理事官,携外务卿和外务大丞的书契前往釜山。这时外务省给森山的指示是:“不论朝鲜自称独立国家或承认是清朝属国,如果它愿意以我太政大臣与该国王、我外务卿与该礼曹参判为对手,修复旧好,即可同意”。可见,本来就没有打算对等交往的意思(菊地谦《近代朝鲜史》)。

森山抵釜山后,立即进东莱府要求呈递书契。朝鲜中央政府接到府使黄正渊的紧急报告后,本想决定接受,但府使又向中央报告说,森山等人于宴席间穿着西服,书契亦与已往体例大异,请求中央再予指示。当时大院君虽已隐退,但他在朝鲜政府中的势力仍然很强,而且由于传说我国将要征韩,所以态度更加强硬。朝鲜中央政府举棋不定,只对府使下了一道含糊其词的命令,命他取其可取,舍其应舍(《李大王朝史》)。这样一来,又发生了1873年前的同样纷争。广津于4月归国,建议在朝鲜排外派尚未再次猖狂以前,“当即派军舰一、二艘,在对州与彼国间往返巡逻,忽隐忽现,测量海路,使其莫测我方用意所在,而朝廷则时时表示督查我理事官迁延情况,以使我有所逼迫彼方之辞”。

根据这一建议,5月末,日本军舰“云扬”开入釜山,“第二丁卯”舰亦继续开来,大举示威。9月,“云扬”测量朝鲜西海岸,驶抵江华海面,20日,溯航汉江停泊永宗城附近。据日本方面声称,突然“遭到朝鲜炮台的炮击”。然而,这“对海军当局说来,正是预定

计划实现了,不足为怪”(《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既然日本军舰擅自深入别国领土,任意挑衅,那么朝鲜方面对此加以炮击,本是当然的事。日本政府打算抓住这个机会,一举达到多年以来的目的。据木户的日记明治八年十二月七日载:“朝鲜江华事件之所以爆发,亦是几年来的困难局面被抑制到今天的结果。然而左大臣(岛津久光)却建议,要今日之政府一变而从事外征朝鲜云云,则军队及士族显然对此皆有附会之势。果如此,恐将悔之不及,政府对朝鲜若无一定目的,难保不四分五裂。故余请舍此一身,以当其责,肩负困难。然十有八九不能如愿以偿”云云。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事件的由来和政府内部的情形。那么,木户、大久保等人究竟对朝鲜抱着什么样的“一定目的”呢?

《大久保利通文书》的编者把大久保向岩仓提出的“朝鲜意见书”这一文件说成是他在1873年(明治年六)10月征韩论争时提出的。这是编者的错误,我们可以断定,它是1875年10月江华事件时的意见书(考证从略)。

据这一文件载,大久保说,关于派遣使节赴韩进行谈判,必须确定“诱导朝鲜开化或使朝鲜屈服于我,予以吞并”中以哪个为目的。岛津左大臣和士族军队主张征服和吞并。与此相反,大久保等人则如上述意见书中所说:“命令聘用的法国人布阿索纳德研究公法,详细进行调查,以及研究通知各国公使的手续”等等,认为不能不顾虑到国际关系,况且他们去年主张的加紧整顿内治的根本情况,今年并未好转,因而决定尽量避免战争的方针。不过,这并不等于“诱导朝鲜开化”,只是推迟了武力侵略。

于是,派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派当时在野的井上馨为副大臣,前往江华交涉江华“暴行”的赔偿和签订新通商条约的事宜,并将此事通知外国公使。这样,暂且以和平为主,但对使节们则预先指示说,如果谈判决裂,“告以我国政府将另有办法,



表示坚决态度,迅速回国”。一方面命令政府的法律顾问布阿索纳德研究国际公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并且加紧朝鲜征讨司令官及师团长以下远征军的编制,准备发给司令官的任命草案和诏命草案。陆军卿山县有朋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马关待机。归根结底,侵略的目的并没有放弃,只是办法比西乡等人更合理,更有计划。

西乡称作“三井的店伙”的井上馨被派为副全权大臣,三井从1873年前后已经打进朝鲜,特别是全权大臣的使命与1873年西乡派遣使节的目的略有不同,还有签订通商条约条款,由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这是我国资本主义在逐渐发达的反映,但强行侵略朝鲜的根本推动力,并不在于经济,而是在于政治和军事。这一点按事件的全部过程看来是很明显的。

黑田全权大臣一行于1876年(明治九年)2月10日在江华登陆,经过数日谈判后,于27日,双方全权代表签订了日韩修好通商条约。这次谈判的经过和朝鲜政府对这次交涉的内部情形,这里从略。总之,派去的军舰起了作用,同时清廷的李鸿章也劝朝鲜议和,所以国王压服了大院君一派的主战论。

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国家,与日本国保有平等之权”。这一条使日本的征韩派大为不满,但是政府方面则是想为了首先明确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以便造成将来日本使朝鲜“属于我国”的前提条件。第十条规定,日本对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而这种治外法权正是当时我国要求欧美诸国废除的东西。日本方面提出的方案中本来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但朝鲜方面主张因为日韩有悠久的友好关系,所以才特别只同日本签订这项条约,同其他国家绝对不签订这类条约,因而没有规定最惠国条款的必要。因为这也是实际情况,所以日本全权代表也暂时表示同意。接着,又于8月签订贸易章程,根据它的附件,数年内,进出口都不征关税。这样,也有了对自己有利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垄断了对朝鲜的贸易。

于是,中日两国围绕朝鲜争夺霸权的纠纷开始萌芽了。六年后,1882年7月,借着所谓“壬午之变”的机会,中日两国军队一齐进驻朝鲜,形成了对峙局面。

此后日本侵略朝鲜的经过,这里不能叙述。那种侵略总之一直延续到1911年吞并朝鲜为止。

这种一贯的侵略政策,势必加强军部的势力。早在1879年,军部就提出了“统帅权独立”的问题,并且得到实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用于军事费用。单是这一件事,就使军部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压力和控制力。西乡等人的征韩论和封建士族的军阀被打倒后不到十年工夫,新的天皇制军阀和军国主义便强有力地在日本成长起来了。

##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 日俄战争的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 第一章 甲午战争的本质

#### 第一节 谁是主角

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石川旭山和幸德秋水，在1907年曾这样写道：“甲午战争还不能说是由于资本家的觉醒而爆发的。不能说它是由于资本家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日本社会主义史》，《明治文化全集》社会篇所收）。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计划、准备和发动甲午战争的主体，不论在表面上或在实质上，都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资产阶级在这个战争中被动员起来，也尝到了不少胜利果实的美汁，但它并不是战争的主角。

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处在依靠天皇制的扶植进行产业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还没有能够支配国民经济。现代大企业，除了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以外，矿山、铁路、海运以及纺纱业还刚刚开始，而且铁路、海运方面的企业，还接受了天皇政府所给与的军事警察的任务，因而在大力保护下被培植起来。甲午战争前，海运业实际上还没有摆脱官民合办的性质。矿业也被那些受到政府大力保护的政商——三井、住友、古河和稍后的三菱等企业垄断了。就连纺纱业也不是从民间许多大小产业资本中自发成长、通过自由竞争发展成为大企业的。一开始就是由享有特权的政商在政府的保护下

开办为大企业的，并且压垮了其它企业，因此反而阻碍了自发的工业资本的发展。与此相反，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生丝生产，却没有超出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式的规模，手缫丝占产量的一半。国民百分之七十还是农业人口，农业中半封建寄生地主制正在迅速发展。国家财政大部分依靠土地税收，其次靠间接消费税来维持。所谓土地税收，主要是国家通过地主的封建佃租剥削从佃农手里间接夺取的税收，以及国家以半封建权力为后盾，从自耕农手里直接夺取的税收，而间接消费税也是大部分由劳动农民负担的。这两种税收总额，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约占国家经常岁入百分之七十一弱，占租税收入百分之八十七。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国家财政下培育起来的。这些事实表明，在甲午战争以前还不是天皇制依赖资产阶级，而是相反，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在依靠天皇制。

因此，大商业资产阶级从天皇制成立初期起就在政治上同官僚密切结合，从而成为“政商”；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分别从国家手中捞到莫大的保护，同时，他们力求把整个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是，他们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给天皇制以重大影响。1890年成立了帝国议会，但是，资产阶级在贵族院是不消说了，即使在众议院也还没有支配力量。1900年修改的选举法施行以前，三百名议员名额中，城市议员还不到二十名。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对议会的地主性质进行攻击说：“帝国议会也是地主议会，地方议会也是地主议会”（田口卯吉），或者说：“土地的所有者就是权利的所有者”（《国民之友》）。然而，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大小，不能单凭城市议员人数的多少来判断。尽管议会本身极其无权和受到限制，但它毕竟是日本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虽然是从农村选区选出的议员本身主要是地主的代表，但也往往同时是商业资本家，甚至也代表制丝业、酿造业等其他工场手工业的资本家。还有，

大多数议员都参加政党组织。当时人人都知道，两大政党之一的改进党的大隈重信领导的首脑部，在议会成立前就同三菱等其他大政商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本身也往往是从商业资本家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政商。当时另外一个拥有议员人数最多的自由党，是个主要依靠地主从而经常保持多数的政党，而它的首脑部虽然不象改进党那样厉害，但也和三井等其他大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2年末，国权主义的报纸《日本》著文，攻击地税轻减案在议会中轻易不能通过时说：“看来议会是农民和商民的生存竞争的舞台”。事实上也是这样，地主的封建势力同资产阶级的现代势力在议会和政党中形成互相对抗的局面。总之，当时的资产阶级批评家说，议会完全是地主的议会，但对此也必须说，尽管地主势力在议会中占优势，而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已经达到能够与之抗衡的地步。同时，对于一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的议会已处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的意见，则必须说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日本的政党，就是所谓在野的官僚——职业政治家（真正的专制官僚出身者）一面使地主的封建势力同资产阶级现代势力对抗，一面从中进行撮合把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而由他们站在上面加以操纵的组织。为了追求权势和利益，他们不惜同官僚政府、军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资产阶级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仅止于此，它还不能在冒国家命运危险的大战争中扮演主角。如后文所述，日俄战争时，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为了确保满洲和朝鲜作为他们的市场而同俄国开战，军部和官僚政府也在开战前曾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复进行协商，开战以后立即强调这场战争如何是一场争夺市场的战争。但是甲午战争时，却没有这种情况。这一点显然表明，资产阶级在这两次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那末究竟是什么情况使天皇制掀起甲午战争的呢？一个有力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虽然在这次战争中不是主角，但年轻的日本工业资本主义从 1890 年经济危机以来就急待确保朝鲜市场，这也是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但据我对史实的分析，却不能这么说。

朝鲜市场对当时日本工业资本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甲午战争前对朝鲜的贸易，进出口都不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二。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个零星贸易出口货物种类时，可以发现，这里面几乎没有日本工业资本的制品。如果由于 1890 年的经济危机以后，纺织联合会曾大力向中国出口，因此便联想到对朝鲜也出口了棉业资本的相当量的制品，那就大错特错了。据统计，向朝鲜出口的棉制品在那个十分微少的对朝出口总额里仅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而且除了英国制品的转口之外，国产品不过是一些棉法兰绒、毛巾等家庭手工业产品，充其量也不过是工场手工业的产品，没有现代机器工业的产品。纺织资本对这个现在十分贫弱而且将来也缺乏发展余地的朝鲜市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是因为纺织资本跳过朝鲜，把全部力量倾注到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中国市场上去了。当时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除了纺织资本以外，还没有另外一种工业资本，急待在远东开辟市场。当甲午战争迫近的时候，纺织资本家十分恐慌和悲观，以至御用的评论家们不得不安慰和鼓励他们说：“只要打胜了仗，一切都好了”。从这些事实来看，要说因为工业资本迫切需要确保朝鲜作为输出市场而酿成了战争是说不通的。

对日本经济来说，朝鲜不是作为输出市场，而是作为稻米和大豆的输入地——粮食的来源地，而具有重大意义。这点在这以前很少有人注意。1876 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后，日本商人和政府大力推行的是采购稻米和大豆。从朝鲜进口的廉价粮食，成为这个号称“丰收之国”的日本资本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尽管听起来很矛盾。1889年秋季,日本的米荒,接着1890年初夏的小麦荒,引起1890年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广泛的米骚动。这个因粮食不足而引起的不安,靠进口朝鲜大米才得到解决。甲午战争前,1888年至1893年的五年期间,日本每年平均出口日本大米约六十九万石。但是另一方面每年平均要进口大米五十六万石(《米谷要览》)。出口高价的日本大米,截至1890年为止,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泉源,也是对地主保证高米价的一个手段。但是必须进口廉价的外国大米来供给贫苦人民食用,才有这种可能。进口廉价外国大米,也是为资本家维持低工资的一根支柱。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达,进口外国大米的需要也逐步提高。从1893年起,进口超过了出口。进口大米的来源主要是朝鲜和暹罗,尤其是朝鲜大米对日本商人来说是利润最高而且是最可靠的商品。因为暹罗大米的进口操在外国商人手里,而距离较近的朝鲜大米可以由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产地,在小农困难时贷以资金,到秋季则用收获的大米来抵偿。这完全是典型的大高利贷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

对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来说,朝鲜是上述那样重要的粮食来源地。而该国政府为了对抗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迫,依附清廷,并取得清廷的支持,便于1889年秋,在咸镜道和平安道突然禁止了粮食出口(即所谓防谷令)。尽管这种禁令实际上并不妨碍日本在朝鲜购买米谷,但早晚可能禁止出口。这件事对日本来说,是个十分不安的病根。日本政府马上威吓朝鲜政府,要它在第二年春季解除防谷令,并对它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由于朝鲜不肯轻易屈服于日本方面的这种不正当的要求,1893年5月,日本政府便暗示要用武力来解决。另一方面,驻朝鲜的日本公使不顾外交上的一切礼节,威胁朝鲜国王,终于迫使他付出拾叁万日圆的“赔款”。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言人、逐渐具有实力的田口卯

吉在《东京经济杂志》上说：如果朝鲜迟迟不解除防谷令，就断然同它开战，届时清廷必然出来援助朝鲜，那就把“战争扩展到天津去”（1893年5月）。及至同年10月，朝鲜再度发布防谷令时，他又主张：日韩关系已经无法挽救，应该发动战争，以消除多年的郁结，清政府如果援助敌人，就攻击它。

如上所述，确保朝鲜作为日本稳固的粮食来源地这一要求，是非常强烈的，不过，当然不能说这就是引起甲午战争的的决定性原因。总的来说，想从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来说明甲午战争，是把甲午战争前的一些事件同甲午战争割裂开来，单独来考虑甲午战争的想法，几乎无视了下列事实，即日本的统治者从1884年在朝鲜发生中日冲突（这个冲突用天津条约敷衍过去了）以后，就对早晚必将发生的中日战争有所准备和计划了；在这以前，1879年参谋本部的独立，也是由于预想到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远东争霸的大战；更往上溯，天皇制成立以来，日本一贯对弱小邻邦推行的侵略政策，也同甲午战争有着直接联系，甲午战争不过是这个侵略政策的一个决算。1884年中日两国围绕着朝鲜的战争危机，当然不能用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说明，因为那时还不存在这种矛盾。

那么，天皇制为什么掀起1894—1895年的战争呢？天皇制所固有的侵略主义，又有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呢？

## 第二节 客观条件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天皇制——反动的半封建的官僚和大土地私有者取得胜利，为了排除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歧视（不平等条约）进行初期斗争，使日本采取了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斗争形式，这就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



(《1932年提纲》)。这是理解甲午战争的钥匙。

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将转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前夕，日本的经济发达程度仅仅是，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刚刚实现，孤立分散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分化，致使旧领主——农奴制不能原样存在下去，小商品生产有了发展，工场手工业多少有些萌芽。广泛的农民起义和市民的破坏骚动，虽然常常使封建权力瘫痪，但还没有来得及成长为一个现代的阶级，来把这些因素组织成为夺取政权的全国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被欧美列强不容分说地拖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凭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国家的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不仅是旧封建制的危机，也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的危机。人民为摆脱这个危机而进行的努力，经历了几次内乱，打倒了幕藩封建制度，实现了明治维新。但是，这并没有马上使日本的半殖民地地位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首都东京的大马路上疾驰的双马马车，坐着的都是外国人，日本人如果一不小心撞在马车上，车内的外国人便大吼而过，日本人即便受伤或是被车轧死，警察也只当没看见，只好自认倒霉(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这种情况是现代的民族觉悟(所谓的民族精神)正在蓬勃发展的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那末怎样才能作到国家的完全独立呢？必须实现真正全民的“富国强兵”，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军事上，培养出足以对抗列强的全民的实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人民从封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完成土地革命。在这样的基础上，促使现代的生产力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确立全体人民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力以代替封建的隶属和不平等关系，在民主的国家之下，把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人民全独立了，国家才能独立。1870年前后，“稍具见识的人都这样说”《佐佐木高行日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论证了这一点。

然而，日本的现实却不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取得胜利，而是封建

的寄生地主制和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胜利，不是民主主义而是天皇及其官僚的绝对主义取得了统治。这个天皇制虽然已经不能死抓住旧的封建制度，但也不能把它和日本从本质上加以现代化。它只好一方面维持封建制度，一方面不断培育与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资产阶级的各种因素。这样，本质上属于封建的、而又是半资产阶级的天皇制的性质，既使人民中最反动的土族攻击它的资产阶级的一面，又使得革命的农民和被赶到自由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去的小资本家同声愤慨。因此，在天皇制下，非但不能团结足以实现对外独立平等的民族力量，反而相继发生了土族的叛乱、农民和市民的暴动，进而飞跃地发展成为自由民权革命运动，使得天皇制从各方面不断受到人民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制和官僚们为了对抗内部的人民和外部的列强，只好加强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这样一来，为了争取人民的繁荣和独立而提出的全民的富国强兵这一口号，实际上由压制人民的天皇制的“富国强兵”给顶替了。因此，天皇制的日本在维新后很久，还不能排除不平等条约，各个方面都屈服于强大的欧美。它只好在侵略弱小邻国上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补偿。

当德川幕府被迫同美国和俄国签订友好条约——完善的通商条约的第一步时，攘夷主义的领导者吉田松阴说，我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既已确定，就不能由我方首先违背信义，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和满洲”，在“贸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可以在“土地上”取偿于朝鲜和满洲，如果认为他在这里说的“贸易”这个词代表资本主义欧美在经济上、政治上及其他一切方面对日本的压力，而“土地”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封建的领土，而且包括资本（不拘商业资本或产业资本）可以追求利润的领域的意思，那么 1855 年吉田松阴的这个既屈服又侵略的政策，可以说原封不动地成了 1868 年以后由他的徒子或徒孙所领导的天皇制权力的最高国策。这个国策表现为

征韩论、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台湾、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后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商业上的蛮横侵略，对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的不断扩张的斗争。而这些表现的总决算就是甲午战争。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般基础的历史条件，已如上述。但是，这次战争和它以前的军事冒险之所以能够发动，还有它特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因素。天皇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半封建生产关系为固有基础的半封建权力，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长起来，旧的各种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蜕化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没有被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完全代替，仍旧保持着封建的本质。因此，天皇制是一种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天皇制不能不坚决维护它固有的基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同时又不能不适应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为了保全天皇制的独立存在，单就装备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来说，毫无疑问，就需要不断培植资本主义的产业，也就是说培植包含其固有的种种矛盾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在天皇制度下，一方面封建的生产关系由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时刻在削弱（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在天皇制下开始全面发展，决不意味着封建制的加强，而是它在资产阶级各种生产关系下不断被削弱和蜕化）；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因为封建的生产关系被顽固地保存下来而难以得到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农民遭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尽管单位面积的产量多少有些提高，但是劳动的生产率几乎没有上升。因此，常常发生大歉收，这时生产力甚至直接遭到破坏。在剥削农民的这种基础上，为了装备天皇制的军事警察而肩负建设大工业这一中心任务的特权政商的大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自发的工业资本却因此而难以取得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全民的富强，即使用以维持和加强天皇

制的所谓“富国强兵”的富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因此，天皇制不得不到处寻找土地、米、金银及其他一切“物产”和“富源”，即后面所说的明治天皇所谓的“收纳”之源。为了获得这种“收纳”之源，最诱人的手段就是侵略他国。在客观上，这意味着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攫取殖民地。征韩论后的侵略政策的经济条件就在于此。天皇制之所以掀起甲午战争，其主要的经济条件也在于此。然而，对富源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渴望，由于1890年前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确保朝鲜大米的要求，既是天皇制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要求，也是原始积累的要求。这种要求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同发展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激化起来，并且工业资本本身也有这种要求。总之，甲午战争的经济条件同以前的军事冒险的根据，不能完全同样看待。天皇制在这次战争中之所以胜利，不外乎日本有了工业资本的发展，它担负得起比清政府在质量上更加优越的现代的军备和战费。否则，1894年的战争最多也不过是1884年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对峙局面的重演，马关条约也只能是天津条约的翻版。同时，使战争成为可能的力量，反过来也起着发动战争因素的作用。所以，把战争的条件单单从确保朝鲜市场的要求来看，并把它当作决定性的因素，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因素，是促使天皇制发动甲午战争的、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的一环，这点是不容忽视的。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和发展步调的不一致，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如上所述，这种矛盾在天皇制片面地培植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中，更加急剧地早熟了。这种情况以及农民受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双层剥削，工人受着因封建制度而更加残酷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国内市场变得非常狭窄。日本处在不平等条约下，也是使国内市场越来越窄的因素。治外法权是外国商人用来迫使日本商人和制造业者接受无理要求的武器，没有关税自主

权就等于后进的资本主义日本被夺去了抵抗外国商品自由蚕食日本市场的防御武器之一。早在1890年,日本的纺织资本就已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出路;同年的国内棉纱生产总额约三千六百万斤,而进口棉纱达三千二百万斤。不难想象,这些进口的棉纱怎样在市场上压迫国货了。因此大企业萌芽不久的日本资本主义,就在这1890年陷入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了。这次危机固然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但是前一年的大米和当年的小麦大歉收,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外的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890年与其说是首次经济危机的年份,毋宁说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经济种种矛盾爆发的年份。随着大歉收,经济危机也提前到来,这就使得整个矛盾愈益加剧起来。

结果到处发生抢米的骚动,佐渡的相川町最激烈,甚至出动两个中队的军队前去镇压。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饥民也充满不稳的情绪。从这一年起,“贫民问题”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佃户和农民的问题威胁着官僚政府。农商务省顾问麦耶特的名著《日本农民的疲弊及其救治之策》一书,单从它的目录看来,就可以知道是专为这些问题而写的。1891年4月,政府系的《东京日日新闻》在举例说明妇女参加劳动人数日益增多以后,写道:“要知我国人口多于土地,已经进入社会生存竞争的最困难地步”,“因此,一位经济学家愁眉苦脸地说:当前必须扩充殖民厅或制定限制人口的法律等等,以期救急,不然社会党共产党之类,难保不接踵而趋”。政府的反对党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在第二年的《自由党报》上登载了一篇论文“殖民论”,大声疾呼,日本的人口不久即将过剩,方今之计不仅增加殖民是当务之急,日本为了同世界富强各国进行竞争,还必须取得海权与商权,为此也大有殖民的必要(《板垣退助全集》上)。由在朝和在野的名士、官僚、资产者列名的“殖民协会”、“东邦协会”等等相继成立,有的主张在秘鲁开发银矿,有的主

张振兴南洋贸易,其中有的是骗人的,有的是认真的,总之,出现了各种各样向海外扩张的热潮,盛极一时。这些主张,不可能分清哪些是属于工业资本性质的,哪些是属于原始积累性质的,可以说是种种因素混为一体,形成寻求海外“富源”的一种模糊的要求。只有纺织资本有非常明确的打算,他们在中国强行开辟推销市场,进行倾销。政府通过正金银行和日本邮船公司极力给予援助。

为了消除 1890 年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深刻化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形成了 1894 年推动天皇制进行侵略战争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这时,工业资本对市场的要求并不限于朝鲜这个具体目标。它是作为一般要求被包含在总的因素之内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因工业资本的形成而更加加剧的、天皇制本身想攫取领土和富源(这点客观上在这个阶段中主要具有原始积累的意义,部分地也可以说是为了取得商品市场)的要求。

下面一段话可以直接说明甲午战争的性质。这次战争的结果,日本从中国夺得辽东半岛,但由于三国干涉又马上归还了中国。这时,明治天皇对他最亲信的宫廷顾问佐佐木高行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考虑了占领盛京省半岛的问题。据说该地情况,利益很少,远不足以供应行政和国防的开支,不从本国贴补,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中略)前些日子在谈笑中问及伊藤(博文),他说不必急于夺取半岛,通过这次战争,已经了解了那里的地理人情,不久,将从朝鲜或其他地方会有再战的机会,那时再行夺取可也。”(《明治圣上和臣高行》)。这段话中的用词也好,想法也好,充分表现了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真面目。可见,甲午战争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成长起来、因而激起领土欲和获利欲才发动起来的。

### 第三节 开战的时机和战果

那末这次战争为什么不在 1890 年发生,譬如,也不在 1893 年的 1 月或防谷令赔偿损失问题谈判迟迟不得进展的 5 月开始(尽管当时曾以战争威胁朝鲜),而是在 1894 年夏天才爆发的呢?这只能说因为这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时机已经成熟。清廷出兵镇压东学党之乱的通知,给了日本向朝鲜派遣大军的一个绝好机会。当然这也是促使战机成熟的一个事实。日本远在清廷准备出兵以前就作好出兵朝鲜的一切准备,并不是因为接到清朝出兵通知后,为了对抗才想出兵的。不管有无东学党之乱,日本是一定要在 1894 年找寻某种借口发动侵朝战争的。因为经济上推动战争的力量很强大,不仅作战准备已经完成,更如下文所述,天皇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也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战争,而且已经作好作战准备。

1890 年天皇制矛盾的爆发和社会不安的激化,在当年召开的议会中也有所反映,引起众议院和政府的激烈冲突。这个冲突在 1892 年末到第二年 3 月的第四届议会上达到最高潮。自由党和改进党结成反政府共同战线的“民党”,从第一届议会以来,提出“休养民力、节约政费”的口号,一直在攻击政府。这种攻势决不象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资产阶级议会围绕国家权利对地主的政府进行的革命的议会斗争。所谓“休养民力”,就是以民众的要求为垫脚石企图达到为地主的利益而减轻土地税。所谓“节约政费”的口号虽然包含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廉价政府”的要求;以及通过扩大议会的预算审议权来使官僚政府事实上隶属于议会之下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议会的领导人物并没有贯彻这些要求的热诚,只是打着民众要求的幌子威胁政府,企图在政府中分享几把椅子。

因此，从第一届议会以来，这些人很容易就被官僚政府收买了。尽管如此，因为议会外面叫嚷着逐年加剧的显著的社会不安，政党还能通过反映这种不安而使政府陷入窘境。

在临近第四届议会以前，政府以伊藤博文为首相，组成除松方正义外、“全体元勋出马”的内阁，下定悲壮的决心，要同议会进行“明治政府末路的一战”（山县有朋）。事实上，民党也认为这届议会是把所有的元勋一举打倒的良机，对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大加修改，并一步也不让。同时，议员方面也没有出现第一届议会那样的被收买的变节分子。最惊人的是，当议会同政府的冲突达到最高潮时，民党不是把政府的错误诉诸民众，而是诉之于天皇，请求天皇给与裁断。政府当然也向天皇控诉议会的不是。结果，胜负定了，天皇的判决诏书当然拥护政府而痛击议会。于是，议会向官僚政府无条件地投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当时议会之所以强大，是只以议会外的民众的动摇为背景的，但正是这个民众的动摇的激化，却使议会变得无能为力了。各政党同政府斗争时，不仅害怕动员民众，甚至象自由党那样的政党，竟然公开宣布该党的自由主义与社会党的自由主义不同，党章规定议员不能受选民的控制，不但同广泛的革命民众绝了缘，甚至同它的选民小地主阶层也断绝了关系。改进党也只是没有这种公开的声明和规定这样的党章，根本不想动员民众。在政治的自由方面（例如修改集会结社法的要求），也完全同政府一样，主张禁止民众享有“社会党”所主张的那种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哪里会有这样不能动员议会外的民众、害怕民众、与民众断绝关系的革命议会斗争？！）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自杀行为，把同政府的斗争向政府的主人天皇去控诉，请求天皇解决。

由于政党害怕民众，政府才在这次“末路的一战”中大获全胜。但是，连民党都感到害怕的民众的动向，对官僚政府来说，它的威



胁更大。躲避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掀起一个对外问题。前任农商大臣、现任内务大臣的品川弥二郎看到半封建小生产者的没落和民心的动摇而痛感天皇政府的不稳。他在1891年第二届议会上提出信用合作社法案，主张如果不及时地定出救济中产以下的小营业者的方策，国家的基础将陷于危险。但是，政府解散了第二届议会，这位品川内相干涉了那次大选，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尽管如此，仍然败于民党，他引咎辞职了。1892年6月，他以山县有朋为幕后总司令，与海军军阀巨头西乡从道合作，组织“国民协会”，以“改良内政”为名帮助政府，呼吁拥护国权，彻底修改条约，把社会的不稳引向对外问题上，利用国民的完全独立的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导向天皇主义的国权扩张和侵略战争。在这以前，与退役将军谷干城、三浦梧楼等人联合的国权主义者陆羯南等人，在1889年2月创办报纸《日本》，大力宣传国权主义，在舆论界方面获得势力，逐渐成长为有势力的报纸。它发表评论说：“远东问题的实际解决，对内可消灭私党的卑念，对外可消灭外侨的骄心，那时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然实现”，从而社会不安和政治不安越来越严重的1891年，即“明治二十四年，实在是我国着手解决远东问题的时代。”这种论调决不是偶然的（《我远东问题的起因》，1894年1月，《日本》）。

“对外强硬”运动在第四届议会后突然激化了。民党的联合被一道诏书打得一败涂地。自由党的主流逐渐被伊藤内阁拉过去。只有改进党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分派，作为一个强硬的在野党保留下来。但是，他们连要求天皇制实行最小限度的民主改革都再也不太热心了，却突然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条约和恢复国权的口号，并且热烈主张：在这些口号实现以前，“坚决执行现行条约”。第四届议会时颁发的诏书也煽动“兼六合而掩八紘”的日本建国的使命。于是，成为议会最左翼的改进党与最右翼的国民协会联合

起来，响应诏书，激烈反对政府的条约修改方案，用尽一切手段宣传对外强硬政策。1893年“即明治二十六年的天地，是对外软硬两派相争的天地”（前引《我远东问题的起因》）。神鞭知常、安部井盘根等最强硬的国权主义者与公认的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大井宪太郎等人创立了大日本协会（10月），成了议会内外对外强硬派的推动力。在“休养民力”、“节约政费”的问题上最害怕动员民众的这帮人，为了“对外强硬”却利用报纸杂志和演说会等等，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发出呼吁。

自由主义者所以参加这个运动，有它必然的根据。如前所述，不平等条约已明确地被认为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付重大枷锁，这一点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受屈辱的反抗情绪。因此，综观修改条约运动的历史，在最初的岩仓大使时期，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国民自尊心的要求，1880年代末期井上外相时期是着重于废除治外法权（这也主要是国民自尊心的问题），其次大隈外相时期是对最惠国条款和税权的关心提高了，这里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1892年以后的条约问题，是强烈要求税权和法权一并彻底修改。对待法权，也不仅是从国民自尊心的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也热烈地提出要求了，税权则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也是求得人民主权完全独立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国民觉悟的这种提高，也是促使自由主义者主张对外强硬的客观因素。

这时，他们企图反对屈服于欧美的政府，保卫国权的完全独立，并通过这个运动来打倒官僚政府。不过，他们把对外强硬的运动同国内的民主运动完全割裂开来，这就意味着把民众的民主革命的要求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去。结果，只能驱使民众去实行山县、品川、谷、三浦等人所操纵的反民主的国权运动和诏书里所说的“兼六合而掩八紘”的八紘一宇的侵略主义了。尽管对外强硬是一个反政府的运动，政府被攻击为对外软弱，然而对外强硬的最大理

论家陆羯南却保证说：“所谓政府只意味着内阁，并不包括陆海军在内”（《我远东问题的起因》）。陆海军中强硬派的陆军首脑，却同被集中攻击为奉行“软弱外交”的陆奥宗光外相在幕后紧密合作。

在革命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外强硬的主张是与国内改革密切结合着，隐藏在国内改革的背后。革命的自由党解散后，在旧自由党党员反对井上外相的条约修改方案的运动中，对外强硬的主张也是结合减轻地说、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作为第三种要求进行斗争的。正因为如此，它既不是攘夷主义，也不是侵略主义，而是旨在完成国民独立的运动。

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天皇的国权主义代替了民众所要求的真正的国民主义。使民众为了“对外强硬”而激昂起来，正是最理想地完成了天皇制发动中日战争的政治准备，但也是一个政治危机的顶点，走错一步，就足以使天皇制分崩离析。这样说虽然似乎有些矛盾，但是这个运动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国粹主义者或议会的在野党的运动了。由于它已经吸收了广大的民众，也许有朝一日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天皇政府不得不镇压它自己放火引起的这个运动的理由，就在于此。同时，它对战争已经不能踌躇不前了。

1893年12月，政府解散了第五届议会，同时下令解散大日本协会。对此，驻伦敦的青木公使写信十分称赞陆奥外相说：“此后惟希断然下定决心，努力挽回和维持天皇的大权，不胜切盼”（1894年2月9日）。陆奥在回信里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作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但是，又不能无故掀起战争，唯一的目的只有修改条约”（3月27日发，清泽渊《外交史》、《现代日本文明史》三）。所谓不能“无故掀起战争”这句话，正好说明他正在如何寻找战争的外交借口。（作战方面的准备，这时已经完全做好。）在不到三个月以后的6月5日，日本下了动员令，

设立了大本营。这是清廷把出兵朝鲜通知给日本以前的事情。

甲午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由于完成国民独立的斗争同对天皇制的民主斗争被割裂开来，结果它被天皇制的国权主义巧妙地给偷换了。象甲午战争这种彻头彻尾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竟受到内村鉴三这类人民中最爱和平主义的人的支持，受到当时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这类人的支持，而且还仿佛被称作正义的人民战争，而没有发生日俄战争当时的那种反战、厌战的斗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国民主义已经被国权主义给偷换了。

甲午战争以日本的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开始，以日本的彻底胜利而结束。战争一开始，对天皇政府的一切攻击就马上停止了。在“征讨和惩治清廷”的“举国一致”的大合唱声中，政府危机和社会不安都暂时消除了。战争的结果，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地位被推翻了，朝鲜被承认“独立”了。这意味清廷承认日本代替它登上朝鲜宗主国的地位。日本还从中国割取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夺取了库平银二亿两，折合日圆约三亿日圆的巨大赔款。这笔赔款抵偿日本的战费二亿二千五百万日圆还有余。根据日中和约，以及附带的通商条约，日本不仅强迫中国签订了和欧美各国一样的不平等条约，还取得任何国家从未取得的特权——日本可向中国市场自由出口商品，并从中国自由进口原料资源的许多特权，以及使日本工业资本侵入商埠商港的特权。

这样，天皇制发动的甲午战争，似乎收到超出预料以外的成果。既取得对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也取得了金钱和领土，还取得了不仅是商品市场而且还有资本市场。众所周知，辽东半岛因为三国干涉马上就放弃了，作为补偿，日本取得了四千五百万日圆。

日本资本主义从这次战争起，有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那么，

驱使天皇制发动战争的各种矛盾，是否因此而完全解决了呢？不是的。那些矛盾却以新的规模、新的形式，加上新的因素进一步发展起来，十年后，迫使天皇制不得不掀起规模更大的、带有新的性质的日俄战争了。三国干涉和明治天皇对三国干涉所说的上述的话，以及向国民提出的卧薪尝胆的口号等等已经暗示了这次战争。

##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 和农业的变化

### 第一节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争和它的辉煌战果使日本资本主义有了飞跃的发展。

九个月的临时军事预算是二亿五千万日圆，相当于当时经常岁入两倍以上。这笔巨款是靠税收和发行以税收为担保的公债、以及向日本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的，实质上是由劳动人民负担的。开战后不久，8月18日，渡边藏相为发行第一次军事公债，召集各大银行行长“训话”，要求“各银行和它有往来的资本家和富翁商议”，协助政府。11月发行第二次公债时，他又断言“为使当局达到全局目的的责任完全在于一般人民，特别在于资本家和富翁肩上”，但实际上一切负担全都落在普通人民身上。“资本家和富翁”非但没有负担，反而由于政府支出战费、购买军需品而赚得大笔财富。例如，银行对缴足股本的利润率（公积金和纯益的合计），开战前一年即1893年是百分之四十七，1894年是百分之五十，1895年是百分之五十一，1896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三。陆军的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在军需罐头中掺杂石块、贪图暴利的故事，是很有名的。甲午战争时任第一旅团长的乃木少将，因为痛恨在罐头内掺杂石块，据说，在他任台湾总督时，曾反对大仓组在台湾设立支

店(《大仓根津康采恩读本》)。虽然据大仓及其他资本家的代言人说,掺杂石块并非事实,但大仓及其他大资本家所取得的暴利,可以说等于把石块当牛肉而骗来的。另一方面,民众遭受的掠夺,“不亚于德川时代的征收军费”,有些小农甚至被迫出卖田地,也得购买军事公债(高桥是清《自传》)。

由于从战争中攫取了暴利,并刺激了生产,同时又获得了战争赔款的大笔资金、广大领土和市场、以及用“卧薪尝胆”的口号,牺牲民众利益,一次又一次地扩充军备等等条件,政府和大政商领导下的现代产业开始建立起来了。1894年,首次施行了商法。根据这个商法规定,该年成立的公司总数为二千八百四十四家,缴足股本总额是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圆。截至日俄战争开始时的1904年,公司数为八千八百九十五家,增加三·一四倍,缴足股金为九亿二千一百万日圆,增加三·八倍<sup>①</sup>。

这些公司从营业种类看来,“商业”公司的数目和资本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发展的速度也很快。这里所说的“商业”,包括“银行”及其他金融业,而它们的数目和资本额(特别是资本额)又在“商业”公司的总数和总资本额中占压倒的比重。1894年的银行资本为一亿零一百万日圆以上,达工业公司资本四千四百五十九万日圆的约二·三倍。到1903年,银行资本为三亿七千四百六十九万日圆,达工业资本一亿七千一百六十九万日圆的二·一倍强。

就商业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在公司总资本的增加过程中占很大比重这点来看,似乎甲午战争前的倾向在战后仍然继续着,但是它的内容与战前的情况显著不同。就是说,银行资本虽然仍具

<sup>①</sup> 根据内阁统计局《企业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第一章的数字。然而,关于这种简单事项的数字,各方面的统计都多少有些不同,到底哪个正确,无法知道。总之,关于日本经济的统计,连一个精确的都没有,这是顺便谈谈的。象最近出版的总理府统计厅第一次《日本国统计年鉴》,就有多得无数的错字,并附着勘误表,然而还存在着勘误表上没有列出的很多错字,这类错字,简直是统计表的致命伤。

有战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性质，但同时又表现出走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倾向。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即银行数以 1901 年的二千三百五十九家为顶点，以后逐年减少；另一方面，银行的支行有了显著增加。这就是说，资本的集中已经开始了。同时，银行对产业公司逐渐具有控制力，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工业资本的资本额虽然没有银行资本多，但它的发展最迅速，这从上述的公司数和资本金的数字上也可以看出。尤其是工业资本的精华——工厂工业的发展最显著。1893 年每天平均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总数是三千零一十九家，其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是六百七十五家。到 1903 年，工厂总数增加到八千二百七十四家，其中三千七百四十一家使用原动力。纺纱的发展最快。1893 年实际锭数是三十八万二千锭，到 1903 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万锭，资本从一千一百二十七万日圆增加到三千四百四十六万日圆。

就连纺纱业这种零星家庭工业量最强的工业，也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机器纺纱超过了手工纺纱。各种工业的生产量都有飞跃的发展，其中以棉纱的产量为最。在造船和机器制造业方面，民营的三菱和住友等其他公司也从甲午战争后逐渐成长起来。在这方面，划时代的事件，是 1901 年国营八幡制铁所投入了生产。

煤虽然勉强够用，但缺乏铁，这是现代工业的重大弱点。尤其对军国主义的天皇制来说，军火生产不能独立，是致命的缺陷。因此，政府从甲午战争前就每年向议会提出创办国营制铁所的预算，但每次都被否决了。到了甲午战争中的第八届议会，才由议会积极要求政府尽速设立制铁所。1896 年 3 月，公布编制，以创业费一千九百二十万日圆的巨款建立了八幡制铁所。使用的矿砂，原定用国产矿砂，后来乘甲午战争的胜利，于 1899 年 4 月，政府与中国大冶铁矿订立每年购买矿砂五万吨的合同，期限是十五年。大冶铁矿原是德国技师发现的，德国对该矿的势力很大。因此，日

本政府订立上述合同时，曾和德国势力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当时，德国对清廷提供利率四厘的四百万圆借款，企图垄断大冶的权利。日本政府为了对抗德国，于1903年11月（日俄战争前夕），通过兴业银行强行借给中国三百万日圆借款（年利六厘，期限三十年），并订立合同，规定在上述期间“大冶铁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列强，也不得出卖矿石”，“日本方面也不得购买别处的矿砂”。“但是，我国的借款比德国的借款数额既少，利率又高，所以交涉非常困难。结果，由于强调同文同种、日中亲善的根本大义，才取得成功”（《世外井上公传》五）。不消说，在这个“同文同种、日中亲善的根本大义”之外，还有一个“根本”，那就是二十万陆军和拥有二十六万吨军舰的海军起了作用。以这种办法建成的八幡制铁所，创业第一年就生产出国内钢铁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三的钢铁，钢材占百分之八十二，后来，它一直在日本制铁业界首屈一指。

铁路的营业英里数，从1893年的二千零三十九英里延长到1903年的四千四百九十四英里，即延长到二倍以上。海运方面，从1893年的一十一万吨轮船增加到1903年的六十五万六千多吨，即增加了将近六倍。这不仅与出口贸易的跃进分不开，同时也是政府为加强战时运输船队，从1896年根据“航海奖励法”加以大力维护的结果。

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很显著。1893年出口总额约九千万日圆，1903年增加到三亿一千五百万日圆。大宗出口的，虽然仍是生丝，但它的比重逐年减少，棉纱渐渐占重要地位。甲午战争后，棉纱每年的产量，将近百分之三十出口。棉纱和棉制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是：1897年百分之十点二，1902年百分之十点五，日俄战争胜利的1905年增加到百分之十九点五。这些棉纱和棉制品几乎完全出口到中国和朝鲜。1897年，棉布棉纱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而在对朝鲜的出口总额中占



百分之四十一，1902年，前者是百分之四十一·七，后者是百分之三十七·八。因此，棉纺织业占据了“我国对外国工商业战争中的中坚和主要”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工商业战争的主要战场，当然指的是东亚大陆（三瓶孝子《日本棉业发达史》所引《明治二十九年工学会临时大会记事》）。

1897年10月，日本实行了金本位制，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显示了自己发展的指标之一。是靠从中国取得赔款而有了黄金准备的。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日本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各个部门中，特别是在轻工业方面建立起来了。

## 第二节 农业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和农业也逐渐加深了影响。从1870年起至日俄战争前后为止，农户总数的绝对户数有了细微的减少，因而农业人口对总人口的比率很快地减低了。1873年农民总户数是五百六十四万户，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六九，1891年减为五百四十八万九千户，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二，1903年减为五百三十五万九千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零七（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六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神户）人口的增加，非常显著，1886年是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人，1903年增加了两倍多，达四百零九万四千人（《明治大正国势总览》）。

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对农产物需要量的激增，这就促进了农产物的商品化。从地税改革以后，农产物的商品化部分，不由地年年增加。远在甲午战争前的1888年，根据政府的调查，象大阪府这个拥有大城市的行政区，全部农

产物中尚有百分之五十运出府外，如果把卖给大阪市的农产物也算在内，商品化的比率当然要比这个输出率更高了（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一）。

农业方面的情况由于地区差别很大，不能以大阪的例子来推论全国。但根据同一调查书中所举的几个县的产米额、向县外运出或由县外运入的数字来看，当时农产物的商品化部分在近畿地方和西南地方可能达百分之四十，东北地方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地主出售的佃米，以及小农忍饥出售自用大米也对稻米的商品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有一定的限度，除非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稻米的商品化是不会超过一定程度的。很久以后的1930年，商品化的稻米，全国平均也不过占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上下。所以，决不能单凭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断言，日俄战争前，商品化就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但是，当时寄生的地主制度还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农村的现金支出处在急剧增长的时期，因此可以想象，稻米的商品化可能也相当进展了。与这种情形互为因果，水稻的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都有较为缓慢的增加。

每五年平均水稻播种面积、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表

年 度	播种面积	指 数	总 产 量	指 数	单位面积产量
1878—1882	2,548 千町①	100.0	29,812 千石	100.0	1,169 石
1883—1887	2,677	102.7	33,785	113.3	1,291
1888—1892	2,736	107.4	38,860	130.4	1,420
1893—1897	2,775	108.9	37,673	126.4	1,358
1898—1902	2,836	111.3	42,479	142.5	1,497

（备考）根据农林省累年统计表。引自渡边信一《日本农村人口论》。

随着生产的扩大，锄和犁等农具的改良，特别是犁的普及，以及中耕除草器“太一车”的发明（1891年，这种除草器的绰号叫作

① 一町=99.18 公亩。——译者

气死日工,当时发挥了划时代的效率),肥料的使用量增加了,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从满洲进口廉价的豆饼,压倒了鱼肥,当时化学肥料也渐渐普及,虽然数量不多,1900年进口硫酸,开始使用。此外,在政府大力奖励下,实行公共秧田和直线插秧等,技术也有了或多或少的改良(山野武夫《农村史》)。

旱田作物由于日本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来往,起了激烈变化。长期以来的技术作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几乎全都减少了。首先是棉花。数以万计的零散农户种植的国产棉花,因为质量不匀、价格昂贵和难以大量收购,不适于用作大机器工业的原料,也不能和国外棉花竞争,并因为棉花手工业的废除,它的生产也减少了。尤其是1896年,棉花进口税在纺织资本的压力下取消以后,棉花很快就不种了。大麻由于马尼拉麻的进口,叶蓝由于印度蓝的进口,都从二十世纪初趋向减少了。此外,菜籽、砂糖、大豆等,凡是同外国农产物或工业品发生竞争的东西,不是不种了,就是少种了。粮谷方面,如农家自用的谷子、稗子等的种植也稍稍减少了。另一方面,城市近郊的蔬菜和各地的马铃薯、甘薯的种植,却激增了。新的技术作物——制造啤酒用的大麦和除虫菊的种植,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渐渐发展起来。苹果、桔子、桃等果实的栽培,作为商品生产,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是在日俄战争后才正式成长起来的。参看我妻东策《农村产业机构史》)。

这时,发展最猛的是养蚕业。桑园面积若以甲午战争前五年平均为一百,则日俄战争前五年平均为一百二十六点九,此后更加上升。当然,蚕茧的产量也随着增加了,但和蚕园面积和蚕茧产量的规律性增加相比,养蚕农户数目的增加却是不规律的,而且增加速度也稍缓慢。

随着这些情况,手工缫丝、特别是小规模家庭工业确实逐年减少了。神山茂夫根据这些现象说,养蚕业的发展就是“出现养蚕专

年 度	桑园面积指数	蚕茧产量指数	养蚕农户指数
1889年	100	100	100
1900年	173	232	132
1909年	198	305	133

(备考)引自神山茂夫《日本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达》。

业农家、促进所有养蚕农家的分化”的过程。可以想象，从1900年起，这种过程慢慢地开始了。

农产物商品化的发展，商业性农业的逐渐成长和旧有家庭手工业的消亡，大大地破坏了农民的自给自足经济，说明农民和农业深入而又广泛地被卷入了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的个人生计也引起了很大变化。从甲午战争到明治三十年代，除普通粮食谷类以外，肥料、煤油、盐、烟草、酱油、酒等日常用品，不仅几乎都要花钱购买(中略)，其价格也非常昂贵，绝非米谷的价格上涨所能相比。此外，子女的教育及其他社会交往亦需要很多费用。现在如果仍按日本古来的农业方法，专种水稻势难维持生计，所以一般都无暇顾及将来的后果，只顾搞现款收入较多的行当了”(1911年，斋藤万吉《实地经济农业指针》)。这里所谓“现款收入较多的行当”，指的是商业性农业，代替原来家庭工业的新的季节性零工和其他工资劳动，妇女到纺织工厂和缫丝工厂去做工，或新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各地方不同的各种所谓“农家副业”。这样，贫农、小农就逐渐走上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中农上层变成小商品生产者了。

前面引文中说，米价的上涨赶不上农民购买物品价格的上涨，这点从下列表格看来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一般物价确实上升了，而米价的涨落则因年成和季节的不同大有出入。因为农民出售的价格，经常被人压价，比市场价格低得多，所以小农可能痛切地感到米价和一般物价的剪刀差的打击。但对地主来说，情况并

不是这样(寄生地主与耕种田地的农民不同,他们不会因为肥料和其他的涨价而受到打击,相反地,他们会因米价的上涨而获利)。

一般物价与米价的指数比较(1894—1903年)

年 度	一般物价	米 价	年 度	一般物价	米 价
1894	100	100	1899	136	113.5
1895	107	100.8	1900	145	140.2
1896	115	108.4	1901	139	143.9
1897	128	133.9	1902	140	163.9
1898	135	166.8	1903	148	150.2

(备考)一般物价指数根据日本银行调查的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米价指数根据东京米市场一石平均行市算出。

其中,农民自己耕种水田的劳动“工资”,可以断定有一些增加(这个工资是在自耕时,从收入中减去种籽、肥料、捐税、杂费等费用,除以自己的劳动日数而得出的;若是佃农,便从收入中减去佃租、种籽、肥料、杂费等费用,除以自己的劳动日数)(斋藤万吉《日本农业的经济变迁》)。

耕种水田时自己劳动的“工资”

地 域		1890年	1899年	1903年
关西① 17村平均	自耕地	33钱	50钱	66钱
	佃耕地	14	26	40
东北② 15村平均	自耕地	20	30	34
	佃耕地	14	22	29

上表的工资上升率比同期内的一般物价上升率或东京市各种手艺人的工资的上升率都高,因此这个材料是否可靠,不无疑问。尽管这样,自耕农“工资”向来比同一地区的普通农村工资较高却

① 关西是大阪、京都地方的总称。——译者

② 东北是福岛、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六县的总称。——译者

是事实，如果联想到米价上涨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那么上层自耕农（中农）的劳动收益有某些上升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尽管农民生活在质的方面与以前一样，仍然极其贫困，但在这个贫困的范围内，在量的方面“多少有了一些提高”（渡边信一前引书）。这一点在前面的引文中的“子女的教育及其他社会交往”的费用增加上也反映出来，从小学的就学儿童来看，甲午战争前的 1892 年，他们只占全体入学儿童百分之五十五，而到日俄战争前的 1902 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二了。

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这样渗透到农村和农业之中，但农业的半封建结构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化。农产物的商品化并不等。农业生产马上就发展成为商品生产。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农民阶层分化的情况下，小农和贫农有半无产阶级化的倾向，中农上层因为技术作物和养蚕的发展而有变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倾向，但是这不过是局部的萌芽状态；这种分化由于寄生的地主制度和天皇制权力的压迫不断受到阻碍。

虽然自耕农本身的劳动“工资”有了某些增加，但远远赶不上用作不断扩充军备的财源而日益加重的间接消费税和地方税的迅速增长。即便他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一些提高，但与当时的一般财富的增长相比，可以说，农民的生活愈益相对地贫困化了，这两点毫无矛盾，事实上自耕的小农仍然面临着丧失土地、沦为贫佃农的危险。据《农商务省汇报》第十三期《土地所有权移动状况》（数字从略）来看，拥有不满一町的少量耕地所有者逐渐沦为无土地者，相反地，拥有三町以上的人，特别是拥有五町以上的地主则逐渐增加了。两者之间拥有二町上下土地的所有者阶层比较稳定。然而，这个阶层的变动虽然没有在数字上表现出来，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稳定的。在上述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动荡时期，善于适应新发展的人，都变成了富农或寄生地主，其余

的人都贫困了。这种变化动摇了农村，因此“保护农民”成了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的重大问题。

对佃农来说，水稻的增产并没能改善他们的半农奴地位。由于农民斗争的结果，佃租率有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佃租的绝对量却增大了（渡边信一，前引书）。

大米的商品化导致了米商对质量、重量、包装等的检查。1898年滋贺县和山口县的米商公会对收购的稻米施行检查，可以说是正式米谷检查的开端。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地主对于佃米的检查，实际上是由替地主服务的组织——郡和村的农会担任这项检查工作。从1900年前后起，开始了这种米谷检查。后来由于地主活动的结果，实行了由县强制检查的办法。1901年大分县经办的检查是这种检查的开始。这对佃农来说，是地主加给他们的新增加的剥削，对自耕小农来说是商业资本所对他们进一步的残酷掠夺（奥谷松治《近代日本农政史论》）。

由于旧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崩溃，现在不论多么小的农业，没有现款就无法经营。但这种资金在农村里是不容易得到的。1896年成立劝业银行和府县农工银行，据说目的是以不动产为抵押贷放长期低利资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的改善。然而，中央的劝业银行自不必说，连府县农工银行也并没有成为小农的金融机关。这是因为贷款要以土地为抵押，而小农的小块土地大都已抵押出去；即便没有抵押出去，他们的信用也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农业本来受到寄生地主制的压力，根本不能成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所以尽管对土地可以贷款，但资本不能流入农业（近藤康男《日本农业经济论》）。

这些银行在农村里变成大地主的金融机关，地主借到低利长期的大笔资金后，把它投入农业以外的企业，或以高利转贷给小农民，从中牟利。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银行发行银行债券，农村的资

金越发被吸收去了。1900年施行产业合作社法，信用合作社作为小农的金融机关出现了。信用合作社也和上述情况一样，把农村中的零星资金也吸收过来，通过购买债券和股票的形式，促使农村的资金逃避到农业以外的方面去了。总之，不动产银行也好，信用合作社也好，它们不过是城市资本和同它勾结的大地主对小农进行剥削的一个新的机构而已。因此，小农的金融，绝大部分依靠高利贷——地主、肥料商人、米商或专业的高利贷者。

从产业合作社法施行以后，各种的购买合作社和贩卖合作社纷纷在各地出现。虽然时而成立，时而解散，但数量逐渐有所增加。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合作社的成立是为了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只能对逐渐发展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上层中农有利，对小农即贫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同时，这些合作社的发展每每遭到农村中的商人兼地主的阻碍，或者变成他们控制下的机构。“农会法”也与产业合作社法同时施行了。农会规定，只限于拥有法定地价四百日圆以上的土地（平均约合120公亩余）的所有者可以入会。这显然是地主和上层中农的机构，国家和乡村都对它给以补助金和其他保护，使它与各种产业合作社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改良”。这种“农业改良”也就象上述的米谷检查那样的东西。

产业合作社法和农会法，特别是前者，在草拟这些方案的官僚们的心里，主现上是为了保护小农，这个提案在议会中引起了大辩论。不赞成的人指责说，这是一种否定经营自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案，而提案者政府方面则认为只有依靠这些法案才能防止农民的社会主义化（辻诚《日本产业合作社史讲》）。然而，这些法案实际所起或能起的作用却与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一样，是为了防止半封建的农业被资本主义拿跑或摧毁，援助地主阶级使之易于适应资本主义，用来捍卫天皇制的固有基础——寄生地主制，同时援助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特别是大地主越来越富有，加深了他们的寄生性。同时，他们购买股票，有的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和工业资本家，还有的地主身分成了次要的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大地主了）。所谓“地方财阀”，大都指这类人。从这类人中间特别发展起来的，有冈山县仓敷的大原家，信州的片仓家，名古屋的伊藤家（即松板屋）等等。另一方面，也有象甲州的若尾这类大资本为了多收佃租而购买土地，成了在外大地主。这种人加上原来的地主迁到城市，致使甲午战争后在外地主逐渐增多了（前引《土地所有权移动状况》）。1901年日本全国拥有五十万日圆以上的资本家，据报载（9月23日的《时事》）有四百四十一人。其中八十八人（百分之二十）的身分属于“农业”、“林业”或“大地主”。此外，还有旧诸侯华族六十三名（百分之十四点二），他们也是大地主。还有“贷款业”、“造酒业”，也大都是大地主，因而“富翁”的过半数，是大地主或者是身兼大地主的人。资本家就这样同地主紧密结合起来了。身兼超大地主和超资本家的富翁，那就是天皇家。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他的臣下的“富翁”们的理想的代表人物。

###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早产和对大陆的野心

资本主义的渗入农村和大小地主富翁的逐渐壮大，意味着资本从农民身上不断吮吸财富以积累新资本，使农民变为负债的奴隶，从而使相对的过剩人口不断停留在农村里面。这样，即使地主有可能从那些连一小块土地都要争夺的佃农民身上剥夺更高的地租，又使资本家有可能获得足够用的被迫忍受超低额工资的劳动力。因为资本家能够用低工资役使工人，所以即使各种工业发展

了，资本家也不肯相应地增雇工人，这就不能消除农村里相对的人口过剩现象。这种循环，看来对寄生地主制和资本主义仿佛都有利。但是，这里面却暗藏着尖锐的矛盾，它对地主和资本家以及驾乎两者之上的天皇制都将进行残酷的报复。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这点明显地反映在前节所引有关资本主义和农业发展的各种数字上。因此，日本的农业甚至连因资本主义发展而激增的粮食需要都不能满足。1890年前，尽管是忍饥出口，稻米的出口还是超过了进口。从甲午战争前夕起，转为入超，1900年前后，已经入超一百四十万石了。从日俄战争开始前的1903年起，入超陡增，达到五百六十万石，入口大米不得超过国产稻米总额的百分之十。

于是号召增产国内粮食是当务之急。前述各种措施就是响应这个号召，但是丝毫没有收效。1900年制定“耕地整理法”，奖励土地改良。但是，零星的耕地分散得归好多人所有，即便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分散成无数的地段，而每一块土地的利弊情况又都千差万别，所以，彼此交换土地、分并和整理，即使如何发动天皇政府的强权，只要不否定地主制，就难以办到。因此，这项法律施行十年以后能够整理的土地只有四万二千六百町步，还不到同年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八，水田的百分之一点六。

第二，双重的剥削每每破坏农业生产力。品川内相在1891年的议会上抱怨说：“不是大风就是海啸，这个国家真是天灾最多的国家”。第一章谈到的1889—1890年大荒年后，1900年又是荒年，接着1902年东北地方又发生霜害及东北、关东、中国<sup>①</sup>的大风水灾，造成超过德川时代末期的大歉收。东北地方出现了数十万贫民和大批饿死者。自诩铁路发达迅速和行政机构特别完备的日本，却出现了饥饿者的矛盾，其实，一部分原因正是这个铁路和官

<sup>①</sup> 指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等县。——译者

僚机构造成的。1905年，东北地方又发生比三年前更大的荒歉。因日俄战争而农村受到破坏，也是重大直接原因之一。土地荒芜，国内市场急剧缩小，引起并促进了经济危机的深刻化。甲午战争后首次的1897—1898年经济危机和1903年的萧条，也都受了上述荒年的影响。

第三个矛盾现象是：大企业必然要破坏家庭工业和小企业，同时还必须要保存家庭工业和小企业。例如伊予花布<sup>①</sup>的生产，1900年前后作为“农家副业”很兴盛，“使佃农也有了施肥的余力，对农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常常因为佃农反抗地主的的关系，有时副业与本业有颠末倒置之虞”，寄生地主制受到了威胁。因而致使县和村的当局决定：“应该慎重的是，必须坚持作为副业来奖励它发展”。伊予花布的生产终于没有超出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范围，这不仅是由于上述地主阶级的有意识的抵制，也由于地主制已经制造出大批的过于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与其投入大笔固定资本实行机器工业化，还不如利用手工业形式目前对资本有利。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冈山县的花草席和麦辨的生产，在甲午战争时已经要变成工厂工业，但结果倒退为家庭手工业了。除上述两个例子以外，在前引渡边信一的书里还有另外的几个同样事例。

寄生地主制阻碍现代工厂工业发展的最大事例，是缫丝业。缫丝业整个来说，是日本最大的工业之一。从富冈缫丝厂的建厂就可以看出，政府早就奖励了缫丝业的工厂工业化。然而，手工缫丝势力大，直到甲午战争后，机器缫丝才超过手工缫丝。后来三井、片仓等财阀通过在各处新建或收买，扩充了缫丝厂，出现了三百口至四百口锅的制丝大工厂。就全国平均来说，一个工厂的锅数，日俄战争前，最高是五十九口锅，每口锅的产量是四十八斤，规模还

<sup>①</sup> 爱媛县松山市附近出产的一种织花棉布。——译者

很小，生产率很低。同时，虽说是“机器缫丝”，但工序的基本部分仍旧不是机器而是手工。就一般倾向来说，机器缫丝在发展，不过也常常受到挫折。原因是：(1)使用高价机器比使用低廉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成本要高；(2)原料蚕茧要依靠数十万农户的零星生产，质量不一致；(3)收购机器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料蚕茧比较困难。因此，甲午战争前 1893 年占缫丝业总锅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机器锅，战后减到百分之七十以下。日俄战争时，减到不足百分之六十（森喜一《日本工业构成史》所引柳川升《缫丝业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三井财阀等的超级大资本虽然接收了政府出售的富冈缫丝所，开始经营大规模的缫丝厂，但在 1902 年“认为缫丝业是可以用小资本经营的企业，不屑与小资本竞争”而逐渐从缫丝业撤手了（9 月 6 日《报知新闻》）。这是因为三井认为象缫丝这种企业不如让那些与农村有直接联系的地方资本家去经营，让他们封建而残酷地使用农民劳动力，自己则通过贷款或经办出口从中剥削一层利润较好。“缫丝大王”片仓的事业，从 1900 年前后起有了显著发展。地主出身的片仓，利用他在缫丝方面赚得的资金购置了内地、北海道、台湾、朝鲜的土地和山林（《日本康采恩全书》十七）。他所以能够成了缫丝大王，看来是由于他轻易也丢不掉地主意识。

早在幕府时代末期，各地已经出现工场手工业的丝织业，也是由于寄生地主制的阻碍而未能机械化。同样，棉纱的生产虽然作为高度的大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棉纺织业一般都难以超出零星的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不仅上述伊予花布如此。纺织联合会于 1905 年反对政府制定纺织品消费税时指出，如果一经征收此税，将有“三十三万家织户和实数八十万的工人”都将丧失生计，原料棉纱的需要将为之断绝，纺纱业者必将陷于困难。纺纱业的大资本只有建立在半封建式地剥削中小或零星棉织业的基础上才能够存

在下去。政府在面临日俄战争时，急需普遍发展现代的大规模工业，曾加以提倡，但却不得不承认：“我国纺织工业，大体上尚未摆脱手工操作的家庭工业的范围，这是因为人口过剩、工资低廉的缘故，这种状态不应突然加以扭转”（1904年清浦农商务相在大日本织物协会总会上的讲话，《伯爵清浦奎吾传》）。

保存零星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并利用它来进行封建性剥削，固然使大资本获得了一定的超额利润，但是，就整个资本主义来说，这里就隐藏着相应缩小它的发展范围，并削弱它的基础的矛盾。

第四，日本的垄断金融资本是在前面三条所述的那种薄弱的基础上过早地萌芽的。大资本是靠国家从农民身上掠夺得的税款和对军事警察装备的需要培植起来的。它靠寄生地主和高利贷所剥削的封建佃租，增加了资本的积累，通过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以及产业合作社吸收农村的零碎资金，并进一步剥削本未就已经剥削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中小零星工业，它本身还直接掠夺工资极低的工人，这些全部剥削都受到绝对主义权力的大力保护。早在1900年，它就从初期的政商的垄断阶级，原封不动地走上形成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阶段。私营铁路方面的日本铁道或山阳铁道、九州铁道等的三菱资本，海运方面的日本邮船、东洋轮船、大阪商船和轮船制造方面的三菱（在长崎和神户）、石川岛、川崎等的绝对垄断，根据国家军事上的需要，受到特别保护而排除了其他企业的竞争。机器工具制造根本就是需要大资本的企业，因此，从开始发展时起，就被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垄断了。采煤矿业方面的三井和三菱、金属矿山方面的住友和古河以及晚些时候的三菱等，也在日俄战争前控制了日本最好的煤矿和矿山，为它在战后垄断打下了完整的基础。

在大企业中有比较自由竞争的纺织业方面，也是以三井和其

他特权政商投资的大阪、天满、钟渊、尼崎等为首的几个公司在同业中占据了压倒的优势。1899年，纺织公司多达七十八家，但从第二年起，公司数目开始减少，1904年减为四十三家，日俄战争后的1912年减为三十二家，其间纺织资本和生产锭数的总额有了显著的增加，从1899年的三千三百万日圆、一百一十七万锭增加到1904年的三千四百七十万日圆、一百三十万锭，1912年又增加到六千六百万日圆、二百二十一万锭，大约达到1899年的两倍。由此可见资本集中的程度。

如前所述，在日本资本主义中，银行资本（开始是半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转化形态）走在其他工业资本前头，这就是说，一开始就加强了工业对银行的依赖。在银行方面，1901年末，六大都市加入银行公会的银行一百七十余家之中，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和正金等八家银行的存款总额占有所有加入银行公会的银行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一，按当时的经济杂志的说法，全国存款总额约五亿日圆之中，大半或三分之二集中在十几家银行手中，其他二千余家银行的存款只占三分之一上下（大冢金之助《资本积累和经济恐慌》）。大银行通过经济危机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在前引大冢的书中可以看到，1897—1898年和1900—1901年经济危机时的这种实例。如果同大银行闹对立，大工业资本也要碰壁。例如1897年钟纺<sup>①</sup>和中央棉纱纺织同业会所属二十六家公司发生争执时，三井银行拒绝对这二十六家公司及其有关个人给以贴现和贷款，严格催取到期的贷款，致使二十六家公司陷入窘境。这场争执最后经日本银行总裁岩崎弥之助调停，在对钟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了（《报知新闻》）。这也是大工业资本与大银行资本加强联合，压制其他同业的一个情况。

这样由封建高利贷起家的三井和安田，除了银行和其他金融

<sup>①</sup> 即钟渊纺织公司，是三井的资本。——译者

业以外,还经营工厂、矿山、铁路、海运等企业,或控制这些企业的股份。三菱和住友虽然最初并没有经营金融业,但在甲午战争前后也有了自己的银行,到日俄战争前夕,它们已经在金融界和主要工业的一切部门中形成了发挥威力的垄断体系——四大财阀。古河、大仓、浅野、澁泽、鸿池等财阀也紧跟着成长起来。这些都是特权政商,所以也越发受到天皇制权力的保护。这种保护有的是采用已往的各种补助金形式,在铁路、海运、造船、糖业等特殊部门受到政府的直接保护。但是,一般则是通过日本银行、劝业银行、正金银行及其他政府控制的特殊银行贷款的操纵,或者通过政府用品的买卖或者通过其他“奖励产业”的各种政策来实行。这些保护,与其说是国家给与特定人物的,毋宁说简直是大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一种强迫勒索。甲午战争后,各方面责难“金权政治”,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第五是经常性的资金缺乏。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及天皇制国家的残酷剥削。剥削来的资金集中在少数垄断大资本家手里,或是变成军舰、大炮及其他庞大的军备,脱离社会生产,因而要扩充生产,就经常感到资金不够,政府苦于财政困难,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从中国夺取了三亿六千万多日圆的赔款,但其中二亿二千万日圆用于扩充军备,八千多万日圆用于偿还甲午战争时的公债和其他善后费,直接用于非军事方面的只有拨归天皇财产的二千万日圆和拨归救灾准备金及教育基金的各一千万日圆,充作新领土台湾经营费的一千二百万日圆(事实上也是殖民地军事费)。

从甲午战争后的 1896 年起,到日俄战争前的 1903 年止,这八年中间,除了 1901 年末和 1902 年以外,每年国家预算支出百分之四十四到百分之五十一是陆海军省的经费。这项庞大的军事开支,肥了大资本家的腰包,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拖延生产资本的积累。八幡制铁所生产的铁,用来作生产资料,完成经济循环,或用

来制造军用品，脱离生产而消失，这对资本积累有很大差别。此外，日本的生产机构所具有的军事的、半封建的性质，使日本的外贸在甲午战争前已经从出超转为入超。这种趋势在战后愈益加剧，造成连年巨额入超，这也促使资金缺乏越发加剧。在利息方面，甲午战前也年年降低，东京市内的放款利息落到七厘二，但战后几乎每年都保持在一分一上下。

工业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这种资金缺乏的情况，常常反对扩充军备。甚至象濂泽荣一那样的政商银行家和官僚中同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井上馨，有时也不得不对扩军表示消极。由于资金缺乏，资产阶级对向台湾投资也表示怀疑。例如象田口卯吉这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断攻击政府在台湾白白浪费金钱（事实上天皇制的台湾经营，大部分是军事上的浪费）（全集第五、第六卷载有他的数篇论文）。这个时期放弃台湾的主张很热烈，甚至有人主张以一亿元卖给法国（《后藤新平》二）。日本为了确保对朝鲜的政治优越地位，曾不惜进行战争，但当井上馨为了“改革”朝鲜（其实是使朝鲜完全变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以朝鲜作为进攻大陆的基地）出任公使的期间（1895年），要求借给朝鲜五百万日圆贷款时，实际上只拿出了三百万日圆。

资产阶级和政府殷切希望吸收外国资金作为弥补工业资金不足和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但是，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金本位制，而日本实际上是银本位，对引进外国资本有很大的阻碍。政府认为日本早晚必须采用国际通货的金本位制，乃于1893年设立了“货币制度调查会”进行研究。甲午战后，因为从中国攫取了巨额赔款，拿它来备置黄金准备，才于1897年10月实行了金本位制。但是，“金融界的巨头”濂泽荣一（第一银行）和正金银行行长原六郎，以及依靠同银本位的中国进行交易的纺织联合会、大仓喜八郎或理论家田口卯吉等人，总的说来，工业资产阶级都一致反



对。就连一向在政府与金融界间起联系作用的井上馨，最初也是不赞成的。因为从工业资本的立场说来，这时采取金本位制对出口贸易非常不利。然而，政府之所以毅然实行了金本位制，主要是为了“便于在海外发行公债”(田口卯吉)，也就是说，为了迅速开辟引进外国资金的道路。澁泽荣一后来回想当时说：反对金本位制，完全是出于“短见”，日俄战争时“日本如果不是采用金本位制，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比澁泽更有先见之明，只是为了引进扩军资金，即便暂时牺牲工业资本的利益，也必须实行金本位制(《青渊回顾录》上，《原六郎翁传》中)。

金本位制完全实行后的 1899 年，政府马上募集到约一亿日圆的外债。1901 年秋，桂小五郎内阁曾想在美国募集外债，但是那次失败了。

最后是痛感国内市场狭窄。以上第一到第五的现象起着互为因果的作用，因而国内市场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相比，显得仍然非常狭窄。获得海外市场的要求就不得不加强了。发展出口贸易，对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和资本主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出口商品中的对美出口的生丝，限于国内生产条件，发展速度很慢。只有向中国和朝鲜市场出口棉制品和杂货，是唯一的希望。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商品得以充斥中国市场，同时也使日本资本主义的命运绝对依靠中国市场了。对中国的出口从 1899 年以来，占日本出口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占生丝类以外的出口贸易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对华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1896 年进出口总额为三千五百万日圆，五年后的 1901 年增到二倍，即七千万日圆，1902 年达到八千五百万日圆。其中出口的增加速度更快，从 1896 年的一千四百万日圆增加到 1901 年的四千三百万日圆，计增加到三倍多。在这期间，日本的贸易总额几乎没变。对华出口的货物，大半是棉

纱，“只要十七万包到二十万包棉纱的出口稍一不振，就使国内纺纱业发生极大困难”（榎本奇策《输出棉织物》1903年）。对华出口的棉纱中，百分之四十以上运往胶州湾以北和中国东北。中小企业生产的棉纱的出口，根据日俄战前三年的平均数，百分之六十九以上也运往朝鲜和华北。

中国不仅是日本的出口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原料资源地。只要回想一下当时的大冶铁砂、东北的大豆和豆饼对日本具有的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亚洲大陆的重大经济意义，资产阶级及和它有密切关系的官僚自不必说——这恐怕不需要举例了，就连山县有朋这类官僚军阀中最封建的一派的巨头也逐渐认识到了。山县在1890年以首相身分出席第一届议会时，为了“维持主权线和利益线”——具体说来就是侵略朝鲜，曾要求扩充军备。当时他所说的“利益线”虽然意味着确保主权线（国境）所需要的战略上和政治上的范围，但他还没有意识到经济上的意义。可是，他在1901年却写了一篇《东亚同盟论》，竭力主张与欧洲的一个强国结盟，以保卫“东洋的和平”——瓜分中国，“以期发展日本的贸易，振兴工业，恢复经济”。

现在除了天皇制传统的侵略大陆的野心以外，对刚刚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确保大陆的市场和原料，也具有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所有的统治者都在注视大陆。可是，大陆的情况已经与甲午战争以前有所不同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远东的竞争激烈化了，不仅是商业的自由竞争，为了资本的输出，垄断矿山和铁路的权利，划分“势力范围”，租借领土等等，进行着生死的斗争。日本向大陆的冒险扩张，正如三国干涉所标志的那样，加深了日本同列强的对立，特别是加深了同俄国的对立。

## 第二节 世界和日本

### ——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朝鲜的霸权，同清国作战而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朝鲜问题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因为日本同远比清国强大的沙皇俄国形成了直接对立。这种对立早在中日开战前，俄国对日本的干涉中就隐藏着，战后的三国干涉是它的公然的强硬表现。明治天皇等人虽然说什么辽东“利益”很少，取之无益，这是对三国干涉不服气的说法，但却预想有朝一日会在朝鲜或其他地方有爆发战争的机会，因而期待下一次战争，并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把不折不扣的“卧薪尝胆”之痛强加在人民身上。

日本借口保护朝鲜的独立和现代化，把清廷势力逐出朝鲜。但战争外交的当事人陆奥宗光本人，却在《蹇蹇录》中公开谈到朝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日本也没有真正要改革的意思。1894年10月，井上内相自报奋勇降格为公使，前去进行“朝鲜的改革”，但这只是因为如果不作出一点改革的成就，就显得侵略主义太露骨，面子上不好看了（9月24日伊藤博文致井上馨的信）。井上到了朝鲜后，首先就把朝鲜王族大院君赶下了台。大院君是在三个月以前，为了驱逐王妃闵氏一派的事大党的势力，由日本政府和公使强扶上台的，而公使一换，马上又被逼下了台，于是闵氏的势力又立刻增大，巩固的亲日政权根本建立不起来。作为“改革”的财源，井上要求政府对朝鲜提供五百万日圆借款，但只得到三百万日圆。这笔款项并不是用来搞朝鲜现代化的，而是为了把朝鲜建成日本进攻大陆的基地的“借款”，朝鲜政府不愿接受，经井上强迫才接受的。这种作法“改革”当然办不到，井上任职一年就放弃“改革”回

日本去了。他的后任是退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他在1895年10月8日指使日本警察和国权主义的打手闯入王宫，在寝室中逮捕闵妃，把她杀了，使大院君重掌政权。施展这样的暴虐手段，当然不能使国王替日本当傀儡。这种野蛮行径引起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的强烈抗议，反日派的朝鲜贵族乘势与俄国公使韦贝合谋，于1896年2月，把国王软禁在俄国公使馆内，从那里发出诏书，罢免亲日内阁，煽动民众蜂起，暗杀了数名大臣。从这时起，朝鲜宫廷和政府中的日本势力便衰落下去了。

在经济和商业方面，日本几乎完全垄断了甲午战后的朝鲜市场，但在政治方面却不能对俄国树立起优越地位。井上馨早在1895年5月（任朝鲜公使时）就对本国政府建议说：“总之，在远东单独行事和筹划国家利益是件难事，徒劳无效，密议与俄国联合如何？”（《世外井上公传》四）。1896年2月后，日本政府的慎重派以井上和伊藤博文为首，热心策划举行“日俄协商”，企图通过外交谈判使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根据同年5月，日俄两国公使在汉城签订的协定和同年9月在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礼的山县有朋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的协定，暂时达到妥协。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在朝鲜并没有得到任何新东西，却失去了垄断地位，而俄国反使日本承认它在朝鲜驻扎与日本同数军队的权利和架设电报设备的权利，对朝鲜内政和财政上的“援助”必须由两国共同承担。此后，俄国对朝鲜的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影响愈益增加了。

这时，朝鲜也出现了民族运动的新高潮。在留美学生和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集团的领导下，成立了“独立协会”，其机关报是《独立新闻》，这是第一个朝鲜文报纸；它既反对日本，也反对俄国。朝鲜国王被软禁一年后能从俄国公使馆回到王宫，就是由于独立协会的民族运动的压力（林光彻《朝鲜历史读本》）。面临这种局势，日俄两国于1898年重新签订协定，约定两国均不直

接干涉朝鲜内政，干涉时要彼此取得谅解，俄国不妨碍日本在朝鲜发展经济的自由。但是，此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仍然继续受到俄国的压制。

日本为什么不能与俄国抗衡呢？这是因为天皇制日本侵入朝鲜，并没有现代的目标，只是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在朝鲜建立日本的统治权，究竟同朝鲜的哪一阶层联盟，也没有定见，昨天援助的一派，今天就抛弃了，在利用最反动的贵族间的朋党对立当中，只能暴露自己的野心，从而得不到朝鲜任何阶层和派别的暂时信任，反倒招致他们的不信任和憎恶，使他们越来越倒向俄国。

日本“改革朝鲜”的经济内容，只是根据军事警察的需要架设电报线，和为了日本更顺利地掠夺朝鲜进行“币制整理”——这是强迫朝鲜实行过于脱离它的经济水平需要的金本位制，并为了以第一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高利贷资本在朝鲜国家财政中开辟一条寄生性的道路。日本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没有对朝鲜投下生产资本。汉城至仁川间的铁路，是在日俄战争前由日本资本建设的唯一生产事业。这是帝国主义进行掠夺的工具，但是它的建设并不单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包含着军事目的。

京仁铁路的铺设权和京釜铁路铺设权都是日本政府于 1894 年由朝鲜夺到手的。但是由于资本不足，未及开工，权利就已丧失。1896 年 4 月，美国人莫尔斯从朝鲜政府手里取得了京仁线的铺设权，同时法国资本家企图取得京釜线的铺设权。日本资本家闻悉，惊慌起来。由竹内纲（自由党干事）、大三轮长兵卫（银行资本家）、濑泽荣一（第一银行）、益田孝（三井）、中野武营（股票交易所所长）、井上角五郎（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经理）等大政商为发起人，后来又有岩崎、三井、安田、大仓等财阀参加，总之网罗了日本的第一流资本家，再加上政府给与巨额补助金和利益保障，好不

易才从莫尔斯手中把已经开工的京仁线的权利收买过来，1901年10月完成了铺设工作。政府加以维护，是迫于参谋本部的要求。至于比京仁线长达好几倍的京釜线，则迟迟不能着手，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余资在朝鲜铺设这样的铁路。战争紧迫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政府突然拨出补助金（根据紧急敕令拨出），方才开工。在日俄开战后的1904年10月，全线开始通车（《竹内纲自传》，《世外井上公传》）。

姑且不说日本侵入朝鲜在经济方面不是劳动群众的幸福（任何民主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天也不能为劳动群众谋幸福的），甚至也不想开发朝鲜资源作为日本资本的市场，而且根本不去培养朝鲜民族资本的萌芽，只有掠夺式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在那里横行，因此，朝鲜的民众自不待言，就连地主、商人，贵族也都仇恨日本。沙皇俄国虽然也不是朝鲜的亲密友人，但因朝鲜人对日本抱有强烈反感，宁愿更加依赖这个不象日本那样露骨地推行强盗政策的俄国。假使日本当局对扶植朝鲜的独立和现代经济抱有坚定的目标，就会通过援助独立协会或和它近似的现代势力，取得朝鲜进步势力的支持。这样日本会取得利益，也能够对抗俄国，但这对天皇制的日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正确理解日俄战争时，除了资产阶级的因素以外，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天皇制的这种干法促进了战争。

日本不仅加深了它在朝鲜同俄国和朝鲜人民的对立，而且在整个远东范围内，自愿地投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复杂对立的漩涡中。日俄战争当时，冈仓天心大喊：“欧洲的光荣，就是亚洲的屈辱”，“亚洲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统一亚洲，即征服亚洲，但是，使亚洲愈益分裂、愈益陷入屈辱的深渊的却是，自己一面屈服于欧洲，一面侵略邻国来求得补偿的日的天皇制和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暴露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已经腐朽得不能抵抗些微的压力，因而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东亚的一个信号。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募集外债。这给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各国除了让他们在东亚占领土地和殖民地以外，又从新开了一扇通过夺取铁道利权和政治贷款方式来统治弱小国民、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大门。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取得了轻易向中国输出工业资本的特权。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无力运用这些条约，结果这种特权却等于替那些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列强，特别是替英国开辟了输出资本的道路。沙皇俄国肆无忌惮地从满洲北部向南入侵。俄国一面与山县大使签订关于朝鲜的协约，一面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密约，为对抗日英而结成中俄军事同盟，并取得了在满洲的铁道铺设权。1898年取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道及其他铁道的铺设权和采矿权。法国、德国、英国都争先恐后地从中国夺取了租借权和不割让协定。美国当时忙于吞并菲律宾，吞并成功后，也露出它对“直接毗连菲律宾的中国市场”的欲望。美国的远东政策迟了一步，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就是要求给后来的人也分得一份。

在小小的朝鲜国里，如前所述，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俄国、法国、美国在竞相争夺朝鲜的铁路和矿山等权利。

日本当然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前面已经指出，日本还没有具备一个够格的帝国主义应有的实力，因此它更急于在列强把远东瓜分完毕以前尽量多分得一杯羹。1899年1月，英国的借列斯福特卿在日本作了一次演说，旨在使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提倡日、英、美、德四国同盟。当时，连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已经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幸德秋水也批评这是实际上瓜分中国的同盟。他说：“根据马关条约开辟的中国市场，究竟对日本有多大利益？我国领事不是十分茫然苦于无聊吗？不是徒使外国商人高兴吗？东

华纺织厂始终没有结果,京仁铁道也缺乏资金,本国的台湾铁道尚且无力着手铺设。这个缺乏资本、工商业萎靡不振的日本,有什么必要参加四国同盟?”。但是在两个月之后,当意大利向中国要求租借三门湾时,他却说:“它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是值得赞叹的”,又说:“当此瓜分中国之势迅速进展的时候,沉默一天岂不就落后一天,我们特别要促请当局注意”。同时他还主张:“在英俄角逐之中,我日本之向背,立即决定其雌雄。日本为何不抓住这个良机呢?”,他惟恐日本在列强瓜分中国时落后于列强而万分焦虑(《倍列斯福特卿的四国同盟论》,《意大利的要求》,自由评论社刊《幸德秋水评论和随想》)。

至于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羡慕和焦躁,更是可想而知的了。例如加藤高明(他最初是三菱公司的职员,娶岩崎的女儿为妻,后来当了外交官)在出任驻英公使的1898年,对第二次日俄协定表示愤慨,向外务省提出一份质问书说:“现在英、俄、德、法各国均从中国取得了所期望的割让,远东事件<sup>①</sup>已告一段落。我帝国政府拥有东亚无比的势力,此时是否应该默默无为?或者象发给本使的电报中所说,5月取得赔款后,是否准备采取一大飞跃的积极方针呢?”。加藤在这以后不久,因对政府的“软弱”感到失望便辞去公使职位,经过朝鲜和中国旅游后归国。回国后,他不主张主权主义者之流的“对华空论”,而竭力主张日本在中国取得和扩大“贸易、工业、矿业、铁路等”的经济利权。他在1900年10月出任第四届伊藤内阁外务大臣,一直主张不辞一战的对俄强硬政策和日英同盟论(《加藤高明》上)。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田口卯吉在1898年发表的《对外国是》论中说:“我所期望于国家的,不是扩张版图,而是增加财官,不是在大陆上开辟土地,而是使贸易集中于我国”。他提倡反封建的、帝国主义以前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场开

<sup>①</sup> 指1896—1898年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



辟论。在军备方面，他反对扩充陆军，要求“必须依靠海军制服敌人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我国海军封锁海参崴，时时向市内投掷炸弹”，“要使日本帝国的各港经常保持安全，使亚洲大陆的商业时时有危险之虞”。他的好战心理，可以说达到了疯狂地步。

日本的天皇制和资产阶级认为，尽管经济实力不足，但如果估计到下述几个因素，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可以达到的。这些因素是：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虽然不象加藤高明说的那样是“无比强大”，但是独占鳌头，同时距离欧美列强较远，邻近各国弱小，地理上占有优越地位，并且列强在本国和亚洲都严重对立，互相牵制。第二任台湾总督（日俄战时的首相）桂太郎在 1896 年 7 月向政府提出一份很长的意见书说：“中国一旦发生事变，列强必将竞相割据它的土地，以达多年来的宿愿。此时，欲乘风云而扩张国势，必须预作准备，即割据华南福建一带归我所有是也”。同时，他预料会有人认为这样强行侵人大陆与列强接境后必将引起纠纷（已有辽东半岛的先例）而加反对，他为了反驳，继续写道：“即使与列强接壤，而列强只是扩张版图和开拓殖民地而已。其本国的主力远在欧洲，而且列强彼此嫉妒反目，伺机倾轧，形成一日不能苟安之势，十分清楚，绝对不能将其主力扩展到隔绝的异域（中略）。利用台湾的地利在华南扶植我国势力不仅不是难事，亦地势所使然者”（《公爵桂太郎传》乾）。这不仅是台湾官僚军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山县、伊藤等人一致考虑的天皇制的最高国策，帝国议会也是这样督促政府的。这种政策的第一个收获，就是 1898 年日本从清政府取得不把福建省割让给他国的诺言。两年后的 1900 年，日本甚至试图占领这个地方。

1900 年初春，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就是义和团起义。这个斗争一开始就是针对欧美各国的，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必须要参加镇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是

一个良机，积极地参加了俄、英、法、德、美、奥、意的帝国主义联军。日本提议派陆军，最初列强不欢迎，只是未加反对。但当列强情势一恶化，它们也就只好承认可以向中国迅速动员大军的唯一国家——日本派遣大部队了。参加镇压义和团战斗的兵员：日本二万二千，俄国八千，其他各国共计三万二千名。他们于8月14日占领了北京。英国和德国的大军（各一万二千名）是在这以后到达北京的，因此日本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充当了联军的主力，并且意外地在列强面前得以来了一次示威。甲午战争以后，英国估计日本可以是它在远东对抗俄国的守卫人，这次见到日本的军力，它更加相信利用日本的价值了。这是不是日本天皇制的荣誉，我不知道，但是作为北京占领军主力的天皇制军队，在帝国主义联军犯下的亘古未闻的无耻行径中，即在残杀市民、奸污妇女、掠夺和破坏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也充当了极不光荣的主力（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的史的研究》，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中国近代农民经济史研究》）。

当北京战事方酣，各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华北的时候，山县首相和桂陆相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儿玉台湾总督等人，计划乘机占领台湾对岸的福建，一举达成宿愿。在这以前，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视察福建，在厦门设立本愿寺<sup>①</sup>的传教所，收买厦门市士绅等，进行了占领福建的其他准备工作。等到义和团事件刚一扩大，桂陆相和山本权兵卫海相认为时机已到，经山县首相和天皇的批准后，首先拟定占领厦门炮台的计划，并通知了儿玉总督和停泊在厦门的军舰“和泉”号的舰长。

8月15日，山本海相打电报命令“和泉”号舰长，“如果厦门地方形势不稳或有其他可乘之机，应借口保护帝国侨民，派若干兵员登陆”，切勿失机。24日，接到报告说，本愿寺传教所“被暴徒烧

<sup>①</sup> 日本真宗佛教总寺院。——译者

毁”，陆战队马上登陆了。儿玉总督也立刻从台湾派出一旅军队前往厦门，并派后藤新平长官首途前往。28日，后藤与“和泉”号舰长及厦门领事商议，决定了占领厦门炮台和电报局的详细步骤。这时两个中队的先遣部队已经乘船抵达港外，其他部队也将离开台湾。

这时儿玉总督接到东京政府的一份电报。“我国政府认为现在不是占领炮台的时机！”于是，一切都完了。（《后藤新平传》二）。儿玉大为愤怒，痛骂政府，山县内阁也因此而引咎辞职了。这个计划所以突然中途停顿下来，据后藤新平的传记载，是因为伊藤博文得知山县内阁这个暴举之后大为震惊，从大矶赶到东京加以制止的。但是根据当时的报纸《日本》的报导说，一碰到英国领事的抗议，态度就马上软化了。如果说，伊藤制止了山县是事实，那末就是因为北京已经陷落，列强有了注意华南的余暇。他认为占领厦门的时机已失，害怕英国反对，也就是说趁火打劫没有成功。

冲昏头脑的军阀和其他国权主义者都从这次失败中得到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日本既没有单独参加帝国主义竞争的實力，又不能模糊地单靠利用列强的对立来钻空子，必须同某一国家结成联盟。这点，井上馨等人五年前在朝鲜就体会到了。山县有朋的那一篇主张日本和“欧洲的一国”结成同盟的“东洋同盟论”，就是在迷以后的1901年4月写的。他的门徒——傲慢的军阀桂太郎在1901年6月第一次组阁时，规定国政的最高方针是：“独力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因此，采取伊藤、井上等人很久以来主张的日俄协调，还是采取山县、加藤高明所热烈建议的日英同盟，成了官僚军阀意见对立的焦点。关于这一点，根本没有容许议会置喙。

日英同盟论是提前导致日俄战争的路线，日俄协调论是鉴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暂时隐忍自重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没有原则性的对立，不能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立场同封建主义立场，好

战的立场同和平的立场那样的对立。这从伊藤内阁任用加藤高明为外相、任凭他实行强烈的排俄亲英政策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伊藤和井上、山县和加藤，他们在如何使日本便于侵入朝鲜、满洲这一目的上是一致的。日英同盟反对论所担心的是，恐怕由于结成这个同盟，“可能不幸地被迫放弃面向满洲最有前途的工商业的利益”（1901年8月28日，井上馨致都筑馨六驻俄公使的信）。然而，事实上俄国在义和团事件以后，把大军驻扎在满洲，很快就使整个满洲变成俄国的半殖民地，日本如果也想打入满洲，那末日俄协调就没有意义了，因此，1902年2月，缔结了日英同盟。自从三国干涉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决心要走日俄战争的路线，可以说这时已经确定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没有同俄国正面冲突的信心。1901年3月的元老会议，虽然对俄国侵入满洲感到威胁，但作出决议：鉴于我国武力不足，暂时应隐忍自重，“这时我方的行动只好限于英、法、德同意的范围内”，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要列强承认日本也在“浙江、福建占一地位”（《伊藤博文札记》）。

天皇制和资产阶级虽然痛感自己这样软弱无能，但已经不能再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了。正因为它们本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欧美列强软弱，所以才被迫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假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强大，并且一样现代化了，那末在朝鲜的俄国反日势力就不见得如此发展。从贸易方面来看，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很激烈，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侵入满洲和朝鲜，而向这些地方输出的日本商品却仍然年年激增。1904年前后，并不存在必须诉诸战争来加以清除的任何障碍。不过，从日本同德国关于大冶铁矿的竞争和同其他国家在朝鲜的铁路利权的它竞争中可以看出，日本在经济实力方面实在不能对抗列强，因此它想利用军事力量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日本经济之所以必须绝对依靠大陆，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向

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一般固有的矛盾，正如前节所述，还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利用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及其固有的基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上，一面具有根深蒂固的军事性质，过早地发展到垄断资本萌芽的地步，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停留在非常落后的贫弱阶段，因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如果从天皇制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立场来解决这个矛盾，就不得不以军事冒险作为主要手段。因此，经济结构的矛盾就愈益激化，这就更加剧了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和领土野心，起了一种相乘的作用。这样，在天皇制的一个冒险之后，必然产生另一个需要进行新冒险的新的对手，即一次战争产生另一次战争。这就是使日俄战争变成不可避免的日本方面的情况。

要弄清战争在1904年爆发的因素，就必须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和俄国的动态以及英国和美国的态等等国际情况。我在这里不准备作这样的分析。但是使日本能够决心开始和进行这场战争的，当然是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俄战争实质上是英国同俄国的战争，这在当时已经十分明显了（《列强纷争的真相》，1904年4月《周刊平民新闻》，《幸德秋水选集》三）。

日俄战争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角也大不相同了。尽管两国都是帝制，但1904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不是1894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他们丝毫也不再掩盖垄断市场和垄断利权的帝国主义目的。这在前述的统治阶层的意见中是很明显的。开战当时，清浦农商务大臣说：“这次战端，不仅由于政治上的必要而开战，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朝两国大大发展我国工商业”，“世上往往认为日俄的局势是两个帝国主义的冲突，这就是日俄通商政策在中国和朝鲜冲突的意思”，他自己就承认这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阪谷大藏次官<sup>①</sup>说：“这次战争是出

<sup>①</sup> 即财政部次长。——译者

于保全中国和保持朝鲜独立的目的是，精神不外乎使我工商业处于平等地位”，他仿佛在阐明“保全中国”和“朝鲜独立”的真意，不反对门户开放，但马上又说：“日本人要坚决肩负开发朝鲜和中国满洲的责任，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暴露出帝国主义垄断的意图。根据这样的战争目的，资产阶级已不仅被天皇制动员起来，而是积极推动战争。这点从上面的叙述看来也是清楚的。前而提到的田口卯吉于1904年11月在东京和大阪组织新闻杂志记者大会，竭力制造开战舆论，说：“满洲问题不解决，就谈不到工商业的发展”。儿玉参谋总长在决心开战前也邀请濂泽荣一说：“如果实业家说开战”，马上就可以打，“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打，战争就无法进行”。他探询实业家的决心，并号召实业家协助。濂泽当然响应他的号召，同邮船公司经理及其他大资产者一起，为了整備战争经济体制进行多方活动。幸德秋水目睹政府在战前和大资产阶级进行的这些频繁接触，综观满洲的市场意义，揭发了金融垄断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说：“实际上掌握宣战和媾和关键的，不就是一种放款业者吗？不就是号称银行家的放款业者吗？”，（《伯爵清浦奎吾传》上，《青渊回顾录》上，《田口卯吉全集》五，《幸德秋水选集》三）。

这种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不象十年前那样，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伪装成为人民战争了。日本人民并不是白白度过这十年历史的。在过去，“劳动组合”、“佃农组合”、“社会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虽然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是现实的东西，但在日本还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仅仅这种可能性已经使统治阶级发抖了，现在它们却作为日本的现实开始萌芽了。掀起了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领导的伟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使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发了基督教徒内村鉴三，产生了诗人与谢野晶子的古今杰作《君莫死》。日本的近代历史，一方面是充满屈辱的历史，我偏重地写了这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民

也用他们的血和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现在和将来都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光荣历史。其中也包括上述这些人。

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是参加帝国主义列强联军镇压义和团事件的1900年？还是发动日俄战争的1904—1905年？可能有两种意见。其实，这两种意见没有多大出入，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确定一个国家恰在哪一年进入帝国主义，只能说从哪一段时期起进入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有一个相当的幅度。不过，我认为1900年是划时代的一年。理由是这一年日本积极参加了上述国际帝国主义战争，在国内改革了选举法，伊藤博文创立了政友会。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和绝对主义天皇制订立了同盟，这个同盟是与制定治安警察法——镇压工人和农民斗争的法律相适应的（这个法律在形式上继承了旧的集会结社法和旧刑法中关于工农业妨害罪的规定，但实质上是针对同这些前期法规在本质上不同的、已经发展起来的日本的阶级关系）。这也就是说，这里集中地表现了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在1900年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同时在经济方面，财阀的垄断组织在这一年的前后建立起来了，尽管严格说来，还不能说这是日本已经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只能说它向这个阶段迈进了一步。日本已经明确地追随国际帝国主义，而且它本身也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行径，因此我是采取1900年的说法的。但是，这个帝国主义按照惯用的用法，还是通常加引号的“帝国主义”，非正规的帝国主义。就是说，国家权力既没有转到垄断资产阶级手里，向北京派兵的主力也还不是垄断的资产阶级。同时，寄生地主制还没有完全失去独立性而从属于垄断资本主义。这些事实在日本是从未有过的。在日本，一向是天皇制的军人和官僚们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中枢。

我之所以突然从日本人民的光荣历史转回来谈屈辱的历史，并且还提出一些烦琐的议论，是为了想在这篇论文末尾介绍如下

的事实,即从1900年这一年起,已经出现了站在人民立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卓越的批判,这个批判仿佛恰恰预见到今天的日本似的。一年前,这个人曾错误地要求日本不要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他就是幸德秋水。秋水在这一年的11月17日在《万朝报》上写了如下的论文:

“在英国的大选中,所谓的帝国主义胜利了。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也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人人都说,帝国主义是世界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国人民也不能不以此为主张和目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帝国主义似乎“就是以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来扩张版图。欧美列强彼此间的经济竞争激烈不堪,竞相开辟新领土,过剩的生产产品迫切需要市场,所以大力推行扩张领土的政策”(中略)。“欧美的帝国主义是由于国力的扩张,至少是由于资本的扩张,这种行为的是非和结果的利害,姑且不论,总之必须有这种扩张才能谈得上帝国主义。而我们日本,外交无能,财政困难,资本家和经济市场现在都极为萎靡困顿,因而不论怎样炫耀陆海军备、主张帝国主义,而这种主义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资本家,仅仅是军人的帝国主义,仅仅是纸老虎的、绣花枕头的帝国主义。现在举国醉心于这种纸老虎和绣花枕头,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岂非不胜寒心。”

我现在要替秋水加上一句,即这个主义不仅是纸老虎的、军人的帝国主义,而且其实还是从属于强大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发表这篇文章的五个月以后的著作《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中,更为详尽和尖锐了。这里摘录其中一节。

“有人说‘贸易跟随着国旗’,然而历史表明,跟随着国旗的是毁灭(中略),我相信,将来美国万一发生国家生存的危机,其危机决不在于领土的狭窄,而是在于漫无止境的领土扩张;不是在于对



外势力的不张,而是在于社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不是在于市场的短少,而是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在于自由和平等的灭亡,在于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

“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借口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而日本的经济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欧美各国如果建设大帝国,无疑必将走向腐败和毁灭,不过,尚有若干年间夸耀其国旗的虚荣。至于我国日本,如果建设帝国,岂能维持一日!岂能因拥有大量军队和军舰而妄自称为帝国主义!我日本帝国主义,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中略)国力日尽,民命日促。如果这样滔滔不知所止,不过数年,我相信,这个东洋君子国的二千五百年历史只会变成一场黄粱梦了。”

## 第三篇 对伟大社会主义 革命的武装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 序章 米骚动和入侵西伯利亚

1918年(大正七年)8月2日晚,日本帝国政府发出“告示”,宣布帝国政府“接受美利坚合众国的提议”,为了救援在西伯利亚被德奥俘虏军折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将迅速整备军旅,首先派往海参崴”,并宣布帝国政府在出兵中“将经常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声明不干涉内政的既定方针,达到目的后,便迅速撤兵,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不侵害其主权。”

当天,第十二师团接到动员令。8月3日,天皇嘉仁批准了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的编制。

就在这同一天,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镇的渔民的妻女约三百名,团结起来,去找市内的老财,诉说生活困苦,要求他们考虑减低粮价。这件事马上传遍全县各地,到处发生群众动荡不安。

8月8日,第十二师团的第一梯团从门司和宇品两港出发,前往海参崴。第二天,天皇亲自任命陆军大将大谷喜久藏为派遣军司令官。

11日,派遣军先遣部队很快在目的地登陆。从师团动员到今天的八天之间,隔着日本海与海参崴遥遥相对的富山县沿海一带,以渔津镇为首,滑川、东水桥和西水桥、生地、泊、四方等其他各村镇的渔民妇女,自发地掀起暴动,数十人或数百人结成一伙,闯入

米店或村镇公所，跟警察发生多次冲突。

“越中地方妇女暴动”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国。从9日到11日之间，在京都、名古屋、大阪及其他各地，群众纷纷暴动；近畿、山阳、东海各地方的大小城市，也都开始动荡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12日，海参崴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大将，在好多的将军和高官高呼万岁声中，抱着必胜的信心从东京车站起身登上征途。18日在海参崴登陆，当即开始了对日本军及英、美、法、捷克联军的总指挥。

这位远征大将军的出征，若在正常情况下，一定会是容光焕发，威风凛凛，群众欢呼万岁之声响亮得达到大海对岸的敌阵。

然而，1918年8月12日至18日这一星期间，正是六千万饥饿的群众喊叫“要米！减低米价！”的声泪俱下的哀号，压倒了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者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好战叫嚣声。

大谷司令官沿途经过的各地——名古屋、京都、大阪、冈山、吴、宇部等车站上，等待着他的不是挥舞着太阳旗的忠良臣民，而是为了粮米而掀起暴动的群众的呐喊。对军国主义者来说，确是很不妙的大杀风景的出征气氛。但是他们中间能有几个人会预料到将来必定要有一个比这更不妙的下场呢？

就连有名的帝国主义军事评论家，也不得不这样写道：“西伯利亚出兵是我国国防史上黑暗的一页。驻兵四年有余，消耗了九亿元战费，军司令官更换三次，动员了好几个师团，其间战争目的变更三次。且不说领土问题，即便在势力圈方面、经济方面、道义方面都几乎一无所得。忠勇的官兵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同所谓‘过激派’<sup>①</sup>作战，由于兵力不足和战略失误，发生了庙街惨杀事件、田中大队和石川大队全部被歼等惨剧。对外则使各国怀疑我国有野心，对内则增加人民的不满和疑惑，终于一无所获而撤兵了，

<sup>①</sup> 指苏联布尔什维克。——译者

真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伊藤正德《国防史》，1941年)。

不是“终于一无所获”，而是给国民带来史无前例的耻辱。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可憎最可耻的战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谁计划、准备和执行的呢？日本是不是仅仅由于“接受美利坚合众国的提议”而出兵的呢？日本的武装干涉者们除了企图扼杀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列强共同目的之外，还抱有什么自己的目的呢？日本军队失败的原因何在？是否由于将军的无能这一偶然因素呢？庙街事件的真相如何？最初一批出征军的出发与米骚动完全在同时，最后一批部队的撤回又与普通选举法、治安维持法的公布在同时，这仅仅是出于偶然吗？关于这些问题，要想通过掌握有关事实的确切资料来具体加以解答，那是颇为困难的。

这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们一向不愿意让人民知道真实情况，而关于西伯利亚出兵事件和米骚动又特别隐蔽它的资料，并歪曲事实。

例如，出兵的最初借口是“救援捷克军”，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日本就几乎找不到记录真实情况的文献。我想把这些事实尽量揭露出来，加以正确的叙述。我国有一些进步学者，偏爱理论，轻视仔细调查事实。但是，仔细调查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譬如对解答下列理论问题，将会提供真实的基础。

有没有所谓的双重的帝国主义呢？

日本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究竟和绝对主义势力有什么不同，不同到什么程度？

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独特性是什么？

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更进一步吸取这一不幸事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教训，把我所能知道的一切事实写在下面。

## 第一章 武装干涉的主角

### 第一节 外务省和参谋本部

我国过去的几乎全部文献，都把出兵西伯利亚写成最初是因外国的要求而成为问题的。

就连强调西伯利亚出兵“不是真正的国防战”的前述伊藤正德以及清泽冽的《外交史》，（《现代日本文明史》三）（它是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对军部一派的“强硬外交”的抗议书），也都把西伯利亚出兵说成是由于外部的促使。军国主义者的文献，虽然强调这次出兵，日本具有自卫的目的，但不说这次出兵一开始就是日本主动计划的。例如，关于这一问题写得最详细的文献之一，大津淳一郎的《大日本宪政史》卷八就是这样。又如出兵当时的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一个长篇的传记——《后藤新平》（鹤见祐辅编，共四卷）一书的正文，与书中所搜集的资料相反，也把日本的出兵写得仿佛是由于协约国的要求。

这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向全体交战国提议不赔款、不割地的和平建议。12月1日，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私人秘书赫斯上校会谈，主张日本应该在对德战争中代替俄国，希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赫斯反对这个提议，他不相信日本能恢复一道新的对德东部战线<sup>①</sup>。

---

<sup>①</sup> Seymour, Charles: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III, p. 389. Boston, 1928.

堪特罗维奇著，掘江邑一译《中国争霸战和太平洋》上卷。堪特罗维奇的这部著作是最可凭信的书籍之一。但是，不知是误译还是错字，年代和日期往往错误，也有一些意思含糊的地方。

第二天，在巴黎协约国会议上，联军最高司令官福煦元帅建议，为了援救南俄罗斯的反革命派和罗马尼亚，要求日美联军占领海参崴—莫斯科之间的铁路。但是，日本委员借口困难，激烈反对，据说这个提案撤消了<sup>①</sup>。

12月14日，驻东京的英国大使根据本国政府的特别训令，访问外务省，开始谈判出兵问题<sup>②</sup>。谈判内容，大概和1918年1月1日日本驻伦敦大使珍田舍巳从英国外交部次长罗伯特·赛西尔那里收到的提案一样。

那就是：为了防止“敌国”——表面上是德、奥，其实是苏俄——在西伯利亚获得军需品，派遣以日本军为主、并有英美小部队参加的远征军<sup>③</sup>。

根据美国驻日公使茂利斯的说法，在这年12月14日以前，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西伯利亚出兵问题。美国国务卿兰辛的12月17日的日记，仿佛证明了这种说法。他写道：“日本大使说他的政府认为向西伯利亚派遣军队是不明智的，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意见是一致的。”<sup>④</sup>

但是，三个星期后的1918年，1月17日，情况就完全变了。这天，美国大使茂利斯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日本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有单独占领海参崴、管理中东铁路和阿穆尔铁路的意图。”<sup>⑤</sup>

① 大津博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八卷十七篇第六章。参见祐辅《后藤新平》III第三章。这两部书关于西伯利亚出兵的外交经过都写得很详细。两部书的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后藤新平》中包含很多原始史料，这点比《大日本宪政史》强得多。它除了根据后藤家的文献部分以外，还载明根据外务省的《关于西伯利亚问题帝国与联盟列强间交涉经过大要》。《大日本宪政史》大概也根据这个资料。我因为无法看到外务省的记录，所以只好根据其他史料，批判地使用了上述两书。这两本书关于外交交涉的记载当然不是毫无隐蔽的。

② 劳舍·乔治著，内山贤次译《世界大战回忆录》，卷八载有英国在1917年12月建议日本进行武装干涉的事。关于日期和建议的内容，没有记载，但也提到了英国的干涉意图，大致如本文所述。

③④⑤ Girswold, A.W.: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根据这些史料,公然提议进行武装干涉的,是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而日本仿佛完全是处于被动。

然而,这不过是日本的外交策略而已。英国外交次官赛西尔于1918年1月8日写给他的上司白尔福外相说:“日本人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意图,但当别人提议要作某件事情时,他们却大发雷霆。如果他们不是十分冥顽不灵,为了保卫我们军需品的储备,由一支实质上是日本军,但为装饰门面,由少数英国军和法国军参加的军队在海参崴登陆,这种方案无疑应该是恰当的。”<sup>①</sup>

日本政府固然没有轻易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但它并没有盲从英、法。日本政府是在贯彻它最擅长的“默默实干”主义。

十月革命一爆发,哈尔滨的领事团就倡议由各国干涉革命,以“维持秩序”。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唆使中国政府向东北北部派兵,12月,便与反革命分子俄罗斯人霍尔瓦特(前中东铁路长官)的军队联合起来,解除了革命的中东铁路守备队的武装。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名义上由中国接管了。

当时中国政府由于巨额的西原借款,在财政方面受着日本的束缚。又因这年5月被日本强加的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军可以进驻东北北部。这些事实就意味着东北南部的日本军随时可以向北部进击。因此,美国国务卿兰辛竟于12月29日训令驻华

---

States, New York, 1939。根据此书引用的文献。本书的日译本有金钢石社出版的菊田贤一译《美国远东国际政策史》。日译本常常漏译了原书的重要脚注。本文所引的兰辛日记就是原书的脚注,这在日译本里是没有的。正文的翻译也由于忽视事实,误译的地方很多,这就大大贬损了原书的特点——“正确的事实”的价值。

其次关于④,根据前引塔特罗维奇的著作译本,载有:“1917年11月中旬,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列强,日本有意以独自行动和相当赔款为条件进行干涉”。这是原书或日译本的错误,应该是1918年1月中旬。不这样,就与其他事实矛盾。日译本的这一部分,常常把“12月”误译作“11月”。

① 前引Griswold的书中所引Dugdale, Arthur James Balfour, New York, 1937。

公使警告中国政府，北京政府军不要与俄军发生武装冲突。英国公使也唯恐中国军队趁此机会产生收复失地的欲望。最初唆使中国出兵，不久又认为有些过火，发出警告。列强终于1月初旬迫使中国军队从东北北部撤退了。围绕着干涉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日本军队和协约国间已在东北北部开始了最初的暗斗（前引塔特罗维奇和格里斯沃得的书）。

日本军部在革命前就在外贝加尔地方布置了周密的谍报网。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就已作好“为了护侨”派遣军队的准备，11月14日，布尔什维克发表停战的那一天，在满洲里马上对布尔什维克宣战的哥萨克的谢苗诺夫上尉，很快就同关东总督府取得了联系<sup>①</sup>。作为满洲观战武官驻在俄国战线上的荒木贞夫中校和黑木亲庆上尉由于参谋本部的特别命令转回西伯利亚、北满，1918年1月以后，指挥了谢苗诺夫军。

海参崴方面也有了周密的准备。

日本政府和军部对英法的出兵提议，虽然感到不愉快，但他们不是用文件，而是用军舰答复了这一提议。1917年12月30日，早有一艘日本军舰（舰名不详）驶入海参崴。驻海参崴的日本总领事通知滨海省地方自治会议长和海参崴市长，这次派遣军舰完全是为了护侨，“帝国政府完全无意干涉俄国政体”<sup>②</sup>。1918年1月

<sup>①</sup>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卷。本书的记述很多地方是所谓志士的豪言壮语和夸张，时间上前后颠倒也很多，不能一概相信。但关于上述事件中的人名、地名和日期都有确凿记述，并且也和事件的发展一致，尚可相信。关于谢苗诺夫军的建立和行动，可以参看 Ross, E. A.: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1933。著者 Ross 在十月革命时亲自视察俄国的实地情况，后来对苏维埃的成立和发展也作过仔细研究。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在序文中说，本书的目的是要记述俄国的“赤裸裸的真实”，因而相当正确地记述了现象。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sup>②</sup> "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Published by the Special Delegation of the Far East Republic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1922。本书是远东共和国（本文第四章第二节有说明）的代表在华盛顿



12日，日本政府公开声明，为了“保护侨民”派遣“石见”号和“朝日”号两艘军舰开往海参崴<sup>①</sup>。香港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马上也把军舰派往海参崴去了。

1月18日，海参崴市长对日本舰队提出侵犯俄国领土主权的抗议，但是日本置之不理<sup>②</sup>。

这样，在行动方面，日本比世界任何国家都领先干涉了俄国。不仅就远东来说是如此，即便就整个俄国来说，英国海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是1918年2月下旬，这比日本舰队开进海参崴晚四十多天。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在外交交涉上，日本的武装干涉主义者也决没有落后。

据当时的邮电大臣田健治郎在1918年4月24日的日记条中载，伊东巳代治（枢密顾问官、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委员，阁外最有力的政府协助者）告诉田健治郎在那两天前使外相本野一郎辞职的理由说：“如你所知，我是主张对俄国出兵的，但出兵属于国家大事，必须有个正当的名义。一是帝国的自卫，二是协约国的共同作战。若为自卫面出兵，就必须有远东迫于危险的事实，如为共同作战面出兵，必须有英、法、美等的联合要求。而本野外相在这两个事实都未具体化时，便仓率与英、法、美试谈出兵问题，也不顾美国暗中表示反对……”。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协约国提议以前，显然就已有了独自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意图，并且进行了外交准备。

本野一郎自从进入外交界，几乎一直担任对俄国的工作或与俄国有关的工作。尤其在他担任寺内内阁的外相以前，从1906年

---

会议上控诉日军不法活动的文件。日本军舰早在1917年12月30日就开进海参崴这一事实，在 Schuman, Frederic: "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since 1917" 中也是引用“New York Times”的报导而记载的。

① 《元帅上原勇作传》，《元帅寺内伯爵传》。

② 前引罗斯的书。

到 1916 年，任驻俄国公使，在莫斯科整整驻了十年，被公认为当时最卓越的俄国通。从 1907 年第一次日俄协定（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秘密协定）起，到 1916 年第四次协定（扩大第一次协定的宗旨，缔结旨在瓜分中国的、事实上的对美军事同盟）为止，所有对俄关系的工作，无一不是由本野经手的。通过这些工作，他认识到，日本在远东逐渐对沙皇俄国占据优势地位。当沙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军火时，本野也曾为使日本供给军火而大力进行斡旋。

最有兴趣的是，二月革命后，日本政府仍然继续供给临时政府武器弹药。为了便于偿付价款，甚至还承受巨额的俄国财政部证券，以示援助<sup>①</sup>。对天皇主义者来说，尽管是颠覆别人的帝制，是最可怕的革命，但只要有个资产阶级政权，也就可以忍受下去了。同时，本野等人可能认为俄国作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已经不足惧了。

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偌大的俄罗斯帝国变得四分五裂，它已经不再是日本的第一个假想敌国了<sup>②</sup>。现在正是把远东西伯利亚从欧俄割裂开，作为日本领土或势力范围的绝好机会。这样一来，满洲和蒙古就不是同俄国分享，而是全部落在日本的势力之下。从本野独具的机灵的和顽固的性格来看，不难想象，他是热衷于这个计划的。

据《东亚先觉志士纪传》载，据说本野在“俄国革命后，马上主张迅速向西伯利亚出兵，在贝加尔湖以东建立一个缓冲国，并同原参谋总长共同策划实行这个主张”。这个“据说”可能是真

<sup>①</sup> 《元帅寺内伯爵传》。日本政府承受的俄国财政部证券为大正五年十月发行的一千五百五十万日元，大正五年二月发行、六年二月转期的五千万日元，大正六年九月发行的一亿零五百万日元（其中七千万日元是大正五年九月发行的，这时转期），此外未记明发行年月的五千一百六十六万七千日元，共计二亿二千二百一十六万七千日元。二月革命后 1917 年 9 月以前的，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

<sup>②</sup> 本野和日本军部、官僚、资产阶级都认为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没有能力掌握政权，这从本书后面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另外，本野认为日本这时应该“直接地、牢固地立足于西伯利亚”的意见书等等，这类资料将在后面叙述。

实的。

上原勇作代表的参谋本部,是最热心的、最顽固的武装干涉主义者。事实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后述),也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他们究竟从何时开始策划武装干涉,没有正确的资料可查。不过,一贯专门策划进攻俄国的参谋本部,假如真是在外国提议后才考虑干涉的君子,那末他们就不会在进行武装干涉不到一年的1919年已经明摆着要失败的时候,还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坚持继续干涉。

帮助参谋本部和本野外相积极策划武装干涉的,是内相后藤新平。他从前以台湾民政长官闻名,曾任第一任南满洲铁道公司总裁。他和本野一样,是同沙皇俄国争夺满洲的、日本最初和最大的殖民政治家,彻头彻尾的谋略家。

后藤在二月革命后不久的1917年夏天,就大正7年(1918年)度的预算案写了一份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到:“鉴于俄国最近的局势及欧洲战后的经过,或许需要我陆军采取行动,也未可知”,因而主张建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制度,确立正式的战时财政。这里所谓的“陆军的行动”,当然还不是预想干涉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预想俄军溃败后如何对抗德军入侵俄国。但是,这时他已经考虑到日本不久会向西伯利亚出兵了。

在十月革命后的12月下旬,后藤在他的备忘录里说,俄国土崩瓦解,德军有东侵之虞,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镇守东亚的使命”和“帝国的自卫”,应该赶紧出兵西伯利亚。又说,“根据与盟国的协议,如果由帝国派遣必要的警备军管理从海参崴到俄国首都莫斯科的铁路线,就是说以战时警察军的名义出动,而不以征服为目的”(联合国警察军的先驱者<sup>(1)</sup>),凭借“警察军的出动”来完全掌管阿穆尔铁路和海参崴,因此“势必要在哈尔滨、伊尔库茨克、或贝加尔湖以东各地驻扎我国警备军队”。同时,据说北京政府为了镇压

北满的革命军,已派遣了军队(这是1917年12月末以前的事。从这句话可以推测这个备忘录是1917年内写的),“帝国政府应该代替中国亲自救护最近陷于无政府状态的哈尔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在这里提的干涉战略的安排,实际上同日本的干涉完全符合。这不能看做是偶然的符合,使人不得不想到他和参谋本部有一定的联系。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家罗斯,这时在俄国旅行后来到日本。当他同后藤会面时,据前引罗斯的书载,后藤曾对他透露了武装干涉计划(关于后藤的史料,除另行注明者外,皆根据鹤见祐辅的《后藤新平》)。

总之,日本没有等到协约国的提议,就已经独自策划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了,其中心人物就是上原参谋总长,本野外相和后藤内相。

## 第二节 西伯利亚缓冲国的幻想

这些干涉主义者究竟想凭武装干涉要得到些什么呢?尾崎行雄说:“西伯利亚出兵的表面借口是救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但其真正目的,不消说,是要乘西伯利亚无边的沃野陷于无防御状态搞些什么名堂。不论表面上如何掩饰,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其真正目的是不容隐蔽的。”<sup>①</sup>三浦观树将军说:“西伯利亚出兵是因为幕后的军人,即参谋本部心想乘机出兵,尽量夺取满洲的土地。”<sup>②</sup>

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1918年4月12日,本野外相向内阁提出意见书,以及本野辞职后由内相转任外相的后藤,根据本野意见进一步整理而发挥的日期不明(大概是1918年6月)的意见书,

<sup>①</sup> 尾崎行雄《自传》全集第一卷,

<sup>②</sup> 《观树将军回忆录》。

对武装干涉的目的有更详细的叙述。他们主张出兵的理由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

1) “帝国自卫的需要”,更正确些说,就是要扼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他们说,现在俄罗斯“四分五裂”,这时“德国势力”即将掌握全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德奥俘虏在德国参谋本部领导之下,与布尔什维克相呼应而进行活动”,德国对西伯利亚的“无限富源”垂涎欲滴,而“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日趋扩张”,必须及早“防范”德奥及布尔什维克的势力。

反革命派的俄国人大肆宣传:在东部战线被俄军俘虏的德、奥官兵,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在俄国各地被布尔什维克重新武装起来,正在对联军进行抵抗。驻在伊尔库茨克的各国领事向全世界散播了这个谣言。于是,英国的遣俄使节团特意前往该地进行调查是否属实,结果,4月26日,公布这是毫无根据的造谣<sup>①</sup>。大岛陆相在3月的日本议会上也作证说:所谓德奥俘虏已经编成两个军团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根本连两个大队也编不起来(史料见后)。

这就是说,西伯利亚被德军占领的危险根本不存在,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至迟在1918年3月是明确知道这一点的(或者说当然知道)。尽管这样,还故意这样说,其实是为了寻找借口镇压布尔什维克,而不是镇压德奥军队。所谓德国对西伯利亚的富源垂涎三尺,其实正是暴露他们自己的心情。

2) “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地位的需要”,即为了将来在帝国主义世界中占一席之地,日本应该为“抵抗德国”而向西伯利亚出兵,

<sup>①</sup> 引自前引 Ross 和 Schuman 的书。还有 Coates, W.P., “Arm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8—1922” 中也有详细的叙述。此书不是根据俄国方面的资料,而是完全根据英、美、法的公文和半官方的记录及当时的报纸和干涉参加者的札记等写成的客观叙述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事实。

“帝国必须在实际行动上表示为了正义与协约国一起奋斗到底”。

3) 确保对和会的发言权,特别是对“处分俄国问题”的发言权。帝国主义者不相信苏维埃俄国的力量;他们主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政权马上就会垮台,在和会上一定会提出瓜分俄罗斯的议题。因此,日本必须现在“直接而牢固地立足在该国领土之上”,不然,召开和会时,“徒以口舌力争”,也得不到充分的份额,所以应赶快出兵。

4) “抵抗美国在西伯利亚活动的对策”。“美国拥有大量资本,它将在俄国亚洲部分进行相当经济活动,从大势来看,在所难免”,必须现在就采取对抗措施。为此,应该出兵西伯利亚,“把西伯利亚的铁路管理权及其他关于民政的实权掌握过来”“特别是想到帝国国民,由于资力、知识、性格的原因,不能在同一条件下同欧美人进行培植经济势力的竞争时,为了对抗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必须以我所擅长的武力活动来弥补我国人民的短处”,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多么宝贵的自白!列宁说过,“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广大的土地和掠夺异民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sup>①</sup>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便清楚地证明了列宁的话是正确的。)

5) “振作帝国民心的需要”。“近来我国人心懈弛,实令人不胜寒心”,因此“有必要断然出兵西伯利亚,以便使人心振奋起来”。这点是决定出兵的直接因素,具有重大意义,后面还要谈到。

6) “对华政策的需要”。这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消除德国搅乱中国的基地”。这里所说的“德国”,其实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然而,这并不是说,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前面已经提到,帝国主义者这时还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俄国能够生存下去,

<sup>①</sup> 列宁这段话,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译者

与其说是唯恐对中国发生影响，毋宁说是为了乘机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永远防止出现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竞争者。但是当武装干涉的失败已经明显的 1919 年春，日本的武装干涉者认为必须防止俄国革命对中国的革命影响一事，就益发坚定了干涉的决心。其二是“对战后列强将在中国展开的竞争进行准备”。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必将涌向中国，这是可以预想到的。为此，必须现在就“打好中日政治、军事、经济合作的巩固基础”。这时如果“使欧美列强怀疑这是帝国乘其无暇顾及远东而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话，却不无遗下后患之虞”。因此最好把“中日合作”作为协约国的共同事业——“对德抗争”的一部分，这就必须出兵西伯利亚。

可是，在这样的目的和理由下出兵以后，怎样处理西伯利亚呢？把西伯利亚永久作为日本领土，当着外国的面前，这是行不通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帝国兵力援助之下，纠合西伯利亚的俄国反德分子，组织一个巩固的政治团体，与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有理由推断是德国的傀儡——完全脱离关系而独立。这样做“既可以在俄国领土上直接而现实地确立帝国的实力”，又可以取得瓜分俄国的发言权，奠定对抗美国的基础，实现“中日共同防卫”，同时还当然会使人心振作起来。另一方面，这也是“尊重俄国领土的完整”，也是“关于俄国内政，不偏袒任何党派”，因而可以“消除俄国国民的反感”，也可以预防“在联军的要求下不得不把军队派往遥远的欧俄的危险”。

上述这些议论只有完全从这样前提出发，才能算作是头脑清晰的议论。即不仅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德国的傀儡，而且布尔什维克不是俄罗斯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地方，是在德国占领下的地方，不是俄国的领土。然而，这个前提在客观上当然是不成立的，而后藤、本野明知道这个前提站不住脚，却偏要这么说，可见这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是多么的厚颜无耻。

在实际出兵时，上原参谋总长的日记<sup>①</sup>里这样写道：“对大谷说：所谓‘斯洛伐克’军只是表面。‘真意在于根据我国在东亚的地位，鉴于利害关系，要以我国兵力恢复东部西伯利亚的秩序，对此保持比其他国家更合适的利害关系，掌握更有力的发言权’（正文发给外务省石井）。这就是出兵的大方针。”

总之，当事人自白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最初真意是：打倒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从而支配西伯利亚的资源，确立对抗美国的基础，加强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确保瓜分俄国的份额，完全控制满洲和蒙古，在中国确立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绝对优越地位。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防卫朝鲜”或“防止过激思想”。这些问题是在出兵后将近一年的时候，世界大战已经签订了和平条约，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再也不能继续说“西伯利亚的德国人”的鬼话，并且深深体会到布尔什维克比帝国主义更强大以后才意识到的。

武装干涉者的这种意图，在1918年3月已经在报纸杂志上揭露出来。例如《太阳》杂志的大正七年四月号，是西伯利亚出兵问题的专号，上面登载着一篇“某将军”的出兵论，主张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缓冲国”，接管中东和阿穆尔两条铁路，使俄军从滨海省撤走，为了这三个最起码的目的，必须出兵。这显然是上原等人做的宣传工作。这个杂志还登载工学博士井上匡四郎的一篇介绍西伯利亚的金矿及其他丰富资源的文章，暗示这些资源可得攫取过来。寺内首相本来对出兵的态度是慎重的，但他在3月8日接见美国

---

<sup>①</sup> 这段日记的日期，据引用的《元帅上原勇作传》载，是“大正八年九月十一日”，但那时不会对远征军司令官或“外务省的石井（菊次郎）”作这样的指示。大正八年九月，大谷已不是司令官，换为大井大将。外务省的石井，可能就是石井菊次郎，但大正八年九月，他在伊香保赋闲。因而这里说的文件一定是石井出任驻美大使时的事情。再从其他种种情况来看，这个日记必定是大正七年出兵当时的，《上原传记》的引证，可能是错误的。



政治杂志《展望》的记者时<sup>①</sup>，曾问，如果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缓冲国”，美英将怎样想？暗示了日本的意图。

日本不仅在报纸和杂志上公开讨论干涉的意图，如前所述，已经在北满和海参崴开始干涉了，因此，日本的野心早被苏维埃政府和人民及全世界识破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遣俄使节团团团长布鲁斯·罗卡特，美国的驻俄大使弗兰西斯，美国红十字派遣团团团长罗宾斯，都在3月初先后向本国报告说，日本人“对俄国的犯罪”如何激怒了俄国政府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甚至激怒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并极力主张，为了把苏维埃拉到盟国这方面来，英美政府必须对苏维埃保证坚决防止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的干涉（前引 Coates, Schuman, Ross 的书。尤其是 Ross 的书更详细）。

然而武装干涉者完全不顾俄国人民和世界的舆论，积极进行它的计划。对谢苗诺夫，不仅给予军火援助，并借口“教给武器使用方法”，还“借给”了人员<sup>②</sup>。3月25日，本野外相和驻日中国公使章宗祥交换了目的在于从远东驱逐“敌国”势力，中日两国“联合”的公文。在5月16日和19日，分别签订陆军和海军的“中日联合防敌军事协定”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从“地位和利害平等的观点”出发，为了对“敌人”——字面上的德国，骨子里的苏维埃俄国——“防御”（其实是侵略）远东，日本军和中国军将“联合”起来，在北满作战，并也在“中国国境外”“联合”出兵，为了进行联合作战，“互派官员，担任将来的联系”，并在中国国内“联合”构筑各种军事工事和“共同”使用等等（协定全文载于《后藤新平》III，1832—1836页）。

这个中日“协定”，已经实现了本野等人的西伯利亚出兵目的

---

<sup>①</sup> 参看前引《大日本宪政史》，《后藤新平》，《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三。

<sup>②</sup> 1918年7月，伊东巳代治给后藤新平的札记。在《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关于谢苗诺夫军的行动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的第六项之二<sup>①</sup>。这个协定在条文上是中日两国处于平等地位，实质上是把中国军摆在占压倒优势的日本军控制之下。它意味在中国领土上，用中国人民的钱，替日本军队修建旨在压制中国和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基地。因此，当中国的爱国学生和商人获悉这个协定正在签订的时候，马上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长沙等大城市举行大会，掀起了反对卖国协定的猛烈运动。留日学生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因而日本文部省镇压了留日的中国学生。段祺瑞领导的中国政府也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当时日本一再给予的“西原借款”的“经济援助”的压力或收买之下屈服了，利用秘密外交来遮掩人民的耳目，镇压爱国人士，终于签订了这个出卖主权的协定。

研究近代史遇到这个协定时，使我不禁联想到现在的吉田首相利用他所爱好的秘密外交，据说在同杜勒斯特使协商“日美共同防御协定”之类的东西。

## 第二章 “双重外交”？

### 第一节 种种的反对

对十月革命后马上企图占领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部和帝国主义者来说，英、法在 1918 年提出希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要求，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然而马上答应这个要求，唯恐有失日本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表现出一副并不十分愿意的面孔。日、英、法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想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

---

<sup>①</sup> 本野和后藤的意见书，是在就这个协定进行谈判时和签订后写的。但是，通过西伯利亚出兵来确立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权这个意图，毫无疑问是在写这个意见书很久以前，即在他们最初考虑干涉时就有的。

这以外，却各自有不同的利害关系，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牵制。

英国的意图，据 1918 年 1 月 19 日提交日本政府的备忘录<sup>①</sup>载，是“援助罗马尼亚食粮，为了防止粮食落到布尔什维克俄国和德国手里，支持南俄乌克兰的反革命派，同时在近东的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可靠的‘自治’国，阻止向西方运出堆集在海参崴的木材和其他物质”。这与福煦在 1917 年 12 月巴黎会议上的提案大体上是一致的。当时法国希望的是首先利用日本军队重新建立东部战线，和保护法国金融资本对俄国的巨额投资的利权。至于英国则是，只要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活动就于愿已足，而法国却希望日本军尽量向西挺进。

但是对日本来说，根本不打算用它最宝贵的军队替外国服务。大战初期，协约国曾要求日本向欧洲派三个军团。日本对此拒绝说：“为了不具备国防本质的目的，派遣帝国军队远征，与它组织的根本原则不相容。”<sup>②</sup>现在正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想出兵东部西伯利亚，在日本军部和政府看来，不要说为了英法利益替已经崩溃的沙皇军队充当替身，即便向贝加尔湖以西进兵，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日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响应英、法的提议而出兵的名目而已。日本希望这样一个形式：（1）远征军的活动范围限于东部西伯利亚，不再往西进；（2）日本单独出兵，确保行动自由，不是联合干涉。在确保这两个条件之下<sup>③</sup>，应联军的要求而出兵。因此，日本与协约

---

① 在《上原勇作元帅传》中引用的上原的日记 1 月 19 日条载有“1 月 19 日，英国在南俄及东部西伯利亚活动及意向的备忘录”，是根据上原自己的记忆写的。有的部分，文意晦涩。我是按照正文那样解释的。这个解释可以根据劳合·乔治的《大战回忆录》核对。

② 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下卷。日本后来应协约国的再三要求，曾向地中海派遣过几只军舰，那是附有协约国承认在和平会议上把赤道以北的旧德国领有的各岛划归日本，以及其他极为有利的交换条件的。

③ 日本的这两个条件在日本和英、法两国交涉时常常提出来。不仅第二节所举的 1918 年 1 月 17 日日本政府的备忘录是这样，即在 2 月的巴黎会议上，日本也曾要

国（大体上由英国代表）之间关于出兵的交涉，并没有轻易达成协议。

德苏间的签订和约（3月3日），越发使英、法觉得有迅速进行对苏干涉的必要，也坚定了它们的最后决心。英、法、意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3月6日，英国政府代表三国向驻伦敦的日本珍田大使提议，“为了防止德国势力的东进”，协约国准备管理西伯利亚铁路，委托日本负责执行。英、法根本没有向远东出兵的余力，所以日本提出的单独行动的希望，这时也被接受了。不过，关于活动范围的问题，后来又经过几次交涉，6月下旬，英、法似乎暗中承认日本可以把活动限于东部西伯利亚<sup>①</sup>。这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大致镇压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它的威信和势力确确实实日渐提高和充实了。因此，英法大概认为不能再为日本的活动范围问题而使武装干涉拖延了。

日本和英、法的交涉虽然告一段落，但还不能马上发动正式的武装干涉。这是因为美国还在坚决反对。美国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点，第二节里已经隐约提到。英国是在1918年3月6日向日本提出武装干涉问题的，第二天，美国政府马上通知日本驻美大使说，如果在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当然由日本担任最适宜。不过，现在进行武装干涉对协约国是否有利，“颇是疑问”。美国政府对英、法两国的通知则是以更明确、更强硬的措词，表示反对日本出兵。

---

求过，日本准备向西伯利亚派遣六个半师团的兵力，但是这个干涉活动必须没有其他国家参加，作为日本单独的事业。（堪特罗维奇，前引 House 上校的 Intimate Papers，劳合·乔治《大战回忆录》。）

<sup>①</sup> 这次交涉的经过载于前引《大日本宪政史》和《后藤新平》。这两本书与受到武装干涉的俄国人所写的《在中国制霸战和太平洋》以及由最后虽然也参加了武装干涉但与日本尖锐对立的美国的立场所写的前引休曼和格里斯沃得的书一对照，就可以完全了解这次外交的主要经过。这里限于篇幅，只好省略了。

日本政府急忙于3月19日答复美国说：“这次干涉根本不是出于帝国政府的希望和提议，”辩解后又说：“不过，今后一旦敌人在西伯利亚的活动愈益发展，帝国国本的安全遭到威胁时，当然就不能不采取自卫手段了，届时希望美国政府给予友好的支持”，暗示日本有出兵之意。同时，日本政府讯问英国：现在美国的态度固然如此，一旦发动武装干涉后，美国是否能够仍然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呢？可见无论怎样卤莽的军部和帝国主义者，没有美国的同意，对进行干涉就不得不表示踌躇。这是因为什么呢？

当时在远东唯一有实力对抗日本的，就是美国。美国和日本的对立，从日俄战争后，特别是从1907年以后，逐年尖锐化了。斗争的最大原因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和华北进行的帝国主义竞争。还因为美国对待日本移民的无理歧视和排斥，刺激了日美间的感情，不断传出日美战争的谣言。当时，美国还没有具备足以横渡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充分的武装力量，因而通过1908年11月的高平—卢特协定到1917年11月的石井—蓝辛协定的一系列协定，在纸面上对日本表示让步，实际上却抱着很深的敌意。美国反对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也就是这种敌意的表现。美国对干涉俄国革命这件事本身，是非常赞成的。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在北方的摩尔曼斯克与英国海军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如果在远东进行干涉，就不得不以日本为主力，干涉一旦成功，可以预料，日本一定把西伯利亚永久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所以，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

本野和后藤企图以武力来弥补日本在经济力量上对美国的显著劣势。威尔逊和赫斯也完全知道，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就是出于这一目的，所以反对。日本当然也还没有信心，现在就和美国开战。尤其是西伯利亚出兵，很可能成为长期的和大规模的战争。那时，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很显然，日本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又完全

没有希望从英、法方面取得经济援助，可以依靠的，只有美国。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取得美国的同意。

对西伯利亚出兵的问题；寺内首相等人是慎重的，尤其象山县有朋那样的军国主义的鼻祖，也不敢贸然赞成，这就是因为怕美国反对。山县在3月15日寄给寺内的信里说：“仅以德祸东渐之势正在猖獗为理由，我方便马上出兵，未免为时过早。俄国既未求我援助，若派兵强入其境，纵然出自善意，亦属武装干涉。不仅名分不正，而且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的猜忌。不但得不到它们的后援，前途亦会产生许多祸患。因此，在确定帝国的对俄政策时，必须首先明确英、法、美的对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军需品的补充和军费的筹措，必须仰仗他国援助。如果不明确这些国家的意图，贸然决定我方态度，他日必将陷入不堪设想的绝境。这也是我在对俄政策上始终注意英、美意图的缘故”（《公爵山县有朋传》下）。

寺内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压制本野外相的急进论时，说没有攫取俄国领土的野心，但是他又说：“为了俄国的复兴，如有必要，必须马上出兵”<sup>①</sup>。此外，前边已经提过，他向《展望》记者暗示，如果英、美支持，他有意在西伯利亚制造一个“缓冲国”。

所谓反对出兵的主张，也都是象山县、寺内那样对出兵主张要慎重，在军人、官僚、政党、资产阶级、地主中间，没有一个真正反对出兵的人。尾崎行雄在自传里说，他曾召集“学者、实业家和其他议论国事的人”，对他们提出反对出兵的主张。但这些人也全都认为“这时出兵西伯利亚，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事实上，尾崎行雄

<sup>①</sup> 载于《后藤新平》III的后藤备忘录。这里所谓的“俄国的复兴”，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复辟。

寺内在1918年1月第四十届议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说“观察俄国最近的形势，内乱不幸渐渐波及远东俄领 维持远东和平的责任，落在帝国的肩上。如果战祸（指革命）蔓延，扰乱远东和平，殃及帝国时，将主动采取适当措施，毫不踌躇。”

本人也煽动出兵；这在当时的杂志上也有所记载<sup>①</sup>。他在1918年1月第四十届议会上，代表宪政会作了外交质询的演说，攻击了政府对十月革命的干涉不够彻底。宪政会的加藤高明、政友会的原敬和国民党的犬养毅，这三个政党的党魁，虽然在一般内政问题上彼此尖锐对立，但唯独对西伯利亚出兵则是一致的。他们反对政府的“自主的”出兵论，迫使政府把出兵限于同协约国协调的范围内。所有的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反对出兵。也并不是象传说那样，他们对“自主的出兵”始终反对的（后述）。

总之，所谓的各种反对派都在观望美国的动静，主要是要大举行动。这正如元老西园寺写给山县的信（5月23日）中所说：“美国如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我国当然不能落后，而且应该主动地担负起全部责任（《公爵山县有朋传》下）。西园寺的信里还说：“对天下宣布的出兵理由，也必须是后世人所能首肯的，当前，为了试探人心，应限于声援协约国，以观望欧洲的变化”，“总之，有必要进一步振刷民心”。这就是说，在取得美国的同意和鼓动起国内人民的战意以前，要慎重行事。

只有在人民中间才有真正的反对出兵论。《大阪朝日新闻》的3月3日社论说<sup>②</sup>：“近来日本出兵的问题不断从中国和欧洲传来。

<sup>①</sup> 《太阳》大正七年四月号，“形形色色的政客”责难尾崎行雄说：“尾崎行雄之流，借口局势严重，为了鼓吹成立举国一致的内阁，到处宣传出兵。”

他在第四十届议会上的质询中说，日本应该表明，原则上接受协约国的要求，不仅派遣舰队，如果有具体办法，即便向欧洲派遣陆军，也在所不惜。他还说：日本应该代替联军而单独警卫远东，使欧美舰队撤出海参崴及远东近海。同时攻击政府说：“对俄国的态度是，既不援助主战派（反革命派），也不阻止违背盟约而单独媾和的人（布尔什维克）”，还责难政府对俄国亡命贵族的态度过于冷淡。这些意见当然不是主张马上发动武装干涉，但不言而喻，他的意图当然是指向这方面的。

<sup>②</sup> 引自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二。此书大量引用了《大阪朝日新闻》的报导和论文。这些报导和论文都认为武装干涉只是军阀的阴谋，从上面引文也可以看到，期望政友和宪政两党带头反对战争。这种见解当然很肤浅。但是，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具有政治嗅觉的人民，已经在反对西伯利亚出兵了。

人民感到这种奇怪的秘密外交,在没有人民的支持下,正在把我国推向不测的深渊,因而非常不安。如果军阀根据人民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日德开战时发起了爱国运动,就认为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战争,那就如同部分欧美人错误地认为我国人民是嗜血成性的好战民族一样,完全不了解我国的国民性和国民思想。这次演成问题的日本的新行动,究竟有什么国民基础呢?一般人民不知道政府究竟要干什么,只是在新的国家危机面前战栗而已。(中略)

人民的知识和思想已经超出空洞的国权主义的庸俗论。有远见的人看破了军阀的肤浅权术而在冷笑。军阀之流正在叫喊德国东进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如果说存在,也是在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国的沙俄时代就存在的,现在的俄国革命反而把它推迟了。(中略)我们不能不为军阀的鲁莽而吃惊。(中略)

总之,这样重大的事情,军阀要独断独行,人民对此能默许吗?政友、宪政两党应该发动一次人民运动来加以反对,人民应该阻止军阀这样专制来误国”。

当时有名的新闻记者浅田江村的一篇论文《为什么出兵》(载于前引的《太阳》杂志,1918年3月16日稿),也是反对出兵的代表名作。他说,德国在西部战线上集中全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还有什么余力把手伸到这个与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辽阔的西伯利亚旷野来呢?”又说:“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暴虐、与德国俘虏的合作,排日运动等等令人不安的报导,即便有几分真实,也要大打折扣。西伯利亚的德军俘虏数目,一度被夸张得很多,但是根据军事当局在前几天的议会上的坦白,西伯利亚的东部和西部总共也不过十六万人。在这次坦白的前后,还夸大传说德国俘虏编成了两个军团。哪里有两个军团,根据大岛陆相的坦白,连编成两个大队,都很困难。其实他们都没有武器。所谓的西伯利亚的混乱,其



程度可想而知，只要听其自然，纷乱的事故将会更加减少”。“甚至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爱国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冷酷地呼吁要兴师惩罚。对这些愚论，为了保护可怜的俄国革命的幼苗，我们竭力反对当前的西伯利亚出兵论”。

还有《东洋经济新报》也始终反对出兵。这个杂志被片山潜评为当时“日本唯一具有独立见解的有影响的杂志”。他在1919年写的论文“日本和苏维埃俄国”，也从这个杂志上引用了很多论点（关于这篇论文，参照第三章第二节）。该杂志在武装干涉十月革命的叫嚣出现后，马上着重指出，作为干涉借口的所谓德国势力东进，是荒谬之谈，要想援助反革命派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的（大正七年三月五日号，十五日号社论）。又在七月二十五日号上登载了“应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社论，这是呼吁承认苏联的最早的要求。该杂志的这种主张尽管遭到警察当局的不断压迫和威胁，却一直坚持不屈，在出兵后的8月15日社论上还分析了政府的出兵宣言，毫无忌憚地批判说，这是干涉他国内政。

后来，一有机会就主张撤兵。《东洋经济新报》关于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也发表了日本统治阶级任何言论都没有的进步意见，对普选运动也大力支持。这个杂志想是代表当时小资产阶级进步民主阶层的意见，得到了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当然，这个杂志也并不是积极支持革命的，但它说：“深望我国人民知道，目前俄国的混乱，是从经济上发生的国内阶级斗争”。它的立场是，用武力镇压“工农苏维埃”是日本经济不堪胜任的，不如迅速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复兴的俄国建立经济联系。

工人的先进分子积极支持俄国革命，认为“俄国革命带来了生存的光明”而感奋。友爱会的机关杂志《产业与劳动》1918年10月号也说，工人由于这次革命而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威力”。至于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不仅以俄国革命为自豪，而且为了积

极捍卫革命,有的横渡大海到西伯利亚去了。这在市川正一的《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中着重地记载着(后述)。在1918年8月的米骚动中,使民众崛起的有力因素之一,就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如原敬所说,“人民不知不觉地受到外国革命空气的感染”(《原敬日记》大正七年十一月三日)。

只有在这样的人民中间,才有真正彻底的反对武装干涉的主张。

## 第二节 出兵

虽然在国内遇到工人、劳动人民、民主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资本家在内的全民反对和元老及政党方面的机会主义,在国外遇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出兵,以及和英法两国在出兵目的和行动范围上发生意见分歧,但是武装干涉者们还是执行了他们的计划。同中国互换了“共同防敌”的照会后,4月5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英国军队一同在“护侨”的名义下,在海参崴登陆了。司令官加藤宽治少将访问海参崴市长说:“由于市内陷于无政府状态,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我军被迫登陆。该市市长和全体俄国人对此全都提出抗议。8日,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海参崴下达如下的通告。<sup>①</sup>

“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日军借口微小事件在海参崴登陆,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对此提出抗议。这种微小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西伯利亚的工农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西伯利亚任何地区的企图,都将组织猛烈抵抗。保护外侨是地方苏维埃的

---

<sup>①</sup> 登陆的日期根据前引的《上原勇作传》年谱。加藤访问市长等等的记述,根据前引的Coates的书。所谓“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知是什么机关,原文是“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Siberia”。

事。日本的武装干涉对维持地方秩序，决不会有任何贡献。即便在最成功的场合，也将是多余的和无益的。西伯利亚的工农，为了防止反革命进行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可耻勾当，将不辞一切努力。现在宣告全西伯利亚处于戒严状态。革命干部要组织起来，防卫帝国主义的侵入。”

甚至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也都抗议日军的登陆。日本原想为日后更大的侵略建立一个桥头堡，但也撒下了失败的种籽。这次登陆是谁策划的，不得而知。不久，4月22日，本野外相由于坚决主张出兵而被迫辞职。但是，本野的后任也和本野一样，是坚决主张出兵的后藤新平。由此可见，这次人事更动，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5月间，如上所述，终于迫使中国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这期间，对英法的交涉也有了进展。

美国始终反对日本出兵，这就使后藤等人渐渐感到焦躁不安。6月末，决定“关于出兵问题，不必拘泥于尊重美国意图的外交经过，另行树立主动的计划，勇往直前”。6月28日夜间，在海参崴由日、英联军与白俄及捷克斯洛伐克军联合行动，以压倒的兵力突然解除该地苏军的武装，推翻了地方当局，完全占领海参崴市和港口，建立了反革命政权。

后藤等人期望海参崴的骚乱闹大起来，同时谢苗诺夫军在当时连战连败，开始逃往北满，企图利用这个混乱局势，发动“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马上“把警察部队派往外贝加尔东部”。恰好当时沙俄时代的驻日俄国大使克鲁宾斯基前来要求“维持秩序”，他们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借此可以使他们的侵略计划合法化。这时就连狂热的干涉主义者伊东已代治对后藤的计划也大吃一惊。他竭力劝告后藤要慎重行事。到了7月1日和2日，后藤对伊东的劝告“情绪十分激动，认为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不应再踌躇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可能是看到谢苗诺夫军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增强而迫不及待地要发动干涉，也可能是因为德国在西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一时显出优势而焦急了。但是，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必须考虑的是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由于米价的直线上涨，人心日益动摇，社会不安发展到可怕的程度，预兆着8月的大暴动。早在5月24日的地方长官会议上，寺内首相就警告说，民众生活困苦<sup>①</sup>，“资产者和劳动者的悬殊太大”，因而有产生“不合国体的思想、人心思乱”的危险。6、7月间，这种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各地频频发生劳资纠纷。在大阪和京都，象监狱的看守和法警这类有权势的爪牙也动摇了，下级官吏、警察等，迫切需要普遍提薪<sup>②</sup>。7月3日，东京一次增加了警官二百一十九名，警察二千三百八十名，一下子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警察人员。这样大规模的增员是空前绝后的<sup>③</sup>。大阪方面也强烈要求增强警察力量<sup>④</sup>。由此可见群众动摇的深刻程度了。

这种形势推动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寺内的脑袋尖得象美国福神比利肯，人们就给寺内内阁起个绰号，叫“非立宪内阁”（因比利肯和非立宪发音接近），报纸和杂志对这个非立宪内阁的攻击非常激烈。政友会本来是忠于寺内的执政党，但鉴于这种形势，便在第四十届议会（到1918年3月）期间转化为在野党了。议会闭会后，各党打倒寺内内阁的活动日趋活跃。寺内打算借口有脑病，辞职不干。后藤新平等人表面极力反对他辞职，实际上是在策划以后藤为首相，延长官僚内阁的寿命。因此，在海外寻衅，制造事端是最有效的办法。利用出兵促使民心振奋起来，就是

① 《元帅寺内伯爵传》。

② 吉川光贞《所谓米骚动事件的研究》。

③ 《后藤新平》III。这次警察人员的增加是后藤担任内相时鉴于“社会阶级间正在产生不安的祸根”而决定的。

④ 吉川光贞《所谓米骚动事件的研究》。

把米骚动前夕群众动荡不安的情绪引向海外，同时延长官僚军阀独裁政府的寿命。出兵的必要性急剧增大，现在已经无暇等待美国的同意了。

当日本和英国决心断然出兵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也预料到，即便美国不参加，日本也早晚必定发动武装干涉。于是，他认为既然干涉不可避免，与其使日本为所欲为，不如美国也参加，以便牵制日本。这样可以使“弊害减少”，也可“消除日本干涉带来的许多不良后果”（赫斯上校）。威尔逊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良心和民众的辩解。既然决定干涉，要寻找合理的借口多得很。威尔逊等人想出来的借口是，为了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而出兵西伯利亚。

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地方的斯拉夫人，当时受奥地利帝国主义的统治。大战开始后，应召参加奥军，被配备在东部战线上。但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压制他们的奥地利帝国主义者毫无理由地同俄国人作战，因此连续不断地大批投降，或是跑来当俘虏。二月革命后，捷克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马萨利克博士与临时政府交涉，把这些捷克俘虏武装起来，编成一个军团，使之参加东部战线，与俄军一起对德、奥军队作战。但是，这个军团一败涂地，逃回俄国，进入了各地的收容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同德、奥单独媾和，引起捷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不满。1918年3月26日，他们经同苏维埃政府交涉后，双方协定：把五万捷克斯洛伐克俘虏用西伯利亚铁路运往海参崴，再搭协约国船只前往法国，参加联军的西部战线。这些俘虏约定，在西伯利亚运输途中，除了每百人携带步枪十支和机枪一挺用作自卫外，不得携带其他武器。4月4日，第一批支队已经到达海参崴，以后陆续运来，5月末，有一万二千名捷克军来到海参崴，他们到达后发现，在海参崴，协约国政府约定的船只一只也没有，后来也一直都没有派来。但这里有日、英两国的军舰和陆战队，

用最新式的武器把捷克人武装起来了。

5月26日，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由东往西去的德国俘虏列车遇上由西往东的捷克人的列车。这时，这两个敌方发生了一次小冲突，苏维埃当局镇压下去了。这对早就隐藏武器、阴谋反苏的捷克军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他们扬言：“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合谋虐待捷克人，要进行抵抗”，马上占领车里雅宾斯克车站，并用电报联系各地捷克军。他们在一星期内占领了平兹、鄂木斯克、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等车站及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全部重要据点，然后占领所有西伯利亚的重要城镇。

本来是某个车站上发生的偶然事件，现在却向全世界宣传说，整个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俘虏经常迫害捷克人，而且这种迫害现已达到极点。捷克军的这次背信的叛乱，完全是经过法国人审慎领导和组织的，这在美国的诺顿教授所著《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罗斯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里都有确凿证据，布鲁斯罗·卡特也是这样说的。

这样，他们在6月29日和日、英两军联合起来，占领了海参崴。现在从俄国欧洲部分的东部起一直到日本海岸的整个铁路线上的全部重地，都被增加到十二万人的捷克军队占领了。7月12日，海参崴的捷克人突然开始向西进攻。两星期以后，在纽约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发出如下的正式声明：

“捷克军究竟留在俄国或离开俄国，捷克人自己不能决定，这需要全体盟军来决定。（中略）捷克人不愿意被卷入俄国内乱之中，但是他们认为留在俄国远比被运到法国更有利于协约国的大义”。

（以上关于捷克人的记述，全部根据 Ross 和 Schuman 及 Coates 的著作。）

这就是在“西伯利亚被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虐待的捷克军”的真相。他们从来也没有遭到德、奥俘虏军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值

得重视的危害。这一点，美国的西伯利亚武装干涉军司令格雷布斯上将也在他的文章《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冒险》中断言如此。捷克人利用并背叛苏维埃的好意，组成反革命的中心。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所深知的。但是，援救被压迫民族这一题目，深受美国小市民的欢迎。威尔逊总统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武装干涉的借口。

7月8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石井大使会谈，主张日、美两国向海参崴派遣同等数目（各七千名）的陆军，去援救捷克军。“但是，这并不等于干涉西伯利亚”，在达到救援捷克军的目的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侵害俄国主权，马上撤兵”，他提议与日本发表一个日美共同宣言。

紧接着，7月12日，驻日本英国大使通知说，英国将为了“恢复海参崴的秩序”、“保护物资”和“救援捷克军”而出兵。上原和后藤等人渴望已久的机会，由于意外事件而突然到来了。美国要出兵了！马上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日本的态度，7月15日举行元老会议，16和17两日召开外交调查会，当日下午发出对美答复。其要点如下：

(1) 关于由日本供给捷克军武器，帝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意见一致，不胜欣慰。该批武器已经装运完毕。

(2) 帝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议的“派兵海参崴之事，欣然同意”。

(3) 美国国务卿希望这次派遣的兵力要“日美同数”（各两个团）。“然而对日本所使用的兵员如果加以限制，就足以使日本人民误解为列强怀疑日本的野心而予以掣肘”，帝国政府“不得不忧虑这将对微妙的国民感情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而且，“日美及其他协约国在这一目的下使用的兵力，应该根据需要，随时决定。帝国政府暂时并无多派兵力之意，但认为不宜预先加以限制。”这

就是说，对限制日本兵力，明确表示反对。

(4) 据帝国政府获得的情报，“德、奥势力对西伯利亚的压迫，只能预料今后必将愈益加甚，结果各协约国，特别是日本帝国由于地理关系，对其重要利益不能不感到严重威胁。因此，根据因前述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方针而发生的形势，也可能向西伯利亚出兵”（《后藤新平》III，第三章十一节）。

根据原敬和犬养毅（国民党总裁）及加藤高明（宪政会总裁）等人的传记，原敬和犬养毅在外交调查会上推翻了政府的“自主的出兵论”，而使会议通过了“协调出兵”。“自主的出兵论”是表面上响应美国提议，实际上按照日本独自的目的，“自主地”向必要地区派遣必要兵力的计划；而“协调出兵”则是限于在协调协约国要求的范围内的出兵。无论外交调查会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什么意见，但它的结论决不是“协调”论，而是可以归结为自主的出兵，这从上述对美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在上述答复中，日本关于兵员数目和行动范围，都强调由日本完全自由决定。不仅如此，外交调查会对美国提议就出兵发表共同宣言所作的决定是“日美两国立场不同，派兵的地点、形式亦不一致，因此各自单独发表适当宣言为宜”。日本政府答复美国的公文中也根本没有提到共同宣言（前引《后藤新平》）。这就是说，日本贯彻了完全自主出兵的立场。

据原敬的日记载，原敬在外交调查会上，一讨论到出兵问题，他就主张出兵须要慎重。他在7月16、17两日的调查会上主张：“没有重大理由而出兵，会不知不觉地酿成大事，对国家非常不利”，所以“此番出兵，应该只限于美国提议的救援捷克军，将来真正有必要时，再考虑向自卫上必要的地点出兵”。平田东助首先赞成原敬的意见，其他委员也倾向这个意见。但是，寺内首相“反复提议，即便为了救援捷克军，也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因此，在决定答复美国大体同意出兵海参崴时，也附带提到这一点。



至于文中所谈的自卫，以及帝国认为自己可在必要的地点独自决定出兵等等字样，全部删除了。”

这是原敬在会上竭力奋斗的结果。原敬从答复美国的政府原案中删去了“自卫”的字样和日本独自决定向必要地点出兵等刺眼的词句。但是，他不仅同意出兵海参崴，也同意寺内所主张的“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这就是说，事实上同意向西伯利亚派遣数目不限的大军。正因为如此，政府答复美国的复文，才写成上述那样。原敬与寺内、后藤等人之间的争执，在于侵略的程序、时期和外交上的准备，对于是否侵入西伯利亚，是否干涉十月革命的问题，他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据原敬的日记载，犬养毅主张“比政府还要激烈的大量出兵论”。加藤高明对寺内内阁坚持了在野党的立场，拒绝担任外交调查会委员。他认为“应该仔细考虑”出兵问题，对原敬在外交调查委员会上的奋斗深表敬意。他在7月18日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一向认为设立外交调查会没有意义，但唯有这一次的外交调查会是有意义的。他之所以反对出兵，只不过是野党的立场反对政府，强调出兵必须慎重，他和原敬并没多大的差别。同时，他对原敬的赞扬，是为了打倒寺内内阁、联合政友会打个招呼。

把加藤高明和原敬看作是对天皇制(特别是对军部)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那就错了。看一下原敬的日记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阿谀山县有朋的。同时，原敬对“民主主义”是最顽固的反对者。这一看他的日记，也很明显。这是贯串着他的全部政策的根本立场。大家都知道，他对军部大臣武官制和参谋本部的横暴，是有所批判的。然而，这无非是认为“如果迫于人民的要求，然后才采取措施，为国家着想是堪虑的”(《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七月八日)，作为一个对民众的动向十分敏感的绝对主义政治家，想对民众采取主动的一种策略。

尽人皆知，加藤高明是三菱财阀的政治代表，但这并不等于他是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他是天皇制的最大支柱。财阀的垄断资本是天皇制培养起来的，它确立以后仍旧得到天皇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保护，以天皇制为靠山。尾崎行雄曾代表加藤所领导的宪政会，在第四十届议会上攻击政府对俄国反革命派的援助不够，也没有打击布尔什维克，已如前述。另外，加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担任外务大臣，事实上居于首相地位。他硬使日本参加大战，也是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规定，中国军队和财政要受日本监督，警察也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中国军队的军火供应和军火生产都由日本垄断等等，任何侵略主义者也未曾想到的这类露骨侵略的要求，竟列出七条之多。就连山县有朋那样的军国主义者，也大吃一惊，认为这些要求对方不会接受，而加以反对。结果，这些要求被迫撤回了。由于侵略过火而尝到失败经验的加藤，现在对于打倒了他的内阁而成立的寺内内阁的冒险政策，即便主张慎重行事，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与天皇制在本质上有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

既然加藤高明和原敬的阶级立场同政府和军部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末认为主张自主的出兵是绝对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主张与协约国协调的出兵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见解，也就没有意义了。若说绝对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山县有朋，但他是主张出兵慎重论的人，已如前述。后藤新平在绝对主义官僚中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人物，但他却是最强硬的自主出兵论者。由此可见，这两种主张之间并没有阶级的和本质上的不同。不过，这时在统治势力间关于出兵的方法、时期、范围等发生了对立，这是日俄战争时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未曾有的，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漠视的。这里歪曲地反映了人民根本反对出兵的要求。原敬和加藤

高明是因为觉察到难以把人民拖入这场战争，所以才要求政府慎重从事的<sup>①</sup>。

日本根据前述对美复文的宗旨，于7月19日，不是把关于出兵的日美共同宣言，而是把日本独自的出兵宣言草案送交给了美国。这个草案中说：“首先出兵海参崴”，“根据形势”再向西伯利亚方面增派军队。美国对17日的日本的回答和这个宣言草案，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最后让步，提议把兵力限为美国七千，日本一万二千，英、法共五千八百（合计二万四千八百人，日本出兵占半数），这样就“可以满足捷克方面的希望”，现在只出这些兵力，“今后需要派兵时，再作为新问题，从新计议”，甚至说：“如果日本硬要派更多的军队，美国便退出这个共同派兵之举，与此脱离关系”。日本深恐美国退出，乃于8月1日下午召开外交调查会议，当夜答复美国说，“虽然预料有必要向海参崴以外的地方出兵，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有必要增援”，但关于兵力和地区，约定同意美国的提议。

8月2日傍晚，政府发表公报，宣布出兵。所以这样迅速发表，是唯恐美国对日本的回答再提出异议，因而打破外交上的一切惯例和外交礼节，与其说是抢在美国之前，毋宁说是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奇袭。这时正是早已担心的米骚动的大浪已经开始翻滚的时候。日本的统治者们哪里还能同美国拖拖拉拉地进行交涉呢！

日本立即向海参崴派遣第十二师团（一万二千名），8月16日，这个师团还没有全部抵达时，又把驻在南满的第七师团调到满洲里。美国对此责难日本的失信，说日本言行不一。但是，日本却驳斥说，这是根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行动，第三国不得过问。第七师团深入苏联领土后，又于8月下旬，把第三师团派到

---

<sup>①</sup> 我在《历史学研究》上发表这篇论文时，只是强调了“协调出兵”和“自主出兵”之间没有根本对立，并说这不过是战术上的推测不同，而关于统治势力之间发生分歧的意义，只字未提，这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外贝加尔方面。10月，驻在朝鲜的第十九师团的一部也进入乌苏里南部。从宣布出兵以来三个月，已经有三个师团<sup>①</sup>以上的日本兵奔驰于外贝加尔以东的西伯利亚了。

日本在8月1日对美国的提案表示同意，完全是口是心非<sup>②</sup>。虽然这是帝国主义者干的勾当，但是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现在连把它作为事实写出来都觉得很难为情。这种干法加深了日美的对立。这时已经孕育了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败涂地的一个因素。

###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失败

#### 第一节 军事和政治的矛盾

企图依靠高喊对外战争的“举国一致”口号来苟延残喘的“非立宪内阁”<sup>③</sup>，由于米骚动垮台了。政友会的原敬组织了后任内阁。这个新内阁，除了陆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以外，全是由政友会的成员组成的，因而被称为日本最初的真正政党内阁。非政党成

<sup>①</sup> 兵力的准确数字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学研究》上时，我写道：马上派遣了七万三千名兵。这是根据《后藤新平》写的。所谓在西伯利亚有七万三千名兵，是派兵最多的一个时期的数字，1918年内是否已经有了这么多，不敢肯定。

<sup>②</sup> 美国在8月4日发表出兵宣言。大意是：美国的出兵目的是救援捷克军和保护海参崴的军需品。毫无损害俄国领土主权的意图。美国的“唯一目的是，当俄国人为了恢复对自己的事业、领土和命运的统治权而努力的时候，美国将给予俄国人所愿意接受的援助。”

美国帝国主义把掠夺俄国人民的军需品、杀害俄国人民的士兵、占领俄国人民的铁路，都说成是对俄国人的“援助”。它还说：“合众国政府一有机会，将通过各种方法，为满足西伯利亚人民的迫切需要，传播有益的报导并对稳健的教育事业给以援助。”宣传捷克人遭受布尔什维克的虐待，就是它所说的“有益的报导”，把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民连同村庄一并杀光烧光，就是它所说的，“稳健的教育”。总之，凡是帝国主义，不论它是否象日本那样穷兵黩武，都是口是心非的。

<sup>③</sup> 即寺内内阁。——译者

员的三个大臣，特别是陆海军大臣，却是权力的中枢，总理对他们根本无可奈何。单从这一点也只能说这个“政党内阁”仍然是处于日本绝对主义范围内的内阁。事实上，原敬内阁并没有奉行与寺内军阀内阁在本质上有任何不同的政策。不仅如此，它还竟然实行了连寺内都没有实行的大规模扩军。一个内阁是否实行大扩军，是日俄战争后鉴别这个内阁是否多少具有进步性的最好试金石。《东洋经济新报》曾要求新内阁撤回西伯利亚的派遣军（9月15日），但新内阁却置若罔闻。

出兵后三个月，“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村镇都有了日本军。从海参崴到赤塔的各个车站，不论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中东铁路，都挂上了日本国旗。从满洲和蒙古通往西伯利亚的一切道路都被日本军占据了。可以说，日本用军队和商人把西伯利亚摆满了。

商人租用所有的房屋，收购所有的必需品。这并不是因为日本需要，而是为了在联军开始行动时，把必需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美、英、法军的司令部如果向海参崴以外的任何地方派遣一个少尉或中尉，日本随后就派去一个上尉。前者要是派上尉，日本就派少校，前者要是派少校，日本就派中校。毫无疑问，日本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协议时确保上级权。在这期间，日本占领了所有的商队道路，封锁了所有港口。任何商队和铁路以及任何河海船只，没有日军的保障，就不能通行”<sup>①</sup>。

从地理上看，与日本出兵的名义“救援捷克军”显然毫无任何关系的黑龙江江口的庙街也被日军占领了。满洲里附近变成了替日本军作爪牙的谢苗诺夫及其部下的非正规军（毋宁说是土匪）的根据地，他们跟随日本军进击到赤塔。日军的另外一个爪牙——哥萨克头目卡尔梅科夫，以绥芬河附近为根据地，跟随日本军深入

<sup>①</sup> 前引 Ross 的书以及该书引用的 Ackerman: "Trailing the Bolshevik".

到乌苏里地方。前中东铁路长官霍尔瓦特也率领一队反革命军驻在哈尔滨，与日本军部和元老山县有朋等人取得联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凡是日本军队所到的地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俄军”和“俄国人”——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以及其他类似的反革命匪帮尾随在后，对居民和公私财产恣意加以凌辱和掠夺。此外，日本军还纠合中国土匪，派往西伯利亚各地。日本军就这样暗中破坏治安，而表面上却以维持治安的“保护者”自居。但是，日军也干了许多不亚于谢苗诺夫的匪盗行为。例如，据1918年9月24日滨海省伊曼地区维闻斯克县冈达钦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报告，在伊曼车站附近守备乌苏里铁道的一座铁桥的日本兵，抢夺一切值钱的资财和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居民如果出来阻拦，马上枪毙。鸡蛋、面包、糖、茶、火柴、小刀等等，无所不抢。他们抢夺这些东西，并非迫于需要，只是为了开心<sup>①</sup>。

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部除了作战以外，还设了一个“政务部”，积极策划建立傀儡政府。占领军一进入村镇，立刻调查面积、人口、耕地乃至家畜、家禽的数目。但是，建立傀儡政权并不象军事行动那样顺利。最初山县有朋和后藤新平等人企图支持霍尔瓦特，让他来当西伯利亚东部的统治者，命令杉山茂丸和夏龟秋夫等人进行这项工作，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且计划给与霍尔瓦特一亿日圆借款。但是寺内首相等人唯恐英、美反对，没有同意，于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后藤新平〉III）。

武装干涉开始后，白俄方面分散在各地的反革命的各个“政府”和各个集团的代表协议，于9月5日，在鄂木斯克挂起“全俄临时政府”的旗帜。这个“政府”由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和人民党

---

<sup>①</sup> 前引“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还有关于谢苗诺夫和日本军的暴行，容当后述。

及其他无党无派者组成，受到亡命海外的克伦斯基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军全面支持这个政府，准备在它的旗帜下向俄国欧洲部分进攻。英、法、意三国打算供给这个政府武器，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反革命军队。美国与此相反，不是输送军需品而是输送经济建设材料和专家，企图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这样说，是满好听的，但骨子里是因为美国对重建对德东部战线或替英、法两国火中取栗不感兴趣，企图以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为名，把西伯利亚的富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早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美国就曾为取得乌拉尔矿山利权，进行过交涉。日本企图抛开其他国家，制造一个完全由日本一手操纵的政府。然而，可怜得很，它能够利用的，只有谢苗诺夫之类的党徒。

11月11日，世界大战停战了。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在阻碍他们回国的捷克人，渐渐明白了真相，对协约国和反革命派的不满开始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11月18日，反革命派的极右分子、沙皇专制主义者的俄国将校，认为“全俄临时政府”不重视他们，并对这个“政府”的“红色的”倾向心怀不满，掀起叛乱，推翻了“全俄临时政府”，在鄂木斯克市建立了沙皇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独裁政权。

高尔察克政权是一个赤裸裸的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他们对工农任何微不足道的要求，都用武力加以镇压。高尔察克的后台是英国将军诺克斯。英国虽然表面上在本国极力装做是“民主主义”的，但在西伯利亚却用全力拥护这个可怕的独裁者，企图使他向欧洲进攻。当时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即便作为单纯的借口，也无法再说什么重建“对德东部战线”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采取一致步调。美国政府因为自称是民主主义的旗手，按理说，为了装饰门面，也不能支持高尔察克政权。但是，因为另外没有适当的傀儡，最后也就追随英、法，给鄂木斯克政权输送武器和军需品。

不管这些国家的本国政府意图如何,当地的各国士兵,尤其是美国士兵,对高尔察克抱有反感,美军司令官格雷布斯甚至把本国运来援助高尔察克的武器暂时扣在海参崴不放<sup>①</sup>。捷克军说,我们是“为了各民族的自由和自决而战的”,因而不能支持鄂木斯克的独裁者,以致司令官西洛伏依不得不声明:“停战以来,士兵不愿与俄国人作战,愿意早日归国,与德国人和马扎儿人作战”。但是,他们一时也曾不得不在英、法的压力下,与鄂木斯克政府军一起向西进攻。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与协约国一起支持高尔察克政府,表示准备承认它是独立政府,运给它武器或军需品,为了替它准备支付武器的代价<sup>②</sup>,在1919年10月通过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借给它五千万日圆的贷款。这笔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英、美争夺富源,特别是从鄂木斯克政府取得库页岛的油田<sup>③</sup>。但是,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霍尔瓦特等人在当地日军的援助下对鄂木斯克政府进行反抗。田中义一陆相在1918年12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提议:鉴于谢苗诺夫反抗鄂木斯克政府,企图独立,而日本对此又不加制止,引起了列强的疑惑,“决定对当地陆军当局给以明确指示,命令制止谢苗诺夫的行动”。“内阁全体通过”(《原敬日记》)。

但是,谢苗诺夫和当地日军后来也没有改变态度。政府虽然对谢苗诺夫和当地部队的行动感到为难,却没有断然制止。这是

<sup>①</sup> Pauline Tompkins: "American Russian Relation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49。关于英、法、捷克军的态度,根据前引 Schuman 和 Coates 以及 Ross 的书。以下同,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加注。

<sup>②</sup> 《东洋经济新报》大正八年(1919年)11月1日号。据该报载,大正八年一月至八月间,日本向俄国亚洲部分的出口额是五千一百二十万日圆,比前一年的总额一千三百万日圆增加了三千八百万日圆。据推测,这部分是出口的军需品。当时政府还准备向高尔察克提供三千万日圆的军需品。

<sup>③</sup>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五月十八日条载:“内阁会议,加藤海相提出承认鄂木斯克政府后,相机要求库页岛油田的权利……会议通过”,同年七月三十日条载有英、美觊觎乌拉尔富源的情报,这可能是日本也觊觎了。经济问题后述。



因为当地日军的后台是参谋本部,不能抑制。日本的政策方针,乍一看来,往往有几个互相矛盾的方针,后来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军部和政府对立的反映,而这种对立还意味着日本的统治阶级,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没有明确的西伯利亚对策,更进一步说,也意味着人民的反战使统治阶层发生分裂。因此,这种对立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就拿“文治派”的首领原敬首相为例,他对援助谢苗诺夫其实也是从不反对的<sup>①</sup>。

日本除内部不统一外,对列强也有冲突。同时,日本所操纵的反革命派又极端无能和卑劣,以致不仅西伯利亚的工农,即便资产阶级和地主也视如蛇蝎。因此,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几乎没有希望。日本在军事上抱着坚决侵略的决心,在协约国中也处于最有力的地位。越是这样,日本也就越发在政治上受制于协约国。日本企图以军事力量来弥补它在政治上的无能,这就只能使得日本越发在政治上变得无能。日本所能操纵的反革命党徒属于最低劣的反革命党徒,决不是偶然的。虽然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样露骨的侵略主义者手下充当爪牙的,除了一伙匪徒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这也是当然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西伯利亚取得经济利权的努力,和它企图建立傀儡政府的计划一样,并没有轻易取得成功。在这方面,日、美间的对立,一开始就很显著。出兵前的1918年6月26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同石井大使会谈时,已经通知说,美国有意派“经济委员”前往西伯利亚。蓝辛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考虑经济上

<sup>①</sup> 《原敬日记》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二日条,大正八年三月十九日条内载,谢苗诺夫军反抗鄂木斯克政权“对我国不利”,政府(包括陆相)一致认为必须予以制止,尤其原敬首相在对大谷司令官的训令中加进这样一项:如果谢苗诺夫“不接受我方提议时,我方对他将考虑改变态度”,但同时,也打算使鄂木斯克政府承认“谢苗诺夫过去的功劳”。《原敬日记》五月十八日条载,该日内阁会议决定承认鄂木斯克政权的方针,如前页注<sup>①</sup>所載。但另一方面,田中陆相提议,对坚决反对鄂木斯克政府的谢苗诺夫等提供武器,原敬首相以下全体阁员一致通过。

的得失,而是在近乎慈善事业的基础上,供给俄国人民所缺乏的物品,换取西伯利亚的农产物,一方面笼络俄国的民心,一方面防止粮食落到德国人手里”。所谓“德国人”,其实是指欧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饿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施舍这个可怕的“慈善”,据蓝辛说,日本和英国都是俄国人所憎恶的,所以“为了事业取得成功,经济委员应由美国一国组织”。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利益决不能让美国垄断,便于7月30日决定,“为了对抗美国等国获取利权,帝国这时必须确立经济活动的基础”,在出兵后的8月18日,公布了“西伯利亚经济援助委员会”的编制,以目贺田种太郎男爵为委员长,任命经济方面的官僚、南满铁路、三井、三菱,大仓等大垄断资本家代表十四人为委员。在第一次委员会上,后藤外相在演说中说:“既然企图重建健全的俄国,帝国考虑其地位关系,认为首先救援西伯利亚,以此作为核心,渐渐波及俄国本部,是最好的政策”。在大资产阶级先生们的面前,官僚也坦率地说出干涉西伯利亚的真正目的(《后藤新平》III)。这个委员会成立时虽然也大吹大擂一番,但实际上只是在哈尔滨帮助创立一个日俄协会学校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原因是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与日本的希望完全相反,所以这些委员也就丝毫无所作为了。

日、美两国当时争夺的具体对象,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在这以前,美国在1917年2月革命后,马上承认临时政府,对它给与积极援助,7月,向彼得格勒派遣以史蒂文斯为首的“铁路委员”,接着派遣以艾马逊中校为首的、由三百五十名美国工程师组成的俄国铁路援助团。十月革命后,史蒂文斯和艾马逊一群人主张旧政权授给他们的职务权限仍然有效,声称从华盛顿的旧政府大使领取薪金,继续留在俄国,企图掌握俄国的铁路管理权。

及至8月,日军在西伯利亚登陆,日美两国围绕铁路的激烈斗

争马上开始了。日军在9月3日声明，把西伯利亚的全部铁路和中东铁路置于日军管理之下，并说史蒂文斯和艾马逊不过是技术顾问，他们管理铁路是美国干涉俄国的内政（诚然！），主张霍尔瓦特是中东铁路和乌苏里铁路的合法管理人。美国政府主张，史蒂文斯是俄国政府委任的“俄国人民的代理人”<sup>①</sup>。这就等于两个强盗在争辩谁是犯罪较少的强盗。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把西伯利亚铁路永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且决定利用这次干涉的机会，“把南满铁路的经营延长到哈尔滨。不管这段铁路是否属于南满铁路，从我国的政策来看，是必要的，必须相机行事”。原敬首相把这个意图已经告诉给关东长官和南满铁路的正副总裁（1918年5月8日。《原敬日记》）。对此，美国则以美国垄断资本家式的旁若无人的态度公开宣布“满洲铁路的中立”和从阿拉斯加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的“荒诞计划”（《原敬日记》，大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样一来，日、美两国的正面冲突便不可避免了。经过几次交涉，于1919年2月达成妥协，结果决定由参加干涉的各国各出一名委员，以反革命派的俄国人为委员长，成立国际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史蒂文斯的领导下，组织一个由各国技术家参加的国际技术团来管理全部铁路。

在这期间，日本军与外交官不同，本着它那一贯的“默默实干”主义，不是用唇舌而是用枪炮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说，西伯利亚的全部铁路，除了东端几个地点由美国军队守备外，日军占领全部铁路线，紧紧把着不放。不仅如此，就连美军守备的地点，也任其不断遭到谢苗诺夫军的攻击<sup>②</sup>。这样一来，日本虽然名副其实地粉碎了美国垄断管理铁路的计划，但同时，日本从西伯利亚取得

① 前引Tompkins的书。

② 同前注。

经济利益和建立日本所希望的统一的傀儡政权的计划也由它自己弄得不可能了。这是因为日本军和谢苗诺夫军占据铁路并不是为了它的统一经营，而是为了节节割断全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并加以破坏。没有交通运输的建设，当然就不能指望什么经济利益和政治的统一了。

## 第二节 革命的力量

1918年秋，也就是表面上获得最辉煌军事胜利的时候，参谋本部也已经感到，日本的侵略目的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已经大半落空了。上原参谋总长在1918年11月3日的信中写道：“我方在西伯利亚方面还没有什么象样的设施。（恐怕是害了恐美病。）过去，社会上指望内阁更换后，人心振奋，一切都能顺利进展。但是，目前并没有这种迹象。既然官僚和政友会终归都不堪期待，下一步就要看宪政会怎样了。总之，今后的推移是值得冷静注视的”（《元帅上原勇作传》下）。

“今后的推移”和上原等人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了。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以日本为主的一切侵略者的斗争，是没有任何妥协的。随着冬季来到西伯利亚，俄国人民发挥了可怕的力量，日本在军事上也开始败北了。这时日本人民为了打倒本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可耻侵略也作了一些贡献，对民族的名誉多少有所恢复，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如前所述，日本人民对于武装干涉十月革命，根本就没有给以任何支持。开战后，尽管政府百般鼓动，人民也没有积极响应。《东洋经济新报》这样写道：“试看出兵后的人心如何。不是任何地方也看不出战争气氛吗？人民对这次战争还不如对师团机动演习那么关心。我们的同胞究竟为什么在西伯利亚作战，不用说后方

的人民，即便是出征的军队，上自司令官下至士兵，恐怕都不理解”。该报在 1918 年 9 月，再一次要求赶紧撤回远征军（9 月 15 日的该报）。

军司令官对出兵的目的可能有所理解，但是士兵和人民实际上根本不理解。不仅如此，人民中的少数人也清楚地“理解”到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不但积极反对，甚至有人为了保护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而进行斗争。前边已经提到，日本工人的先进分子由于俄国革命而受到很大的激动，“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记住”：

“日本工人当时对俄国革命不仅隔着大海表示同情和共鸣，觉悟了的先进工人和当时进步的革命家甚至越过大海前往西伯利亚，亲身帮助俄国革命，勇敢地对正在进行侵略的日本资产阶级的军队作宣传，呼吁他们不要破坏俄国革命，不要把枪口对着我们的阶级弟兄的国家、工人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苏维埃俄国的工农。我们的同志，我们尊敬的先进工人，冒着莫大的危险，在西伯利亚，或主动来到俄国的欧洲部分，亲身援助了俄国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斗争。例如，佐藤同志，他就是在西伯利亚为了保卫革命，献身子非常困难的英勇斗争而在西伯利亚牺牲的”（市川正一述《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

这位日本的民族英雄，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牺牲的“佐藤”，名字叫三千夫，1900 年 1 月，生在官城县登米郡登米町。小学毕业后，进入县立中学，后来中途辍学了，十九岁那年夏天来到海参崴，在木村的火柴工厂当工人，一年后就同他的父亲不通音信了。后来在 1922 年（大正 11 年）春天，从海参崴秘密回到日本。他为什么回来？不详。“可以想象，他的偷渡目的，只有当时的南葛工会里的人们和已故的市川正一知道”（德永直《关于日本人佐藤》，《人民文学》第二卷第十号）。佐藤从东京马上又回到西伯利亚去了。1922 年 11 月，他尽管因患结核病发烧，但为了向后方传递紧

急命令，冒着冰雨，跑了几十里路，完成了任务。但是，由于发高烧，他终于在伯力的游击队医院里去世了，死时只二十一岁又十一个月。

为了纪念他，三宅伊之助（可能是假名）同志等人在西伯利亚将《列宁主义基础》译成日文出版，他在序文中写道：“他是日本工人群众中第一个为俄国革命牺牲的人。知道他的人很少。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他勇敢地渡过沼泽，越过山岭，饮泥水，冒雨雪，化装在各处出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军队中间宣传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后来，到1948年，佐藤被移葬在“无名战士之墓”里了。他在苏联以“日本人佐藤”闻名（德永直，同上论文）。<sup>①</sup>

参谋本部的军官们所忧虑的西伯利亚日侨受了“过激派”的“感染”，大概指的就是“佐藤”这类人。当时，著名的革命家片山潜正在美国，一面从事革命运动，一面不断研究日本的形势，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当然从正面加以反对。不过，当时这究竟对日本人民和士兵产生多大影响，没有史料可查。据推测，他在1919年秋，用英文写的论文“日本和苏维埃俄国”以及1922年他在西伯利亚向日本军呼吁赶快放下武器回国的三篇论文，都收在题为《片山潜呼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的论文集中<sup>②</sup>。片山对

<sup>①</sup> 我在《历史学研究》的一五三号（1951年9月号）引用《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记述“佐藤”的时候，关于佐藤的事迹，还一无所知。根据前引德永直的文章才知道上述情况和德永直已经在1950年6月的《人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日本人佐藤》。德永直与佐藤的表妹结婚，打算通过她从佐藤的父亲佐藤唯助那里查明佐藤是否还活着。佐藤唯助在1928年（昭和三年）从东京来的两个自称是“南葛工会的人”收到上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和佐藤遗下的几册笔记本，这时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当“游击队”死的，所以也没有敢声张。1951年11月27日，按日本习惯是去世三十周年，在故乡登米町的本觉寺，由同学和共产党支部的同志四十人召开佐藤三千夫纪念会。希望能了解详细情况。

<sup>②</sup> 《片山潜在呼吁》是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在他死后的1935年出版的。本书是二十五开本，共二百二十八页，有别拉·昆的序文，除卷首载有“无产者国际主

日本远征军士兵发的呼吁，是在武装干涉战争的末期，这虽然和我在这里所谈的这个时期不同，但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在转载其中最短的一篇全文。

“日本的老革命家对现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士兵的诚恳的劝告”

各位日本士兵！

你们是否想过，你们在西伯利亚拿着武器究竟是为了拥护谁和反对谁而作战的呢？

你们是否仅仅是你们的剥削者和刽子手——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的忠实的工具呢？他们不是经常以此自豪吗？

你们是否仍然相信你们为了反对俄国的工农而斗争，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同胞和家庭的安全和幸福”呢？

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和同胞”的那些说服你们的人，都是在欺骗你们。

日本的士兵弟兄们！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正确的思考而行动呢？

难道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革命后试图对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进行过危害吗？当然没有。他们一致斗争的唯一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反动的将军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都在同这种剥削者进行斗争。

---

义者片山潜”外，搜集 1918 年至 1933 年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和平而斗争的论文共二十三篇。本书的全部内容，它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日本人民最宝贵的财富。莫斯科出版的这部书有多少本传入日本不详，恐怕为数不多。我从山边健太郎氏那里看到了这个珍贵的文献。关于本书的全部内容，我想山边氏可能有所介绍。

再者，前面所引的文章，没有日期。与这篇文章一并收录的另外两篇同样呼吁士兵争取回国的文章分别在文后注有“1922 年 7 月 19 日片山潜”和“1922 年 5 月 12 日片山潜”。因而推测前引的文章也可能是在这前后写的。其次，这些文章的原文，就其目的来说，无疑是用日文写的，但是现在流传的这些文章不知是否是原文；作为向日本士兵呼吁的文章来说，未免外国文的气息太重了。

是否日本的工人和贫农——佃户，没有对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呢？

你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你们将站在哪一方面呢？当然，你们要站在自己的阶级那一方面，站在你们和你们的家属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一方面——工人和农民那一方面！

然而，日本的士兵弟兄们！在这里，在西伯利亚，你们却站在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军国主义者的一方面了！

你们大家都是为了杀人而到这里来的，即便你们不去积极地杀人，但是你们来到这里以及你们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就等于是扼杀俄国革命的刽子手的帮凶，这将给斗争中的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带来很多困难。

同志们，希望你们理解这一点，然后在反对日本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为了帮助你们的兄弟——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希望你们回家去！

各位日本士兵，你们现在可能听到你们的军官和将军说，不久将送你们回家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个诺言是因为日本的军阀受到已经奋起的日本无产阶级的压力，受到日本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压力。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诺言而已。

你们必须亲自强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履行这个诺言。你们必须向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表示，你们决心马上从西伯利亚撤退。你们必须把这件事通过组织，即通过士兵委员会向他们表明。同志们，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要求直接向你们的军官提出，监视他们，注意不要让他们象过去常常搞的那样，制造新的借口，把你们留在西伯利亚。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委员会，好通过它来监视他们。

打倒军国主义！

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工农兵联盟万岁！  
为苏维埃日本而奋斗！

片山潜

由于日本进步人士的奋斗，还由于向俄国现实情况学习，侨居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理解革命意义的越来越多了。《原敬的日记》在1918年11月2日写道：“从东部西伯利亚地方视察回来的参谋本部第三部长星野庄三郎少将来访。报告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其谈话（中略）。该少将深为忧虑，他说，凡是在当地有家属的我国预备役士兵，必须尽可能遣送回国。原因是住在过激派势力强大地区的我方侨民，已经有人受了他们的感染，有向我驻军进行宣传的危险。再者，美国兵的薪金每天两块美元，我国兵不过几分钱，因此非常危险”。

不仅侨居俄国的日本人，就连日本国内人民也正在变为“过激”了。在该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田中陆相提议说，鉴于某些日本人和外国人传播过激主义，有关各部门应该协商取缔办法。但是，这个问题不应该由多数人来讨论决定，应当首先由内务和陆军两部详细协商，拟定草案。同时，参谋本部有人报告，我预备役士兵在西伯利亚有受当地日本侨民感染之虞。关于这些，我曾秘密指示，采取适当措施，并令陆相和内相执行这个方针”（《原敬日记》）。

请看，专制主义者们竟不敢公开和同僚讨论对革命影响的对策，可见社会空气对他们该是多么险恶。原敬首相认为社会主义的传播，“事到如今，已经无可奈何。人民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国外的空气，一旦有人煽动，随时可能暴动”，他和山县有朋都为此担忧（1918年11月3日）。同时，他说：“据我看来，欧洲大战有导致突如其来动乱之虞，今日正是重要的时机，非有特别的决心不可”，他同田中陆相“就内政前途”互相披沥了“坚定的决心”（1919年4

月2日)。当时,被公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尾崎行雄等人,“正在对工人进行煽惑工作,为了在工人中间树立勤王的宗旨,希望由宫内省赐以资金”,这已取得元老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的同意。但是,宫内省认为这类事情如果被民间知道反而不好,所以没有拨给资金(1919年2月20日,《原敬日记》)。

资产阶级和地主们无视民众的这种情形,不,正是因为知道和担心这种情形,他们就越发想来一个“举国一致”的示威行动,于是在1918年12月的第四十一届议会上,首先全场一致通过“感谢陆海军官兵士的决议”。

当国内人民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由于西伯利亚的侨胞和从日本赶去的革命家的宣传教育,士兵们——穿军服的贫农和工人,对自己不能理解的战争,当然无法勇敢地战斗了。尽管远征军宪兵司令部在它公布的报告<sup>①</sup>中说,从1919年4月至1920年末,“没有过激思想渗入军队中的具体事实”,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上级对下级的不恰当的言行或下级缺乏自制力,往往也不无出现过激倾向的人”,又说:“往往忘了皇军出兵的本旨,或是因为身处异地,乘着战地的气氛,不无行动越轨的人”(指掳掠奸淫)。最初出征的第十二师团和第七师团,盗窃军需品的士兵很多,“尤以大正八年七月的凯旋时为甚”。换防的第十四师团,也是正在换防时期,“各地过激派纷纷兴起,到该年年末,我军士气昂扬,各地都有战斗,因而军纪也自然弛缓,违犯纪律的事件层出不穷,宪兵的活动频繁”。既然说士气一昂扬,军纪因而弛缓,那末,所谓的“士气”是什么,以及它与“过激倾向”的系关,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内的民众和远征军的士气既然是这样,军部当然不能使一

---

<sup>①</sup> 军事警察杂志社主千田崎治久编《续日本的宪兵》。还有,据说西伯利亚派遣军反抗上级命令的士兵很多,在当时以军官为对象的杂志《偕行社记事》时常有所记载,但我没有机会查核是否属实。

个部队长期驻在“坏思想的发源地”(石光宪兵司令官的训示)俄国了。大致上占领了全部西伯利亚之后,1918年11月,政府和军部决定把派遣军的预备役和后备役遣送回国。遣送有妻室的士兵回国的措施,无疑是根据上述星野少将的报告。据原敬日记12月19日条载,“现在的五万余人,将减为一半”,然而是否是“现在五万余人”和是否已经减为一半,不能盲目相信。

第二年,即1919年1月,第四十一届议会复会时,政府声称,东西捷克军的联络已经完成,当初出兵的目的已经大致达到。本应急速撤兵,但在捷克军完全撤回前,为了维持治安,暂时仍与联军协力,驻在该地,表示不久就可以撤兵了。

正当政府这样欺骗国内外人民,议会也在自吹自擂地说“陆军大大宣扬帝国威武于海外”的时候,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态呢?

预期很容易取得胜利而没有充分御寒准备的远征军遭到了零下四十度可怕的严寒的侵袭,每一百人中间出现了二十个冻伤兵(伊藤正德《国防史》)。同时比这个冬季严寒更可怕的是,西伯利亚的全体工人和农民起来发动了游击战。

1919年1月,守卫马萨诺瓦的一个小队全部被歼灭了。2月26日,在阿穆尔省的尤夫塔附近,田中大队三百一十余名士兵和西川炮兵中队被两千名游击队完全歼灭了。在同月28日的安得烈夫卡战役中,大队长堀少校以下大半阵亡了。铁桥和木桥,最多的时候,每天被破坏五十座。激怒得几乎绝望的日本军司令官山田少将在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布告说:“凡是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的村落,一律烧毁”(望月小太郎在第四十三届议会上对内田外相的质问)。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居民不分男、女一律被杀害了。但是,西伯利亚人民不仅没有因此被吓倒,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反抗。

另一方面，高尔察克军虽然一度攻到伏尔加河附近，但是从1919年5月起，遭到红军的大力反攻，开始全面退却，及至9月，日本政府也清楚地看出，已经没有挽回的希望了。这就越发鼓舞了西伯利亚的人民，游击战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了。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1919年3月，日本增派第十六师团，6月，第十四师团替换第十二师团，同月下旬又增派第五师团。从此以后，出征师团的轮换十分频繁。在整个出兵期间内，共计动员了十一个师团交替轮换。驻扎期间最长的，也不满一年半（其间几乎没有战斗）。这样频繁的轮换，据推测，一则是为了对国内外掩盖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实际兵力（实际上，政府和军部在议会上也是经常隐瞒出征兵力的），二则是为了防止士气的低落和感染“过激思想”。轮换越频繁，也就越发削弱战斗力。

日本军的败北，不仅是由于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日本士兵及人民的反战和厌战的情绪，在日本帝国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加速了日本军的败北。

早在1918年10月，驻在朝鲜的第十九师团的一部分兵力，据说是因为海参崴方面“有排日思想的朝鲜人”很多，妨碍军事行动，为了前去镇压而出动了（《大日本宪政史》VIII）。事实上，居住在间岛和乌苏里地方的朝鲜人，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时因为进行反抗而被驱逐的，或是在这以后被驱逐的，他们住在革命的俄国境内，现在亲眼看到革命的俄国以行动显示出它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朋友，因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也是毫不奇怪的。这样，当日本的驻朝鲜师团不得不分兵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1919年3月1日，有名的朝鲜独立万岁的革命起义<sup>①</sup>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用惨绝人寰的办法，花了一年的时间，

<sup>①</sup> 朝鲜人民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于1919年3月1日，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朝鲜全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般称为“三·一起义”。——译者

才把它镇压下去，但是无数的朝鲜民族英雄退入长白山脉，或者逃到间岛和西伯利亚，越发顽强不屈和刚毅勇敢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

《续日本的宪兵》一书记载着乌苏里南部诺沃基辅斯阔耶的朝鲜人大队，尼科尔斯克的“韩族中央会”以及各地朝鲜民族抗日的许多事实。不用说，他们也分别参加了俄国人的游击部队。

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勇敢的战士中间，以金日成将军为首，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在西伯利亚或满洲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其中还有他们的子孙。这和那位“大韩民国”的年迈的总统，在“三·一起义”<sup>①</sup>之后，逃往上海，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斗争，投靠美国，主张托管朝鲜，后来又在美国落户，可以说是鲜明的对比（朱可夫编《殖民地体系的危机》中所载夏布西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境内进行得很激烈，这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外，直接反对日本干涉俄国革命的事实也是很多的。在满洲里，谢苗诺夫军及参加该军的“日本义勇军”——它是由现役及预备役的日军将校指挥的——同中国军队在1919年8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另外，最初被骗参加谢苗诺夫军的中国人，中途反正的人也不少（《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

此外，《续日本的宪兵》还载有下列事实：在海拉尔及满洲里曾有俄国人、捷克兵、美国兵和中国人组成的国际反日地下组织；间岛地方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阿穆尔省和外贝加尔省边境附近，季福林的一个队伍同布尔什维克暗中联系；庙街的中国炮舰和中国平民的反日援苏活动；绥芬河的中国人的“红色游击队约八百名”的活动等等。当然这些都是被日本宪兵队

<sup>①</sup> 同前注。——译者

逮捕或解除武装的例子。没有遭到这种命运的更多的中国人进行了抗日援苏活动,是不难推测的。

最后,日本军与美军或捷克军的对立,也使日本的将军们为之大伤脑筋。美军司令官格雷布斯也承认,他不是忙于同布尔什维克或游击队的战斗,而是忙于监视日军和如何妨碍日军。当田中大队全部被歼的时候,驻在附近的美军分遣队虽然接到田中大队遭到游击队袭击的报告,却根本没有前去救援,也没有去阻挠游击队的集结。从那时起,日、美两国军队间的关系更趋恶化了(前引罗斯的书)。日本的宪兵队除了“搜索过激派的残党”以外,竟然把“调查某国的排日行动”也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日、美两国在一切问题上都发生过冲突。威尔逊总统为了统一他在西伯利亚的反革命政策和反日政策而如何大伤脑筋,以及武装干涉的失败已经明显后转而把重点放在反日上,这些在 Tompkins 的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对立是列宁早就指出过的。1920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地方党会议上分析日、美两国对立的激烈化时说道:“为了使他们对我们的战斗变得困难,我们必须系统地利用帝国主义者们的敌对关系。”<sup>①</sup>

既然有这样重重不利的因素,不论日本的将军们多么卓越(其实他们并不是有什么才能的),又怎么会有最后胜利的希望呢?

---

<sup>①</sup> 1918年5月,列宁作为“决定俄国国际形势的第二个对立,”举出日、美的对立,认为它“抑制着帝国主义对俄国的进攻”(前引塔特罗维奇的书)。本文所引1920年列宁的演说根据前引的 Tompkins 的书。

##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 第一节 庙街事件和占领库页岛

从 1919 年秋季起，西伯利亚的形势，对以日本军为主的全体武装干涉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红军逐日强大起来，高尔察克军继续败退。11 月 15 日，红军进入鄂木斯克。捷克军越来越丧失斗志，甚至对协约国心怀不满了。西伯利亚居民的游击战越来越广泛地展开了。而进行武装干涉的各国国内的舆论则强烈地攻击政府继续干涉政策，要求立刻撤兵。在西伯利亚，形势越加恶化，日本军和美军等的对立也越发加深了。日本军和谢苗诺夫匪帮的暴行，使日本军成了全体居民和全体协约国的憎恶对象。

由于高尔察克军最后崩溃的危机到来而惊慌失措的日本，企图再派新的精锐部队（六千人）前去，设法挽回局面。但是，在政府内部，高桥藏相认为如果把这毫无希望的武装干涉继续下去，日本的财政必将不支，主张莫若马上撤兵。这与陆军的大举增援的主张，是一个正面的冲突。经原敬首相在两者中间调停结果，决定首先与美国协商，美国如果同意，再增援大军，暂时先将半个师团的兵力派赴满洲。原敬首相虽然认为日本单独继续干涉，“国内舆论将不堪设想”，“不仅刺激人心，还可能发生重大事件，也难保不涌起过激思想的浪潮”，但他仍不肯放弃西伯利亚而作了如上的决定（《原敬日记》，11 月 24 日）。

美国因为预料武装干涉必将彻底失败，日本也不可能在西伯利亚达到目的，又迫于舆论的攻击，特别是出征士兵的父母激烈要求撤兵（前引 Schuman 的书），不但不再增援，反而决定撤兵了。1920 年 1 月 4 日，格雷布斯将军把兵力集结在海参崴，开始准备

撤退。

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也在1919年11月中旬说：“这种代价昂贵的干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只有法国和日本一样，决心把反苏战争进行到底。但是，它的主力远在俄国南部，日本在远东完全陷于孤立了。

捷克军公然背叛高尔察克军。当高尔察克所乘的列车于1920年1月15日开进伊尔库茨克车站时，捷克军协助革命军逮捕了高尔察克。从那时起，捷克军因为迫不及待地要从海参崴回国而火速向东进发。日本军及其爪牙——谢苗诺夫军却以全副力量阻止捷克军东进。日本军和捷克军到处发生冲突。日本军最初声称救援捷克军，现在竟与捷克军为敌了。

在日本，民众要求撤兵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垄断资本家方面也开始改变主意，这已经反映在高桥藏相在内阁发表的撤兵主张中。在第四十二届议会上，在野党宪政会的领袖片冈直温开始攻击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他说，当此各国纷纷撤兵之际，日本有什么必要单独坚持驻兵，替别的国家保护“秩序”呢？但是，高桥也好，片冈也好，他们都不是与民众站在同一立场而公开坚决主张撤兵，所以对军部和政府中主张驻兵的一派人的说服力很小。不过，武装干涉派面临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和俄国人民军事力量的壮大，已经大为动摇了。

结果在1920年1月，政府决定了新方针，由首相、陆相、外相三人列席，授予特使奈良中将发给派遣军司令官大井大将的一道训令。内容是：“选择适当时机，把我国军队撤到海参崴和中东铁路沿线，即中国领土内。尽量避免与布尔什维克冲突，以免日后麻烦。撤退的地点是为了我军在朝鲜和满洲的自卫。如果撤退到这些地点以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对我加以危害，方可改为讨伐”。此外，还训令奈良中将在归国途中顺便前往北京，协商履行“中日共



同防敌军事协定”事宜。这时田中陆相由于一时不慎，对奈良中将脱口说出：“库页岛也需要派兵”，于是内田外相马上订正说：“那在名义上很困难，虽然可以听任司令官处理，但除了发生不得已的情况，否则是不可以的”（《原敬日记》，1月21日）。

这个训令表明，当时日本已经十分动摇和恐惧布尔什维克，但它还不肯放弃野心，企图在“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名目下确保中东铁路，并且已经具体拟定占领库页岛的计划。

另一方面，政府在1月14日美军宣布撤退时声明说，日本由于地理关系与美国不同，住在西伯利亚的侨胞很多，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如果按现在的情况东进时，“不仅破坏东洋的和平，进而我国的存在也将受到很大威胁”，为了“保护侨民”、“维持东洋和平”和“自卫”这三个目的，还要继续驻兵到底。

当初响应美国提议为救援捷克军而出兵的借口既然行不通了，便马上改口又制造新借口。原敬在野时，曾在出兵问题上主张慎重论，说出兵应该限于同美国协调的范围内，但在他掌握政权后，却完全改变了主张。如果他当初的主张是站在同绝对主义本质上不同的立场上，那么决不会是这样的。其实，美军撤退时，正是日本多少可以维持面子的绝好的撤兵机会。这时撤兵只能提高政府对内对外的威信而决不会损伤它的威信。而原敬内阁竟错过了这个良机，反而想顽固地把武装干涉继续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和军阀气味相投的。

后来内田外相在议会上答复片冈直温的质问时，除了大致重复前述的政府声明的内容外，还补充说：“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海参崴和伯力方面朝鲜人很多，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数年前就对帝国进行种种阴谋”，所以，为了防范他们的阴谋，有在西伯利亚驻兵的必要。3月31日，政府对国内外重新声明了三项所谓日本驻兵的目的：

- (1) 保护侨民；
- (2) 防卫接壤地区即朝鲜和满洲；
- (3) 保障西伯利亚的交通自由。

这里又有了与1月的声明不同之处，这说明日本的统治者为了制造战争借口是如何地信口开河。但可以说，这三项目的却很坦率地表明了武装干涉的理由。第二项等于帝国主义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支柱。至于第三项，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为什么必须确保外国领土西伯利亚的交通呢？它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破坏西伯利亚交通自由的，不正是日本军吗？

现在日本的统治阶级非但不象最初那样诬蔑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抱着最大的憎恨，决心无论如何把它打倒。同时，他们又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及支持它的国内民众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人民及国际舆论等有所恐惧，从而在战略上必然摇摆不定。更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在1920年3月爆发为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部分大资产者也对前途渺茫的军事冒险感到消极了。

在西伯利亚，侵略军在败战之下迎接第二个寒冬，士气越发低落，军纪紊乱。军官们悲观失望，因而对居民施加惨无人道的暴行。例如，1920年1月3日，有个日本军官(Heida Tonaki)无故向一个名叫古谢耶夫的民兵开枪，因为没有击中，反被民兵擒住了。当民兵问他为什么放枪时，他答说：“是为了开心。”同一时期，有一队日军在距离沃洛斯特村一俄里的地方向该村开炮轰击，然后闯入村中，用机枪扫射其第一、第二、第三的三条大街以后，无故搜查所有村民的身体，奸污所有的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最后把民房和政府（地方自治政府）建筑物全部烧毁。好些无辜的老人和儿童都被他们当作寻乐对象而杀掉了。这样的事实，不下数千起。

在阿穆尔省，苦于异常严寒的日军残暴更甚于其他地方。单就伊凡诺夫卡村来说，就有数百名居民不是被机枪射死，就是被烧死。因此全体居民，不论富人或穷人，也不论哥萨克、农民或市民，都起来反对日军。由于日军的处境极端恶化和军事当局的消极方针，2月末，他们不得不暂时从阿穆尔省撤退了。所谓的庙街事件的整个背景，就是这样（根据前引《远东共和国的报告书》）。

在庙街，由于高尔察克军的完全覆灭而得到鼓舞的游击队，于2月5日占领了奇奴依里阿夫要塞，那里设有日军的无线电报局。然后游击队包围了庙街的日军（石川少校指挥的一个营和宪兵），前后三次要求日军投降和停止武装干涉。

第一次的军使索洛金被日军杀害了。第二次派到日军的军使是两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奥尔洛夫。日军作为答复，挖了奥尔洛夫的眼睛，烧了他的鼻尖和脚尖，用刀砍了他的背，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杀了他。他的尸体，后来被游击队挖出来在外国代表面前检验，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的残暴和违反陆战法规。第三次的劝降是2月24日（日本方面的全部文献，只记载这第三次的事情，对前两次的交涉和日军的违法和残暴都隐瞒了）。结果于2月28日，日军以下列条件向游击队投降了：

（1）日军无条件地和彻底执行阿穆尔省日军司令官白水中将（第十四师团长）提出的不干涉俄国内政的声明；

（2）解除庙街的白卫军的武装，把武装交给游击队；

（3）在游击队进入庙街市内占据战略要地以前，上述武装由日军保管；

（4）日军向游击队投降，撤退到双方协议决定的地区。

29日，游击队开入市内。白卫军把步枪三百支、三吋口径大炮四门和炮弹及其他武器交给了游击队。游击队监禁了市内的富豪反革命派，没收了他们的财产。3月11日，据日本文献记载，游

击队要求解除日本驻军的武装，于是日本驻军决心反击，该日深夜（12日拂晓）突然袭击了游击队的司令部。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后来苏联的使节越飞来到日本与后藤新平洽商日俄恢复邦交时，据越飞说：11日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市内终日欢腾，居民和游击队都喝醉了；日本军乘隙破坏投降协定，发动背信攻击。日本方面对此说法根本没有反驳（《后藤新平》IV）。这次奇袭等于是日军及领事、侨民的自杀。激战一个星期后，石川少校、三宅海军少校和石田领事及其家族全部阵亡，下余的官兵及侨民一百二十二名于18日投降，当了俘虏。

到了春天，游击队料到日军必将从海、陆两面大举前来复仇，5月25日，便从庙街撤退了。那时，他们放火焚烧城市，杀了日本俘虏和十倍于俘虏的俄国反革命富豪。这就是作为“过激派”的残忍凶暴的典型，直到现在还大肆宣传的“庙街惨剧”<sup>①</sup>。

在这个事件中，游击队从头至尾只有一个错误，即在撤退时杀死俘虏。但在这以前，日本军有无数的不法和残暴行为，而游击队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指责。而且，革命的俄国人民自己已经处分了这次游击队员们的暴行。同时就连日本帝国主义者，凡是多少有些良心和稍具常识的，例如加藤高明这类人（他曾在1919年11月宪政会大会上演说，主张坚决以武力消灭“过激派”。不过，他也只是认为日本不可单独派遣大军），也曾在贵族院的议会上断言，

---

<sup>①</sup> 本文主要根据俄国方面的文献“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和《后藤新平》第四卷越飞—后藤会谈的记录，并参照了《国防史》、《大日本宪政史》、陆军省新闻班监修《国防大辞典》、《续日本的宪兵》。

日本方面的文献是1920年6月，日军第二次侵入庙街时，从残存的反革命分子那里听来和加以润饰的，因此没有史料的可靠性。与此相反，“Japanese Intervention”是以革命政府对肇事人进行公审时的调查为根据的。这次公审不是为了给外国人看和听的，是为了维持革命纪律，在列强代表面前检验被日军残杀的游击队停战使节的尸体，也不可能是伪造的。再从越飞—后藤会谈来看，日本方面对越飞的主张终于表示屈服，这也足证越飞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庙街事件是“由于日本毫无理由驻军带来的自然事件”（第四十四届议会）。

越飞和后藤举行会谈时，日本方面最初要求俄国对庙街事件给予赔偿。但是，越飞把后藤的主张一一驳倒，并且说，如果日本坚持认为庙街事件是俄国的不法行为，那么日本可以向国际仲裁法庭控告。如果那样，即便是反苏主义者的法国籍法官，也一定会判决俄国胜诉。日本方面认为，如果“组织调查委员进行详细调查”，“不难预测，日本给与俄国的损害更大”，所以撤回了最初的要求。这就是说，日本当局已经供认，基本上，不合法的是日军而不是游击队。

实际上，就连美帝国主义的将军格雷布斯也承认，“令人战栗的残杀事件很多，但是与世界人士所听信的相反，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干的。可以平心静气地断言，在西伯利亚东部，布尔什维克杀了一个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就杀了一百个人”<sup>①</sup>。这里所说的“西伯利亚东部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惭愧得很，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及其傀儡谢苗诺夫匪帮。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庙街事件是进行更大侵略的最好借口，因此加以最大限度的歪曲，并大肆宣传。

政府最初指示当地驻军把兵力集结在海参崴周围和满洲，但是参谋本部和当地驻军不但不执行这一方针，反而于4月4日突

---

<sup>①</sup> Coates, "Arm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引用的格雷布斯的札记。此外，1922年4月12日，在美国上院的一个委员会上，前西伯利亚的美国派遣军莫洛中校 (Colonel Morrow) 对当时申请入境的谢苗诺夫作证时说，谢苗诺夫军杀害了十多万名男女和儿童。这样的大批屠杀是前所未闻的。他还说对美军来说，谢苗诺夫军“是比布尔什维克更可怕的敌人。只是因为另外一个姑隐其名的国家（指日本）从外部干涉，所以美军未能解除谢苗诺夫军的武装”。接着，格雷布斯关于谢苗诺夫军的残暴也作了证 (Ross, "The Russian Soviet-Republic")。谢苗诺夫的残忍肆虐，使日军也终于忍不下去了，1920年8月，日本从外贝加尔地区撤退后，强迫他下野，命令他隐居旅顺。第二年，即1921年夏，当谢苗诺夫到海参崴时，日军对他也曾加以压制。

然在滨海省一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6月，陆军省也秘密指令当地驻军占领整个阿穆尔省的土地（前引《远东共和国的记录》载有指令的全文）。7月3日，日本声明，在西伯利亚成立足以追究庙街事件责任的政府以前，占领库页岛，作为保障。

占领库页岛具有莫大的价值，因为那里富于石油、煤、森林和渔产，并可作为控制西伯利亚和北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政府和军部为占领此地永远作为日本领土，很久以来就进行策划并窥伺机会，这从前引《原敬日记》来看是很清楚的。该日记1920年6月25日条还明确记载，占领北库页岛后，“以将来作为日本领土的方针”来进行建设<sup>①</sup>。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饰其领土野心，声明向库页岛出兵的同时，撤退外贝加尔的驻军，但是为了保护日侨和防御对朝鲜的威胁，仍然继续在海参崴驻兵。

## 第二节 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当日本在库页岛及其对岸的阿穆尔省策划新的冒险时，除了日本外，其他协约国的军队，都在1921年6月末以前完全从西伯利亚撤退了。

另一方面，4月6日，在上乌定斯克<sup>②</sup>召开外贝加尔省劳动人民代表会议，建立“远东民主共和国”，并得到苏俄政府的承认。这个共和国除外贝加尔省以外，宣布阿穆尔省、滨海省及库页岛都是该国领土，而这些省的自治政府也都希望与远东共和国合并。但是谢苗诺夫军和日军盘据在赤塔，顽固地阻碍着上乌定斯克和赤塔以东的交通，同时日军直接压迫伯力省自治政府，对阿穆尔省也

---

<sup>①</sup> 关于库页岛的占领问题，参照《原敬日记》1920年6月12日、25日、9月10日，1921年5月6日、7月7日各条。

<sup>②</sup> 今称乌兰乌德。——译者

尽量施加压力，以阻碍在西伯利亚建立统一政权。

这里无暇详细叙述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政治斗争。总之，不管日军怎么玩弄阴谋，它根本没有人民支持，所以不能得逞。参谋本部在日军撤退赤塔一事上虽然顽强反对，但是就连军阀的鼻祖山县有朋在6月也说：“如果不迅速撤兵，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西伯利亚制造缓冲国是无益的”，上原参谋总长也终于不得不答应从外贝加尔撤兵了（《原敬日记》、大正九年六月九日、十二日、二十八日）。

赤塔的障碍物消除后，西伯利亚有了迅速统一的可能。11月9日，远东各省全都统一在“远东共和国”之下，莫都于赤塔。政府中虽然共产党员很多，但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

日本在这期间进行平定阿穆尔省的计划，也占领了库页岛，但是前者在8月突然停止了。理由是红军在波兰战线上打败了武装干涉军，威力大大增强了，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反日已激化了，这也使得日本的冒险家感到威胁。日本在库页岛把全部矿山都据为己有，驱逐原来的开采权所有人。因此，甚至白俄也都仇恨日本了。同时在这里拥有各种权益的美国资本家的反日斗争，也因此变得十分强烈（前引《远东共和国记录》）。

国内统治阶级的分裂也加深了。在7月的第四十三届议会上，宪政会的望月小太郎口似悬河地攻击了政府。他的演说并不是明确地坚决要求撤兵，尤其对库页岛问题只字未提，但却尖锐地指责了政府和军部武装干涉的失败。在1921年1月的第四十四届议会上，众议员的无党派俱乐部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明确对俄国不干涉的宗旨并建立通商互利的基础”。这个议案被否决了。另外，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在贵族院要求迅速撤兵。但他并没有说从库页岛撤兵，这就暴露了他的反对武装干涉在本质上与山县有

期没有区别。(加藤曾主张消灭过激派,已如前述。)不过,这些提议表明,统治阶级本身的各个有力派别都公开承认武装干涉失败了,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提议是有意义的。

尽管军部和政府在西伯利亚进行最后的挣扎,但是已经非常明显,武装干涉是无法继续下去了。1921年7月,政府向远东共和国提出实现非共产主义等七项要求,声称如果远东共和国接受这些要求,日本就从西伯利亚撤兵,但暗中仍旧在各地支援反革命余党,对远东共和国进行破坏活动。然而这些反革命余孽也都不久开始溃败了,1922年春,都被逼入海参崴,最后被解除了武装。

现在日军在西伯利亚已经没有任何反革命势力可以依靠了,日军本身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日本军部就不得不认真考虑撤兵问题了。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和俄国人民的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第二是诸如上述片山潜、佐藤三千夫的活动等。侨居西伯利亚的日侨的反战活动,和与此相呼应的日本国内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力量,要求政府立即撤兵<sup>①</sup>;第三是朝鲜和满洲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逐渐增强;第四是欧美工人阶级也要求日本撤兵<sup>②</sup>;第五是,如前所述,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一派对武装干涉的反对日益加强;第六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sup>③</sup>的对日攻势加强,日本已经不能象在大战中和在大战刚开

---

① ② 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时,日本工人提出了“承认工农俄国”的口号。

两个星期以后,英国的工会把英国对俄不干涉委员会的小册子寄给日本工会总同盟,通告说,日军如不赶快撤退,将与全世界工人团体联合起来抵制日货。

总同盟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和“立即开始对俄通商”的两项决议,为了实现这两项决议而展开了群众运动。6月,在东京成立思想团体和工人团体的“对俄不干涉同志会”。8月,表示日本人民对俄国欧洲部分的饥馑的同情,由总同盟的革命分子、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成立“俄国饥馑救济委员会”。这些运动在秋季扩展到了关西地方。统一领导这些运动的“日本共产党”也于这年7月在地下组织起来了。(前引市川正一的书,赤松克麿《日本社会运动史》,菊川忠雄《学生社会运动史》)。

③ 除了前引的美国人所著各书以外,在G. F. Hudson, *The Far East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Press(1934)中关于日美的对立,也有扼要的记载。



始后那样在远东充当独裁者了。由于以上这些理由，1922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于不得不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兵了。

10月25日，运载最后一批日本兵的船开出海参崴港。这时红军的西伯利亚第四军在俯瞰港口的高地上布置了炮列，作好日军如不及时撤退，随时将予歼灭的态势。

在整整四年零两个月的期间内，耗费了七亿六千万日圆军费，驱使七万三千名士兵徬徨在西伯利亚的旷野和森林中，进行武装干涉，结果以狼狈不堪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帝国主义者仍然继续盘踞在库页岛，但是结果一无所得，终于在1925年5月不得不撤退了。那时正是男子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刚刚公布之后，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偶然的。

长达七年之久的对苏武装干涉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切非正义战争中最不正义的战争，武装干涉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本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天才的将军和政治家都无法避免的。

失败的不仅是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人，都一齐遭到了最狼狈的失败。

象日本那样对武装干涉越是积极的国家，它的失败也就越惨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军事评论家们把西伯利亚惨败的原因归结为兵力不足和战略动摇。所谓兵力不足，其实就是士气不振的日军敌不过俄国全体人民的奋起，所谓战略动摇，并非政治家和军人个人的错误和优柔寡断，而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它的脆弱性。

换句话说，这就是帝国主义企图扼杀社会主义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因为：

第一，尽管帝国主义怎样宣传社会主义是“过激派”、是魔鬼，但事实本身却教育了人民群众，帝国主义毕竟不能阻止群众的觉悟。所以，即便在天皇制的日本，也难以避免干涉军的士气低落和

后方人民的反战、厌战的情绪。

第二，完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不论俄国人、中国人和朝鲜人，人人都有为保卫祖国和保护自己而战斗的清醒的觉悟，他们确信自己是站在历史的进步必然胜利的一方面，因而产生无比的勇气和周密的思考，对侵略者敢于抗战到底，直到最后一人为止。

第三，这次革命鼓舞了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特别是邻近的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奋起参加反帝斗争。

第四，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本消除。

第五，国内统治阶级各个集团间发生分裂，并且日益加深。

这些都是前文具体叙述的事实。由于这些理由，帝国主义必然发生兵力不足和战略动摇的现象，结果被社会主义打败。这是1918—1925年在日本，同时也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实。但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从1918—1925年的失败中汲取任何经验教训。当时上原参谋总长最信任的部下荒木贞夫（他在十月革命后任中校时组织谢苗诺夫军，充当反革命战争的先锋，1918年7月升为上校后，担任西伯利亚派遣军参谋，以特务机关长的身分忙于建立反革命政权，他是推进武装干涉战争的“骨干军官”），后来升为中将、大将，成了侵苏战争的不断的和最高的策划者和鼓吹者。因此，荒木现在被判为战犯，晚年不得不系身于囹圄中了。<sup>①</sup>虽然如此，日本和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仿佛仍然没有从西伯利亚战争和荒木等人所遭遇的命运中汲取教训。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无视这些事实，帝国主义不可能战胜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历史的教训仍然有效。哪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小国家所进行的干涉，也是绝对不会胜利的，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

---

<sup>①</sup> 据报载，荒木在1958年4月已被岸信介政府不法释放。——译者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作者 =

页数 = 2 4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 日本军国主义

(日) 井上清 著



三



# 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

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

〔日〕井上清 著

马黎明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新版日本の軍国主義 III

軍国主義の展開と没落

井上清著

据日本现代评论社1977年7月初版译出

2568/20

内部发行

RĪBĒN JŪNGUÓ ZHŪYĪ

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

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

〔日〕井上清著

马黎明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80

---

1985年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13千

印数13,200册 印张9

定价：1.50元

## 目 次

对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的说明 .....	1
第一章 军部的形成 .....	5
第一节 “军部”的概念 .....	5
第二节 天皇制军队与人民 .....	14
第三节 军队从政府独立出来 .....	28
第四节 军阀的形成 .....	44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部”的形成 .....	57
第二章 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 .....	74
第一节 军部同政党和人民的对抗 .....	74
第二节 军部对中国的干涉 .....	92
第三节 军部的后退和准备反击 .....	115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	
——《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 .....	136
第一节 围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各种思潮 .....	136
一、参战思潮 .....	136
二、反对参战、反对要求利权 .....	143
第二节 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的各种思潮 .....	151
一、“应该尽快放弃满洲” .....	151
二、“二十一条”要求的热潮 .....	158
三、唯一的彻底反对论 .....	168
第三节 大战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 .....	173
一、对内——民本主义,对中国——帝国主义 .....	173
二、真正的“日华亲善”论 .....	189

第四节	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顶峰 .....	185
一、	巴黎和会前后 .....	185
二、	“放弃一切的决心” .....	193
第五节	批判帝国主义论的动摇 .....	203
第四章	侵略中国的七十年 .....	211
序	.....	211
第一节	友好的两千年 .....	212
第二节	对欧美的从属及对朝、中的侵略 .....	220
第三节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	228
第四节	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	234
第五节	是实行经济、政治侵略？还是采取军事高压政策？ .....	241
第六节	为走向“九·一八事变”铺平道路 .....	247
第七节	战线扩大，国内法西斯体制的推进 .....	257
第八节	日本侵略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 .....	265
第九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中战争 .....	271
跋	.....	278



## 对新版《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的说明

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的第一、二两章，相当于旧版《日本军国主义》第一册“天皇制军队的形成”序言中预定编入的项目——“军阀和政治”。第一章“军部的形成”和第二章“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其内容互相衔接。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推行者——“军部”，最初以“军阀”出现，不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便发展成为“军部”，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牢固地占据了日本国家机构。第三册的前两章旨在阐明这一历史过程及其结构。

其次，第三章收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一文，论述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杂志《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观点在舆论界和思想界所占的地位。由此我想阐明在我国国民中间曾经有过如此了不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潮流，同时还想剖析一下这一潮流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很快受挫的原因。

最后一部分，收录了概观近代日本侵华史的“侵略中国的七十年”。“侵略中国”正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自始至终一贯的主要目标。而这种侵略的不断继续和升级，终于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惨重失败和彻底崩溃。这段历史连同本书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所载“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的惨败历史，对现代的军国主义分子也好，对其反对派也好，都将成为一面很好的镜子。



第三册各章论文最初发表的标题、发表单位、时间及改动如下：

第一章“军部的形成”是原标题，发表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发行的《人文学报》第二十八期上（1969年）。

在将上述论文收录于本书时，只将原文中的“前言——‘军部’的概念”的“前言”部分改为第一节，原文第一节改为第二节……，以后类推，并对原文略加整理，内容没有改动。但在最后简单补充了宫中设立侍从武官府一事。

第二章“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是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与社会》（1969年，岩波书店）一书中的论文之一。该书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

原文第一节就“军部的形成”作了简述，这次全部删掉，因为与第一编论文内容重复。所以把原文第二节在本书改为第一节，开头部分稍许作了改动。第一编论文和这个第二编论文几乎可以看成一篇论文的前后两部分。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是井上清、渡部彻合编的《大正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1972年，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书中的论文，该书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

原标题为“帝国主义批判论”，没加副标题。即使如此，如果放在原书中，还是可以领会题目的意思的，但是，如果单独提出来，是何时、谁批判的就不明确了，因而改动了题目。文章内容几乎并未改动，只在两处补充了不足一页。其一，在第一节末尾收录了提纲挈领地概述《东洋经济新报》对整个国内外政策所贯穿的民主主义（不是民本主义）立场的社论及其纲要；其二，在第三节末尾补充了主张台湾和朝鲜实行“自治”、“独立”一点。

以上两点，在《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中，是重

要的、不可缺少的。本来，我的论文只是在发表集体研究成果时我所分担撰写的部分，所以它不是全面完整的东西。当把它从原书抽出另行编入其他论文集时，按说最好应该把《东洋经济新报》的基本立场、它对朝鲜和台湾的看法以及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的主张，具体地加以详述，但因这些方面，已由我们集体研究组的其他成员写得很详尽，所以如上所述，本书只极简单地作了抽象的补遗。

第四章“侵略中国的七十年”，是将朝日新闻社编《日本与中国》第二卷（1971年）《日中关系是什么？》中的“侵略的一百年”一文改题写成的。

原文把侵略不仅限于军事侵略，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仍与中国领土台湾的“中华民国”伪政权保持“邦交”关系，对其继续进行经济侵略，继续推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也包括进侵略时期内，题为“侵略的一百年”。但以日本旧军国主义为主题的本书，只限于军事侵略，将范围定为从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到1945年战败的七十年。日本战败后敌视中国的问题，将在以战败后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为主题的第四册中论述。

---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刘剑乔同志曾对译稿提出  
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译者补记



## 第一章 军部的形成

### 第一节 “军部”的概念

凡是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军部”专制时代的人，即使对“军部”一词不能给以一个明确的概念，也能对其基本的涵义和内容有一个感性认识。一提到“军部”，就会使人联想到，它是一股特殊强大的势力，它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军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或者甚至可以说，“军部”是由“少壮派军官”、“中坚军官”等组成的一个集团。然而，如果所说的“陆军当局”或“军事当局”，和所说的“军部当局”实质上即使相同，但后者并不单是“军务当局”，另外还有“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的涵义。本来，“军部”一词就容易具有这后一种涵义的因素。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陆海军逐渐走向与政府相对抗，不久便几乎牵着政府走的过程中，“军部”一词便盛行起来，指的是变成了对抗政府的一股政治势力的陆海军了。

我不准备考证“军部”一词从什么时候用起来的。1898年台湾驻军的一个特务曾以“陆海军当局”的涵义用过“军部”一词（参照本书第50页），但这是极其罕见的例子，除此以外，在1910年以前的公文、报刊、杂志、书籍及其他文件上，我还没见过“军部”这个词。我首次看到这个词，是在1913年2月2日田中义一少将（第二旅团长、前陆军省军务局长）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的信件里。信中田中向寺内详细报告了日本国内的政情，并谈论了对

策<sup>①</sup>。内称：

“自去年年末以来，鄙职从未得见公爵（即当时的首相桂太郎），窃惟当今最须注意者，乃军部之态度。万一海军属政友会<sup>②</sup>，陆军属新政党（桂太郎正在组织），各据分野，实为国家堪虑之大事。窃惟今后至要者，乃陆海军协同一致，屹立于政党之外。（中略）再者，此次桂公建立之政党，恐将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sup>③</sup>。”

显而易见，信中的“军部”，意味着陆军和海军的总体。此外还有一种设想，即“军部”要形成对抗政党和政府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假设这封信要写在1930年以后的话，信中的“陆海军大臣”就应该写作“军部的大臣”，可见当时“军部”这个概念还很难说已经确立起来了。

比这封信晚三个月的“大正二年夏初”，陆军省军事科长宇垣一成大佐撰写了《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一文<sup>④</sup>。文中多次使用了“军部”一词。他所以特意使用这个词，当然可以了解。因为宇垣是在上述田中担任军务局长时的手下的科长，1912年（大正元年）12月，同田中局长共同策划要强行增加两个师团，结果没有成功，从而导致上原勇作陆相单独辞职、西园寺内阁垮台，进而又造成了那年“大正政变”的原因。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宇垣是主谋之一。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部“中坚军官”的先驱。他写这篇文章是在大正政变以后不久，对山本内阁<sup>⑤</sup>废除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的问题，提出了如下的反驳意见：

---

① 《寺内家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书，全文见本书第79页。

② 政友会：（1900年8月25日—1940年7月），即立宪政友会的简称，由伊藤博文创建，与民政党同为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多次掌握政权。——译者

③ 陆海军大臣官制：指陆海军大臣须由现任武官担任的制度。——译者

④ 《宇垣一成日记》1。

⑤ 首相山本权兵卫。——译者

“据吾人所知，从未闻当时<sup>①</sup>就后任陆相进行内部磋商之事，故政党者流所谓后任难产云云，据吾人观之，纯系揣度臆测军部之意向，可谓徒自画鬼于壁，望而生畏，自欺欺人……。”

“掌管军政、统辖军人军属<sup>②</sup>、且负有行使统帅权、堪称军队首脑之陆海军大臣，竟肆意扩大其任用范围，甚至扩大到可随意加入政党派系之预备、后备役军人，使吾人不得不有所醒悟：终将遇上拥戴热狂于争夺政权、具有党派关系之人物为陆海军部首脑之时期。（中略）将政党人物安插于军部首脑要部，能否使属下众多官兵正确遵守先帝陛下之圣谕、陆海军刑法之要求，实在令人怀疑。”

宇垣主张“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的基本理由有以下四条：（1）、如引文所述，将“酿成军人最忌讳之党派思潮”，违反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军人敕谕》，挫伤军队士气；（2）、“军部大臣”平时主宰需要渊博专业知识与经验之军政，战时则成为大本营“重要决策人之一”，故必须是具备“卓越的用兵见识”和“日新月异的军事知识”者；（3）、“危害命令与服从之关系”；（4）、“危害统帅权之作用”。

宇垣也好，田中也好，他们都顽强地想把军事置于一般国政之外，由此便产生了包括军政在内的一切军事，都应该由不受政府控制的“军部”来独断专行的想法。另外，“军部”也可单指陆军，而不是指整个陆军和海军，这可从上面最初引用的宇垣的文章看得出来。这种把“军部”同政府并列起来的思想，在一份标有“绝秘”字样的陆军内部文件《鉴于时弊，关于拥护军令权独立之建议》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据推测，这是1914年的文件，<sup>③</sup>摘录于下：

① 指上原勇作陆相辞职之时。

② 军属：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译者

③ 小林幸男：《海军大臣事务管理问题始末》，《法学》杂志，12之1。

“内阁总理大臣虽以首席国务大臣组阁，但对属于政务以外之国防事务，毫无置喙之权，更何况国防所需兵力之裁决乎！（中略）当今正值我军制危机，建军根本行将动摇之秋，故宜在扩充兵力之前，牢记军制要义，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先行协商，基于完全一致之意见，与行政部交涉，以维护军令权之独立，不至贻误国军之建设。如行政部因财政状况，不能接受军部要求，双方则应进而一再协商，自定缓急顺序，决不可仰承内阁之成案。”

文中以“军令权独立”为武器，把兵力的决定也列为内阁不得干预的事项，并在文字上把“行政部”<sup>①</sup>与“军部”对立起来。这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军部”的基本涵义。1913至1914年间所以形成这样的概念，正是因为在此前不久已经形成了“军部”的实体。阐明“军部”形成的历史，是本文的主题。本节先回顾一下“军部”这个概念的演变过程。

以上引用的只是陆军内部的史料，而且田中和宇垣都具有强烈的“军部”思想，并且是亲自实践这种思想的政治军人。最后引用的史料，据推测可能是山县有朋或其亲信田中义一写的“建议”<sup>②</sup>，如果推测不错，那么山县有朋正是创立军部的最高领导人。在他们当中形成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概念，应该说是当然的。在这个时期和大正年间使用“军部”一词的例子，除了陆海军内部的文件以外，我只在军事评论家西本国之辅的文章中，看到一次。西本国之辅是个退役骑兵军官，他始终反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统帅权的独立和扩充军备。1913年，西本在《修改贻祸之军相官制》<sup>③</sup>的短文中，批判了山本内阁一味地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将官，强化参谋本部权限的作法。他指

---

① 行政部·指政府。

② 前引小林幸男的论文。

③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1913年（大正二年）7月1日。



出,在这次修改中,“长州阀军人估计到,在看到文官出身的军部大臣以前,舆论界必将群起而攻之,于是便采取了企图坚守参谋本部的方针。”

这里所说的“军部大臣”,并不是居于政府之外的“军部”的大臣,而是指在政府里负责军务的大臣,但他为什么使用了“军部”一词,却不得而知。这个时期前后,除了前面引用的陆军内部公文以外,一般社会上都把陆海军大臣干脆写作“陆海军大臣”或“军务大臣”。西本的这篇文章,标题用的也是“军相”一词。在下一期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sup>①</sup>上,刊登了法学家林毅陆对该问题的意见,文章中只用“军务大臣”这个词。此外,例如《日本及日本人》杂志<sup>②</sup>上刊载的以《设置国防会议引起的麻烦》为题的文章中写道:“不称国防而只称防务,实则也是由于内阁屈服于陆海军所主张的关于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员的大权论”,这里所说的“陆海军所主张的……”,如果文章是1930年以后写的话,就很可能将“陆海军”写成“陆海军部”或“军部……”。

总之,这一时期,尽管有极其罕见的例外,但一般社会上还未出现“军部”这种提法。对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陆海军,社会上只称之为“军阀”。当然,“阀”字是含有贬意的。陆海军当局所说的“军部”,不过是把社会上非难的“军阀”在军队本身的主观上认为没有任何恶意的理所当然的表现罢了。例如1922年2月,众议院有人攻击帷幄上奏权,吉野作造也撰文《论所谓帷幄上奏》,前后五期连载在《东京朝日新闻》,攻击“军阀”。而作为回答各报纸都在《帷幄上奏辩》的标题下,发表了“陆军当局谈”,其中就规定了所谓帷幄上奏权的内阁官制第七条说:“近来认为此条款招致军部专横,妨害一般政务的统一……”;“社会上往往评论说,参谋本部或

① 1913年(大正二年)7月15日。

② 1914年(大正三年)7月1日。

军令部是军部最终最高的决策机关,由它来决定军备,对此,内阁、议会也只好唯命是从,这只能说是不符合实际的议论”等等。这里所说的“军部”,就是当时社会上所说的“军阀”。1930年以后的军部,无非也是一种军阀。因此,太平洋战争以后,有不少人把军部叫做军阀。书名上也有这种表现,如《军阀专横的真相》<sup>①</sup>、《军阀暗斗秘史》<sup>②</sup>、《日本军阀暗斗史》<sup>③</sup>、《军阀兴亡史》<sup>④</sup>等等。

如果把军阀称为军部,字面本身并无贬意。而且这个词具有始终把政府看作是行政部,军部则是一个同它并列的特殊的国家机构——它正是军阀的本意。因此,宇垣者流在他的《一如庵随想录》<sup>⑤</sup>中,一再用了“军部”一词。而且有不少地方涵意是指陆军,可以说,这反映了陆军特别军阀化了。而且我还觉得并非偶然的巧合的是,自从滨口内阁<sup>⑥</sup>取代了田中内阁<sup>⑦</sup>,宇垣一成再次<sup>⑧</sup>当上陆军大臣以后,在报刊杂志上,“军部”一词越来越多地代替“军阀”而出现。田中内阁的首相田中义一,是尽人皆知的长州军阀的巨头,所以田中内阁被反对派称为军阀内阁。而民政党的滨口内阁,由于前内阁不得人心的反动,人们对它比较抱有好感。宇垣陆相在陆军省内组织了一个“军制调查会”,为了适应政府紧缩财政的方针,摆出了陆军似乎也要精简的姿态,使社会上攻击军阀的声浪消沉下去。此事和批评当局时不称军阀而称军部,可能有关系。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的,例如《大阪朝日新闻》在批判

① 1946年,田中隆吉。

② 1946年,马岛健。

③ 1947年,田中隆吉。

④ 1958年,伊藤正德。

⑤ 公开出版的书名为《宇垣一成日记》。

⑥ 首相滨口雄幸。——译者

⑦ 首相田中义一。——译者

⑧ 1929年7月。

“军制调查会”的社论<sup>①</sup>中指出，甚至连当初对调查会寄托希望的人们，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军阀为了缓和社会上裁军的呼声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篇社论还指出，“专门研究军事策略的陆军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国家的思想、产业和财政”，因而反对他们想要审议国防根本方针政策，强调了政治优越于军事，但它的调子却很温和，只停留于攻击“军事当局”、“陆军当局”的秘密主义。若是1920年前后的改革派，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不会称它是“军事当局”，而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它是“军阀”。

在此以前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尚未见过“军部”的提法。翌年，1930年3月，该报在报道政府与海军军令部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sup>②</sup>上意见对立的新闻时，写的也是“海军和外交当局的意见，处于决不相容的状态。”<sup>③</sup>，“海军方面始终强硬”<sup>④</sup>等等，并没有使用“军部”一词。“军部”的提法首次在该报出现是4月1日的社论，其中写道：“海陆军与外交当局在国防上犹如车之两轮”，“外交当局同军部当局的协调，绝对必要”。这里所说的“军部”，是与外交部门相对而言，指陆海军所有的军事部门，还看不出它具有对抗政府的特殊政治势力的涵义。但第二天，即4月2日，在报道加藤军令部长凭帷幄上奏反对政府妥协案的消息时，以《咨询枢密院之前，是否采取适当方案——军部保留的最后手段》为题，报道说，“因为条约内容与国防计划有关……，所以军部企图采取奏请召集军令事项的咨询机构——军事参议院会议，以采取适当措施的方针。（中略）认为这大概是军部今后所要采取的最后手段。”就是说，这里是将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与政府相对抗的海军军令部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29年（昭和四年）11月10日。

②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在伦敦召开，会上美、英、法、意、日等五国签订了《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译者

③ 《大阪朝日新闻》，3月28日。

④ 《大阪朝日新闻》，3月31日。

长为中心的海军首脑部门,写成了“军部”。

在批准“伦敦条约”<sup>①</sup>的过程中,内阁与海军首脑部门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统帅权独立的问题,骤然尖锐化起来,不管是海军、陆军还是其整体,总之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与政府相抗衡的“军部”的概念,迅速一般化起来了。

可是,在此以前也有过表示对抗政府的军部这一概念的例子。例如1928年6月27日的《国民新闻》,就公布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和处罚其负责人的问题报道说,主张坦率地公布事实真相并在较大范围内处罚其负责人的田中首相同持反对意见的陆军之间发生了对立。还发表了以《因满洲某重大事件,首相与军部意见冲突》为题的文章,文中指出:“在上原勇作元帅等军部巨头之间……”、“陆相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懑,待军部首脑之间达成协议后,再作出某种回答……”<sup>②</sup>。另外,三宅雄次郎主编的《昭和四年史》<sup>③</sup>,在有关宇垣陆相提出的军制改革方案的记述中,曾提到“对于陆相不惜裁减师团的积极意图,在军部内,尤其在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内,出现了反对意见”,“然而,在军部尚未确定基本意见之前,政友会已先主张整理削减陆军军备。迫于这种形势,陆军部内巨头之间亦逐渐达成谅解。”

通观这些史料可以看出,1929到1930年(昭和四到五年),陆海军当局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用过的“军部”这个概念,已在一般社会上使用,它的涵义是以陆军或海军的各自军令机关作为中心,但并不止此,还包括陆海军省、军事参议官、元帅在内的所有军队首脑或者陆海军的总体,这些都不是只限于本来的军务,而是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在政治问题上或多或少强调自身的政治势力了。在

① 伦敦条约:即上述《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译者

② 据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册中的引文。

③ 1930年(昭和五年)2月出版。

这种军部立场的根子里，已经不仅是统帅权的独立、军人垄断军事、不准政府和议会介入军事，而且还有企图使政治从属于军事的思想。以“伦敦条约”问题为转机，军部同政府、执政党以及广大人民的舆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时军部固然失败了，但由于这种尖锐的对立本身，使整个社会对军部的存在具有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陆军和海军都对政府和议会越来越不信任，可以说，加强了军部的军阀性。同时，所谓的“青年军官”和“中坚军官”这一伙人成了军部的引爆力，接连制造了1931年的“三月事件”、同年9月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其次是“十月事件”、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和战争，军部逐步确定了对政府、政党、议会的决定性的优越地位。同时，“军部”一词，也逐渐用于那些并非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军事当局。例如1932年12月29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以《我军部密切注视热河风云》为题的文章，说：“目前陆军派遣古庄少将赴关东军，令其进行重大协议，军部尚未考虑积极进军热河。（中略）据军部看来，华北各将领间的利害关系，并非以张学良为中心取得一致……”。再如以《关门<sup>①</sup>架桥受挫折，军部当局不赞成》为题的文章中说：“就关门架桥问题，土木工程局长唐泽要求陆海军部予以谅解，但军部当局以军事上的理由，不太赞成内务省的架桥计划”<sup>②</sup>，这些过去可能写作“陆海军当局”的地方，也用了“军部”一词。

现在如果说军部大臣，只是指陆海军大臣而言，大都没有特殊的政治涵义，随便把军事当局称为“军部”已经成了超历史的概念。随着二十世纪头十年代初期“军部”实体的建成，和其内部形成的历史概念，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便成了一般社会上的常用词，后来，

---

① 关门：指日本的下关和门司。——译者

② 《大阪朝日新闻》，1932年（昭和七年）12月2日。

随着军部对国务的全面控制，“军部”便具有了包括军或军事当局的超历史概念的性质。本篇论文要首次剖析军部实体的建成过程，“军部”一词，只用作历史的概念。

## 第二节 天皇制军队与人民

军部的建成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为基础的。天皇制下的日本军事机构，早在法制上就得到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保障，成了建成军部的条件。关于天皇制下的军事制度，松下芳男著的《明治军制史论》(上下集)，用法学观点对于法制上的沿革以及关于那些法令的解释，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所以我不想对法制本身深入详述，只想从政治史的观点，就军事机构的独立性问题，探讨一下军部的形成和它所起到的作用。

天皇制军队是靠国民征兵制建立起来的，但它从建立之初就脱离了国民，甚至同国民相对立。这是军队很快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大前提。

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天皇政权，当初它本身没有一个兵员。1868年正月初三(旧历)天皇政权才首次建立了类似统治机构的组织，把国务分为七科，将其中一科设为海陆军科，二月初三，将七科改为八局，海陆军科改为军防事务局。但是，这个科或局只能向归顺天皇政权各藩的军队下达极其有限的指示，并没有直属的军队。军防事务局成立后不久，在局内设立了“亲兵总管”，由大和十津川和其他乡士<sup>①</sup>组成“御亲兵”<sup>②</sup>，兵员仅四百名，这便是天皇政权最初固有的军队。

---

① 乡士：住在农村的武士。——译者

② 御亲兵：指直属天皇的军队。——译者

天皇政权并不是靠人民<sup>①</sup>对封建领主进行革命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而主要是一些从封建领主阶级的下层——下级武士中产生出来的改革派，在长州藩和萨摩藩里掌握了藩的实权，以两藩的联合为主力，得到了其他各藩部分政见相同的改革派及各地的地主富农（乡士亦即其中一部分）、商业资本家、批发商式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家（大都是兼地主）的支持，推翻了德川幕府而建立起来的，接着迫使反对派各藩臣服了。在这个过程中，天皇政权对于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给予仿佛把他们从领主的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幻想，因而得到并利用了他们一定的支持。1868年内乱时，天皇政权在某种程度上还准许并利用了民众的民兵组织。然而，随着天皇政权逐步打倒反对派，便背弃了人民。内乱一结束，各地的民兵组织立即遭到了严禁。政府直辖的府县，甚至禁止在管区内拥有武装警察，在需要兵力的时候，责令向邻藩求援。内乱时期许诺人民“年贡减半”、“取消苛政”等誓言，全部化为一纸空文。

新政权利用从旧幕府和反对派各藩没收来的领地，同旧幕府一样，对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和剥削。因此，这个政权根本不能依靠人民来创建军事力量，而且也不想这么做。连扩充1868年的御亲兵那样的军队也不可能，于是便想让各藩向中央政权交出一定兵员来组成自己的军队。但是，由于这支军队不仅是为了镇压人民的，而且是企图加强天皇政权对各藩的控制力量的，因而各藩并不积极支持，结果也未成功。这里不容详述天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组织起兵力的，总之是把各藩士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来，并拉拢三井等大商业资本家和各地的富农、豪商，以此削弱各藩的力量，强化中央政权，1869年6月成功地实现了使各藩主“奉

---

<sup>①</sup> 人民包括农民、资本家、工人和其他劳苦大众。

还版籍”<sup>①</sup>，进而在两年后的1871年7月，又成功地完成了“废藩置县”<sup>②</sup>。这些都是通过天皇政权的实权派——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出身的官僚，利用他们在原藩拥有的力量，从三藩抽出受过近代训练的步兵、炮兵、骑兵共约八千名，编成天皇的“御亲兵”，以这个武装力量为后盾，才得以强行实现的。

通过废藩置县，政府解散了各藩全部军队，改编其中一部分，充作新设在全国四处的镇台<sup>③</sup>及其分营的兵力。中央的兵力仍旧只有御亲兵。此后军事力量建设得相当迅速。1872年3月，“御亲兵”改称“近卫兵”，拥有步兵三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和四门大炮，由都督<sup>④</sup>指挥。这个月在兵部省内首次设置了“巡检参谋军官”。其“职责”是“查清各地城塞之方向及地形，推测攻守之便否”，调查“城内市街人烟之多寡贫富”，“总之，万一将来发生暴动，无论敌我哪方占领城池，都必须事先对其攻守方法等，记下设想”<sup>⑤</sup>。显而易见，当时的军备，是专门用来防备旧藩士族和人民暴动的，而不是为了防备外国入侵的。所以，海军还是由旧幕府和各藩集中到中央的舰船和船员占大部分。

如果天皇政权仅仅满足于镇压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军备，这些兵力也就足够了，可是，1868年，日本本土的内乱刚刚结束，天皇

---

① 奉还版籍：版即版图，指领地；籍即户籍，指人民。奉还版籍即各藩主把其占有的领地和统治人民的权力交还给天皇，旧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实际上是各藩主的“版籍”被政府没收了。——译者

② 废藩置县：天皇政府的一项政治改革，其内容为废除藩制，设置县制，罢免了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担任地方官即知事。——译者

③ 镇台：系师团的旧称。1871年组织的镇台兵分驻在东京、东北（仙台）、大阪、西海（熊本）四个管区。1873年因设军港，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个管区。1889年废除。——译者

④ 最初由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后来由参议西乡隆盛担任。

⑤ 《法规分类大全》兵制门，2。



政权就迫不及待想要征服朝鲜——“征韩”<sup>①</sup>。其目的在于企图通过对外战争削弱各藩的力量，把藩士和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对外作战，以稳定和巩固中央政权；并企图通过征服邻国，取得日本受欧美各国半殖民地压迫的补偿。这是明治政权一贯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设想。<sup>②</sup>为此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1871年12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已向太政官<sup>③</sup>提出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必须做到，第一，实行国民征兵制，建设常备军；第二，建立沿海防御，即建造军舰，构筑海岸炮台；第三，“积蓄海陆两军之资本”，即培养军官、生产和蓄积武器，不依赖进口外国武器，还要做到能够出口的程度等三点。这就需要巨额经费。当时虽然也出现过“不能竭尽天下财力，供兵部一省使用”的反对论调，但如果“察天下大势之缓急”，这种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国家虽实不能胜其费用，但乃必需之大业，欲罢不能”。<sup>④</sup>

太政官是不能照此办理的，但作为一种设想，不仅是军事当局，而且也是整个天皇政权的基本想法。众所周知，“富国强兵”是天皇制在当时的总路线，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山县有朋的建议。所谓“富国”，就是扶植资本主义产业，这也是“强兵”的手段。事实上人们都知道，日本的现代工业首先是从军事意义建设起来的。当然，这个建议的理想，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全部实现，但建议第一条的征兵制度，却凭第二年（1872年）年底颁发的《全国募兵诏书》得以实现。当时太政官发布的“布告”指出，古代日本是全民皆兵，并痛斥武士说，“原非后世所称武士，厚颜坐食，甚至杀人亦不治罪

① 征韩：征服韩国。韩国：公元936年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国号为“高丽”。1392年高丽亡，成立李氏朝鲜，国号为“朝鲜”。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10月，朝鲜改国号为“韩国”。在这以前，日本往往称朝鲜为“韩”，只是一般称谓，并非正式国号。——译者

② 具体论证请见本书第2册第1篇“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

③ 太政官：明治初年最高行政机构，统辖八省（部）和各厅的政务，1873年改为内阁制。——译者

④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册。

者”。接着又指出，“然而，大政维新，各藩奉还封土，及至辛未，恢复远古之郡县制，坐食之世袭武士，减其俸禄，准其免佩刀剑，自是四民始得自由之权，此乃平均上下，齐一人权之道，亦即兵农合一之基也。”“世上每一事物，莫不课税，以充国用，然则人人固应竭尽心力，报效国家，西人称之为‘血税’。（中略）且国家若有灾祸，人人必皆分受其殃。须知人人竭尽心力，防止国家之灾祸，亦即防御自己灾祸之基。苟有国家即有军备，既有军备，则人人不得不服其役。由是观之，民兵之法，固属自然之理，非偶然臆造之法也”。

这里根本没有要求向天皇尽忠而服兵役之类的话，而是说明明治维新实现了四民自由之权和人权均一，国家之灾即个人之灾，由自己保卫国家是“自然之理”，据此来施行征兵制度。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脱离人民甚至与人民对立的军队，因而，也就不会有后来形成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征兵制度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政权同君主专制制度及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进行斗争，为了人民获得自由、平等，并维护它、发展它而建立起来的。它以人民主权为前提，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日本的征兵制度，却与此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保障专制主义天皇制对于旧封建领主阶级（华族<sup>①</sup>和士族<sup>②</sup>）和革命人民的胜利，并作为天皇制侵略邻国的武器而建立起来的。1863年，征兵制很快付诸实施，在正月初四（从这年开始使用阳历）天皇的“政事始”<sup>③</sup>时，陆军卿山县有朋在向天皇上奏募兵顺序的奏章中称：

“征兵之法，牵涉民政极大，故至要者为与地方官吏臣下等同心协力，深切晓谕天下之民，令其贯彻朝旨。若朝旨贯彻，则

① 华族：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译者

② 士族：明治维新后授给武士阶级的族称之一，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译者

③ 政事始：即一年之初开始处理政务的意思。——译者

天下之民必由衷乐于向之。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内足以镇压草寇，外可与列强争衡。然则兵实为治国之要道，民赖以安，法赖以立，国赖以稳固”<sup>①</sup>。

政府对国民的布告和陆军卿对天皇的奏折，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当时征兵也称为“赋兵”，这正表明征兵与旧幕府加给封建隶农的徭役之一——征集“兵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在最初的征兵令中，有很多免役条款。甲：（1）在中央各部及府县任职者，吏役亦准此，村镇保长及区长亦准此；（2）陆海两军学校学生；（3）国立公立专门学校学生、国外留学生及学习医术、兽医者，亦即官吏、公吏和将来可能成为官吏、公吏的官僚统治阶层的人，都免除兵役。这就是说，兵役只是被统治者所担负的义务。乙：缴纳代人费二百七十日元者，可以免役，这就等于大地主、资本家和富豪都可以不服兵役。丙：（1）一家的户主；（2）嗣子及承祖孙；（3）独子、独孙；（4）替代父兄治理家务者；（5）养子；（6）应征服兵役者的兄弟，这些人也都免役。这显然是为了维持家长、家族制度。正如以上第（6）点所表明，兵役并非个人的义务，而是所谓每户出一人的家庭义务。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且主要靠家族劳动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下，维持家长和家族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必须的，而且在思想和政治上，家庭的天皇制作为国家的天皇制的基本细胞也是非维持不可的。<sup>②</sup>此外，丁：被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者也免役。

从这些免役规定中可以明确看出，征兵是为了维护天皇制及其基础的一种封建徭役，决不是日本人民为了保卫人民的国家而规定的制度。对这样的兵制，广大人民是不会欢迎的。因为它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对前科者实行免役，本是为了企图炫耀当

<sup>①</sup> 山县有朋：《陆军省沿革史》。

<sup>②</sup> 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天皇制的“民法”仍然规定了家长和家族制度。



兵是一种荣誉的特权，但人民不但不感到光荣，甚至讥讽说：“‘征兵’和‘惩役’只是一字之差<sup>①</sup>，一个是腰间带刀，一个是腰系锁链”。人民纷纷掀起暴动反对征兵令。众所周知，1873年日本发生了福冈县嘉麻、穗波两郡等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暴动等，大小合计共十四起之多。

暴动遭到残酷的镇压，1874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人民转而采取了利用免役规定来逃避兵役的作法，无法利用免役规定的，就干脆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把户籍迁往尚未施行征兵令的北海道、冲绳等地，千方百计逃避兵役。1879年，对征兵令进行了部分修改，但关于免役的规定基本没有改动。在人口变动较大的城市，报假户口逃避兵役尤其容易。1881年陆军卿大山岩建议说：“长崎县的长崎区中竟无一人应征者”，“向来担心东京、大阪两镇台管辖区内应征员额缺短，不无缘故”。1882年全国二十八万余名壮丁中，平时战时均予免役者就有十五万四千名，其中户主约七万六千名，五十岁以下的养子两万八千名，嗣子约四万名。

为了防止人民逃避征兵，制定了严密的户籍法，由警察严格进行户口调查，但直到1889年废除维护家族制度的免役规定及其他免役规定以前<sup>②</sup>，利用户籍逃避兵役的还有的。1889年，因不能利用合法手段逃避兵役而无故不去接受征兵检查的人，达三万六千人，竟占全部壮丁的百分之十。<sup>③</sup>

万般无奈，被征入伍而又逃出营房的也为数不少，每年的数

<sup>①</sup> 惩役，指徒刑。日文中“征”与“惩”在此处读音相同，故原文的“一字之差”是指“兵”与“役”之差。——译者

<sup>②</sup> 即使废除了免役规定，对于中等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和在外国留学生等（二十六岁以下者），仍然保留了缓期征兵的制度。征兵制决不是全国人民一律平等的义务，而只是无产阶级的苦役，这种本质并未改变。

<sup>③</sup> 在小山弘健的《近代日本军事史》一书中，有1880-1889年“不参加征兵者人数表”，此表是根据陆军省第三次统计年报（1890年）做的。译者补注：请参阅本书第1册，第158页。

目虽不得而知,但在1881年度陆军犯罪总数(已经判决部分)二千八百三十四人中,就有一千四百零三人属于逃脱犯。第二年有一千零六十六人因逃脱而被处刑。<sup>①</sup>1881年度现役兵员总数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人,犯罪人数所占比率约为百分之九,逃脱率达百分之四点四四,由此可见,士兵抵抗该是多么强烈。

此外,诸如士兵在假口外出时,几十乃至几百人结伙同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在实行征兵制的初期由于史料关系,这类事件发生在东京的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是屡见不鲜的。其中惊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84年1月在大阪松岛花柳街发生的六百多名警察同一千四百名士兵的冲突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双方拔刀相斗,结果士兵死了两人,负重伤者十八人,警察中也有十余人受伤。当时有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百余名宪兵赶到现场进行排解,但也束手无策。<sup>②</sup>当时的警察大都属于士族,而士兵则是农民。这些事件表明,农民士兵对以士族为爪牙的警察权力和国家政权怀有很大的不满,在士兵的骨子里对兵营生活怀有无法发泄的不满。

在这样的士兵中,并不只是由于酗酒同警察打架,而掀起发白政治觉悟的反抗,也并不稀罕。在征兵制、修改地税和靠家长沉重负担的义务教育制等构成天皇制基础的体制一起建立起来以后不久,1874年,板垣退助等人便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于是自由民权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887年西南战争以后,民权运动开始从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运动发展成为以农民阶级和地方独自经营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阶层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其间,1878年8月,发生了近卫炮兵队和步兵联队二百六十多名士兵的

---

① 陆军省第7、8年报。

② 在盐田保美的《从历史上看宪兵制度的创立》(《军事史研究》杂志,第2卷,第1期,1937年)一文中有对此类事件和其他有关士兵反抗事件的详细记述。

叛乱事件。他们对于西南战争的奖赏没有发给士兵和下级士官，并且借口财政困难削减他们的薪饷，心怀忿懣，一再向上级申诉不满，上级不加理睬。终于8月23日夜杀死了大队长和值勤军官，放火烧毁营房，拉起大炮走出皇宫附近的竹桥兵营，首先开炮轰击座落在兵营前面的大藏卿官邸，鼓起气势，然后开到赤坂的行宫门前。他们事先同东京镇台预备炮兵第一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取得联系，计划同这些部队共同纵火烧毁皇宫，待各参议仓皇晋宫时，一举全歼或将其逮捕。但因同盟部队事前已被镇压下去没来支援，叛乱立即遭到镇压，四十七人被枪决。叛乱领导人是近卫步兵第二联队士兵三添卯之助和近卫炮兵大队驭卒小岛万助等人。

据报纸报道，当时在军官和士兵之间对减薪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大阪镇台炮兵第四大队、东京镇台宇都宫分营（联队）和熊本镇台等处，也都发生了军官提出辞呈、士兵情绪不稳等情况。<sup>①</sup>以竹桥炮兵队为中心的近卫军的叛乱事件，其动机肯定是反对减薪，但只是为了这个，计划未免过于庞大，根本原因是否由于他们怀有革命思想？对于这次严重叛乱的全貌，军事当局和政府一味加以隐瞒，至今还收集不到史料，但不拘怎样，它与逃避征兵和逃出兵营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次从根本上动摇天皇制军队的叛乱事件。

惊惶失措的军队首脑，于是煞费苦心树立“军纪”和统制士兵。其方法之一就是叛乱发生不久的10月，以陆军卿山县的名义，颁发了《军人训诫》。其要点是：

第一，军人对于“圣上”，“即使有关御容等细节，亦不得发一言”。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这是军纪唯一最高的根源。

第二，在服装等各个方面，要严格区别军官与军士和士兵，下

<sup>①</sup> 《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

级必须向上级敬礼，这种精神亦适于文官。

第三，对上级的无理横暴，也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申诉不平时，“因结伙为军人所最禁忌，故不得三人以上同时出面，即使事情涉及到三人以上，申诉时亦不得超过二人”，其余人等，除当局对其查询，不得发一言。士兵彼此须亲睦，而“新人伍者，凡事应听从年资高者，不得违抗”。

第四，绝对禁止关心政治。“批评朝政，私议宪法，评议官厅等之布告规章等行为，系违背军人之本分，一人如此，众人效之，终致产生轻慢上级之风，其流弊不可胜言。……喋喋逞辩，动辄愤慨时事，高唱民权等”，绝不允许。严格禁止对管辖以外的官宪提出建议，并不准向报刊杂志投稿评论时事。

第五，军人应经常与警察合作、和谐，维持国内秩序。<sup>①</sup>

这里说的“军人”是指什么呢？尽管抽象说来，包括从士兵到大将，但具体说来，首先是指根据征兵制从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中征集来的广大士兵。因此，与人民对立并矛盾重重的天皇制军队，最害怕“军人”尤其构成军队主力的士兵们的政治觉悟。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在太政官采取征兵制以前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论战中，就对若让人民当兵、枪口不知对谁的问题，有了戒心。所以对这支军队必须加强服从命令的纪律和严禁三人以上联合起来。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初期有关维持征兵军纪的各项规定中，竟然没有关于军人不得参与政治一类的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人可以参与政治，倒很可能是当时的军事当局和统治阶层还没有意识到要规定禁止农民士兵参与政治这一点。原因是自维新以前农民就闭口不谈政治，而且也不准谈政治，农民本身不用说早就

---

<sup>①</sup> 这项内容的制定，不言而喻，说明军事当局已经想到了上述屡次发生的士兵同警察的冲突事件。

有自知之明。

然而，士族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关心政治是当然的本分，因此，对于由这种身分的人组成的“御亲兵”，在1871年6月颁发的《御亲兵规则》中，就有一项关于“亲兵不得议论政事之得失及官员之是非”的规定。对于具有关心政论的可能性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确发出禁令。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征集的常备军没有规定这种禁令，如上所述，应该理解为由于禁止参与政治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在统治阶层担心民权论有渗透到一般士兵中去的“危险”的时候，爆发了近卫炮兵、步兵的叛乱。惊惶失措的军队首脑便以《军人训诫》训诫军人绝对尊崇神格化的天皇“圣上”，奴隶般地服从上级长官，以及同此构成一体的、使军人同政治隔离开来。于是，天皇制军队特有的、外国军队所没有的一些原则，便有体系地建立起来了。

无论怎样迫使士兵脱离政治，而士兵也是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处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在自由民权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的当时，民权思想必然也要渗透到军队内部。<sup>①</sup>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1882年1月，天皇颁发了《军人敕谕》。其内容是把《军人训诫》加以整理的，它的立场不同于军队首脑下达的训诫、法令和规则，乃是神格化的天皇本身直接颁给军人的圣谕，具有不同于军队首脑发布的任何训诫和在此以前或以后公布的法律命令和规则的分量。

《军人敕谕》开头说：“我国军队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规定这是日本的“国体”，还说，“夫兵马大权，朕所统率，有司之事，自可委诸臣下，而其大纲朕亲揽之，非可委之臣下”，极力强调天皇对军

---

<sup>①</sup> 1882年12月，右大臣岩仓具视关于停止召开府县议会的意见书中提到，日本现状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照此下去，恐怕“即便士兵军士，亦难保其不离心而倒戈”。



队的绝对统率权，并以高压姿态说，“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还强调“军人应以竭尽忠节为本分”，这是首要，接着谈到“礼仪”（身分制度）、“武勇”、“信义”和“质朴”。所谓“忠节”，乃是“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里是说忠节只有在脱离政治（因而脱离一般社会）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在“礼仪”一项中命令说：“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在《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而在这里，长官的命令规定为超越一切“情理”的天皇的命令，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它服从的深度和坚定性。

松下芳男解释《军人敕谕》说，《军人敕谕》并不是天皇从“国家统治者的立场”提出来的，而是“从大元帅的立场，即统帅军队的元首这一立场来讲的”。他还说，《军人敕谕》中还明确指出，军队并非天皇的军队，而是国家的军队。<sup>①</sup>不过与此相反，这篇文章本身也不是不能把日本的军队解释为天皇的军队。即使松下芳男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想到天皇制下的国家不是国民的国家而是天皇的国家，国民是天皇的臣民，那么国家的军队也好，天皇的军队也好，本质上是一样的。松下芳男强调了《军人敕谕》中竭尽忠节的对象不是天皇而是国家的意义，不过，如果天皇并不等于国家的话，那么，对于国家的忠节就是如何把国家建成强盛这种政治上的忠节才是根本，这就同只有在脱离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忠节的说法矛盾了。正因为天皇就是国家，所以对国家竭尽忠节就必然是对天皇竭尽忠节。因此，对天皇任命的政府进行批判等这种政治行动就不成其为忠节了，军人的忠节只能是与政治隔绝的、奴隶般地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和对分享天皇权力、权威的各级长官以及天皇的政府的绝对服从。

<sup>①</sup>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第3篇，第3章，第2条。

把国家同天皇区别开来的是后来的天皇机关说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政治上起到积极作用,是个重要的事实。正如上一节所述,二十世纪十年代以后,对军部的批判变得强烈起来,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机关说对宪法的解释和更为进步的民主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是以对抗专制主义天皇制、发展民主势力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民主势力软弱的话,就搞成天皇即国家了。无论《军人敕谕》也好,还是《帝国宪法》也好,只是在它们字面上可以作出把国家同天皇区别开来的解释这点上,有着一个古典专制主义或纯粹封建专制与天皇制专制主义的不同。这个不同来自世界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自自由民权运动中人民的力量,它迫使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天皇不得不制定了《军人敕谕》和《帝国宪法》。

在此期间,1881年3月,日本创建了作为军事警察的宪兵制度,并于1881年12月制定了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宪兵“担任巡察、检查、视察军人违法乱纪,……掌管国内安宁”。从此以后,士兵在营外的犯罪,定为不准一般警察过问。唯其如此,使军队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隔绝程度就越发加强了。而且,根据这个规定,一般警察无权干预军队、军人的事情,但宪兵却以“掌管国内安宁”的政治警察身分,具有超出一般警察的权力而介入社会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革命家不但受到警察的监视,还经常受到宪兵监视。在对待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上,半官方撰写的宪兵史竟自我夸耀说:宪兵队“先于地方警察<sup>①</sup>,着手社会主义思想的取缔和调查,而且不分军内军外,明确了系统界线”<sup>②</sup>。另外,在镇压群众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的暴动方面,宪兵队起到了比警察更为有力的作用。

在陆海军刑法中,与本书主题有关并特别重要的是,刑法中规

---

① 地方警察:军队用语,指社会上的普通警察。

② 田崎治久:《日本的宪兵》。

定：“凡军人就政治事项上书建议或谈说议论，或以书面广泛传播者，处以一月以上三年以下之监禁”。<sup>①</sup> 军人干预政治，不仅按道德或纪律加以禁止，而且还要课以刑罚。在此以前，1880年4月，一般法律也为了镇压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集会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陆海军人，在常备、预备、后备役军籍者、警察、官公私立学校的师生、农业工艺的见习生等，均不得参加讲说议论有关政治事项之集会，更不得加入其社团”。不仅现役军人，甚至连过着一般社会生活的预备、后备役军人也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和政治团体。由此可知，统治者们该是多么害怕人民的政治思想渗入到军队里去。在陆海军刑法中，也没有禁止预备、后备役军人参加政治集会、政治团体的规定。当1890年，《集会条例》改为《集会及政社法》时，相当于上述的条款改为“现役及应征中的预备、后备陆海军人”，这个规定由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继承下来。

根据《集会条例》和陆海军刑法的规定，军人当然也不能参加议会的选举。根据1882年2月修改的府县议会规则，现役军人也没有府县议会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后，实施了《帝国宪法》，但仍然不准现役军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上叙述了天皇制军队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设法使军队脱离人民和社会，尤其同政治隔绝并独立出来，但天皇制军队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必须从它所有各种制度的基础来进行考察。这样一来，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制度，也就是这个本质上的必然产物。因为要使军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设想变为一种制度，就只好使军队的统帅制度也从政治机关——政府中独立出来。这种制度一旦建立起来，政府就不能干预统帅，而统帅部却有可能介入政治或政府了。这恰恰与军事警察由于从社会一般的警察中独立出来便大力介入社会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实际上军事与政治是不可分

<sup>①</sup> 陆军刑法第110条，海军刑法第126条。

割的,掌管军事的统帅部和掌管政治的政府不可能不发生关系,所以,实际上归根结底不是政府领导统帅部就是统帅部领导政府,二者必居其一。可是,政府在制度上要受不能介入统帅的制约,而统帅部却无需受这些约束,而且拥有掌握国家权力核心的实力结构这种有力地位,所以在政府同统帅部的关系上,后者具有动辄领导前者的条件。不过,根据政治形势,特别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势力处于上升时期,政府也很有可能领导统帅部。

### 第三节 军队从政府独立出来

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早在1878年就实现了。在此之前,1872年,兵部省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当时撤消了兵部省的参谋局,它的任务分别移交给陆军省第一局和第六局。随后于1874年2月,又撤消第六局,设立了参谋局。当时还明文规定陆军卿“由将官担任”的武官专任制度,海军卿就没作这种规定。当时的海军卿由文官胜安芳担任。不久,1878年12月,又撤消了参谋局,重新建立了参谋本部。

以前的参谋局以及它的前身,都是设在陆军省或兵部省内的一个局,因而归太政官统辖,最后要接受太政大臣的指挥和监督;而参谋本部不仅由陆军省独立出来,而且从太政官的管辖下也独立出来。参谋本部长只限由将官来担任,直属天皇,“统辖部务,掌管参与帷幕之机务”。参谋本部条例第五、六、七条中,列有参谋本部长在平时和战时的任务,这里从略。一般说来,其任务均属统帅军队的事项,即所谓“军令”事项,例如第六条规定:“凡军中的机务,战略上的动静,进军、驻军、调动命令、行军路程的规定、运输方法、军队的派遣等等,其有关军令事项,专由本部长主管,经参与策划、天皇批准后,立即下达陆军卿,责令执行”。因此,参谋本部在

责令陆军省执行军令这点上，就介入了陆军省。而陆军省是太政官的一个部门，所以，参谋本部不仅独立于太政官之外，而且还可以通过陆军省介入太政官。因为当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向政府提出执行军令的某种要求时，如果陆军省坚决贯彻执行，政府就不得不屈服于陆军省，否则就得垮台。如前所述，陆军卿<sup>①</sup>只限由武官担任，所以当其要求不被采纳时，就得辞职，如果不提出后任的人，政府就得垮台。

然而，军令事项和所谓军政事项——这时陆军省已成了只掌管军政事项的机关——，往往难以具体划分，所以军事当局希望将与军队有关的事项尽量纳入“军令”之中。参谋本部设立五天以后，又在参谋本部以外另设立了一个监军本部作为军令机关。监军本部设在东京，“平时统辖我国全部陆军之检阅及军令出纳之事项”。所谓“军令出纳”，即执行军令之意，监军本部内不设本部长，只设三名监军部长分别管辖日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监军部长在战时担任师团长。监军部长也直属于天皇，既独立于陆军卿和太政大臣之外，也独立于参谋本部长之外。后来，监军本部的组织和任务有过种种变更，终于1898年撤消，另在陆军大臣管辖之下新设“教育总监部”，1900年4月，教育总监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为直属于天皇的机关。

关于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的任务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只看各自的条例搞不清楚，详情请阅前引松下芳男的著作。上述三个机关的任务、权限的增减，以及随之而来的部局机构的改组和撤消，主要是由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队”内部的争权夺力和观点变化的问题，属于本书主题以外，所以只在与政治有关且有必要时，本书将提出这些问题，这里姑且要强调的是，他们利用军令事项和军政事项界限模糊这点，建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些军令

<sup>①</sup> 陆军卿，即后来的陆军大臣。

机关并不断扩大了其权限的倾向。

因为参谋本部长直属于天皇，所以对其管辖事务，可无须顾及政府，直接报告天皇，或提出希望和要求。这就叫作“帷幄上奏”。通过帷幄上奏，参谋本部对天皇做工作。在施行帝国宪法之前，天皇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制君主，所以一打动了天皇，就能左右国政。1880年11月，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将有关调查清政府军备的情况《邻邦兵备略》六册呈递天皇，向天皇陈述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上奏文称：

“方今欧洲议论兵之多寡，较议论国之贫富为急。是故各国兵制均按其人口，常备兵多则七十分之一，少则不下百分之一。且战时定员多则十五分之一，少亦二十分之一，又何暇计较内外国债，顾虑岁出岁入不相抵乎。（中略）

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使其臣民乐生，安于富贵，开畅胆识，振起爱国之志，从进取之计者，非兵力而不能。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贸易之利益，始可积蓄国民之劳力，始可保国民之富贵。故富国与强兵，古今互为本末。此乃形势之必然，欧洲各国汲汲于兵备，亦不足为怪。今如言富国为本，强兵为末，则民心将日趋于私利，不知公利之所在……苟一旦如斯，则重耿直、俭朴、忠厚、勇敢、廉耻，尚节义之风将一扫而尽，一旦遇开衅端，则叛君卖国之贼，将群起而不可御焉。（中略）

明治初年，陛下宵衣旰<sup>①</sup>食，励精图治。而官僚百司亦有奋然从事之风。而今身为臣僚者，刷新鼓舞，或已不如昔日。

此虽时势之所然，亦岂非耽于安逸之所致哉。是以诸如兵备海防等事，臣虽再三论之，但倾耳听之者甚少。今则安于小康，姑息是事，漫然不察时势之所趋，一旦面临势成事迫，则将噬

<sup>①</sup> 原文将旰误刊为肝，兹更正。——译者

脐无及矣”<sup>①</sup>。

一读便可看出，这里面没有一条涉及统帅军队这个参谋本部长  
长的本职任务。他在专门论述政治，强调应将国政的根本放在强  
兵上面的彻底的军国主义，增强军备优先于一切。他攻击政府由  
于财政困难不能按照他的要求拿出扩充军备所需费用，耽于安逸  
松了劲，甚至恫吓天皇说，照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已经出现  
了后来的军部的萌芽。

过了半年以后，1881年5月，山县参谋本部长和大山岩陆军  
卿联名上奏天皇：说东京湾的防御设施是当务之急，请求天皇“赐  
给”总经费二百四十五万余日元，以十年为期，每年二十四万五千  
余日元。天皇接受后于同年7月5日颁发命令，把军方所要求的  
款额如数由本年度另行“拨付”。<sup>②</sup>然而，陆军当局并不满足于此。  
第二年1月，山县参谋本部长和大山陆军卿就增强军备达成协议。  
其协议内称：“试观目前宇内大势，东方论尚未绝迹，琉球藩<sup>③</sup>问题  
还未彻底解决，固非高枕无忧之时，万一遇到有事之日，始论兵备  
不足，可谓已迟。因此，即使财政上受到若干影响，亦须自明治十  
五年度即十六年的征集期起，年年征足征兵令规定之员额”。<sup>④</sup>

这是为了显示日本周围的局势紧张起来而故意夸大的。碰巧

---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

② 前引《陆军省沿革史》。

③ 琉球藩在此三年前的1879年4月既已废除，改为冲绳县。关于琉球群岛的  
归属问题，日本与清政府间的激烈争论也是在此以前的事。1880年9月，日清两国全  
权代表曾经议定条约，把群岛分为两部，宫古、八重山群岛归属清政府，以北归属日本。  
但因清政府没有同意，所以未能签约。因此，不能不说琉球归属问题在国际法上“还未  
彻底解决”。不过，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积极主张领有琉球群岛，而日本却巩固了领有全  
岛的既成事实。所以，日本才竟把冲绳县叫作“琉球藩”，似乎在说其归属尚同清政府  
存有争议。山县有朋和大山岩的这个协议说“东方论尚未绝迹”，这是说出于“东方”  
（主要指朝鲜）的问题，仿佛存在着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夸大了日本周围的国际局势似  
乎非常紧张。

④ 《陆军省沿革史》。

这年在朝鲜汉城发生了朝鲜士兵的叛乱事件，叛乱者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朝鲜士兵和汉城市民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山县抓住这次事件的机会，煽动危机感，主张以陆军为中心扩充军备，右大臣岩仓具视也主张扩充海军是当务之急。太政官根据这些议论计划扩军，同年11月24日，天皇把地方官员召集宫里，晓谕扩充军备，并为此增征租税。不仅如此，同月22日，天皇又用敕语的形式对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肯定了政府的朝鲜政策，指出“然从邻国感到，或有不虞之变，为此充实军备之议，尤为护国之要点”，同意了以朝鲜和中国为敌的战争准备，仅就扩充海军的经费和具体的顺序、方法命令说：“再经阁议详论，以安朕意”。是谁建议天皇这样干的，不得而知，但从其贬斥海军扩充论说：“定其理论虽易，收其实效却难”；质问“长期支付经费之计划如何？”等简直是无理的刁难看来，说不定就是山县有朋等人策动的。这种臆测姑且不论，是参谋本部的独立开创了这样一条军事当局不经政府而直接搬动天皇的道路。

当时陆军现役兵员总数约三万五千人。军队竟如此弱小，为什么要急于让统帅部独立起来呢？陆军省内的参谋局，是根据桂太郎第一次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建议学习德国陆军而设置的，参谋本部也是根据桂太郎第二次从德国研究陆军回国后建议大力扩大参谋局，经山县有朋等人采纳后才开始设立的。不过，桂太郎的建议是，大力扩充和加强参谋局，以适应陆军发展和扩充的需要，他说“欧洲数一数二的文明国<sup>①</sup>的陆军参谋局”，其“局长权力几乎与陆军卿相抗衡”，日本亦须如此。他并没有说军令机关要从政府独立出来。其实，即使在太政官内设立与陆军省平行的参谋本部，把军令机关与军政机关分开，也可以建成桂太郎所希望的那样规模大，而且其长官权力能与陆军卿相匹敌的机构。

<sup>①</sup> 此处文明国指德国而言。



可是，参谋局的扩大和加强，竟从太政官独立出来，参谋本部长比陆军卿的地位还高，因为陆军卿位于太政大臣之下，不直属于天皇，而参谋本部长却直属于天皇，这并非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必定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其原因正如上一节已经详述，天皇制军队同人民互相矛盾对立，军部当初关于军队必须与人民隔绝、脱离政治的思想，到了这时，不仅军部首脑，而且在整个政府当中也迅速强烈起来。在参谋本部独立前不久抛出《军人训诫》绝非偶然。正象《军人训诫》明确表示的那样，使军队脱离政治的思想，以桂太郎的建议为契机，不仅促成参谋局的扩充，而且导致设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

以上是最根本的原因。西南战争以后的天皇制军备，其主要目标已经不仅是为了镇压国内反对派，而主要是为了对外战争，实际上当时天皇政权已经开始对朝鲜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军事侵略也早已有了计划，这些都加速了统帅部由政府独立出来。与其说事前作好对外战争的充分准备是统帅部最重要的工作，莫如说统帅部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准备打仗。而在完成这项工作已变成现实课题，统帅部必须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当时，在具有让军队脱离政治愿望的天皇制统治者中间，产生让统帅部不受政府约束而独立出来的想法，是当然的趋势。至于让参谋本部长直属于天皇的问题，可能当时的太政官和军事当局的首脑也会认为：对于本来以天皇统帅天皇制军队为理想而缔造的军队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海军的军令事项，自海军省成立以来，由海军省的军务局和军事科掌管，并兼管军政事项。1884年，军务局改为军事部，成为由将官担任部长的专管军令的机关。尽管这样，军事部仍属海军省内的一个部门，按规定，军事部长的职责是“关于军令军略事项，参

与卿（海军卿）之机谋”<sup>①</sup>。但军事部于1886年3月即被撤消，军事部主管的军令事项全部移交给参谋本部的海军部。以陆军的军令机关起家的参谋本部，当时已扩大改组为“负责陆海军军事计划”的机关，按规定，参谋本部长要“以敕令由皇族一人担任”，两名次长由陆海军将官担任。因此，海军的统帅和军令机关也由海军省独立出来，但是这种独立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海军的独立，而是海军被置于陆军之下。两年以后，参谋本部条例改为“参军官制”，原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部分别改称为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

但海军对于实际上低于陆军一等表示不满，1889年3月，海军参谋本部脱离参谋系统，回到原来的海军省，成为海军大臣指挥下的海军参谋部。于是“参军官制”又变成参谋本部条例，“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帝国全军之参谋总长”，令其掌管“出师、国防、作战之计划”。正如条例明文规定，参谋总长不仅是陆军而且是“帝国全军”的参谋总长，掌管“国防”那样，陆军的“陆主海从”思想十分严重，不断压制海军。后来，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3年5月，制定海军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机关终于也由海军省独立出来，成为与参谋本部平行并直属于天皇的机关。

海军与陆军不同，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接触面也窄。因此没有受到民权运动的威胁，对于重新建立一个军队脱离人民的制度，也不象陆军那么痛感有其必要。而且，从1883年准备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起，在扩充陆海军军备的过程中，海军也大大地扩充起来，当时海军的实力只有一艘大型军舰（排水量三千七百七十七吨）、四艘中型军舰（排水量二千八百吨左右）和五艘小型军舰（排水量不到一吨），计划以后八年间只再建造五艘大型军舰、八艘中型军舰、七艘小型军舰以及十二艘鱼雷炮艇。处在这种政治和军事形势下的海军当局，恐怕还没感到军令部独立的必要。

① 条例第11条。

不久,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海军预算也将由议会审议,即与人民发生了直接的政治关系,与此同时,在海军内部也有了把军令部独立出来的意图。

当时,政府正在计划发动甲午战争,大肆扩军备战,1890年9月,海军省向首相提出了从次年度开始的扩军计划。扩军目标是中国现有军舰与英国东洋舰队实力之和,即要保有约十二万吨的舰艇。其中除现有实力五万吨外,其余七万吨,按艘数计算,要求再建九千五百吨的装甲舰一艘、六千吨的装甲巡洋舰三艘、一千五百吨至四千五百吨的巡洋舰九艘和鱼雷艇十一艘。估计总费用为五千八百五十五万日元。此外,还有增设海军镇守府及其他新的要求。<sup>①</sup>

阁议原则上没有反对这个计划,但因财政关系,不可能全部完成,因而编出从当时的1891年度开始连续五年支出五百二十一万余日元(第一个年度为二十五万七千一百二十一日元)的预算,在第一届议会上得到批准。但考虑到老朽舰的代替时,这样下去,装备十二万吨的基本计划永远无法实现,于是第二年,1891年9月,海军省重又向阁议(松方内阁<sup>②</sup>)提出了从下年度起连续九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五万日元的造舰计划。但这也认为财政上办不到,经过阁议向第二届议会提出的预算案是:连续六年的造舰费用二百七十五万日元,建立炼钢厂的费用二百二十五万日元。对此,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虽然承认扩充海军的必要,但认为海军部内存在着藩阀派系之争,弊害累积,当局不能信任,因而否决了预算案,并且自由、改进两党的民党联合,竟然搞出了一个关于改革海军的上奏案。于是政府解散了众议院。在此后的大选中出现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力干涉选举的现象,尽管这样,民党联合还是取得了

<sup>①</sup> 海军省《海军舰船扩张沿革》,收于原书房出版的《山本权兵卫和海军》一书。

<sup>②</sup> 首相松方正义。——译者

胜利。因此，在第三届议会上又一次否决了扩充海军的预算案。随后在第四届议会上（1892年11月25日—1893年2月28日），政府（第二届伊藤内阁）提出了建造两艘装甲舰和其他舰艇的造舰预算案。在这届议会上，民党与政府的对立仍很尖锐，造舰预算案又被否决了。政府不同意这个否决，要求议会重新考虑。议会不但不答应，反而上奏弹劾政府。对此，政府以议会休会、闭会进行报复，在此期间，伊藤首相上奏天皇谴责议会。天皇咨询枢密院，于1893年2月10日，向内阁和贵族院、众议院下达敕令：“国家军防之事”，不得疏忽一日。朕今后六年间，每年下赐三十万日元，同时，令文武官员在此期间将其薪俸十分之一献给国家，以补充造舰费用。朕望内阁和议会作为立宪机关，“各慎其权威，循和协之道，辅佐朕躬完成大业，以期有终之美”。议会屈服于天皇的敕语，不但恢复了以前削减的造舰费用，而且还全部承认了政府提出的自1893年度连续七年共一千八百零八万日元的造舰费用。

这样，海军的第二次扩充计划总算就绪了。在以前议会上攻击海军的过程中，第四届议会民党联合的代表杉山定一等人曾提出海军改革建议案。其内容是：“建立扩充海军之方策，以与海外各国保持均势，实为我国当务之急”，政府提出的以十二万吨为目标的计划是保守的，必须保有十五万吨。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清除海军省内积弊的彻底改革。

改革大纲的第一点是，“确定军令与军政之区别”。“若海军大臣管理一般政务，统辖材料部、会计部、人事部等事务，无须专门的海军武官。至于诸如指挥、统率海军军队、舰队等事，则非由专门海军武官担任不可。如军令与军政相混相侵，则有弊害百出之虞”。因此，为了明确区分二者，“应另设海军司令本部，使其直属于天皇陛下，其长官应由具备海军将级资格之人充任”。

第二点，“革除该省武官组织之积弊”。在这一点已经建议，作

为军政机关之长的海军大臣无须限于武官，认为大臣以外的海军省职员也不要仅限于武官，“会计事务应建立由文官办理的制度”。

第三，“限定将官和佐官的名额”；第四，“培养军官”；第五，“改革镇守府制度”；等等，共提出九项改革要点。在结论部分概括了以下几条：

第一，确定国防方针；

第二，改革海军制度；

第三，整顿海军财政；

此即建议案之要领。当局者如确立国防之方针，制定一定不变之计划，在造舰上设计得当，其事并非不成。又，如改革海军制度，矫正武官组织之弊，录用军官时，亦厉除私情，广录人才，则我国海军面目必将为之一新。再者，若整顿海军财政，慎防滥用冗员，大力节减经费，则经常军费可削减百万余日元、跨年度经费可削减四百万余日元。减下之经费可充作将来扩充海军所需之费用”。<sup>①</sup>

1892年12月20日，这个建议案提交给众议院并立即委托给特别委员会。后来，因有了上述的天皇敕语，在特别委员会上，有人提议，在此颁发敕语之机，海军已有自行改革之决心，应观其后效。于是特别委员会并未作任何结论。翌年，1893年2月25日，建议案又“交回”议会的全体会上进行了讨论。犬养毅等人认为，海军已经决心进行改革，现在此建议案业已无用处，遂被否决<sup>②</sup>。

这个建议案把军政机关和军令机关分开、和废除海军大臣及海军省职员的武官专任制这种极其重要的军制原则上的根本改革，同现行制度下的海军内部各种弊害的改革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混为一体，而且在结论中又说：“当局者须确立国防方针”，

<sup>①</sup> 杂贺博爱：《杉田鹤山翁》、《大日本帝国议会志》，2。

<sup>②</sup>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2。

造舰计划也必须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一定不变”的计划，又把性质不同于前两类的问题，随随便便提了出来。确立国防方针的“当局者”，并不限于海军当局，陆军的军令、军政当局和整个政府，如果主张议会政治的话，议会也当然必须是参与其事的“当局者”。但从这份建议书的整个措词来看，可以认为只指海军当局。而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就委员会内审议情况向全体大会所作的报告也好，在全体大会上的讨论也好，全然没有谈到军政、军令机关的分离、武官专任制的废除、如何确立国防方针等原则问题，谈的始终只是议会是否信任政府遵奉教语，全面进行行政改革的问题。

如果从这些情况推测起来，只能说建议者提出的分离军政、军令机关和废除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等意见，并非考虑到陆海军在军制上共同的根本原则问题，只是站在把它作为改革眼下海军内部弊害手段的立场提出来的。就是说，可以认为，对于“政治高于军事”还是“军事独立于政治之外”（实际上是“军事高于政治”）的问题，当时无论是建议者还是众议院的其他议员根本没有考虑。假如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多少有些考虑的话，那么就不仅海军大臣和海军省职员，陆军的大臣和职员也应废除武官专任制；在军令机关同军政机关分开并由政府独立出来之后，其职责权限应严格限于用兵和统帅，这种制度问题，当然哪怕是用极其普通的言词也应该谈到才是，却全然没有触及。对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有关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后述），就连一直攻击藩阀政府的民党，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他们仅仅从振兴海军业务的观点出发，随便地提出建议，又随便地加以否决。从振兴业务的观点来说，海军内部还产生了“军政、军令机关最好不分开”的意见<sup>①</sup>。

<sup>①</sup> 在《伊藤博文秘书类纂》的《兵政关系资料》中，录有批评杉田定一建议的《海军改革意见》一文。作者不详，据推测可能出于海军内部之手。该意见基本赞同杉田定一建议中第二点以后的部分，关于第一点，作者认为军令、军政机关的分离反而会产生“政令多歧之弊”。

当时，陆海军当局、政府、议会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舆论全都一致热衷于军国主义，正在准备发动甲午战争，以达到把朝鲜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下的目的。杉田定一的建议也是其中表现之一，他是从有效地实现军国主义和完成战争准备的观点出发，要求海军军令部独立出来的，可能唯独这一点——其他的改革项目姑且不论——受到了政府和海军首脑的普遍欢迎。特别是海军当局，希望拥有一个能与陆军抗衡的军令机关，便借此良机，于当年5月实现了海军军令部的独立。这样，海军统帅部也从政府和议会中独立出去了。

在极端专制的专制君主制度下，不管军队统帅部是否独立于政府之外，因为军队本身是脱离人民的，所以如前所述，既然以军队独立于国民之外为基础，军令机关还有可能独立于政府之外。但是，宪法既然颁布、议会干预制定法律和编造预算，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执行情况，通过审议法律案和预算案，议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介入军队，人民也要通过议会介入军队，这就产生了或多或少妨碍军队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可能性。因此，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时候，伊藤博文等人为使军队始终保持对国民和议会的独立性曾煞费了苦心。即在宪法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伊藤对此解释说，第十一条“表示统帅兵马乃至尊之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就是说统帅独立于政府之外；关于第十二条则解释说：“本条表示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亦由天皇亲裁，这固然要由专职大臣辅佐，但亦同帷幄大权，属于至尊大权，无须议会干涉”。<sup>①</sup>

如果按照伊藤的解释来运用宪法，则陆海军统帅完全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唯独军政是构成政府即内阁的陆海军省的业务，议会因而人民对此都没有任何发言权。就是说，军队全面保持了

<sup>①</sup>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

对国民的独立性。从法学上来评论伊藤的解释是否正确，并非本章的主题。但历史的事实则是，如前所述，初期的议会曾连续否决了海军的扩充方案，并干预了海军“常备兵额”的决定。这就是说，在议会势力强大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推翻伊藤博文对第十二条的解释的。

还有，伊藤博文等天皇制官僚和军事当局，把军政机关的陆海军大臣及其职员定为武官专任制，以此从人事方面堵死了军队以外的势力特别是议会势力介入军队的途径。

陆军大臣的陆军将官专任制，如前所述，是1874年制定的。1881年11月，在制定太政官《诸省事务章程通则》时，规定陆军省的职务制度也以此为依据，在法令上取消了陆军卿限由陆军将官担任的规定。但这并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1885年底，废除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在1886年2月的陆军省官制中，规定陆军省职员“由武官担任”。如果大臣也包括在这个“职员”以内的话，那么，这就等于把“武官”专任制重又明确地写进法令条文上了。接着又通过1888年6月陆军省职员定员表的修改，明文规定了“大臣：将官”、“次官：将官”。

关于海军省长官，最初在制度上非但没有武官专任制的明文规定，而且还曾有过由文官胜安芳担任海军卿的时期（1873年10月——1875年4月），但在1886年2月的海军省官制上，和陆军省一样，明文规定职员由武官担任。不过，在1890年修改的海军省官制中，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制度上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只好理解为不是武官专任制。

这就是说，在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的时候，陆军大臣和次官是将官专任制，海军大臣和次官则不然。而且在1891年7月改革陆军省官制时，取消了另表中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限于将官的条款。此类大事究竟因为什么搞的？几乎不得而知。据春亩公追



颂会编纂的《伊藤博文传》中册记载，“在此之前，松方内阁改组时，军部主张扩充军备，并摆出若不接受就不推举军部大臣的态度，故当时阁僚中有人提议可让文官担任军部大臣，遂于这年<sup>①</sup>7月修改官制时”，删去了上述陆军省定员表中的“大臣：将官”、“次官：将官”一项。

上面所说的“在此之前，松方内阁改组……”，是指这年5月6日，松方任首相时上届内阁<sup>②</sup>阁员全部留任下来，同月17日，陆相大山岩辞职，由高岛鞆之助接替，接着外务、司法、文部、内务各大臣相继更换。我还不能确认当时有过“军部”的高压。如果确有过高压，那么，在这届内阁里有递相后藤象二郎和农商务相陆奥宗光等旧自由党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说不定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当这年7月改革内阁各省官制时，对陆军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问题也进行了上述的改革。其中的情况有待今后再研究。

废除陆相的武官专任制问题，在天皇制机构的最上层中间似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这在当时及后来很久都丝毫未向外部泄露出来。最令人费解的是，据说连当时的陆军省步兵科科长长冈外史，都对这次官制改革全然不知。<sup>③</sup>这且不论，争论竟然麻烦起明治天皇来，9月15日，侍从职干事岩仓秉承天皇旨意到神户去访问旅行中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就陆海军大臣的将官专任制可否实行问题进行了咨询。对此，伊藤答复如下：

“担任陆海军大臣者，非将官不可的规定，在欧洲各国亦非法定的制度，可能出于实际上防御的必要。原因在于，保持立宪君主

---

①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

② 即山县内阁。

③ 在平塚笃编纂的《伊藤博文秘录》(1929年3月)一书公开发表伊藤博文的一段日记和答复天皇文之前，学术界甚至不知有过这个问题。《伊藤博文秘录》一书中载，有长冈外史关于伊藤答复天皇文的谈话。长冈说，答复天皇文看来似乎姑且废除了大匠武官制，可是我作为步兵科长，对此毫无所知。

政体之主义，苟欲不使大权旁落，则不应将国家实力之兵权，委诸议会或政党去玩弄。欲不使兵权旁落，必须由皇室即君主亲自来直辖。君主如欲直辖之，管理军政的大臣，与其任用易为政党或政治热潮所动摇的一般所称的政治家，莫如任用军事上经过磨炼，精通军制军纪，熟悉军人情况并有素养的将军，不轻易变更其军制组组为善。（中略，主要陈述了欧洲各国亦非固定任用武官或文官）。在根据我国国体的立宪制下，最重要的当然是由武官管理军政，以使政界风波不易波及军事。故上次在官制上废除将官任大臣的限制，博文不赞成。”伊藤还说，陆军限于陆军将官、海军限于海军将官，这样作，在当前海军中合适人选较少的情况下，实际上可能很不方便，所以姑且以陆海军将官哪方面都可以为好，但陆海军应尽量由各自的将官担任为宜。

这些话似乎无须再加说明。不让议会和政党介入军事，这是坚持专制主义天皇制所必须的。这决不是军事当局的排外主义或军事要交给军事专家那种单纯的技术观点。伊藤这份答复天皇文作于何月何日不详，在有了这个答复天皇文以后直到1900年5月以前，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在制度上始终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可以认为，武官专任制就凭伊藤的这份答复天皇文确定了下来。如前所述，1893年，“废除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曾在议会上略微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会上根本未谈到当时官制上并不是武官专任制。陆海军当局自不待言，就连政党也确信当时的现状是武官专任制。

此后，1897年4月，即松方、大隈内阁时期，由于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进步党的压力，各省设置了简任参事官，政党人士被任命担任该职，但陆海军省内没有设置文官的参事官。后在1898年5月，第三届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根据伊藤的推荐，组成了自由党和进步党联合的宪政党的大隈、板垣内阁。

接受组阁敕命的大隈推荐各省大臣时，<sup>①</sup> 他向天皇上奏说：“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法律来讲，当时陆海相并不是武官专任制，所以按说也可以从政党人员中推选大臣，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可能。于是天皇特命前内阁的陆相桂太郎和海相西乡从道留任，使新内阁建立起来。当时，桂太郎和西乡从道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了新内阁完全接受陆海军提出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参加组阁仪式的。

大隈、板垣内阁是破例组织起来的，<sup>②</sup> 所以陆海相不但无意协助首相，反而伺机要打倒内阁。其他各大臣和执政党的宪政党，则热衷于同旧自由党派和旧进步党派争权夺力，抵制不了山县有朋等人策划的绝对排斥政党内阁的倒阁活动，结果这届内阁仅仅三个月就垮台了。此后又组成了山县内阁。为了防止以后再度出现政党内阁，或者即使出现非组织政党内阁不可的形势时，陆海军也不至于受到它的控制，1900年5月，山县有朋便伺机修改了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由现役将官担任。至此，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终于名副其实地确立起来。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不仅为了防止军政大权落到文官或政党人士手中，而且还使陆海军大臣在内阁的地位成了总理大臣实际上也难以指挥、控制的独立的东西。因为任命陆海军大臣，虽说形式上通常是由受命组阁的人向天皇推荐，但在他向天皇推荐之前，必须先同掌握陆海军实权的人进行协商，取得他们的推荐和同意，即陆海军大臣实际上是由陆海军的实权派送进内阁的。

---

① 按照当时的惯例，天皇根据元老们的推荐，选出适合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令其组阁，再根据受命者的推荐，由天皇任命各大臣。如果天皇不按首相的推荐，直接任命国务大臣时，深恐首相就不能担负起内阁官制第二条规定的“总理大臣作为各大臣之首席，保持行政各部之统一”的责任。天皇没有根据大隈的推荐，而让陆海相留任，这是专制君主的干法。

② 参考上条注释。

再者，陆海军大臣不仅掌握军政，还掌管军令机关要求实施的军令事项，而军令的实施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所以这一点也造成了陆海军大臣独立的一个侧面。1889年12月制定的内阁官制第七条关于帷幄上奏权的规定，使这种情况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七条规定：“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除据天皇圣谕下达内阁者外，须由陆海军大臣报告内阁总理大臣”。陆海军当局就解释说由于所谓帷幄上奏取得保障，便一直蛮干下来了。

关于这一条的由来以及陆海军解释的不当，在松下芳男的《明治军制史论》（下，第187—188页）中已经阐明。尽管法理上是不当的，却终于形成了按照这种解释的惯例。军政和军令的界限本来就含糊不清，于是陆海军大臣就尽量扩大“军令”的解释，进行帷幄上奏。因此，1896年4月，伊藤首相（第二届）通知大山岩陆相说：“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首先应属于军队机密、军事命令者，固不待论，但因界限不清，往往属于行政事项之事件，亦不无通过帷幄上奏经天皇钦裁之虞，故凡与行政事项有直接关系者，或不经阁议则会妨碍行政各部保持统一者，望于上奏之前，先经阁议讨论。请按此处理。”把帷幄上奏权的根源——统帅权的独立规定在宪法上，还制定了前述的内阁官制，并确立了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的伊藤博文，如今身居首相却对陆海军大臣的帷幄上奏感到苦恼了。<sup>①</sup>

#### 第四节 军阀的形成

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的武官制和帷幄上奏的惯例，形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本来与人民对立并脱离人民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天皇制军队和军事机构，竟把独立于人民之外作为国家体制确定下来。在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建立议会之前，

<sup>①</sup> 陆军省编，《军事关系明治天皇传记史料明治军事史》，下。

军队的这种独立性，在国家体制上是军队对政府的独立。而在宪法颁布和议会建立之后，它既独立于政府之外，同时也成了确保独立于议会之外、从而也成了确保独立于政党之外的东西了。

试看宪法颁布以后的政治史实则是，陆海军不但不与官僚政府相对抗，反而成了官僚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柱，同时取得官僚政治家的支持，极力防止议会和政党势力对陆海军的渗透。如上节所述，1891年7月至1900年5月，尽管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大臣的武官制，陆军内部对此却满不在乎，陆军省的一个科长对此却全然不知，这是因为当时垄断政权的藩阀官僚与陆海军之间，在确保军队的独立性上，意见完全一致。正如上节所述，文官官僚的巨头伊藤博文为了维护军队的独立性，曾经付出多大努力！可是，1900年，又明确规定，陆海军大臣不但限于将官，而且还只限于现役将官。这完全是为了警惕政府的结构从藩阀官僚转到政党手里的缘故。

随着陆海军独立性的增强，掌握陆海军实权的将军们的政治影响力也增大了。不是军人就不能当陆海军大臣，而军人却可以当陆海军以外各省的大臣、总理大臣和枢密院顾问。山县有朋就是这类军人的最高代表。他是征兵常备军制的缔造者，从担任兵部大辅开始就掌握了新陆军的实权，历任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监军、参谋总长等陆军所有最高职务。他不仅当了大将和元帅，而且从1883年起连续六年任内务卿，在此期间，在内务官僚中占据了牢固地盘。而后又任两届首相，共达三年零四个月，还当了枢密院议长。陆军的最高人事要凭他的意旨，至少违背他的意旨就寸步难行，内务省的人事也全由他和他的嫡系来控制。山县有朋出身于长州藩，他所提拔的军人几乎全是长州出身，形成一大派系。在陆军中，如果不加入长州阀的派系，就抬不起头。山县派的内务官僚，固不限于长州人，但这些官僚派全以山县为首领，与长

州陆军阀沆瀣一气。手中握有陆军、内务官僚和警察的山县有朋及其同党,不仅形成天皇制机构中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陆海军对政府也保持独立地位。萨摩藩出身的陆军大将、元帅大山岩,是在陆军中不属于长州阀的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他主要担任参谋本部长(总长)和野战军司令等职务,政治势力较小。

长州陆军阀的另一方面则是萨摩海军阀。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于1885年当上了海军大臣,在任四年零五个月,其间还兼任农商务大臣约半年,后来又当内务大臣和枢密院顾问,1893年第二次当海军大臣,在任约五年,其间还兼任或代理陆军大臣,1894年,由陆军中将升为海军大将,1898年再次任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的经历颇与山县有朋相似,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山县内阁中,西乡都曾担任内相,这一事实既说明了两者配合、协作的情况,也反映出两者在地位和势力上的差别。这一差别也是陆军与海军的势力之差。海军以西乡从道为头头,由萨摩藩出身的人把持着。在幕府末期的各藩中,也曾有过堪与萨摩藩相匹敌的诸如佐贺藩出身的中牟田仓之助等几个海军高级官员,但到了甲午战争时期,这些藩阀势力便全被萨摩阀压倒了。在政治方面继西乡之后拥有实力的山本权兵卫,也是萨摩藩出身,在西乡最后辞去海相职务后接替了他。山本于1898年11月至1906年1月担任海相达七年零两个月之久,1913年任首相。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海军始终没有陆军那么大的政治势力。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情况,在天皇制权力机构中,不论文官还是武官,原长州和萨摩两藩出身的人占压倒优势,很早就形成了藩阀,所谓长州藩的陆军阀和萨摩藩的海军阀,就是以此为前提的。随着陆海军军备的扩充和它对政府独立性的加强,由藩阀就派生出来了军阀。同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虽然都是政界的长州阀代表,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同山县军阀结成一体的

长州藩阀。从“阀”的角度来看，长州的陆军和萨摩的海军，正如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是好搭当一样，陆海军联合之后形成了一个“军阀”，它是与通常所说的维新元勋阀——伊藤博文、井上馨、松方正义<sup>①</sup>、黑田清隆<sup>②</sup>等势力<sup>③</sup>并列的另一种“阀”。

陆海军阀不顾财政状况如何，一味要求扩张军备，难为政府，并滥用帷幄上奏权超越政府为所欲为；还不管内阁由于什么情况更迭，陆海军大臣完全根据陆海军内部情况决定去留<sup>④</sup>。从1885年年底建立内阁制<sup>⑤</sup>以来，到本文论述的年代末尾，即1914年组成大隈内阁为止，内阁共变动十六次，其间陆军大臣只变更十次，海军大臣只变更六次。在辞职的陆相当中，同内阁一起辞职的有第一届松方内阁总辞职时的高岛鞆之助，第二届松方内阁时，还是高岛鞆之助，第二届桂内阁时的寺内正毅，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的上原勇作，第一届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楠濂幸彦，前后总共不过五次。

而且这五次辞职都有不得已的特殊情况。高岛鞆之助是萨摩藩出身，为了协助本藩阀的首领松方而入阁的，所以松方一辞职，高岛也就不得不一起辞职；寺内正毅则是作为长州陆军阀的后辈，和他的先辈桂总理一起辞职的。关于上原勇作陆相的辞职问题，从日期上看，是和西园寺内阁一起辞职的，但实际是上原勇作为了反对不接受增设两个师团要求的西园寺内阁，单独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从而把内阁搞垮的。至于楠濂幸彦是因为当时陆军内部骂他是“窝囊废”<sup>⑥</sup>，要寻机撤换他，恰逢山本内阁因意外变故倒台，陆相便趁机换了人。就是说，与内阁共进退的只有因阀族关系

① 松方正义系萨摩藩出身。

② 黑田清隆出身同上。

③ 其内部存在着萨长对立。

④ 松下芳男的《明治军政史论集》中的《政变史和军部大臣制》（1937年），最先提出了陆海军大臣留任和辞职的政治意义。

⑤ 即第一届伊藤内阁。

⑥ 楠濂幸彦的绰号，姓的谐音。——译者

结合起来的高岛鞆之助和寺内正毅。反之，也有象上原勇作那样，陆相不经首相而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的。陆海军大臣的去留，就这样实质上是由军阀的意志决定的。

可见军阀哪里是不干预政治，倒是严重地影响了政治，象最初的隈板内阁和后来的第二届西园寺内阁的情况那样，他们敌视内阁，并指使陆海军大臣反对内阁，最后竟想打倒内阁。然而，这种政治行动的目的，在甲午战争以前，只是为了迫使政府和议会接受他们所要求那样的扩军，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本来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还没有介入全部内政外交，尤其是外交，对国家的前进方向给与重大影响。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从1900年前后，军阀开始大力介入日本的国际政治了。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夺取中国领土台湾作为它的殖民地，从中国索得大量赔款，迫使签订不平等的高压条约，并企图迫使割让中国要地辽东半岛，以打开通向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近代帝国主义阶段的大门；还特别围绕着对朝鲜的统治权问题，想与沙俄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都借“战后经营”之名，把全力投入到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去了。

军备接二连三地扩充起来，到日俄战争开始前的1903年底，陆军已由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时的七个师团增加到十三个师团。甲午战争开战当时仅有五万多吨的海军舰艇，到日俄开战时已达到三十二万八千吨，增加了五倍半。甚至可以说，日本经济归终只是为了维持和扩大军备、装备和供应陆海军。尤其钢铁、造船和机械工业，这一时期开始正式把军需生产放在一切的首位。国家财政则集中力量设法筹措军费。如下表所列，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结束，军费总额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除1902年低于百分之三十以外，其他年份通常都是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以上。



直接军费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年 份	一般会计与临时军费的合计	直接军费	百分比(%)	
1893年	84,582	22,832	27.0	
94	135,299	128,427	69.2	甲午战争
95	173,631	117,047	65.5	
96	168,848	73,408	43.5	陆军扩充十年计划
97	223,848	110,543	49.2	海军开始第一次扩充
98	219,758	112,428	51.5	海军第二次扩充
99	254,166	114,308	45.0	
1900	292,750	133,174	45.5	出兵镇压义和团
01	266,857	102,249	38.4	
02	289,227	85,763	29.6	日英同盟条约
03	315,969	150,415	47.6	
04	822,218	672,960	81.8	
05	887,937	730,530	82.3	日俄战争
06	696,751	378,723	54.3	

注① 此表根据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4，“临时军费”。

② 直接军费，是指陆海军省费、临时军费、各种名目的直接战费、征兵费的总和。

在全力以赴地大搞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点上，藩阀官僚、陆海军阀以及它们所敌视的政党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不得不增加陆海军对国家和社会的压力，因为它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手段。占国家预算总额一半以上的军费，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提供了最大的国内市场。当然，大部分人民财富都被非生产性的军费浪费掉，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长远看来、从本质看来，它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妨碍了资本积累。但是，对于以三菱、三井为首的那些同政府相勾结、同军需直接联系的、势力雄厚的产业部门来说，却可以带来巨大利益。政党的资金主要依靠这些大资本家来提供。因此，对大资本家和政党来说，军阀固然是个不愉快的政敌，但陆海军本身却是宝贵的。军阀领导下的陆海军当局，正

象担负起帝国命运似的，觉得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而且他们可以凭统帅权的独立和大臣武官制，可以不受政府约束采取独立行动。于是军队便开始撇开政府擅自开展对外活动。下面举几件日俄战争前的重要事例：

1896年8月，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在阿奎那多的领导下首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日本刚刚占据了吕宋岛对岸的台湾，刚刚开始武官总督下的殖民统治，菲律宾人民的起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的陆军参谋部便派遣楠濑幸彦前往调查实际情况。这时菲律宾人民的起义在年底曾一度与西班牙官厅达成妥协，楠濑幸彦调查数月后回到台湾。后来，为了经常得到情报，台湾军于1898年3月派遣台湾铁道队会计员坂本志鲁雄常驻菲律宾。

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战争，5月，美国舰队驶进马尼拉湾，诡称要援助阿奎那多领导的独立斗争。阿奎那多轻信谎言再次起义，8月中旬解放了除马尼拉市和其周围地区以外的吕宋全岛。当时，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很快达成停战协议，驻在菲律宾的美军背弃了菲律宾人民军，并与之为敌。随后，同年年底，美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媾和条约，菲律宾全部地区成了美国领土。被叛卖的菲律宾革命党掀起了新的反美独立斗争。而日本政府却承认美国占领菲律宾，对革命党请求驻马尼拉的日本领事给予援助不予理睬。但是，一年半以前台湾军派到马尼拉的坂本志鲁雄，在此以前的8月15日，却向台湾陆军参谋部提出建议：“当今我国若不占领马尼拉并在此扶植日本皇威，美国即将扎根于这些岛屿，势必危害东亚神国之自由与发展。请从速统一朝议，援助阿奎那多军，以帝国之力，实现其独立。如帝国军部同意，请拨给小官一营陆战队，将在顷刻之间奋勇夺得马尼拉城。”对此，台湾军认为，须请示中央的方针，此时经略南方，只是理想而不可实际动

手,于是指示坂本要严守中立。<sup>①</sup>

以上是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当局的官方态度。但参谋本部却暗中“援助”了菲律宾革命党。1899年2月,在菲律宾革命党展开反美武装斗争的同时,革命党代表波赛来到日本,奔波筹措武器和弹药。国权主义政治家犬养毅、学者志贺重昂、政治骗子中村弥六等人帮助波赛。经中村弥六介绍,波赛与陆军次官中村雄次郎搭上关系,进而又与参谋总长川上操六接了头。后来中村弥六、波赛等人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众说纷纭,不知哪个正确。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载,川上操六参谋总长支持这一运动,不顾外相青木周藏的强烈反对,陆军把武器弹药售给大仓组,大仓组又把这些武器弹药卖给中村弥六认识的德国人瓦音贝格尔,然后转手交给了波赛。这些武器装在中村弥六从三井物产公司买来的轮船“布引丸”里,于1899年7月13日驶出神户港,但于同月21日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遇到暴风雨,轮船沉没,人和武器全都沉入海底。在装运这批武器之前,台湾陆军参谋部的上尉原禎,脱离军籍,伙同四名预备役陆军军官、军士及著名的大陆浪人平山周,为了参加阿奎那多军队,一同搭船到马尼拉去了。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的记述是否可靠?也有不大准确的地方,不过确有确凿证据证明参谋本部介入了这一事件。在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二卷(明治三十二年)的《布引丸一件》中,录有1899年5月31日大浦警察总监写给青木周藏外相的秘密报告。据这个报告说,东京的摄影师铃木真一受波赛委托,请求川上操六大将协助筹措武器弹药,川上大将经同桂陆相协商后,决定卖给毛瑟枪和施奈德枪共六万支。但在同年年底,日本政府同意了美国政府关于不要援助菲律宾人的要求,取消了上述出售武器的决定。于是,铃木真一又托胜海舟,胜海舟再次劝说川上操六

<sup>①</sup> 尾崎卓尔:《平坂本志鲁雄》。

和桂太郎，领到废枪支的样品。据同一文件集中的其他文件载，中村弥六从三井物产公司买到的轮船“布引丸”，自7月13日驶出神户港后，在门司市除了装载航海所需煤炭外，还装载了三百吨弹药，经长崎驶往上海，21日因海上暴风而沉没。这些弹药就是火仓组卖给瓦音贝格尔的。

从这些材料可以断定，川上参谋总长和桂陆相两位陆军最高负责人曾经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军也显然参与了。川上等人是否确实取消了曾经约定出售六万支枪这点，极其可疑。是否考虑到日本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就取消了呢？虽然还不能说川上等人当时企图通过“援助”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向那里扩张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但总会有一些想为日后有个抓挠吧。这件事后来日本政府和陆海军都打消了入侵菲律宾的念头，结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史上的一段插曲，但陆军“军部”化的萌芽在这里也已经冒头了，从这点看来，它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个重大事件。

1900年发生了更加重大的事件。这年夏天，为了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民族斗争，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在三万三千名联军总兵力中，日本出兵达两万二千名。义和团起义并没有直接把日本也当作斗争目标，日本并没有参加镇压的理由，但山县有朋首相、桂陆相、参谋本部等认为，如果各国出兵镇压需要大军，必定要依靠日本出兵，日本可将此机变成“将来称霸东洋之开端”，参谋本部很快就作好了出兵准备。6月8日，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议联合出兵，日本政府立即同意。关于这一点，陆军省编纂《军事关系明治天皇传记史料》<sup>①</sup>一书中所引用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sup>②</sup>战史卷七》中有

---

① 校订者将该书题目改为《明治天皇传记史料明治军事史》，并已公开发行。以下本书使用《明治军事史》名。

② 清国事变：指义和团起义。——译者

如下重要记述：

“6月15日上午，内阁召开会议，国务大臣及参谋总长出席，决定派遣陆军事宜之后，内阁还想就其陆海军兵力进行讨论，但大山参谋总长发言：出兵与否，固须经内阁决议，至于兵力及编制等项，当由本职负责调查决定。遂未议论。”

当时的首相是陆军军阀的最高首脑山县有朋。参谋总长在阁议席上一说不准政府置喙出兵的兵力问题，连这个山县首相都默不作声，这是怎么回事？上引史料接着还说：“在此之前，参谋本部业已在进行关于派遣兵力及编制的调查，并制定出编制提纲，阁议一旦作出决定，参谋总长便立即将此编制提纲上奏天皇，取得批准，决定先派出少于提纲的兵力为先遣队”。参谋本部事先不同政府商量，就把出兵的兵力问题作为“军令事项”擅自作出决定，待阁议刚一决定出兵，便立即上奏天皇取得批准。天皇已经同意，政府就再也不能吭一声，只能照此办理。山县一想这样怎能完成首相的任务呢，或许出于一时的气愤，当天便向天皇提出了辞呈。前引《明治军事史》中引用的《明治天皇年表稿本》，对此有如下记载：

“\*因清国事变，内阁会议决定派遣陆军；参谋总长侯爵大山岩上奏天皇。

\*因内阁总理大臣侯爵山县有朋有意辞职，赐予优渥圣旨。（是否关于出兵华北问题与大山总长意见冲突之结果？）”

上文括号中的注释，出于《明治天皇年表稿本》作者的手笔。这位作者属于哪一机关？不得而知，但注释所作的推测，恐怕是有根据的。关于派遣陆军问题，只由参谋总长上奏而没有首相的上奏，首相因而向天皇流露辞职意，这说明上述阁议的记述是真实的。不言而喻，对外出兵时，应派出多少兵力，不应首先取决于军事观点，而应按出兵目的把政治判断放在首位。然而，关于军队的动员和编制问题，甚至连陆军的缔造者和元帅山县有朋都没有发言权。这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军部独裁的先驱。

当时还有一件海军也参与了的重大事件——出兵厦门事件。为了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京。1900年8月，陆海军当局和台湾总督府企图占领台湾对岸的中国福建省的厦门。从上一年6月份以来，台湾总督(第四代)儿玉源太郎中将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极力主张：为了统治台湾，必须占领厦门，把福建省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也曾有过此类主张，割取福建始终是日本政府当时的基本目标。义和团起义一爆发，陆海军当局和台湾总督府便企图借此机会实现历来的野心。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策划的？以惨败告终的这次阴谋的史料藏到哪里了？由于材料奇缺，不得而知。但是，8月12日，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电训军舰高千穗号舰长，令其为了“保护侨民”，“迅速驶进厦门，继承先前发给和泉号舰长的训令，该舰高千穗号、和泉号、筑紫号中之一舰务必停在厦门”。14日，海相又向停在厦门的和泉号舰长发出如下秘密训令：

“作好以高千穗、和泉、筑紫三舰之兵员，于必要时占领厦门港口两岸炮台的计划。再者，待与外国共同行动之时机一到，自当不迟于他国，且决心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务使他国致力于居留地，而我军则极力占领炮台，如占领全部炮台力有所不及，应着眼于攻占主要炮台，要事先秘密慎重作好计划，并速将计划要旨直接报告海军大臣。如厦门地方发生不稳情况或有其他可乘之机，务同驻在当地的帝国领事协议，借口保护帝国侨民，派若干兵员登陆，切勿踌躇失机。”<sup>①</sup>

这个训令，海相当日通知陆相，由陆相电告台湾总督。台湾总督接到训令后，立即复电说：“占领厦门炮台必须同时占领川石山电信局，请记住。请与海军省协商为盼。”此后，台湾总督与陆相之

<sup>①</sup>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1章，第7节。

间,就由台湾派遣陆军问题,曾往复电报多次。22日,大山岩参谋总长将发给台湾总督的训令上奏天皇,并得到批准。训令的内容是,要作好战斗准备,如和泉号舰长提出要求,应立即从台湾军中调出一大队步兵、两中队炮兵和一中队工兵以内的兵员,派往厦门,与海军合作占领该港。第二天,训令由桂陆相作为“奉敕”传达给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24日拂晓,捏造了一起厦门本愿寺传教所“被暴徒纵火”的事件,<sup>①</sup>于是海军陆战队登陆,和泉号舰长请求台湾出兵,<sup>②</sup>台湾军出动等,立刻受到各国的强烈抗议,结果政府立即命令台湾和驻厦门的舰队停止军事行动。<sup>③</sup>

关于这一事件,海军大臣官房编的《山本伯实历谈》一书有如下记载:山本海相向警备厦门的和泉号舰和高千穗号舰发出“秘令”,内称,为了保护侨民,“须相机行事”,事先调查研究“一旦发生要占领厦门炮台的情况,应如何行动”的办法,拟定方案后报告海相。“按照惯例,将‘秘令’通告了陆军大臣”。可是,山县总理大臣给山本海军大臣挂了电话,海相应首相之邀来到外相官邸,山县首相、大山参谋总长、桂陆相、青木外相均已在座。桂陆相对山本海相说:

“已将所收海军秘令厦门警备舰之通知传送参谋总长。海军既已企图占领厦门,陆军亦须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经报请天皇批准后,已向儿玉台湾总督发出命令。然而,接到报告说,儿玉总督性急,已从台湾守备军中调出若干陆军,正在令其开赴厦门。情况如此,须就今后措施进行协商。”

山本听后大吃一惊。他说,发给和泉号舰长的秘令,是属于平

① 据说实际上是传教士遵照台湾总督府的密令,自己烧掉的。

② 实际是台湾让和泉舰长请求出兵。

③ 这件事的概况,请参照本书第2册,第2篇,第2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史料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北清事变》上;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

时的军舰外务令的性质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厦门炮台等在外地进行战争，陆相等人误解了秘令的意思，要求陆军停止出兵，并说服参谋总长，促使他取消了由台湾派兵的命令。

山本后来(1926年8月或1927年8月)的这段谈话，奇怪得很。第一，8月14日海相发给和泉号舰长的训令，显然是企图伺机占领厦门炮台，并不是同当时的行动计划毫无联系的平时的预备调查；第二，如果桂太郎确对山本说过：海军既已企图占领厦门，陆军亦须采取相应措施，即向台湾总督发出训令，台湾总督竟贸然出兵等等，这些话句句都荒谬绝伦；第三，所谓经山本说服，陆军取消了由台湾出兵的命令，不符合事实。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话收进《山本伯实历谈》里呢？不会只是由于山本记忆混乱所致吧。可能是山本后来为了对海军当局企图计划和实行占领厦门炮台终归失败进行辩解，说成陆军误解了海军的秘令，险些误了大事吧。

关于这个事件，外务省只是接到了陆海军省决定出兵的通知，除厦门以外，华南其他地区的领事都全然不知。上海代理总领事到了8月30日<sup>①</sup>才询问外相说：“据闻台湾已派一千三百名兵员去厦门，此消息是否属实？果真如此，又因何出此一举？”甚至连与厦门同在福建省的福州领事，事前也一无所知，这从该领事于8月28日和31日发给外相的抗议电报中便可了解。该电谴责武装占领厦门的想法，在28日提给外相、参谋总长和海相的意见书中指出：厦门地方并没有形势不稳的事实，本愿寺纵火事件，“风传是故意搞的”。

就是说，这个事件或许是台湾总督府和海军省、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共同策划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最为积极。这与后来关东军总想要占领“满洲”如出一辙。这次出兵是

<sup>①</sup> 这时台湾军业已撤退。



否根据阁议的决定。以及山县有朋事前对出兵计划参与到什么程度。都不清楚。后藤新平9月7日进京会见了山县有朋。后藤就此向儿玉报告说：“总理似颇辛劳，厦门及台湾情况不尽了解，总理之意亦不过欲归咎于领事及舰长”。政府以外的元老伊藤博文等人也一无所知，听到出兵的命令后，慌忙从大矶赶到东京加以制止。尽管是小规模的，不仅向海外派出军舰，甚至向外国派遣陆军发动战争，这样策划并付诸实行，这说明陆海军阀正在形成本质上不同于因军备预算对抗政府或阻碍政党出来掌握政权等的一股势力。一言以蔽之，已经开始了由“军阀”向“军部”的过渡。

##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部”的形成

日本派出作为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主力部队以镇压义和团以及占领厦门的失败，对于日本政府、元老和军阀来说，一方面增强了自信，另一方面也从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所谓的自信是，日本从此也加入了“列强的行列”<sup>①</sup>，当列强镇压东亚的反帝民族斗争时，不得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列宁于1916年就曾指出，“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sup>②</sup>这段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著名论断，如果加以必要的改动，也适用于金融垄断资本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1900年左右的日本。在远东，无论何处，日本都能立即集结大军。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军事力量，是帝国主义世界中所独有的。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日本统治

---

① 桂太郎语。

②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译者

者就可以弥补经济实力上明显的不足，并能加入列强帝国主义的“行列”，这在镇压义和团中已显示出来。

其实，桂太郎在任台湾总督时就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地理条件和军事条件。1896年7月，桂太郎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冗长的意见书《割据华南福建一带归我所有》。他预料会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强行侵略中国，将与列强势力范围毗连，引起纠纷，而加以反对，他对此满怀信心地反驳说：“虽然与列强接壤，但列强只是扩张版图，建立殖民地而已。其本国主力远在欧洲，由于列强彼此嫉视反目……，绝不可能在隔绝的异域扩张其主力，十分显然……。利用台湾的地利在华南扶植我国势力不仅不是难事，亦地势所使然者。”但是，占领厦门的惨败，给了他们深刻教训，他们认识到，日本只靠独占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军事力量，还不能同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必须同列强中某一国家结成同盟。八个月后的1901年4月，山县有朋拟出《东洋同盟论》，主张“与欧洲的一国结成同盟”。桂太郎也在1901年6月初任首相时，规定国政的最高方针是“独力承担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注意相机与欧洲某一国家缔结某种协定”。<sup>①</sup>

占领厦门失败以后，日本统治阶层暂时放弃了南进政策，改为“北进”，企图确保在朝鲜的独占统治力量，以及向与朝鲜接壤的中国“满洲”方面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由于沙俄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义和团起义的机会，旁若无人地将“满洲”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加强了对朝鲜的压力，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日本统治阶层认为，“北进”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同欧洲的哪个国家结盟，是俄国还是英国？众所周知，围绕这一选择，政府、元老、军阀内部意见分歧，最后1902年2月结成了日英同盟。日本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发起了

<sup>①</sup> 关于这段时间前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已在本书第2册，第2篇，第3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详细论述。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如上节所述，日俄战争前的陆海军阀，已发展到试图独自发动小规模对外武装侵略的程度，但在重大战争决策方面，政府或政治还掌有领导权。甲午战争时，政府掌握着决定开战的领导权。当时的大本营里，说是根据明治天皇的特别命令，允许伊藤首相以文官身份列席法律规定“文官不能介入”<sup>①</sup>的大本营会议。这并不单是为了便于政府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系，而是伊藤以与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对等的地位，参与战略的讨论，实现了政略与战略的统一。在停战和媾和上，政府也完全领导了军队。

如前所述，在决定出兵镇压义和团时，在派遣兵力问题上，就通过了参谋本部的独裁，不准政府介入，但对是否出兵的问题，还是由政府决定的。在日俄战争开战时，自1903年春季，参谋本部的各个部长就在内部高唱强硬的开战论，斥责政府，批判大山岩参谋总长优柔寡断，但并没立即诉诸社会或向政界做工作，而是把内部意见归纳起来，然后由大山岩总长于1903年5月向天皇提出了意见书，认为当前日本的军备能够同俄国对抗，但越往后将越对日本不利，并说现在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良机。末尾还说：“我等军人本不应置喙政治，亦不愿介入”，只是职责攸关，不能对国防计划和敌我兵力关系漠然处之，故提出意见，略加辩解。这些话并不是捎带而已地敷衍一下。

政府还得到了元老的全面监护，但对“和”与“战”这一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却负起责任来对待，没有受统帅部的摆布。谷寿夫中

---

<sup>①</sup> 战时的大本营即设在天皇之下的统帅部，按其第二条规定：“在大本营参与帷幄机务，计划帝国陆海军重要作战，乃参谋长之职责”，第三条规定：“幕僚由陆海军将校组成，其人员另定之”，文官不能担任幕僚。当时最初是伊藤要在大本营的御前会议上主管并说明“出师经费等事宜”，经天皇批准，列席了大本营会议。对此，伊藤认为，“不仅只是经费，在外交政略方面，如不熟悉军事行动”，亦有妨碍，因而这点也被批准了。

将在其《机密日俄战争史》<sup>①</sup>一书中谴责说：在1903年10月24日的元老会议上，除元老以外，只有首相、陆相、海相和外相出席，连参谋次长<sup>②</sup>、海军军令部长和藏相都未被邀请，后来也是一样。在政府明确决定开战后的1904年1月7日的阁议上，才允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各自率领次长出席，这些作法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谷寿夫弄错了。

在开战后的战争指导上，也没有军略无视政略而独断专行的情况。在全局方面，政府与大本营也彼此沟通了意见。1905年奉天<sup>③</sup>会战之后，陆军军官严重缺乏，大炮和弹药也精光了，要迅速补充根本不可能。不要说进一步追击敌人，就连长期保住现有占领地区都困难了，而且并没有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些情况，大本营和“满洲”军总司令部都对日本人民一概保密，但却告诉了政府和元老，说是“政略与战略要一致”，要求政府早日实现媾和。这一点，和后来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尽管连续大败，军部还是硬拉着日本一直走到最后的惨局——，迥然不同日俄战争的开战，名副其实地是由政府负责决定的，同样，媾和也是由政府负责决定的。

虽说如此，实际上这时就连得到明治天皇特别信赖的伊藤博文，已不能以十年前的发言权参加大本营了，只能以一名元老的资格“列席”大本营的御前会议，旁听幕僚对天皇的各种报告。在大本营内已经没有甲午战争期间的政治与军事的统一，只是还没有严重的分歧，基本上能够保持协调局面而已。

而且，在这次日俄战争中，局部出现了军事优越于政治的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对韩国的政策方面。日俄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

---

① 该书是1925年在陆军大学校的讲义。

② 大山岩总长以元老身分出席。

③ 奉天：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旧称。——译者

在于把沙俄势力从韩国全部赶走，把韩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开战两周后的1904年2月23日，日本急不可待地迫使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把韩国变成了“保护国”。3月，伊藤博文作为天皇特使派到韩国进行视察，根据他的视察报告，6月11日，系统地制定了为把韩国搞成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的具体政策，并稳步付诸实行。而实行这个计划的保证，就是日本在韩国的军事力量。

在此之前，进攻韩国的日本第一军追击俄军北上以后，3月11日，大本营又编制了五个后备大队作为韩国驻屯军，归大本营直接指挥。于是韩国驻屯军与驻韩日本公使之间发生了争执。驻公使馆的武官为了“操纵”韩国宫廷和政府，“经常采取超越公使的行动”，韩国驻屯军司令官也上报说，“必须操纵韩军、干涉韩国政治，公使、武官、司令官之间产生三角斗争，呈现难以统一的情况”。结果，“以威压为主的当今对韩统治，如不将军司令官的职权置于公使之上，则我政策不能贯彻”的主张取胜，8月21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寺内陆相在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改编韩国驻屯军，确定驻屯军的任务为：（1）“根据日韩议定书第三条之规定，确保韩国独立及领土完整”；（2）驻屯军为“防御来自大陆方面敌人袭击之帝国国防轴心”，决定把驻屯军扩大为由两个师团和若干特种兵组成的一个军，驻公使馆武官兼任驻屯军参谋。配备两个师团的计划在此后若干年也未能实现，但当时的后备军增加到十二个大队，9月5日，将近卫师团长长谷川好道中将提升为大将，任韩国驻屯军司令官，直属天皇指挥。<sup>①</sup>

由于新的韩国驻屯军司令官直属天皇，所以其地位远远高出驻韩公使，由他“操纵”韩国宫廷，推行独自的对韩政策。外务大臣无权指挥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只接受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

<sup>①</sup> 前引《乱密日俄战争史》、《明治军事史》。

监督。这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原则性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便形成了，即日本在对朝鲜和“满洲”政策方面，军人总督勾通军队中央，超越政府采取行动。《机密日俄战争史》就这一点评论道：“如此重大问题，采纳武官方面的主张，并顺利得到解决，乃伊藤侯爵于3月中旬以特派大使身分渡韩，目击现状而推行的改革步伐……”。这就是说，因为韩国上下隐蔽和公开的对日反抗情绪非常强烈，所以日本的对韩政策，必须以威胁镇压的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这种想法通过伊藤的赴韩视察已经广泛传布到政府之中，所以这种重大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

掌握军队指挥权、凭军事力量来统治异族人民，这在台湾总督已有与韩国驻屯军相同的先例。

日本凭1895年5月生效的中日“马关条约”占据了台湾，5月11日立即制定了《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任命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为总督，令其接收台湾岛。桦山总督利用一个陆军师团和一支五艘军舰的舰队，排除台湾岛居民的顽强抵抗，6月17日进驻台北，建立了总督府。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半师团的兵力，用以镇压汉族和土著居民的武装抵抗，到11月下旬基本上平定了全岛。但这只能是“基本上”而已，后来台湾人民对日本统治的反抗斗争非常激烈，每年台湾都发生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

按照《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建立起来的总督府，属大本营领导，可是6月11日，内阁设立了台湾事务局，由伊藤首相任总裁，川上参谋本部次长任副总裁，具体事务分成各部，任命有关各省次官担任各部委员。随后，8月6日，将《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改为《台湾总督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规定，总督府为军衙组织，确定了大本营与台湾事务局的职责范围，民政归台湾事务局管辖，总督府同事务局直接联系，有关军事事宜，总督府同大本营或陆海军

省直接联系,至于虽属军事事宜但与民政有关的问题,则由大本营或陆海军省与事务局协商处理。<sup>①</sup>

以军事组织开始的台湾总督府,其领导机关在大本营复员后改为陆军省,另一方面,台湾事务局仍继续研究总督府的统治原则和总督府官制,在1896年2月2日的台湾事务局全体大会上,审议了拓殖务省官制、台湾总督府官制及其他问题。根据外交部委员原敬日记载,他主张驻台湾的日本陆海军,应由主管省直辖,无须委任给总督,关税、邮电等项亦由各主管省管辖(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但因居少数未被采纳。至于陆军大将或中将任总督的原案,“除川上中将外,全会均不同意,但总理可能考虑到陆军的感情,仍采取了原案”。另据交通部委员田健治郎的传记载:当海军出身的军事部委员山本权兵卫刚表示赞成文官担任总督时,川上副总统便痛斥山本身为军人却赞成文官担任总督,对此,山本反驳说,没有军人不准赞成文官担任总督之理,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篇传记还写道,结果台湾事务局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仰呈天皇裁决,即“呈请天皇批准武官担任总督的原案”。这与原敬日记的记载不符,但从内容看来,原敬日记可能是正确的<sup>②</sup>,而且从史料的性质来看,后人编纂的书籍与当事者当时的日记比较起来,当然是后者的价值要高一些。

伊藤所以排除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采用武官总督制,或许是“考虑到陆军的感情”,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战争期间他就在大本营极力主张占领台湾,其中包藏着企图把台湾作为向南推进帝国主义扩张之据点的祸心,而且要想统治台湾,首先必须用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因此,让武官担任总督,使其拥有军队指挥

---

① 《台湾总督府条例》,见于《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所收的台湾资料。

② 很难设想,由于这种程度的问题,会议意见不一致便仰呈天皇裁决。当然,最后要采取呈请天皇批准的形式,但我想在此之前,伊藤总裁已经作出决定。

权为好。于是在1896年3月底，用敕令公布《台湾总督府条例》，从4月1日开始实行。

总督直属于天皇，只限陆海军大、中将担任，在委任范围内统辖陆海军，为维持安定秩序必要时可动用兵力。另外，根据与该条例同时制定的法律第六十三号《关于台湾应施行法令的法律》规定，总督可以在其管辖区域内发布“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府令）。这个“法律第六十三号”在议会中酿成重大问题（所谓“六三问题”），宪法学家们也认为，授予行政官员台湾总督以立法权是违反宪法的，直到后来始终是个问题。但不管法律论如何，总之，台湾总督变成了一个在台湾具有军事权和立法权的独裁者。随着这一条令的实施，在形式上从军政过渡到民政，内阁的台湾事务局撤消了，其事务由新设的拓殖务省接管。中央政府对总督府事务的管辖后来还有变动，但那些都不是本文的主题。

日本对于第一个殖民地——台湾，实行了直属天皇的武官总督独裁统治。关于民政，尽管说受到政府监督，但是总督人事的实权掌握在军队手里，可以说军队把台湾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那里，军队独裁在制度上也确立起来。而且对于这种作法，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表示原则性的反对。在台湾事务局的会议上，虽然原敬和田健治郎等官僚曾主张文官总督制，但伊藤一说原案较好，也就不反对了；虽说议会曾因“六三问题”反对政府，但也决非反对总督武官制和军事权；再者，对于用敕令，亦即不经过议会就决定了殖民地统治体制，也没有任何批判；它不是反对总督具有双重意义的专制——既是独立于议会和人民之外的对于殖民地统治，又是对殖民地人民的专制——，他们所争论的只是使其专制合法化的技术问题。原敬等人的内地延长主义（同化主义）和竹越与三郎等人的殖民地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同样只是以双重专制为前提的技术性的争论。这种军人专制体制不久竟反应到国内来，这在计划



占领厦门上台湾总督府所起的积极作用中业已表现出来。

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割取了库页岛南半部，接管了中国辽东半岛南部旧沙俄租借地作为关东州，并把朝鲜实际上变成了殖民地<sup>①</sup>。这些地区再加上台湾，日本把面积相当于本国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土地和拥有人口相当于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还把同日本本土面积几乎相等的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南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大殖民帝国。在这前后，日本同美、英、俄、法等国缔结了关于瓜分东亚和东南亚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同盟和协定，成了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在东亚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对于韩国，1905年11月，伊藤以特派大使身分前往汉城，一面凭韩国驻屯军威压韩国皇帝和大臣，一面迫使签订了“保护”条约<sup>②</sup>。接着，12月，为了对韩实行“保护”统治，以敕令制定了韩国统监府官制。当时议会没有任何发言权。按规定，统监“监督”韩国的外交活动，但实际上并不限于外交，统监已经通过指挥安插在韩国政府的财政、警察、教育等部门的日本“顾问”，还统治了韩国的内政。并且规定，“为保持韩国安定秩序，必要时可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行使武力”，兼而掌握了军事权。

1906年3月，伊藤任首任韩国统监。由于统监当然拥有韩国守备军的使用权，因而对于这一任命认为文官伊藤对军队司令官拥有命令权触犯了统帅权的独立，掀起了文官统监反对论。在反对派中，参谋本部各部长和第一部成员田中义一中佐等人是首当其冲者。据《田中义一传记》载，海军方面也卷入反对派中，山县参谋总长代表反对派同伊藤发生了激烈冲突。伊藤以得不到军队指

---

① 1910年全部吞并。

② 即1905年11月17日日本以高压手段迫使签订的《韩国保护协约》，这是第二次“日韩协约”。——译者

挥权就不当总监，坚决要求军事权。当时认为除了伊藤以外找不到担任总监的合适人选，所以元老和陆海军都感到为难。1905年底，由于取代山县当上参谋总长的大山岩元帅和寺内正毅陆相的斡旋，才总算说服了山县和参谋本部的成员，特以天皇发布命令的形式，承认韩国总监拥有兵力使用权。就是说，1906年1月16日，天皇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下达诏敕，内称：“朕考虑韩国当前事态，为达保持其安定秩序之目的，假韩国统监以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使用兵力之权，故卿等应采取适当措施，以免在国防用兵计划及上述兵力使用方面互生障碍，以符朕望”。这就开了一个通过行使天皇大权的特例形式。大山参谋总长接到诏敕后，向韩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如下的“训令”：

“一、贵官受韩国统监之命使用兵力维持韩国安定秩序时，须按命令酌情处理；

二、关于上项使用兵力，须注意避免影响作战计划，且应尽快将统监命令之要旨及执行要领，报告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

三、如认为为执行上项韩国统监命令须变更作战计划时，则应经参谋总长，将理由上奏天皇，等待裁决；

四、当理事官要求出兵以维持其地方之安定秩序时，应令其地方驻军指挥官酌情答应”。<sup>①</sup>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尽管对于辅佐天皇统帅大权的统帅部的独立在此出现了一个例外，但毕竟还是要靠行使天皇大权，对统帅部独立的制度本身，没作任何修改。毋宁说通过这次争论，军事当局可能重新强烈地意识到了统帅部的独立问题，更加坚定了坚决捍卫这种独立的决心。这在诏书和参谋总长的训令中，都强调要采取适当措施，以免统监命令使用的兵力同“国防用兵计划”之间不至发生障碍这点上也可感觉出来。第二，更加重要的一

<sup>①</sup> 前引《明治军事史》。

点是，这次争吵是由参谋本部的部长和成员发动的。山县只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就是说，参谋本部的部长及其成员串通一气反对政府，并不同于过去那种军阀巨头随便摆布政府，它说明参谋本部这一组织本身正在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正在发展成为“军部”。

承认韩国统监拥有兵力使用权，正象义军蜂起所表现那样，说明韩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力量比台湾人民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为持久。既然如此，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承认统监拥有兵力使用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任统监是文官伊藤，所以承认了文官拥有军队指挥权，形成了一个例外，仅就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在统帅部的独立上暂时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裂痕，但统监的权限本身，也就是建立军事统制朝鲜体制的第一步。

1909年6月，伊藤辞去统监职务，后任还是文官曾祢荒助，他也拥有统监府官制第四条规定的权限。按例外处理表示妥协承认了伊藤拥有兵力使用权的军事当局，所以也同意曾祢荒助统监拥有同样权力，是因为当时山县有朋和桂太郎首相已在研究吞并韩国的时机和具体的程序，为了加速这一时机的成熟，正如桂首相写给山县的信中所说的，安排平庸人物担任统监，促使韩国和皇帝政府“犯错误”<sup>①</sup>，此乃“今后政策上最妙之方策也”。<sup>②</sup>

在将近断然吞并韩国的三个月之前，桂太郎首相将统监换为寺内大将。当时伊藤认为最好通过统监政治，名义上仍然保存韩国，实际上把它变成殖民地，所以对早期吞并不积极，但对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队势力也没有积极抵制。当时伊藤也已无力控制军队的势力，这一点留待后述。吞并韩国是在1909年7月6日的阁议上才作为国策正式决定的，但在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队首脑

<sup>①</sup> “犯错误”：意思是韩国皇帝等可能利用韩国统监的平庸无能，采取自主的行动。

<sup>②</sup> 1909年4月17日桂太郎首相致山县有朋的信。参见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

之间，在此之前早就背着内阁秘密定下来了（1910年8月实行吞并）。

在吞并的同时，韩国国号也被迫废除了，“朝鲜”定为只是一个地名由总督府统治。朝鲜总督直属于天皇，由陆海军的大、中将担任，对驻在朝鲜的陆海军拥有指挥权，在朝鲜须用法律规定的事项，可用总督的命令（制令）加以规定。即朝鲜总督也和台湾总督同样拥有立法权，但实际上，朝鲜总督是一个比台湾总督权力更大的独裁统治者，他所指挥的军队也比台湾总督多一倍以上。在台湾，从儿玉源太郎任总督的时代起，军事以外的事宜，均由文官的民政长官指使警察名副其实地掌管起来，台湾总督府的陆海军参谋不干涉民政工作，这已形成惯例，而朝鲜的文官政务总监就不然了。在朝鲜，受陆军大臣和总督指挥的宪兵司令官垄断了警察权，民政也由宪兵掌管。警察政治也好，宪兵政治也好，对受压迫的民族说来，没有多大区别，但对压迫其他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体制来说，却是个大问题。朝鲜作为军队特别是陆军直辖领地的意义，比台湾更为重要。其理由有二。第一，由上述可以看出，为了镇压朝鲜民族顽强持久的抵抗运动，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第二，吞并朝鲜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下一个最大的扩张目标是统治“满洲”，而朝鲜被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绝对重要的军事前哨基地。由于这些原因，在统治朝鲜上，军事比台湾更加优越于民政，更加强化了军事统治。

对关东州的统治也和朝鲜一样，是强有力的军事统治。对那里的统治，始于日俄战争期间的军事占领，日俄媾和条约<sup>①</sup>签订以后，1905年9月26日，日本设立了军政机关“关东总督府”，1906年9月废除军事统治体制，实行新的关东都督府制。都督直

---

<sup>①</sup> 即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朴次茅斯签订的《日俄和平条约》及附加条款。——译者

属于天皇，由天皇特任陆军（海军不行）大、中将担任。其职责为担负关东州的施政和防务，负责守卫南满洲铁道，监督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都督拥有对驻满日军的统率权，在“满铁”附属地的要地设置宪兵队，责令兼负维持治安和军事警察任务。

日本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统治以及对满铁的经营，不同于日本对朝鲜、台湾或南库页岛的统治，不仅要直接同清政府（后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利害发生密切关系，而且还要同英、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害发生密切关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中国领土，同中国和列强进行争夺。如前所述，在关东州，都督在制度上可以说就是陆军的都督，这就意味着陆军统治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政策。因为陆军的中央——统帅部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军省虽然仍属政府内的一个机构，但它凭大臣武官专任制和帷幄上奏权，等于半独立于政府之外，尽管陆军省和统帅部两者内部存在着矛盾，但对外它们却是一个陆军的整体。陆军控制着日本帝国主义将来“发展”的最大目标——统治“满洲”的前哨基地，这就决定性地加强了陆军对于日本全部国政的发言权，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其他军令军政机构本身形成政治势力的最重要因素。

在关东总督府阶段，由于它是由统治占领地区继续下来的军事统治，所以总督接受大本营的监督，复员后接受陆军中央的监督，对于政府或外务省的指示置若罔闻。这种军事统治践踏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前和战争中曾一再宣称、在《日俄和平条约》中也明确规定的关于“满洲”的“门户开放”、“各国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机会均等”等原则，全然无视中国的主权，采取一系列旨在只把日本势力渗透到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措施，甚至连铁路运输货物的处理细则也是如此，这就触怒了日俄战争时期在财政和政治方面大力援助<sup>①</sup>过日本的英美等国。由此造成了围绕中国和西太平洋地

<sup>①</sup> 日本的胜利全靠英美等国的援助。

区的势力的、日本同美英特别是同美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的对立<sup>①</sup>。

在政府内部，外相加藤高明等亲英美派，主张对“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未被采纳便于1906年3月辞职了。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担心日本同在财政上所依靠的英美之间对立的加深，多次向中央提出意见。1906年5月22日根据他的要求，召开了有元老、政府首脑、陆海军最高首脑等参加的“满洲问题协商会议”<sup>②</sup>。会上伊藤首先发言。他慷慨陈词，强调不开放“满洲门户”，与英美为敌是日本的“自杀政策”；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不满，照此下去“最后势必导致中国二十一省人心走向抗日”，强烈要求军政当局改变现行政策。山县元帅、寺内陆相和儿玉参谋总长以各种理由强词辩解，反对伊藤的意见。伊藤针对儿玉等人一再说“经营满洲”，指责“儿玉参谋总长等人根本误解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痛斥他们把并非日本领土的“满洲”完全视为日本领土的作法。会议的结论是：“全会意见大体一致”。这种结论与其说形式上用了暧昧不明的言词，莫如说实际上用空洞的言词承认了伊藤的主张，会议决定把关东总督府改为平时组织。此后，总督府制便改为都督府制了。

不过，即使改成都督府制，日本在“满洲”的政策活动比过去并没有根本改变，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没有实现，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只有加强，没有丝毫减弱。因此，日本同英美的对立，以及同中华民族的对立却日益加深。1907年11月，伊藤自汉城向政府呈递意见书，警告说，由于日本不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

---

<sup>①</sup> 日本同英美的对立，尽管时张时弛，但总的看来日趋激化，终于发展成1941年的日美战争。

<sup>②</sup> 参加这次会议者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五元老外，政府首脑有：首相西园寺公望、陆相寺内正毅、海相斋藤实、藏相阪谷芳郎、外相林董等五人，军方有：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桂太郎、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等共三人，总共十三人。——译者

将加深日本同英美间的对立，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本有孤立于世上的危险。然而军事当局对此却充耳不闻。

伊藤还在意见书中提到，日本在财政方面必须依靠英美，在资本方面无力与列强帝国主义竞争。所以伊藤等人主张要与英美协调。然而军人们却认为，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确保和扩张势力范围。只要日本想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就必须靠“军事力量的独占”、“独占掠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特别方便条件”来弥补或代替日本体质上经济力量的不足。换言之，即必须维持和强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事统治。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对立与日俱增，朝鲜、中国大陆、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日益高涨的时代里，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越发加强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更加推进了军备的扩张，这不单是军事当局利己的要求，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体质上的需要。

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掌握军事力量并统治着殖民地的陆海军尤其是陆军的实权派，已经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在对华政策方面，他们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就随时无视政府，强制推行独自的政策。其先例表现在1900年占领厦门的计划上，到了日俄战争以后，军队在“满洲”的政策行动，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

尽管是军队的擅自行动，但在外国看来，也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行动。日本政府对外要直接负责，不得不设法加以处理。就是说，政府只好被军队造成的既成事实牵着鼻子走为它进行辩护；或者只好制止军队的行动。再让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队服从政府的领导，当时甚至连伊藤博文也无能为力了。日本与美、英、俄等国的外交中心，也是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所以，谁执对华政策之牛耳，谁就可以对日本的全般对外政策直接给予决定性的影响。而对外政策是与内政密不可分的，因而他们也必然介入内政。这就是说，陆海军尤其是陆军，以推行独自的对华政策

为中心，介入了外交内政各个领域的政治。

这样，独立于政府、议会和人民之外，必要时干脆对立起来，试图操纵国政的政治势力——军队即军部就形成了。军部已不是过去的军阀，正如围绕韩国统监的军队指挥权问题的对立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是整个军事机构形成政治势力后的产物。

通过1907年4月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这些日本最高国策，以及1907年9月制定的《军令》，使军部的势力在国策上和制度上得到了新的强有力的保障。

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始于山县元帅于1906年10月采纳参谋本部成员田中义一中佐的意见，拟出《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上报天皇。天皇将这一方案交给元帅府<sup>①</sup>进行咨询。元帅府答复说，准备将此案交给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让陆海军协商起草“帝国国防方针”。经过两个统帅部门的协商，1907年2月，他们共同向天皇呈递了《帝国国防方针草案》、《国防所需兵力草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草案》。天皇只把《帝国国防方针草案》交给西园寺公望首相，令他组织研究，而《国防所需兵力草案》则只准首相自己“秘阅”，至于《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草案》连秘阅也未准许。3月，西园寺首相上奏天皇，内称：“我认为国防方针极其适宜，但国防所需兵力当今难以立即全部实现，请暂假以时日，结合国力斟酌缓急”。于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方案全被天皇采纳，并作为天皇本人的意志和方针确定下来。这些方针政策是由天皇只特别交给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首脑的事项，至于议会和人民则根本不晓得有这码事。

国家存亡攸关的最高政治方针——国防方针，只由军部来策划，首相只能就天皇下达的方案发表意见，这就等于首相只能承认陆海军的决定。如果也让首相发言，统帅部就应该从起草阶段同

<sup>①</sup> 元帅府：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机关，1898年设立。——译者



政府协商，或者起码在统帅部制定出成案后即就此同政府协商才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由统帅部策划以后立即上奏天皇。天皇制下的惯例是，对于天皇受理的方案，一般说来，首相不可能加以修改或者提反对意见。正因为如此，军部才故意这样做的。在决定最高国策方面，这种程序便确立了陆海军的统治势力绝对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制度。国防方针的内容是，把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美国作为第二假想敌国，还设想了对美战争。这种设想的根据在于，山县有朋在私案中提出的所谓“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中国为有利”这一日本发展方向的规定。如果日本继续侵略中国，首先同俄国、其次同美国的对立是必然的，军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这纯粹是政治判断，本应“不介入政治”的军队统帅部竟擅自做出政治判断，并通过天皇强加给政府头上了。

执行国防方针所需的兵力，陆海军的指标都是日俄开战时的两倍，陆军定为平时二十五个师团、战时五十个师团；海军则是以八艘战舰和八艘巡洋舰为中心的“八八舰队”。此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便围绕着这次以天皇旨意确定下来的扩充军备问题而展开了。

1907年9月，又制定了《关于军令事宜》，作为“军令”第一号。文件只有两条，第一条，“有关陆海军统帅事项，几经钦定之规定，均称军令”；第二条，“凡军令须公告者，附以上谕，天皇亲自签署后加盖御玺，主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标记年月日，并副署之”。规定什么是“军令”的军令第一号就是以政府和议会根本不得介入的“军令”制定的，它本身就明确表示，这么一来，军事当局想把什么叫作军令就可以把什么叫作军令。这也是根据超越法理的明治天皇的判断，作为天皇的意旨制定出来的。<sup>①</sup>因此，能够与其对抗的不是法理，而只能是可与军部对抗的政府或议会的实力。这种实

<sup>①</sup>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法学》杂志12卷3、4期。

力只能凭政府或议会在政治方面到底能把多少人民力量集结起来来决定。

1908年12月，皇宫内设立了侍从武官府，府内置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sup>①</sup>侍从武官长由天皇亲自任命陆海军大、中将担任。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在天皇身边担任有关军事的上奏、答复和命令的传达，可以说是天皇与陆海军省、统帅部之间的纽带。虽然设在宫中，但并不受宫内大臣或内大臣的监督，是完全独立的。通过这个机构，军部便可完全抛开政府经常直接地与天皇取得联系。

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统治着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实力部队——陆海军的势力，已经形成了一股无论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法制上都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并牵制政府和议会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军部。这股势力的中枢人物，明确意识到自己属于与“行政部”对立的“军部”成员而最初表现出来的就是本章开头引用的田中义一少将1913年2月2日致寺内正毅大将的信。

## 第二章 大正时期的政治与军部

### 第一节 军部同政党和人民的对抗

通过日俄战争，天皇制日本变成了亚洲唯一的殖民帝国，开始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的霸权。同时，天皇制帝国主义最大的实力组织——陆海军，以统帅权的独立和陆海军大臣武官制为两大支柱，与政府相抗衡，成了每每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治势力。当时的进步评论称之为“军阀的跋扈”或“军阀的蛮横”。我认为，这种“军阀”的形成，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决定日本命运的“军部”的形成。军部是怎样形成的，上一章已经叙述了，因此，

<sup>①</sup> 明治四十一年第319号敕令。

下面就直接叙述军部实际上是怎样干预政治的。

最早出现的军部与政府对抗的著名事件是，1912年年底，军部要求增设两个师团，西园寺内阁拒不接受，于是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单独辞职，从而迫使内阁垮台。

《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均由军部独断，作为天皇的意旨和国家最高方针确定下来，议会和政党对此全然不得而知。实际上政党人士和大资本家们迟早肯定知道了，但表面上他们始终佯装不知。日俄战争后的政局是，围绕着实现“所需兵力”的扩军问题，在政府、陆军、海军和政党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三角、四角的讨价还价的斗争，这样说并不过分。经过这些斗争，到1911年8月组成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陆军已拥有十九个师团。<sup>①</sup>但距陆军要求平时二十五个师团的目标，还差六个师团。陆军认为，为了镇压朝鲜的民族独立斗争，并为了准备《帝国国防方针》中设想的对俄战争，主张迫切需要增建两个师团常驻朝鲜，改变过去由本国派遣师团轮流驻在朝鲜的编制。陆军过去每年都向内阁要求这项预算，但因日本财力实在担负不了而一直拖延下来。这次陆军又向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提出了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

海军也不示弱。它正在用总计两亿五千一百五十七万余日元的预算实行建造新式舰艇的七年计划。但1910年5月，它又向阁议提出了四亿余日元的要求，作为由次年度开始连续八年的充实海军费用。这项要求因财政困难被搁置起来，但阁议决定提前实施以前的计划，还决定从1911年度开始六年之间再支出两亿四千八百六十七万日元，并得到了1910年底召开的第二十七届议会的承认。尽管这样，海军还不满足，1912年又向西园寺内阁提出了从1913年度开始为期七年的“紧急扩充”计划，要求拨款三亿五千一百九十九万日元，以建造七艘最新式的大型战舰和两艘巡洋舰。

<sup>①</sup> 日俄开战时是十三个师团。

陆军和海军竞相提出了财政根本担负不了的要求，内阁对此全部予以拒绝。海军考虑将来再说撤回了，但陆军却不肯撤回要求。陆军为什么唯有这次如此强硬呢？赶快增建驻朝鲜师团一事，从一味要坚持对朝鲜实行军事统治的观点来看，觉得实属当务之急；但心里未尝没有要乘后述的中国辛亥革命混乱之机大肆侵略中国的企图，因而急于扩军。不仅如此，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山本四郎说，陆军讨厌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有着以在议院中控制着绝对多数的政友会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内阁因素，因而企图用增建师团问题谋求藩阀官僚势力的东山再起。<sup>①</sup>言之有理。

在政府方面则是，整理行政和财政势在必行。一般说来，资本家也因军费过重妨碍他们的资本积累反对扩军，支持政府整理行政、财政的政策，尤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广大中间阶层和民众的舆论，由于反对日俄战争期间延续下来的苛捐杂税的掠夺，以及前桂内阁集中表现出来的军阀内阁对人民的压制，对于比桂内阁还差强人意的西园寺内阁的整理行政，财政寄予期待。政府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没有屈服于陆军的要求。起首反对增建师团的财界头目涩泽荣一等人，由于元老井上馨的劝说，11月中转变立场支持扩军，但并没能左右财界大势。政府越坚决，陆军就越顽强。

11月17日，上原陆相写信给桂太郎大将，信中阐明他的观点说：“试观政府方面情况，此次似欲逞不易成功之阴谋，以此一举博得彻底胜利，以达到政党政治之目的，当然不仅针对增建师团问题，亦不止针对陆军”，进而表明他们的立场说：“当今，君主主义一派，第一步调不一，阵容不整，各行其事，所一致者唯有自豪及轻敌一事。……总之，今后如不以非常之决心与非常之准备，克服危机，

<sup>①</sup> 参阅山本四郎《大正政变的基础研究》，此外，山本四郎《围绕增建师团问题》（《华顶原期大学研究纪要》第6号）中也有相当详细的分析。

确立国家永世不可动摇之基础，更待何时？”<sup>①</sup>他把增建师团问题看成是政党势力和君主主义的决战，所以始终不肯让步。11月30日，陆军的妥协方案在阁议上最后被否决以后，第二天，12月1日，上原同山县元帅进行商谈，12月2日，没向首相打一句招呼，就滥用帷幄上奏权单独向天皇提出了辞呈。这么一来，陆军根本不会推荐后任陆相，于是西园寺内阁便于12月5日垮台了。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陆军省军事科长宇垣一成大佐在“大正二年(1913年)夏初”的《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sup>②</sup>一文中，针对社会上所谓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是因没人担任上原陆相后任而垮台的说法，说：“据吾人所知，当时从未听到有就陆相后任进行内部磋商之事，故政党者流所谓后任难产云云，纯系揣度臆测军部之意向，徒自画鬼于墙，望而生畏，自欺欺人。”然而，当时确实从现役陆军大将或中中将当中选不出来陆相，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西园寺要求山县、寺内和桂推荐陆相后任而遭到拒绝，社会舆论定会更加激烈攻击军部，西园寺所以并没有这么做而干脆辞职了，可能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一员，不愿意让民众更进一步地攻击军部吧。

关于围绕着增建师团问题的军部同政府和国民的斗争，一般的定论是，若是以前的话，军部的最高巨头山县有朋必定首先跳出来拥护陆军的势力，可是这次当初并未积极活动，上原陆相起初也并不那么强硬，后经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和宇垣一成军事科长等中坚军官极力活动，鼓动山县、寺内、桂等人，一再怂恿上原，还说服井上等元老和财界。在《田中义一传记》中大肆夸耀了当时田中的活动情况，说明陆军省、参谋本部这些机构本身发展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形成军部的时候，其中掌握实权的干将——局长、科长等中坚军官，根本无视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热中于政治活动，这正

① 前引山县四部：《围绕增建师团问题》。

② 《宇垣一成日记》1。

是由军阀统治转化为军部的特征。田中和宇垣等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坚军官”和“少壮派军官”的先驱。如果联想到后来的“中坚军官和少壮派军官”不仅把日本军队而且把整个大日本帝国导致崩溃的事实，那么田中传记的作者大肆夸耀田中军务局长的政治活动，未免有些滑稽可笑。

西园寺内阁垮台后，其势力仅次于长州陆军阀山县有朋的桂太郎巨头，辞去仅任职数月的大正天皇侍从长兼内大臣的职务，组成了内阁。当时海军由于同陆军争夺势力，不肯提出后任大臣，想迫使桂内阁流产。于是桂太郎请求天皇颁发敕诏，让前内阁的斋藤实海相留任新内阁。斋藤无奈，以桂内阁接受扩充海军的要求为条件答应了留任。可见，制定军部大臣武官制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陆军阀也为这种制度受到打击。可以说是“因果报应”吧。军部的形成同时也使陆海军的对立激化起来。这和后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部独裁越发展，在大战方酣时陆海军的对立越激化是一样的。

陆军依仗帷幄上奏权扼杀了西园寺内阁，后任的桂太郎“以玉座为后盾，以诏书为子弹，狙击政敌”<sup>①</sup>，挥动天皇大权的权力政治，激化了人民的反军部情绪，掀起了打倒军阀、拥护宪政的大规模国民运动。1913年2月10日，数万民众包围了议会，要求内阁辞职，演成了如同原敬日记中所描写的情况，即“倘若还不辞职，将引起革命骚动的事端”。桂太郎让三菱财阀拿出资金，收买了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人，组成新政党“同志会”，策划对反对派搞“中央突破”，但归终屈服于民众的包围和攻击，于2月11日辞职了。

在这次政变的高潮中，由军务局长调任第二旅团长的田中义一少将于2月2日寄给驻汉城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sup>②</sup>一封长

① 尾崎行雄语。

② 寺内正毅是仅次于桂太郎的长州陆军阀巨头，而田中义一则是长州阀属望的人物。

篇信，信中论述了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如何捍卫军部势力的问题。<sup>①</sup> 信中还写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由此可以了解当时一些政治军人的想法，因此特将信件全文刊录于下<sup>②</sup>。

“久疏问候，伏维阁下愈益康健，是所至禱。鄙职自去年末调任以来，只顾忙于当前军务，敬请释念为盼。

去年末政变以来，发生种种变化，结果桂公组成政党，虽说不会立即如何，但早晚将使(议会)休会，然后解散议会，着手建立公开组织。由于去年以来发展情况，促成如此形势，但桂公关于政党之想法，似自始即有道理。去年为抑制政友会之横暴，标榜决不妥协，利用国民党派系人物，造成此趋势，是为此次决心之动机。

自去年末以来，鄙职未得会见桂公，窃维当今最须注意者，乃军部之态度。万一海军支持政友会，陆军另属新政党，各据分野，实为国家堪虑之大事。窃维今后至要者，乃陆海军协同一致，屹立于政党之外。再最须注意者，乃逢迎社会之趋势，政府丧失权威；政府若无权威，终将影响皇室尊严，社会将对钦定宪法作英国式之解释。再者，此次桂公所建政党，恐将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桂公目前并无此意，但将来实不可逆料。

然而，当前形势，视政友会之态度如何，或许立即解散议会；但另一面，因政府坚决不辞解散议会，杀减政友会之气势，或不至解散议会亦未可知。桂公之决心似极坚定。新政党方面，对解散议会分有利与不利两派，但就大局而言，如今社会已陷于混乱，如不解散议会恐无医治之途。惟桂公组织政党，竟俯首于国民党，实属遗憾之至。去年末元老会议召开之前，如阁下(寺内)组织内阁，彼等将完全无条件驰驱麾下，大隈亦必约定

① 《寺内家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书。

② 文中的( )是我的注释，我还加了标点，并改了行。

支援阁下。今者国民党如前所述，竟前来邀请会见鄙职。然今桂公却利用此已定之趋势，对之屈膝逢迎，甚属可耻。当前唯一支持桂公者为大隈伯爵，大隈已将对阁下之期待转移于桂公。当时，不论阁下出马或桂公出马，均将造成目前形势，所不同者显然唯有无条件之驰驱与屈膝逢迎之差，而此差异必将对政府前途发生重大影响。

今后固不待言，目前若干处置者为政友会之原(原敬)与野田(野田卯太郎)等人。由目前情况推断，将来新政党如不能顺利发展，桂公或许将推荐阁下而下野，而原敬等或将接近阁下。总之，近期须特别注意。陆军此时如不保持坚定意志，恐将面临严重困难局面。以前曾言那件削减五千万日元一事(因财政紧缩，桂内阁要求陆军省也要削减预算)，大臣、次官等人有意再增加陆军经常费用，因而向冈次官提出坚决意见。如因首相更迭，对陆军之处理有所不同(即不同意西园寺内阁的削减预算，而答应桂太郎的要求)，则陆军将失信于天下，因此(陆相和次官)似乎都打消了削减预算之意。但据悉，最近(桂内阁)又向陆军提出更高要求，对此陆军将采取如何立场？当然会出现诸如停止临时军费之意见。从大臣(木越安纲，从德国留学期间是桂太郎的密友)与桂公之关系以及冈次官已向桂公透露陆军财政内情看来，前途颇不胜忧虑。

此时尤需参谋本部进行活动。考虑今后趋势，莫若如前将动员、编制(由陆军省)移交参谋本部，以在政治斗争之外确立坚实基础，实为至要。否则深恐将遗噬脐之悔于将来。此类问题终属人事问题，鉴于各种关系，鄙职亦认为由上原中将任参谋总长，目前属实必要。

此外，考虑大局，将来尤应注意者，为对六七年后将达三百万人之在乡军人加以适当领导，并将其推广至一般青年，以



健全引导国民思想，巩固国家基础。此次教育令亦大致含有此意，所谓良兵即良民之主义将贯穿于教育与内政中。在乡军人会机关刊物《战友》杂志，目前发行量已达七万左右。此刻应将其改为旬刊，至少改为半月刊，以大力指导国民，实属当务之急。但因经济关系，不能轻易着手实现，颇为焦虑。阁下如能赐与关照，在阁下领导下取得此事之巨大发展，为国家作出贡献，实属我国最大幸福。在乡军人会发展形势良好，地方（指一般社会——军用语）与军队之关系颇有改观，此刻尤须奋勉从事，伏请阁下赐教为禱。

上月二十一日，伏见宫殿下就任总裁，并将于后日（四日）在殿下宅邸召集全国联队区司令官，届时拟请殿下为军人后援会颁发令旨，因正值皇孝期间，联队区司令官和军人声援会干事拟在偕行社<sup>①</sup>聚餐，相互疏通思想，实行合作，并乞諒察。

与去年增建师团问题时一样，大部分国民总对陆军怀有不可理解之成见，致使陆军蒙受莫大不利，今后必须随时采取措施，消除国民之成见。诸如增建师团问题，军人中了解真相者亦甚少，何况在乡军人。因此，《战友》避开政治性报道，从教训出发，刊登说明真相文章，亦无不可。果对社会思潮顾虑重重，何时能了解真相？结果将始终抱怨陆军。另册稿件已邮寄河本（名不详，可能是寺内的亲信）处，请大致检查后赐与斧正，准许载于《战友》。山县元帅亦恳切希望予以刊登。

上原中将现仍居乡。窃维总须先回东京，正在劝告，烦请阁下亦顺便给予劝告。依愚见，果待命时间过长，将等于加强大臣不限武官之意，阁下在任地如无妨碍，能否于下月左右暂且返京。由各方面考虑，暂时返京似属必要。以上汇报近况，并候安好。请为国家保重身体。时局多难，想阁下对逢迎社会趋势情

<sup>①</sup> 偕行社：日本军人俱乐部。——译者

况，定感不快。但国军永存，请勿因一时变动而过度伤感，是为至祷。所陈杂乱，恐有失礼之处，诸乞海涵。

专此谨呈

田中义一拜启”

对这封信的内容全部加以注释，会过于冗长，这里只好从略，不过在后文将一再谈到此信。

继桂内阁之后组成了萨摩藩海军阀巨头山本权兵卫内阁，实际上政友会变成了执政党，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变成了准执政党。桂太郎遗留下来的同志会改称“立宪同志会”，由加藤高明担任总裁，它是唯一的在野党。当时，前内阁由于打倒军阀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垮了台。无论谁来组阁，都不得不做出相当的改革。山本内阁首先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从现役将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其次修改“文官任用令”，对警视总监和内务省警保局长等高级官员实行了自由任用制；第三断然整理行政和财政，把1913年度的预算比前届内阁的原案又削减了百分之十三。

尽管这样，这届海军内阁虽然削减了一般预算，唯独增加了海军扩军费，既没有废除群众盼望已久的素称苛税的纺织品消费税和交通税，也不倾听中小工商业者拼死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呼声。

在军部大臣任用资格扩大的另一方面，正如上述田中信中所计划的，陆军的编制、调动及其他业务均由陆军省移交给了参谋本部。这就在制度上规定了这些业务均属内阁不得干预的军令事项，而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进行协商，《田中义一传记》称赞田中在这个问题上的功绩说“尔来参谋总长的势力愈益扩大”。参谋总长势力的强化正是当时进步舆论最激烈攻击的目标。进步的民族主义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是攻击军阀、要求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反对统帅部独立的急先锋。它在这年7月1日刊载了预备役军官西

本国之辅题为《胎祸的军相官制的修改》如下的批判言论：

“军队是国家的设施、国家的机构，为国家交战的工具，故必须服从国家的旨意。即军备的设施、改革、废除、国防方针、陆海军的安排和调整等自不待言，凡有关整个军队的事项，均须由内阁来统一，由国务大臣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诸如妨碍内阁旨意的机关，即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各机关，应先废除。”然而，这次对陆海军大臣任用资格的扩大，“据说是把原属陆军权限内的动员、编制等职务移交参谋本部，以此为交换条件，才得以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这只是长州阀军人估计到军部大臣若不由文官出身者担任，舆论界必将群起而攻之，于是便企图采取坚守参谋本部的方针。”西本断言：“所谓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均属老朽不能胜任现役而被淘汰者”，即使把大臣任用资格扩大到他们，实际上根本也不能让预备役和后备役军官来担任大臣，这种以更加加强参谋本部为交换条件的名义上的扩大，反倒越改越坏。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继 1913 年 7 月 1 日之后，又刊登了法学家林毅陆以《军务大臣的权限》为题的文章。该文批判说，如果扩大陆军大臣的任用范围，交换条件是缩小陆军大臣的权限，毫无意义。“为了便于解决军务大臣的资格问题，迎合部分阀族意图，从陆军大臣的权限中划出一些拨归参谋本部管辖，在运用国政上并非上策。应将军务大臣的权限日益扩大，同时令其负起责任。而在法律上不能提责任问题的特殊机关，即直属于天皇的特种机关，应尽量缩小其权限，以明确国政的责任，并使其不能牵制和妨碍当局的行动。”

西本的批判宛如已经看过上述田中的信似的，看透了军部的意图。军部虽然由于大正政变受到了打击，但仍不肯轻易退却。

由于强烈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全国性运动和在众所周知的西门

子事件<sup>①</sup>中，海军当局长期以来的腐败被揭露出来，山本内阁垮台了。在1909年2月20日至24日的《读卖新闻》上，对于海军高级官员利用购买军舰和其他军需品的机会，从中取得回扣一事，极其具体地揭露说，“陆海军军部的阴暗面，他们表面上装作清廉洁白，背地里却肮脏卑鄙，对于大批采购的军需品，经常掠取巨额回扣，悄悄伸出舌头舐这些香甜的汁液。”1911年，预备役海军大佐太田三次郎在名古屋组织召开了海军演讲会，从战略理论上批判海军扩充军备计划对日本的防卫毫无益处，并揭露海军内部的腐败，为挽救海军提出几条意见说：“第一，取消海军大臣只限现役将官担任的军刀主义，应和外国一样，由文官担任；第二，在军需部门应掺进非军事人员；第三，仿效陆军，隐瞒海军编制员额的作法，固属出自对外的战略上的担心，但这不仅是可笑的，而且实际上是出于不经法制局、运用帷幄上奏的卑劣手法而已。”1911年8月6日的《东京日日新闻》详细报道了这次演说的要旨。在发生西门子事件的1914年2月的一次讲演会上，太田大佐激烈主张说，最先拉出来的靶子——海军舰政本部第四部长藤井光五郎少将、和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的泽崎宽猛大佐等人不过是些小辈，要把罪魁祸首山本权兵卫干掉。太田因此立即受到“惩戒免职”处分，并被剥夺了军阶和功勋章。国民党、同志会和中正会<sup>②</sup>共同为太田募集慰问金，各报社也都帮助传播。<sup>③</sup>此外，在职的海军主计大监片桐西次郎早就主张改革海军的预算，西门子事件败露之后，他揭露出作证的事实，因而和太田同时被惩戒免职了<sup>④</sup>。

由于上年桂陆军阀的专横和本年山本海军阀腐败的暴露，使

---

① 西门子事件：指日本海军官员接受德国大军火商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事件，1914年1月23日被议会揭发出来，牵连山本首相及海军部门多人。——译者

② 中正会：反对政友会的小党派。

③ 《日本及日本人》1914年2月19日。

④ 同上，1914年3月15日。

人民过去对陆海军的尊敬扫地，在当时的报刊杂志等上，到处充满了要求废除大臣武官制和废除统帅权独立的舆论。但是，政党无论是政友会、同志会，还是国民党，都只是为了自己钻进政权，暂时利用民众反对官僚军阀的情绪，并没有为坚持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原则而领导民众进行斗争。反对桂内阁的政友会摇身一变成了山本海军内阁的执政党，该党首脑原敬等人参加内阁，犬养也暗中支持山本，这些都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尽管有这么绝好的机会，却没能给军部以任何严重打击，也没有真正要废止军部独立的意图。

山本内阁垮台后，元老会议推举山县的嫡系官僚清浦奎吾为首相候选人。清浦奉天皇之命，喜不自胜地着手组阁，但被山县派搞垮了山本内阁的海军，利用推荐海相之机要求清浦同意根本办不到的海军扩充方案。清浦果然没有答应。于是海军拒绝推荐海相，迫使这次组阁流产了（4月7日）。由此可见，海军不仅腐败，而且还很专横，毫不亚于陆军，只是海军手腕巧妙，没有受到陆军那样的舆论谴责。而且这一时期，海军内部也和陆军一样，“少壮派”非常活跃，他们开始向前辈们施加压力。这些“少壮派”以斋藤海相留任为条件迫使第三届桂内阁接受海军扩充方案，大肆活动，1912年12月21日的《国民新闻》对此作了报道。

清浦组阁失败以后，制造内阁的元老们也束手无策，提不出首相候选人了。最后根据井上馨的提议让大隈重信来组阁。大隈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曾是改进党的创始人，后来又长期担任改进党后身的领导，还当过首相。由于这种经历和他爽朗的为人，使一般人们把他误认为不属于萨长藩阀的颇有能力的政治家，是一个主张政党政治的论者，因而欢迎他来组阁的气氛相当浓厚。新闻出版界中有很多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人，他们为制造欢迎大隈组阁的舆论，帮了些忙。然而，其实大隈当时不过是一个只有“政权欲”

的老牌政客，元老们想利用他来压制政友会，他情愿实行增建师团，才承担了这个问题。大隈让加藤出任副首相兼外相，把同志会拉来作执政党。不过，这届内阁的实力派是警察出身的官僚大浦兼武，他和清浦同属山县一派，任农商务相，后改任内相。大隈内阁于4月16日组成。

大隈内阁首先抓的第一件大事是6月23日设立了防务会议。防务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构成的，它是一个“审议有关陆海军备设施重要事项”的机关，尽管财政困难，还是试图寻求扩充陆海军备的办法。

以前也曾有过设立类似防务会议但比它还胜一筹的机关的计划。第三届桂内阁在元老井上馨的支持下，曾经设想建立一个调整财政与军备关系的“国防会议”。设想的内容虽不太明确，但桂太郎的目的是想统一陆海军备。桂太郎在1912年12月9日写给山县有朋的备忘录中说，“增建师团问题，应就国防概况(设立国防会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再行决定，在上述调查决定之前，陆海军均不得施行(扩充计划)”<sup>①</sup>。1913年1月8日，桂太郎还向田健治郎谈了对于整理财政和国防方针的抱负说，为此必须组织新政党，“陆海两相应改由文官担任”<sup>②</sup>。在前述田中致寺内的信中，也汇报说担心桂太郎的政党会主张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由这些史料推测，可以认为，桂太郎设想建立“国防会议”的目的在于抑制陆海军竞相扩充军备的企图，对攻击军阀的社会舆论作一些让步<sup>③</sup>。

在政党方面，大正政变的中心人物、国民党党魁犬养毅在1914年1月的第三十一届议会上提出了“设立临时国防会议的建议案”。他说：“为了确立帝国国防的总方针，须以国务大臣、军务当

① 角川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一书中所引宪政资料室收藏的桂文书。

② 《田健治郎日记》、大久保利谦《日本全史10近代III》中引用的史料。

③ 参阅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各忘录》(见《法学》杂志，第12期3、4号)。

局首脑及特别任命的人员为成员，组织临时国防会议”。其宗旨是，“国防这样的大计划，应从一国的大势来推断，从一国的大方针来推断，然后斟酌财政、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因此，要设立建议案中所说的、不仅军人而且有各有关大臣也参加的临时国防会议，作为天皇的咨询机关。犬养未就会议的组织权限提出具体方案，他说：“总之，只要能够协调国务大臣与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出任何让步。”他还着重说明这份建议书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控制军备的扩充，而是为了实施现有的国防计划。提案交给委员会审议，但因审议未完而流产了。<sup>①</sup>

同这些比较起来，大隈内阁设立的防务会议，并不是一个讨论国防方针或者重新制定包括陆海军军备基本计划的机关，而是为审议如何实现陆海军扩充军备的要求而建立的首相咨询机构，为了避免陆军反对文官议论国防侵犯统帅权的独立，他们甚至回避了“国防会议”的称谓。<sup>②</sup>总之，它不过是一个为了既能顺利通过陆海军的要求，又可避免人民的谴责集中指向要求扩充军备的陆海军而建立的组织。经过防务会议的审议，海军军备补充追加预算，在第三十三届临时议会上得到通过。陆军增建两个师团的预算也准备在下年度提交议会讨论。桂太郎和犬养毅设想的国防会议还多少含有抑制军部独裁国防的因素，而防务会议甚至却具有军部反扑的因素。一贯进步的议员泽来太郎等人在议会上揭露并批判了防务会议的欺骗性。1914年7月1日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也批判防务会议是贯彻军部既定计划的工具，并在批判中指出，所以设置防务会议，是由于政府“屈服于陆海军主张的关于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员的天皇大权论”，否定了伊藤博文从军部立场对宪法第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9。

② 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录》。

十二条所作的解释<sup>①</sup>。这就说明把对军部的批判引向到宪法论的高度,这很重要。

军部对外界批判军部言论的高涨,警惕得有些神经过敏,这在田中那封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犬养毅等人关于设立国防会议的建议可能也刺激了他们,当时陆军内部拟定了一份题为《鉴于时弊,关于拥护军令权独立之建议》的绝秘文件。执笔者大概就是田中义一。该文件内称:“关于国防,只应由超然于政务以外之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任辅佐之责,……制定符合机宜之计划,仰乞天皇圣断,别无他途。岂有军部自身玩弄权术,诉诸舆论,求其援助之必要?”关于扩充陆海军问题,则说,“先由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进行协商,根据完全一致之意见,再与行政部交涉,以维护军令权之独立……。若行政部由于财政情况,不能接受军部要求,双方则应进而重新协商,自行制定缓急顺序,决不可仰承内阁之成案。”就是说,陆海军在进行军备竞争时,如果双方为此都想分别利用军部以外的势力,则在反对统帅权独立的社会舆论异常强烈的当时,军部自身恐将走向损害统帅权之路,所以文件严禁此类作法,要求陆海军的统帅部协同一致,以捍卫“军部”的独立。<sup>②</sup>

军部就这样摆脱了对它说来最初的严重危机。军部威信虽然大大降低了,但结果只在制度上把大臣的任用资格由现役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实际上是个微不足道的让步,代价则是参谋本部得到了加强。扩充军备虽然迟迟不见进展,但这些要求从财政来看本来就极其勉强;在财政困难和当时舆论那么严峻的时候,海军的扩军竟多少取得进展,陆军的增建师团问题也由于防务会议的反击有了眉目,这些毋宁可以说是军部的成功。

度过这次危机不久,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元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3册,第1章,第39页。

<sup>②</sup> 参阅本书第3册,第1章,第7页。



老和政府以及一些当权派以为这是“天佑”而手舞足蹈，便以日英同盟义务为借口，尽管英国并不欢迎，强行参战到协约国一方。一到战时便是军部的天下了。参战不久，在第三十四届临时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上，上届议会提出的本应纳入海军补充计划的驱逐舰建造费，却硬塞进临时军事费里，受到在野党的追究。看来或将被否决，但声言“战时要举国一致”，便在预算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上全场一致地通过了临时军事费预算。开战的第二年，即1915年6月，在第三十六届特别议会上，以执政党在上次大选中赢得的压倒多数的胜利为后盾，陆军增建两个师团的悬案也顺利通过了。

山县等人原想让大隈内阁干的事情到此算全都干完了，此后便打算把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的大隈内阁搞垮。于是1916年10月，迫使大隈内阁总辞职。随后长州陆军阀的寺内正毅大将辞去朝鲜总督职务组成了纯官僚内阁。《朝日新闻》等报纸虽然抨击了元老和军阀内阁，但当时政党都热衷于党的利益和策略的斗争，民众也陶醉于大战景气的高峰，废税减税的呼声敛迹了，哪里也没出现高举旗帜阻止军阀内阁和“拥护宪政”的运动。

军部似乎又飘飘然起来。他们要在这时用军国主义思想把人民打成一片，由陆军掌握的在乡军人会加以灌输，凭陆军的压力，由文部省和内务省把自主的青年团强行改编为用军国主义思想来统制和教育青年的组织。

甲午战争以后，陆军内部就产生了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想法。日俄战争以后，根据“国内外形势及国军编制要点”，陆军越发痛感到有其必要。所谓国内外形势当然是说日本为了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必须拥有强大的后备军。日俄战争以后一再发生工人运动和租佃争议，民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统治者看来，这是“国民思想的恶化”——，这些很快就会影响到军队中来。因此，寺内担任陆相时曾经调查了外国（主要是德国）的情况，1906

年10月,首次制定出《在乡军人会规程草案》,经同海军协商,征得了海军的同意,但因“战后经营极为繁忙,且因各种情况不得不拖延”下来。1910年7月,陆军又拟定了一个修正案同海军进行协商,而接到海军的答复是“为时尚早,碍难协同共事。但因形势不容踌躇,决定暂先由陆军单独设立。”于是寺内陆相将此案上奏天皇,得到批准,在同年11月3日即明治天皇的诞辰,举行了“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开幕式。<sup>①</sup>

当时促使陆军决定单独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所谓不容踌躇的“形势”,是指前此不久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逮捕了所谓“大逆事件”的犯人幸德秋水等,这一事件使陆军当局深受冲击,他们感到“国民思想竟已恶化”到如此地步,于是便把设立“作为思想对策的在乡军人会”看成当务之急。<sup>②</sup>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义一是创立该会的积极鼓动者之一,他恪守“良兵乃良民”的信条,鼓吹“要使在乡军人成为地方良民的模范,同时还要使之日益锤炼军人精神及增长军事知识,并使会员采取互相扶助及慰藉的方法”,以此作为创立该会的宗旨。<sup>③</sup>当时海军所以没有同意,可能是因为海军复员的水兵为数极少,并未感到有训练在乡军人的必要;而且对于用在乡军人会加强社会上的陆军势力,怀有对抗意识。

据陆军文件记载,在乡军人会创立之前,全国各地业已组织了在乡军人<sup>④</sup>团体。实际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拘怎样,在乡军人会是经过天皇批准这种最高级的正式程序而创立的,本部设在偕行社,支部设在联队区司令部,分会设在各市町村,聘请皇族担任总裁,特邀两名陆军高级官员担任顾问,称之为“会老”。在乡军人会接受陆军大臣的监督,各支部接受所属师团长(在殖民地则是

① 前引《明治军事史》。

② 《田中义一传记》。

③ 《明治军事史》、《田中义一传记》。

④ 在乡军人:指退伍后居乡的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

驻军司令官) 的监督。修改在乡军人会规章须经陆军大臣认可。这种全国性组织是把由上至下单方面进行指挥和发布命令的军队组织照搬过来的,通过这种组织,实际上把全国的退伍军人都强行组织到各个分会中去了。

从前引田中致寺内的信件可以了解在乡军人会的发展情况,以及田中是如何期待该组织发挥机能,防止民主舆论侵入军部中去。1914年初,田中视察德国,看到德国工厂里有退伍军人组织,在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深受启发。同年8月,田中回国后,就企图不仅在居住地区,还要在工厂也把在乡军人组织在分会里。根据这种设想,1917年5月,对在乡军人会章程作了部分修改,规定工厂、矿山也可设立独立的分会。于是同年7月,九州的三池煤矿根据所辖久留米市联队区司令部的指示,便建立了四个分会,并组成“三池煤矿联合分会”。在第二年8月的米骚动中,这个联合分会与军警密切配合,充当了镇压暴动的急先锋<sup>①</sup>,还有很多地区的分会在镇压米骚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田中期待的效果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从此以后,各地的大工厂都陆续建立了分会。1917年,除了为会员发行的机关刊物《战友》以外,还发行了面向会员家属的《我家》杂志。

1914年,田中义一在德国看到中央集权的青年军事组织之后,深受启发,回国后便企图把过去农村自发形成的民间自治青年团体,一举统一为中央集权的“修养”团体。他的设想是:第一,团员的年龄自义务教育结束至二十岁<sup>②</sup>;第二,不是自治团体或事业团体,而是修养和被指导团体;第三,使同在乡军人会直接挂钩;第四,磨炼身心,尤其要锻炼体力;第五,以统一或“诱导”青年思想为目的。其中重点在于使青年团同在乡军人会直接挂钩,通过

<sup>①</sup> 新藤东洋见:《三井矿山和舆论岛》。

<sup>②</sup> 二十岁为征兵体验的年龄。

小学校——青年团——在乡军人会这样一个系统，把全国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田中虽说青年团不搞军事训练，但又说，根据全民皆兵的方针，一定要让青年们学会使用武器和掌握射击方法。

1915年9月，日本内务和文部两省向各地方长官发出了《关于领导和发展青年团体的问题》的训令，田中的纲领全都实现了。陆军省所以没在训令中列名，是为了避开社会对军阀到处插手的责难。对这次建立青年团最卖力气的是各地联队区司令部。当时内务和文部两省内心虽然反对军队强行介入，但一下子就被军队压倒了。<sup>①</sup>

军部就这样在社会舆论谴责“军阀”专横的高潮中，稳步地打下了它的势力基础。另一方面，又乘中国辛亥革命及后来的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军部无视政府，独自推行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政策，牵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路线。

## 第二节 军部对中国的干涉

自从对日俄战争中占据的地区实行军事统治以来，军部一直把南满看作是陆军的领地，每多无视政府指示为所欲为，致使元老伊藤博文十分痛心。在1900年，满不在乎地炮制出厦门事件的军部，当1911年10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陷入混乱状态时，立即开始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革命起义。革命的烈火开始蔓延全国，于是清政府在10月13日要求日本政府<sup>②</sup>援助三十万发炮弹、六千四百万发步枪子弹以及其他武器。日本政府马上答

<sup>①</sup> 《田中义一传记》。日本内务和文部两省1920年的反击情况，容待后述。

<sup>②</sup> 时为第二届西园寺内阁。

应，16日，内田外相训令伊集院驻华公使<sup>①</sup>，让他向清政府申明：鉴于日本政府不避莫大风险，提供援助武器的善意，清政府应改正那种视日本为满洲侵略者的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10月23日，日本泰平公司<sup>②</sup>代理店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了订购武器的合同，这种“援助”便付诸实行了。日方出售野炮、山炮、榴弹炮、步枪子弹、机枪等，总计价款达二百七十三万多日元。<sup>③</sup>

在天皇制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中，元老山县有朋和前首相桂太郎等实力派，对邻邦变为共和国本能地感到恐怖，坚持拥护清朝，希望清廷实行“立宪君主制”。这就导致内田外相以及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政策僵化起来。当初标榜立宪君主制的袁世凯，在通过同英国的交易、观点转向共和制之后，唯有日本仍然对他施加压力，令其采用立宪君主制，终归失败<sup>④</sup>。这个外交过程，不属于本书范围，故不论述。

虽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使它实行立宪君主制，但日本统治阶层在对华政策上，步调并不一致，并没有始终坚持拥护清朝的政策。在日本政府内部，内阁的头号实力派内务大臣原敬，10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形势，叛徒<sup>⑤</sup>和官军情况均不详，

---

① 伊集院公使：日本外交官伊集院彦吉(1864—1924年)，1911年4月到1912年7月，任驻华公使，还曾任驻意公使等职，1923年出任外务大臣，旋即病死。——译者

② 泰平公司是1908年由三井物产、大仓洋行、高田商行等三个公司与陆军签订合同，为了出口陆军的“陈旧”武器而组成的合伙组织。当初合同期限为10年。经过两次延长后于1926年解散。通过向中国各派“援助”武器，泰平公司成了日本陆军操纵中国各派的桥梁，同时，它交给陆军的回扣，又成了陆军操纵政党和议会的资金来源。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清国事变》。

④ 白井胜美：《辛亥革命——日本的对应》，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大正时代》。

⑤ 叛徒：为对革命党及革命军之诬称，习见于辛亥初期日本官方文件。——译者

故只凭外交上的理论，未免于我不利”，在看不准到底哪方面将会取胜的情况下，为了无论哪方面取胜都不至于吃亏，认为也可以多少答应革命军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援助武器的要求。于是参谋本部这回还是从独自的立场出发，10月20日，将少量的雷管和炸药以运往马尼拉的名义出售给中国革命军，为此请求原敬内相令警察给予默许，原敬内相当即同意。石本新一陆相请求原敬内相说：陆军省“讨厌参谋本部直接插手中国各派，故凡未经陆军省者，请勿理睬”。<sup>①</sup> 参谋本部根本没有支持中国革命，只是企图让中国混乱局势加深，长期延续下去，趁机向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在这点上陆军省也是一样，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军部内部早已存在着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争权夺力。

整个政府根本没有看清中国的革命形势，原敬内相等人打算对中国双方都插手。1911年10月24日，阁议决定的《关于对清政策》内称：“帝国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地位，并应讲求方策，使满洲现状永远持续下去。此乃前任内阁执政时经庙议决定之方针”，不想乘中国动乱之机采取新的行动，“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则须待对我最为有利、且最有把握之时机，再行着手，方为得策。”“今后应着重努力在清国本土扶植势力，并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sup>②</sup>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只能作出这样一篇抽象的文章，难怪连原敬内相也叹息道，它对辛亥革命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政府无所作为，束手无策，被中国的形势搞得晕头转向；军部也同政府一样无能，但军部不但不是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它过于有所为了。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一传到日本，陆军省的田中义一军务

<sup>①</sup> 《原敬日记》。

<sup>②</sup> 参阅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09—110页。字句略有删改。

局长等人便立即着手拟定侵华计划。10月13日,就很快将拟好的《关于对清国的用兵问题》的文件传给了海军省。文件说,“当向清国出兵时,第一步应给制定战略之首脑部以沉重打击,同时须根据战后情况,占领政略上经济上最为有利之要地,以作抵押”,“宁肯在战略上输一筹,也应根据政略上之要求,谋求取得战役之最佳效果,方属得当。即我方是否应满足于获得南满洲,或是否应占据直隶、山西地区,攫取清国中部地区之资源,或是否应扼制扬子江口占据长江资源及大冶矿山等,或是否需要令其割让广东及福建。凡此等等,必须确定政略上之要求,使作战计划符合此要旨,以期对清策划万无遗误。”<sup>①</sup>

上面所说的“政略”,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而是指军部关于占领中国哪一部分对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最为有利的判断。据《原敬日记》载,在陆军省把上述文件传给海军省的10月13日,石本陆相在阁议上“把一份文件交给阁员传阅。文件说,并非要求阁议通过,亦非陆军的成熟意见,只是当清国发生事端时,我国是否应该安于现状,还是应该占领一些地区,如果占领的话,该占领哪块地方,希望决定下来。”这份文件的内容,肯定和前面传给海军的文件是一样的。陆军省虽然将如此暧昧的文件交给政府和海军传阅,但实际上却准备日本单独出兵“满洲”,并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华北,第二天,14日,陆军省次官向参谋本部次长发出了如下的照会:

“应特别注意者,乃当战局波及华北时,我国当然须下决心,即一方面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单独加强对该方面之防卫;另一方面则应采取共同出兵<sup>②</sup>华北之手段。盖当共同出兵华北及长江流域时,为以后计,必须先于列强独占白河口及长江口之有利

① 采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之一面》,资料2。

② 指日本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

根据地。征诸过去经验，我国此时似常处于列强背后而失去机宜。故必须预期事变，配备海军于主要地点，使之应急首当其冲，以采取制先机之手段。因此，请将事先研究与海军联系之事项，火速告知。”

由此看来，陆军策略确已定下来了。但它却对政府和海军说，陆军也还没有定下来，在阁议上也不说让大家决定政略，只说通报一下，这是玩弄什么阴谋呢？是否因为让内阁来按照陆军的意图决定日本国家的方针没有十分把握，才故意把陆军的意图说得含糊其词，想要无视政府擅自行动，殊属可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讲的是作战用兵的战略，本应由参谋本部作为军令机关来拟定方案，而陆军省却以“照会”形式通知参谋本部，几乎仿佛是在指示参谋本部。后来陆军省也有类似行动。如1912年3月8日，陆军省次官用“绝秘”文件秘密通知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说准备利用驻满师团换防时机，向满洲派遣第五师团新兵三千名，就地训练这些新兵作为留守部队，换防的兵员不调回国，准备令其开赴华北。<sup>①</sup>策划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

参谋本部也在擅自活动。除了上述向革命派提供武器外，中国爆发革命运动以后，1911年10月14日至1912年初，参谋本部分别向南京、上海、福州、北京、“满洲”、长江沿岸、华北地区、山东省、外蒙古、广西省梧州、内蒙古、云南、“满洲”郑家屯及整个中国其他各地派遣了三十七名谍报军官，令其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北京公使馆武官、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驻其他各地的武官、谍报机关、台湾陆军部等有关军事机关进行必要的联系。其一一览表请见前引栗原的编著。

10月14日，海军也对形势作出了分析并制定了行动方针，

---

<sup>①</sup> 防卫厅战史室藏书《清国革命动乱关系集》，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的引文。



将其下达给海军的下属机关，内称：“当前我国之方针是，暂时观望形势之发展，苟宜扩张我国权域，则不失可乘之机，并毫不丧失既得利权，且须避免中国之猜忌及各国之恶感”，这是总的方针。海军当前的具体措施则是，第一条，在接到有关命令之前，保持中立；第二条，对待清廷官宪和“叛徒”，态度要十分谨慎。虽然这么说，但在第四条中却提出，“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保持大治，事实上占领之”；在第十条还提出，“马公之第十驱逐队要按缓急，作好向对岸厦门、汕头、福州等地出动之准备”；第十一条，“若北方兵力薄弱，不能排除直隶方面发生暴动之可能，第二舰队主力要准备奔赴该地”等等。海军当局看了这个通知以后，便在策划占领政略要地。<sup>①</sup>

元老、政府、军部、军部内的陆军和海军、陆军内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都在各行其事，国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方针，难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中经常充当最侵略的集团的吹鼓手德富苏峰哀叹道，日本应付中国辛亥革命归终只是“右手欲为之事，以左手打消之，终未取得任何可计之功。总帐算来不过是，中国任何党派均不领情，而且遭到各个党派之抱怨或轻侮而已”。<sup>②</sup>下面仅就“右手欲为之事，以左手打消之”试举一二具体事例。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一方面向清政府赶紧援助武器，同时参谋本部也在向革命派提供武器。而与参谋本部关系密切的民间一部分“支那浪人”却为“援助”革命派大肆活跃。黑龙会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中卷，写得相当详细，而且不愧是一部粗糙的冒险主义者集团的著作，是用粗糙的豪言壮语写成的，在此从略。这些“支那浪人”的所谓“援助”，不过是为了革命胜利后攫取利权的手段而已，内心却绝对反对中国变成共和国(后述)。1911年11

① 前引栗原编著。

② 德富苏峰，《大正政局史论》。

月，革命形势逼近北京。于是在各国公使团之间提出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守备”北京—奉天铁路的问题。日本政府同意由列强共同守备，同时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北京—奉天铁路的山海关外一段理应由日本单独守备。英国当然对于日本的野心存有戒心，最初认为，问题是关于山海关内京奉线的守备，至于关外，在发生必要的事态时再由各国另行协商，但结果还是原则上承认了日本的单独守备。当然这是在发生必要事态时，而不是立即这么办（11月13日）。关内的京奉线由列强共同守备一经决定，陆军省便立即制定了《华北派遣队编制要领》，决定从第三师团调出一个步兵大队和步兵机枪队（六挺机枪），置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之下。这支部队分别于12月2日至3日到达天津、北京，因此，中国驻屯军的总兵力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三名。

在此之前，驻北京的伊集院公使曾要求派遣精锐的部队。但政府认为，派遣过多的陆军会增加列强对日本的戒心，对日本不利。<sup>①</sup>然而，陆军省却计划向华北派遣一个师团，11月30日，军务局拟定了《华北派遣师团编制要领》，接着取得了参谋总长的同意。12月2日，军务局又草拟了将第十二师团全部调往“满洲”的《满洲派遣师团编制要领》，1912年1月23日，参谋总长予以批准。参谋本部最初认为向“满洲”派遣一个旅团即可，但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向山县有朋报告说：“对此决不同意，立即叫来第十二师团参谋，令其作好出兵准备。”<sup>②</sup>

1912年1月14日，山县有朋拟定了一份乘此时机与俄国签订瓜分“满洲”的协定，并制定了由日本占领南满和东部蒙古派遣

---

① 1912年1月2日，向田外相致伊集院公使电。

② 1月17日，田中义一致山县有朋的信，前引角田书中的引文，《山县文书》，宪政资料室藏书。

两个师团的方案，翌日将其递交给前首相桂太郎。然而，1月16日西园寺内阁的阁议却未采纳山县的意见，并决定陆军当局出兵一个师团的方案亦须待取得俄国和英国谅解之后再说。

另一方面，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接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的亲信朝鲜宪兵司令官兼警务总长明石元二郎的命令，策划“援助”“满洲”的革命派首领王国柱，在“满洲”炮制混乱，以制造日本大量出兵的机会。中村派出若干满铁公司的职员与王国柱接头，迫使其服从这个策略，于是关东都督掌握着警察权的满铁附属地便成了他们策划的根据地。11月12日，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请求内田外相，“此时应赶紧严重告戒中村，切勿对其本职以外事宜玩弄小计”。13日，西园寺首相电告中村说，有人说阁下在奉天操纵革命党，“此固系毫无根据之报道”，但鉴于目前局势，望严加注意。

满铁当局的策划似乎就此停止了，但情况不详。而且关东都督府仍旧借“援助”革命派之名继续进行扰乱“满洲”工作。清廷要求日方交出王国柱，总领事等人再三要求都督府和本国政府让王国柱离开满铁附属地，但直到12月初，都督还没让王国柱离开。12月1日，与王串通的一伙日本人向奉天城里的钟楼和市街投了三颗炸弹，并继续向王国柱一派提供武器。<sup>①</sup>1912年1月30日，陆军冈次官秘密告诉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说：“现正就将来“满洲”秩序混乱时向该方面增派若干兵力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当前即使在满洲酿成少许纷乱之事端，贵职亦须注意避免过于死板之措施”。<sup>②</sup>在这期间，革命运动发展起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宣统皇帝逊位。在外务省预想到这种形势的2月初，日本政府也就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1912年2月1日，落合<sup>③</sup>

① 《日本外交文书》，别册，《清国事变》。

② 前引角田书。

③ 落合：即落合谦太郎，1911年11月14日，接替小池张造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译者

驻奉天总领事致电外务省，就关东都督任凭革命党将满铁附属地作为策源地一事，询问政府的方针。<sup>①</sup>内田外相在2月2日的复电中指示，“现在，满洲朝廷让步之大势已定；今后赵总督<sup>②</sup>等人态度如何变化，亦难预料。因此，当前对革命党施加压力之分寸，须慎重考虑。即使革命党势力壮大，致使“满洲”秩序发生紊乱，或将构成我国更进一步推行“满洲”政策之动机亦未可知。故既定方针<sup>③</sup>固属未变，但在具体执行时，则应多少略加斟酌。”<sup>④</sup>这就是说，外务省及政府都在被军部牵着鼻子走。原敬内相等人早在前此1月12日召开的阁议上主张，“对于革命军，应采取更加主动援助的政策。俄国已以帮助外蒙古自治之名，进行插手。现在是我国对东三省采取相当措施之时机，请政府仔细讨论”。松田正久法相和斋藤实海相也都同意了这种意见。<sup>⑤</sup>

正当政府看来也要决心出兵的时候，2月3日，山海关外发生了京奉线铁桥<sup>⑥</sup>被炸，列车翻车、死伤多人的事件。凶手是谁不得而知，但根据列强各国的协定，事件发生在日军负责守备的关外地区，而且日本主张关外要由日本单独守备，所以中国固不待言，列强各国也怀疑这是日军干的。加之，日军立即派遣山海关的铁路守备队一部奔赴事故现场，所以就更加深了列强各国的怀疑。1912年2月6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西吉电告外务省说，中国方面曾透露，这次铁桥爆炸使用了大量炸药，若以十余人操作，至少需要一两天方能完成，故不能认为是革命军干的等等，怀疑是日本干

① 参阅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33页。——译者

② 赵总督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译者

③ 所谓既定方针指不能把满铁附属地作为变乱策源地的方针。

④ 前引《清国事变》。译者补注 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35页。

⑤ 《原敬日记》。

⑥ 即金子屯铁桥。——译者

的。电文又称：“此外，近日风传，还有破坏山海关—奉天间另一铁桥之计划。倘我陆军当局为向满洲运兵确有此类计划，考虑对外关系，必须在绝对秘密中进行。”<sup>①</sup>

铁桥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月5日，大岛关东都督致电内田外相，内称，“在满洲秩序紊乱时，曾说我方应采取相应对策，现在已经紊乱，怎么办好？请予指示<sup>②</sup>”，暗中催促出兵。然而，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势力已经压倒了革命派，宣统帝逊位三天后的2月15日，由十七省选出议员组成的参事院一致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了。列强估计袁世凯将完成统一中国，便对这种事态表示欢迎。所以日本军部也不能不担心，如果日本单独大量出兵“满洲”，造成新的混乱，那时日本将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结果，关东都督也不得不断定，利用革命党扰乱满洲的阴谋也到了限度，于是2月27日，都督指令各民政署长，令革命派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退出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sup>③</sup>关于在利用革命派扰乱“满洲”问题上军部同政府间的争吵，由于中国形势变化这一日本以外的因素便消声匿迹了，这决不是政府对军部的胜利。

政府也在长江流域一带向革命派“援助”武器，企图打进英国的势力范围。1912年1月10日，外相、大藏次官、日本银行总裁以及三井、三菱、台湾、正金、第一各银行代表和大仓喜八郎等人在外相官邸召开会议，决定以上海—杭州铁路为抵押、由大仓组单独向革命军提供贷款，并于1月27日签订合同，立即实行。大仓组既卖给清政府枪炮，也卖给革命派枪炮，从中赚钱。另外，还以把汉冶萍公司改成日华合办为条件，决定由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

<sup>①</sup> 前引《清国事变》，译者补注。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45页。——译者

<sup>②</sup> 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40页。——译者

<sup>③</sup> 前引《清国事变》。

司提供三百万日元资金,该公司把这笔款交给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用这笔钱向三井洋行购买武器(2月10日)。还有,2月6日,以招商局的船舶为抵押,招商局与日本邮船公司之间签订了一千万日元的暂定借款合同。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这笔借款未能签订正式合同。另一方面,日本企图向袁世凯政权做工作,但如前所述,袁世凯本身也转向赞成共和制,唯独日本想把君主立宪制强加于他,结果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使日本与中国革命派的关系自不待言,甚至与中国新统治者的关系也疏远了,在列强中间也孤立起来了。<sup>①</sup>

在“满洲”,军部一面利用革命党制造混乱,企图伺机出兵,另一方面还策划利用最反动的反革命宗社党<sup>②</sup>炮制“满洲独立”,并企图利用内蒙古部族的王爷举兵炮制蒙古“独立”,以一举将“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参谋本部是推行这个计划的中心。关于这次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栗原健的《满蒙政策史的一面》一书中载有详细的论文,本书下面只作简单叙述,并加上一些该书没有提及的情况。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有一批“支那浪人”。他们是为日本统治阶层侵华政策服务的侦探,也是出谋划策者——当然其中也有象宫崎滔天那样真心实意想通过中日两个民族的合作谋求解放亚洲的一些人。它们的主流即玄洋社和黑龙会企图通过“援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达到其侵华的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玄洋社和黑龙会也曾站在革命派一边;而川岛浪速等人一派却一直与清朝皇室保持联系,宣统帝逊位以后,他们还想拥立皇族肃亲王,在清朝的发源地“满洲”恢复清朝皇室。参谋本部也支持这个阴谋(参谋本部同时还在“援助”革命派)。2月2日,怂恿肃亲王逃离北京,把他窝藏在

---

① 前引白井论文。

② 宗社党:企图在满洲恢复清皇室的一派。

旅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的官邸，随后于16日送到宗社党的根据地——奉天，拉他当宗社党首领。利用宗社党搞的“满洲独立”运动的总指挥实际上是参谋本部特派来的高山公通大佐，参与策划者是多贺宗之少佐和松井清助大尉等人，北京守备队长菊池武夫等从中协助。关东都督府耍两面手法，既袒护革命派，又支持高山公通等人的阴谋活动。在参谋本部里，福岛安正次长是这一阴谋活动的总指挥。可是，奉天总领事获悉这一计划后，建议外务省加以制止（2月21日）<sup>①</sup>。经政府和军部协商后，停止了 this 阴谋活动。

在宗社党策划举兵炮制“满洲独立”的同时，多贺少佐和松井大尉等人在内蒙古策划着另一阴谋，即唆使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日军的指导和帮助下举兵“独立”。此外务省也曾插上了一手。1911年12月6日，川岛浪速向福岛参谋次长说，喀喇沁王已向正金银行提出申请，愿以所辖领地内的矿山为抵押，借银二万两<sup>②</sup>，望促其实现。参谋本部同外务省进行协商，结果，12月12日，外务省政务局长告知正金银行副总裁说：“喀喇沁王的借款，内田外务大臣希望促其实现”<sup>③</sup>。1912年1月30日，驻北京的高山大佐电告福岛参谋次长说：“关于蒙古举兵事，刻下稳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内离开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到运出）”<sup>④</sup>，还报告了喀喇沁王要求二十万日元借款的事宜，拍电“请赶紧把现款寄来”<sup>⑤</sup>。内田外相将此电文抄件一并发给驻北京的伊集院公使，令他贷给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一定数额的现款，并说：“若能在东部内蒙古区建立某种利权关系，在万一时可能对我国有利”<sup>⑥</sup>。伊

① 参阅前引《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83—84页。——译者

② 参阅上书，第87页。——译者

③ 参阅上书，第87页。——译者

④ 参阅上书，第88页。——译者

⑤ 参阅上书，第89页。——译者

⑥ 参阅上书，第89页。——译者

集院公使2月15日电复内田外相，陈述己见说，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俱系昏庸之辈，既无实力，又无节操，但“认为此时通融若干资金，并非无用”<sup>①</sup>。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3月5日正式签订借契，由大仓组贷给喀喇沁王九万日元、贷给巴林王两万日元。<sup>②</sup>当时宗社党在“满洲”举兵的阴谋业已停止，而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却仍旧进行着上述内蒙古举兵的准备。关于外务省通过这次借款积极参与内蒙古举兵阴谋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写出文章。

松井大尉等人继续囤积武器<sup>③</sup>，5月下旬，在他指挥下，把这些武器装在五十辆大车上，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途中被中国政府军队发现，遭到阻拦，结果松井受重伤，日本人十三人、蒙族人九人、中国政府军三十人，共五十二人被打死，武器弹药也不得不丢掉了。

值得注目的是，政府、外务省也参与了这次内蒙古举兵的阴谋活动，“无所作为、束手无策”的内田外相和西园寺首相，为了乘辛亥革命的机会，设法对中国搞帝国主义侵略，竟然如此粗暴地对中国进行了武装干涉。他们之所以反对军部对中国进行干涉，只是因为生怕伤害同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关系，怕没有效果，只是战术上的意见分歧罢了。如果真正按刑法、陆军刑法的规定说来，军人搞这些阴谋是犯了“外患罪”，但他们却根本没有受到政府或军部的任何责难。可能是因为军部中央参与了阴谋，也就不应该只惩罚下边的执行者了。这就造成了只要是为了侵略中国，干什么都不受惩罚的先例。不久，这就变成惯例和理所当然的了。

1913年7月，中国江西省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当时日本军队和中国方面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兖州事件、汉口

① 参阅上书，第90—91页。——译者

② 前引《清国事变》。

③ 估计这些武器可能是从关东都督府领来的。



事件和南京事件等纠纷。

兖州事件发生在1913年8月5日。情况是驻在北京的日军川崎享一大尉穿着便衣在津浦路沿线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的北军逮捕，“监禁”在兖州兵营一天。据驻北京的山座公使调查，只是因为川崎用商人护照进行活动，被中国北军怀疑他是革命派（南军）的间谍。怀疑一冰释，川崎立即获释了。汉口事件发生在8月11日。情况是驻在汉口的日军西村彦马少尉带领一名士兵在北军戒严的江岸车站搞间谍活动，不听北军哨兵的制止，硬要闯进戒严区。由于西村首先动手砍伤了中国哨兵而被逮捕，没收了他的军装和军刀，把他拘留在北军兵营内仅仅几个小时。南京事件发生在9月1日。情况是当北军占领南京时，三个日本人举着国旗向领事馆避难途中被北军杀害，南京的日侨住房也遭到抢劫。当时那一地区参加南军的日本人有十三人，其中包括日军的陆军中尉，被杀害的三个日本人也经常出入南军司令部。<sup>①</sup>

兖州事件和汉口事件应该完全归咎于日本人，南京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中国方面不对，但本来发生这类事件的背景，是因为本应保持中立的日本驻屯军“支援”了南军，这就加强了北军对日本的疑心，过错根本还是在日本方面。可是，驻当地日军对这些事件完全加以歪曲，颠倒黑白，造谣夸张，大肆宣扬，说中国方面对日本军人，即对帝国军队、日本帝国进行无理的迫害和侮辱；侮辱日本国旗，是凶恶残暴的行为。“支那浪人”则更变本加厉，大肆叫嚣“膺惩支那”向国民煽动排外主义情绪。报纸也净刊登这类蛊惑人心的报道。军部中央也迫使外务省要求中国处罚肇事者，“赔偿”损失，中国政府要向日本道歉。不仅如此，在汉口事件发生时，军部还要求把汉口日军兵营用地和所属道路划入日本居留地，要

<sup>①</sup>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中，载有当地领事、公使等人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

求在汉口取得军用无线电信的敷设权。对于这些要求，就连山本权兵卫首相等人也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因而没向中国提出。

陆军的驻外机关、军人以及关东都督府无论怎么胡作非为，在外国人看来，这都认为是日本国的行为。所以作为日本国外交机关的外务省，就不得不一一进行处理，又不能说这些都是军队擅自搞的。因此，只好牵强附会地说对方不对，一旦理屈词穷，就采取高压手段。这就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反感和不信任，而且激起了同日本帝国主义角逐的列强各国对日本的不相信和反感。当时即使日本的无理得逞，也不能完全满足军部或排外主义“舆论”的奢望。于是，国内攻击“软弱外交”的势头便凶猛起来。外务省官僚对此吃不消，当然希望把外交统一起来。

1912年5月，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在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内田康哉外相手下就职。根据外相的命令，起草了一份《对华政策》，经过部分修改后，于第二年山本内阁组成不久便将这篇冗长的意见书提给了牧野伸显外相。《对华政策》的重点在于“解决满蒙问题”和“统一外交”。关于前者，阿部说，“所谓解决满蒙问题，往往意味着获得领土，帝国须以割取南满及与其毗连的内蒙东部，求得问题之解决”，但是，如此则(1)“不能最后获得中国之承认”；(2)“与保全中国领土之主张相抵触，与日英同盟、日俄协约、日法协约、日美协约等条文相矛盾”；(3)“若欲断然实行之，则牵累帝国甚大”，例如会促进中国的抗日运动，引起各国对日本的疑心，造成各国瓜分中国的开端等等；(4)“将给日本财政带来巨大困难，并对国运发展之全局造成不易克服之障碍”。

关于统一外交问题，阿部严厉地指名批评了军部。他说：“陆海军省自不待言，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署，亦均须遵循政府之方针，不仅决不能与之背道而驰，且应按照外交机关之要求，为其活动创造条件，此点至为重要。因此，主管长官亦应针对此点向中国

各地驻屯军司令官下达详尽之指示,以使将来无丝毫之误解,此固不待言;而以往参谋本部、军令部等机关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之军官亦应牢记上述意旨,实属当务之急。”阿部的意见书还指出,在满洲由于领事馆(外务省系统)、关东都督府、满铁会社和朝鲜总督府四个机关各自为政,因而造成了日本外交不统一,前后自相矛盾,应该尽快予以纠正,要求外交应由外务省来统一。阿部虽列举了四个机关,但当时满铁是在军部(关东都督府)操纵之下,所以实际上应该归结为军部同外务省、政府的对抗。<sup>①</sup>

阿部政务局长由于持有这种政见,被军部及其爪牙“支那浪人”看作是最坏仇敌。1913年9月5日,当他到新桥车站迎接归国的前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的返回途中,在私邸门前遭到黑龙会两名凶手刺杀,翌日身亡。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部及其爪牙法西斯恐怖的雏型。黑龙会等不但没有受到政府和资产阶级“舆论”的谴责,而且在阿部被杀后的9月7日,还召开了“国民大会”,掀起了侵略中国的热潮。

所谓“支援”中国革命派的黑龙会,还联合川岛浪速等宗社党派,组成了所谓“对华联合会”。他们“支援”革命派的司马昭之心,仅就这点已昭然若揭。试看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提给政府的《对华问题意见书》,他们的真心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在我帝国支援中国民众上有个诀窍。即促使革命党、宗社党以及其他不平不满的党派到处掀起暴动。一旦其国内陷于混乱状态,导致袁政府土崩瓦解”,日本军队则援助中国人中孚众望者,使中国统一起来。“而我欲使革命党及不平不满的党派掀起暴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不能把力量集中于中国)现在是不易多得的最好机会”。“而中国的共和政体,是将来谋求日中合作的一大障碍。因为共和政体和立宪君主政体,其伦理道德标准根

<sup>①</sup>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本不同，制度法律亦颇背道而驰，与日本领导中国、使中国取范于我、日中合作处理东亚问题格格不入”。“改中国的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实是改造中国的根本”。至于是让宣统皇帝复辟，还是另外拥立宗社党的皇族，或是推选革命党中德高望重之士充当君主，则要根据时宜而定。若说这帮人的“亚细亚主义”似乎还有什么亚洲一体思想，岂不荒谬透顶。

在三十一届议会(1913年12月到1914年3月)期间，连经常批判“军阀横暴”的立宪同志会<sup>①</sup>代表大石正巳也怒斥政府，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方针。无党派人士林毅陆在征得“宪政之神”尾崎行雄等人的同意后，提出了《关于满蒙政策的质询要点书》，要求保卫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除此之外，其他各派也纷纷提出了《关于对华外交的质问要点书》、《关于保全中国领土、实现机会均等的质问》等等。他们都大声疾呼，在俄国控制了外蒙古、英国插手西藏的现在，为了“保全中国领土”，要向俄国和英国提出抗议，实行“机会均等”主义，以加强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殊地位”。在这点上，军部、政府和政党，三者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军部才得以搞起无视政府的侵略活动。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统治阶层认为这是“天佑”，趁欧美列强无力侵略中国之机，企图大力侵略中国。8月17日，驻在“满洲”铁岭的日本军队，在身背实弹的行军演习途中，在郑家屯与中国巡逻队发生冲突，结果日军的一名准上和一名士兵负伤。关于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真相，我只看到日本方面的史料，所以不详。巡逻队说把日军误认为匪徒了；而日本方面则说所说“误认”纯属谎言，不可能有这种事，本来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排日气氛强烈，所以才故意挑起事端。即使看日本方面

<sup>①</sup> 即后来的宪政党。

的史料,也会使人怀疑是日本方面故意挑起的争端。<sup>①</sup>

关东都督福岛安正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于9月11日致电加藤高明外相,希望“在交涉谈判时,务必要让中国官民知道应该如何畏惧帝国的权威”,主张除了处罚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以外,要以“获得日本人在满洲的居住权、不动产所有权及矿山开采权等重要利权”为目标,使之成为“为帝国势力培植牢不可破之基础的良机”。<sup>②</sup>连不逊于军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加藤外相对此都似乎感到大吃一惊。他责难都督说,“本件本是一时的偶然事件”,福岛都督提出的这种“涉及全局问题”的要求,“根本不应予以考虑。”

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挤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攻占了青岛的德军要塞,并占领了胶济铁路。这条铁路按条约规定是德国和中国民间资本合资经营的,日军管理这条铁路全线,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当然中国要向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本军队和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

当时,中国有发生三次革命的动向,日本军部照例要搞一些“援助”南方的各种活动,其意义和前述一样,很明显,故在此从略。1914年10月,前述黑龙会的《对华问题意见书》炮制出来。如前所述,这份意见书认为当时正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提议“根本解决”的办法是缔结“日华国防协定”。协定的内容为,(1)在中国外战内乱之际,日军应对中国进行援助,维持中国领土的防卫秩序;(2)“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并将统治权交给日本,以确立国防之基础”,等等,共有十条。总之,是企图把中国的陆海军全部由日本来掌握,“委托日本整理中国财政”,让日本的教育顾问统治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的外交权置于日本监督之下。因为以袁世凯政权为缔约对象来缔结这个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

协约是不行的，所以如前所述，必须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建立新的“立宪君主制”傀儡政权。

当从民间向政府提出如此露骨而且实质上是吞并中国的意见时，在政府内部炮制出了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中既包括前述郑家屯事件发生后福岛都督提出的日本人在满蒙的居住权、不动产所有权、独占矿山开采权等要求，还包括黑龙会主张的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武器供应，实际上由日本掌握中国的警察权等要求。这个在外交技术上史无前例的“二十一条”的总括的要求，究竟是怎样炮制出来的不详，但可以肯定，它是加藤外相和政府都全盘接受了军部等各方面提出来的要求。后来军部又单独策划了第二个“满蒙独立”的阴谋。

从1915年年底以来，中国掀起了反对袁氏政权的新的武装斗争。日本政府1916年3月7日的阁议断定：把袁氏赶出政界以外最为得策，但由日本政府从正面对袁施加压力不合适，因即决定了帮助中国反袁派的方针。具体策略之一是日本“默认”“民间有志者”支持中国反袁派的活动，坦率地讲，是“鼓励”这种颠覆活动。尾崎行雄法相抓住这次阁议的决议中日本的对华政策要“尽量与各国协调”这句话，竭力主张应是“关于中国问题，为与各国协调，必须不受其束缚”。石井外相解释说，所谓“尽量”，已包含了尾崎所说的意思，说服了他。

政府的上述方针，意味着鼓励“支那浪人”和接受参部本部密令的现役、预备役军官利用宗社党进行活动。关东都督府指令各地警察要“酌情”处理日本人支持反袁派的活动，这实际上是纵容和放任。为此，参谋本部把土居市之进大佐和小矶国昭少佐派往“满洲”，令其在都督的全面协助下，准备以宗社党的名义举兵反袁，实现满蒙独立。然而，外务省根据驻华领事和公使的判断，认为不应利用宗社党那样毫无实力的组织，而应利用奉天军阀的实

力派张作霖,阻止土居等人的活动。军部则是,驻满洲的师团长本乡中将和独立守备队长藤井少将等人同意领事的意见;参谋本部的上原总长和福田第二部长主张利用宗社党,田中次长则主张利用张作霖,众说纷纭。5月27日,宗社党一派企图炸死张作霖,结果失败了。于是张作霖不得不怀疑日本的居心。巧好6月6日,袁世凯暴病而死,黎元洪继任,参谋本部便和政府商定,全面停止满蒙“独立”运动。

但是,土居等人仍然声称奉参谋本部的密令(真假不详),企图利用宗社党和蒙古的巴布扎布策划在蒙古举兵。独立守备队内部也不统一,有的军官违背藤井队长的意图秘密参加活动。8月14日,他们集结在满铁沿线的郭家店,以满铁附属地为根据地,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关东军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让他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应战。后来日本政府派来特使,说明参谋本部的方针也是停止举兵,9月2日,收回了关东都督府发给土居等人的部分武器,另一部分<sup>①</sup>送给了宗社党和巴布扎布,令其退回蒙古地区。<sup>②</sup>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是此后仅仅十二年的事情,而关东军和陆军中央的中坚军官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中也有小矶少将。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刚一停下,驻满洲日军又制造了第二次郑家屯事件。情况是,郑家屯镇内一个日本人到中国鱼店去买鱼,硬要少给钱。眼看要动手抢鱼,被中国第二十八师的士兵看见,一怒之下打了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就报告了当地巡查川濑某人。川濑巡查立即赶到中国兵营,声言逮捕“犯人”,便与卫兵发生口角,最后跑回日军守备队去班兵求援。于是松尾少尉带领二十名士兵急忙赶到中国兵营,在与卫兵争吵中,突然用军刀砍伤

<sup>①</sup> 一千二百支步枪,二十四万发子弹,四门野炮,五百六十发炮弹及其他武器。

<sup>②</sup>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

了对方的右臂。营内的中国兵立即出来与日本兵彼此开枪，川濑巡查和日本士兵八人被击毙。中国士兵死亡四人，负伤十四人。第二天，日军调动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大队步兵袭击了中国兵营，当时中国士兵根据上级命令已撤出兵营。

林权助公使9月6日致电石井外相，汇报了事件的经过，内称：整个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一个驻外军队竟然立即答应一个根本无权请求出兵的巡查的要求，“殊使本使不解”，并责问陆军当局是否允许驻满部队这么干。林权助公使还援引以前发生的兖州事件和汉口事件为例，慨叹军部这种行动致使日本陷于不利。

然而，在日中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过程中，日方压迫中国，不仅要求处罚肇事者，并按一贯手法，乘此良机提出了好多无理要求：在驻南满和东蒙古的中国军队内配置日本军官顾问；中国军官学校聘用日本教官；在日本认为必要的南满和东蒙古地方派驻日本警察；南满的中国警察官署聘用日本顾问等等。负责谈判的林公使明明知道日军不对，军部却以日本国内舆论激昂为由，迫令赶快解决，使他不胜愤慨。这些要求就是“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内容，是想借此机会实现“二十一条”谈判没能实现的要求。中国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对日本进行抵抗，中国民众的抗日怒火高涨起来。于是军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用警告第二十八师长等办法，年底双方达成了协议。当时日本还恋恋不舍地提出在中国警察和军队内配置日本顾问等三条“希望”，作为口头记录交给中国，并说对此无需回答。这也和“二十一条”谈判之际，迫于中华民族的抵抗和欧美的压力，眼看第五号所列各项要求不能实现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同出一辙。

就这样，驻外部队惹出事端，牵制军部中央，军部则迫使外务省追认既成事实，牵着政府鼻子走。这可以说是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以后从炸死张作霖到“九·一八事变”全部过程的“预演”。



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这是日本军部、政府、政党及其所有统治阶层的共同目标，即日本的最高国策。通过日本的寺内军阀官僚内阁与中国的段琪瑞政权于1918年5月缔结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军部在贯彻这一最高国策中的优越地位已经形成了制度。这两个军事协定同寺内内阁有名的西原借款，构成侵华一车的两轮。如果说西原借款是日本对中国的“胡萝卜”政策的话，那么军事协定则是“大棒子”政策。而且这两个军事协定与日本军部的武装干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侵占东部西伯利亚、从而把过去沙俄在北满和整个蒙古的势力范围据为己有等大规模的侵略计划是分不开的。

1917年11月，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取得胜利，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便急不可待地支持反革命势力，列强本身出来直接武装干涉苏联。同年年底，日本军部在与北满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迅速展开了支援反革命派的活动。1918年1月初，日本军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派遣军舰，企图协同英国舰队镇压当地的革命派。于是由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和次长田中义一带头，会同外相本野一郎及其后任后藤新平等人共同策划，制定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当时田中参谋次长等人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这不仅是出于出兵西伯利亚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把北满和蒙古置于日军控制之下，构成北从这一地区、南从日本本土夹攻整个中国的战略态势。<sup>①</sup>

出兵西伯利亚，要尽量在取得帝国主义列强谅解之下进行，这项外交谈判当然由外务省来承担，参谋本部只能在幕后督促外务省。但是，关于日本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中国领土权利的谈判，已从1918年年初由参谋本部背着政府、亲自直接指挥其驻外机关

<sup>①</sup> 出兵西伯利亚本身就含有这个目的。

及配置在中国政府内的日本军事顾问干了起来。向段琪瑞政权提供贷款——所谓“西原借款”的谈判主角西原龟三（寺内正毅的亲信）也进行了幕后活动。对于日本企图出兵西伯利亚，美国轻易不肯赞同，山县有朋等人也唯恐在没有取得美英谅解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一旦战争长期化或扩大化，日本财政将陷于崩溃，因而对出兵问题举棋不定。而参谋本部却认为，即使日本单干也要出兵，同时也急于确保对中国领土的军事使用权。军部强行牵制政府，迫使它1918年3月同意了军部的意见，5月17日，日中两国全权代表便签订了两项军事协定。这次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只有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协定的正式名称也定为“军事”协定，把内容基本相同的协定分别缔结为陆军协定和海军协定，因此文官代表没有参加，另由日本外务省和中国外交部之间交换了军事协定的文件，日本国内则只公布了这份换文，协定本身付诸秘密。甚至对于向枢密院“披露”协定内容一事，田中都表示反对，竟写信给山县有朋说，“完全属于大权之军事协定”，不同意这样处理<sup>①</sup>。协定的内容是，（1）日中两国陆军（海军）“为了预防远东全局和平之危险，及履行两国参加欧洲战争之义务起见，采取协同防敌的行动”；（2）两国军队在北满采取协同行动；（3）日本为此得在中国境内同中国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必要的基地；（4）相互交换必要的联络员。<sup>②</sup>这些内容在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处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下的当代日本人，会立即明白的。这两个军事协定缔结两个多月以后，日本就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了。<sup>③</sup>

---

① 《田中义一传记》，上。

② 参阅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1981年1月第1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253—259页。——译者

③ 参阅本书第2册《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

### 第三节 军部的后退和准备反击

1918年5月，军部牵着政府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强加于中国，并在同年8月1日迫使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这是军部在大正年代的政治上最专横跋扈的时期。后来，军部的政治势力表面上暂时有所收敛。

但从外部却看不出来，军部后退的最初一个重要事实，可从它在全盛时期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作法上看得出来。在此之前，1917年6月，“宫内”设立了一个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作为直属天皇的外交政策审议机关。调查委员会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三位枢密顾问官即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牧野伸显、以及政友会总裁原敬、国民党总理犬养毅任委员，寺内首相任总裁。关于设立调查委员会的发起人及其动机、目的的各种说法，这里不一一介绍。总之，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是出于内政的需要，为了巩固和加强一味依靠军阀和官僚而没有执政党的寺内内阁，用外交活动应该举国一致的“大义名分”，把政友、国民、宪政三个党派的首脑拉笼到政府方面来；同时，正如外交调查委员会的“设立理由”第一条所表明，估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结束，为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处于有利地位，要开展外交活动，并出于“回顾以往对邻邦中国之政策和行动，须谋求匡正厘改之策，是当务之急”的迫切心情，把目标放在尽量真正地作到举国一致的外交上（但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反对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拒绝担任委员）。

可以设想，世界大战一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显然不但不能再象大战中那样趁火打劫大发横财，甚至还会遭到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攻势。设立外交调查会的理由中所列“匡正厘改”过去的对华政策和行动，究竟如何改革以及改革什么，根本没有具体说明的

文件。但是可以肯定,当时的决策人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要消除军部与政府不一致的局面,推行统一的对华政策。

在统治阶层内部,可能谁都会想到,假如大战结束,欧美列强重新致力于对华政策的话,那么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旁若无人地推行下去,因此必须以明确的统一方针,采取慎重的行动。这种想法,对于妨碍外交一致的军部来说,是一种牵制力量。

当时的寺内首相是长州军阀巨头,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是寺内直系的长州阀,山县有朋是军队的最高权威,三者构成了山县—寺内—田中系统,形成长州军阀权势的最高峰。通过这种人事关系,内阁和参谋本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行动,长州阀的独裁与军部的独裁形成一个整体。向段琪瑞政权提供巨额贷款也好,缔结日华军事协定也好,都把外务省放在不闻不问的地位,甚至演成由首相、参谋本部和仅仅是首相私人亲信的西原龟三来策划的局面。当时一般说,军部的一意孤行在这届内阁执政时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军部,而是长州陆军军阀最后一次的“昙花一现”。这届内阁不得不设立外交调查委员会牵制军部的对华政策,表明面对国内议会和政党势力的扩大,大战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列强之间的角逐以及中华民族抗日热潮的高涨等形势的变化,军部和军阀也难以抗衡了。

我对外交调查委员会的这种看法,和今井清一的《大正时期军部的政治地位》<sup>①</sup>一文中的评价正好相反。今井的论文,整个说来我是同意的,并从中受到很多教益,只是对外交调查会的看法,我的意见完全相反。今井说:“尽管这个会议不同于后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或御前会议只任幕僚左右而流于形式,尽管会上原敬和牧野伸显等人反对武断外交并展开了活跃的论战,但是仍然不

<sup>①</sup> 《思想》,1957年9月,12月号。

可否认,总的看来军部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增强了其在外交方面的发言权。”然而,即使在过去,军部在内阁里对于外交事务的发言权已经够充分了,再者,在朝鲜和满洲的情况,前面已经详细谈过,即使陆海军大臣参加了外交调查委员会,军部的发言权也不会特别增强。相反,正如今井所说的,牧野伸显、原敬以至伊东已代治在会上一番压制军部的发言,使军部觉得难堪,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这一点,小林龙夫编的《翠雨庄日记——伊东家文书》中收录的伊东已代治关于外交调查会的议事日志,写得很明确。下面试举一些具体例子。

第一,关于出兵西伯利亚的问题。调查会上就出兵目的以及可否出兵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关于派出的兵力和出兵地点,文官的枢密院顾问以及身无官职的政党总裁也大发议论,结果使得军部不得不在表面上基本服从调查会上的在极其有限范围内出兵的决定。实际上军部和后藤外相(寺内的心腹)干脆无视调查会决定的精神,向东西伯利亚一带派出了七万五千名士兵的大军,事实上军部还是自行其事了。但尽管在表面上也好,军部毕竟还是服从了军部以外机关的决定。这一事实试与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的情形比较一下。那时在阁议上,参谋总长甚至压制山县首相,不许内阁插嘴出兵兵力问题,相形之下,不能不说这是军部重大的后退。

在最初出兵的时候,军部哪怕是表面上也好,不得不服从外交调查会的决定,这就成了军部后来受到外交调查会牵制的条件。在1918年12月22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在田中陆相缺席的情况下,加藤海相代替陆相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兵约三万(11月底已撤兵一万三千八百名),留下约三万兵力。前首相寺内正毅也以委员身分出席了会议,并未表示异议。接着,12月25日,田中陆相事先未同参谋本部协商便擅自将撤兵决定上奏天皇,得到批准后才

通知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地位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sup>①</sup>

1919年8月，日本支持的俄国鄂木斯克反革命政权受到苏联红军攻击难以坚持下去。面对这种形势，田中陆相可能接受了参谋本部的要求，认为“维持”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反革命“秩序”，“防止过激思想东渐”，必须增强兵力，要求外交调查会同意增加兵力。若是以前的话，只需军队内部进行协商便立即决定出兵了。而在这次外交调查会上，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和犬养毅等人认为，在当初的出兵目的中并没有规定日本要单独守卫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这也不是日本国力所能胜任的，因此一致表示反对，不同意增加兵力，最后会议决定“鉴于当前形势，无须变更过去出兵方针”，“将来形势发展，处理手段随时酌定”。<sup>②</sup>从这次会议决议是田中在会议席上起草的看来，是否田中内心也反对增兵，为了压制参谋本部的增兵要求，才借助外交调查会决议的力量呢？殊属可疑。面对这种事态，参谋本部不可能忍受下去，于是上原总长和田中陆相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起来。田中对原敬首相说，我用“西伯利亚问题并非根据战争，而根据政府政策来决定”的说法压服了参谋本部。<sup>③</sup>无论是因“战争”而出兵也好，还是根据“政策”规定而出兵也好，在使用军队上并无两样。如果以前的话，军部在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绝对不准军部以外的机关于军队的使用、增兵和撤军等问题。这从为了承认文官韩国统监对朝鲜驻屯军的使用权问题而一再争吵，便可了解。而现在，参谋本部竟被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说法压制住了。

这时，政府的实力派甚至唱出撤消参谋本部的论调。据《原敬日记》大正八年（1919年）10月15日条载：“高桥藏相作为个人意

<sup>①</sup> 《原敬日记》、《田中义一传记》。

<sup>②</sup> 前引《翠雨庄日记》。

<sup>③</sup> 《原敬日记》，大正九年八月十日。

见，印制了旨在消除军国主义误解的意见书，秘密交给我看，并由我酌量，可散发给别人。我读了一遍，恰值田中陆相在座，便秘密交给他看了。结果决定也给山县看看。高桥建议将参谋本部和文部省一并撤消，将农商务省分为农林和商工两省。农商务省问题姑且不论，撤消参谋本部和文部省，实际上办不到，徒只制造反对派，对国家亦毫无利益。再者，如欲撤消，必须统一内阁的意见，排除万难，坚决执行。总之，既属个人意见，暂不发表为宜。高桥也听从了我的话。”话只是这些，不过，撤消参谋本部问题已提出来了，仅就这点也可看出时代的空气与过去不同了。

在对华外交方面，军部的独断专行作风受到了相当抑制。在1918年12月2日的外交调查会上，牧野伸显认为，在大战后<sup>①</sup>困难的国际关系中，同英美列强保持协调至为重要，因此他说：“例如日华亲善。表面上声言亲善，背地里实际上是‘霞关外交’<sup>②</sup>、‘私人外交’和‘军人外交’三足鼎立，外国大使、公使等均在啧啧批评。今后必须尽量排除威压、权谋的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在8日的会议上，牧野再次重申反对表里不一、权谋术数的外交，强调要消除军部与外务省在外交上的“扞格”局面。犬养毅针对牧野的发言逼问道，如按牧野说来，日本是否今后连一寸土地也不应谋求，只在经济上求得发展？伊东巳代治则责问牧野，你说日本是“无信之国”，请举出例子来。田中陆相也叫嚷要牧野举出陆军同外务省扞格的例子来。牧野对此未作任何答复。牧野说的话的确属实，不要说犬养和伊东，就连田中也清楚得很。如果说，就连在如此绝密的外交调查会上，还居然隐讳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把重点放在这种事情上来对会议进行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调查会是软弱无力的，但从牧野能做出那样的发言，而在陆相等人

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牧野伸显当时是媾和会议筹备委员。

② 霞关：日本外务省所在地；霞关外交：指日本外交部的外交活动。——译者

为了遮羞而愤然作态看来，可以说这也是军部后退的又一表现。

可能是由于牧野的发言吧，第二年，即1919年1月2日的《原敬日记》载，由中国归国的福岛道正访问原敬时说，驻在中国的外国人怀疑日本的“军人是否依然跋扈？”因此应为消除外国人的这种疑虑而努力。原敬回答说：“陆、外两省已发出训令，指示外交由北京（指日本公使馆）统一进行，军人不得擅自行事。”在1919年6月26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内田外相汇报上海发生了对天皇照片不敬的事件。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内田主张：“考虑当前周围的情况，扩大此事件，将酿成时局的纠纷，尤须审慎”，对此看法，伊东和田中陆相也都表示赞同。假如此类事件发生在几年前的话，军部和在中国的浪人定会大造舆论，而这次却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1919年7月，在长春附近，一个满铁职员被中国军队用枪打伤了，于是驻宽城子的日军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与汉口事件、郑家屯事件不同，似乎不是日本方面挑起而是中国方面挑起的。外相训令关东军司令官说：“因诸如此类的事端，无论是非曲直在哪方面，中国方面都将用来中伤日军或借机排日，”故贵职应立即调查原因提出报告。日本方面决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伊东已代治在外交调查会上听到有关这一事件的汇报后也认为：“此时，尤须警惕审慎，不要给欧美列强以日本帝国恃强凌弱之感，如欲极力坚持日方要求而使问题僵持下去，外交上并非得策。”<sup>①</sup>

1919年11月，在福州发生了台湾籍人与中国大陆学生的冲突事件，经日中两国官方共同调查，结果认为咎在台湾籍人一方。1920年11月，以日方道歉和支付抚恤金而了事。若是在过去，会颠倒是非，把责任归诸中国方面。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反对日

<sup>①</sup> 《翠雨庄日记》。



本帝国主义的情绪高涨起来，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强行压服下去了。<sup>①</sup>

这是因为，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角逐，和战前的性质不同，愈演愈烈；第二，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发展到与过去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性质不同的高级阶段，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势不可挡。在朝鲜，通过同年3月1日掀起的以“独立万岁”为口号的“三一”独立运动，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日本国内，自从上一年夏季遍及全国的米骚动以来，民众的政治势力取得迅速发展，人民对于那些镇压米骚动、有的地方甚至用刺刀刺杀人民的军队，越发怀有反感；出兵西伯利亚是不顾国民反对、没有取得国民支持而强行蛮干的，并且没有成功，这也造成了军队威信降低。这种状况迫使日本统治阶层不得不收敛一下新的对华侵略，军部中央及其驻外军人也不得不在政治上退后一步。

军部在政治上的后退，从改革殖民地总督的武官专任制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但这里也不无退一步进两步的性质。

改革殖民地统治制度的先导是1919年4月废除关东都督府。据《田中义一传记》载，1919年2月1日或2日，田中陆相访问寺内元帅，当偶尔谈到日本的殖民地时，元帅说即使任用文官担任关东都督也无异议。田中为武官绝对论者寺内的突变而高兴，便急不可待地制定了都督官制改革方案，5日提交阁议，作出决定，10日又经枢密院副议长清浦奎吾的口头同意，4月12日用敕令公布了关东厅官制及有关法令。据此废除了关东都督府，规定关东州附属地的行政、司法均由关东厅管辖，关东厅长官文武官员均可担任，由天皇亲自任命，关东厅为受外务省指挥和监督的纯粹的政务

<sup>①</sup> 《翠雨庄日记》。

机关,旧都督府制的军事部门完全从政务分离出来,成为直属天皇的关东驻军。

从时间上看来,在田中访问寺内时,可能陆军内部业已拟好了都督府制改革方案,田中就是为了就这个问题试探寺内的意向才去访问的。我手头没有说明陆军当局为什么需要进行这一改革的史料。当时还没爆发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朝鲜的“三一”运动,所以不能把改革都督府制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朝两国抗日民族斗争的冲击。若大胆推测的话或许是这样:即使军部想要掌握关东都督府推行一元化的侵略“满洲”的政策和策略,由于国内发生了米骚动,国外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等国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统一外交的要求日益强烈起来。在外交和民政方面受政府监督的都督府,不能使军部随心所欲地推行其“满洲”政策。因此,都督府只能是军部的累赘,所以才把政权与军权分开,军部只掌握军权,让关东军司令官直属于军部中央,不受政府约束,便可自由行动了。即使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垄断着军事力量,结果还能压制关东厅,所以军、政分开丝毫无损于军部。不过,军部却因此失去了通过关东都督来监督满铁的权利,满铁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摆在首位的经营方针,在制度上得到保障,这对军部并不可取,而对垄断资本有利。都督府早就想把都督府迁到统治南满的军事中心——奉天(沈阳),但奉天不是租借地,不能把租借地关东州的统治机关设在奉天,于是就想把军、政机关分开,把驻满军事机关中心迁往奉天。

让文官来担任殖民地总督,这是原敬自从创办台湾总督府担任台湾事务局委员以来的一贯主张。现在他当了首相,似乎正在等待实现他多年来宿愿的时机。当时,1918年11月23日,田中陆相对原敬首相说,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大将有意辞职,我认为让他辞职也好;又说,山县也说愿意辞就让他辞吧,以此试探原敬的

心意。原敬答道：“长谷川事已有耳闻。当时我想，在目前情况下，朝鲜总督不能永远限于武官。应把军、政分开，指挥国防由陆军直辖，总督改成由武官、文官担任均可为好。现任山县伊三郎（山县有朋之养子）担任政务总监已达数年，让他担任总督亦属当然。我认为这是修改官制的时机问题，请详加考虑这点，并仔细讨论”<sup>①</sup>。这里玩的伎俩显然是想通过任用山县养子为总督来刺激山县，以期及早实现文官总督的目的。

于是原敬首相和田中陆相暗中进行协商，认为修改总督任用资格的问题，如不采取陆军大臣提议的形式，而由其他方面提议的话，对于统辖军队内部不方便；这次只限于朝鲜总督，不涉及其他。田中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官制改革方案。<sup>②</sup>

其间，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美国传教士访问原敬时谈到“对朝鲜军阀政治的详细考察”（5月12日）；朝鲜的卖国贼旧贵族宋秉峻也向原敬谈到总督府歧视朝鲜人的情况和“宪兵苛政的详细情况”，并“举出大小事例，要求撤消总督政治”。宋秉峻还谈出山县政务总监要尽快修改总督武官制的口信，他极力主张“首先必须把总督改为文官制，若不改变这个原则，任何改革都无效果”。

原敬和田中等人于是紧抓朝鲜总督府官制的改革。起首，山县有朋反对文官担任总督的方案，同时也不同意让养子山县伊三郎担任总督，参谋本部也坚决反对。于是，田中决定在制度上规定文武官员均可，但实际上任用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新制总督，以此来缓和陆军内部的反对意见，请求原敬予以谅解（5月23日）。原敬没有立即答复，四天以后，他察觉到陆军内部和山县、寺内等人反对任用文官的意见，觉得也只好按照田中的方案，便同意了。以此

① 《原敬日记》。

②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一月十五日。

说服山县后，田中陆相在6月13日的阁议上提出了修改朝鲜、台湾总督府官制的方案，得到全体一致赞同。<sup>①</sup>会上原敬叙述了建立现行制度的沿革，指出现行制度是模仿欧美各国殖民地的产物，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应采取和国内相同的方针，进行相当的改革”。“内地延长主义”和“同化主义”是原敬的一贯主张，其意义与本书第一章所述(63至64页)相同。

8月19日，公布了改革朝鲜和台湾总督府官制的敕令，和废除关东都督府制的前例一样，规定政务、军务分开，总督只负责政务，其任用资格文武官员均可；军事部门规定为朝鲜(台湾)驻屯军司令部。同时还废除了朝鲜宪兵兼任警察工作的制度，改为普通的警察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朝鲜或台湾人民的压迫，掠夺较过去有任何缓和。根据田中的提议，海军大将斋藤实被任命为新制度下的朝鲜总督。斋藤实当时已编入预备役，又特意恢复为现役，才当上了总督。看来军部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朝鲜的政权。继斋藤实之后的朝鲜总督也净是陆海军大将。唯有台湾总督选任了文官田健治郎，直到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由文官连任。因此，军部对朝鲜的统治力量，实际上和过去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制度上把政务和军事分开了。政务不归军部管辖，说明军部后退了一步，也意味着专制主义的殖民地统治机构向近代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的演变。

军部在国外的政治势力的削弱，连同政府和外交调查委员会对出兵西伯利亚的兵员增减、配备等发言权的增强，致使政党和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要求裁减军备和改革军部的呼声。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平主义和裁军的呼声形成了

---

<sup>①</sup> 据《田中义一传记》载，经退役将军三浦观树劝说，最初坚决反对的山县有朋，也以让山县伊三郎担任总督和修改朝鲜及台湾总督府官制为条件表示了同意。这和《原敬日记》中记载的经过不符。《田中义一传记》一书还载有海军主张台湾总督武官制，这也违反事实。

世界潮流。根据“凡尔赛条约”创立了以维护和平为招牌（仅仅是招牌而已）的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盟约》第八条中规定：联盟会员国承认，必须裁减本国军备；联盟理事会按照各国情况，制定裁减军备方案；接受方案的国家必须实行。<sup>①</sup>1919年2月，日本召开外交调查会，当讨论《国际联盟盟约》时，伊东已代治等人认为，接受《盟约》第八条则违反日本宪法关于天皇决定常备兵额的规定，对完全同意第八条的牧野全权代表，大肆谴责，但又生怕否认第八条，日本就加人不了联盟，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结果还是同意了《盟约》规定，决定加入联盟。

然而，当时不要说军部，就连政府骨子里根本不想裁军。不但如此，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财政宽裕了，有了依仗，于是原敬内阁便从1919年度预算开始建设“八八舰队”<sup>②</sup>、改善陆军武器装备等，大肆扩充军备。社会舆论不加谴责，致使日本的裁军舆论落后于国际舆论。到第二年，即1920年11月，国际联盟召开第一次大会以后，日本国内的裁军呼声才逐渐高涨起来。特别是1920年，由于战时景气的反作用，日本陷入严重的危机，后来转入慢性萧条，一直未能恢复正常，从1919年下半年起，贸易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于扩军、出兵西伯利亚以及原敬内阁推行的“积极政策”，财政支出猛增，财政困难和第一次大战以前一样，与年俱增，越来越严重，于是扩军与财政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就使裁军舆论有了有力根据。

另一方面，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估计将来的战争可能是可怕的消耗战，要取得最后胜利，应平时缩减常备军，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加强军备的产业基础，由国家来完全把它掌握起来，并提

---

① 参阅《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269页。  
——译者

② 八八舰队·即八艘主力舰和八艘巡洋舰。——译者

高全体人民的体力、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战时则动员国家的经济力、人力、国民精神力。这种“总体战”的战略、策略思想成了各国的执政者和军人的主导思想。这本质上并不是裁军，只是在缩减常备军这点具有裁军的表象。这种“总体战”思想也传到了日本。在1921年1月的国民党大会上，犬养毅提倡“产业立国主义”或者“经济军备”。他主张：整理行政、财政；建设产业主义国家；消除外国说日本是军国主义的误解；为了准备综合武力和经济力的总体战，要缩短士兵服役年限，削减师团。在政党政治家中，犬养毅是从总体战的观点出发主张推行缩小常备军政策的先锋。

同年2月，在第四十四届议会上，尾崎行雄以外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在国际上有陷于孤立的危险以及财政困难为理由，提出了限制军备决议案，虽然得到了《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舆论界的支持，但在议会上以三十八票对二百八十五票的悬殊之差被否决了。政府和执政党的政友会自不待言，就连在野党的宪政会也是一样，供给他们资金的三井、三菱等特权垄断资本由于扩充军备才得以大发其财，所以裁军等等根本谈不到。

然而，虽然同是资本家，纺织业资本家钟渊纺纱厂厂长武藤山治却创立“大日本实业公会联合会”，以轻工业资本家为中心掀起了限制军备运动。同年6月，东京商工会议所会长糖业资本家藤山雷太访问原敬首相说，大坂商工会议所在会议所召开的全国联合会上提出了裁军的建议，“看来也太露骨，这样可不行，因此建议修正后再提出。”“藤山并把建议案交给了原敬”。对此，原敬警告说：“近年来，会议所的言论全是政治性的，而且是书生之见，老实说，无论提出什么建议，谁也不重视，只是束之高阁。可否考虑一些更加稳健扎实的实际问题如何？”<sup>①</sup>。当时商工会议所的主力是中小资本家，他们经不起扩军带来的经济负担，因而要求裁军，但

<sup>①</sup> 《原敬日记》，大正十年六月十五日。

控制会议所的确是藤山那样的垄断资本家，他们和政府串通一气。

不愿倾听日本人民呼声的原敬内阁以及其他历届政府，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金融上要依靠英美，因此他们不同于无知的军人，对于在国际上陷于孤立非常敏感和担心。1921年秋季，美国呼吁召开关于裁减海军军备的美、英、法、意、日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日本政府唯恐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虽然十分不愿意却参加了会议。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民间的裁军呼声更加高涨起来，1921年9月17日，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政治家和吉野作造等学者团体一起组成了“裁减军备同志会”，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舆论。与此相反，同年10月，三井公司的团琢磨、涩泽荣一、藤山雷太等垄断资本家巨头，经同原敬首相进行了仔细磋商之后，组成了以团琢磨为团长的“访问英美实业团”，为了向美国垄断资本家阐明日本的立场，把华盛顿会议引向有利于日本方向，同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等人同乘一船前往美国。<sup>①</sup>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在此一周以前，原敬在东京车站遭到暗杀。政友会闹得人仰马翻，结果高桥是清当上了总裁和内阁首相。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国际压力，日本的裁军呼声这才变成了政党的议论，自从1921年12月召开第四十五届议会以来，裁军和改革军制的主张在议会中也强硬起来。因为海军的裁军问题在华盛顿会议的国际压力下是不容分说的，所以裁军的主张便集中在裁减陆军上了。1922年1月，在面临第四十五届议会的宪政会大会上，总裁加藤高明提出的通过缩短士兵服役年限来缩减陆军的主张，就是它的前奏。

这个时期，曾直属在乡军人会的青年团又变成了独立的团体。即1920年1月，文部和内务两省发布训令，确定青年团是青年的

<sup>①</sup> 《原敬日记》，大正十年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十月十五日。

自主、亲睦、修养、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团员的年龄仍按原规定不得超过二十五岁，团长须经团员选举产生。训令虽称：“考虑本团体之宗旨，以自主自力之精神，大力发展其能力，颇为紧要”，但改组后的青年团也绝不是自主的、民主的青年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把青年团从军部的手中夺了回来。

结合裁军的主张，改革军制的呼声也高涨起来。这一主张的中心是废除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在1919年3月的第四十一届议会上，国民党的植原悦二郎等人向政府提出《质问书》，指出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妨碍宪政的发展，表示反对武官专任制，这是在议会上打出改革军部的第一炮。于是对陆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的批判席卷了整个舆论界。大正政变前后，军部凭陆海军大臣武官专任制这个武器露骨地策划倒阁或阻挠建立新内阁，所以政党和舆论界对它的攻击也能够动员广大群众走出街头进行斗争。但到大正后期，由于军部为了避免受到“干预政治”的谴责，行动谨慎起来，加上米骚动以后，政党已经害怕动员民众，因而政党和舆论界改革军部的舆论只停留在宪政理论上的泛泛批判，实际上没有任何魄力。而且若是理论的批判，如果不触及宪法第十一和十二条的天皇大权问题，批判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可是，当时谁都不敢碰上一下。当政府内部高桥藏相等人认真考虑撤消参谋本部的时候，政党和舆论界中竟根本没有人把参谋本部当作问题，这也说明他们批判军部的不彻底性。

原敬首相非常善于抓住舆论动向并加以利用。原敬说：“维新以来，赖先辈的努力，万事都是政府走在前头，进行改良。所以我也要遵循这个宗旨。迫于人民督促才采取措施的作法，为国家实堪忧虑”<sup>①</sup>，军部大臣任用资格的问题，原敬也抢在“人民”的前头。即1921年10月，在海相加藤友三郎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华盛

<sup>①</sup>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七月十日。



顿会议的外出期间，原敬首相担任了“临时署理海军大臣事务”。陆军当局认为这是破坏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的第一步，坚决表示反对。不过，为了始终贯彻反对，例如陆相辞职，把内阁搞垮的那种强硬干法，过去还无不可，当时业已行不通了，所以只好说这次对海军的处理办法不能作为适于陆军的先例而默认了。

在比华盛顿会议晚一个多月召开的第四十五届议会（1921年12月到1922年3月）上，宪政会的野村嘉六等人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修改任命陆海军大臣官制的质问书》；国民党的植原等人向议会提出了《关于任用陆海军大臣官制的建议案》。两者都主张废除武官专任制，而植原等人的《建议案》在许多反对武官专任制论中最有条理也最有说服力，它把陆海军大臣应有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建议案》说，第一，根据法律理论，指出武官制不合理；第二，用政治史实论证了武官制对宪政的危害性；第三，在裁军势在必行的今日，武官大臣不可能坚决实行裁军，从现实的政治形势说明裁军的必要性；第四，为了准备将来的国家总体战的军政，比起军事知识来，更需要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广博而综合性的远见卓识。

在第四十五届议会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大冈育造等人提出了《整理并裁减陆军的建议案》；国民党的犬养毅等人提出了《关于裁减陆军军备的决议案》。后经两个建议的提案者协商后，归纳为《关于整理并裁减陆军的建议案》。其主要内容是，把步兵的服役期限由两年缩短为一年四个月、精简机构、削减经费四千万日元等。在审议该建议案的委员会上，山梨半造陆相声明：目前陆军当局也正在努力整理和裁减军备。

这届议会顺利地通过了裁军建议和关于陆海军大臣任用资格的建议。从此以后，一般认为裁军和改革军部两者是不可分的。例如，大冈育造在前述裁减陆军建议中也指出，现代战争不是军人

的战场，而是全体人民的战场，裁军后浮余下来的费用要用作文化事业和军事教育；还说“然而，在宪政之下还有什么帷幄上奏，实在不可思议”，进而主张废除帷幄上奏。大冈说，由于有了帷幄上奏，军部就可以任意制造将官，结果费用也增多。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必须废除帷幄上奏这种东西。

大冈的论证比较粗糙。吉野作造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论所谓帷幄上奏》的文章，连载一周（2月13日至19日），有理、有据地详细论述了废除帷幄上奏的观点，在唤起社会舆论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军部针锋相对地以“陆军当局谈”的形式在各个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帷幄上奏辩》的文章，进行强辩。文章说：当前社会上所以谴责帷幄上奏，是因为不了解帷幄上奏的法律根据和运用的实际情况，“社会上往往认为参谋本部或军令部是军部最终最高决策机关，在这里决定军备，对此，内阁也好、议会也好，只能唯命是从。这不能不说是脱离实际的议论”，文中举出了可以进行帷幄上奏的“军令”项目。但文章没有任何说服力。<sup>①</sup>

在第四十五届议会上，尾崎行雄在阐述裁减陆军的观点时指出，日本所以孤立于世界文明各国，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陆军兵员臃肿，到处违法乱纪”，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裁军，“陆军当局军阀者流无论怎样专横跋扈，若没有二十一个师团，则蛮横不法的区域也会减少”。当时社会上关于裁军的主张，一般都归结到经济、财政与军备的调和论上，而尾崎却揭示出了“陆军兵员臃肿”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确是卓见。要让这些议论收到效果，必须反对军备背后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尾崎却是一个不亚于军部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一点前已述过。

正如山梨在议会上说过的，在华盛顿会议的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内阁时期，陆军削减了六万多名官兵约合五个

<sup>①</sup> 《论所谓帷幄上奏》，收在《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三卷。

师团的兵力、马匹,但却增建了机关枪队、野战重炮队和航空队,整备了无线电通讯器材。海军则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裁减了主力舰,但却增加了辅助舰艇。因此,在预算中陆海军总共只削减了七千万日元。而且这些资金却用来增加了养老金和遗族抚恤金。宪政会认为这还不够,1923年2月,又向第四十六届议会提出了裁减陆军的建议,但由于政友会反对而被否决了。

但是这届议会却通过了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废除大臣武官制的建议。植原悦二郎在阐述这个建议案的发言中指出,在“去年的议会”<sup>①</sup>上,现总理大臣即当时的加藤海军大臣曾经声明“海军省认为文武官员哪方担任海军大臣均无妨碍”;在本届议会的贵族院预算委员会上,加藤首相还说过陆海军大臣也可不由武官专任。情况既然如此,如果政党下定决心团结起来推动社会舆论,必要时把民众动员起来,那么就有可能打垮武官专任制。不过,哪个政党也没有这样的决心。过去原敬首相在鼓励田中陆相果断改革参谋本部时曾经说过:“陆军的改革,只有陆军内部有了改革之士方能成功,外力无济于事。但利用社会攻击军阀的呼声,靠它的势力,亦非不可凭外力进行改革。不过,这样做陆军固然可以改革了,但将来的陆军恐怕变得无力了,所以不能采用这种手段。”<sup>②</sup>怀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止原敬一人,政友会自不待言,宪政会和国民党的干部可能都有这种想法。第四十六届议会是最后一次,后来议会上再也没有出现废除大臣武官专任制的主张。

当时正是军部的政治势力处于最低落的时期。1922年7月公布陆军裁减方案时,教育总监部的宇垣一成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明治以来一再增建的军备走向缩减,可悲!”他慨叹军人遭受社会的诅咒,诅咒不久变成了轻蔑,裁减军备论很快升级,走向军备无

① 指第四十五届议会。

② 《原敬日记》,1920年8月10日。

用论。军备从扩充转向裁减,这是军部后退的集中表现。

在公布裁军方案前后,日本开始从西伯利亚全面撤兵,<sup>①</sup>为了扼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8年8月开始出兵西伯利亚,在整整四年间,兵力最多曾达七万八千名。他们纵横奔驰于西伯利亚的辽阔原野,结果彻底失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首次尝到的军事上的惨败。最初出兵正赶上发生米骚动,所以人民对于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就非常冷淡。与日本共同进行武装干涉的美、英、法三国已于1920年1月撤兵了,而日本仍以维持西伯利亚治安等根本不成理由的理由不肯撤兵。从那时起,人民反对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军部无视人民呼声,一味继续战争。苏联人民的武装部队和红军的反击攻势越来越强,日军到处遭到失败,最后终于不得不偷偷逃出西伯利亚。陆军的威信由此扫地。本来,人民对军阀在国内政治上的专横的诅咒,并没有直接联系到对军队和军人本身的轻蔑,但由于军部强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落得军队和军人本身都受到了唾弃。

然而,军部的后退只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本来,军部之所以形成,是以军队乃天皇的军队而不是人民的军队为基础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军部作为它的先头部队随之而形成。使军部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是,军令机关完全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帷幄上奏权和军令第一号等法制;以及议会根本不得干预决定国防方针及国防所需兵力问题,实际上政府也只好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的惯例。所有这一切,在军部后退期间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军部大臣武官制方面受了一点轻伤(即由首相署理海军大臣事务)。殖民地总督虽然不是专由武官担任,但军部仍然垄断着统治殖民地的军事大权,实际上殖民地驻屯军司令官比文官总督高高在上。

<sup>①</sup> 1922年6月24日日本发表撤兵声明。

军部所以后退,不仅是由于日本国内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且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过于蛮横,战后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击;当时还正面临方兴未艾的中朝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卷土重来镇压中朝民族斗争并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角逐之时,也就是军部在日本的政治势力中企图东山再起之时。即使军部在后退时期,也丝毫没有停止反击的准备。有时伪装后退,实则前进。

在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震灾<sup>①</sup>时,军队不仅显示出“维持治安”的实力,而且田中义一陆相还把军用物资发给在乡军人会令其救济灾民,收得成效。这对于温暖人民对军部、军队冷淡到极点的心情起到很大作用。从此军部的政治势力开始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这是因为,加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以补偿关东大震灾中日本遭受的严重损失,已经成为日本军部、官僚、政党、资本家、地主阶级等整个统治势力的一致要求,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军部创造了活动的条件和日益成熟的时机。

1922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sup>②</sup>,在这期间,过去一直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加以扶植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警惕吴佩孚背后有英美在支持,便声明中立,并企图接近吴佩孚。可是,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却支持张作霖,这就出现了“双重外交”的情况。因此,7月27日召开的阁议对军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明确的批判,控制了军部的活动。阁议指出,“隶属于参谋本部的帝国现役军人,应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宪之聘,到处处于军事顾问等地位……,这些顾问同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中国各地的特务机关、武官、研究人员等保持联系,与日本国内的参谋本部及陆军省遥相呼应

<sup>①</sup> 关东大震灾:1923年9月1日发生于整个关东地区和静冈、山梨二县局部地区的大地震,计烧毁住房五十七万余户,受灾四百三十余万人,死亡九万余人。——译者

<sup>②</sup> 直奉战争,直隶军阀吴佩孚与奉天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应”，军部中央经常根据驻外军人的报告，背着政府自行其事，“暴露出极端的双重外交”，“使帝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经常陷于不利地位，始终不得不站在辩解的立场”，这种情况今后决不允许。

1922年时，政府还有上述这种力量。到1924年，中国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共同密谋支持奉系军阀，唆使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武装政变，迫使吴佩孚逃离天津。当时日本正是加藤高明任首相的护宪三派<sup>①</sup>联合内阁，外相是币原喜重郎，陆相是上届内阁留任的宇垣一成。陆军唆使冯玉祥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驻中国的领事和公使等人似乎有所觉察，但因他们同吴佩孚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对抗关系，也希望张作霖取胜，所以对于军部的阴谋不但未加干涉，甚至也没向外务省作任何汇报。详细情节请参阅栗原健编的《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由于冯玉祥的武装政变，张作霖轻易取胜，币原外相等人为此皆大欢喜。假如日本公开援助张作霖，很可能因干涉中国内政而招致中国人民和列强的谴责。由于外相断然坚持了不干涉政策，因而日本在未遭到外部任何非难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便大吹大擂起来。宇垣一面从旁冷眼看着，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上似乎有很多愚蠢透顶的人认为，新局面的展开是一种天佑。社会上这样看是可以的，满好。”但是，“既不知张为什么打了胜仗，也不知冯为什么倒了戈，而得意忘形的他们<sup>②</sup>，实在可怜，而且可笑之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强化，是加深“双重外交”，使军部可以无视政府在中国强行独自侵华政策的基础。军部和关东军从此又开始走上一意孤行的道路，一直发展成为四年以后炸死张作霖和七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

在国内政治方面，军部的态度是表面上老老实实，骨子里耍弄

---

① 护宪三派：即宪政、政友、革新俱乐部三派。——译者

② 指日本外务大臣等人。

阴谋，正在制造准备的态势。1925年，在宇垣一成担任陆相时期，撤消了四个师团，使反对军国主义的国内舆论趋向缓和，但这种做法并不同于山梨那种为了招架外部压力而被迫裁军，实质上是一种积极扩充军备的做法。宇垣把裁减兵员和马匹节约下来的经费全部用于改善坦克队、航空队及其他装备上了。就这次“裁军”的意义，宇垣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抢在裁军舆论之前，先发制人，谋求充实军备；第二，让人们知道，裁军会造成该地方经济的困难，使人们不再提出裁军；第三，创造“军民一致”（即军队掌握人民）的开端。一面减少师团，另一方面在中等以上的男生学校里配备现役陆军军官，把学生的军事训练列为正课。在市町村还设立青年训练所，对没进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规定修完军训课程者，在入伍服现役时，服役期限由两年改为一年半。

宇垣陆相设想用这些方法，陆军可掌握“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多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学大学学生和八十万青少年”，“无论平时、战时，实现真正的举国一致，使七千万同胞驱驰于至尊之下，听从指挥”。宇垣在日记中还写道，“在国家非常时期，统帅权不单是指挥军队，而且是一种支配国民的权力。要按照社会现状来行使这种大权。”他所看到的“社会现状”，是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和工人、农民斗争的激化。宇垣当时的思想已经形成波拿巴主义，其形成的过程，可以从他的随想录中看得出来，在此不谈这些。在这个时期的议会上，以退役军人出身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为首，一再建议或决议，要求政府尽快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工作，为此要求建立直属于天皇的国防会议等等。这些论调，和大正政变时期为了抑制军部而提倡建立国防会议的主张截然不同，毋宁说是政治和经济的专家们为了帮助军部建立“总体战”体制的叫器。在议会的讨论中，就“总体战的能力”的最高领导权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能由军人掌握，必须由政治家掌握的主张。面对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共合作的、如火如荼发展着的革命斗争形势，军部、政府和政党协同一致地制造保卫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舆论。军部又一次干预了政治，不久，不仅是干预，而且稳步地打下了独裁国政的基础。

###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

——《东洋经济新报》杂志的作用——

#### 第一节 围绕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问题的各种思潮

##### 一、参战思潮

1914年（大正三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英国对德宣战仅四天的8月8日，日本政府和元老们便匆忙召开会议，背着人民秘密决定以履行日英同盟义务为口实参加对德作战。9日，元老井上馨写信给元老头目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举国团结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要停止一切为一党一派利益的减税、免税等争执，此时要“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sup>①</sup>”，争取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世界地位”。山县和大隈也都“完全赞同”井上的意见。至于日英同盟义务云云，不过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寻找机会的借口罢了。

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在中国山东省胶州湾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限定了答复的期限。理由当然是确保东洋和平，还煞有介事地宣布，要求移交胶州湾是为

<sup>①</sup> 指袁世凯。——译者



了把它“归还给中国”。德国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在过了限定答复的期限——8月23日，天皇便宣布了对德作战。

日本的“舆论界”顿时沸腾起来，狂热支持这一决定。甲午战争期间创刊的《太阳》、《新日本》等永井柳太郎编辑的杂志，当时发行量最大，是日本鼓吹帝国主义思想的急先锋，属于大隈派的评论杂志，当然主张积极参战。从“大正政变”以前就站在攻击军阀、反对扩充军备的前列，坚持反对军部大臣武官制、反对统帅权独立，在内政方面极力主张民主改革和政党政治而首屈一指的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竟然也积极主张参战。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在8月15日的社论专栏“东西南北”中刊登了题为《日英同盟与日本的义务》的评论，表示赞成政府的措施，认为当前正是确立日本“东洋霸权”地位的绝好机会。文中写道：

“欧洲战乱或许扩展成为世界动乱。即便不扩展成为世界动乱，也必将波及东洋，给以重大影响。当此时机，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终归会使日本得以取得置喙于世界利害问题的地位，在日后收拾时局时，日本可以东洋霸权国家占据获得有力发言权的地位。当局的声明，可谓极得时宜。”近来，欧洲各国对东洋压迫过甚，甚至连日本应得的胜利成果也没能得到。国民对此记忆犹新<sup>①</sup>。“现在正值欧洲多事之秋，正是我们多年努力取得总收获的时机。以鄙人观之，我们倘若失掉这个机会，将永远成为世界的落伍者。”

显然，这种设想和前述元老井上馨的信件如出一辙。但该杂志在9月1日的“东西南北”栏中，就政府的决策是否“英明”又作了如下批判，说：

“德国是三国干涉的罪魁”。德国是以中国人杀害了德国传

---

<sup>①</sup> 可能指俄、德、法三国对中日马关条约的干涉。

教士为借口,占据了胶州湾的。“这次大战,责任也在德国”,所以“我们当然认为,此次帝国的(参战)决定实属至当”。然而,这是否是最英明的决策呢?假如把德国势力从东亚全部驱逐出去的话,列强在中国的均势就将保持不了,英俄一打进来,难保日本将从南北双方受到压迫。“时局之英明决策”应是首先与英国达成协议,“把印度以东置于战局以外,以谋求东亚商业市场的安全,乘欧洲因战乱无暇东顾之机,掌握在中国的商业霸权,通过外交努力,对中国表示亲善,排除我商业贸易上的一切障碍。这样一来,在欧洲因战乱处于疲弊之际,我则稳步充实国力,可拒绝任何国家对东亚的发言权。此乃安定东亚的最好方策,亦我国富强的火策。然而,当局目光短浅,不能远观十年以后,只为眼前利害决策,致使局势紧张,未免过于轻率。”

这就是说,不是有个不需参战就能成为东亚霸主的办法吗。这只是当时书报杂志上特有的倾向,无论什么事都要对政府批判一番,不这么作就不过瘾似的。所以,继前文之后,“东西南北”栏又以《喙探残肴》为题,说日本参战是“行使自卫权力”,与英国达成协议本来是个失败;并说政府对德最后通牒中关于要求移交胶州湾,“其目的在于交还中国”,可以说这也是被英国骗了;还大骂日本政府在对德宣战时“把帝国的活动范围限于中国近海和帝国商船的通路,把南洋除外”,这简直就象让英国来吃盛饌佳肴,而日本只用筷子去捡“残羹剩饭”。这种论调远比政府更富有冒险性和侵略性。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本来一贯标榜国粹主义和国权主义,所以不难看出,尽管平时高唱民主论调,一到战时,它的国权主义就原形毕露。而每期都刊登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民本主义评论家文章的《中央公论》杂志,在其9月号的前言中竟也说日本对德宣战《谁不觉得大快人心呢!》,文章说:

德国从中国夺去胶州湾，“德帝在东亚实现其雄图的策源地基础，即将完成。德国势力已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势将控制山东、河南，并因地形关系，要塞化的胶州湾势必形成对北京的威胁。正如德国本土是欧洲的祸源，胶州湾实危害远东百年。

呜呼，天乎！命乎！德国皇帝将不得不放弃其倾注多年精力所经营的宝贵成果，我帝国将一举根除远东和平的一大危害。谁不觉得大快人心呢！”

在同一期《中央公论》上刊登的石川半山的论文《毕竟是中国问题》，说欧洲大战是“期待已久的战争，这次大战持续得越长，对日本越有利”。文章进而提出了以下看法：

在欧洲对东亚的压力减少的时机，“日本应选择道路，第一，在北方应将南满及东蒙古划为势力范围；第二，原封不动地继承山东省的德国势力；第三，采取向南洋扩展之方略。如果袁世凯在政治统一中遭到失败，中国大陆发生巨大动乱，日本必须及时地采取保持此四百余州秩序之措施。日本必须下定东亚盟主的决心，果断地确定扩展的方策。”

这可以说预示了政府的“二十一条”要求。

在制造舆论上比杂志具有更大渲染力的新闻界，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主编的《国民新闻》自不待言，在内政上与《国民新闻》针锋相对、大正政变时高唱打倒军阀的急先锋《大阪朝日新闻》，竟然也竭力鼓吹参战和帝国主义狂热。

在政府尚未秘密决定对德参战以前的8月6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欧洲战乱与日本》的社论，为日本参战大造舆论说，英国参战、“祸乱波及东方国家时，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同盟的义务”，在7日的社论《战争之价值》一文中，声称这次大战是实现世界和平理想的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该报还在8月12日的社论中暗示政府要在对德最后通牒尚未发出时赶快

占领青岛。社论说：

“同东亚及中国大陆本无任何领土利害关系的德国，在中国占有防御地带以至策源地的租借地，纯属侵略行为。在平时也大大危害和平。如德国无所反省，为了东亚和平，青岛难免要作为眼中钉加以处理。”

该报在 13 日的社论中还进一步煽动战争狂热说，日本切断德国所占青岛要塞这个“东洋和平的祸源”，“完全出于道义”，如第三国<sup>①</sup>介入进来，“为了道义，也毫无忌惮地把它击退”。在对德最后通牒中规定的答复期限——23 日，该报又发表社论，估计日本将对德宣战，认为那时议会和政党应举国一致通过军费，自不待言，还应确定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社论说：“这岂不是时刻逼近的天赐良机，让我们来最充分地利用它，积极发展国运。我们既要力戒轻举妄动，同时也要警戒不能抓住天赐良机的那种深谋远虑”。

《大阪朝日新闻》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等的约定予以重视。在对德宣战前的 8 月 19 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胶州湾的处理与中美》的社论。社论说：“归还胶州湾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日本帝国？抑或为了东亚的全局？不看今后的实际情况，很难确定。如果帝国付出了许多牺牲才得以归还胶州湾，就不得不作相当的考虑”，暗示日本必须占领青岛。社论还说：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靠自己的力量要求德国归还胶州湾保全本国领土的实力，所以中国觉得“除与帝国合作以外，在东亚别无依靠，那就希望无需拘泥于‘为了归还给中国’等字样”。

日本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立即要求日本保证归还胶州湾。《大阪朝日新闻》对此评论说：“真奇怪”，“中国太也现实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对我帝国不信任的表现”，“中国政府应诚心诚意信赖

<sup>①</sup> 第三国即指美国。

日本”<sup>①</sup>。

《大阪朝日新闻》也好，《中央公论》的知名人士也好，他们本来就是极力赞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的，所以当面临他们所谓的“绝好机会”时，提出上述这种主张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曾经主张日本应决心放弃一切殖民地的茅原华山等人，在大战一爆发也竟然主张起“新帝国主义”来了。

大战前一年的1913年（大正二年）8月15日，他在《日本及日本人》上发表了《日本的孤立与新人生观》一文，主张日本应放弃“以武力为中心之国家主义”，不要对中国追求领土扩张，“要下重大决心果断地把朝鲜、‘满洲’都丢掉不顾”，建立一个“在内不妨得个性发展，对外与世界协调而平等的新型国家”。但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出版的茅原亲自主编的《第三帝国》杂志9月号的前言中，却以“赞美战争”为题说，“日本民族今后个人也必须实现自我；作为一个民族，今后也必须以改变世界地图颜色的雄心进行扩张”。<sup>②</sup>

茅原华山还在《中央公论》9月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从文明史和国际史来看欧洲战争》。文中写道，“由于大战的爆发，已无须担心日俄再战。第一，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更加巩固；第二，‘满洲’暂时也不会遭到日俄重新瓜分；第三，中国政府不管愿意与否，也只得依赖日本。因此，日本的势力将遍及全中国。问题在于日本人是否善于利用这种势力”。他竟如此恬然写出了与一年前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

在同年12月号的《中央公论》上，他又发表了长篇论文《战争的两大焦点和日本出兵论》。他说，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青岛，已尽到了日英同盟的义务，今后为了防备德国的复仇，必须“扩充、整

---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14年8月30日社论《要表示对日好意之实》。

② 《第三帝国》杂志创刊于1913年10月，标榜“新人的唯一战斗机关”，实际上聚集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的进步评论家。

顿、改善陆海军”。接着又说：“不过，我并不赞成增建两个师团”。他到底想说什么？令人费解。可是他进而又主张“新帝国主义”。他说：

“如果彻底实行君主主义，就必然达到民主主义，如果彻底实行民主主义，就义然达到君主主义。与自治主义合一的专制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将国家经济置于世界经济（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上；而将世界经济置于国家经济之上，是第三经济主义。首先要让日本国民扩大起来；首先要充实日本国内；要建立一个以发展个人为主的新型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帝国主义。首先要把剑、肉和灵，军备、财富和思想融汇为一体。国威国权自然光被八表，皇威自然遍及宇内。”

由此可知，他在着眼于“建立一个以发展个人为主的新型国家”这点上，和上述一年前在《日本及日本人》上论述的观点相同。他要建立的国家，说是君主主义、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总之，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不过是一种一旦遇到发扬“国威国权”和“皇威”的良机，便立即和它“融汇为一体”的那类东西。

著名的民本主义领导人吉野作造，当时也写道：“我认为，所谓最好的政治，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sup>①</sup>。吉野的这种观点也贯穿在两年后他发表的《谈宪政之本义及其善始善终的途径》<sup>②</sup>这一著名论文中。吉野的文章比茅原的更通俗易懂，更具鲜明的“民本主义色彩”。不过，不能不说他们二者是属于同一基调的。而且吉野也支持过“二十一条”要求，后面将例举史料。茅原和吉野都是《中央公论》上经常出头露面的所谓流行评论家。如果将此与当时最“民主的”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也在鼓吹参

① 《中央公论》1914年4月，《论民众的示威运动》。

② 《中央公论》1916年1月。

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不难看出,当时的“民主”言论,其水平是何等肤浅。如果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明确批判,也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主义。

## 二、反对参战、反对要求利权

在上述思想状态中,只有《东洋经济新报》坚持真正的民主主义,在要求内政上实行民主改革方面,它要求与当时任何民本主义者都在本质上不同的彻底的民主主义;<sup>①</sup>在参战问题方面,它也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值得大书特书。

在日本参战尚未确定以前,《东洋经济新报》于8月15日发表了题为《警戒好战态度》的社论,其要点如下:

当前正面临着欧洲战乱波及东亚的危险。东亚变成战场,日本也将参战,这“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考虑,都对我国不利。如果可能,最理想的是,让他们那些交战国不在东亚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把战祸坚决局限在欧洲。如果难以办到的话,则我国目前所应采取的唯一方策,就是倾注全力缩小、缩短东亚的混乱状

<sup>①</sup> 1914年第1期《东洋经济新报》(1月5日)社论阐述了民主主义的纲领。内称:

“按照我国民生活之现状,当前无论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诸方面,均须进行彻底整顿并开展大规模改革运动”。需要彻底整顿的项目如下:

“在政治方面,变限制选举为普通选举;在产业方面,取消保护政策,确立自由开放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抛弃帝国主义,奉行工商主义;在国防政策方面,缩减当前过于臃肿之军备,改为高效率之小型军备;在教育方面,废除官学特权;在社会问题方面,把妇女和工人从当前穷困境遇中解放出来。吾辈确信以上宗旨即为我国民前进之方向。”

接着,1915年7月25日《东洋经济新报》又发表了署名为石桥湛山、题为《论国会政体》的文章。该文指出,“无论任何政体”的国家,其“主权亦属全体国民”;“无论任何政体,最高统治权亦属全体人民”。该文主张建立议院内阁制,实行普通选举,以实现政府也“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制度。《东洋经济新报》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以上纲领。《东洋经济新报》不是民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而是真正坚持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原则。

态。当前我国若稍许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其目的绝不可越出这一范围”。

日本始终“根本日英同盟的精神，同英国交涉，共同合作，承担维护东亚和平的重任即可。这时可能将不得不与德国为敌，固属遗憾，但德奥在东亚的军事势力也不过只有几艘军舰而已。压迫它，加以封锁，以保持东亚海面的安宁，可能只需举手之劳。至于德国在胶州湾微不足道的陆军，即使置之不理，它也无所作为。如果要发动大军，把它攻陷，我们必须说，这是超出了日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

显然，《东洋经济新报》的这一立场，和日本政府以及上述报刊杂志认为大战对日本帝国主义说来是“天佑”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诚然，单从字面看来，它也不是主张绝对不参战，但它希望不要以东亚为战场。它是说这个愿望，“如果因为当前德奥英法俄等交战国在东亚及其附近地区，各自拥有相当规模的军备和领土的情况下”，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在东亚也很尖锐的现状下，实现不了，则日本也只好利用日英同盟，为了把东亚的战乱控制在最低限度，采取最小的军事行动。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参战论，丝毫也不想乘此机会扩张日本领土，或在中国确立统治地位。因此，它坚决反对日本出兵青岛。

《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还警告说，如果日本企图乘此机会“实现侵略野心，则必将造成使日本陷于危险境地之重大事件”。社论说：

“部分好战之徒，竟想驱使人民走向这种无益而又极其危险的事业。对国家来说，实属害群之马。对国家心怀危险思想的正是他们”。这些怀有危险思想的人们主张要趁此机会“在东亚努力获取利权”，但“他们到底说要在哪里、如何努力获得利权呢。请看现在胶州湾的贸易情况如何呢。过去德国向该地投入



了多少资本不得而知，由于开发该地而得到了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实际并非德国，而是中国和日本。现在胶州湾贸易的七八成难道不是由日本商品占着吗？既然这样，假使我国占领该地，岂能得到比此更大的利益吗？至于说担心德国在该地拥有基地会威胁东亚和平，正如前述，愚鑫透顶，不足为惧。而且并不限于胶州湾，欧美势力打进东亚，其投资越大，则我国所得利益越多。这是我们一贯的论点，过去已一再论证。”

《东洋经济新报》所以反对扩大战火，反对那种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行径，正如上述该报社论中所看到的，它并不是出自道德观点和人道主义，目标是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即使通过战争扩张领土，或获得利权，对日本并不有利，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社论记者从前一贯的主张，后来也贯彻这一主张。这里有着《东洋经济新报》独特的经济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东洋经济新报》才能始终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下面试稍详述它的独特的经济理论。

1912年1至3月，《东洋经济新报》连载了该报主编三浦铁太郎的文章——《放弃满洲乎、扩张军备乎》。文章明确表示反对扩军、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放弃“满洲”。而且在同年，大战爆发以前的3月5日，该报发表社论，竭力主张“在中国攫取利权无用”。社论说：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欧美各国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取得铁路和石油的利权。于是“我国人动辄就说，中国的资源若由欧美资本开发了，其利益将悉为欧美人所攫取，我国就只好袖手旁观了”。然而，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论者说，“如果利益意味着靠资本赚取的利润”，那么，象日本这种资本匮乏的国家，纵令由外国借来资本，再投到中国，“只是把借款转手贷放出去，并不能取得多少利润。若是从赚取工资说来，中国幅员辽阔，工作繁

多,对中国人从事劳动,并无任何妨碍”。

(中略)“又如从这些事业带来种种好处说来,铁路也好,石油也好,把它由敷设、生产带来的便宜一股脑儿都由少数资本家或企业家揣到腰包里,这决不是人力能办到的。不论何人投资或由谁来经营,结果那些好处是利用最多的人享受最多。如果在中国铺设铁路或增产各种产品,显而易见,享受最多好处的当然是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其次则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人。又何苦必须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与欧美人竞争,努力获得空头的利权呢?如果我国拥有可投入中国的资本,最好用于其他事业。如果欧美人有愿获得利权者,多多益善,我们应该大力欢迎。因为投入中国的外资越多,越能促使我国与该国结成有利的经济关系。

不过,我国人讨厌欧美资本涌入中国的另一较大原因是,唯恐中国会因此沦为埃及或波斯第二,这完全是杞人之忧。当今试图从政治上瓜分中国的人,恐怕不仅欧美没有,而且即便有这种人,谁也不能无视日本的势力就办得到的。”

上述理论的前提似乎无视了以下的事实,即列强在中国攫取利权,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却意味着由该国垄断了利权事业和利权区域,并不排除中国和其他各国资本的自由活动。各国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还得到现实的保障,并不由此带来瓜分中国或使中国在政治上从属于利权国的问题。这样的前提只是《东洋经济新报》记者的极不现实的一种愿望。从上述引文的最后一段还可以看出,该报记者认为列强不会在政治上瓜分中国的根据是,第一,“从主观上希望欧美各国不会有如此企图”;第二,“断定日本的势力”不会允许欧美那样做。但是,第一点纯属主观臆断,并非现实;第二点的断定,它本身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处于一定的相互角逐状态,这种“均势”可能随时打破。即使该报记者的愿望全属现实,

推测也正确,它也是一种无视中华民族所处的现实,在客观上美化帝国主义的逻辑。因为中国业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上了不平等条约,不断受到军事威胁,被瓜分为若干势力范围,被剥夺了民族独立,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只要根据这种逻辑,结论就会是,如果认为日本在中国攫取利权是有利的,也可以那样做。事实上上述论文中已经说:“如果情况是,我国资本充裕,国内本来用之不尽,把它投到中国去,铁路也好,油井也好,可随便拿到手里,那或许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只能说‘或许’,而决不能说‘一定’”。

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作者的论点原则上都不是否定帝国主义利权的。它是一种“对欧美列强攫取利权要听之任之,但日本以不那样做为得策”的现状认识论。为什么日本以不那样做为得策呢?第一,“众所周知,当前日本是一个资本极端贫乏的穷国,在日本国内铺设一点铁路,尚且立即发生资金不足,不能如愿,哪里还谈得上在中国铺设铁路呢!哪里还谈得上在中国钻油井呢!”第二,攫取利权“势必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引起同欧美人的竞争。”就是说,即使同欧美竞争,资本薄弱的日本也不能取胜,所以不要搞这种无益之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唯恐“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这说明《东洋经济新报》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估计到即使设法通过压制攫取利权,从长远观点来看,经济上毕竟划不来。这个问题容待后述。

《东洋经济新报》对日本资本主义脆弱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民民族抵抗的评价完全正确。因此,尽管该报原则上没有掌握否定帝国主义利权的逻辑,但从现实问题的剖析中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资本输出的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理论,说攫取利权没有用,如果确有向中国投放的资本,应该把它投在国内。并说日本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投资中吸取巨额利益,所以无需羡慕列强攫取利权,

反倒应该表示欢迎。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通过自由竞争的商业贸易的利益。列强攫取利权和向中国投资，决不象《东洋经济新报》仿佛是自明之理似地阐明的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利益，但是，对于同欧美列强一样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具有同中国接壤的地利条件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却有使日本对华贸易额增加的可能性。于是《东洋经济新报》便力图证实日本在中国攫取政治势力范围，对日本经济未必有利；即使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利权，日本的对华贸易还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种论点体现在《东洋经济新报》大正三年四月十五日社论《我方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政府》和大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社论《我国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上。

《我方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社论举出在华日侨按地区和职业的人口统计说：

侨居日本政府政治和军事势力较大的关东州、南满的日本人，主要是官公吏、军人、满铁职工及有关工作人员。“我们不能不怀疑，除了我国拿出经费在关东州和南满经营的事业以外，我们的经济活动究竟能有多少呢？”

反之，“在北满和中国中部，我国官公吏和机关雇员总共只有一千人（包括家属）。那里根本没有南满铁路那样的企业，而进出口商、杂货商、药材商、鞋商等却均比关东州、南满两地区还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在几乎没有我国政府庇护的地方却分外取得优势。这些侨居的工商业者和工人，都是不靠国家出钱的独立活动者。由此估计，我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关东州和南满相比，北满及中国内地反而更为旺盛，这么说决不是不恰当。而且这并不是单从在华日侨看来是这样，从贸易及其他活动方面看来也可得出同样结论，这是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

上述论断，若就“经济活动”规模的大小来看，譬如把“南满”的满铁一个公司同“北满”及中国中部的许多杂货商、药材商等的活

动成果用金额来一比较,立即站不住脚;而且这种论断的严重错误在于,它没有把北满和中国中部的日本中小商人和工人也在享受治外法权和关税上的特权这点考虑进去,从不靠国家保护的独立自主的经营者立场来把握“经济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东洋经济新报》的阶级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该报记者得出结论说:“如果有人认为,攫取的利权大了,则我在华的经济发展就指日可待,这是大错而特错。前车之鉴已在关东州、南满清楚看到,我们呼吁天下人予以注意。”结果归结到反对攫取利权的论点上。

前面提到的第二篇论文《我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分析了1901年至1913年香港以及日、英、德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演变情况,举出日本如何取得了迅速发展,已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情况,并阐明在中国商埠、港口进出的船舶统计上,日本所占的比重也迅速增大,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英国。于是得出结论说:

“在贸易政策和海运政策方面,过去并没有采取任何方策,一再犯错误和失败,尚且取得这样的发展。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所处位置对我国发展极为有利,如果推行符合这种位置的明智的政策,将会得到或可以得到何等强大的势力,简直无法估计”。文中还论述了今后应采取的贸易和海运政策,最后得出结论说:“总之,我国在中国市场的势力发展如何,并不在于些许外交、军事和攫取利权等。问题的中心只在于改变我国本身在产业上的保护主义即只局限于内地市场的做法,采取自由主义即海外发展主义一点上。如果这样,则在贸易方面压倒香港,压倒英国,压倒印度,压倒德国,而且在海军方面压倒英国,决非难事。”

一提“海外发展主义”,也许会引起误解,但《东洋经济新报》的意思是,不要为了保护内地市场而高筑关税壁垒或者保护特定的大资本,不要把目标放在凭军事和政治来扩大势力范围和攫取利

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要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拓海外市场。这显然不是代表金融资本和重工业垄断资本等,而是站在专靠自由竞争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们的立场上。具体说来,就是站在经常给《东洋经济新报》投稿的中国贸易商行松昌洋行的经营者山本唯三郎等人的立场上。<sup>①</sup>

《中央公论》也倡导过同《东洋经济新报》看来极其类似的主张。《中央公论》1914年7月的一篇题为《论我对华国是》的社论指出,日本现在资本匮乏,即使在中国与列强争夺利权,也徒劳无益。因此,应隐忍一时,倾注全力扩大贸易。文中还列出了1891年以来日本及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和中国沿海海运方面所占地位的变迁表,论述了日本发展的惊人速度,指出如果各国在中国攫取利权、进行投资,那便是日本的利益。

到此为止的论点和《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极其相似,但有两点根本分歧。其一,《中央公论》主张原则上要大力攫取利权,遗憾的是当前办不到,并不象《东洋经济新报》那样原则上反对攫取利权;其二,最重要的分歧是,《东洋经济新报》毫不重视“南满”的既得利权和势力范围,甚至主张干脆放弃(见后文),但上述《中央公论》的社论却说,“据说社会上部分人主张‘满蒙撤退论’”(恐怕

---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在1914年6月25日的“时论”一栏上,刊载了山本唯三郎撰写的题为《日华实业协作的急务及其方策》一文。内称,资本匮乏的日本,是否应该不与欧美列强在中国争夺利权,把整个中国作为我国市场,“利用列强铺设的铁路,经销列强采掘的矿物,在各处努力扶植我国商权。只限定局部地区作为势力范围,而置广大中国领土于不顾的作法,在对华贸易上可谓最大的错误”。文章还说,“当务之急是,必须进口廉价的中国煤炭,谋求降低(日本产业的)的成本;进口中国的粗制品,再转手输出,以打开一条同欧美各国竞争的道路。……即使设立日华合办的一个大公司,如果目的在于供攫取利权的工具或只为提供铁路材料那种规模,则对日华实业究竟能有多大好处:所以,应该不再于诸如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又会引起欧美各国猜疑那种狂热争夺利权的蠢事,全力研究增进中日两国实际利益的方法。例如把中国什么货物输入我国,加以精制最为有利:通过什么途径方能与中国人合资经营企业: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运用日华实业合作的方策:这些应该是日华合作的前提。”

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论点),日本撤退之后,那里不会建立“中国的权势”,只会被外国势力侵入进来,所以绝对撤退不得。《中央公论》的社论还说:

“而且帝国本来在南满有一个重大的天职。那就是在该地区拥有势力,以尽监督保全中国的职责。譬如,驻满蒙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维护远东和平的一个宪兵师团。一旦列强有人心怀不逞,或一旦中国内政紊乱以至不可收拾,日本应带头与列强共同努力恢复和平。此即帝国不可撤出满蒙的一大理由。”日本既然要“保全中国”,就“绝不可能吞并满蒙,充当瓜分中国的先锋”。“帝国对于满蒙的要求”,是居住、土地所有和开发矿山的自由。换言之,“想要在和帝国国内大致相同的自由之下,谋求开发满蒙,并想让列强均沾这些自由”。

日本并不想独占“满蒙”,而要把它变成列强各国共同的殖民地,在这点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即使如此,以上这些要求仍然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东洋经济新报》就完全没有这类主张。

## 第二节 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的各种思潮

### 一、“应该尽快放弃满洲”

日本对德宣战后还不到两个月,1914年10月14日,日本海军很快就占领了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11月7日,日本陆军不但攻陷青岛,还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山东省的铁路。从一开始就煽动参战的《大阪朝日新闻》等报刊,大肆宣扬“帝国军队的威力”,国民大众白天举旗游行,夜晚提灯游行,陶醉于大规模的军国主义示威游行之中。

在对德最后通牒中,日本要求为了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把

它移交给日本。但是，日本政府和各报刊杂志的评论家们，都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归还给中国”的问题。12月9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必须冷静》的社论，就这一问题作了如下论述：

“青岛归还与否，并不是值得加劲讨论的事情。关于山东省铁路、矿山的各种利权，中国既已让给德国，由德国来继续行使也好，由日本取代德国继续行使也好，对中国来说，均无损益。因此，诸如日本的野心等，根本就不成问题”。

社会贤达的论调虽然没有这么露骨，却基本上同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对日本的野心存有戒心，一再就日本侵犯中立或侵犯主权提出抗议，中国新闻界也提高了批判日本的调子。日本政府对这些抗议当然根本不加理睬，各个报刊却不停地谴责、攻击“中国不诚实”、“排日”。例如《大阪朝日新闻》11月7日的社论《青岛沦陷之日》，对袁世凯总统提出要求说，总统直系的报刊上充满了排日消息，要彻底取缔。《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也对日本于1915年1月7日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兵一事大发雷霆，扬言要派“问罪大使”等等<sup>①</sup>。总之，各报刊从根本就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性，似乎中国只有对日本唯命是从、任凭它在中国为所欲为，才是中国对日本的“信义”和“友好”，如果中国稍微有一点要独立自主，就是“排日”或者“背信弃义”。

唯有《东洋经济新报》对抗这种“舆论”的逆流，始终坚持反对攫取利权、反对参战的立场。下面一系列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显示出其毅然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

(1) 《战争无休止乎》(大正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第679号)

(2) 《反驳侵略领土论》(十月十五日，第684号)

(3) 《不可占领南洋》(十一月五日，第686号)

(4) 《决不可占领青岛》(十一月十五日，第687号)

<sup>①</sup> 《东京日日新闻》1915年(大正四年)1月11日社论。



(5) 《再论不可占领青岛》(十一月二十五日,第 688 号)

以上第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否定了侵略战争。社论说,

现在社会上到处是一片讴歌战争的论调。他们常说:“反正生意人离不开算盘。而且,人类是,盘算之后有活力,利害以外有感情”,战争是无休止的。这就是说,我国将不惜巨额国帑和亿万生灵,企图采取重大的行动。然而,我国真的有进行战争的必要吗。“所谓举国一致的精神,确是国民的一个美德,我们相信这点,决不落后于他人。不过,举国一致,也有多少种,所谓盲目的雷同、虚伪和随声附和,是一般最应唾弃的国民的堕落”。因此,我们至今仍然敢于坚持反对战争。在不久的将来,战争或许还不会停止。这正如文明社会里“会有盗窃的可能一样”。但是,也正如靠盗窃可得利一时,而他们的生活毕竟不会幸福一样,战争也是一种“无益而极其愚蠢的勾当”。

“为什么说战争愚蠢而且无益呢?我们说,因为战争绝不会带来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利益。社会上有人认为,战争的结果,可以扩张领土或获得赔款,这就会给国家增加财富,这是荒谬绝伦的想法。事实胜于雄辩,我国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台湾,通过日俄战争吞并了库页岛和朝鲜,究竟得到多少利益?诚然,我国得以在台湾兴办了一些事业,在朝鲜、库页岛也正在兴办各种事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战争兼并,而是由于投入了巨额资本。假如不兼并这些地区而投入这些资本,也一定会取得这些结果。如果说在他国领土上难以进行投资,那就应该把它投入国内。投资所得,可能并不低于台湾和朝鲜。至于获得赔款,毕竟只会给接受赔款国的经济界带来混乱,这点在此不予赘述。从经济方面来看,战争并无益处,就连积极鼓吹战争的人现在似乎也大致承认了这点”。

尽管如此,战争鼓吹者还说:“除经济利益外,战争还会带来

诸如发扬国威、振奋国民精神等利益”。“他们若能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发扬国威、振奋国民精神，离开国民经济生活，会有多少实质内容呢？恐怕只能令人感到空洞得几乎无法捉摸。……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战争是毫无益处的勾当。因此，为战争而花费巨资、牺牲无数生灵是愚蠢透顶的，我们任何时候都敢于证明这点”。

第二篇社论《反驳侵略领土论》，力图从日本近代史来论证这个论点。文章在开头指出，“维新以来，使我国濒于危险、陷于困境者，莫过于我国国民的侵略领土论”，下面回顾历史说：

甲午战争期间，由于侵略领土论者统治了议会，煽动国民，致使“当局战后在同中国交涉中丧失了取舍选择的自由，任凭国民感情的驱使，强行割取辽东半岛，终于招致三国干涉”。幸亏当局英明、有勇气，放弃辽东半岛，使我国摆脱了同三大强国交战的严重危机，但“当时此种侵略领土论的确使我国陷于累卵之危，这是无需争辩的”。

不仅如此，日本一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竟把沙俄及欧美列强的势力引进远东，引起瓜分远东的竞争，从而日本也不得不扩充军备，给国民增加负担十亿余日元。日俄战争的处理也因侵略领土论而贻误，阻碍了国运的发展。日俄战后，“我国的大陆扩张主义终于占了上峰，并贯彻于实际政策之中”，因此，日本国民负担增加，“中国人民的排日情绪弥漫全国，日趋强烈，曾是日本最亲密的友邦美国人民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危险，以至动辄就说日美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日俄战争以后，乘俄国威胁业已消失之机，停止扩充军备，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则早就偿清了日俄战费，积累了充分资金，成为强有力的对华投资者，还可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信赖，消除欧美各国人民的误解，博得他们的尊敬。

“每十年发动一次战争，是滥用国民的爱国心，或过分迫使发扬爱国心，我们不禁窃为此担忧。此点现在只好说不得已了。然而，目前最可怕的是，侵略领土论又照样逐渐在控制国民的感情。……我们希望遵守诺言，事后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关于占领马绍尔岛问题……，我们也殷切希望，不要由于企图永久占领如此区区弹丸之地，致使将来滋生事端那种欠考虑的做法。”

这个论点极为明快。但是，说侵略他国领土是“国民”的要求，它迫使政府没有选择政策的余地，根本颠倒了政府、军部以至整个统治阶级才是侵略他国领土的元凶，而国民则是受煽动、被诱惑这个事实，是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文章作者具有“好也罢，坏也罢，国民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人”的思想。即作者经常告诉国民说，只要国民坚定不移，政府若违背民意毕竟一事无成。这种思想本身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从这种思想出发，民主改革的要求也就有了基础。但是，如果不顾现实的权力机构，立即把它用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实，就会陷入上述的误谬。这种应用是由于作者对于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根本没有分析和认识——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而来的。不过，如果我们只抓住作者的这个错误和局限性，看不到作者站在“只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治哲学及历史原理的立场当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结果就会误解了作者。

以上第一、第二篇社论，从理论和历史上阐明了反对战争、反对扩张领土的论点，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的是第三篇及后几篇社论。

社论《不可占领南洋》首先明确指出，日本能够占领的不过是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一千英里的窄小地区，即使占领了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社论紧接着说，该地的地理位置在威胁夏威夷和菲律宾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所以，我国国民若悍然攫取德属南洋群岛，欧美国民就会普遍推测，其目的的一定是并不

在于经济，主要在于扩张领土和侵略。这种推测很难说没有道理”。尤其对美国人民的刺激可能更大。这样一来，势必加深日美间的对立，挑起日美军备竞赛。结果或许会酿成战争。在处理甲午、日俄战争时，由于国民被侵略他国领土的思想所驱使，致使经济上受莫大损失，使国家受到莫大危害。占领南洋是与此一样的严重错误。“再也没有比主张占领南洋群岛更无益、危险更大的了”。

社论的作者期待大隈首相特别是加藤外相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而结束了全文。其实，当时日本政府业已同英法政府秘密进行谈判，要求它们同意日本永久占领德属南洋诸岛。《东洋经济新报》接着于11月15日和25日分别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占领中国青岛。其论点与11月5日的社论相同，说占领青岛不但不会给日本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使日本变成中国及欧洲列强最凶恶的敌人。笔锋非常尖锐。社论说：

“所谓德国占领青岛，危害东洋和平；而日本占领青岛，却无害东洋和平，其理由何在？如果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占领中国部分领土，会启瓜分中国之端，或破坏列强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导致以中国为舞台的国际关系趋于恶化，那么，日本占领该地，将与德国占领青岛危害和平一样，也必然会危害和平。”

这个逻辑，含有超越日本“国家利益第一”的国家主义的因素，如果再彻底一些，就不得不否定日本在“南满洲”的垄断地位。而这篇社论的确也否定了日本的这种地位。社论继续说道：

“不，岂止占领青岛。此外，诸如日本在南满、英国在威海卫、法国在广州湾等，必须说都危害东亚的和平。”

作者在这篇社论开头提出应该如何处理占领后的青岛问题，并作出如下论断：

“我们对于这类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不能向亚洲大陆扩张

领土，满洲也应及早放弃，这是我们一向的主张。如果再在中国山东省的一角霸占领土，真是祸害上更加祸害，危险上更加危险，必须坚决反对。”

关于《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是彻底的“南满洲”既得权益放弃论这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它和前面例举的茅原华山的轻率说法不同，它的理论基础是，攫取利权，对于日本说来并非有利，因而后来也一再提出这种主张。如上所述，这篇社论在这样断言之后，全面否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行径，进一步指出：

“天下公认，英法美各国没有瓜分中国的野心。<sup>①</sup>不！此三国衷心唯恐他国瓜分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防止瓜分。而公认动辄对中国领土包藏野心的，是俄德日三国。因此，我日本深为中国人所恐惧，并遭到排斥，而且被美国视为危险，连盟邦英国人都非常猜疑。

现在若把德国从中国山东驱逐出去，即使仅仅如此，日本占据中国“满洲”本来就很引人注目，若再以青岛为根据地，把山东地区视为领土进行经营，其结果将会如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越发明显，势必耸动世界列强的听闻，自不待言。”

有人说，日本占据“满洲”和山东，一旦中国出现国际或国内动乱的时候，日军便可以立即出动，恢复和平。<sup>②</sup>“若从同中国人民或中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欧美各国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有如此危险、可怕的状态”。只因现在战争方酣，英法人才对日本

---

① 所谓英法美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是指此时它们不想瓜分中国领土，只想进行帝国主义的角逐。这三国也想在中国攫取利权，加强政治势力，和日俄德一样。《东洋经济新报》记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对英法美三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抱有幻想，所以才作了如上论述。不过，上述论述不够正确，这并不有损记者的根本论点。

② 本书第3章第1节《中央公论》的社论就是其中一例。

表示好感。现在就完全可以设想，一旦战后人心稳定，他们也“必定愕然有所畏惧，视日本为威胁远东和平的最大危险国。欧美人民将互相团结起来，奋力颠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这样看来，日本割取青岛，实际上将同中国人结下不解之怨，被欧美列强视为危险，决不会增进东洋和平，反而会导致形势紧张”。

如果把论点同 1921 年华盛顿会议的《九国条约》结合起来，同后来的日中战争联系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惊叹，这是何等正确的预言家的预见！

《东洋经济新报》记者这样论述可能仍然感到不够，11 月 25 日又发表了《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的社论，批判了那种认为：“占领青岛旨在开辟向中国发展日本经济的立足点”的谬论。该报记者的立场，正如上述那样，反对一切利权主张。在这篇社论中，又反复阐明了这种观点。

## 二、“二十一条”要求的热潮

尽管《东洋经济新报》怎样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反对战争、反对领土扩张主义，对社会舆论也没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说句讽刺话，正是因为《东洋经济新报》对舆论没有影响，一点也没有打击政府，政府才让它随便云云。

当时日本一般的报刊杂志都掀起了更加高涨的好战热潮。尤其是素以露骨而急躁地鼓吹侵略中国著称的黑龙会等组织，早就满不在乎地说出了日本政府不敢公开讲的话。从大战爆发以前，黑龙会就或者组织包括许多政治家在内的“对华联合会”，或者召开“国民大会”，以“日华亲善”和“保全中国”为名，煽动侵略中国的热潮。他们把欧美势力因大战无暇顾及远东看作是“千载难逢之时”，企图趁机一举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1914 年 10 月 29 日，黑龙会以其会长内田良平的名义，秘密向日本政府提出了

《对华问题解决意见》<sup>①</sup>。

黑龙会炮制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是：使中国陷于混乱，废除现在的共和制，建立“立宪君主制”的傀儡政权，与该政权缔结《国防协约》。其协约草案如下：

“我日本帝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维持东亚全局的和平，与中国共同担负防御中国内乱及外寇的义务，中国对日本的国防设施提供特殊方便，日本将保护特殊利益。为此，兹缔结协约如下：

第一，在中国发生内乱或中国对外宣战时，日本应派军队予以援助，负责防卫领土，维持秩序；

第二，中国须承认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并将其统治权委任于日本，使之确立国防基础；

第三，日本占领胶州湾以后，应占据过去德国拥有的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利权。又，恢复和平后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使其成为开放的世界贸易市场；

第四，为适应日本海防之需要，中国应将福建省沿岸要港租借给日本，作为日本海军基地，同时将该省的铁路敷设权及矿山开采权交给日本；

第五，中国应将陆军的改革及军队的训练均委托给日本；

第六，（采用日本武器）；

第七，应将海军的建设及训练均委托给日本；

第八，（把中国的财政、税制的整顿及改革，委托给日本人，聘请日本人担任财政最高顾问）；

第九，（聘请日本人担任教育顾问，并在中国各地设立日语学校）；

第十，中国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租借或割让土地时，以

<sup>①</sup>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7。

及对外宣战、与外国媾和时，须预先与日本协商，征得日本同意。

这个协约草案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它比日俄战争中日本强加给韩国的《日韩保护协约》还要厉害。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在酝酿与《国防协约》的设想基本相同的对华政策。不论政府派还是非政府派，除了《东洋经济新报》以外，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想一举将整个中国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主张甚嚣尘上。日本政府在这年（1914年）的12月3日，指令驻华公使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

“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享有的一切权益等共四款；第二号，要求延展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把“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实际上变成日本领土等，共七款；第三号，要求把中国最大的铁、煤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日中两国合办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答应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割让给他人；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财政等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机关，并聘用多数日本人；要由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的武器供给；要求日本人在中国拥有土地所有权、布教权、铁路和港湾的利权等，共七款。<sup>①</sup>

试把“二十一条”要求同前述黑龙会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作一比较，可见两者非常类似。中国如果屈服于这些要求，中国必将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当然，全中国人民掀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就连过去一贯屈服于日本高压政策的袁世凯大总统，也拼命抵抗“二十一条”，把英美拉到自己这边。于是日本增加在山东的兵力，用以恫吓中国。但因中国仍不肯屈服。日本无奈于1915年（大正四年）5月7日撤回第五号要求，发出最后通牒，迫使中国表

<sup>①</sup>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6卷，第73—77页。——译者



态是否答应其他条款。9日，袁政权终于不得不予以接受。

“二十一条”要求的全貌是在交涉的末期公布的，但把它递交给中国后不久，新闻界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例如：《大阪朝日新闻》1月28日的社论《对华交涉要速决》中说道：

“此次日置公使所提案件的内容尚不详悉，但我国有民间外交，日华间存有早该解决的悬案……，特别是日德开战以后，中国的态度，对日本每多不利，因而中国的将来实堪忧虑。故现在求得根本解决，对双方均极为有利。日置公使所提的要求，也是根据国民的要求的。如果是这样，谋求解决，不应拖延，应一气呵成，以保全两国亲善之谊。

（中略）

日本的提案，并非仅限于处理山东问题，另外还有许多悬案，它同处理山东问题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在日中谈判期间，《大阪朝日新闻》继上述社论之后，又连续发表社论，一再宣称为了“日华亲善”、为了“保全中国领土”、中国必须立即答应日本的要求等等，并谴责拒不接受要求的中国是“不诚实”、“远交近攻”、“旧式外交”、“耍弄小把戏”等等，还屡次用诉诸武力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一味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例如2月15日的社论《日华谈判的拖延》中说道：

中国方面正在“鼓动排日情绪”，拖延谈判。但“中国反复这样错误，只能越发陷于不利。因为日本会越来越对将来感到不安，出于国家自存的需要，不得不向中国提出更为严峻的要求。

（中略）我们不详提案的内容，但确信其中必有很多对中国有利之处。然而谈判至今尚未决定，完全由于中国的旧式外交所致，莫非我国当局中了它的圈套？（中略）我舆论界正以慎重态度等待此次谈判的结果，而中国却以舆论为武器，向我进攻。这样危害两国关系很大，中国政府若不加以制止，我政府将采取

适当措施,迫使袁总统进行更加彻底的交涉,以求尽早解决”。

《大阪朝日新闻》2月26日和27日的社论《将被德国贻误的中国》内称:

“如果日本欲以强力压制中国,何以拖延至今。日本提案的内容,本是为了保持日中的睦邻友好,真正确保东洋和平,解决日华间多年的悬案,进而为中国铲除祸根。因此,即便中国拖延时日,日本仍隐忍持重,保持和平,不肯使用暴力,谆谆诱导,促使中国醒悟。如果日本真要侵犯中国主权,采取诸如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手段,则寻找时机和借口,并非难事。然而,日本始终要维护友谊,奉行保全中国的主义。因此,谈判开始后已过四十天的今天,仍不厌烦不必要的会见和手续”。

在了解“二十一条”要求内容的人看来,这篇社论侈谈的“友谊”和“保全中国主义”等论调,和黑龙会的“日华亲善”和“保全中国”异曲同工。如此谰言该是多么无耻,不禁令读者为之作呕。而《大阪朝日新闻》自己也明知这是在撒谎。

“中国高唱独立和主权,真是愚蠢透顶。所谓保全、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東西。各国出于权宜之计,才遵守这三項纲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各国的权宜之计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不能自我保全,各国才权宜予以保全。这已暗中在无视中国。这种无视或许表面化起来。我国为此暗暗忧虑,为了未雨绸缪,这次提案才有所触及<sup>①</sup>。而其提案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又为何迷惑不解而拒绝呢?”

《大阪朝日新闻》4月21日发表了题为《危害日本的是中国,须采取强硬态度》的社论,竟然暗示要颠覆中国的现政权。

“中国本身虽然高唱独立和主权等一个普通国家所必备的条件,其实中国并不真正具备这些条件”。中国不是已被列强各

<sup>①</sup> 指“二十一条”要求的第五号。

国夺去了租界,强占了铁路、矿山和税关的利权了吗?邻国日本对此感到困惑,所以为了实现真正的日中睦邻友好和保全中国,才进行了这次谈判。那种歪曲日本的真意,认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独立,真真岂有此理!”

“这次谈判若被中国贻误了,我国政府不仅会立即丧失国民的信任,这个国家的前途又将如何?国民正以非常的决心等待这次谈判。万一我方作出让步,留下后患,则不仅会引起在华日侨的愤懑,即国内人民也决不会答应。对于中国,要根据帝国国策的根本原则,堂堂正正地对待。手段可有多种。既可追究袁总统的责任,也不妨改革中国的国体”。

此后,《大阪朝日新闻》又于4月25日发表了《日华关系与世界政策》、5月6日发表了《对于毫无诚意的拒绝》、5月7日发表了《发出最后通牒》、5月8日发表了《交付最后通牒》等一系列社论,对中国百般威胁,直至中国屈服,打出了威胁的连珠炮。而当日本撤回第五号要求,中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其他全部条款,“结束”谈判时,《大阪朝日新闻》当天又发表了以《对华问题并未结束》为题的社论,谴责日本政府对华过于妥协。社论说道:

“由于我方过于谦让及这些过失,致使这次谈判幸而未动干戈而告一段落,但不能说对华问题业已结束。因为作为今后的问题,暂且取消了第五号条款,未能达成协议,还须继续谈判,决非撤回之意。中国人之特点是,别人一让步,就翘起尾巴;别人一强硬,就畏缩回去。”恶毒地中伤中华民族。并说此后谈判时,要丝毫不让步,即使有第三国稍加干涉也不去管它,“当决定如此重大事件时,应该具有相当的决心”。

社论主张要以诉诸武力的决心,坚决贯彻第五号要求。

一般说来,当时报刊上的论调都和上述相同,甚至还更“强硬”。这种情况,从早稻田大学教授、论坛的老前辈浮田和民——

他是自从日俄战争前后就提倡“伦理帝国主义”，即“对内民主主义”（或者也叫社会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鼻祖——在那年《太阳》杂志6月号上刊登的题为《对华外交上的大问题》一文，便可了解。文章说：

“今年1月日中谈判以来，每读有关中国问题的消息、评论，觉得健全的舆论大都并未现于纸上，隐蔽在里面，不堪一读。如果政府依照所谓舆论来决定事宜，问题或许不会得到和平解决，如今已经酿成大战。在此期间，唯有《读卖新闻》的社论，较其他报刊别具一格，始终发表公平意见，对国民给以痛切忠告，值得社会称赞”。

浮田所赞扬的《读卖新闻》，笔者尚未看到，不过，即使较其他报刊怎么“公平”，也赞成“二十一条”要求，这是确定无疑的。赞扬《读卖新闻》的浮田自己也说：“‘二十一条’要求谈判，解决了日俄战争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还获得了各种利权，尽管在外交程序上有了好多失策，但从国民立场来看，并不是了不起的失败。”

在同一期《太阳》杂志上，还刊登了“中国学家”内藤湖南题为《论日华交涉》一文，说“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完全失败了。他所说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蛮不讲理、残暴。他说：

“日本对华关系，目的在于什么都要求，这一点本身就是失败。”即使日本不提什么要求，“由中国来自行决定，也会成为日本的利益，并可巩固将来的团结。所有这些条件全然不顾，白白放过中国迫切希望的时机，而在中国已经摆脱了危急感之后，才提出方案。”这本来就是失败。失败的具体例证之一如下：

“在南满提出混和审判等，纯属胡来（中略），现在中国人的实际思想情况是，与其把生命财产委托给本国官宪，莫如把它委托给外国人。放弃中国政府主张的审判权，从中国人民方面说来，反倒有利。提出混和审判等，终归是不了解这种情况的

结果。”

从这段文章<sup>①</sup>即可了解，以头号“中国通”自居并著称的这位著名的“中国学家”，对中国古代的事情姑且不论，对当前汹涌澎湃兴起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丝毫也不理解，丝毫也没有共鸣之处。内藤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很好地操纵他主观臆造的“中国人的特点”，就能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他在侮辱中华民族、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上，并不比任何强硬论者差。

“民本主义”的头头、曾作为袁世凯的私人教师去过北京<sup>②</sup>、当时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头号人物吉野作造，也是“二十一条”要求的支持者。据认为在日中谈判结束后不久脱稿的《论日华交涉》<sup>③</sup>一书中，吉野指出：

“我个人的想法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在于援助中国，同中国合作，日中共同作为东亚的强国向各个方面扩张势力，以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保全中国领土，经常成为我国的议题，但绝不能瓜分中国领土。保全中国的领土，尊重中国的独立，使它充分发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能力，必须是我国日本对待中国的根本政策。”

只看这一段，的确不含糊。这是吉野所有政论文章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说的仿佛象现代“公平”的报纸评论一样，即理想是这样，而现实则是那样；这一点必须加以考虑，而那一点也不可忽略等。《论日华交涉》也是如此，当讲到抽象的理想时，确是不含糊；但一接触现实，就说：

“中国将来是否真的不辜负我国的期望成为强大的国家？这在许多研究中国问题人员之间是有争论的。有人说，中国颇

---

① 此外内藤湖南还举出一些例子。

② 1906年—1908年。

③ 单行本。

有希望：有人则认为中国没有希望。我当然不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不过，也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非常强大起来”。

这段引文是吉野文章和议论的典型。他接着又说：

在中国尚未强大的时候，列强拼命扩张势力，或许中国已经处于不能独立自主的状态。因此，在研究“中国的将来”时，“既要考虑中国本身的发展进步”，“也不可忽略欧美各国在中国扶植势力。我们的理想是，期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面对当前各国各自竞相在中国内部扶植势力的现实情况，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换言之，我国对待中国的理想政策，不得不由于列强在中国竞争这一现实，多少受到一些影响”。<sup>①</sup>

如果照抄吉野这种论调的文章，未免太占篇幅，这里干脆援引吉野在《论日华交涉》一文中对“二十一条”要求的评价。他说：

“总之，我认为，这次对华提出的要求，表面看来，固然不无侵犯中国主权，或使中国丢脸之处。但从帝国立场来看，大体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抓住了同中国谈判的适当时机：即使再从同西方各国的关系来看，也可谓选择了颇为适当的时机；从帝国将来对中国采取的步骤来看，相信它是极其适合机宜的措施。”<sup>②</sup>

即便对于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的第五号要求，吉野也说：

“我认为，这次所提的要求，基本上是最起码的要求，是日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取消第五号要求，实在令人遗憾。（中略）若因担心英国，而对第五号要求作出让步，则大错而特错了。更何况如果象社会上传说那样，只因生怕加上第五号要求中国

<sup>①</sup> 吉野作造：《对华政策的理想》，见《论日华邦交》，收在《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

<sup>②</sup> 引自松尾厚允编，《论中国、朝鲜——吉野作造》（1970年）一书中抄录的《论日华交涉》第3章第3节“帝国对待中国之实际态度”。下面的引文亦同。

决不会同意,始终一心要和平解决日华两国间的问题,勉强取消了第五号要求,这岂不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吗?”

由此看来,吉野比主张取消第五号要求的日本元老山县有朋更富于侵略性和帝国主义性。他一方面这么说,而在结尾部分却说:“日本帝国的理想政策,在于始终援助中国,做中国的后盾,谋求中国完整而健全的发展。现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时会引起他们反感,其实这是迫于列强在中国角逐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决不是日本的本意”,日本国民“应深深印入各自脑际,对于中国的事物,将来应寄于深切的同情和尊敬”,“这就是我深望于国民的”。

吉野这样写,他心里可能真的这么想,不是在说谎。尽管是这样,这种说法该有多么自私、多么富于欺骗性、多么卑鄙啊!难道还有比这更巧妙的为“二十一条”要求作辩护的吗?

当时的舆论界,除了后面提到的《东洋经济新报》以外,根本没有否定“二十一条”要求的。《日本及日本人》等刊物,虽然嘲笑日本政府外交手腕如何拙劣,但对于“二十一条”要求本身却是十分赞成的。拥护“二十一条”的热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只有一次例外。在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前,1914年11月和12月号《中央公论》的社论认为,无论从道义观点还是从利害关系来考虑,都不应该占领青岛和山东铁路,主张应“在一定条件或保证之下”,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此向中国表明,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不过,《中央公论》的这种主张,只是帝国主义气味少了一点而已。

它所说的“条件或保证”是以下三条:第一,把青岛划为开放贸易市场,创建“可保障其将来繁荣的组织”,“为此,中国政府须采纳日英政府的建议”;第二,把山东铁路定为中国所有,但日本以资方身分参加经营;第三,将来中国一旦无力保全领土,而任凭外国宰割时,日本为了“自卫,将采取必要行动”。这是舍占领之名求占领

之实的作法。即使仅仅是舍名，也不能不说它对“二十一条”要求的想法比起吉野的观点来，帝国主义气味要少一些。

不过，“二十一条”要求正式提出以后，这个《中央公论》再也没发表过反对的意见。1915年（大正四年）6月，《中央公论》刊登了吉野的《严正批判对华外交》一文，其观点当然是和这一时期他写的上述《论日华交涉》完全相同的。

### 三、唯一的彻底反对论

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利权，甚至主张放弃“满洲”的既得权益的《东洋经济新报》，当然反对“二十一条”要求。1914年<sup>①</sup>2月5日，该杂志发表了《莫做俄德第二》的社论，首次评论了“二十一条”谈判。社论说：“大隈内阁就根本解决‘满洲’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政府之本意”在于“将‘满洲’也和朝鲜一样吞并为我国领土”。这是《东洋经济新报》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这样干，必将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并同欧美列强对立起来，结果孤立于世界，就象过去俄国失去“满洲”、现在德国失去青岛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也会丧失一切。“要毫无领土野心，以与资本家投资事业全然相同的精神，努力开发中国”。这就是《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

当日华谈判迟迟不见进展，中国排日情绪高涨，其他报刊大肆叫嚣“中国没有诚意”、“没有信用”时，《东洋经济新报》却认为中国排日是对日本的“蛮横的报复”，指出，日本“对中国新闻界横加干涉”，要求取缔排日，而对美国的排日舆论却不吭一声。“日本国民欺软怕硬的根性”着实可怜。主张若想取得中国的好感，“首先要尊敬中国”。<sup>②</sup>当舆论界谴责日本政府“外交失败”，《东洋经济新

<sup>①</sup> 1914年疑为1915年之误。——译者

<sup>②</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3月15日“小评论”。



报》也加以谴责,但是它说:“然而,并不象社会上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采取强硬态度造成了失败,恰恰相反,强硬地‘赤膊上阵’才造成了外交上的失败”,要纠正“轻兵之弊”。<sup>①</sup>

当日中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5月5日,《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贻下祸根的外交政策》,全面地反对日本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和要求。社论说:

“看到我政府当局和国民对待外交的态度和行动,我们不胜忧虑。其一,断然实行露骨的侵略领土政策;其二,轻率的举国一致论。此二者将导致全世界与我日本为敌,可谓结果必将给国帝贻下百年祸根”。

这次的对华交涉是,看穿了英美德俄法等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形势之后,“我国企图从中国攫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掠夺物,才向中国提出来的。可谓阎王不在小鬼偷油”。为此便“发动各界舆论恫吓中国,还在守备队换防的名义下,实际增派几个师团的兵力,悍然采取威胁中国的高压手段”。还恫吓说,如果中国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日本全体国民便认为中国没有诚意,要采取最后手段。这种恫吓恐怕只能在日本人中间行得通,而在世界大多数公平的旁观者看来,反而肯定加深了日本是否具有诚意的怀疑”。

现在来读这篇文章,谁都会认为它讲的是至属当然的道理,但在当时,在“轻率的举国一致”的热潮中,发表这样至属当然的正确言论,需要具有何等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啊!

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因为日本政府没有公布出来,《东洋经济新报》只好根据日本其他报刊以及中国方面英文报刊的报道来进行推测,似乎完全不晓得有关山东半岛的各条要求(第二号)。《东洋经济新报》推测日本要求的主要内容是:(1),把“南满”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4月5日“小评论”。

的占领问题落实下来,并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向“蒙古”和中国其他领土进行扩张和发展;(2)，“进一步明确落实日本帝国在台湾对岸福建省的势力”;(3)，“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日本国民在整个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利益”。《东洋经济新报》的这种推测当然并不正确。“二十一条”要求里并没有日本企图独占福建省铁路、矿山利权的要求。但是,《东洋经济新报》指出,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是为了日本一手承担保全中国这个大业奠定基础。”这种说法,却完全正确。

中国竭尽全力抵抗日本这一“主要意图”是理所当然的,而对此进行高压和恫吓,扬言“诸如中国的独立和中国人的希望等,根本无需放在眼里,摧毁了蹂躏了也无妨”。《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对于“日本朝野的举国一致论”的这种说法,“不禁不胜汗颜,至今心里难过”。中国果真屈服于日本的威胁,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会如何呢?只因当时在大战中,欧美才任凭日本为所欲为,到了战后,必然会给以反击。

“到了那时,决不会仅仅丧失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权益和通过这次对华谈判得到的权益就算了事。恐怕从明治二十七、八年战争(甲午战争)积累下来的所有掠夺物,全被剥夺,弄得鸡飞蛋打。这是我们所以认为此次对华外交会给帝国贻下百年祸根而忧虑不置的。这个大祸根,固然是远自甲午战争、尤其日俄战争以来既已明显化的日本领土侵略主义种下的,但把它推向上述那样可怕的危险境地的,实际是日本全体国民的糊涂观念造成的结果,而其直接的责任,不能不说在于身居领导国民地位的现内阁诸公,尤其是大隈首相和加藤外相的失策”。

当日中谈判结束、政府公布了其大致经过时,《东洋经济新报》

发表社论,评论了《日华新条约的价值如何?》<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首先评论说,“幸亏新条约里取消了我国提出的所谓‘第五号希望条件’”,第五号要求“共列七款条件,对于独立国家——中国来说,断难接受”。试把该报的这种论点同前述吉野作造和《大阪朝日新闻》的观点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东洋经济新报》的精神更加明显。《东洋经济新报》还说:“这些要求,由日本方面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条约提出来,实在无聊得很。……要实事求是”。乍一看来,似乎和内藤湖南的说法相仿,但是,《东洋经济新报》是说,无需要求让日本人去充当中国顾问,如果有中国想聘请去当顾问的日本人,自然会实现的。这和内藤湖南的“中国人操纵论”,本质上截然不同。

然后,《东洋经济新报》就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攫取“满洲”铁路利权等问题评论说:“乍一看来,这些要求似乎并非没有道理,一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但依我们看来,其中令人遗憾之处甚多”。其理由是《东洋经济新报》一贯坚持的“利权无益有害论”。

“当前,旅顺对我国来说完全没有用处,即使大连、南满铁路、安奉铁路长期由我国来控制也没有益处。尽快把它归还给中国,则我国受益只能增加,无需担忧减少,而且,我方放弃该地之后,会减轻多少负担。……总之,我们认为,通过新条约进一步向中国大陆扩张帝国主义的作法,极为不利”。我国国民嫉妒其他国家在中国攫取利权,企图妨碍它们,由日本来独占,自己本来没有开发资金,却偏攫取了铁路和矿山的利权。其实,“这对我国国民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因为邻邦中国赶快富强起来,是促进我国富强的原因。而这一原因却被这次缔结的新条约给断送了。即它成了妨碍我国富强的阻力。我们通过如此观察,断定这次日华谈判终归是一次彻底的大失败”。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6月15日社论。

总之,对于参战问题也好,南洋和青岛的占领问题也好,“二十一条”要求谈判自始至终也好,《东洋经济新报》始终坚定地贯彻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坚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中国的一贯主张。我曾在拙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sup>①</sup>中写过,对于“二十一条”要求的问题,连反对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洋经济新报》也“没提出原则性的反对”,那是由于对《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只凭讽刺日本政府的“小评论”而轻率论断的,是个莫大的错误。

堀川武夫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说》(1958年)一书,是研究“二十一条”谈判的专著。该书第二章第一节有如下的论述:

“尽管《东洋经济新报》谴责‘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的‘侵略主义外交’,但它却指出日华外交的问题无他,只能是确保南满、侵略蒙古和扶植福建省的日本势力”(第66页)。

这份资料的注释举出了前面我引用过的《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5月5日社论《贻下祸根的外交政策》。不过,这篇社论并没指出“日华外交的问题无他,只能是确保南满、侵略蒙古……”,而是举出日本政府这次对中国提出要求的三项纲要中的两项,与堀川说的完全不同。堀川把谴责日本侵略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等同起来,仿佛《东洋经济新报》也在强调“确保在华权益”的重要性。他所以这样写,可能是因为堀川本身也认为“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无可奈何提出来的,并力图说明任何反对侵略的派别都未曾加以反对。

---

<sup>①</sup> 岩波,《日本历史丛书》1968年。

### 第三节 大战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

#### 一、对内——民本主义，对中国——帝国主义

《大阪朝日新闻》在评论“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业已结束的社论中，提出了对华问题尚未结束，今后不能让步等论点（前引），以这篇社论为代表，日华谈判结束后，日本舆论界的侵华热潮并未平息下来。中国人民则把被迫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5月9日规定为“国耻纪念日”。这表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抵抗运动日趋深入和广泛。在日本看来，中国的“排日”运动，或者会变成公开的行动，或者即使不表现在行动上，中国人民内心的抗日情绪也会增强起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谴责中国“没有诚意”的声浪也就不断高涨。

例如1915年6月25日的《大阪朝日新闻》社论声称：“除采取高压手段以外别无他法。”8月28日，论述了“日华亲善的根本主义”，指出，总之，中国应该无条件地“信赖”日本，中国应该明白，没有日本也就没有“中国的领土保全”。

这年10月至第二年初，中国国内围绕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群情骚然。于是日本政府便伙同英俄两国政府劝告袁世凯延缓复辟帝制（10月28日）。袁世凯在11月曾一度接受了这一劝告，但在转年1916年1月1日却宣布了帝制。对此，日本等国均施加压力，3月22日，袁世凯又取消了帝制。中国各地的军阀纷纷起兵反袁。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建立一个排除袁世凯的新政权，参谋本部秘密策划了“满蒙独立”的阴谋。以这种形势为背景，《大阪朝日新闻》等报刊对袁世凯政权的谩骂越来越激烈。他们不仅批判袁世凯的对日政策，还逐一攻击其内政方面的各种政策。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攻击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以为是出自真诚的

劝告。

1916年6月,野心家袁世凯暴病而死,之后,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下,成立了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政府。在日本,1916年10月,大隈内阁垮台,组成寺内内阁。为了怀柔段祺瑞政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收买工作(提供西原借款)。《大阪朝日新闻》不断地猛烈攻击寺内内阁是军阀政府,是“非立宪”内阁。《大阪朝日新闻》在日本内政方面的民本主义主张,可以说在日本新闻界是首屈一指的。不过,一旦涉及到中国问题,便仍旧坚持它一贯主张的强硬论,鼓吹露骨的帝国主义。

例如:1917年4月5日,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一出现,《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是由于寺内内阁在利诱中国段祺瑞政权,便猛烈攻击寺内本人及其内阁,并同样地痛斥段祺瑞和寺内是一路货色,都是军阀,谩骂其政权也和寺内内阁一样,是非立宪的、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政权。

1917年11月7日,公布了日美签订《石井—蓝辛》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消息。《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个协定“并未谈到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互相冲突的根本原因,仅仅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地理关系,而对于堪称其实质内容的政治及通商方面的权益,却丝毫没有承认日本的优越地位”。而且对于协定中规定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表示强烈反对。还说,“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关系,远在美国以上,并远超过通商关系,而是关系到国家的生存问题,因而理应承认日本的自由行动”。可是,日美协定却规定“对于违犯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行为,日美两国政府坚决反对”。这是日本“做茧自缚,只有寺内内阁才会干出这种蠢事”。<sup>①</sup>

这是把反对寺内内阁同“二十一条”要求中关于“日本独占中

<sup>①</sup> 《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大正六年)11月6日《日美协定之发表》。

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对内民本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过,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而是专对付中国的。由于深知自己实力薄弱,企图回避同欧美列强的角逐,看来象是和平主义;在国内攻击军阀,反对扩充军备,看来象是反对军国主义。但一看它对中国的态度,它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本质就昭然若揭了。由于考虑到高压软弱的中国无需动用大军,所以一贯的反对扩充军备和一贯的对中国高压主张,两者就能并行不悖。《大阪朝日新闻》的这种态度,直到1918年基本上还没改变。只是缓和了对中国段祺瑞政权的直接谴责,重点攻击援助段政权的寺内内阁,并支持与中国段政权对立的所谓南方派、孙中山的国民党。在1918年8月席卷日本全国的米骚动中,《大阪朝日新闻》旗帜鲜明地站在民众一边进行报道和评论,对于这年8月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也采取了相当的批判态度,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却以独特的笔法,为反对段政权、支持南方派的干涉主义进行辩护。3月21日和22日两天的社论《不干涉内政主义的动摇》,就是这种辩护的理论。

“一国迫使他国改革内政,或就他国元首的选任以及政府的机构等提出要求等做法,均属不当,即所谓不干涉内政主义,现在在国际法及国际道义上公认具有充分权威的法则”。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国家集团主义,即在以国家为单位的集团共同扶助之下来进行国际生活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绝对不准一个国家以超级的权威干涉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又让单位国家担负为世界人类共同目标而协力的义务。因此,在前者意义上固然否定了干涉内政,而在后者意义上并不否定干涉内政。(中略)

在对华政策方面,我们历来所主张的,实际上无非是提倡根据这一近代倾向来决定我国的态度。我国官僚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昔日神圣同盟精神的干涉,其所谓的不干涉主义,其实是政

策上企图压迫中华民族自决主义的消极干涉，不在某种情况下，是露骨的积极干涉”。

口称反对寺内内阁“神圣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以“国家集团主义”支持“中华民族自决主义”的“干涉”，真是娓娓动听。《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果真支持过中国“民族自决”的反帝斗争吗？根本一丝一毫也没支持过。它固然反对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但对“二十一条”要求，无论在谈判期间、当时还是以后，一次也未反对过，岂但如此，对于中华民族的“排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却针锋相对。不反对本国日本的帝国主义，又不支持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而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具体做法——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支持中国的反段派，不管它冠以什么“国家集团主义”的美名，也无非是主张一种不同于寺内做法的帝国主义。《大阪朝日新闻》所主张的新式帝国主义，在4月15日的社论《日华经济合作的意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篇社论说，所谓日华亲善或合作，不要理解为日华“同文同种”、“唇齿相依”那种习惯说法的程度；也不能说，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缺乏开发资源的资本和人才，而日本资源匮乏却具有资本和人才，所以日华合作以取长补短。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说呢？

战后的世界，恐怕要改变过去那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体制”，“要出现通过以国家及工人为本位的经济体制来进行国际经济竞争之倾向”。届时，日华两国的命运将会如何？现在，日本侨民和中国侨民均遭到白人排斥，而且与其说受到白人资本家的排斥，倒不如说受到白人工人的排斥。“当想到将来会以这些工人为本位、或者保护这些工人的国家必将在欧美各国出现时，我们一想到日华两国人民的命运，不禁不寒而栗。这样想来，日华经济合作的意义，就越发明确了。即不仅为了中国，也不仅为了日本，实则关系到日华两国存亡的问题。日华两



国当政者若想到这里,就应该抛开眼前接二连三的琐事,为了谋求中国真正强盛起来,和日本合作,制定顺应将来形势的大策”。

这是所谓黄种人团结起来对抗白种人的“亚细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最新版。欧美固然也在压迫和剥削中国,然而,当前最露骨、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的难道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吗?日华之间的“眼前接二连三的琐事”看来象区区的小事,但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事。抛开日华之间的这种原则性对立,侈谈什么对抗白种工人国家,建立永久性的“日华经济合作”等,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再方便没有了。

刊登这类社论的《大阪朝日新闻》的编辑局确有一些当时进步的评论家。例如编辑局长鸟居素川;主要编辑干部有长谷川如是闲、花田大五郎、大山郁夫、丸山干治等。《大阪朝日新闻》在8月25日刊登的一则消息中,报道了当时与米骚动有关联的、攻击寺内内阁的关西记者大会,其中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典故“白虹贯日”,说是暗示了革命暴动,因此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和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闹得村山社长终于同年10月辞职了,与此同时,鸟居局长及上述主要编辑干部也一起退出报社。其中大部分人又在转年即1919年以长谷川如是闲为中心创办了《我等》评论杂志<sup>①</sup>。

据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长谷川撰写的《从“大阪朝日”到“我等”》一文说:现在“利用这一小小刊物,继续宣传我们过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所鼓吹的主义和主张”。

过去,“我们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在内政方面,一贯极力主张立宪主义和社会政策;在外交方面,则站在尊重他国人民自主的立场,有时竟被所谓实际主义者说成是愚蠢的。”

“我们的对华政策,主张彻底抛弃私心。……所谓恣逞私心,用老话说来就是玩弄权谋术数,搞威压征服、利己主义政策等等

<sup>①</sup> 《我等》创刊号在1919年2月11日出版。

……。如果抛弃私心，就无所谓南方（指中国的南方派、孙中山等人）与北方，支持“公正”一方。我们好象在支持南方，这是因为南方比较‘公正’的缘故”。

由此看来，他们在《大阪朝日新闻》社论上拼命鼓吹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想必也确信是“尊重他国人民自主的立场”了。在鼓吹“国家集团主义”的他们在主观上很可能是这样确信的。果真如此，那么，就连当时最有教养、具有民主思想的记者集团，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尽管站在极端的帝国主义立场上，竟然在主观上没意识到这是帝国主义，确信是友好行动，这就不能不说他们早已沉浸在帝国主义意识中了。正好象封建时代武士压迫百姓市民，确信并不是压迫而是保护一样。

实际是，由《大阪朝日新闻》被排挤出来的民本主义者创办的《我等》杂志的对华主张，和把他们排挤出去以后由保守派统治的《大阪朝日新闻》基本上并无二致。最明显的例子可以从它们对于北京大学学生反对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于1919年5月4日毅然决然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所发表的评论中可以看得到。

《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是《绝不能让步——山东问题与日本》<sup>①</sup>。顾名思义，即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这是通过战争从德国手里夺过来的果实，因此完全理所当然，无论中国讲什么道理，也不管美国如何支持中国，日本也“绝不能让步”。接着在5月4日的社论《解决山东问题》中，热烈祝贺日本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取得胜利，说：“这不能看成是由于国力的强弱所带来的胜负，而只是根据正当协定<sup>②</sup>规定的权利取得的胜利。”当然，实际是

① 1919年（大正八年）5月1日。

② 指“二十一条”要求。

根据大战中的密约<sup>①</sup>，受到英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制服了中国。对于在发表这篇社论的同一天爆发的北京五四运动，《大阪朝日新闻》根本没有一篇象样的报道，社论中也没把它当作一回事。看来该报根本不了解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重要性。

《我等》的态度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该杂志于1919年5月15日刊登在卷首的无署名论文《青岛问题与北京暴动》，这是《我等》杂志论述五四运动问题的唯一的文章。

“对于国家外交谈判的经过，举行群众性示威运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若是竟演成了烧毁房屋或者袭击人身等流血事件，那就已经丧失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只能是一时激起的暴行。此种激发性的狂暴行径，在文明程度低的国家里，往往在其政治中心——首都，以外交问题的失败为动机，容易发动起来。

归还青岛问题，是根据1915年日华条约<sup>②</sup>两国间商定的既定事项，与其说它是在巴黎和会上按照我方提案通过的，莫如说它不过是按照日华两国四年前的协定，得到了英法美意等国的承认而已。（中略）

本来，在巴黎和会之初，中国使节心想侥幸于万一，在青岛及其他问题上，曾经企图背叛邻邦<sup>③</sup>的友谊，是罪恶的开端。这次北京学生闹事，归根结底，可以说是由于陆征祥等人推行的心存侥幸的外交政策造成的”。

赶走“进步派”的《大阪朝日新闻》和被赶走的“进步派”《我等》

---

① 1917年初，为了摧毁德国潜水艇的破坏通商战，英法要求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作为同意这一要求的补偿，日本政府要求英法保证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省德国利权以及日本占领的南洋德属诸岛的各种要求，英法同意了这个要求。

② 指“二十一条”要求。

③ 指日本。

的论调,文体虽然不同,但其想法和内容岂不是一模一样。

吉野作造在“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希望,这表明他的见解比《大阪朝日新闻》和《我等》略高一筹。他在论文《论北京大学生骚扰事件》<sup>①</sup>的开头写道:“无论怎说,这个事件带有排日色彩,使我们深感遗憾”。可是后来他又说,这个运动是中国“有为的青年觉醒的结果”,是自发的运动,对“五四运动”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这点和上述报刊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这次运动的政治意义,吉野认为,它“并不完全是单纯的排日运动,他们主要是要铲除内部祸根”。吉野只肯定了“五四运动”攻击中国国内的“官僚军阀”,而对其“排日”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深感遗憾”,这一点和上述报刊的观点是一样的。

在7月号的《中央公论》的社论上,吉野又发表了批判日本各界的“狂乱的膺惩中国论”说:“虽说如此,对中国人的暴行,要采取自卫方策,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坚决努力维护我国的正当利权,自不待言”。他可能仍然在说“‘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中的山东条款都是日本的正当利权”。吉野对于“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的目标在于废除“二十一条”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的条款,一次也没有表示过赞成。

## 二、真正的“日华亲善”论

试把吉野作造、《我等》及其同伙《大阪朝日新闻》时代的中国政策主张,同黑龙会和德富苏峰<sup>②</sup>等人的观点比较一下,觉得似乎

<sup>①</sup> 《中央公论》1919年(大正八年)7月。引自松尾尊允编的《论中国、朝鲜——吉野作造》。下面的吉野论文亦同。

<sup>②</sup> 德富苏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头号思想家,自不待言。他于1913年秋和1916年春,分别发表了《时务一家言》和《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等文章,连载于自己创办的报刊《国民新闻》上,后来又改为单行本发行。这两本书成为当时特别畅销的政论书。他的立场是“对内推行平民主义,对外推行帝国主义,而且用皇室中心主义将两者融成一体。”(《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序言)。

都是非帝国主义的。但是，如果同《东洋经济新报》的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论点对照一下，便立即看出，民本主义者却是非常帝国主义的。下面介绍一下《东洋经济新报》的主张。

《东洋经济新报》1916年6月25日的社论《论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首先发问：过去占我国对华外交主导地位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或曰保全中国，提倡日华亲善；或曰扩张我国利权，甚至主张瓜分中国”，哪个是我国国民的真意呢？然后回答说：“所谓我国国民对中国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我国的保护国，或者至少把它摆在同保护国一样的地位，这就是我国国民的真意”。

“简单说来，我国国民认为，没有独立能力的中国，所以得以保全了领土，主要是托日本之福”。日本不仅是远东，而且是世界上的大陆海军国家。因此，“如果中国抛开日本，不知中国将会陷于何等困境。如果诚恳信赖日本，中国领土就会真正得到保全。所以，中国应该比任何国家都更紧密地同日本结合起来，依靠日本，方为有利。这就是我国国民保全中国论和亲善论的出发点。

那么，同日本紧密地结合起来、信赖日本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一切重要问题，在实行之前均须事先同日本商量，征得日本同意。这是表示信赖实质的办法。就是说，引进外资时也要同日本商量，聘用外国人时也要同日本商量，增建师团、修筑炮台、建造军舰等时都要同日本商量，然后再决定再实行。可见名目是保全中国，实际等于把中国变成了保护国。看来这实际上是我国的保全中国论和日华亲善论不折不扣的内容和结论”。

尽管日本很想这样做，可是中国当然不会马上就听从日本的意愿。于是就进行恫吓说：“中国当局顽梗不化”、“没有诚

意”。这么一来,中国就越发对日本怀抱反感。日本应该赶紧放弃这种过去的方针,重新做起。中国从未拖欠对日本的债务,也几乎没有危害过日本人的的人身安全。“若说多少有过一些,大都是在可宽恕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我国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尤其从日俄战争以来,根本瞧不起中国,我们的对华外交,只顾我国的利益(其实是愚昧狭隘的见解),无视中国的利益,为了强行推销毫无道理的亲善论,滥用威胁手段<sup>①</sup>,终于陷入今天的僵局”。如果还要继续强制推行这个方针,最后只好诉诸武力,在中国炮制傀儡政权。不过,这在现代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大,列强各国也不会允许这么干。

这种观点完全正确,无须赘述。特别是它还指出,中国以往对日本没做过任何坏事,而日本却一味地侮辱和侵略中国。这种指摘,不仅在当时没有先例,就是现在也应该重新想一想。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归结到《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还是从正面坚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除此别无他途”<sup>②</sup>。由这一政策获得利益的,“按顺序说,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日本,欧美各国则为第三、第四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理论大家都熟悉,这里用不着说。再者,这种说法客观上也含有帝国主义的因素,这在本章第一节第二个问题中业已阐明。不过,这篇社论在《东洋经济新报》过去一贯主张的反对侵略、反对利权的观点以外,又加上了一些微妙的补充。

它主张,日本在坚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同时,还要“当列强中任何一国即使略微在中国采取了同该原则不相容的态度或行动时,要竭尽全力予以抵制。而且,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情况,日本要进行监视”。

---

① 指陆海军。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6年(大正五年)7月5日,《再论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

所谓“日本监督列强,使其遵守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竞争的一种和平形式吗?按纯理论讲来,如果有哪个国家始终不遵守这个原则时,为了迫使它遵守,就要诉诸武力,也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来看,只要日本坚决遵守这两个原则的话,那么,几乎不会有其他国家敢于出来瓜分中国的可能性。所以,即使说“监视”,提法不太稳妥,记者的本意并不是让帝国主义潜在下去。只是该报记者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对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寄托希望。《东洋经济新报》想到的是由日本来进行“监视”,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保全中国”的思想影响。

虽然《东洋经济新报》错误地认为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各项政策,事无巨细一律反对,始终坚持谋求真正的“日华亲善”。

例如“小评论”的《日本人的对华经营》<sup>①</sup>一文指出:“我国人的所谓对华经营的意思就是从中国人手中掠夺一些利权。例如,矿山开采权、铁路铺设权……,再不就是只看到在华日侨或我国人的对华活动,而不顾及其他的一些设施。换言之,只看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对此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还说,自从攻陷青岛以来,日本政府在考虑设立“满蒙银行、日华银行”,它必须是“以中国人为对象的银行”,为促进“中国产业”发展的银行。

此类“小评论”还有好多,因论点相同在此从略。另外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东洋经济新报》估计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会走向新的发展而阐述的《去年中国的财政状况》<sup>②</sup>及其他评论和报道,都和《东洋经济新报》真诚的“日华亲善论”有密切关系。此外,在1917年5月5日的“小评论”《中国提高关税问题》中,就中国向各国提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11月15日。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15年(大正四年)3月5日。

出提高进口关税、引起日本财界的反对，并组织了“反对中国提高关税关西联合大会”评论说：“对于我国对华贸易业者深表同情”，不过，“纵令我国工商业因此而全部倒闭，也没有理由反对别的国家提高关税”，这种斩钉截铁的说法，明确表示了《东洋经济新报》真正尊重中国主权的立场。这篇“小评论”接着说：

日本对中国“只能尽量恳求或为互利进行协商。前几天，我工商业者不是确也向英国提出恳求，进行协商了吗。……这时，我们并未听到我国针织品业者组织过什么反对英国禁止进口针织品的大会。然而，对于中国却大肆‘反对’，令人百思莫解。这种态度，我们首先感到不快。诸位可以设想，堪称‘我国制品的最大顾客’的‘四亿中国民众’一定会更加感到不快吧”。

《东洋经济新报》把中国看作和英国一样的主权国家加以尊重，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日华亲善”。

对于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东洋经济新报》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曾经强烈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的《东洋经济新报》，临到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企图造成占领青岛的既成事实时，却一言不发。对于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东洋经济新报》只在“财界要报”的消息栏中，从对华贸易影响的观点，作了简单的报道。由此看来，《东洋经济新报》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的主张似乎是虎头蛇尾的了。实际并非如此，《东洋经济新报》一贯反对日本占领青岛，这一点留待下一节叙述。关于这一时期《东洋经济新报》在批判帝国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彻底性，试看该报主编三浦铁太郎关于台湾和朝鲜的论述，便可清楚了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洋经济新报》于1913年1月业已刊登了署名三浦铁太郎的论文《放弃满洲乎，扩张军备乎》一文，主张放弃“满洲”。在大战期间，该杂志从1916年7月到10月连载了题为《陷入僵局的台湾及打开局面的方策》的文章，署名也是三



浦铁太郎。文章认为,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无论在经济上也好,政治上也好,都已完全陷入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岛人民的民族抵抗斗争已经势不可挡,压制不了。因此三浦得出结论说,对于台湾的统治,“要改变以住台日侨为核心的方针,须以台湾本岛人为主。换言之,即废除台湾总督府官制政治,允许台湾自治”。

1919年5月15日,《东洋经济新报》还就朝鲜三月民族独立起义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朝鲜民族直到取得独立自主以前,决不会停止对日本的反抗,民族独立的要求,是任何“善政”也压制不了的,日、朝之间“避免无谓牺牲的方法”,只有让朝鲜人“成为自治的民族”。文章所说的“自治”,显然是指“独立”。

此外,对于1917年11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东洋经济新报》也表示有一定的理解,自始至终坚决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反对武装干涉俄国革命,主张承认“工农苏维埃政权”。

## 第四节 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顶峰

### 一、巴黎和会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倾注全力的战争,所以,开战后不久,舆论界就有充裕时间议论起战后世界的前景。其中大多数人<sup>①</sup>估计,战后和平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大阪朝日新闻》1915年9月18日至25日,连续发表了《论世界和平与日本国防》等八篇社论,估计战后世界会转为和平主义,主张推迟海军当局提出的“八四”舰队的造舰计划。许多民本主义者的观点也和这篇社论相同,作为反对扩军备战的论据,主张战后会转向和平

---

<sup>①</sup> 据后述三浦铁太郎的论文说,似乎社会上曾出现过“战后国家间的对立将比过去更加激化”的说法,但我尚未见过这类看法的论文。陆海军当局等扩军论者可能会有这类的观点。

主义。

多年来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特别热情地论述了战后世界的前景以及日本应该采取的姿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还不到半年的1915年1月15日，《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了以主编三浦铁太郎署名的文章《战后的欧洲》，共连载十一期，其要点如下：

所谓战争，有(1)：“国民生存上绝对必要的”和(2)：“危害国民生存的”两类。第一类，例如日俄战争时的日本；第二类，例如日俄战争时的俄国。然而，任何战争之后，为战争献出生命财产的人民一定要考虑：什么是为了国家？自己和国家是什么关系？从而产生把国家作为维护自己的机关的要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民众力量的显著增强和俄国的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战争“无论需要或无需，都将伴随政治上的革命”。“其革命的方向，必将朝着建立一个国民各自的意见在政治上比过去更加受到尊重”的组织前进，这是不待言的。

现在的欧洲战争，不论英德哪方胜利，都不能毁灭对方的经济；即使扩张领土，也不会带来经济利益；即使要求赔款，由于现代世界各国金融处于相互紧密依存关系，也不会要到手。若是由于赔款致使战败国的经济崩溃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战胜国，致使它的经济陷于危殆。这样一来，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民众都会要求补偿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深重灾难。结果，将会按照“限制军备”和“改变财产制度”的方向，走向“社会组织的改革”。于是，“战后，民众的力量将会出人意料地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增强起来，这就早晚难免发生政治的、社会的革命”。

战后的欧洲，再也不能由“帝国主义(掠夺成性、盗窃成性)”来领导。将由“非帝国主义的、反对秘密专制外交的外交”来领导。具体地讲，必将向下述方向迈出新的一步，即第一，裁减军

备；第二，“公开外交机密。就象国内租税及其他财政问题交由国民公开讨论决定那样，外交问题也要交给国民公开讨论；在国际方面，组织一个以各国为会员的最高团体，两国之间不可解决的争端，均交由这个最高团体开会讨论决定”。

三浦的上述论断未免有些粗糙，还有明显的错误，与其说是论证，莫如说是作者的信念以至对将来所抱主观愿望的写照，但是也有超出时流的远见卓识。对该文的分析和批评不是本文的主题。不拘怎样，三浦就是这样设想战后世界的，而且这是贯穿《东洋经济新报》、包括无署名的文章在内的一贯的观点。该杂志同年7月25日的社论《战争的结局与世界的国际关系》还指出，欧洲在这次大战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祸，战后必将广泛掀起争取持久和平的运动。无论大战于何时、以何种形式结束，防止未来战争的计划，必将作为媾和条件之一提出讨论。日本应该促进这种形势的发展，“不要固守旧式外交，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抛在后面”。

《东洋经济新报》如此展望将来，表现了主观愿望，一方面刊登了署名石桥湛山的论文《世界和平同盟之我见》<sup>①</sup>和英国费边协会的《和平同盟协约草案》翻译全文<sup>②</sup>；另一方面还发表了《战后经营要点》<sup>③</sup>和《如何准备和平战争？》<sup>④</sup>等有关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社论。

《战后经营要点》为使日本经济赶快达到欧美水平，提出五大政策。第一，拯救资本匮乏的局面。为此，“新领土<sup>⑤</sup>的财政，要根据完全独立经营的方针，改变目前粗暴的对外领土扩张主义”政策，“否定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本年度岁出军费预算和

① 1915年(大正四年)9月5日至10月15日。

② 1917年(大正六年)6月15日至8月15日。

③ 1915年(大正四年)4月5日。

④ 1916年(大正五年)9月25日至10月5日。

⑤ 新领土：指日本的殖民地。

新领土补充费预算总计二亿日元的一半、至少四分之一；还可以减少公债偿还基金，减免盐税、纺织品消费税、营业税、通行税等苛捐杂税，增加民间的资本积累。第二，扩大市场。为此要建设铁路网，其财源可以通过实行第一条政策取得。“铁路比军舰更需要”。第三，废除贸易保护政策。这也是《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第四，改善职工待遇，提高职工业务水平，增强职工体质；实行各种社会政策，缩短劳动时间。第五，为了改革和钻研生产技术，兴办各种公、私立研究机构。

对于日本一般的产业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他们既没有通过军工产业和殖民地事业受到政府的保护，也没有公债，而且强烈要求减免营业税等苛捐杂税——说来，再也没有比这五大政策更可心的了。不过，第四项政策，大概他们不会赞成的。

《东洋经济新报》所谓的“准备和平战争”，是指“人类的产业革命”，即“变革社会组织，在生产方面高度发挥人的能力，在消费方面高度发挥产品价值。”具体地讲，第一，实行人人收入平等的最低工资制；第二，限制劳动时间的上限标准；第三，完善卫生保健设施（包括上下水道的完备以及贫困者的公费医疗制度）；第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包括对贫困者实行公费教育）；第五，建立和健全失业、养老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用现代话说来，就是施行彻底的社会保障。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主张，可能是从英国费边协会那里学来的。

1918年11月，长期的世界大战出人意料地停了，接着召开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打着保障世界和平的招牌，把建立国际联盟作为重要课题提了出来。《东洋经济新报》认为果如所料，表示热烈欢迎，对它寄托了过大期望，说来也就是幻想<sup>①</sup>。一看1919年6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以后，发现国际联盟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2月5日社论：《国际联盟的中心事业》。

那种强有力的保障和平的机构，但《东洋经济新报》对于虽说是抽象的、但把裁军规定为各国的义务一点抱有很大期待。

同时，《东洋经济新报》对于对德和平条款“极为严峻苛刻”大失所望。该杂志严正指出，削减德国本土；剥夺其海外全部殖民地；只迫使德国在其原势力范围实行民族自决；对协约国殖民地却佯装不知；只迫使德国严格执行军备限制；使德国单方承担战争责任；对德国课以根本无力偿还的巨额赔款；并对德国产业加以限制等，“极其偏颇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对英、法、美等国的民主主义一贯尊敬和钦佩的《东洋经济新报》，虽然还没有丢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但也逐渐觉察到了其帝国主义的残酷本质。<sup>①</sup>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最关心的问题是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对此，《东洋经济新报》未有提到，对中华民族的“五四运动”也几乎不大关心，这些前面已经述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反对扩张领土和获得利权的一贯主张。关于山东利权问题，《东洋经济新报》企图通过当时美国政府提议的美日英法四国对华共同贷款团来加以解决。

例如，《东洋经济新报》在6月5日发表的社论《新贷款团与我国的地位》上，表示赞成美国的提案，即同意对中国的政治贷款、中央和地方政府保证的贷款，全都通过新四国贷款团办理；四国现有的对中国贷款的优先权，一律取消。《东洋经济新报》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要把“满蒙”排除在新贷款团活动范围以外的企图。社论说，组成四国贷款团“是对中国适用国际联盟主义”，毕竟“无非是国际共同管理中国”，“冷静地考虑起来”，山东铁路和满铁都要全部交给新贷款团。要认真考虑，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不能莫棱两可。而《东洋经济新报》本身对此显然是赞成的。<sup>②</sup>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5月25日至6月15日社论：《包藏祸根的媾和条约》。

<sup>②</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8月25日社论：《满蒙除外毫无意义》。

进而在翌年即 1920 年 5 月 29 日“财界概观”栏中刊登了《中国拒绝谈判山东问题》的文章,指出日本虽然表面上说要把山东利权归还<sup>①</sup>给中国,但“在背地却强迫中国接受奇妙的秘密条约,企图从中渔利”,因而遭到中国拒绝谈判。《东洋经济新报》的结论是,青岛利权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长远看来毫无意义,“通过对德和约得到的山东利权,应该统统放弃,把它委托给国际联盟”,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东洋经济新报》并不支持日本攫取德国的利权,由此可以了解。但是,它说让新四国贷款团或国际联盟来经营山东利权,却不说应该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这就说明《东洋经济新报》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认识带有盲目性。

《东洋经济新报》正确地看清了四国贷款团的成立意味着“在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心,战前是英国,战时是日本,战后转为美国”;以及美国“为了达到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势力的目的”,而狂热奔走组织国际贷款团。因而断言,贷款团规约<sup>②</sup>不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是必然的。尽管如此,对日本来说,并非不利。<sup>③</sup>

显而易见,《东洋经济新报》并不主张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可是,正如《东洋经济新报》自己也承认的,四国贷款团是四个大国

---

① 《凡尔赛和约》把山东省的德国利权交给了日本,但一经决定,中国便发生了反对这一和约的“五四运动”,当时,1919年5月17日,日本政府声明把胶州湾原德国的租界地归还给中国。并于翌年即1920年1月,在《凡尔赛和约》生效的同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议举行上述归还问题的谈判。到了5月,中国才答复说,在媾和条约上没有签字的中国,不能同意就和约规定的山东问题进行谈判。于是这个问题便拖延下来。结果,在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由于美英的斡旋,基本问题才得到了解决,1922年12月签订了协定的细则。

② 1921年5月制定。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0年(大正九年)11月27日,“财界概观”栏《对华新贷款团成立》;及1921年(大正十年)4月9日,“小评论”栏《对华贷款团规约》。

对中国的共同管理，即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组织，即使把四国贷款团换成国际联盟，也是一路货色，而《东洋经济新报》却熟视无睹。这是由于《东洋经济新报》一直错误地信赖英美，本来“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只是帝国主义任意剥削、压迫中国的口号，却一直错误地认为会给中国带来利益；没有认清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本质，认为它是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机构，抱有幻想。

虽说过去《东洋经济新报》比日本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都更为激进，是彻底的非帝国主义论者，但它也有上述的错误。然而，这时日本出现了完全没有《东洋经济新报》那样错误观点、明确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例如，《中央公论》1919年1月号鹭尾正五郎的论文《战后世界依然是国际竞争的舞台》，便是其中之一。该文笔者的头衔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但关于他的经历，我一无所知。下面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要点。

这次大战，是德国军国主义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德国战败了。不过，战后德国业已民主化了，日本无需与德国为敌。过去，日本盲目追随英美，今后要走自己的道路。其中心问题是对华政策。日本的方针，只能是援助中国民族的自治自决运动。不仅政治上实现自治自决，经济上也要如此。

“所谓中国在经济上实现自治自决，归根结底就是除了自由通商以外，不给列强以任何特殊经济权益。列强过去攫取的利权另当别论<sup>①</sup>，日本应该自己确定今后不许再搞攫取利权活动的方针，并一面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巩固日华亲善的基础；一面大力向英美各国进行宣传，用来作为牵制英美政府及实业家的野心的武器”。英美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凭舆论来推行的，而是“凭政府同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实业家的阴谋来推行的”。

（中略）

---

<sup>①</sup> 文章作者在这里有局限性。

“所谓门户开放，是列强相互保护的主义，不是保护中国的主义”。英美的目的是“推行资本政策，即不是根据供求自然关系来扩张商权，而是想在中国由自己来经营中国自己的事业。这也就是企图利用自己多余的资本，支配他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的野心”。

这段分析的确正确。笔者进而就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如下的正确论述。

“日本必须始终在自然供求范围内同英美竞争，参与资本政策的竞争，而且必须为彻底消灭这种竞争而努力奋斗。危害中国独立、进而使日本自己受到打击的，正是这种资本政策的竞争。日本对华实行资本政策，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并给英美资本势力侵入中国造成借口，对我国来说，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政策了。”

日本必须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民主主义的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英美的资本政策是取代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专制力量。中国四亿人民的劳动，绝不能供作英美资本的牺牲品。（中略）

日本要向中国和列强表明这一主张，借媾和之时，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例如青岛，应该按照中国的要求，把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首先让中国认识到我国确有诚意，支援中国，让中国充分参加媾和会议，在会议席上坚持东洋民族自治自决的总方针。但是，据闻我外交计划似乎并非出于这一方针，而是逢迎英法的秋波，为攫取些许利权绞尽脑汁”。英美实业家奉行拥护和攫取利权的政策，一定会到东亚来，届时如果发生国际争端，政府肯定会作为他们的后盾而出现。“为防止这种情况，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自身的民主运动。作为日本的方针，除了援助他们，促进这一民主运动的到来，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为了这一整个大局的目的，必要时，不仅青岛，日本而且应该把“满洲”也放弃掉”。



试把这篇卓越的论文同《东洋经济新报》对照一下，便可立即看出后者错在哪里。虽然《东洋经济新报》有上述那些严重错误，但在国际问题上，对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径，无论出兵前、出兵后，都始终表示坚决反对；对于朝鲜的独立运动有正确的理解；在国内问题上，它反对军部，主张普通选举权；正确认识米骚动的历史意义；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一如既往地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反对钢铁工业保护关税的文章中，《东洋经济新报》也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论断。它针对那种认为虽然日本既无铁矿又无炼焦煤，可是“尽管日本没有而中国有”的说法，指出“那是说中国具有兴办这种工业的条件，这丝毫不能成为日本兴办这种工业的条件”<sup>①</sup>。

在这些涉及国政各个领域并形成体系的论点方面，《东洋经济新报》依然与《大阪朝日新闻》或民本主义者有着本质的距离。<sup>②</sup>而鹭尾的高论后来也没有接续的文章，完全是孤立的。

## 二、“放弃一切的决心”

新四国贷款团的组成，是美帝国主义对日反击的尝试。1921年，日本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各国更加沉重的打击。即1921年7月，美国呼吁日本政府召开讨论海军裁军和“太平洋、远东问题”<sup>③</sup>的会议。于是同年12月至转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美、

<sup>①</sup> 《东洋经济新报》1919年（大正八年）1月15日至25日社论：《排除保护政策》。

<sup>②</sup> 《大阪朝日新闻》等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起过去来，虽说调子变得相当温和了，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议会内的对华政策论》（1921年1月29日）是这一时期《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中帝国主义因素较少的一例。文章主张宁肯“放弃一些既得权益”，也要“积极地把和平政策贯彻到底！”试看这段时间前后的社论，可以说它并不肯放弃“满蒙的特殊权益”，即使说它没有“领土野心”，但也有“扩张领土的欲望。”（1920年7月15日社论：《与其占领不如收买》，1920年8月20日社论：《列国共同改造中国论》）。

<sup>③</sup> 太平洋、远东问题：主要指中国问题。

日、英、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参加的“九国会议”，缔结了全面否定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益”的“九国公约”<sup>①</sup>，同时日、英、美、法、意五国还签订了“海军裁军协定”<sup>②</sup>，日、英、美、法四国签订了关于维持太平洋区域岛屿现状的“四国条约”<sup>③</sup>。于是，日英同盟条约期满即不再签约；大战期间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石井—蓝辛协定”也废除了。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日本完全孤立了。

《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放弃一切的决心》评论说：听到美国提案时，“日本政府和国民都不禁为之愕然，不知所措”<sup>④</sup>，但它认为，这次会议是使日本根本改变过去帝国主义政策的极好机会，表示欢迎，并立即以上述标题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论。其要点如下：

本来，日本应该主动发起并在东京召开这种会议，日本现在不要被“小欲”熏心，“而要放弃一切。这是一条最好也是唯一的道路。例如，放弃‘满洲’，放弃山东，放弃对中国的一切压迫，结果将会如何？又例如，允许朝鲜和台湾实行自治，结果将会如何？英国和美国都将会陷于极端的困境。因为它们只让日本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时，它们就在世界上保持不了道德价值了，中国等世界弱小国家必将全都信赖日本了。（中略）

贪图小欲者或许会说，这样的话，日本怎能活得下去呢？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要

---

① “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的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65页。——译者

② “海军裁军协定”：即《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40页。——译者

③ “四国条约”：即《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36页。——译者

④ 《东洋经济新报》1921年（大正十年）7月23日社论。

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sup>①</sup>”

乍一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多么奇特的议论。尤其最后一段引用《圣经》的话,或许会给人一种把政治、经济问题偷换为道德论的感觉。可是,对于熟悉《东洋经济新报》几年来一贯主张的人来说,可以理解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实际上,在这以后,《东洋经济新报》还多次提到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而且《东洋经济新报》继而从7月30日至8月13日连续三期发表了社论。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一文中就“放弃一切的决心”,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

和主张放弃全部殖民地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如果日本不牢固控制住这些殖民地,在经济和国防上就不能自立;第二,列强各国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国土,却只要求日本放弃殖民地,未免太不公平。然而,上述“第一点是幻想,第二点是‘小欲’”。

首先试看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关东州和库页岛”的经济利益。这些地区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九亿多日元,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为十四亿四千万日元左右。对美是最高额,对于日本的经济自立来说,美、英、印度等国远比这些殖民地要重要得多。再者,上述殖民地没有多少日本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日本工业最重要的原料——棉花,主要依赖于美国。在煤炭、铁矿和石油方面,朝鲜、台湾、“满洲”等地也不是日本的重要供给地区。即使对中国和西伯利亚进行干涉,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反而有害。从中国进口的铁矿为两亿五千万斤,煤炭五十五万八千吨,“为这一点点东西,争夺利权,有何必要?”通过正常的贸易,从美国进口了铁矿十二亿五千万斤,从英国进口了三亿三千二百万斤。

<sup>①</sup> 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至33节。——译者

其次，从军备国防方面来看，到底哪个国家有可能侵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以前曾经是俄国，如今不同了。有人说是美国，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侵略日本要夺取哪块地方呢？日本本土这样的土地，即使白给人家，恐怕也没有人要，倒是想要殖民地。所以，假如日本说不要“满洲”、朝鲜、台湾和库页岛，战争就决不会发生了。即使日本放弃这些地方，也决不会有哪个国家取代日本把这些地方从朝鲜人民或台湾人民手中夺走。

第三，有人会说，尽管殖民地的贸易额少，资源也不十分丰富，但作为日本人移居地来说，却很重要。可是，现在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却微乎其微。本来，殖民地只有在那里投下资本，利用技术和企业头脑，剥削当地的劳动力，才能赚得利益，结果必然反映到贸易上来。然而那里的贸易情况却如前所述。

即使假定大日本主义对我们非常有利，也不可占据“满洲”、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因为现在已不同于英国掠夺殖民地的时代了。“朝鲜的独立运动，台湾的建立议会运动，中国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抗日运动”等等，决不是凭警察和军队的干涉和镇压能够压制得住的。纵令大日本主义利益多么大，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总留恋这些，是目光短浅的“小欲”的表现。

“我们认为，台湾也好、朝鲜也好、中国也好，如果日本尽早对它们采取自由解放的政策，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民决不会背离日本。他们必将仰赖日本为盟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将永远与日本保持亲密关系，如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的感情，正是如此。”

有人说，列强各国都拥有广大领土，却只让日本人囿于狭小国土以内，这不公平。让我们来回答他们。“我们所说的放弃大日本主义，绝不意味要局踣在狭小的日本国土以内，恰恰相反，为使我国人民把世界当作我国领土而活跃起来，就必须抛弃大日本

主义”。

(1) 日本想扩张领土也扩张不了。如果硬要扩张的话，反而会造成与四邻各民族、各国人民为敌。

(2) 列强各国过去掠夺的海外殖民地，正处在逐渐独立的命运。

(3) 即使羡慕别国的广大领土，事到如今，已不能再仿效它们。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抢在列强前面，让它们解放殖民地，这才是最英明的策略。

如果日本允许朝鲜和台湾实行“自治”(即独立)，那么，英国对待印度和埃及、美国对待菲律宾，总不会老是让它保持现在这样吧。

说美国不让日本人和中国人入境，这指的是移民，并不是不准商人去经商。有人说，不把它变成本国领土，就不能自由投资，例如矿业不准外国人开办，哪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只要有资本，就必然会有一条投资于外国产业、间接经营的道路”。一投资就有利润，即使不去外国也行。“哪怕把八亿日元军费的一半投到和平产业里去，日本就会拥有丰富的资本了”。

这些看法，当时可能会被人们当作空想家的白天梦呓，但是，对于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潮流的我们来说，不由得体会得到且抱有同感。这种观点，和明治初期革命的自由民权论者反对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主张选择和平、文明和富国小国的道路，以及明治后期社会主义者们利用《周刊平民新闻》反对日俄战争、主张“小日本哉”的思想<sup>①</sup>是一脉相承的。

《东洋经济新报》主张，日本要提出这个崇高的理想，在华盛顿

---

<sup>①</sup> 关于小国主义的传统，请参阅松永昌三：《是扩张主义还是和平主义：——日本生存之路》，见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争论的焦点》，1967年，上卷。

会议上“和中国合作”而奋斗。它还说,过去,日本一贯侵略中国,今后要改正,决心“放弃”“掠夺”的态度。这样一来,“日华亲善”一定能实现。现在的太平洋会议,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的绝好时机。并继续强调,会议的筹备期间和会议进行当中,在限制海军、归还山东利权的中日谈判,太平洋岛屿的四国和平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方面,日本要表现出“放弃一切的决心”<sup>①</sup>。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关于“放弃一切的决心”,当然连作梦也没有想过。尽管他们死求百赖地想保住在中国的“特殊权益”,还是受到了美英等欧美七国和中国的围攻,终于在九国公约的条款上,包括“满洲”在内的日本在中国享有优越地位的主张,被迫改为“放弃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当然也包括日本)剥削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变成了严密的条约。“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是《东洋经济新报》过去一直用来反对日本攫取利权野心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它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因为这一原则已经变成了严密的条约,它本来应该因此而高兴,但却相反地说这是日本“华盛顿外交的失败”。说失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和人民都不了解“世界大势”,都没有“放弃一切的决心”<sup>②</sup>。它并没有具体说出日本在哪一点上、是怎样失败的,可能是指日本没有充当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锋,反而死抱着不放,终于被各国逼迫着才无可奈何地作出了恋恋不舍的让步。

《东洋经济新报》不再提“门户开放”了,这一定是因为“九国公约”中已有明文规定,无须再提。其实不仅如此,可能是因为《东洋

<sup>①</sup> 这一时期,《东洋经济新报》就政治和外交等问题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时期、任何问题都多得多的评论,其中有《就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会议的几点劝告》(1921年9月24日社论)、《信仰心薄弱的人!》(9月17日社论)、《山东交涉条件》(9月17日小评论)、《就山东问题答复中国》(10月15日小评论)、《华盛顿会议与中国问题》(12月8日社论)、《四国条约签订》(12月17日小评论)等有关华盛顿会议的评论、社论和报道。

<sup>②</sup>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1月28日小评论。

《经济新报》已经认识到，“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无非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剥削、管理他国的一种体制，如果日本参加进去，就和“放弃一切的决心”、充当亚洲民族解放的先驱、以此开辟日本前进道路的理想背道而驰了。例如，在华盛顿会议筹备期间，针对会议发表的《共同管理中国是时代错误》<sup>①</sup>的社论，和过去对按机会均等原则组成的四国贷款团“共同管理中国”表示欢迎的态度截然不同，立场站得更高了。这时的《东洋经济新报》，主观上自不必说，客观上也摆脱了任何意义的帝国主义。

在经济方面，《东洋经济新报》认为中国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市场，仍然是最重要的（从现实情况看来，中国也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重视，才反对攫取利权和压迫政策。《东洋经济新报》分析形势指出，中国的纺织业以及其他“现代工业”的民族工业将会逐渐发展起来，并将同日本的纺织业、杂货业等展开竞争。它认为，日本面对这种形势不应该悲观。如果中国整个经济繁荣起来，全民的购买力必然随之提高，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也就会有增加的可能。只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的工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日本应该确定与此相应的方针<sup>②</sup>。

所谓新的对策，就是销售比中国更精制的产品。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约定，从1922年3月召开关于中国提高关税问题的各国会议，9月达成协议。新关税对粗制品（日本等国的输出品）的税率比较高，对精制品（英美等国的输出品）的税率比较低。因此，对日本来说，无论在同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上，还是同英美的竞争上，都很不利。“因此，今后只有改变我国人光造粗制品的方针，通

---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1年（大正十年）8月20日。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4月1日至8日社论：《要重新注視中国》。

过提高工业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努力廉价生产精制品<sup>①</sup>。

这篇社论接着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向那里移植产业等的企图,可谓无计可施的穷途末路的方策”。资本输出本来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时日本资本主义正处于确立垄断的阶段,对中国输出资本,比纺织业等的商品输出开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而当时《东洋经济新报》还如上述指出,输出资本应尽量避免,这表明了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

在政治方面,当时《东洋经济新报》不仅在一般理论上反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扩张,还主张“取消满洲守备队”<sup>②</sup>。正值陆军准备压缩编制,其中也包括缩减(其实是改编)“满洲”独立守备队。《东洋经济新报》便针对陆军的这一计划,提出不是缩减而要取消的主张。于是出现了这么搞日俄战争以来用鲜血换来的权益就保不住了、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就保不住了等反对意见。但是《东洋经济新报》却说,“满洲”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那里的权益,是承袭了俄国从中国掠夺来的利权,所以在历史上是非法的。不配置军队就保不住的权益应该放弃。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要在不配置军队就呆不下去的危险的他国居住或经商,根本就是错误,它只能意味着军国主义、侵略主义”<sup>③</sup>。

这一时期至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东洋经济新报》批判帝国主义最彻底的时期,比前述鸳尾的论文更加激进。例如,在1923年2月24日的社论《改革外交的根本想法》中主张,亚洲国际政局的中心已由英国转到美国,“以中国为中心的日美关系”的这个难关,靠帝国主义的外交是闯不过去的,摆在日本面前的一条光明道

---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10月14日社论:《中国关税的提高与我对华贸易》。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6月10日小评论。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2年(大正十一年)9月16日小评论。《在满日侨反对撤兵》。



路只能是“我国充当把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进而有色人种从白人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运动的旗手”。

首先要同中国人民握起手来，互相真诚信任。“为此，即使把我国在中国的利权全都放弃了也不是惜。还要尽早同苏维埃俄国握手言欢。”日英同盟业已解除，我国总算幸而摆脱了充当英国走狗的处境，美国恐怕根本不会让我国充当它的走狗吧，“不知对华强硬论者有无对美战争的决心？”

《东洋经济新报》正确指出，“中国的排日”运动就是日本幕末的攘夷，是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sup>①</sup>它由此对中国共产党还逐渐有所认识。在小评论《中国共产党》<sup>②</sup>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属于什么性质，不得而知。……最近广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的《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值得一读”，并介绍了这本小册子的反帝、反军阀的内容，指出“它的主张，值得倾听之处甚多”。“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少数无名青年的组织，但不拘怎样，中国有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不可忽视的。高山彦九郎<sup>③</sup>在三条桥上落泪时，时人说他是疯子。然而，就是这个疯子的思想产生了明治维新”。

华盛顿会议后若干年，在不得不裁减海军以至陆军的国际压力下，“和平主义”情绪弥漫整个日本，连日本政府和军部中主张对华执行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人，一时也销声匿迹了。《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山东问题的解决——中日关系的前景和英美》<sup>④</sup>等文章中，竟把过去的“日中”改为“中日”了。

不过，不管表面上有怎么改动，轻蔑和蹂躏中国人而满不在乎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3年（大正十二年）6月23日小评论：《中国前途如何？》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3年（大正十二年）8月4日。

③ 高山彦九郎（1747—1793），江户末期“勤三家”，上野人，和林子平、斋生若平共称“宽政三奇人”，著有《高山药叶集》。——译者

④ 《大阪朝日新闻》1922年（大正十一年）11月30日。

的心理却丝毫没有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误杀中国工人事件——要迅速公布事实消除误解》<sup>①</sup>。这是一篇关于关东大地震时，不少侨居日本的华侨和多数朝侨一起遭到日本官宪和民间自卫团惨杀事件的述评。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了惨案发生以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攻击日本政府的群众运动，中国政府准备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的情况，为了缓和这种局势才写出来的，并不是自发的反省。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无论朝鲜民族对大肆屠杀驻日侨胞的罪恶行径表示多么强烈的愤慨，由于受到总督府的镇压，愤怒的呼声也不会传到日本；朝鲜民族没有自己的政府，所以也不会提出什么抗议。所以，《大阪朝日新闻》对于屠杀朝鲜人的事一直佯装不知，而唯恐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才只报道了屠杀中国人的情况，这正好暴露了《大阪朝日新闻》的本质。这篇社论还说：

“据称，在京华侨，特别是多数行商，被误认为朝鲜人而被杀害者甚多。在那种混杂情况下，尤其还有语言不通的人，多数中国工人遭到惨祸，丝毫不容怀疑。其中可能也有行动不慎的人，但在那种混乱之中，肯定会有本来善良而一股脑儿遭到杀害的人。对于这些人实在感到不胜遗憾”。

这不是在说杀害朝鲜人是理所当然的吗？说什么中国人被误认为朝鲜人令人“遗憾”；而且“行动不慎”的中国人遭到杀害是应该的；“善良的人”受到牵连实在遗憾；这些全都是由于“那种混乱之中”和“语言不通”。一看到中国人或朝鲜人“行动不慎”，难道就可以杀害吗？

中国人民对这一行径当然要表示愤慨，而《大阪朝日新闻》却强辩说那是“误解”。还说：

在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以前，“应该尽快表示出日本国民所

<sup>①</sup> 《大阪朝日新闻》1923年（大正十二年）11月1日。

怀优美的同情心,安慰死者之灵,消除中国人的误解。(中略)当前若能对不幸在混乱之中遭到误杀而牺牲的人施与抚恤金,想是最好的办法。(中略)

本来,这种事件决不是表示与中国人民为敌,完全是误杀,这点想必中国人早已有所谅解,并理解到当时完全出于无奈,所以此时日本政府若能迅速公布全部事实经过,并表示遗憾,由日本主动对牺牲者施与抚恤金,不仅可以杜绝流言蜚语的宣传,还可能是个使他们广泛彻底了解日本好意的权宜之计”。

这里连口头上的反省也见不到。对于自己极其非法地屠杀的人们,却重复说什么“抚恤”啦、“施与”啦,以此来表示所谓“优美的同情心”。这连伪善都谈不上,极不诚实,厚颜无耻透顶;说什么被杀是“完全出于无奈”、“想必中国人早已有所谅解”等,这到底是凭什么根据说的呢?而且这篇社论竟把那些对同胞惨遭杀害表示愤慨的中国人称为“专门煽动排日者”,并反脸威胁说:对此“我们还有不得不说的话”,“必须谴责他们这些排日分子”,“开导他们,消灭煽动卑劣运动的余地,这完全是中国有识之士的责任”。看来文章的作者索性甘当侵略者了。

对中国人民抱有这种想法的人,纵令有时表面上主张缓和一下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有了一丝一毫的减弱。

对照《大阪朝日新闻》的这种论调,就会了解《东洋经济新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该是多么彻底啊!

## 第五节 批判帝国主义论的动摇

华盛顿会议前后,《东洋经济新报》的思想高度,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还是在国内民主改革的各种要求方面,都达到了近代

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顶峰。<sup>①</sup>我认为，它不是单纯的改良，而是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本书对于这点不做介绍，这里仅就其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加以论述。《东洋经济新报》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1925年初，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由此发展为“五卅运动”，之后，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东洋经济新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最足以说明它的反帝思想。

在介绍《东洋经济新报》的态度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大阪朝日新闻》的态度。因为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稳健派的思想 and 观点。

1925年2月9日，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内外棉纺织厂”<sup>②</sup>发生了四万工人的罢工运动，斗争持续到3月1日。厂方公开用暴力进行镇压，杀伤了中国工人。《大阪朝日新闻》对此分别于2月14日、19日、3月8日和21日发表了四篇社论。

第一篇社论《致在华企业家——内外棉罢工问题》说，不要殴打中国工人，现在全世界工人已经觉醒起来，“虽说中国工人非常愚昧，但也不能永远处于世界潮流之外”。今后还会发生“罢工闹事”，所以我国企业家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施展拳头政策，会引起中国工人反感”，要十分慎重。

2月19日社论的题目是《上海罢工之对策——不可空喊强硬》。顾名思义，从题目就可以推测出文章的内容。

3月8日社论《上海大罢工的教训》的结论是，“我国的企业经营者，能否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在利益面前不贪婪，为长久大计，

<sup>①</sup> 参阅井上、渡部编《大正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

<sup>②</sup> 内外棉纺织厂：原名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共拥有十九个工厂，其中三个设在日本，十一个设在上海，三个设在青岛，另外两个设在我国东北。这里是指在上海的第八厂。——译者

以从容不迫的态度经营工厂，这将关系到将来能否在中国企业界占据牢固地盘的问题”。

以上三篇社论，只是劝告日本资本家不要干得太过分了。而3月21日的社论《中国纺织业的不安——连续发生罢工事件》，“回顾了以广东政府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左倾分子，近年来把发展政治势力的方向转向无产阶级，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作者总算意识到了这次上海和青岛的罢工斗争的政治性质。但是只看到“国民党左倾分子”的煽动，却全然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抵抗，或许是知道却佯装不知。于是笔者提出对策说，一方面，日本工厂要注意，切勿上煽动分子的当；另一方面，要清除“不可靠分子”。

对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毫不理解的《大阪朝日新闻》，大肆歪曲“五卅运动”的真相，把它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学生的闹事。原文篇幅过长，在此从略。在文章的结论部分却说，假如中国学生“妄图用集体的力量，无视现有的秩序<sup>①</sup>，否认和推翻现在的统治势力<sup>②</sup>”，“则只能导致中国重蹈二十五年前遭受世界惩罚<sup>③</sup>的覆辙”。竟至暗示要实行帝国主义联合的武装镇压。<sup>④</sup>

不过，《大阪朝日新闻》如此露骨的帝国主义主张，后来可能连它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六天后的社论《上海事件的特征及今后的对策》却说：“吾人既反对中国学生团体激进的收回国权运动的手段，同样也反对日本政治家急于求成的解决办法”。

又过了三天以后，即6月11日发表的社论《上海事件（第二次）——有无和解的方策？》说，“五卅运动”并不是《大阪朝日新闻》所说的暴力学生的闹事，上海的工商业团体、资产阶级也都参

① 所谓现有的秩序，即指帝国主义秩序。

② 所谓现在的统治势力，即指外国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官僚军阀的势力。

③ 所谓世界惩罚，即指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

④ 《大阪朝日新闻》1925年（大正十四年）6月2日社论：《上海暴动……各国共同的问题》。

加了。他们连续开展了不屈不挠的罢市斗争。社论对此以举手认输的姿态抱怨说,无论如何,首先总得“让它取消罢市宣言,安定人心”。

以上属于当时日本社会上的一般反应。其中《东洋经济新报》在《上海日本纺织业的罢工》<sup>①</sup>一文中批判了日本纺织联合会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资本家把这次事件的起因仅仅归咎于外部的煽动。这种态度,不得不说他们今后根本没有在海外经营事业的资格”。在《青岛我国纺织厂的罢工》<sup>②</sup>一文中也谴责了在华日本企业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告诫人们不要认为罢工是由于外部的煽动。

对于“五卅运动”,《东洋经济新报》也提出了正确看法。它在《关于排日和发展对华事业的对策》<sup>③</sup>一文中说:“五卅运动”的起因,在于我内外棉纺织厂的罢工,但“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而且是最顽强的根子是……中华民众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民族方面对华不平等待遇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抗”。

即使日本企业是靠优秀的技术和经营而得到发展的,中国人也不那么看,而认为由于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处于有利地位的缘故。因此,在华日本企业今后要想得到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让中国人民信服中国人的企业是和日本人的企业站在对等地位上在进行竞争。(中略)要作到这点,为了谋求我国在华企业的发展,就必须赶快修改对华不平等条约”。

如果眼界再开阔一些,要打开日本经济停滞的局面,必须就扩大原料供给和打开销路,要求实现世界范围的机会均等,至少要开辟东南亚的殖民地市场,即必须使欧美解放殖民地、半殖民

---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2月21日“财界与事业”。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4月25日“财界与事业”。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5年(大正十四年)6月13日社论。

地。而对于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之一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本只能越来越有必要协同中国促其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诚然，日本为此也必须自行放弃对华的既得优越地位和朝鲜的特殊地位，结果所得将大于所失。从这点来讲，日本当前也应赶紧着手制定立即修改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这才是在中国杜绝一切排日运动的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日本只是出于开辟东南亚市场的需要，为了削弱欧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支持中国的反帝民族斗争，而日本自己依旧在中国占据帝国主义地位的话，那就是和头山满等人标榜的“援助中国革命党”毫无二致的帝国主义政策。《东洋经济新报》则不然，它主张日本本身不但应该首先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地位和权益，而且还要解放朝鲜，放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压迫，支援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所以，这里没有丝毫帝国主义的因素，只有反帝。

由于这个原则十分明确，所以《东洋经济新报》说，日本人侮蔑中国人固然也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原因，而其侮蔑的“根源，还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拥有治外法权及其他极不平等的优越权所造成的”，这就正确地抓住了不平等的政治结构这个根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东洋经济新报》所要求的并不是诸如要日本人进行反省或律己、不得侮辱中国人等的道德问题，而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把改善中国工人待遇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加以援助。因为中国工人被迫满足于当前极其低廉的工资待遇，是现在我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尽量改善中国工人待遇，进而也是救济日本产业之道”。

《东洋经济新报》这种不仅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反对对中国工人的殖民地般的低工资制度的态度，最大限度地表明了

它的反帝思想。在这之后,《东洋经济新报》接着还把中国的“混乱”比作日本的“明治维新”,正确地理解为“产生新中国的阵痛”<sup>①</sup>,还说,“由外部来妨碍中国独立运动的作法自不待言,对于中国的党派,如帮助甲来压迫乙的态度,切望决不要采取”<sup>②</sup>,对于田中内阁干涉中国的内战,始终毫无保留地坚决反对<sup>③</sup>。

当然,《东洋经济新报》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它毫不含糊地坚持整个产业资本的长远利益的观点,不拘泥于眼前暂时的损失。从《东洋经济新报》本身的表现来看,它站在摆脱“小欲”的立场上,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势,寻求与其适应的道路,使其从过去就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发展,到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境界。

然而,作为拥护资本主义者的《东洋经济新报》,当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旦深刻化,它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也就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动摇。《东洋经济新报》曾经认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是最愚蠢政策,可是在1925年10月24日的社论《中国的关税会议和对我国的打击》中,却明确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粗制品占的比重大,而中国关税规定的粗制品税率却较高,而且中国本身也正在发展粗制品生产,所以中国修改关税对日本的打击,是和英美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情况本来和三年前《东洋经济新报》反对资本输出时完全相同,但现在它却说:“因此,从对策来看,也不得不说,在向中国移植我国产业的同时,发展内地的精制品工业,最为必要”,提出了与过去相反的论点,认为资本输出“最为必要”了。

---

①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4月16日“时评”栏《不可侮辱中国》。

②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4月16日“财界概观”栏《中国动乱重大》。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27年(昭和二年)6月4日“时评”:《哎!终于对华出兵》;6月4日“财界概观”:《出兵与财界》;1928年(昭和三年)5月5日社论:《无需对华出兵》;5月19日社论:《想…想阵亡者》。



在“五卅运动”之前，1924年7月至8月，《东洋经济新报》连续四期刊登了川岛清三郎的投稿，题为《朝鲜没有独立的资格》。这篇文章一开头就骂朝鲜人懒惰，过着原始的低级生活，而日本人则过于正直，不会象西方人那样觊不要脸，所以恪守兼并朝鲜时的诺言，“一味为了朝鲜民族的安宁和福利采取发展文化的政策，并一直向这个理想奋勇前进”，总之文章通篇就象朝鲜总督府的宣传品一样。文章还说，无论日本怎么努力，由于朝鲜没有任何资源，红土地质贫瘠，想增产大米也办不到。虽然朝鲜志士再三呼吁独立，但“极端贫穷的朝鲜，从国土资源来看，永久也独立不了”，“政治的目的，在于增进和维护人民的安宁幸福和自由，国家不过是实现这个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在朝鲜，日本已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和自由，所以目的业已达到。再要求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的独立，“犹如满腹之后谈碗论筷一般”。

这位笔者对朝鲜人的侮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赞美，还远不止此。即使它不是出于《东洋经济新报》编辑部内部人员的手笔，但连续四期刊登这类稿件的编辑部，同那个曾经对朝鲜民族的独立斗争表示理解，用充满支援的心意评价过1919年朝鲜独立起义，指责了关东大地震时屠杀朝鲜人的“真正罪魁”是日本政府及其统治者的编辑部，令人难以置信是一个编辑部。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当1928年6月，中国在北伐基本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不久即7月7日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七条“临时办法”时，《东洋经济新报》竟为此大发雷霆。

7月28日的社论《中国应先休养实力》做了如下论述：

“中国南方国民政府打倒北京政府之后的第一件事，却是突然通告各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施临时办法，这使记者为中国人民甚感遗憾”。记者自清朝以来就一直同情中国关于修改不

平等条约的要求。然而，这种条约之所以长期存在，应归咎于帝国主义列强，同时，“我们坦率断言，最大的罪过，则在于中国国民本身”。在突然采取废除条约之前，“中国应先休养实力”。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诚然，中国确实因为没有实力，不平等条约才继续存在下来。现在，中国有了足够的实力，可以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了。为了把这一宣言贯彻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去，中华民族还须进行艰苦奋斗。而文章作者不站在支援中国艰苦奋斗的一边，却侈谈要先休养实力等帝国主义分子的陈词滥调。这难道是那个两年前一直热烈主张日本要抢在列强前头尽快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东洋经济新报》吗？

8月4日的社论《娇孩——中国》，又发表了如下对中国带有侮辱性的庸俗低级的帝国主义议论。

中国突然废除条约的作法，表明“中国国民对内不求休养实力，总是依赖外力，以图利己。犹如娇孩，自己虽无任何力量，但一撒娇，父母或近亲一时就会溺爱起来，于是便得意忘形，一天天地变成讨人嫌的娇孩。往事暂且不提，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显然是这样。中国利用忌妒日本向中国扩张的列强，在华盛顿或其他等地大撒其娇。结果形势变得多少对中国有利了。这次废除条约等也是那套手法，用来折磨日本，暗中可能有美国及其他各国在帮助它。中国的政治家和爱国运动者，以此外力为唯一依靠而捣乱闹事”。

这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腔调。即便署上德富苏峰的名字也未尝不可。只是在文章结尾说，各国“把中国人民当作娇孩”，而日本要有日本的坚定方针。所谓方针是指“放弃满蒙的所谓特殊权益”，强调了《东洋经济新报》的一贯主张，略微保留了还象《东洋经济新报》的影子。作者还说，“决不能允许中国政治家废除条约的轻举妄动，同时，日本也要放弃想要独占中国利益那套小气的根性，

这是作者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殷切劝告”。

的确,后来《东洋经济新报》也没有抛掉放弃“满蒙”的观点。例如同年9月22日的社论《满铁社长的满蒙经济解放论》、12月10日的《所谓对华强硬外交意味着什么?危险的满蒙独立论》等文章,早已洞察出日本政府虽然不想吞并“满蒙”,但企图名义上使它“独立”,把这个“独立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阴谋(三年后伪满洲国就实现了),文章表示坚决反对。看来到底是《东洋经济新报》看问题尖锐。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是娇孩”,难道中华民族一真的宣布完全独立的战斗,就把过去的理想论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在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中,和其他报刊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堪称富于革命性的《东洋经济新报》,由于它没有跳出为日本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圈子,一旦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就难免产生上述的动摇性。在这个阶段,要想贯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哪怕是以和平自由竞争为理想的产业资本,恐怕也只能站在超出资本利害的立场上。而这种立场,这时才在日本也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

## 第四章 侵略中国的七十年

### 序

当我们访问中国,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中国人民总是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还说:

“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来保持了极为友好的亲密关系。只是近百年来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中日间历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我们不能一听这话就说“可不是呢”,便心安理得了。在历史

的长河里，后一百年远比前两千年具有更重要的内容。因为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也被后来直至现在连续不断的侵略和反华的一百年历史给葬送了。“百日之功，毁于一旦”。我们只有把近一百年的侵略和反华的历史，真正作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把它埋葬掉，永远不准重蹈覆辙时，过去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才能苏生，跳过近一百年，直接同新的友好时代联结起来。那时我们才能坦然和中国人民共同高唱日中关系历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为使这一天早日到来，首先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日中两千年的历史吧。

## 第一节 友好的两千年

### 一、交流之始

我们远古的祖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到现在的日本列岛生活下来的呢。这段历史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一万多年以前开始具有新石器和绳纹陶器的人们，是我们的直接祖先。

在绳纹文化的早期，日本业已变成四面环海的列岛。从当时的日本及其周围社会的交通手段来看，渡过大海和朝鲜半岛或大陆往来，即使并非绝对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日本列岛社会，几乎有八千多年一直孤立于周围的社会，而不得不走独自的道路。因此，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当然缓慢。整个绳纹时代，人们始终未能摆脱渔猎和采集经济，当然也不知道什么金属器。绳纹时代的人们过着氏族制的原始公社生活。

与日本相比，中国社会则不然。它可以同大陆毗连的周围社会进行接触，因而进步颇快。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汉族人民就已经在黄河流域一带开始耕作和饲养家畜，公元前十五世纪左

右，建立了统治广大地区的国家——殷王朝。殷王朝的人们发展了青铜器，创造了文字。就是说，已完全从蒙昧阶段摆脱出来，进入文明阶段。到公元前六世纪，即继殷王朝之后的周朝末期，开始使用铁器。关于铁器的使用，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论证，朝鲜民族的祖先在辽河流域生产、使用铁器的时间比汉族还早。

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体系，建立儒学的孔子等的儒家，和同它对立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的韩非子等法家，以及其他各家的“诸子百家”，陆续涌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花朵盛开起来。公元前三世纪建立汉王朝，基本上统一了整个中国的广大领土，其势力竟扩展到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

由于受到这种汉族文化巨大潮流的冲刷，蒙昧的日本社会也进入文明阶段。公元前三至二世纪，随着比绳纹陶器烧制技术更高一级的弥生式陶器以及水稻种植和金属器（主要是青铜器，一部分是铁器）等而产生的新文化，可能是从南朝鲜传到了北九州地区。到底是从北朝鲜沿半岛南渐的文化，进而传到了日本呢？还是从中国江南地区渡海传到济州岛和南朝鲜的呢？还不能最后肯定。但如果只就水稻而言，从北朝鲜南传至日本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可能是从江南经南朝鲜而传到北九州的。

这种新文化，并不是北九州人到南朝鲜去摄取来的，而是南朝鲜人将新文化带到北九州的。不过，并未形成民族的迁徙，他们的文化立即取代了绳纹文化，但从种族方面看来，外来的人被原来的绳纹人同化了。

以前把日本社会同朝鲜、中国隔绝开来使日本处于孤立的深渊的朝鲜海峡，这时变成了向日本社会不断输送新血液和新文化的通路。日本社会从此有了生气，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公元一世

纪前后,水稻耕种和金属器的使用,从北九州通过山阴<sup>①</sup>、山阳<sup>②</sup>,传播到近畿,又从近畿发展到伊势湾沿岸,到公元一世纪后半期,便普及到了关东地方。

在北九州等先进地区,原始氏族公社的族长转化为统治者,出现了小型“国家”的萌芽。公元一世纪后半期写出的中国史书《汉书》载:“夫乐浪<sup>③</sup>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所说的倭人,即指日本人,这是记载日本社会最早的文献。到公元57年<sup>④</sup>,倭奴国的使者,经乐浪千里迢迢来到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后汉王朝首都洛阳,领到汉王朝皇帝赐予的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sup>⑤</sup>。江户时代,这颗金印在现在的福冈县志贺岛发掘出来。

这些“倭国”是族长统治下的规模很小的“部落国家”,到了公元三世纪中叶,出现了把二十八个倭国“征服了”的“邪马台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中国魏王朝首都洛阳派遣使节,贡献“生口”(奴隶)和有斑纹的麻布,并蒙赐予“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大刀、铜镜等物。

## 二、文明之师

邪马台国究竟位于日本的北九州,还是近畿的大和?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还没有肯定下来。北九州之说在学术界占多数,但

---

① 山阴:全称为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等八国,今属日本的中国地方日本海沿岸地区。——译者

② 山阳:全称为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等八国,今属日本的中国地方濑户内海沿岸地区。——译者

③ 乐浪:汉王朝在北朝鲜的统治地区。

④ 公元57年即中国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译者

⑤ 金印,二、三公分见方,厚零点八公分,蛇形纽,阴文篆书。它同在我国云南省晋宁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滇王之印”,在金质、雕刻方法、字形、蛇纽等方面都非常相似。——译者

大和地区出现的国家，也必定经过类似“倭国”或“邪马台国”那样的发展阶段。到五世纪初叶，这个大和倭国已经发展成为统治日本列岛主要地区的国家，其势力从北九州一直扩展到关东地方。它的最高君主——“大王”，可能就是天皇家族的祖先。在这之后的中国文献中所说的“倭国”，均指这个国家。

公元421到478年间，倭王赞、珍、济、兴、武五代，连续向中国南朝的宋王朝<sup>①</sup>朝贡，以宋王朝的“使持节”<sup>②</sup>的身份，受命统督倭及南朝鲜五个小国<sup>③</sup>的军事，被授予“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现在学术界多数人推测，这五代倭王即相当于仁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等五代天皇，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在此期间，从朝鲜和中国相继传来先进的农耕、铁和铁器、丝绸、各种工矿业、土木的技术和工具、养蚕、家畜的种畜及其繁殖方法，这些方面的技术人员也陆续来到日本。和这些技术关系十分密切的数学知识当然也随之传来了，也一定有替倭王起草寄给中国书信的人，最初可能是从朝鲜来到日本的朝鲜人。据《日本书纪》<sup>④</sup>载，应神天皇的皇太子首次跟朝鲜学者王仁学习了《论语》，由此学习汉字、汉文和儒学的日本贵族，也可能日渐增多。在此期间，地方豪族之间也有使用文字——当然是汉字的例子，同时，还出现了用汉字的音训来记载日语的萌芽。

这样，到了五世纪左右，日本社会确已进入文明阶段。这完全多亏了朝鲜和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日本或许公元以后还不

① 南朝的宋王朝：南北朝时刘裕在今南京建立的王朝，公元420—479年。——译者

② 使持节：守卫边境的军政官名。

③ 指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译者

④ 《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是日本最初的编年体正史，从神代记述到持统天皇年代。当时执笔者多半留学长安、洛阳，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全书用汉文写成，并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译者

得不很久停滞在蒙昧阶段。

日本在这一阶段，不仅在文化方面完全被包括在中国文化圈内(当然，日本有独自的神祇信仰和风俗)，而且在政治方面也被纳入了中国王朝的势力圈内。邪马台国女王和五代倭王对中国皇帝的臣属关系，足以证明这一点。

然而，倭王“武”死后一个多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曾于公元607年派遣使臣前去隋王朝，所持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在翌年的国书中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由此可见，日本力图站在同中国王朝的对等立场。隋王朝对此甚感不悦，仍把日本看作藩属。此后，经过奈良时代直到平安时代前期，前后共约三百年间，日本向隋王朝以及后来的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达十四次。中国仍然把日本来使看作藩属的朝贡使。不过，这些遣唐使到中国去并不是为了请求中国皇帝承认日本天皇的地位，或请求加封等，而是为了通过友好往来，汲取中国的文化，日本实际上已自立于中国王朝的政治势力以外。

这时，六世纪，佛教从朝鲜传入日本，不久佛教便占据了国教地位，超过了自古以来的神祇信仰。这种佛教业已汉化，而且还增添了朝鲜的色彩。随着佛教而来的是建筑寺院以及制作佛像、佛画、佛具等技术，这就一举提高了日本人的造型美术、冶金、铸造、建筑、工艺等各方面的水平，还培育了日本人的哲学思想。

遣隋、遣唐使的船队，一般由四艘船只组成，每次都有二、三百名留学生随行，除大使外，加上留学生、水手等，约达五百人左右。航海是个拼命勾当，往复很少没有遇上因风漂流或沉没的危险。古代的贵族宁肯冒着这种危险和困难，也要同中国友好往来、汲取文化。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始终没能回国，在唐王朝度过一生，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个。长安总是住着很多日本人。也有许多和尚由唐王朝来到日本，在奈良建造唐招提寺，把戒律首次传给日



本的鉴真和尚等人便是其中之一。

“大宝律令”等一些古代法制，也是效仿唐王朝的。奈良的都城——平城京，是照长安的原样的四分之一的大小建筑的，排列在那里的宫殿和贵族宅邸，都是红柱、白壁、瓦顶的唐王朝建筑的翻版。学术则都是直接引进的中国各派佛教哲学和儒学。所谓教养，首先就是认识汉字、缀写汉文。音乐也是唐王朝的。日本最初的货币“和铜开珎”<sup>①</sup>并不是由于当时日本经济上的需要而铸造的，而是效法唐王朝。所以无论政府怎样鼓励使用，也没有流通起来。这种货币，在中国现在的西安（过去的长安）出土了，或许贸易上使用过它。

### 三、蒙古的进犯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平安时代前期公元894年，古代贵族已经没有活力，停止了派遣唐使。从那时起直到明治维新近一千年间，日本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断绝了。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次往来，即公元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从明王朝皇帝接受“日本国王”的称号，在致明王朝皇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他如此奉承明朝，是为了贪图特许贸易的利益，从政治体制来看，幕府并没有臣属于明朝，因此，这种情况只以足利义满而告终。

在日中两国政府关系断绝近一千年里，在两国关系上发生了两件政治、军事上的大事。

首先是公元1274年（文永十一年）和公元1281年（弘安四年）元朝两次进犯日本。众所周知，这两次都由于日本借助暴风雨而英勇奋战，元军立即被击退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这时是由中国方面企图侵略日本的。而且侵略者的主体是征服了中国

---

<sup>①</sup> 和铜开珎：公元708年因武藏地区献天然铜，改元和铜。珎字是“宝”字的简体，也有珎为“珍”字异体之说，因此在日语中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译者

汉族王朝的蒙古族，不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这两次所以都能轻易地击退了元军，也未尝不是由于被迫充当元军部卒的汉人和朝鲜人抵抗了元朝的缘故。毫无造船和航海知识的蒙古人，要想越海侵略日本，只好动员刚刚被他们征服的汉人和朝鲜人，但汉人和朝鲜人内心不服元军，船只也造得粗糙，所以一遇上台风就立即坏了，残存在船上的船员们，也就赶快调转船头仓皇逃跑了。就是说，日本人当时客观上得到了汉人和朝鲜人的搭救。

其次，和元寇来犯相反，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经两次（公元1592～1593年，即文禄2年，1597～1598年，即庆长三年）企图进攻明朝。两次都是丰臣秀吉首先入侵朝鲜，主要由于朝鲜人民的力量，部分由于朝鲜得到了明朝的援助，以致遭到了惨败。这是丰臣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

消灭丰臣政权，当上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德川家康，曾经谋求同明朝恢复邦交，但未成功。不过，明朝（后为清朝）的商船频繁驶来日本。日本锁国之后，幕府在长崎的一角设立了唐人馆，允许清朝人暂时住在那里，经营有限范围的贸易。

#### 四、交流中发展的民族文化

除了蒙古进犯日本和丰臣秀吉试图侵略明朝以外，即使在日中两国断绝政治关系期间，也绝不意味日中双方处于敌对关系。直到德川锁国之前，日本人只要有意志、能力和机会，他们就能够渡海到中国去，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在不断地发展。九州一带的领主们与中国商人自由地开展贸易活动；十三世纪镰仓时代，每年从日本开往中国浙江方面的商船，达四、五十艘。由他们从中国输入的大量中国铜钱，在日本国内广泛流通。这种两国人民的自由往来，一直持续到锁国之前。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出现过时而是和平商人、时而又是海盗的日本船队，在朝鲜和中国沿岸一

带进行骚扰。朝鲜和中国方面视为倭寇加以防范。然而中国人和朝鲜人却从未骚扰过日本沿岸。

在此期间，中国的茶树栽培法从宋朝传入日本。大豆也是从中国传来的，因而豆酱、酱油和豆腐的制作技术也是八世纪僧侣从中国学来的，到了中世纪，日本人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生产技术。砂糖也是中世纪末叶输入日本的。大部分蔬菜也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由中国传来的。这样列举起来，不难看出，日本人的食品，从主食的米面、副食的蔬菜，到必需的调味料，以至茶叶等等，总之除了渔猎取得的食品以外，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

在宗教、学术和艺术方面，九世纪以后，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逐渐得到发展。假名文字的发明，就是典型的代表。古代属于中国文化圈各民族当中，日本人最早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佛教方面，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也是日本人独创的。在绘画方面，平安时代产生了“大和绘”<sup>①</sup>，镰仓时代的雕刻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总之，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独创。然而，正如真言宗和天台宗两大派别是空海和最澄在中国学到的，禅宗也是由中国传来的，在佛教方面中国的影响仍然很深。与假名文字相比，汉字仍占主流，在学术方面，汉语经典的佛教哲学、儒学及其他汉学一直占压倒优势。

尤其是儒学，在近代的幕府各藩，具有国教的地位，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还普及到农民和市民的上层。凡是要求取得知识和教养的人，首先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不懂汉字和汉文是不行的。儒家的道德还渗透到那些不识字的民众中间。近代日本的儒学和中国儒学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它同中国儒学并无本质区别。日本人还广泛学习诸子百家学说，包括中国的历史和诗文在内，汉学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教养的基本内容。

<sup>①</sup> 大和绘，即日本画。——译者

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博物学等，大都是由中国传来的。美术、工艺方面的陶瓷器、水墨画和书法等，同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围棋、象棋也是由中国传来的。

然而，统治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学和汉学，基本上是为幕府、诸藩和武士阶级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随着或多或少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市民的社会势力的发展壮大，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国学和兰学兴起，与儒学和汉学对抗起来，不久，前者压倒后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和日本人醉心于西方，过去对中国的尊敬，一变成为侮蔑，很快又发展成为对中国的侵略。

## 第二节 对欧美的从属及对朝、中的侵略

### 一、日本与中国分道扬镳

十八至十九世纪，当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征服了亚洲国家各个民族，逼近清朝统治的中国时，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文明国家之一的地位的中国，无论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以至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已经完全被西方赶超过去了。

1840~1842年英国蛮不讲理发动的鸦片战争，一下子暴露出中国这个古老大国已经变得极其腐败无能。从此以后，中国很快被从南面压迫上来的英国和从北面入侵的沙俄打头阵的欧美列强变为半殖民地，中国边境的广大领土遭到瓜分。

同一时期，日本幕府及诸藩的封建统治体制，也由于经济和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正在从内部崩溃。正当幕府等被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吓破了胆，面对西方束手无策时，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提督培里率领的舰队开进了江户湾，转年，不容分说地迫

使幕府缔结了亲善条约<sup>①</sup>。随后,美、英、俄、荷、法五国,又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sup>②</sup>,从此日本就被纳入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市场。

就这样,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划为半殖民地。然而,日本人民在陪里来航后十五年的1868年,打倒了幕府,接着1871年废除各藩,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向着民族独立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此期间,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却更加深化了。

中国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抵抗,并不比日本人民软弱。公元1850~1864年长达十五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清朝统治和欧美列强侵略的农民战争,在日本并没有多少能和它相比拟的人民革命起义。尽管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而日本却能经过维新走向了自立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想就与此有关的两个问题谈一下。

其一,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军占据上海一带,清政府却借助英法军队对其进行镇压。亲眼目睹这一事实的高杉晋作指出,清朝依靠外国军队来镇压本国人民的叛乱,是亡国的根源。

其二,高杉晋作的契友久坂玄瑞,可能受到了高杉观感的启发,在他1862年的著作<sup>③</sup>中说,英法之所以不对日本进行武装侵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长发贼(太平军)声势浩大。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了,英法必然寇侵我国”。事实上,当太平军在上海地区

<sup>①</sup> 指1854年3月31日日美两国全权代表缔结的《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最早缔结的一个近代国际条约。该条约于1855年2月21日在日本下田完成了批准换文手续,正式生效。——译者

<sup>②</sup> 指1858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大不列颠国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日本荷兰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日本国法兰西国修好通商条约》。因为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安政”,所以这五个条约也称作“安政五国条约”。——译者

<sup>③</sup> 即《解腕痛言》。——译者

被迫失败后,1863年,英国东洋舰队就悍然攻击了鹿儿岛。

高杉的观察道破了中国半殖民化所以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日美安全条约,把日本人民的革命内乱看作外国的“间接侵略”,准许美军出动镇压。一百一十年前高杉晋作对清朝的批判,满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批判日美安全条约。

## 二、“从朝鲜和满洲取得补偿”

久坂玄瑞的话里含有比他自己所想的更加深刻的历史真理。当日本开港的时候,公元1856~1857年,在波斯<sup>①</sup>发动了以巴布教徒为主的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1857~1858年,印度士兵在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大起义。英国虽然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但对它过去那种一味掠夺,分毫不舍的殖民政策和亚洲政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了某种程度的收敛。

接着,英国就碰上了太平天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总结了亲身体会后,1863年写了《大君之都——旅居日本三年记——》一书。书中写道:“亚洲任何民族,不经过顽强的反抗,决不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亚洲人即使在战场上败给西方,也决不停止抵抗,只不过是改变战斗的形式而已。因此,英国的对日政策必须慎重。”日本之所以得以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命运,是由于得到了迫使英国采取“慎重”政策的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大力支援<sup>②</sup>。

可是,幕府末期的志士和明治时期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想同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来对抗欧美对亚洲的侵略。甚至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便一面搞妥协、屈服于欧美,一面企图侵略朝鲜和中国,用来作为屈服于欧美的补偿。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当时思

① 波斯:现在的伊朗。

② 详见拙著《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

想界颇有名望的人物，就是这样主张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1855年(安政二年)，吉田松阴在寄给他哥哥的信中提出了《同志的一致意见》。其中写道：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与沙俄、美国亲善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严守条约)，敦厚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吉田松阴的这种想法，由他的门徒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通过明治政府一步步地付诸实行了。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取代了幕府的天皇政权，从平定东北各藩的反抗斗争那年年底开始，以木户孝允为中心的领导阶层急不可待地拟定了征服朝鲜的计划。虽说这个计划未能立即实现，但公元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即开始同清政府谈判正式建立邦交和缔结通商条约问题。这次谈判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同朝鲜的“上国”——清国之间建立平等的邦交，把朝鲜按低于日本的国家来对待制造根据。

在当时的日中预备谈判中，日本全权柳原前光对李鸿章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sup>①</sup>李鸿章相信此言，并说服清政府订约，于是转入正式谈判。但柳原前光说的却是一派谎言，日本不但毫无和中国同心合力的意思，反而帮助欧美侵略中国，以分沾余唾。1870年6月，当英法以天津的传教士被杀事件为借口，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时，日本政府就对驻日英法公使说，日本愿意向远征军提供食品、燃料以及日本办得到的援助。

在正式谈判日中条约时，日本最初提出的方案，要求日本与欧美一样享有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权等特权，是一个不平

<sup>①</sup>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31页。  
——译者

等的条约。清政府看后大怒，便提出了中国的方案。其第二条指出，两国既经通好，自应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等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sup>①</sup>这也可以理解为日中两国的政治同盟。日方生怕这样一来会被欧美怀疑两国同盟，表示强烈反对。于是中方嘲笑日本说，“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sup>②</sup>于是日方把《中日修好条规》第二条解释为不过是作为友好国家对平时的细微纷争加以调停而已。1871年7月，条约正式签订。

这是一份奇妙的“平等”条约。日中两国都互相享有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权。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侨居的中国人，所以这一规定实质上就等于只有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这就是日本的着眼点。英美法等驻日公使对于条约的第二条内容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谴责日本政府违背了过去向公使们作出不与中国结盟的保证。日本政府一面辩解说，第二条绝无同盟之意，同时又重新同清政府交涉，争取在条约批准以前删除第二条。清政府不答应，日本也就只好批准了。

### 三、“征韩论”和出兵台湾

日本从同中国建立邦交以来，一直就没有遵照条约规定实行平等互利和相互合作，一味争取欧美列强的支持，想在中国享有优越地位。

不仅如此，在批准条约的交涉过程中，日本得知琉球人漂流到

---

①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45页。——译者

②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1卷，第43页。文中的“伊大臣”即日本当时的大藏卿伊达宗城，时为来中国议约的全权大臣。——译者



台湾被土著人杀害了以后，日本政府便以确保日本“属民”的安全为借口，拟定了《台湾“蕃”地征伐要略》<sup>①</sup>。为此，还接受了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的指导，并经公使推荐，聘请美国退役少将李仙得为外务省顾问。李仙得曾于1867年率领美国军舰征讨台湾，1872年充任厦门领事，在归美途中来到日本。他正式当上日本外务省顾问后，便辞退了美国领事的职务（1872年11月）。

不久，西乡隆盛等人鼓吹的“征韩论”，便成了当时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出兵台湾的计划遂被搁置起来。可是，众所周知，从西欧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反对立即征韩，西乡隆盛等征韩派被排挤出政府以外。转年即1874年，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日本政府准备强行进攻台湾。这当然要引起领有台湾的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大使身份亲赴北京，与清政府交涉，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同清政府达成和解。

这次日中谈判达成妥协，全靠驻北京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斡旋。大久保利通的日记里载有威妥玛对他的谈话：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将首先支持日本。在大久保利通从北京回国后还不满一年，即1875年（明治八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便非法侵人流经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挑动江华岛的朝鲜炮台开炮，促成两方交战。大久保政府立即捏造说是朝鲜非法攻击了日本军舰，威胁朝鲜政府，转年1876年2月，迫使朝鲜接受了第一个日朝“修好条规”<sup>②</sup>。

根据这一条约，朝鲜首次向日本开放，但只有日本一方具有治外法权，根据条约附属的《朝日通商章程》，规定日朝两国间的贸易

<sup>①</sup>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65页。  
——译者

<sup>②</sup> 即《日朝江华条约》。——译者

进出口“暂时”都不征收关税，并规定日本的通货（包括纸币）可在开放港口自由流通。日本迫不急待地把不平等的高压条约强加于朝鲜，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这也是日本充当英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凭武力撬开了朝鲜锁国之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在1970年11月说过：“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经常是以强大的帝国主义为后盾而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事实上，日本最初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就是以美国为后盾，侵略朝鲜则是靠英国的后援搞的。特别是英国，自从日本开放港口以来，一贯想把日本当作英国对抗沙俄在远东地区的前哨基地作为它的方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怂恿大久保利通侵略朝鲜，也是为了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向朝鲜扩张势力。

如前所述，最初的日朝条约虽然是日本压迫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但其第一款里却规定：“朝鲜国是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sup>①</sup>。其意义在于表明朝鲜不是清国的“属国”，用来防止将来清国反对日本统治朝鲜。

#### 四、主张联合的民权派

从此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侵略与年俱增，朝鲜对日本的反抗当然也愈来愈强烈。过去一直把朝鲜作为朝贡国的清政府也没有沉默。为了镇压朝鲜民族的反抗运动，为了准备应付因统治朝鲜而同中国发生的战争，日本从1880年就已经开始倾注全力扩充军备。

日本政府就是这样坚持推行了一条一面屈从于英美，一面又从对邻国的高压中取得补偿的路线。但在民间，当时自由民权运动正在发展。运动的宗旨是在国内要完成自由民权革命，在国际

<sup>①</sup> 《日朝江华条约》，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35页。——译者

上要联合朝鲜和中国来抵抗西方对东方的压迫。

例如,对于日本政府要强行吞并琉球王国的企图,民权派报刊《近事评论》指出,如果琉球人民希望自治,日本应努力培育这种萌芽,抢在世界前头承认它的独立,这样来向世界表明强国不得欺凌弱国、大国不可吞并小国的大义。这是日本争取独立之道(1876年6月)。在日中两国围绕琉球归属问题发生对立的1878~1881年,《近事评论》一直批判日本政府一面屈服于俄英等国,一面又对朝中采取高压政策的作法;主张日本应该“合纵亚洲,防遏欧美的势力”,决不可同自古以来唇齿相依的中国打仗。以青年贵族西园寺公望为社长、中江兆民为主编的《东洋自由新闻》也持同样的观点。

1882年,朝鲜士兵和汉城群众举行起义,反抗日本的压迫和剥削。日本立即出兵镇压,还向朝鲜政府索取“赔偿”,并迫使朝鲜承认日本有在汉城驻扎若干军队的权利。于是,以朝鲜宗主国自居的清政府,便出兵朝鲜对抗日本。日本政府大肆煽动日中开战热潮。自由民权派对此一致反对,主张要同朝鲜和中国保持友好。改良主义的改进党最高领导人小野梓也反对日本向朝鲜索取赔偿和进行压迫,极力主张朝、中关系应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日本不应干涉;当务之急是,日本、朝鲜、中国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欧美。

然而,这种国内民主革命和谋求日、朝、中三国联合起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终告失败。围绕朝鲜问题的日中势力之争逐年激化起来。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舰队,7月29日,日本陆军又在朝鲜的牙山和成欢袭击了中国的陆军,三天以后的8月1日,日本政府才正式向清国宣战。

当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进行袭击的前九天,7月16日,在伦敦签署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英国对日治外法权。当时英国外相发表演说指出:“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

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sup>①</sup>，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煽动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日本政府因此才决心开战。这正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所说的：日本“以强大的帝国主义为后盾”，开始侵略中国。

### 第三节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 一、和西欧划等号的特权国

甲午战争时，清政府的主流派几乎没作任何准备。具有四千多年悠久历史、幅员辽阔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亚洲的文明中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实力业已衰竭，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一个迎合西洋、狂妄自大的小国。所以他们万没想到“小”日本竟敢向“大”清帝国挑战，以为即使日本敢于冒险，也不堪一击。

清国因屡遭西洋侵略，也认识到必须加强军备，拥有现代化武器和舰船，1883年以来，清政府声称为了购买十几艘军舰，向人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但掌握国家实权的清国皇帝母亲——西太后，并没有用这笔款去购买军舰，而是以此修建了穷奢极侈的游乐园地——颐和园，寻欢作乐。清国方面认真参加甲午战争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军阀。

日本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在军事方面自不待言，在政治、外交方面，以至在动员国民思想方面，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充分准备，因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根据在日本下关缔结的《马关条约》<sup>②</sup>，规定：（一）、中国要完全停止对朝鲜的干预；（二）、将辽东

<sup>①</sup>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60页。——译者

<sup>②</sup> 下关：又叫马关，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我国通称《下关条约》为《马关条约》。——译者

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三）、赔偿日本战费三亿日元；（四）、缔结新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及其他协定，规定日本在中国享有与欧美各国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五）、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有自由兴办各种制造业的权利，以及资本输出的自由和各种免税等，连欧美各国都没有享受的特权。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侵略朝鲜可以不受清国妨碍，同时还确保了日本在中国与欧美列强享有同等特权的地位。至于割让辽东半岛，众所周知，只因受到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才不得不死了心，但却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此外，《马关条约》中虽然没有谈到，琉球列岛（日本已经把它划为冲绳县）的归属问题，最后却作为日本领土在国际上确定下来，这也是甲午战争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清政府也曾提出自己对琉球的领有权，与日本进行过争夺。还有，当前争执的“尖阁列岛”<sup>①</sup>，本来是中国领土，但日本却乘甲午战争胜利之机，私自作为日本领土划归冲绳县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是一个对朝鲜拥有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但它的国际地位，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受西方压迫的亚洲小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虽然还具有受西方压迫的一面，但它基本上已变成一个与西洋享有同等特权、压迫朝中等亚洲国家的殖民帝国。而且《马关条约》开辟了西洋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取得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及各种免税等特权，也立即为欧美列强所均沾。《马关条约》规定的这一条款，与其说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莫如说是为了唆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英国资本而规定的。清国为了向日本偿还其财政万难负担的巨额赔款，不得不向沙俄、德国、法国、英国等列强借款，因此，清国在金融方面

<sup>①</sup> 所谓尖阁列岛，实指中国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系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译者

也成了西方的附属国,从而也就加深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

## 二、宫崎滔天<sup>①</sup>和孙中山

尤其是日本一提出迫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就引起欧美列强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掠夺中国的边境一带,而且还企图到中国内地占据租界及其他方式的领土扩张。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干涉,当然不是为了维护清国,而是为了三国自己要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及其他地区。于是沙俄“租借”辽东半岛的尖端、旅顺大连地区,德国“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也不甘落后,占领了威海卫。列强进而陆续夺取了经营矿山和铁路的利权。

日本非常焦急。屈服于三国干涉的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首相说:“由于这次战争,我们熟悉了辽东的地理情况,将来设法在朝鲜某处制造事端,把辽东夺回来吧。”政府以“卧薪尝胆”的口号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来报三国干涉的仇,向人民横征暴敛高出战前好几倍的重税,倾注全力扩充军备。尤其把沙俄视为头号敌人。因为沙俄是三国干涉的罪魁,而且当日本刚刚把清国赶出朝鲜的时候,俄国就把自己的势力伸到了朝鲜。日本急于独占朝鲜,甚至做出诸如袭击并杀害不听日本摆布的朝鲜王妃之类的事情,致使朝鲜统治者去仰赖沙俄,于是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便逐渐被俄国所压倒。

日本既然从一个受欧美压迫的亚洲小国,变成同欧美竞相压迫剥削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帝国,那么所谓日、朝、中联合起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或者亚细亚主义等,便失去了现实基础。这种日朝中的反帝联合或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只有在反对日本本身的帝国

---

<sup>①</sup> 宫崎滔天(1871—1922):日本熊本县人。原名虎藏(亦叫寅藏),号白浪庵滔天,以滔天之名著称。——译者

主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如果不反对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仅仅反对欧美的侵略，那么这种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只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在亚洲扩张势力的一种政策。

事实上，甲午战争以后，在“亚细亚主义”和“解放东亚”等名义下，日本“大陆浪人”和“支那浪人”的活动十分猖獗，其中大多数是同日本陆军和一心想向朝鲜、中国扩张的三井等大官僚资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支别动队，真正希望中国人民从清朝专制和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只有宫崎滔天。即便是这个宫崎滔天，也不得不跟头山满和犬养毅等人一致行动，客观上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圈里的人。

在清国，由于万没料到大败于日本，于是连腐败透顶的朝廷也不得不考虑改革了。在此之前，民间文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非常注目日本明治维新及以后的迅速发展，提倡以日本为榜样，改革制度(变法)和强化国家(自强)。甲午战争以后，他们的意见才达到朝廷，眼看就要实行变法，却立即遭到西太后等极端反动派的反击，改革派被赶出朝廷，康、梁亡命来到日本(1898年)。这些清廷的改革派及康梁等人，并不是对打败了自己的日本煽动复仇情绪，而是想从日本“取经”。这本是日本谋求同中国友好合作的好机会，但是，别说日本的统治者，就连那些亚细亚主义者们，也根本不想当个清国改革派的真正的朋友。

曾在夏威夷、香港等地受过近代教育的农民子弟孙中山，和康有为等旧文人不同，早就立志革命，不想改革清廷。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久，1894年，他在夏威夷组织了“兴中会”<sup>①</sup>，在清帝国败于

---

<sup>①</sup> 兴中会：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次年设总会于香港，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译者

日本后返回香港，联合广东群众的秘密结社，策划发动革命，武装夺取广州，因失败而流亡日本。从此，他打倒清朝的决心愈加坚定，后来由美国前往英国。1897年（明治30年）8月，孙文又从英国来到日本。这时认识了宫崎滔天，而且开始与头山满、犬养毅等人交往。

只要一听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革命就毛骨悚然的日本政府和政党的首脑们，对于想要改革、强化清朝的康有为等人，没有予以任何支援，而对彻底的革命家孙中山，却允许他在日本自由活动，还准许与陆军和政府中的侵华积极派相勾结的头山满等人支援孙中山。这可能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如果孙中山等人的运动果能削弱清政府，对日本伺机侵华再好不过了。从甲午战争后到日俄战争前后，中国各地的留学生纷纷来到日本，据说最多时超过一万人。<sup>①</sup>后来的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很多是从他们当中培育出来的。

### 三、英国的宪兵

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必然加剧中华民族的普遍反抗。最初的表现是，1899~1900年，中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义和团武装起义。英、俄、法、德、奥、意、美、日等八国组成三万三千人的联军，镇压了包围北京外国使馆区的义和团。日本出兵两万二千人，相当于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由此在国际上得到证明，为了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镇压中国反帝民族斗争，只有日本能够迅速调动大军。英国对此大为赞赏。

趁着这次事件的机会，日本和其他列强又从中国攫取了新的

---

<sup>①</sup> 参考实藤惠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见《何谓日中关系？》，朝日新闻社编，第113页。



帝国主义利权,其中包括借护卫北京公使馆之名,可让少量军队驻扎在北京的利权。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就是凭这个利权把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部队。

同时,趁列强各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北京之机,日本急不可待地向厦门派遣舰队,并从台湾调动陆军,企图占领中国福建省,但是,还没等陆军开到中国,就遭到了英国的严重抗议,日本政府便慌慌忙忙停止了占领计划。通过这次教训,日本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认识到,无论日本具有如何方便的地利条件,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援,单枪匹马侵略中国是办不到的。

日本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寻求同盟者。因为与日本对立的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俄国,所以日本便同俄国在亚洲的对头——英国结成了同盟(1902年)。于是日本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远东的宪兵,可以在英国的支援下,同俄国在朝鲜和南满争夺霸权。1904年2月,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旅顺口外和仁川海面袭击沙俄舰队,三天以后才正式宣战。宣战前的袭击和十年前甲午战争时以及后来偷袭珍珠港的作法一样,是大日本帝国的惯用伎俩。

日本得到了英美,特别是英国在政治上财政上的大力援助,才胆敢发动日俄战争。日本耗费约十七亿日元的战费中,就有八亿左右是从英美资本家手里借来的。因此,日俄媾和条件也不得限于英美允许的范围。日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独占朝鲜,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并把沙俄从中国夺取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的一段铁路连同一切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及其附属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日本。<sup>①</sup>

从此以后,日本完全统治了韩国(1910年吞并),“满洲”南部

---

<sup>①</sup> 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201—205页。——译者

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进一步威胁清政府，攫取允许日本驻扎军队守卫满铁的权利及若干新的利权，并以所谓《秘密议定书》规定：中国政府同意不在满铁附近修筑并行干线及有损于该路利益的支线；中国政府说明，在东三省地方兴利除弊，认真整顿，使住在该地的中外（日本）商民得安居乐业，同享中国政府的妥实保护等等。<sup>①</sup>这就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满洲，恣意干涉中国内政打下了根基。

而且，日本变朝鲜为殖民地，也是日美、日英瓜分亚洲的一次交易。在日俄媾和会议期间，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来到东京，同桂太郎首相订立密约，双方互相支持，即日本支持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支持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后来不久，修改日英同盟，规定日本协助英国统治印度，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根据这些同英美的交易，才在日俄媾和条约中规定了沙俄承认日本统治朝鲜的条款。日俄媾和以后，日本进而又与沙俄缔结了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秘密条约。

根据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964年）中所谓“日俄战争是从欧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亚洲的圣战”，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牵强附会，该是多么伪造了历史的诡辩。

## 第四节 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 一、帝国主义的优越感

日本政府和军部，不但利用学校教育，还利用报刊杂志、戏剧、广播、浪花节<sup>②</sup>等各种宣传手段，抓紧一切机会，拼命向国民灌输

<sup>①</sup> 所谓《秘密议定书》实为《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并非条约。参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225—233页。——译者

<sup>②</sup> 浪花节：是日本一种用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的鼓词。——译者

说,日本打败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国——俄国;现在已由亚洲的最强国跨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其实,这次战争只是由于得到了英美的援助,才勉强在日本占优势的情况下讲和的,形式上总算是日本战胜了。人民不了解真相,任凭政府和军部任意摆布,相信日本取得伟大胜利,日本已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甲午战争以后,不仅日本的当权者,甚至连普通的日本人也轻蔑、侮辱起中国人来了。对待朝鲜人,他们早就抱藐视态度。日本帝国主义本来就在欺压和掠夺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日本人对个别朝鲜人或中国人即使做出多么不公正、非法的事情,甚至加以侮辱,日本官宪非但不加追咎,反而百般袒护;反之,如果朝鲜人或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哪怕稍有一点点正当的抵抗,日本官宪就立即对朝鲜人或中国人予以非法逮捕和残酷镇压,因而日本民众完全被帝国主义的优越感迷惑住了,这也是不足怪的。日俄战争后的“大国”教育,使日本人对于朝鲜人或中国人,推而广之对于亚洲人的这种帝国主义优越感越来越严重,竟至牢不可破了。而且这种优越感,和头顶“万世一系之天皇”的“万邦无比之国体”这种矜夸、同“忠君爱国”的“大和魂”的矜夸结合起来了。

用这种思想教育国民取得成功,使日本统治者越来越露骨地推行起帝国主义政策来了。如前所述,日俄战争由于得到英美的援助才得以取得成功,所以日本向英美约下,日本没有独占“满洲”的企图;一定向英美各国实行门户开放,保障各国经济活动机会均等。但实际上南满驻有关东军的前身部队和借口保护满铁线路的“满洲”独立守备队,这些军队事实上霸占了南满。英美政府一再抗议说日本政府违背了前约。

元老伊藤博文等人,深知日本经济实力不足,只得依靠英美资本,所以生怕陆军独占“满洲”会惹怒英美。1906年(明治39年)5月,根据伊藤博文的要求,召开了元老和政府、军部的最高首脑会

议，确定“满洲”的门户开放，但掌握实权的军部，还是不认真执行这一决定。

第二年即1907年11月，伊藤严厉批评政府，提出警告说，日本如果不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日本将失去欧美各国的信任，结果会停止对日贷款，那时日本经济就会直接受到打击，尤其会给政府的财政造成莫大困难。他还担心：“日本在‘满洲’的利己主义政策，不仅势必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还会给第三者制造挑拨煽动的借口，难保最后不致重演同一人种的日中战争”，届时日本会遭到全世界摒弃，最后将陷于完全孤立。

到底还是创立大日本帝国的领导者看得准。然而，他所培育的畸型帝国主义和军部，已经不是他能控制得住的了。果然不出伊藤所料，从此以后日本同英美的对立与年俱增，最后竟发展到1941年(昭和16年)的12月8日。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恰恰在伊藤写出上述看法的三个月后，首次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 二、中国同盟会

1908年，日本渔船第二辰丸在澳门偷运武器，被中国官方扣押，日本政府认为这种作法不当，强行要求清政府立即释放第二辰丸，并陪礼道歉，收购该船载运的武器弹药，“赔偿损失”等等，清政府被迫屈服。广东商人提出抗议，并和群众一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一运动立即传到汉口等华中地区，当年6月“满洲”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运动还从香港和马来西亚扩展到东南亚各地和澳大利亚的华侨，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镇压，把运动一直坚持到年底，给日本贸易造成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大众把反帝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日本一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孙文等领导的革命运动，经过重重困难和挫折，稳步成长起来。1905年7月，当孙文第七次来日的时候，东京的三个中国革

命团体<sup>①</sup>，在孙文的说服下，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所谓“民族”，是推翻满族的清朝统治，建立汉族的共和国；“民生”主要指土地革命；“民权”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

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反映出中国的复杂情况，是把外国帝国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敌人呢？还是把满族的清朝作为主要敌人呢？人们不断为这个问题所苦恼，中国同盟会在孙文的领导下，把推翻清朝确定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不是单纯的种族对抗，而是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阶级斗争被罩上了种族对立的外衣。不过，“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汉族斗争”这种思想意识，阻碍了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的提高。

特别是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惊人发展奉为楷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是亚洲的先驱，作为黄种人受到白种人帝国主义的轻蔑，所以日本和欧美不同，会理解并赞同中国通过革命富强起来的。事实上，日本政界中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支持”他们，即使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有时压制革命者，但他们还是能够比较自由地在东京进行活动，这就更加难以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正确的认识了。但是，只要推翻清朝统治是当前的课题，这也就不会成为革命的障碍。

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几乎包罗了中国各省的人，是中国最初的全国性政党。而且它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反对清朝专制的群众秘密结社、各种形式的“会党”，结上了一定的关系。同盟会曾动员民众，在各地举行过多次革命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0日，以武昌的“新军”<sup>②</sup>士兵为主力的武装起义终于取得成功。以此为突破口，革命浪潮扩展到全国，

<sup>①</sup> 即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译者

<sup>②</sup> 新军：清朝用汉族人民编制的新的军队。

1912年1月1日，革命派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推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讨伐革命军总司令袁世凯看到清朝已命在旦夕，便与革命军进行交易，约定以自己充当民国大总统为条件，倒戈投入革命派。因此，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统被迫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遂按前约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 三、东方头一个共和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姑且确定了援助清政府的方针。陆军最高的实权派、伊藤博文死后元老中的头头山县有朋坚决不允许君主制国日本的邻邦建立共和制。可是在政府内部原敬内相等人考虑到革命军将会取得胜利，主张耍两面手法，哪方面胜利就支持哪方面，这种主张在政府内部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为了促使中国的动乱局面闹大、拖长，以便乘机进行武装干涉，创造新的侵略机会，暗中同时向清政府和革命军两方提供武器。海军和关东都督府百般阻挠革命派，而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却按照政府的授意，向革命军提供大量武器和资金，约定革命胜利后取得长江流域的矿山和其他重要利权。

参谋本部利用川岛浪速等“中国浪人”，指使清朝皇族肃亲王和内蒙古王爷分别举兵，策划“满洲”和蒙古的独立，推行日本独占满蒙的计划。朝鲜总督府支持这个计划，驻满领事（外务省系统）表示反对，满铁当局则暗中支持革命派。最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等三方在东京进行协商，结果认为这个阴谋为时尚早便停了下来。但是，参谋本部决没有放弃了这个计划，1916年，又策划规模更大的第二次“满蒙独立”阴谋。

这样，在日本政府、军部和资本家之间，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而且各个系统内部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各个部门都各行其是，各自热衷于彼此矛盾的策略。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巨大

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根本不能从历史上全面地分析、判断中国的革命形势，只是根据军队、警察、间谍以及走情报的一小部分的“绝秘”情报，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来判断清政府和革命派哪方面会取胜，然后把赌注下在自己认为优势的一方。在中国人看来，通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左右摇摆，只是突出一个日本各派势力极其卑鄙的侵略野心。所以，中国的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中间派也好，对于日本哪一派势力都存有戒心，都不相信。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而且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个共和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亚洲首创的共和国。不过，孙文等真正革命派的力量还很薄弱，还没能把民众充分组织起来，因而只好借助袁世凯等认为清朝没有指望的军阀力量，所以，不久，革命成果便被这些野心家们所窃取，形成这些军阀割据抗争的局面，革命派不得不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中国仍然处于革命动荡的状态。

#### 四、“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14年(大正三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列强已无暇顾及远东。正如元老井上馨写给元老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所说的：“这次欧洲大战祸，是大正新政的天佑”，日本帝国主义欢喜若狂。他们想借此机会把统治势力推广到整个中国，便以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不顾英国感到为难而强行参战，向德国宣战。日本海军立即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群岛，陆军攻占了我国山东省青岛的德军要塞，接管了该省的德国利权。

之后，日本不仅不从山东撤兵，反而增派兵力，以此为后盾，1915年1月，向我国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

利权等共四款；第二号，把东部内蒙古和南满洲实际划为日本领土等共七款；第三号，把中国最大的铁矿、煤炭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日中合办；第四号，中国政府不准将沿海港湾及岛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中国军队的武器由日本垄断供给；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享有土地所有权、传教权、铁路和港口利权等，共七款。

第一号至第四号旨在割取中国的重要地区，至于第五号要求，实质上是把中国的财政、军队、警察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夺取中国民族的主权，所以在整个中国掀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连一向卖国的袁世凯也进行抵制，拉拢英美支援。于是日本不得不撤回第五号要求，其他条款则在武力威胁下迫使袁世凯接受了。

过去中国人曾把日本崇为亚洲近代的楷模，对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行径，也尽量给予宽恕。革命派甚至期待靠日本的力量来防止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然而，“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来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重新下定决心，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翌年 1916 年，当中国各地的军阀举兵反对袁世凯搞帝制，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想乘机把不听日本约束的袁世凯搞下去，搞满蒙“独立”，唆使企图复辟清朝的“宗社党”和蒙古部族，在“中国浪人”和形式上退役的日本军人指挥之下，举兵闹事。为此参谋本部向“满洲”特派两名军官，其中一人是小矶国昭少佐。可是，同一个参谋本部的次长田中义一却支持满洲军阀张作霖，策划以张作霖为傀儡来搞满蒙“独立”，外务省也持同样意见。关东都督支持参谋本部第二部，但他指挥下的独立守备队长和驻满师团长却属于利用张作霖派。这种情况在军队内部早已司空见惯，更何况军队与政府之间，意见更不能统一。小矶等人想炸



毁张作霖坐的列车，把他炸死，但失败了。

这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参谋本部和政府商定，想把黎元洪搞成傀儡，于是满蒙“独立”运动完全停了下来。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是在这以后十二年（1928年）。过了三年，即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占领中国东北“满蒙”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拉出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及其旧臣，也就是—些旧宗社党的人物，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就是小矶国昭。可见军部是从1916年起，花了若干年工夫，又把意见统一到1916年参谋本部第二部的路线上来，基本上按照这个计划，炸死了张作霖，搞起了“九·一八事变”。

## 第五节 是实行经济、政治侵略？还是 采取军事高压政策？

###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本，当1918年（大正七年）11月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1月，巴黎和会刚一召开，就想继承旧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并企图把凭“二十一条”从中国夺取的帝国主义利权，在巴黎和会上取得国际的承认。大战末期，中国也参加了协约国方面作战，是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因此，战败国德国从中国夺取的利权，理应无条件地全部归还给战胜国中国。中国的主张是正当的，但英法美却袒护日本，巴黎和会通过了日本的要求。

这一消息一传到中国，点燃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怒火。他们在愤恨协约国和日本的同时，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当时北京的段琪瑞卖国政府。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群众提

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拒绝签订巴黎和约”、“抵制日货”等口号。

游行队伍涌进亲日派卖国贼外交总长曹汝霖的私宅时，遭到中国警察的袭击，三十余人被捕。镇压更激发了学生和市民的斗志。北京的斗争一下子变成全国学生奋起的信号，全国各地学生在工人和市民中间展开了广泛反帝宣传，号召举行罢工。6月5日，上海进入全市罢工，以上海—南京铁路工人罢工为首，各行各业的工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政治罢工斗争。北京政府只好在民众的压力下，表示屈服，6月9日作出决定，免去曹汝霖的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28日在凡尔赛宫内举行和约签字仪式时，北京政府声明拒绝签字。过去一直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政府，首次针锋相对地拒绝了屈辱条约。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第一，出现了群众自觉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和反对国内反动卖国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了。就是说，群众对“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革命的正确目标已经有了认识。第二，广大学生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激励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中国发生五四运动之前，朝鲜爆发了“三一”民族独立起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它都有俄国革命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一共同因素。朝鲜民族的“三一”起义激励了中国的学生。

毛泽东说过，从此中国便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五四运动两年以后，1921年7月，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斗争取得了迅速发展。

## 二、“五卅”运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严重缺点，但它还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同它合作，共产党员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加入国民党。

在日本强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孙中山认为这不是由日本发起的，而是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帝制而炮制出来的，仍然只顾抨击袁世凯，没有完全丢掉过去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五四运动及后来群众斗争的发展，使孙中山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孙中山发展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规定为中华民族的反帝解放及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义，还规定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为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进行斗争的工农的利益。根据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领导机构还吸收了很多共产党干部。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和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可分割的三件大事。现在，大概谁都会理解这一点，但在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军人、官僚、学者和新闻记者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部分学生的反日闹事；中国共产党是充当苏联爪牙的秘密结社；国民党在广东建立的政府只是中国许多军阀政权中一个时髦的形式，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和他们所嘲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反帝斗争既不关心也幼稚无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诞生了，但它的

纲领草案中只有“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撤出军队”，竟然连朝鲜的独立要求也没有写进去。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的浪头，中国民族主义巨大潮流引起了他的重视。这种认识在当时的日本人中间是罕见的，但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工农的革命力量，甚至对于“二十一条”要求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积极地予以肯定。只有三浦铁太郎和石桥湛山主编的《东洋经济新报》，全面而彻底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直到1927年左右，一贯正确理解并支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sup>①</sup>

然而，不管日本统治阶层愿意与否，不久便碰上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1925年2到5月，上海和青岛的日本纱厂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大罢工，日本职员和充当日本爪牙的地方军阀开枪镇压，杀伤了好几十人。为了抗议这一罪恶行径，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于5月30日举行游行示威，租界巡捕开枪射击，又打死了十儿人，这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一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上海等全中国民众的愤慨。在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反帝斗争特别强烈。6月23日，当游行示威的队伍行经英法租界沙面地区珠江对岸的沙基时，珠江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开炮轰击，打死五十二人。这就更加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热情。边境外的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市民也展开了大罢工和抵制英货的斗争，竟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1926年7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开始了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战争。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和工人的热烈支持，10月，很快就推进到长江一线，1927年2月，逼近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华东据点——上海。

---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3章。

### 三、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孤立

这时，日本与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正象二十年前伊藤博文预料到的，日本不仅被中国人所唾弃，而且在帝国主义阵营内也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在巴黎和会上曾经不得不同意日本方面要求的美英法，1922年（大正十一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由日、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等参加的九国会议上，对日本发起猛烈攻击，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日本不仅把巴黎和会上通过的日本继承的旧德国在山东的利权归还给中国，而且日本一贯强调的、日本同中国接壤因而拥有“特殊权益”的主张，也被全面否定了，在“门户开放”的名义下，列强各国在掠夺中国上进行自由竞争。

结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日本让步、承认日本拥有“特殊权益”的《石井—蓝辛》协定也废除了。此外，从1902年以来曾经续签三次、成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国际支柱的“日英同盟”，也与日本的愿望相反，在到期后不再续约。日俄战争后通过三次日俄秘密协定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沙皇俄国，现已不复存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日本特别惧怕和仇恨。

就这样完全陷入孤立境地的日本，竟无视《九国公约》，企图把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和内蒙古）纳入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便于1922年4月唆使奉系（沈阳）军阀张作霖同受英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开战（第一次直奉战争），5月又指使张作霖宣布东三省（满洲）独立。但是，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日本的期望落空了。1924年9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时，由于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倒戈，张作霖打赢了，但冯玉祥和张作霖不同，不想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和南方的国民党秘密勾结起来。1925年11月，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与冯玉祥合谋，掀起叛乱，日军马上介

人，援助张作霖击败郭军。张作霖的地位虽然姑且保住了，但日军露骨的干涉行动，点燃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反日怒火。这样一来，日本想把张作霖当作傀儡来独占东三省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而且从冯玉祥的举动也可看出，国共合作统一中国的形势，已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上述北伐战争正在取得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英国帝国主义很快就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加深接触，企图笼络蒋介石使革命陷于流产，而日本的统治者，军部自不待言，政府和议会也都只顾考虑如何阻挡国民革命统一华北，以及如何防止革命进而扩展到东北地区的问题。当时的日本内阁是继1924年组成的护宪三派联合内阁之后的宪政会的若槻内阁，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在对中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尤其要把东北置于日本独占之下这点上，这届若槻内阁、币原外相同军部和其他统治势力是一样的，但若槻内阁认为，经济力量薄弱的日本，首先应和英美保持协调，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若槻内阁的这一方针引起了军部、枢密院、在野党政友会等的不满，他们要求开展“积极外交”和“强硬外交”。尤其当北伐军即将逼近华北的时候，他们感到危机严重，便想伺机赶快推翻内阁。

恰在这时，1927年（昭和二年）3月，发生了空前的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浮肿似地膨胀起来的资本，战后仍然未能收敛回来，政府虽然用各种救济措施，延缓了因通货膨胀导致的崩溃，但怎么也挺不下去了。为了救济导致金融危机的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台湾银行，若槻内阁向枢密院提出了紧急敕令案。可是，在枢密院内，以袒护政友会的伊东巳代治顾问官为首的一些人，竟不谈敕令案的可否，却始终攻击政府“对华软弱”，否决了敕令案，4月17日，迫使若槻内阁垮台了。

后来，由身为陆军大将、从辛亥革命时期就以强硬侵华派闻名

的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身分组成了内阁。外相由田中自己兼任，森恪任外务省政务次官，实际上森恪代理外相。森恪是在中国经营煤矿等事业的三井系统的资本家，与关东军关系甚密，是众所周知的“对华强硬”派。

## 第六节 为走向“九·一八事变”铺平道路

### 一、“东方会议”

田中内阁采取的金融危机对策是，拿出近二十二亿日元的救济资金闯过了危机，并清理资本不足一百万日元的银行，确立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第一等五大财阀银行在金融和产业界的垄断地位。

政府一面应付危机，一面以“保护侨民”为名，于5月28日赶紧派两千名关东军出兵山东（第一次出兵山东），妄图在那里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上。接着从6月下旬起，召集军部和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官及满铁首脑，举行了历时十天的“东方会议”，讨论了对华政策。会上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用“内科的办法”，即用外交和经济手段，捍卫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东北的帝国主义权益，而军部等人却主张用“外科的办法”，即用军事办法一举解决。会上两种主张互相对立，结论是两者兼用。

7月7日公布了东方会议决定的《对华政策纲要》。“纲要”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来，对于“中国本土”，“要与各国友好合作，共同促进稳健分子（指蒋介石）建立中央政府”；同时表明：“如帝国在华权益及在华日侨生命财产有被非法侵害之虞时，要酌情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明确表示了武装干涉的意图。对于“满蒙”则说，因为“满蒙”“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这是主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前兆），日本负

有“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安居之地”的特殊责任和义务，“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对我特殊地位和权益有侵害之虞时……须当机立断，采取适当措施”。亦即坚决把东北四省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为此要有诉诸武力的决心。次日即决定增兵山东。

这就为四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铺平了道路。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日本来独占的企图，在参谋本部乘辛亥革命之机阴谋策划“满蒙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满蒙独立”阴谋。在东方会议之前，“满蒙独立”本是陆军的部分秘密工作，到了1927年（昭和二年）东方会议以后，具体的时间和办法姑且不论，日本独占“满蒙”的方针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根本不是出于军部中央，当然更不是驻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要求的产物，而是政党内阁、军部和驻外的外交官、资本家代表（满铁）等人汇集一堂，用了十天时间，经过慎重讨论审议、作出决定而公开发表的。而且对于这一政策，在野党的民政党（原宪政党）、资本家团体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所有部门，都没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对这种政策和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的，只有重新组织起来的非公开的日本共产党及受其决定性影响的劳动农民党和其他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中，只有日本劳农党多少表示了反对，社会民众党实际上是赞成田中内阁干涉中国革命的。

在日本田中内阁组成之前，中国蒋介石已经公开背叛了革命。即1927年2月，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合作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但蒋介石表示反对，并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解除了工人武装，逮捕了几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未经审判就全部枪决了。接着，4月18日，蒋介石在英国支持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并宣布排斥共产党。武汉政府主席汪兆铭与蒋介石串通一气，



6月转向反共，9月与南京政府合流。

面对国民党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下定决心进行武装抵抗，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8月1日，朱德等率领的中共军队发动了南昌起义；接着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湖南农民秋收起义；10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2月广东公社等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等等。

在此期间，蒋介石政权停止北伐，全力以赴地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而日本在1927年8月把派去山东的军队姑且撤了回来。1928年4月，当国民党政权再次北伐时，日本政府便又急忙从内地派往山东一个师团（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3日，驻扎山东济南的日军寻衅阻挠北伐军进攻，双方发生冲突，演成“济南事件”。日本政府故意把这一事件大加渲染，说这是一起杀害日本侨民的事件，以此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占领了济南之后，又增派了一个师团（第三次出兵山东。山东日军总数约达一万五千人）。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认为，张作霖若仍留在北京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对日本不利，便动员他撤回根据地奉天。张作霖无奈只好服从，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却认为，不肯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反而是个绊脚石，便在奉天附近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火车，把他炸死了。早在1916年，关东军就曾试图这样干而失败了，这次竟取得了成功。河本大作等人把这一事件的肇事者捏造成为国民党，还计划以维持“满洲”治安为名，一举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但由于关东军的首脑们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制止了这一行动。

日本政府、外务省认为张作霖还可以利用，因而对军队的任意胡来甚感恼火，但是却对人民一味掩盖日军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把一切都归咎于国民党。政党、财界和新闻界的首脑们旋即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他们也没有把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一起责备

军部，而是与政府和军部同唱一个调子，煽动日本人民的反华热潮，同时又把这一事件当作了倒阁的炮弹。陆军当局只是悄悄地让河本大作退役，并未加任何刑事处罚。不止如此，后来河本竟当上了满铁的理事。总之，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于炸死张作霖一事，只是有人责备政治上干得不够漂亮，至于在拉着日本人民执行日本的大方针——企图否定张作霖等中国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宁肯诉诸武力也要把中国东北四省完全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上，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 二、伦敦裁军会议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三次出兵山东、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和炸死张作霖等，促使中国人民群众把反帝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五卅惨案”以后，英国一度成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但是，英国巧妙地把蒋介石拉拢过去，扭转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矛头。日本占领济南和炸死张作霖，使日本帝国主义想用武力统治中国的企图公开化了，这就加剧了日本同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英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站在同一立场上。结果就成了唯有日本同中国的统治者以及中国人民为敌了。

由于田中内阁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过于露骨和拙劣，它在日本统治阶层中也陷于困境，遂于1929年(昭和四年)7月辞职，由民政党的滨口内阁接替，币原喜重郎就任外相。滨口内阁是地道的大资本家政府，实行了产业合理化、紧缩财政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等三大政策。即通过彻底整顿中小企业、降低工人工资、解雇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实行产业合理化，以此促进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压缩财政，收缩通货，以降低物价，提高出口能力(财政紧缩政策)；解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开

辟引进外资的途径(金解禁)。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政策，就必须开展币原的“协调外交”。日本政府不再对中国搞露骨的武装干涉，1930年初，参加了伦敦召开的日、英、美、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压制海军当局，坚持把大型巡洋舰吨位保持在对美英七成的意见，向英美表示妥协，同意改为六成。这就遭到了以海军军令部为首的军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政府擅自决定兵力违犯了天皇的军队统帅权，枢密院中多数也唱这种调子。但是，政府得到广大人民和财界的有力支持，断然反击军部和枢密院，终于签订了裁军条约。

然而，滨口内阁和币原外交并不是不搞帝国主义了，它只是装扮得比军部时髦些，把招牌涂成资本利益第一罢了。前田中内阁时期，为了“总体战”统制和利用资源，在内阁设立了“资源局”。滨口内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资源局”，并开始了战时产业动员演习和空袭时军用物资的生产和运输的演习。同时，为了准备靠国家同垄断资本融合一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进行总体战，内阁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输出组合法》等，开始了经济统制。由于紧缩财政，陆海军省的经费多少削减了一些，但在财政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增大了。政府全力扶植重工业，促进坦克、舰艇和飞机的生产，1931年春，日本首次造出了国产重型轰炸机，同年夏季，首次编制了用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对殖民地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例如，1929年11月，以朝鲜光州中学生抗议日本人侮辱朝鲜人的运动为开端的学生和工人的斗争，受到宪兵和警察的残酷镇压。1930年11月，台湾雾社当地居民一千五百人，因警察侮辱女性，愤怒掀起了暴动。日本政府不仅调动地上部队，还出动飞机，对部落居民进行烧光、杀光的血腥镇压。

在日本国内，对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反对战争和反动统治的革命势力，也大肆镇压，远比田中内阁为甚。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人，1929年是四千零九十二人，1930年达六千一百二十四人，到1931年竟超过了一万人。这些数字从反面证明了左翼势力的发展情况，同时也说明滨口内阁如何扩大解释治安维持法，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在排除“思想国难”的名义下，思想本身也遭到了镇压。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却放任不管。1931年3月，陆军军官的秘密组织“樱会”，和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势力勾结起来，并吸收部分社会民众党人，策划旨在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军部独裁政权的武装政变。这一阴谋由于宇垣一成畏首畏尾而失败了，但搞阴谋的军人和民间人士并未受到任何追咎；宇垣依旧担任陆相，对于国民完全隐瞒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滨口内阁的产业“合理化”和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萧条，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大批工人被解雇，工资普遍下降。

而且，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危机。工业生产降到危机前百分之三十至七十，进出口也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失业者达几十万人，若包括回乡工人在内，超过三百多万。物价下跌，特别是米价和生丝的价格，比过去降低了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农村也变得毫无生气。加上1931年北海道和东北地方因遭到霜灾大歉收，农民的遭遇惨不可言。全家自杀、卖儿卖女、学童缺食等情况，全国农村到处可见。

### 三、“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对日本统治阶级来说，除了“经济国难”以外，又加上了“思想国难”。视线一转向国外就会看到朝鲜、台湾的反日斗争正在高

涨，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锋芒正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的北伐以1928年6月阎锡山部队进入北京宣告基本胜利，继张作霖之后统治东北三省的张学良，誓死抵抗有杀父之仇的日本，取消了东北三省独立宣言，与南京政府合作（1928年7月）。他引进英美资本，着手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和港口。这是公然无视日俄战争后强加于清政府的“秘密条约”的行动。如果照此下去，日本不但不能独占东北三省，最后或许会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及英美资本从东北驱逐出去。

此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因经济危机而一筹莫展。社会主义苏联却与此相反，从1928年起，成功地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苏联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日益扩大。这就支持和鼓舞了与苏联接壤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斗争，从而更加深了日本统治阶层尤其是军部的危机感。

大日本帝国受到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袭击，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滨口内阁及其幕后的财界，决定首先把恢复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但陆海军军部却坚决反对。特别是陆军认为，如不重视“满洲”的形势，赶紧把它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并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痛击“赤化的策源地”苏联，就不能把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政府强行签订伦敦条约，使军部和民间的军国主义分子极为愤怒，1930年11月，滨口首相在东京车站遭到受军部煽动的右翼青年的狙击，负了重伤（旋即死亡）。转年，即1931年，发生了前述的三月事件。在政府和执政党内，安达谦藏内相和中野正刚等一派，从1930年底就策划建立“举国一致内阁”，即为了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内阁。在野党的政友会，不停地攻击政府当局对“满蒙”的“软弱”和“无能”。

三月事件前后,政界和财界人士曾私下传说,今年秋天,好象要在“满洲”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政府和军部竭力为战争做舆论准备。叫嚣“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7月,在南满洲的万宝山,关东军特务唆使朝鲜农民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并把这一事件捏造成中国人威胁日本人生命财产的重大事件来大肆宣传。8月,公布了所谓陆军间谍中村大尉被张学良军队逮捕杀害的事件,煽动说:“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正面临危机”。这时陆军已经宣布改变关东军的配备,作好了临战态势。

在8月4日的师团长会议上,南次郎陆相发表训示,暗示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把训示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在内阁会议上,币原外相提醒南陆相,指出他公开发表训示内容的作法是不妥当的,但对训示内容并未加反对。1930年12月,币原自己也曾就中国方面公布计划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一事,训令驻外机构“要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此举。此外,若槻首相(在滨口重伤辞职后就任首相)就其在8月民政党大会上的讲演稿,要求内阁会议予以理解。讲演稿中也谈到,“中国的措施如有不当非法之处,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有时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对此准备有所松懈”,号召进行战争准备。8月31日,在政友会的干部会上,森恪等人组成的“满蒙调查团”报告调查结果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夕的状态”,“确信为了要把日华关系恢复到合理的位置上,必须有待于国力的发动。”干部会同意了这种意见。

#### 四、“上海事变”和“伪满洲国”

总之,包括币原外相在内,无论是政府、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也都和军部一样,决心近期要在“满洲”发动战争,并在大肆制造舆论。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的部分军官和参谋本部的部分军

官合谋，在奉天(沈阳)郊外的柳条沟炸毁了满铁的路轨，并捏造说是中国军队干的，立即出动关东军，攻击奉天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旨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宣而战的战争，即所谓“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手法发动战争，就连关东军司令官、陆军中央首脑和政府事前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手法发动战争的意图。不过，如前所述，军部中央自不待言，政府和政党也都为在最近占领东北地区的战争下了决心，做了准备。9月21日，日本的朝鲜军司令官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派出四千名(公布的兵员)士兵，越过国境进攻“满洲”。朝鲜军司令官这种明显蹂躏统帅权擅自出兵的干法，不但未受任何责难，反而称赞他英明果断，若槻内阁竟也无条件地承认了这笔军费开支。日本政府一面这样干，一面又再三声明“不扩大事态”，但无论日本国内还是国外，谁都不信。事实上战火一天天地蔓延起来了。

美国虽以激烈的言辞指责日本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sup>①</sup>，但它因全力应付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未能对日本作出任何有效的牵制。

日军为了把欧美列强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利权集中的上海，1932年(昭和七年)1月，在上海雇佣中国地痞流氓杀害了日本僧侣。借此机会，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方面挑衅，引起冲突，2月，陆军的大部队也在上海登陆，陆海军共同以“保卫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为托辞，2月20日，对上海发起总攻，战火终于笼罩了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奋勇抗击日军，日军被打得狼狈不堪。这时，日军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满洲”，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2年3月1日炮制出来一个由原清朝宣统皇帝溥仪执政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上海方面的战斗已无需再打下去，3

<sup>①</sup> 《非战公约》：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1928年，在巴黎签订，参加国共六十余国。——译者

月3日，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以中国军队业已退到当初日本要求的距离以外为理由，声明停战，逐渐缩小战线，5月5日，正式签署了日中停战协定。

美英等列强各国，虽然口头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但因忙于应付经济危机，不能给日本以有力的还击。另外，内心还期待日本从“满洲”北上进攻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姑息态度。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联盟决定不要立即谴责日本，首先调查“满洲”实际情况。于是以英国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伪满洲国成立宣言发表后不久进入“满洲”。对此，日本当局不加理睬，1932年9月，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缔结了《日满议定书》。议定书只有两条。一，伪满洲国无条件地承认日本及日本人在“满洲”的一切既得权益；二，为了“共同防卫”，同意日军无限制地驻在“满洲国”。这等于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伪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质上是日本的殖民地。由此可以看到名为独立国实为殖民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殖民主义的“先驱”。

后来，国际联盟调查团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李顿报告书》。报告书认为日本的行动确是侵略，建议撤出日军，但同时又强调东北的“赤化的威胁”，主张把它从中国分开，改为自治区。1933年2月，日本政府不但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在热河省发动了新的作战。开战后的2月24日，国联大会根据《李顿报告书》，决定把东北改为由列强各国共同管理的“自治区”，制定了动员日军撤出的劝告案，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国反对（只有泰国弃权）通过了大会。日本因此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这就等于宣布日本宁愿在世界上孤立也要继续侵略中国的决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承认伪满洲国和退出国际联盟问题，民政和政友两党比政府和军部还要积极。这些政党人士并不是为了尽量缩小战局和尽快结束战争作出努力。他们虽然反对军部擅



弄权势,但并不反对战争。纵令他们在内部私下议论了些什么,但在人民大众面前,则比军部更加积极地煽动了战争狂热。

## 第七节 战线扩大,国内法西斯体制的推进

### 一、五·一五事件

在军部和政府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政党也一味追随甚至比军部更积极地煽动战争狂热之前,他们“保卫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宣传,还未博得人民的响应。战争开始后一个阶段,国民还没有陶醉于战争的狂热。例如:据说在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原驻地仙台市,当满铁豢养的军国主义团体“满洲青年联盟”召开煽动战争狂热的讲演会时,台下有三十多个听众大喝倒彩,使得讲演者下不来台,恼恨之余想在讲坛上切腹自杀。还有,象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等主张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钻了政府严格检查的空子,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非法性。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及其直接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和文化团体的反战活动也非常活跃。全协登记会员在1931年底就有一万人,至少有五倍于它的工人受到它的影响。

在军部和右翼势力看来,不能利落地收拾这种局面的政党内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开始不久,1931年10月,三月事件的主谋们又在策划新的政变。虽然这次政变又以未遂而告终,但迫于这一阴谋幕后人——军部的压力,若槻内阁不得不于12月辞职,代之以政友会的犬养内阁。新内阁组成的当天,便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口,改成通货膨胀和战争财政政策,加强了对左翼的镇压。尽管如此,右翼和军部仍然不满意。

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首脑团琢磨,分别于1932年2月和3月,被“血盟团”——以农民出身青年为主力的

右翼团体——的团员杀害。接着，5月15日，一伙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首相，这就是“五·一五事件”。

对外的侵略战争和对内的法西斯化，两者形成一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1932年10月和1933年2月全国接二连三的大逮捕，致使日本共产党几乎遭到致命的打击，1933年6月，被捕入狱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等人转向拥护天皇制和赞成战争，从此以后，狱内外的党员和共产主义同情者也争先恐后地表示转向，到1935年2月，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机能。到了这时，全协、左翼的农民组合、文化团体等也全都崩溃了。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众党和劳动总同盟从一开始就支持战争，全国劳农大众党和它的基层组织劳动组合虽然初期曾经主张反战，但不到一年就转变了方向，1932年7月，社会民众党和劳农大众党合并组成社会大众党，确定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三反主义”和“尊重国体”为纲领。纲领中的“三反主义”，其实是反对共产主义，尊重天皇制、支持战争和法西斯化。

自由主义也遭到了无情的镇压。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泷川教授被开除公职；1935年春，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sup>①</sup>被取缔，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京大事件发生时，京大、东大等全国的学生还展开了捍卫学术自由的斗争，但到了“天皇机关说”被取缔时，哪里都没出现有组织的反抗。

只不过动用了几个师团兵力的局部战争，开战以来还不到四年的光景，左翼和自由主义者们便都轻易地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每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对于现在中国人民把日本帝国

---

<sup>①</sup> “天皇机关说”：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学说，认为天皇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关，不是日本国家的主体，主权属于国家。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认为这个学说损害了日本天皇的绝对主义权力。——译者

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呢?

在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同时,侵略战争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继1933年春季侵略热河省之后,又侵入了华北。借口是打击扰乱“满洲国”治安的根据地,这和现在美军以打击支援南越民族解放战线的根据地为借口,轰炸越南北方、进攻柬埔寨的作法,如出一辙。对于日军入侵华北,蒋介石几乎毫无抵抗,5月底在塘沽同日军缔结了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南京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把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划为非武装地区,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从此以后,日本便捏造中国方面违反了《塘沽协定》,以此为借口,扩大并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

## 二、长征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但对中国共产党却大肆“围剿”。从1930年底到1934年3月,前后四次倾注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均告失败。1933年10月,又调集百万大军和二百架飞机,发动了第五次“剿共”。当时王明极左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1934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工农红军不得不放弃江西省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奋力追击,对日本的侵略,似乎毫不介意。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了侵略东北以后的一系列战争。

然而,对伪满洲国的经营并不顺利。到1933年初,日本基本上打垮了张学良等旧军阀的抗日军队,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游击战争却从此活跃起来。1933年秋,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组建了有七个军的东北抗日联军,其兵力最多时达五万人以上。为了讨伐这些抗日军队,日本不得不投入远比占领初期还多的军队。

伪满洲国的经济并没有取得发展。军部最初曾扬言不许财阀进入“满洲”，但没有垄断资本的合作，经济工作就无法开展。于是立即转而积极欢迎财阀资本，兴办军需产业。但这只是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所以，财阀虽然赚了钱，一般产业却得不到开发，再加上无休止的“讨伐”战和日军的掠夺，使得农业生产显著下降。东北三省的农作物产量，战争开始的1931年为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第二年下降到一千五百万吨左右，后来也只保持在一千五百万吨至一千七百万吨上下。东北特产的大豆和小麦受到的打击最大。这样，东北的基本生产人口——农民群众越来越贫困，势必从中不断涌现出抗日战士。

因此，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便以“打击抗日根据地”的惯用逻辑，更加猖狂地侵略华北，1935年5月，把《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军队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抗日运动。后来，又炮制了华北居民的“自治运动”，11月，在河北省炮制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sup>①</sup>，12月，又策动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建立一个管辖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然不抵抗，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却横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面前。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武装抗日，同年7月以后，令抗日先头部队冲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北上抗日，在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以往的极左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接着又克服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贯彻了毛泽东的北上抗日的方针。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

---

<sup>①</sup> 实际是1935年11月，日军傀儡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同年12月30日，才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译者

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一年以后，红军的第二方面军也到达了陕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延安定为首都，巩固了陕西、甘肃、宁夏等三省的革命政权，把它作为抗日根据地。长征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懂得：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史诗；红军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等无法比拟的真正英雄；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在红军长征经过的纵横十一省和两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和抗日的种子。

在长征途中，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呼吁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斗争。北京学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反对日本强迫宋哲元建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毅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16日，北京学生不顾军警的镇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示威运动。在这种压力下，宋哲元也就不能再当百分之百的日本傀儡了。同时，上海等全国各地人民，抗拒蒋政权的镇压，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 三、二·二六事件

这时，在日本军部内部，在同等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目标下，“皇道派”和“统制派”<sup>①</sup>之间的对立却激化起来。1935年11月，皇道派军官在办公室里刺死了统制派首领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以此为序幕，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6日，东京师团的皇道派军官们率领部下发动了政变。叛乱于第四天平定下来，他们的

---

<sup>①</sup> “皇道派”与“统制派”：两者都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的派别。皇道派主张，必须在拥护天皇的名义下，对现内阁发动武装政变，建立军部独裁。统制派则认为不经政变，也可以实现军部独裁。——译者

军部独裁目标，实际上是由统制派实现了。

事件平息以后，按照陆军要求，原外相广田弘毅当上首相，组成了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涂上了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1936年8月，召开有首相、藏相、陆相、海相和外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规定“在排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迫使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把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属国），筹划我民族和经济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向外南洋<sup>①</sup>方面发展”。后来发展成为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世界为敌的战争。它的最初设想，早在这时就有了萌芽。

二·二六事件和广田内阁的出现，使中国人民更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惕。1936年5月，中国各地的各界救国会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关东军唆使内蒙古傀儡军进攻绥远，被傅作义的军队击溃，这就越发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斗志。然而，在绥远取得全面胜利的11月23日，蒋介石逮捕了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开始对救国会进行全国性的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这种卑劣行径的回答，就是12月的西安事变。

被部署进攻陕西解放区的第一线部队司令张学良，要求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后，便于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把他监禁起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立即赶到西安，在他的说服下，蒋介石签写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誓约而被释放。

这时，战时经济使日本人民的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对于军方的压制越来越有反感。这种动向也反映到国会中去，在议员中也出现了多少批判军部的言论。军部认为广田内阁里还有政

---

<sup>①</sup> 外南洋：日语“南洋”指太平洋西南部各地，内南洋指战前日本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加罗林群岛一带），此外各地为外南洋。——译者

党的残余势力,这是不能允许的。1937年1月,便把内阁搞垮了。元老和重臣们推荐原陆相宇垣一成接任首相,但由于军部的反对而流产,改由原陆相林銑十郎组阁。人民对这个内阁的批判十分激烈。在林内阁于3月份解散国会后的大选中,执政党惨败,不仅政友和民政两党合起来拥有绝对多数,而且无产阶级政党也取得空前的票数,有三十八人当选。军部唯恐如再坚持拥护林内阁会连累自己,便把它赶下了台。6月4日,近卫文麿公爵在军部支持下组成了内阁。

#### 四、“柳条沟事件的重演”——芦沟桥事变

军部面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日益强大,日本国内民心背离感到焦虑,内部主张此时应给抗日中国一击的气氛浓厚起来了。1937年7月7日夜,一中队日军正在北京郊外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据中队长报告,听到来自中国军队方向的十几响枪声。当中队长急忙集合部下作应战准备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他立即派一名传令员把这种情况报告给驻丰台的大队本部,大队长用电话报告给北京的联队长,接到联队长指示后,做好了战斗准备。

翌日午前一点前已把兵力在指定地区展开。随后三点半左右,又听到来自中国军队的三声枪响。大队长向联队长一报告,联队长命令断然开始战斗。这样,在凌晨五点三十分便开始向宛平县城外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以上是军部对这一事件的官方说法。但是,第一,没有任何关于最初“十几响枪声”是来自中国军队的证据,而且也无法证明这些枪声是实弹射击,仅仅是中队长的主观判断。第二,“失踪”的士兵实际是在大便,集合时只迟到了一会儿,而且中队长没有及时将此情况报告大队长,在大队作好战斗配备后8日午前2时许,中队

长遇到正在前线视察的大队长时才告诉他的<sup>①</sup>。

而且曾努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当时驻北京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少佐,在他写的《中国事变回忆录》一书中写道:芦沟桥事变发生前不久,北京人们就曾担心“柳条沟事件的重演”;东京在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也曾私下议论说“七日晚上,华北将要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这个事件是否是日军蓄意炮制的“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很值得怀疑。即使退一步说,中队长的报告属实,中国军队果真开了枪,而故意把这种偶发的小小事件大加渲染的,也是日本军部。驻在当地的日军,早就阴谋占领芦沟桥一带。经过当地日军同中国方面的交涉,在日方的高压下,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终于表示屈服,全面接受了日本的要求,11日傍晚,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事件基本上就地解决了。

然而,就在这一天,东京政府接受了陆军当局的要求,内阁会议决定调动以关东军和朝鲜军各一个师团,日本本土三个师团为基干的步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部队,派往华北。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近卫首相还把贵众两院、财界、舆论界的代表邀至官邸,要求各界举国一致团结协作。

在中国,8日,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彻底抗战的号召。蒋介石也迫于人民怒火的压力,17日在庐山同周恩来会谈,承认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国准备抗战。

在日本军部内部也有人主张“不扩大”战争,但“扩大派”却坚持干下去,政府当局虽然口称不扩大,但在行动上却步步积极地同军部采取同一步调,在煽动人民的战争狂热方面,甚至超过了军部。7月28日,驻华北的日军向北京、天津等地区发动总攻击,到8月4日,占领了京津一带。8月13日,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

<sup>①</sup>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战端。翌日，日本政府声明：“为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采取断然措施”，决定也向华中派遣陆军部队。

日本就是这样决定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最初把此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但到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又改称为“中国事变”。哪里是什么“事变”，明明是日本发动的空前的大规模战争。

## 第八节 日本侵略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

### 一、平型关的战败

在发动战争之初，军部和政府当局根本没有想到这次侵略会演变成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命运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陆相杉山元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天皇报告说，用两个月时间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在声明“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惩罚不逞之徒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这样稍微灸治一下，中国方面或许会象过去一贯那样，马上就变得服服帖帖的。所谓军部擅自发动战争、政府无奈被牵着鼻子走的说法，纯属弥天大谎。据说近卫内阁里两位政党出身的大臣——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铁道相）和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邮电相），就曾在内阁会议上主张“要趁此机会把中国军队彻底打垮”，比军部大臣还强硬<sup>①</sup>，他们也认为这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再者，从中岛和永井的发言还可以看出，即使说这次战争是军部发动的，而政党及其所代表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也积极表示了赞成。因为他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取胜。

然而，回想远在明治年代，甲午战争是在事先作了十多年的周密准备，并倾注全力主动发动的；而清政府的主要当权人物并无战意，只有李鸿章的北洋军阀勉强应战，因而日本才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日俄战争则是靠英美的大力支援，日本才在优

<sup>①</sup> 风见章：《近卫内阁》。

勢的情况下媾和的，但在对人民隐瞒真相、灌输取得“伟大胜利”之中，昭和年代的军人和政治家们，竟然自己也确信无疑了。

再说近的，1931年开始的侵略东北战争，以不到两万人的关东军，转眼就打败了二十多万的张学良部队，军事上确实是一大成功。但这次战争也是日本方面周密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局部集中了优势兵力，还集中动用了对方一架也没有的飞机，出其不意地袭击毫无准备且有内讧的中国军阀而取胜的。塘沽协定和后来日军人侵华北，所以唾手而得，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总司令蒋介石只顾全力以赴地讨伐共产党，根本没有心思抗日。当中国方面有了抗战意志时，如1932年上海战中同第十九路军的战斗，1936年绥远战中同傅作义部队的战斗，日军及其走狗就未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的历史教训，对于那些沉醉于自己创建的“无敌皇军”神话的军部、政府、政党来说，就根本没有装进脑子里去。他们直到如今还执迷不悟，许多群众还在相信军部所作的宣传，以为在中国战线上“皇军确是无敌”。很多历史书对于“皇军”决不是“无敌”的、它们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中经常败北这一事实，也写得含糊其辞。

“七七事变”以后，情况不比过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虽然本来无心抗日，但他也不得不同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达五、六亿的中华民族充满了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站在其前头的是以长征的胜利证明了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同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共产党就把原来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1937年10月，又把红军主力长征后仍然留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只要抗日，不论是谁，也不管过去情况如何，都一律贯彻了团结的方针，使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从属于反帝的抗日民族斗争；并改变了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对抗日地主只实行减租减息。

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象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察觉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

占领了京津地区的日军，从8月上旬开始，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四个方面进攻，到年底控制了北起绥远省包头、南至山东省济南的华北一带。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几乎不战而溃败。

然而，当9月25日，日本出动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四千兵力和一百辆汽车，企图从万里长城的平型关侵入山西省时，尽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武器装备只是一些少量的旧式步枪，处于显著的劣势，却在平型关附近的公路两侧山地英勇伏击日军，把它彻底打垮。日本空军前来救援，但因双方混在一起展开白刃战，未能进行轰炸。八路军牺牲了一千人，打死打伤日军三千多人，缴获一千多支步枪和很多机关枪、大炮等。八路军的新式武器装备，就是这样完全靠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武器来补充的。

平型关歼灭战，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取得的首次胜利。它完全证明了武器装备处于显著劣势的中国军队也能战胜日本的精锐部队，这次胜利使八路军及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接着，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在日军的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等地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

## 二、南京大屠杀

日本以陆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舰队及空军等几万兵力，向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几乎没有前进一步。11月，指派新兵团在上海背后的杭州湾登陆，这才打开了局面。尾随中国军队战略退却之后，12月13日，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蒋政权迁到汉

口。

当时日军残杀了中国俘虏和男女老少市民二十万人（一说是四十万），干尽了放火、抢掠、奸淫的残暴勾当。日军用机枪一次枪杀几百中国人，或把中国人装进船里沉入长江，或挖坑将其用汽油烧死在坑里，或把无数妇女强奸后残酷杀害，等等，可谓极尽残暴之能事。这和一般在战场上常有的个别士兵的暴行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在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西伯利亚战争中，日军就干过这种勾当。后来在同英美的战争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也干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勾当。面临顽强的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军队就疯狂地干这种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就在它的占领地区干过这种事，最近还暴露美军在越南湄公河进行了大屠杀。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发生动摇时，纳粹德国的驻华大使为日中媾和进行斡旋。上一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防共协定，表面上是日德共同防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结成了反苏的政治同盟，所以日本对德国的斡旋寄托了希望。特别是参谋本部，警惕与“满洲”接壤的苏联，竭力主张尽早结束日中战争，以便全力投入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然而，一旦看到日军占领南京已成定局，近卫内阁就认为“无须由连战连胜的日方来提议讲和，而应彻底打垮中国”，于是便对德国的斡旋不再感兴趣，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就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

由于日本在华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暴露出要吞并华北的野心，再加上南京的大屠杀等，促使中华民族的抗日怒火以冲天之势燃烧起来，因而连动摇的蒋介石也不敢改变抗日态度了。

日本政府判断，放弃了南京的蒋政权，已经堕落成—一个地方政权，长期抗战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经济向城市集中的程度很低，在辽阔的领土上，失去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对中国的抗战来说，不但完全不象譬如日本失去京滨、阪神地区那样会受到致命打

击,而且抗战司令部转移到内地,等于使日军更广更深地分散在中国大陆,战略上反而有利。日军的将军、政治家及其周围的人们,为什么没能认识到这个道理呢?

总之,作出如上判断的日本政府,1938年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声明<sup>①</sup>。中心意思是:“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真正与帝国协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它调整两国邦交,为更生新中国之建设而协力。”这个愚蠢透顶的声明,等于日本主动放弃了将来谋求和平的对手,后来连近卫本人也承认这是个最大的失败。这个声明并不是军部迫令发出的,而是由外务省起草,在内阁会议上和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政府最高咨询机构内阁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陆海军、政党、财界、外交界等统治阶级各种势力中具有代表性的长老们组成——上全体一致通过的。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如此蔑视中国,作茧自缚,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在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已达二十个师团,陆军总兵力由开战前的三十万已增加到一百万。如此大规模地征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在侵略东北的战争期间还几乎没有过。日本凭这支庞大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但其力量却根本达不到周围的村庄,只确保了所谓的点和线,不能控制面,而且所到之处遭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联合的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狼狈不堪。尽管如此,1938年3月,又在南京炮制了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4月,制定了“开发华北”和“振兴华中”两个国策公司设置法,计划独占华北、华中的中国富源。

### 三、《论持久战》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内的战时法西斯体制全面加强起来,在

<sup>①</sup> 即第一次近卫声明。——译者

“八统一字”<sup>①</sup>的口号下，大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制定新的治安立法，剥夺了国民的一切自由和人权。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授权政府随时无条件地统制、动员资本、劳力、物资、工资、物价等一切经济要素的独裁权。在国际上，由于美英忌恨日本独占中国，日本与美英的对立日益加深。1938年7月，关东军在苏、朝、“满”国境的张鼓峰寻衅，进攻苏联，遭到惨败。1939年春夏，关东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的诺蒙坎地区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被苏联的机械化部队歼灭了。

1938年9月，日军想要一举结束战争，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开始了大规模作战，10月21日，占领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同月27日，又占领了华中的武汉。这样一来，华北、华中、华南等中国最富饶地区的主要城市均被日军占领了。蒋政权又迁到内地的重庆。

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必胜，但不是速战速决而是持久战。预见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共分三个曲折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的时期，以运动战为主；第二个阶段，是日本战略保守、中国准备反攻的时期，以游击战为主；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战略反攻、日本战略退却的时期，又以运动战为主。这个预见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在战后的今天，大概谁都会明白了吧。

以日军占领广东和武汉结束了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尽管日本政府当初的估计和决策已被证实全部是错误的，但它却没能断然缩小战线向和平方向转变，只是对过去的政策略加修改，1938年1月，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修正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即使是国民政府，只要对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合作，日本政府也将不

<sup>①</sup> 八统一字：把全世界都变成日本天皇统治下的一家。

予拒绝。

“东亚新秩序”的中心内容就是12月下旬日本政府发表的所谓“近卫三原则”。第一，中国停止抗日；第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签定“日华防共协定”，允许日军驻扎在特定地区；第三，日本侨民在整个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营业权，“尤其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利用方面，积极为日本人提供方便。”如果中国同意这些条件，就和国民政府媾和。第二条的后半部分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停止同中共联合抗日，日本将协助国民党政府讨伐共产党。

这一声明动摇了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在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兆铭，与日本早有勾结，他借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的机会，逃离重庆，与日本要人进行会谈，靠日本的援助着手准备建立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反共和平”的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总统本人也大为动摇。他对抗日本来就不热心，从此以后，他的主力部队不是抗击日军，而是转而包围共产党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了。

然而，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的对手其实并不是蒋介石或汪兆铭，而是中华民族。汪兆铭投降也好，蒋介石动摇也好，都丝毫没有动摇以中国共产党为先锋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日本就一天天地淹没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正在急急忙忙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只要是帝国主义分子，无论比较开明的贤达，还是愚昧的蠢才，在人民战争面前，只能走完全一样的道路，这似乎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 第九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中战争

### 一、日、德、意“三国同盟”

当日本淹没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1939年

9月，纳粹德国以闪电战侵入波兰，开始了欧洲大战。英法立即对德宣战，美国也表示支援英法。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后随即侵入华北；1937年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同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这一系列战争，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世界的协定遭到武装践踏，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现在，欧洲大战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与英美的对立加深了，在欧洲大战之前，日本业已同德、意缔结了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与英法发生战争以后，实际上同美国也形成了敌对关系，于是日本同德意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1940年5月荷兰政府、6月法国政府分别投降德国，英国也因遭到德军的大规模空袭，无暇顾及远东，于是日本便乘机迫使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当局同意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河内。

这时，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到了1940年，中国方面多次进行局部反击，日军一再陷于被动。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的南宁战役和1940年6月前后的宜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多次对日军展开局部反击，使日军陷于苦战境地。华北的八路军也把日军打得疲于奔命。这样一来，用军事手段解决日中战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这一点就连将军和参谋们也都不得不有所觉悟了。

况且，当时日本的战时经济已经一筹莫展。基本物资极端缺乏，劳动力应征入伍，肥料供应不足，农业生产开始下降，战时食粮也难以保证了。日本军部和政府对于国民大众的艰辛苦难，只要它不致酿成反政府的政治行动就毫不介意，但对于石油、橡胶、锡



和军粮的不足却大感为难。于是，他们的视线便转向了那些资源丰富，在广田内阁时期早已觊觎的东南亚地区。

再者，日本军部认为，由于有一条从香港、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往重庆运送战略物资和武器的“援蒋通道”，所以蒋介石才能继续抗战。这正和当前美国认为，南越民族解放战线是靠“胡志明小道”从北越和中国不断得到补给才能打仗的想法一样。在人民战争中，只有人民的无穷力量才是首要的根本抗战力量，帝国主义看不到这一点，而竟自觉不自觉地把抗战归因于“外援”，这是古往今来、日本和美国的共同特点。

于是便引出这样一种逻辑，即为了结束“圣战”，可以进行切断“外援”来源的作战。其实本来目的是要占领那块地方，而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和进攻老挝、柬埔寨等地也就凭这套逻辑“正当化”了。同样，1940年，日本为了侵略富于日军必需资源的东南亚地区，军部和政府当局也是把“切断援蒋通道”说成是“大义名分”，乘法国处于困境之机，迫使法国同意日军进驻河内的。日本还迫使统治香港、缅甸的英国封锁了“援蒋通道”。

日军进驻河内证明了日本急于南进。美国把英、法、荷等国对日本的敌意扭在一起，促使它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在此期间，1940年7月组成的第二次近卫内阁，积极鼓动德、意结成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公开与美国为敌。三国同盟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在不久将来发动对日作战。

三国同盟把欧亚两洲的战争结合起来，成了把战争推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的一条纽带。盲目崇信希特勒的日本陆军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日中战争同对英美战争以及世界战争结合起来加以解决。1940年11月13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内称：“想来想去，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只有把中国事变的解决，作为综合欧亚的国际大变局

(即世界大战)之一环,才可望实现”。据杉山参谋总长说,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都主张:“现在这种情况,中国事变没有解决希望。向南方扩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事变。应该把用于中国力量调往南方”。

## 二、法西斯三国与统一战线

1941年6月,德国突然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起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妄图以“闪电战”迫使苏联屈服。这种幻想使日本军部和政府认为,德国此举将促使他们更加轻易地取得南进的成功。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西贡,美国看到这种情况,也决心发动对日作战。12月8日,日美战争打响了。

由于德苏战争和日美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如果以日本为主体来考虑的话,日中战争也分三个阶段。即从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热河战役为止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是第一阶段;此后,转入侵略华北的准备阶段,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941年12月,日本与美英开战,把日中战争变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从此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次世界大战具有四种性质。按其出现的顺序来说,第一,是日意德帝国主义分别向中国、埃塞俄比亚、欧洲弱小国家等进行侵略,并攫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此则是中国等国家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纳粹占领下的西欧各国人民的抵抗,也是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是德意与英法、日本与美英等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第三,是纳粹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战争;在苏联则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防御战争。以上三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综合起来,便产生了第四种性质,即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集团,与第一种性质里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及第三种性质的苏联保卫

社会主义祖国的防御战争结成同盟，结果便形成了民族解放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虽是帝国主义但不是法西斯的国家对抗法西斯三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争。

在日德意力量强大的时候，第四种性质暂时掩盖了第二种性质，但随着三国走向失败，第四种性质便逐渐淡薄起来；一旦三国失败接近定局，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势力以及苏联固有的对立，又全面地暴露出来。到那时，它们甚至企图利用已经战败的日德意法西斯势力。例如，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曾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还利用了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

日本通过三国同盟和日美、日英战争，把日中战争同欧洲战线和苏联战线直接联结起来了。日本军部和政府暗中盘算，通过德意（特别是德国）征服欧洲和苏联，日本攫取整个东南亚的英、法、荷、美的殖民地和当地的资源有了保障；在对美、对英战争的同时，自然也可以保证侵华战争的胜利。然而，事与愿违，已被侵华战争拖得软弱无力的日本战斗力，由于对美、对英战争的开始，更加重了不可估计的负担。德意的战败加速了日本的战败；同盟国对德意的胜利，大大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提高了战斗力。

同时，中国的抗日运动同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斗争结成了一条战线。

日本一举占领了英、法、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的占领统治是一种比英、法、荷、美等殖民者更加残酷、只取不予的掠夺，所以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便由反对旧殖民帝国一变而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它们同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在同中国接壤的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同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些抗日民族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援了旧殖民帝国的对

日战争。日本凭“大东亚战争”把亚洲各族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东南亚各族人民同旧殖民帝国一起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也不允许旧殖民帝国卷土重来再当他们的主人，是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

### 三、真正的胜利者

日美战争一开始，1942年1月，美国就把史迪威派到重庆，令其担任印度、缅甸、中国战线的美军总司令，并经印度和缅甸向重庆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和军需品。此举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为了加强当前的抗日力量；其二是为加强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创造条件，但当时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上。前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和第四种性质，当时表现为后者占有优势。

可是，蒋介石自转移到重庆以后，不但不抗日，反而把重点放在反共上，而且越走越远。1941年1月，悍然搞起近乎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的背叛行动（皖南事变），欺骗新四军，一举包围了新四军司令部，逮捕了军长叶挺，几乎歼灭了他的部队。美国对蒋介石的如此援助，几乎不能说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援助。史迪威本身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为了增强国共合作的抗日力量，向蒋介石施加了压力，但美国派到重庆的航空部队指挥官陈纳德却与史迪威对立，支持蒋介石反共。美国总统罗斯福则适当地操纵了两者。

1944年夏季，美国在太平洋战线上发起对日强烈反攻。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战败，德国的彻底战败也已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对重庆的援助，专是为了战后统治中国创造基础。10月，美国政府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罢免了史迪威，接着又把驻华大使由高斯换成赫尔利。赫尔利扶植蒋介石，极力支援其反共，并妄图以“为了打倒日本，要统一中国所有的军队”为名，取消八路

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的独立性。<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当然就皖南事变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但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应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加强了党和人民军队的独立性。新四军在陈毅代军长的带领下，加强了同人民的联系，使长江以北的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一年以后，新四军兵力达十余万人，华中解放区人口达两千万人。

日美开战前后，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以八十三万兵力进攻了华北解放区。为了反击日本的侵略，民兵积极协助八路军作战。他们挖掘了稠密的地道，展开了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的“地道战”、在敌人前进道路上埋下无数土法地雷的“地雷战”、民兵三三两两象麻雀似地神出鬼没消耗敌人的“麻雀战”等等，真正发挥了人民的智慧，施展了独创的打法。

经过两年的激烈战斗，八路军的兵力从四十万减少到三十万人，解放区的人口从四千多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人。但是，1943年以后，八路军和解放区又重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驻华日军除去偶尔在华中、华南进行短期大规模作战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把总兵力的六、七成都用在同中共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的战斗上了。南京的傀儡“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不抗日，专门反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1944年转入局部反攻，这一年在全国进行了两万多次战斗，使日军损失了二十二万多兵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总共发展到七十九万人左右。

在1945年4到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共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万正规军和二百二十万民兵，控制了

---

<sup>①</sup> 关于英国的对华政策，本文引自小此木真三郎：《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第3编，第2章。

九千五百万人口(比当时日本全国人口还多)的解放区。后来继续迅速发展,8月时正规军兵员超过一百万,解放区人口超过一亿。总之,194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在军事上也不断扩大了对日军的胜利。

相形之下,蒋介石唯恐抗日会损失他的嫡系部队,对日军几乎没有抵抗,所以日军才敢以十三个师团的大军从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悍然发动了打通大陆的作战,打通了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一时占领了桂林、柳州和南宁。日本只大肆宣传这点,仿佛日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军队和政府本身抱有这种幻想,而且日本人民也被灌输了这种幻想。为了进行这种大规模作战,抽调了占领区的守备部队。守备部队一经抽出,人民军队就立即在那里建立解放区,并巩固下去。正当日军自信大陆已经打通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广大人民已经开始把两千多公里长的战线切得稀碎。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的航空基地,到1945年,大部分也不得不放弃了。这样,日军的“世纪的大作战”便以巨大牺牲而告失败。

在此期间,不论缅甸战线,还是太平洋战线,日军到处遭到惨败。由于空袭,本土被烧成一片瓦砾,冲绳岛的守卫军连同十五万居民全被歼灭。8月9日,苏联参战,关东军也垮了,8月15日,天皇终于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对日《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并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广播出去。

## 跋

日本的当政者们宣称,“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虽然败于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是战胜了它”,很多国民也深信不疑。其实,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完全歪曲。它说明,对于侵略中国东北以来长达

十五年的侵华战争，日本人至今还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自我批判。

本来，自从日本与美英开始战争以来，日中战争就“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没能取胜。坦率地讲，即使局部的战斗打赢了，在整个战争上却打败了。

这一点，前面已作了具体说明。而且，日美战争最基本的争执点，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日美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终于达到了极点。日美战争的主战场是西南太平洋，但对日本来说，对那一地区的侵略，比起“结束中国事变”来是次要的。

所谓战争的胜利，是指达到战争的目的。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无论在哪一阶段，都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失败了。在第一阶段侵略东北的过程中，日本固然炮制出了一个“满洲国”（仅就此而言算是胜利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没能使“满洲国”安定下来。也就是说，未能达到战争的目的，所以日军转而入侵华北，不久便开始转入第二阶段——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第二阶段，战斗虽然打赢了，但就达到战争目的而言，则比第一阶段的失败更为惨重，因而发生了第三阶段的太平洋战争。

在第三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投入了侵华战争。日美开战当初，日本陆军总兵力的配备情况是，一成留在本国，三成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四成配置在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二成派到南方。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军队，肩负确保中国内陆战线的任务，具有第二线的意义。就是说，陆军总兵力的七成用于侵华战争。战争结束时，日本兵力分布情况大致是：日本本土二百四十万，朝鲜和中国东北一百万，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一百万，南方一百万。留守本土的部队，大部分是新编的，没有足够的装备；派到南方的一百万兵员分散在孤岛上，丧失了战斗力；中国派遣军二十七个师团一百万兵员及配置在朝鲜和中国东

北地区的军队,是最有实力的部队,仍然是日本陆军的主力。

就是这支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保住点和线:好不容易占据的“点”,如同分散在六亿中国人民抗日大海中的孤岛一样。在战斗方面,如前所述,自1944年以后,日军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局部攻势下,也陷于失败。所谓日本在中国打赢了的说法,正如前述打通大陆作战那样,把利用蒋介石回避抗日、反共第一的作法而一时取得的局部胜利,偷换成达到战争目的即胜利,进而扩大为一般,仿佛在侵华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没有接受美国的援助,同亚洲的抗日民族斗争联合起来,打败了日本。不但如此,而且还是在克服了受美国全面援助的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的情况下战胜日本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以蒋介石为走狗,挑起了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又进而粉碎了美蒋的一切阴谋,建立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上就是长达十五年的日中战争的结局。这也是溯至明治维新以来包括国民在内的日本人一贯蔑视、侵略中国的总结算。我们日本人民从这段历史的严肃事实中,到底能全面地汲取多少教训,这将关系到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将来。日本战败后,蒋介石曾经毕恭毕敬地对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等人,不把日军当战俘对待,口称“以德报暴”。当时以及后来历代的日本统治者把这说成是蒋介石的恩义,用来作为勾结蒋介石的唯一最大的借口。然而,蒋介石那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利用冈村等人同中共打内战。不管蒋介石玩弄什么伎俩,也不管美国如何帮助他,被人民所抛弃的蒋介石终于不得不逃出大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尽管过去吃了日本那么多苦头(侵华战争中日本杀伤一千多万中国人,掠



夺和破坏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但他们还是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这才真是“以德报暴”呢!当我们紧握中国人民的友谊之手时,日中关系最初两千年睦邻友好的历史便跃过近一百年日本侵略和敌视中国的历史,现在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日本军国主义 第三册 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

作者 =

页数 = 2 8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 日本军国主义

（日）岸田信行著



# 日本军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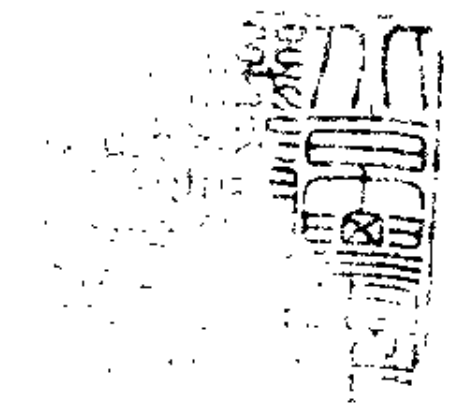
第四册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日〕井上清 著

盛继勤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新版日本の軍国主義 IV  
再軍備と軍国主義の復活  
井上清 著  
据日本现代评论社 1977 年 7 月初版译出

2568/21

内部发行

RIBEN JUNGUO ZHUYI  
日本军国主义  
第四册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日〕井上清 著  
盛继勳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81

---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3 1/32
198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
印数 12,200 册	印张 8 1/4

定价：1.40 元

# 目 次

序言 .....	1
----------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篇 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绪论 .....	3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概念 .....	3
第二节 被占领与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 .....	10
第三节 媾和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 .....	16
第四节 “潜在的帝国主义” .....	24
第五节 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	30
第六节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	38
结束语——从属帝国主义论 .....	44
第二篇 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 .....	49
第三篇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	69
第一章 重整军备及其政治经济的基础 .....	69
第一节 留下了帝国主义的孽根 .....	69
第二节 重整军备的开始与军国主义思想政策 .....	74
第三节 自卫队的创建及其特点 .....	85
第二章 有计划的扩军与日美军事同盟 .....	98
第一节 “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与日美关系 .....	98
第二节 第二次和第三次扩军计划与垄断资本 .....	109
第三节 第四次扩军计划与对日本战斗力的评价 .....	117
第三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	127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各阶段 .....	127
第二节 “日韩会谈”与日本帝国主义 .....	132
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	145

结 束 语 .....	160
-------------	-----

## 第 二 部 分

第一篇 鸠山内阁论 .....	166
第一节 两种力量 .....	166
第二节 所谓“自主的防卫体制” .....	169
第三节 日苏谈判与松鼠外交 .....	173
第四节 官僚的质变 .....	177
第五节 展望 .....	181
第二篇 从历史上来看岸内阁的性质.....	184
第三篇 《乙巳保护条约》与“日韩会谈” .....	198

## 第 三 部 分

第一篇 最近的日本电影上的军国主义 .....	216
——以《战争和人》为中心——	
第一节 岸内阁和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 .....	216
第二节 从《日本最长的一天》到《冲绳决战》 .....	218
第三节 《人的条件》与《战争和人》 .....	222
第四节 《战争和人》的导演的意图 .....	227
第五节 文部省及其《昭和史》观 .....	230
第六节 美化法西斯 .....	236
第七节 反中国和反朝鲜的鼓盍宣传 .....	240
第八节 与亚非人民团结战斗! .....	246
第二篇 结束了什么? 是怎样“结束”的? .....	251
——评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	
第一节 导演山本的借口 .....	251
第二节 终集的梗概 .....	253
第三节 怎样描写了侵略者和抵抗者? .....	256
第四节 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裸体镜头等问题 .....	258
第五节 修正主义的巧妙的“结束” .....	260

## 序 言

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四册，“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终于能够付印了。这一册收编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八篇论文。其中第三篇是首次出版，其他七篇都是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的。

各篇论文的编排顺序，既不是所述对象的年代，也不是文章发表的时期。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三篇文章，概述了理论问题和整个复活过程，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第二和第三部分，是按文章论述的具体问题进行分类的。

关于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问题，本书并不是都涉及到了。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形势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除“日韩”关系外，都没有写到，这是作者本人也感到遗憾的。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全面的、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同中国的接近，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美国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激化以及其中苏联的进攻，苏联同中国对立的加深，苏联对日本露骨的帝国主义压迫的逐年加剧，等等，随着亚洲和世界形势的剧变，日美军事同盟（“安全条约”体制），尽管其帝国主义本质没变，但它的意义和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的、详尽的论述，需要另写一本书。我将在目前正在执笔写的《日本现代史》（1965年现代评论社出版的《战后日本史》的全面修订增补版）中进行此项工作。

这本书尽管有上述不足之处，然而我认为关于战后日本军国



## 第一部分

### 第一篇 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 军国主义绪论\*

####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概念

现代日本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呢？日本共产党及其理论家认为从十多年前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复活，但尚未完成。同日共尖锐对立的，被社会上称作毛泽东思想派的人们则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决不应把现代日本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种已经复活了的军国主义。日共则认为军国主义也正在复活，但尚未完成。

是帝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复活了还是正在复活？我认为只钻概念，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多大意义。然而现在争论的不仅仅是概念正确与否，而是关系到现代日本民族是压迫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统治日本人民的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还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两者兼而有之，双方又是

\* 这篇论文载于1971年3月发行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第31期。其中的“今年”是指1970年。

我认为，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复活了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政治侧面，并非离开帝国主义而建立、而存在的。因此，这篇论文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就战后日本的历史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我这里大量引用了《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人的评论，这是因为从中国1970年左右的论调来看，中国从来不把日本称作帝国主义，专讲军国主义，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我非常关心这种区别的根据。中国似乎担心如果把日本当作“帝国主义”国家，会把日本同美国等同起来，所以不说帝国主义。然而我认为尽管日本从属于美国，但明确指出它本身也是帝国主义，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重要的。

处于什么关系。日本垄断资本利用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猛烈地向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进行扩张，并在政治上开始具有影响力量，这是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呢？还是仅仅具有辅助美帝国主义的意义？如何评价每年急剧增强的日本军备？以及其它一系列日本现状以及对这些方向的认识问题。

我认为现代日本是一个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其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上层建筑的军国主义已经复活。以下根据概括考察战后日本的历史来阐述一下我的这种看法。

首先，我们要专门根据列宁的著作来搞清“帝国主义”的概念。对几乎不讲自明的问题，要反复进行烦琐的引用，这对明确论点大有好处。据我所知，“帝国主义”这个词，列宁有四种提法。

（一）“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2 版，第 74 页）

从以上引文来看，“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是指某个国家企图将其领土扩张到超越其原来国境的政策体系。这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历史概念，也不是经济概念。列宁认为在研究近代（现代）帝国主义问题时，这种超历史的观点是一种愚蠢的空论。在上述引文之后，他紧接着指出：“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 74 页）当论证现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复活时，不消说，所谓“帝国主义”当然不是这种超历史的概念。然而也不是与此决无关系的。

（二）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曾给现代帝国主义下过一

个著名的定义,现将它重新引用如下: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0页)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上)

《帝国主义论》的第七章,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为题,把以上引用的定义作为前六章对世界经济分析的总结,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个定义,尽管列宁预先说明“限于”“基本的、纯经济的概念”,但是列宁写明即使在政治上是被压迫国家而其社会经济结构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也叫帝国主义。这种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德国。

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国共产党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指出,当时苏俄能够利用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三个根本矛盾”是:第一,日本和美国的矛盾;第二,“美国和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纠纷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纠纷”。他说:

“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按经济发展程度来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那德国就占世界第二位。(中略)凡尔赛条约就是强加在这样一个国家头上的,它当然不能忍受。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0页)

列宁在 1921 年 5 月发表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又说：

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8 页）

“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同上，第 509 页）

如果“象卡列林那样断言——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同上，第 509 页）

列宁领导的 1921 年 6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论策略提纲》，是这样谈及德国的：

“德国共产党应当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德国无产阶级说明，不推翻德国资本主义政府，便不可能进行反对协约国资本剥削的斗争，因为德国资本主义政府尽管在大声疾呼地反对协约国，但它仍然充当着协约国资本家的监工和掮客。德国统一共产党只有通过德国政府进行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证明它并不是在为破了的德国帝国主义寻找出路，相反地而是在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加强法国无产者群众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荒畑寒村译，中文据《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1919—1932 年》中文版第一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282 页。）

1919 年 6 月德国政府接受的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奴化德国的条约。德国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不只是德国从邻国掠夺、变为本国领土的阿尔萨斯·洛林、西里西亚和波兹南，而且被割去了一部分固有领土；德国须将其现有商船的百分之九十移交给协约

国,而且在未来五年间,每年担负提供二十万吨新船的义务;作为赔款的一部分,首先在两年内要支付二百亿金马克,赔款总额未定,但估计不少于一千亿金马克;德国军队被压缩到十万人以下,禁止制造和使用毒气、坦克和飞机;为使其不违反这个条约,由协约国军事委员会进行监督。

这样一来,德国的统治阶级不管怎样反动和满怀侵略、复仇的野心,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协约国拥有监督德国履行条约的权利,这事实上等于统治德国。德国不听从时,协约国可用武力强制它遵守。于是,1921年1月协约国决定德国赔款总额为两千二百六十亿金马克,并通知不积极裁军的德国政府必须立即将军队裁减到十万人。德国政府对这个条约的接受和实行表示踌躇,3月举行的协约国伦敦会议便发出最后通牒,法军竟占领了德国西部要地。德国最后只好在仅同意减少赔款的情况下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

一言以蔽之,“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这些先进国家<sup>①</sup>降到了殖民地从属地位,陷于贫困、破产、饥饿、毫无权利的境地。”(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0页)然而,这个德国是一个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的、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国家。列宁看到这点,如上所述,认为:“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破产了的帝国主义”(但还没有完全毁灭——井上)。

(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第三种提法,是指具有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结构及在此之上不可避免地必然成长起来的、对外力图实行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力量和野心,对内“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政治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总和。这种

<sup>①</sup> 指德国、奥地利等战败国。

政治和政策与各个具体统治者的好恶无关，它是体制的必然产物，只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此外是不可能存在的。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把现代帝国主义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否定它在政治上必然实行暴力与反动、侵略与兼并的政策。按照考茨基的说法，“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3页）然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强加了凡尔赛和约体制的德国既是被压迫国家、本身又是帝国主义时，指出：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只是由于战败而“破产”，只要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把它“消灭”，就必然存在着总有一天会在政治上复活帝国主义的基础。

（四）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是否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阶段。因此即使它没有成为力图实行暴力与反动、侵略与兼并的政治的帝国主义大国，但也有与这样的大国相勾结，掠夺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的较小国家。这是列宁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的第四种情况。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瑞士和丹麦就是这样的帝国主义。

现在看一看列宁关于瑞士的文章是怎样写的。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要使自己承认国际主义不致成为毫不负责的空话（象“中派”的拥护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表现的那样），第一、必须彻底地不断地使外国工人同瑞士工人从组织上亲密起来，并且融合在共同的组织中，为他们的完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平等而奋斗。瑞士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瑞士资产阶级对毫无权利的外国工人的剥削愈来愈利害，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两部分工人的疏远上。”（列宁：《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载《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23 卷,第 146 页)

瑞士资产阶级政府“(1)同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财政联系,并且完全依赖他们;(2)它的整个方针早已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转而实行反动的政治(中略);(3)它愈来愈变成反动透顶的瑞士军人派和军人集团的傀儡。”

“因此,瑞士社会民主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揭穿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卑躬屈膝的政府的实质,揭露政府用民主等等词句来欺骗人民的行为,说明这个政府完全可能(在统治瑞士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意下)把瑞士人民的利益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同上,第 137 页)关于丹麦,列宁写道:

“丹麦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依靠乳制品和肉制品市场的有利的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利润,把乳制品和肉制品通过运费最低的海路运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去销售,因此,丹麦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不管俄国民粹主义者怎样胡说八道,他们是最纯粹的资产者)就变成了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运的”寄食者,变成了特别稳当、特别优厚的利润的分享者。”(列宁:《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34 页)

以上列举了在列宁著作中见到的“帝国主义”概念的四种用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当时被盟军——实际上是被美军——占领,失去了一切殖民地,甚至被剥夺了冲绳、小笠原和千岛群岛等一部分固有领土,军队和一切军事机构一兵不留地全部解散,显然在政治上不再是帝国主义。然而在经济方面,尽管由于战败,战时经济解体,生产力下降到战败前最高点的三分之一;以及因解散财阀和实行《垄断禁止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资本和生产的积聚一时明显地被削弱,但垄断资本主义

的基本结构并未瓦解。

因此,按照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定义来说,占领下的日本,尽管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更加破产、更加削弱,而且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首先应该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由破产到复兴,由削弱到加强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在此之上所建立的政治结构的总体,那末这种所谓的“复活”就不仅是经济的“复活”,而且应该精心地观察它是否在此基础上在政治上也变成一个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国家。同时还应该弄清日本国家及日本民族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弄清今天日本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and 今后的方向。这是因为尽管不是帝国主义大国,而且在金融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还“从属”于或者“依赖”于大国,然而却仍然不失为帝国主义国家。

## 第二节 被占领与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接受了同盟国对日本的《波茨坦公告》而投降。在投降的同时,日本丧失了民族主权的独立,被置于同盟军,实际上是美军单独占领和统治之下。而且这种占领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为止,长达六年七个月以上。

美国政府1945年9月22日发表声明说,其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2)建立“支持美国的目的的政府”,即把日本变为从属国家。《波茨坦公告》规定被占领国日本和占领国美国都有义务使日本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然而对美国来说,只有当这种政策可用来作为达到上述“最终



目的”的一个手段时才采用。

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回顾从占领开始到一年半以后的1947年2月20日这一时期的占领政策时，向美国国会报告如下：现代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必须在摧毁战争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摧毁那种煽起人们参战意念的人的本能。这种人的本能，只靠一时战败的冲击使其屈服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精神方面进行彻底改革。这种改革不应该仅仅支配被战败了的人们，还必须是对后继年代的人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日本《朝日年鉴》，1948年版）

麦克阿瑟所说的也就是必须使日本人直到子孙后代都要培养起对美国卑躬屈膝的意识。根据这种令人生畏的奴化日本民族的基本方针而采取的摧毁日本可能再次对美发动战争的“物质基础”的方法，就是它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为了对日本人进行直到子孙后代的“精神改革”，实现精神上的对美奴化，麦克阿瑟在上述报告中接着说道：“彻底封锁粮食及其他补给完全依赖从外部供应的部队，是粉碎这个部队的有效武器。……对投降后的日本继续实行并扩大、加强了这种封锁。”（同上）

于是便有计划地毁灭日本经济，有计划地将人民投入饥饿的深渊，接着，麦克阿瑟又对饥饿的日本人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即占领军又扮演了“紧急放粮”和“粮食援助”的角色。这也“不是善心发作”，麦克阿瑟向美国纳税者保证说：“粮食钱将来还是要日本偿还的。这要由美国优先取得日本资产的权利得到保证。”（同上）

1947年6月27日，麦克阿瑟对美国新闻记者团沾沾自喜地谈到自己作法的成功时说：“美国送给日本的粮食，把日本同美国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同上）

这种狡黠诡诈、极端专制的军事占领权力，给日本铺下了对美

从属化的轨道。日本共产党把这种占领军说成“解放军”，也对美国政策的成功帮了大忙。

占领下的日本，在政治方面不管怎么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因战败和投降面被大大削弱，但还是保存下来了。不仅如此，由于农地改革和遍及全国的农民斗争，使曾经与资本主义并列、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寄生地主制受到严重打击，它作为经济制度不久就变为无足轻重的残余，寄生地主作为阶级势力逐渐消灭下去，于是资本主义变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变成唯一的统治阶级。还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天皇失掉了专制权力，军部也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垄断资产阶级在日本的各阶级、各阶层中的政治地位比战败以前任何时期都相对地提高了。但在他们的头顶上有占领军的权力，过去的天皇制政府和官僚机构成了执行占领军权力的政策的机关，因此，垄断资产阶级也没能掌握日本国家的权力，只能给政府和官僚以一定影响，使其在执行占领政策时，尽可能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

占领军权力封锁日本经济一直持续到 1948 年春，解散财阀的指令、《垄断禁止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实物赔偿征收计划等等，一个接一个地抛了出来，推进了削弱日本垄断资本、剥夺其对美竞争能力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以工农为主力的日本人民迅速转向革命，占领军则又不得不保卫资产阶级的“秩序”；在国际上，在 1946 年春以后急剧加深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中，还不得不把日本当作反苏、反共势力加以利用；在 1946 年 5 月 19 日举行所谓粮食劳动节<sup>①</sup>时，对反对组织吉田自由党内阁和要

---

<sup>①</sup> 粮食劳动节：1946 年 5 月 19 日，在日本东京都人民广场召开的“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又叫粮食劳动节。二十五万人参加，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包围了首相官邸，要求吉田放弃组阁。——译者

求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人民攻势，占领军竟出动装甲车部队进行镇压；以第二天成立第一届吉田内阁为转机，开始采取开设复兴金融金库，实行“倾斜生产方式”<sup>①</sup>等，以复兴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在一定程度上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

进入 1948 年，美国远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以前，以美国在亚洲夺取了旧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势力；特别是在中国，给蒋介石政权以武器和资金，让它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力量；把蒋政权变成美国统治和剥削整个中国的傀儡，并把中国当成它进攻苏联的坚不可摧的巨大根据地，作为美国的最高方针，而日本只要变为对美国忠诚、无害和无力的资本主义小国就可以了。然而战后的现实粉碎了美国的这种野心。无论在朝鲜还是在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力量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唆使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而缩短了蒋政权的寿命，早在 1948 年初就已预见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地区，同时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也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于是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日本突然被重视起来。

1948 年 1 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说，应该改变“原来在广阔范围内使日本非军事化的方针”，要把日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工厂”、“远东的反共壁垒”（攻击基地），“扶植起一个坚强有力的日本政府”。

根据这一新的方针，美国政府和占领军便开始为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倾注力量。《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的实施几乎全部停了下来，旨在摧毁日本产业的潜在军事能力的征收赔偿方针也

---

<sup>①</sup> 倾斜生产方式：即 1946 年 12 月，内阁会议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决定的《煤炭、钢铁超重点生产计划》，也就是有重点地对钢铁业配给煤炭，对煤矿配给钢材，以促使两大基础产业尽快恢复和扩大生产。——译者

抛弃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增加了。这与“援助”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复兴、建立全欧反苏包围圈和反革命战线的马歇尔计划几乎是同时出笼的。

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与一切统治阶层，全面依赖美国这一新的对日政策。美国为使日本变为扼杀亚洲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据点，不顾一切地大力推行迅速复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路线。

1948年底，占领军总司令部强制推行“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示，即由美国政府特派公使道奇<sup>①</sup>来日编制1949年度和1950年度日本国家预算草案；同时美国派来特使休普<sup>②</sup>全面改革日本税制，废除复兴金融金库，设立“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特别会计”（这是一种旨在对于占领军认为重要的重化学工业的垄断资本的重建和加强，“直接地、迅速地作出贡献”而设立的美国援助资金的贷款机构）；1949年4月规定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单一汇率，从而把日元束缚在美元上；之后开始了私人贸易，占领军通过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贸易和汇兑管理法，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来迅速复兴对美从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就在1948年底，“为了对付中共军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开始研究利用日本的重新武装和人力资源的问题。”（日本《朝日新闻》1948年12月2日）

在这期间，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全朝鲜的独立与统一的斗争飞速发展，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同年年底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一伙逃到了台湾。

---

<sup>①</sup> 道奇(Joseph M. Dodge):美国国防部顾问(底特律银行董事长)，来日前曾领导西德的币制改革，后来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局长。——译者

<sup>②</sup> 休普:美国的税制专家。——译者

美国急不可待，于1950年6月，便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与此同时，恢复和起用日本垄断资本愈加成为燃眉之急，公然开始了重新武装日本。在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周内，占领军总司令部就指令日本政府以“警察预备队”的名义创建了七万五千人的美式轻步兵部队。8月下旬，预备队匆忙成立了。防卫厅编的《自卫队十年史》承认：占领军对队员的募集、教育和训练等，一切都是“全力以赴”的。

毛泽东和斯大林早已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再起的可能性，并作了防备。即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在1950年2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前言中规定：中苏两国“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为此，决定缔结本条约；其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下略）”（1950年2月号《新华月报》）

签订这一条约时，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尚未达到战前（1934—1936年平均的）水平，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不存在，主权独立也被占领军剥夺了。尽管如此，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世界人民的领导人之所以作了上述估计可能是因为：第一，存在着美国企图统治和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形势；第二，从理论上来看，战败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存在再起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六章中谈到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问题时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5 页)

斯大林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工夫”,重新变成强大的国家;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也必然会“挣脱美国的镣铐,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同上第 26 页)。他在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也许就有这种预见。

那末,日本幸存而再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斯大林这样写后十八年的今天,砸碎了美国的占领“制度”的镣铐了吗?很明显还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希特勒政权下割断凡尔赛条约体制的锁链那样砸断了镣铐。那末日本今天是不是基本上同十八年前一样仍处于占领“制度”之下呢。我的结论是,可否认为占领制度在逐渐放宽,被占领情况已变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从属关系。这个问题将在下文探讨。

### 第三节 媾和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

美国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当它在这次战争及其侵略亚洲的一切战争中企图积极利用日本时,便遇到许多对它不利和不便的情况。即日本不仅在国际法上被同盟国占领,受《波茨坦

公告》的约束，禁止日本重新武装和进行军需生产，而且远东委员会<sup>①</sup>和对日管制委员会<sup>②</sup>还有可能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进行干与。因而美国五角大楼主张继续占领日本，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占领特权来左右日本；美国政府的实权派则主张在国际法上使日本变为“独立国”，然后让这个独立国日本根据自主意志重新武装，采取让日本“协助”即屈从美国的形式更为有利。

于是 1951 年 9 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日本在美国一手起草和决定的《对日和平条约》上签了字，只同美国阵营各国媾和了。同时在同“媾和条约”不可分割的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日美安全条约》上也签了字。接着，又借日美政府间的“行政协定”之名，规定了“安全条约”的实质内容。日本政府进而在美国指使下，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当作“中华民国政府”，并与之缔结了“和平条约”，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这些条约和协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都是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的。

日本在国际法上变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事实上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然是美国的属国。“安全条约”在条文上也只规定美国单方面的权利而不负任何义务，日本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根据日美“安全条约”，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占领军的全部特权，一切军人、军队文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享有治外法权。美军甚至可以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同担负占领军费用一样，日本以“防卫分担费”的名义，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不仅如此，在“和约”生效的同时，法律上取消了一切占领机构。但是，装

<sup>①</sup> 远东委员会：1945 年 12 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的、由美、英、中、苏、菲、印、新西兰、澳、加、法、荷等十一国代表组成的对日占领的决策机关。后因被美国把持破坏，1948 年后失去作用，1952 年被美国非法解散。——译者

<sup>②</sup>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决定设立的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谘询和劝告机构。由美、英、中、苏四国组成，设在东京。它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武装，使其民主化。但其工作一直受美国破坏，1952 年 4 月被美国非法解散。——译者

备、编成、训练和指挥警察预备队的占领军机关——盟军总司令部军政要员驻区(CASA)<sup>①</sup>，仅仅改名为“美国远东军司令部驻日保安顾问”，实际上和以前完全一样，管理和指挥着警察预备队(后发展为保安队)。

那末，媾和之后，日本对美国的地位是不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那也不是。合法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占领权力消失了，这无论对日本统治阶级，还是对日本人民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巨大变化。此后，美国对日本人民提出任何无理要求，都必须通过日本政府和国内法令。例如根据“安全条约”，美国在日本国内可以随便建立基地，但如果为此要从国民手里征用土地，则必须先让日本政府来征收，然后再由政府交给美军，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由占领军直接征用土地、直接镇压抵抗征用土地者。于是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和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比在占领情况下容易进行了。

日本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对美国来说，由于签订了“和约”和“安全条约”，并由于美国拥有压倒优势的实力，还由于日本垄断资本依靠被占领下的美帝国主义政策粉碎日本人民的抵抗所决定的复兴方式，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不严重地从属于美国。此外，在冲绳县及其他地区还残存着美国对日本民族的直接统治。但除冲绳等以外，日本国内对人民的统治权，由于“和约”的生效和占领权力的消失，又回到日本统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因此，不能因为他们所统治的日本国家从属于美国，日本民族主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就否定日本统治阶级掌握着日本国家机构，直接统治着日本人民。统治阶级一方面掌握着日本国家的权力，统治着人民，另一方面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又从属于美国，出卖民族利益。这种从属关系由于战败和长达七年之久的长期占

---

<sup>①</sup> 军政要员驻区：原文为 CASA，系 Civil Affairs Staging Area 的缩写。  
——译者



领是不得已的,但除此以外,还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主动依赖美帝国主义庇护的一面。

他们的阶级利益是,第一,为了复兴垄断资本主义,要接受美国的“援助”,镇压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旦这种斗争发展成为内乱,就企图依靠美军来镇压。1952年签订的“安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镇压内乱可动用美军。它不仅表明美国害怕日本人民革命,从而在条约上明文规定有镇压革命的权利;而且还表明日本统治阶级也在依赖美军。

第二,所谓日本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害怕、憎恶并企图阻止朝鲜、中国等亚洲各族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有可能还想重新侵略亚洲。因此,他们不得不全面依赖美国,为此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日美“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蒋条约”刚一生效,1952年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了《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其中讲了下边一段话:

“这(指缔结单独‘和约’和‘日蒋条约’等——作者)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祸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复活它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统治。”<sup>①</sup>(《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第40页)

这段话同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提到的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它在对美“和约”和“日蒋条约”中,不仅仅看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和使日本成为属国,而

---

<sup>①</sup> 光冈玄:《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论》(《中国研究月报》,1970年6月号)所收。以下本书所引用的中国政府声明及《人民日报》社论等中国文件,只要不特别说明,皆引自光冈的资料。

且还看到日本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意图，并把它同远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代日本统治者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联系起来，这点使我深受启发。

在这期间，日本垄断资本靠朝鲜战争中美军“特需”采购发了横财，以此为动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1年，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接着以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年增长率发展起来。资本和生产的积累也恢复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钢铁等与美军“特需”直接有关的重化学工业和动力工业首先得到恢复，今天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在这一过程中，旧财阀系统的银行，对该系统的企业给以重点贷款，它们相互勾结起来，还使许多中小企业从属于它们的系统，从而确立了金融寡头制的统治。到1953—1954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切领域中都完全恢复了。

至此恢复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战前。第一，战前与资本主义并存的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寄生地主制，但现在没有了，资本主义成了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垄断资本高居其上。即垄断的直接统治已渗透到日本经济的各个角落。第二，战前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重化学工业尚未占统治地位。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军需生产需求紧迫，重化学工业这才占了统治地位。三十年代初期，仍以纺纱、缫丝等轻工业为主，现在重化学工业居绝对优势，已成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战前的中小企业，尽管通过提供贷款、供给原料和销售产品等，从属于垄断资本，但作为生产单位大都进行独立经营，而现在则多数中小企业已成了垄断资本的承包企业或再承包企业而被纳入它的系统了。

然而这时复兴了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处于占领下近七年之久，在美国根据其亚洲政策的需要而敷设的轨道上扶植起来的，靠朝

朝鲜战争的美军“特需”打下了基础，完全依赖包括“特需”在内的对美贸易。另一方面，在朝鲜战争开始后，朝鲜自不待言，同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受到占领军的严格限制，简直如同禁止一般。媾和以后，日本政府在美国指使下仍继续实行限制。因此，日本的贸易结构、进出口都完全依赖美国，技术也是如此。

但是，资金方面的依赖却逐渐减弱。美国的“援助”，1950年以来停止了，因此，在政府财政投资和贷款的资金来源中，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特别账目的比重，以设立该账目的1949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为最高，之后迅速减少，1953年减为百分之八，同年竟取消了。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辟了从世界银行接受贷款的渠道。在此之前，美国私人资本已连续不断地流入日本。然而政府高度警惕外国资本控制日本产业的危险，还在占领下的1950年1月，取得占领军的同意，制定了外资法，严格限制了外国资本流入日本。美国资本家在五十年代还没有把日本看成是安全而且特别有利的投资场所，因而他们对日投资很少。但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却完全在美国资本支配之下，这就加强了整个日本经济的对美从属性。

对如此恢复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因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协议，预计到“特需”将剧减，从而会受到沉重打击。为了减轻这种打击，日本听信美国的劝诱，决定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规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这次谈判是从7月开始的。作为援助的代价，美国要求日本将地面部队一举增加到三十万人。

在此之前，1952年8月，新设了保安厅，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增加到十一万人，美国借给坦克及各种重武器，还建立了小型航空部队。海上警备队又从海上保安厅独立出来，与新设保安队一起纳入新设保安厅的管辖，开始成长为一支小型海军。日本

政府企图以此作为“新国军的基础”，逐步建成陆海空三军保持均衡的现代常备军。政府把这种做法叫做“自卫力量渐增”。其武器和装备都是美国借给的，美国的将军以管理这些借给的武器的名义，作为自卫队的“顾问”，合法地高居于保安队之上，美军顾问团和过去一样指挥和训练部队。

美国对日本的“渐进”方式表示不满，尤其是鉴于朝鲜战争的失败、公开主张“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月就任总统以后，美军战略改为以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地面部队则力图使用其他民族。根据这一战略，一方面尽量把驻日美军地面部队撤回美国，另一方面则企图大力增加和使用日本陆军，要求日本建立一支三十万人的地面部队。

日本政府则执意坚持自己的“渐增”扩军方式。结果使《共同安全法》的谈判拖长，到1954年4月才勉强达成协议。根据协定，日本从美国无偿接受武器援助，并购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其售款用日元结存，作为发展军事工业的资金。其交换条件是，日本负有如下义务：要在三年内将地面部队增加到十八万人；要划时期地增强军备；要以保护美国提供武器的秘密的名义，制定《刑事特别法》；在日本生产的武器也要符合美国武器的规格（这是把军火工业与技术，用美国规格统一起来，即依附于美国）；要对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特别是限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等。

根据《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1954年第十九届国会上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建立了陆上、海上、航空三个自卫队、防卫大学等培养干部的机构，三军“联合幕僚会议”<sup>①</sup>以及其他一切军事机构。这样一来，日本便正式地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武装。该自卫队也同过去完全一样，紧紧地从

<sup>①</sup> 联合幕僚会议：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译者

屈于美国，《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自卫队的对美从属关系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它是日本垄断资本统治日本人民的武装力量，不只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勉强建立起来的，而是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建立和增强的军队，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这表现在日本拒绝了美国只让大力增加地面部队的片面要求，坚持了在日本经济力量允许范围内，海陆空三军均衡渐增的方式。

在通过《共同安全法》和《自卫队法》的第十九届国会上，政府以“保持教育的政治中立”为名，通过两项法律，初步确定了政府统制教育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框框。并以此为根据，每年强制推行教育的统制和反动的重新编制。事实上其背景是：在《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美国要求“利用教育和宣传，在日本造成一种能够发扬爱国心和主动自卫精神的空气”；对此，日本表示了同意。

为了镇压人民反对对美从属的重新武装和反动政治的斗争，全面复活了比战前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据称，由于在野党的反对，政府和执政党估计到这一警察法案不可能在原定国会会期内通过，便企图延长会期，为此，竟将二百名警察拉进国会，利用实力排除反对派议员的抵抗，通过了延长会期的议长提案。

《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正式重新武装、中央集权警察制度、国民教育的反动统制和重新编制，以及为了强行通过这些法案，将警察力量引进国会，这意味着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抛弃了战后日本的政治原则——“和平与民主主义”的伪装，公然开始转入反动与暴力的统治，这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必然产生的政治形态。

#### 第四节 “潜在的帝国主义”

自1948年11月以来紧密勾结占领军和美帝国主义，并受其指挥，得到大力庇护，一直掌握政权的吉田首相，于1954年底，不仅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且被垄断资产阶级——财界抛弃，终于被迫辞职。之后，公然主张修改宪法，以便自主进行重新武装的鸠山一郎，在财界的支持下组成了民主党内阁。

鸠山一旦掌握政权，由于担心人民反对，便不再坚持修改宪法，但却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当时政府在同美国谈判，并就应交付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将随着日本军费的增加自动减交所增军费的半数取得成功。从而向自主重新武装迈进一步。这届内阁，从1955年1月到1956年10月，同苏联不断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不顾美国的反对和明里暗里的干涉，不顾国内垄断资本和执政党的一部分人以及外务官僚等的反对，终于恢复了邦交。日本也因此得以加入联合国。从鸠山内阁的这些作法中可以看到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企图实现帝国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与努力。

但是日本资产阶级并不都支持鸠山路线。财界实权派为了实现其参加联合国的愿望，才暂时对鸠山路线作出了让步。于是在实现参加联合国而露了脸之后，便让鸠山从政界引退了。之后，由于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组成石桥湛山内阁。但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了，1957年2月，组成了第一届岸内阁。

岸首相是个狂热的扩充军备派，曾在国会明目张胆地说：在自卫的范围内即使拥有原子武器也不违反宪法。他在就职三个月后，又到东南亚进行了两周的访问。其最后日程是在台湾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企图借助这次旅行让各国政府接受他的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当地的资源

和劳动力来“开发”东南亚的设想。然而各国都认为这是以美国为主人、日本当管家、剥削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而予以拒绝。

岸信介6月回国后,马上又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进行会谈。日本首相去华盛顿朝拜的惯例是从这时开始的。他要求美国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等,美方置之不理。值得一提的只有一点,就是约定明年美国撤退驻日地面部队。其实这是美国企图把重点放在核导弹战略上,认为把很多地面部队配备在日本,只能刺激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战略价值很小,因而将其撤回,以便让日本自卫队来接替。并以日本迅速增强军备为条件,从1958年度起废除防卫分担费。

这时日本已拥有仅次于美、英、西德,与法、意相匹敌的生产能力,正如在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设想中所看到的,日本开始暴露出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岸信介始终紧密勾结美国帝国主义,是美国在远东的无比忠实的代理人,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向东南亚扩张经济和政治势力。利用对菲律宾、缅甸、印尼和南越的“赔偿”输出资本,也是从这届内阁开始的。发展出口贸易对日本垄断资本来说是最重要的。钢铁资本等资本家寄希望于日中贸易。但岸内阁采取露骨的敌视中国政策,在1958年5月,破坏了不久前经民间人士呕心沥血签订的日中钢铁协定和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他认为即使牺牲目前的经济利益,也要贯彻敌视中国的政策,用以对美表示忠心。从大局来看,这对日本统治阶级是有利的。

之后不久,在7月7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

“岸信介内阁的对外、对内政策,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垄断资

本集团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严重地说明了日本正在进一步被拖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岸信介政府力图把日本重新拖上帝国主义的老路，决不是偶然的。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遭到了挫败，丧失了殖民地，并且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却被美国保存下来。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日本垄断资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工具。而日本垄断资本却希望通过为美国侵略政策的服务，得到美国的扶持，从而积累力量，东山再起。在朝鲜战争中，日本起了美国侵朝军队的后勤基地的作用，使日本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加强了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企图重新称霸远东的帝国主义欲望。”（1958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篇文章意味着，中国认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采取的对外侵略的政策和体制。只不过令人感到：“军国主义”一词的重点是放在政策和思想体系方面，而“帝国主义”一词的重点则是放在多少已经统治着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体制上。因此尽管说日本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表岸内阁直言不讳地表现出“企图重新称霸远东的帝国主义野心”，但是还没有实现，所以采用了“潜在的帝国主义”的提法。尽管如此，而“日本正在进一步被拖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这样的观点，应该看作是从1952年5月，中国认为日本从“妄图准备复活”帝国主义的阶段前进了一步。

在日本国内，从1957年岸首相第一次访问东南亚和朝拜华盛顿时起，就发生过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议论，从1958年到1960年，日美进行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1960年6月，在新《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前后，掀起了一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是否复活的大争论。其主要论战人物和论点,高内俊一在《现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一书中作过介绍。这次论战与围绕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不论哪个参与论战的人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已经恢复,而且有了高度的发展。并且对岸内阁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即现代帝国主义政策的观点,谁也没有异议。

论战的一方(主要是日共系统的)认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从属”于美国,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从属还很严重,日本事实上仍然是被占领国(或者称半占领国),作为帝国主义尚未“独立”,因而不是帝国主义。而论战的另一方则强调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在资金方面的渗透很有限,进出口贸易对美依赖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受到美国控制;虽说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几乎完全“从属”于美国,在军事方面也“从属”于美国,但这是日本统治阶层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并不存在“半占领”,或者“事实上的占领”,日本基本上已经独立。不过,在这两种主张之间,对“从属”或者“独立”的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在条文上也是露骨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民当然要求废除它,统治阶级对它也不满意。在垄断资本主义复兴后的1955年,鸠山内阁的重光外相8月访美,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提出修改“安全条约”,并使其成为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的要求。杜勒斯回答说:当日本重新武装不断加强,“并且能对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条件具备时,美国就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在这里美国表明了这样一条路线,即只有当它认为日本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忠实地履行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竞选总统时所确定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美国基本方针时,它才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这种重新武装的加强正是鸠山内阁所追求的。岸内阁进一步加速了重新武装的进程，热中于修改宪法，以便能够向海外派兵。为了给修改宪法作准备，1957年8月，在护宪派委员不参加的情况下，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与岸内阁的这种态度相呼应，1958年，美国废除日本的防卫分担费，并开始撤退驻日地面部队。然而1957年美国还没有接受岸信介的修改“安全条约”谈判的提议；直到1958年8月，杜勒斯才痛快地接受藤山外相的要求，10月在东京开始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美国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岸内阁破坏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5月）；岸任命的“日韩会谈”首席代表泽田廉三发表“把三八线推回到鸭绿江外是日本外交的使命”的演说（6月），对岸内阁和日本统治阶级这种典型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抱有好感。

众所周知，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是不顾日本全国人民的空前反对而硬干的。1960年6月，日本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其主要条文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相应条款是一样的。臭名昭彰的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加强其自由制度……”，“应努力消除其国际经济政策中之冲突，并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二条文字相同；新《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效法《北大西洋公约》第三条，为了照顾日本宪法第九条，在缔约国负有继续增强军备的义务上加了“以根据宪法规定为条件”的限定。

在条文的形式上变成了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然而新条约仍规定美军可以毫无限制地驻扎在日本和设置基地。旧条约的内乱条款尽管在文字上不见了，但藤山外相在国会解释说，这包括在第三条“对日本安全……的威胁”中的“间接侵略”里面，即驻日美军可以出动镇压革命内乱，这点同旧条约实质上还是相同的。根据条约第六条（美军驻扎日本和设置基地权）签订的关于驻

日美军《地位协定》是代替旧条约《日美行政协定》的，它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地位协定和关于关税及审判权的规定是相同的，尽管废除了美国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及其家属的治外法权。但在北大西洋公约地位协定中没有而在旧行政协定中有的、关于美军可以优先使用铁路、电信等日本政府所有、管理和统辖的公用事业和公共劳务的规定，原封不动地为新地位协定继承了下来。

即新条约原封不动地承认了旧条约中美国享有特权的基本部分，另外新增加了军事同盟的性质，因而日本人民和日本民族被更紧地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置于比以前更加危险的境地。然而在统治阶级看来，由于缔结了新条约，他们便有了军事挡箭牌，就可以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对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和东南亚更积极地起作用，以便实现它本身的侵略和扩张野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统治阶级才热切地希望修改“安全条约”，并且终于实现了它们的愿望。

中国始终注视着日美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人民日报》从1959年4月16日到同年11月27日，发表四篇社论，揭露这次谈判是美国企图利用日本把它当作其侵略亚洲的“马前卒”、“一着棋子”；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则企图“利用美国”实现其“潜在的帝国主义”的野心。10月22日社论指出：日美谈判结成了日本对美从属的同盟关系，社论中还使用了“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同盟关系”（见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第82页）一词。条约刚一签订，1960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中国政府不能不严正指出”，“日美军事同盟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标志着日本已经公然参加美国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稍后,于4月16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写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论文,严正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关于日本下列一节值得注意。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sup>①</sup>(《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想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有把日本称作“帝国主义”这样的提法为根据,说新《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表现,而是想介绍一贯强调日本从属于美国,把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称为“反美爱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不仅认为在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中贯彻了美国的意图,而且认为也贯彻了日本垄断资本的侵略和扩张的意图。

## 第五节 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在岸内阁期间,与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谈判的同时进行了“日韩会谈”。在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字后不久便在美国的指挥下开始了“日韩谈判”。美国为了让日本协助其侵朝战争,企图让“独立”的日本根据“自发的意志”“援助”南朝鲜。为此,“日韩”

---

<sup>①</sup> 引自日本共产党发行的《世界政治资料》第98号译文《列宁主义万岁!》。光冈著:《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论》中也引录了上述一段话,两者译文稍有不同。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词的用法完全相同。

之间必须建立邦交，于是美国便“撮合”双方进行复交谈判。经过1951年10月的预备谈判，1952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然而日方是否真有诚意达成协议是值得怀疑的。1953年10月第三次“日韩会谈”时，日本代表大放厥词，说什么在日本缔结和约之前，南朝鲜擅自独立是非法的；日本统治朝鲜，给朝鲜带来好处，并非掠夺等，完全是一派旧帝国主义意识的高压狂言。南朝鲜方面非常气愤，要求日方撤回发言，日方置之不理，致使进行了两周的会谈决裂。自此“日韩会谈”中断将近五年。

在这五年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已超过战前。南朝鲜因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而疲惫，社会和政治严重不稳；而北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复兴和发展十分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国支持的法国帝国主义，在北越发展了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人民对美国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对此，美国策划使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勾结起来，同已经建立的东南亚军事同盟联结在一起，以期加强对东亚的统治和对中国的包围圈。因此，美国认为，“日韩”不建立邦交是不行的，而且必须让日本支持南朝鲜的傀儡政权。岸内阁一成立，便大力对它进行工作，让岸内阁赶紧重开“日韩会谈”。梦想重新侵略亚洲的岸内阁紧跟美国的指挥棒，于1957年12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和南朝鲜发表共同声明：日本放弃对南朝鲜的财产请求权<sup>①</sup>的主张，重开“日韩会谈”。从1958年4月起开始第四次“日韩会谈”。日方首席代表泽田的那个露骨的帝国主义的发言前面已经谈过。这时仍未达成协议，1959年6月谈判再度中断，同年8月，又因美国大力干预而重开。但1960年4月，南朝鲜学生领头的反对李承晚的斗争激化起来，

---

<sup>①</sup> 日本对“韩”财产请求权：即原在南朝鲜的日侨对发还旧有财产的请求权。  
——译者

李政权垮台，“日韩会谈”也中断了。

之后不久，1960年6月，岸内阁在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中倒台，池田内阁组成，10月开始第五次“日韩会谈”，这次于1961年5月也因南朝鲜政变而流产。此后不久，同年6月，池田首相访美，肯尼迪总统迫使日本尽快就“日韩会谈”达成协议。美国发生美元信用危机，不得不削减对南朝鲜的“援助”，因此肯尼迪打算让日本来接替美国。在南朝鲜，在美军支持下利用政变取得政权的朴正熙总统，为了从日本得到美国减少的那部分援助，热切希望“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而日本垄断资本已经具有满足美国和南朝鲜要求的经济力量，并企图把对南朝鲜的“援助”当作对其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第一步。于是从1961年10月起开始了第六次“日韩会谈”。这次日方的首席代表人选不再象前几次那样的职业外交官，而是财界元老杉道助（杉病死后，仍从财界遴选了高杉晋一）。这表明在“日韩会谈”中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要求占了很大分量。

第六次“日韩会谈”进行得很顺利，1962年10月实际上已就最大难题达成协议，但由于南朝鲜人民反对卖国的“日韩会谈”，反对朴政权对日屈从的斗争有了发展，1964年4月再度中断，12月池田首相因病辞职，接替池田的佐藤内阁重开第七次“日韩会谈”（这时美国对两国都施加了压力），1965年6月，全部达成协议，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同年11月生效。

第七次“日韩会谈”与美帝国主义迅速扩大侵越战争、1964年8月制造北部湾事件、1965年2月开始疯狂轰炸北越并开始向南越急剧增加地面部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这次战争，美国于1965年1月让南朝鲜派二千名南朝鲜军前去越南（后来增加到五万人），佐藤内阁给南朝鲜相当于派兵费用的二千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危机的加深和南朝鲜向越南

派兵速度的增加,加快了“日韩会谈”妥协的进程。

从“日韩会谈”的上述经过可以看出:第一,始终是在美国的指挥下,根据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战争的需要进行的;第二,是随着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扩张的实力和野心的增强而进展的。

《日韩基本条约》规定:“大韩民国政府”,“如联合国大会第190号(III)决议所表明的,是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从而否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韩”双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紧密合作”。南朝鲜方面理解:这是约定当驻南朝鲜“联合国军”(即美国军队)“为维护和平与安全”而进攻以致越过三八线时,日本也将与之合作。南朝鲜驻日大使和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在签字前后露骨地谈到这一条约的军事性质。日本对南朝鲜的对日请求权所付的款额和有偿、无偿的经济“援助”总额达八亿美元,为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进行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第七次“日韩会谈”的日方首席代表高杉晋一于1965年1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坦率地表明:他是为了使日本能够“用这笔钱(请求权款额)进行符合韩国国情的开发合作”,才出任首席代表的。实际上,此后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的扩张是惊人的。

1964年,日本向台湾的扩张也是划时期的。这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蒋政权与法国断交,地位更加不稳;2月,池田内阁派遣前首相吉田茂以“个人”名义访问台湾,“改善”日台关系,表明了日本支持蒋政权的态度。接着5月,吉田得到首相谅解,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保证日本不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对中国进行延期付款出口,即池田内阁重新拉紧已经放松了的对中国贸易。无疑这是美国在背后施加了压力。于是日本政府与蒋政权的关系便很快得到改善。

接着,7月,大平外相访台,8月,蒋帮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访日,与池田首相以及自民党和财界的领导人商谈增进日台之间的

“友好”关系。

佐藤内阁组成后，1964年底，在台北召开了“日华”协力委员会，日本以前首相岸信介为团长，有垄断资本的代表参加，商谈台湾方面要求日本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问题，政府于1965年4月正式签订提供贷款协定。美国以保卫美元为理由，从这年起停止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因此便由日本来代替了它。以此为转机，日本的商品和资本迅速向台湾扩张。1965年底，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喜一郎任团长，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总经理等很多垄断资本家代表参加了“日华”协力委员会。

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到1967年底投入美军达五十二万人，南朝鲜派兵五万人，东南亚的傀儡政权被迫也都出了兵。除核武器外，美军使用了所有最新武器，恣意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战争，推行了杀光政策。尽管如此，不仅没有战胜南北越的人民战争，而且日益深陷泥沼，被赶进穷途末路。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的冲绳被当作最重要的美军基地，本土也作为美国核潜艇和第七舰队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工业则成为美军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佐藤内阁和垄断资本除了没有派遣日本军队外，在其他一切方面对美国进行了全面合作。

佐藤首相于1967年6月到7月访问了南朝鲜，在汉城同朴总统、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蒋政权副总统严家淦进行会谈；9月在台湾同蒋介石等人会谈，之后回国，不久又历访了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老挝傀儡政权；又于10月8日，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其最后日程是访问南越。在学生和青年工人企图用实力阻止这次“佐藤访越”的第一次羽田机场斗争中，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被机动队汽车碾死。佐藤首相这一连串访问外交，是为了同从南朝鲜和台湾起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止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亲美政权一致协助美国的侵越战争，同时企图在美国的总指挥下，为复活



以日本为其亚洲总管的“大东亚共荣圈”铺平道路。结果他 11 月访美，14、15 日两天同约翰逊总统会谈，16 日发表了共同声明。

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日本必须加强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为此日美一致认为，“今后进一步密切协商”，“同意创造一种使亚洲国家不受中共威胁的环境是重要的”（加强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日本对美国侵略越南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准备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美国将把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归还日本，这“对保障日美两国的共同安全是有利的”；日本将协助美国保卫美元，推进贸易及其他国际交易的自由化；日美还将为促进宇宙开发、海洋开发，原子能和平利用，进行科技合作。

也就是说，日本将在美国的指挥下，拉拢东南亚各国，对那里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同时加强对美侵越战争的全面支持，进一步推行包围中国的政策，不断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也是作为其一环提出来的，今后还要协助即从属于在危机中挣扎的美国经济政策。这里可以看到，同十年前 1957 年佐藤的亲哥哥岸信介以首相名义两次访问东南亚，要求美国同意和支持日本向东南亚扩张而被拒绝时大不相同，虽然都是对美从属，但是日本在东南亚的实力增强了，对美国的地位提高了。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十年间，日本垄断资本取得惊人的扩大和加强，日本、西德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的经济有了发展，而相反的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因在全世界到处镇压反帝民族斗争和支持傀儡政权急剧增加了开支，尤其是越南战费的激增，加深了财政困难和美元危机。这些情况体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里应该简要地概述一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国民生产总值从 1958 年的十一兆五千一百八十二亿日元增长到 1967 年的四十三兆一千一百六十七亿日元，增加了接近三倍；同期国民

净产值也由九兆四千二百三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三十四兆五千九百三十九亿日元，出口额由二十八亿七千六百五十六万美元增加到一百零四亿四千一百五十七万美元。1967年以后由于对美国以及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出口不断激增，到1969年出口总额达一百六十亿美元。现在几乎每天从各方面都能听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的赞扬声。

日本自1967年以来，以贸易收支的巨额盈余为基础，国际收支固定保持盈余。而且在资本收支方面，自1965年以来，支出超过收入，日本由依赖外资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据1970年7月3日《朝日新闻》载：“我国的国际收支在黄金、外汇储备额达二十亿美元的十年前，即使扣除外汇储备也还有近三十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69年底变为三十二亿七千万美元（估计数）的盈余。这种资产的增加主要来自短期资产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信贷、日元贷款以及其他长期资产也达六十五亿四千万美元，超过了长期债务（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外债、借款、证券投资、延期付款和被占领下美国“援助”资金的未偿还余额的合计）六十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在资本输出中，近年来对南朝鲜和东南亚的比重激增。关于其投资的领域，今川璞一著：《日本经济在亚洲的扩张》（日本《世界》杂志1970年11月号）一文谈得很详细。

日本近年来出口急剧增加，这是由于包括越战“特需”采购在内的对美出口的激增和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南朝鲜、台湾、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参加侵越战争的国家的出口的激增所造成的；进口贸易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依赖也是最大的。这些情况表明，日本经济对美依赖程度仍然很深，即仍然继续跑在占领下美国铺设的轨道上。

尤其是日本经济是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远东工厂”，被培植成为高度的重化学工业国。但日本国内几乎没有石油、钢铁等重

化学工业和动力工业的基础资源，在取得原料方面要绝对依赖美国及其势力范围。而且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受其指挥的历届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日本同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受到严重限制，从而使日本在原料方面要绝对依赖美国及其势力范围。

日本垄断资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在确保原料资源上并没有达到它的迫切愿望，美国及欧洲垄断资本居压倒优势。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南亚也只能在日美合作和对美从属的框框内进行扩张。“如在印度尼西亚，美国主要进行资源开发，日本则进行商品援助及对当地政府的资金援助，再就是向制造业，运输、通信和电力等领域进行扩张。而日本则进口美国开发的原料。即日本只有以这样的形式帮助印度尼西亚的亲美政权，使其‘稳定化’，才能得到印尼的原料”（前引今川瑛一论文）。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极其深重。那末，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受美国剥削的一面依然是主要的呢？还是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台湾等东南亚地区扩张，近年来又在加强对非洲的扩张，剥削这些国家的一面是主要的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谁都会回答说剥削的一面是主要的。即日本在经济上一方面依赖和从属于美国，同时今天又正是靠这种作法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剥削国家。即便极力主张日本经济是从属于美国的中国的看法，196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也承认：“日本反动派正在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反动派已经挤进世界上最大掠夺者和剥削者的行列。”于是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市场和资源争夺战迅速激化，这直接表现在日美纺织品谈判上。有人说由于“自由化”，日本经济的对美从属愈来愈严重；日本垄断资本弱小时，日本政府一直拒绝“自由化”，那末既然强大了，不就应该接受美国自由化的要求了吗？日本经济弱小时有拒绝“自由化”的力

量,也就是说那时从属程度低,而经济一旦发展,从属程度反而高了,这种说法,我是无法理解的。

## 第六节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最近日本一直在不断增强军备。据今年(1970年)10月政府公布的第四次扩军计划,从1972年度起五年间,将投入五兆八千亿日元的巨资,即大大超过警察预备队建立以来二十年间重整军备的军费总额,努力“保障我国及其周围的海域和空间的制空和制海优势”(《防卫白皮书》),即企图确保超越国境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武器、飞机、船舶以及其他装备,几乎都已经不依靠《共同安全法》援助而是靠国产的东西来装备。不过,其生产技术仍绝对依赖美国,并完全按照美国的规格来制造。这与自卫队作为对外战争的军队完全从属于美军和最高指挥权实际上操在美国手中是相适应的。即这种军备对外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的旨在侵略亚洲的军备,但这种侵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所要求的。日本垄断资本的政府,可以不受美国的指挥自由使用作为统治日本人民的武装力量的自卫队,因此,不能忽视自卫队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军队的这种性质。

于是依附于美国,并加快了对亚洲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步伐的佐藤首相,1969年11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约定自动延长1970年6月到期的“安全条约”,同时还说“韩国的安全对日本本身的安全来说是要紧的”;“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日本将寻求其对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所能起到的作用”;日本将与南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傀儡政权共命运。佐藤还就《日美安全条约》第四条关于驻日美军出动的事前协商条款约定,一旦美国提出协商,日本的回答将是“迅速向前

看”。这就是说马上同意美军出动。

中国此后一直注视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征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当1960年修改“安全条约”时便断定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复活，那时就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提法，这点前边已经讲过。1965年2月《日韩基本条约》草签以后，中国便更加激烈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196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谴责佐藤访问台湾说：“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的扶植下，已经死灰复燃。”它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佐藤的所谓‘共处’，不就是东条英机的‘共存共荣’的同义语吗？不同的是，当年东条实行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侵略政策，而现在的佐藤反动政府则是仗美帝之势，进行侵略和扩张，充当美帝在亚洲的一名凶恶的侵略爪牙。”（载1967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从此以后，中国的论调如前引文所见，特别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受美国扶植、依靠美国、充当美国的爪牙。同时经常明确指出，日本反动派和垄断资本也在追求本身的利益。1968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的“时事述评”，在论述《日本反动派在亚洲的经济扩张》中谈到：“日本反动派疯狂地对外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这是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日本反动派在亚洲的经济扩张》，载《人民日报》1968年4月22日第6版）

这年11月发表了上述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后，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更加严厉。1970年4月，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说：“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同时说：“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它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公然走上了侵略亚洲的道路。双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见 1970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

在这一“联合公报”的影响下，不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亚洲反帝势力中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突然高涨起来。而日共等却说：日本没有征兵制；宪法规定不能向海外派兵；在国家预算中军费的比率只占一成左右，以此为理由，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尚未“完成”。

何谓军国主义？恩格斯 1887 年 2 月在《给巴黎国际友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中说，欧洲面临着战争的危險，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各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全民皆兵义务和征兵制的军事制度，根据这个“由于有弹性所以能大大扩张”的制度，各国全力以赴地相互进行了扩军竞赛。恩格斯称此为“军国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93—394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三章《暴力论(续)》中也说过：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采用“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67—168 页）

日共说全民皆兵和征兵制度在日本尚不存在，所以说军国主义的复活尚未“完成”，这在理论上或许是根据以上引用的论文。然而，尽管没有征兵制度，正如 1963 年揭发出来的《三矢作战计划》所表明，日本统治阶层在美国的指挥下，不是已经准备了设想重新发动侵朝战争，在开战同时马上建立起完整的战时法西斯体制的蓝图吗？1967 年在滋贺县发现他们竟然命令市町村当局秘密制定了适合战时参加自卫队人员的名册。今天由于行政机能高度发达，一旦政府断定实行征兵制时机到来，马上就会施行。应该记

得，连志愿兵制的警察预备队，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建队指令后的第四十五天便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还有，尽管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还很弱，但日本的对外军备是作为日美“安全条约体制”而存在的。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供认，现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进攻朝鲜和中国。根据“第四次扩军计划”所进行的突飞猛进的扩军工作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比恩格斯所说的欧洲被军国主义控制着更加危险的情景，不是已经在日本出现了吗？

列宁在谈到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时说：

“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sup>①</sup>），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sup>②</sup>）。”（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6页）

根据列宁的这段话，“现代”即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这时是指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好战的反动体制，它有两个侧面，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战争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和在国内外实行阶级统治的武器。日本已签订了侵略性的《日美安全条约》；建立了迅速增强的并且一味加强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训练的自卫队；拥有了自1954年以来逐年得到加强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警察机构；在教育各个角落都完成了反动的重新编制；侵略而好战的意识到处泛滥；议会民主主义早已形同空文；所谓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后的假面具也毫不吝惜地抛弃了（请看最

① “Militarismus nach aussen”系“对外军国主义”之意。——译者

② “Militarismus nach innen”系“对内军国主义”之意。——译者

近的福岛审判官公诉问题)。在这样的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日本既然存在着不断谋求对外扩张、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怎能不实行军国主义呢？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凭暴力镇压全国人民的反对（当时发展到甚至准备出动自卫队）强行通过议会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已经“完成”，之后日益加强，1969年11月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宣布，这个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现在已经作好随时进攻朝鲜、台湾、越南和东南亚的准备。

尽管如此，日共等还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复活，其最后论据是说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其前提在于：他们错误地断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既然从属于一个比它更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它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军国主义。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也是从属于欧美强国；众所周知，日俄战争时日本唯有同英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依靠其财政的和政治的援助来进行那次战争，当英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继续进行战争时，日本就停止了战争，而对俄媾和的条件也只能限定在英美帝国主义同意的范围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就惯于投靠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侵略别的国家。”（金日成：《1970年11月2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新华月报》1970年11月号，第209页），这是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当作首要侵略对象，今天仍然被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当作首要侵略对象的朝鲜民族，根据历史的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

1920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刚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即使在当时，列宁在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作为“极少数富强的国家”，就列举了“英、美、日”，同时他谈到下面一段话：



“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8页）

参与论战的人会说，“可是”，今天日本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1920年的情况不同，继长期被占领之后，美帝国主义一直驻扎着军队，不仅凭“安全条约”，而且在军事实力方面也从属于美国，因此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不仅财政上和军事上力量不足，连单独下定战争决心也是不可能的。

的确，日本统治阶层是不能单独下定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的。他们在世界政治中能够违反美国的意志单独行动的幅度是很窄的。尽管如此，象鸠山内阁还是实现了美国所不喜欢的日苏邦交的恢复，只要想干也是能够做到的。还有，日本统治阶层今天是根据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自主的内在要求拼命向海外扩张的，而不是受美国唆使才去这样干的。

尽管美国实际上掌握着自卫队对外战斗力的指挥权，而且它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作为警察预备队建立起来的。它向保安队、自卫队的改编和加强也是在美国的“援助”和指导下去进行的，但是，日本垄断资本却以占领军的命令为幸运，凭它自己的要求开始重新武装的，是利用了美国的要求和“援助”使军备增强起来的。当时连吉田内阁都坚持“防卫力量渐增”的主张，力争使之适应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目的，并不都是唯美国之命是从。自卫队不只是受美国指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统治日本人民和向海外扩张的军事力量。

还有，日本经济的对美依赖，如前所述，在市场和取得原料方面也是绝对的。然而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日本帝国主义，1930年美国一国就占日本进口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出口占

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其对美的依赖程度毋宁说比现在还高。重化学工业原料，过去日本除燃料煤以外也几乎什么都没有。不过，当时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因此日本对美国一国的依赖程度比现在低，但石油和废铁是绝对依赖美国的。

当讨论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问题时，与其看它在市场、原料和资金方面对外国依赖程度的高低，莫如区别日本基本上是被剥削国还是被剥削国。在这个问题上，今天日本尽管没有象过去那样的殖民地，但已经说过，它仍然是个剥削国。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剥削，日本统治阶层才从属于美国，依靠进攻性的“安全条约”，进行扩军备战。

也就是说，对美从属不能成为否定日本垄断资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论据，它只能规定其军国主义的特点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 结束语——从属帝国主义论

我在上节集中谈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它是以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为基础的，是其必然产物和“活生生的现象”。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应把包括其经济基础在内的现代日本定为帝国主义的理由。不论试取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任何一个例子，都没有不适用于现代日本的。在前面反复引用的中国文件中，也屡称日本为“帝国主义”。

然而在中国，在前面引用过的 1968 年 4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时事述评中写道，日本的“新殖民主义扩张”，是“由它们（日本反动派）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人民日报》1968 年 4 月 22 日第 6 版。），而在此以后的文件中，则单提日本帝国主义，显然是有

意回避“帝国主义”这一词。今年4月的中朝联合公报和自此以后的中国要人的发言以及《人民日报》等的社论，据我所知，日本帝国主义的提法，只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前，而谈到今天的日本时，则一定提军国主义，在与美国并列时，则提“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美日反动派”。这种区别是极其严格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人和劳动党机关报，同样称日本为军国主义，一般不提“帝国主义”，但在把美国和日本并提时，有时也称“美日帝国主义”。例如今年4月5日金日成首相在欢迎中国周恩来总理的正式宴会上的讲话中，最后提到“美日帝国主义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和战争阴谋活动”（金日成：《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0年4月6日第二版）。再如1970年11月2日金日成总书记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国际关系部分中，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揭露和防备当作一个重点，他说：

“对日本反动统治阶层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期望。垄断资本在国内膨胀就要走上向海外侵略的道路，这是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规律。日本垄断资本已经大大膨胀，并已再次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权。正是在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复活及确立其统治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推行重新武装和向海外扩张的政策。”（前引《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新华月报》1970年11月号，第210页）

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基于“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规律”。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同年7月27日在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十七周年的宴会上，招待中国要人时讲话说：

“最近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傀儡集团举行的‘国防部长级会议’，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傀儡集团、朴正熙傀儡集团搞的

所谓‘联络委员会’的反共同盟等等，这些都如实地表明美日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朝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多么疯狂。”（载《人民日报》1970年7月28日号）

朝鲜国家领导人并提“美日帝国主义”的例子，此外还有一些。

对照之下，中国领导人决不提“美日帝国主义”。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同年8月，木村禧八郎访问中国，问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徐明，中国为什么不称今天的日本为帝国主义？徐明以“个人意见”回答说：

“帝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在制度上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我们……曾把东条的军国主义日本不叫军国主义而叫日本帝国主义。那末，是不是不能把今天的日本叫帝国主义呢？也不妨叫做与过去不同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可是把今天的日本同美国相提并论都叫帝国主义，则恐怕会使人们对其从属于美国的一面的关心淡薄起来，从而削弱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抗美援朝，并有使斗争后退之虞。”（木村禧八郎：《中国如何看待日本？》，载日本《经济学人》杂志临时增刊，1970年10月号）

徐明同年8月在回答第六次学生访华参观团提出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不同的问题时，他说：“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区别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在于美帝是不是（日本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否把反美当作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是提出反美、反垄断、反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还是放弃反美口号的问题。”（同上）

因此，徐明认为从明确日本从属于美国和日本人民的抗美援朝的决定意义这一“实际出发”，还是不提日本帝国主义复活为好。如果只是提法问题，把日本“不妨叫做与过去不同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明确“与过去不同的条件”即从属于美国之后，不也可以说是认为帝国主义复活了吗？

我为什么要抓住“帝国主义复活”的提法不放呢？因为我考虑重要的是应该首先明确今天日本的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具有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其本身列宁就称作帝国主义，对凡尔赛和约体制下的德国就称作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一面。站在对美从属的帝国主义（如果愿意叫军国主义也可以）最前列担负领导的是亲美垄断资本家，他们把民族利益出卖给美帝。这种帝国主义或者军国主义的基础是，把日本垄断资本分为亲美和非亲美（包括反美）两类，其中不仅是亲美垄断资本，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就产生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有亲美和非亲美（反美）之别，亲美垄断资本掌握着领导权。反美垄断资本“主张从美帝的从属下挣脱出来，独立自主，在亚洲与美帝争夺霸权”（徐明对上述学生参观团的谈话），即已经清楚说明在日本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式的独立的帝国主义。但我认为只要日本走帝国主义道路，对美从属是必然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帝国主义将来也不会有，现在的从属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无疑也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

今天的日本只要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对美从属就不可避免，这不只是因为在被占领下的七年间以及由《旧金山和约》和“安全条约体制”铺下了这样的轨道，它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及其他革命后的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另找机会再谈。

因此，日本人民一方面受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和掠夺，受军国主义的驱使，同时又通过垄断资产阶级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受（美国）军国主义的驱使。不仅如此，如果从冲绳县人民的情况来看，则一目了然，日本人民还直接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制。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压迫和剥削着南朝鲜、台湾和南越等东南亚民族。因此，具有这样一个统治阶级

的日本民族,也是压迫民族。日本统治阶级的对美从属,听起来似乎矛盾,它使日本民族变成了压迫民族。我把现代日本叫作从属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考虑搞清这一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 第二篇 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

今天(1969年)的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第一流的高度发展了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谁也不会有异议。

然而在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结构是否是帝国主义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仍有几种对立的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实现了帝国主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正走在帝国主义复活的道路上,但还没有复活,它从属于美帝国主义,是其“从属的同盟国”。而我本人则认为日本的国家权力已经被帝国主义化了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但其权力却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我曾经在《中央公论》1955年6月号发表的《鸠山内阁论》中认为:这个内阁正在积极追求已经完全复兴了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独立;接着又在该杂志1956年12月号上把当时的岸信介内阁看成是企图借助对美从属加速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内阁。

---

\* 这是登在月刊毛泽东思想社编辑发行的《月刊毛泽东思想》杂志1969年12月号上的一篇论文。原题为《围绕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在重新收编时将“复活”的引号去掉了。发表这篇论文当时,在日本的毛泽东思想派中间压倒多数的意见是虽然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但不论在什么意义上讲都不承认帝国主义已经复活(即使在今天这种人也占多数)。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毛泽东思想派的成员看的,所以原文用了带引号的“复活”。但这本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加了引号反而可能引起误解。

在这篇论文中,我第一次正式发表了“从属帝国主义”的观点。一年多以后,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的论文,即本书的第一篇论文《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绪论》中,更加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通过议会的两年后，我在1963年7月发行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第四册现代部分》中登载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日本》里面谈到：“现代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的、金融寡头制统治着的国家，……而且已建立起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然而这个帝国主义被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我也知道这种从属帝国主义的说法遭到了攻击，说它本来是同帝国主义的概念不相容的，是一种称不上什么理论的折衷主义。但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这种说法。以下我谈谈我的理由，希望大家批评。

## 一

不言而喻，现代日本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首先想将它同战前作一比较来证实它的特点。

(一) 战前的日本经济，无论根据怎样保守的说法，都会毫不含糊地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垄断资本主义就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还广泛存在着寄生地主制，它在农业方面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显而易见，地主的土地所有形式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在这种土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则是一种以分散的小农家庭劳动为主的、旨在维持农家生活的经营方式，而不是赚取资本主义利润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全部剩余价值作为实物地租被地主掠夺去，农民手中不可能留下利润。然而在富裕中农和富农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营的萌芽。他们经营的耕地，包括自耕地和佃耕地约在一町五反<sup>①</sup>以上。而且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之间的矛盾逐年扩大，地主制衰亡的历史趋势是摆脱不了的。然而，地主制却在战时国家垄断资

---

<sup>①</sup> 町和反(一作“段”)：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0.992公顷；一反=991.7平方米。——译者



本主义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经济制度继续保存下来。尽管垄断资本利用税收、价格剪刀差和战时征购制度等也直接剥削农民，但是农民的主要的直接剥削者是地主阶级。而且地主从农民身上掠夺的高额地租，与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低工资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

在战前，日本内地的就业人口将近一半是农林业劳动者，而且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资本主义产业工人，大部分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从父亲那辈就是纯粹的工人并不占绝大多数，即多数工人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和农户。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农民的社会因素还很大。在此基础上，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族制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占统治地位。

今天，寄生地主制作为经济制度已经没有意义。尽管多少还残存着出租少量土地的地主，但作为阶级势力的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的以及富农的农业经营受到政府的扶植，不过，它并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营仍居压倒优势。广大农民主要受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掠夺。农业人口今天约占就业人口总数的二成。“农家”户数仍然很多，但大部分是政府统计中的第二类兼业农户，他们的生活与其说依靠农业收入，莫如说主要依靠农业以外的劳动工资及其他方面的收入。

（二）今天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地主制已不存在；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剥削制度，全国人民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且这种资本主义还完全受垄断资本的统治，同时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发达的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甚至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纺纱、缫丝等轻工业仍占统治地位，女工占工人的半数以上。能够用国产工作母机来操作还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军需生产变成当务之急以后的事。到了战争期间，日本重化学工业才占了统治地位。

《1932年纲领》，即库西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指出：“首先就是日本的轻工业在今天仍然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一点决不是近代最新财政资本的特征。”“这一点是日本资本结构的最大特征。”（《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6页）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已经不能这么说了。但今天仍然存在着“双重结构”的问题，还有无数资本有机构成程度低的中小企业和零散小企业，尽管它们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其有机构成比垄断资本大企业低，但其机械化的程度决非战前的中小企业和零散小企业所能比拟的。近年来因劳动力不足，这种情况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战前的中小企业虽然在资金和产品销售方面从属于垄断资本，但作为生产单位多数还是独立经营的。而现在的中小企业，多数则是作为垄断资本的承包企业或者该公司的再承包企业而被纳入体系中，变成了垄断组织的附属企业。也就是说，垄断资本的统治达到了战前无法相比的程度，直接贯串到一切行业的全部企业。

（三）现在的贸易结构也和战前显著不同。战前，日本将朝鲜、台湾和库页岛南部变为殖民地，将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变为半殖民地，从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掠夺粮食和铁矿石，工业用煤以及其他生产原料运回日本，并从美国、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进口棉花、机器和石油等，向美国出口生丝类，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出口棉纱、棉布和杂货等轻工业品。即使现在，棉织品和化学纤维仍然是日本的重要出口商品，但生丝已不是出口商品而且必须进口了。

现在，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钢铁、船舶、汽车、电视机等最新的重工业产品和肥料等化学工业产品；在纤维及其制品中，也以合成纤维和人造丝等为主，棉纱、棉布仅占纤维及其制品总出口额的百分之十五左右（1967年数字）。主要进口商品是粮食（包括饲

料)和原油、木材、铁矿石等重化学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加在一起只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八。也就是说,这种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表明,日本已变成一个极高度的重化学工业国家。

进出口的对象国家和地区问题下面还要说。同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每年皆占百分之三十左右;1965年以后向南朝鲜和东南亚,尤其是对参加侵越战争的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急剧增加,并超过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同中国的贸易急剧减少,同战前是没法相比的。贸易对象地区结构,与战前相比发生很大变化,总之,这种绝对依赖对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贸易结构,在论述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复活”,是否“独立”时,将成为重要论据,这个问题下面再说。

(四)从资本的输入和输出来看,战前日本从美国和英国等输入资本,同时主要向朝鲜、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输出资本。战后日本经济借助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政府间的“援助”,找到了复兴的机会;之后又利用了美国私人资本的直接投资、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引进技术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起,日本资本开始向海外扩张,1965年以后,海外投资以各种“援助”、向帝国主义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和私人资本投资等多种形式更加活跃起来。据说1968年度末日本的对外债权和债务的平衡情况是资产超过债务约十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日本现在已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日本经济新闻》1969年3月15日)

## 二

现代日本既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只有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支配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也只有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制完全支配了政治和文化。

过去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有地主阶级，依靠这两个阶级并对它们保持相对独立的天皇制掌握着国家政权。能不能象《1932年纲领》<sup>①</sup>那样把这种天皇制归结为绝对主义，我最近有些怀疑，我认为至少应该看成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就转向波拿巴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不久就变成法西斯主义了。然而这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总之，起源于绝对主义、而且甚至到帝国主义阶段仍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机构的、以天皇为首的军部和官僚机构，掌握国家权力，为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统治着全国人民，资产阶级并没有直接掌握政权。从1925年到1932年，按照惯例是由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政党组阁，但那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暂时地、不完全地掌握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部分的政府，没能剥夺军部和官僚，尤其是军部的独立性。

战败以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到1952年4月一直处于占领军的专制统治之下，在那个时期谈不上日本民族独立的国家主权问题。然而从日本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来说，只有资产阶级通过占领下的各种改革变为唯一的统治阶级，天皇变成没有实权的“日本国的象征”，变成日本资产阶级的王冠。过去的天皇的军部解散了；官僚受占领军指挥，变成占领军和日本资产阶级服务的行政执行者。而且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尽管没有因战败而遭到破坏，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程度暂时下降；贸易微不足道（可以说被美国封锁了）；经济上也完全从属于美国。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在国际法上变成了独立国。但同时因签订了美帝国主义强加给的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过去的占领军改名为驻军仍然继续赖在日本不走。驻军继续

---

<sup>①</sup> 《1932年纲领》：即1932年3月2日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又叫《库西宁报告》。——译者

保持占领军所享有的特权；一旦美国提出要求，日本必须无限制地、无期限地提供陆海空军所需基地，而且基地设施费必须由日本负担；并以防卫分担费的名义，按照美国的要求交付驻军费用；日本的铁路、电信电话和气象有关业务，必须让驻军来优先使用。

从这些情况来看，美军根据“安全条约”驻扎日本实际上是占领的继续。但唯有一点是驻军与占领军绝对不同的，这就是它不再象占领军那样享有直接统治日本国家的无限权力。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完全从属于美国，即使是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也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利的、对美从属的不平等条约。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不消说是要进行干与的，对国内的统治也随心所欲地进行干涉。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冲绳县仍继续处于全面的、无限制的占领统治之下。但除冲绳以外，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不是行使占领权力，而是凭借其帝国主义实力，使没有力量的日本统治阶级从属于它。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压迫，也不是象过去那样凭不由分说的占领命令形式，而是一切都必须根据日本国内法，通过日本政府来进行。在“和约”生效三天后的5月1日，被占领军命令停止发行的《赤旗报》，并未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重新公开复刊，这是三天前那种占领权力已经不复存在的典型表现，是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全面占领，变为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半占领。

旧金山“媾和”并不是日本人民寻求的真正媾和。尽管如此，由于“媾和”，正象上述《赤旗报》复刊那样，人民在解放斗争方面获得了不同于过去的有利条件。而资产阶级可以比人民更自由地活跃起来。在“媾和”问题提上日程的同时，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战争“特需”采购的刺激下，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正式开始复兴。产业活动的综合指数，以战前1934年到1936年的平均值为一百时，到朝鲜战争第二年的1951年底为一百十九点四，翌年

1952年为一百三十一.八。从这年开始，钢铁、电力率先从美国等地引进技术，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1952年5月参加了美国金融资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辟了从这些金融机构接受贷款的渠道。

到1955年，日本政府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重建了拥有最新设备和远比战前、战争期间的资本构成为高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从这年起，强行推进以更新、更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为中心的所谓的“高速增长”计划。其资金来源已不再是依靠美军“特需”和美国“援助”，而是主要依靠对日本人民的掠夺——重税，“合理化”、缓慢而确定不移的通货膨胀以及牺牲社会福利和所谓的社会资本的充实而进行的、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家财政投资和贷款。由于封建的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族制度的瓦解，广大妇女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后期中等教育（高中）的普及，为这次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完成新型垄断资本主义重建的1954年到1955年，也是战后政治结构新阶段的开始。1954年春第十九届国会使用过去的保安队突变为自卫队，走上陆海空三军全有的正式重新武装的轨道。为了给这些军队提供装备，日美缔结了《共同安全法》军事援助协定。并在同一届国会上，以“教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为名，制定了两项法律，实际上是为政府进行教育统制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初步打好框架。教育统制和反动的教育改编，都以此为出发点，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法制化。同时为了镇压人民反对这种对美从属的重新武装和反动政治的斗争，复活了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据说政府和执政党估计到这一警察法案由于在野党的反对，不可能在国会原定会期内通过，为了延长会期，竟将二百名警察拉进国会，动用暴力排除了反对派议员的阻挠，通过了延长会期的议长提案。在从今年春天到夏天召开的国会上，以强行通过大学法案为开端，

所谓“强行通过”竟进行了二十多次，说什么“议会民主主义已经濒临危机”，其实这类事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因将警察拉进国会而被扼杀了。

《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正式重新武装、中央集权警察制和国民教育的反动的中央集权统制的制度化以及为了通过这些法案将警察力量拉进国会，这意味着战后日本所标榜的政治原则“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招牌已被扔掉，开始明目张胆地转入反动与暴力的统治（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必然要建立的政治形态）。

这年年底，那个自 1948 年 11 月以来与占领军和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一直掌握政权的吉田内阁，不仅遭到了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并为垄断资产阶级抛弃而倒台；组成了公开主张重整军备并为此而鼓吹修改宪法的鸠山一郎的日本民主党内阁。鸠山等人一登上政权的宝座，鉴于人民的反对，没有马上提出修改宪法，却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当时政府同美国进行谈判，并就应交给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将随着日本军费的增加自动减交所增军费的半数达成协议，从而向独立自主地进行重整军备走近了一步。这届内阁从 1955 年 1 月起花费了几乎近两年的时间，不顾美国的反对，不顾国内垄断资本和执政党的一部分人员以及外务官僚的反对，响应苏方的倡议，实现了日苏邦交的恢复，从而才实现了参加联合国的愿望。

从鸠山内阁这一系列作法中可以看出，已经完全复兴、正在向新的发展跃进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独立的意愿。有这种意愿和能够实现这种意愿当然是两回事。在国际政治方面，实际上日本是美国掌中的工具，这种情况到鸠山内阁时期基本上没有改变。实现日苏复交，不能忽视它的世界政治结构的背景，即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根据修正主义为制定同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作了准备（1956 年 2 月，在日苏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共产

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4月解散了共产国际，6月撤销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10月恢复了日苏邦交)。尽管如此，但我仍想着重指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适应其经济力量，开始积极地力图从半占领情况下摆脱出来的历史重要性。

鸠山内阁下台以后，借助自民党内派系斗争组成了石桥内阁，似乎要进一步推行鸠山的“独立自主”路线，但因石桥生病，这届内阁不到两个月就垮了。1957年2月组成第一届岸内阁，1958年6月又组成了第二届岸内阁，在这届内阁之下进行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1960年上半年，不顾震撼整个日本全国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6月竟使第二次“安全条约”在议会自然通过，岸信介下台。第一次岸内阁组成不久，岸首相以日本首相身分首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历访了东南亚的美国傀儡政权，回国后马上又去华盛顿朝拜(作为日本首相，这也是第一次)，这次访美的成果是6月21日岸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的高唱“日美新时代”的共同声明。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界中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大论战是从这时开始的。1957年5月，岸首相在国会宣称，如果为了自卫，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违反宪法；1957年8月，成立了旨在修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等，日益加紧强化重新武装(与此相配合，开始撤退驻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废除防卫分担费)和建立反动和暴力的统治体制；同时，首相第二次访问东南亚；1957年12月，在新的意义上重开自1953年10月以来中断了的“日韩会谈”；以赔偿的形式对南越的美国傀儡政权进行援助(1958年初开始谈判，1959年5月签订协定)等，表明岸内阁的政策开始露骨地表现出日本统治阶层向南朝鲜和东南亚扩张的野心，并开始暴露出日美垄断资本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其基础不消说是因为日本垄断资



本主义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情况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复活了？这个问题集中在如何评价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上。

### 三

第一次“安全条约”，其草案是在占领下强加给日本的，在条文上也是一个露骨的不平等条约，不仅日本人民要求废除它，成长起来的垄断资本对它也不满意。鸠山内阁时，1955年8月，重光外相访美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首次提出将“安全条约”修改成日美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的建议。杜勒斯回答说：当日本重新武装不断加强，“能对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条件具备时，美国就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轰动一时的、重光秘密保证向海外派兵就是这个时候。这种密约不管是否有文件得以确认，但当美国确认日本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忠实地履行美帝国主义关于“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基本方针时，美国就同意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望的修改“安全条约”的要求，这条路线是明显的。而且这条路线也是日本统治阶层本身所希望的。

日本的重新武装最初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开始的，是接受美国远东军的指导和指挥的。对吉田内阁时期的那种军备适应经济力量的“渐增”方式，美国一再很着急，希望更迅速地扩军，并且在媾和以后，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片面增加地面部队，以充当美军的炮灰。但日本统治阶层并没有唯美国之命是从，仍贯彻了吉田方式，保持了陆海空三军必要的、均衡的逐渐增加。杜勒斯向重光提出日本现在就要具备向海外派兵的能力（这必须摆脱宪法的限制）的要求时，无疑也是施加了压力的，但杜勒斯的要求与日本统治阶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日本统治阶层必须压制或者逃避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必须为达到扩军的目标创造必要的政

治环境,必须考虑经济实力,因此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作。美国迫不急待,日益施加压力。因为只看到压力很大,所以也就显得好象日本重新增强军备都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日本统治阶级软弱无力、实行对美从属政策的结果。然而日本统治阶级本身也是念念不忘和积极推行重新武装的,这是日本重新武装的基本理由。

岸首相从1957年6月第一次访美时起,向美方转达了要求修改“安全条约”的愿望,受到与重光同样的冷遇。1958年夏天,美国对中国的包围以杜勒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得到加强;中东的危机激化了;在美国鼻尖下的古巴,革命斗争有了发展(1959年1月取得革命胜利);非洲大陆的民族斗争也爆炸性地高涨起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经济从美元不稳发展成为美元危机。因此,就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来说,接受日本修改“安全条约”的要求,让日本主动升格为军事同盟国,比仅仅规定美军驻日的第一次“安全条约”更为有利。而且岸内阁正象美国所希望的,竭力增强军备,为了能够实现向海外派兵,修改宪法的热情也非常高,岂止根本不想象上届内阁或大上届鸠山内阁那样接近苏联和中国,而且破坏了鸠山内阁时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日中贸易,并去台湾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打气。所以它是美国最理想的从属盟友。于是1958年8月,欢迎藤山外相的杜勒斯明确表示愉快地同意进行日本迫切希望的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第二次“安全条约”是根据日本要求缔结的、形式上日美对等的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驻日美军的特权也同根据《北大西洋公约》驻欧美军相同,在条约上半占领状态不存在了。但对日本人民来说,新条约对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没有任何好处,原条约关于驻日美军可以出动镇压人民革命暴动的规定,改变了说法,暗藏在新条约中。过去的租借基地条约的性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新增加了军事同盟的规定,因此对人民来说,日本比过去更紧

地被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但从统治阶级来看，日本则可根据新条约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向朝鲜和东南亚扩张时，取得了一个军事挡箭牌。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或者帝国主义化的人民来说，新“安全条约”比过去更坏，但对力图积极推进修改条约的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新条约则是一个同过去无法比拟的好条约。

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人好象说：新“安全条约”也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它使日本愈益深重地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从而也就妨碍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如前所述，日本统治阶级要求和推进新“安全条约”，美国则是对此响应的，日本垄断资本哪里是被强加给的，简直可以说是争取得来的。在谈到“日本”的时候，要把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同人民加以区别是极其重要的。日本人民是被日美统治阶级的联盟强加了新“安全条约”的，但垄断资产阶级是“争取得来”的。而且对统治阶层来说，新“安全条约”在十年以后的今天，在执行他们的内外政策时，一点也没感到妨碍和牵制，心里想没有再比这更合适、更难得了，说：“日本的繁荣是托福美国核保护伞的”。不过，为粉碎“安全条约”而斗争的人民力量，并不是共产党那样的口头反对派，而是作为真正的反对派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摆脱人民的反对，陆陆续续有人主张最好改变日美军事同盟的现状。

新日美“安全条约”使那根把日本绑在美帝国主义战车上的绳索变得更加粗大。有人把这种事实解释为日本对美从属的加强和加深，这不是弄错了事实，就是曲解了理论。在法律上来说，新“安全条约”规定日美是对等的、条约是有期限的，仅就这点来看，它就比过去大大增强了日本统治阶级的对美独立性（不是完全独立）。而一个在法律形式上的对等的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哪一方面居优势地位、掌握主导权，哪一方处于从属地位，这只能由各个同盟

国的实力来决定。日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对比是绝对悬殊的,即使以美国在远东能够自由动用的实力与日本的实力相比,日本也是望尘莫及的,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因此,日本对美国不能不居从属的地位,与在第一次“安全条约”下的情况相比,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并没有加深和增强,而是由半占领状态上升为从属的盟友,日本垄断资本对美国的地位是提高了。日本统治阶级所以主动地选择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国、“钻进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道路,而不是美国借第二次“安全条约”强加给日本的,这是因为他们要对抗社会主义中国,要向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新的经济和政治扩张(这正是帝国主义政策),不能不同美国军事力量相勾结。即使日本重新武装有了进展,日本垄断资本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对抗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何况对中国施加压力,那就更谈不到了。日本统治阶级只要想实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扩张,除了选择建立对美从属同盟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败战,经历了事实上被美国单独占领、旧金山媾和及第一次“安全条约体制”的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在亚洲除美国外没有结成帝国主义同盟的对象,由于这样的政治地理条件,迫使日本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从日本被迫走上这样的道路这一点来说,尽管第二次“安全条约”的外交谈判是根据日方的主动要求进行的,但在历史上和客观上,日本方面还是有“被强加”的性质。而且虽然说这是日本垄断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缔结的或者说不能不缔结的从属同盟,可是既然建立了这种同盟关系,日本要根据自己的意志解除它,美国是不会同意的。美国也根本不是为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利益同意第二次“安全条约”的,它始终要把日本攥在自己的掌中,作为它“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略和战略的重要一环,为了美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才容纳日本的要求的。如果日本想要背离美国,它是决不会

同意修改“安全条约”的。否定日本垄断资本对美从属的人所持最重要的论据是，在“安全条约体制”中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美从属是日本方面选择的道路。如上所述，很明显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缔结第二次“安全条约”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条约，1961年设立了日美贸易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日美科技委员会和日美文化教育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据说也是美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加强对日侵略，并使其进一步从属化的，但这也同“安全条约”本身一样是日本对美从属同盟的一种补充。日美贸易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既是一个把美国的要求，诸如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强加给日本垄断资本的场所，反过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抵制这种要求的场所。双方在这里的关系是根据实力（它不仅是经济力量，而且还包括亚洲形势以及其他政治条件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复杂力量的总和）来决定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固定的美国对日统治的工具。

在建立第二次“安全条约体制”的同时，在池田内阁之下“日韩会谈”也开始有了进展。据说1962年8月因为预计到谈判会达成协议，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便就“日美韩军事合作大纲”达成协议；同年11月就南朝鲜对日财产请求权问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韩会谈”的最大难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不过“日韩会谈”最后达成协议和《日韩基本条约》等得到批准，是在三年后的1965年11月。这是由于“日韩”双方的国内政治形势（人民的反对和置人民反对于不顾的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统治势力内部的斗争等）而推迟的。

在这期间，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经历了1962年2月在西贡设立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1964年8月美国舰队炮轰和飞机轰炸北越（北部湾事件）；1965年1月南朝鲜向越南派兵；2月美军猛烈轰炸北越，升级为对整个南北越南的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日本

政府和统治阶级参与侵略也积极起来。1964年9月，政府决定给南朝鲜二千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意思是补偿南朝鲜因向越南派兵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冲绳作为轰炸越南的美军基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越战相关联，美国核潜艇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在佐世保和横须贺一再“停泊”；日本垄断资本借助美军直接和间接的“特需”，又找到了一个跃进的机会。日本这样一个后勤基地，给美军侵略越南帮了大忙。日本除了没派出军队外，在一切方面积极参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日本垄断资本从同美国的帝国主义同盟那里赚得了最大的利益。

#### 四

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同盟，积极参与其侵略战争，从中分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仅根据这一点就应该把它叫做帝国主义国家。南朝鲜傀儡政权和菲律宾在美国的强制下被迫向越南派兵，用本国人民的生命换来美国的“保护”和“援助”。日本参与越战与这些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日本利用“日韩条约”，将南朝鲜纳入它同美国共有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变为剥削和压迫朝鲜民族的国家，明目张胆地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并加强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的“日美韩军事政治同盟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日方的经济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怎么还能说日本不是帝国主义呢。

日本垄断资本在越南战争“特需”的刺激下，成功地回避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政策”所造成的破绽；借助其增长了的经济实力，乘美帝国主义因越战失败而开始的美元危机愈益深化和在政治上侵略亚洲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之机，部分地“代替”了美国，在南朝鲜和东南亚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扩张。日本

不仅在美国指挥下的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太平洋地区部长会议等国际机构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日本资本单独向东南亚的扩张也是惊人的。

就商品输出来说,1967年,“日本对南朝鲜、台湾地区、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口都超过了美国,占了优势地位。特别是南朝鲜,1961年和1965年美国都占其进口的第一位,但到1966年日本变为第一位,1968年(1月到10月)日本为百分之四十四,美国为百分之三十二,同1965年相比,日美调换了位置。”“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美国的出口直线下降,而日本1967年则为1962年的两倍,同美国的差距显著缩小。”<sup>①</sup>

日本的资本输出,从1960年起增长很快,其投资地区,1960年以前,北美和中南美占日本国外投资总额的七成,1961到1967年度,北美、东南亚和中近东同样占了七成,“尤其是对东南亚的投资,增长显著,总额增为四点四倍。从1951年度到1967年度的投资行业的情况来看,对北美的资本输出,商业等服务性行业约占百分之五十七;对东南亚则以矿业为最多,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纤维、食品、钢铁、金属等。这说明,企图通过开发投资进行原料资源的开发,以便长期地、稳定地保证原料资源,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对制造工业的投资,扩大成套设备的出口。”<sup>②</sup>

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了猛烈的扩张,对美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国际收支的综合收支近三年来也持续盈余,国民生产总值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并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于是它今年以来竟大声疾呼地宣传起什么“自主防卫”,在第四次防卫计划(正确地说是扩军计划)中,把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的扩充上,甚至扬言必须“防卫”马六甲海峡等,他们的

---

<sup>①②</sup> 引自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1969年9月号刊登的《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动向》一文,该文对日本向东南亚扩张阐述得很详细。

“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野心是极其露骨的。

佐藤首相之所以向美国提出“归还冲绳行政权”的要求，并不是因为迫于冲绳县民以及本岛人民解放冲绳的斗争，用“归还行政权”来支吾搪塞，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姿态，而是因为对敌视中国、企图加强对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日本垄断资本来说，为了达到其扩张的目的，不想将军事地理上具有极重要地位的冲绳置于美国单独统治下的美军基地，他们迫切需要挤进去把它变为日美的共同基地。这时已经不是在日美共同声明中如何处理在美军基地上安装还是拆除核武器的问题，而是日本统治阶层利用“归还”这种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心理，乘机把“安全条约”的事前协商事项扩大为日本对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和越南也事前积极同意，从而进一步积极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这点比上述问题更重要。

日本如今不仅在经济基础方面完全帝国主义化，而且在政治上建成了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即在内政方面加强了反动与暴力的统治体制（请看最近在国会搞的二十多次的“强行表决”，今年4月28日、10月10日和10月21日的各次斗争，还有警察对阻止佐藤访美斗争的镇压和自卫队的“治安出动”的万无一失的准备）；在国际上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这种反动与暴力的统治，扩张与侵略的政策，并不是佐藤内阁或者别的什么内阁随便选择的政策，而是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除了这种政治以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政治。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已经完成复活，我不认为是“正在复活”。其复活的里程表是：从1954年到1960年为过渡期（如果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正在复活”），1960年修改“安全条约”奠定了复活的基础，1965年签订“日韩条约”开始了帝国主义扩张，而今天，1969年11月，佐藤访美则是试图获取帝国主义的新的进展。

然而这个帝国主义如本文第三节所述，它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这是因为第一，在日美实力对比方面，事实上美国强大，居压倒优势；第二，这种从属地位是由败战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造成的，而且也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适应这种客观条件、亲自选择的道路。只要日本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垄断资本从其经济本质来说不可能选择别的道路），就不能避免对美从属。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形势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单独实行帝国主义，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能了。今天甚至连美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单独地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他们说“集体的安全保障”才是今天的“安全保障”呢！当然，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防御性的，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侵略性的。

这样讲，有人会说从属和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概念。然而，较弱的帝国主义从属于强大的帝国主义过去也有过，就是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能说明。请参考《帝国主义论》第五章和第六章。列宁对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指出，它在金融方面是从属于英美的。

强调日本对美从属、否定日本是帝国主义的人列举了如下事实，说日本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如石油工业所代表的，在战略产业方面大都依赖美国资本，在资金和技术上依赖美国，在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东南亚也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日本经济隶属于美元区，等等。然而这些都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关系中司空见惯的事。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帝国主义的银行资本，三分之二由法国资本控制着，俄国在金融方面完全从属于法国，但这毫不妨碍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宁说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双重帝国主义，作为现代帝国主义的表现，他列举了侵略“满洲”，构成沙皇专制政治经营“满洲”中枢的道胜银行，完全由法国银行控制着。今天日本在金融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比当时俄国在金融上对法国的依赖，或者当时的日本对美英的依赖程度低得多。

今天日本的新殖民地的扩张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与其说这是对美从属的证据，莫如说日本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独占的地区，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具有历史的和政治的意义，所以说它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一种表现。

虽然非常不充分，我仅提出以上论点，到此结束。

### 第三篇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 第一章 重整军备及其政治经济的基础

##### 第一节 留下了帝国主义的孽根

1945年8月,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向同盟国投降了。盟国对日占领军(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军),在9月中占领了日本全部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并解散了大本营<sup>①</sup>、陆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sup>②</sup>、海军军令部<sup>③</sup>等所有军事机构和陆海军队(战败以前,日军中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部队分属于陆军和海军)。在海外的日本陆海军也分别向其所在地的盟国各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完全解除了武装。接着,除天皇以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人都作为战争犯罪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军国主义的各种团体全都被解散了。第二年1946年1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国主义领导人,被从政界、行政机构、经济界、教育界以及各种民间团体清洗出去,并禁止再任公职。被清洗的人数达八万六千人,另外,职业军人约十二万人也全部被从公职清洗出去,并采

---

\* 我从1976年1月到6月,在中国北京大学“日本近现代史短期研究班”讲学。本稿是以当时的部分讲义为基础,稍加修改撰成的。与这个题目相关联,在这之前讲了《战后日本史的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矛盾》,又在这之后讲了《现代日本的主要矛盾》。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准备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形势另写一本书,这另外一本书就是以在北京的这一题目的前后讲义为基础,正在编写中。割裂讲义的整个体系,单独抽出此稿,多少出现有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因此作了简单的补充或改写。它与本书的第一、第二篇论文的基本观点相同,但更具体地、更详细地追述了史实。

① 大本营:战争期间在天皇之下设置的最高统帅机关。——译者

② 陆军参谋本部:即陆军参谋部,是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译者

③ 海军军令部:是海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译者

取了各种禁止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措施，如禁止使用过去那种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学校教科书等。主要军事工业的机器等，作为实物赔偿的一部分由盟国接收过去。

总之，占领军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日本军国主义不能东山再起。占领军显示出一副象是要彻底执行这项任务的样子。

然而，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子还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军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第一，保留了经济基础。

由于战败和其后根据占领军指令进行的各种改革，寄生地主制基本上被废除了，但保留了垄断资本主义。战败以前，军国主义最大和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地主制已经变为次要的东西。其最主要的基础垄断资本主义，因战败受到沉重打击，但决没有被打倒、被消灭。地主阶级灭亡了，但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而且由于地主阶级的灭亡，资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变成唯一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比以前更强大了。他们也被置于占领当局的统治之下，但在日本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中，他们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

美帝国主义占领军为了防止日本垄断资本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宿敌而再起，并将其改造成为美国的忠实附庸，推行了种种政策，但它决不想消灭和摧毁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而且占领军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推翻垄断资本、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斗争，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被保留下来；军国主义最主要的阶级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得以幸存下来。

列宁 1908 年说过：“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参考本书第 128 页）只要还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就必然

留下军国主义的根子。

第二，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指挥者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触动而被保留下来；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尊崇天皇的观念也得以保存下来。根据新宪法，天皇已不再象以前那样，不是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依然高居于日本国民之上。为了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盟国远东委员会和美国的舆论都强烈主张必须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但美国政府压制这种意见，将天皇作为“象征”保存下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过，“天皇是胜过二十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在他迫使日本政府接受的新宪法草案中，定有禁止日本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条款（现行宪法第九条原案），但麦克阿瑟认为，尽管有这一条款，只要以某种形式将天皇这个巨大战斗力保存下来，在美帝国主义认为必要时，便可随时重建日本的军事力量，为美国来加以利用。

因此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就妨碍了日本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天皇的命令、在天皇的最高指挥下所进行的那次侵略战争感到责任，妨碍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在保留天皇的同时，也就保留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虽然不象第一、经济基础，第二、意识形态的核心那样的根本性的因素，但第三、占领军司令部竟为他日重新武装日本秘密保存了人的因素。

麦克阿瑟总司令和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占领军总司令部反情报队队长）把以战争期间东条首相的秘书官、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上校为中心的一些旧陆海军参谋收罗到总司令部“太平洋战史编纂室”去了。参加这种编纂工作的旧参谋之一的丸山一太郎（笔名？）在1952年的文章中谈到他们为了收集资料曾同全

国数百名旧军人进行联系,并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知道内情的日本人中间加深了“怀疑,在总司令部的庇护下,十几名作战专家的旧军人集中在一起干‘什么’呢?”威洛比少将,“他的看法是日本早晚必定要重新武装。因此他是为了不断绝火种以备来日之需,深谋远虑地来看待我们旧军人的。”“当朝鲜动乱出现危机时,特定的人员一再从编纂室消失了。这些人肯定在邮船大厦(编纂室所在大楼)的什么地方。但我始终没能打听到他们担负着什么任务,在哪个房间。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我在一个人的桌子上看到一份正在制定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防卫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央公论》,1952年5月号)

麦克阿瑟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有为朝一日重新武装日本保留了军队的“火种”。

1946年1月,清洗了超国家主义者,但并没有真正将日本军国主义的领导人一扫而光。最近揭露出洛克希德公司对日本政治家行贿的问题,这次行贿的拉纤人儿玉誉士夫成了瞩目的中心。儿玉是旧日本海军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日本被打败时,他将其机关在中国非法搜刮的大量金银财宝带回日本,并将它提供给鸠山一郎等人,作为日本自由党的创建和活动的经费。鸠山不久就被清洗了,但吉田茂接替鸠山当了日本自由党总裁,1946年5月组织了内阁。自由党同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日本民主党同时是战败后连续掌握日本政权的政党,媾和以后便很快热中于重新武装。

第四,在规定日本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斗力的宪法第九条中,日本反动派和占领军总司令部偷偷地准备了通向重新武装的道路。占领军最初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第八条第一款是“废除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永远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

解决同其他国争端的手段”。这是根据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给部下的关于修改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必要条件的第二款，它不仅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战争，而且意味着也放弃了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然而接受这一草案的日本政府，当把它作为政府的宪法草案时，将条文改成下述字样：“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由于这样一改写，这个条文就可解释为只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没有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占领军对这样改写表示了同意。

还有，在审议宪法草案的帝国议会上，将司令部原案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将来也不应赋予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之保持权；也不应赋予国家交战权”，改为在前头加上“为达到前项目的”的字句。这样一改，这一款就变成为了达到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战争的目的，不保持战争力量。于是言外则偷偷地塞进了可以保持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力量的意思。占领军也同意了这种修改（在占领时期，任何法律草案和在议会的修正案，都必须预先得到占领军的同意）。

占领军和日本反动派将占领军原案的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作了上述修改，变为现行宪法的第九条，偷偷地准备了借“以自卫为目的”之名进行侵略战争和为此而重整军备的道路。

在审议宪法草案的议会上，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肯定地说第九条规定了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也放弃。然而那只不过是一种当场的即席表态而已，吉田的真心并不是那么想的。他在议会上这样说，可是没过四年，在1950年1月，他又强调宪法没有放弃日本的自卫权，在“自卫”的名义下，为旨在进行侵略战争而重新武装作了思想准备。

总之，由于战败使天皇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受到沉重打击。但他

们并没有被日本人民的革命推翻，而是由美帝国主义占领军进行了部分的改造，作为对美从属物而保存下来，从而保存了军国主义的经济的、阶级的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随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军国主义也就必然要复活。

## 第二节 重整军备的开始与军国主义思想政策

1948年初，为了对付中国革命带动下的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革命的发展，美国改变了过去的对日占领政策，决定尽快把日本重建为远东的反共堡垒，把日本垄断资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

与此同时，据报纸报道：早在这年年底，美国五角大楼就制定了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1948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著名的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的一篇评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重新评价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迟早要回到利用日本的人的资源问题上。因此必须修改放弃军备和战争的日本宪法。”同一天英国报纸《每日邮报》驻纽约的特派记者报道说：“为了对抗中共军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正在研究重新武装日本和利用日本的人的资源问题。”

第二天，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报道说：驻日占领军主力第八军前司令艾克尔巴卡中将主张在日本建立一支用轻型武器武装的、最大限度十五万人的警察军是当务之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国防部消息灵通人士”也都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艾克尔巴卡早就认为：“日本人可以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十分清楚，报纸上报道的这些消息不是臆测而是事实，因为在一年半以后，根据占领军的命令，日本就建立起同艾克尔巴卡所唆使的“警察军”一样的东西。



1950年6月25日,美国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两周以后,7月8日,麦克阿瑟向吉田首相发出指令,必须马上建立一支七万五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厅增编八千人。

这一指令采取了加强陆上和海上警察力量的形式。但无疑是指示建立一支小型陆军和小型海岸警备海军的。为了进行侵朝战争,驻日美军几乎全部开往朝鲜。因而在防备人民革命、保卫占领权力当局和日本反动派的政权的武装力量方面出现空白。为了赶紧填补这个空白,发出了上述指令。指令说创建新兵力的经费由本年度国家预算一般会计项目的公债偿还费中支出。

这年的公债偿还费预算列有五百四十七亿日元,占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三。本年度偿还到期的国家债务只有十五亿日元,而列入的预算竟达三十六倍以上。这个预算是美国公使道奇直接指挥日本政府编制的。为什么要列入这么多的公债偿还费呢?在这年年初召开的日本国会上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真相大白,这是为了充作重新武装费用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占领军以及日本反动政府是预先就准备借警察预备队之名创建日本新军队的。这也是美国作了发动侵朝战争准备的一个证据(政府过去解释说:“列入过多的公债偿还费预算是为了防备通货膨胀”)。

从这笔预算中支出了警察预备队创建费二百亿日元和海上保安厅增编,即新设海上警备队费四十六亿日元。

接到麦克阿瑟指令的吉田内阁8月10日颁布了警察预备队令。它不是根据经国会审议的法律,而是根据政府为执行占领军命令而颁发的政令(通常称波茨坦政令),这是日本新军备诞生的反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政令说:“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与秩序,保障公共的福利,在必要的限度内”,补充警察力量,建立警察预备队。预备队是作为总理府的直属机关而建立的,在维持治安特别

需要的时候,接受总理大臣的命令而行动。

从颁布预备队令之日起,政府就公然大张旗鼓地招募志愿队员,开始为入队人员准备穿的军服、携带的武器和居住的营房。之后,在第二周的8月23日,全国七千名第一批入队的预备队员穿戴上宛如美国步兵的军服和军帽。这时麦克阿瑟的指令下达后才仅仅过了四十五天。这表明这一部队的创建很早以前连技术事项都作好了准备。正因为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事先充分研究了招募士兵的方法和机构,充分确保了必要人员,很早就准备了士兵必需的服装、鞋和卡宾枪以及他们居住的营房,所以才能够这样很快就完成了部队的编制。从其手法的巧妙来看,日本今后实行征兵制,一举编成一百万、二百万的大军时,也一定会是轻而易举的。实际上,日本实施征兵制,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这样迅速编成的警察预备队,到1950年底已建成拥有美国借给的卡宾枪和机关枪的、纯美式的四个轻步兵师。如果弄坏了这些美国借给的武器,日本必须赔偿;而且各级组织的武器都由美军来管理。于是美军通过武器管理也就管理了部队。

师司令部的别称叫“管理本部”。第一管理本部设在东京、第二设在札幌(北海道)、第三设在舞鹤(京都府的日本海方面的要港)、第四设在福冈(北九州,与朝鲜半岛相对);队员以大队<sup>①</sup>或者联队<sup>②</sup>为单位,在全国设立三十七个兵营(美军用语叫“Camp”,即宿营地)。部队训练是在美军军官和被派到分队的下级军官的指导下,由志愿参加预备队的旧日军军官和下级军官来进行。所使用的操典几乎是从美国步兵操典直接翻译过来的。

海上保安队10月23日根据政令将编制由一万人增为一万八

---

① 大队,相当于营一级。——译者

② 联队,相当于团一级。——译者

千人(不包括办事员),拥有的船舶由二十五艘激增为二百艘,由五万吨激增为八万吨,担负日本的沿海警备。新建了海上保安大学、海上保安训练所,即培养海军的军官和下级军官的地方。

警察预备队员月薪五千日元,服役二年,退役时发给六万日元的退職金。月薪比普通工人的工资低,当时日本经济还没有从战败的打击中恢复起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到处都是失业者,因此志愿报名人数竟有招募人数的好几倍(后来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进入成长期,志愿参加预备队的后身——自卫队的人数骤减,变得达不到编制了)。

政府一口咬定硬说警察预备队不是军队,是不折不扣的警察的预备队。因为保持军备违反宪法,所以政府只能这么说,尽管它还极其弱小,但也是军队。这不论占领军还是日本政府都是十分清楚的。麦克阿瑟竟然在国会上洋洋得意地说:“警察预备队与其说是警察力量,毋宁说是警备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为强大的保障国际安全的兵力”。

日本的重新武装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从其历史来看,还是从它完全受美国军人统治的部队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军队首先是一支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土著军队。预备队的长官和副长官是日本人,部队的各级首长也是日本人,然而在这些长官和副长官以及各级部队长官的身旁一定都跟着美军顾问,他们是部队的实际指挥者。

但是也不应以此为理由而轻视这一新军备的其次的一面,它又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今天在日本是唯一的剥削统治阶级)和反动派对内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对外为实现其复活帝国主义的野心的暴力机器。他们急切地等待着重建军队之日的到来。如果他们明目张胆地叫嚷重新武装,会遭到人民大众的反对,因此他们就宣传什么一切国家都有自卫权呀,日本也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国家防

御呀。吉田首相总是声称：“不重新武装”。但到1950年正月则强调说，日本国宪法并没有放弃自卫的权利，1950年底又说要“考虑自卫的方法”等。他所谓的“自卫的方法”，就是在媾和后缔结《日美安全条约》，让美军仍驻扎日本，一面依赖美军，一面逐渐加强日本军备。

统治阶级有势力的政治家，他们的说法大体上与吉田首相相同。其中独有前首相芦田均从1950年底就直言不讳地公开主张重整军备。他是1946年审议新宪法草案的国会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九条第二款开头加上“为达到前项目的”的字句就是他想出来的。他同多方面的人士接触，设想当前建立一支十五个师、二十万人的陆军部队。

在开始重整军备的同时，全部解除了对旧军人的清洗令。接着对一般担任公职的也解除了清洗令。过去的超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纷纷出笼，又耀武扬威横行起来。儿玉誉士夫一度也作为战犯嫌疑分子关进巢鸭监狱，1948年出狱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在此以前曾在伪“满洲国”进行过残暴殖民统治的岸信介，也从1951年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两人紧密勾结，儿玉在幕后，岸信介公然在政治舞台上为复活和推进日本军国主义扮演领导的角色。

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七年重劳役的原外务大臣重光葵也在刑满前的1951年11月出狱了。他与芦田相勾结，很快就成了民主党的后身——改进党的最高干部、总裁，为促进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而大卖力气。

战前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集团也一个接一个地复活起来。不仅如此，在工人运动中，“国铁”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发起了号称“发扬爱国观念的工人运动”的法西斯运动，它们十几个集团于1951年9月联合起来，自称“民主劳工运动研究会”，在“爱国工

人运动”的名义下，扮演分裂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产业别工会这时几乎已丧失了实力）、破坏工会的法西斯突击队的角色。

中小学校从1950年9月左右起，逐渐恢复悬挂太阳旗，并把天皇赞歌《君之代》当作国歌唱了起来（附带说明：太阳旗是国旗，但《君之代》不是国歌）。国家神道开始复活，并且开始实际上强制为伊势神宫捐款，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字后，同年10月，在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时，吉田首相竟以“个人”身分去参拜，各报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同时文部大臣天野贞祐自己编写了小册子《国民道德实践要领》，强调天皇是国民道德的中心，并以文部大臣天野贞祐个人的名义将小册子散发给全国中小学校长作“参考”。

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想准备活动就是这样在一切方面同时开始了（井上清等人合著：《现代日本历史》下卷，1952年）。

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早就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东山再起的危险。即日本还实际上完全处于美帝国主义的占领下，在美国尚未发动朝鲜战争（但却稳步地进行着准备），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众所周知，这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再起而作的事前准备，条约前言说，中苏两国政府“决心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新华月报》1950年1—3月号，第1085页）并在条约第一条中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同上）

这一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先预见到日本帝国主

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的。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同时日本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几天后于5月5日,中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发表声明。“声明”明确指出,《旧金山和约》与《日蒋和约》是非法的,并进一步讲了下面一段话:

“这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祸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复活它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统治。”(载《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第40页)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六章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矛盾,并就日本和德国,讲了下述一段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在斯大林这样说过后,已经过去二十三年多的今天,日本还没有完全砸烂美帝国主义的镣铐。然而日本的统治者不是从正面与美帝国主义对抗,而是一面从属于美国,一面利用美国的力量,逐渐复活日本本身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斯大林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必定要复活的理论性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和斯大林所预见的，日本军国主义勾结美帝国主义，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媾和以后加快了复活的步伐。

《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吉田首相与第二任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就加强日本的军备再次达成协议，并就下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952年1月，在新年度（1952年4月到1953年3月）的日本国的预算中，将警察预备队于1952年度内增加到十一万人，并用大炮、高射炮和坦克等重武器装备起来，进而在1953年度内跃增到三十一万人。在海军方面，日本还决定改组海上保安厅，接受美国借给的二千吨级的驱逐舰十艘，五百吨级的舰艇五十艘，加强沿岸警备力量。

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政府于1952年4月决定把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合并起来，新建保安厅，并于“媾和条约”生效后的1952年7月建立起来。同年4月19日，李奇微对美国新闻记者团说：“在军事方面期待日本自己创建以防御为目的的陆军。警察预备队最终应该发展成陆军，这已暗中包括在《日美安全条约》所赋予日本的义务之中。”（《日美安全条约》的前言中规定：美国“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

这里美帝国主义露骨地暴露出促使日本重整军备的真正目的。美帝国主义在此阶段还警惕日本建立正式的陆海空三军。美国的目的在于：不让日本保持海军和空军，而只是想把日本人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用来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替死鬼。上述1952年1月迅速增强警察预备队的方针就是日本政府不得已被迫接受李奇微所说的美国方针的结果。

然而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执政者们内心反对只片面增加充当美军替死鬼的地面部队。他们企图逐渐均衡重建陆海空三军的现代

军队。吉田首相称此为“自卫力量渐增”。他坚持这一方针，竭力抵制了美国的要求。

吉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亲美派外交官，战后被美国占领军起用而掌握政权。因而日本进步的人们把他当作追随美国的卖国的当权派不断进行批判。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不应忽视，他是代表日本垄断资本和反动派要求复活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从这种立场出发，他对重新武装日本尽管表面上服从美帝的指挥，实际上总是以日本经济力量不足为借口，不实行美帝的只片面急剧增加陆军的要求，而是贯彻了吉田的所谓“自卫力量渐增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就会看不到日本的重新武装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过程的表现。

1952年7月，政府按照4月计划颁布了《保安厅法》。这时已经是媾和以后，已经不可能以执行占领军命令为理由颁布政令来进行扩军，要把警察预备队改组为保安队，必须根据经日本国会审议的法律来实现。警察预备队在法令上始终只能解释是警察的预备队，但保安队在法令上则与警察完全是两回事。按规定，它是“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及财产，在特别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部队”。其编制定员总数为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七人，其中十一万人为保安部队（陆军），七千五百九十人为警备部队（海军）。其余二千三百五十七人为保安厅的内部部局和附属的保安研究所、保安大学（培养军官的机构）以及技术研究所的职员。

8月4日，吉田首相以代理保安厅长官的身份，对保安厅机关以及第一、第二幕僚监部（陆军和海军的参谋部）的干部作了内容如下的训示：

“重整军备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力也不允许。然而需要有一个保护国家的组织，所以组织了保安队。将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军。保安队的任务是要成为建



立国军的基础。”

吉田首相又在同一天的全国知事<sup>①</sup>会议上讲话说：“要坚决阻止扰乱社会秩序的破坏活动。最近一部分学生叫嚷反对征兵，这种言行令人深感遗憾。我之所以不主张现在实行重整军备，是为了等待时机的到来。”在翌年9月，吉田首相又在执政党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总会上强调说：“二百亿日元的预备队经费，就说成是重整军备，可付之一笑。现在要紧的是，在教育方面应该利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历史和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和历史教育，培养作为军备基本的爱国心。”

他确实认为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军备。那只不过是真正的建设军备打基础，企图等待“时机到来”，即在养成军备之本——“爱国心”，完成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准备，经济力量得到充实之后，才正式进行重整军备。这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步骤所作的巧妙的政治安排。

保安队和警备队于10月15日成立。其装备是由美国借来的，陆军配有重炮、坦克和装甲车等；海军配有护航快舰十八艘，大型登陆艇五十艘以及其他装备。

保安队和警备队都有美军顾问，他们是管理借给日方的武器和弹药的，事实上也就管理和指挥了军队，这与前一时期完全一样。尽管这种顾问在媾和以后失掉了法律上的根据，但实际上今天的作法同占领期间的美军作为警察预备队的顾问对其进行管理和指挥是一样的。

保安队完全为美帝国主义所掌握，这也表现在预算方面。与占领下的警察预备队的预算相同，“独立”后的保安队的预算额也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1953年，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的统治下，采取了所谓“新国防政策(New look 战略)”，即对

<sup>①</sup> 知事：是日本都道府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译者

苏联和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世界新战略。作为这一战略的一环，强烈要求日本迅速加强军备，尤其是地面部队。因此，驻日美军也象占领军当时一样干预日本国家预算的编制。媾和以后，日本还必须分担根据“安全条约”而驻日的美军所需要的经费。当日本编制岁出预算时，必须首先同美军协商决定驻日美军防卫分担费的金额（日本把它叫作防卫支出费）。与此相关联，美军对决定日本军费也大肆干预。

日本本身的军费预算，1950年度为二百亿日元，1951年度为三百一十亿日元，1952年度（媾和后的第一年度）为五百九十一亿日元，1953年度为六百一十一亿日元，1954年度为七百四十二亿日元，年年飞跃增加，1956年度为九百九十九亿日元。各年度的金额完全接受了美军的要求。

此外，在1952年度预算中，以“安全保障费”这样一种暧昧的名目列入五百六十亿日元。这是因为日本不想按照美国的要求很快建成三十一万五千人的地面兵力，所以美军便强制日本政府（这年的预算编制期还在占领中）列入了一笔需要紧急增加兵力时（恐怕是预想到要驱使日本军开往朝鲜战场）的经费。这笔预算结果被用作驻日美军的设施费，到1955年度才算用完了。（朝日新闻社编：《日本的防卫与经济》）

尽管编制了这样巨额的预算，当时日本还没有足以全部花掉这些预算的制造武器和舰船的能力，而且演习场和空军基地等的建设，由于收买建设用地——受到以当地居民为主力的人民反对基地运动的阻挠，其设施的建设大都没能着手进行。结果这笔预算每年在年度内都花不完，1956年度以前转入下年度的金额每年都超过二百亿日元。在1957年度的预算中，转入下年度的金额才降到一百亿日元以下。

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花不掉，这不仅由于上述原因，实际上可

以说是日本政府对美军要求片面增加地面部队的一种抵制，是以物资采购困难为借口来拖延实际支出（前引《日本的防卫与经济》第 57 页）。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上述列入预算的“安全保障费”及其实际使用方式，表面上日本政府屈服于美军的无理要求，但没有按照美军要求去实行，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第三节 自卫队的创建及其特点

垄断资本家开始积极着手军事工业的建设。1950 年 6 月，美军一发动朝鲜战争，便向日本产业界发出大量为了战争的军需品订货。货物品种最初为车辆、船舶、燃料桶、纺织品、药品等。但 1952 年 3 月，占领军解除了禁止日本制造武器的禁令，4 月底，决定将盟国过去接收和管理的飞机制造设施等八百五十个工厂还给日本。从翌月（即“和约”生效后）起，美军才向日本订购以弹药为主的成品武器。到 1953 年，日本工厂还接受了最新式喷气战斗机的修理业务，这就给战败以来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日本军火生产技术造成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1952 年 8 月，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总司令部——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了摆脱军火生产依赖美军订货（特需）的不稳定状况，建设和发展日本自己有计划的不扩军所需要的军火工业，决定在“经团联”内部设立防务生产委员会，以便对此进行调查，加强军火资本家之间的联系和调整。

防务生产委员会早在 1953 年 2 月就发表了《关于整备防卫力的试行方案》。这就是从 1953 年到 1958 年为期六年的《防卫力整备计划》，即扩军计划。它规定六年间地面兵力增为十五个师三十万人，其装备够三十个师、六十万人的数量；海上兵力为舰艇二十九万吨，兵员七万人；空军为飞机三千七百五十架，兵员十三万人；

其年度平均预算为四千八百亿日元,预算总额为两兆九千亿日元。从当时日本的经济和财政规模来看,是一个惊人的大规模的正式的重整军备计划。全年四千八百亿日元,达1953年度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五。

这一计划的制定者并没有考虑全部经费由日本自己出,其中四成多即一兆七千亿日元(约三十五亿美元),指望美国“援助”(前引《日本的防卫与经济》)。

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和改进党)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图,利用美国的援助,制定了正式的重新武装的计划。1953年6月,政府就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进行协议。8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日,督促日本政府加强军备,并唆使日本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杜勒斯对吉田内阁的“自卫力量渐增”方针表示不满。他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增加地面部队,其代价是约定归还媾和后美军仍继续占领的奄美大岛群岛(在冲绳本岛北侧,原属鹿儿岛县的各岛;同年年底归还日本)。

政府以接受杜勒斯要求的形式,决心建立陆海空三军,而不只是地面部队。在当时召开的第十八届国会上,政府不顾社会党等的强烈反对,凭自由党和改进党两党合作,通过了以恢复对旧军人的抚恤金、养老金为目的的《恩给法修正案》。这是为重新武装制造舆论的重要措施。

接着,9月25日,自由党召开了议员总会,决议:“根据自卫力量渐增方针,谋求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增强自卫力量,逐渐健全抵抗直接侵略的自卫体制,借以促进驻军的撤退,建立巩固的安全保障态势”。这一决议还决定:“自卫力量的增强,当前应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在不致形成战斗力的限度内实施之。等到国力充实,将来修改宪法,再创建具备动员、统率、服役(国民征兵)、编制和装备等条件的自卫军”。对自由党的这一方针,改进党(当时重光葵

任总裁)也基本上是赞成的。尽管两党在争夺政权,但在推行重整军备上是密切配合,密切合作的。

在自由党议员总会之后,9月29日,该党政务调查会长池田勇人(前大藏大臣)以吉田首相的特使身份访美,谈判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和加强日本重整军备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池田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一直谈判到10月底。日美双方就日本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加强军备的原则很容易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有两点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一点是日方主张当前陆军的增加目标为十八万,并开始建设正式的海军和空军。美国则强烈要求将地面部队增为十个师(三十二万五千人)。另一个争执点是,日本不光要求军事援助,还要求纯经济援助,美国则企图只限于直接军事援助。

池田、罗伯逊会谈10月30日结束,只就原则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的最初草案中,还有日本政府负有加强军国主义思想责任的意思的下述条款。

“会谈的当事者一致认为,在日本造成一种使日本国民增强对防御的责任感的空气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责任在于通过教育和宣传,在日本造成一种能够发扬爱国心和主动自卫精神的空气。美利坚合众国对此将予以援助。”

双方可能考虑到这一条款暴露出美国过于露骨地干涉日本内政,所以在公布的联合声明中被删掉了。可是包括这一条款在内的联合声明草案被《朝日新闻》传了出来。

关于《共同安全法》协定的问题,此后日本政府与美国大使馆之间在东京继续进行了协商。另一方面,政府就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而制定的重整军备计划,与自由党和改进党以及垄断资本家进行了反复协商。

政府为了正式的重整军备,急于作好国内体制的准备。这里

不仅仅是直接与军事有关事项的准备，此外还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通过教育和宣传”在日本加强所谓“爱国心”即军国主义思想。其措施首先是统制中小学教育的内容，禁止教师进行政治活动，压制进步思想。其方法大致有三种：第一，通过自由党和改进党对“偏向教育”发动猛烈攻击；第二，由教育委员会和校长对教员的读书倾向进行调查，对有进步思想的人施加种种压迫；第三，以保障教师政治中立为名，制定等于禁止教师进行政治活动的限制法律。

在首先被列为“偏向教育”的例子中，包括教师要按照条文正确地宣讲日本国宪法。如正确地向学生宣讲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告诉学生，宪法如何保障基本人权，这就被说成是“偏向教育”。再如关于日本历史，讲授封建时代的农民怎样遭受残酷的剥削等，就说这是“把祖国的历史讲得黑暗而悲惨”的“偏向教育”。

在对教师的思想调查和镇压中，竟出现了校长调查教师家中书斋里存放的书籍、强制烧毁马克思主义文献等的例子。

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日本教职员工会大多数支持社会党，一部分支持共产党，从这一立场出发，积极开展选举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对此，政府和执政党彻底加以禁止和镇压，以便使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候选人多当选一些。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来削弱并尽可能消除其对政治的关心。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这是过去从专制天皇制镇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以来，最重视的教育和思想政策之一。

建立旨在加强正式重整军备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就是通过修改警察法来复活中央集权警察制度，加强特别暴力部队（警察机动队）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的革命行动和加强政治思想警察（所谓公安警察）。

过去那种专制天皇制的完全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经过战败以后的改革，被分成国家地方警察和自治体<sup>①</sup>警察两套人马。自治体警察由市町村公安委员会建立和管理，最终则置于自治体议会及其首长的监督之下。这种制度在《旧金山和约》成立后被修改成自治体可以废除它所设的警察，并将其编入国家地方警察。这样一来，苦于维持警察费用的地方自治体都争先恐后地把警察移交给了国家。因为掌握自治体权力的人也处于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势力之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然而政府和统治阶级政党认为这样作还不够，于是强行废止了自治体警察，重建起比战前更强大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与此同时加强了所谓“公安和警备警察”即专门镇压革命运动和一切社会运动的部门及其实力部队的机动队（可称作警察军的部队）。

在从1953年底到1954年春召开的第十九届国会上，为了划时期地重整军备，提出了防卫厅设置法案和自卫队法案、有关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的四项目美协定案、以“教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为名的两个法案（所谓“教育二法”）以及警察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并不是同时提出来的）。

四项议案实际上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对哪一个法案，以社会党为主的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内进行了顽强的反对斗争；教职员工会带头，工会、学生团体、文化团体在议会外展开了激烈的反对斗争。然而自由和改进两党在议会内占绝对多数，因此有关自卫队法案、有关《共同安全法》的四个协定、“教育二法案”，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国会。最后只剩下了警察法修正案。

这届国会会期延长两次，直到6月3日才结束。在这一天之前，警察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但参议院还没通过。于是政府和自由、改进两党企图第三次延长会期。社会党以及其它党派对此进

<sup>①</sup> 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译者

行了猛烈反对，在6月3日召开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延长会期提案时，议员企图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会场入口，阻止开会。于是议长（自由党）就把二百名警察叫进国会，用武力排除了在会场入口阻挡的议员，议长进入会场马上就宣布延长会期提案通过。统治阶级把警察叫进国会，凭警察暴力随心所欲地操纵议会的审议，这还是第一次。当然这种干法是从正面蹂躏了议会民主主义，甚至可以叫作小型法西斯政变。他们竟用这种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的方法为划时期地、飞跃地、重整日本军备、复活军国主义，制定了各种法律。

在日本国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极端法西斯的足以刻画出日本政治本质的事件。这就是法务总裁（大臣）对检察官行使指挥权：禁止对执政的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受贿嫌疑加以逮捕。这一受贿案件本身就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有关。即历届政府（从自由党的吉田内阁1948年11月以来一直是这样干的）为了迅速发展日本海运造船业（与在朝鲜战争中必须加强军需运输力量有密切关系），每年向造船业界提供巨额补贴。大造船公司为了得到这种补贴，就给自由党的议员很多贿赂。众目昭彰，其中最大的受贿人就是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而且根据被捕受审的行贿人的供述，也证明佐藤干事长有受贿嫌疑。因此检察官打算逮捕佐藤，但吉田首相叫法务总裁犬养健行使总裁对最高检察长所拥有的指挥权，禁止逮捕佐藤。因此，造船贪污案件的真相终于在暗中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说明，所谓在法律面前国民一律平等该是多么无耻的谎言，所谓司法权的独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政府对造船贪污案件的处理方式使人民懂得：要使司法权从行政权独立出来对刑事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必须以能够对嫌疑分子进行公正的逮捕为前提。而对政府和统治阶级不利时就不准逮捕，可见司法权独



立也是有名无实的，审判只不过是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

立法机关里竟拉来警察，行政权事实上对司法独立横加侵犯，即行政机关行使法西斯权力，这本身就清楚地表现出军国主义的两个侧面，即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军国主义之中的后者。当然无需反复说明，用这种方法制定的上述各种法律的内容是促进军国主义的。

那末，这样正式开始的重新武装日本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呢？它将怎样加强呢？这个问题我想在另一章再谈。

1954年7月1日实施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据此，保安厅改为防卫厅，保安队与警备队变为陆上和海上自卫队，又新建立了航空自卫队。

新军备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在法制上只规定了警察的任务，对其是军队这点，还在进行掩饰，但防卫厅和自卫队则明确规定它是抵御外来敌人、镇压国内革命运动的军队。即规定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国的和平与独立，保障国家的安全，抵抗直接侵略和间接侵略，保卫我们的国家。另外，根据需要负责维持公共秩序”。这里所说的“直接侵略”指的是外国对日本的侵略；所谓“间接侵略”是指国内的革命斗争；还有所谓“维持公共秩序”当然是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所谓“间接侵略”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外国都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给它出兵镇压资本主义各国国内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找借口，制造谎言说这些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煽动、唆使和支持进行的，即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间接侵略。这种“间接侵略”的概念，是经1951年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引进日本的。在第一

次《日美安全条约》的前言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国际条约集》1950年到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93页）。而且条约本文第一条规定，“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同上，第394页）可以使用驻日美军。自卫队也还有镇压这种所谓“间接侵略”即国内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任务。

第二，建立了过去没有的空军（航空自卫队）。于是陆上、海上、航空各自卫队即海陆空三军全有了。各军都设有各自的指挥机关——“幕僚监部”<sup>①</sup>，另外还设有统管它们的联合幕僚会议<sup>②</sup>，即总参谋部。还建立了联合幕僚学校（培养参谋军官的机关）、陆海空各军干部学校、防卫大学以及其他培养军官和下级军官的机构。

管理和主持陆海空三军的机关是防卫厅。它是直属总理府的外厅，但事实上是国防省（国防部），其长官由国务大臣（部长级）充任。长官在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以及教育和训练部队方面接受联合幕僚会议以及各军幕僚监部的辅佐。另外设有不超过十人的参事官（必须是文官），协助长官制定有关防卫厅管辖事务的基本方针。

关于军需物资的采购与管理、军事设施的建设业务，由防卫设施本部来进行。这一机构也在防卫厅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防卫厅和自卫队的组织如图1。

在防卫厅之外，1956年7月设置了以总理大臣为主席，以副总理的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以及经济企划厅长官为成员的“国防会议”。这一机构是根据1954年防卫厅设

① 幕僚监部：即参谋部。——译者

② 联合幕僚会议：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译者



置法设置的。关于其成员要不要“民间人士”(这里所说的“民间人士”事实上是指旧陆海军将领)参加,政府与自由党和改进党之间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民间人士”不参加。1956年7月,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国防会议组成等法律》。

国防会议是审议《国防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可否出动防卫部队”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的机关。

如上所述,新军备与保安队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飞跃加强和充实,它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第一流的军队和军事机构。

第三,新军备与旧日本陆海军相比,有两个最重要的不同点:一点是在制度上贯彻了关于军事的非现役军人统制(civilian control);另一点是志愿兵役制。

旧日本军,军队的统帅大权属于天皇,作为统帅机关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属天皇,对政府和议会是完全独立的。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是内阁的一部分,陆海军大臣同其他各省(相当于部)大臣一样也在总理大臣的统辖之下。陆海军大臣分别根据陆海军部内意见从现役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军中任免之。首相不能随意任免。而且陆海军大臣还掌管有关实施军令的业务。其范围不受总理大臣的指挥和监督,直接接受天皇的命令,并向天皇报告。此外还有几个法令。总之,陆海军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政府不能指挥军,军则能牵制政府。政府对决定国防的最高方针不能加以任何干与,而且对天皇和军部决定的国防最高方针,政府必须服从。

新军备体制与此相反,在制度上内阁总理大臣是军的最高指挥者,在总理大臣的最高指挥之下,防卫厅长官统帅三军。这样,防卫厅长官关于纯军事方面,接受由现役军人陆海空各军幕僚长和三军幕僚长组成的联合幕僚会议的辅佐,而部队的指挥则通过

各幕僚长来进行。

总理大臣和防卫厅长官都必须是文职人员(civilian)。国防会议也只能由文官大臣组成。而且辅佐长官策划和制定有关防卫厅所管事务的基本方针的参事官也必须是文官。

这样,新军备在法制上是受文官的总理大臣、防卫厅长官和参事官的统辖的。而且总理大臣是根据国会提名从国会议员中选任。说到底,是国会统辖军。这种彻底的文官统制,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统帅军,防止象过去日本那样军拖着政府走、军部为所欲为地推行军国主义。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应该说垄断资产阶级对军队拥有支配权。

在建立这种文官统制制度方面,估计美国政府可能施加了压力。例如强烈主张国防会议成员要加上旧军人的是处于在野党时的改进党和自由党的鸠山派。1954年底,鸠山与改进党合并组成日本民主党,终于取得政权,这时政府和执政党,一反他们处于在野党时期的主张,制定了阻止旧军人参加国防会议的道路的现行法令。只能认为他们态度的改变,与其说是由于日本国内在野党的动向,莫如说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

第四,自卫队与旧军队相比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自卫队也同保安队和警察预备队一样,是志愿兵役制。但是,自卫队内有预备自卫官制度。自卫队的士兵(陆、海、空军的士兵)、下级军官(陆、海、空军的上士、中士、下士)以及军官(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所定服役年限届满后,根据个人志愿,并经政府考试,可当预备自卫官。预备自卫官任期三年;但根据自愿可续任三年。拥有预备役制度也表明自卫队是正式的军备。但是到现在为止,志愿当预备自卫官者,与政府的要求相反,是极少的。

第五,自卫队是借助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建立起来的,

这对分析自卫队性质是最重要的。

在给日本的《共同安全法》援助中，有无偿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P）和有偿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 Sale, MAS）两种。

无偿援助中包括由美军供给和借给其现有的武器和舰艇等。日本的情况是供给的占大部分。借给的只有根据舰艇租借协定租借的旧式驱逐舰（自卫队称护卫舰）和沿岸警戒艇。另外，在无偿供给中，有一种称作“域外采购的方式”。即美军向日本军火工业界订货，让它们制造武器，然后买过来无偿供给日本。用这种形式，日本可以无偿地加强军队装备，而且还有助于加强和发展国内军火工业，同时还可以赚得美元，真是一举三得。日本政府希望尽可能多给“域外采购”援助，但只有两艘驱逐舰的建造和车辆的新旧更换这两件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有偿援助有三种方式：第一，美军把现在使用的武器卖给日本。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买到靠通常的商业交易买不到的武器。第二，美国手头没有武器，政府另向美国军火制造商订货，将其产品卖给日本。第三种方法是，日本引进美军新型武器的生产技术，在国内生产，作为日军的武器。采用这种方法时，使用技术的专利费和部件的价款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一部分，由美国政府负担。这种方法对发展日本军火生产技术非常有利。现在自卫队的空军超音速练习机 T 33 和喷气式战斗机 F 86 F 等，就是以这种方法在日本生产的。

《共同安全法》援助是从美国 1954 会计年度（1954 年 7 月—1955 年 6 月）开始的。其中无偿援助一直给到美国 1964 会计年度（1964 年 7 月—1965 年 6 月）。在这期间的无偿援助总额达五千六百亿日元；有偿援助四百亿日元，不到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十。

从 1951 年度到 1957 年度，美军无偿供给和借给的武器弹药

合计折价（但它是以半新的当新的计价）三千四百五十五亿多日元。尤其是《共同安全法》协定刚成立后的1954年和1955年，都近一千亿日元，超过了这两个年度的防卫厅预算（1954年度七百四十三亿日元，1955年度八百六十八亿日元）。从1958年度起施行第一次防卫力整備计划，有计划地扩大武器国产化。在此以前，即自卫队的创建期，其装备可以说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

美国声称为了把这些援助武器交给日方，教给使用方法和和管理这些租借的武器等等，即为了实施《共同安全法》协定，在东京设立了对日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J）。保安队的美军顾问没有法律根据，而对日军事援助顾问团才算有了法律根据。这个顾问团当初以美军的将领为首，有军官二百一十二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二百五十三人。与保安队时期一样，美军顾问团掌握有关自卫队的编制和训练的实权。此后，一方面随着自卫队和日本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共同安全法》无偿援助被取消了，加上本来就很少的有偿援助变得可有可无，美军顾问团人数减少了，到1957年剩有军官陆军二十五人，海军十人，空军十二人，合计四十七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仅十六人；1968年进一步减少，剩有军官十八人，下级军官和士兵八人。这时顾问团已经不再领导自卫队，变成有偿援助（这也不是成品销售，而主要是利用日美两国分担的经费进行专利生产）的事务机关。

《共同安全法》援助，如上所述，在自卫队的创建期与初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之后十年多几乎完全失掉它的意义。然而从警察预备队以来，日本重整军备的基础，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和指导与事实上的指挥来进行的，其部队的编制、训练是效法美军的，其装备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这就使自卫队在军事技术方面（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不消说）也完全从属于美军了。

这种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完全对美从属，不只是日本军，南朝鲜

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军队也是一样的。美军内心是想在必要时组织起美、日、韩、蒋联合军，因而对这些部队进行了统一的编制、训练和装备。

对日《共同安全法》援助是为了使日本的军备从属于美国。1963年4月，美国参议员丘奇在参议院提出停止对日无偿援助的建议的讲话中露骨地谈到了这一点。据此，美国国防部说明援助意义如下：“美国通过给日本援助资金让它采购某种武器，这样便对日本保持的军队有了影响力；在西太平洋的防御（指侵略战争）方面，就能使日本适应美国的综合战略。”

关于自卫队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严重地从属于美国的问题，将在后面叙述。

## 第二章 有计划的扩军与日美军事同盟

### 第一节 “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与日美关系

1954年是日本垄断资本结束复兴阶段、开始新的高速增长的一年。重化学工业率先积极进行了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与这一新经济阶段相适应，这年成立了防卫厅和自卫队。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军备也得到迅速扩大。

这年年底，自由党的吉田内阁垮台，由改进党与鸠山自由党合并的日本民主党的总裁鸠山一郎组成内阁。吉田内阁自1948年11月组成以来，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把持政权直到1954年底。执政党的自由党严重腐败，因造船贪污案件被揭发，受到致命打击。垄断资产阶级担心继续让吉田和自由党执政会加剧人民大众对整个统治阶级的不满，从而使阶级斗争激化起来。于是便迫令吉田内阁总辞职，换成鸠山内阁。在现代日本政治史上，垄断



资本家公然积极干与政局，这还是第一次。

鸠山内阁及其执政党对重整军备最积极。在取得政权以前，他们曾主张修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但在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发现鼓吹改宪论就不可能在选举中取胜，便把这一主张隐蔽起来。他们又说起什么即使不修改宪法也可以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为了使建立自卫队合法化，前内阁在当时就宣扬过此类论调。

鸠山内阁组成后的第二个月，1955年1月解散了众议院，2月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民主党获一百八十五席，变为第一大党；自由党获一百一十二席。当时社会党分裂成左右两派，左派获八十九席，右派获六十七席，合计为一百五十六席。此外劳农党获四席，共产党获两席，从右派社会党到共产党加在一起为一百六十二席，即超过众议院议员定额（四百六十六席）的三分之一，这些党都反对修改宪法。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要修改宪法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取得议员定额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的同意。现在反对修改宪法派超过众议院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一，因此目前不可能合法地修改宪法。

然而，鸠山内阁和民主党对修改宪法并未死心。自由党也热中于修改宪法。为了制定宪法修改草案，两党都分别在党内设立了宪法调查会，其制定的宪法修改草案都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实行征兵制，规定国民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在“自卫”的名义下，可以无限制地扩军，也可以对外进行战争。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党的宪法修改草案，另外还有不同的地方，但上述三点是共通的。

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党以及比它更左的政党在议会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势力感到威胁，为了加强资产阶级政党，强烈要求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党合并和统一。结果，1955年11月，两党合并组成一个“自由民主党”。在这个党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政策中规定有这样的条项：“自主地修改宪法，修改和废除不符合国情的占领

法规。”

因组成自民党，改组了内阁，于是组成了第三届鸠山内阁。新内阁的“三大目标”的第一项就是修改宪法。第二年即1956年，在第二十四届通常国会上，政府和自民党操纵会议使其通过了在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的法案，并于6月公布了该项法案。但社会党（在此以前于1955年10月左右两派合并）及其它党派拒绝向调查会派出委员，所以调查会没有马上成立。

鸠山内阁为了获得修改宪法所需国会两院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企图修改选举法，将现行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制，采用新选举区比例。修改选举法严重影响到现职议员的直接利益，因此即使在自民党内也强烈反对对鸠山派特别有利的修改草案，再加上议会外人民群众的反对运动也高涨起来，结果选举法的修改没能实现。

鸠山内阁之所以这样一味地竭力追求通过修改宪法和实行征兵制时期地增强军备，是因为它代表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希望提高对美帝国主义的地位和拥有足够将来独立所需要的军事力量的愿望。从同样的愿望出发，鸠山内阁还极力恢复日苏邦交，借此实现日本参加联合国。鸠山不顾美国政府和部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1956年10月，实现了日苏复交；从而在同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以前因苏联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受到阻挠）。

鸠山乘机从政界引退了。之后石桥湛山当了自民党总裁，组成内阁。石桥在任三个月，因有病于1957年2月实行内阁总辞职，岸信介接任自民党总裁，当上了首相。

战争期间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的政府，露骨地推行了军国主义政策。

岸信介刚一上任马上就在国会明目张胆地叫嚷什么如果为了

自卫而袭击敌人进攻日本的基地也不违反宪法；为了自卫拥有非进攻性的核武器，宪法是允许的等，借“自卫”之名，为疯狂扩军而奔命。

岸内阁第一次召开了国防会议，1957年5月20日决定了《国防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到今天即1976年，从来没有修改过。该方针规定，国防的目的在于保卫日本的独立与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基本方针”规定下述四项内容：第一，支持联合国的活动；第二，安定民生和发扬爱国精神；第三，“根据国力和国情，在必要的自卫限度内，逐步发展防卫力量”；第四，“对来自外部的侵略，则根据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对抗之。”

第三项的“在必要的自卫限度内”，对以岸内阁为首的日本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第四项是依赖美帝国主义。然而当时的《日美安全条约》规定：驻日美军得用来帮助“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国际条约集 1950—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94页），这是一种美国对日本的防御不负任何义务的东西。起草该条约的美国国务院顾问（主管对日媾和问题）杜勒斯在1951年2月26日提给美国议会的报告书中说，他在同月月初与吉田首相会谈时，“强调在目前，美国不承担日本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对此，吉田表示谅解（《朝日年鉴》1952年版）。

既然《日美安全条约》是这样一种条约，那末为什么岸首相等人可以把根据“安全条约体制”作为日本防御外来侵略的“基本方针”呢？

他们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是期望迅速扩大和加强日本自身的军备，从而把日本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体制，尤其是侵略亚洲的体制之中，把“安全条约”改成形式上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

他们这样期待是有根据的。即 1955 年 8 月，在鸠山内阁时期，外相重光葵去华盛顿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议将《日美安全条约》改成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对此，杜勒斯原则上表示同意。然而却附有以下重要条件：“日本能够尽快地承担起防御本国国土的第一阶段的防务，并且能够对维护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各项条件具备了并能够实行时，将随时站在合作的基础上作出努力”。就是说这些条件一旦具备，美国将满足日本的希望，同意修改“安全条约”。重光约定将满足这些条件。

这种约定是说日本要协助美国侵略西太平洋（东亚），创建能够向海外派兵的军备和政治条件。在报道重光和杜勒斯会谈的联合公报时，不仅日本的反军国主义势力，而且美国的多数评论家都一致理解为这是日本约定向海外派兵的。因为暴露出真实意图，日本政府便慌了神，出来支吾其词地掩盖，说联合公报中的“并且”是英文原文“and”的误译，真正的意思是“其结果”或者“于是”。

鸠山内阁以这个联合声明的目标为努力方向，积极扩张军备和培植军国主义思想。而接替鸠山内阁的岸内阁，对此更是倍加努力。如果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国防基本方针》的第四项，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不是消极地要求美国来防卫日本，而是与美国称霸东亚体制相勾结来确立日本“国防”的地位的。这一点，通过后来岸内阁的所作所为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决定国防方针的那一天，岸首相出国旅行，历访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等各国政府以及台湾蒋介石一伙。日本在职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不论战前还是战后，这是第一次。这次旅行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想就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发”东南亚的设想征得各国政府的同意。但各国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设想是以美国为主人，日本充当其当地的老板，剥削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从而拒绝了岸的提议。“大

东亚战争”的战犯岸信介不了解：现在已经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通行无阻的时代。旅行的第二个目的是视察东南亚的实际情况，探索日本在这一地区协助美国的道路，并将它带到美国作为访美的礼物。为此目的，岸信介同其旅行的最后访问对象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对蒋说：“日本保守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对蒋介石“恢复大陆自由表示赞同”的日本人，“在对付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渗透很坚强，但对付来自中共的渗透却软弱无力。这一点自己感到很可怕。因此，如果解放大陆有了进展，对日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井上清著《从历史上来看岸内阁的性质》，载《中央公论》1957年12月号，参考本书第184页）

岸信介的这些话不仅是对蒋介石的恭维和鼓励，不仅是对美国说的，也是他的真心实意的大暴露。

6月4日从东南亚回国的岸信介，14日决定了很早以前就在国防会议上研究过的1958到1960年的扩军计划（内容后述），16日便带上这个计划飞往美国。日本的在职首相去华盛顿朝拜，同去东南亚旅行一样也是从岸首相开始的。岸信介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进行了会谈，他说日本正在努力增强军备，在东南亚政策方面愿意积极地协助美国；他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和小笠原岛的行政权，希望美国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然而美国一项也没有接受。这次会谈大概与1955年重光和杜勒斯会谈的结果相同，但在公布的联合声明中，没有象过去那样流露出真心话的词句。联合声明只说日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利益一致、互相信赖和基础牢固的新时代”。

岸信介所取得的具体成果是，美国欢迎日本扩军，信赖日本的军备，因而约定在明年度（1958年度）内撤走美驻日地面部队。这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战略改为所谓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把重点放到飞速增强核导弹，借此对敌国中枢地区一举给

(表1) 日本政府从1950到1975年的军费支出

年 度	防卫本厅费 (亿日元)①	防卫支出费 等(亿日元)②	合计 (亿日元)	占国民收入 的比例(%)	备 考
1950	200	1,112	1,312	3.88	此外还有“安全保障” 费 560 亿日元(1955 年度以前用完)
51	310	956	1,266	2.94	
52	591	1,234	1,825	3.50	
53	611	643	1,254	2.14	
54	742	607	1,350	2.08	
55	866	482	1,348	1.88	
56	999	429	1,428	1.79	
57	1,006	428	1,435	1.57	
58	1,197	287	1,484	1.57	
59	1,352	204	1,556	1.45	
60	1,509	90	1,600	1.23	
61	1,738	96	1,835	1.19	从这年起停交防卫分 担费(交付美军的费 用)。为美军修建设 施也包括在防卫设 施厅费内。
62	2,025	112	2,137	1.24	
63	2,232	142	2,475	1.24	
64	2,654	153	2,807	1.24	第二次防卫力整備 计划
65	2,869	184	3,053	1.22	
66	3,239	211	3,450	1.20	第三次防卫力整備计 划。《共同安全法》的 无偿援助停止(从1955 到1963美国会计年度 对日无偿援助总额为 5,600亿日元)。
67	3,575	233	3,809	1.17	
68	3,967	169	4,236	0.8	
69	4,537	326	4,863	0.8	
70	—	—	5,695	—	第四次防卫力整備计 划(到1976年为上)
71	6,512	461	6,973	0.9	
72	7,495	775	8,270	0.9	
73	8,978	879	9,857	0.9	
74	9,854	1,166	11,020	0.8	
75	—	—	13,273	—	

资料来源:1950到1967年数字根据朝日新闻社编:《日本的防卫与经济》;1968到1975年数字根据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国势图会》1970和1975年版以及《朝日年鉴》1971和1976年版。

① 防卫本厅费,包括警察预备队费和保安厅费;② 防卫支出金,包括驻日美军设施费、交付美军顾问团的费用、自卫队设施费和国防会议费。

(表2) 1950—1971年重整军备进度表

	警察预备队 1950— 51年度	保安队 1952 年度	自卫队 1954 年度	第一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58 年度	第二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62年度	第三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67年度	第三次扩军计划的 最后一年 1971年度
自卫队队员	75,000人	110,000人	130,000人	170,000人	171,500人	173,000人	179,000人
自卫队预备队员				11,000人	19,000人	30,000人	36,000人
基干部队	4管区队	1方面队 4管区队	2方面队 6管区队	2方面队 6管区队 3混成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舰艇		26,900吨	58,300吨	82,500吨	109,900吨	118,300吨	135,000吨
护卫舰		13,100吨	29,400吨	50,600吨	69,300吨	68,600吨	74,000吨
潜水艇		—	—	1,500吨	4,100吨	7,400吨	14,000吨
其他		13,800吨	28,900吨	30,400吨	36,500吨	42,300吨	47,000吨
飞机		—	57架	200架	248架	235架	270架
飞行部队			1队	9队	18队	22队	21队
全天候战斗机队			—	2队	5队	11队	10队
昼间战斗机队			—	5队	10队	8队	8队
侦察机队			—	—	1队	1队	1队
运输机队			1队	2队	2队	2队	2队
飞机			147架	969架	1,157架	1,097架	970架
航空警戒部队			—	10队	24队	24队	24队

以大规模打击上面，因而不重视日本基地上的地面部队。况且地面部队不断同日本人民发生摩擦和对立，加剧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在政治上给美国带来很大的不利，而且其战略价值已经减少。因此将其撤回，让日本自卫队去接替它。这是撤走美驻日地面部队的真正意图。

还有，在此以前，在鸠山内阁时期，经重光和杜勒斯会谈，日美已商定从1956年度起，随着日本军事预算的增加，日本付给美军的防卫分担费，将减少相当于军事预算增加部分的半数，这样一来，日本的军事预算愈增加则交付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就愈少，最后直至完全废除。这件事再加上这次约定撤退美军地面部队的保证，尽管很有限，但可以看成这是日本军备在摆脱对美依赖，并向自主的军备发展。

岸首相亲自带到美国去的1958到1960年度的三年扩军计划，正式叫做“防卫力整備计划”，这是第一次扩军计划。从完成这一计划两年后的1962年度起到1966年度止的五年计划是第二次扩军计划；从1967年度到1971年度是第三次扩军计划；从1972年度到1976年度是第四次扩军计划，即所谓“第四次防卫力整備计划”。这种计划一般简称为“一次防”、“二次防”；“三次防”、“四次防”。从1977年度开始的计划方案，正在由现政府拟订中。

“一次防”声称：“建立与国力和国情相适应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三年间计划陆上自卫队达到十八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约达十二万四千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一千三百架。其经费总额为四千五百三十亿日元左右，它将根据各年度的财政情况来分配，并按照各年度计划来订购装备，招募和训练必要人员。

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借此向美国证明日本是履行《共同安全法》中所保证的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的义务的，并正在为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成双边军事同盟创造条件；另一个目的是保证军火



工业资本家能够安心地进行军需品生产，以使军火工业得到有计划的发展。这一目的在“一次防”的书面计划中是这样写的：“结合防卫力的整备，应对军事工业的整备采取必要措施”。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和军火工业资本家团体——日本兵器工业会早就强烈要求政府进行这种有计划的扩军。

战前，日本陆海军部要求扩军时，政府根据财政情况，接受或不接受军部的要求。如果政府不接受军部的要求，军部就叫陆海军大臣辞职，借此打倒内阁，这种事例也曾有过。内阁对决定军备的发言权是极小的；更何况资本家，他们对决定军备计划没有任何发言权。战后至今不是军方自己提出扩军要求，而是一直保持垄断资本组织提出扩军要求，政党和政府响应，制定扩军方针，由军方拟订具体计划草案，经国防会议（即没有一个军人参加的政府内的军事委员会）认可，并征得议会同意的形式。这就是说，是垄断资本控制军备计划。

“一次防”大体上按计划实行了。因此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抱有好感。1958年9月，第二届岸内阁的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向杜勒斯国务卿提出举行修改“安全条约”谈判的建议时，出乎藤山和日本政府的预料，杜勒斯很快就答应了，他说：“现在日本与订立现行安全条约时不同，自卫力量增强了，从这点来看，安全条约可以重新研究。”

结果从1958年10月初，日美在东京开始举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这时岸首相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极端的军国主义本性。例如1958年5月4日在长崎市举行的世界邮票展览会的会场上，法西斯青年把悬挂在许多国家的国旗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拉下来撕碎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容许如此侮辱中国的行动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对此岸首相若无其事地说，日本没有承认“中共”，因

此那个所谓的国旗在日本政府来看,只不过是一块布,弄坏一块布这点事,在刑法上顶多算是犯了损坏器物罪,不能构成对外国国旗的侮辱。民间人士呕心沥血发展起来的日中民间贸易和友好往来的狭小渠道,就这样由岸首相给破坏了。

这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惩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向金门、马祖的美蒋军基地打炮。岸信介热情支持蒋介石,10月15日,他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记者说:“为防止台湾和韩国被共产主义者征服,日本应该尽可能地作好一切准备。台湾海峡的形势不是中国的内乱,那是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国际战。日本已经到了应该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便能够向海外派兵的时期。”岸信介的发言被播放到美国全国。

岸内阁任命的“日韩会谈”(日本和南朝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代表举行会谈一事,将在第三章详述)日方首席代表泽田廉三(外交界元老),1958年6月在原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府有关人员的集会上讲话说:

“日清和日俄两次战争都是为了把威胁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势力推回到鸭绿江那边而进行的战争。如果我们不能第三次奋起将三十八度线推回到鸭绿江那边,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就对不起前辈。这是日本外交的使命。三十八度线是韩国的命运线,同时也是日本的命运线。”

岸内阁如此疯狂地反对人民中国和人民朝鲜,在美国的指使下对中国和朝鲜竟然采取不惜进行反革命侵略战争的态度,为此企图有计划地增强军备,有计划地扶植军火工业,以及修改日本国宪法,所有这些都博得了美国政府的欢迎,因此为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成形式上的日美双边军事同盟而举行的日美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而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也是史无前例地高涨起来。可是结果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竟不顾人民的反

对，于1960年6月20日使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自然通过了议会。

根据新“安全条约体制”，日本变成美国侵略亚洲体制的积极而重要的力量。质和量都已超过战前的、高度发展起来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正如前引岸信介的发言所看到的，已经燃烧起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欲火。而实现他们的这种欲望的武器，就是从日本方面估计的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从美国方面来看，这是把复活的日本垄断资本捆在美国战略体制上而加以利用的体制。然而这个体制并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是日方要求的，是日美双方统治阶级在政治和军事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第二节 第二次和第三次扩军计划与垄断资本

岸内阁在新《日美安全条约》通过后引退，1960年7月，大藏省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当了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池田内阁全力以赴地推行众所周知的高速经济增长政策，即牺牲工人、中小资本家以及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垄断资本的超高速增长，并以高速增长为经济基础，以新安全保障体制即对美从属的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要支柱，全力以赴地复活和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为此，在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这方面的情况就不详述了。这里仅着重提一提池田一再散布的日本大国论。他夸耀日本经济的惊人发展和有高度教育水平的上亿的国民，挺起胸膛地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大国。他一有机会就向国民灌输：大国日本义不容辞地要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中立主义”只不过是“小国的保身术”，对大国日本来说，中立主义是幻想；日本应该自始至终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尽其国际责

任,成为“中共”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敬畏”的国家。

池田的日本大国论是掩盖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美从属的蛊惑宣传。从经济和资产阶级教育水平来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除外,在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近西德和英国,成为与法国和意大利并驾齐驱的“先进大国”。因此池田的大国论对煽动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对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加强军国主义,具有极大的持续效果。

池田内阁组成两个月后,1960年9月,日本政府向美国提议在东京召开第一次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该会是根据缔结新“安全条约”时岸首相和美国国务卿赫脱的来往信件,为实施新“安全条约”随时进行协商而设立的,日美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就可召开。日方由外相主持,防卫厅长官参加,美方代表由美驻日大使及其最高军事顾问美国太平洋部队总司令组成。据各报报道,在第一次协商委员会上,日方说明了自卫队的现有势力以及1961年度的军备计划,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就国际形势现状,对整个军事、政治和经济,相当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然而日美任何一方都一点也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这种协商会,尽管日美形式上是对等的,实质上是日本接受美国要求的场所。这样看恐怕是不会错的。

1961年7月,以池田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决定并公布了1962到1966年度的长达五年的“第二次防卫力整備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军备的目标是:“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能够有效地对付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

在“一次防”里所规定的军备目标为:“建立适应国力和国情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在“二次防”里,如上所述,进一步具体化了。“二次防”的目标,从字面上来看,变成防御来自外国的侵略。可是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不是防御而是侵略性的,上述所谓的“防

御”实际上是美军发动侵略朝鲜战争，而自卫队同它联合作战，主要担负日本本土的防御。这一点由后来揭露出来的《昭和三十八(1963)年度共同防御作战图上研究》，又名《三矢作战计划研究》得到证明。这个问题容在下面稍微详细地加以叙述。

“二次防”规定到1966年度末所达之兵力为：(一)陆军十三个师，十八万人，预备自卫官三万人。在这些兵员当中，将建立奈基和隼式地对空导弹大队各两个；一个地对地导弹实验部队。坦克、机枪和步枪由美军提供或使用国产品，都换成最新式的装备；直升飞机增加一百零二架，以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二)海军，在计划年度内新造舰艇四万七千三百六十吨，取代陈旧舰艇两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吨，总吨数将增为十四万吨以上。新造舰种包括三千吨级的护卫舰(驱逐舰)四艘、两千吨级护卫舰七艘、三千五百吨级练习舰一艘，此外为了加强海上警戒能力，新造一千五百吨级的潜艇五艘、布雷舰一艘以及其它舰艇。新造大型反潜侦察机(P<sub>2</sub>V)七架，反潜直升飞机五十四架，到1966年度末，拥有海上飞机二百三十五架。并将大凑(津轻海峡)、舞鹤(京都府日本海方面)、小松岛(德岛县，鸣门海峡)、大村(佐贺县，面临对马海峡)等地区建成反潜直升飞机基地。(三)空军拥有的飞机数量将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六架，计划培养的驾驶员数为飞机数的一点八倍。建立用喷气战斗机(机种名称从略)装备的全天候截击部队十一个队，其中有二百五十架飞机装备有空对空导弹。建立昼间截击部队八个队和侦察机部队一个队，用大型飞机装备的运输部队和电子侦察部队各两个飞行队。还计划建立半自动化防空警戒管制组织。此外为在1967年度编成鲍马克远程导弹防空部队，计划让必要人员在计划期内赴美留学。

“二次防”的预算总额约为一兆四千亿日元。每一年度的平均额为两千八百亿日元，接近“一次防”平均每一年度一千五百亿日

元的两倍。

“二次防”的奋斗目标是重新编成地面部队，这项工作在“二次防”的前一年 1961 年就已经开始。过去的六个管区队和三个混成团，从 1962 年度起统一编成五个方面队十三个师。新师编制的优点是，各师兵员人数减少，车辆增加，机动能力为过去的四倍，火力配备为过去的两倍。这是效仿美国准备打原子战争的师团编制，平时尽可能分散配置，必要时能够迅速集中。十三个师分成北部（四个师、北海道）、东北（两个师、奥羽地区）、东部（两个师、关东和中部地区）、中部（两个师、近畿和中国地区）、西部（三个师、九州地区）等五个方面队进行配置。最重视北海道方面，这表明这种军备首先是假想对苏作战的，而东北方面军则是北部方面军的支援部队。其次，九州方面所重视的是监视朝鲜，由中部方面军为其援军。东部方面军主要承担东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警备，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据说 1960 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时，岸首相曾强烈希望出动驻东京的师团，后因防卫厅长官谏阻，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那时驻东京的师团已经完全作好出动的准备。

海军的重点开始把过去的沿岸警备队转向海上护航和反潜作战。

空军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装备最新式战斗机和导弹来提高截击能力。它开始拥有大型运输机部队，这同海军用大型最新式驱逐舰编成护航舰队一样，表明它不单是为在国内作战时运送地面兵力，已经着手准备向朝鲜出兵。

“二次防”的另一个特点是，陆海空三军都正式开始装备导弹。这些导弹中有的可以安装核弹头。尽管政府强调绝对不可能安装核弹头，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人们，不论谁都认为在技术上这是可能的，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让日本拥有核弹头，日本无疑是会接

受的。

“二次防”还特别注意扶植日本军火工业。从这一时期起，防卫厅决定对军需品采取长期一揽子订货方式。这样一来，接受订货的公司就可以有计划地稳定地进行生产，也就可以制定更新和扩大生产设备的计划。政府想在整个“二次防”时期，使百分之二十的装备实现国产化。所谓百分之二十的国产化，意思就是装备所需要的经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付给国内军火资本家，百分之八十付给美国政府和美国军火资本家。不过，尽管说是国产，而战斗机、原子武器、导弹等，也是一种有偿援助的专利生产。

1967年开始的“三次防”表现出业已明显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即依然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要支柱，因而在国际政治上和战略上是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阶段。

“三次防”扩军计划，其大纲是1966年11月在以佐藤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上决定的；1967年3月公布了主要项目和所需经费。

“三次防”的目标与“二次防”一样，旨在建立“能够最有效地应付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事态的高效率的军备”。但它又说：“根据国内外形势、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等情况，力求充实和加强陆海空自卫队的内容”，与“二次防”当时相比，在这里流露出“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的帝国主义的自信。

当时日本在经济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达到同西德并肩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阶段。据海关统计，1965年贸易收支以对美贸易和对南朝鲜、台湾以及东南亚贸易的大幅度出超为主，出现十九亿多美元的盈余。在资本收支方面，长期资本收支有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短期资本收支有六千一百万美元，合计有四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出超（即日本的外汇收支出现赤字）。贸易收支的出超刨去资本收支和贸易外收支等方面的赤字，结果国际收支的综

合项目有四亿五千万美元的盈余。自此以后，日本遂由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贸易收支连续保持大幅度的顺差。这种情况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几年（1915—1918年）有过。然而这种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是1965年起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日本充当其后勤基地的结果，估计美军的直接特需采购部分和美军花在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美元被日本通过贸易吸收的部分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因此贸易收支盈余以1972年为最高，而从直接和间接越战特需采购剧减的1973年（这年1月签订越南和平协定）起，突然急剧减少。可是贸易的规模，进口和出口都连续激增（请参照表3）。

经济大国日本当然要力争成为政治大国，其实统治阶级已经以政治大国自居了。这种自负表现在“三次防”计划中的“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之类的提法上。而政治大国的奋斗目标又必然是军事大国。“三次防”没有写明兵力和装备的具体奋斗目标。“三次防”与其说是追求兵员、舰艇、飞机的数量的增加，莫如说是旨在飞速加强整个装备的质量。计划规定的师团数目同过去一样仍为十三个，但其中一个师计划装备成机械化师，其他各师的机动能力和火力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换成新型坦克，并将增强新的地对空导弹部队；海军计划加强反潜能力；空军全面提高质量，加强运输机部队。

“三次防”的经费预算总额为两兆三千四百亿日元，为“二次防”实际支出一兆一千六百三十五亿日元的两倍多。

如上所述，“三次防”的主要目标不是增加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实现装备新型化。装备的国产化比重计划达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共同安全法》协定的无偿援助在“三次防”期间全部停止了，资本家反而把它看成是好事。尽管新型飞机和电子武器进口成品比有偿援助的专利生产或纯国产的产品，价格便宜得多，但日本资



(表3) 日本国际收支的变迁(1965—1974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式单位:百万美元)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一) 经常收支	932	1,254	△ 190	1,048	2,185	1,970	5,797	6,624	△ 136	△ 4,549
1. 贸易收支	1,901	2,275	1,160	2,529	3,752	3,963	7,787	8,971	3,688	1,628
出口	8,332	9,641	10,231	12,751	15,728	18,969	23,566	28,032	36,264	54,506
进口	6,431	7,366	9,071	10,222	11,976	15,006	15,779	19,061	32,576	52,878
2. 贸易外收支①	△ 884	△ 886	△ 1,172	△ 1,306	△ 1,382	△ 1,785	△ 1,738	△ 1,883	△ 3,510	△ 5,888
收入	1,563	1,931	2,182	2,607	3,262	4,009	4,840	6,238	8,493	11,992
支出	2,447	2,817	3,354	3,913	4,644	5,794	6,578	8,121	12,003	17,880
3. 转移收支②	△ 85	△ 135	△ 178	△ 175	△ 185	△ 208	△ 252	△ 464	△ 314	△ 289
收入	63	69	74	83	82	98	127	138	149	186
支出	148	204	252	258	267	306	379	602	463	475
(二) 资本收支	△ 476	△ 872	△ 305	△ 30	14	△ 867	1,353	△ 2,521	△ 7,343	△ 2,534
1. 长期资本	△ 415	△ 808	△ 812	△ 239	△ 165	△ 1,591	△ 1,082	△ 4,487	△ 9,750	
2. 短期资本	△ 61	△ 64	△ 506	△ 209	179	724	2,435	1,966	2,407	1,419
(三) 错误和遗漏	△ 51	△ 45	△ 75	84	84	271	527	638	△ 2,595	244
(四) 综合收支[(一)+(二)+(三)]	405	337	△ 571	1,102	2,283	1,374	7,677	4,741	△ 10,074	△ 6,839
金融结算	405	337	△ 571	1,102	2,283	1,374	7,677	4,741	△ 10,074	△ 6,839
外汇储备增减额	108	△ 33	△ 69	886	605	903	10,836	3,130	△ 6,119	1,272
其他	297	370	△ 502	216	1,678	593	△ 3,031	1,611	△ 3,955	△ 8,111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图会》1970年版和1975年版。

① 贸易外收支,又称无形贸易收支,其中包括运输、保险、旅行、和投资利润等方面的收支。△:表示支出超过收入。——译者  
② 转移收支:包括私人“赠与”、来自海外移民的汇款、政府援助等有去无回的单方支出的收支。——译者

本家不光考虑自己攫取直接利润，而且还考虑到军火工业能促进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发展最新技术的利益，因而他们提出大义名分来说，军火生产的独立对加强国防非常重要，便强烈要求武器要国产化，并基本上实现了。

然而美国政府和军火资本家推销军火成品的运动也很猛烈，美国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如在出售战斗机方面，洛克希德公司和格拉曼公司之间的对立）也很激烈。因此，是国产还是进口？如果进口，那末选择美国哪家公司的哪种产品？在这方面国内外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政府和执政党也参与了这种竞争，于是行贿和受贿事件层出不穷。震撼今天日本政界的洛克希德行贿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

在“一次防”计划时期，围绕战斗机是用格拉曼公司的？还是用洛克希德公司的？发生过激烈的对立。在1958年4月的第四次国防会议上，一度内定用格拉曼公司的飞机。可是当时的自民党总务会长河野一郎（现在的中曾根干事长是河野的部下，河野死后，中曾根继承了该派），与儿玉誉士夫勾结起来，为推销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而奔走，在1959年6月的第五次国防会议上，推翻了上次的决定，在同年11月的第六次国防会议上决定用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三次防”在选定战斗机时，也发生过道格拉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的推销竞争，结果道格拉斯公司获胜。在“四次防”计划时期，T<sub>2</sub>超音速练习机是用国产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制造）？还是进口（诺斯罗普公司产品）？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结果三菱重工业公司获胜。在这些推销竞争当中，进行了巨额贿赂竞争，所谓的“黑雾”笼罩着日本，成了当时的重要话题，只是其证据没有被揭露出来罢了。1968年3月7日，《朝日新闻》列举了防卫厅长官频繁更换的事实，从任命第一任警察预备队长官的1950年8月起到1967年12月止，长官更换了

二十三人，平均每人任期仅九个月——这暴露出防卫厅长官这个宝座成了自民党内各派争权夺利的目标。

话有些离题了。“三次防”的武器国产化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的目标。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要是《共同安全法》的有偿援助（主要是专利生产），处理与此有关事务的美军顾问也只剩下二十几名。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干与自卫队的编制或训练了。

### 第三节 第四次扩军计划与对日本战斗力的评价

关于制定“四次防”计划，1971年4月当时的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公布了所谓中曾根方案。在该方案正式决定之前，方案中预定购买的T<sub>2</sub>教练机（二十架）、RF<sub>4E</sub>鬼怪式侦察机（十四架）以及CI运输机（十一架）等这些“四次防”的最重要的新型装备的经费，就已经列入1972年度预算。对此，各在野党认为“四次防”的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太不象话，于是在1972年2月的国会上，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四次防”的正式通过大大推迟，在1972年10月的国防会议上通过大纲，而详细的具体方案一直悬到1973年2月，即1972年度末。

“四次防”的决定所以如此推迟，其背景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起了很大作用。1971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在翌年5月前访问中国的新闻公报；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发生了这个使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形势大大缓和的事件。并且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眼看就要成为定局，因美国背信弃义而拖延下来的和平会议，大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也就是说，日本为实现真正防御不得不加紧增强军备的形势完全不存在了，尽管如此，中曾根的预算方案竟超过从“一次防”到“三次防”十四年间预算总额的一倍，这种大幅度扩军的企图，遭到日

本人民大众的激烈反对。自1969年11月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以来,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带头,东南亚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这点将在下章再谈)。反映这种国内外形势,社会党及各在野党反对扩军的力量增强了。而且从1971年夏天开始,所谓财界即垄断资本集团对佐藤内阁表示强烈不满,说佐藤首相没有能力应付激变的亚洲形势;在对美出口纺织品问题以及其他同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对立加剧,没能满足日本垄断资本的要求,一味对美屈从,等等,开始要求佐藤下台,内阁于是不稳。1972年7月,佐藤内阁总辞职,田中内阁组成,9月,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使政局暂告稳定。这时才开始进行确定“四次防”的工作,在年度内的最后几天刚刚决定下来。

“四次防”的确定如此棘手,这说明日本急剧扩军和加强军国主义,同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因此军国主义势力随心所欲地进行扩军困难起来。“四次防”在本年度(1976年度)就要结束,从1977年度起就该进入“五次防”,可是防卫厅尚未拿出方案。恐怕它将受到人民的抵抗比“四次防”时期还要大。洛克希德行贿事件使今天的日本政局陷入混乱的深渊,它将使“五次防”的决定更加困难起来。

叙述稍微讲到前而去了。“四次防”是把1969年11月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公报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野心,在扩军计划中具体化了。

在1972年10月的国防会议上通过的“四次防”,计划将1972年度到1976年度五年间的总经费定为五兆一千亿日元左右,企图进一步加强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陆军大力增强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炮,试图把在“三次防”时期仅有的一个机械化师,实际上扩大到一切师,都实现机械化。并建立三个用新型地对空导弹装备的部队。在海军则作为提高对周围海域的防御能力和确保海上交通安

全能力的措施，计划一举扩大海军的行动范围。为此计划新造可载反潜直升飞机，或装备有舰对空、舰对舰导弹的新型驱逐舰十三艘，潜艇五艘，以及其他舰艇五十四艘，约七万吨；还计划新添反潜巡逻机七架以及其他作战飞机九十二架。空军则计划增强地对空奈基导弹部队两个飞行群，新增 F<sub>4</sub>EJ 鬼怪式战斗截击机四十六架，RF<sub>4</sub>E 鬼怪式侦察机十四架，国产 T<sub>2</sub> 超音速教练机五十九架，国产 CI 喷气式运输机二十四架，以及其它飞机。（通过“四次防”日本陆海空三军将拥有多大实力，这个问题小山内宏所著 1974 年出版的《这就是自卫队》一书作了详细介绍。）

陆海空三军的兵员数均未增加多少。因此这笔巨额预算比以前增多的部分几乎全都是拨充购置新装备的款项。借此将使武器国产化率的目标超过百分之九十。

“四次防”比“三次防”更具有攻击性。它规定“提高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能力”；“在对付空间入侵方面，进一步加强防空、截击和攻击能力，建成能在相当期间确保空中优势的体制”。在“三次防”以前，防卫计划在字面上还坚持海军和空军在领海和领空范围内行动的原则（实际上这决不可能）。可是今天的计划目标甚至在字面上也公然提出以在远离领海的远洋能够行动为前提的“确保海上交通”；不是在领空等候敌机，而是在“相当期间”（即到美空军全面来援以前）能够依靠日本空军自己的力量来维持日本周围空间的“空中优势”，即制空权。这一目标在以上略述的海军和空军的新装备计划中已具体化了。如果把这样的体制也称作“防御”，那不过是军事学上所说的“进攻防御”。

本来就在宣扬什么“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和战力”也可以装备核武器啦，“为了自卫，攻击海外敌人的导弹基地也不违反宪法啦”，持续不断地大肆扩军。因此这种情况发展到“四次防”，连公海和公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及对外国的进攻都变成了奋斗目

标,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事情并不是职业军人想出来、推动政治家去干的,而是垄断资本家最先提出来的。1969年4月,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代表理事樱田武,在“日经联”大会上发表了令人吃惊的讲话,说“日本的安全是由美国和韩国的纳税人来维持的。因此不管日本怎样夸耀自己的经济繁荣,它也只是半个国家。我们必须提高认识,增强防卫力量,现在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同年5月在日本兵器工业会大会上,会长大久保谦(接受陆海空军的电子设备订货最多的三菱电机公司总经理)在发表要求“把防卫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准许向东南亚出口武器”的讲话时,博得会员的热烈掌声。当时的军事预算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八,这就是说大久保要求一下子增加到五倍。即便是百分之零点八,日本1970年的实际军费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也仅次于美国、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居第七位。而在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军备之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是别的国家望尘莫及的,而且是唯一具有足以保持这种军备的工业能力的国家。尽管如此,垄断资本家还不满足。仅次于“经团联”的垄断资本的团体——经济同友会(该会是公认的“具有明知卓见”的团体)的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1969年5月发表讲话说,中东石油占日本能源的大部分,日本应该亲自保卫居于中东石油运输线上的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这一讲话使东南亚各国受到很大震惊,引起高度警惕。

在政治上代表资本家这种意向的是据说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1970年秋亲自写成的所谓《防卫白皮书》原案。在方案里面第一次提出确保空中优势和海上交通安全的军备要求。

1975年8月28日各报报道:由于1973年秋发生了经济危机,很难完全达到“四次防”的目标。根据这种情况,政府预定将

“四次防”最终年度 1976 年度的预算，比 1975 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尽管如此，估计海上自卫队约七万吨的新舰建造计划的近四分之一，即一万六千吨也不能完成；空军和陆军估计能完成计划。

如前所述，日本以世界最高的军费增长率、世界最快的扩军速度重整军备，在它的面前出现日益增大的政治困难，与此同时开始出现新的经济困难。然而日本统治阶级对这样的困难并不介意，将依然不肯放慢扩军的步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军国主义是今天日本垄断资本的“活生生的表现”。尽管美国已经不想更加积极地进攻亚洲，然而日本统治阶级会又发现一种可以扩军的理由，即亚洲的形势和过去不同了，即他们无疑会拿所谓苏联的威胁来作为理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威胁确实在迅速增加。然而也不能因此就拿来作为必须象过去那样继续扩军的借口。我认为排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另有他路可循的。可是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

他们也许想通过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军火生产，以及向海外出口军火来摆脱部分经济困难。毫无疑问，其主要意图不仅想通过废除现行的志愿兵役制实行征兵制来解决经济困难，而且想拥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在军备方面一跃超过西德。实行征兵制的准备，甚至连技术方面的细节都已经完成。关于这个问题，在林茂夫著《征兵准备的现阶段》（1973 年三一书房版）一书，根据确凿的资料，作了非常详尽的、明确的阐述。

如此不断地进行扩充的自卫队究竟拥有多大的战斗力呢？进步的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次防”完成阶段，陆上自卫队已超过旧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实力；海上自卫队尽管舰艇总吨数还少，但已拥有不次于旧联合舰队的战斗力；航空自卫队已拥有可与世界第一流空军媲美的力量。小山内宏还根据“四次防”按兵种进行了说明，他说兵员人数虽未增加，但战斗力将变为“三

次防”阶段的两倍。自卫队已经拥有能够发射装有核弹头的炮弹、炸弹和鱼雷的装备。据说在“四次防”以后会拥有大型巡洋舰和核潜艇,甚至连拥有生物化学武器的准备都作好了(小山内宏著:《这就是自卫队》)。

进步军事评论家藤井治夫著的《自卫队——这种战力——》(1970年三一书房版)一书,也对自卫队的装备和编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明确指出它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在政府方面,外务大臣爱知揆一在美国的外交专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69年10月号上,写文章夸耀自卫队的战斗力说:

“日本的自卫能力是相当大的。日本的三个自卫队,宪法上规定它们不能向海外派兵。然而这个拥有二十八万五千多人的军队,业已拥有比帝国陆海军战争期间最高峰时的火力还强大的常规武器火力,已经形成非常有效的本土防御力量。本会计年度的防卫费为十三亿四千万美元,每年以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五的比率增长着。据某非官方人士估计,大约在十年以后,日本的防卫费,大概可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费(包括常规武器经费和代价高得惊人的核武器开发经费)相匹敌。”

如上所述,进步的军事评论家为激发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危险的警惕性;反动的外务大臣为提高日本对美国的身价,都强调了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但也有相反的说法。有一个从1952年到1972年一直在防卫厅工作的官员,后来当了防卫局长,并在1967年到1972年担任国防会议事务局长的海原治则强调说,日本军备的现状是,一旦苏联发动进攻,日本完全没有单独防御的力量。他的目的在于坚持和加强今天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把整个日本象刺猬一样武装起来,使日本经常处于临战状态,把全体国民都组成军队(海原治著:《我的国防白皮书》1975年)。



究竟哪种意见正确呢？从唯武器论的立场来说，美苏除外，自卫队显而易见是今天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力，将来还可能进行核武装。现在，技术上正在一步步地作好准备。日本在原子能发电方面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原子能发电时产生的大量的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材料。政府佯称是发电用的，并全力以赴地独自开发浓缩铀技术，浓缩铀是制造氢弹的材料。而且日本已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技术与装上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生产、发射和控制的技术是共通的。不过，由于日本人民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核武装，美帝国主义也警惕日本单独搞核武装，因此还没有公开进行核武装的准备。

不管日本想怎样加强武器和装备，其军备有它致命的弱点。这就是日本的军备是没有灵魂的。日本的重整军备，首先是根据美帝国主义的要求、“援助”和“指挥”而开始和加强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是通过满足美国的这种要求而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主义军备的。它不是为了保卫日本民族独立、防御民族国家的军备，而是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的战略的军备。这是在日本尽人皆知的，日美统治阶级怎么隐瞒也隐瞒不住的。

其次，这种重整军备，一直是凭欺骗国民、混淆黑白的方法建设和加强起来的。今天的军备违反宪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历届政府和执政党、垄断资本集团总是想要修改宪法，然而这用合法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合法地修改宪法必须在国会众参两院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而日本人民不给他们那么多修改宪法的势力。将来修改宪法派占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可能性也只会越来越少。因此，历届政府和执政党都恣意篡改对宪法的“解释”，把违宪的东西说成符合宪法，进行欺骗。

最初说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是一种警察，不是军队。一改成自卫队便不能把它再说不是军队了，便说军队是军队，但不是“战

斗力”，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到了“一次防”阶段已不能再说不  
是战斗力了，于是便说尽管是战斗力，但是一种以自卫为目的的斗  
力，是不违反宪法的。

这样解释下去是没有止境的，还能够说“如果为了自卫”也可  
以拥有核武器；攻击海外敌人的基地也是容许的；为了自卫向海  
外派兵也是容许的。一方面佯称日本贯彻“单纯防御”，一方面又  
叫嚣为了自卫必须在公海和公空击退敌人，进而竟然讲出如下  
的话：

“当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冲突而联合国又来不及处理时，作为  
一种自卫措施去排除这种冲突，这样的任务是容许的”（1970年  
2月24日，爱知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发言）；“在台湾  
海峡发生的武力冲突，可以构成动用自卫力量的对象”（爱知外  
相1971年3月2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讲话）；“自卫权  
的行使不是在受到武力进攻以后（就是说也可以先发制人地发  
动进攻）”（1970年3月18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的政  
府统一见解）。

政府所以作出这样的发言，是因为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议  
员提出了质询。可是质询者只是听了政府这样的发言，并没有进  
行反驳，迫使政府承认这是违反宪法的。因而结果就等于质询者  
让政府利用国会这个地方把这种军国主义给“合法化”了。从这里  
也不难看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本质。

政府一直是这么混淆黑白进行欺骗的。政府难道以为用这种  
办法就巧妙地击退了议会主义者的追究了吗？一个国家的军备建  
立在如此荒唐的骗局上，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灵魂的军队呢。

自卫队是一个没有得到国民真正承认的军队。它是美帝国主  
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私生子。因此，自卫队的军官想以这样的身  
份到普通大学上学时，学校的广大学生就要掀起拒绝他们入学的

运动。驻冲绳的自卫队队员想在营房外居住，就曾发生过拒绝他们在市町村居住的事件。志愿参加自卫队的青少年是很少的。于是负责招募队员的人就跑到汽车教练所去，对在那里为取得汽车司机驾驶证而学习开汽车的青年说，参加自卫队既可以领工资又可以领驾驶证。此外，在日后的找工作上还有很多有利的地方，用花言巧语劝诱他们入队。自卫队入队考试三十分满分，有一个时期(1956年)得了三分以上就算合格。

尽管如此，自卫队的士兵仍然不能满编。固然根据经济情况的好坏，多少有些变化。士兵只能达到编制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而战斗部队和战斗支援部队的编制达成率尤其低。据1969年统计，前者为百分之七十四，后者为百分之六十九点七(藤井治夫著：《自卫队》)，其他年分也没有太大差别。

志愿参加自卫队的人如此少，这是它得不到国民支持的最有力的证明。

旧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军纪的根源来自对天皇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而自卫队的军纪观念来自哪里呢？今天的自卫队也在挖空心思企图把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保卫自由国家日本和尊崇天皇作为树立军纪的根源。然而前者根本没有成功，而且从理论上说也决不会成功。

即便鼓动对天皇的忠诚，要想作得象旧大日本帝国军队那样，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然而除此之外，并没有拿来作为军纪观念根源的东西。因此在自卫队的教育中，千方百计地灌输对天皇的崇拜。在培养军官和下级军官的机构中，原封不动地讲授大日本帝国时代的皇国史观(日本是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国民永远效忠天皇，才使日本国得以发展的历史观)。

政府和自卫队的干部想让天皇重新当大元帅。而且天皇本身也摆出一副大元帅的架子。这里暴露得最彻底的事例是，1973年

5月26日，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向天皇报告最近的日本军事情况，受到天皇勉励的事件。天皇向增原说：

“日本的自卫力量与近邻各国相比不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会要把自卫队当成问题呢？太奇怪了。”“保卫国家非常重要。因此，希望不学旧军队的坏处，吸收它的优点，切实把军队搞好。”

由于增原的得意忘形的谈话，这件事就传出去了，于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马上攻击政府，说政府在政治上利用了天皇。尽管他们谴责政府，但对天皇以大元帅自居一事本身，决不批评。在这种喧嚣声中又暴露出显示天皇和自卫队关系的另一个严重事件。自1965年以来，每年正月都要举行一次天皇勉励自卫队干部的仪式。在这个月召开自卫队的“高级干部会”。出席者有联合幕僚会议主席，陆海空各军幕僚长等六十多人。会议期间，他们在皇宫“拜谒”天皇，聆听天皇勉励他们的话。天皇说：“自卫队的官兵，平素励精其职，非常辛苦。希望认识到职责的重要性，更加励精于职务”。对此，联合幕僚会议主席代表大家回答说：“愿重下决心，为保卫我国的和平与独立而肝脑涂地，以符合圣意。”（1973年5月3日《朝日新闻》）

这也表明自卫队在尊奉天皇为大元帅，而天皇也在以大元帅自居了。

然而他们不敢公开这么干，只能不让国民知道，偷偷摸摸地干。这样干决不可能把对天皇的忠诚拿来作为军纪观念的根源。一些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说不定会通过政变的办法，或者近似政变的非法手段来修改宪法，使军备得到公认，实行征兵制，使天皇变为名符其实的大元帅。然而即使他们这样干，也不可能改变自卫队的历史，更不可能给自卫队注入灵魂。

## 第三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各阶段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就所谓军国主义是什么下任何定义，就用了这个词。可是，现在必须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资产阶级“舆论”，大多数认为日本决不是军国主义国家，而日本共产党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则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是尚未完成。为了批判这些观点，给军国主义下一个定义，这在讨论它是复活了还是没有复活的问题时，可以避免无益的争论和混乱。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三章《暴力论(续)》中说过，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国家，都采用普鲁士式的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热中于扩军竞赛。接着又说：“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7—168页）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给军国主义下定义，而是阐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军国主义的重要特点。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扩军竞赛。拿超级大国来说，恰恰是军国主义吞噬着国家，并企图吞噬世界。日本虽说今天是以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世界最高的年增长率进行扩军，但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军备吞噬着它们的国家相比，根本不在话下。统治阶级说日本不是军国主义，这种骗人的说法只是单纯根据日本的军事预算只占国家岁出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左右，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但是，第一，日本军费的绝对额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数额；第二，它是以世界最高的比率按几何级数增长着；第三，日本的军备是通过日美“安全条约”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军备勾结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三条，日本在疯狂扩军的问题上也已经具备了军国主义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是军国主义，并不仅仅是由军备的程度来决定的。1908年列宁讲过下面一段话：

“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6页）

根据列宁的这段话，“现代（二十世纪初）的军国主义”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好战的、反动的政策体系，它有两个侧面，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争夺霸权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和在国内实行阶级统治的武器。列宁在其后期著作：《帝国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之上，其政治必然是，对外力图实行侵略和扩张，对内则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上面引用的列宁在1908年所使用的军国主义的概念，与后来在《帝国主义论》中所阐明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征和根本性质的概念是相同的，是用不同的措词表现了相同的概念。

如果给军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那末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从1945年8月战败投降到1952年4月“和约”和“安全条约”生效，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准备时期。由于日本人民没能通过革命

彻底拔掉过去大日本帝国战败后的军国主义孽根，它便在美帝国主义的保存下潜伏下来，不久便为了改造成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而做好了复活的准备。这种准备集中表现在警察预备队的创建上。当占领日本的美军全去参加侵朝战争时，预备队是作为留守部队和日本统治阶级协助美帝的实力部队而被建立起来的。这件事意味着日本统治阶级协助美帝参与了对外侵略。而且预备队还是以镇压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己任的对内军国主义的武器。

接着，从1952年4月到1960年新“安全保障体制”建成，这是军国主义复活的第一阶段。《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签订；自卫队的创建；比战前集中程度更高、更强大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的复活；对教育的反动统制的复活；加强和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各种政策的开始；对议会民主主义的蹂躏；在掩盖造船贪污案件上暴露出来的行政权对司法权独立的事实上的侵犯；这些都集中出现在1954年。这表明对内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完成，对外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开始。

自卫队是对内军国主义的武器，同时它又作为对外军国主义的战斗力而迅速成长。而且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而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一面又利用美帝的力量，力求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1960年的新“安全条约”，就日方来说是结成日美军事同盟，实现帝国主义野心的武器。

从1960年6月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建立起，到1965年6月《日韩基本条约》签订止，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第二阶段。

垄断资本在统治国内方面的反动和暴力的体制逐渐得到加强。1960年6月，自卫队待机镇压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自卫队实际出动的地步，人民的斗争就被警察机动队镇压下去。但从这时起，自卫队便作为镇压人民斗争的部队加强了组织和训练。为了对这种所谓的“治安出动”及其训练拿

出一个可资遵循的准则，1960年11月制定了《治安行动教范草案》。它从单纯威吓和压制人民大众的阶段起到出动坦克、装甲车、航空部队和伞兵部队止，设想了一切阶段的行动。而且为了镇压人民，规定了自卫队同警察、公安调查厅等治安机关、一般行政机关、国营铁路、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广播协会(NHK)等之间平素如何联络与合作的形式。根据这个“草案”，自卫队平素就对其管区内的政治、社会、经济、交通、通讯等的状况，尤其是政党、工会以及其他团体、外国人(主要指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团体等的组织、势力、活动的历史状况和现状、主要人物的姓名、经历和能力等，秘密进行尽量详尽的系统调查(调查所需人员已经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甚至精密地制出出动镇压人民时必要的《警备地志》。

这些事并不是由这个《教范》才开始的，而是总结了自警察预备队时代起长达十年的镇压人民训练的经验编成的教范。这个草案由于1961年3月在参议院被揭露出来，政府和防卫厅便表面上停止了对这个草案的研究，但里面所规定的训练、调查以及同其他机关之间的联络与合作，实际上并没有停止。从1965年起，又着手制定新的教范，并在1968年以《指挥官须知》的名义，实施了新的教范。

在对内军国主义方面，不仅要研究旨在镇压人民运动的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器的加强，而且还要研究在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政策方面的军国主义的加强。诸如规定“建国纪念日”；在历史教育上加强对天皇的崇拜并为过去的侵略战争唱赞歌；对无线电广播、电视、报纸和电影等群众性宣传工具加强统制，借此鼓吹军国主义，压制反战、和平、民主思想；对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加强歧视和压迫，煽动民族排外主义，等等，此外还有诸多方面的事实，具体叙述从略。

在对外军国主义方面，自卫队早在1963年就已经研究假设美



国再次发动侵朝战争,届时自卫队将怎样协助美军、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的问题。不仅如此,甚至还研究了怎样建立国内的战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这时还处在实施“二次防”中,自卫队装备的战斗目标还只限于日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以内,但在这一阶段已经研究了包括协助美军、向朝鲜派兵的作战计划。三矢作战研究和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等的签订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方面也已经结束了复活的过程。

缔结《日韩条约》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得到更迅速的加强,并日益成为近邻各民族的威胁。“三次防”和“四次防”就是以完成其军国主义为目的扩军。

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首先指向国内人民,这是不待赘述的。1969年10月,自卫队在富士山麓公开进行了甚至包括出动坦克和用直升飞机降落部队的大规模的“治安出动训练”。这是自卫队预想到1970年6月“安全条约”很快就要到期,会再次出现十年前那样的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而对人民进行的大示威。这年12月25日,陆上幕僚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通过今年一年的训练,树立了一个治安出动的典范,对队员也彻底进行了训练。今后将以反游击战训练为主,治安训练的时间可能减少。”

在这以前的11月,防卫厅和警察厅就自卫队对警察的治安警备的支援形式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即使在首相对自卫队发出治安出动命令以前的阶段,自卫队也可以承担警察机动队员的运输任务,并可把自卫队拥有的催泪弹等镇压用的武器借给警察方面。据自卫队法第七十八到八十一条关于治安出动的规定,这是非法的,实际上是篡改了自卫队法。

于是自卫队作为支援警察的力量就经常发挥其镇压人民的职能(藤井治夫著:《自卫队》)。

自卫队还对政变进行研究。据说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编的《兵学研究会记事》第六号(1971年4月20日号)登载一篇论文,有以下内容:

自卫队是保卫现行宪法体制,即自由主义体制的部队。因此,即使合法地建立了革新政权,当这个政权还软弱时,就一声不响地等待它垮台,而当它一旦强大,就采取“保卫宪法体制的行动”。……

这是1975年2月4日在众议院被社会党议员揭露出来的,而还没有揭露出来的这类研究,可能多得很。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的锋芒指向哪里呢?据上面所述已很清楚,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同盟者,协助美帝称霸亚洲的武器;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借以对朝鲜、台湾和东南亚进行经济侵略和扶植政治势力的武器。不能说,日本的军队配备在作战方面是以防御苏联进攻日本为主,就认为这个军队是自卫的而不是侵略的。因为若是有必要这样来防御国土,那是因为日本担当着美国对苏争霸战的一翼,同时日本自己也力图进行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本土防御就是整个帝国主义战争一部分的防御战。整个战争的性质并不是防御战。

一般理论就谈这么多,现在再具体地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对朝鲜、台湾和东南亚采取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 第二节 “日韩会谈”与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在战败后最早注目、最最重视的是朝鲜。

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和资本主义从其建成的最初阶段就是靠侵

略朝鲜，饮朝鲜民族的血，茹朝鲜民族的肉壮大起来的。战败后的日本垄断资本仍靠鱼肉朝鲜民族，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即当1950年到1953年，美帝国主义发动和进行侵略朝鲜战争的时候，日本便成了美军的根据地，日本垄断资本便成了美军的军需工厂。美军的“特需”采购1951年约为五亿九千万美元，1952年为八亿两千四百万美元，1953年为八亿一千万美元，1954年为六亿美元，1955年为五亿六千万美元，分别占各年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四、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和百分之二十点九（经济企划厅统计科主编：《日本经济统计》上，1964年版）。可见在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所获得的美元当中，浸着朝鲜民族的血，粘满朝鲜民族的肉。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以这些美元为本钱实现了复兴，并以超过战前的速度开始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又力图在朝鲜重新扶植帝国主义势力。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1951年10月，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强烈要求（在占领当时，这实际上是命令）下，同南朝鲜开始进行恢复邦交的预备会谈。在日本“独立”的同时，美国企图让日本根据它自发的意志，通过给战争中的南朝鲜大量生活物资来协助美国的侵略战争。要作到这一点，“日韩”两国必须有正常的国交，因此便命令“日韩”双方的政府，举行两国会议。

1952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日韩会谈”。当时南朝鲜方面希望日本对其过去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彻底反省，树立“日韩”两国对等的新关系，可是日方根本不想这样作。在正式会谈开始的前夕，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在南朝鲜周围的海域划了一条“和平线”（李承晚线），禁止日本渔船进入这条线以内。在“日韩会谈”当中，日方只是一个劲地反对李承晚线，不想谈起会谈的主题。因此会谈历经两个月而中断。

自此以后过了一年，1953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南朝

鲜方面以新的平等国交为前提，要求日本宣布1909年的“日韩合并条约”无效。日本不接受，仍然只主张撤销李承晚线。因此，第二次会谈也历经三个月而中止。这时在日本国内，政府和执政党大肆宣传日本渔船进入李承晚线被南朝鲜方面捕获的事件，说什么“日本要是过去那样的海军就不会让朝鲜人这样为所欲为，可是……”竭力煽动重整军备和蔑视朝鲜的民族排外主义。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为了在李承晚线内外确立日本的渔业权，向南朝鲜政府提议举行会谈。南朝鲜表示同意，遂于10月6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当时日方的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什么“在日本缔结媾和条约以前，南朝鲜擅自独立是非法的”，无视《波茨坦公告》，蛮不讲理；还说什么“日本统治朝鲜、铺铁路，开港口，开垦农地等，对朝鲜作了有益的事，丝毫没有剥削和压迫朝鲜。”狂妄已极，令人吃惊。南朝鲜方面当然非常愤怒，要求久保田撤回发言，久保田不接受，会谈仅历两周就决裂了。久保田的狂妄发言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话，而是日本统治阶级始终也没改变的帝国主义的真心的流露。

自此以后，“日韩会谈”中断了将近五年。第三次以前的会谈，日本尽管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进行的，但日本根本不想给南朝鲜生活物资以及其它方面的援助，而且当时它也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想使会谈成功。

1953年7月，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速发展，而南朝鲜却没有摆脱战争的打击，经济没有复兴起来，李承晚政权极不稳定。在东南亚，美帝国主义践踏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阻挠南北越南的统一，在南方扶植傀儡政权；而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却在顺利稳步地发展着；柬埔寨不顾美帝的压力坚持中立。在印尼，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发展。

美帝国主义在日内瓦协定成立两个月后的1954年9月，搜罗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的反动政权，拼凑了反动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但它也没有成为能够对抗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它称霸东亚之梦，撮合日本、南朝鲜、台湾的蒋介石一伙，拼凑了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军事同盟(NEATO)，并企图把它同东南亚条约组织联结起来，控制东亚，建立中国包围圈。因此，日本和南朝鲜必须建立正常国交。美国为了改善南朝鲜的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稳定，想让日本给南朝鲜经济“援助”。因此，从1957年秋，美国又强烈要求两国重开“日韩会谈”。

这时，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战前，如岸首相的“开发东南亚”设想所表现出来的，力图实行新的帝国主义势力扩张。于是岸内阁便接受美国的要求，企图把“日韩会谈”当成日本在南朝鲜扶植势力的第一步。

1957年12月31日，以日方正式撤回过去的久保田发言，撤回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时日本人在朝鲜拥有的财产的赔偿请求权的主张(日本竟然提出这样的主张)等等为前提，发表了将于1958年3月1日举行第四次“日韩会谈”的“日韩联合声明”。在“声明”里面说，日本对南朝鲜的财产请求权的主张，“以1957年12月31日美利坚合众国声明为基础”，予以撤销。由此可以看出，第四次会谈是美国说服日本使其接受会谈的。

前面已经说过，第四次“日韩会谈”的日方代表泽田廉三发表了日本必须把三十八度线推回到鸭绿江那边，即必须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韩国”统治整个朝鲜的演说。

在1958年4月开始的第四次会谈当中，南朝鲜提出在日本统治下南朝鲜人被夺去的财产请求权的主张，日方予以拒绝。在李承晚线问题上也发生了对立，会谈没有进展。在这期间，1960年4

月，由南朝鲜人民在学生带头下把李承晚赶下台，因此第四次会谈也流产了。

在南朝鲜李承晚被打倒以后，张勉当了总统。1960年10月，张勉政权与日本池田内阁之间举行了第五次“日韩会谈”。由于张勉政权极不稳定，会谈没有进展。1961年5月，张勉政权被朴正熙用军事政变推翻。于是第五次会谈没有任何成果也流产了。

之后不久，6月，池田首相访美与肯尼迪总统会谈。肯尼迪强烈要求池田就“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池田回国以后，朴正熙来东京与池田首相会谈，双方就“早日使日韩国交正常化”，原则上达成协议。朴正熙急于使“日韩会谈”尽快达成协议，因为南朝鲜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而美国为了保卫美元削减了对南朝鲜的“援助”，因此朴正熙希望同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从日本搞到钱。肯尼迪也对池田提出这种要求，希望日本代替美国对南朝鲜进行“援助”。池田也把这件事看成是日本在南朝鲜扶植帝国主义势力的好机会。

1961年10月，开始了第六次“日韩会谈”。日方遴选了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杉道助为首席代表。杉不久病死，其后任是三菱电机公司的董事长高杉晋一。这是一种以日本商品独占南朝鲜市场为背景的人事安排。

日本同南朝鲜之间的贸易，是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由美军居间斡旋而开始的。贸易额不大，而且是日本商品的单方面的输出。1959年日本经济空前繁荣，生产力迅速上升。从这年起至1961年，南朝鲜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绵实业、江商<sup>①</sup>、住友商事（都是日本有代表性的贸易垄断资本），都在汉城设了常驻代表。尽管“日韩”邦交尚未正常化，官方还不允许日本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进行合法活动，然而大贸易公司已经在积极地推

<sup>①</sup> 江商：原文为“红商”，系“江商”之误。——译者

销日本商品。’结果，1964年，日本占南朝鲜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九(约三千八百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约一亿一千万美元)。南朝鲜几乎以三比一的比例对日入超。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间，南朝鲜对日入超额合计为两亿九千二百一十五万美元，超过了这期间南朝鲜的出口总额两亿六千零六十七万美元<sup>①</sup>。日本几乎独占了南朝鲜市场，很快就掌握了南朝鲜的经济命脉。

为了对这种经济活动给与法律保障，日本垄断资本希望“日韩”国交尽快实现正常化。他们在1960年底就已经同有实力的在日南朝鲜资本家(尽管这么说，但与日本资本家相比，只不过是小资本家)一起，“为了促进日韩邦交的恢复”，设立了“日韩经济协会”，对政府进行工作。该会顾问是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足立正，会长是“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1975年，田畑书店版)。杉道助和高杉晋一被遴选为第六次“日韩会谈”的首席代表，就代表了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动向。

自此以后，“日韩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促进“日韩会谈”的不只是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动机，还有美帝国主义对远东的军事动机。据说1962年10月，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预想到不久的将来“日韩会谈”将达成协议，而且中国将进行核试验，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决定“美日韩”进行军事合作。据当时的《东京新闻》和《每日新闻》报道，其内容有：(一)美国把过去由美国一国承担的远东对共产党国家的“防御”，委托给“日韩两国”；(二)两国在其领土内设立美国核潜艇基地；(三)南朝鲜军的装备在日本生产。美国把对共产党国家的防御“委托”给“日韩两国”一事，是很难理解的，这一报道的准确程度不无疑问，不过，曾经研究过建立“日美韩军事合作体

<sup>①</sup> 美元：原文为“日元”，根据原文第164页表4判断，系“美元”之误。——译者

制”一事,恐怕是事实。

在这次协商会议前夕,10月1日,防卫厅宣布:“正在研究当‘日韩’邦交正常化后,在汉城设驻韩武官,把日本、韩国、冲绳、台湾的防空警戒组织联络起来,以便在这些地区能够进行空军联合作战的设想。”因为美国的第五空军司令部(驻东京都府中)统一掌管日本空军、冲绳基地的美国空军和南朝鲜空军,并同台湾的美蒋空军有联系。由此可见,日本在美军的总指挥下,研究与“美、韩、蒋”空军联合作战一事,是很可能的。

1963年1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访日,与池田首相、志贺防卫厅长官、林联合幕僚会议主席进行了会谈。会上协商了什么,完全保密,但它确实同建立“美、日、韩”军事合作体制有关。吉尔帕特里克后来视察了南朝鲜和南越(这时美国已经准备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然后回国。4月17日,他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美国期望日本在太平洋西北部比过去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中略)最后,美国期望日本拥有足够的海空军力量(不是攻击力量而是监视力量)来保卫包括朝鲜半岛一部分在内的地区。这样当南朝鲜发生新的危机时,也许可以不必期待美国再向韩国增派兵力。”(共同通讯社:《世界周报》1963年5月7日号)

吉尔帕特里克来日后不久,从2月到6月,防卫厅已经进行了一再公布过名称的《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该计划假定出现这样一种事态,即“昭和三十×年(1960年到1969年)7月19日傍晚,中国和北朝鲜的联合战斗机和轰炸机大编队突袭南朝鲜,北朝鲜军越过三十八度线”,对此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就是研究日军在这次战争中怎样进行联合作战和届时怎样处理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后者甚至研究了建立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



的程序问题，如向国会紧急提出，并使其在两周内通过《有关整備国防中央机构等事项》、《各种战时法案和预算补充修正案》等八十七项议案的问题，战时经济统制、劳动力和其他必要人员的确保措施等等。

根据这个设想说，战争是在7月19日以北朝鲜和中国方面的突然袭击开始的；而上述向国会提出的八十七项法案、预算案以及其他议案的准备工作，是在5月31日以前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尽管说是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实际上美国和日本方面在开战的两个多月以前，已完全作好转向战争体制的准备。这里，他们自己就暴露出所谓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并非突然袭击，而是美日方面预谋的战争。

根据这一计划，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日本本土和承担美军的后方支援。不过它还规定部分自卫队将协助并参加美军对北朝鲜、千岛和库页岛的进攻战，还将参加“联合国”军，即美军占领地区的警备。

《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还研究了当南朝鲜军内发生部分叛乱，影响到日本国内治安情况的时候，“共产党方面”支持南朝鲜军叛乱，最后导致同美军和南朝鲜军的战争等各阶段的自卫队的行动计划。另外，这个计划还研究了：（1）在日本发生天灾地祸，根本没有外国干涉时；（2）对日本发动间接侵略时；（3）发生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或者威胁到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时；（4）在日本施政区域内，对日美任何一方实行武力进攻时，这四种“紧急时期”的自卫队的行动以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调整”。关于这些这里从略（详见藤井治夫的《自卫队》一书）。

当《三矢作战计划》在国会上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揭发出来的时候，政府说这件事政府全然不知，自卫队设想各种万一发生的情况，研究相应的对策，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统管这次三矢作战

计划研究的负责人陆将<sup>①</sup>田中义雄，在札幌地方法院审理惠庭事件<sup>②</sup>时的证言中说：“三矢研究决不是什么假定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大学里的课堂研究。它始终是一种以实战为目的作战计划”（日本共产党出版部编：《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1966年）。内容这样重要、且以实战<sup>③</sup>为目的的作战计划，身居自卫队最高指挥官的防卫厅长官和首相，如果完全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严重的玩忽职守，不然就是自卫队早就象过去的军部那样已经脱离政府，独立行动，二者必居其一。总之，日本统治阶层早在1963年“二次防”实施阶段，已经就在制定当美军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怎样进行联合作战的计划，甚至计划同美军一起到北朝鲜、千岛和库页岛去协同作战，竟然还研究和计划用实际上近乎政变的方式，建立战时总动员体制（届时成立军事独裁或者近似军事独裁的政权）的程序。如果这还不算最极端的军国主义，那末它又叫什么呢？

《三矢作战计划》研究了部分日军出兵朝鲜的问题。为了能够合法地、顺利地向朝鲜出兵，日本和南朝鲜必须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作战计划也是以尽快实现日本同南朝鲜邦交正常化为前提的。

因此，为了建立促进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实行经济统治的法律前提，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日军能够向南朝鲜出兵作战的前提，日本垄断资本、政府及其军事部门等一切统治阶层便急于实现日本同南朝鲜的邦交正常化。

从南朝鲜方面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日本皇军中尉冈本某的朴正熙总统，不仅不象李承晚那样反日，而且同冈本中尉

---

① 陆将是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军衔，相当于中将。——译者

② 惠庭事件：1962年12月，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练兵场演习，惠庭地区的当地农民对演习影响农业生产非常愤怒，切断了自卫队的电话线的事件。检查官以违犯《自卫队法》罪，对该农民进行起诉。在审判中，被告争辩说自卫队违反宪法。

③ 实战：原文是“实践”，疑为“实战”之误。——译者

时代一样是媚日的，他为了利用日本的“援助”来弥补减少了的那部分美国“援助”，以加强其卖国政权，急于使“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作为日本和南朝鲜双方的指挥者——美国总统，为了维持朴政权，为了把维持这个政权的部分负担让日本来代替，也敦促双方就“日韩会谈”达成协议。

这些条件都已具备，所以会谈进行得很顺利，1962年底，实质上已就基本各点达成协议。然而南朝鲜人民大众反对这种卖国会谈，不顾朴正熙军事政权的镇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一斗争进入1964年发展到四年前打倒李承晚时期的规模。因此，朴正熙也不不得不在同年3月将1962年10月以来派到东京去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谈判的心腹金钟泌召回南朝鲜。这样一来，第六次会谈也中断了。如果这时日本人民与南朝鲜人民相配合，象南朝鲜人民那样，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地开展强有力的反对斗争，也许就埋葬了“日韩会谈”。在日本，反对“日韩会谈”的口号也在所有民主的群众大会上提了出来。1962年10月21日，在日本全国（冲绳除外）二十个主要美军基地周围，召开了要求撤销基地和粉碎“日韩会谈”的大规模集会。以后斗争逐渐发展。然而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一种从属于一般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在街头集会上和游行示威时的口号宣传，没有发展成为集中粉碎“日韩会谈”、深入到工厂车间、能够组织罢工及其他决定性行动的持续斗争。日共已经从修正主义的斜坡上直线地坠落下来，害怕群众起来闹革命；而社会党根本就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学生为主力的新左翼各派是有斗争性的，但几乎没有同工人、同劳动人民大众结合起来，所以没能发展成为同南朝鲜人民相呼应的斗争。

从理论上来看，反对“日韩会谈”的斗争，本来是反对复活了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可是日本共产党却没有明

确把握这一点，使它从属于反美斗争。“日韩会谈”一直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也不应因此就使反对“日韩会谈”的斗争从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粉碎“日韩会谈”的斗争本身就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而不是相反。

第六次“日韩会谈”中断后不久，1964年8月，美国对越南南方和北方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美国的舰队和空军在北部湾一再非法进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8月20日，越南人民军鱼雷艇为了进行反击，攻打美国驱逐舰。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说美舰遭到北越军的非法攻击，对此美国将进行合法的报复，于是对北越开始了舰炮射击和飞机轰炸。一切都是按照这年一月以来美国周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8月4日，美国大举炮轰北越沿海地区。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年底把侵略战争全面扩大到南北越南。（《美国防部秘密报告》，载日本《朝日杂志》1971年7月9日特辑号）

美国希望日本和南朝鲜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和南朝鲜两国政府也都高兴地进行了合作。这时，为了使南朝鲜易于派兵参加越南战争，日本有必要“援助”南朝鲜。为此，必须加紧实现日本同南朝鲜的邦交正常化。于是美国副国务卿邦迪便奔走于东京和汉城之间，12月10日，让它们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日韩会谈”。

1965年1月7日，日方首席代表高杉晋一在接见记者谈到日本为了正式出面“开发”南朝鲜必须早日恢复邦交时说：

“日本统治三十六年，并没有剥削朝鲜，是出于善意的，日本是想作好事的。据说现在韩国的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朝鲜脱离了日本的缘故，如果再和日本同处二十年，恐怕是不会变成这种样子。我们的努力由于战败前功尽弃了。如果再拥

有朝鲜二十年,可能不至于变成这种样子。日本把工厂、房屋和山林都留给朝鲜了。创姓改名(强制朝鲜人改成日本式的姓名)也很好。那是为了同化朝鲜人,为了让朝鲜人受到和日本人同等的对待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什么剥削或者压迫。”

这套话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久保田的狂妄发言,是帝国主义思想的大暴露。南朝鲜人民听到后非常愤怒,可是朴正熙政权并没有生气。12月11日,朴政权竟向南越派遣了二千名的军队。第二天12日,日本政府(1964年11月,池田首相因病辞职,佐藤荣作当了首相)作为“对韩紧急援助”,对南朝鲜无偿地提供二千万美元的原材料和机器零件,从而使过去同南朝鲜进行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据说这笔钱相当于派往南越的两千名南朝鲜兵所需要的装备及其他费用。

以“日韩”双方对美国侵越战争进行合作为媒介,“日韩会谈”进展得非常迅速。1965年2月17日,椎名外相访问南朝鲜,20日在汉城草签了《日韩基本条约》。4月3日,双方就南朝鲜对日请求权,日本对南朝鲜的渔业合作,在日南朝鲜人的法律地位等三个问题的谈判,也达成协议,进行了草签。并就归还日本从朝鲜抢去的文物问题和今后的文化合作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2日,正式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及其他一切协定。

到了这一阶段,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及所谓“文化人”所领导的反对“日韩条约”的游行和集会,非常频繁,但为时已经太晚了。接着到了在国会审议和批准该条约的阶段,与五年前审批新《日美安全条约》时相似,向国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游行,但终究是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了。

11月12日,议长在众议院大会上宣布以《日韩条约》案为议题,紧接着只用了三十五秒钟又宣布全部通过;12月11日,参议院在只有自民党和民社党(社会党、公明党和共产党的议员进行抵

制,拒绝参加审议)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大会,一揽子地通过了《日韩条约》的全部议案。于是,堪称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登记证的“日韩关系诸条约”,和它的内容很适称地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方法强行通过了。

通观“日韩会谈”,从其达成协议、签署条约和审议批准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日韩条约》是美帝国主义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侵略东南亚的政策,是它让“日韩”两国政府为它服务的政策;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这个条约则是高度发展了的垄断资本,在“援助”和“开发”的美名下,企图把南朝鲜变为日本的商品出口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条约,而且是旨在把南朝鲜变为对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落脚点的条约。达只要分析一下《日韩基本条约》的条款,就看得一清二楚。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间接地承认南朝鲜是“朝鲜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等于日本同南朝鲜站在同样立场上,认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是非法的,与南朝鲜否认和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唱的是一个调子。这个条约还规定:两国“认为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两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密切合作是重要的”。这就成了两国事实上结成军事同盟。所谓“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安全条约》中都用过,是美帝国主义惯用的词句。其真正意思是说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反共、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革命运动将发动战争。《日韩条约》上的这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在东京签订这一条约后归国的南朝鲜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明目张胆地说:“韩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以中共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保障”。

《日韩基本条约》体系中的南朝鲜对日请求权及两国经济合作有关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对南朝鲜提供无偿政府援助二亿美元、有

偿政府援助三亿美元和私人资本援助三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对南朝鲜实行经济侵略；意味着已经垄断南朝鲜对外贸易百分之三十的日本又开辟了进一步垄断南朝鲜市场，将其变为资本输出的场所，置南朝鲜于日本的殖民剥削之下的新的道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日韩条约》的签订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复活，它还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也已经完成了复活。这种军国主义在对外方面紧密地从属于美国的亚洲战略。但不应因此就说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从属于强大的帝国主义是世界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如果站在朝鲜人民的立场来看，马上就会看出日本毫无疑问是最凶恶的军国主义，他们决不能说日本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就不是军国主义。只能认为日本是假美国大虎之威的一只小虎，因此它是格外凶暴的军国主义。

### 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以签订《日韩条约》为跳板，日本对南朝鲜的商品出口和资本的输出飞跃增加。日本对南朝鲜的出口贸易，1965年以前大致为一亿多美元，但《日韩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966年，与上年相比激增百分之七十六，接近三亿美元，之后每年飞速增加，1972年超过了十亿美元，1973年超过了十七亿美元。来自南朝鲜的进口，在这期间也激增一倍多。在“日韩”贸易方面，日本的出口一向为进口的四倍左右，因此即使在1973年，南朝鲜对日贸易依然人超四亿八千四百多万美元。在南朝鲜的进口总额中，来自日本的进口比重，1965年为百分之三十六，从第二年起达百分之四十大关，1973年竟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九。在南朝鲜的出口中，对日出口比重，1965年以后最低的一年（1969年）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最高的一年（1973年）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五。自1966年以来，在南朝鲜对

外贸易逆差总额中，日本占百分之四十八到百分之六十九。历年数字请看(表4)。

(表4) 南朝鲜对日进出口贸易比重

(单位:千美元)

年度	出 口			进 口			对日出口 进口比率 ①	逆差总 额中对 日逆差 所占的 比重%
	总 额	对日 出口额	%	总 额	自日本 进口额	%		
1962	54,813	24,483	44.7	421,782	109,171	25.9	1:4.46	23.1
1963	86,802	24,841	28.6	560,273	159,345	28.4	1:6.45	28.4
1964	119,058	38,158	32.0	404,351	110,117	27.2	1:2.89	25.2
1965	175,083	43,974	25.1	463,442	166,628	36.0	1:3.79	42.5
1966	250,334	66,293	26.5	716,441	293,794	41.0	1:4.43	48.8
1967	320,229	84,726	26.5	996,246	443,051	44.5	1:5.23	53.0
1968	455,401	99,744	21.9	1,462,873	623,998	42.5	1:6.26	52.0
1969	622,516	133,326	21.4	1,823,612	753,817	41.3	1:5.65	51.7
1970	835,185	234,329	28.0	1,983,973	809,283	40.8	1:3.45	50.0
1971	1,067,607	261,988	24.5	2,344,320	953,778	39.8	1:3.64	54.2
1972	1,624,088	407,876	25.1	2,522,002	1,031,085	40.9	1:2.53	69.4
1973	3,220,614	1,239,701	38.5	4,218,531	1,723,723	40.9	1:1.39	48.5

资料来源：“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1975年，田畑书店版，第31页。

南朝鲜事实上处在美国的占领下，美国在其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但日本占的比重比美国还大。尤其是在进口方面，1965年以前，来自美国的进口比日本多，但1966年以后，日本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在出口方面，1965年以前，对日出口比对美出口多，但1966年以后情况倒转，对美出口一直比对日出口多，到1973

① 对日出口进口比率：是以对日出口为1的自日进口的比率。——译者



年又发生了逆转。南朝鲜的对日、对美贸易构成比的演变，请看（表5）。

（表5） 南朝鲜对日美贸易构成比的演变

（单位：%）

		1961年到 1965年平均	1966年到 1970年平均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出 口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日 本	35.2	24.9	24.5	25.1	38.5
	美 国	26.3	46.2	49.8	46.7	31.7
进 口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日 本	27.4	42.1	39.8	40.9	40.7
	美 国	46.2	31.1	28.3	25.7	28.3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32页。

总之，从贸易额来看，南朝鲜可以说是日美两国的独占市场，但其中日本的比重更高，而且与年俱增。

不仅如此，而且在南朝鲜进出口贸易的经办额中，日本大贸易公司所经办的比重都很高。前面已经说过，在签订《日韩条约》以前，日本的贸易公司就非公开地到南朝鲜去活动，条约签订以后便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了。从1967年起，大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设立正式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不仅作为总公司的代理，以自己的名义搞进出口贸易，而且还替南朝鲜的贸易公司招揽进出口生意，从中赚取佣金，利用这种形式使南朝鲜的进出口商实际上从属于自己。南朝鲜的进出口商，从国际范围来看，是一种小本经营，在海外广泛开辟销路的力量极小。所以不得不依赖日本大贸易公司所掌握的交易渠道。日本贸易公司的分公司开始活动以来，经其招揽的南朝鲜出口贸易额，每年以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比率增长。1972年在南朝鲜的日本贸易公司的经办额在南朝鲜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四，占向日本出口的百

分之二十八点八。而在日本贸易公司的经办额中，输往日本的比率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输往日本以外地区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也就是说，在南朝鲜的日本贸易公司的分公司，不仅从事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的贸易，而且还把充当南朝鲜整个对外贸易的中间人和经纪人作为主要活动。在南朝鲜的外国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进口中的销售额，1973年占一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此外加上政府购进的部分以及其他部分，进口金额达十三亿多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点三是由日本贸易公司经办的。日本的大贸易公司依靠其在全世界建立的交易网和情报网以及南朝鲜贸易公司与之无法相比的巨大资本力量，逐渐把南朝鲜的企业纳入自己控制的体系中。

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自1966年以来，连年激增，这是因为南朝鲜的工业迅速发展的缘故。南朝鲜是从哪里弄到这些工业建设资金的呢？主要依靠来自外国的政府间的贷款和“援助”与私人资本的商业贷款以及外国资本对南朝鲜的直接投资。到1969年为止，在资本输入的累计额（实际达到的数字）中，美国为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占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日本为三亿六千六百万美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不过美国政府对南朝鲜政府的“援助”，1965年以来逐渐减少，私人资本的商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也在减少，反之，日本政府提供的贷款以及日本私人资本的贷款和直接投资急剧增加。尤其是直接投资，如（表6）所列，1967年还仅仅为一百五十万美元，1969年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万美元，超过了美国的直接投资额，1973年进一步飞跃增加，接近三亿美元，约为美国的二十四倍（以批准额为基准）。到1974年6月底，南朝鲜自日本引进的资本额和余额及其比率，见（表7）。在南朝鲜引进的外资余额中，日本的比重是，贷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直接投资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两项合计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八。美国提供的贷

款和投资合计的累计余额仍比日本多，然而它所占的比重与年俱减，而日本则与年俱增。

(表 6) 南朝鲜历年引进外资的演变\*

(单位: 百万美元)

年次	引进外资的形式 (以实际达到数为基准)				各国投资情况 (以批准额为基准)			
	合计	政府贷款	商业贷款	外国私人投资	合计	日本	美国	其他
1959— 1966	350.4	140.8	184.1	25.5	30.5	—	29.9	0.6
1967	237.2	105.6	124.0	7.7	20.1	1.5	18.0	0.6
1968	357.8	70.2	268.4	19.2	25.6	4.5	14.6	6.5
1969	560.3	138.9	408.7	12.7	30.4	17.7	6.0	6.7
1970	548.1	115.3	366.7	66.1	65.4	15.8	41.8	7.8
1971	691.4	303.4	345.2	42.8	50.9	24.7	21.7	4.5
1972	729.6	324.4	326.4	78.8	113.3	77.6	29.7	6.0
1973	856.2	368.5	344.4	143.3	314.1	295.2	12.6	6.3

\* 南朝鲜引进外资的数字,有的以批准额为基准,有的以确实到达数额为基准,因此不仅各自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即使在同一基准中,由于发表的时间不同,也不相同。所以上表只能列出大体的倾向,不能看作是准确的数字。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71页。

而且日本垄断资本控制着南朝鲜的重化学工业。例如日本对南朝鲜重工业建设的关键项目浦项制铁所提供建设贷款的合同于1967年签订,到1973年竣工为止,日本提供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合计为一亿六千八百零五万美元。然而日本对南朝鲜的重工业建设的合作条件是,南朝鲜的工业建设项目必须以“有效利用”浦项制铁所为前提条件。

关于日本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

日本控制南朝鲜经济的意图,1970年4月在汉城召开的第二次“日韩”协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69年2月成立,会长为岸

信介,在顾问和常务委员中网罗了日本主要垄断资本家)上,由理事矢次一夫提出的《日韩长期经济合作试行方案》中暴露得最清楚。其基本要点如下:

(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为目标,建立“日韩经济合作圈”,并使其发展成为“亚洲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二)、“日韩经济合作圈”把浦项以南的南朝鲜沿海工业地区,同鸟取、山口、北九州等日本关西经济圈联结起来;

(三)、日本希望把钢铁、炼铝、石油、石油化学、造船、电子工业、塑料等因厂址选择困难和公害等原因在国内发展达到限度的工业,转移到南朝鲜去;

(表7) 南朝鲜引进日本资本的情况

(1974年6月底)

(单位:百万美元)

	借 款			投 资	合 计
	财 政	商 业	小 计		
以批准额为基准	548.4	691.5	1,239.9	467.6	1,707.5
比 率%	21.4	19.5	20.3	67.4	25.1
以到达额为基准	384.0	646.8	1,030.8	295.3	1,326.1
比 率%	22.9	24.7	24.0	65.0	27.9
偿 还 额	5.7	215.6	221.3	1.1	222.4
比 率%	6.4	23.1	21.6	4.2	21.2
余 额	378.3	431.2	809.5	294.2	1,103.7
比 率%	23.9	25.5	24.7	68.7	29.8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73页。

(四)、日本经济界为了通过合办的形式谋求长期合作,建立“日韩合办与加工贸易振兴公社”,希望南朝鲜政府采取措施,严禁在合办公司内搞工人斗争;

(五)、日本方面从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出发，考虑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南朝鲜。对“日韩合办与加工贸易振兴公社”，日本方面百分之百由私人出资，把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交付南朝鲜，南朝鲜方面，政府出资百分之七十，私人出资百分之三十，接受委托加工；

(六)、希望南朝鲜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大力扩大保税地区<sup>①</sup>和自由港地区<sup>②</sup>，以便承担日本企业的制造和加工。

对这个试行方案，无须多加解释。这是一个企图把南朝鲜经济变为日本经济的承包殖民地、把日本的多公害企业和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南朝鲜、彻底掠夺南朝鲜人民的方案。

一个包罗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团体，竟公然如此露骨地写出南朝鲜殖民地化的计划，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南朝鲜看成是日本的殖民地了。而且日本对南朝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战略执行的。

日本在“对外经济合作”的名义下，搞了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其中从1967年到1971年实际累计额的百分之十五点四是向南朝鲜输出的。这一比率作为对一个国家的比率来说是最高的；其次是对香港。然而对香港的资本输出，没有日本支配香港经济的性质。而输往南朝鲜的，如前所述，则控制了南朝鲜经济，而且日本还控制了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在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对南朝鲜的出口，自1969年以来大体占百分之四点八，尽管与对美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二十三没法相比，但它却居第二位。这样一来，南朝鲜的经济便完全从属于日本，同时日本经济如果不使南朝鲜经济从属于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是说，南朝鲜成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线。

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同南朝鲜的朴正熙政

---

<sup>①</sup>和<sup>②</sup> 保税地区：即一个国家在指定的地区，在一定期间内，对进口的商品暂不征关税的地区。自由港则是限定一定地区，对通过该地区的外国货物不征关税，因而也是一种保税地区。——译者

权这样一个买办法西斯政权紧密勾结起来。对日本统治阶级来说，千方百计地支持朴政权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永远阻碍南北朝鲜的民主统一，镇压南朝鲜人民的革命运动，一有机会就唆使朴政权北进，让它统治整个朝鲜，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这也是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对朝鲜的政策。美国企图将其执行朝鲜政策的重负，尽可能让日本多分担一些，日本政府又高兴地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而朴政权也只有以美、日两帝国主义为靠山，才能维持其法西斯统治。美、日、朴之间的这种一致是1965年缔结《日韩条约》以及此后日美朴关系的基础。从这点出发，在军事方面，日本便把假定在美军的指挥下对朝鲜发动反革命的侵略战争这一点作为军备的依据。

前面谈到的《三矢作战计划》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三矢作战计划》规定，在军事上日军是以美军的后方支援为主要任务的。但自1964年3月起，在日美联合制定的1964到1965年度的实战计划《飞龙(Flying Dragon)作战计划》里面，日本军的任务进一步扩大了，即在同朝鲜和中国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将置于美国太平洋方面空军最高司令的指挥下，与驻日美第五空军联合作战。陆军将根据“联合国军”的要求，进驻南北朝鲜和中国。这个计划1965年10月在众议院“日韩特别委员会”上被社会党议员揭露出来。

接着《周刊现代》杂志1966年9月29日号，揭露了美国远东方面的陆海空军参谋和情报部工作人员，在日本联合幕僚会议的协助下，从1965年9月开始制定了1966年度作战计划，即《奔牛(Bull Run)作战计划》。据说这个作战计划是以前的《飞龙作战计划》的延长，已经确认了的日美两军义务要继续下去。

这个作战计划是假定朝鲜发生战争，美军进入临战体制，同时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合作，日本政府接受美国的要求。计划规定进入战争状态以后，日美最高司令部共同协商日后的作战，但指

挥权在美国方面；日本的海空两军在被指定的空域和水域保护自日本出击的美军轰炸机；美军和自卫队共同担负自日本本土向朝鲜、冲绳和台湾的军事运输。在作战的初期阶段，日本陆上自卫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三集结在对马海峡面向朝鲜的海岸线上，五分之一向东京周围和北海道展开。在美方认为自卫队有必要参加对朝鲜和中国本土的进攻时，将会得到日方的同意。作战成功后，希望自卫队作为联合国警察军参加对占领地区的占领。

“飞龙作战计划”与“奔牛作战计划”是以美军为主制定的，但它们与自卫队的“三矢作战计划”有明显的联系。总之，自卫队和美军把同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计划，逐步地具体化了。在这些作战计划中，自卫队主要承担美军的后方支援和本土防御，这也是以进攻作战为目的的基地防御，而不是对侵略日本国的“非法的侵略者”进行的正当防御。

此后，还没有揭露出诸如此类的作战计划，但恐怕会更加周密、更加具体化了。

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除派军队外，在其它一切方面都积极地协助了美国侵略越南、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四条，政府把这种合作说成是理所当然的。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在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应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协商”（《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2页）。政府在审议新“安全条约”的国会上，言明这一条款的“远东”范围“不包括越南”。可是当民社党议员1965年2月12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问美国侵越战争适用第四条的根据在哪里的时候，椎名外相回答说，说不包括越南，这是原则上讲的。即使原则上讲不包括在第四条的远东范围，可是当发生危及远东和平与安全的事件的时候，美军的行动范围是不受限制的。如果照这样推论下去，美军在亚洲任何地方

发动战争,美国都可以说这威胁了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就把日本当成作战基地,日本就要对它给以协助。日本统治者在法律上可以信口雌黄,总之只要他们决心想协助美军进行战争,就会那样作的。

1965年12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指出日本的飞机公司修理参加越战的美军飞机这种事实,并批评说这是非法的。对此,佐藤首相回答说,这是私人企业与美军直接签订的合同,政府不介入。

日本政府和资本家们如此诡辩,全面协助美军的侵越战争。假如没有日本的合作,美国进行那次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日本垄断资本协助这次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美国。日本垄断资本在这次战争当中直接间接地赚了数十亿美元。

佐藤内阁竭力加强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并且全力以赴地与美国共同建立和巩固美国侵越战争的后方体制。1966年4月,参加了第一次开发东南亚部长会议(之后每年定期召开);同年6月参加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部长协商会议(之后每年定期召开);同年12月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大会决定由日本出任总裁。佐藤首相还于1967年6月到7月访问了南朝鲜,在汉城与朴总统、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副总统严家淦达成加强日、美、蒋、朴合作体制的协议。接着他在9月访问台湾,会见了蒋介石,10月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其最后日程是在西贡同越南傀儡政权会谈,誓对侵越战争进行合作。

历经这一系列活动之后,同年11月,佐藤访美,与约翰逊总统会谈,发表了包括以下条款的共同声明。

(1) 日本加强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为此,日美将进一步紧密合作;

(2) 为了使亚洲各国不受来自“中共”威胁的影响,日美要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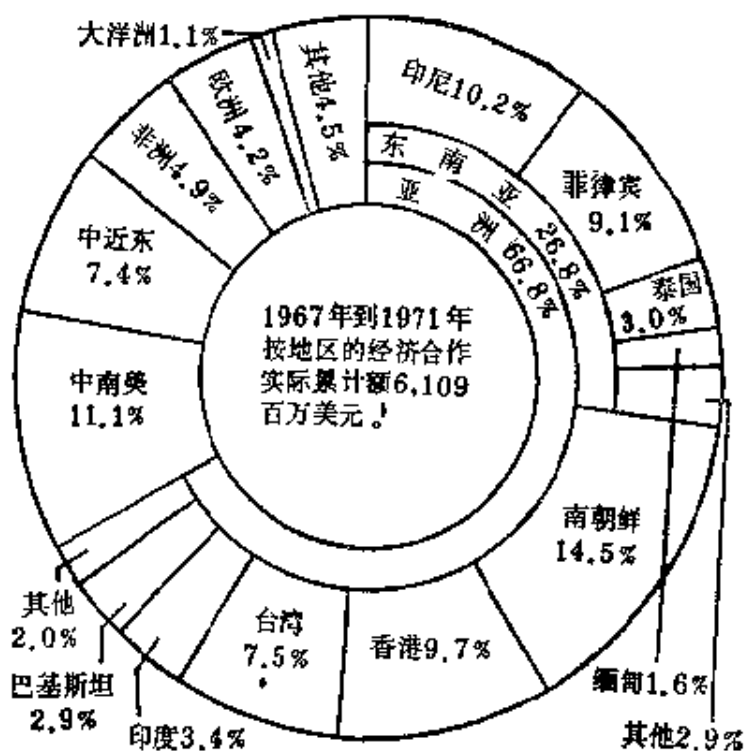


同合作(日美企图共同封锁中国);

(3) 日本“准备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也就是说,日本将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其他称霸亚洲的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以增强日本本身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下省略)。

如果将这个共同声明与十年前佐藤的亲哥哥岸信介首相访美,要求美国对以日本为主“开发”东南亚提供资金合作而遭到拒绝的情景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地位提高的情形。它的基础就在于日本资本主义在这十年当中有了飞跃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为了今后的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迫切需要借“开发”之名,掠夺东南亚的资源,而且已经拥有这方面所需的资本输出能力;从“二次防”到“三次防”期间,军备年年都有很大的扩充。

(图2) 日本双边“经济合作”的地区分布  
(1967年到1971年累计)



资料来源:通产省编:《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各年版。

通过前面列举的从1965年到1974年的历年国际收支的统计(本章表3),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发展的一斑。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名,从1961年到1973年实际资本输出的演变情况,请参阅(表8)。(图2)表明日本自1967年到1971年双边“经济合作”的实际累计额按地区或国别的份额情况。1972年以后的情况,一看通产省编《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的1973年以后的各年版就清楚了。这里不再引用。

今天,过于膨胀了的日本垄断资本,为了寻找消化这种巨大生产力(为战前大日本帝国最高期的十倍以上)的商品出口市场,跑遍全世界。其中,美国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没有这个市场,日本资本主义就活不下去。其次,南朝鲜和东南亚市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国内,重化学工业所需的能源和原料、材料极端贫乏,因此,日本垄断资本为了寻求这些资源,不得不拚命向东南亚、中近东、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输出资本,以便掠夺那里的资源。他们尤其重视朝鲜和台湾。这是因为在日本国内,重化学工业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所谓公害),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怨府。于是垄断资本便企图在他们认为居民的抵抗较小的第三世界寻求重化学工业的建设场所。南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邦,拥有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素质好的丰富劳动力,而且有美国的傀儡政权。因此,南朝鲜和在美国的庇护下为蒋介石一伙所非法盘踞的台湾,对日本垄断资本格外具有魅力。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渴望事实上重新控制曾经是大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这种冲动。

然而,台湾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国必将解放台湾。朝鲜民族是一个具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而不懈斗争的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北方,社会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表 8) 日本历年经济合作实际金额的演变

(从 1961 年到 1973 年)

(以净支付额为基准,单位:百万美元)

项 目	历 年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一、政府开发援助		106.9	86.8	140.3	115.9	243.8	285.3	385.3
1. 两国间的赠与 赔偿 无偿资金合作 技术合作		67.8	74.6	76.7	68.7	82.2	104.7	138.4
2. 政府贷款 直接贷款 再贷款 清理信贷		65.1	66.8	62.1	57.8	62.8	55.6	81.7
3. 对国际机构的赠 与、出资等		0.3	4.2	10.1	5.1	13.4	41.6	45.7
		2.4	3.6	4.5	5.8	6.0	7.6	11.0
		27.7	5.0	51.5	37.5	144.1	130.0	202.2
		26.8	12.5	60.3	49.1	83.2	114.8	161.9
		—	—	—	—	31.7	29.9	41.2
		0.9	△7.5	△8.8	△11.6	29.2	△14.7	△0.9
		11.4	7.2	12.1	9.7	17.5	50.6	44.7
二、其他政府资金合作								
4. 一年以上的出口 信贷								
5. 直接投资金融								
6. 对国际机构的贷 款等								
政府资金合作(一加二)		106.9	86.8	140.3	115.9	243.8	285.3	385.3
三、私人资本合作		274.5	199.4	127.3	175.3	242.1	339.8	412.2
7. 一年以上的出口 信贷		130.7	130.4	50.6	135.7	154.7	243.1	327.7
8. 直接投资		98.4	68.4	76.7	39.3	87.4	97.1	84.6
9. 对国际机构的贷 款等		△4.6	0.7	—	0.3	—	△0.4	△0.1
10. 私人非营利团体 的赠与		—	—	—	—	—	—	—
合计(一加二加三)		381.4	286.2	267.6	291.2	485.9	625.1	797.5
经济合作总额 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率(%)	日 本	*0.71	0.49	0.40	0.36	0.55	0.62	0.67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95	0.80	0.76	0.79	0.77	0.71	0.74

续 表

项 目		历 年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政府开发援助 额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20	0.15	0.20	0.15	0.28	0.28	0.32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员 国平均	0.53	0.52	0.51	0.49	0.44	0.41	0.42
国民生产总值 (GNP, 亿美元)		531.3	588.9	679.6	801.1	883.1	1,015.5	1,195.5
项 目		历 年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一、政府开发援助		356.2	435.6	458.0	510.7	611.1	1,011.0	
1. 两国间的赠与 赔 偿		117.0	123.4	121.2	125.4	170.6	220.1	
无偿资金合作		46.4	41.3	18.2	21.8	34.6	66.9	
技术合作		56.9	63.2	81.4	75.9	100.4	96.0	
2. 政府贷款		13.7	19.0	21.6	27.7	35.6	57.2	
直接贷款		190.5	216.2	250.3	306.7			
浮 贷 款		178.1	221.4	236.4	302.9	307.2	545.1	
清理信贷		3.9	△ 10.0	△ 7.7	△ 7.2			
3. 对国际机构的 赠与、出资等		8.5	4.8	21.6	11.0			
48.8		96.0	86.5	78.7	133.3	245.8		
二、其他政府资金合作			375.8	693.6	651.1	856.4	1,178.9	
4. 一年以上的出 口信贷			309.9	349.5	271.7	266.3	254.0	
5. 直接投资金融			55.9	143.1	136.3	264.7	569.8	
6. 对国际机构的 贷款等			10.0	201.0	243.1	325.4	355.1	
政府资金合作(一加二)		356.2	811.4	1,151.6	1,161.8	1,467.5	2,189.9	
三、私人资本合作		693.1	451.7	672.3	978.7	1,257.9	3,654.3	
7. 一年以上的出 口信贷		570.5	299.6	386.9	494.0	190.6	440.1	
8. 直 接 投 资		122.6	144.1	265.0	356.2	844.3	3,072.1	
9. 对国际机构的 贷款等		—	8.0	17.5	125.4	217.4	135.3	
10. 私人非营利团 体的赠与		—	—	2.9	3.1	5.6	6.8	
合计(一加二加三)		1,049.3	1,263.1	1,823.9	2,140.5	2,725.4	5,844.2	

续 表

项 目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经济合作总额 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74	0.76	0.93	0.96	0.93	1.44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80	0.75	0.80	0.83		
政府开发援助 额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25	0.26	0.23	0.23	0.21	0.25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38	0.36	0.34	0.35		
国民生产总值 (GNP, 亿美元)		1,418.8	1,658.9	1,961.6	2,253.0	2,944.6	4,069.6

资料来源：通产省：《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历年版。

注：1. — 号表示没有实际数；△号表示收回超过付出；

2. “私人资本合作”中的“非营利团体的赠与”，从1970年起决定列入开发援助委员会统计项目中；

3. 1970年以前，按1美元等于360日元，1971年按1美元等于350.83日元换算；

4. “其他政府资金合作”是开发援助委员会从1969年起新引进的统计项目，1968年以前的统计数字包括在“私人资本合作”项目里。

\* 战前为 3.3%

民共和国在日益发展。而且南北方的朝鲜民族都在谋求祖国的统一。因此，日本的统治者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强烈的敌意。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对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本来就是极大的鼓舞。唯其如此，日本统治者才非常害怕和敌视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朝鲜。这种敌视由于上述情况倍加强烈。佐藤首相在政治上是代表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立场的。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方面投入的兵力和财力越多，它所遭受的失败和打击就会越大。因此196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于同年7月历访了东南亚各国，途中在关岛发表了“尼克松主义”，其实际内容是：把侵略和干涉亚洲的政策的重担，更多地让亚洲的美国傀儡政权和日本来承担。

佐藤首相为了建立与美国这个新的亚洲政策相适应的日美关

系，1969年11月访美，与尼克松进行会谈。21日发表的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申明延长并继续坚持将于1970年到期的《日美安全条约》；关于两国的远东政策和安全条约的实施，两国政府之间互相保持密切联系。佐藤首相的一段话尤其重要，他说：“高度评价联合国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作的努力，韩国的安全对日本本身的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他把南朝鲜的安全看成是对日本安全不可缺少的，因此为了维护“韩国的安全”，日本就要对美军统治南朝鲜和敌视、侵略北朝鲜的政策进行全面合作，并比过去承受了更多的负担。佐藤首相在这个联合声明中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日本正在探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所能起到的作用”。在这里露骨地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当前的矛头是指向朝鲜、中国和越南的。而且对于朝鲜，如前所述，日美两国竟然联合制定了进攻作战计划，对美国的侵越战争，实际上正在进行全面合作；同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在进行密切合作。

在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天11月21日，在台北，“日华”协力委员会（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最反动的政治家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同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建立的团体）的第十四次大会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宣称：日本和蒋介石集团（僭称“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迅速改变其国际姿态，为了维护亚洲的自由与安全，将转为采取积极承担政治责任的态度”，“为了完成中华民国政府收复本土的最大课题，亚洲各国应一致努力创造一种使本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的环境”。

## 结 束 语

日本军国主义这样露骨地表明其对朝鲜和中国的积极进攻方

针，当然要受到朝鲜和中国方面的严厉反击。1970年4月7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强烈谴责”，“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公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直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效劳，积极参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战争阴谋，并且妄想把中国人民的神圣领土台湾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申明：“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制止和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公报进一步说：中朝“双方认为，当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反美斗争的一部分，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双方表示决心，在进行反美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斗争。”（1970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70年4月9日第1版）

中朝联合公报使广大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提高了警惕。于是日本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马上跳出来叫嚷：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还没有完成。关于这个问题，1970年7月，他们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说：

“自卫队在战斗力方面已经成为居世界第十位的军队，这本身就是明显的军国主义复活。……我们丝毫不应把这样一个军队已经复活的事实，同它同时又是军国主义一定本质性的复活混淆起来。……而且这个军队根据安全条约已成为美国侵略亚洲战略的补充部队，这一点也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的威胁。”

光看这一点，他们也象是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可是，上述报告紧接上文又说：

“不过，当我们议论军国主义是否已经全面复活的时候，不能抛开是否建成能够公开进行对外侵略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问

题。蹂躏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力的规定而产生的军队——自卫队，它今天仍然没有建立起可以公然施行征兵制和向海外派兵的体制。今后容不容许它建立起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体制，这不仅对日本的前进道路而且对亚洲的和平，都确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日本共产党如此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完成复活，这就使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事实模糊起来。

他们还摆出一副象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人民的现实威胁的样子，但那只是说因日本军队是美帝国主义的补充性的军队才给亚洲造成了威胁。这样就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经济侵略的、政治和军事的表现这样一种事实。他们还把日本没有派出军队参加美帝侵略越南的战争，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完成复活的证据。这也是企图尽可能缩小日本统治阶级无条件地、全面地协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一事实的。

日本共产党竟然用日本宪法上规定不能向海外派兵、不能实行征兵制来作为军国主义没有完成复活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至上主义。尽管宪法上规定禁止重新武装，日本反动派不是已经拥有侵略性的军队了吗？对反动派来说，宪法上的规定对他们搞军国主义几乎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作好征兵制的准备但还没有实行，并不是为了维护宪法，只是因为他们还没能造成一种把青年征去当兵也能够放心的政治思想状况。关于向海外派兵，1969年4月以来，政府再三说明“以自卫为目的”向海外派兵宪法上是允许的。这一点前边已经讲过。这里想就政府类似的发言再补充一个例子。1970年3月3日，内阁法制局长官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为了保护在南朝鲜的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了保护日本的权益，把自卫队派往南朝鲜，



宪法上是允许的。”(《东京新闻》)

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后,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得到更快的发展。日本对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商品出口和资本输出,按几何级数与年俱增。而且正如过去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扩张的方式所看到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民族经济和共存共荣,而是破坏民族经济,无孔不入地剥削朝鲜工人,掠夺朝鲜的资源。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日本资本很快把一个地区的山林掠夺了个精光。在新加坡,不管当地多么小的事业,日本资本都进行掠夺,并企图压倒新加坡的中小资本。泰国人批评说:日本人乘日本的飞机来到泰国,坐上日本的汽车,到日本资本家开设的旅馆住下,向泰国工业投资,残酷地剥削泰国工人而回国;日本是经济动物,是赚钱的野兽。日本资本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越厉害,遭受侵略的民族的抵抗就必然越激烈。为了压制这种抵抗,日本政府就支持当地的反动卖国政府,让它对本国人民采取法西斯镇压政策。这种典型例子同在经济侵略方面的例子一样,从南朝鲜的朴正熙政府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南朝鲜,1965年签订“日韩条约”以前,人民群众反对卖国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就同反对日本重新侵略南朝鲜的斗争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进入七十年代,朴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在日本政府和资本家的援助下,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人民的反法西斯和反日帝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对朴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就连一直扶植它的美帝国主义对它也束手无策。可是日本政府和资本家却经常地、一贯地支持朴政权,每年都给它巨额贷款。

南朝鲜政治家金大中,在1971年总统选举中与朴正熙对抗。1973年8月,发生了在东京的旅馆被南朝鲜情报部(KCIA)拐骗的事件。这时连美国政府都对金大中的生命安全表示重大关心,谴责朴政权,但日本政府竟对蹂躏日本国家主权的这一事件,不

仅没有对朴提出抗议，反而“信任”南朝鲜政府发表的所谓它与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胡说八道的声明。日本警察发现的指纹证实南朝鲜驻东京大使馆馆员是拐骗金大中的犯人的同谋者。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向南朝鲜政府提出抗议。不仅如此，反而在同年12月召开第七次日本南朝鲜定期部长会议，决定在1974年度向南朝鲜提供四千五百四十万美元的贷款。

发生金大中事件的当初，日本政府装出一付有可能中断日本同南朝鲜经济合作的样子。然而我认为资本家是不会那样改变政策的，因为如果那样作，日本迄今对南朝鲜的投资就会前功尽弃，日本就不能控制南朝鲜经济了，事实就是如此。

1974年8月15日，在汉城发生了一起侨居日本的南朝鲜的一个青年狙击朴总统而失败的事件。从各种证据来看，这一事件很明显是南朝鲜情报部导演的一出戏。可是日本政府并不要求南朝鲜方面查明事件真相，却派缔结“日韩条约”当时的外相椎名悦三郎(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作为首相特使前赴南朝鲜，就侨居日本的朝鲜人发动这一事件表示遗憾，并约定加强镇压住日南朝鲜人的反朴运动。

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对南朝鲜的经济控制越厉害，它就越同南朝鲜卖国法西斯政权结成一体。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好象日本政府屈服于朴政权的无理主张，实际上正因为日本把朴政权看作是它的代理人，所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拥护它。拥护朴政权，也就是日本要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力量扩展到南朝鲜。因此，一旦南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打倒卖国法西斯政权，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南朝鲜进行反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势必要以某种形式贸然进行军事干涉。

南朝鲜的情况是复杂的。还要看美国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对南朝鲜的影响也很大。因此，朴政权在被人民用革命推

翻以前,也许由美、日两帝国主义另换一个,也许朴政权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由美、日帝国主义事后加以追认。不管发生哪一种情况,日本的统治者为了保护其在南朝鲜的帝国主义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毫无顾忌地进行军事干涉。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 第二部分

### 第一篇 鸠山内阁论\*

#### 第一节 两种力量

1954年12月，连续执政六年零两个月、从属于美国、恣意独裁的吉田内阁垮台了，组成了鸠山民主党内阁。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

吉田内阁是在两种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下被打倒的。一种是为实现独立与和平的日本而斗争的国民的力量，它得到国际的和平力量与独立力量的发展的支援。另一种力量，其反动性和军国主义野心并不亚于吉田等人，而且同吉田内阁一样是美国的附庸，假如先从结论来说，它是一股已经复兴起来并企图向帝国主义独立的道路前进的垄断资产阶级势力。这股势力纠集了反对吉田飞扬跋扈与独裁的人、看到吉田势力衰退而企图另找靠山的人、以及其他保守派内部所有反对吉田派的人。

国民对吉田内阁过分地屈从于美国和推行反民主的暴政非常愤怒，从而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不久导致了流血的“五一节”。有人批判这次“五一节事件”，说是上了敌人挑拨圈套而采取的极

\* “鸠山内阁论”是登载在《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的一篇文章，离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文章发表前两年，1954年底组成的鸠山内阁，不论它的组成方式还是它的政策，都与过去占领下的历届内阁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这里我发现日本垄断资本的恢复已经超过战前，正在重新迅速成长，它力图实现帝国主义的独立。当时日本还处于美帝国主义的半占领下，看到占领下的政府有帝国主义独立的意图，这是一种相当大胆的看法。即使今天看来，我认为也没有错，所以才敢将这篇旧的论文重新收编进来。——作者

左的冒险行动。纵令这是领导者的错误,上了敌人的圈套,然而数万群众在没有出口的广场上,同数千名用手枪和催泪瓦斯进攻的警察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也非同小可。

此后不久,在号称占议会绝对多数的自由党内部,发生了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所谓“民同派”的分裂。他们对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寄予深切关心,要求同中国贸易,批判吉田内阁向美一边倒。他们还反对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论,主张公然重整军备。鸠山内阁现行政策的最初雏型就是这时确立的。

在保守政党之间,也互相揭露对方是向美一边倒的反民族党派。1953年1月,在众议院通过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时,在野党各派提出的不信任的主要理由是说吉田内阁“没有建设独立日本的抱负”。吉田一伙则反唇相讥,说在野党才是仰赖美国的支持,“严重背弃独立日本的民主政治的”。

从1953年到1954年,以反对内滩基地斗争、反对比基尼岛氢弹试验的怒火为开端,国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高涨起来。另一方面,自由党出现了造船贪污案件,法务大臣动用指挥权阻止逮捕收贿的首犯佐藤干事长,这件事反倒使民心完全背离了吉田内阁,把它赶入穷途。

在国际方面,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归国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十字会的和平、友好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得到解决,三万多日本人从新中国回到祖国,传播了人民中国的明朗、和平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形象。接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越南人民独立战争的胜利,中、苏、美、英、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和平解决远东问题会议的成功,周恩来·尼赫鲁和平五项原则声明的发表,亚非民族解放斗争暴风雨般的发展,这些对日本国民该是多大的鼓舞,给日本国民带来多大的希望啊!

国民的这种力量越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就越严重。在野党千方百计地想要取代已经完全失掉人心的吉田内阁。1954年11月，在野党联合提出的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眼看就要通过议会，于是吉田企图解散议会。可是，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所有大资产阶级团体，即所谓“财界”，一致要求吉田辞职。垄断资本家们第一，担心一旦吉田蛮横地解散国会，自由党不消说，连资产阶级第二政党民主党（鸠山任该党总裁）也要在选举中失败，那末左右两派社会党会有很大发展。因此，他们希望让它平平稳稳地将政权移交给民主党。第二，当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恢复，不仅已经没有必要讨好吉田，而且希望偷偷地或者公开地采取不同于吉田内阁的积极重整军备的政策，稍微修正向美一边倒的政策，特别是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这个问题将在第四节详述）。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内定为吉田的接班人绪方竹虎表示反对解散国会，要求内阁总辞职，最后，傲慢的吉田也就不得不辞职了。

于是组成了鸠山民主党内阁。

鸠山首相鉴于民众对吉田“一人”独裁、官僚秘密主义和封建老爷作风，非常厌烦，便摆出一副完全相反的姿态。取消大臣官邸，废除了总理大臣汽车警笛和大臣警卫，说话也跟老百姓一样直爽，等等，借此来收买人心。

非常明显，鸠山内阁仅仅靠这样一些小动作来收买人心，是维持不下去的。它必须满足打倒吉田内阁的民众的要求。它企图通过高喊同中苏调整邦交、促进贸易来满足这种要求。另外，鸠山内阁还必须满足打倒吉田内阁的另一个势力，即其真正的主人“财界”的要求。为此，在人事方面，把坚持紧缩政策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安排在大藏大臣职位上，压制通货膨胀派的石桥湛山（鸠山的忠实盟友）猎取藏相交椅的强烈要求，让他当上通产大臣。

在政策方面,除了坚持紧缩政策外,还采取了积极推进重整军备的政策以及保证重整军备的产业政策。

1955年2月27日,举行了鸠山内阁组成时所约定的大选。面对选举战,政府和民主党大肆宣传同中苏调整邦交,扩大贸易,使社会党失去攻击的借口。在重整军备方面,则宣传建立“与国力相适应的自主防御体制,以便逐渐使美军撤退成为可能”,“减少防卫分担费,用这笔钱建筑国民住宅”。避免使用“重整军备”一语;征兵制一事,只字不提;说不修改宪法,即一味大肆宣扬改变向美一边倒,讨好国民;和吉田一样,企图掩饰重整军备。他们没有忘记在上次大选时,民主党的前身改进党高唱重整军备和修改宪法,遭到惨败的教训。

选举结果:民主党当选一百八十五席,成为第一大党;自由党由一百八十席一举降到一百一十二席。社会党,尤其是一直坚持拥护和平宪法和反对重整军备的左派社会党有很大跃进,由七十四席增为八十九席,右派社会党也由六十一席增为六十七席。此外加上劳农党四席,共产党两席,反对修改宪法派合计为一百六十二席,取得了议员定额四百六十六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能够在议会上阻止修改宪法。

第二届鸠山内阁于3月18日组成。一万田藏相、石桥通产相和河野一郎农相等是掌管经济方面的内阁大臣,重光外相留任,防卫厅长官改为鸠山的亲信杉原荒太。

## 第二节 所谓“自主的防卫体制”

鸠山内阁许下的诺言究竟实现了多少呢?所谓减税和建设住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正实行,因此,现在也就不去管它,而把问题集中到重整军备和与中苏调整邦交上。

民主党的候选人，连党的口号都强调自主的防御体制。不消说，纵令是“自主的”，军备也违反宪法。鸠山处于在野党的时候，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因此主张尽快修改宪法，可是取得政权以后，则又花言巧语地说，自卫的军备并不违反宪法，对此现在也不必去重复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鸠山内阁企图拥有“自主的”军备，它同吉田内阁的“自卫力量渐增”有没有区别呢？据我看是有微妙的差别的。鸠山内阁想尽快实行征兵制。这一点只要一看他为此而急于修改宪法就清楚了。虽然吉田内阁也作了不久要施行征兵制的准备，但没有把它当成当务之急的课题。吉田在回答在野党质询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鄙弃的口吻回答说：“不实行重整军备。”这是因为尽管他想实行征兵制，希望拥有现役和预备役，马上就能动员一百万人甚至二百万人，希望建立拥有第一流装备的军队，可是他认为现在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国民也还没有充分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训练，因此为时尚早。

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方式有三个目的：第一，为将来通过征兵正式实行重整军备建立骨干队伍；第二，建立镇压国内革命运动的兵力；第三，以自卫队为诱饵，换句话说，就是以日本年轻人的生命来换取由美国加强给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共同安全法》之类的“援助”。因此，尽管在吉田时代重整军备的奋斗目标是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但并没有努力（或不能）推进三军的均衡发展。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日本将陆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对此，日本竭力设法讨价还价，使其保持在十九万人的限度以内，但对美国没有提出要求的空军的增强也不热心。不消说，地面部队畸型发展的军队只能是美国的雇佣兵。美国只要求日本提供“人的资源”，不愿让日本拥有空军和海军。

鸠山内阁重整军备的目的，眼下与吉田的那三点是相同的。其



中上述第三点已不象吉田时代那样重要了。而代之以新的第四个目的，即它确想拥有“自主的”军备。他希望尽快施行征兵制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因为“自主的军备”需要庞大的资金，要是还象现在这样士兵拿工资，在财政上无论如何也是负担不起的。鸠山内阁组成以后，与吉田时代不同，在重整军备上热中于三军均衡发展，力求实现喷气机国产化，甚至推进了火箭武器的研究。1955年3月决定的六年防卫计划，预定最终年度陆军达十八万人、海军舰艇达十二万三千吨、空军飞机达一千四百架。说是这一目标实现时，就要求美军地面部队全部撤退。据说民主党内有人要求沿袭旧改进党1953年6月制定的陆军十二万人、海军十五万吨、空军一千五百架的方案，但如果要求美国撤退地面部队，陆军最低要有十八万人，否则美国就不同意，无奈决定为十八万人（《朝日新闻》1955年3月12日）。即便是鸠山内阁的“自主的”重整军备，而这样的日本陆军也只能是美国陆军的代用品；国产喷气式飞机，其实也不过是把从美国买来的部件加以装配而已。本来，受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束缚的日本，是不可能拥有自主的军备的（请参阅《文艺春秋》1956年5月号文章：《没有比“自来”的自卫队代价更高的军队》）。不过，鸠山内阁确实希望拥有独立自主的军事工业体系和靠这种军事工业体系装备起独立的陆海空三军，并为此而付出了努力。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和鸠山内阁的重整军备，在其向往和努力的强烈程度上是不同的。

鸠山内阁要求美国减少日本每年必须向美国交纳的“防卫分担费”，结果决定每年按日方防卫厅费增加额的半数减交防卫分担费（用减交的分担费来建设住宅，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只能促进和加强重整军备。尽管同样是军费，却把全部交纳给美国的钱，变成日本能够自由使用的钱，仅就这一点来说，也是为“自主的”重整军备所作努力的一种表现。

鸠山内阁如果真想保持“自主的”防御军备，那末首先它就应该拒绝美军把“诚实的约翰”导弹运进日本，拒绝美军关于大规模扩大载原子弹飞机起落用的机场和为此而征用国民的土地等要求，积极主动地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美军基地，至少不应该采取镇压国民反对基地斗争的方针。这些原子弹氢弹战争基地是进攻用的，决不是“防御用的”。而且保持这些基地不仅仅是为了进攻苏联和中国，也是为了威胁和镇压日本人民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假如原子战争基地、大小空军、海军基地压制着整个日本，那末即使日本建成了十八万人的陆军，美国地面部队全部撤退，日本军队也不可能是真正“自主的”。今天的日本，“重整军备”和“自主性”是不能结合起来的。

鸠山等人不是减少和缩小而是增加和扩大美军基地，并为此而强制征用国民的土地和住房；正象扩大砂川基地时所看到的，造成日本警察为美军而无动于衷地枪杀日本人民的民族悲剧。这样一来，所谓“自主的”重整军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是从属于美国，伙同美军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日本独自の帝国主义军备。就是说，鸠山内阁企图从吉田时代的殖民地土著军队向从属帝国主义军队飞跃而迈出了第一步。也就是说，鸠山一派把国民要求祖国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歪曲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重光外相于1955年8月在华盛顿同美国协商“防御”问题时，甚至作出了向海外派兵的保证。鸠山首相1956年在国会答辩时“失言”说，如果为了自卫，可以“侵略”海外敌人的基地（2月29日）。当有人问道“你不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吗？”的时候，他竟很少见地大动肝火，拒绝回答（3月8日），大喊大叫地说：自卫权优先于宪法（3月10日）。这一切都不过是为复活帝国主义铺平道路罢了。

### 第三节 日苏谈判与松鼠外交

一般在谈到鸠山内阁的两面性的时候，是说鸠山内阁一面举行日苏会谈，另一面实行从属于美国的重整军备。据我看来，这两方面在鸠山派来说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可能应该看成一部分有矛盾吧。这是因为鸠山内阁的重整军备，既然是在从属于美国的情况下谋求帝国主义独立，那末他们进行日苏会谈也还是谋求帝国主义国家的独立的。最热中于正式重整军备的鸠山、河野一郎和杉原荒太等一派，又是最热中于日苏会谈的一派，这并不奇怪。在争取独立自主这一点上，两方面是不矛盾的，可是重整军备不能算是真正独立自主，因此不是防御性的，而是侵略性的，这同恢复日苏邦交、和平共处是矛盾的。

鸠山等人希望恢复日苏邦交，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认为仅仅是为应付选举的一种姿态。前面已经说过，从他们还是旧自由党民同派的时候起，就热中于日苏和日中贸易。1954年12月10日，第一次组阁后举行初次记者招待会时，鸠山首相讲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最可怕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美苏战争。为了避免这次战争，最好的办法是彼此大力开展贸易。我认为自由主义各国，以苏联、中共为敌，不同他们交往和进行贸易，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相互搞好关系，努力维持和平，大力开展贸易为好。美国也会理解这个方针，不会招来误解。”

如果完全听信这些话，那是相当漂亮的和平共处论。鸠山又在12月15日的无线电广播中大胆地说：“蒋介石政权也好，毛泽东政权也好，都是杰出的独立国政权，日本同双方大力发展贸易交往关系也是当然的。”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来说，说这些话还是第一次。

为了响应鸠山的这种态度，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如果日本有意，苏联准备就日苏关系正常化，研究实际措施。接着在1955年1月，苏联驻日代表部道穆尼茨基秘密会见鸠山，提交了本国政府提议开始日苏会谈的文件。鸠山没有把同道穆尼茨基的接触马上告知重光外相，与心腹杉原等人商谈，决定同意谈判，并且是在把这件事委婉地透露给新闻记者以后才告诉重光的。也许因为已经知道重光不同意日苏谈判，所以暂时对他保守了秘密。这证明鸠山一派是认真想搞日苏谈判的。

批准前去中国和苏联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和商谈遣返日本人归国及贸易关系的人士，与前内阁时代相比，大幅度增加了。准许中国的贸易代表入境，也可以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日中和日苏的实际贸易额尽管还是微不足道的（鸠山政府不断受到美国的压制，因此，好不容易签订了的民间贸易协定，还限制实行），但门缝虽小却在逐渐扩大。

恢复日苏邦交谈判，日方要求归还南千岛和齿舞、色丹诸岛，苏联不同意；陷入无限期休会，政府和执政党内有人主张就此打住。可是鸠山一派仍想找机会重开日苏谈判。政府派遣河野农相前去谈判渔业问题，目的大概也是为了创造恢复邦交的机会。因此，我估计可能是重光外相故意没有把必要的新情报告诉河野全权代表，发出了模棱两可的训令；这样恐怕连渔业谈判也不能圆满达成协议；但绝对不要使谈判决裂，部分采用暂定办法处理，要为以后谈判留有余地。

那末，为什么鸠山一派热衷于恢复日苏邦交了呢？虽然纯属推测，但我认为恢复日苏邦交的直接目的，在经济上是为了稳定北洋渔业，为进口库页岛和西伯利亚的木材和石油开辟道路，有利于减少日本资本主义对美国的依赖；在政治上是为了给日本参加联合国扫清障碍（以前苏联一直反对），加强日本的独立性。与此

同时，恢复日苏邦交实际上可能想建立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廊。日本在吉田政府时期在条约上写明承认台湾政府是唯一的正统的中国政府，今天它要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建立日苏正常邦交的迂回道路，看来是远，实际上是最近的道路。鸠山一派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尽管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如果希望独立，就必须同这个邻国建立正确的关系。其实，这年2月22日，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会见记者时就说：“中共是离日本最近的巨大市场，解决中共问题对日本经济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他们调整日中、日苏邦交的真正原因。

然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顾虑的。一经建立邦交，日本人民对苏联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人民的幸福生活知道得越多，就会越羡慕，无疑会产生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值得他们担心的。前面引用的经团联会长石坂的谈话中也说：“在我国尚未恢复应有的国民精神的情况下，同苏联恢复邦交不危险吗？”这也许是他们尚不能摆脱美国的压迫，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为了眼前也顾不了别的。在重整军备方面，他们利用国民正当的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来建立从属帝国主义军队；同中苏恢复邦交和发展贸易的问题，本来是他们从帝国主义独立的需要出发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行动，但它又不能不使他们担心会增强人民的国际主义。

现在在全世界最担心这一点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他们在日本的代理人是外务大臣和外务省，是旧自由党的吉田派。重光外相把他在首次组阁后不久的一次谈话(1954年12月11日)，发表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对国内的；一种是用英文对国外的。在对国内的版本中简单地谈到在同美国协调的基础上，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希望实现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发展日中贸易。与鸠山谈话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共产党国家侵略的威胁之类的谎言一句也没说。可

是用英文发表的谈话与对国内的谈话几乎完全相反。其要点如下：

(一) 最近共产主义国家发动了和平攻势，但仍然难以预测。针对亚洲的现状，采取“凭实力的和平”政策，是最妥当的。因为将来共产主义对不稳定的亚洲的压力，恐怕会愈来愈强大。

(二)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日本列岛的战略重要性，在日本经济力量容许的范围内，做好防卫力量的准备。

(三) 对同中苏的贸易，虽然不能抱很大希望，不过现在的贸易额太小，如有增加的机会是欢迎的（《朝日新闻》12月12日）。

对美国的这种媚态胜过吉田前首相。第二段是说充分认识到日本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而进行扩军，连吉田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1955年8月，重光去华盛顿朝拜的时候，在全美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他引证白宫前面公园里跳跃在树间的一只松鼠说，自己与其作一只金丝笼中扬扬得意的孔雀，“莫如作一只在林间耍懒、贪玩、羞怯的松鼠”。他绘影绘声地描述公园里的松鼠时常从妇女手中得到饵食的情景，然后结束了他的演说：“这也许是因为妇女对这个小小的动物充满了友好的情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眼睛看不到的和平共处的和谐的缘故。……这种情况象征着理想的外交图景。请大家象妇女给松鼠饵食那样，温情地来对待我吧！”

一想到这竟是自己国家的外务大臣的演说，在气愤之前，首先觉得脸上发烧。重光松鼠大臣如此低三下四地献媚，不知从白宫妇女那里领到什么饵食呢。他什么也没领到，反倒只是日本被迫作出“为了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出兵的保证。

重光个人只不过是企图靠追随美国保持其在日本政界的地位的小人物而已。因为这样的人物被安排在副首相、外相的地位，日本才被美国利用“媾和”与“安全保障”两个条约、共同防御援助和

其他“援助”以及美国私人投资等等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起来。连让重光下台都作不到，这就可以看出鸠山外交“自主性”的局限性了。

上述观点不是被鸠山等人的日苏谈判的姿态欺骗了吗？我认为重光、鸠山的二元外交，实际上不过是日本外交史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即“两面外交”(Double play)的伎俩罢了，也就是说，两个人为了欺骗热望和平共处的日本国民，不是分别表演得够精彩的了吗？假如情况如此，国民就应该利用其两面性的一面，迫使鸠山内阁必须在实行和平共处，还是继续实行卖国政策之间进行抉择。这样做是进步政治家的才能，把鸠山定为卖国贼算不了什么本事。鸠山内阁二者择其一，如果明确选定卖国政策，那时鸠山内阁以及类似的内阁，就会被国民大众打倒，使它不能再次重新出现在政界。

#### 第四节 官僚的质变

国内基本政治问题的重整军备(修改宪法、修改公职选举法和实行小选举区制的问题是当前国内政治的决定性问题，这些也都是与重整军备问题交织在一起发生的)方面也好，对外政策方面也好，都共同贯穿着鸠山内阁的两面性，即帝国主义的独立的意向和对美从属性这样两个方面。这种两面性是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恢复并发展到企图独立的阶段，但这种恢复一直依赖、现在仍然不得不依赖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援助”的政治表现。

战败后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被迫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这个问题是不消论证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尽管日本资本主义从属于美国，然而它却已经明显地复活，而且已经发展起来，并超过了战前。

产业活动指数，以1934到1936年为100，战败后的第二年1946年仅为39.2，可是1951年就已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19.4，1955年跃进到186.7。尤其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共事业，1946年就达到109.1，1952年达201.2，已达战前的两倍，1955年为254.7（尽管如此，在国民日常生活方面，电和煤气的供应仍不如战前充裕，尤其是1951年，停电非常严重，这是因为增产的部分被美国占领军以及为其服务的军事工业用掉了）。就工矿业来说，除了纺织和印刷，到1951年全部突破战前水平，尤其是机械工业，达197.1，几乎为战前的两倍。特别是1952年到1955年生产增加的速度，比西德都快，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一位。

这种产业活动的复兴，同时也是大垄断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的飞跃发展，也是以旧四大财阀系统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资本的复兴。

然而这种复兴，首先是通过臭名昭彰的复兴金融金库和后来的开发银行的贷款，由国库对所谓“重点生产”、“集中生产”的基础产业（即财阀系统的垄断企业），有重点地、集中地发给补贴和补助金及其他等等，即都是通过政府的资金援助实现的。而且这些财政投资和贷款大都依靠美国的“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在公开的占领制度情况下，预算、贸易都要受占领军的干涉，实际上是控制。因此，日本的产业和贸易完全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作为占领军的承包执行机关的日本政府官僚，尤其是外务省、大藏省和通产省的大臣和官员对经济界的发言权是极大的。企业的借款远远超过自己的资本，唯其如此，企业受到银行控制。这些银行从属于日本银行、官僚和占领军。

产业复兴的第二个时机是1950年6月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日本产业因为有了这一天，作为“远东工厂”而复兴起来；战争一打起来，日本简直变成了美军的后勤部一样，赚取了巨额“特需”收



人。特需采购受到凶狠的压价，“牺牲血本接受订货”并不新鲜，不过，大企业则是牺牲工人和承包业者，让他们出血而自己赚钱，积累资本。直接或间接严重依赖特需的日本垄断资本，当然不会产生对美国的独立性，也不会动摇官僚统治权。

1953年7月朝鲜停战，特需采购减少，使资本家再度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在这种困难处境之中，大垄断资本已经充分地积累了资本，反倒兼并了弱小企业而膨胀起来。1954年，在吉田内阁末期，萧条非常严重，产业每月的活动指数很快下降（从1954年3月到8月，由一百七十九点三下降到一百六十二点四，从9月开始回升）。我认为这一困难时期是垄断资本摆脱对“特需”的依赖而寻求出路的时期，并且在设备资金等方面是摆脱依赖与美国“援助”相结合的政府资金的转折点。

对日本经济和鸠山内阁来说，幸运的是，从吉田内阁向鸠山内阁过渡起，在国际经济好转的影响下，日本出口突飞猛进地增长。以战前1934年到1936年平均为一百，出口金额指数，1953年为一百三十五点六，1954年平均为一百七十三点三。同年10月增长到二百零六点六，12月增长到二百四十二点六。1955年与1954年相比又增加二点三成。以出口旺盛为杠杆，工矿生产也迅速上升。

大企业有充足的自己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银行资金因而也变得充裕了，能够向日本银行偿还贷款。于是在战后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谓的“金融正常化”。在供给资金方面，尽管财政投资的作用仍然很大，但在1956年度的预算中，实际上是显著减少了。美国附带条件的援助资金，即购买剩余农产品的贷款，也已经不再具有1950年以前那样的外资的威力了。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由从属于美帝国主义逐渐走向独立自主。同时，尽管日本垄断资本正在摆脱从

属美国恢复独立性,但从整体来看,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从属于美国,在经济上还要依赖庞大的美国资本(战败以来的各种“援助”资金、世界银行的贷款、美国贸易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因此,还远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独立,不过,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还会逐渐得到很快的发展。

垄断资本对美国的这种独立性,也只不过是个萌芽,在国内方面,它是万能的统治者。官僚也不再象过去可承受美国占领军赐给的权力、掌握“援助”资金款项时期那样有威力了。吉田内阁在末期已经不能行使独裁首相的威令,他的宠儿池田勇人(大藏官僚出身)在党内的势力也已经减弱,这同他们原来的基础——占领权力执行机关的官僚制开始失去威力有关。

一般认为,在编制本年度预算时,“政党(保守势力联合后的自由民主党)的力量自始至终起很大作用,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经济年报》第90集)。不仅如此,作为行政机构改革的一环,“内阁最大的实力人物”河野农相甚至提出撤销大藏省主计局,在内阁设立“预算局”,企图将预算编制权置于政党控制之下的方案。河野原来是个新闻记者,现在与北洋渔业垄断资本有牵连,在经历上没有当过有力的官僚。他一直在政党出身的鸠山首相之下,成了“第一名有实力人物”。这同在纯外务官僚出身的吉田首相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出身于大藏官僚的池田勇人相对照,就会看出这两届内阁的不同性质。

大藏官僚还不至于软弱无力得连预算编制权也被夺走,河野方案没能实现。但自明治以来,具体提出这样的设想,这还是第一次。

而这个政党是听命于垄断资本家的。在从吉田到鸠山的政权交替中,“财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保守党合并中,财界也施加了强大压力。从今年(1956年)2月22日经团联会长石坂的谈话,<sup>4</sup>

月 26 日在日经联大会上几个人的发言,可以预想到这种情况今后会愈来愈利害。

## 第五节 展望

垄断资本的统治,还明显地表现在鸠山内阁的农业政策,即所谓河野农政上。1955 年 8 月,农相在农林渔业调查会上致辞说:“现在以增产米麦为中心的农业政策,不过是沿袭了军国主义下的农业政策。应该把日本农业同世界农业的动向联系起来考虑,根据这种观点,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农业政策。”(《日本经济年报》,第 90 集)

这个想法的具体化,就是他的废除统制的方针和购买美国的剩余农产品的政策。这是企图在世界农产品过剩、农业危机的情况下,从外国买进廉价大米和小麦,政府停止收购(或者大幅度减少)国产大米和小麦,以便减少财政负担,竭力维持低米价,借此保障低工资的。这无非是一种利用国际农业危机,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无视日本农民的利益甚至包括中农以及少数富农的利益的政策。

这的确是“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农业政策”。因为从前的农业政策是,在考虑垄断资本的利害的同时,要首先考虑地主阶级的利害,也考虑到中农阶层的利害。可是,河野的农业政策只考虑保障低工资等垄断资本的利害和大农业资本家的经营(用廉价进口饲料大量饲养家畜,或者经营不能进口的水果和蔬菜)的利害,而对于主要靠自己劳动、生产米麦的农民大众则全然不顾。

这种农政设想,可能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以前那样的贩卖米麦的寄生地主这种社会阶层。在农村里,半封建的地头蛇势力还很强大,在山村里还广泛存在着半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正是这种半封建的地头蛇势力，同垄断资本紧密勾结，支撑着它的统治，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主要在山林、原野、用水权方面所保留的封建所有制关系还有很大力量。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象以前那样与资产阶级并列的独自的政治势力，即半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也是大米的贩卖者）已不存在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河野的农政上。

我以前重视在农业或者农村广泛保留着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飞扬跋扈的封建地头蛇势力；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社会习惯（如男女不平等、家长制、身分差别等），一句话，重视这种既广且深的封建残余制度，是可以的。但是，从这里直接得出存在着作为阶级的半封建地主阶级的结论，则是错误的。从这种错误的观点出发，便错误地认为战后的天皇制官僚——它同占领权力的关系另当别论——，在国内阶级关系中仍然是绝对主义，即建立在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股势力之上的。尽管今天的官僚与官僚制中，仍保留着一些封建因素，但应该说在基本阶级关系上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支配着官僚、政党以及日本一切统治机构的垄断资产阶级，暂且把所有资产阶级势力纠集起来，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通过“保守合并”组成的自由民主党。他们企图靠这个统一的力量，借“自主的防御态势”之名，强制推行对美从属的、侵略性的、正式的重整军备，恢复日苏邦交与和平共处并不是这个统一战线的真正一致的目的。它只是得到了鸠山派的积极支持。

尽管自民党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但并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因此它不能通过修改宪法案。于是鸠山等人就企图修改公职选举法，施行小选举区制。它的目的是，首先想一下子消灭社会党、劳农党和共产党；第二，他们想借此消除党内的各种派别，确立主流派的领导权，加强团结。在一区一人的选举区内，除了党公认

的候选人以外，禁止使用党的名义，这样，党的干部就可以通过决定公认候选人来巩固势力；第三，企图禁止政党的联合选举和共同选举，并且使不能提出五十名以上的候选人的政党不能进行选举活动，剥夺国民政治活动的自由，尤其是想使社会党、劳农党和共产党不能进行统一选举。

也就是说，修改选举法就是加强反动和重新武装的势力的统一和团结，阻碍进步与和平势力的统一，是企图为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和帝国主义的独立敞开大门。

## 第二篇 从历史上来看 岸内阁的性质\*

凭我国的保守势力，——保守固然是保守——，难道就不能实行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政治了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愚蠢的吗？看一看岸信介和自民党（合并为一个党，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的保守党）的动向，不禁令人感到他们想走的道路不仅是保守而且是反动，不仅是反动而且只能是一条法西斯化和对美从属的道路。

然而，回顾岸内阁以前的内阁，并非只是这样一条道路。实行拙笨的、独裁的、完全独断专横的政治和对美从属的政策达数年之久的吉田政权于1954年底倒台，组成了鸠山内阁。这时，在国民中间出现一种象是在长期梅雨之后看到一线云隙的气氛，竟形成了所谓的“鸠山热”。鸠山一党早就主张公开重整军备，为此还主张修改宪法。鸠山在战前当政友会领袖时的活动也称不起是个民主政治家。尽管如此，他压根儿就是搞政党活动和议会活动的人，因此，当他和其同伙接替了全身浸透秘密外交的官僚出身的吉田及其集团的时候，便出现一种明朗的气氛，被认为固然保守还是向民主政治前进了一步。而且鸠山内阁不顾国内垄断资本一派的反

---

\* 这篇文章应该说是前面的《鸠山内阁论》的续篇，登在《中央公论》1957年12月号上。鸠山内阁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复活的倾向，到岸内阁变得更加明显了，并且加快了步伐。鸠山内阁还表现出独立的意向，而岸内阁并不想去探索独立的道路，它是在加强对美从属同盟的同时，追求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那时以来，它便成了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我认为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分析，这篇文章今天还是有用的。——作者

对,不顾美国不悦,首相终于抱病亲赴莫斯科,实现了日苏复交。日本并以此为跳板参加了联合国。这次与《旧金山媾和条约》不同。那个条约是根据美国单方面的安排,从时期、形式到内容都是美国强加的。这次与那次媾和有本质的区别,是国与国之间对等的复交活动,是积极地向民族独立前进的。尽管鸠山内阁试图非法划小选举区,极其露骨地强制推行小选举区制,试图复活和加强“大日本帝国”教育和实行其他若干反动政策,然而这届内阁与过去的吉田内阁有些不同。与吉田内阁相比,具有民主性和民族性的倾向,这是不容否认的。我当时认为鸠山内阁的这种倾向是代表以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为基础,统治阶级积极谋求帝国主义独立的动向的(本书《鸠山内阁论》)。这一论断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没有错。

鸠山引退后,自民党多半是由于派系势力均衡的结果,不得已实行总裁公选。这种作法除了远在1881年(明治14年)的革命的自由党外,后来在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一旦弄清了种种内幕,也许会有人认为,本质上这不过是一出粉饰民主主义的滑稽戏而已。不过,保守政党为了对付进步势力迅速发展的倾向,不是也想要把自己打扮得带上一点清新的气氛吗?

公选的结果,石桥湛山当选总裁,于是组成了石桥内阁。虽说石桥内阁也不得不谋求党内的派系势力均衡,没能满足人们实现清新保守内阁的期望,可是,这届内阁却借助当时的经济繁荣,提出了他们可能实现的政策——一千亿日元的减税、一千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措施,以及经济的扩大均衡政策。这些政策尽管都同样反映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但它更强烈地反映了产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银行资本的利益(当然这种减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是得不到好处的);另外他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敌视中国,当他们把扩大贸易作为实行扩大均衡政策的保证,从而表现出希望同中国扩大和加强

经济关系的姿态时，人们便对石桥这样一个很久以来有骨气的自由主义者抱有好感，期望石桥内阁沿着前内阁迈出的方向，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鸠山、石桥这两届接连的内阁，从政党和官僚关系的角度来看，也是我国政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是因为在我国尽管说是政党政治、政党内阁，而战前的保守政党除了只有一次犬养毅的政友会内阁外，压根儿就没有过政党出身的人当上党的总裁从而当上首相的，都是官僚、军人或者华族<sup>①</sup>出身的人。而且犬养也仅仅当了六个月的首相，就被法西斯军人杀害，结束了战败前的政党内阁时代。后来，原来是政党出身或者财界出身的人当政党领袖，暂且保全了余生，但那些官僚和军人连看都不消看他们一眼，政党逐渐完全从政权被排斥出去，终于发展到政党本身也解体了。

战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变成一个原则。在有占领军总司令部期间，它同议会的关系，宛如战败前天皇同议会的关系，占领军总司令部拥有绝对权力，不能说是真正的议会政治。而且战后的历代首相，最初是皇族东久迩宫，接着是币原、吉田等所谓战前的英美派外交官，之后，热烈庆祝国民主权与和平主义的新宪法的诞生，并根据新宪法进行了第一次大选，社会党变成国会第一大党，组成了片山内阁。然而不久还是被外交官出身的民主党总裁芦田均取而代之，当了首相。接着成立了第二届吉田内阁，此后吉田内阁整整蝉联了六年之久。在这期间，保守政党几经离合聚散，除了比较弱小、不久被消灭的协同党(国民协同党)外，自由、进步两党以及它们的后身，都推选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芦田、重光为总裁。这只能令人感到：因为保守党只有推选与占领军总司令部或者美国关系密切的人当总裁才对它们有利，它们才有力量。然而，在恰如占领军总司令部赐予的吉田内阁的末期(这时已经是媾和以后，占

<sup>①</sup> 华族：日本有爵位的贵族。——译者



领军和占领军总司令部这样的形式已不存在，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在制度上比过去缓和了），在鸠山一郎当上与吉田自由党对立的民主党的总裁之后，自由党也把总裁和首相分开了<sup>①</sup>，新闻记者出身的绪方竹虎当上自由党总裁，于是政党才在官僚以外拥立自己的总裁。接着吉田内阁倒台，继鸠山之后组成了石桥内阁。

非官僚出身的人当政党的总裁，而且在党内也不是依靠官僚派而主要依靠非官僚派的势力取得政权，这一点是政党政治的一个进步，在我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是划时期的。这种进步不仅仅是在形式上，不论在战前的天皇制下，还是在战后的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统治下，在议会政治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的时期，这是不可能的。而这样的事似乎终于实现了，从这一点来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如果能按这个方向坚持下去，那末由保守政党实行保守的民主政治也许是可能的。

然而这个方向没有确立起来。石桥首相组阁后很快就病了，由于出现这样一个偶然情况，事态很快就开始逆转了。石桥派在总裁公选中的胜利，并不是靠压倒优势的實力，而是由于竞争对手在策略上的错误帮了他的忙，是侥幸拣到的，在他因病辞职后，由该派占据总裁位子就不可能了。于是战前天皇制法西斯的推行者“新官僚”的领导人登场了。曾经担任过东条战争内阁大臣的岸信介，当上了首相兼外相。岸是1952年才解除了清洗令的，他最初的政治活动是组织了一个称为“日本重建联盟”，渗透着战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团体，搞起什么“爱乡”运动、重新武装运动，根本就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这一点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可是现在这个赫赫有名的、具有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经历的旧天皇制官僚，再次当上保守政党（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的总裁，当上了首相。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同上述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这种情

<sup>①</sup> 总裁和首相分开，即总裁不担任首相。——译者

况,在8月10日的改组内阁而建成的“岸体制”的内阁人选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在岸内阁中,有副首相石井光次郎等旧内务官僚系的头子四人。其中唐泽俊树在东条内阁时担任过内务次官,与岸信介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在此以前担任过警保局长,他不仅镇压左翼而且以彻底镇压一切自由、民主、和平的运动与思想闻名;他只当选过一次众议员。具有这样历史的唐泽这次竟当上了法务大臣,指挥检察厅和公安调查厅,这怎能不令人惊讶。新设立的内阁总务长官今松治郎也是内务官僚出身,担任官房长官的爱知揆一是大藏省出身,在他手下的副长官冈崎英城也是内务省出身,是地地道道的特高警察。从这些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是企图事实上恢复战前的特高警察系统的。从大臣到长官,官僚出身的十二人,非官僚出身的仅七人。曾经被清洗过的有岸首相、石井副首相、藤山外相、河野经济企划厅长官、唐泽法相等有实力的阁员,共十人,达到过半数。此外还有堪称岸信介的经济问题顾问的贺屋兴宣。如果我们想起作为战犯押在鸭巢监狱而刚刚出来的、东条内阁的藏相贺屋,那末我们只把兴趣仅仅集中到党内派系,看哪一派有几名,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就会把真正要紧的问题看错了。所谓岸体制,从人事方面来说,首先是以首相为首的旧官僚,尤其是旧内务官僚和战犯的全面复活的体制。

第二,这届内阁人事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生就是大资本家、领导着一百八十到二百个公司和资本家团体的藤山爱一郎,因为他与首相有多年的交情,这次当上了外相;还通过藤山让前开发银行总裁小林中出任东南亚巡回大使,让涩泽财阀的头子、前日本银行总裁、国际电信电话公司总经理涩泽敬三出任南美巡回大使,这种第一流的资本家相继得到任命。在我国政治史上,身为大资本家在政府担任要职,仅在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1937年后的

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有过。现在岸内阁起用财界人士担任外务大臣,这也许是为了直接开展所谓的“经济外交”,也就是为垄断资本开辟市场,进而同美国相勾结,扩大对东南亚的资本输出。这与反苏、反华政策是互为表里的,并与促进军火生产的体系化和重整军备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可以非常具体地看出站在岸信介背后的垄断资本是些什么样的集团。这是一些在垄断资本家当中与国家资本紧密勾结,并通过它直接与美国资本相勾结的大金融资本家。

## 二

从人事方面所推断的岸内阁的性质,再从它的政策和行动来看,就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石桥辞职后,刚刚接替石桥的最初的岸内阁一方面处在国会会期中,另一方面在党内的地位还没有巩固,因而内政方面的主要政策,只好原封不动地沿袭石桥内阁的方针。于是当时的第二十六届国会,在“正常运营”的名义下,象上届国会一样,执政党和社会党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就结束了。这种所谓的“正常化”的条件,一半在于社会党幻想在保守和革新“两大政党的时代”,如果不受工会等议会外势力的束缚,始终凭议会内交易“成长”起来,就能吸引中间阶层,扩大党的势力,与保守党相互交替执政。而主要的条件在于,政府和执政党方面暂时避免拿出象废止人事院法案、秘密保护法案和劳动关系法的修正案等预想到进步势力会猛烈反对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显得比较明智些。这种明智的根基,政治上是前内阁的政策遗留下来的;经济上则由于“神武景气”,垄断资本的姿态显得大方了。

然而在这次国会开会期间,不得不从上届内阁继承的“扩大均衡”政策的前提条件——经济繁荣,因外汇收支恶化而开始受到威胁。当然需要“调整”经济和金融政策。“调整”就得承认上届内阁

经济估计的错误，因而就不能不意味着追究它的直接责任者石桥派(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说来，是以在反岸时与石桥联合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为代表的)的责任。而解决外汇危机的办法，只提出抑制进口和紧缩金融。正好这时，5月底，英国不遵守美国强加给它的对中国贸易的特殊限制，宣布放松这种限制，西德等西欧国家一齐响应，而岸内阁却按兵不动，没有表现出要借机积极发展日中贸易，以利摆脱预想到的经济危机的意向。岸信介并不止此，还想把同共产党国家发展贸易为前提的扩大均衡政策的崩溃，用来作为建立岸体制的绝好机会。

当要建立“岸体制”时，岸首相首先访问了东南亚，接着又去华盛顿朝拜。他去印度时，同尼赫鲁总理一起赞扬强调和平共处，赞扬反对一切殖民主义的万隆决议十项原则；在共同声明中倡议：“紧迫而热切地呼吁，立即停止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在中国问题上，他对尼赫鲁首相说：“日本在同国民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在大陆上已经成为稳定政权的事实，可是促进同它的贸易与承认中共政府是两码事。”关于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他说：“日本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完全没有防御力量，因此日本同意美军驻日，不过不是无限期地驻下去。”（《朝日新闻》1957年5月25日）仅凭这一点，如果说真心话，也并不是不能对现在日本保守党对国际和平与民族主权的诚意作出评价的。他在锡兰也谈到了“维护万隆精神”。

可是他一到台湾，就唆使蒋介石“收复大陆”。他说：“中国大陆现在由共产主义统治着，对中华民国(台湾蒋政权)的困难处境不胜同情。不过，由于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日华两国就应该越发加深合作。”“日本保守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不过在实行政策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日本赞同在大陆恢复自由。不过，要想理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就必须了解日

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般说来，日本人对苏联有一种敌对心理或者冷冰冰的感情，有时甚至怀有一种类似愤怒的情绪。与此相反，对中国人则抱有亲近感，这与是不是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在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上，可以说来自中国比来自苏联更可怕。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收复大陆，我是非常赞成的。”（《朝日新闻》1957年5月4日）既然是这样，那末北京政府谴责岸首相敌视中国是理所当然的。

《世界周报》8月17日号在《东与西》栏内，一个用笔名S的人攻击周总理说：周恩来总理只凭《朝日新闻》一家报纸的报道材料就攻击日本政府，这种态度“没有一点气魄”。说是“这位作者本人手头上有可信赖的岸信介在岸蒋会谈结束后的谈话记录。”而在记录中，岸首相是这样说的：

“日本保守党不采取容共和中立的立场。不过，在谈到它的手段和方法时，日本也有日本国内的情况，从外部来看可能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蒋总统希望解放中国大陆的心情和信念，我非常理解。日本对俄国怀有长时期的历史的反感。但对中国，不分中共或台湾，都怀有一种亲近感。因此，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渗透，抵抗力强；对来自中共的渗透，抵抗力弱。这一点我感到很可怕。因此，如果解放大陆，对日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

这同上述《朝日新闻》的消息，内容也好，气氛也好，究竟哪里不同呢？

岸首相在台湾一句也没提到万隆精神。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问题，只是说极左派曾把日本人的特殊体验所产生的国民感情用来反美，但是“现在政府和国民形成一体，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进行反对”。（这是进行禁止核试验运动的意思吗？）蒋介石对此也说：“我总认为尼赫鲁总理反对原子弹氢弹和日本的立场是不同

的。”在印度和锡兰的岸信介和在台湾的岸信介，我简直看不出是一个人。这样一个“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岸信介”，他又怎么能得到亚洲人，哪怕是蒋介石一派的真正信任呢？

岸信介东南亚之行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美国提供“开发东南亚的基金”，日本给它当掌柜的，提供技术，榨取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辟发财致富的道路。东南亚人民立即看穿这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美国也不说对这样的事要拿出钱来，因此，这个设想今天完全失败了，这一点这里毋庸重新赘述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岸内阁的这种“经济外交”，一方面仍然依靠引进美国资本，另一方面经过“神武景气”，迅速成长起来，竟企图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这正是迅速恢复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的要求。

在吉田自由党时代的 1950 年前后，政府及其支持者就大力主张，不应把将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任何希望，寄托在同中国和苏联等“共产化了的国家”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上，而应该向东南亚扩张。当时还认为这是要出口日本工业品，进口东南亚原料。而今天已经到了提出资本输出问题的阶段了。这么一来，对政府和支持政府的资本家来说，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同共产党国家进行麻烦的商品交易，远不如在东南亚赚取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吸引力大。而且因为它“既不容共也不中立”，当然有理由期待美国的援助。不仅如此，为了走充当美国代理人的帝国主义道路，就不能不越来越强调“既不容共也不中立”。

不过，如果始终光强调这一点，就会在“万隆精神”指引下的亚非各国人民当中日益孤立。于是就需要“两岸”<sup>①</sup>政策、“两面外交”。在印度就必须同尼赫鲁总理完全一致，“紧迫而热切地呼吁立即停止”原子弹氢弹试验。可是，在联合国，在美国的眼前，光强调这一点又怕得罪美国，于是一方面支持美国提出的核试验与一

<sup>①</sup> 两岸：即两种面孔的岸信介之意。——译者

般裁军是不可分割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说可以不管一般裁军协定,要求暂时停止核试验,提出了一个内容完全矛盾的议案(1957年9月23日)。尽管如此,而当苏联回电答复岸信介,表示同意日本将一般裁军与停止核试验分开的方案时,政府又厚着脸皮说:那是苏联的曲解。实际上日本想搞什么,怎么搞,也许连岸首相、藤山外相自己也不清楚。

### 三

这种“两面手法”,不仅对亚洲各国,就是对我们日本国民,岸政府也是常常喜欢采用的。岸信介在飞往美国之前,同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委员韭泽嘉康对谈(《赴美之前》、《中央公论》1957年5月号)时说:“当日美两国互相站在独立的和对等的立场上,相互考虑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旧金山体制有必须纠正的地方。拿‘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来说,这种地方是很多的,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年青人反对旧金山体制,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摆脱战后一个时期的虚脱状态,正在产生民族自觉的证据。保守党正确地抓住这一点,理解这种民族自觉,对美国进行必要的谈判,或者实际表示要沿着这条线走向解决的方向。与此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我想青年人也好,一般国民也好,都会理解的。”

这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见解。如果岸信介真的体会到民族的自觉,对美国进行必要的谈判,那我也想当岸派。“不过”,岸信介接着说:“不过,为了表示要对美国进行这样的谈判,不先进行协商、打好基础是不行的。……日美之间要就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日美未来关系的展望,在基本看法上取得一致。关于这一点,尤其要坦率地告诉美国首脑,日本国民是这样想的,让他们很好地理解。应该先作这样的事,说现在马上就叫它进行修改‘和平条约’和‘安全条约’的谈判,也办不到,事情总得有个顺序。”

这么说来，开始举行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的时机无论如何还没有到来。这样把一件前后矛盾的事，用一种表面上非常象样的措辞统一起来，听的人怎么理解都可以；如果理解得对自己不利，就说那是误解或者曲解，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绝对主义官僚和诡辩家的世界，尽管在“圆滑周到”的有才华者那里可以通得过，但这决非有经世济民之志的诚实的政治家之谈。

实际上首相朝拜华盛顿，在让美国首脑理解日本民族自觉方面作出多少努力呢？1957年6月21日，他在记者俱乐部演说时说：“报纸上报导说最近日美关系正在恶化啦，反美主义在日本人中间扩大啦，这种报道固然没有必要过分认真地去提它，但同时也不能无视它”，略微流露出一点日本人的民族感情。然而他在这里一点也没能表明日本人对一些迫切而具体的问题的要求和希望；却净说了些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忠实盟友、是容共和中立主义的坚定敌人之类的话。例如关于冲绳行政权问题，这一天他在会见日本记者时坦白地说：“也不能要求归还部分行政权，把军政分开；也不能满有信心地断言，归还了日本，就会变得非常好起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2日）他这是在说，即便把那些在比任何帝国主义都残暴的美军的压制下受苦受难的冲绳县民放到岸信介自己施政之下，也没有信心会比今天幸福得多。这样的人，在日本的民族利益方面，在维护和平方面，又怎能向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诉说些什么、让他们“理解”些什么呢？日美联合声明只是让美国取得使日本今后仍然充当攻击远东共产党国家的基地的保证，日本只不过是重新发出忠于美国的誓言，这一点连吉田前首相时期都为之逊色。日本人的禁止核试验的要求被拒绝了；日中贸易只字没提；关于冲绳只是重复日本拥有潜在主权这样一些过去说过多次的、毫无意义的话。“安全条约”岂止没有提出修改的方向，反而决定设立讨论有关实施这个条约的各种问题的委员会。根据美



国战略变更的既定方针，撤退驻日地面部队，这一点被说得仿佛是会谈的成果，可是作为答谢的条件，日本要进一步加速重整军备。连这样的东西也竟然空话连篇地吹嘘说：“确信日美关系正进入一个以利益一致、坚决信赖为基础的新时代”。

就对美屈从这一点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两国关系的“新时代”。然而在屈从的作法上确实有“新”的地方。这个“新”就是，日本同苏联也恢复了邦交，加入了联合国，与过去相比相应地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经济上也得到了恢复。只要打算和平生存下去，日本已经有条件可以不接受条件不利、完全强加的对美依赖；在国际关系方面，一般说来，尽管进展缓慢，但并没有改变缓和的趋势，尤其是亚非各国的和平主义与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对美国采取自主立场的步子都可以比过去迈得更大；在这种客观条件增强了的时候，而这时的政府却比过去没有这些条件、对美国抬不起头来的任何时期的政府，更积极、更具体、一项不漏地去承认美国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新东西、“新时代”。看起来，岸首相等人也许确实相信这样作是一条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道路。不是违心地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对方，尽管旁观者认为那是屈从，而他却很容易认为这是因为本人有同美国共通的反苏反中国的根本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互相“合作”，不仅如此，说不定是让美国张牙舞爪地干，其实是自己想要利用它。岸内阁不仅仅是出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本性，彻底厌恶共产主义，而且积极敌视中国和苏联，一有机会就想恢复过去的帝国主义特权和势力，为此在军备方面便想装备核武器，火箭、导弹等远距离进攻武器。美国以“集体防御”为名的新战略，正是把用这类武器武装日本军队说成是“援助”的。岸首相企图同它结合起来，把日本变成名符其实的当代第一流的国家。岸信介等人不是开始抱有这样的野心吗？尽管这些还属于根据收集到的片断材料

而作出的推测的范畴，然而我认为这种野心已经成为使岸首相之流确信“日美新时代”的基础。

这样想才能理解首相充满信心从美回国，极其蛮干地强行改组内阁，组成具有上述内阁成员的“岸体制”的意义。7月10日，这个体制一建成，同月30日，悍然不顾社会党和反对修改宪法的学者拒绝参加，竟由自民党议员、赞成修改宪法的学者、大资本家代表以及其他委员组成了一直是悬案的“宪法调查会”。戒能通孝在《对宪法调查会的疑问》（《中央公论》1957年10月号）一文中透彻地指出这件事的深刻的反动意义。以此为开端，第二届岸内阁尤其是在文教政策和劳动政策方面，集中力量继续强制推行了最反动的法西斯政策。其具体情况不想一一累述。剥夺组织起来的工人、尤其是国营企业等基干产业的工人的战斗力，在“爱国精神”和“道德教育”的名义下，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反民主的奴隶服从精神和反共主义，在这方面一旦成功，对反动统治来说，那些可怕的东西不就消失了吗？

岸内阁为什么恰恰在今天这样强制推行反动政策呢？大资本家的利润也没有濒临危机，工人也没有起来要发动革命，岂止如此，最近由于“神武景气”的影响和共产党腐败的自我暴露，工人运动和革命政治斗争与过去相比，近一两年明显地衰微了。而且连杜勒斯都非常清楚，苏联和中国会进攻日本是莫须有的事，根本不必担心。既然如此，为什么岸内阁还要如此强制推行反动政策呢？也许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即在自己把战线统一起来、加强了统治力量的今天，在经济方面虽有危险征候、但还没有太大问题的今天，在革命力量或者进步势力衰弱的时刻，对它进行彻底追击。因为如果不这样作，在国民投票修改宪法的时候，就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说不定会爆发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然而，今天的反动并不只是垄断资本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还必须

看到前述向美一边倒、露骨地敌视中苏的外交和复活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一面。

岸内阁好象企图通过向美国表忠心，以便从美国得到比吉田内阁更多的支持，从而建立象吉田内阁那样的“长期稳定政权”。然而这条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来说是一条非常不幸的、严重违反人民利益的道路，即使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未必能说是一条明智的道路。如前所述，现在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对外关系上都不存在严重危机。他们按照他们那一套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是有可赚钱的余地和方法的，今天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所走的通往从属、战争和法西斯的道路以外，即在岸信介之流已经体验过的那条以惨败而告终的道路以外，并不是没有生存的道路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走现在这样的道路呢？是日本没有能指出不同于他们的道路的保守政治家吗？

有一位叫麦克马洪·鲍尔的澳大利亚学者。不管在任何意义上讲，这位学者既不是容共主义者，也不是反美主义者，只希望亚洲和平与繁荣。他忠告日本人说：

“也许有这样一种议论：如果发生了世界大战，只要美国战胜，无疑对日本是有利的。可是，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一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先说下，象日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形暴露，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所谓安全一词在将来不是对战败的安全，而是应该意味着对战争的安全。因此我想说，日本的政治家们如果离开意识形态和观念论来认真考虑本国的问题与现实，那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最大的国民利益就是和平。”（《日美安全条约应该修改吗？》，《中央公论》1957年6月号）

### 第三篇 《乙巳保护条约》与 “日韩会谈”\*

××：“日韩会谈”，在2月20日草签了“基本条约”，4月3日又就请求权、渔业问题、法律地位等三项悬案草签完毕，现在已经到了企图强行批准这项条约的阶段。南朝鲜人民把“日韩会谈”叫作“第二个乙巳保护条约”，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重新侵略”的口号下，顽强地开展了反对运动。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当“日韩会谈”到了决定性阶段之际，日本人民应该考虑些什么，作些什么呢？在回顾近代日朝关系的同时，请先生从历史学者的角度谈一谈过去对朝鲜的侵略和“日韩会谈”的特点（提出质问的是《朝鲜研究》编辑部）。

井上：过去日本侵略朝鲜时，最初有充当欧美侵略朝鲜的开路先锋的味道。1876年（明治9年）把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的时候，事前也完全取得了欧美各国的谅解和支持才搞的。那时主要是英国，当时英国和帝俄在全世界对立，尤其是在远东。当时英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企图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对抗俄国的前哨基地。因此，英国公开支持日本1873年以后的“征韩论”。虽然有这种因

---

\* 自1951年以来断续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日韩会谈”（详见本书的第三篇论文），终于在1965年6月达成协议，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及其他一系列条约。这年的干支是乙巳。在干支的上一个乙巳年，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事实上把大韩帝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协约”。一般把这个条约叫做《乙巳保护条约》。从那时起六十年后的《日韩条约》，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乙巳保护条约》的再版。在这个条约签订前夕，为了回答日本朝鲜问题研究所编辑部提出的问题，就“日韩会谈”以及其他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写了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朝鲜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朝鲜研究》1965年6月号上。——作者

素，但在当时英国的支持不是主要的。日本的天皇制还是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尽管如此，不，正因为是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反而更加急于对朝鲜进行纯军事性的扩张。

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朝鲜成为日本天皇制的大米和大豆的粮食资源基地。其次，在中塚明的论文中明确指出：是为了掠夺朝鲜的黄金。在经济上，这两点是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输出日本商品，不如说是为了掠夺粮食和黄金。在政治上日本受欧美各国压迫，为了补偿这方面的损失，便对朝鲜或者清朝也采取相当的高压态度。也就是说，企图用侵略朝鲜，在朝鲜炫耀皇威来作为对欧美屈从的一种补偿。其次，我认为还有相当严重的封建性的领土扩张主义的因素。日本本身的这种侵略性是主要方面。

现在“日韩会谈”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从会谈一开始到这次迅速达成协议，在一切阶段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指挥。尤其是在第四次会谈，我认为日本放弃当初对南朝鲜提出的请求权的主张，是“日韩会谈”当初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对南朝鲜提出对其在殖民地统治时代在南朝鲜拥有财产的请求权主张，而南朝鲜方面则认为根本不能成为对日会谈的问题，由于日本放弃了请求权，“日韩会谈”这才走上轨道。而日本放弃请求权是因为美国政府写信指示日本放弃的。<sup>①</sup>信上公然写道：“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见解，……”从此以后“日韩会谈”正式走上轨道。

在谈判的紧要关头，总是美国的指挥起了作用。就拿这一次来说，也是佐藤首相赴美，同约翰逊总统会谈回来以后，才迅速达成协议的。

由此可见，“日韩会谈”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日本体会美国的意

---

<sup>①</sup>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在1957年12月31日给日本政府的书信说：“根据合众国的见解：对有关这些资产利益的有效请求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图而同南朝鲜恢复正常关系，它企图今后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美国统治南朝鲜。也就是说，当美国的代理人，代替美国对南朝鲜的部分统治。最高主人是美国，以美国为主人，日本当掌柜的，然后代行主人的一些拙劣作法。这次“日韩会谈”有这样一种因素，而且这种因素非常大，这也许可以说是这次“日韩会谈”的特点。

### **日本垄断资本本身的野心**

那末，是不是日本只根据美国的命令行事呢？也不能那样说。恢复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自己也有想向南朝鲜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因此，在经济上资本输出可能比商品输出变得更主要了。日本的财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到南朝鲜去。因为他们想以各种各样的合办事业或者向南朝鲜产业投资的形式，向南朝鲜输出日本的资本，把南朝鲜人民当成非常便宜的劳动力来驱使。

在渔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日本企图靠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援助南朝鲜渔业的办法，最后日本大渔业资本与南朝鲜买办资本勾结起来垄断南朝鲜的渔业。因此，不仅南朝鲜一般渔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就是日本中小渔业者也是无力对抗的。我认为日本大渔业资本把那一带垄断起来，这是渔业条约和渔业问题的本质。

### **借“援助”之名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

我认为当然会出现从南朝鲜掠夺大米和黄金这样的因素。不过，现在南朝鲜还没有这样的生产力。因此，我认为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反映日本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要求的资本输出，这恰恰是典型的垄断阶段的经济侵略。它采取一种所谓的“援助”的形式。以前曾经采取过相当露骨的掠夺形式。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援助”使南朝鲜的官僚和同官僚勾结的南朝鲜买办资本同日本资本结合

起来。

以前日本统治朝鲜是从朝鲜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对朝鲜资本的成长则以《工业令》、《公司令》等法令进行压制，抑制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这种露骨的、赤裸裸的暴力的压制是很明显的。就是这回也根本没有发展南朝鲜民族资本或者发展南朝鲜的农业和渔业的意思，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而是把南朝鲜完全置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这时就把当地的买办势力当成走卒，采取姑且同他们合作的形式，装出一副仿佛力求南朝鲜繁荣的样子。这是一种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因为以前那种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在世界上已经行不通了，用来欺骗和镇压朝鲜人民也办不到了，所以只能采取一种欺骗的手段和方法。这就是今天的特点。

### “日韩会谈”的军事性质

另一点是，“日韩会谈”同美国的整个亚洲政策相结合、具有很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性质。它不只是日本垄断资本掠夺南朝鲜的问题，首先美国的亚洲政策本身就是始终阻止朝鲜统一和南朝鲜社会主义化，把它作为美国的殖民地来保持下去。不仅在南方，一旦有机会，还想把北方也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而且不仅是北朝鲜，还想向中国进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在地理上也就变成更重要的据点，在南朝鲜维持日美的傀儡政权，以此为根据地进攻北朝鲜，遏制中国。为了贯彻美国的这种政策，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垄断资本，因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处于由“安全条约”，不仅由“安全条约”，还由被占领的历史状况确立起来的对美从属的地位。另一方面只要日本垄断资本企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那末它无论如何也得象以前那样，在远东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日本今天没有这种力量。因此当日本企图对已经觉醒了了的朝鲜民族和中国，乃至对亚洲各民族进行帝国

主义扩张的时候，它无论如何必须依赖美帝国主义。这是前提条件。

本来，日本帝国主义过去也是这样，如果它不同欧美某个强国勾结起来，在财政方面就没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足够的实力，现在更是如此。军事上也好，经济上也好，如果日本作为和平民主的国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亚洲各民族共生存，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依赖外国的力量。然而只要想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就必须排除现在亚洲各民族的抵抗，因此，日本无论如何必须依赖美帝国主义。由于日本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于是两者便互相结合起来，即美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要求与日本垄断资本企图依靠美国进行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立场互相结合起来，日本企图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使南朝鲜从属于它。

对日本人来说，这样把“日韩会谈”推进到批准所签定的条约的阶段，简言之，这就是日本充当美国的代理人，让南朝鲜从属于它。这自然意味着马上建立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事实上的东北亚军事同盟。

在“三矢作战计划”中也预想到日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向朝鲜扩张的情形，“日韩会谈”有很强的军事性质。不仅仅是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还有军事性质。已经去镇压南越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连日对北越进行轰炸，发动侵略战争，亚洲的形势非常危险。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起事实上的东北亚军事同盟，对日本人民来说，甚至明天就有被拖进战争的危险。现实发生了从横田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在北朝鲜进行间谍活动，被北朝鲜飞机赶走的情况，亚洲的战云逐渐接近日本。日本的天空逐渐遮上战云。这种形势同今天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迫使“日韩会谈”迅速达成协议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与南朝鲜傀儡政权之间结成同盟关系，支持傀儡政权。“韩国”向南越派遣了陆军，还会发生增员的事态，这时傀儡政



权当然会日益动荡不安。因此，日方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对美国来说就变得更加紧迫、更加必要。这是“日韩会谈”急于达成协议的最根本原因。唯其如此，对人民来说，这正是危险所在。

### 日本人的民族观与“日韩会谈”

过去日本在亚洲曾经是唯一的压迫民族，战后被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至今日本民族仍然算是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被压迫民族。我认为由于再也不充当压迫民族，日本人才有可能在亚洲建立起正确的平等互惠的民族关系，才有可能作为同朝鲜人、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对等的民族伙伴，建立相互平等的关系，并在战后逐渐建立起日本人的正确的民族观。

我认为日本人对朝鲜人的不正当的民族差别感，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不过这种东西正在迅速消逝。这是因为战后，特别是最近数年间，当日本人充分了解到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的时候，才感到朝鲜民族了不起；然后日本人才能够公正地看待南朝鲜的学生和一般人民反对“日韩会谈”或者打倒李承晚政权的斗争及其力量。

由于这种原因，过去对朝鲜的那种不正当的优越意识，正在迅速消逝。然而今天的情况是，日本资本重新长驱直入地向南朝鲜扩张。一旦朝鲜人在日本资本之下，以非常低廉的工资，象奴隶一般地被驱使，那末好容易快消失的日本人的错误的民族观念和思想，又可能恢复，并得到加强。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从属于美国，一提到美国人就认为是了不起的民族。也就是说，对美国人卑躬屈膝，对朝鲜人则趾高气扬，态度截然不同。我认为我们对朝鲜人有了正确的民族观，才是能够对美保持正当的独立、自尊的民族荣誉的基础。

好不容易到了这种地步，又要走回头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非

常不幸的事。

### “不可能成功的”再度侵略南朝鲜的梦想

因此,如果日本照现在这样充当美国的代理人,向南朝鲜进行帝国主义扩张,那末首先就会很快遇到非常大的军事危险;日本直接同美国、同南朝鲜的买办官僚和买办资本勾结起来发动战争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其次,在思想上也会妨碍正确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间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的产生和成长;第三,对工人来说,它将成为支撑日本工人的低工资的条件。如果在南朝鲜,以非常低廉的工资驱使朝鲜工人,并从那里不断地赚钱发财,这样对日本国内的工人群众来说,一方面会起不断压低工资的作用,另一方面会成为造成少数工人贵族的部分基础。在渔业方面,九州和中国(日本的一个地区)的沿岸渔民以及零散的中小渔民,也必然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当南北朝朝鲜和平统一,建立起统一的自由民主的朝鲜,民族工业在那里得到发展的时候,如果那时日本与繁荣的朝鲜结成平等互惠的关系,那末它对日本工人来说,为日本人民自身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繁荣的日本也是非常有利的,就是对渔民来说,日本和朝鲜签订平等互惠的渔业协定,即可保护渔业资源,又能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一切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所谓朝鲜问题,日本好象又考虑召回昔日那种“大日本帝国的荣光”的亡魂,或者想从朝鲜捕捞朝鲜近海的鱼,让我国民能够大量吃到价廉而味美的鱼等,总之是考虑日本人民的繁荣,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且会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我们不要当政府和资本家所散布的幻想的俘虏,进一步说,尽管这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抵抗和斗争,不过,从世界的一般情

况,尤其是亚洲的情况来看,即使日本垄断资本想进行那种帝国主义扩张,也不会象以前那样简单。尽管美帝国主义用了那么多的军事力量,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能把南朝鲜建成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能够使他们放心的殖民地。正因为没有成功,所以现在才让日本来帮助它弥补美国的失败。

从美国没有成功这一点可以看出今天朝鲜民众的民族觉悟之高和抵抗力之强。

尽管日本想代替美国进行扩张,而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残酷地压迫过朝鲜,这是朝鲜人怎么也忘记不了的,因此,朝鲜人的抵抗,只会比对朴政权和美国更利害。

若是美国的话,它还可能有条件使朝鲜人民这样想:就某种意义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从而给朝鲜带来了独立的机会。可是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日本怀有好感的朝鲜人一个也没有。因此,向南朝鲜进行扩张,象以前那样干“便宜事”在那里赚钱回来等等,即使暂时能作到,长期这样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甚至想请资本家也最好撒手别干。

### 《乙巳保护条约》和“日韩会谈”

今年是巳年,同迫使签订所谓《乙巳保护条约》的1905年,正好是干支相同的一年。朝鲜人今天一再说:“这是乙巳保护条约的再版”,我有同感。六十年前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乙巳保护条约》,是使朝鲜完全殖民地化的第一步,比使朝鲜半殖民地化还进了一步,实际上是殖民地化的条约,此后五年,便吞并了朝鲜。我想今天南朝鲜人提起《乙巳保护条约》,恐怕是想强调今天的“日韩会谈”最后签订的《日韩基本条约》和渔业协定等等,是日本使南朝鲜殖民地化的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来说,当然只能这样看,而且事实也只能是这样。

在签订《乙巳保护条约》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在那以前先签订了桂太郎—塔夫脱密约，日本同意美国统治菲律宾，交换条件是美国同意日本统治朝鲜，这就是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的密约。另一件事是第二次“日英同盟”。这个《日英同盟条约》是英国在它对印度的统治受到威胁时，用结成“日英同盟”来对抗这种威胁的，也就是说，当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逐渐困难起来时，让日本来增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交换条件是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这是日美、日英两帝国主义间的交易。所谓《乙巳保护条约》就是这类东西，结果日本使朝鲜殖民地化，一般也是通过充当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帮凶得以实现的。

尽管形式不同，这次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企图借助充当美国统治亚洲的帮凶，建立起日本在南朝鲜的帝国主义地位。

与六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表现形式也不同了。然而日本还是同样想与其他帝国主义相勾结，通过充当其侵略亚洲的帮凶来实现日本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就这样的历史结构来说，六十年前也好，今天也好，都是一样的。

因此，当我们说这是六十年前的“乙巳条约”再版的时候，从朝鲜人来说，便会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使朝鲜殖民地化的第一步；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不仅是第一步，而应该看成它具有加强日益困难的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的意义。

### 日本人民的历史课题

谈一点与朝鲜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自从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来，一般说那种认为自明治以来的日本是对抗欧美侵略亚洲、解放亚洲的、抵抗侵略的中心，是站在抵抗的最前边的观点，尽管象林房雄那样以露骨的形式来说的人很少，然而恐怕在整个日本统治阶级里都有。其次在所谓比较进步的、有

良心的人们当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明治以来,不管怎么说,正是日本站在亚洲进步的最前列,无论朝鲜、中国还是东南亚,它们的近代化是日本帮助和推进的。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比较多的。然而这根本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试看一下缔结《乙巳保护条约》前后的国际关系就清楚了。

象“高杉发言”,还有以前的“久保田发言”,这些发言当然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种想法却出乎意料地在一些公认的“有识之士”当中广泛存在。如果对此不作根本的反省,那末日本民族的真正独立,日本民族的真正繁荣,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日韩会谈”,作为日本人,我们要尽可能地协助建成一个自由、统一和繁荣的朝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不让日本再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据点。越南战争也好,在此之前的朝鲜战争也好,如果日本不充当美国的基地,美国是作不到的。如果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不充当美国的帮凶,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希望协助建立一个自由的、统一的朝鲜,那末当然要同日本本身摆脱军事和经济上的对美基地化和从属化的状态,解放日本人民结合起来,要同争取我们自身的解放斗争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如果不去结合,那他就是口头派。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明治时代对朝鲜的侵略,一般日本民众除极少数进步人士以外,事实上压倒多数的人都被组织进去并参加了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分析这个问题,取得教训,对今天的运动是有益的。

我认为世界史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与殖民地解放和殖民地崩溃的时代不同,出现所谓帝国主义完成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的“跃进期”。请谈一谈这个时期的情况,以及这一时期的侵略方式是不是巧妙了?

还希望结合起来谈一下最近常常演成问题的日本人的朝鲜观

问题。

### 错误的朝鲜观的形成过程

井上：当我们追溯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历史关系的时候，就势必要提到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去侵略朝鲜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加速了丰臣家的没落。与其说加速没落，不如说如果不侵略朝鲜，丰臣家可能不会没落。

在德川幕府时代，每当将军世家改换将军，朝鲜都派人来祝贺。但这决不是按属国来对待，而是受到非常郑重礼遇的。就封建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确实是结成相互对等的关系的。

因此，日本人不论统治者也好，民众也好，对朝鲜形成明显的差别观是在明治以后。因为无论怎么说，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军事力量。而朝鲜还没有作到这一点。

缔结《江华条约》后，第一银行首先在釜山设立分行，三井资本侵入朝鲜，用日本纸币收购朝鲜黄金。然后一般商业资本侵入。日本商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正同在横滨一带欧美商人对待他们的情况一样，而把地位颠倒过来了。拥有治外法权的欧美人在横滨同日本商人进行交易时，强词夺理，违反合同，无恶不做。即使提起民事诉讼，日本方面也绝对打不赢官司，因而只好饮泣吞声。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如日本商人从欧美商人（主要是英国人）那里借钱，到期去还钱的时候，对方假装不在家，无奈只好第二天再去还，说是已经过期，便没收抵押品。还有更突出的例子，如日本人去偿还借款，就嗾使狗出来咬人，叫你进不得门。这样一来就说过期了，没收抵押品。在1890年以前，英国商人净干这种事。日本商人到朝鲜去的时候，也完全是这么干的。也许是效仿英国人在横滨对他们的作法，不过，这是一般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想到的干法。

通过这样一些干法，日本在朝鲜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掠夺。这种掠夺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于是日本人就慢慢形成一些诸如朝鲜人文化程度低啦，生活水平低啦之类的看法，对他们不管怎么强词夺理都会行得通。

不过，日本一般国民对朝鲜人有一种非常不正当的差别感，真正作为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当了压迫者，那无论怎么说还是在日朝合并以后。

### 与侵略结合的优越感

吞并了朝鲜，日本人便恣意榨取朝鲜。朝鲜人在祖国生活不下去，便四出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到日本。这些人完全两手攥空拳，可以说身上只穿着一件衣服来到日本。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近代产业工人的技术训练，所以只好当土木工程的工人或者煤矿工人，不得不到日本工人中条件最差的地方去作工。这样便把朝鲜人推进了苦难的深渊。日本人在这里看到的朝鲜人是从朝鲜流浪来的，从事艰苦的劳动，受低工资驱使的一些人。日本国民对他们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对朝鲜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是它的前提，而对遭受殖民地奴化的朝鲜人民便持有一种优越感。我认为根源就在这里。

其次，它还同崇拜西洋有关。日本人好象感到西洋人、白人比自己更了不起。这同对日本部落民的差别观是一样的。其实日本人民本身是不自由的，是受上面压制的，因为受上面的压制，自己也就想去压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者企图制造民族压迫，而民众对此接受了民族差别感。这是它的基础。

因此，为了对朝鲜能够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使造成这种错误观点的基础的日本人本身，作为一个民族真正得到解放，确立民族自尊心，而且即便作为个人也一定要从被压得抬不起头

的状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拥有民族的和作为一个人的荣誉。如果能够这样作，那末即使看到朝鲜人陷人不幸的困境，也不会产生优越感，而且正因为他们处于不幸境地，反而会产生一种愿意同这样的人们共同争取解放的心情。

因此，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恩格斯：《论波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卷，第1910页）我认为实际上在心理方面也与恩格斯的话是一致的。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前面请教过的。在明治时代，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这件事一般怎么看？认为那是一个不怎么坏的时代吗？

### 帝国主义确立时期的民族意识

井上：是啊。不只是日本，所谓帝国主义确立期的理论，毋宁说那是一种认为优胜劣败乃世之常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一种使帝国主义合理化的理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在1900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认为强者征服弱者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象英国那样工人运动发达的国家也出现过众所周知的塞西尔·罗兹<sup>①</sup>的《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即当他听到英国失业者大会上“给我面包！”“给我面包！”的喊叫声，他就想怎么办才能给他们面包呢？除非实行帝国主义；实行帝国主义对工人来说也是幸运的。他公然说能填饱工人肚子的只有帝国主义（1895年）。

象今天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能公开地搞帝国主义，这种事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即俄国革命以后的事。俄

---

<sup>①</sup> 塞西尔·罗兹，即 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英国南非好望角殖民地的总督（1890）。——译者





侵略主义勾结的因素。当欧美各国接二连三地侵略清朝，侵略朝鲜的时候，在日本国民中间也相当广泛地存在一种对抗欧美侵略的情绪。我认为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例如象利用“一进会”<sup>①</sup>，用这种方法装得简直就象《乙巳保护条约》和《日韩合并条约》是由朝鲜国内提出要求似的，那种认为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很难顺利地把日本国内的舆论统一起来的想法是不怎么多的吧。

井上：是的，不怎么多。与其说不装成是朝鲜人的要求就不能牵着国民鼻子走，莫如说用来压制和削弱朝鲜人的抵抗是主要的。

××：试看签订“保护条约”当时的报纸，其中有国民感激伊藤博文拿出的明治天皇亲笔信之类的消息。这种事与其说是针对日本的舆论，莫如把它看成是压制朝鲜的一种手段更确切些吧。

井上：可能是这样。另外，还出现一种“日朝同祖论”的说法。说什么日本人和朝鲜人本来就是在一起的，这次又合并到一起了。这主要是对朝鲜人进行工作，不过，这在引导日本舆论和民众上，会使人们觉得这样作并没有罪，而且是作了一件好事。在使人们不太意识到罪恶的情况下就干了出来。我认为确实有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理论是福泽谕吉经常讲的。由于邻居不小心发生了火灾。于是就担心火要着到自己这里。因此便去忠告邻居要小心谨慎，以免发生火灾。可是不管怎么对他说，对方也听不进去。而且也没有那种能力，那末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闯进去，管理对方的家政，以免发生火灾。我认为这种理论是为了让一般国民能够接受侵略朝鲜而想出来的谬论。日本总想站在亚洲前头充当老大哥，说是要帮助朝鲜以及其他落后地区好好地管理一下，把它们提拔起来。我想这不仅是日本统治者为了侵略朝鲜而制造出来的借口，

---

<sup>①</sup> 一进会：系部分朝鲜亲日势力在日军支持下于1904年成立的一个亲日政治团体，主张朝鲜在政治上由日本来保护。——译者

国革命在思想史上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把“帝国主义可不行”这点给常识化了。并不光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各国的阶级斗争发展起来了，一反过去那种认为工人是下等人的思想以及帝国主义的强者理所当然地要使弱者从属于它的思想，现在普遍认为帝国主义不行了，并认为工人并不是什么下等人，工人毋宁说是值得自豪的阶级，一般人的工人观改变了，工人本身也提高了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思想完全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种思想变化的根源在于俄国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么说，明治政府本身在迫使国民侵略朝鲜上，与其说采取了特别巧妙、特别高明的手法，莫如说时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并不是特意捏造了什么巧妙的口实进行欺骗的。

### 把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引向侵略朝鲜

井上：侵略朝鲜之所以比较成功，这与其说是由于作法高明，莫如说在此之前搞垮了自由民权运动。因为搞垮了自由民权运动，才有了条件，所以才能作得到。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本受欧美压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非常高涨。当然有摆脱欧美争取彻底解放的民族的和国民的要求。他们利用这种摆脱欧美争取彻底解放和完全独立的正当的民族要求，去充当欧美的打手，结成日英同盟等，同世界最富强的欧洲国家结成对等的同盟，从而大大提高了日本的身价，给人一种象是同英国对等之感，并且日本也想和欧美各国一样地侵略朝鲜和中国，总希望尽快赶上欧美，希望独立，希望确立对等地位，我认为这是能够取得国民支持的条件。

一些相当进步人士被卷了进去。当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很快会同侵略主义结合起来，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同

蔑视和敌视朝鲜人的一种手法，就是把朝鲜人民的反日解放斗争说得象是给日本人民带来危害，也就是把加害者同受害者颠倒过来，在群众当中灌输这种思想，制造出一种“要狠狠整他们一顿”的空气。我想这次也会进行这样的宣传。当然今天时代变了，而且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会就那样简单地被煽动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 互相鼓励的日朝两国人民的斗争

井上：一旦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而且民族斗争也有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把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说成象是给日本带来什么损失似的，企图借此操纵日本大众，我想也是不可能的。毋宁说，朝鲜的民族斗争，必然会鼓励日本人民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他们会在内心树立起对朝鲜人的正确认识，或者对朝鲜人的尊敬。因为现在的条件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例如在过去，一提到朝鲜的“三·一暴动”<sup>①</sup>，还是宣传日本人被杀害了（尽管实际上完全相反），日本的权益受到侵犯等等，我想那时这么说有容易接受的条件。可是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没有什么权益，所以也就没有可具体受侵犯的权益。还有，贸易公司今后会到朝鲜去，有时根据日本贸易公司的作法，也许会发生朝鲜人的游行队伍拥向那里，打烂玻璃窗等的情况，然而即使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今天的国民也不会认为日本的权益在那里受到威胁了吧。反而会认为“因为作得太过分了”，“朝鲜人都生气了”。

---

<sup>①</sup> 三·一暴动：1918年，朝鲜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立了独立运动本部。1919年3月1日，在为前皇帝李太王举行葬礼那天，民众在汉城高呼：“朝鲜独立万岁！”举行了游行示威，运动波及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郡，参加暴动的民众达二百万人。日本对此进行了武装镇压。但日本被迫更换了总督，并将过去的武政改为文政。——译者

而且也确实企图借此赢得日本国民的支持。

最近又说日本的情况是一方面在受欧洲的压迫，所以让朝鲜近代化，人们就轻易相信这套话，并成了被它牵着走的条件。

日本曾经靠日英同盟当上帝国主义列强的远东宪兵，从而使日本自己也变成了帝国主义。今天，日本又同美国结成同盟，代替美国进行所谓的“经济援助”，看上去仿佛日本已变成了大国。所谓“日本大国论”，实际是因为日本人受着压迫，所以一被说成是大国就高兴。

××：那末说，除了所说的时代基本上不同以外，其中还有另外一面，即不让人们感到这样作是罪恶，而想使人们感到日本不是作了坏事，而是作了好事。

井上：是啊。尽管说是处在那个时代，可是去偷窃人家的东西，打着想侵略人家的旗号，也还是不容易作到的。尤其若是欧美各国的话，有充足的经济力量，因而可以靠资本输出或是商品输出，即使不搞太露骨的政治压迫和军事压迫，只靠经济力量就可以使之从属于它。而且军事力量这种东西，应该是确保经济从属的一种力量。可是日本没有经济力量，因而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垄断这些地方。为了进行侵略，就必须千方百计地使这种侵略合理化。

在形式上缔结对等的条约，进行贸易，实际上是使其从属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说是根据优胜劣败的法则，能够讲得通。但是如果通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和占领来进行垄断，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不能不考虑合理化的借口。

而且因为朝鲜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所以对此也费尽了心机。

××：换一个话题。“日韩会谈”已经达成协议，今后很快就要进入正式向南朝鲜扩张的阶段。南朝鲜人民现在就掀起了大规模的斗争，今后这种斗争会日益激烈，会正式发展起来。过去日本人

## 第三部分

### 第一篇 最近的日本电影 上的军国主义

——以《战争和人》为中心——

#### 第一节 岸内阁和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

十四年前的 1957 年 4 月，渡边邦男导演的、新东宝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空前叫座。正如从片名马上就会联想到，影片是以确立旧大日本帝国转折点的日俄战争的“巨大胜利”为主题，颂扬“指挥”这次战争的明治天皇的。过去那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题材充斥银幕，如乃木将军指挥的第三军攻克旅顺，东乡舰队司令率领的联合舰队进行的日本海大海战，等等。

这年 2 月组成了大战犯岸信介内阁，它以已经恢复和成长起来、并超过战前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为背景，极其露骨地推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政策。而影片竟毅然决然与这种情况紧密配合，从正

---

\* 这是 1971 年 12 月亚非作家协会日本委员会丛书第一册收编的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以当时非常叫座的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为中心，批判了几部军国主义电影。我对文艺是门外汉，因此我不是从艺术上，而是专门揭露作品的思想和政治效果的。这篇文章原登在河原崎长十郎编辑和发行的戏剧创作研究杂志《舞曲扇林》第 4 号（1970 年 12 月）和第 8 号（1971 年 8 月）上的，是对影片《战争和人》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有人对我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诽谤和中伤，说因为中国批判了《战争和人》，我才随声附和。不过，我在《舞曲扇林》第 4 号上发表这篇文章时，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这部影片还一言未发呢。——作者

## 世界史的现阶段

今天南朝鲜学生不断焚烧日本国旗。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可是国民并不认为这是朝鲜的“排日”和“侮日”，倒显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情绪。实际上连日本人也想烧一烧美国的国旗，但是没能烧。我认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是在反对“安全条约”的时候，1960年4月的李承晚倒台是激励日本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非常强大的力量。那个时期，在朝鲜李承晚倒台；土耳其发生政变，旧政权倒台。我认为它作为激发日本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国际条件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我想今后会这样发展下去。也就是说，各国的民族运动不是相互反目，而是相互鼓励，相互促进。世界史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1959年到1961年小林正树导演的五部一套的影片《人的条件》(关于这部电影下边再谈)等,还保持了一定吸引力。而统治电影业的五大电影制片公司却逐渐向以摄制流氓片和色情片为主的方向发展下去。这是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增长”、“昭和元禄”时期,诱导群众脱离政治,为使群众接受军国主义与反动统治扫清障碍的。

在这期间,岸内阁血腥镇压了近代史上空前的、全国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强行修改“安全条约”;垄断资本高唱高速发展经济。1965年,与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升级紧密配合,缔结了“日韩条约”。以此为转机,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台湾、东南亚的入侵是非常惊人的。尽管依然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但反动派好象觉得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有可能实现似的。同时他们也变得比过去多少聪明了。不再象岸信介那样露骨地采取帝国主义的过分自私的作法,而采取一种在形式上“尊重”“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独立,给他们“经济援助”,实际上是剥削它们,使其从属于日本的新殖民主义的手法。

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情况相适应,电影上的军国主义也不再象1957年的《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那样,把旧帝国主义赤裸裸地再现于银幕,而是给它披上祈求和平的伪装而登场的。从《明治天皇和日俄战争》上映到1967年8月,冈本喜八导演的、东宝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日本最长的一天》首次上映,正好过了十年。《日本最长的一天》是这种新军国主义影片的最初的代表作。

## 第二节 从《日本最长的一天》到《冲绳决战》

《日本最长的一天》是以天皇和陆海军部的首脑、军官们、政府以及官僚们围绕是否投降而产生的对立和苦恼为主题,到1945年8月15日,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日达到了最高潮。电影把天皇



面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唱赞歌。

岸首相在组阁后的第一次国会上，扬言日本为了自卫即使进行核武装也不违反宪法。接着他作为日本现任首相第一次出访东南亚各国，公然提出利用美国的资本，日本的经营以及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发”东南亚的设想，企图在对美从属下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这完全是岸信介的如意算盘，哪个国家也没有理睬。

然而岸所代表的日本反动派并没有放弃它的迷梦。岸内阁一方面根据美帝国主义的要求加速扩军，以换取美国同意在1958年开始进行所谓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以便使它发展成为对美从属的日美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岸信介强制推行露骨的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各项民间协定，与此同时，以“赔偿”的形式，开辟向东南亚输出资本的道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对美国的南越傀儡政权开始进行“援助”。

在岸内阁的这些动向中，当时中国报纸《人民日报》曾经指出日本的“潜在帝国主义”，并表明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反对（1958年7月7日社论）。

影片《明治天皇和日俄战争》，把日本的这种潜在帝国主义公开地搬上银幕，回想旧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胜利，企图把它当作复活新军国主义的肥料。然而这种过于旧式的帝国主义影片，只此一部，后来没再继续出。这部电影上映后所以大叫其座，是因为它以天皇为影片主人公，构思新颖，这是过去所不敢想的；而且扮演主角的岚宽寿郎很象照片上的明治天皇，影片巧妙地抓住中年以上的人，尤其是明治时期出生的人的怀古心情。新东宝电影制片公司因而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又摄制了《天皇皇后与甲午战争》，但结果是守株待兔，希望落空。

日本电影业正好从这时候起，观众一般开始下降。其中独立的中小制片公司系统的小市民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影片，如从

等人略微提出一点疑问：在对美战争中，日本究竟能否取胜？而电影却十分强调这点，极力美化贺屋。

在这部电影中还反复出现战败部队的悲惨场面，但它只是使观众感到可千万不能打败仗，而决不是培养批判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

今年上映的《冲绳决战》，整个影片大部分用来描绘战败的极其悲惨的情景，一方面使观众沉溺于伤感主义，另一方面对军司令官不消说，对参谋们和部队长<sup>①</sup>们极尽美化之能事，诱使观众要对中学生、师范学校学生编成的突击队、女学生编成的护士部队、学生出身的敢死队员等等流下眼泪。不仅如此，影片使人感到那些伟大的司令官、高明的参谋、勇敢的部队长、天真的年轻人，他们那种极其崇高的尽忠报国的殊死搏斗，终于在敌人压倒优势的物质力量面前无可奈何地败退下来，把整个战争描绘得无限悲壮、无限壮丽。

配备在冲绳的第三十二军和东京大本营简直不把冲绳人民看成是日本人，象对待临时占领的敌区居民那样残暴无道，把当时冲绳县人民的三分之一、十五万多人赶进无限悲惨的死地。但是，对于“皇军”这种反人民性，这部影片却一个镜头也没有揭露。

军队无故枪杀县民的场面出现过两次，但却把它描绘成出于误解。例如渡嘉敷岛居民四百多人集体自杀，却被描写成岛民自己选择了与其活着当敌人的俘虏、莫如自杀的道路。事实是驻在这个岛上的陆军海上挺进队队长赤松大尉欺骗岛民，把他们赶入绝境，强迫他们集体自杀的。而赤松及其上司们却躲在安全地方，始终避免同美军战斗，最后竟从容不迫地投降了美军。这一事实在银幕上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不过，赤松本人最近却辩解说，他自己决没有命令岛民集体自杀。但命令者是“赤松大尉”也好，“黑松少

<sup>①</sup> 部队长，即师长。——译者

塑造成一个一心一意祈求国民幸福和世界和平的、令人诚惶诚恐、感激涕零的圣君。电影美化投降派的将领和大臣自不待言，竟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最大主角)为首的焦土决战派也描绘成精诚爱国、忠于职守的悲剧英雄。

《日本最长的一天》与十年前的《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不同，它不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以其战败为背景，不是从正面赞美军国主义，而是通过美化军国主义的元凶来麻痹人民批判军国主义的力量，培养接受军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尽管日本电影一般都严重不上座，但这部电影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叫座。而且观众的年龄情况，从壮年到青年，面是很宽的。从那以后，东宝公司每年基本上把用同样的构思和手法摄制的“超级巨篇”在8月15日以前开始上映，如1968年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1969年的《日本海大海战》(此片是从上年的《山本五十六》联想到的主题，是个例外，赞扬胜利了的军国主义，但影院上座不佳)；1970年的《军阀》以及今年的《冲绳决战》。

影片《山本五十六》是描写一个虽然明知对美战争最后没有胜利希望，却英勇地服从国家决定，鞠躬尽瘁的悲剧英雄的故事。影片把山本反对对美战争，描绘得简直象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对他主张集中全力侵略中国，一点不加批判地给以肯定。

《军阀》强调天皇和东条英机等“大东亚战争”的元凶们，是怎样千方百计地想避免日美战争的，同上一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主张“完成中国事变”，也就是说主张集中全力只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这部电影把天皇描写成一个始终一贯的和平主义者，甚至把军阀的代表东条也都描写成一个为天皇、为国家而肝脑涂地，想避开日美战争，但迫于形势竟义不容辞地被推上战争最高负责人地位的悲剧人物。今天自民党的最年长的元老、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促进者贺屋兴宣，在日美开战时担任藏相，曾向东条首相

张,但(实在的人物)他化装成老百姓,在从岛尻地区逃跑的时候,碰上了一队扫荡残敌的美国兵,马上用英语喊:“请饶命!”

在这一瞬间,镜头换了,没有说明他是否被杀了,只是暗示他活了下来。事实是他没有被杀,而是当了俘虏。也就是按照牛岛司令官的最后命令“好歹设法”活下来了。电影没有照出他举起双手投降的场面,其用心显而易见,是为了不损伤“皇军”高级军官的形象。

这样幸存下来的旧日本军的参谋军官们,后来便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偷偷保护之下,同美军参谋们一起制订对美从属的日本重整军备计划。这是隐藏在日本重整军备历史背后的事实。影片《冲绳决战》的最后部分竟肆无忌惮地暗示并美化了这条道路。

如果我们系统地分析以上介绍过的东宝制片公司自1967年以来一系列的“超级巨作”影片,就可以看出最初没有的战争的悲惨(其实是战败的悲惨)场面,越往后越突出,使人感到好象的确大大增强了非战或反战的姿态;其实完全相反,是企图使观众沉溺在感伤主义之中,遮住他们批判帝国主义及其军队的视线;十分清楚,它逐渐强烈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日本军队是很了不起的,但同美国作战是太愚蠢了,今后应该和美国一道去进行“合理的”胜利战争。这不正是今天对美从属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吗?

### 第三节 《人的条件》与《战争和人》

这些电影制片公司属于三井财阀系统的电影垄断资本,导演们也从来不是以诸如“进步性”为招牌的,因此他们摄制这样的影片也并不奇怪。但是,过去曾与电影垄断资本相对抗,坚持独立制

尉”也好,事情的本质是一点也改变不了的。

这部电影还通过美化第三十二军司令牛岛和冲绳县知事岛田等人,掩饰“皇军”的本质,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

尽管第三十二军已经折兵大半,却仍让残余部队向岛尻地区转移集结,试图尽量延长抵抗美军的时间。参谋们正在为此开作战会议,岛田知事神情悲壮,未经传达便径直步入会场。他说县民相信岛尻地区不会变成战场,有三十万人集聚在那里,为了拯救这些县民,他请求尽量设法避免把岛尻变为战场。

可是作战主任参谋八原博通上校,冷酷无情地拒绝了知事的请求说:“我们至死必须完成军队的使命。”知事垂头丧气地走出会场。这时牛岛司令官把他叫住,用温情的、安慰的日光注视着他,说道:“岛田先生,请你谅解,我们军人是必须战斗到最后的。”知事带着一副很受感动的神情回答说:“我作为知事要竭尽全力拯救县民。”两人悲愤地会心一笑而别。

这种场面哪怕要在参谋们冷酷地拒绝知事的地方打住,也会给观众留下自己思考问题的余地:后来的凄惨战斗究竟是为了谁?是为什么?还不只是为了第三十二军将军们的面子而牺牲冲绳县三十万县民吗?可是影片并没有就此打住,而让一个温情脉脉的司令官登场,同知事相互谅解对方的立场和心情,互相安慰,把最重要的问题淹没在感伤主义之中,从而扼杀了观众对“皇军”的批判。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电影的结尾。牛岛司令官和少将参谋长自杀前,在给其他参谋布置游击战和地下工作等任务,让他们离去之后,特意命令八原作战主任说:“唯独你‘好歹也要设法’活下去。”为什么要让他活下去呢?没有明确交代给他的任务。但暗示他“要担负起重建皇军”的任务。八原在旧陆军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到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作战会议上经常提出现代合理主义的主

的创伤，作者对此也未加批判。不仅如此，梶在眼看要同爱人结婚时，心想与其被抓去当兵同爱人分开，莫如选择去矿山现场当劳务主任，这样可避免应召当兵，同妻子一起生活。主人公和作者都肯定这件事，认为作为一个人是不得已的，并且认为生为一个日本人，命里注定是要当帝国主义日本的爪牙的。

如果认为这个大前提没有疑问，那末后来的一切就成了一个为了追求有良心的生活而尽量苦斗一生的人的动人的英雄故事了。这样还不如说影片竟把一个为了自己逃避兵役、选择充当奴隶监督的人物，塑造成不论在多么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的残酷压制下，仍然力图为维护最低限度的“人的条件”而殊死奋斗的英雄。这样一来，原作也好；影片也好，就都是在肯定作者任意捏造的前提，即日本人不管你的心地多么善良，由于你生在帝国主义日本，就不能变成革命者，命中注定要当帝国主义的爪牙。

在这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人的条件》当然不是革命性的作品，连进步作品都说不上，毋宁应该说本质上是反动的作品。不过，原作也好，影片也好，大体上还是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本多记者最近在《朝日新闻》晚报上连续评论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暴，实际上远比这部电影所描写的严重，而这里至少没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既没有侮蔑中国人的描述，也没有潜藏着反中国的宣传。

对中国人的描写反倒有很好的部分。第二集的“特殊工人”们的总反抗是革命的，他们的领导人尖锐地指出，主人公的善意和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是在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这些地方是相当动人的（但是紧接着主人公就叹息说，难道我生为一个日本人是罪恶吗？于是又出现了肯定前述大前提的根本缺点）。

《人的条件》到第二集为止还看得过去。可是第三集以后，则可以说是一个“秉性温和而有力”的超人的人物去征服坏蛋而遭到

片，一直以“进步性”为招牌(现在还是这样)的日本共产党系统的电影导演，竟然同五大电影制片公司中最反动的日活资本<sup>①</sup>合伙炮制了比上述几部更加精湛的军国主义影片。我这样说，人们会以为：“这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的人，特别希望你看一看山本萨夫导演的、日活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超级巨作”《战争和人》吧。

影片《战争和人》，是根据五味川纯平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五味川很久以前，写了一部叫《人的条件》的超长篇小说。前边已略提到，这部小说在1959年到1961年由独立制片公司“胡萝卜俱乐部”和松竹电影制片公司联合拍成电影，受到好评。这部电影相当忠实于原著，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第五集，全部上映约需十个小时。

《人的条件》，是以一个有能力、有良心的原左翼青年梶为主人公的，中日战争后期，他在中国东北(旧“满洲”)地区的一家日本军需公司经营的铁矿山现场当劳务主任。这个公司从一些并非战场的村庄随便抓来非士兵的中国人，当作“俘虏”，名之曰“特殊工人”，对他们进行了比古代奴隶还甚的奴役。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张应该稍微人道一些来对待这些工人，竭力对抗公司当局和军部，以期尽量体现人的良心。这种斗争是前半部的主题。

影片的后半部是描写这个反抗军部的主人公遭到惩罚而被征召入伍，在军队里仍然同上司的非人性干法进行斗争。战败后当了苏军俘虏，又在集中营同苏联当局的官僚主义以及对其拍马、继续虐待士兵的原日本军官进行斗争。最后从集中营逃走，彷徨在茫茫雪原，想念美丽妻子的幻影，最后气力消磨殆尽而死去。

在这个很长的故事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说，主人公梶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左翼运动，被捕变节，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线“满洲”的军需公司工作。但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形成梶在良心上

<sup>①</sup> 日活资本：日本电影制片垄断资本之一，即日活电影制片公司。——译者

情节松散的庸俗小说。

山本导演说，根据这样的小说，摄制了一部“反战电影”，日本共产党对这部电影的摄制和普及给予全面支援。新片上映后影业取得相当成就，“日活资本”很高兴。那么电影的内容怎样呢？

影片的第一集大体相当于原著的第一篇《命运的序曲》，与原著一样，在1928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打倒北方军阀的内战，即北伐战争，出兵山东省济南，发动了“济南事变”，这时在同军部关系很深并已扩张到“满洲”的新兴财阀伍代家的客厅里，正在为长子英介留美举行欢送会，第一集就是从这一场面开始到炮制出伪“满洲国”时期结束的。第二集相当于原著的第二篇，题为：《骷髅的舞蹈》，影片名叫：《爱和悲的山河》，接第一集，故事情节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而展开，到1937年7月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结束。原著预定在这之后写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投降，已经发行到1939年底日本叫汪兆铭组织伪“国民政府”，并与这个政府缔结了《日华基本条约》。电影也预定继续出第三集、第四集。如果影片全部拍完，上映时间可能超过十五个小时。

主要上场人物：伍代财阀的主人由介，是一个冷静沉着的绅士；由介的弟弟乔介，在“满洲”经营运输公司，为了侵略“满洲”和繁荣伍代财阀，他与关东军的军官串通一气，不管什么阴谋与恐怖都满不在乎地干下去；由介的长子英介是与叔父乔介沆瀣一气、目中无人的资本家；伍代家的长女由纪子，天生一副美貌，富于才智，她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现代的而且惯于激情，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是最主要的女主人公；次子俊介在第一集里是个中学生，他喜好绘画，接受了贫穷的进步画家灰山浩一的影响，在第二集里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反对父亲和哥哥，却依仗伍代家的财富和势力；最小的孩子顺子，在第一集里是个小学生，只稍微露了露面，



在第二集里变成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学生，与俊介的朋友一个贫穷的革命青年标耕平相爱。

以伍代家族六人为中心，与他们有各种各样关系的无数人物登场，战争、谋略、各式各样的恋爱以及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抗日斗争交织在一起，舞台横跨东京和中国东北。

由纪子的曲折的恋爱对象、正义派的陆军军官柘植进太郎；俊介的情人有夫之妇狩野温子，她的丈夫狩野市郎是个“满洲”浪人，怀恨伍代家夺去了他的财产，企图进行阴险的报复；顺子的恋人标耕平，其兄只在第一集露过面，是个革命家，变节后被抓去当兵，在“满洲”战死；被英介凭暴力奸污而参加抗日地下活动的中国富豪的姑娘赵瑞芳及其一家，与赵家亲近、倾慕瑞芳的年轻的日本医学者服部；“满洲伍代”乔介的部下、心地善良的公司职员高岛正典；替乔介出谋划策的冷酷无情的鸭田；和由他作为恐怖主义者培养起来的青年大盐；在与乔介交换情报时与乔介发生肉体关系而满不在乎的、面目不清的美人谍报员鸿珊子；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中共党员、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白永祥；抗日游击队朝鲜革命家徐在林及其同志和爱人全明福；拼命反对关东军侵略“满洲”谋略的年轻领事馆馆员篠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还有其他军人、政治家、银行家、工程师、画家、小说家等等，一一接连不断地登场。

光从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就会想象出这部电影和原著的宏大场面。介绍其情节的梗概，会占很多篇幅，这里只好从略。我准备介绍山本导演通过这部影片想向观众灌输些什么，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评论。

#### 第四节 《战争和人》的导演的意图

今年夏天，这部电影的第二集上映后，中国批判它是军国主义

电影,消息传来,山本导演对此表示愤慨,利用各种场所进行反驳。其中之一是《周刊朝日》7月23日号登了他的一次谈话。那是一篇最能表明导演意图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山本导演首先在前言里说,中国方面的攻击,与其说是对电影本身的批判,莫如说“可能是对日本共产党称赞过这一点的反驳,然后就作品的意图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一,始终想简略地阐明昭和史上的事件(侵略‘满洲’的历史),让年轻人学习昭和史。

同时,《战争和人》不单是昭和史的重现,就拿司法这一问题来说,今天的日本简直同当时完全一样,我想告诉人们,日本今天又正在走和当时相同的道路。

第二,看到越南便切身感到所谓的防御战争。在那里得到的实际感受是‘这里很象满洲’。因为我深深感到在老挝看到的美军和关东军完全一样;这是一种同日中侵略战争(这是一种奇怪的词。——井上)一样的手法。

第三,想让那些认为战争就是战场的年轻人知道:事实上‘所谓战争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是用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摄制了这部影片,山本导演当然“完全不会料到”中国方面的批判。而对影片“完全看不到群众”的具体批评,导演则是这样反驳的:

“我知道对人民大众的描写确实不够。然而当时是人民大众被蒙蔽的时代。虽然作过调查,可是很多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这么说来,难道影片所表现的全都是山本导演进行过认真调查的真实情况吗?——井上)

“还有受太长需要压缩的制约和虚构的局限,所以在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痛苦方面出现了缺点。这个问题想在第三集里弄清楚。”(这样说来,难道第一集和第二集对人民大众的描写法

是认识到虚构的局限、接近事实吗？——井上)

总之，山本导演是为了用这部影片借古喻今才来描写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真实的。而且正如导演所期待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似乎相当多。例如上述《周刊朝日》就第二集，就登过观众如下的感想。

一个凡是战争片几乎必看的某公司青年职员（二十五岁）说：“我以为是战争片才去看的，而内容却是一部情节片。不过还是一部好电影。它使我充分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

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说：“一言以蔽之，作为历史教材是相当有用的。它接触到了学校没有教过的昭和史的黑暗面。……使我切身感到战争。看了这部电影后，好象才了解到曾经出征到过南方的父亲为什么绝对不看战争影片的原因。”

她的同伴女大学生说：“如果中国人和朝鲜人看了这部电影，尽管他们嘴上不说，说不定会感到日本人沾染上一种象体臭一般的差别意识。更严重的是，还有反对战争的人们受到拷打的场面，据说这同今天的干法一样。希望演给机动队看看。”

《周刊朝日》的这一特辑，尽管也登了中国方面和在日中国人的批判文章，但总的来说，对这部电影的介绍是肯定的。另外，这部电影还受到在护宪运动方面非常活跃的宪法学家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星野安三郎等人的莫大赞许，他说：

“军部和五代财阀搞的损人健康、败坏道德的鸦片走私，利用暴力团和国家权力搞恐怖主义，尤其是特务警察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拷问，还有过激派军人对稳健派政治家的暗杀，等等。通过这一连串的迥非寻常的事件，了解到侵略战争是由谁发动的，是怎样准备，怎样贯彻的，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这部电影的重要性还不止这些，它还生动地描写了为抵抗

侵略和压迫，为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主义、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痛苦与烦恼，欢乐与悲伤，甚至恋爱也不只是凭个人的爱憎，而是把它放到这样的人、民族、阶级以及人类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和激烈动荡的形势中来处理的。”

积极活动的星野先生看过电影，在感激之余竟说：“为了完成和上映预定摄制的续集，我也感到有一份责任，必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还说：“说真的，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与推进这部电影的摄制和上映运动的学生们邂逅相逢，并同他们有一个讨论的机会，各自谈出同样的感想，真是太难得了。因为那些创造出新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青年力量是信得过的。”他甚至披沥了对日本的光辉未来的信念。对山本导演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篇文章更使自己得意的了。（《书籍俱乐部情报》杂志 8 月号）

## 第五节 文部省及其《昭和史》观

不过，很不幸，不论原著或者电影，我本人压根儿就不赞成，我要强调这是一部反动影片。我在去年 12 月发行的河原崎长十郎编的戏剧杂志《舞曲扇林》第 4 月号上就已经把《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军阀》并列起来进行了批判，那时日本还不知道中国方面的批判。《军阀》里面还有极少一部分不错的场面，但《战争和人》一个好镜头也没有。……我写道：《军阀》，爱知外相推荐过。而这部电影该值得佐藤首相推荐。

接着今年夏天看了第二集《爱和悲的山河》，愈益为它的反动性所惊倒。于是我这才去读原著，对此我也一点不觉得好。但我却了解到影片竟把原著中零散见到的一点进步的东西，完全给弄反了。非常失礼，我不能不怀疑山本导演所谈的用意和星野先生赞不绝口的颂扬是否真地谈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我究竟有什么根据敢这样说呢？仅就电影谈一谈我的论据。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的。这段历史，只是在解说和字幕的年表里一笔带过地谈了谈，根本没有把它变成画面。影片所表现的是情节片或仿西部剧<sup>①</sup>片、流氓片等各种场面的大杂烩。正如一个喜好战争影片的年轻公司职员一语道破的，这不是战争片，而是以战争为背景的情节片。既然如此，那末导演基本上是怎样看待那次战争历史的呢？

在第二集一开头，影片用字幕和解说介绍了第一集时期发生的各次事件的简单年表。“为了维护在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所获得的权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影片是这样开始的。这个解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山本导演想教给年轻人的《昭和史》的全部史观。

通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日本夺取了中国的领土台湾，把朝鲜变成殖民地，在“满洲”夺取到名为租借地的殖民地、“满铁”以及其他“权益”。关东军和其前身日本军为了镇压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权益”，进一步侵略中国，而“驻军”“满洲”，也就是把这里继续占领下去。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影片的解说却把帝国主义为了使日本从中国夺取的“权益”合法化，为了使关东军驻扎即占领“满洲”合法化，不断向人民灌输的滥言，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

影片《战争和人》全面继承和再现了这种立场、观点和感情。例如第一集一开始，在说明“济南事件”时，不提日本武装干涉中国，只说“日中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

当时军部决定近期发动战争，于是从1931年春连日大肆宣传和散布日本人在“满洲”受到多么非法的和无理的迫害的谣言。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把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

<sup>①</sup> 西部剧：美国以开辟西部大陆的历史为背景的戏剧或电影。——译者

中国军枪杀的事件，歪曲成中国官宪非法地和无理地杀死帝国陆军军官。在电影里，把这一事件说成中村大尉“在绘制兵要地志进行实地调查时”被中国军打死。光这么一说，在观众中会有少数人了解到，这种所谓的实地调查并非别的，正是非法的军事间谍活动。然而多数人，正如当时军部所宣传的，可能会认为中国方面对帝国陆军也太不讲理啦！

比上述情况更严重地伪造历史、美化帝国主义的是，竟然描写得好象当时的日本农民要求夺取“满洲”。

当时的军部和政府日夜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但还没有进行一取得满蒙，日本农民就能得救之类的宣传。可是在电影里面，在东京郊外的货摊上，有一个象是外出干活的农民打扮的、岁数挺大的男子，喝着闷酒，大喊大叫地说：“‘满洲’有辽阔的土地，拿到‘满洲’，日本农民就得救了！”

而且这种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这样一个场面上。在第二集里也有，事情发生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轮船从日本开到大连港，出现“满蒙开拓团”的农民下船的场面。一些农民兴高彩烈地叫嚷道：“终于来到‘满洲’啦。以后不会再因给地主缴地租受苦啦！”我身边就有一个参加过开拓团的人，实际上他们在大连一登陆就越发强烈地怀念故乡，深感远离故乡的悲哀，在那陌生的土地上，感到前途茫茫，惶恐不安。但是山本导演描写得与此完全相反，简直就象是这些在日本受苦的农民进了解放区似的，显而易见，这和上述第一集的场面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试与原著相比，第一集的上述场面，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失业者，这天又因寻找职业而疲惫不堪，虽然没有钱却进了酒店。在先进来的酒客中，有一个三十岁左右仿佛是个右翼的“壮士”，正在兴高彩烈地喝酒。他对那个失业者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不打倒今天的滨口内阁，不结束币原的软弱外交，失业问题就不能

解决，“只要把满洲一拿到手，什么经济危机啦，不管什么问题，统统都解决了。”那个听了这番话的失业者，回到家里便想那就到“满洲”去吧。

山本导演把这个军国主义打手的煽动，改写成农民自己的大喊大叫，而且在第二集里精心安排了一个开拓团的喧闹场面（原著对开拓团在大连下船一字没提，只写集体旅客都是参观旅顺战绩的修学旅行团<sup>①</sup>和县人会<sup>②</sup>），虽然电影丝毫没有必要拘泥于小说原著，但山本导演却这样创造出原著里没有的人物和场面，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写成农民和工人的自发要求，而且把实现这种侵略，写成农民得到解放的喜事，这明显表明他是有意识地想要伪造历史、美化帝国主义的。他对完全没有描写人民大众的批评进行辩解说：关于当时人民大众的情况，调查也搞不太清楚，而且虚构还要有个局限。其实连他自己也根本不懂，却竟然虚构出这样一个赞美帝国主义的农民来。

根据这样的史观根本就不可能阐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历史。在第一集里把那次战争描写成是根据关东军的忧国军官们和伍代乔介之类的冒险资本家阴谋发动的。在第二集里，则说日本把侵略扩大到蒙古和华北，是关东军参谋武藤章等人和乔介之流的资本家违背军部中央当局的方针，无视伍代由介那样的深谋远虑的大资本家的反对面蛮干的。

这是战败后的军人、政治家和御用学者的说法，和臭名昭彰的、经文部省的反动审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的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真实情况是怎样呢？由于192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继此之后的1929年以来的世界严重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日

---

① 修学旅行团：在校学生到国内外去实地参观学习的旅行团。——译者

② 县人会：即县同乡会。——译者

本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濒临危机。而且在同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取得了进展，这样一来，日本早就想完全纳入殖民地的“满洲”，也出现了将被中国中央政府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危机，由军部带头，政府、政党、财界和地主阶级都一致想尽早夺取“满蒙”，于是便发动了“满洲事变”。

这样，就炮制出一个“满洲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斗争日益强大，经略“满洲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很快陷入穷途末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不仅军部，所有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在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寻找出路。不过，在作法上有软硬之别，在时机上有缓急之分罢了，用时髦的话说来，只不过是鹰派和鸽派的不同。

影片丝毫没有表明这种基本结构（这在电影上不是作不到的，光描写一下“东方会议”，就能很有分量），如果只是强调关东军军官和领事馆的馆员、武藤章和石原莞尔、乔介和由介这些人之间的意见对立，说前者强行发动和扩大了战争，那末它就描写不出“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事实”。这样一来便把罪责只归咎于一部分军人和投机资本家，豁免了整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责；竟然还说什么农民和工人希望夺取“满洲”，甚至还觑着脸说什么这是个“进步的”、暴露帝国主义的影片，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而且这部电影就是在描写战争的直接纵火人的阴谋上也只是精心刻画那些军队的走私鸦片啦，伍代乔介指使的白色恐怖啦等小事，唯独就是不暴露大事。如前所述，第一集里对“济南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处理手法是荒唐透顶的，柳条沟事件也只用解说一带而过。尤其严重的是，第二集结尾处竟把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掩盖起来。

众所周知，7月7日夜间，日本军在北京郊外芦沟桥附近，竟



然携带实弹，非法地、无理地进行夜间演习。这种演习本身就是对中国方面的严重挑衅。日本的“在华驻军”捏造了一个日本演习部队遭到中国部队非法射击、造成一个士兵失踪的阴谋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觊觎已久的芦沟桥地区一带。于是当地的日本军基本上达到了当初预定的目的，11日傍晚，便同中国方面签订停战协定，“事件得到解决”。

然而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东京陆军中央当局就已经决定派遣五个师团去占领整个华北，11日内阁会议也同意了这个计划，政府声明暂从日本内地向华北派出三个师。近卫首相特地召见政党、财界和舆论界的代表，要求他们给予合作。大家都发誓表示将积极进行合作。于是以军部中央当局为首，政府、统治阶级一致同意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动这次战争迅速扩大的中心人物并非在中国当地和在东京的军部中央机关的青年军官，而是军事当局的首脑、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等人。

影片《战争和人》，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完全避而不谈。不仅7月7日夜里的事件一个镜头也没有，就连7月7日这个日子都没有出现。仅仅在字幕和解说中说，“7月8日上午五时三十分”（说得多么准确呀——并上），丰台的日本军进攻中国军，发生了“事变”，在解说里面，只是说：“由于前天晚上正在演习的日本军队遭到中国军队的非法攻击……”日本军队开始了战斗。

为什么要隐瞒日本军的“七·七”谋略呢？为什么要慎重其事地回避说明那个全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日子呢？为什么要从7月8日早晨丰台部队的行动说起，给观众一种印象，好象是对中国方面的非法攻击来进行正当自卫呢？对帝国主义拥护到这种程度，简直令人可怕得很。不过，思想起来，这不外是自第二集开头的解说到现在为止所举例子中，贯彻着山本导演的帝国主义史观罢了。

## 第六节 美化法西斯

这部电影的史观既然同旧军部和今天的文部省的史观完全相同,那末它不去真正暴露战争的真实情况和军部的阴谋,而且积极赞美军人和法西斯,也就一点也不是怪了。

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最主要的男主人公是伍代由纪子的恋爱对象柘植进太郎。他是一个军官,是一个热情而有正义感的人,忠于职守。1930年,因为他作为参谋本部的成员批判了日本方面采用杀光政策镇压台湾雾社的人民暴动而被降职。在第二集里他当上“满洲”特务机关的特务。他对军队通过人体试验杀害中国人来研究化学武器持有疑问,并揭发伍代乔介与军队勾结走私鸦片的罪行。他一点也不作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在为数众多的日本军官中,象柘植这样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可是,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的军官,只热中于揭发日本军队的罪行,与压制中国人和挑起战争的谋略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事是可能的吗?以柘植这样的军人来当主角,是想说明军部里面也有好人和坏人,坏人挑起战争,残忍暴虐,这是在为整个军部进行辩护。这正如在《冲绳决战》中,通过牛岛司令官来美化整个军部的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程度的事还可以厚颜无耻地辩解说,这是为了在柘植的正确主张通不过的地方来暴露军部的丑恶。可是影片竟把杀死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相泽中校和“二·二六”事件的一些首谋分子都描写得象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似的,这就不论山本导演还是日共文化部都怎么也辩解不了吧。

电影拍出一个原著里根本没有的情节,相泽中校为了杀死永田,在赴京的火车里面,看到一些贫穷的农村姑娘集体被卖掉的场面。接着当他看到孩子们在互相争抢从行驶的火车窗户扔出去的

剩饭的情景，脸上显出一副非常沉痛的神情。紧接着就是刺杀永田的场面。通过这一连串的画面，观众可能会想，相泽是为了拯救贫苦的农民才谋求政治变革的。试看继此之后的“二·二六”事件的描写手法，导演的这种意图就更加露骨了。

这里没有任何说明，便出现了一个身上斜披白布标语的军官，领着兵袭击首相、藏相和侍从武官长的场面。这实际上不是在描写“二·二六”事件，而是在给观众看一部流氓片之类的三个人三种杀法的场面，用来给观众取乐。

这一天，标耕平（一个贫苦学生，在第二集里是日本人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反战活动家）和他的朋友、也可以说是他的掩护人伍代俊介在下雪后的一个公园里散步，相互谈到了这个事件。俊介谈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看法，说这个事件可能是企图建立军人政权。耕平听了这番话象是沉思了一番，然后说明：“那些军官们认为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把工农大众从穷困中拯救出来。”山本导演捏造相泽中校同贫苦农民之间的联系意图，在这里昭然若揭。

必须把“强兵”之本的农民从穷困中拯救出来，事实上这是那些法西斯军官们的口头禅。不过，他们搞政变的目的，和相泽刺杀永田一样，不是为了拯救人民，而是为了建立他们一派的军人独裁政权，以便更积极、更快地加速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对苏战争，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多少有些阶级观点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山本导演却让这些反战活动家在这里宣传法西斯的陈词滥调。

接着出现了与电影情节的展开没有任何关系的处死叛乱军官的场面。他们用白布蒙着眼睛，一一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最后壮烈死去。山本导演对他们的同情该有多深呀！

原著是怎样描写这些事情的呢？一看大吃一惊。原著明明不是把“二·二六”事件的叛乱军官们所说的拯救农民之类的谎言作

为一般的历史叙述，而是作为小说来描写的。

在戒严部队中，柘植少校向贫农出身的军官千田少尉问道：“你也许很了解这帮人（叛乱军官）的心情吧。”千田回答说：“我不太了解。”他进一步指出：“在那里的军官”一个贫农出身的也没有。然后接着说：

“据说农民贫穷是闹事的一个原因。不过，（那帮人）只是一些在口头上和文字上知道农民贫困的人。这一事件对农民作出什么保证呢？一点也不明确。连个具体计划都没有，即使搞了军事暴动，农民也是不会得救的。说因为士兵大半是农村出身的，所以为了强化国军，必须巩固国军之本的农村，这种说法是把问题弄颠倒了。因为不是为了军队才有农村的……”

这是对“二·二六”事件的绝好批判。在原著这部很长很长的小说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是说了些正经话的段落，可是山本导演却与原著写明的这段完全相反，竟把相泽和叛乱军官们塑造成了农民的救世主。

而且原著里面，在被判处死刑的军官中，最初十五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把第二次处刑的北一辉等四名“非军人”写成有意识地拒绝喊“天皇陛下万岁！”这样写是有意义的。而山本导演的电影却只强调了“天皇陛下万岁！”

电影把法西斯军人写成人民的救世主，让人民来要求侵略中国，可见这部电影里没有写出人民真正反战、要求和平的斗争。

在第一集里，标耕平的哥哥、共产党员及其小组的小说家和画家（他对五代俊介产生了影响）出场。耕平的哥哥在“三·一五事件<sup>①</sup>”中被捕，很快自首变节而出狱。之后被抓去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在入伍前教导他唯一的弟弟说：“人也好，思想也好，在自己

---

<sup>①</sup> 三·一五事件：昭和三年（1928）三月十五日对日本共产党员的大检举事件，共逮捕一千六百多名。——译者

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以前不要相信！”这些话是和一个自首变节者很相称。小说家吹得吓人；画家诚实而软弱无力。当时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开始以前，日本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面对现在无法相比的残酷镇压，还是大力展开了反帝斗争。这种斗争，尽管是在漫长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期间进行的，今天对我们也是唯一的鞭策，是人民的宝贵遗产。可是山本导演（原作者亦同）对这些情况却不感兴趣。

在第二集里，标耕平拒绝伍代家的资助，他白天劳动，晚上上夜校，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左翼运动家而登场的。然而他对“二·二六”事件的看法，如前所述，简直错得没边了。他被捕以后受到严刑拷打。在警察拘留所里，和他同屋的反战活动家以及关在别的牢房里的朝鲜革命家遭到严刑拷打，几乎被打死。但这些人物都经起了这种拷问，确是好样的。

然而滑稽的是，在这个拘留所的一间宽敞的牢房里只关着耕平和另一位反战活动家两个人。而不屈不挠的朝鲜人革命家却在拘留所里当杂工。会有这样不合情理的事吗？当时的东京警察拘留所的实际情况是，一个七到十一平米的牢房里要关押十几个人，不管受了多重的严刑拷打，就是奄奄一息，想要躺下都不可能。即使偶尔关押的人非常少，而一间牢房关两个人，也绝不可能把两个左翼运动家关在一间牢房里。象电影里的朝鲜人革命家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当杂工（这是一种特殊的优待），是要关到一个特别的单身牢房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耕平他们两人的牢房墙壁上，清清楚楚用大字写着：“打倒天皇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字样轻轻用指甲写上去是有的，但一旦被警察发现了，马上就会被涂掉，写的人也要被打个半死。可是在电影里却清清楚楚地挥笔大书，耕平在那间牢房里不遗余力地护理着遭到

严刑拷打已经半死的伙伴。看守对此也不过问。好一个仁慈的看守呀！

也就是说，对这个拘留所的描写，掩盖了甚至毋宁说美化了当时天皇制警察极端残暴的本质。要是那样，那末严刑拷打还意味着什么呢？前面已经介绍过女学生和大学教授感想，他们看过电影后称赞说，影片充分地描绘出以前一般被掩盖起来的可怕的警察白色恐怖，他们完全搞错了。同拘留所的描写法互相矛盾的那些拷打场面，既不是描写革命家的斗志，也不是暴露天皇制警察的残暴，乃是和流氓片的私刑场面一样，仅仅为了刺激观众的嗜虐性罢了。因此，那些遭到拷打而死亡的朝鲜人革命家，也不太象个革命家，只是让他们说出希望死在故乡朝鲜就完事了。固然希望死在故乡的这种事也许会有，但是仅仅这样能算是描写了一个革命家的光荣就义吗？我认为这是对朝鲜人的侮辱。

另外，还有人会说，这是利用这种拷打的场面来吓唬观众的，说谁要搞反战运动，就要象这样地倒霉呀！向人们灌输失败主义。这也是一种不合情理的错误看法。不用说革命家，就是真正进步的人，也不会因这部电影就被吓倒。

顺便提一下，这位根本没有描写工农反帝斗争的导演，让调查耕平的特务警察问耕平有没有读过宫本显治的书？有没有读过藏原惟人的书？借此若无其事地宣传日共今天的最高领导，表明他对党中央的忠诚。真是费尽了心机！

## 第七节 反中国和反朝鲜的鼓盪宣传

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自始至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电影也好象在描述中朝人民的抵抗似的，然而不是正确地去描写它，而是加以歪曲，尤其是把重点放在使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激烈对立

上,进行了一种罪恶的反中国和反朝鲜的宣传。

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在中国的朝鲜人徐在林和中国人白永祥代表了两个民族的革命人民。在朝鲜民族“三·一”大暴动时,徐的父母家属遭到日帝残杀,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燃烧起炽烈的仇恨火焰。他是朝中人民联合游击部队的干部,可是民族意识太强,非常粗暴,因而容易感情用事。无论怎么看,也没有描写出来一个代表朝鲜民族的革命家典型。导演在展开故事情节时,非常袒护徐,但却把徐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流氓形象。在这里也体现出那个女大学生所说的:“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日本人沾染上一种体臭似的差别意识。”

白永祥,知识分子出身,是中共满洲省委员会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他是一个很有才干、性情温和而勇敢果断的人物。可是这个人物被企图利用他来充当情报来源的伍代乔介救了出来,让他在自己的公司仓库里工作。这倒还可以,而白却在一个运货车出入频繁、按照常识会布满日本特务的地方,给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发出重要指示,这被伍代的部下偷听到了,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这该是个多么愚蠢的地下工作人员啊!而且这回他又凭伍代乔介的体贴,并得到伍代的部下高岛正典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还从高岛那里拿到逃跑的路费逃跑了。从这里看,仿佛伍代乔介比白永祥高明得多。电影这样来描写中共党员代表,难道不是莫大的侮辱吗?

还有更露骨的反中共、反抗日游击队的宣传。这是在第一集里的故事。伍代运输公司的高岛正典说服“盗匪”,使其同意了从满铁沿线,通过“盗匪”的根据地,向内地运输物资。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不能让日本的特务和军人潜藏在里面。可是乔介却答应了关东军参谋的要求,悄悄地让军事侦察员混了进去。发现这件事的“盗匪”,不仅把运输队全部歼灭了,而且乘高岛不在家袭

击了他的住宅，抢走了他美丽的新婚妻子。高阜和白永祥一起到“盗匪”根据地去寻找妻子，他在那里得知妻子已被带到更远的内地共产党地区。两人又进一步进入内地，见到了徐在林。徐用憎恨的口气告诉高阜说：“你的妻子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被部下奸污了，最后给杀害了，尸体不知道弄到哪去了。”

原著是，高阜的妻子在徐稍一疏忽的工夫自杀了。如上所述，电影竟让中朝联合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去绑架、强奸并惨杀日本人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一个日本共产党员山本萨夫导演可真行！竟创作出这样一个反中国和反朝鲜的蛊惑人心的作品。

山本导演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让徐和白对立起来，让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民族对抗。

在第一集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场面，关于1930年5月的间岛朝鲜抗日武装起义，徐在敦化首次遇上了白，对白大骂中共。徐对白进行激烈的指责，说：“中共满洲委员会驱使朝鲜人搞极左冒险，让朝鲜人承担一切牺牲，而中共党委员会躲在安全的地方就象若无其事似的。”白说：“党是发出了起义的指示，但却没指示叫去冒险。”这完全跟宫本显治今天对下级党员讲的话一样。如此官僚主义地推脱责任，徐当然越发怒不可抑，他毫不客气地说：“要是不冒险就能起义，我倒想领教领教。”

一看到这种场面，就会使观众觉得徐所说的一一都在理上，而中共该多么狡猾呀！原著里也有白和徐的上述一段对话，但原著中白对极左冒险主义的批判写得更有说服力，还描写了白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李立三路线的怀疑；徐本身实际上也犯了极左错误。而且双方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决没有形成敌对。可是，在影片里只是描写得好象中共在利用朝鲜人似的。

在第二集里，徐同白的对立进一步发展起来。

这是在中朝联合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发生的事情。他们被日



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军队包围了很久，粮食也吃光了，战士姑且不说，群众中有的忍受不了这种艰苦而逃走了。徐严禁逃走，说发现违抗者马上枪毙。白表示反对，主张应设法让群众逃走，光留战士在这里坚持到底，待机打开局面。徐认为这样下去会一天天地不好办，主张强行突围，另行建立新根据地。争论得很激烈，表决结果，徐的主张被否决了。但他不服从决定，大喊大叫地说：

我一直是最勇敢地进行了战斗，接受了最危险的任务（实际上在这部影片里，一直是徐在指挥战斗，中国干部只是在根据地开会时才登场）。总之，所以不采纳我的正确意见，就是因为我是朝鲜人，你们是中国人的。姓白的胆小鬼摆出一副领导人面孔，也是因为是中国人的。我再也不同你们一起行动了。我要离开这里到金日成将军那里去。“朝鲜人应同朝鲜人一起战斗！”

对此，白竟然说：“要走你就走吧，朝鲜人！你的民族意识既然这么严重，我就叫你一声朝鲜人吧！”

这种漫长的对立场面实在是目不忍睹。徐也好，白也好，根本不象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家，被描写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两人的对立变成了中朝两个民族的对立。原著里面徐和白之间的对立也写得很象上述那样激烈。不过，在原著里面，六个中国人、一个朝鲜人开会，并不总是采纳白的意见，否定徐的意见；有时徐的意见，竟压倒白的激烈反对，以六比一被采纳了。而且总的来说，徐和白之间并不是民族的对立和憎恶。

在原著里面，这种对立情况发展到最后，在白批评徐欺骗和枪杀逃跑者的时候，徐骂白，想打死他。当徐用手指去勾扳机的一瞬间，徐的爱人、尊敬白是领导的朝鲜女革命家全明福，一下子飞跑过去，用自己的身子去掩护白。正在这时徐的枪喷出火来，明福倒下了。徐充满悲痛的哀思抱着明福走向雪原，把她埋葬在

那里。

这是原著中最动人的部分，但影片却不是这样。徐与白等人决裂后，率领全明福及其他朝鲜同志，离开根据地，走向金日成将军的麾下。不久在中途发现傀儡“满洲国”的讨伐队来了。这时徐接受明福的批评，重新回到国际主义革命家的立场，为了营救留在根据地的中国同志，勇敢地进行了佯动牵制战，全明福战死。徐在林抱着她的遗体，从雪原向祖国朝鲜方向走去。不久筋疲力竭，一边抽泣，一边把爱人的遗体埋葬雪下，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作为一个情节不知应如何评价，但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行动，它同在东京警察拘留所受刑致死的朝鲜革命家的最后表现是一模一样的，给人一种过于望乡悲叹之感。

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原著虽然也有使中朝革命家对立的部分，但山本导演的影片却进一步扩大了原著的这种缺点，一味强调中朝革命家的对立，给人一种感觉好象这种对立是基本的，其政治用意是很明显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人民的反美帝和反日本军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不可动摇的，双方用鲜血凝成的团结，是无比牢固的。可是热中于反中国的日共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御用电影作家却嫉妒中朝的这种团结，而且怕得要死。因此，他们在电影里使双方对立起来，特意把中国方面描写成只是利用朝鲜人的坏人，尽量使日本观众对中国党留下坏印象。

如果导演想认真描写“昭和史”，就应该清楚地描绘出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抗日斗争中最根本的事实，双方紧密团结一致，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最后，并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在他们之间有时或许有战术上的争论，也许偶尔有些民族感情上的摩擦。然而这不是本质的，不过是一时的插曲，很快就会解决，本质则是始终团结一致的，是国际主义的革命同志的友爱。而山本导演却把它本

未倒置了。

这种事并不是普通反动作家和军国主义作家轻易能想到的。这正是反对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作家的独到之处。他们反对高呼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团结一致万岁！而高呼分裂对立万岁！当然这是美日反动派的口号。

一般说来，对中国人的描写简直太不象话。连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女大学生竟然也嗅到影片对中国人和朝鲜人“沾染上体臭似的”差别意识。

在第二集里出现过两三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人侵华北的游行示威的场面，然而气势不大，而且沿路观看游行的人们脸上毫无表情，这同日共修正主义者今天搞的“秩序井然”的葬仪式的游行如出一辙。实际上，1936年12月9日，从北京的大学生开始，发展成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那些频繁的抗日游行，抗拒着中国卖国武装警察的猛烈的武力镇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进行了斗争。影片对这种整个民族的崛起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因此，在“一二·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后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毫无关系的、孤立的事件了。这时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飞赴西安解决这一事件，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影片里根本没有表现出这位革命家的伟大形象，而且显得有些庸俗，只出现过胖胖的“周恩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镜头，这次活动的内容和意义不仅没有用画面表现出来，而且连解说也没有。

还有，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富豪的小姐赵瑞芳，为了摆脱日本宪兵的追查，不是依靠中国同志来进行工作，而是花了大笔金钱求助于一个不伦不类的日本女谍报员（原著也是这样），把这类根本莫须有的事描写得象惊险片似的。这不也是极大地侮辱了中国革命组织吗？

拿这部影片的战斗场面来说，日本军队一次也没打过败仗。日本军队总是勇敢地冲锋，刹那间就占领了中国军的阵地，简直就象战争时的日本新闻记录片一样。徐在林指挥的抗日游击队，痛快地把散敌军，出现过两三个仿“西部剧”的场面。而被打散的总只是伪满傀儡军。在原著里有日本军败退逃跑的事，但堂堂皇军被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游击队打败，这种事是日本人山本的帝国主义自尊心不能容许的吧？或者是导演考虑到那样一来会使日本观众不满意呢？

## 第八节 与亚非人民团结战斗！

对《战争和人》的反动性谈得稍微过细了一些。本来这部电影，好也罢，坏也罢，不是战争片和“昭和史”的电影化。如前所述，它是一部过分商业性的情节片。

在第一集里还多少可以看到影片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之类的历史性大事件的痕迹。可是到了第二集，正如从原著题名《骷髅的舞蹈》改为《爱与悲的山河》可以推测到的，影片是以由纪子和柘植、俊介和温子、顺子和耕平、徐在林和全明福、赵瑞芳和服部医生这五对恋人为中心的货真价实的情节片。而且还尽量加了很多迎合一般人的低级趣味的场面，如仿“西部剧”的武打、流氓片的残暴场面和刽子手的刀技、色情场面等；并且请来很多当代很红的电影明星，挖空心思地讨好观众。

如果就是这些，也就无需在这里去提它了。但是，它竟这样地把群众引诱过去，伪造历史，美化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使人感到好象人民渴望而且乐意侵略“满洲”，灌输反对朝鲜和反对中国，尤其是反对中国的思想，进而捏造中朝的分裂和对立，向观众灌输最恶劣的军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毒素，因而就必须对它进行彻底

的揭露。

万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谴责这样的影片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中国人默不作声，我们日本人民也应该彻底进行批判。

今年(1971年)正月，在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新春访问党首脑”的节目里，日本广播协会的解说委员在与日共主席野坂参三对谈时，拿话套野坂说：中国人竟然连日本的反战影片都进行攻击。“日本大多数人认为那样的批判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野坂觉得这话正中下怀，便说：“据说(谁说的?——井上)，那只是根据听说的，并没有看过电影，就进行了那样的批判。那部电影我也看过。《战争和人》那可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啊!……”，对中国进行了诽谤(《赤旗报》1971年1月4日)。中国方面可不是野坂那种人，不是连《军阀》和《战争和人》都没有看过就进行谴责的，而是确实看了以后才说那是一部很坏的影片的。

本来，一个修正主义政党的头子，大肆称赞党员摄制的反对中国的电影，攻击中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可是以进步自诩，说唯有自己在日本是最了解毛泽东思想，说象自己这样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是没有的，如此自负的研究中国的专家，竟然在《周刊朝日》(1971年7月23日)杂志上发表如下的文章，真是令人吃惊。

首先谈谈写过好几本有关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书的新岛淳良教授。他认为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的经验完全不同”，影片《战争和人》“只是从日本人的立场来摄制的”，因此即使中国人把它说成反动影片，“制片人员也完全没有权利去生它的气。……纵然确有其事，也有该写和不该写的问题。”

其次是野村浩一教授。野村教授曾于6月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派遣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中国，刚一回国就说：中

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和人》的评价有分歧，“我们这边有很大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总结，也没有“很好地整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最后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家竹内好。他说：“这次的《战争和人》，说明双方（日本和中国）的分歧很大。中国方面可能意见很大，总之日本和中国的立场是不同的。要说现在马上就要取得一致，那是办不到的，首先双方要有个一致的立场，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知道中国方面认为这部影片是反动的，是军国主义的，但是似乎一致认为从“日本人的经验”或者“处境”来看，是可以有不同的评价的。三个人都没有明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它不是象中国方面所说的那种反动影片。但只能解释他们的话里有这样的想法。

这种说法是对这部极其反动的影片的极其巧妙的辩护。中国人看也好，日本人看也好，反动就是反动。并不是因为日中两国人民的“经验”和“处境”不同，评价才有分歧。即使在同样的日本人中，垄断资本和反动的“立场”则会变成反中国的“立场”；而受本国帝国主义统治者折磨，因而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人民，是同中国人站在共同的“立场”上的。这种日本人内部的“处境”、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岂止对影片《战争和人》的评价会带来分歧，还会带来决定性的对立。

听到“处境论”后，我很想引证一下东南亚各国对西村防卫厅长官的自卫队亚洲派遣论的猛烈反击。西村长官曾于10月11日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谈到当亚洲太平洋地区发生天灾的时候，如果受灾国要求援助，就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去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来看，确实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道主义的建议。然而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一致

强烈反对,认为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表现,从而提高了警惕。

10月18日《每日新闻》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说“连对国际问题的反应并不那么敏锐的印尼”也很快提到西村的发言,“在印尼以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程度,对日本发起了攻击。”《每日新闻》在这一报道的结尾评论说:“西村的发言好象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使大多数日本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亚洲人的怀疑”。其实受到无缘无故怀疑的是“大多数日本人”,而对少数垄断着日本的财富和权力的人来说却是有缘有故的怀疑:把电影《战争和人》说成是反战片的,是同西村等人站在同样立场,把派遣自卫队到亚洲各国救灾说成是人道主义的人,如果我们同警惕西村设想的中国、朝鲜、印尼等国站在反帝反军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那末即便是日本人也会把《战争和人》看成是反对中国、反对朝鲜的军国主义的反动影片。

《战争和人》今后还要接着出第三集和第四集。象东宝制片公司1967年以来的《8月15日事件》那样的电影,一定还会在什么地方继续摄制出来。在今天的日本,直截了当地赞扬侵略战争的电影,已经不受群众欢迎了。今后还会出现打着什么反战非战啦,描写什么生活在极其艰苦情况下的人们的苦恼啦,或者说什么“为了救灾而向亚洲派兵”啦等等招牌,实际上是灌输军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代替旧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影片。

对诸如此类的货色,我们要培养起明确的批判能力,坚决进行斗争。为此最重要的是应该坚定地站在反帝反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民的立场上,虚心地向那些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折磨、今天能够最敏锐地看穿、警惕和反对已经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的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学习,同那些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

在我们日本人中间总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动不动就盲目崇拜

欧美人的意见，并引用这些意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作谁也不引为奇怪。但是一引用朝鲜人、中国人、东南亚人或者非洲人的意见，则马上轻蔑地说是什么迎合啦，追随啦，经验不一样啦，立场不同啦，等等。这本身就是一种中了蔑视亚非的帝国主义毒素的思想。

然而，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认识得最锐敏、最深刻的是其最大的受害者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不首先向他们学习，此外还能向谁学习呢？不首先团结他们，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反帝和反军国主义的战友呢？

我们在文化战线方面，也要向亚非人民学习，团结亚非人民，同已经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



## 第二篇 结束了什么?是怎样 “结束”的?\*

——评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

### 第一节 导演山本的借口

关于影片《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我在本杂志(《舞曲扇林》)的第4号(1970年12月)、第8号(1971年8月)以及亚非作家协会日本委员会编:《亚非作家丛书》第一号(1971年12月)上,作了相当详尽的批判。结论是这部影片决不象山本导演所吹嘘的、一般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及其变种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等所赞赏的,是什么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反战影片,不仅如此,而且影片没有暴露、毋宁说是美化了侵略中国的元凶,并且把日本人民描写成军国主义的赞颂者,歪曲中朝抗日革命家的形象,对其进行诽谤和中伤,煽动中朝的民族对立,应该说是一部最反动的影片。

象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在一个影响不大的杂志上,不管从历史和思想上怎样进行批评,作者也许不会介意的。但在第二集上演时,日本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传来了中国要人的批判,山本导演对此也就似乎不得不说点什么了。

---

\* 这是一篇批判影片《战争和人》终集的文章,曾载在《舞曲扇林》第18号(1973年12月发行)。单独把它拿出来,可能不太好了解它的意思。然而它是前面收录的《最近的日本电影上的军国主义》的续篇,我对影片《战争和人》的批判也到此结束,所以重新收录在这里。——作者

《周刊朝日》杂志 1971 年 7 月 22 日号所归纳的中国批判的要点是，这部影片的本质不是反战的，毋宁说是赞美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攻击的表现，并列举了具体例子，如这部影片把日本垄断资本家的某一家族作为主人公，没有描写日本人民；没有描写中国和朝鲜人民大众怎样受日本帝国主义折磨，怎样进行抵抗和斗争；中国人民被描写得十分软弱无力；把抗日游击队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对立起来，企图离间中国和朝鲜，等等。

对此，山本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批判不是在很好地看过电影之后进行的；因为中国与日本共产党对立，所以凡是日共称赞的影片，无论如何也要说它不好；同时还说明了作者的“意图”。他说：“第一，始终想简略地介绍一下昭和史（侵略满洲的历史），想让年轻人学习昭和史。同时，……想让人们了解今天的日本几乎和当时一样，又在走同当时一样的道路”；“第二，深深感到今天美军在越南干的，和过去关东军的侵略手法并无二致”；“第三，想让那些认为所谓战争即战场的年轻人了解‘所谓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其次，山本对没有描写人民大众等具体意见反驳如下：

“我深知对人民大众的描写确实不够。然而当时是人民大众被蒙在鼓里的时代，虽然作过调查，可是很多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还有描写得过长、需要压缩的制约和虚构的局限，所以在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痛苦方面出现了缺点。这个问题想在第三集里搞清楚。

“说对朝鲜游击队的描写法是企图离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略）此外还有的批判说，为了考虑在营业上要赚钱，拍了妇女的裸体像等，但这决不是为了迎合观众，而是为了强调在战争中妇女是受害者才加上裸体镜头的。”

在《日中》杂志第7号(1972年1月)上,山本在同编辑部人员、原著作者五味川纯平的座谈中,更加详尽地谈到了与此当然完全相同的内容。不管山本是怎么说的,我确信我对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这与中国的批判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正确的。这点在这里就不必重复了。不过,山本的上述发言,在相当于第三集的“终集”里,究竟是不是实现了呢?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分析。

## 第二节 终集的梗概

首先想介绍一下“终集”的主要梗概。

影片一开始通过解说和画面介绍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梗概,即从1928年到1937年12月,日本军攻克南京和当时对市民进行大屠杀等历史事件,以及终集的主要人物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里所阐述的史观是与当时的军部和今天文部省审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完全相同的。其具体例子,这里从略。请参考发表在本杂志(《舞曲扇林》)第8号上的我对第二集的批判文章。

一进入正片,首先出现的是伍代财阀的长女由纪子的华丽面略显孤寂的新娘子的身影。她对同柘植大尉的曲折恋爱(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主要主题)已经死心,遵从父亲由介的劝告,同东亚银行的经理雨宫的儿子结婚(但不久又决定离婚。一点也没有暗示她为什么要这样结婚的)。

另一方面,与伍代家的最小的女儿顺子相爱的反战活动家标耕平,接到了一周后要到仙台联队入伍的通知。于是顺子在哥哥俊介(耕平的好朋友)的帮助下,瞒着父亲同耕平结婚。在耕平住的一间破旧而狭窄的房间里,只有互相爱慕,互相信赖的耕平、顺

子和俊介三个人，他们那种充满纯洁的爱情和决心冲破前进中的苦难的结婚场面，同披露由纪子政略结婚的虚假豪华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让妹妹和亲密的朋友结婚之后，俊介去东北地方旅行。在那里，偶然遇上一个贫农的姑娘苦，为了她的一家被迫要去卖身，在他的帮助下，当了伍代家的丫鬟。

在伍代财阀内部，当家的由介抑制“满洲”分公司经理的弟弟乔介和长子英介要大力发展军需工业的强烈主张，认为不能搞那种投机勾当。但是当他从雨宫那里得到最近要制定国家总动员法的机密情报之后，预见到战争将要大规模地长期发展下去，便马上去巴结军事中央当局，转向正式的军需公司。

耕平在内地兵营受到严格训练和下级军官的可怕的私刑制裁的折磨，不久被派到中国山西省战线，顺子坚信耕平一定能够活着回来，在耕平的老伙伴们的贫民救济社做工作。

俊介为了得到免除兵役的特权，到伍代产业满洲分公司去当领导职员。从一开始就热爱上了俊介的苦，随他之后来到海拉尔，在他的住处只尽了一夜的热恋之欢，第二天早晨当俊介尚在睡梦之中，她便从那里溜走，不久便沉沦到烟花巷中。

电影的主题是反映耕平和顺子、俊介和苦这两对年轻人，在激烈的战争下体验了怎样的苦恼、反抗和爱情的。第二集是五对恋人的故事，其中还有朝鲜人的抗日游击队同志的恋爱，日本医学者对一个中国富豪的小姐的倾慕，情节庞杂，外观上显得规模宏大。但终集则集中于上述两对恋人的故事上。在这一点上它比第一集和第二集紧凑了，画面也有很多为低级趣味女青年所喜爱的瑰丽场面，作为情节片比前两集搞得更出色了。

耕平在内地兵营对下级军官的私刑制裁并没有积极反抗，一向在忍耐之中采取不服从的态度。在战场上当命令他用刺刀去刺

杀中国俘虏时，他说什么也不干。不久在部队烧光中国村庄时，严厉命令他打死乱跑的孩子，耕平竟敢不开枪。因而惨遭上司用枪托殴打而失去知觉。在险些被打死的时候，八路军来抢救村民，于是日军撤退，耕平被八路军救了，高高兴兴地进入解放区。

顺子从公报上得悉耕平战死，但几个月后，由于宪兵来搜查顺子的房间，她才知道耕平还活着，在解放区，她自己也高兴得象重又活过来一般（到此，两个人的戏，以团圆告终）。

俊介也反对扩大战争。他与志同道合的前辈、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田岛一起，在准备发动对苏战争的关东军参谋们的面前，义正词严地指出：按日本的经济力量说来，发动对苏战争无论如何不能取胜，进一步扩大战争是不行的，结果被关进监狱。田岛受到宪兵的拷打；而俊介靠伍代家的势力获释，但取消了他的免除兵役权、到海拉尔当地部队入伍去了。

不久，关东军在诺蒙坎发动了对苏战争。在欢送俊介等人的部队出征的日本人中，出现过苦拼命找人的身影，但两人谁也没发现对方。在诺蒙坎，日本军被占压倒优势的苏军歼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柘植少校也壮烈战死了（到此，由纪子和柘植的戏“结束”了）。俊介的部队也全部被歼灭，他好不容易幸存下来。当他在战场的废墟上徘徊的时候，遇到了乘挎斗摩托车的参谋军官。军官严厉训斥俊介是胆小鬼，命令他回部队去。俊介拿出枪来对准军官，逼问说：“告诉我，全部被歼灭的我的部队在哪里！”军官仓皇逃去。

惨败的日本兵，溃不成军地“凯旋”回到海拉尔。前来迎接的日本人中有苦。俊介看到了苦。两人面面相觑、互相睨视。俊介喝了苦递过来的茶水，茫然若失地离去。始终谁也没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醒悟过来的苦朝着走远了的俊介的背影喊道：“当兵的！到我这儿来玩呀，我会非常爱你的哟！”（于是，两人的戏到此也“结

束”了)。

电影的基本情节到此结束。除此之外，还有乔介同关东军参谋关于战略的议论和交易、中央军事当局会议等场面，但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此之后，解说里说，在日本的诺蒙坎战役失败的同时，希特勒出兵占领了波兰，战火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因此，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与其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主动发动的，莫如说是在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风暴之下被迫干起来的。

### 第三节 怎样描写了侵略者和抵抗者？

影片《战争和人》的这一部分不是第三集，而被写成是终集。在到拍完第二集时，原作者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要拍成电影，不能半途就停下来，要拍到小说原著结束；山本导演也是这样打算的。这一点在前引《日中》杂志座谈会上已经讲明。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使他这次拍完就“结束”了，从而使电影大大脱离了原著。因此，我们作为观众只好认为作者通过这部长篇巨著所要诉说的意图，大致到此业已结束来对它进行评论。

那末这部影片结束了什么？是怎样结束的呢？山本导演试图要说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这点弄清楚了，通过电影画面看到了战争的结局，在这个范围内“结束”了作者所谓的“昭和史”，是这样吗？

不管怎样捧着说，也根本看不出影片是在这种意义上结束的。

在这部影片里，对发动和指挥战争方面，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描写了日本的军部、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内部的鸽派和鹰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对鸽派作了肯定的描写，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暴露帝国主义的本质，而且美化了鸽派帝国主义。不仅如此，它还把那次侵略战争描写成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是人民大众所期待的；通过

炮制伪“满洲国”给日本贫农造成仿佛得到解放似的幻想，对此竟然作了肯定的描写。

在继此之后拍成的“终集”里，并没有统治阶级内部的鸽派批判鹰派的镜头，只有那些无知的狂热追求战争的军人随便把战争扩大下去。而且连以前对协助战争持慎重态度的伍代由介也很快利用总动员法，加深同军部的勾结。山本导演也许企图借此暴露鸽派垄断资本家的本性也是帝国主义。可是，在此以后，影片却使由介同乔介、英介的对立进一步发展，甚至让英介攻击他父亲，说他怀有敌对思想。这样一来，由介仍然被美化成仿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从而赦免了他对侵略战争的罪责。

影片对被侵略的一方是怎样描写的呢？已经不象第一集和第二集那样，不再让朝鲜人、中国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占电影的相当部分。山西省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只是稍微露了一面。从表面看来，显得象是作了正确的描写。

被日本军绑在树上当作刺杀靶子的被俘游击队战士不让蒙眼睛，瞪着日本军，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场面，和日本军烧毁村庄，屠杀、奸淫老百姓，八路军来救的场面，山本导演拍出这些镜头恐怕是针对对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安排的。他会装腔作势地说：“如果有意见，那就请看了煞尾再说吧！”

但是，这个场面的主人公是标耕平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是在突出耕平，描写他不服从日本军的蛮干的，而且正象他同顺子约定的那样，“要活下去为反对侵略战争而奋斗。”这一场面是为了使情节剧以团圆收场而安排的，不是从中国人民方面来描写他们的抗日的。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命令耕平刺杀的那个俘虏，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那个俘虏就不会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一定还会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并且不仅光描写那个俘虏不要蒙眼睛，还会把其他一切俘虏也同样写

得很有英雄气概。

其次，那个日本军烧毁村庄，八路军来营救的场面，所描写的主题也不是揭露日本军的残暴和八路军同中国人民浑然结成一体的力量，而是为了给耕平到解放区去制造一个机会，并为了刺激观众的嗜虐性和色情的情趣面安排的。所以八路军一来，日本军就撤退了。没有让八路军去追击和打败日本军。只是救了耕平，导演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山本真的想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让观众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末日，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想预示这次战争“结束”的情景，那末它的结构就会同这部影片完全相反。譬如说，他就必然要把八路军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兵团等情况拍进去。而在其“终集”的结构中，根本没有描写中国人民抵抗的场面。

这样一来，在影片里尽管日本军没能战胜中国人民，然而也决没有被中国军打败。从第一集起到终集止，不管哪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一次也没有打败日本军。而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苏联的大坦克群和空军。这就是影片《战争和人》所描写的战争“结束”的模式。

#### 第四节 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裸体镜头等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山本导演预定说要在第三集里充分描写的、日本人民的痛苦和抵抗又是怎样“结束”的呢？这点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苦被迫想卖身；一个是顺子对前来劝她不要再搞贫民救济工作、叫她回家的姐姐由纪子说：伍代产业公司的工人发生了工伤就被惨无人道地赶了出去，而且后者仅仅是顺子的话，并没有用画面表现出来。在苦的卖身问题上，贫农的苦难也是从农民的嘴里说出来的，而对使农民受苦的元凶（地主的剥削和侵略战争



的重压)哪怕一句半句也没有。

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它的主题也不是描写贫农,不过是作为俊介与苦相结合的一个机会而安排的。这同安排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场面是为了结束耕平同顺子的恋爱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场面一开始是俊介正在村道上写生,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骑着马迅猛地跑了过来,差一点撞上俊介,她怒斥道:“哪有在道路当间儿画画的笨蛋!”说着驱马跑过。这充分表现出苦的野性奔放、热情和天真。在这里,苦骑在马上,效果非常好。

可是这匹马却使苦这一家变得不象是贫农了。在父母说服俊介不得不把姑娘卖给他的时候,苦正在刷洗马。哪里会有这样的马棚和马的极穷的贫农呢?这个时期在东北地方有马的贫农偶尔也许会有。对农民来说,马是仅次于生命的重要生产工具,不管多么穷,马是不能卖掉的,因此可能是不得已才卖女儿。然而画面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暗示。而且从房子的外观和几个家庭成员的面貌来看,并不特别穷得很惨。

还有百思不解的是,村里的人们对苦被卖去当妓女并没表示任何同情,反而把它当成嘲弄和耍笑苦的材料。这样的贫农是不会有的。其次,一个场面是,苦作为伍代家的丫鬟出现。恐怕连小学都没有很好上过的一个东北极穷的贫农姑娘,被带到伍代家里,不是在厨房打下手,而一开始就在客厅接待客人斟茶倒水,当作一个漂亮的丫鬟来使唤,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在厨房里当下手可能没有机会向少爷求爱;如果是一个漂亮的丫鬟,就容易成为情节剧里的女主人公,所以才这样安排的。由于这样一种荒唐的安排,苦及其一家便离帝国主义战争下的苦难人民的典型愈来愈远了。我根本不认为山本导演是想描写人民的痛苦的。这种苦闷的财阀家的少爷同奔放、美丽的贫农姑娘的恋爱,不过是为了博得庸俗人的欢心而已。

从这种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角度说来，美女的裸体镜头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这种色情镜头很多；在终集里，也有三处。最初是顺子和耕平的裸体拥抱镜头。导演可能会说，因为是两个人结婚的初夜，所以这是当然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处理，也并不是不能表现两个人相爱的热烈程度的。毋宁说这样一来，反而只能使两人的爱情庸俗化了。十分清楚，不管理由如何，这种镜头是企图把纯洁的形象变成商品，用女明星吉永小百合在床上的裸体镜头来勾引观众的。

其次是苦在海拉尔逼俊介同她共同过夜的场面。这两个人全身裸体厮混的镜头，纯粹是色情电影。这样看来，当耕平所在的部队袭击中国村庄的时候，日本兵把一个妇女的衣服扒下来，赤条条地抱着走的镜头，尽管山本导演会说，这是为了表现在战争中女性被害的情形，不过谁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与此同类的情况是出现过在日本军队内部下级军官虐待新兵或者日本军野蛮地对待中国人的场面。这也并不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残暴本质。因为影片拍成一些恶劣的下级军官这样作，好人是不会这样作的。这和第二集里特务警察拷打的场面是一样的，只是为了迎合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挑逗其嗜虐情绪而已。

## 第五节 修正主义的巧妙的“结束”

不去暴露侵略者的本质，倒去美化侵略者；不去正确地描写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也不去描写日本人民的痛苦，竟用色情的和私刑的镜头引诱群众。看来不能不说这部“终集”在结构上也是同第一集和第二集一样的反动影片。

一部分批评家也许会说：“可是……”，“这集同第一集和第二集相比，不是好得多了吗？也没有象以前那样歪曲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尽管还不充分，还是暴露了日本军的野蛮行径。尤其是井上，以前不知为什么没有进行具体分析，但耕平的反抗不是很了不起吗？俊介虽然有财阀家少爷的弱点，但他也进行了同他身分很相称的反抗。影片会给现代青年很大鼓励。”

我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这种评价标准，是说“选择危害少的”“总比选择危害多的好些”。这种标准是想要一步一步地承认过去的战争和法西斯年代的现实，并使其合法化。

耕平的反抗，是不能当作现代青年的榜样的。他不服从，只是一味忍耐，一次也没有站出来积极反抗。他也有很好的机会逃到八路军那边去。可是他根本不想这样作。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合法主义者。说什么在当时的日本军队里，谁能作得超过耕平呢？好象唯有抵抗是忠于历史事实似的。这种说法应该住口！

比方说，他应该看一看根据上等兵奥崎谦三在法庭上的供词编的《山崎，枪毙天皇！》一书，奥崎上等兵不管是高级军官，还是下级军官，对蹂躏自己人权的人进行了彻底的、积极的反抗，并加以惩罚，保护了自己和士兵伙伴们。这不是虚构，而是奥崎本人在中国战线，在运输船内和在新几内亚战线进行斗争的事实。而且就是在中国战线上，逃往解放区的人也不少。现代青年的榜样应该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耕平。

俊介那套反抗是说应该估计能不能取胜，不应进行不能取胜的战争。这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则。而且他的这种估计，也只是根据敌我物质生产力的对比，可是拿关东军参谋们的唯一的最大精神支柱“皇军士气”同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士气相比，后者远远压倒前者，而俊介也好，田岛也好，他们根本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没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耕平和俊介的那种反抗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现代的反抗只是这样就不成了。现代的反抗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

帝国主义进行积极的反击。

在这部影片里，反抗者只有知识分子，在工人和农民以及工农出身的士兵当中，没有一个人进行丝毫的反抗。他们只是戏弄被迫卖身的姑娘；在兵营里净说些下流话；对上级的命令无条件地服从，什么野蛮行径都干得出来。这是把某一方面的历史现象给普遍化了，歪曲了历史的本质。

而且反战活动家耕平，尽管是个知识分子，然而他是穷人的孤儿出身，边劳动边上夜校，在工厂作工，一贯不服从，总是挨上司的整，而财阀家的少爷俊介，用枪对准不讲理的军官，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个人的最大反抗性和他的阶级性没有关系，竟成了个性的问题。作为个别现象，这种情况也许会有，然而本质还是阶级性问题。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只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不会正确地描写反抗问题的。

既不能正确地描写被侵略的中国方面的抗战，而日本人民和士兵对本国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完全没有或者很软弱，因而就根本看不到击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要害。这样一来，山本萨夫导演的《昭和史》是没法结束的。在《战争和人》里面，“人”的这面被偷换成各种恋爱故事，尽管情节多少有些勉强，总算全都“结束”了。可是“战争”这方面怎么处理的呢？于是拯救山本的神人出现了。这就是苏联大军！“终集”的战争，主题已经不是日本侵略中国，那只不过是两起恋爱故事的部分背景。主要事件是对苏战争的准备，实行及它的惨败。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前所述，是为了渲染耕平的，而以中国方面为主体的描写根本就没有。在诺蒙坎战役中的苏军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中的主角。苏军不仅作为日本军的对手，从日本方面进行了描写，也从苏联方面进行了充分描写。如果不是这样，苏军和苏联电影界也不会协助摄制第三集的。

苏军利用各种佯动和谋略麻痹日军，在此期间作了极充分的准备，突然转入总攻击。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苏联的大坦克群铺天盖地而来，这该是多么压倒优势的气概啊！这在日本电影中是空前宏伟的豪华场面。在这个伟大的苏军面前，日军望风披靡。而与这种情景相比，什么八路军，什么人民游击队，显得多么渺小呀！

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苏联才是可怕的！

这是导演山本萨夫的《昭和史》和影片《战争和人》的结论。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苏联军队根本没有出现。在那里面一直主张“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此为前提，在“终集”里，通过充斥银幕的画面得出“苏联才是可怕的！”结论。山本导演可能不是从拍第一集起就是这样构思的，但是，既然他想以他的基本立场，即反华、亲苏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昭和史》，那么结果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是这样。

修正主义是百分之百的合法主义、非暴力主义、“唯武器”论和“唯生产力”论，它是和性的颓废、残暴情趣，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资产阶级的颓废相结合的东西。

由此可见，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是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必然展开和结论。这是多么巧妙的修正主义的“结束”和完成啊！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日本军国主义 第四册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作者 =

页数 = 2 6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